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著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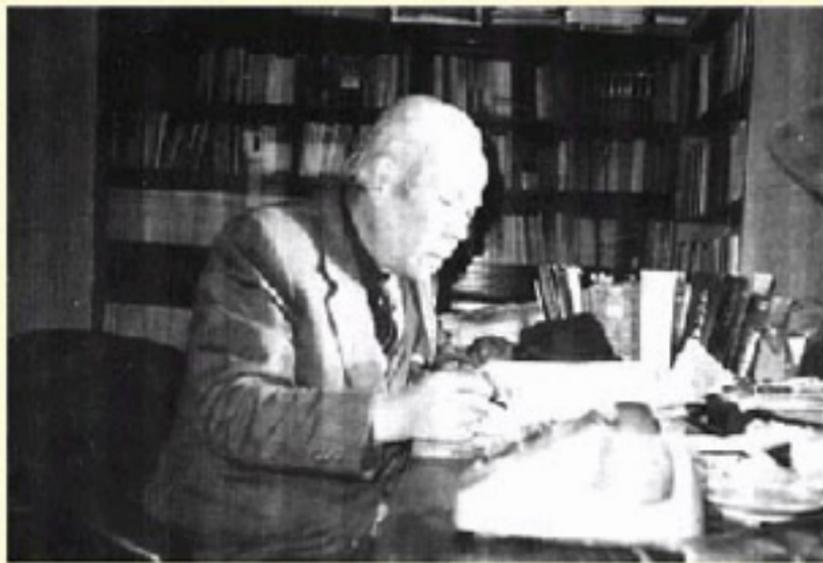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SHANG HAI DE
ZAO CHEN

ZHou er fu



周而矣

上海和平日报

第十卷

十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遷往新址辦公，自即日起，本報將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公告。

周而复手迹

●序

—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

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

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 303 户，我从头至尾参加

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

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 303 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

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

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

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

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

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

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的革命历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举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刘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丁学雷的黑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他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进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罪恶活动，欺骗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没肃清。这就需要揭开他的画皮，让人们看看他丑恶无耻的嘴

脸，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丁学雷之流的谬论。转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来：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丁学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接着他说：“徐义德就是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

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怪也！”

“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是先把对方打成“敌人”，然后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对方，这样便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了。实际上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回，丁学雷更进一步，把小说中的人物徐义德，打成“反动家伙”，接着便可以在作者头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厂里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丁学雷引的一段话后面，紧接着又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须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

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怎么能够说资产阶级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要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动家伙”呢？难道说民族资产阶级欢迎“限制”，决不“反抗”，才算是“正动家伙”吗？这成了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真是“奇哉怪也”！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然，这条分清敌我的界限适用于民族资产阶级。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甚至划为敌人呢？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当然，他也不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

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为什么？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

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那末，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丁学雷表面批评小说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说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小说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小说美化资产阶级的一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说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小说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小说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

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第二部小说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小说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各方面的斗争过程，抹杀得干干净净，独出心裁地溢之为“个人的觉悟”，而且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一夜之间”是丁学雷之流的“创造发明”。小说里写了“五反”工作队领导工人阶级和徐义德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解释，是丁学雷之流变的张冠李戴的戏法。小说所描写的，是指一向骑在工人头上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资本家在工人面前低头认罪，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个历史性变化，而不是指资本家徐义德本人。这能算美化

资产阶级吗？难道要工人阶级不领导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低头认罪不痛改前非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吗？五反运动结果的事实表明小说的描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丁学雷之流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千方百计地暗中反对。请听丁学雷说：“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段引文里，除了第二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段是用黑体字以外，其余都是老宋体，在当时凡用黑体字的表明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第一和第三点分析引

文虽然不是黑体字，但从行文来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把人和事以及观点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分析，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应该以他比较近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否则得不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丁学雷之流在这里大耍花招，把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做为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条件下的论据，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是从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后部分摘来的，原文是这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其他的阶级关系怎样呢？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

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条件和各阶级所处的地位而得出上述的分析，即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到了一九四〇年一月，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国际国内的条件起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

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丁学雷引述的第一点分析，是从这段文章中摘去的，引述的很不完整，特别是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他根本不提。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因为国际国内条件变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问题，而是要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并且是做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出来，谆谆教导不要“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

历史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露出地平线了，绘制新中国蓝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召开，国际国内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条件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蒋家王朝

即将覆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马上要诞生了，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于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更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的问题，而是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人民之中。如果按照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的意思，他是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把“敌人”也包含在人民之中了？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也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为敌人的，如朱延年，最后依法处理。这只是极少数人，并不是一“翼”。正如其他阶级也有转化为敌人的一样，如工人阶级中就出了王洪文这样凶恶的敌人，不能因此也把工人阶级划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右翼”来。丁学雷之流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二点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丁学雷把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简直是不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打死这部小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

笑到惊人的程度。举的例子是马慕韩。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了。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来看丁学雷是怎么分析的：

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

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举的例子，却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和“有中变无”法。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

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丁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

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

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

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

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什么？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

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

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

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鞠，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

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

附 录：

为党的政策而战

——揭露“四人帮”批《上海的早晨》和
制造“桑伟川事件”的真相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黄浦江畔，风雨交加。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卢湾体育馆，一位名叫桑伟川的青年，被当众戴上了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位青年处之泰然，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冷冷一笑。

桑伟川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命运如何？震动上海、波及全国的“桑伟川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长期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所关心的。

如今，真相大白了。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

桑伟川，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评论《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遭到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处七年徒刑。“桑伟川事件”是“四人帮”蓄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要从丁学雷的文章谈起。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作者的署名“丁学雷”，乃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笔名。这篇文章是“四人帮”授意起草，由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修改、定题，然后交给“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作为“炮弹”发出来的。随后，新华社转播了这篇文章，在一个月內，《人民日报》连发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章。“四人帮”之意不在评书，而在反党，借机攻击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勾结林彪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桑伟川读了这篇文章，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而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不平则鸣。过了三天，即七月十四日，桑伟川就着手写批驳丁学雷的文章了。这个小伙子出身于劳

动人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五六年进厂当实习生。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尤其爱好哲学和文艺。他勤于思考问题，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仔细了解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同小说对照起来加以思考、分析。两个星期功夫，初稿写出来了。桑伟川领导的青年哲学小组，对这篇稿子讨论过六次。大家围绕稿子的基本观点以及是否公开发表等问题，展开了自由而激烈的争论。桑伟川听取组内同志一些好的见解，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他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联系实际。对作品评论，不是谁说了算，要根据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看是否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桑伟川把稿子寄到《文汇报》。这篇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阐明了与丁学雷的原则分歧。桑伟川认为，小说“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

桑伟川的文章很快地落到张春桥的手里。这个

国民党老牌特务一看，如获至宝，随即“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发给一批积极分子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立即下令了解桑伟川的“情况”，要《文汇报》加紧做好“批桑”的准备工作。

《文汇报》赶紧拟订了一个“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发稿计划”。张春桥看了两遍，又密密麻麻写了一段黑批示。他承认：“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他所指的中间派，就是人民群众。他心怀鬼胎，阴险毒辣，下令“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那个余党也学着主子的腔调一旁吆喝，批道：“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的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

为了这次“演习”，《文汇报》着实忙了一阵。准备工作如此“充分”，连“桑伟川一方”的动态都探得一清二楚。会前，《文汇报》派人找桑伟川“摸底”，然后密报张春桥。

在张春桥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演习”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桑伟川衣着整洁，兴致勃勃地来《文汇报》赴会。“对立双方”摆开了阵容，一方人数

众多，如临大敌；而另一方只有桑伟川一人。“讨论”一开始，桑伟川就开门见山地说：“对这部小说，我是带着问题去看的。对丁学雷的文章，我也是带着问题去看的，觉得很难说服自己。就拿怎样写资本家的本质这个问题来说，丁学雷的文章说马慕韩露出了马脚：既然是有马脚露出，那么作者也就不能算掩盖资本家的本质了……”他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奇怪的是，对方保持沉默，几乎没有打断他的发言。原来，按照张春桥一伙的布置，先要“让桑伟川充分把观点放出来”，然后再抓住他的“辫子”，对他进行围攻。而桑伟川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在团团包围之中，单枪匹马地和对方辩论了三个多小时。他用事实和道理，把飞来的帽子、棍子打得落花流水。

十一月二十日，《文汇报》按照张春桥的旨意，发表了桑伟川的文章和信，并加了一个由张春桥和那个余党修改定稿的“编者按”，诬蔑桑伟川同志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煽动“一切革命同志”都来投入“这场批判与反批判的斗争”。当天，《文汇报》派人了解桑伟川的“反映”。桑伟川严正指出：“你们的‘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这应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单靠下个结论。”他说：“问题越辩越清楚。为了便于争论，你们可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一发批判文

章，群众看了都吓得不敢讲话。”

桑伟川哪里知道，“四人帮”就是要用法西斯大棒，封住人民的嘴，不让群众讲话，以便任他们愚弄、宰割；而他自己，正是“四人帮”及其鹰犬拚命要猎取来“杀一儆百”的对象呵！

以《文汇报》的“编者按”为信号，张春桥一伙对桑伟川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文的和武的两路夹攻，帽子和棍子双管齐下。

《文汇报》上，一片刀光剑影。短短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评论、报道、来信、座谈纪要等等。

《文汇报》的“编者按”发表以后，过了三天，桑伟川就遭到批斗，从此连续不断，逐步升级。过了二十天，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亲自出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文科座谈会上叫嚣，桑伟川“是右倾翻案思潮的产物”，要把他“放到社会上批”，并指令一些单位去揪斗桑伟川。主子一声令下，马天水、陈阿大等立即行动，霎时间，上海掀起了一个跨行业的“批桑”运动。

辱骂和殴打，封不住桑伟川的嘴。一有机会，他就张开嘴巴，为坚持真理而抗争。请听听他的声音吧！

他对《文汇报》的人说：“你们的‘编者按’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公开认错！”

十二月六日，桑伟川在批斗会上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对吗？要好好区别两类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允许保留。”别人喊口号：“彻底批臭《上海的早晨》！”桑伟川却高呼：“《上海的早晨》是香花！”这天晚上，宣布他“留厂审查”，又拉去批斗。他遭到拳打脚踢，眼镜也被打坏了。

十二月八日，《文汇报》派人“摸”桑伟川的情况。桑伟川说：“昨天我在隔离室里，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想了一下。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批判会开来开去这些内容，还是我讲得多，他们讲得少，断章取义，讲不过我。”说着，他打开本子，“我理了四条：一、批判会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使人心服口服；二、不准人身攻击，不要将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三、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四、要对我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他的要求合情合理，他的态度恳切感人。可是，当时他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伙干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敢这样办吗？

每天，从批斗会回到“牛棚”，桑伟川已精疲力

尽。但是，他不休息，他还要写。不是写检查交代材料，而是写揭发批判文章。不仅写，而且投给《文汇报》、《红旗》。

十二月十五日，桑伟川在《〈文汇报〉形“左”实右倾向必须纠正》一文中写道：“我写了一篇文章，触犯了哪家的皇法？对作为群众一员的我专政，试问你们是什么阶级？”

十二月三十日，桑伟川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瞎叫嚷一通，把不同意见的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自己一面孔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凡是不同意他者都是‘牛鬼蛇神’，‘新毒草炮制者’。他们玩尽马列主义理论名词愚弄群众。从极‘左’到极右，软硬兼施，为着吞吃人的灵魂。”

在“牛棚”里，倔强的桑伟川，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踱步沉思。就这样，他怀着“为真理而斗争的”激情，送走了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夜晚，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黎明。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帮”精心策划下，《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丁学雷的文章，题目是《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黑文，是反动文痞姚文元亲自下令，要《人民日报》到上海“组

稿”，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炮制出笼的。姚文元把原来题目中的“路线斗争”改为“阶级斗争”，露出一副刽子手的凶相。在这篇文章里，丁学雷贼喊捉贼地说：“桑伟川的专业不是文艺工作而是煤气技术。然而，他却很懂得利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接着，丁学雷赤裸裸地叫嚷，类似桑伟川这样的“反动思想”，“决不是一棍子、两棍子打得死的”，要“不断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几十年、几百年，直到确实打死为止”。这篇黑文发表后，对桑伟川的迫害越来越疯狂了。

桑伟川看了这篇文章，怒火中烧，难以抑制。他对《文汇报》派来的人说：“丁学雷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要写文章批判丁学雷。上次客气一点，用‘商榷’二字，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你们《文汇报》敢不敢发？”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改变观点的话，就是叛徒。我是死也不会改变的！”

张春桥一伙没有料到，桑伟川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竟然如此“顽固不化”。他们对桑伟川咬牙切齿：不能把他打死，也要把他拖死。在“四人帮”指挥下，各行各业，甚至连郊区，都搭起了“批桑”班子。批斗会越来越频繁，最多的一天“游斗”了七次；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大的一次是拉线广播大会，强令六十万人参加。据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斗”桑

伟川共达二百九十多次。难以想象，桑伟川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他年老的母亲又流了多少眼泪！一天早晨，桑伟川的母亲看见儿子病在床上，再也不能去“游斗”了，于是打电话要求让他在家里休息半天。谁知不一会，一批打手冲到桑家，用拳头猛打桑伟川的头，把他从床上拖走，把桑母推倒在地……

铁打的汉子桑伟川，始终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反革命淫威。批斗会上，他从不低头。即使狠命用力按下去，他也要把头抬起来，按一次，抬一次，再按，再抬。实践教育了他，使他抛弃了一切幻想，更加坚定地昂起了头。越是不准他讲话，他越讲，同时用笔战斗。

桑伟川为什么而战？

“四人帮”诬蔑他“反革命”、“搞复辟”等等，他不屑一顾，并引以为光荣。有的庸人却说他是“为个人名利”。对此，他很难过。一九七〇年春天，他在给童年好友的信中说：“想与你倾诉一下不白之冤，似乎我写那篇文章真是为了我个人的名利。不，有哪一点对我有好处？除了我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为党的政策而战有利于自己外，对个人主义是根本没有好处的。”

“为党的政策而战”——桑伟川概括得多好呵！在反迫害的斗争中，他揭露的，他保卫的，他宣传的，

无不关系到党的政策——“党的生命”。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坚决要求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歌颂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大声疾呼，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拿棍子打人的法西斯行径，“必须暴露之，彻底批判之”，“这里毫无妥协的余地”！

他痛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人民日报》里“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引用列宁的语录，揭露“四人帮”扮演着“牧师”与“刽子手”的两面角色，怒吼道：“你们牧师不要当了，不要再给我说教了，我的观点至死不变。你们还是当刽子手吧！你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判我死刑，我就雄赳赳上刑场！”

桑伟川为什么战斗得这样英勇？

打开法院《桑伟川案件》的卷宗，单是读着他一九七〇年给朋友的几封书信，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道：“桑伟川呵，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请看看吧——

四月二日，他写道：“据他们在批判会上说，我的前途是危险的。也许是在某天，你将会在那一张布告上看到，有一个叫桑伟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啊！其实，那图画画得太不像样了。尽管他们吓唬人，说要枪毙我，但我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五月一日，他写道：“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故不可能一帆风顺，打成反革命我早有思想准备，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随着斗争的发展，问题总是会弄清楚的，又有什么可怕呢？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必须作出必要的牺牲而换取革命运动的进展。也只有自己投入运动，引火烧身，才是个革命者的样子。那些贪生怕死，躲躲藏藏的人，怕政治风浪的，不做修正主义者才有鬼哩！……让春青放出最大的光辉来吧！在这方面，我刚刚跨出理论结合实际的第一步，也是脚踏实地前进的第一步！”

五月三日，他写道：“经过批斗，我得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更大的勇气，也考验了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风浪，是否是马列主义的。”

八月二十三日，他写道：“让革命的洪流来锤炼我们吧！世界是光明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桑伟川的信心和勇气，来自真理，来自群众。一九六九年底，他曾经奉劝披着“左”派画皮的张春桥

一伙：“如果一定要横行不法下去，到头来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知道中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还有广大革命群众呢！”

群众站在桑伟川一边，以各种方式同情他，支持他，鼓励他。

《文汇报》的“编者按”一发表，邻居就对桑伟川寄以无限的同情。在桑伟川所在的单位里，许多同志为他鸣不平。“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慌了手脚，“批示”道：“我感到煤气公司有一伙人参与桑的反革命活动，希抓紧对桑的批判，深挖现行反革命。”结果，二十多名职工遭牵连，受迫害，连给桑伟川看过病的医生也不放过。青年哲学小组被打成“桑伟川反革命小集团”，小组成员遭到隔离审查、变相抄家、撤职下放。在上海，不管哪个单位，只要发现同情桑伟川的人，便马上列为“专案”。某化工厂一个青年女工，为桑伟川说了几句公道话，立刻遭到批斗。某单位一个青年理论小组，在讨论会上表示支持桑伟川的观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不仅如此，张春桥一伙还把魔爪伸向外省市。他们鬼鬼祟祟，收集各地寄到上海的来信来稿，从中搜寻“张伟川”、“李伟川”，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加以迫害。可是，人民的嘴是封不住的。

一个化名“李骊”的读者给桑伟川来信说：“你

的勇敢、无畏，感动着我和每一个人。你并不孤独，很多人在支持着你。希望你为崇高的理想奋斗终身。”

上海国棉二十九厂一位青年工人写信给桑伟川说：“希望你为了真理和革命继续战斗。真理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人民的声音，给了桑伟川无穷的力量；而张春桥一仗却吓得发抖了。一份份小报告送来：“桑伟川大肆放毒”，批斗会“被桑牵着鼻子走”，群众“对批桑无动于衷”，“批不起来”，“批不下去”，把桑放在外面“太危险”，等等。于是，“四人帮”又耍了一个诡计，由其余党马天水出面，唆使人打报告，捏造了一个桑伟川“殴打群众”的罪名，“要求”公安部门将他拘捕。马天水接到这个报告，连夜批准执行。第二天，在卢湾体育馆召开大会，当场把桑伟川抓走。

“四人帮”用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对桑伟川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最后把他逼疯了。即使如此，心狠手毒的张春桥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又以桑伟川散布“攻击性言论”的罪名，一九七五年非法判处桑伟川七年徒刑，押解外地农场劳动改造。

人们不禁要问：对《上海的早晨》和评论者“小人物”桑伟川，“四人帮”何以如此大动干戈？他们一手策划批判《上海的早晨》和制造“桑伟川事件”

的目的何在？

原来，“四人帮”勾结林彪，在党的九大上，恶毒攻击和诬陷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迷梦。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供认：“九大以后，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就是继续整陈毅等同志，借这篇文章来否定陈毅等同志长期以来在上海执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诬蔑他们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攻击他们执行的无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是什么‘阶级调和’、‘右倾投降’、‘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等等。”桑伟川同志的文章触到了“四人帮”的反革命要害，这还了得！张春桥一伙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以批《上海的早晨》做为突破口，又一手制造了“桑伟川事件”扩大突破口，既要封住人民的嘴，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又要借此攻击、诬陷和打倒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攻击矛头实际上也是对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着敬爱的周总理的。他们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干着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在群魔乱舞的时候，桑伟川曾经警告张春桥一伙：“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但终究是要完蛋的！”

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桑伟川曾经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待等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落实之日，也是对小说《上海的早晨》评论及一系列问题水落石出之时。”

桑伟川的预言实现了！“四人帮”，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彻底完蛋了！

沉冤得到昭雪，正义得到伸张，桑伟川同志解放了！他母亲含着热泪，连声说：“谢谢党中央！”

八月十一日，浦江两岸，骄阳似火。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礼堂举行的大会上，宣读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桑伟川同志平反的判决书。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人心大快。

这时候，人们的目光一齐射向“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徐景贤，是他，直接参与了对《上海的早晨》和评论者桑伟川同志的恶毒诬蔑和疯狂迫害。现在，反革命分子徐景贤龟缩在台上的角落里，低着头接受历史的审判。

这时候，人们的心呵，在想着因住院治疗而缺席

的桑伟川同志——“四人帮”铁蹄下又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又一个为党的政策而战的无畏战士！

新华社记者 东 生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电）

第一部

1

一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汽车远远驶来，在柏油路上发出轻轻的吱吱声。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小奥斯汀穿过了横马路，降低了速度，在梧桐的阴影上开过来。

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黑漆大铁门开了，迎面站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卡叽布制服的门房老刘。他伸开右手，向里面指着，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他旋即关紧了大门，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汽车后面溜进来似的。他过来拉开小奥斯汀的车门，里面跳下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浅灰色底子淡蓝色条子的西装，打着一条玫瑰红的领带；长型的脸庞微笑着，两腮露出两个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眼光机灵地向四边一扫：院子里没人。他橐橐地走了进去。

这人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外号叫酸辣汤。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梅佐贤本来并不是办纱厂的，是开饭馆出身的商人。他的表哥裘学良是沪江纱厂的厂长，就凭这个亲戚关系到厂里来的，起先是担任事务主任的工作，最近升了副厂长。裘学良经常生病在家，不来上班。梅佐贤这个副厂长，几乎就是正长了。他在纱厂工作也和他开饭馆一样，钱经过梅佐贤的手，他总要弄点油水。比如说厂里发代办米吧，本来应该向上海粮食公司采办的，但是没有油水可捞，他就向庆丰米号采办。沪江纱厂总管理处的职员和厂里职员家属的代办米，都是庆

丰送去的；有时，在梅佐贤的默许之下，还掺杂一些霉米进去。那时候，梅佐贤所得到的油水当然就更多了。大家吃代办米发现霉味，自然有些不满，甚至于发了牢骚，梅佐贤表现得更不满，他当着职员的面骂庆丰，说这样做生意是自寻绝路；可是下一次的代办米仍然是要庆丰送去。一任事务主任，梅佐贤捞到的油水不少，他同人合伙，开了一家碾米厂。工人说，鸡蛋到了梅佐贤的手里也要小一圈。这个比喻并不过火。在上海解放前夕，厂里的钢丝针布、皮带皮、棉纱等等东西，直往他家里搬，起初说是保存起来，以后就变成梅佐贤的了。

他做这些事体总经理并不是不晓得，但他不在乎。因为总经理要更大的油水，梅佐贤可以在这方面献出他的才能和智慧。只要总经理的眉毛一动，他就晓得总经理在动啥脑筋。凡是总经理要办的事，假如别人办不到，只要找梅佐贤，没有一件不能完成的。而且，有些事只要总经理稍为暗示一下，他就懂得应该怎样去办。他的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总经理肚里的蛔虫，就是这样得来的。因为字太长，又只能说明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不很贴切，叫的人比较少，也不经常。酸辣汤的外号在厂里是无人不知的。他自然并非不晓得这个外号，有时听到了倒反而很得意：我梅佐贤就是酸辣汤，你把我怎么样？现在从事务主任爬

到副厂长的地位，是总经理面前的一位红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梅佐贤走进了客厅。穿着白卡叽布制服的老王捧着一个托盘轻轻走过来，把一杯刚泡好的上等狮峰龙井茶放在梅佐贤面前的矮圆桌上。梅佐贤悠然自得地坐在双人沙发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向老王望了一眼，谦和地问道：

“总经理回来了吗？”

“刚回来，在楼上洗脸。”

“请你告诉他，我来看他。如果他有事，我在这里多等一歇没有关系。”

老王点了点头，去了。梅佐贤揭开矮圆桌上的那听三五牌香烟，他抽了一支出来，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烟盒子，很自然地把三五牌的香烟往自己的烟盒子里装。然后拿起矮圆桌上的银色的朗生打火机，燃着了烟在抽，怡然地望着客厅角落里的那架大钢琴。钢琴后面是落地的大玻璃窗，透过乳白色绢子的团花窗帷，他欣赏着窗外花团里翠绿的龙柏。

楼上传来咳嗽声。梅佐贤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他连忙熄灭了烟，站起来拍一拍刚才落在西装裤子上的烟灰，整了一下玫瑰红的领带。他晓得总经理快下来了，目光对着客厅的门。果然楼梯上有人

下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缓地往下移动。梅佐贤走到门那边去，像是接待一个贵宾似的在那边等候着。

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容光焕发，脸胖得像一个圆球，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实际上他已是靠五十的人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修理得很整齐，油光发亮，镜子似的，苍蝇飞上去也要滑下来的。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我是蒙不白之冤，这个年纪应该有白发了。我的三个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头发不白。”如果朋友们凑趣地说：“那是怕你纳第三个姨太太。”那他就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乐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嘻嘻地笑笑。上海解放以后，他的说法有一点修正：“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

梅佐贤曲背哈腰迎接了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

“总经理，又来打扰你了。”

“来了很久吧，累你等了。”徐总经理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

“刚来，没啥。”

徐总经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贤对面的单人沙发里，把整个沙发塞得满满的。他抽了一支烟，一对鱼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顶，嘴里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

梅佐贤仔细留神徐总经理的脸色，眉宇间很开朗，嘴角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晓得今天徐总经理的情绪很好，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总经理，汕头的电报到了……”

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型的脸上：

“那几批货色怎么样？”

“都脱手啦。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三百八十件，装到汉口广州的二十支一共八百三十二件全抛出了。”

“多少款子？”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

“划到香港没有？”

“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的紧了，不容易套。这个数目又不小，想了很多办法，靠了几家有港庄的字号才划过去。因为这个原因，电报来迟了。”

“他们办事总是这么慢，汕头这个码头靠香港那么近，来往又方便，还有广州客户，有啥困难？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套汇的办法多的很，了不起多贴点

水不就行了。”

“那是的，”梅佐贤心里想：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别人亲手经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一要可靠，不能叫政府发现；二要划算，汇水贴多了又要心痛。但是梅佐贤嘴里却说，“他们办事手脚太慢，心眼不灵活。不怕政府管的紧，就怕我们不下本钱，钱可通神。广东每年有很多侨汇，只要我们多贴点汇水，要多少外汇有多少外汇。”

“你的意见对。那批美棉和印棉有消息没有？”

“货已经到广州，正在接头……”

“要他们快一点脱手，脱手就买进……”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买进糖①。”

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话讲完了眉头还在皱着想心思，就接上去说：

“是不是买进参②划算？这两天香港参的行情看涨，大户多买进。我们买进参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这数目可不小。”

徐总经理没有思考，果断地说：

“还是糖好。香港大户做参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

① 这是他们的暗号：糖代表美钞。

② 这也是暗号：参代表黄金。

汇丰银行，这是大户中的大户，最后他吃通，我们不上那个当。”

“这倒是，”梅佐贤马上改变口气，他自己没有啥主见的，只要老板高兴，他都赞成，“还是糖好，把稳。买进参可能利润大些，但是风险太大，何况总经理又不在香港。”

徐总经理点了点头。梅佐贤又说：

“要是总经理在香港，我看，汇丰银行也不一定斗得过你。你有丰富的经验，看香港市场的变化，决定自己的行动，别人保不住会在汇丰手里栽跟斗，你一定会站得稳稳的。你是上海著名的铁算盘呀。”

梅佐贤几句话说得总经理心里暖洋洋的，表面上却谦虚地说：

“那也不一定。”

一阵囊囊的皮鞋声忽然传到客厅门外，旋即有一片红光闪过。梅佐贤问道：

“谁？”

“还不是那个小王八蛋，”徐总经理以充满了喜爱的口吻说，接着他对客厅门口叫道，“要进来就进来吧。”

门口出现了一位青年，身穿大红方格子衬衫，西装裤子笔挺，裤脚管不大，显得脚上的那双尖头皮鞋越发尖得突出，乌而发亮，和他头发一样的引人注

目。那头发高高翘起，像一片乌云似的盘绕在额角上。他是二太太朱瑞芳生的，徐总经理的爱子。

“又耍啥花样经？守仁，这么大了，没规没矩，见了客人也不叫一声。”

“哦，梅先生，”他轻飘飘地叫了一声，然后轻视地把嘴一撇，昂起头来向外望着，两只手叉着腰，右脚向前伸开，胸微微挺着，显出不愿叫的神情。

梅佐贤不在乎这些，也不注意这些，他讨好地笑着说：

“大少爷越长越英俊了。”

“唉，这孩子，……”徐总经理得意地望了望自己的爱子。

“究竟去不去呀？”徐守仁转过脸来歪着头说，“爹。”

“去当然去，不过……”徐总经理和梅佐贤商量道，“佐贤，这孩子一心要上美国去念书，我总得到英国去好。纺织这门学问，英国是有名的，学好了，回来也好帮我管理这份产业。”

“那当然是去英国的好，总经理的高见不错。”梅佐贤说到这里，连忙望了徐守仁一眼。总经理是听爱子的话的，爱子的主意不好违背。

果然，徐守仁不同意：

“英国，英国有啥好白相？连好莱坞也没有，我

不去。”

梅佐贤看风向不对，马上转舵：

“不过现在美国的纺织业发展得也不错，有些地方超过英国，他学点新技术回来，那对我们沪江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徐守仁立即鼓了两下掌，笑了，觉得梅佐贤这家伙倒不十分讨人厌。

“去美国也未始不可以。”徐总经理每次总是满足爱子的要求的，他说，“可是你的英文底子不行，这两年在圣约翰附中也不好好念书，我看你还是先到香港，把英文的底子打好，再上美国。”

“这倒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梅佐贤的声音。

徐守仁一听到香港，就想起同学们讲的香港好，美国电影、美国衣服料子、美国的……要啥洋货有啥洋货，他当然满心欢喜，说，“去就去，明天走。”

“看你急的，”徐总经理想起香港那厂，他问梅佐贤，“义信运到香港去的那六千锭子，为啥还没有装上？”

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徐义德料到上海保不住，当时没法把他所经营的企业一塌括子搬走，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边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纱尽量外运，变

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他现在站的很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地皮贵，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还是不好找。英国当局限制又严，不久以前才搞到一块地皮，连夜动工盖厂房，看样子下个月可以开工了。”

“再运两千去，佐贤，你看行不行？”

梅佐贤把眉头一皱：“这怕不行。那六千锭子，因为上海没解放，拆运出去虽则比较吃力，还算顺当。现在解放了，要是再搬动厂里的东西，怕工人不答应。”

徐总经理给梅佐贤一指点，果断地说：

“那这样好了，守仁，你到香港去，先到新厂去看看你叔叔，把那边详细情形给我写封信来，催义信快一点开工。”

“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笃定泰山！”他的问题解决了，便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一边大声叫道：

“吴兰珍！”

吴兰珍是大太太的亲姨侄女儿，她家住在苏州，因为准备考复旦大学，就住在徐义德家里。这时，她在楼上大太太的房间里。大太太低声地向她说：

“兰珍，这次考大学，你要好好用功。大学毕了

业，你的前途就有保障了。”

“姨妈，你放心，我一定很好准备就是了。”她已经听姨妈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了，怕她再唠叨下去，说，“我想，考上，大概没问题。”

“还是小心点好。”

“是的。”她听姨妈的口吻有点责备她的意思，低下了头，玩弄着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

“你妈死的早，只丢下你这个女儿，要好好读书，给你妈争口气。”

她点点头。

“你妈临死辰光，还对我说，要我好好管教你，我也上了年纪，管教不动了，要靠你自己。”

“我晓得。”她的声音很低沉。

“我呢，到了徐家，没生育过，朱瑞芳她有守仁，林宛芝是义德心头的肉，只有我无依无靠，义德把我搁在脑壳背后了。我只有依靠你了……”说到这里，大太太的右手扶着吴兰珍的肩膀，想起老来的景象，忍不住落泪，呜咽地说不下去了。

吴兰珍用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给姨妈拭干了眼泪，同情地说：

“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道，你别伤心。”

“不是我伤心，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单是林宛芝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你别理她，好女人不会给姨父当小老婆的。当小老婆的，都不是好东西。”

“你说的对，兰珍，”大太太摸摸她的头发，说，“朱瑞芳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以为她有守仁这孩子……”

“也别理她。”

“可是理谁呢？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多寂寞呀！”

“我陪你。”

“你考上大学，你要念书，不能老在我跟前啊！”

“你可以出去看看戏，听听评弹。礼拜六礼拜天我回来陪你……”

她感激地紧紧握着姨侄女的手。

徐守仁叫了一声无人应，提高嗓子，又叫道：

“吴兰珍，吴兰珍！”

“我在这里，啥事体呀？”

徐守仁又叫道：“看电影去！”

吴兰珍对姨妈说：

“我不和他去。”

“去吧，义德喜欢守仁，你可别得罪他。”

吴兰珍在楼上勉强应道：

“好呀。”

徐守仁向楼上走去，一路上得意地吹着口哨。

徐总经理见守仁走了，向客厅里四下看看没有

人，他把声音放低，生怕有啥人听去似的：

“佐贤，你说的对，现在解放了，锭子不好再随便搬了，今后工人吃香了，新工会里没有我们的人不好办事，你看，……”

“我看，我们把工会拿过来，”梅佐贤端起矮圆桌上的上等狮峰龙井茶喝了一口，怕这句话说过火了点，便用话试探着徐总经理的意图，“你说呢？总经理。”

“我说，没那么容易……”

“唔，确实不容易，不过，不拿过来呢，办起事来也不顺手……”

“你倒想想看……”

徐总经理没再说下去，他那对可以入木三分的鱼眼睛的光芒盯着他：那意思是说这回要看看你的本事了。梅佐贤眼睛一转动，他猜出总经理的心思，就大胆地上了一个条陈：

“把工会拿过来自然不容易，不过这么说说罢了。资本家怎么好领导工会，共产党会答应吗？绝对不会。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会，我们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是他的，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要是不能按照我们的心事办事，至少可以通风报信。”

“妙，佐贤，你真不愧是我的副厂长。”

“全靠总经理的栽培。”

“那么谁打进工会去呢？”

老王走了进来，向徐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咖啡三明治预备好了。”

“晓得了。你去吧，我还要给梅厂长谈几句话，等一歇来。”

梅佐贤听老王的脚步声远去了，他坐到徐总经理旁边去，压低嗓音说：

“陶阿毛怎么样？这个人机灵，能干，勇敢，就是喜欢喝这么两杯，给他两瓶酒，要他做啥就做啥。”

“小陶能行，”徐总经理肥大的手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转过身来，对着梅佐贤担心地说：

“不过，他是过去工会的副理事长呀！”

梅佐贤见总经理发愁，立刻改变了口吻：

“这一点倒是的，总经理看是不是还有办法呢？”

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办法，不过在总经理面前既不能表现自己无力，也不能显得自己比总经理高明。他有意把话留给总经理说。总理想了一阵，思考地说：

“办法当然有，我们过去在他身上也下过点功夫，他过去和工会理事长闹意见，工人都晓得的。他在工人当中有些威信，现在我们再给他帮一手就差不多了。”

“帮一手？”

徐义德见梅佐贤不大理解自己的话，笑了笑，说：

“当着工人的面，我们要对他表示不满意，他也要想法尽量反对我们……”

梅佐贤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总经理面前晃了晃：

“总理想的妙，实在妙！”

总经理嘱咐他：

“你要注意一点：表面上不能和小陶接近；小陶要像过去一样，寻找机会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我们，带头和我们斗争。这样，他给我们做事就方便了。”

“总经理高明，”梅佐贤赞不绝口，“高明，高明极了。”

“你亲自去办吧，别让人晓得。”

“遵命，一定遵命。”

“来，喝杯咖啡去吧。”

他们两人走到隔壁的西餐厅里，继续谈论着，声音仍然很小，听不清说啥，有时爆发出一阵格格得意的笑声，接着又是低语密谈。

2

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走进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些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梅佐贤蹒跚走进去，眼光向两边卡座扫了一下，立刻发现西边最末的一个卡座上有人向他举起右手招了招。他点了点头，走过去。

在西边最末的那个卡座上坐着的是个青年，看上去约莫有三十上下年纪，穿着一身咖啡色的条子西装，打了一条绣着金龙的红缎子的领带，袖子比较短，不大合身，显然是吴淞路旧货店的货色。他站了起来，和梅佐贤握了握手，说：

“这个地方真不错！”

梅佐贤在他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去，笑了笑，说：

“错的地方好叫你来？”

“人又少，又安静，理想极了。”

“特别是这个辰光，”梅佐贤看了看表，说，“五

点钟光景，下午来白相的人差不多快回去了，晚上要
来白相的人还不到时候。”

“地点选的好，厂长，时间也选的好。在上海跟
你走，啥地方都熟，真有本事。”

“一到了厂里保全部，我就不如你了，阿毛。”

陶阿毛是沪江纱厂的技工，虽然只有三十上下
年纪，据他自己说已经有了十年的工龄，单说在沪江
纱厂的保全部做工也快三年了。梅佐贤受了徐义德
的委托，特地选择了闹市中这个幽静的所在来和他
商议。上海解放以后，根据上级给他的命令，他早就
想拉拢徐义德和梅佐贤，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
梅佐贤主动约他今天到这里来谈谈，真是正中下怀。
他换上了西装，比梅佐贤早到五分钟。

“不，我那点技术算不了啥，哪能和你比，厂长，
你是管理全厂的……”

“共产党来了，我们厂长今后吃不开了，要靠你
们工人了……”

“哪里的话，不管怎么样，厂长总比我们工人
强，”陶阿毛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可是高兴，眉毛
微微扬起。他晓得今天梅厂长约他到这里来，一定有
啥重要的事体，便试探地说，“厂长要我们工人做啥，
没有二话讲，一定照办！”

“你当然没问题，别的工人就不见得……”梅佐

贤说到这里，他低低叹息了一声。

“别的工人？也没问题，我在厂里熟人不少，有事体，他们倒也听我的话……”

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谈着，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

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梅佐贤伏在桌子上，喝了一口咖啡，把嗓子放低了说：

“你在厂里究竟认识了多少人？”

“少说也有百儿八十，点头之交，那就数不清了。”

“这次工会改选，你看，你选的上吗？”

陶阿毛了解梅厂长约他谈话的目的。他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努力保持镇静，不流露出来。打入工会，正是他目前要进行的中心活动，梅佐贤也要他进去，那不是一举两得吗？他没有马上满口应承，也没有立刻回答，对着桌上那盏深黄色的小台灯凝神地想了一阵，半晌，说：

“要我选上吗？”

“你能选上最好不过了，以后工会有啥事体，我们都可以晓得，办起事来就方便了。”

陶阿毛摇摇头，有意追了一步：

“怕不容易。”

“选不上吗？”

“唔。”

梅佐贤在徐总经理面前几乎是打了包票，没想到陶阿毛这样不中用，他焦急地说，声音也高了起来：

“你不是熟人很多吗？”

“是的。”

“你不是说工人听你的话吗？”

“是的。”

梅佐贤听他回答很有把握，抬起头来，对着他的面孔，用着质问的口气说：

“那为啥选不上呢？”

陶阿毛轻轻笑了一声：

“上海解放哪，共产党会不抓工会？”

“当然要抓。”

“那谁会选我？”

“主席捞不到，连个委员什么的也不行吗？”

“难。”

梅佐贤不解地问：

“为啥呢？”

“解放了，我们这种人吃不开啦，又不大进步，

……”陶阿毛不断摇头。

“要进步还不容易吗？”

“要进步你也有办法？”陶阿毛有意逗他。

梅佐贤没有一件事体没有办法，他说：

“当然有，你首先反对徐总经理和我，遇事站在工人那边，公开骂我们，我们绝不怪你。我们呢，也到处不满意你，给你颜色看，这样，你就有本钱了。”

陶阿毛听到最后一句话大吃了一惊，不禁信口说出：

“本钱？”

“唔，本钱，政治本钱，有了这个，就好做事了。”

陶阿毛失望地摇摇头：

“这个，我晓得。可是，光靠我一个人也不行。”

“你当然要拉拢一批人。”

“不比从前，现在拉拢人不容易。余静、赵得宝他们是党员，威信又高，他们不用拉拢，谁都跟他们走，我吗，不行。”

“难道你认识那么多的人，一点作用也不起吗？”梅佐贤显然又有点焦急了。这件大事办不好，徐总经理那里的“差”是“交”不了的。

“也不能那么说，作用当然有……”

梅佐贤听见有苗头了，立刻笑嘻嘻地接上去说：

“那就好了。我说你有办法，果然不错，真有办

法。”

陶阿毛摇摇头，梅佐贤暗暗吃了一惊：

“怎么？又不行哪？”

“别的作用当然有，选举工会这件事，不容易，不容易……”

梅佐贤眉头一皱，顿时想出了一个主意：

“像从前那样，你带头和我们斗，工人就跟着你走了，你的威信也高了，选举起来就容易了……”

陶阿毛微微一笑：

“现在不是从前。共产党当了家，我哪能够领导工人和你们斗争？”他深深叹息了一声，说，“今后领导工人的是余静、赵得宝他们了！”

梅佐贤圆睁着两只眼睛，失望地说：

“毫无办法了？”

陶阿毛凝神地注视了一下舞池，空荡荡的，没有一对舞伴在跳，但音乐台上还是兴高采烈地演奏着伦巴舞曲，跳动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扉。他看过舞池，暗中顺便觑了梅佐贤一眼：他鼻子上渗透出几粒汗珠，摘下玳瑁边的散光眼镜，用淡红色的绒布在擦，一边不断地问：

“你说，真的毫无办法了？”

“办法，不能说一点没有，可是很难很难。”

“只要有办法，阿毛，别怕难，你提出来，我帮

你解决。”

“现在做事体不比从前……”陶阿毛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又停下来了。

“那是的。”

“公开领导工人，我怎么能赶上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让我领导。”

“不错。”

“只能在少数人当中活动活动。”

“对。”

“有的时候，只能个别活动，又不能明说；叫余静她们知道，事体就坏了。”

“是呀！”梅佐贤听他这些意见都很对，可是还不具体，急着追问，“哪能进行呢？”

“你知道，我是保全部的工人，可以找机会满车间跑，和工人聊聊闲天……”

“这个办法好。”

“有些话在车间里不好谈，人太多，要到他们家里去才能谈……”

“当然，要慎重。有的还可以约到外边谈……”

“家里人多的，谈起来也不方便，自然要到外边来谈……”

梅佐贤长方型的脸庞上露出两个酒窝，正面对着陶阿毛，伸过头去低声地说：

“对象呢？从哪些人身上先下手？”

“先从保全部下手。保全部有个工人，叫张学海，人很忠厚，和我谈的来。他的老婆，汤阿英，细纱间的挡车工，人缘不错，和她谈谈大概也没有问题。通过汤阿英，还可以影响细纱间的女工。一个人拉拢一批，这个数目凑起来就可观了。”

“这个办法很好，为啥早不说？”

“只是做起来不容易，”说到这里，陶阿毛又不说下去了，显然他肚里有话，吞吞吐吐，想说又不说出来，隔了一歇，才说，“又化时间，又要化钱……”

梅佐贤听到最后一句，才恍然大悟自己今天演了一个大傻瓜的角色，给陶阿毛玩弄了这么久，自己一点也没有察觉。但他也不好立即发脾气，工会改选这件事，梅佐贤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他是资方代理人，别说选不上工会，连工会的红派司^①也领不到的。他戴上玳瑁边眼镜，仔细望了陶阿毛一眼，爽朗而又慷慨地说：

“钱没有问题，你要多少，向我拿好了，只要你能选进工会，以后事体就好办了。”

“我试试看。”

“阿毛，没问题，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办到的！”梅

① 红派司。指工会会员证。

佐贤口气非常坚定了，毫不怀疑地说，“你快点和张学海、汤阿英他们谈谈……”

“那没问题，”陶阿毛的语气也很有把握了，说，“明天就找机会和他们接近。”

他们离开卡座的时候，整个舞厅里一个舞客也没有了，连乐队也休息吃饭去了。他们走出昏暗的舞厅，下了旋转的楼梯，见到淡淡的光线，到了马路上，看到一轮红日吊在西边高大建筑物的上空，橘红的阳光洒满一地。

3

汤阿英是无锡梅村镇贫农汤富海的女儿。

她五岁的辰光、逢上个荒年，田里颗粒不收，她爹欠了地主朱暮堂的两石租子。第二年的年成还是不好，没法还地主的欠租，加了一倍，变成了四石。第三年的庄稼也不好，没法还地主的欠租，又加了一倍。到了第八个年头，汤富海已欠了朱暮堂一百一十多石租了。朱暮堂伸出了贪婪的手，先摘了汤富海的田，又扣了他的押板，全年的收成全逼了去，变卖了一点可怜的家产还他还不够，又强迫要汤阿英这个

十四岁的小女孩去抵债，否则要把汤富海抓进“人房”^①。

汤富海舍不得把亲生的女儿去抵债，对阿英她娘说：

“朱半天想要我的女儿，可不能答应！”

朱暮堂一人占有三千亩地，人称朱半天。出村一看：半个天下面的田地都是他的。出村一二十里地，几乎全有他家的田。他自己常常公开给农民讲：“上有神仙，下有我朱半天。”凡是神仙能办到的事，他朱半天也能办的到。神仙能享受到的快乐，朱半天也有法享受到。

他还有个绰号，叫做朱老虎。因为他家的田是出名的老虎田。他订的租额很重，租他家一亩田少则要收八斗，多的要收到九斗半，一般的要占每亩田的收获量百分之七十。出租田亩，只要超过六分，都要按一亩计算。不论年成好坏，全要照租额缴纳，颗粒不得拖欠。欠租不缴，每年要增加一倍。汤富海欠他的一百一十多石租就是这样加倍积累起来的。

阿英她娘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不能答应，朱老虎别想割我心头肉，要么，

^① 人房：地主设立租栈收租，反动政权允许租栈自设监牢，民俗称为“人房”。

我这条老命和他拼了！”

“一定不答应，天下哪有这个理数，我们只欠朱半天两石租子，是荒年时候欠下的，讲道理应该减免了，就是要还，也不过两石。谁晓得朱半天七算八算，变成一百一十多石租了。我一想到这件事体，心里就不服气。”

“是呀，这一百一十多石租子压在我们头上，就是种一辈子庄稼也还不清呀，到来生还要变牛变马还他哩！”

“来生？哼，这一辈子还过不下去哩，朱半天的苦我可吃够了，分明只欠他两石租子，为啥算到一百一十多石呢？我哪能也想不通。”

“谁想的通？我憋了一肚子的气。”

“我的肚子差点给气破了！”

“朱家的算盘和我们的不一样。”

“那不做数。”

“他可要哩！”

“他要怎么样？”汤富海伸出两只满是老茧的黝黑的手，气得手有点颤抖，说，“我给朱半天劳苦了一辈子，落得两手空空，还欠他一屁股的债，叫我拿啥去还？”

“不是要阿英吗？”

“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

“我们要受朱老虎一辈子的气吗？”她想世道为啥这样不公平，日子老是这样下去没法过呀！便问，“能不能找个地方给朱老虎讲讲理？”

“上啥地方去讲理？乡长是他的人，区长听他的话，县长办事要看他的脸色，全无锡当官的都和他穿一条裤子！”

“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

“讲理的地方？”他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朝外边看看，夜已深了，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村里十分安静，人们都睡了。他关好门，回来坐在方桌子前面，低声地说，“讲理的地方有啊！”

“在啥地方？”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根据地？”

“小声点。”他生怕让人听去，警告地说，“隔墙有耳。”

她放低了声音说：

“那快点到那边去讲理呀！”

“那边远着哩，哪能去法？”

“不管多远，总有走到的一天。”她眼睛里露出希望的光芒。

他摇摇头：

“走到了也不行，我们这地方，那边管不着。”

“那我们要苦一辈子吗？”

“谁晓得呢？”他说，“除非我们这里也变成根据地。”

“那边的人为啥还不来呢？”她是多么盼望有个讲道理的地方啊！

“现在不是正在打着么！那边的人来了就好了。”

“哦，”她有点焦急，见汤阿英睡在床上，非常酣沉，想起今天下半晌朱暮堂的管账先生苏沛霖的话，指着阿英对她爹说，“那么，明天苏先生来要人哪能办呢？”

“这个——”他还没想出啥办法来。

从他的脸上她看出阿英她爹心中的苦恼，忍不住一阵心酸，满眶热泪顺着腮巴子不断往下流。这一阵子闷在肚里的怨气再也忍不住了，她放声大哭了。

汤阿英在床上翻了一个身，给哭声惊醒了。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歪过头来，在微弱的灯光下，看见娘扶着方桌子在哭，爹愣在那里。她奇怪地问：

“娘哭啥？”

爹一听到这话，心里十分难受，他咬着牙，想了一阵子，说：“没啥，你睡吧。”

“不，你告诉我。”

“告诉你？”爹皱着眉头，轻轻地摇摇头，说，“大人的事，别多嘴。”

她爬了起来，坐在床上，叫：

“娘，娘……”

娘一听到她的叫唤声，哭得更厉害了。她意识到爹不肯告诉她的原因了。这几天爹和娘一直在为她操心。她跳下床来，摇着娘的肩膀说：

“别哭，娘，别哭……”

娘抬起头来，拭去腮巴子上的热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摸着阿英的小辫子，对着她的面孔望了许久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阿英注视娘的慈祥的眼光，晓得娘有一肚子心思，排解不开，便哀求地说：

“你给我说吧，娘，我听你的话……”

娘抚摩着她蓬松的头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无可奈何地说：

“去吧，娘心里实在舍不得；不去呢，朱老虎不答应，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

说到这里，娘的眼睛又有点润湿了。

“我，我去！”阿英坚决地说。为了家里的生活，她想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

“不，这口气我受不了！”汤富海霍地站了起来，右手有力地向桌子一拍。

“不去，明天一早苏先生就要来了！”

“我去好了，娘……”

“好孩子，娘不忍割去心头肉，可是朱老虎要你

爹的命，留了你，就留不了你爹；留着你爹，好好谋生，可以养家活口，等你爹赚了钱，再赎你回来……”说到这里，想起她这样小小的年纪，要到朱老虎家去受苦受罪，内心如同刀绞一般的难受，娘忍不住嚎啕大哭，再也说不下去了。

爹不忍看她们母女两个，把脸转过去，对着剥落了土的土墙。

汤阿英坚强地跨进朱家的门，迎接着她的是饥饿和寒冷。天还没有亮，她就爬起来做活。朱暮堂和他的老婆稍为有点不如意，就用鸡毛掸帚和棍子没头没脑地抽打她。饿她一天是经常的事，饿她一顿那已经是非常宽大了。在严寒的冬天，朱暮堂夫妇睡在丝棉被里还不够，加上从上海买来的英国制的纯羊毛的毯子；可是汤阿英睡在牛房旁边，连一床薄被也没有，用喂牛的草垫在下面，盖一床破棉絮，连脚也盖不上，一双脚给冻烂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一天夜里，汤阿英偷偷回到自己的家，抱住娘失声痛哭，宁肯跟爹和娘到处去讨饭，死也不肯回到朱家这个老虎窝里去了。娘最初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阿英也不好意思说，最后说了，娘的脸气得通红，看到她给折磨得这样，放声痛哭。哭声连着哭声，两个人紧紧抱着，整整哭了半夜。汤富海回到家里，晓得这回事，觉得阿英再也不能留在村里了。走吧，朱家

要起人来哪能办？不走，又哪能办？娘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爹说：

“不能再让朱半天糟蹋，要离开村子。现在真的应了歌子的调调了。”

“啥歌子？”

“你忘记了吗？‘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眼前三条道，一逃二牢三上吊！’”

“这一带都是朱老虎的天下啊，逃到啥地方去，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娘担心地说。

“逃到啥地方去？”他凝神一望，说，“秦妈妈在上海混的不错，先到她那边躲一躲……”

秦妈妈也是梅村镇的人，是汤家的好邻居，乡下日子不好过，很早以前就到上海谋生去了，现在是沪江纱厂的接头工，在上海落户了。逢年过节，她有时回到乡下来看看。

娘给阿英她爹一提，眉头舒展了，兴奋地说：

“你不说，我倒忘记了。”

“你带阿英去，在秦妈妈那边避过风头，然后找点生活做，别再回来。”

“好，我们去。娘，我到上海找了生活做，把工钱寄回来养家。”阿英一双机灵的眼睛盯着娘，等待娘下决心。

“好是好，只是你还没有长大成人，我叫你离开了家，到上海去找活，受苦受累。”

“不要紧，我身子蛮结实，只要离开朱老虎，又能养活家，就是苦一点，我也心甘情愿。”

“好孩子，只是苦了你啦。”

“娘，你别担心这个，吃点苦没啥。”阿英懂事地说。

娘心里同意了，但还不放心家里：

“家里的事呢？”

“我和阿贵在村里顶着。”

阿贵是阿英的弟弟。娘要他们父子两个和她们一道去。爹不肯。他舍不得离开乡土，就是忍痛离开了，四个人到上海也没法站住脚，秦妈妈家里容纳不下，到啥地方去谋生？留在村里，好歹熟人多，有啥困难，街坊邻居也好照顾。娘放心不下。汤富海在煤油灯下，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你们去，千斤的担子，我挑；有油锅，我下；有刀山，我上！”

“我们走了，你们在村里的日子不好过……”娘说着话，忍不住把头低了下去。

“不走，日子更不好过啊。”

娘和阿英都没有吭气。爹催促道：

“别一心挂两肠，时候不早了，快收拾收拾吧！”

爹连夜向邻居借了点钱，天还没亮，就把母女两个送上去上海的火车。

母女两个从来没有去过上海，一下了北火车站，满眼尽是高楼大厦，几乎遮去了半个天。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又涌过去。公共汽车，电车和各式各样的车辆从四面八方开来，又向四面八方开去。街上每一个人都很匆忙，仿佛都有紧急的事体在身，迟了一步就会耽误似的。

母女两个不认识路，也不敢搭上任何一辆车子，怕给拉到不晓得的啥地方去。她们死死记住秦妈妈的地址，一边走，一边问。快到秦妈妈住处，天早已黑尽了。

北风冷飕飕地迎面吹来，地上结着薄冰，阴暗角落的积雪还没有完全化净，正是三九天气。娘身上那件已经穿了二十五年的破棉袄，怎么抵挡得阵阵寒冷北风的侵袭？她冷得浑身只是发抖，牙齿打颤，问路都讲不大清楚。她抓住阿英的手，跌跌撞撞地走去，嘴里嘀咕着：“该刚的朱老虎，你逼得我们好苦，害得我们冲了家，……”她边走边嘀咕，一个不留心，滑的一下掉在一个半人深的臭水沟里，差一点没把汤阿英带了下去。

汤阿英左拉右拉，好容易把她拉上来，找了一个破墙角，慢慢给她把衣服拧干。那衣服上的臭味，叫

人闻了呕心。阿英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蓝布罩衫，给她穿上。刺骨的北风，加上潮湿的衣服，她身上更是冷得直打哆嗦。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才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走到秦妈妈的草棚棚门前。

秦妈妈见了她们母女两个，又是惊，又是喜。老街坊好久不见了，猛然碰到，感到格外亲切。但事先为啥没有信来，突然半夜三更到了上海，为啥阿英她娘身上发出一阵又一阵难闻的臭味，等阿英她娘把不幸的遭遇一一从头诉说给她听，她才了解个中情况。她赶快把阿英她娘扶到床上，叫她先歇一歇，再做饭给她们两个人吃。阿英她娘一躺到床上，就像是疯瘫了似的，再也动不得了。

阿英她娘病倒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没有钱请医生。她吃不下茶饭，人一天一天消瘦下去，两个眼眶子陷下去，那一对眼睛失去了光彩，木愣愣地盯着阿英。阿英望着门外迷迷蒙蒙的天空，远方的天边有一片红光在昏暗的夜色中跳动，那是南京路一带霓虹灯光的照耀。她想到上海看到的繁华景象，人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手里提着大包大包的东西，有的乘着漂亮的小汽车，风驰电掣一般地过来过去。有钱的人那么多，她们为啥连请医生买药的钱也没有呢？她们为啥这样穷困呢？她恨不能马上找到生活做，有了工钱好给娘请医生，好给娘买药吃，好使娘很快恢复

健康，可是偌大的上海，她们除了认识秦妈妈以外，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谁会马上给她生活做呢？她失望地把眼光收回，望着草棚棚。

那一带草棚棚的灯光早熄了，草棚棚的轮廓也溶化在夜色里，看不清晰。只有秦妈妈的草棚棚里还有灯光，但是很微弱。阿英守在娘的床头，两只大眼睛盯着娘。娘嘴巴一动一动的，像是有千言万语要对女儿诉说，可是动了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阿英一见这情形，忍不住落下泪来，低低地叫了一声：“娘……”

她用手抚摩着娘的额角，给娘理去披在那里的一绺灰白的头发。娘紧紧抓住她的手，生怕她离开自己似的，嘴巴又在动了。过了一会儿，娘终于说话了：“阿英，娘好命苦……”

阿英安慰娘：

“娘，你别急，你的病慢慢会好的。”

“我晓得自己的病，身子坏透了，好不了哪，阿英……”

娘的水汪汪的眼睛留恋地望着女儿。阿英劝她：

“秦妈妈到厂里张罗去了，借点钱来，给你请医生抓一两剂药吃，会好的。”

“来不及了，没有用了，”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感到很吃力，草棚棚里顿时沉寂起来了。半晌，她喘

过气来，才又说，“我舍不得你，舍不得无锡那个家……”

“你别想这些，好好养病，娘。”

“你爹在乡下朱老虎一定不会放过他的……阿贵年纪又轻，不懂事，我们汤家就这样给朱老虎害得四分五裂哪……”

阿英怕娘越说越伤心，有意打断她的话头，说：“娘，你喝点水吧！”

“不，啥也不要了，我的路走到头了。你长大成人，找个事做，好好养活家里，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听娘的话。”

“听娘的话，好好照顾阿贵，这孩子不懂事……全家就靠你……”

娘的话没讲完，呼吸忽然短促无力，眼皮慢慢搭拉下来，最后停止了呼吸。她那一只抓着阿英的手已经松开了，但还压在阿英的手上，好像不甘心遽然离开人间。

阿英伏在娘身上，放声嚎啕大哭，忘记了一切。

秦妈妈下班回来，远远听到阿英悲恸的哭声，料想事体不好，连忙奔进阴暗的草棚棚，在煤油灯微弱的光线摇曳下，模模糊糊地看见阿英她娘直苗苗地躺在床上。她一头伏在床上，伤心地凝视着阿英她娘苍白冰凉的清瘦的面孔，竭力噙住眼泪，劝阿英不要

哭，自己却忍不住不断掉下眼泪。她用袖子拭去泪水，从床褥子底下拿出两张草纸，盖在阿英她娘的脸上。

4

梅村镇在无锡城外，离太湖不过五六里地，站在村头的小坡上，就可以看到辽阔无边的浩浩淼淼的湖水。在蓝湛湛的天空下，透过稠密的碧绿的枝叶，时不时可以看见扯满了帆的渔船静静的驶过湖面。村子里也是像湖面一样的平静。

走进村子不到半里地，靠右首有座很大的花园，灰砖高墙，里面是五进五开间的高大平房。平房后面是一座精致的花园。花园侧面有条火巷，通往牛房和仓房的道路。

这座花园的主人是朱暮堂。他的花园把梅村镇分成两个世界：花园里面是人间乐园，有的是吃不了的大米白面，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化不光的金银财宝；花园外边周围简陋的房屋里居住了辛勤而又善良的农民，一年忙到头，仍旧穿件破棉袄，吃的糠菜食。不但梅村镇的农民都种着朱家的田，就是外村外

乡的农民也种着朱家的田。朱暮堂的花园是建筑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而梅村镇是天堂下面的地狱。

汤阿英和母亲逃到上海第二天，朱老虎派狗腿子苏沛霖账房先生到汤家来要人。汤富海回说没有看见，吵了一通，没有下文，苏账房走了。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太阳已经偏西，苏账房又来了，要汤富海到朱家去。汤富海料想去朱家没有好事体，但不去也不行，就把八岁的小儿子汤阿贵叫到屋子里，交代了几句话，满不在乎地随苏沛霖到了朱家。

因为天井里已经完全没有阳光了，大厅里显得有点暗，挂在大厅上端红底金字的大横匾上“礼规义矩”四个字差点看不清楚了。大横匾下面当中挂了一幅“丹凤朝阳”的中堂，两边挂着水红色的泥金对子：上联是“蠡羽歌风凤毛济美”，下联是“鸾声吹月蟾影圆辉”。一堂红木家具摆得整整齐齐，越发显得大厅里幽暗。上面横几正中摆着一尊江西景德镇加工特制的细瓷寿星老人，面前是一个红木玻璃盒子，里面装着一只一尺多长的金如意，闪闪发光。

朱暮堂早就坐在大八仙桌子左边的那张红木宝座上，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素缎的狐腿袍子，手里托着一只银制的长长的水烟袋。站在他旁边的是个青年，看上去不过二十刚出点头，圆圆的面孔，满脸是肉，白白净净的，穿着一件天蓝色软缎的九道弯羊庆

袍子，另外套了一件黑缎子的背心。他是朱暮堂的唯一的心爱的儿子，叫朱筱堂。他们身旁大八仙桌上的白铜熏炉里袅袅地飘起檀木的香味。朱暮堂见苏沛霖带汤富海走到大厅里，有意不理睬汤富海，只顾呼噜呼噜抽着水烟袋。抽了两袋水烟，他瞪了汤富海两眼，哼了一声，才慢慢地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你，好大的胆！”

说到这里，他没有再说下去，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汤富海菜黄的脸上，观察他的表情。汤富海跨进朱家黑漆大门以前就拿定了主意，沉着地反问朱暮堂：

“你说的话，我不懂。”

“不懂？别装糊涂！你给我老老实实地招来！”

“招啥呀？”汤富海抬起头来望了朱暮堂一眼。

“招啥？”朱暮堂冷笑了一声，说，“好刁的泥腿子。你说，你把我的丫头藏到啥地方去了？”

“你的？”

“我的，当然是我的，我化了粮食换来的。”朱暮堂站了起来，用媚子指着汤富海的鼻子说，“你快给我招来，否则，哼，别想走出我朱家的门！”

汤富海站在那里纹风不动，把头一昂，强硬地说：

“我正要找你要我的女儿哪，你今天不把阿英交

出来，你请我走，我也不离开你朱家！”

朱筱堂望着汤富海。

“哦，真刁滑，倒给我算起账来了。不给你一点厉害瞧瞧，料想你也不会招的。”朱暮堂转过脸去对苏沛霖说，“你给我把家伙拿出来。”

苏账房向大厅后面走了两步便停了下来，转身对汤富海说：

“你识相点，就说了吧。汤阿英到啥地方去了，告诉老爷，把她叫回来，不就完了吗？”

朱筱堂也说了一句：“是呀，你快说。”

汤富海气愤地盯了苏沛霖一眼：

“我的女儿在朱家，谁晓得她到啥地方去了？我正要问你们哩。你一定晓得，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我绝不甘休！”

“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是好心好意劝你，倒粘到我身上来了，这才是笑话哩。还是说出来算了吧，不说，老爷今天不会饶你的。”

“我不晓得，我说啥？”

朱暮堂看汤富海的态度非常强硬，立刻对苏沛霖说：

“少给他啰里啰嗦的，快拿来！”

苏账房马上向朱暮堂弯腰鞠了一鞠躬，陪着笑脸说：

“老爷，看小的面上，等汤富海一歇。”接着他向汤富海说，“我想你一定是怕说出来老爷不饶你。没关系，你说出来，有啥事体，我给你求情。”

“我没啥事体，还要你求情？”

“出了事体，可别找我。”

“我死也不会要你求情的！”

“好，好好！”

“给他说啥，快去！”

“是，是是，老爷。”

苏账房到大厅后边去了。朱暮堂站得有点累了，他坐到红木宝座上去，把烟子吹着，又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了。不到两袋烟的工夫，苏账房左手拿了一捆粗麻绳，右手拎着两个大笆斗，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把这些物事往地上一放，向汤富海说：

“瞧见了把，这家伙谁也受不了。还是说了算哪！”

汤富海看见两个大笆斗，想起听人说过这家伙厉害，可是他没有动声色，气势汹汹地走上一步，反问他：

“你叫我说啥？你叫我说啥？”

朱筱堂见他走上来，吓得躲到爸爸的背后站着。

苏账房见他来势很凶，生怕吃了眼前亏，立刻把笆斗往地上一掼，挡住他的去路，退了一步说：

“你自家晓得……”

朱暮堂坐在宝座上看见汤富海冲苏沛霖面前走上
来，苏沛霖竟然胆怯地往后退避，叫他气的胡髭都
翘了起来，大声喝道：

“汤富海，你想在我面前造反吗？”

汤富海站在大厅里没动，轻蔑地望了朱暮堂一
眼，那眼光说：你逼得穷人活不下去，弄得汤家父女
分离，就是造反又哪能？

朱暮堂用鼻子使劲“哼”了一声，说：

“好大的狗胆！”他接下去对天井外边说，“来
人！”

有两个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从外边走了进来，
向朱暮堂鞠了一鞠躬，叫了一声“老爷”，就恭恭敬
敬站在汤富海的右前方。汤富海歪过头去一看：是朱
暮堂的两个看家的，两个人的年龄仿佛，身体都很魁
梧，胳膊粗的像人家的一条小腿，一个高的，叫奚福；
矮的那一个叫何贵。汤富海一个人当然抵挡不过他
们两人的膂力。

朱暮堂对奚福、何贵两个人说：

“给我动手！”

同时，他的眼睛向苏沛霖斜视了一下。苏账房懂
得老爷的意思，顿时放下笑脸，上前一步，亲昵地叫
了一声“富海”，便接着说：

“阿英到了朱家，老爷从来没有亏待过她，吃的饱穿的暖。这丫头伶俐，手脚也灵活，老爷蛮喜欢她。你们她交出来，有啥事体都好商量。老东家了，也不是外人。”

他见汤富海没有理睬，又说下去：

“你晓得，老爷是好心肠人，从来不亏待人，你有啥为难的地方，只要把人交出来，总好办。……”

朱暮堂很欣赏苏沛霖的口才，更赞美他善于察言观色，理会自己的心思。他得意地抽着水烟，有意让他说下去。汤富海站在那边看看天色有点暗下来，朱暮堂手里的烟子发着火光。朱暮堂用两个笆斗和那两个看家的在威胁他。他毫不屈服，冷冷地对朱暮堂说：

“我不晓得……”

“你不晓得，”朱暮堂冷笑了一声，说，“我叫你马上就晓得了。”

朱暮堂断定汤富海受不了抛笆斗这种刑罚的，因此，他很有把握要他屈服。他的眼睛瞅着两个看家的，右手拿着烟子对汤富海一指，那两个看家的立刻站在汤富海两侧，掏出口袋里预备好的手指头粗细的麻绳，打了活结，往汤富海头上一套，汤富海倔强地往后退了一步，迅速把绳子扔掉，想往外走。他们两人马上赶上去，把他抓了回来。苏沛霖拾起地上的

绳子，往他头上一套，连忙收紧，一道又一道地往他身上绕，手脚连着身子给捆得紧紧的，一点也动不得。他们两人旋即把汤富海放倒，两个大笆斗一个给套在头上，一个给扣在脚上，又用绳子把两个笆斗缚牢。汤富海的头看不见了，脚看不见了，整个一个人都看不见了，只是在两个笆斗之间露着一截身子。奚福同何贵把他抬到天井里。

这时，暮色从太湖那边悄悄地升起，白茫茫的湖水和天空连成一片。村子里静静的，倦游了一天归来的麻雀一阵阵从村子的天空掠过，有的就落在朱家大厅的屋檐上，发出带有一点儿疲劳的啁啾的声音。

朱暮堂手里托着水烟袋，走到客厅前面的白石台阶上，对奚福说：

“抛吧。”

他们两个把笆斗和汤富海拎起，使劲向对面的青砖墙根一抛，噗咚一声落在石板地上，像两个车轮子似的，直滚到墙脚下才停住。

“去听听他有啥话要讲？”

奚福马上跑到墙根，弯下身子，冲着汤富海的头部仔细地谛听：笆斗里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

汤富海给装在笆斗里，两眼发黑，啥也看不见了，啥也听不见了，只感到浑身上下痛楚。他四肢给捆得直苗苗的，和身子紧紧连在一道，丝毫不能动

弹。他想用力把绳子崩断，可是这绳子非常结实，越用力，捆得越紧，不使劲倒反而显得松一点。他没有办法解开绳子，不得不听凭他们摆布。刚才给他们两个人往空中一抛，重重地落在石板地上，他头昏眼花，人事不知。过了半晌，他才慢慢苏醒过来，不晓得自己是死了呢还是活着，觉得浑身如同给锋利的小刀扎了似的，特别是绳子捆绑的地方，更是痛得要命。他不禁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唤声。

奚福等了一歇，没有听到汤富海说话，便回禀了朱老爷。朱老爷把眼睛一楞，那浓眉下面的两个眼珠子就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气呼呼地说：

“拎过来，再给我抛！”

朱筱堂注视着墙脚下的笆斗，他深深感到爸爸的威力真大！

奚福同何贵把汤富海抬过来，放在地上。汤富海在笆斗里面并没有听见朱暮堂说啥，但他给抬过来以后，马上意识到又要抛了。他头上湿漉漉的，不晓得是出汗还是流血。凭他这个身体，是经不住这样抛来抛去的。他想起阿英母女两个，该早已到了上海，也许已经找到了秦妈妈，正在诉说在乡下遭受的苦难。如果说出来，阿英又要跳进朱家的火坑，那个罪哪能受的了？说不定还要带动她娘。宁可让自己一个人上油锅，也不能再让年纪轻轻的女儿去过刀山了。

他咬紧牙关，忍受刚心似的痛楚。

朱暮堂见他们两个人发呆似的站在那里没动，便生气地说：“快点！”

他们两个人立刻把汤富海提起，往空中一抛，噗咚一声，不由自主地向墙根滚去。奚福这次不等老爷吩咐，主动地走过去，弯下腰，侧着耳朵听：没有一丝儿声音。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低下身子去听：还是没有任何声息。他连忙跑到朱老爷面前，曲着背，说：

“老爷，这家伙死哪！”

“死哪？”

朱暮堂不相信，走下石台阶，皱着眉头，思虑地说：

“给我打开来看。”

汤富海给打开来，满脸血迹，破棉袄的下摆那里也流出红殷殷的血，仍然没有呼唤的声音。奚福用手放在汤富海的嘴巴上，等了一歇，他鼻子里吐出轻微的气息。奚福抬起头来，望着朱暮堂说：

“老爷，还有一点气……”

朱筱堂走前两步去看了一眼，又胆怯地捂着鼻子退回来了。

朱暮堂浓眉一皱，生怕有啥意外，自己推脱不了责任，慌忙果断地说：

“赶快把他送回去！”

苏沛霖懂得朱老爷的心思：立刻送汤富海回家，一不负死亡的责任，二不必贴一口薄皮棺材。他对他们两个人加了一句：

“越快越好，路上不要停，放到他家就回来。”

“误不了事，苏账房，你放心。”奚福边讲，边和何贵松了汤富海身上的绳子，弄了一块门板，急急忙忙把汤富海送回了家。这时天已经黑尽了，整个村子的轮廓消逝在昏暗中。

5

朱暮堂料想汤富海活不成，又怕真的出了事挨到自己的身上来。他第二天一早就派苏账房去探听，回来说汤富海在屋子里呼天唤地叫痛，他放心了。

约莫过了半个月的光景，汤富海慢慢起床能够走动了，朱暮堂又把汤富海叫到他的大厅里来。他晓得汤富海挨过了“抛笆斗”，别的私刑对于汤富海是不会起啥作用的。汤阿英既然逼不出来，那末，眼面前的汤富海正好抓住。他见汤富海一拐一拐地走进来，便放下笑脸，轻声地说：

“汤富海，我们是多年的老关系了，你既然不肯把女儿交出来，欠的那些粮食，你打算怎样？”

“不是早就一笔勾销了吗？”

“汤阿英呢？”

“不晓得。”

“你不做生活，日子也过不去，我倒有个好主意——”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眼光对着汤富海的脸，正好汤富海也抬起头来充满仇恨的眼光在看他，两个眼光碰个正着。

朱暮堂问道：

“你想晓得这个好主意吗？”

汤富海没有理他。

“我说出来，你一定满意……”

汤富海听到最后这句话，心中忍不住苦笑：朱暮堂会有啥好甜头给人家尝吗？他还是不理他，看他究竟又要耍啥新花招。

“靠下甸乡山坡那儿，有四亩六分地，我租给你种，照五亩算，一亩交一石租，多下来全是你的……”

汤富海一听到下甸乡就吃了一惊：从梅村镇到下甸乡足足有十里地，来回二十里，工夫都化在路上，还种啥地呢？再说，一亩交一石租，能剩下多少颗粒给自己呢？他不禁摇摇头：这种地不能种。朱暮

堂不管三七二十一，肯定地说：

“就是这样吧……”

朱筱堂不了解朱暮堂进一步压榨汤富海血汗的毒辣手段，却感到爸爸真正是个大好人，汤富海欠了租子，人又逃走了，还给他地种。

“地太远，租子也太重……这个地我种不了……”

朱暮堂听汤富海回绝不种，马上把脸一板，拍着大厅当中的红木八仙桌，说：

“你不种，就还我的阿英；要末，还我的欠租！否则，哼，我就送你到县里去吃官司！”

苏沛霖在一旁笑脸打圆场：

“老爷好心好意照顾你，你就种吧。种了地，自家的生活也有了着落……”

“你简直不知好歹！”朱筱堂在旁边插上来说。

汤富海知道欠了朱老虎的阎王债，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他有钱又有势，官府里都是他的熟人，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身上，没奈何，只好勉强应承下来。他希望用勤劳的双手把地种好，多打点粮食，自己留下点，可以糊口。第二天一清早汤富海跑到下甸乡山坡那边一看，可把他吓呆了，原来是块没人要的荒地。山坡下面的好地是朱暮堂的桃林。他指着那块荒地骂道：

“好狗操的朱老虎，你真会坑人，要我种这样的荒地，地里打的粮食全给你也不够完租啊！我不能种，我不能种……”

他心中盘算退朱暮堂的地，但一想到阿英她娘病死了，阿英年纪又小，在上海还没找到事，阿贵才八岁，更不懂事，只靠他一个人了。他本想到上海去一趟，手中没钱；家里不种点地，更生活不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咬牙答应种朱暮堂的那四亩六分地。他心想：虽然是没人肯种的荒田，租子又大得吓人，只要多劳动，多施点肥，收成慢慢会好的。有地，才有个奔头。

汤富海披星星戴月亮，白天帮工，晚上回来赶上十里路又做到深夜，鸡快打鸣的辰光才躺到床上，天还没有亮又爬起来。阿贵跟着爹跑，帮着做点轻便的活，递递拿拿。他深耕细作，想尽办法使田不漏水。到了秋天，那四亩六分地荒田完全改变了面貌：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稻颗乌黑，比下甸乡的好地的庄稼还要好。他望着庄稼喜上心头：“你看，还是多苦多劳动的好，打下庄稼，交了租，今年会有点剩余了。”

谁知道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到六石，首先送五石租子到朱家，苏账房刚要收下，朱暮堂听说汤富海交租子，赶到仓房这里来了。他伸手抓了一把谷子，平铺在左手心里，用嘴一吹，见有一点稗子扬起，一边

摇头，一边对苏账房说：

“不行，要过风车，重新筛过。”

汤富海走上去说：

“我已经筛过了。”

“筛过了的谷子是这样？……”

苏沛霖立即叫人搬过风车，插上来说：

“我正准备筛哩，这样的谷子当然不能收，嗨嗨。”

“不能再筛了，……”

朱暮堂不顾汤富海的意见，不满地说：

“非筛不行！苏账房！”

苏沛霖不由分说，把口袋里的谷子往风车里倒。朱暮堂看见筛出来的谷子慢慢堆成一座小山似的，就暗示地和苏沛霖说：

“把我们那个斗拿出来……”

“是。”

苏沛霖从仓房里取出了活箍斗。这是朱暮堂特制的斗，箍是活的，放债时把它收小，收租时放大，一进一出差二升。汤富海辛辛苦苦送来的五石租子，给朱暮堂一筛一量，只剩下四石三斗了。照这样量法，把家里剩余下来的不到一石的粮食再贴上去也不够啊。汤富海愤恨地指着那斗说：

“这斗，不对……”

朱暮堂看汤富海指着他的斗，不由心中发火，眉头一棱，气冲冲地反问道：

“啥不对？你别胡说八道！”

“我在家里量的分明是五石，怎么到这儿就剩下四石三呢？”

“你的斗不准！”

苏沛霖在旁边帮腔说：

“你在路上也许撒了些，风车又筛过了，当然不够了。”

“不对，不对，口袋不漏，路上颗粒没撒，风车筛下的也不多。”汤富海知道朱家的斗有花样，但又不愿吃这个亏，他的两只眼睛怀疑地盯着斗，理直气壮地说，“这斗不准，这斗……”

“这斗怎么不准？”朱暮堂不知羞耻地撒谎，“你说这斗大吗？别说梦话。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绝对不会贪图你的小便宜，不像你们穷人，常常做下贱的事，做骗人的事。朱老爷不是那种人。我满仓满库有的是粮食和金银财宝，谁希罕你的那点芝麻大的谷子！”

汤富海急得脸发红，说：

“我在家里量的是五石，天地良心，五石，一点儿也不少，为啥到你家一量就少了呢？……”

“少噜嗦，快补来！”朱暮堂威胁地说：“不补，欠

租不缴，就送你到县衙门吃官司！”

汤富海知道县老爷和朱老虎穿一条裤子，穷人有天大的理，现在到啥地方去讲呢？朱老虎这个吃死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说到就做得到，啥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他站在那里，没有理睬朱暮堂。朱暮堂要苏沛霖带汤富海回家，连抢带拿又补了七斗。

汤富海家里剩余的粮食拿走，他家里再也没有啥粮食了。他一年忙到头，起早带黑，汗淌在田里，清水鼻涕落在碗里，抵不住朱老虎算盘珠子一动，还是空忙一场，常常锅不动，瓢不响，肚皮饿得贴脊梁。他拄着铁锹，对着那四亩六分荒地出神地望了许久，然后唉声叹气地说：

“要你，我受苦；不要你，我也受苦。苦日子要熬到啥辰光啊！救星为啥还不来呢？”他的眼睛焦急地望着北方的天空。

6

娘过世以后，汤阿英整天蹲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那一对大眼睛越发显得大了，面孔像蜡一样的发黄。她不好意思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痛苦，眼泪只好

往肚里流。眼睛没有神了，嘴角上看不见一点儿笑纹，整日价听不到她的声音。见了任何人她也不讲话，要是问到她，也只是答上一句半句。她没有心思和任何人往来，只是默默坐在草棚棚里。她怀念着死去的娘，盯着床发愣，仿佛娘仍然躺在床上，不相信娘那样年纪就死去，死的又这么快这么悲惨，要不是秦妈妈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弄了点钱，娘也下不了土，真的要躺在床上哩。她和娘到了上海，一直怀念着梅村的那个家。朱老虎这个狠毒的禽兽对爹那么敲打，爹为了她受了这样的罪。一想起这些事，心中难受，仇恨的怒火就在她胸中熊熊地燃烧。她恨不能马上回去报仇，想起临走的辰光，爹的嘱咐，要她们别回去，就在上海找点生活做，她并且答应找到生活做，把工资寄回去养家，哪能回去呢？她在上海只有找秦妈妈，看秦妈妈那样忙碌，又不好意思开口。秦妈妈上工去，她一个人在草棚棚里帮秦妈妈收拾收拾，洗洗浆浆。秦妈妈回来了，就相帮烧饭做菜。

秦妈妈待她就像亲生的女儿一样，看她那神情，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帮助她忘却这个痛苦的记忆。秦妈妈和她商量，还是早点找生活做，或许会好些。她早就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秦妈妈想介绍她去做厂，阿英当然愿意。没有牌头，谁要呢？秦妈妈寻思来寻思去，想了一个好法子：把汤阿英偷偷带进细

纱间去，要她学接头。汤阿英听到这消息，一把抱住秦妈妈不放，激动地说：“要是有了生活做，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

“孩子，我给你说说看，还不晓得行不行哩。”

“行的，一定行的。”汤阿英好像她就是沪江纱厂的负责人，有把握地拍着秦妈妈的胳膊说，“有了生活做，我可以寄点钱回家了。”

“我给你想想办法看。”秦妈妈摸摸汤阿英的头，不愿意说没有希望，但她不肯马上满口答应。秦妈妈从来不说大话，办不到的事，她一定不讲；事情没有成功，也不肯随便答应人家。见阿英想寄点钱回家，她关怀地说：“我去借点钱，先寄给富海他们用？”

“不，”阿英不愿秦妈妈再为她顶债，说，“现在用不着，等我有生活做再说吧。”

“有啥困难，尽管对我说。孩子，我有啥事体，厂里人都愿意帮忙。”

秦妈妈说的是实话。她在细纱间里像是块吸铁石，她走到啥地方，啥地方的人都团结在她的周围；就是在厂里，不论哪个车间，一提到细纱间的秦妈妈，没有一个人不跷大拇指的。任何人有困难，秦妈妈总抢在前面帮助。秦妈妈有啥事体，哪一个人人都乐意帮忙。大家都知道秦妈妈人缘好，没有一个人晓得她是个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上海的时期，

金元券不值钱，时时刻刻往下跌。物价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时时往上涨。工人们领工资那天都非常紧张，拿了钞票就往大门口跑。大门关着，上面有一个小洞。这时小洞外边挤满了工人家属。工人赶到门口，马上把钞票往小洞外边塞，自己家属在门外接了钱，飞也似的奔到米店油店和百货店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把钞票都变成实物，然后才能安心回到家里。发了工资，不要说迟一天买东西了，就是迟一小时半小时物价也要上涨。一天究竟有几个行市，谁也摸不准。家里生活困难的工人拿到工资就比一般工人更紧张，生怕晚了一步。秦妈妈手脚快，办事灵敏。她常常排队在靠近大门那里。她见身后的工人姊妹们拿着钞票发急，她总是走开，让别人先把钞票从小洞塞出去，她才慢慢走到小洞那里。

秦妈妈自己买了一块花布旗袍料，送给细纱间的那摩温^①，又给看门的说了几句好话，安排妥当了，就把汤阿英带进了沪江纱厂。

汤阿英却不知道秦妈妈为她化了钱出了力，以为跟在秦妈妈屁股后头就很容易进了这么大的厂。

阿英跨进细纱间，在她面前展开一个新的世界：一排排车有秩序地平列着，机器转动着，响声很高，

^① 那摩温：即英语 number one 的音译，这里是指的工头。

面对面讲话要是声音低了就听不见。棉絮在上空飞扬着，好像在落雪。大家在弄堂里紧张地走动，一会推擦板，一会接头。她很有兴趣地注视着弄堂里每一个女工的动作，脚步放慢了。

秦妈妈催她走，到一百零五号车那里停了下来。这台车关着。车头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门，门上挂着一块灰布门帘。门那边是女厕所。秦妈妈把车开了，车上的锭子马上迅速地转动起来。一歇辰光，有一个锭子上面的纱断了。秦妈妈走过去，用右手食指一绕，接好了头，纱又在那个锭子上不断绕上了。秦妈妈教阿英接头。阿英马上学会了，可是动作很慢，一分钟只能接一个头，有时还不到一个头。秦妈妈看她很快学会了，心里实在高兴，拍着她的肩膀，附着她的耳朵说：

“你在这里学吧。留点神，别让先生看见了，那可吃不消……”

“在这里行吗？”阿英一股学习的热情给秦妈妈一说，有点冷下去，她怕妨碍秦妈妈的工作。她问，“要是给人看见呢？”

“当然要查问哪能进来的。”

“那对你不好吧？”阿英放下手里的生活，说，“不能连累你，我不学了。”

“不要紧，你学吧。”

“不，秦妈妈，不方便的话，还是不学的好，不要连累了你。”

“发现了，先生也不一定查问，我们厂里常有人偷着进来学，不要紧。在这里学吧。先生来了，你躲一下，就混过去了。”

“没事吗？”阿英不放心地问。

“没事，我跟车间的姊妹们说一声，有啥动静，她们会招呼你的。你机灵一点就行了。”

“好。”阿英望望面前的那台车，实在也舍不得走。

秦妈妈到她自己的车上去。

阿英仔细向四周看看：没有一个先生模样的人，她安心地注视转动着的每一个锭子，左边一根纱断了，她跑过去接头；刚接好，右边有两根纱断了，她又去接头；还没接好，另外又有几根纱断了。因为她不熟练，动作又慢，这台车上的断头特别多。她倒蛮高兴，这样，接头的机会多，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她紧张地接着头，汗珠子不断从额角上渗透出来，她脑筋里时不时闪出一两个穿着长大褂的和西装的先生的影子。当影子出现辰光，她便连忙丢下手里的生活，跑到弄堂口向四下张望，见没有人才回来接头，可是心还是急遽地跳动着，生怕被人发现。

她埋头注意着锭子，机器在转动，情绪慢慢安定

下来。机器有规律地发出响声，淹没了一切的声音。

在一片机器声中，忽然听到更高的尖锐的女工郭彩娣的声音：

“来哉，有人来哉。”

她立刻丢下手里的生活，拔起腿来就跑，掀起灰布门帘冲过门去，机灵地一口气跑到女厕所里，一屁股坐在马桶上，紧紧顶着面前的小门，歪着头，耳朵向着小门，倾听外边的声音。外边传来的是粗纱间和细纱间的机器和咔嚓咔嚓的响声，别的啥声音也听不到。她低下了头，感觉到自己的心在卜通卜通地跳动。厕所门口忽然有人走过，她用手把门顶得更紧，怕先生们闯到女厕所来，把她查出来不就糟糕了吗？

门外脚步声远去，阿英的心定了。她松了手，抬起头来，抹去额角上的汗珠子，静静地坐在马桶上，这时，她感到一股带着浓烈的碱性的尿味扑鼻冲来，很难忍受。她想呕吐，可是又怕呕吐出声音来，被人发觉。不呕吐呢，在厕所里实在待不住。没有办法，她只好用手捂着鼻子，呼吸感到困难。她从来没有感到在厕所里这么难受，更想象不到在厕所里的时间这么难过去，在厕所里待一分钟比在外边待一小时还要长哩。她竭力忍受着这难堪的迟缓的时刻。额角上的汗珠又不断地渗透出来。

“阿英，阿英！”

她在里面听到有人叫唤，两只手又把门顶上。她慢慢听出来是秦妈妈的口音。她开了门，跑出来，碰到秦妈妈，劈口就问：

“没事吧？”

“啥事体？”

“先生查出来没有？”

秦妈妈撇一撇嘴，说：

“哪能会查出来，这些先生啊，到了车间就不容易了，谁会到厕所来。”

“走了吗？”

“走啦。出来学吧。”

阿英迈动着酸软无力的腿，迟缓地走出来，揭开灰布门帘，她向四下看看，大家都忙着做生活，没有别的人。秦妈妈指着一百零五号车说：

“快点学吧，别担心，有我哩。”

阿英站在一百零五号的那台车前面，紧张地学接头。别人休息，她一个劲地学；别人吃饭，她也还是一个劲地学。下班回到家里，她用几根细线拴在筷子上，吊起来，把线剪断，学秦妈妈的动作，用食指一绕，把头接上。到了厂里，开了车，她的动作比从前快了。她和车间的姊妹们慢慢也熟悉了，有人来，姊妹们歪一歪嘴或者手指一下，她便懂得，暂时闪开，机警地隐在灰布门帘后面。先生们前脚走过，她

后脚就跟了出来，又站到那台车前面去。

半个号头的紧张学习，开车、关车、接头和清洁这些工作，阿英大半都学会了。

没有几天辰光，正好沪江纱厂招考接头工。秦妈妈给阿英报了名。阿英这一次是正式走进沪江纱厂，看门的向她露出会意的微笑。她感激地点点头。按着报名的次序，一位先生领着一批应考的女工走到细纱间。恰巧是用一百零五号车考试。阿英看到这台车心里乐开了。这台车她摸了半个号头，很熟悉。前面三个女工考过了，现在轮到了她。

先生手里拿了一个体育运动比赛用的表，对她说：

“我叫开始，你就接头；我叫停，你就不要接了。”

阿英点一点头。

“两分钟要接十二个头，才算及格。”

“好的。”阿英的眼睛斜视着锭子，想：两分钟能接十二个头吗？这次考试决定她能不能做厂，而且只是两分钟的时间。

她站在满绕着雪白细纱的锭子面前。

“开始！”

阿英的手迅速地接着头一个，两个，……一个劲地接。她这时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眼睛只是注视着一个个转动的锭子和一根根断了头的

细纱。她连气也几乎没有换一口，额角上的汗珠如雨点一样的往下滴，也顾不上揩一下。

“停！”

她马上放下了手。因为刚才太紧张，她竟不知道自己接了几个头。那位先生摘下耳朵上的铅笔，一根根的数，最后向她笑了笑，那意思表明满意她的成绩，说：

“十六个。”

他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下她的成绩。阿英听到这个数字心里得到无上的安慰，吐了一口气，这辰光才觉得身子有点累了。她站在那里没动，还留恋地望着锭子。

“阿英！”

她抬头一看，秦妈妈站在人圈外边向她招手：

“你快过来，阿英。”

阿英走了出去。秦妈妈欢天喜地对她说：

“你考上了，恭喜你，小鬼丫头。”

秦妈妈一把把她抱在怀里，乐得不行，用手一个劲儿抚摸着她的头发。

汤阿英到沪江纱厂，先做养成工，看十三木棍^①。她拿了工钱，尽量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寄

① 木棍：一木棍六个锭子。

回梅村镇，贴补家用。她在沪江纱厂，就像在秦妈妈的草棚棚一样，怀念着爹娘，默默地做生活，不大愿意说话。她的生活，仿佛是一条静静的小溪，汨汨地流着。

7

天空灰沉沉的，低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蒙蒙的细雨越下越密。一阵阵狂风刮来，马路上电线杆子发出金属的唿唿的响声。天空更暗了，接着来的是豆大的雨点，啪哒啪哒落在地上。

汤阿英住的那间草棚棚现在更暗了，从外边向里面看去，只是黑乌乌一片，啥也看不见。要在草棚棚里站一会儿，慢慢才看清楚一进门右首摆着的那两张床是用砖头砌成的，有一尺多高，上面都铺了一层稻草，算是褥子，灰黑了的褥单和打满了补钉的蓝印花布的被子全卷了起来。床对面贴墙摆着两张板凳。靠板凳的上头，放着一个洋铁炉子。锅里的饭已经焖熟了，散发出的饭的香味给浓重的潮湿的泥土的气息掩盖住了，一点也闻不出来。人字形的芦席的屋顶很低，给洋铁炉子的烟灰熏得黝黑。草棚棚里没

有一张桌子。屋顶低也有它的好处，汤阿英的剪子和铅笔这一类的小物事就插在屋顶芦席里，抬起头一伸手便可以拿来用。

草棚栅外边下着大雨，草棚栅里面下着小雨。靠门口那张床上放着一个破搪瓷脸盆，里面是一幅黄嫩嫩的菊花图案，菊花已脱落一半，黑绿叶子也残破了。屋顶上的水不断地往下滴，转眼之间，装了大半盆。

啪，啪……屋顶上又有水滴在泥土的地上。

“又漏了。”这是巧珠奶奶的声音，她指着靠洋铁炉子那边说，“你看看……”

汤阿英正蹲在床上把被子卷得更紧，推到竹篱笆墙边去，免得搪瓷脸盆里的水溅到被子上。她回过头来看娘指的方向，果然又有一个地方漏了。从门口那儿起，地上一连摆了两个小瓦盆和三个菜碗，里面装着浑泥汤汤。巧珠奶奶在洋铁炉子旁边又摆上一个缺口的粗瓷饭碗。汤阿英焦虑地叹息了一声：

“是呀，又漏了。”

雨水好像特别和这间草棚栅开玩笑，从屋顶上漏下来不算，水还从门口漫进来。门口那边有一块木板隔着，水仍然狡猾地从木板两头浸到草棚里来，紧贴着门槛那里已经汪着一摊水，并且逐渐扩张开去。巧珠蹲在那里，她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给风吹得摆来

摆去。她低着头，用筷子玩弄着水，使得那摊水更扩张开去。汤阿英指着她的脊背说：

“没看看别人忙的样子，水都接不过来，你还在那里弄……”

巧珠把筷子插在水当中，好奇地注视着外边漫进来的水。汤阿英见她蹲在那边不动，生气了，说：

“还不把筷子拿出来，把筷子弄脏了，等歇看你用啥吃？”

“巧珠，”巧珠奶奶走过来说，“把筷子拿起来，洗洗好吃饭，别叫大人生气，奶奶喜欢你。”巧珠从水里把筷子拿出来了。

“乖孩子。”奶奶得意地望着巧珠头上的两根小辫子。

阿英嘴上虽然讲她，心里却很喜欢她，喃喃地对自己说：

“这小丫头，……”

她的话还没讲完，脚上忽然有水了，连忙回过头去一看，大吃一惊，劈口叫道：

“快，拿个碗来！”

奶奶匆匆拿碗过去，她看到搪瓷脸盆里的水漫出来了，便急着说：

“我用碗接上，你把水倒掉……”

阿英端起脸盆，一步步移下床来，向门口走去。

门外一条狭长的小弄堂像是一条小河似的，到处汪着一摊摊的水，有的就流到左右的草棚棚里去了。她把满满的一盆水哗啦啦往外一倒，水里浮起无数的泡沫和被风吹落下来的屋顶上的茅草。一阵令人恶心的臭味，如同从陈年不修的臭阴沟里发出来一样，在空中浮散着。她已经闻惯了这种气味，没有感觉似地望着天空。雨还在下着。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诅咒地骂道：

“这倒霉的天！”

奶奶在里面接着说：

“老天爷也应该睁睁眼睛，下成这个样子还不停。”

“这天就像是漏了似的，下个没停。”她端着搪瓷脸盆，站在门口，发愁地盯着灰沉沉的天空。

“阿英，快上工了，进来吃饭吧。”

阿英给奶奶提醒，立即退了回来，把脸盆放在床上原来的地方接水。奶奶把饭菜装到碗里。阿英把贴墙那两条板凳端到床面前，拼拢起来，算是饭桌，青砖砌成的床沿就成了凳子。巧珠从奶奶手里接过一碗豆腐，小手颤巍巍地拿着放到板凳上，她还想过去拿汤，叫奶奶止住了，怕汤烫她的手。她自己端了过来。这是一碗有点发黄了的青菜叶子汤，上面漂着几滴疏疏落落的油珠。她们坐在冰冷的青砖上吃饭了。

奶奶夹了一筷子的豆腐放在巧珠饭碗里，说：“巧珠，快吃吧，饭都快凉了。”

巧珠坐在青砖砌成的床沿上，她夹不到板凳上的菜，吃了两口饭以后，用筷子指着碗说：

“汤，奶奶。”

她自己想弯下腰来倒汤，叫奶奶制止了：

“别动，奶奶给你倒。”

奶奶倒了半碗汤给巧珠，叹了一口气说：

“人家不像个人家，吃饭连张桌子也没有，唉，啥辰光有张桌子吃饭就舒服了。”

阿英赶着吃饭，她没吭声。

“你说，”奶奶絮絮叨叨地问，“阿英，你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上海解放了，人民翻了身，生活一天会比一天好的。”

“谁来了，还不都是做工，工钱还不是那些，日子哪能会好呢？”

“那要看谁来，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占领上海，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国民党反动派来，也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现在共产党来了，完全不同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要解放穷人。”

“我们的日子为啥还不好呢？”

“上海解放才多久，你性子就那么急，事体要一

桩一桩办哩。别的不说，现在钞票值钱了，就和从前不同了。”

“那倒是的，”奶奶还是有点怀疑，说，“啥辰光有张桌子呢？”

这句话可把汤阿英问住了，她不知道啥辰光有桌子；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

“等生活做多了，钱挣多了，就可以买桌子，日子也好过了。”

啪，右边墙上的一块泥巴掉了下来。风像个贼似的从那个洞闯进草棚棚里来，吹得奶奶身上凉浸浸的。

“唉，又掉下一块。”奶奶望着那个洞口发愁。

阿英走过去，望了望，想把它糊起来，奶奶摇摇手，说：

“你去上工吧，我来弄……”

“好。”

“到厂里碰到学海，要他下工以后早点回来。”奶奶惦念着儿子，希望他早点回来好帮帮忙。

张学海是沪江纱厂保全部的青年工人，思想进步，对机器特别有兴趣，有空就钻研技术，一分一秒的空隙也闲不下他，不是修修这个，就是擦擦那个，不知疲倦地做生活，充满朝气蓬勃的精神。他像是头铁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他办事正派，待人

忠厚，一个心眼看人，从不计算别人，也很少想到别人对他耍花招。他以为别人也像他那样待人接物。从秦妈妈的嘴里，他了解汤阿英的悲惨身世，对朱暮堂在乡下横行霸道剥削农民的罪恶行径，满腔仇恨，衷心盼望有一天能够到无锡乡下给汤阿英她们报仇雪恨。他住在秦妈妈的草棚棚对面，厂礼拜常到秦妈妈家里来白相，相帮秦妈妈搬搬弄弄，收拾收拾。秦妈妈有啥用力气的活，总少不了他。汤阿英没进厂以前，由秦妈妈介绍，两个人就认识了。最初，张学海到秦妈妈家来白相的辰光，汤阿英不声不响地做她的活，给秦妈妈洗洗弄弄。张学海和她搭讪两句，她也只是简单问一句答一句，不多言不多语。他看她做事体那样严肃认真，那一双灵巧的手把草棚棚收拾得整整齐齐，秦妈妈换下来的衣服，她给洗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经过熨斗熨过，可是她折叠得平平整整，仿佛是熨过一般，心中对她暗暗敬佩。她年纪虽小，但悲惨的经历，使她懂得事体不少。她头上几绺乌而发亮的刘海短发从额头披下，显得鸭蛋型的面孔更加红润，那一对机灵的大眼睛，明镜一般，好像啥事体经过她这对眼睛都可以看得透彻。她比他矮不到半个头光景，身子很灵活，虽没有他的身子那样结实，却十分健壮，苗条而不虚弱，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穿着一身浅蓝的布衣布裤，背上拖着两根

辫子，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也没有任何修饰，可是朴素天然，出落大方，保存着农村少女的那种自然风韵。她的性情像水一般的温柔，可是她的意志却比钢铁还要坚强。她仿佛是一块吸铁石似的，把张学海这个铁牛一样的人深深地给吸引住了。张学海每次路过秦妈妈的草棚棚，即使明知秦妈妈到厂里去了，他也要走进草棚棚，去找秦妈妈。汤阿英察觉他的用意，便嫣然微笑，指出他又忘记秦妈妈早就上工去了。他于是便借故来向她借个碗箸，或者还个啥物事，看她一眼，就心满意足地到厂里去了。

汤阿英进了厂，张学海经常到她那个车间去修理车子，两个人更熟了。他一到了汤阿英那排车子，仿佛光滑的地板上铺满了胶水，把他的一双脚给粘住了，走不动了。他细心地给她检查车子，看有啥地方出了毛病，看过来，又看过去；车间机器的转动发出雷鸣般的轰轰巨响，讲话也不容易听得见，更何况车间的生活很忙，姊妹很多，他想和她讲话，但不大方便，他每次检查完车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快走到弄堂口的辰光，总回过头来暗暗再看她一眼。

张学海做的是常日班，逢到汤阿英上白班的辰光，常常在路上碰到他，一道上工，又一道下工。修长的煤渣马路上，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喧嚣的人声，静幽幽的，路边的田野图画般的从眼前一直展向

碧蓝的天空下，一片一片白云悄悄从天空缓缓地掠过。

张学海望着平静的绿油油的田野，喃喃自语地诉说他家的情况：他爹在上海郊区给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他是个独生子，家里除了娘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娘年纪大了，身子倒还算硬棒，家里大小事体全靠娘一个人维持。娘希望他早点结婚，抱个孙子，给寂寞的草棚棚里增加生气和欢乐。他说到这里便口吃了，仿佛有啥物事堵在嘴里，把心中要讲的话给挡住了。他怯生生地没有往下说，不晓得汤阿英心里的想法，暗中窥视着她面孔的表情。

汤阿英早就洞察他对自己的情景。她认为张学海努力向上，是个好样的，对她的态度不错，每逢她有啥困难和需要，他都主动地过来帮助和照顾；并且他为人忠厚诚实，不是一个轻浮的青年。她内心已默默地同意了，平时她听他的关于家庭生活和婚姻问题的谈吐，她虽然没有表示态度，可是从未拒绝，也不讨厌。他像影子一样地紧紧追随着她，不管在啥地方，是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还是在弄堂里，回过头去，时常发现他就在她的身边。时间久了，他如果不到秦妈妈的草棚棚里来，她倒盼望他了，有时甚至径自到张学海的草棚棚里去，相帮他娘做点家务，或者偷偷地给张学海洗洗换下的衣服，折叠好，放在他的

枕头底下。最初，张学海还以为是娘洗的，后来发现是汤阿英洗的，他穿到身上感到特别舒适和愉快。他想念她的感情愈来愈浓了。他终于大胆提出他的要求，虽然是通过他娘的愿望表达出来，也没有直接点出是谁，但她心里早就一明二白了。她当时没有正面回答，鸭蛋型的面孔顿时发烧，红润润的，两个丰满的腮帮子如同两片朝霞，含羞地低下头去，半晌，微微抬起头来，含情脉脉地望了他一眼，然后飞一般地跑了。

晚上，秦妈妈和汤阿英都上了床。汤阿英依偎在秦妈妈的身边，望着门缝里透进来水一般的月光，她的心怦怦跳动，话到嘴边，几次想讲又忍住了。秦妈妈发现今天夜晚汤阿英的神情和往常不一样，好像有啥重要的事体要对她讲，可又吞吞吐吐地欲说还休，她已猜到几分，忍不住点破问汤阿英是不是和张学海的事。汤阿英暗暗点点头，却又不好意思言语，娇嗔地抓着秦妈妈的手，没头没脑地问：“你说，好吗？”秦妈妈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有意逗她：“啥事体呀？我不晓得，怎么说好还是不好？”汤阿英摇着她的手说：“你晓得，啥事体都瞒不过你，你啥都晓得。”秦妈妈打趣道：“那我成了能知道过去未来的大神仙了。张学海最近对你哪能，详细给我说说，才好给你出主意。”汤阿英在枕边低声细语说了最近的往

来，时断时续，还是有些羞答答的，怕难为情。其实秦妈妈早就同意她和张学海要好了，现在不过试试汤阿英的决心下了没有。听完汤阿英的叙述，她已经晓得汤阿英的决心了，笑声朗朗地对汤阿英说：“你们小两口子相好，我秦妈妈难道会反对不成吗？”秦妈妈喜爱地抚摩着汤阿英乌黑的头发。

张学海和汤阿英结了婚，当时汤阿英十七岁多一点，长得像是二十岁的人了。汤阿英从秦妈妈的草棚棚里搬到张学海的草棚棚里，度着幸福的新婚生活。当年，汤阿英生下了巧珠，今年快七岁了。现在，汤阿英肚里又有了孕。

刚才巧珠奶奶要她叫学海下工早点回来，她“唔”了一声，连忙拿起一把有点破的雨伞，匆匆走出去。

雨淅淅沥沥地落着。

路边的电线上挂着一连串的圆圆的透明的水珠，不时无声地落在煤渣路上。路两旁的菜田里种着碧绿的青菜，菜叶子上好像刚刚撒了油一样，闪闪发光；有的菜畦汪着一摊摊的水，反射出来的亮光，远远望去，地上如同铺了一块一块不规则的各种形状的玻璃。

从黄浦江边吹过来的风，一路呼啸着，电线发出唿唿的金属声，风助长了雨势。雨像一个顽皮的孩

子，直向汤阿英的身上扑来。她手里那把伞有的地方破了，走了一段路，身上那条裤子已经透湿，像从水里捞起来似的。她没有钱买套鞋，脚上那双破布鞋湿漉漉的，走在煤渣路上有点吃力，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

她低着头，用力迈开大步走去，怕慢了碰不上张学海。走到沪江纱厂的门口，她浑身透湿，浅蓝布褂子变成深蓝色了。她看看门房的闹钟，离上工还有十分钟，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赶路过分紧张，到了厂，她松松劲，感到有点疲乏。但是，她还是鼓起劲道，连忙到保全部告诉张学海一声，然后才放慢了步子，向细纱间走去。

陶阿毛穿着一身粗蓝布的工装，脚上穿着长统胶皮靴，手上打着把黑洋布雨伞，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走来。他一见汤阿英浑身透湿，连忙加紧脚步，赶上去，关怀地说：

“阿英，看你身上湿的……”

“谁？”她回过头来，看见是陶阿毛，便搭了一句，“给雨淋的。”

“我带你打伞，”他走到她的左边，肩并肩地走着，把她的伞挤在一旁，说，“这伞破的不能用了，为啥不买把好伞？”

“唔，”她低着头想：买伞要钱啊，这伞虽然破了，

可是还能挡点雨哩。她把破伞小心地收起，说，“是呀，陶师傅，要买伞了。”

“有困难吗？”

“困难？没有。”

“别客气。”

“不，没啥困难。”

“这点小事体有啥关系，我同学海是老朋友，阿英，别见外。”

她不愿意随便接受别人的帮助，宁肯自己受点苦，也不向别人开口，谦辞道：

“真的不需要，谢谢你。”

“有啥需要，跟我说一声，没关系。”他望着她那身湿绿绿的衣服说，“那么，到车间里快换身衣服，这样要受凉的。”

她心里感到温暖，觉得陶阿毛关心人真是无微不至。她感激地“唔”了一声。

陶阿毛在工人当中有相当的威信。他不但技术好——他平的车没人有第二句话讲。他的人缘比他技术更好，不管哪个车间的人他都合得来。比他技术稍为高明一点的人，他叫人家老师傅；比他本事差的，他也乐意帮别人的忙。他关心别人生活就像是关心自己一样。他在厂里的威信差不多快赶上细纱间的秦妈妈。上海解放以前，得到大多数工人的选票，

当沪江纱厂的伪工会的副理事长，别人靠活动，或者勉强当上工会的干部，他完全两样。上海解放以后，伪工会理事长逃到川沙，给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回来法办了。陶阿毛不再是工会的负责人，回到保全部工作，在群众中威信仍然相当高。

在黑洋布雨伞下面，陶阿毛听汤阿英“唔”了一声，没再言语，便进一步说：

“我们劳动，资本家享福，徐义德和酸辣汤的生活多舒服，吃的好，穿的好，汽车出，汽车进……下雨，我们工人连把好伞也没有！”

她听他的话蛮有道理，答了一句：

“你说的，倒也是……”

“我们要向工会提提意见，解放了，工资也该提高点。”

“这个，”她愣住了。她随大家一道做厂一道领工资，没有提过意见。一九四八年初冬那次罢工，她跟秦妈妈一同摆平的。斗资本家，她总是站在前面。现在解放了，有共产党当家做主，如果有需要会考虑工资问题的。他这么热心和她谈，她也不好当面拒绝，只是说，“这个，需要的话，工会会考虑的。”

“工会，他们可忙哩，大家不提，他们哪能想的起……”

“余静同志他们会想起的……”

“余静同志？唔，她一定会想起的，提醒她们一下，不是更好吗？”

“这个，”她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工会就是代表我们工人利益的，工人有啥要求都可以告诉工会，要他们代表我们去争……”他鼓励她向工会提，听到身子后面脚步声越来越多，步子越来越急，知道夜班工人赶来，快上工了。他便简单地说，“工资暂时不提高，工会多给我们办点福利也好，生活总要改善改善……”

她没言语，只是漫不经心地地点了点头。

夜班工人在雨中有说有笑地超过他们两个人，分别走进自己的车间。陶阿毛陪着汤阿英向细纱间走去，突然把手里那把黑洋布雨伞放在她手里，说：

“你留着用吧。”

她吃了一惊，说：

“这怎么可以！”

“我家里还有一把，”他在撒谎，说，“你用这把，没关系。”

她把伞退还给他，直摇手，说：

“我不要，我自己有伞。”

“你这把破了，挡不住雨，你的裤子都淋湿了。”

“挡得住。裤子淋湿了，没有关系，烘一烘就干了。”她坚决不要他的伞，怕他再把伞送过来，连忙

和他分开，说，“不早了，得赶快到车间去了。”

她加快了步子，向细纱间门口走去。他的慌惘的眼光盯着她正直而又坚定的背影，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对着她迅速远去的背影，不满地撇一撇嘴。

8

陶阿毛手里拎着两包东西，脸上浮着微笑，轻松地跨进张学海的草棚棚的大门。张学海从里面迎了上来，亲热地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道：

“你说话真算数，说要到我家来白相，今天真的就来了。”

“说话当然要算数，人的信用很重要。一个人不讲信用，人家就看不起他。”陶阿毛一本正经地说，装出像是一位素讲信用的人物。其实他心中另有计谋。那天陪同汤阿英到细纱间去上工，他以为是天生的巧妙机遇，不露痕迹地和她聊天，认为谈的还不错，便自然而然地把伞送过去，显出他对汤阿英的真诚的关怀，没料到汤阿英不吃这一套，坚决把伞退回来，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使他陷入狼狈的境地。但他并不因此丧心悔意。他晓得汤阿英是位不大好接

近的人物。她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虽然平时不大爱讲话，但讲出话来却是一句顶一句，工人们都听的进，特别是细纱间的工人碰到啥事体，都愿意看看汤阿英的态度。陶阿毛觉得在汤阿英身上下些功夫不仅仅是十分值得的，而且非常必要的。汤阿英的钉子虽软，但不能一碰再碰。直路走不通，得走弯路，绕个道。他想起了张学海，整天和张学海在保全部一道做生活，正是给他活动的绝妙机会。张学海不单容易接近，而且为人忠厚，待人诚挚，通过他进一步接近汤阿英就不太困难了。他第二天一进保全部就和张学海特别亲近，一歇问张学海今天忙不忙，一歇又问张学海手里的生活难不难做，要不要帮点忙。张学海每天都把规定的生活做完，不做完决不肯下工，因为张学海做生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总是在预计的时间做完。他私心感谢陶阿毛的热情关怀，但不需要陶阿毛的帮助。陶阿毛并不就此罢休，进一步表示：有啥需要，别忘记对他讲，更不要客气。陶阿毛自我批评，说过去对张学海帮助不够，也不太主动积极，希望张学海不要见怪。张学海接受他的热情的关怀，感激过去在技术上已经得到他不小的帮助，答应以后少不了还要请教。

过了没两天，陶阿毛做完了生活，已经到了下工辰光，却没有走，在等待张学海收拾完工具，两个人

肩并肩地走出保全部。陶阿毛羡慕张学海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关心巧珠在学校里的功课成绩，如果数学方面有啥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给她补习一下功课。张学海一听陶阿毛谈到巧珠，他心里特别欢喜，忍不住流露出对巧珠的热爱，说这孩子年纪不大，倒也长得聪明伶俐，讲话逗人喜欢，功课虽说不上最好，却也是班里优秀学生当中的一个。陶阿毛说自己最喜欢小孩，将来结了婚，要是有一个像巧珠那样的聪明伶俐的小孩，下了工，回家带她白相白相，一定会消除一天工作的疲乏，增加无限欢乐的情绪。陶阿毛说得那么真切，又那么渴望，仿佛就想立刻抱一下巧珠似的神情。张学海信以为真，安慰他不用着急，等到将来找到理想的对象，结了婚，一定会生一个比巧珠还要聪明伶俐的小孩。要是现在就想小孩，有空可以到他家和巧珠白相白相，巧珠也一定会喜欢他。陶阿毛衷心盼望的一句话终于从张学海的嘴里说出来了。他控制住内心激动的喜悦情绪，不露声色地说：“我早想看看巧珠和她奶奶了，老是没有抽出时间来，过两天有空，我一定去。”

今天是厂礼拜，陶阿毛一早起来，吃了早点，收拾一下，啥事体也没有做，便到南京路永安公司精心挑选了一个玩具，本来想买一辆铁制的玩具小汽车，怕汤阿英嫌价值昂贵，不肯接受，这次不能再碰钉子

了，于是挑了一个橡皮做的小火轮，价钱不贵，形状别致，在陆地上可以白相，放在水里漂起来，也可以白相，游来游去，顶有意思的。买了小火轮，走出永安公司，他感到这件礼物显得有点单薄，在大街上边走边想，正愁没有法子，他的迟缓的步子已迈到泰康食品公司的门口了，看到货架上大玻璃罐子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得到了启发。他走进“泰康”，没有买营养丰富的巧克力，没有买装璜美丽的奶油糖，却买了廉价的水果糖，而且只买四两。这两包东西拿在手里，陶阿毛感到合适而又得体。

陶阿毛走进草棚棚，把手里两包东西往床上一放，向熏得乌黑的草棚棚扫了一眼，对巧珠奶奶弯腰曲背，亲热地叫了一声：

“奶奶，你好。”

“请坐呀，你好。”巧珠奶奶没有见过陶阿毛，见他那么亲热，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印象，就应声招呼他。

“奶奶，这就是我们保全部的陶师傅。”张学海一边介绍，一边把长板凳端过来，对陶阿毛说，走累了，快坐下来歇一歇。”

“坐吧，陶师傅。”巧珠奶奶指着那条长板凳说，“早就听学海讲起你了，就是没见过。学海他年纪轻，手艺不行，希望陶师傅多多教他。”

“那没问题，多年在一个车间里做生活，短不了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啊！”

“陶师傅，你别客气咯，”汤阿英站在墙边，洗着碗箸，伸出湿淋淋的右手，指着陶阿毛，说，“你的手艺好，做生活又精巧，在保全部是有名的，学海哪能和你比呢？只有你教他，他对你能有啥帮助呢！”

“阿英，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陶阿毛忽然严肃起来，认真地说，“每个人的手指头有长短。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这方面也许有啥长处，那方面一定会有啥短处。古话说的好，取长补短。在学海身上，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好好学习哩！”

“你别把我捧的这么高，摔下来可吃不消呀！”张学海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我身上可没有啥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

陶阿毛不等张学海说完，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立刻接上去说：

“别的不讲，单是你的谦虚精神就值得我好好学习。”

“这个，”张学海突然给陶阿毛钻了空子，一时不晓得哪能回答是好，态度显得有些窘，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汤阿英把右手一甩，手上油腻腻的污水撒了一地，伸手把张学海从窘迫的境地中救了出来，不慌不

忙地说：

“陶师傅太客气了，学海笨嘴笨舌，十张嘴也顶不上你一张嘴啊！他是说老实话，不是啥谦虚精神。他身上没有啥本事值得别人学习的。”

陶阿毛心中暗暗钦佩汤阿英的谈吐，简单两句就把他的话反驳回去，不卑不亢，意正词严，叫你无从挑剔，怪不得工人们对她的话那么尊重和信服。这回轮到陶阿毛陷入窘迫的境地，他不晓得哪能往下说。巧珠奶奶无意之中搭救了他：

“以后希望陶师傅多关照学海，他年纪轻，经验少，对技术倒是有股钻的劲头。”她倒了一小碗开水，颤巍巍地端了过来，抱歉地说，“尽顾说话了，连水也忘记给你倒了，喝口水吧。”

陶阿毛站起来，双手把小碗接过去，真的喝了一口，顺便又向草棚棚四周望了望，却不见巧珠的踪迹，看到放在床上的那两小包东西，惦记今天来的目的，巧珠不在，东西送不出去，那不是白跑一趟吗？他想打听巧珠的去处，又怕露出马脚，正在左右为难的辰光，巧珠从门外一头钻了进来，摇晃着头上两个小辫子，辫子梢上扎着大红头绳，在早晨的灿烂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她没有看到草棚棚里来了客人，径向奶奶面前跑去，一头伏在奶奶的怀里，娇嗔地要求道：

“带我上街买物事去！”

“鬼丫头，刚回来，就要上街，整天在家里蹲不住！”

奶奶严厉的训斥，却吓不倒巧珠，她不假思索地马上回敬奶奶两句：

“是你说的，叫我到外边白相一歇，回来就带我上街买物事去，为啥怪我呢？”

原来吃完早饭，巧珠晓得今天是礼拜，爹和娘都在家休息，她吵吵嚷嚷地要娘带她出去白相。娘没答应，说是要收拾家里，改一天再出去白相。她偏要去，闹得母女俩不可开交。奶奶出来打了圆场，要巧珠自己到弄堂里去白相一阵，等娘洗完碗箸，收拾一下，再带她上街买物事。她的要求，奶奶满足了，便一蹦一跳地一个人独自出去了。现在，奶奶给她一质问，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倒是奶奶理亏了。奶奶眯着有点老花了的双眼，忍不住笑了。

“看你嘴利的，讲话没有个上下！”

“是你说的么。”巧珠仿佛受了委屈，却不肯屈服，不满地噘着殷红的小嘴。

奶奶没有压服巧珠，反而被她顶了回来，奶奶并不生她的气，心里却喜欢她的活泼伶俐，抚摩着她的小辫子，语调放缓和了，妥协地说道：

“等一歇带你上街。”

“不早了，现在就去。”巧珠一步不让。

“你没看见客人来了吗？”奶奶把她从怀里拉开，让她面对着陶阿毛，说，“叫陶伯伯。”

巧珠一双聪明的乌而发亮的眼睛，向陶阿毛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不认识这位陶伯伯，她低低叫了一声陶伯伯，便微微转过圆圆的红润润的小脸蛋儿，诧异的眼光对着汤阿英，仿佛问娘：这是啥地方来的陶伯伯呀！娘没有回答她的疑问。陶阿毛弯下身子，侧着头向她看了一眼，便立刻赞美：

“巧珠长的真漂亮，又活泼，又伶俐，上几年级啦？”

巧珠凝视着陌生的客人，没有吱声。奶奶开口了：

“陶伯伯问你话，现在怎么又不说话了呢？快告诉陶伯伯。”

“一年级。”

“这样能说会道，真不像一年级小学生，你不告诉我，我还以为你上二年级哩！”

“明年就上二年级啦。”

“对，明年就是二年级的优秀生了。”陶阿毛伸过手来，抓住她细嫩雪白的小手，想讨她幼小心灵的欢心，说，“你今天想到啥地方白相？我带你出去，好不好？”

陶阿毛一句话说到她的心坎上，可是她没有马上回答，觉得这位陶伯伯真奇怪，头一回来，人家还不认识他哩，就要带人出去，谁同他白相呀！

汤阿英也感到惊奇，陶阿毛今天为啥这样热情呢？他是个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从来不上她这个草棚棚来，今天来了，谈的没了没完，好像有啥事体，可是坐在那边又不讲出来，因为陶阿毛在解放前当过沪江纱厂的伪工会副理事长，她从心里不愿意和他接近；但陶阿毛是在保全部工作，和张学海经常接触，一道做生活，听说对张学海不错，特别是最近，更加亲近，她又不可能不和他有些接触。她不想让陶阿毛带巧珠出去白相，当面直接拒绝也不十分好，眼睛一动，想了个主意，指着巧珠说：

“别闹，答应你的事，一定办到。等歇奶奶上街买菜，一定带你去。”

巧珠懂事地点点头，想到娘面前去，发现自己的手还给这位陌生的陶伯伯抓着哩，她便默默地低下了头。陶阿毛看出今天带巧珠出去汤阿英是不会答应的，头一回来，和巧珠还没有混熟，料想她也不会愿意的。他连忙给自己下台阶，抚摩着她的小手说：

“以后要到啥地方白相，告诉我，我和你爹一同带你出去。”

张学海以为陶阿毛真的以后要带巧珠出去，就

向巧珠许愿道：

“等哪天有空，我和陶伯伯一同带你上中山公园白相去，里面有个动物园，有狮子，有老虎，有猴子……可好白相哩。”

巧珠的心给爹说动了，恨不得今天就去，但她又不愿意和这个陌生的陶伯伯去，歪过头来，望了娘一眼。娘懂得她眼光的意思，说：

“到奶奶那里去，让大人谈话。”

陶阿毛抓住她的小手不放，连忙从床上拿起那两包小东西，放在她的小手里，说：

“这是送给你的。”

巧珠没有拿。别人给她的东西，不得到娘或者奶奶的同意，她从来不要的。陶阿毛见她没拿，便放开她的小手，打开纸包，取出橡皮小火轮，在她面前一晃，笑嘻嘻地说：

“你看这小船，好白相啵？”

汤阿英连忙对巧珠转动一下眼睛，巧珠立刻理会娘的意思，摇摇头，走到奶奶面前，说：

“我不要。”

“特地给你买的，别不好意思，拿着吧。”陶阿毛送到巧珠面前。

巧珠用两只小手往外推，接连地说：

“我不要，我不要。”

陶阿毛察觉汤阿英眼光的力量，巧珠在她娘的教养下，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料想大人不言语，她是不会收下的。他于是对汤阿英央求道：

“你叫巧珠收下。”

“不，她有物事白相，不要这个，你带回去吧……”

“我带回去给谁呀？我这么大了，还要这个吗？”陶阿毛指着小火轮说，“这个小玩意，不值啥钱，你就叫巧珠收下吧！”

“不，你还是带回去，”汤阿英晓得陶阿毛还没有结婚，家里也没有小孩，但她不能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礼物，特别是像陶阿毛这样人的礼物，她更不想要，坚定不移地说，“真的不要，你带回去留着，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给你自家孩子白相。”

“那可早着哩。”陶阿毛伸出去的手，尴尬地停留在空中，他向张学海求救兵，说：“你让巧珠收下吧。”

张学海看陶阿毛那样真心实意要送，硬是拒绝也抹不过面子，就解围道：

“陶伯伯给你，就收下吧。”

陶阿毛不敢打开那包糖果，怕再遭到拒绝，局面就越发僵得不可收拾了。他把它都塞在巧珠手里，匆忙站了起来，避免发生波折，趁机告辞，叫他们无从退回。他对巧珠奶奶说：

“你要带巧珠上街了，我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他曲着背，向大家点点头，加快步伐，跨出门去，回过头来，对张学海说：

“明天厂里见。”

9

汤阿英望着陶阿毛的宽厚的背影迅速消逝在门外的弄堂里，转过脸来，注意巧珠双手捧着那个橡皮小火轮和那个没有打开的小包，不晓得里面包的是啥物事。她走过去，打开一看，是花花绿绿的糖果，吃惊地指着对张学海说：

“你看，还有一包糖哩！”

“啊……”张学海惊异地应了一声。

“明天你带到厂里还给他。”

“算了吧。”他不介意地说。

“怎能算了呢？”她见他那样毫不在乎的神情，心里有点急了，声音也变得严峻了，一定要他明天带到厂里还给陶阿毛，讲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的，语调十分肯定。

他这时候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刚才当着

陶阿毛的面，是他要巧珠收下的，他明天自己哪能又送回去呢？这点东西，在陶阿毛说来，不过是点小意思；他和陶阿毛过去的交往，收下也没有啥了不起。他说出的话，哪能好意思收回？不但叫陶阿毛下不了台，自己也抹不过面子，难道在家他做主收下这点小玩意都不行吗？想起平时他说出啥意见一般都得到汤阿英的尊重，这点小事更不在话下了。他严肃起来，认真对她说：

“已经收下了，东西也不多，又是给巧珠的，退回去，反而见外了。”

“我没有同意收下。”

“我同意的。”

“那你给我退还给他。”

“说出去的话，哪能好意思收回？”

“你不退，我明天带到厂里退给他。”

他见汤阿英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东西由她去退，更叫他没有面子，说不定她和陶阿毛闹僵了，影响他和陶阿毛的关系。他的语调也变得有点严厉了。

“你不能退，我这点主还不能做吗？”

“不是你不能做主，过去有些事我不是听你的意见吗？这件事可不能依你。”

“为啥？”

“你不想想，陶阿毛从来没到我们家来过，为啥

今天来呢？”

“他早就讲要上我们家来白相，今天厂礼拜，他就来了，有啥稀奇呢？”

“来了，为啥还要带礼物来呢？”

“他喜欢小孩，买点小礼物给巧珠，也是人之常情，有啥大惊小怪的？”

“为啥对我们忽然这么亲热呢？”

“过去不大熟，在保全部一道做生活久了，慢慢熟了，比过去亲热些，你为啥这样多心眼呢？”

“不是我多心眼，是你没心眼。”

“我没心眼，”她一句话把他说得跳了起来，火冒三丈，瞪着眼睛，脸红脖子粗，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没心眼，又哪能？”

“没心眼，”她并不生气，也不焦急，慢条斯理地说，“那就长个心眼。”

“我就不长，”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生气地说。

巧珠奶奶见他们两个人，像是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刀对刀来枪对枪，谁也不让，怕再闹下去，弄得大家别别扭扭，家里不和，便在一旁调解道：

“这点小事体，也值得这么大吵大嚷，大家省一句，少说点，不就完了吗？”

张学海没有吭气，显然同意巧珠奶奶的意见，想平息这场风波。汤阿英不让步，她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不是小事体，要讲讲清楚才好。”

“我看不出有啥了不起的地方，陶师傅来串门子，好心好意带点东西给巧珠，有啥不对的？”

巧珠对于娘和爹的争吵，迷惑不解。她不晓得这位陌生的陶伯伯和厂里的事，听奶奶一说，觉得有道理，但没言语，低下头，盯着手里的小火轮和糖，不晓得怎么是好。

“奶奶，你晓得陶师傅是啥人？”汤阿英听出巧珠奶奶的话里的意思，显然是帮助她的儿子。汤阿英晓得巧珠奶奶不了解陶阿毛的情况，并不怪她，解释道，“解放前，他在我们厂里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工会的副理事长，这种人的礼物，我们能随便收吗？”

“那是工人选的。”他辩解地说。

“谁选的？我就没选他。”

“可是别人投了他的票。”

“那还不是他想法运动的。”

“你看见了吗？”

“我听人家讲的。”

“谁讲的？”

“秦妈妈。”

“秦妈妈？”他暗暗吃了一惊，汤阿英晓得的事体比他还多。秦妈妈是共产党员，在厂里的威信非常之高，只要秦妈妈站出来一说话，工人没有不赞成拥护

的，因为秦妈妈处处想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句句说到工人的心里。秦妈妈说的，没有一个错。可是他又不甘心服输，说，“我问秦妈妈去！”

“为啥说到我头上来了？”秦妈妈迈着稳重的步伐，从门外走了进来，笑嘻嘻地对大家望了一眼，惊诧地问道：“大好的厂礼拜，小两口子在屋里吵啥？”

汤阿英把争吵的经过说了一遍，理直气壮地说：“请秦妈妈评评理，看谁的意见对。”

“好嚟，听秦妈妈的。”他也盼望听听秦妈妈的意见。

“我倒想听听你们两人的意见。”秦妈妈没有立即表示自己的看法。她刚才在屋里，听巧珠奶奶的草棚棚里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语调也有些激昂，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她以为出了啥事体，就关心地走过来。她听了汤阿英的叙述，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希望他们进一步展开各自的论点，把思想暴露出来，才能真正解决矛盾。

“要是别的工人送点小东西给巧珠也没有啥，可是陶阿毛就不同了……”

张学海不等汤阿英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质问：

“陶阿毛有啥不同？他不也是工人吗？”

“我没说他不是工人，可是他给国民党反动派做过事。”

“不就是当过国民党反动派伪工会的副理事长吗？”

“就是这个。”

“他也不是国民党员，和伪理事长还有矛盾哩，两人一吵架，就几天不说话。”

“这点我也晓得，只是偶尔吵架，不是天天吵架，平常他们两人相处的也不错，伪工会的事，都是他们两人一道做的。”

“犯了错误，还不准人家改吗？”

“谁晓得他改了没有呢？”

“你不晓得，就断定人家一定没改吗？”

“也不能武断说他改了呀！”

“你不能把人家看扁了。”

“也不能随随便便说人家好。”

“照你这么说，在一个车间做生活，和他不往来，连轧个朋友也不行，就算正确了吗？”

“话不是这么讲，要看啥人。”

“你看人总是多心多眼，疑神疑鬼，要是别人对你这个态度，你心里高兴吗？”

“我没有给反动派做过事，也不怕别人猜疑。不是我爱猜疑别人，轧朋友也要有个选择，遇人遇事都要仔细想想。”

“又是你说的对，你一贯正确！”张学海心里不

服，嘴上却说不出道理，忍不住又要光火了，他辩解地说，“陶阿毛送巧珠一点小玩意，我看不出有啥坏意的地方，你却讲出一篇大道理，和你这样的人往来，真不容易！”

“随便和陶阿毛往来，总归不对。”

“有啥不对？”

秦妈妈看他们两人的嗓子又高了起来，汤阿英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张学海的耳根子又涨红起来了。她认为该她说话的辰光了：

“你们两人别吵，听我说两句，好哦？”

汤阿英早就盼望秦妈妈说话了，张学海自然也没有意见。巧珠奶奶不了解他们两人今天为啥谁也不让，希望秦妈妈排解开，她好带巧珠上街买菜，赶回来做中饭，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巧珠更想早点放下手里的小火轮和糖，她不懂为啥这么一点东西引起那么大的风波，闹得爹和娘争论不休，真想把东西扔掉，免得家里不和睦，也好跟奶奶早点上街去白相。

“陶阿毛这个人么，在解放前能当上我们厂里的伪工会副理事长，自然不简单。伪理事长是个国民党党员，这条走狗当然不会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陶阿毛是伪副理事长，办起事来要听伪理事长的。他们两人有矛盾是事实，也经常吵得几天不说话，不过，他们两人有些事还是一致的。陶阿毛说他是傀儡，伪

理事长要排挤他出工会，这也不完全是假话，但是陶阿毛究竟是个啥人，谁也没有摸清楚。”秦妈妈说到这里，停了停，在回想过去伪工会的一些斗争。的确，谁也没有摸清楚陶阿毛的底细。伪工会理事长确实想排挤陶阿毛，一方面固然因为陶阿毛在工人当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另一方面陶阿毛不买他的账，因为陶阿毛有陶阿毛的靠山，他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地派到厂里来的，不但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晓得，就连伪理事长也不晓得他的底细。同时陶阿毛善于伪装，在工人面前经常表现自己，用虚假的现象去迷惑部分工人的眼睛。秦妈妈想起往日那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使人眼花缭乱，不容易立刻看出内在的真象。她说，“古话说的好，知人知面不知心，未可全抛一片心。对于陶阿毛这样的人，还要继续留心观察，和他在一个车间做生活，当然不能不往来，就是轧朋友，目前还不能深交。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敌人不会死心的，阶级斗争更没有结束，以后的斗争也许更复杂更激烈。阿英因为陶阿毛当过伪副理事长，对他不满，这样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宝贵的。陶阿毛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啥大问题，要观察，要调查研究，不能主观断定他是啥样的人。毛主席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我们办啥事体，都要实事求是。”

张学海听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像是把一团没头没尾的乱麻，暂时理出个头绪来，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使他的眼睛把扑朔迷离的现象看得清清楚楚了。他边听边点头同意。汤阿英更是完全赞成。巧珠奶奶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巧珠把手上的小火轮往床上一放，一双聪明的眼睛征求娘的意见：

“娘，我不要这个。”

“要不要明天带到厂里退还给他？”张学海主动提出来，问秦妈妈。

“既然收下了，突然又退回去，也不好，以后和他往来，多留心一点就行了。”

汤阿英深深敬佩秦妈妈分析有理，处理得当，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笑着说：

“学海，你听见了吗？不是我对人多心眼，你和人往来，不要没心眼。”

“总是你对！”他嘴上虽说没有完全同意，但他内心感到汤阿英看人看事确是比他高一筹。

10

“呸！走狗！”陶阿毛走出沪江纱厂的大门口，对

着前面人群中一辆黑色小奥斯汀吐了一口口水。

细纱间收皮辊花的工人赵得宝走了过来：

“阿毛，你又骂谁哪？”

“谁，不是酸辣汤还有谁！”

“无缘无故的骂他做啥？”

“做啥，”陶阿毛顺着厂门口左边走过去，他指着前面的人群说，“你看。”

赵得宝抬头一看：那辆黑色的小奥斯汀在人群中缓缓开去，一边不耐烦地揪着喇叭，催促下班的工人快点让开。

“酸辣汤坐在里面？”

“除了他还有谁？我们工人流血流汗，他们这些资本家和走狗享福，给他让路还嫌慢，你看那股神气劲，真叫人受不了。我恨不得扔两个石头打这狗操的两下，才出了我心头的火气。”

“阿毛，你这可不对。我们工人要讲道理，不应该随便打人。”

“那是的，我不过这么说说。我心里总不服气，为啥说工人翻身了，我们生活还是这样苦？”

“翻身当然是翻身了，当家做主人，不受人压迫了，不是翻了身吗？要改善生活，还得好好劳动，提高生产，国家好了，我们生活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是的，你这话有道理，”陶阿毛望了赵得宝一眼，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来，在他面前晃了晃，说，“你真行，看的比我远，看的比我高，我没看到的，你都看到了，真是面面俱到。”

“那也不见得，我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不，”陶阿毛知道赵得宝很进步，区里和工会有啥事体都要找他，走近他的身边，说，“你是老工人，见多识广，当然看的比我们周到，以后有啥工作希望你多指导我们，得宝哥。”

“听你讲话甜的，就像是舌头上有蜜似的。”细纱间的记录工管秀芬从他们后面走上来，插进去说。

陶阿毛听出是管秀芬的声音，连忙歪过头去，半开玩笑地高声说道：

“小丫头，大人讲话，你又多嘴多舌的。”

“唷，”管秀芬把嘴一撇，说，“又卖老了，你有多少老，哪一天才卖完？”

“老少没有关系，现在都平等啦。”赵得宝不清楚她话里的话，搭了一句。

“陶阿毛连忙接过去说：

“对，老少平等啦！”

“这才像句人讲的话啊。”管秀芬瞪了陶阿毛一眼。

陶阿毛怕管秀芬再说下去，耽误了他的事，他摆

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

“秀芬，我和得宝哥谈点正经事，你别再开玩笑
了。”

他的音声里流露出哀求的情绪。

“好，你们谈你们的，我不敢耽误你们的大事。”
她一甩头，径自走去。

陶阿毛望着管秀芬苗条的背影，那慕恋的眼光
情不自禁地随着她的背影慢慢远去了。

“管秀芬哪能一甩头就走哪？”

赵得宝的声音唤起了陶阿毛的注意，他这才发
现赵得宝站在他旁边在和他讲话哩。他收回了眼光，
望着赵得宝，说：

“今天幸亏你，得宝哥，不然她肯走才怪哩，谢
谢你。”陶阿毛亲热地碰一碰他的胳膊。

“啊哟。”赵得宝怯痛地叫了一声，他的左手连忙
去按摩着右胳膊。

陶阿毛兀自吃了一惊，他不知道管秀芬刚走，自
己闯下了啥祸。他也用手去按摩赵得宝的胳膊，关心
地问：

“哪能？”

“还是那个老毛病，这两天天气不好，又发作了。
没啥，揉两下就好了。”赵得宝原来是沪江纱厂的穿
油线的工人，十二年前，有一次，一百零五号车的滚

筒坏了，他走过去，用一根线抛到滚筒上，然后用钩子去钩油线，准备钩过来拴在锭子上；谁知道这个滚筒坏了，上面有一个洞，钩子恰巧钩在洞上；他在外边用手竭力拉钩子，车子有十匹马力，哪里拉的动，他的胳膊叫车子卷进去哪。他立刻面孔变色，哇哇叫救命。正好秦妈妈在那里，马上过来关车。他的胳膊已受了重伤，送到医院，医生要切断。他老婆死活不肯，要是成了残废，啥地方去做厂？医生见病人家属不签字，病人自己也说要保留臂膀，治死也不要紧。医生没有办法，只好用三十斤重的铅给他包胳膊。治好了，胳膊只能直着走，这样，整个车间的弄堂就只好给他一个人走。他要求能弯过来，医生再给他开刀。他晕了过去，以后治好，能弯了，可是再也不能伸直，穿油线的工作做不成，改做摆粗纱。但也还是感到很吃力，特别是把粗纱送到细纱车上，有些费劲道。解放后，工人兄弟们照顾他的身体，减轻他的工作，就调到细纱间收皮辊花。他这胳膊好比晴雨表，只要一酸痛，就知道要刮风下雨。

赵得宝一提，陶阿毛想起这件事，他说：

“我倒忘了，对你不起。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我送你去。”

“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

“那你还是快回家休息去吧。我给你叫个三轮

……”

“不要，”赵得宝制止他。

陶阿毛不由分说，叫了一辆三轮，并且先付了钱；赵得宝不肯上车，车夫在一旁催他，没有办法，只得跨上三轮，一个劲点头谢谢陶阿毛。他觉得解放以后陶阿毛变得比从前更好了，很关心工人的生活，自己做生活也巴结。工会改组，倒少不了他这样的人。

陶阿毛一直看赵得宝远去了，他才跳上一辆三轮，连价钱也不讲，就叫三轮往静安寺路踏。他在车上自言自语：“管秀芬这丫头，打断我们的谈话，没轻没重的，这丫头。”

三轮拉到荣康酒家面前停了下来。陶阿毛付了钱，就径直向楼上走去，走到贴马路的那间小房间，揭开门帘一看：里面坐了一个中年人，长方型的脸庞上浮起了笑容，那人把架在鼻梁上的玳瑁边的散光眼镜往上一推，仔细看了看陶阿毛，指着手表说：

“你迟到了。”

“迟到虽是迟到了，可是有收获，厂长。”

“有收获？”梅佐贤站了起来，过去连忙把门帘放下，坐在陶阿毛旁边，小声地问，“啥收获？”

陶阿毛把刚才遇到赵得宝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梅佐贤听得眉飞色舞，拍拍陶阿毛的肩膀，夸

奖地说：

“你真能行！你是我们沪江的人才，了不起，了不起。你在工人面前骂我，许多工人都听见，做的真漂亮，谁也看不出一点破绽。总经理说，要这样做才对，以后当着工人的面，把我骂凶一点更好。”

陶阿毛望着梅佐贤胸前的玫瑰红的领带，微笑地说：

“你不生我的气吗？”

“自家人，”梅佐贤亲热地说，“还讲那个。演戏就得演的逼真，越像越好。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有数就是了。”

“对，你说的算。”

“你说……”

梅佐贤一句话没讲完，一个青年服务员左手的胳膊上搭拉着一块白抹布，微笑地走了进来，望着梅佐贤，说：

“客到齐了吗？”

梅佐贤点点头：“齐了。”

“两位要点啥小菜？”

服务员的眼睛打了陶阿毛一下，表示并不单纯征求梅佐贤一个人的意见，也请他点一点。陶阿毛没有吭气，他的眼光停留在梅佐贤肥肥胖胖的长方型的脸庞上。梅佐贤懂得他的意思：想吃一顿又不好意思

思开口点菜。梅佐贤一心只想听陶阿毛的好消息，他倒不在乎吃饭不吃饭，便说：

“你给我们配三菜一汤，吃便饭，清爽点。”

对方习惯地拿下抹布抹一抹桌子，然后很熟练地放到肩上，一边答道：

“有数啦。”

他知道这两个客人有话要谈，知趣地很快走出去。梅佐贤接下去问：

“你说，阿毛，咱们厂里工会究竟啥辰光改组成立呢？”

“快啦，我听赵得宝说，基层工会委员会月内就要成立。”

“你摸了摸他们的底细没有？啥人当工会主席？”

“我探听了一下赵得宝他们的口气，看样子可能就是赵得宝，他是个党员，工人当中威信高，有能力，对待工人也好，又是老工人，不要讲共产党会看中他，就是一般工人，也保险选他。”

“你呢？”

陶阿毛愣了一下，一时想不起怎么回答。正好窗外到虹口公园去的一路电车经过，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加上车轮压在轨道上的轰轰的声音，闹得听不见谈话的声音。陶阿毛随便答了一句：

“这地方真闹。”

“闹点好。”梅佐贤抓得很紧，马上又转到主题，“我说，你有希望吗？”

“希望，”陶阿毛望了梅佐贤一眼，很有把握地说，“当然有啦。这一点你放心，赵得宝他们最近对我的印象不错，一般工人，更没问题，觉得我阿毛很好。我现在还要在几个党员身上下功夫，像赵得宝呀，秦妈妈呀……”

梅佐贤听到第二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又仿佛听说过，立刻打断他的话，问：

“哪个秦妈妈？”

“就是领导罢工的细纱间的秦妈妈……”

“是一二四六吗？”

“一点不错。”

“早晓得应该把她开除了……”

一九四八年冬天那次罢工，梅佐贤向徐义德建议开除几个罢工的为首分子，杀一儆百，不然以后日子会更不太平啦。徐义德接受他的建议，要他开名单。他这位厂长对厂里的工人并不熟悉，工人名字一个也叫不出来。工人和他交涉，他注意了秦妈妈的工号：一二四六。这个数字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找陶阿毛商量名单，第一个就想到一二四六。陶阿毛告诉他：一二四六是细纱间挡车工秦妈妈，技术好，做生活巴结，在厂里威信很高。假使马

上开除她，一定会闹出更大的事体来。不如等一等，找个借口，再开除，那就妥当些。梅佐贤把这个意思转告总经理。总经理认为这样做法对，陶阿毛想的周到，看的远，既然为首分子一时不动，那么，在胁从分子的头上开刀意义也就不大了，索性都等一等，到辰光一齐下手。一眨眼的工夫，还没等总经理下手，上海解放了，开除工人的事，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要看看风声再讲。没想到秦妈妈是个共产党，真是出乎梅佐贤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脸上露出悔不当初的神情，叹息地说：

“我当时坚决主张开除她的，总经理赞成你的意见，我就没有办法了。”

“留下来也不错，现在好向她做工作。”

“你这张嘴真会说，”梅佐贤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和他们谈的来吗？”

“当然谈的来，并且很投机。”

“哦！”梅佐贤展开眉头，露出得意的样子，望着陶阿毛，说，“你倒给我说说看。”

“常和他们接近；他们要啥，我就赞成啥；他们反对啥，我就反对啥；有机会，就抢在他们头里讲……”

“对，”梅佐贤说，“你今后要多看点报，特别是《解放日报》，要学会用他们的话讲。”

“我就懒得看报。有订报的钱，我不如去喝两杯。”陶阿毛有意这么说，其实他每天在厂里都看《解放日报》。

“唔，”梅佐贤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上对门帘叫道，“茶房。”

那个青年服务员掀起门帘进来，他知道十个客人有九个客人是性急的，一进门恨不得马上给他把饭菜摆好，一定又是催了。他一进门便抢先说：

“饭菜马上就到。”

“先来个拼盘和一斤老酒，快。”

“得，”他随口应道，“慢不了。”

陶阿毛一听到酒就什么也不计较了。他说：

“你说的对，要看报，特别要看《解放日报》。”

“报钱我付好了。”

“那小意思，没关系。”

“你应该多学他们那一套，讲话要多带些新名词，什么政治觉悟呀，工人阶级的领导呀，翻身呀，进步呀，……”

“唔。”陶阿毛听入了神，想不到酸辣汤的肚里倒蛮有些货色，平常不大看得起他，听他这些话很有道理，其实这一套他比梅佐贤知道的还多，但他有意露出佩服的神情，说，“是的，你说的真好。”

服务员送进来腊味拼盘和一瓶老酒，梅佐贤给

陶阿毛斟了一杯，小房间里旋即散出一股浓郁的醉人的清香。梅佐贤举起杯来，说：

“来，先干一杯。”

梅佐贤只饮了一点，陶阿毛却把一杯酒喝得干干净净，连声赞好：

“这个酒真醇，不是和你一道来，喝不到这样的好酒。”

“喝好酒的日子多着呢！”梅佐贤暗示地望了他一下，“你说，这次改组，你当个副的，能够吗？”

陶阿毛认真地想了一下：

“当个委员主任啥的，我看，问题不大……”他见了好酒就恨不得一口喝掉，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饮了一半，说，“弄的好，工会副主席也可能弄到手，不过……”

他没有说下去，梅佐贤看他眉头一皱，知道他的心理，想起上次在弟弟斯咖啡馆谈话的情形，紧接上去代他说：

“要花点钱，是啵？”

“啊哟，我的厂长……”

“嘘——”梅佐贤用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子，“你小声点。”

“你真行，”陶阿毛把声音压小了，“你真行！”

服务员又送进菜来，梅佐贤等他走了，才说：

“办事哪能不花钱哩，”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万块钱^①放在陶阿毛手里，“不够，给我说一声，就给你。”

“好的好的。”陶阿毛一边说一边又饮了两杯。

“我还有点事，阿毛，要先走一步。饭钱我去付，你慢慢吃。”

“你不吃点吗？”

“不，”梅佐贤说，“今天晚上有人请吃饭，你一个人吃吧。有好消息马上报告我，副主席。”

陶阿毛摇头说：

“梅厂长，你别开玩笑。”

“怎么？”

“你为啥叫我副主席？”

“工会一改选，你不就是副主席了吗？”

“现在还不敢说，就是改选，也不一定选上。”

“那没有问题。”梅佐贤好像比陶阿毛还有把握，他眯起眼睛说，“今后，我们要密切合作哪。”

“我听候梅厂长的吩咐。”陶阿毛见小房间外边没有人影，他放低了声音说，“就是这次选上了，怕也当不长。”

“那为什么？”梅佐贤皱起眉头，困惑地问。

① 那时还是用的旧币。

“最近市面上流传四句诗，你听说了吗？”

“没有。啥诗？”梅佐贤歪过头来，急切地问。

“这四句是，”陶阿毛右手的食指按着右边的太阳穴，想了想，才慢慢念了出来，“民国四十年，八魔闹中原，去了口上口，来了天上天。”

“梅佐贤睁大了两只眼睛：

“这是啥意思？”

“最初我也不懂，后来人家讲给我听，才闹明白了。口上口指的是日本，天上天呢，就是美国。”

梅佐贤愣了一下，皱起眉头一想，怀疑地问：

“一九五一年美国要占领中国吗？”

“我听人家这么说，谁晓得是真是假。”

“这是谁编的？”梅佐贤听陶阿毛的口气，松了一口气，露出有点不相信的神情。

陶阿毛立刻严肃地说：

“不是人编的，听说是乩训。”

梅佐贤肃然起敬地说：

“那一定是真的，扶乩是很灵验的，说不定啥地方出了刘伯温。”

“我不信那一套。”陶阿毛摇头说。

“这是神仙的指示，不能不信，——我母亲就相信扶乩。”

“啊！”陶阿毛楞着两只眼睛。

“不管哪能，你先设法选上再说。”梅佐贤惦记着要向徐总经理交差。

“能选上，我当然不反对，只是现在还很难说……”陶阿毛嘴上虽然这么说，脸上的表情却好像有九成把握。

11

冯永祥一跨进徐义德的大客厅，他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见那些富丽而又堂皇的陈设，立刻感到徐义德的的确确是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在这样人物的身上下些功夫，是值得的。他觉得今天登门拜访是非常英明的举动。他站在钢琴旁边，远远望着壁炉上的一只汉朝的发绿色的小铜鼎。

从东客厅那里走出一位年青的女子，马上吸去了冯永祥的注意力。她穿着苹果绿的凡立丁旗袍，上身还穿了一件短短的背心，也是苹果绿的凡立丁做的，但和旗袍不同的是镶了一道粉绿色的边；脚上穿的是绣着一对红凤凰的白缎子浅口软底鞋。她低着头慢慢地一步步向里面走来，头发给烫得有点发黄，波浪式的头发左边夹了一个翡翠色的蝴蝶式的夹

子。她浑身上下显得极其柔和，头虽然低着，可是冯永祥从侧面看去，也十分秀丽。

她没有注意客厅里有人，只是缓缓地走着。冯永祥的眼光随着她身子的移动，发痴一样地跟过去。

她快要走到客厅门口，老王一步跨进了客厅，向她弯着腰，低声地说：

“有人找总经理……”

“她站了下来。老王的手指着冯永祥，说：

“就是这位冯先生……”

冯永祥给老王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竟不知道哪能是好，等了一会，整理了一下领带，才慌张地走上一步，急急忙忙地说：

“是，是鄙人，是鄙人……”

老王站在旁边嘻着嘴说：

“这是三太太……”

“三太太”这三个字像闪电一般地从冯永祥的脑海里划过，他记起了外边的人对这位三太太神话一般的种种传说，有人为了要看这位三太太一眼，曾经化了很多钱大请了一次客，事后主人再三地说：“值得！值得！”他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徐义德家里就有福气看见，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然，他也是早就想瞻仰瞻仰三太太的仪容的，不料来得这么迅速而又突然，使得他毫无准备，想到今天穿的那身浅灰色

的英国呢的西装，本来以为还不错，现在觉得有点寒伧了，不够漂亮。领带也不像样，灰溜溜的，怪自己为啥不换一条呢？他扣上西装上衣的扣子，彬彬有礼地走上一步，点了点头，说：

“久仰，久仰，三太太……”

她更正说：

“我姓林，叫林宛芝……”

她并不喜欢人家称呼她三太太。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叫惯了，她没有办法把大家的口改过来，但是在陌生人的面前，她希望人家叫她的名字。

冯永祥一听她给自己介绍姓名，就懂得她不满意刚才的称呼。他认为直呼林宛芝太不礼貌，叫林小姐吧，又不合乎身份，他改口叫了一声：

“徐太太……”

林宛芝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她愉快地走回来，指着大客厅里的单人沙发对冯永祥说：

“请坐。”

冯永祥像是木头人一样的应声坐下，她在冯永祥对面的双人沙发上也坐了下来。他的眼睛还是不放松地一个劲盯着她的脸庞。有时他虽然怕被老王发现，有意把眼光望着沙发前面的那张矮矮的圆桌，可是眼光又时不时对她望一眼两眼。

老王悄悄地退了出去。

她没有正面看他，也不知道他在凝神望他。她微微低着头说：

“找总经理有事吗？”

“是的，有……”冯永祥在平时是以能说会道出名于工商界的，现在却变得好像是一个笨嘴笨舌的人了，话老是一句搭不上一句，过了一会，才接着说下去，“有，有点小事。”

她见冯永祥有点口吃，讲话的语调慌张，以为他有什么心思，便抬起头来看看他，不料正好碰见他的眼光在注视自己，她忸怩地又低下了头，应了一声：

“哦。”

“冯永祥正面看见她的脸庞以后，立刻感到有一股热流在全身迅速地流转。他的两只眼睛圆睁着，望着她波浪式的美丽的头发。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有点奇怪：冯永祥坐在对面既不说话，也不走，难道是出了啥事体吗？她问道：

“你和总经理约好了吗？”

冯永祥听到这清脆的声音，顿时发现自己的神情不对。他从面前的矮矮的圆桌上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浓郁的茶香和那有点涩的茶味，使得他的精神陡然一振，头脑也清醒了一些，仿佛从梦一般的境地回转来。他的心虽然还是怦怦地跳着，但现在努力

使自己保持镇静。他放下茶杯，慢慢地说：

“是的，徐总经理约我现在来的。”

“那他快回来了，累你久等了。”

“没有关系，”冯永祥没有一丝焦急的神情，毋宁说他倒希望在这间大客厅里多等一歇。他补了一句，“没有关系。”

“有要紧的事体吗？”

“没啥要紧。”他想把话题岔开去，说，“你不常出去走走吗？”

她没有答他下面这句话，只是重复他第一句话：

“没啥要紧……”

她皱起淡淡的眉头像在思索这句话的内容，又像是知道“没啥要紧”，便要站起来上楼去似的。他连忙接上去说：

“说要紧，当然也很要紧。”

“这是啥事体呀？一会不要紧，一会又很要紧。”

她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眼，看他俊秀的面孔上满是笑容，她也忍不住噗哧笑了一声，但旋即用淡绿的麻纱手绢捂住了涂满了大红唇膏的嘴。他知道林宛芝是徐义德心上最宠爱的人，他和徐义德之间的事没有瞒着她的必要，他不讲，徐义德也会告诉她的，不如痛痛快快地告诉她，反而会博得她的欢心。他说：

“我们工商界的巨头们有个星二聚餐会，每逢星期二聚餐一次，大家交换交换意见，也学习学习政治。现在共产党当权，凡事离不开政治，不学习就跟不上去，连生意也不好做。有了这个聚餐会，比在同业公会里交换意见方便些。义德兄想参加这个聚餐会，特地约我来商量商量。”

“这桩事体啊，”从她的口吻里听出她对星二聚餐会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且也不认为是件啥了不起的事体，轻描淡写地说，“他要参加，参加就完了。”

“没那么简单，”他很严肃地说，“加入我们星二聚餐会的要两个会员负责介绍，还要全体通过，只要有一个会员反对，就不能够加入，非常严格哩。”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金头的三九牌，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便含在嘴犄角上，又说了一句：

“你说容易吗？”

“大家在一道吃吃饭，还要这么费事，为啥呀？”

他摘下嘴犄角上的香烟，身子稍微向前一点，神秘地说：

“这里面自然有道理……”说到这里他有意不往下讲，看了她一眼，欣赏她那如水一般的透明的惊奇的眼光。

“啊——”

她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眼光毫无顾忌地凝视

着他。

“只是一般吃吃饭，那当然简单。我们这个聚餐会的成员，一大半是上海工商界的核心人物，对外讲是学习政治，实际上是工商界同仁交换意见的地方，研究应付政府的对策，保护工商界的利益，有啥重大的事体先在聚餐会讨论，意见一致了，然后推出去，交给公会办，聚餐不过是个名目罢了。”

“原来是这样！”

他拿着香烟的那只手对她指了指，说：

“这是一个秘密，只是告诉你一个人，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说。”

“这么神秘？”

“唔。”

“义德恐怕加入不进去……”

“为啥？”

冯永祥以为她听了介绍星二聚餐会的性质怕了，不敢让徐义德参加。他想改口把星二聚餐会说得普通一些，不要吓倒了她，可以让徐义德加入。但一时又想起词儿来，同时也不大容易马上一百八十度转过来。正在他发愁的辰光，她说话了：

“谁肯介绍义德呢？”

她听他的话里有不少新名词：啥个“核心”呀，“对策”呀，“学习”呀……她并不完全懂，就是觉得

这个聚餐会神秘而又重要，徐义德加入进去可以提高地位，和工商界大亨们往来，大概会有好处的。可是徐义德过去和大亨们往来少，就是冯永祥也是头一趟到徐家来。她担心加入不进去。

“只要他愿意，我负责介绍。”他得意地望了她一眼，仿佛是看在她的面上，又好像是特地做给她看，显得冯永祥在上海滩上很有办法。

“要是有人反对呢？”

“我包他加入好了。”

“那我要代表义德先谢谢你了。”

“我和他不是外人，”他忽然和徐义德拉起知己来，很亲切地说，“用不着谢……”

他的眼睛注视着她的面部表情。

老王忽然走了进来，站在她旁边，弯着腰，对她的耳朵轻轻地说：

“朱先生来了。”

“朱延年吗？”

“唔。”

“又来了。”她马上沉下脸来，显得厌烦的样子，说，“让他在小客厅里坐。”

老王刚要退出去，她连忙补了一句：

“你上楼告诉她一声。”

老王懂得“她”是指二太太朱瑞芳。他点了点头，

走了。

冯永祥听见朱延年三个字，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朱延年三个字，在西药界从红得发紫变得臭得难闻了。他问：

“是福佑药房的朱经理吗？”

“是的。”

他惊慌地站了起来。他怕遇见朱延年，那会纠缠不清的；同时他和林宛芝两个人在客厅太久，怕引起人家误会。他脸上露出好像做了啥不名誉的事体突然被人发觉的尴尬表情，连忙说：

“我走了。”

她感到很奇怪：

“你不是要等义德吗？”

“不，我还有事体哩。”

“再坐一歇，也许马上就来了。”

“不，不，我马上要走，”他霍地站了起来，伸过手去和她握了握，感到一股热气，像火似的，立刻松开手，匆匆地说，“再见！”

说完话，他放开步子走了。她连送也来不及送，望着他倏然逝去的背影，跳上汽车，开走了。她有点莫名其妙。她怕在大客厅里碰到朱延年，径自上楼去了。

冯永祥的汽车开出了徐公馆没有一段路，他问

自己：为啥忽然离开呢？朱延年来，就让他来，不理他就是了，怕啥呢？冯永祥和徐义德约好，要谈星期二聚餐会的事情，和林宛芝在客厅里等待，有啥关系呢？他想再回去，又怕人家奇怪：刚走，怎么又来呢？他懊恼地靠在车厢角落里，眼皮慢慢搭拉下来。一个浑身穿着绿色服装的少妇的影子在他的脑海里时不时出现。

正当冯永祥回味刚才客厅里情景的辰光，徐义德的那辆一九四八年式的林肯牌的黑色汽车喇的一声从他的汽车旁边驶过，迅速地向徐公馆开去。

徐义德一跳下汽车，老王就对着他的耳朵低声报告朱经理在小客厅里等候他的消息，他眉头一皱，连大客厅也不进去，便到楼上林宛芝的房间去了。

林宛芝告诉他冯永祥来等了他很久，刚才走了。徐义德焦急地搔着自己的头，说：

“真糟糕，公司里有事，来晚了一步。”他望着门外，那眼光仿佛在搜索冯永祥似的，问，“他走了多久？”

“一歇工夫。”

“那派车子追他？”

“怕来不及了。”

“对啦，”他忽然想起，说，“我刚才在路上看见一辆小轿车开过去，怕就是冯永祥的，一定是冯永祥

的！”

他凝神想了一阵，说：

“我马上找他去。”

“你晓得他到啥地方去哪？”

他愣住了，问她：

“他对你说到啥地方去没有？”

“他哪能会给我说这些事体。”

“对，他不会给你说的。”他觉得自己有点糊里糊涂，冷静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他商量哩，只怪我不好，来晚了一步。”

“是星二聚餐会的事吗？”

他大吃一惊，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问：

“你哪能晓得的？”

她微微一笑：

“对吗？”

“他怎么讲？肯介绍吗？”他这几天到处设法托人给自己介绍加入，还没有个头绪，冯永祥只答应他来谈谈，看样子没有把握，但总算开始有点苗头，不料给自己耽误了，来迟了一步，没有碰上。

“他不肯。”

他失望地噗咚一声躺到沙发上去，两只眼睛茫然若有所失地望着她。她怕他真的难过，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走过去，对他说：

“他负责把你介绍进去。”

他马上跳了起来，按着她的肩膀，急着问：

“真的吗？”

“谁哄你。”

“那再好也没有了，”他爽朗地笑了，说，“再好也没有了。”

老王在外边敲了敲林宛芝卧房敞开的门，听了里面的应声，就笑嘻嘻站在门口，对徐义德说：

“总经理，二太太请您下去一趟。”

“我晓得了，”这两天那位朱经理老是往徐公馆跑，他讨厌见他，可是偏偏当他在家的辰光就遇上朱经理。他虽然讨厌朱经理，但二太太催着去，又不得不勉强应付一番，过了一歇，他说，“告诉她，我一歇就来。”

“是。”老王见总经理有点生气的样子，懂事地悄悄向楼下走去。

12

福佑药房总经理朱延年在他姐姐面前霍地站了起来，正对着他姐姐的面恭恭敬敬地作了一个揖，然

后哀求地说道：

“请姐姐高抬贵手，再帮小弟弟一次忙。小弟弟这一次一定好好做生意，将来福佑药房有一点点的发展，我都不忘记姐姐的大恩大德。”

朱瑞芳无动于衷，冷冷地说：

“谁晓得你做的啥怪生意，一会赚了很多钱，嚯，抖了起来：又是小汽车，又是吉普车；一会穷得吃一碗阳春面的钱也没有了，到处做伸手将军。我问你，你那些钱究竟用到啥地方了？你倒讲给我听听……”

朱延年整理一下水红色的牡丹花的领带，他用眼睛觑了姐姐一眼，显出心里很难过的神情，慢吞吞地说：

“唉，别提那些了，还不是蚀本蚀掉了……”

“为啥蚀得那么多？别人做生意也没你蚀得那么快那么干净，究竟是啥道理？”

朱延年是商人的儿子。他的福佑药房是白手成家的。他并不懂得西药，也不懂医务，连卫生常识也不比一般人高明。他原来在上海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做练习生，后来当了报告员。这家电台有个歌唱团，其中有一个叫刘蕙蕙的团员，年纪不过二十三四，生得平平常常，身材和举动同男子差不多，喜欢哼哼唱唱，到处蹦蹦跳跳。她有不少男朋友，可是没有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她和许多男朋友一道白相回来之

后，常常感到无比的孤寂，认为自己在恋爱上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她却比任何一个女子幸运，也比任何一个男子幸运，她一连得了两次头奖。一次是伪慈善奖，一次是伪中央储蓄会的奖。她取得了四千元伪储备票的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件事体轰动了广播电台，也轰动了上海。刘蕙蕙的身价无形中抬高了，男朋友找她的多了，其目的不过是要她请请客，吃完了又复东走西散。这辰光，有一个男朋友却看中了她，这就是朱延年。他很快的就爱上了她，结了婚。这可以说是朱延年平生第一笔生意。有了资本，他就希望做第二笔生意，赚更多的钱。恰巧电台旁边住了一位青岛客人，专门做洋酒、罐头、乳粉这一类生意，生活很阔绰，服装极华丽，眼看着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面对着这样的商人，朱延年的眼睛越看越红，不安心做一个报告员了。用那四千元的伪储备票，他到西藏南路的一条小弄堂里租了个客堂，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两张沙发算是写字间了，贴客堂里面放了一张床，用一块白布隔着，算是朱经理的卧室。电话装不起，借用邻居的。他跟青岛客人做的是五洋杂货带点西药。他认为自己很有福气讨了一个有钱的老婆，做生意也一定有福气。他挖空心思想了字号的名称：叫“福佑行”。这字号实际上不成为一个字号，可是招牌做得挺大，挂在弄堂口，白底

红字，过往行人在马路上老远就看见福佑行三个斗大的字。五洋杂货的利润虽然不错，比起西药来，利润还是薄的。经朋友再三的怂恿，劝他专门贩卖西药，那个青岛客人看他手里有点钱，人也算得上聪明，乐意帮他一个忙，给他拉上一些客帮的关系。他自然高兴得没有话说。福佑行变成了福佑药房，并且从西藏南路搬到汉口路的吉祥里，扩大一间写字间，一共有两间。朱延年成了西药掮客，拿了一张价目单和几种样品，到处兜客帮的生意。这位西药掮客起初连药名字也弄不清楚，把消发灭定叫做沙发不定。给客人几次指点，加上药厂药房伙计的帮助，他开始熟习一些药名和它的主要性能。凭他那一张能把死人说话的嘴，和善于观察对方的意图满足对方要求的能力，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在西药这行业中几乎大家都知道有个很会钻营的掮客叫做朱延年。他手面不小，也有一些商业上的魄力，只是有一点：实力不雄厚。许多利润很厚的生意，眼看着在他面前滑过，不仅他本人，即连别人也为他惋惜。他于是向姐姐轧头寸。姐姐不肯，一则手里现款不多，因为伪法币不值钱，有点钱都变成了黄金美钞；二则不知道朱延年这行买卖有多大把握，踌躇地不肯借给他。朱延年说西药这一行只要有钱存货，那准是一本万利，而且睡在家里，钱就会往屋子里滚进来。姐姐答应借给他两千

万伪法币，这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向无锡的堂房哥哥朱暮堂借了五十两黄金，月息一两黄金；同时向上海利华西药房柳经理轧了五千万头寸，月息五分，不消半个月，利息就等于本钱。人家看他吃这么大的暗息轧头寸，同行都为他捏一把冷汗。朱延年不在乎，凭了这点本钱，他在市场上做空头，投机倒把。他对行情看的相当准，市场的规律也摸的熟，只要把伪法币伪金圆券变成货，那一定赚钱。利息和物价赛跑，怎么高的暗息也追不上物价，做西药更是笃定泰山。朱延年的生意日渐扩大，写字间扩大，职工增加，在重庆和广州两个地方设了分号，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只有两个伙计，给上海跑街接头。他成了西药界一名红人。本来他出入总是叫“祥生”或者“云飞”的汽车，现在自己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顺风牌小轿车。三轮和老虎车已赶不上送货的需要，他买了一辆旧吉普车，吉普车两旁和后边都漆上四个耀眼的红字：“福佑药房”。车子经常在汉口路那一带药房门口经过，谁看到不暗暗羡慕朱延年，都说西药界出了一个有能力的少壮派。刘蕙蕙不再是广播电台的歌唱团的团员了，她随着朱延年出入交际场所，自己的名字渐渐被人忘却，大家只知道她是朱太太。

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之下，横渡长江天险，大军前

进的矛头指向南京和上海。朱延年过去开出五万多支盘尼西林的抛空账单，三个月取货，现在都到期了。市场银根紧，水陆交通断，朱延年手里头寸缺，债户逼的紧，他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藏到刘蕙蕙的家里，啥人也找不到他。

福佑药房宣告破产。所有福佑的债户组织了债权团，清理债务。四十多职工大闹情绪，打碎了写字台上的玻璃板，扯破了开张时同行送来的“大展宏图”的贺幛，把朱延年恨煞。伙计们在上海有家的回家，住在外路而有盘川的也回家去了，留下几个上海没家也走不动的伙计看店。童进家在浙江，不但没有路费回去，即使借了盘川回家，也无事可做，生活马上成问题，反而不如留在上海好。他整天价蹲在这个宣告破产的福佑药房里。

朱延年请了严大律师出来调解，债权团摸清了朱延年的底细，知道他没有啥根底，糠里怎么也榨不出油来，初步同意和解。朱延年这才露了面，所有动产与不动产都交给债权团分配。鼎盛时期福佑药房发展到五个写字间，现在只留下一间，给留下的童进他们这些伙计住用。

上海解放以后，朱延年穷得像个小瘪三，到处伸手借点钱吃喝，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刘蕙蕙渐渐对他不满，他对刘蕙蕙呢，更加不满；四千元伪储备

票早已用得精光，刘蕙蕙在经济上对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啥帮助。在日常生活上，朱延年感到多一个人的开销，就是刘蕙蕙。在他眼中，刘蕙蕙已没有可爱的地方，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物了。但为啥两个人还能住在一块呢？因为刘蕙蕙有时候还能给他拉一点饥荒。

他念念不忘福佑药房的黄金时代，经常跑到汉口路那唯一留下来的写字间去，看看为债权人分配掉的那四间房子空在那里，走来走去在转念头。通过严大律师的试探和提议，债权人同意朱延年复业。朱延年听到这消息真赛过飘浮在茫茫大海里的人遇到了救命的船只。他一口气跑到了姐姐的家里，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姐姐那么一逼，他一时说不上话来，想了一阵，才嘎嚅地说：

“姐姐你还不晓得吗？国民党时期的生意难做，钞票不值钱，天天要动脑筋，一不小心就要在市场上栽筋斗，不是我个人的罪过。解放了，很多停工歇业的厂店都开门了，不瞒你说，我的债权人都愿意把福佑原来的那几间写字间租给我，允许我复业。这是我出头的好机会。”

“那朱延年要抖起来了，眼睛又要朝天看了。”他姐姐想起他有汽车的辰光，亲戚朋友对他不满的情形，就瞪了他一眼，说，“你写信找暮堂去，我没办法。”

朱延年因为欠朱暮堂五十两金子过期没有归还，两人早就断绝了往来。朱延年一听提起朱暮堂，直摇头道：

“他吗，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钱。他哪会借钱给我？我死了也不去找他。”

“不管怎么说，究竟是堂兄弟，一笔写不下两个朱字。暮堂最近来信还谈起你哩。”

“他谈起我？”朱延年以为又提到那五十两金子的事，赶紧表明，“欠他那五条黄鱼，等我复业，生意发达了，一定还他。我知道，他念念不忘这五条黄鱼，他就没想到我目前的困难，你告诉他，姐姐，目前不能还他。”

朱瑞芳笑了：

“看你急的，暮堂根本没提金子的事，他也知道你目前困难，他想帮你的忙……”

“他想帮我的忙？”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

“可不是。……”

他凝神听姐姐说：

“他说手里没有现款，田地倒是现成的，他说他可以帮助你一二百亩地，多一点也可以，要你好好经营。”

“一二百亩地？”

“对。”

朱延年还是有点不相信：一则朱暮堂没有直接给他的信；二则现在田地不值钱，没人肯拿现款买地；三则接受了堂兄的地，姐姐这里就没有希望了。他想了又想，说：

“我们做生意买卖的人，不会经营土地，这个给我没有用。姐姐，你别提暮堂的事，现在只有靠你了。”

“地不要吗？”

“不要。”

“暮堂信上说，都是上好的水浇地。”

“再好我也不要。好姐姐，你无论如何帮我这次忙。”

姐姐听了他的话，心里已经软了一半，松口问他：

“你发了财还会想起姐姐吗？”

“啥闲话，啥闲话，我朱延年不是那号子人，对姐姐的恩情从来没忘记过。”

“对别人可有过。”

朱延年不假思索，赖得一干二净：

“那是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他暗暗看了姐姐一眼，她微笑着，知道是逼他的，并不是真正生他的气。他拉回了话题，说，“姐姐，写字间准备好了，

职工准备好了，客户的关系拉上了，开业登记手续也准备妥当了，只是差点头寸，你帮我点忙，你拉我一把，我就站起来重新做人了。今后姐姐要我做啥我就做啥，叫我哪能做我就哪能做。”

“说得那么好听，”姐姐听了他的话心里很舒服，看他那情形也想帮帮他的忙，父亲生前很喜欢他，一再关照姐姐要多照顾他，何况姐姐也有这个能力。姐姐刚才没有很快答应他的原因，不过想教导教导他，改正他那些毛病。现在朱延年自己表示了态度，她就进一步说道：

“自家要晓得自家的毛病，不要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了话不算数，有了钱就转脸不认人。”

“不会的。”

“你还不承认？”姐姐把眼睛一瞪：不满意他现在还当面撒谎。

“不，我是说今后不会的。”他见姐姐那么严峻，不禁打了个冷颤，慌忙改口。

“那就对了。我也不过是希望你好，给我们朱家挣一份光荣。”

“是的，是的。”他不敢再声辩，生怕事情弄僵。

“你看要多少呢？”姐姐试探他的口气，怕他开口数目太大，又补了一句，“我手头也不宽裕。”

“不多，有两三百万就周转过来了。”

“太多了。”姐姐摇头。

“少一点也可以，”朱延年马上让步，因为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是想请徐总经理担保在银行开个户头，可以透支。他向姐姐提出这个要求。

他姐姐说：

“那要看你姐夫的意思了。”

“只要你说一声，一定行。”

姐姐听到他奉承的话，心里想朱延年说出来的话比蜜还甜，她忍不住微微笑了。朱延年看大事已成，站起来对着姐姐又是深深一揖：

“好姐姐，谢谢你，我这一辈子也忘记不了你待我的好处。”

姐姐得意地推开他的手：

“算了吧，不要再演戏了，我吃不消。”

“我是真心真意，姐姐……”

楼梯上传来囊囊的皮鞋声，姐姐阻止他说下去：

“别哇哩哇啦，你听，你姐夫下来了。”

朱延年连忙规规矩矩坐下，整理好自己的领带，两个眼睛注视着客厅的门。

13

朱延年看见徐总经理走到客厅的门口，他连忙站了起来，弯着腰说道：

“你好。”

徐总经理没有望他，径自走进来，随随便便地应付了一句：

“好。来了很久吗？”

“不，刚来一歇。”

“对不起，刚才在楼上有点事，没有下来招呼你，”徐总经理抽出一根香烟，点着了。他抽了一口，装出不晓得他最近常来的神情，悠然地说，“不过让你们兄弟姐妹多谈谈也好，有好久不见了吗？”

朱延年坐下来很局促，感到徐总经理的话里有刺：好久不来，现在来谈了这么久，一定是有啥要求，——这是说朱延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朱延年愣了一会儿，才给自己转过弯来：

“不，我和姐姐倒是常见面的。”

姐姐看他一眼：那意思说你真会撒谎，话讲得那么自然，就像真的一样。

“常见面，谈谈也好，”徐总经理把烟灰向着北京制的深紫色的珐琅烟灰盘弹了一下，望着袅袅上升的蓝烟说，“最近做生意没有？”

“做生意？”朱延年听到这话马上脖子红了，他不知道徐总经理是挖苦他还是骂他，也不知道是徐总经理无心说出的，他就随随便便“唔”了一声。

姐姐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不怕朱延年很聪明又很调皮，遇到深谋远虑老练圆滑的徐总经理却感到局促不安。癞痢头是忌讳人家说亮的。朱延年宣告破产以后，怕人家提到福佑药房和生意。姐姐见他“唔”了一声，一会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会又把手插到口袋里，显然这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好。她搭救了他，插上去说：

“刚才谈的，就是想做生意。”她说完这句话，略为转过脸去，暗暗向着朱延年对徐总经理噘一噘嘴，意思是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好的机会，送到嘴上的肉，怎么不吃呀。

朱延年领会姐姐的好意。他从窘境上慢慢恢复了正常，但也不好马上转入正题，因为不是和姐姐谈话可以随便点，向姐夫暴露了意图，不答应，下次就很难开口了。他试探地说：

“提到生意，倒是想做一点，”他斜视了一下徐总经理的脸色，很自然，没有察觉出朱延年有啥意图的

样子，他接着说，“现在市面好了，生意也比过去容易做些。”

“哪能见得？”

“钞票值钱，市场稳，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利润就不会厚。共产党到上海不久，他们究竟施啥手段，现在还难预料，你对市场不要盲目乐观。我看今后的生意一天要比一天难做。”

“那是的哟。”

“共产党和我们资本家是死对头，他们一心只顾工人的利益，不会让我们讨啥便宜的。”

“这话极是。共产党是要共我们的产的。”

“现在他们的政策还不是共产，他们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般的利润还是会给我们的。不过共产党的底盘很难摸的透。”徐总经理感到现在办厂不容易，他的食指在敲着烟卷想心思。

“我在这些方面毫无经验，今后希望你多多指教，多多提携。”

“我也没啥经验。谁在共产党手底下过过日子，大家都没经验，还不是走一天算一天。”

“你在工商界方面的经验可丰富，不要说小弟弟我哪，就是工商界许多前辈也不得不让你三分。他们只有旧经验，不像你既有旧经验也有新经验，连外国工商界的情况也比我们熟悉。”

“那不过是他们这么说说罢了。”

“办厂的经验更多，谁都比不上你。”

“这未免过于夸奖了。”

“这是事实。你看：沪江纱厂是你一手办起来的；纱锭在上海是第一流的——瑞士立德出品。还有，你是聚丰毛织厂的大股东，兴华印染厂的董事，茂盛纺织厂的董事长，苏州的泰利纱厂你也是董事长，听说最近永恒机器厂也要请你担任董事长……”

朱延年一口气往下数，其实他并不知道徐家的底细，他姐姐也不知道，真正知道徐家底细的，除了徐总经理本人以外，只有他所宠爱的林宛芝。单是朱延年知道的已经够多，名字都记不大清楚，幸亏徐总经理半路插上来：

“永恒的事只不过说说而已，我并不想就……这个厂难得办的好。”

永恒机器厂是制造纺织机器和纱锭的，在上海虽挂不上头牌，但二牌是稳的。它的好处是全能厂。徐总经理对这个厂确有意思，凡是永恒到沪江来轧头寸，徐总经理没有一次不答应的，而且有意放手让他用，到期不能还，要求转期，要是别人，徐总经理老早把眼睛向上一翻：下次要不要向我轧头寸？但对永恒却是另外一副面孔：笑嘻嘻地点点头。同行中都说徐总经理太好了，为啥这样巴结永恒。把永恒的胃

口喂大了，吃惯了，有些流动资金在徐总经理的怂恿之下，扩大生产，变为固定资产。这样，永恒更时常周转不灵，对徐总经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徐总经理看他预计的时机已经成熟，向永恒表示：要抽头寸派用场。永恒急了，市场上银根紧，临时到啥地方去调这么多的头寸，走投无路。徐总法理是翻脸不认人的，永恒老板咬咬牙齿，提出请求徐总经理把负债变为股金。徐总经理摇头；于是又提出请他担任董事长，徐总经理内心已经答应了，可是他嘴上还是表示不愿意，只要现金。谈到最后，经过棉纺公会疏通，徐总经理才勉强答应考虑考虑。

朱延年懂得徐总经理说的是客气话，永恒早就抓在他的手里，现在不过是做一种姿态，这样一推让既博得同业的好评，又可以制服永恒，徐总经理好像对永恒并不想染指，是永恒一定要拉他下水，他是救人之急，为了永恒才勉强应承的。朱延年猜到他的心思，并不揭露，却从侧面顶他一句，其实也就是恭维他：

“听说快拍板了，你哪能还不想就？你多才多艺，哪个厂不想请你。我看还是帮永恒一个忙吧。”

“当然，朋友有困难不好袖手旁观，最近公会方面又约我谈了，不看僧面看佛面，总得给公会一个面子。看情势，不答应永恒怕是不行了。”

徐总经理伸了一个很舒服的懒腰，仿佛倦于这些事情，但在他产业单子上又增加了一个单位，是很高兴的。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不怕你有多大的本领，就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朱延年瞅着徐总经理嘴角上的笑意，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紧接着说：

“工商界朋友提到你，没有一个不佩服你，没有一个不感激你，别人有啥困难有啥要求，你都是慷慨帮忙的。”

“在市面上混，总得要互相帮助。我手头宽裕一点，帮助别人多一点，没啥。”

“是的，最近西药业生意好转，行市大家都看涨，有头寸进货，一定赚钱。”

“我也听说了。”徐总经理无意搭了一句。

“我想把福佑复业……”

朱延年说到这里停了停，他偷看徐总经理的神色。徐总经理“啊”了一声，似乎有点察觉，提高警惕在听他的话。这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朱诞年大胆往下讲道：

“只是头寸方面……”

徐总经理见苗头不对，连忙关门：

“这两天各方面头寸都紧，眼看着月底就要到，我也差这个数不能过关，”徐总经理伸出一只手来比

了比。

朱延年懂得徐总经理暗示他自己差五亿头寸的目的是要封他的嘴。他也是老手，马上见风转舵：

“我倒不需要现款，”朱延年知道在徐总经理面前一时轧不到头寸，乐得吹点牛，“复业方面的经费差不多了，客户也联络上了，最近就要择吉开张。我想在银行里立个户头，请沪江打个图章担保，有了大买卖好透支一点……”

朱延年说完了话，眼角上对着他姐姐。徐总经理早已看见，他却故做不知，淡然地答道：

“啊，最近银行紧缩信用，开新的透支户头怕不容易……”

朱延年脊背上一阵凉意掠过，紧张地正面对着姐姐：

“这个，这个……”

二太太对徐总经理说：

“你不要推三推四的，这点忙你得帮，延年有困难，你不帮忙谁帮忙？”

“不是我不肯帮忙，就怕碰钉子。”

朱延年趁着姐姐的支持，慌忙补上一句：

“沪江是金字招牌，只要你答应担保，其余的事我查办，在哪家银行开户头都行。”

“我怕……”徐总经理晓得借钱给朱延年或者是

给朱延年担保等于把钱扔到水里。

二太太看他那个犹豫样子，急了，便说：

“你不打图章，我到厂里叫梅佐贤打。”朱瑞芳有点生气了，说，“义德，这点小事体还犹犹豫豫的，真成不了气候。”

徐义德看情势推却不了，只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说：

“想透支多少呢？”

“五千万就差不多了。”

“那么就介绍你到信通银行开透支户头吧，”徐总经理见数目不多，便一口答应，但怕他乱化，又加上一句，“信通银行经理金懋廉，我并不太熟，是朋友介绍的，认识不久，和人家往来，信用要紧啊。这一次得好好做生意，不要过不了几天又宣告破产。”

朱延年满脸绯红。

二太太觉得丈夫这句话说的对，真是一针见血，点头附和道：

“你姐夫的话要牢牢记在心里。”

朱延年低下头去，勉强地小声说道：

“忘不了。”

二太太送弟弟到客厅外边，语重心长地嘱咐他：

“你这次真有办法吗？”

“当然有办法。不是吹牛，我有十二分的把握。”

“共产党来了，办事要小心点，别又栽筋头！”

“福佑早就和解放区有往来，他们那一套我摸的熟透了。姐姐，你放心，不久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好消息哪。”

14

当徐总经理答应朱延年开透支户头的辰光，税局在沪江纱厂的驻厂员方宇正在厂长室里坐立不安。梅佐贤把一只马凡陀的手表在他面前一放，说：

“你收下吧，老方。”

方宇坚决地把崭新的金黄表面的马凡陀推还给梅厂长：

“我不能收。”

梅佐贤指着马凡陀自言自语地说：

“这只表真不错：十七钻，自动，防水，不锈，不怕电，不怕震动，走起来又准，一分也不差，是瑞士的最新出品。现在外边买至少要百把万哩。”说到这儿，梅佐贤把表戴在自己左手上，说，“戴在手上真漂亮，你看。”

梅佐贤把左手有意伸给方宇看：

“你说，这只表不错吧？”

马凡陀表面上的金光在方宇面前闪耀。他的意志在金光面前摇摆。要是上海没有解放，方宇还是伪上海市政府税务局的驻沪江纱厂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的税务分局的沪江纱厂的驻厂员，不要说是一只马凡陀，就是十只马凡陀方宇也会毫不犹豫地收下来。现在他得考虑考虑。共产党解放了上海，他是一名留用人员，对共产党的情况不了解，但共产党反对贪污不爱钱财他是知道的，不要因为一只表而打碎自己的饭碗，这就得不偿失。但这是一只马凡陀啊，凭他这样一名小职员，至少得束紧二四个月的裤腰带才能勉强买一只，否则，一辈子也别想戴上。他拿不定主意，吞吞吐吐地说：

“这个表，呃，倒是不错。”

梅佐贤马上解着马凡陀，说：

“你在我们厂里当了三年多的驻厂员，多承关照，徐总经理很感谢你，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觉得你是政府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很有前途的。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个人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

说完后，梅佐贤解下手上的表往桌子上一放，这次他并不马上送过去，却静静地看方宇的神色。方宇

一双眼睛直盯着那表，说是个人的私交，那哪个不送人东西呢？连方宇有时也送点东西给梅佐贤。礼尚往来，这没有啥的。想到自己手上戴的那只白克钢表已经生锈，一天至少要慢十分钟，也应该换一换了。他想拿过来，手伸到半道上又踌躇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好随便接受商人的礼物吗？梅佐贤瞧出他的心思，他抓住方宇的手，给他把马凡陀戴上，说：

“自家人客气做啥，太见外了。”

“不，不是的，现在不比从前，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不好随便拿你们的东西，是避点嫌疑。”方宇结结巴巴地说。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

方宇放心了。他戴着马凡陀的左手自然而然地放到桌子下面。梅佐贤接着说下去：

“你们当职员的，生活很苦。解放后，物价虽平稳，收入没有从前多……”

“薪水倒差不多，生活比从前好过一点。”方宇有意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个我晓得，单靠那点固定收入怎么行呢？”

方宇把马凡陀的事情渐渐忘去，他想起解放前的豪华的生活，那时候对于发薪水并不感到兴趣，非正式收入要比薪水多好几倍，化钞票就像是流水一

样。现在手头不得不紧一点，生活就不如从前了。梅佐贤一句话说到他心上，他不好再打官腔，流露出真情：

“唉，这日子，你说的倒也是的……”

“我看你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心里有话，想说又不说，我就晓得有事体。我们虽是老朋友，可是你同我还是不够交情……”

方宇听到这儿，跳了起来，说：

“你这是啥闲话，梅厂长，”他听到外边的脚步声，有人到斜对面的会计室领款，就把声音压低，没有说下去。

“没有关系，我关照过了，现在没人进来的。你说吧。”

“我方宇从来是讲交情的，够朋友的，你这样看我，未免看错人了。”

“那你有困难为啥不对我说一声呢？”梅佐贤逼紧一句，两只眼睛正对着方宇。

方宇脱口说出：

“不瞒你说，我早就想……”话到唇边他又吞了下去，改口道，“现在是人民政府，唉，现在是……”

“那有啥关系，我们两个人的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晓得。那个津贴你还是收下去，”梅佐贤从口袋里

掏出五十万块钱往方宇手里一塞，“先花着再讲，不够，说一声，我再给你。”

方宇手里给五十万元的人民币塞得满满的。他心里暖洋洋的，觉得梅佐贤这个厂长实在太好了，自己心里没有说的话，梅佐贤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他那么体贴，办起事来又那么小心谨慎，处处都注意照顾他。他不知道怎么来感激他才好。他把钞票往口袋里一放，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梅佐贤的手：

“梅厂长，我真谢谢你，梅厂长……”

因为太激动，方宇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梅佐贤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猎户，欣赏着已经捕获的猎物，悠然自得地说：

“没啥，用不着谢。你有啥事体说一声，也关照关照我们。”梅佐贤试探他税局方面有啥消息没有。

方宇越发感到梅佐贤这人实在太好了，不给他做点啥事体那就太对不起人了。他附在梅佐贤的耳朵边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七月一日要加税……”

“哦……这个是……”

梅佐贤想再问下去，方宇仿佛感到自己犯了罪，好像旁边有人在监视他，他惶恐地站了起来，拉开门，飞也似地走了。

15

朱瑞芳坐在沙发里，心里直纳闷，她想不通为啥弟弟对那一二百亩地一点兴趣也没有，暮堂这一片好意哪能拒绝呢？她希望徐义德能给她想出个好办法来。徐义德笑而不答，越发叫她困惑不解了。她奇怪地问：

“好好问你的话，笑啥？”

“延年要你帮忙，暮堂有意帮助他，他又不肯，你说，这不好笑吗？”

“不，一定还有别的意思，你倒给我说说看。”

“你说啥意思吗？”徐义德还是不肯说。

“我知道了，还问你，这不是废话！”

徐义德给她这么一训，脸上笑容消逝得干干净净。她又进一步催促道：

“快说吧！”

“延年究竟是在市面上混的人，现在谁肯要田地？”

“为啥？”

“你想想看：暮堂一辈子也没送过人一分地，现

在为啥要送？延年从来不拒绝接受别人的东西，现在为啥不要？这里面有个道理，共产党来了，要土地改革，谁拿了土地都烫手，有的想送出，没有的谁敢要？”

她听了大吃一惊，怪不得朱延年态度那么坚决。

“这么说，没有办法叫延年收下？”

“这还用说。”

她想起朱暮堂也要送给自己二百多亩地，信来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机会和徐义德商量，正好现在是个机会。她说：

“暮堂送给我们那二百多亩地哪能办法呢？”

“退还给他。”

“信上说，他已经办了手续了。”她认为不能说服朱延年收下，但给她的却不好意思推辞。

“你想要吗？”

“你看呢？”

“三个字：要不得。给共产党做事要加倍小心，共产党早就对地主宣布了，要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幸好，我们徐家祖上没有留下什么地，落得清闲。现在收下暮堂的地，那不是无事找事吗？”

“你不是说共产党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吗？”

“说是这么说，一有了土地，就变成地主了。”

“资本家有土地，共产党就不保护了吗？”

“共产党说是分别处理，可是这哪能分的清？”

“暮堂大概也看到这一层了，他说田地记在我的名下，同你没关系。”

“你不是徐家的人吗？”

给他这么一说，她哑口无言。隔了一会儿，她忧虑地说：

“暮堂那里哪能交代呢？”

“写封信去。”他早就想好拒绝的办法。

“这个……”她觉得事体不这么简单，就是写信，怎样措辞呢？

梅佐贤笑嘻嘻地走进徐总经理的客厅，她见梅佐贤有事要找徐义德，便站了起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你们谈吧，少陪了。”

朱瑞芳走到门口，想起弟弟的事，回过头来对徐总经理说：

“延年刚才提的事，你等会给梅厂长说一声。”

徐总经理不耐烦地应道：“朱延年的事哪能会忘的了！”

梅佐贤等二太太走远了，问道：

“啥事体？”

“有什么好事，”徐总经理生气地说，“我们这位朱延年先生，又要择吉开张了，可是头寸不够，要我给他担保在银行里开个透支户头。”

“那么……”梅佐贤看总经理生气，不知道这事要不要给朱延年办。

“透支的数目倒不大：五千万。你给他打个图章吧。不过这五千万又丢到水里去了。”

“那是的，朱延年老是做投机买卖，又没有本事，最后蚀光拉倒。听说福佑的债务还没清偿完，能复业吗？”

“给他在信通银行开个五千万的透支户头，沪江担个保，别管他那些闲事。”徐总经理不愿再提起朱延年，他把话题拉到沪江纱厂上来，“佐贤，厂里的工会改选的事怎样了？”

“我就是来向你报告这件事体的……”

梅佐贤笑眯眯地叙说工会改选的情况。陶阿毛根据梅佐贤和他在弟弟斯咖啡馆商谈的意见进行，活动改选的工作相当顺利，一开始提候选人名单里就有陶阿毛。但是梅佐贤还不放心，叫陶阿毛那几天特别卖力气，到处接触工人，和这个工人谈话，替那个工人领代办米，有时就溜到工人住宅区去，了解工人生活情况，鼓励大家提出改善生活的条件，向厂方交涉。只要为了工人福利，比方说细纱间女工要求增加乳盘啦，大家要求饭后增加一碗绿豆汤啦……给厂方交涉起来，他都站在前头，讲起话来声音比谁都高，厂里办公室里里外外的人都听的见。选举那天，

梅佐贤有意坐在厂办公室里办事，其实他没啥事体，一会看看报，一会瞧瞧厂里的高大的仓库，可是会不散。等到天黑了，夜班快上班了，才看到工人从做为会场的饭厅里蜂拥出来。他看到参加工会的职员们，就笑嘻嘻打听新工会的人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党支部书记余静当选了主席，细纱间收皮辊花的工人赵得宝当选了副主席，张小玲、钟珮文、陶阿毛……当了委员。最近开了一次工厂委员会，分了工；赵得宝兼生活委员会主任，钟珮文兼文教委员会主任，……

梅佐贤一个劲往下数，徐总经理除了陶阿毛以外，他就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是还有没有接近资方的工人当选。梅佐贤听到这问题愣了一下，他默默数一数，说：

“像陶阿毛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不过，一个也就够了，工会里有啥事体今后再也瞒不过我们。总经理，你放心好了。”

“你把事体看的太简单了。佐贤，我还不能放心。你要晓得：陶阿毛一个人在里面不容易起作用，万一陶阿毛出了啥事体，我们就再也没有人在工会里了。”

“对，总经理有远见。”梅佐贤点头称赞。

“我不是叫你想一切办法多选一两个人在里面

吗？”

“他们在工人当中没有威信，选不上。这次陶阿毛是下了许多工夫才成功的。”

“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够，太少了，太少了！”

工会已经改选完毕，总经理的口气又是这么硬，非增加个把自己人是过不了关的。这可难为了梅佐贤。他的眼睛一转动，想起陶阿毛的话，正好给他解围。他说：

“不过，这一届工会的寿命不长。”

“为啥不长？这一次改选了，谁晓得共产党到哪一年才改选？”

“到哪一年改选确实没人晓得，总经理，你忘记那四句乱训了吗？”

“乱训？”徐义德说，“晓得，就是灵验，也是以后的事，——今年我们就不过了吗？”

梅佐贤的围还是没有解了，他在总经理面前只好摊牌了：

“工会已经改选了，即使找到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办法再插进去了。”

“这个吗？……”

梅佐贤不等总经理说完话，接上去说：

“很难。”

“说难，确实很难；说容易，也确实容易……”

梅佐贤惊异的眼光望着徐总经理。他不慌不忙地说：

“你在当选的委员当中物色一个对象，好好培养他，不是很容易吗？”

“我这个脑筋太笨了，一时转不过来，没想到这一层，总经理。”

“可别让陶阿毛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不要让任何第三者知道。”

“一定照办，时间方面要宽一点……”

“那可以，”徐总经理在工人方面初步安排好，他想起冯永祥昨天给他说的话，便对梅佐贤说，“工商界最近有个聚餐会，都是上海著名的人物参加，章程规定的很严。参加进去以后，有啥事体大家好商量，也好互相帮助。很多工商界的朋友想参加，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这次冯永祥拉我进去，不晓得能不能通过……”

梅佐贤插上来说：

“那一定通过，绝无问题。”

徐总经理谦虚地说：

“冯永祥是核心人物，他能出面介绍，大概差不多。但愿能够通过，工会和工商界方面都有人，今后的事体就好办了。”

“总经理办事总是十拿九稳，只要你想到啥，就

一定能办到。我在工商界威望很高，关系又多，真是四通八达……”

梅佐贤恭维的话还没有说完，老王手里拿了一封信进来了：

“老爷，少爷有信来了。”

徐总经理坐在沙发上没动，只是右手伸出去。老王把信放在他的右手里，旋即弯着腰退了出去。徐总经理拆开信来，仔细地从头看到尾，脸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把信递给梅佐贤：

“守仁从香港来信说：新厂开工了，六千锭子都装上，义信办事真能干。佐贤，你看。”

梅佐贤接过信来，边看边说：

“总经理的妙计又完成了。现在三道防线都按照你的意图实现了：第一道防线上海，第二道防线香港，最后防线是瑞士，那是解放以前早就建筑好的。”

“中国近几十年来变动实在太太大，我们做生意的人不得不想的远一点。这三道防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我能够集中资金在一个地方办厂，那发展会更大的。瑞士这道防线太远，外汇存在银行里虽说牢靠，但没啥利息。”他皱着眉头，好像有点后悔。

梅佐贤看他心思重重，局面有点僵，他看到守仁信上谈到自己读书的事，便笑着说道：

“守仁在香港书院里的成绩不坏，总经理。”

徐总经理感到瑞士的存款可以慢慢想法子，眉头稍为开朗一些，听到梅佐贤提到爱子的事，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英国人办学校办的严，守仁到了那边不得不用功。他一心想去美国，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大同意，如果能去英国就好了。”

“那是啊，”徐守仁不在场，梅佐贤又是一种口吻，“学纺织自然应该去英国，念书还是英国好。美国的先生也好白相，哪能会教好学生呢？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下次写信我还是要他去英国，”徐总经理下决心说，“佐贤，你写信给香港厂，要他们也劝劝他。”

“好的。”梅佐贤心里想：徐守仁你自己讲话都不听，别人说了有屁用，不过顺水人情不妨做做，成功不成功不能怪别人，要看他自己。梅佐贤看看花园，见天色不早，想起还有一件大事没有报告徐总经理，便把徐守仁的信放在沙发面前的矮圆桌子上，他走过去，坐在徐总经理旁边，报告刚才方宇所说的消息。

徐总经理听到这动人的消息，直点头，垂在他下巴的肉好像听到这消息也很兴奋，高兴得一抖一抖的。听完了梅佐贤的报告，徐总经理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圆圆的脸上闪出红光。他两只手放在背后，走

到窗户面前，注视着花园尽头的一排柳树，他在考虑怎样利用这一消息，狠狠捞他一票。

一会，徐总经理果断地转过身来，对梅佐贤说：“六月底以前赶出两千件纱……”

梅佐贤算一算只有几天便是六月底，犹豫地说：“怕来不及……”

“加班加点。”

“那勉强可以赶出来，”梅佐贤硬着头皮说。

“货次一点没有关系，一定要赶齐。”

“是。”

“这两千件纱六月底卖出，缴了税，全部出厂。”

“怕没人要。”

“没人要也得卖出，找一个客户名字，做为他买的，不要付款，记一笔账就得了。”

“那纱放到啥地方去？”

“存到茂盛的仓库里，等税涨了以后再慢慢卖出。”

梅佐贤这才恍然大悟，不禁拍掌叫道：

“妙计，妙计。”

“你告诉方宇，以后有消息要早点送来，得了利润我们同他三七拆，今天你再送两百万给他。”

“没问题。”

“你现在回厂里去快点布置，……”

“要是工人有意见，总经理，怎办？只有几天工夫啊！”

“工人有意见？不怕，要工会出来顶。”徐义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狡猾地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说，“你就说，我们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这顶大帽子压下去，谁敢不生产？”

“是。”梅佐贤兴奋地走出去，一边重复着徐总经理的指示，“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

16

夜班已经上工，空气中荡漾着机器震动的嘈杂的响声。汤阿英下了工就到工会办公室去，没有见到余静，到饭堂里吃了饭，又向工会办公室走去。

沪江纱厂的工会办公室在仓库对面，那儿一溜平房，倒数第三间就是。一盏雪亮的电灯照耀着整个办公室，两边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靠里面当中的墙壁上贴着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贴着左右两边的墙有秩序地各放着四张办公桌，中间正好留出一条走道。高低不平的泥土地散发出一股有点潮

湿的泥土的气息。

工会副主席兼生活委员会主任赵得宝坐在进门右边的第二张桌子上，他在计算下一个月的工人代办米。因为厂里这两天增加生产，添了一些临时工，他的工作更加忙碌了。

汤阿英走进去，赵得宝还在低头计算。她向办公室右边第四张桌子看去，椅子空着，——余静不在。她低低地叫了一声：

“赵得宝同志……”

赵得宝放下手里的算盘，抬头看见她，站了起来，热情地过来问：

“有啥事体？阿英。”赵得宝知道她刚下班一定很累，端了一张板凳给她，说，“坐吧。”

“余静同志到啥地方去哪？”汤阿英的眼光注视着右边第四张桌子，她站在那儿没坐。

“她到车间里去了。工会刚改选，人手不齐，事体忙不过来，厂里又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车间里忙的上气不接下气，有的工人累的不行，她去看看。”

“哦。”汤阿英低低应了一声，皱着眉头说，“真不巧……”

“有急事吗？”

“没啥，”她想对赵得宝说，一想还是等余静来了

当面谈的好，便说，“我在这里等她一歇吧。”

“好的。”赵得宝马上拿过热水瓶给汤阿英倒了一杯白开水，指着那张板凳说，“那么，你坐下来等她吧。”

赵得宝又去计算工人代办米了。他的两只手忙碌地拨弄着算盘珠子，发出清脆的格格的音响。

在嘈杂的机器震动的响声里，远远传来一阵轻松愉快的歌声：

我们伟大的祖国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结成了民族的大家庭，
为了人类的幸福，
世界的和平，
我们不怕流血牺牲……

随着这歌声，工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兼沪江纱厂职工夜校教员钟珮文走了进来，他见赵得宝在低头计算，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歌声消逝了。他发觉汤阿英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好奇地问汤阿英：

“咦，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做啥？”

汤阿英说：

“等余静同志。”

“哦。”钟珮文走到汤阿英前面，问，“你为啥不

参加合唱队，阿英？”

钟珮文是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积极分子，打乒乓球，他是攻击型的能手；篮球，他投篮相当准；京剧，他会哼几句老生调子；游泳，他能仰游一二十码；合唱队里，他是著名的男高音。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每一种活动他都想摸一摸学一学，可是都不精通。他自己也不想精通。但对于写文章他却特别有兴趣，经常钻研，每一期工会的壁报上差不多都有他的文章。他是《劳动报》的通讯员，有时，他的通讯稿子也在《劳动报》上出现。他私下立了一个志愿：当一个作家。下了夜校的课，不管哪能忙，也不顾疲劳，他要读几页小说才能躺到床上去休息。最近沪江纱厂成立了合唱队，是他发起的，他自己当然首先报名参加了，可是车间里工人参加的不多，参加的主要是办公室里的职工和脱产的工会干部。他这两天一碰到工人就积极请人参加。

汤阿英每天到厂里来上工下工，别说唱歌了，就是讲话也不多，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参加合唱队，给钟珮文一问，她愣了一下，低声地说：

“我不会唱歌。”

“唱歌很容易，你真的不会吗？”

“真的不会。”

“不会，教你。”钟珮文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

教你——不过，我是药里的甘草，哪剂药里也有；唱歌，也多少懂点，但我也唱不好。”

“你是有名的男高音，不要客气。”汤阿英钦佩地望着他。

“那我教你，好不好？”钟珮文热情地问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他刚才唱的那只歌，想把汤阿英拉起来，说，“我教你唱这只歌。”

“我没有工夫。”汤阿英想起自己悲惨的往事，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芒。她没有唱歌的兴致，也不愿说出来，只好讲没有工夫。

“唱歌不要多少时间，一天有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里还有事体哩。”汤阿英坐在那张板凳上不动，慢慢低下了头。

“现在等余静同志，反正闲着没事，我教你这个歌子，好不好？”钟珮文歪头问她，像是托儿所的阿姨问小孩子似的，说，“你答应我：好。”

汤阿英摇摇头：

“不。”

“你这人！”钟珮文见她固执地不肯学，有点急了，但又不好发脾气，只是盯着她望。

赵得宝的手指按在算盘上，插上来说：

“小钟，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不要强人所难。你

喜欢唱歌，要天下的人都唱歌，怎么行呢？厂里的工人都参加合唱队，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教哩。听说报名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了，先唱起来再说吧。”

“二三十个人的合唱队像啥样子，开个晚会哪能拿得出手。合唱队至少要有四五十人才行，”钟珮文把话题转到赵得宝身上，说，“你参加一个吧，老赵。”

“哎哟，”赵得宝吃了一惊，伸出舌头来，笑着说，“老了还学吹鼓手，算了吧。”

“你忘记一句古话了吗：长到老学到老。何况你并不老；现在解放了，翻身了，大家都应该歌唱，你为啥不唱？”

“有你们这些青年唱唱就行了，我们听。”

“不，你自己也要参加，我代你报名。”

“不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去报名。”

“你是工会副主席，应该起带头作用，你都不参加，谁还肯参加？是吧？阿英。”

汤阿英没有表示可否地“唔”了一声。

“那我参加，——你们要吗？”

“当然要！”

钟珮文高兴得热烈鼓着掌，一边高声地说：

“欢迎我们合唱队的新队员赵得宝同志！……”

钟珮文的话还没有讲完，外边走进来一个年青的女同志，圆圆的面孔，脸上浮着微笑，腮巴子上有

两个小小的酒窝，两片嘴唇很厚，有一小半露在外边，和钟珮文的个子差不了多少，身子有点发胖，但很结实。她穿着灰布列宁装上衣，左边的下摆那儿有些折纹，好像匆匆穿上，忙得没有时间去熨平。她的头发没有烫，脸上也没有一点脂粉，浑身却充满了旺盛的青春的力量。她步子很迟缓，每迈一步出去都很慎重似的。她一跨进办公室，马上被赵得宝看见，他站起来，说：

“余静同志来了，汤阿英等你哩。”

钟珮文立刻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恳求地说：

“你也参加一个。”

余静摸不着头脑，她思索地凝视着钟珮文：

“文教委员，又有啥花样经？”余静慢吞吞地说，“要我参加啥？”

赵得宝把钟珮文动员人参加合唱队的事说了一遍，代余静回答了钟珮文：

“你就饶了她吧，小钟，余静同志整天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她哪有时间参加这个。”

“越是忙，越要参加；工作时候工作，娱乐时候娱乐嘛。”

“你还有理论哩？”余静笑着说。

“是呀，谁也说不过小钟。”赵得宝插上去说，

“工会里有我带头参加就行了。”

“不，唱歌也不好派代表的，余静同志，你说，是吗？”

“我参加一个，小钟，不过，忙的辰光让我请假。”

“好的。”钟珮文同意余静的意见。

余静今年虽然不过二十五岁，可是在细纱间挡车快八年了。上海解放前一年，在地下时期，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沪江纱厂党的力量很薄弱，现在连余静在内也只有六个党员，其中还有三个是候补党员。原来的组织关系没有打通，上海解放以后才打通，建立了支部，余静被选为支部书记。她离开细纱间，脱产专门搞党的和工会的工作。工会建立，她当选了工会主席。她在一清早进厂起，就忙个不停，不是那里开会，就是这里谈话，或者到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去，要么，区工会办事处一个电话把她找去。到了晚上，别人下班了，她还留在工会里，写汇报，填表格，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她虽然这样忙，却十分愉快，从来不感到疲倦，觉得越忙，给革命尽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劲道。不管工作哪能忙碌，她对于唱歌的兴趣，绝没有因此有些减低，一有空闲，或者是回到屋里去的辰光，她一个人爱哼几句，但一旦被人发现，她却腼腆地闭上了嘴。开会的辰光集体唱个歌，

或者是在操场上大家唱歌的时候，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个。如果要她单独唱啥歌，她总是羞涩地一扭头逃避开去。钟珮文邀请她参加，本来她就要答应的，给赵得宝那么一说，她又不好开口，等钟珮文再一次邀请，她很快答应了。她听说阿英在等她，便走到汤阿英面前，坐在那张板凳上，关怀地问道：

“阿英，找我有啥事体吗？”

“有点小事，”汤阿英注视着余静，嘴唇动了动，犹犹豫豫，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啥事体？”余静歪着头问她。

汤阿英想：她和余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没有送一份厚礼给余静，提出来，余静会答应吗？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不提，事体不会成功的。她正在左右为难，余静开口了：

“阿英，有啥事体，尽管对我说好了，自家姐妹，不是外人，有啥不好说的。你大胆说吧。”

她浑身感到一种温暖，像是对着最好的亲人一样，心中的话不得不说出来：

“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吗？”

“你没有提出啥要求，我怎么答应呢？”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她没有说下去。

“你家里有啥困难？”余静关怀地问。

“不是我的事体，”汤阿英话到了嘴边，又停下来了。

“说吧，”赵得宝在一旁听得有点急了，说，“只要行，余静同志一定答应的；不行，余静同志也会马上告诉你的。余静同志是愿意帮助人的。她办事一点不敷衍，一是一，二是二。阿英，痛痛快快地说吧。”

汤阿英抬起头来，说：

“现在厂里人手够吗？余静同志。”

“人手还不够，你想介绍人吗？”余静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汤阿英的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和钦佩。

“听你那口气，工会主席会猜不出来？”钟珮文用唱歌的调子说，尾音拖得很长。

“梅厂长要开足锭子，增加生产，今天又增加了几十个临时工，还是不够。我刚才到车间里去看，夜班比日班更累。你有人介绍来，正好，是谁？”

“我有一个干姐妹，叫谭招弟，原来也是做厂的，生病歇了生意，闲在家里，手艺不错，能介绍来吗？”

“你对她了解吗？”

“了解了解。她，人很好，很单纯，只是有点性子急。”

“她原来在哪个车间做的？”

“在筒摇间，挡摇纱车的。”

“多大啦？”

“二十五。”

“有几年工龄？”

汤阿英想了想，说：

“七年光景。”

“那你明天把她带来。”

汤阿英怀疑地望着余静。

“你已经答应了吗？”

余静看她那股怀疑的神情不禁笑了，说：

“是的，答应了。”

汤阿英想起解放以前介绍一个工人到厂里多么不容易，没有靠山，就别想跨进工厂的大门，就是她自己走进沪江纱厂也是经过一番困难的。现在余静立刻答应了，一没有送礼，二没有说情，她还是有点不相信，试探地说：

“我明天就带她来？”

“对。”余静肯定地说，“我们工会介绍给厂方。”

“好的，好的。”汤阿英从心眼里笑开了，她的眼光注视着当中墙壁上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想起上海解放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她为谭招弟感到幸福。

“你明天上班把谭招弟带来，迟了，怕人手够了，

厂方不要。”余静说，“阿英，还有啥事体吗？”

“没有了，”汤阿英站了起来，说，“我得赶紧通知她去。”

“以后有啥事体，尽管来找我好了。”

17

汤阿英跨出工会办公室，低头迅速地走去。迎面送来一阵乱哄哄的人声，吸去她的注意力。她抬起头来，望见仓库那边的电灯光刷亮，照得如同白天一般。

她看见记录工管秀芬从医务室走了出来，便问道：

“你还没有回去？”

管秀芬今天也是做日班，她下了班到医务所里来看妇女病，因为病号多，才轮到她，想不到看完了天已经黑了。她说：

“我来看病的。”

“老毛病吗？”

“是的。”

“好了些？”

“好些。”管秀芬指着汤阿英的肚子说，“你最近怎么样？肚子越来越显了。”

“还好，就是不想吃东西。”

“是不是怀孕的人都不想吃东西？”管秀芬今年才十八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婚后的生活，像怀孕这一类的事，她很有兴趣，关心地问汤阿英。

“也不一定，头胎反应比较厉害，以后慢慢会好些。”

“哦。”管秀芬感到有些神秘，问道，“你肚里是第几胎了？”

“我肚里——”汤阿英感到还没有好的创伤忽然给人刺了一下似的痛苦，她低下头去，想起耻辱的往事。生怕别人发觉她悲惨的创伤，她连忙很自然地抬起头来，说，“我肚里是第二胎。”

她虽然脸上保持着镇静，不让管秀芬觉察她是在说谎，可是等她说完之后，毕竟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唉……”

管秀芬望着汤阿英：

“为啥叹气？阿英。”

“没啥。”她的声音有点低沉。

“你不高兴生孩子吗？”

“高兴。”

“那为啥要叹气？”

“生孩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管秀芬以为她添孩子经济上有困难，便向她伸出援助的手：

“需要啥，大家相帮你。”

“谢谢你的好意，”汤阿英含糊其词地应道，她听见仓库那边传来一种有规律的叫喊声：咳哟咳哟，咳哟咳哟……抬头看去：在刷亮的电灯光的照耀下，顺着仓库门口，一溜停了八九辆大卡车，紧靠着仓库门口那儿的一辆大卡车上搭了一块木板，运输工人吃力地掬着一件件棉纱往大卡车上送，一边咳哟咳哟地叫喊着。她避免管秀芬再问下去，有意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说，“今天仓库为啥这样忙？”

管秀芬看到那情形，应了一声：

“唔，为啥这样忙？”

她们两人说话之间走到仓库门口那边。

税务分局的方宇驻厂员左手捧着一个紫蓝色的印色盒子，右手拿着一个方印，面对着垒得整整齐齐的一蒲包一蒲包的纱，忙着对每件纱的骑缝上打印子。

管秀芬看方宇驻厂员那个忙劲，立刻想起上海解放以前方宇神气十足的架子，在她脑筋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辰光，方宇要是不满意厂方，别说是下了班不肯打印报税，就是上班的辰光，他也经常

借故有事溜出了厂；在厂里，也常闹脾气不打印。不打印，纱就出不了沪江纱厂的大门一步。管秀芬感到有些奇怪，她便停下脚步，笑了一声，说：

“哎哟，方驻厂员，这么晚了还不休息，真不容易。”

在沪江纱厂里，除了厂方以外，方宇算是比较松闲的人。他听到管秀芬在揶揄他，有意不理她的碴，随便答道：

“你们忙，我们也得忙。徐总经理说的好，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么。你们工人大忙，我个人小忙。不算啥。”

汤阿英看到方宇额角上不断渗透出汗珠来，她同情地问：

“明天来打印不是一样的吗？”

栈务主任马得财凑上来说：

“今天要出货，不把纳税手续办好，就不能出厂。不完税出厂，那是犯法的。”

“明天出厂不是一样？马主任，你也加班了。”汤阿英感到有点奇怪。

“这没有办法，汤阿英，这一阵生意好，买主催的急，我们就得加班。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管。”

根据汤阿英的经验，她从来没有看到沪江纱厂

连夜出货的，更没有看到过方宇驻厂员这么忙碌过。她说，“你们辛苦了，忙了一天，现在还加夜班。”

“方驻厂员加班加点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呀！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呢！”管秀芬说。

方宇听见管秀芬这两句冷讽热嘲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他按下心头的不满，耐心地解释道：

“为了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税收，我们多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说到这里，他一愣，发觉脸上热辣辣的。他那天在厂长室收下了崭新的金黄的马凡陀手表和五十万人民币，便向梅佐贤厂长透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七月一日要加税的秘密消息，又收到梅厂长的两百万人民币，并且还希望他以后多帮忙，有啥消息立刻告诉梅厂长，有油水可以三七拆。这数字大大诱惑了方宇。他现在在沪江纱厂里工作好像忽然增加了一股不可估量的动力，推动他积极工作。最近一阵子，他在考虑薪水以外的收入怎样安排：做几套漂亮西装吧，穿出去怕惹人刺眼；买点美钞存起来呢，现在买进和将来卖出都有些困难，如今外钞不能在市面上流通；日用品呢，倒容易买进卖出，只是没有多大的油水，甚至一进一出还得贴补一点；考虑来考虑去，没有个好主意。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漫无限制地发行钞票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钞票在家里过夜，最后他买了

几两黄金才算解决。他刚才对管秀芬说自己积极是为了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税收，内心感到惭愧。

汤阿英没有发现方宇脸色的变化，她很高兴听到方宇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点了点头，对管秀芬说：

“方驻厂员蛮不错啊！”

“那当然，”管秀芬望着方宇把一大堆的棉纱包打完印，转过身来打他背后靠仓库大门右边那一堆，说，“现在是人民政府的驻厂员啦，不好好工作，小组要批评哩。”

方宇见汤阿英管秀芬她们在恭维他，越发显得谦虚，弯了弯腰，对她们说：

“现在工作和从前当然不同啦，过去旧政府，我们做起事来，老实讲，是磨洋工：签个到，吃些早点，看份报纸，喝喝浓茶，聊点闲天，就差不多快下班哪。现在吗，一是一，二是二，不敢含糊。不过，和老区来的人一比，我们这些留用人员还谈不到哩。”

管秀芬识破他谦虚语句里隐隐含着自满的情绪，有意刺他一句：

“我看你已经不错啦！”

“差的远哩，差的远哩。”

“嘴上别谦虚啦！”管秀芬又刺他一句。

方宇的脸红红的，顺着一堆棉纱包走过去打印。栈务主任马得财也感到方宇的变化，说：

“方驻厂员可积极哪，简直是变得像两个人啦，特别是最近，有啥事体找到他，没有一个不答应的。”

“上海解放了，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过去不同啦。”汤阿英感动地说。

“在新社会里谁都得变，哪个也要进步，不进步，大家会推着你走的。”管秀芬瞅着方驻厂员的背影说。

一辆大卡车已经装满了纱包，堆得高高的，向大门外开去；另一辆大卡车又停到仓库门口，搭上跳板，运输工人把打了税务局的印子的棉纱一件件往车上运，嘴里发出劳动的歌声：咳哟咳啊，咳哟咳啊……

“对啊，”马得财对管秀芬说，“就连我这匹老马也得变啊。”

方驻厂员从那头又顺着打过来，举起紫蓝色的右手：

“老马说的对，在新社会里谁都要变，”他望了管秀芬一眼，说，“你不能拿旧眼光看我，我们留用人员也要进步哩。”

“进步当然好，谁还会反对你进步不成！”

管秀芬还过去一句话，堵住了方字的嘴。他哑口无言。

钟珮文走过仓库门口，一眼叫马得财看见，他高

声说道：

“钟珮文同志，新社会大家都进步，你给我们编个歌子，好不好？”

钟珮文站了下来。管秀芬告诉他刚才谈话的情形。他把头一摇，说：

“我不会。”

“沪江纱厂的作家，”方宇笑着说，“别客气。”

“别开玩笑，谁是作家？”钟珮文一听到别人说他是作家脸就红，心里却很高兴：真的能当上个作家那才好哩。

“谁是作家？我们的钟珮文同志。”方宇把语调放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我昨天还在黑板报上看到你写的工人积极生产的文章哩。”

“那算不上作品。”

“可是我们还写不出来哩。”

“只要学着写，谁都可以写。”

“不，你有写作的天才，你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管秀芬指着方宇对钟珮文说：

“文教委员，方宇成了一个算命先生了，他能算出你的未来。你得好好谢谢他。方宇今天加班加点，工作可积极哩，你倒是给他编个歌子，教大家唱唱。”

方宇叫管秀芬点破，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谦虚地

说：

“我这块材料不值得编歌子，要编，还是请我们文教委员编个工人的歌子。”

“啥歌子我也不会编，”钟珮文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听人家的奉承话，他想起早一会汤阿英向余静介绍谭招弟到沪江来做临时工的事，便说：“你还不快点回去通知谭招弟去，阿英，迟了，厂方也许不要了。”

“你不说，我倒忘了。我还要到邮局寄钱哩。”

汤阿英拔起脚来走了。

管秀芬问汤阿英：

“你给谁寄钱？”

“我家里，梅村镇，发了工资，该昨天寄的，今天再不寄去，爹在乡下要着急了。”

“那快去吧。”

“是呀！”汤阿英加快了步子，匆匆忙忙走去。

18

钟珮文一走出沪江纱厂的大门，在马路两边店铺电灯光亮的照耀下，从幢幢的人影中，他很快地发

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子只稍微高一点点，因为身子苗条，看上去比别的女子好像高一个头，两根乌黑的辫子垂在两肩，更加显得她的身材有点儿消瘦。辫子梢上扎着两个大红绸子蝴蝶结，给水绿色的素呢夹袄一衬，远远就叫人看见了。她下面穿了一条深蓝色的斜纹布西装裤子，脚上穿的是圆头浅口的平跟黑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嗒嗒的匆忙的声音。就是从背影上也可以看出：她浑身上下打扮得干干净净，衣服平平整整，没有一个皱褶。在她身上找不出一点让人家说长道短的地方。她不但爱干净，而且衣饰很讲究。自然，这样的人对于别人的生活和举止，喜欢挑眼。

她就是细纱间的记录工管秀芬。

钟珮文加紧脚步，一眨眼的工夫，就赶到管秀芬背后。他想叫她一声，却又羞答答地说不出口，站在马路上愣住了。

呜——呜……公共汽车的喇叭一再叫唤，车子快开到他的背后来了。他给惊吓到马路旁边，公共汽车开过，他的心还在剧烈地怦怦跳动。他喘了口气，定定神，望着马路上的人匆匆走来走去。他想起了那个熟悉的背影，昂起头来，在人流中望去：眼光能够看清楚的那些背影，没有他要寻找的；再远些，人影模糊了，只见到有人在走动。

他急了，拔起脚来就向前面迈开大步，几乎是跑去。他抢过前面一群一群的行人，跑了大概有百把步的光景，看见水绿色素呢夹袄上的两根乌黑发亮的辫子了。

离管秀芬有五步远的地方，他步子慢下来了，好像前面有啥物事阻拦着他，使他走不快。但他也不敢慢下来，生怕再找不到她。她走快，他跟着走快；她一会儿走慢了，他也慢慢走。两人之间老是保持着三五步的距离。

路边一家杂货店的收音机里传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十八相送的唱词：

梁兄若是爱牡丹，
与我一同把家还，
我家有枝好牡丹，
梁兄要攀也不难……

钟珮文从这充满了离别情绪的富有感情的调子里，顿时想起舞台上情景。他凝神去听：

青青荷叶清水塘，
鸳鸯成对又成双，
梁兄啊！英台若是红妆女，

梁兄愿不愿配鸳鸯？

当时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是个“红妆女”，两人一边走一边唱下去。可是走在钟珮文前面的明明是个“红妆女”，他想自己为啥连祝英台这点勇气也没有呢？他加紧脚步，跟上去，鼓起勇气，低低叫了一声：

“管秀芬！”

她回过头来，望见钟珮文那副腼腆的微笑的面孔，不觉吃了一惊，不晓得有啥事体，“咦”了一声，机械地叫道：

“钟珮文。”

过了一歇，她随便地问：

“刚回去？”

“唔。”

他赶上一步，走在她的右边，两人肩并肩地走着。转眼之间，两人走完街市，现在马路两边都是人家，光线暗下来，人声也小了。两人走了一段路，也不言语。她不想讲话。他想不起要讲啥。身后传来祝英台的歌声：

弟兄双双上桥看，
好比牛郎织女渡鹊桥……

钟珮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会说话，有好几次话已到了嘴边，又怯生生地吞了下去。他过去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子单独肩并肩地这样走过，曾经有两三次机会可以和管秀芬接近，他都犹犹豫豫地错过了。今天见管秀芬一离开厂，他就紧跟着出来，下了很大决心跟上。现在一同走着，他一方面感到愉快，一方面又怕给熟人瞅见。他用舌头舔了舔下嘴唇，猛可地说：

“袁雪芬唱的真好，你听见吗？”

“听见。”

管秀芬回答的非常简单。她近来感到钟珮文有意找各种机会和她接近，从刚才的问话里，更有点察觉他的意图。他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又是工会里的文教委员，厂里的活跃分子。她是知道的。但是她不喜欢他。他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但经常是被别人当做开玩笑的对象。不管什么衣服穿到他身上总不像样，也不大合身，不等两天，不是齜龇了，就是扯破了。头发好像永远没有理过，老是蓬松松的，如同一堆草鸡毛披在头上。她看不惯这样的人。她一发觉他要接近自己，总想法避开。没想到今天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他，她没法避开，只好淡淡地答他一句半句。他马上又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吗？”

她看过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分喜爱这出戏。她知道他问这句话的用意，想了想，故意说：

“没有看过。”

他现在说话比较自然一点了，胆子也大了一些，歪过头去，问她：

“你喜欢梁山伯吗？”

她敏感到他在挑逗自己，如果顺他说下去，他一定会露骨地表达他的愿望，那辰光自己更难于应付了。她立刻把脸一板，质问道：

“你问这个话啥意思？”

他没料到她这样严厉的反问，一时哑口无言，默默地走着，步子慢下来，距离她有两步远。

深蓝色的天空上，闪烁着数不清的繁星，像是眨眼在讪笑他似的。微微的凉风掠过马路两边的田野，吹拂着人们的面孔。

她恐怕他不懂自己的意思，干脆给他说明白：

“我不喜欢梁山伯，讨厌他。”

她的话比晚来的凉风还凉，使他听的面孔直发烧。他讨了个没趣，感到是被侮辱一般的难堪。他低着头，走了没两步，赶上去说：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也听不懂你的话。”

“我是说，”他歪过头去望了她一眼：她微微低着头，一绺头发披下来，把那张鸭蛋型的脸庞遮住了一部分。他心里非常喜欢她，一看见她，他的心就跳动得厉害，可是又不得不按捺下激动的情绪，冷静地把话题岔开去，说，“厂里很多人要求成立越剧组，你要是喜欢越剧，越剧组成立，就请你参加，好学习。”

“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同我喜欢不喜欢，没啥关系。”

她无动于衷他的关怀，把披下的头发掠上去，用钢夹子夹起。

“关系，当然没有啥大关系，嘻嘻，”他极力想缓和有点紧张起来的情势，说，“不过，成立起来，你要是报名参加，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不参加。”

“我听说你很喜欢越剧……”

“谁讲的？”她不否认，也不承认，可是面孔有点绯红。

“你们车间的人讲的。”

“啥人乱讲？”

“自然有人。”

“你告诉我……”她有点急了。

他见她答自己的话，不再冷一句热一句，心里暖洋洋的，嘴角上有了笑纹，说：

“你说，是不是喜欢？”

“不是告诉过你了，不喜欢。”

“不要瞒人，我还听你唱过哩。”

“在啥地方唱？”她坚决否认道，“没有的事。”

“唱越剧也不是丢脸的事，怕啥？”

“我怕啥？喜欢就喜欢……”

“这就对了。”他进一步要求，“我们成立越剧组，你报名参加一个，好不好？”

他想：如果她马上答应参加越剧组，他明天到厂里就建议成立，和她接近的机会多了，希望也就大了。

她冷冷地说：

“我不参加。”

“我们请老师来教……”他等待她肯定的答复。

“我也不参加！”

他从热望的峰巅跌落到失望的深渊里，几乎讲不出话来，连那两条腿仿佛也麻木了，不大听自己的指挥，吃力地向前迈去。

她看他一个劲跟着自己走，心里非常焦急，想甩开他，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条长宁路是仅有的干道，大家回去，只有走这条路。她悔不该今天去看病，要是放工就走，不会遇到他；即使遇到他，有许多姐妹们在一道，他也不会一句接一句地问个不休。她希

望在路上能够碰到一两个熟人，搭救她跳出这个窘境。路上来往的行人不多，认识的更没有。

她无可奈何地往前走。

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刚开一个头，给她左拦右堵，全说不下去。他默默地跟随她走着，可以听到双方的呼吸声。他感到非常尴尬。他想很快和她告别，但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自己又舍不得离开她；和她一同走下去吧，没有啥好讲。

两个人保留了一点距离，慢慢走着，给马路上路灯从背后照来，两条细长的影子印在柏油路上，徐徐向前移动。

她留神望着前面的路，瞅见路上两个影子一道移动，便有意放快步，走到前面一点。他没精打采，没赶上来和她一道走。

在她前面两丈远近的地方是个十字路口，她脸上浮起了得意的微笑，回过头来，问钟得文：

“你向前面走吗？”

他知道向前面走是她回家最近的一条路，听她这样一问，以为是要他送她回家，赶上一步，响亮地答道：

“是的，我们一路。”

说话之间，他们两个人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她说：

“你向前面走吧……”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两只眼睛凝神地望着她。她很自然地接着说：

“我从这里去，”她指着横在面前的中山路说，“有点事体……”

“我送你去，好啵？”他怕她不好意思提出来要他送，大胆地对她说。

她摇摇头，说：

“我有腿，自己会走。再会！”

她头也不回，走了。他站在十字路口，呆呆地望着她水绿色的背影慢慢远去，竟忘记自己该回家去了。

管秀芬向中山路走了二十来步路，回过头来，等钟珮文走了，她慢慢向十字路口走来。

“小管！……”

“谁？”她忽然听见一个粗鲁的男子的声音，大吃一惊，在这黑洞洞的中山路上，有啥人认识她呢？是钟珮文吗？刚才明明看见他走了，绝对不会马上绕到她的背后，除非他是神仙。不是钟珮文，会是谁呢？别遇到什么坏人？她望着那悠长而又寂静的黑乌乌的马路，头也不敢回，脚步有点慌乱，迅速地走去。

“走得这么快做啥？也没人绑你的票。”

她听到背后的人声愣住了，不由自主地站下来，

可是头还是不敢回，警惕地问：

“你究竟是谁？”

“我吗？——就是我。”

“你——”

“唔。”

她在辨别背后那个男子的声音。这声音她好像听见过，又好像没有听见过，因为发音很尖细，仿佛是女人的口音，其实是男子有意装出的怪腔怪调。

“你叫啥名字？”

“眼睛长到额角头上去了，不认识我吗？”

她听见这个男子本来的嗓音，想起来了：

“你是陶……”

后面那个男子不等她说完话，嬉皮笑脸地走了上来：

“派头真不小，连我也给忘记了。”

她认真地对他望了望，奇怪地问道：

“你从啥地方来？”

“厂里。”

“为啥走到我的背后去？一定不是从厂里来的。”

“只准别人从厂里来，不准我从厂里来吗？”

陶阿毛从梅佐贤那里领了任务，叫他在工人当中多多活动，有了耳目，消息就灵通了。其实他自己早就在物色活动的对象了。那天在张学海的草棚棚

里，领教了汤阿英严峻的态度，她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情，叫他兀自吃了一惊，幸亏张学海打了圆场，否则他还不好意思走出草棚棚的大门。他感到自己有点性急，接触汤阿英这样的人要瞻前顾后，想的周到，做的自然，不能有丝毫的鲁莽，更不能性急，要慢慢进行。工会改选以后，他当上了委员，越发不能性急，否则让汤阿英的入木三分的锐利眼光发觉，于事无补，甚而会坏事的。他在接近汤阿英的道路上有意识地放慢了步子，先在张学海身上下点功夫。这时，他想到了管秀芬，她是细纱间的活跃人物，又是钟珮文的紧紧追求的对象。他和管秀芬接近，不仅从管秀芬的嘴里可以晓得一些工人的动向，还可以通过管秀芬了解钟珮文这个工会文教委员的活动。他选中了管秀芬，做为她重点活动的对象，但管秀芬自恃年青漂亮，态度傲慢，孤芳自赏，目中无人，是一朵带刺的娇艳的蔷薇。他和她接近，也要特别小心谨慎。对于她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态度，他懂得只有比她更傲慢才能杀她的不可一世的凛凛威风，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需要刺她一下两下，开出路子，让她自己不知不觉地走过来，他才能不慌不忙地把她抓在自己的手心里，服服帖帖地听他的使唤，那辰光才能派上用场。他打定了主意，暗暗了解她的行踪和兴趣，已经暗中跟在她背后好几天了，今天见她把

钟珮文甩开了，那条幽静的马路又很少行人，他认为是个机会，便在她身边露了面，语意双关地刺了她一下。

她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唰的一下，脸红了，努力保持着镇静，岔开话题，反问他：

“为啥走到我背后去呢？”

他没有点破她，只是说：

“你这么年青，长得又这么漂亮，我看见你一个人在路上走，怕你遇到坏人，不放心，特地绕到你背后，给你保镖。”

她向他撇一撇嘴。

他和她肩并肩地踽踽走着。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关心地说：

“以后出来要小心点。”

“怕啥？”她不解地望着他。

“不是怕，单身女子晚上出来，有人陪你好一点。”

“我一个人常来常往，用不着陪。”

“那当然，你是女子当中的英雄好汉。”

“你别恭维我，我受不了。”

“我从来不喜欢拍马屁。”他虽然这么说，他的手却有意向她肩上一拍，“谁恭维你。”

她走上一步，加快速度，想把他甩开。不料他并

不跟上来，也不言语，好像在生她的气。她见他落后自己好几步路，心稍为定了一些。他们两人走到十字路口，没有多远，就到了公共汽车的一个站头。她正愁怎样可以离开他，他有意把她甩掉，冷冷地说：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你一个人在这里等车子吧。”

“好的。”

陶阿毛一走，她感到十分突然，没料到他倒先告辞了。她心里感到有些迷茫，摸不清陶阿毛打的啥主意，更不知道对她是啥态度。她的两只眼睛望着陶阿毛傲慢的背影逐渐消逝在夜色茫茫的远方。

19

福佑药房的债权人虽然同意朱延年和解复业，但具体条件并没有谈拢，写字间、客户关系、职工问题和开业登记这些重大事体都还没有一个头绪。不过银行能开透支户头，姐姐又答应了一笔现款，这些都增加了他的勇气，更加强了复业的信心。

他从徐总经理的公馆出来，心里充满了喜悦，兴奋地找到了严律师，请他和债权人的代表柳惠光商

谈。

柳惠光是利华西药房的经理，他曾和福佑药房的主要债权人草拟了一个和解笔据，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推柳惠光做他们的总代表和朱延年谈判。

严律师和柳惠光往返商量了好几次。他们谈的大体差不多了，朱延年和严律师一同到利华西药房商量。柳惠光把他们引到楼上的经理室里坐了下来，闲谈了两句，朱延年请柳惠光把他们拟的和解笔据草稿拿出来议一议。柳惠光打开抽屉，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大红封皮的和解笔据来。朱延年打开一看，里面用墨笔端端正正的这样写着：

福佑药房朱延年
立和解笔据人 债权代表柳惠光（以下简称

债务人）缘债务人前因受经济波动影响，一时周
债权人

转不灵，不得已曾宣告清理。兹承各债权人热忱拥护，未忍有成绩之福佑药房消灭于一旦，几经磋商，一致主张福佑复业。经双方同意，签订和解笔据，详开复业条件于后：

一、债务人所负债务若干由债务人出具证明书
交与债权人代表。

二、债权人公推代表三人经常执行债权事务，并

以柳惠光为全权代表，负责清查债务人财产，使其财产先行移转于债权人，俟全部债务清偿后，仍予归还之。

三、对福佑药房外埠分行及财产由代表办移转手续，俟全部债务清偿后，归还之。

四、偿还债务由福佑复业之日起，第一个月内偿还二成，两个月内偿还三成，三个月内偿清全部债务。

五、债务人经常开支，复业后，经债权代表之同意，于营业项下支付，其余数悉以偿还债务。

六、双方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协议修正之。

七、本笔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证明人存一份为证。（附债务人移转管理财产证书一份）

公历一九四九年 月 日

立和解笔据债务人

债权人代表

证 明 人

朱延年看完以后，把和解笔据递给严大律师。复业条件的原则曾经几次商量，现在不过是由债权人写下来，朱延年给严律师看，希望他在文字上再推敲

朱延年凑过去对柳惠光说：

“惠光兄，关于第四点，我有点意见。”

“是不是嫌时间规定得太短促一点？”

“对啦，既然诸位债权人看得起我朱延年，同意我复业，也不能逼人太甚。你想想，惠光兄，复了业，也得让我喘口气，怎么三个月要我偿还清？倒并不是没有头寸，上海市场上调个一两亿头寸并不难，”朱延年看柳惠光听了他的话，眼睛发亮，他马上接着说，“但是，刚复业，不能把我的流动资金抽枯。”

柳惠光听朱延年语气之间有点愤激，他的话也就不大客气：

“债权人方面经过几次交换意见，我竭力帮老兄的忙，最后才算取得一致，做了这样的规定。你说是逼人太甚，债权人方面却以为让步太多了，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朱延年冷静地想了想：这时候不能太让步，反正自己已是躺下来的人，债权人方面知道不复业不能清偿他们的债务，不如退一步，看看柳惠光的态度再说。争取拖延一些时日清偿，对福佑是有利的。他说：

“谢谢你的照顾，很感激。这件事体我考虑了很久，条件实在太苛了一点，叫我不能接受。上次和债权人方面会谈的辰光，我也说了：我朱延年是最讲信用的人，说到就要做到。我希望尽早偿清债务，绝不

想拖欠各位的一丝一毫一厘。可是复业三个月就要还清，我看是不可能，所以我不能答应。如果债权人方面一定坚持，那我只好暂时不复业了。”

朱延年边讲边看柳惠光的脸色。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嘟着嘴，气呼呼的，心里很不满意。大家都没有言语，严律师也不好插嘴，僵了一阵。柳惠光毕竟忍受不住这样的回击，他有点光火了：

“这是啥闲话，朱延年，谈了好几次，好容易谈拢了，和解笔据写出来了，你却不复业了。这不是叫人为难，要债权人代表柳惠光的好看！”

朱延年看这一着成功了，便冷冷地慢慢回答他一句：

“这也是债权人把我逼出来的。”

柳惠光究竟沉不住气，他也不是朱延年的对手，他想起债权人曾授权给他：在时间方面可以再让点步，只要偿清债务就可以了。大家知道朱延年的信用扫地，糠里榨不出油来，现在不过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因为柳惠光是债权人方面的大户，福佑欠他的货款最多，他想早一点偿清。一听朱延年的口风，不能再拉紧弦，他就松了口：

“你看要多少时间偿清呢？稍为延迟一些也未始不可以商量。”

朱延年看到自己这一着走对了，他当时并没有

答复。他仰起头来想，仿佛真的在计划如何清偿债务，其实他在想和解笔据上还有哪一条可以顺便再修改一下。想了一阵，觉得那六条没有啥好修改了，他才装出很有把握的神情说：

“至少得半年。”

“那太久了，”柳惠光渐渐想通：朱延年不复业，他自己也没有出路，刚才那句话显然是威胁他的。他的态度稍为硬了一点，“债权人方面是不会答应的。”

朱延年沉住气，毫不动摇：

“那我也没有办法。”

柳惠光忍受不住朱延年这股子傲慢劲，他逼紧一步：

“这样谈不拢了，我这个债权人代表也当不下去，只好找大家一道来谈了。”

朱延年话很硬，态度却软下来：

“也好。”

他心里想：这事不好弄僵，债权人当中柳惠光算是比较讲交情的，他一个人坚持主张让朱延年复业的。如果这边谈不通，要所有债权人一道来谈，事体就不好办。

沉默了一会儿，楼下传上来马路上的汽车声和嘈杂的人声。局面有点僵，朱延年知道这样僵下去于自己不利。他的踌躇的眼光望着严大律师，盼望他来

解这个围。严律师现在虽然没有执行律师的任务，但凭他二三十年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生活的经验，晓得双方不过是拉紧弦，做出一种紧张的姿势，内心里都是想靠拢的。他默察这种形势，知道是该自己出力气亮一手了，便从容不迫地说：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不必在时间上多计较，我晓得双方都有困难，可是双方都有诚意，都有交情，还是靠拢的谈。柳先生的人情要做到底，帮朋友的忙也要帮到底，是啵？”他笑嘻嘻地望着柳惠光。

柳惠光微笑地点点头：

“只要我能做到的，没有不帮忙的。”

情势显然缓和下来。

严律师接着说下去：

“债权人方面要求三个月，朱先生这边提出来半年，差三个月的时间。刚才柳先生说稍为延迟一些可以商量，这样也不过差个把两个月的时间。这并不是清偿与否的问题，是清偿的迟早问题。一般债权人方面，我晓得关心的是清偿问题，只要清偿有保证，并不在乎早两天迟两天。”

柳惠光听到这里，觉得严律师真不愧是个刀笔吏，说话一针见血。他微微点一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朱延年稳稳坐在那里不做声。他料定严大律师一定是帮他说话的。果然，严律师说：

“朱先生这方面是讲信用的，他怕到期不能偿还，反而对柳先生过意不去。他现在还没有复业，复业以后的生意如何还难说，朱先生把稳一点计划倒是好的……”

柳惠光听他在帮朱延年说话，心里有点不耐烦，便插上来问：

“你看呢？严先生。”

“我提个议：双方考虑考虑怎样？”

柳惠光和朱延年都说“好的”。严律师说：

“第四条这样修改：偿还债务由福佑药房复业之日起，视业务情况与可能，第一个月偿付二成，两个月内偿付三成，三个月内偿清全部债务；如不可能，得延期偿清。”

朱延年心里满是高兴，真亏严律师想出这个妙计，表面上规定很明确，实际上可以无限的延期。他自然同意；当时却未表示，在看柳惠光的态度。柳惠光了解再逼也不过如此，别人既然给他台阶，他只好走下来：

“我倒没啥意见，就怕债权人方面……”

严律师知道柳惠光已经答应了，就进一步敲定：

“柳先生，你是债权人的全权代表，当然有权力决定，他们要听你的意见的……”

柳惠光不再坚持下去，他想摸摸朱延年的底：

“延年兄，你看呢？”

朱延年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神情，无可奈何地说：

“严兄这样照顾双方的情况，我怎么好再有意见。”

严律师接上去说：

“多谢两位给兄弟的面子，那就叫人快点抄出来，好签字了。”

柳惠光把修改了的和解笔据交给利华西药房的账房里的人去抄写，他从抽屉里把债务人移转管理财产证书拿出来，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立移转财产据人朱延年，兹遵福佑药房债权人议决，将下列各项移转予债权代表管理。至清偿及归还办法，详和解笔据。

计开（货物移转部分，另开清单备查）：

房屋租赁权部分：

汉口路吉祥里二十八号内 六〇三、
六〇四、六〇五、六〇六、六〇七室
五间。

西藏南路五十八弄三十四号 前客
堂、灶披间、西厢房。

电话使用权：

二八九三一 二四五〇七 九〇一七

二 九五七六三

对讲电话一只：

汉口路至西藏路

汽车部分：

顺风牌轿车一辆〇三——一三五〇

吉普车一辆〇四——二六五一

立移转管理据人

公历一九四九年 月 日

柳惠光把这张证书放在朱延年面前，说：

“债权人方面同意这样写法，你先在这上面签字吧。”

朱延年仔细看了一下，根据他原来写的没有啥修改，他就拿起笔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以后，他惘惘然若有所失，这些财产原来是朱延年的啊，签了字以后，它已经换了主人。他默默低下头去，想起福佑药房复业后可能的兴盛情况，又使他兴奋起来。他安慰自己：这些财产顶多半年以后，一定又在朱延年的名下了。

利华西药房的账房里派了三个人在抄写和解笔据，没有多少辰光，便装订得整整齐齐的送到柳惠光的面前了。他们三个人仔细校对了一遍，没有笔误，

柳惠光和朱延年签了字，严律师在证明人项下也签了字。

朱延年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说：

“走，上山东路老正兴吃晚饭去。”

柳惠光客气地推却道：

“不必了。”

朱延年拉他下楼：

“别客气了，老朋友，今天我的东，走！”

20

朱延年从老正兴出来已经喝得有点半醉，迎面由外滩吹来的凉风，使得他很舒适，他抹去额角上的汗，精神抖擞，跳上一辆三轮，向汉口路福佑药房驶去。福佑药房在一座大楼里面，出入走弄堂里的小门。每层楼的写字间的人都走了。楼梯那儿的电灯不大亮。到了六楼，连电灯也没有，黑洞洞的，像是没人住的空房子。他伸出两只手，在暗中顺墙摸去。

他推开六〇七室的门，才算看到了微弱的灯光。原来的出纳童进正闲着没事，有小台灯下面低头看《解放日报》，见朱经理进来，就站了起来，叫了一声：

“朱经理。”

接着，他把室内的电灯扭开，又说：

“朱太太早一歇来找你……”

“找我做啥？”

“说你出来一天没有回去，家里有事体等你……”

“等我？”朱延年心里早已知道，最近刘蕙蕙见了他没有别的话讲，就是伸手要钱，真叫人倒胃口。他漫不经心地说，“晓得了，我等歇就回去。”

朱经理一屁股坐在办公桌的转椅上，打开侧面的窗户，让童进坐在他左边一只破了的沙发上，他向童进望了望，然后说：

“就是你一个人在店里，夏世富呢？”

“他出去了，一歇就回来。”

朱延年本来想找他们两个人一道谈，既然夏世富不在，他就先对童进谈：

“童进，福佑要复业了。”

童进近来听到一些关于复业的传说，他和其他店员一样：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朱延年在西药业信用一败涂地，谁能和他往来，谁又能信任他？大家听到这些传说，兴趣并不高。童进听刚才朱经理的口气很有把握，他便提起精神来听：

“你给我准备一下复业登记的手续，童进，房间、电话、沙发、桌子、药品……都是福佑的资产……”

童进怀疑地问：

“除了移转给债权人的以外，留下来的这些电话、药品，不值啥铜钿，算是资产吗？”

“为啥不值钱？”朱延年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物事买起来都很贵，你按照新的价格算好了，这样钱就多了。”

童进还是不放心：

“工商局要是查问起来，怕不好办吧？”

“呃，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工商局那么忙，哪有这些闲工夫查问。你给我写进去，要多一点，资产少了不会批准复业的。这件事体关系大家的利害。童进，你写好了，有事我负责。”

童进没有吭气。

朱延年说：

“凑一凑，有这么五千万的资产，去登记复业就差不多了。你明天到工商局去领登记表，写好了，给我盖上图章送去，越快越好。”

“好的。”

朱延年坐过去一点，对童进说：

“童进，你在福佑快三年了，也算是老同仁了。这次福佑周转不灵宣告破产，你没有走。最初我没有出

面清理，可是对你们很关心的。你也不错，守着这片店，我们算是患难之交了。”

两年前，童进由他父亲的朋友介绍到福佑药房来。他父亲是浙江茶厂的工人，童进自己学的会计。最初是当练习生，后来升了出纳。童进年青，不了解上海商界的情况，更不了解这位朱延年经理的底细。他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店员。朱延年看他少年能干，干活肯卖力，办事也很精明，有些机密的事就喜欢找他做，觉得比找别人牢靠。逢到要用他的辰光，总给他一点甜头尝。这次朱经理给童进的甜头是：

“童进，复业以后的福佑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银行里开透支户头的事也谈妥了。我想福佑先成立四个部：营业部，会计部，栈务部和外勤部。会计部设两个组：出纳组和客户往来组，你就当会计部的主任。”

童进感到这个责任太重大，他的能力不行，立即谦辞道：

“我负担不了这样的工作，朱经理。”

“可以，”朱延年说，“你是中学毕业生，又是专门学会计的，在福佑里也是老同仁，西药这个行业你也摸熟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下来。”

童进还是推辞：

“恐怕不行……”

另一个留在店里没走的店员——夏世富从外边回来了。他听见朱经理在和童进谈话，便停留在门口，没有进来。朱经理一听脚步声就知道他回来了，便对童进说：

“好好努力干吧。”

童进不好再说啥。

朱延年对站在门口的夏世富说：

“为啥不进来？”

夏世富弯着腰进来，向朱延年深深地一鞠躬：

“经理刚来？”

他看到朱经理面前没有茶，就拿过杯子倒了一杯开水送过去：

“经理喝茶。”然后他抱歉地说，“不晓得经理今天晚上来，我刚才出去找一些客户的关系，回来晚了一点，嘻嘻。”

他坐到童进右边的沙发里。深蓝布的沙发套子已经发黑了，扶手那里露出一块棉花。他用手把破的地方遮住，微笑地望着朱延年。

朱延年看到夏世富手脚灵活，心里忍不住的高兴，暗暗赞美他是福佑不可多得的人才。听到他说出去找客户的关系，更使朱延年高兴，他说：

“你主动出去找事体做，很好。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是要腿勤、手勤、口勤，有了这三勤，就不愁生意

做不好了。你是很有前途的。”

夏世富站起来，曲着背说：

“全靠经理的栽培。”

“客户的关系找到多少？”

“不多，有几十户。”

“那也不少了，有大户没有？”

“有一些，”夏世富从对面的窗户望出去：远远看见南京路上的灯光反射在天空，织成一片闪烁的彩光，最突出的是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霓虹灯，在一切灯光之上闪烁，在上海的夜空中跳跃着。夏世富对着灯光在想客户的名字，待了一会儿，他说，“我听医药公司招待所的人说，最近苏北卫生处有个采购员要到上海来办货，这笔款子不小。”

朱延年的面孔上立刻露出得意的微笑，兴奋地说：

“世富，你要想法抓住他，好好招待他，不要怕化钱，我们最近就复业。复业的时候遇到大户，是一个好的兆头。”朱延年简单地把筹备复业的情况说了一遍，旋即拍拍夏世富的肩膀说，“你担任我们福佑的外勤部部长的职务，明天开始上班，工资从本月份算起。”

他转过脸去，对童进加了一句：

“你也是一样。”

21

朱延年回到家里的态度和在福佑药房时完全两样，垂头丧气地坐在卧房的单人沙发里，摆着一副长马脸，没有一丝笑容，像是穷困潦倒得再也扶持不起来的样子。刘蕙蕙在灶披间洗完了锅碗，一路上哼哼唱唱走进卧房里来，笑嘻嘻地问：

“吃晚饭没有？”

朱延年没有答腔。

“是不是没吃？要不要做点吃？”

朱延年冷冷地说：

“不吃。”

“明天米没有了，房东今天又来催过房钱，说是不再付，就要请我们搬家……”

她还没有诉说完，就叫朱延年堵住了：

“噜哩噜嗦，烦煞了，一天到晚这张嘴就没有停过，啥辰光才能让我清清静静过一天？”

她有点不满：

“咦，你整天在外边游来游去，这个家我在给你背；揭不动锅盖，我到外边去求人借钱；房东要房钱，

又钉着我，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催。现在告诉你，你不领情，反而说我噜哩噜嗦烦煞了，你倒清闲。好，明天我出去，你待在家里一天试试看。”

“你出去就出去，不回来我也不在乎，别吓唬我。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她说的话朱延年无动于衷。过去，他们经常顶嘴，甚至于大吵起来，最后总是他让步，因为在经济上有些地方他要依靠她。目前她的经济能力已经是油尽灯干，没啥苗头，而他却有了转机，渐渐感到她对他只是一种负担了。他跨进家里的门槛以前，早打定主意设法和她离婚，提不出啥理由来，就有意挑动她的感情。她不了解他最近活动复业的情况，还是凭过去的经验来看他，所以她的态度很强硬，料到他最后总会出来收篷的。她说：

“我早就不想待在你家了，进了朱家的门，就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把我四千块的奖金骗去，就翻脸不认人了，总是看你的颜色。我何苦一定要跟着你受这个罪……”她一提起这些事就伤心，她有些话咽在嗓子里激动得说不出来。

朱延年轻蔑地啧啧两声，接着说：

“又提这些事了，说过何止一千遍，也不怕倒胃口。我和你结婚就倒了穷霉，没有走过一天的好运。”

她忍不住插上去说：

“哟，别昧着良心说话。不亏我四千块钱，凭你这样，就开起福佑药房；你投机倒把，还怪人连累你没交好运哩。想想看：汽车是谁坐的？老板是谁当的？你不好好做生意，怪谁！”

“我谁也不怪，就怪自己的命不好，讨了你这样一位好老婆。”

“我有啥不好？”她走到他的面前，挺着胸脯好像要和谁比比的样子，“现在没有钱了，穷了，自然不好了。当初是谁追求我的？说我聪明大方，又会唱歌，是啥才女。我刘蕙蕙还是刘蕙蕙，现在却变得不好了。”

“啥不好，好极了。”他冷笑一声，不屑去看她一眼，仿佛没有看见似的，“我追求你？追求你的人多的很哩。”

她听到这句话很得意：

“那当然啦。”

他听她那得意的口吻，马上浇下一盆冷水：

“就是没有人敢要你，算我倒了霉，瞎了眼睛，看上了你。”

“我也是没有睁眼睛，碰上你这个骗子。”

“我是骗子？”他仍然很冷静，毫不激动，慢条斯理地说，“很好很好，是你讲的，别赖。那你为啥要上骗子的当？为啥要爱一个骗子呢？现在不必再受骗

了。”

她气冲冲地说：

“我当然不再受骗了。我想透了：和你在一道整天挨饥受饿，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闲言闲语，还要受你的脚板气，我贪图啥？”

说到这里，她的眼角上忍不住流下了两滴泪。他狠狠地又逼紧一句：

“我也没有用绊脚索把你绊住……”

她想起今后这样困难的日子怎样熬法，娘家带来一点钱贴光了，借债的门路绝了，能够典当的物事也很少了，转眼到了秋凉的时候，日子更难打发，于是下了决心：

“那我走。”

说了这句话，她看他的脸色。他坐在沙发里稳稳不动，电灯光射在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尊大理石的雕刻，凉冰冰地说：

“不送，不送。”

“好，我走。”

她真的拔起腿来就走，囊囊地跨出门去。她暗暗回过头来觑了他一眼，料想他会走过来拉住她，这样可以挽回僵局。但是他的屁股连动也没动，安然躺在沙发里。她抹不过脸来，径自下楼去了。鼓着劲走到后门，她忍不住站了下来，反问自己：“真的这样走

了吗？”她怀念起初婚的生活，那时候朱延年的生意做得不错，她自己手头也宽裕，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度了一段甜蜜的生活。现在朱延年正是倒霉透顶的辰光，忽然离开，丢下他一个人也说不过去，何况他有个姐姐，还有那位上海工商界有名人物的姐夫，不会忍心看着他这样潦倒下去。她的心软了，未来美好生活的远景在她眼前闪耀着。她掉转身，回到楼上，看到朱延年仍旧是安稳地坐在沙发上，一股怒气从她心头冲起，想留下的念头淡薄下去，但也不甘心就走，却又不好改口，她气呼呼地说：

“要走，没这么容易，写下笔据。”

朱延年用眼角扫了她一下：

“好吗，你爱写啥就写啥……”

刘蕙蕙赌气拿起纸笔来就写了离婚字据，并且在上面签了名，然后扔给朱延年，鼓着勇气说：

“你签字吧。”

朱延年真的在上面签了字，而且折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她一看事态严重，情势发展不是如她所预料的，过去想把字据抢回来，朱延年哪里会给她，抢了两次抢不到，便哇的一声倒在沙发里埋头放声大哭了。

朱延年看也不看她一眼，轻轻地走到楼下的客堂间去了。

22

夏世富领着苏北行署卫生处的张科长一上了六楼，朱延年马上就迎了出去，像是会到一位老朋友一样，一把紧紧握住张科长的手：

“张科长，久仰久仰。”

夏世富在一旁介绍道：

“这是敝号的经理，朱延年先生。”

张科长穿着一身灰布人民装，里面的白衬衫的下摆露了一截在外边，脚上穿了一双圆口黑布鞋子，鞋子上满是尘土，对周围的环境与事物都感到陌生和新鲜。他显然是头一次到上海来。他见朱经理那么热忱招呼他，就像是有了几十年的交情似的，他想头一回到大都市，不要给人家笑话自己是土包子，叫人看不起，他也学朱延年那股热呼劲：

“久仰久仰，朱经理。”

可是他究竟不熟练，口音有点不顺，态度也比较勉强。朱延年热情的款待把他的窘态遮盖过去：

“经理室坐，经理室坐。”

他给领到六〇七室的那个小房间，夏世富倒了

茶，打开一包三炮台香烟，递了一支给他，他想不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便拒绝道：

“不要……”

夏世富把香烟塞在他手里：

“抽吧。”

他还是拒绝，并且说：

“我不会抽。”

朱延年看到他右手的食指中指给香烟熏得发黄了，不但会抽，而且是老枪，他笑着说：

“张科长别见外了，烟茶不分家，抽根把香烟算啥。你会抽，你看你的手指都叫烟熏黄了。”

张科长从来不会说谎，这次为了想不抽老百姓的烟说了一句假话，马上叫人发现，有点难为情，脸上发烧。他不得不接过夏世富的香烟。夏世富亲自给他擦了火点上。朱延年察觉出来他是第一次到上海的老解放区的干部，很注意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他便给他拉知己，来打破这个隔阂：

“张科长，我们这个字号和别的铺子不同，上海解放前，我就给解放区往来了，有一次一批西药运到解放区，”说到这里朱延年抓抓头皮在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是运往苏北解放区的，在路上给日本鬼子截住了，一批货都没收了，我亏了老本，里面的人叫我暂时不要做了，这才断了往来。我早就赞成共产党

解放军了，别看我这个买卖人，也算得是半个公家人哩。这次张科长来，不要拿我当外人才好。”

张科长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别说上海，连南京和镇江也没有去过。在解放区参加工作有三四年了，为人本本分分，老老实实，谨慎小心，观察事物比较迟钝。因为工作认真负责，慢慢提拔当了副科长。张科长听到朱延年这番话，又看见店员身上一律穿着布的人民装，讲话的时候嘴上缺不了新名词，完全是一派新气象，确实和别的药房不同，果然感到和朱延年亲近了些，不像刚才进门时那样提高警惕，精神也没有那样紧张了。他抽着烟，坐在沙发里，说：

“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当然不会拿你当外人……”

“张科长参加革命一定很久了，是我们的老干部老上级，以后希望多教导教导我们，也好让我们这些落后的人跟着你一道进步。”

“不要客气。我不是老干部，也谈不上啥上级，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张科长心里想：参加工作没两年，连党也没有参加，怎么能说是老革命呢？但是听他的恭维话心里却很舒服。他看朱经理倒是和一般商人不同，满口新名词，大概从前是和解放区往来过，否则不会这样的。朱延年确实曾经和解放区做过生意，但只是两三次，而且数目很小，他却夸大了许许多多

倍。张科长听他说的口气那么大，和他现在坐的这间狭小的经理室极不相称。他抬头向四下张望了一下，这样小的地方能做很大的生意吗？他脸上不禁露出怀疑的神色。

朱延年一看张科长的眼光就知道他不相信福佑药房是做大买卖的，他连忙暗示地说：

“唉，我们福佑因为给解放区往来，叫国民党反动派恨透了，逼得我们解放前不得不歇业，差点没搭上我这条小命。当然，只要为了解放区，为了革命，牺牲了我这条小命也不在乎。人生只要有个人目的，死了也有意义。幸亏解放军解放了上海，我才逃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虎口。解放后，我们高兴的很，人民翻身了，大家都忙……”

“那是的。”张科长随便答了一句。

夏世富趁机会帮腔：

“我们经理因为和解放区有往来，认识很多解放同志（他把区字漏了），整天忙得脚都没停过。”

“是呀，”朱延年摆出浑身忙不过来的神情，说，“就拿福佑来说吧，我就没有时间来好好筹备复业，同行希望福佑早点复业，许多客户，特别是老区的同志更盼望福佑早点复业。做买卖的一回生二回熟，总喜欢老主顾，客人也总喜欢老铺子，双方熟悉，信任的过，办起货来放心，不会吃亏。就是这样，福佑还

没有筹备的好，就草草复业了。”朱延年指着门外边那一溜已经移转给债权人的房间说，“那些房子还来不及布置，在同行与客户的催促之下，只好先复业再说，地方太小，怠慢你了，张科长。”

张科长弯弯腰，说：

“没啥，我们过去打游击，有这样的房子就不错了。”

朱延年马上又把话拉回来说：

“不过上海这市场就是这样，写字间——就是公司办公接头的地方——总是狭窄一点，栈房啊工厂啊倒是比较像样的。张科长啥辰光有空，到小号的栈房里去参观参观。请指教指教。”

夏世富在旁边听得朱经理这一番话，不禁给朱经理捏了一把冷汗，福佑有啥大栈房？幸好张科长说：

“好的，等把货办完了，再说吧。”

朱经理抓紧这个机会，立刻接上去说：

“张科长这次准备办些啥货呢？”

张科长从灰布人民装的胸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子来，打开来，从中抽出一张购物单子。他慎重地把它递给朱经理：

“不多，先买这一批……”

朱延年一看那单子，心里毛估了一下，至少也得

三四亿，这笔买卖可不小啊。他看着上面的药名，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张科长，那就请你把这单子留下来吧，小号来给你服务……”

“不，你先给我，我等歇抄一份给你……”张科长想收回去。

“是不是准备也送到别的药房去估估价？”朱延年猜出他的心思，他有意放一码，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说：“多给几家药房估价好，看哪一家货便宜，买哪家的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张科长办事真有经验！”

朱延年在张科长面前翘起了大拇指。张科长心里很得意。觉得朱经理的眼光不错：识人才。他外表没露出来，摇摇头，说：

“太恭维了。”

“这样好了，张科长，我给你复写几份，开好本号的估价单，一道给你送过去。货暂时不忙配，等你比较了价钱，送给医药公司核价以后，决定买哪一家的再说。”

张科长点点头：

“那我先走一步。”

朱延年问夏世富：

“张科长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吗？”

“早安置好了。”

张科长吃了一惊：

“我自己有地方住……”

夏世富拉着他的手说：

“住在我们这里方便些，一样的，没有关系，走吧。”

朱延年送走了张科长，旋即把童进叫到经理室来，指着张科长的货单子说：

“你去和营业部商量一下，开出一个估价单来。一般便宜的货照批发价九折计算……”

童进听到这样开价，他的眼睛愣了：

“经理，这样计算？”

“没关系，”朱延年满不在乎地说，“童进，我们是薄利多销主义，你开好了。贵重的药品你们照批发价九五折计算……”

童进暗暗佩服朱经理的手段：贵重药品九五折，那利润不错；一般便宜的货九折，估价单表面上看便宜，拉扯过来，还是划算。他不再提出异议，静静地听朱延年说下去：

“这个估价单只准开便宜，不准开贵。张科长要把几家的估价单送到医药公司去核价的。这是我们福佑复业后的头一笔大买卖，无论如何不能叫人家做去，懂得吗？”

童进站在朱延年面前会意地点点头。

“你快去开，”朱延年说，“开好马上就拿来给我。同时把货单子给我复写三份。”

童进前脚走出去，夏世富后脚跨进来，他笑嘻嘻地报告了安排张科长的情形。朱延年听完之后，他最关心的是张科长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到上海来办货。夏世富想了半晌，皱着眉头说：

“摸不清。张科长的嘴很紧，他不随便透露他的情形，连讲话也很小心的，你不是看到刚才那副腔调吗？”

“这是老区干部的特点，你越问他越不讲，你要是把他引到话头上，他有时不提防就流露出来了。这辰光还不能追问，一追问他就不讲了，要装做不注意他讲的那些事，同时你表示晓得很多事，他就会慢慢讲的。我的外勤部长，现在做买卖不比解放前，要用点政治，要动点脑筋。”

“希望经理多指导，我们实在太没经验了。”夏世富感到自己很空虚，听了朱延年的一番宏论，更感到自己不灵光了。

“你很聪明，只要努力学习，慢慢就会进步的。”朱经理鼓励他，问，“张科长带的行李多不多？”

“不多，只是一个铺盖卷和一只箱子……”

朱经理听到箱子，脸上立即发出兴奋的光彩，紧

接着问：

“沉不沉？”

“沉的很。”

“对，那里面装的一定是钞票。这箱子有多大？”

“三十二寸光景。”

“我晓得了，至少也有五六亿现款，这笔生意我们一定要做上，世富，你再去了解了解他的嗜好和脾气，早点回来告诉我。”

“好的。”

夏世富走了不久，童进把估介单和复写的货单子送进来，朱延年和他一道仔细校对了一下，比照市场上的行情，研究了哪些药品还可以压低一点，经过反复考虑，朱延年再三修正了估价单。晚上夏世富向朱延年报告了张科长的情况。朱延年吩咐几句，夏世富出去办理了。

第二天中午，朱延年和夏世富一同到惠中旅馆去拜访张科长。他们两个人走到三〇二房间，茶房热情地过来打招呼，知道他们是来看客人的，便在三〇二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里面没有回音，茶房说：

“张科长睡午觉了，朱经理夏部长在隔壁房里等一歇。”

朱经理同意，他给领到三〇三的空房间里坐下来了。喝了一口茶，朱经理对茶房说：

“张科长一起来就叫我们，你在外边看着……”

茶房懂得这些老板包围顾客的意图，他会意地笑着说：

“误不了事，你们歇着吧。”

张科长在床上睡得正熟，忽然听到轻轻敲门的声音，仔细一听：声音又没有了。他翻身想再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看看手表已经快两点了，他想起办货的事，就霍地爬起来。他下床一看，大吃了一惊。他放在床前的那双满是尘土的圆口黑布鞋不见了，却换成了一双贼亮的黑皮鞋。他想上海真是一个可怕的十里洋场，睡了一觉，鞋子就不见了，而且是在房间里不见的。这双皮鞋是谁的？一定是茶房打扫房间放错了，应该告诉茶房送还给它的主人。他要下床来，没有鞋子，只好权且借用一下那双新皮鞋。他把脚放进去，真稀奇，不大不小，正合适，是谁的脚和他一样大小呢？他低着头穿好了鞋子，抬起头来走两步，正要叫茶房，忽然看见床头那边放了一把靠背椅，椅子上放了一套深灰色哗叽的人民装，他好奇地把人民装上身拿过来试一试，走到衣橱的那块大玻璃面前一看：啊哟，不长不短，不肥不瘦，很合身。他很紧张地脱下来，慌忙折好，仍旧放在靠背椅上，竭力避免往那儿看。他过去开门，叫茶房。

朱延年和夏世富听到张科长的声音，就和茶房

一道过来了。张科长见他们来，自己连忙缩回来，坐在床上，把皮鞋脱下，两只脚悬空挂在床沿上。他见茶房进来，劈口就说：

“这是谁的衣服和皮鞋？怎么放到我的房间来，还给人家去！”

茶房没有吭气，他的眼睛望着夏世富。夏世富说：

“这是送给你的。”

张科长急得一个劲摇手：

“我不要，我不要……”

“穿上吧，”夏世富笑嘻嘻地央求说，“不晓得合不合适。”

张科长的态度很坚决：

“我不要这些东西，我用不着……”

朱延年看张科长的面色很紧张，他在旁边设法缓和这空气，轻描淡写地说：

“先试一试，没啥关系。这皮子倒不错，是德国纹皮，嘻嘻。”

张科长挂在床沿上的两只脚直摇，也在反对的样子，他说：

“用不着试。”心里想到刚才试穿的情形，脸颊上有点红红的，他对茶房说，“我的布鞋呢？你给我拿来。”

朱延年怕形势弄僵，知道老区的老干部刚到上海是很不习惯这样的，一切的事要慢慢的来。他没让茶房答话，抢先插上去说：

“这皮鞋是我个人的，那衣服也是我个人的。你那双布鞋太龌龊了，大概他们拿去洗了，晒干了会拿来给你的。你今天先穿上皮鞋再说。这衣服和皮鞋先借你用一用，将来再还给我，不是送你的。”

朱延年把夏世富说错的话无意中收回来，张科长听他这样说法，神经稍为松弛一些了。朱延年更进一步说：

“我们到老区去，天气冷了，部队上发衣服给我们，我们就不客气穿了。军民是一家，张科长不要拿我们当外人才好。”

“那是的。”

他听朱延年继续讲：

“凡事要入乡随乡，到啥地方说啥地方的话。这些物事，”他指着靠背椅上的衣服和床前的皮鞋，“在老区确实用不着，不过在上海穿穿倒也是需要的，嗨嗨。”

张科长听他这一番话认为也有他的道理，他转过脸去向靠背椅看了看：那衣服料子很不错，想到苏北的首长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衣服，便立即转回脸来，对朱延年说：

“那我借你皮鞋穿一穿，等我的布鞋晒干了还你。这衣服我一定不穿，我这身灰布衣服蛮好。”

夏世富搭上来说：

“张科长，你试试……”

张科长没听他说完就摇头。朱延年懂得目前不宜再劝说，不在意地说：

“你这身灰布人民装也不错……”他把话题拉到估价单上来，送过去复写的货单子和福佑的估价单，说：“张科长，都给你准备好了。”

张科长穿上皮鞋走过去。茶房看事体已经解决，转过身来伸伸舌头溜走了，侥幸这事差点没怪到他的头上。张科长迎着窗户站着，在仔细看那估价单，朱延年走到他的侧面，一边也看估价单，一边偷看他面孔上的表情：张科长有时眉头开朗，觉得药品的估价是比较便宜；有时眉头皱起，板着面孔，感到有些药品的开价并不便宜。朱延年站在旁边屏住呼吸，心卜通卜通地在跳。

张科长看完了估价单，知道总的来说价钱不贵，心中高兴。朱延年在一旁试探地问：

“张科长，你是内行，一看就晓得估价克己不克己，小号一向是抱薄利多销主义的，对老区同志，尤其要克己。我们完全是服务性质的。嗨嗨。”

张科长把估价单往桌上一放，很谨慎地说：

“等别的药房开了估价单再说，好啵？”

“好的好的。”

夏世富怕生意让别家抢去，他赶紧凑上一句：

“张科长确定了，请你早点通知我们，我们好早点给你把货配齐，别误了你的公事。”

“决定哪家以后，就通知你们。”

朱延年恐怕露了马脚，连忙在侧面摆出不在乎的神情，补了两句：

“不忙，等你考虑考虑，再和医药公司商量商量，研究在哪家配货都是一样。我们因为曾经和老区往来过，思想认识比较清楚，我们希望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在上海办货要小心，有些商人唯利是图，过期的货也配进去，给客户上当。这药品不是别的，买了不能用不行。”

“这话说的对，”张科长同意朱延年的看法，他说，“我要和医药公司他们多商量商量。”

“应该的。”朱延年不再向这上面说下去，他暗暗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张科长，你头一次到上海来，凡事谨慎一点好。出门不要带贵重东西，小心叫别人偷去。”

张科长顿时想起了他带来的四亿现款，心时有点紧张起来：出门不能带，留在旅馆里安全吗？这倒是个包袱。路上为了这笔款子，他几乎整整一夜没合

眼，到了上海又成了问题。他向房间四面看看，好像没有依靠，便脱口说出：

“我带了一些现款来，别的倒没有啥贵重东西。朱经理，你看有啥办法吗？”

“办法？”朱延年有意不马上答复，想了一阵子，才慢吞吞地说，“办法倒是有，就拿小号来说，我们的客户到了上海总喜欢把款子交给我们保管，要我们给他存在银行里。福佑和银行往来有专用支票，客户要款子，一个电话，马上就送过去，客户感觉很方便。小号特别派人负责，加倍小心。小号的宗旨就是为客户服务的。”

“存在银行里，”张科长说，“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朱经理。”

“没啥，你吗，我们更应该服务的。”

张科长从床底下把箱子拉出来，说：

“款子倒不多，只有四亿……”

朱经理看见一箱子人民币，他的眼睛里忍不住露出喜悦的光芒，望着夏世富说：

“你快点给张科长送去，坐三轮去，路上小心点。”

“晓得了。”

夏世富点了点数，提着箱子走出去。朱延年留在房间里，对张科长说：

“我们的夏部长可算得是老上海了，他啥地方都晓得，要买什么东西，找他，他的门槛精来兮。”

张科长说：

“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朱延年瞧大事已成，他站了起来，很诚恳地说：

“张科长，这估价单你仔细多看看，有些价钱我们还可以让点步。今天晚上请你便饭，希望你赏我一个面子。”

张科长不同意：

“用不着，旅馆的伙食比我们机关的小灶还好。”

朱延年弯下腰去，说：

“这是我对张科长的一点小意思，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可是很谈的来，以后还希望张科长多多栽培。”

“晚饭一定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

“别客气，”朱延年走到门口对张科长拱拱手，说，“我晚上过来候你。”

朱延年走到楼梯口那儿，刚才和他一同到张科长房间去的茶房追了上来，问他张科长那双布鞋哪能办。张科长昨天穿了拖鞋到浴室里去洗澡，夏世富趁此机会量了他的鞋子大小和衣服长短，立即从外面买了黑皮鞋和灰色哗叽人民装来。在他今天睡午觉的辰光，让茶房送了进去，特地把布鞋子拿出来。刚才朱延年顺嘴那么一说，茶房不知道怎样处理是

好了。朱延年要茶房真的给他洗一洗，今天不要给他，等他催两三次以后再送去。如果他不提，就不必给他了。

张科长关起门来，又仔细看了一下估价单，想起这许多款子叫夏世富拿走，有点不妥。朱延年虽然说得那么好听，他究竟是商人啊，何况他们从前也不认识。这次夏世富从医药公司招待所打听出他来沪的消息，一直把他接到福佑药房来，情况没摸清楚，就把款子交出去，未免有点太冒失，应该自己存到人民银行去。他把茶房叫进来，问清了福佑药房的电话号码，当时打电话过去，告诉夏世富，他要这笔款子用，不必存了，请他马上送过来。

夏世富得到电话，急忙跑去问朱延年怎办。朱延年仿佛早想好了主意，旋即答道：

“你告诉他：四亿款子已经派人存到银行里去了，要钱用，请他晚上告诉我。我去对付他。”

夏世富刚跨出经理室，朱经理又加了一句：

“你打完了电话就回来，世富，你把这款子，”朱经理指着沙发旁边的张科长的皮箱说，“送到信通银行去，存在福佑药房的户头里。”

23

童进走进经理室，小声地对朱延年说：

“经理，张科长又催了，他叫我们快点把药配齐，他等着回去。”

“晓得了。”朱经理有点不耐烦。

“他还说，再不配齐，他就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这吓不住谁。”

“这不好吧，”童进严肃地劝说，“收了人家货款，哪能好不配货呢？”

朱延年给问得无话可说，他转过口气来说：

“当然要配货，不要一个劲屁股后头追……”

“也难怪张科长，他等了半个多月了。”童进一想起这事，就很惭愧。

那天晚上，朱延年和夏世富一道请张科长吃饭，朱延年首先提出来问要款子派啥用场。张科长事先没想好题目，一时没答上来，只说是放在手边方便些。朱延年劝他还是存在银行里稳妥，要多少福佑派人随时送过来。张科长不好再说，暂时存在那里再说。

过了两天，各家药房的估价单送来了，价钱倒是福佑便宜，他并不马上决定，去找医药公司核价。医药公司那边管理这方面工作的旧人员，朱延年请过他们的客。医药公司的同志说：凭估价单看，是福佑货价便宜，买福佑的划算；只是福佑复业不久，品种可能不全，希望张科长抓紧一点催他们配货。张科长自己哩，想到受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招待，穿了他们的衣服和皮鞋，现款也存在他们那里，不买福佑的药品既说不出理由，也有点不好意思。至于催配货，那是每家一样的，他决定买福佑药房的。

福佑药房办货的手续并不慢，决定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就装了一批出去。本来张科长是希望一次配齐，夏世富说分批快，反正都得配齐。张科长同意他的做法，眼见第一批货上了火车，张科长稍为放心一点了。他不知道头一批货是福佑现成的便宜货，不值钱，自然装的快。第二批货就拖了一个礼拜，最后装出去时，那里面还暗暗搭配了一些冷背货，张科长却给蒙在鼓里。第三批，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催了一个礼拜，迟迟没有装，每次催夏世富，夏世富总是说“就装就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张科长愁的难于打发这日子，等的有点不耐烦了。

在张科长焦急的等待中，夏世富笑嘻嘻地走进了他的房间。他不再和夏世富寒暄，劈口便问：

“你们以后究竟还想不想和我做生意？”

“你这是说啥闲话，张科长，一回生，二回熟，当然想做，当然想做！”

“为啥还不配齐货？”

“就要配齐，就要配齐。”

“老是说就要配齐就要配齐，等了半个多月了，还是没配齐！”

“张科长，这次真的就要配齐了。”

“还有几天？”

这一句问住了夏世富，天晓得还有几天。他看张科长那股急劲儿，不说个具体的日期，一定会跳起来的。他具体的日期又说不出，便含含糊糊地说：

“这个礼拜大概一定可以了。”

“你说的，这次可要算话，这个礼拜一定要配齐。”张科长给拖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他，可是还不放心，又加了一句，“没有货，那可别怪我了。”

“我一定催朱经理，”夏世富见他态度缓和了，马上就把手推给朱经理身上，到辰光没货他好有话讲。他说，“你放心好了，张科长。”

张科长叹息了一声：

“整天呆在旅馆里等货，真闷的慌。”

“我陪张科长出去散散心，……”夏世富说到这里便停下来，观察张科长的表情。

张科长毫不考虑地坚决地说：

“我不要散心。”

“反正闲着没事，到大世界去逛逛吧……”夏世富不再说下去，在听他的口气。

“不，”张科长说了一个“不”字，立刻想起了大世界。他在扬州家乡就早听说过上海。上海有个大世界，里面啥都有，可以说要啥有啥。这次到上海办货以前，也曾有个念头，到大世界这些地方去白相，一方面因为自己头一回到上海，人生路不熟；另一方面由于福佑的货始终没配齐，任务没完成，把到大世界白相这些念头忘在一边了。经夏世富一提，又勾起了消逝得了无影踪的念头，接着他思念地说，“大世界？”

“唔，大世界，”夏世富看他有些心动，便乘机紧接上去说，“这地方可好白相哩，到了上海的人没有不到大世界去的。有人说，不到大世界，等于没到上海。”

“啊！”

张科长听夏世富一说，惊讶一声，态度没有刚才那样坚决了。

“去白相白相，反正闲着。”

夏世富不由分说，拉着张科长就走。张科长心里想去一趟也好。转一转马上就回来。

夏世富买了门票，首先把张科长带到进门右边的那一排镜子面前，指着镜子，嘻着嘴，对张科长说：“你看！”

张科长站在镜子面前，大吃了一惊，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奇矮的胖子：胳膊短而粗肥，腿也短而粗肥，看上去膝盖就要接近脚面，身子，不消说，也是短而粗肥，头仿佛突然给压扁了似的，眉毛、眼睛和嘴变得既细且长。整个人比无锡惠泉山的泥制胖娃娃还要矮还要胖。这种人他从来没见过。他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他几乎不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看看自己，又看看镜子里那人的容貌，又确实是自己。接着，他好奇地又走到另一面镜子前面，上身非常之长，几乎占去整个人的长度六分之五，两条腿出奇地短，成了一个很可怕的怪人。他退后几步仔细一看，镜子里那个怪人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两个人，下面一个人十分矮小，头上顶着一个倒立的人，细而长，长得只见半个身子多一点，脚都看不见了。这一长一矮的人都是自己。张科长在各种镜子面前，变成各式各样的畸形的人物，到最初一面镜子面前，才又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张科长十分好奇地又重新在每一面镜子面前望了望，然后才不舍地离开。

“这是哈哈镜。”夏世富对他说，“因为在镜子里

看到各种怪样子，没有一个人不哈哈大笑的，就叫做哈哈镜。”

“唔，”他把畸形的身体所引起的喜悦隐藏在心底深处，随便地“唔”了一声，跟夏世富走去。他心里对大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夏世富把他从一个游乐场带到另一个游乐场，有时坐下来看一阵，有时站在那里停一会。这里有京剧，有越剧，有沪剧，有甬剧，还有淮扬剧；这儿有魔术，有杂技，有电影，还有木偶戏；另外还有吃的喝的地方。他站在三层楼上，只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像流水般的涌来挤去。耳边听不尽的音响：京剧铿锵的锣鼓，越剧哀怨的曲调，杂技的动人心魄的洋鼓洋号……吸引每一个游客的注意。

他心里想；确确实实是个大世界，啥玩艺都应有尽有。这个地方不来一趟，真的是等于没有到上海。他回到惠中旅馆三〇二号房间还在想每一个游乐场的情景：夜里躺到床上，在他眼前不断出现的也还是游乐场的情景和照在哈哈镜里的畸形的身体。

第二天，他起来很晚，吃过午饭，困了一觉，又是晚上了。夏世富那张阿谀的笑脸又在他面前出现了，低低地问：

“大世界不错啵？”

“这地方倒蛮有意思。”他心里想：上海真是一个

迷人的地方。

“今天我们上另外一个地方去……”

张科长听到“上另外一个地方去”，心头一愣，啥地方？也许是自己曾经想去过的一个不敢告人的神秘的地方，他信口回绝：

“绝对不去！”他感到任务未完成，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很重，不能随便乱跑了。

“还没有给你说到啥地方去，为啥就说绝对不去呢？”

夏世富看他那股紧张劲，不禁笑了。张科长像是突然给人发现隐私，脸绯红了。等了等，改口说：

“啥地方也不去。你们快给我把货配好，我该回去了。”

“到了上海总得多看看，也不是到下流的地方去……”夏世富有意避免谈到配货上去。

“唔……”张科长没有说下去，但不再坚决拒绝了。

“到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这可是个好地方，站在上面，什么地方都看的到……”

张科长觉得待在旅馆里闲的发慌，利用这个机会到上海各个地方白相白相也不错，便答应道：

“去就去吧。”

他们两人坐电梯上了七重天。夏世富先领他站

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

看了一会，夏世富陪他走进了七重天的舞厅。两个人在右边靠墙的一张台子上坐下。音乐台上正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朝着左边转去。灯光很暗，随着音乐旋律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在各色的灯光下，张科长留神地望着每一个舞女，有的穿着乔其丝绒的花旗袍，有的穿着紫丝绒的旗袍，有的穿着黑缎子的旗袍，脚上是银色的高跟鞋，跳起舞来，闪闪发着亮光。他拘谨而又贪婪地看了一阵，又想看，又怕人发现自己在看，不安地坐了一阵子，想走开又不想走开，半吞半吐地对夏世富说：

“我们走……走吧？”

夏世富从他的眼光中发现他对舞场发生极大的兴趣，便坐在那儿稳稳不动，说：

“白相一歇再走。”

张科长不再言声，右手托着腮巴，凝神地望着舞

池。夏世富给一个穿着镶了绿边的白色制服的侍者咬了一下耳朵，手向角落上的一个女子指点了一下。半晌，一个穿着大红牡丹的乔其丝绒旗袍的青年舞女走了过来，坐在张科长旁边。

一个曲子终了，舞池里的电灯亮了。张科长回头一看，忽然发现了这个青年舞女，连忙放下右手，靠左边坐过去一点，好给她保持稍远的距离。

“这位是张科长……”

那青年舞女点点头，亲热地称呼道：

“张科长……我叫徐爱卿……”

张科长不自然地点点头，立刻把头向左边望过去。舞池里的灯光变成紫色的，张科长暗暗回过头来，朝那个舞女觑了一眼，正和那舞女的眼光碰个正着，他马上又把头转向左边。

夏世富对徐爱卿说：

“请张科长跳个吧……”

徐爱卿看张科长神色不自然，她没有马上站起来请他跳，很老练地说：

“张科长阿肯赏光……”

“不……”

张科长不知道自己要讲啥，说了个“不”字，没有再讲下去。

夏世富料想他不会轻易跳的，没有勉强他，却

说：

“张科长是老革命，老干部，是国家的功臣，打游击打了很多年，现在全国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也该享乐享乐……”

“是呀！”徐爱卿说。

张科长在回味夏世富的话：真的，在苏北辛苦了这么多年，有机会到上海来，现在等货，闲着没事，又是夏世富请客，不白相也太对不起自己了。他早听说上海舞厅富丽堂皇，到了七重天一看，果然不错，坐在身旁的徐爱卿更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漂亮的少女，跳一次舞为啥不可以呢？可是他耳朵里仿佛听到另一种声音：你是出来办货的呀，为啥要到这些地方来？他犹豫不决，但并不拒绝徐爱卿，只是说：

“我不会跳，看看吧……”

夏世富说：

“请徐爱卿小姐教你。”

徐爱卿顿时接上说：

“张科长一定跳得蛮好，不用我教。嫌我跳的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张科长满口否认，“不是这个意思。”

夏世富凑趣地说：

“那就跳一个吧。”

“等等……”张科长松了口气。

夏世富说了一声“好的”，便拉徐爱卿到舞池里去跳了。他们两个人一边跳着，一边谈着。张科长不知道他们谈的啥，但看见徐爱卿的眼光老是盯着他望。他漫不经心地也对着她望。

夏世富和徐爱卿跳完了一个曲子，回到座位上来。夏世富说要小便去，站起来走了，把徐爱卿和张科长两人撇在那儿。她见张科长的眼光专心注视着舞池，不和她搭讪一句话，等了一会儿，她说：

“肯给我面子啵？科长。”

“什么面子？”

张科长回过头来问徐爱卿。她笑着说：

“我想请你跳只舞？”

“我，……我不会……”

“我晓得你会，就是看我不起！”

她向他微微一笑。

“不是，不是……”张科长一个劲否认。

“那就跳吧，”她拉着他的手，要到舞池里去。

他望见舞池里挤满了人，在暗幽幽的蓝色的灯光下，一对对舞伴跳着轻盈的慢狐步舞。舞池附近的台子全空空的，只有他和徐爱卿坐在那里没跳。他是会跳舞的，并且也是很喜欢跳舞的，一进了七重天，他的脚就有点痒了，但觉得在舞池里和舞女跳舞不

好。如果这儿是机关内部，他早跳得浑身大汗了。徐爱卿再三邀请，他觉得老是拒绝也不好，何况舞池里没有一个熟人，连夏世富也不在哩。他慢吞吞地说：

“那你教我……”

“好的。”

“只跳一个！”

“随便你……”

徐爱卿拉着他的手一同下了舞池，随着音乐旋律，在人丛中跳开去了。接着她又请他跳，他想：既然跳了一个就跳吧。等他们跳完了两个曲子，手挽手地回到座位上，恰巧夏世富比他们早一步回到座位上，他翘起大拇指对张科长说：

“跳的真好，科长。”

“不会跳，”张科长忸怩地说，“是她硬拉我下去的，献丑了。”

“科长跳的邪气哉，夏先生。”

“我早就晓得了。”

现在张科长再也不顾忌啥，时不时邀请徐爱卿跳。跳完一个曲子回来，张科长发现夏世富不见了，他心里有点焦急。她说：

“等等大概要来的。”

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张科长还不见夏世富来，心里实在忍耐不住了，老是向舞池四面张望：没有夏

世富这个人的影子。他不禁信口说道：

“怎么办呢？还不来！”

她一点也不急，老是讲：“等一歇再讲。”张科长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

“不行，我得回去了。”

他又向四面看看，仍然没有夏世富的影踪。这时正好有个穿白制服的侍者走过，张科长指着夏世富的空座位问他：

“你看见这位客人到啥地方去吗？”

“是夏先生？”

徐爱卿点点头。侍者说：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两位了。刚才有电话找夏先生，有要紧的事，他回药房去了。你们的账他已经付了。他要我告诉科长一声，对你不起，他有事先走一步。”

张科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药房里忽然有啥要紧的事？为啥知道他在七重天舞厅呢？他事先给药房讲好了吗？这一连串问题，他得不到解答。徐爱卿却毫不以为奇，漠不关心地说：

“不去管他，我们跳吧。”

张科长有点生气，果断地说：

“不跳了，我要走哪。”

“也好，”她也站了起来，靠着她身边，低低地说，

“我送你回去……”

“不……”

她没有再说下去，陪他走出了七重天。她好像事先知道他住在惠中旅馆，挽着他的手向那个方向走去。他失去了主宰。上海的路，他不熟，他也没有办法甩开她，可是心里又不愿她送自己回去。他无可奈何地一步步向前迈去。她一直把他送进了三〇二号房间……

第二天黄昏时分，夏世富又来了。张科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生怕他知道自己昨天晚上的事。不等夏世富开口，他首先说道：

“今天啥地方也不去。”

夏世富等了一歇，笑了笑，说：

“去看周信芳的《秦香莲》，怎么样？反正闲着没事。”

张科长后悔昨天晚上的荒唐，做了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幸好夏世富不知道，否则宣扬出去就更糟糕了。他今天打定了主意，不怕你夏世富说得天花乱坠，啥地方也不去，避免自己再陷下去。他急于要回苏北去，很严肃地质问夏世富道：

“你们的货啥辰光可以配好？”

“大概快了！”

“三天以内行不行？”张科长的眼光盯着他。

他见神色不对，马上应道：

“差不多。”

“那么，你快去办吧，货不配齐，我啥地方也不去。”

夏世富一看苗头不对，不再说下去，转身就走了。他出了惠中旅馆直奔七重天，找到徐爱卿，安排好了，才回到福佑药房去。

一小时以后，徐爱卿出现在三〇二号房间里，约张科长到七重天去。张科长坚决不去，但经不住她好说歹说，拖拖拉拉地走了。

张科长一天又一天地这样生活下去，夏世富来晚了一点，他反而怀念起他来了。有时夏世富不来，就叫徐爱卿陪他出去白相，然后一同回到惠中旅馆。张科长不大催货了，甚至希望货慢一点配齐也好，他这才有理由在上海等货。他逐渐把苏北行署卫生处交给他的任务淡忘了。

正在张科长沉浸在欢乐中，忽然接到苏北行署卫生处拍来的电报，要他把货办好，立刻回去。张科长从梦一般的境地中清醒过来。他不再催问夏世富了，因为夏世富老是一副笑脸，你骂他两句也是笑嘻嘻的；你发脾气也没用；如同皮球一样：把它打到地上旋即又跳了起来。他算是对他没有办法，就直接打电话到福佑药房来，正好是童进接的电话。他发的脾

气，童进认为应该的，这是福佑药房不对，他就在朱延年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

朱延年看童进一本正经在说，语气之间带有责备的味道，他不好再发脾气，怕在同仁面前露了馅，漏出去，那不好的。他说：

“明天就配，你通知栈务部的配货组……”

童进进一步说：

“栈房里缺货，很多酞剂没有，复方龙胆酞，复方大黄酞，陈皮酞，净大黄酞……这些都没有，别的贵重的药品也没有，哪能配法？”

“有。”朱延年信口答道，他望着窗外先施公司的矗立在高空的霓虹灯广告在想心思。

“真的没有，我问过栈务部了。”

“我说有就有，你不晓得……”

童进听得迷惑了：栈务部说没有，朱经理说有，难道是栈务部骗他，或者是朱经理有啥妙法？朱经理毫不犹豫，很有把握地说：

“明天给张科长配第三批药。”

“那很好。”童进不再提意见。

朱经理给夏世富咕叻了几句，过了点把钟，他们两个人一道出去，到西藏路去了。福佑药房的前身——福佑行——现在成为福佑药房的工厂了。这个工厂真正做到“工厂重地谢绝参观”，除了朱经理和

少数有关的人员以外，不要说外边的人，就是福佑药房的人也不好随便来的。这个工厂非常之简单，既没有高大的烟囱，也没有成套的机器，连装药用的瓶子也不完全，只是几个铅皮桶，一些大小不同的瓶子和少数各种不同的药粉。站在那间客堂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厂的全貌了。

朱经理走进客堂，要夏世富准备好铅皮桶和水，他自己拣了几包药粉，拿了一瓶酒精，开始制复方龙胆酊了。

按照药典规定：复方龙胆酊一千西西，它的含量应该是一百格兰姆龙胆粉，四十格兰姆橙皮，十格兰姆的豆蔻，一百格兰姆甘油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醇。朱经理放了龙胆粉和醇，夏世富在旁边说：

“成分不够吧？”

“我要你准备的黄连呢？”

夏世富把刚才从中药铺里买来的黄连递给朱经理：

“在这里。”

“放下去就差不多像了。”

这些酊剂按照规定应该浸五六天才行，朱经理他们把药配好，只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来过滤了。没有过滤纸，夏世富拿过一块绒布，上面加了一张草纸，既不干净，也未消毒，马马虎虎就过滤出酊

剂来了。夏世富过去试了一下分量，不够，他急得满头是汗，走到朱经理面前：

“还差十五磅，哪能办法呢？”

朱经理昂起头来一想，说：

“给我加自来水。”

夏世富照办，二百磅假酞剂制造出来，装在瓶子里，送到栈务部，装了箱，和别的药一同准备发到苏北去。

张科长把第三批发票看了一下，和他要买的货单一对，还有一些药没配齐，数量不多，价钱不少，毛估一下得八千万，几乎占整个办货四亿款子的四分之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朱经理，你也太不像话了，要我等了半个多月，到今天还没有配齐？”

朱经理很沉着，他一点不慌张，说：

“是啊，真对不起你，我今天又打电报到广州去了。那边说有一大批货已经装出来，这几天就要到。我们做生意要规规矩矩的，宁可慢一点，但一定要配好货。药品这些东西是救命的，千万不能马虎。这次广州那边手脚慢了一点，请张科长包涵包涵。下次你要办啥货，早点把货单子寄来，我们先给你办好，你一到上海，马上就给你装走，这多好。”

张科长没有心思想到下一次，他问：

“这次怎么办呢？”

“你索性再等两天就差不多了，一切开销算我的。”

张科长想起苏北的电报，组织上要他回去，一定是家里有啥重要的事体，他不好再耽搁，便说：

“我回去还有事呢，开销倒不要紧。”

朱延年知道这是好机会，即刻说道：

“那我派人送过去？”

“究竟哪一天可以配齐呢？”

“快哪，快哪，我看顶多三五天。”朱经理说得很有把握，其实他根本没有打电报去广州，广州也没有货装出。

张科长却信以为真：

“五天一定可以装出？”

“没有问题。”

“我今天赶回去，”张科长还不放心，又加了一句，“五天以后等你的货到。”

朱经理叫了一辆祥生小汽车送他到北火车站。张科长身上穿的那身灰色哗叽的人民装，脚上那双德国纹皮的皮鞋擦得雪亮，现在头发也是乌而发光。他们走进车厢，夏世富已经给张科长把位子占好，东西也放妥了。在张科长座位的行李架上有一辆小孩子玩的三个轮子的脚踏车，他的座位下面是两大筐

香蕉和苹果；这些都是朱经理要夏世富买的，张科长并不知道。

他们坐了一歇，车站上的铃响了，服务员在催送客的人下去。夏世富给张科长握了手后，指着脚踏车和水果，说：

“张科长，这是我们经理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

张科长愕然了：

“我不要，请你带回去。”张科长站到座位上去取。

朱经理说了一句：“小意思。”

他们两人飞快地下了车，走到张科长座位的窗口外边来。

张科长拿下脚踏车来想从窗口退还给朱经理，叫夏世富上前一把拦住。

车站上的铃声停了。穿着黑色制服的站长，朝着火车头的方向，扬了扬绿旗，火车轰隆轰隆地慢慢向前移动了。

张科长的头从窗户那里伸出一半来，对着朱延年和夏世富，自言自语地说：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没啥，没啥。”朱延年毫不在意地摇摇手，一边又追上蠕动着火车说，“张科长，下次早点来，来以前先给我个信，我好来接你。”

“好的，好的。”张科长把胳膊伸出窗外，向朱延年和夏世富挥了挥，说，“谢谢你们。”他心里想这一次到上海真不错，不然真是白活了一辈子。下次有机会当然要来，而且不像这一次小手小脚，要痛痛快快地白相白相。

火车慢慢远去了。

夏世富望着消逝在远方的那只灰色哗叽人民装的袖子，对朱延年说：

“张科长和他刚来的辰光不一样了，经理。”

“那当然，”朱经理在月台上兴奋地走着，说，“不管是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也不管是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只要他跨进我们的福佑药房，我就有办法改造他的思想。啥前进，啥为人民服务，都是说的好听，全是骗人的假话。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钞票。有了钞票，要前进就前进，要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没有钞票做啥也不灵。古人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只要有钞票，保险你路路通，多大的老干部也过不了这一关。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物质基础。”

夏世富似懂非懂，说：

“那是的。”

“所以，我开头叫你不要急，对付老区来的老干部急不来，要用另外的改造思想的办法。你看，他今

天穿上那套灰哗叽人民装很自然了，也不提啥了。在惠中旅馆和徐爱卿一同走出走进也没啥了。”

“徐爱卿这笔费用可不小啊，经理。”

“不算啥，徐爱卿这次给我们不少帮助，以后要多多照顾她。”朱延年毫不在乎地说，“对待不同的干部要用不同的手段。世富，懂得啵？”

夏世富摇摇头。

“不懂不要紧，你很聪明，只要努力学习，你慢慢会进步的。”

他们走出了四号月台。朱经理见后面到了一班车，旅客熙熙攘攘地走来，他说话的声音就放低了些。

夏世富的眼睛里闪耀着钦佩的光芒，他没注意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旅客，只顾巴结地说：

“经理的本事真不小，又会做生意，又会政治。这次对付张科长，我跟经理学到不少本领。”

“那当然，做一个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商人可不容易，单靠经营吃不开哪，还得搞政治，这样才有前途。”

24

朱筱堂一走进大厅，伸手便扭开电灯，挂在下沿的那四个大红色的宫灯顿时亮了，照得大厅里明晃晃的，当中那幅“丹凤朝阳”的中堂也显得十分耀眼，好像从画面放射出红日的光芒。

“做啥？”朱暮堂一见那宫灯就有点生气，说，“也不办喜事，为啥把宫灯都开了？”

“宫灯亮一点。”

“我不要亮，我讨厌亮，太刺眼了！”

朱筱堂站在大厅当中，不知道怎么是好。母亲把他从窘境里救了出来，说：

“筱堂，把宫灯关了，开上头的小灯。”

朱筱堂马上开亮了长几上的帽筒也似的小灯，然后把宫灯一一关了。朱暮堂坐到大八仙桌左边那张红木宝座上，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

“世道真的变了，想不到连延年也不要田地。”

他用右手的食指有规律地敲着红木八仙桌，发出清脆的音响。他在寻思原因。筱堂他娘知道他们兄弟两个人不和，但不敢直接提出，怕朱暮堂不高兴，

只是说：

“他恐怕要付钱，当然不肯要了。”

“不，我在信上说的清清楚楚，分文不要，完全奉送。”

她试探地说：

“是不是生你的气？”

“那是过去的事了。五十两金子到现在没有归还，这两年也没向他提，做哥哥的总算对他仁至义尽了。听说他在上海混的不好，福佑曾经宣告破产，现在虽说复业了，可是做生意买卖风险大，没有田地稳妥。田地顶多年成不好，少收点，绝不会贴本，也不会宣告破产。我想送他一点地，落叶归根，将来也好有个依靠。他却不要，你看气人不气人？！”

“他不要就算了。”

“算了？”他睨视她一下，心里还在打主意，想叫朱延年收下。

“有地还怕没人要？”

“天下就有这样的怪事，不但延年不要，连瑞芳也不肯接受。”

“姑姑为啥不要？”

“义德在上海走红运啦，一厂一厂开办起来，手下工人成千上万，当然不希罕我们这点薄田。”

“这真叫人想不通。”

“不过，瑞芳没有说死，她说没有工夫到乡下来管理田地，如果要记在她名下也可以，还是要我代管……”

“那她同意了？”

“信上的意思推掉，大概义德不赞成；她又不好意思回绝，留了个尾巴。唉，”他长长叹息了一声，不胜感慨地摇摇头，说，“人情浇薄的很，到了紧要关头，就是兄弟也不可靠……”

“延年那号子人，你别理他。”

“当然不理他。我朱暮堂多这么一二百亩地也不在乎，好在我家的地早就分了，”说到这里，他的眼光转到右下面红木宝座。朱筱堂坐在那边，刚才爸爸讲了他两句，一直没有言语。爸爸关照他，“日子记住了吗？”

“记住了，无锡解放前三个月就分了的。”

“对。”

无锡一解放，朱暮堂就留心土地改革的事。《土地改革法》公布了，他仔细研究那四十条，看来看去，差不多可以背诵出来了。他把土地分登了五户：朱暮堂一户、朱延年一户、朱瑞芳一户、他老婆和他儿子两户，说是在解放前三个月就分了的。因为《土地改革法》第八条规定了在解放以后出卖、赠送土地的，一律无效。他怕儿子忘了，特地提醒他一下。他很满

意儿子记住。但是朱延年不接受他的好意，却有点棘手。他想亲自到上海去一趟，可是最近乡下风声很紧，有许多事要办理，一时走不开。他准备写一封恳切的信，要瑞芳去办，只要朱延年不反对，一切事情由他负责，绝不叫朱延年吃亏，并且还可以选送点租米去，朱延年一定会收下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延年那边，还可以想点办法……”

“他肯吗？”

“试试看。……”

朱暮堂的话还没有说完，从大厅后面忽然走出来一个人，他轻轻走到朱暮堂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老爷，我回来了。”

他站在一旁，听候朱暮堂的吩咐。朱暮堂对苏沛霖的突然从后面出现，感到有些惊异：

“你怎么从后面来的？”

“怕走大门遇到人，特地绕到后门来的。”

“好，你办事有经验。”

“全靠老爷的教导。”

“船开了吗？”

“开了，开了，我亲眼看船开走了，才回来报告的，保险到上海出不了问题。”

“这一船开走了，我就放心了。”朱暮堂心中默默

计算偷运走的粮食，一共运走三条船，快两百石了，都是管账先生苏沛霖一人经的手，他很满意苏沛霖的才干。他得意地说，“沛霖，你看，这批粮价能不能涨一点？”

“涨一点？没有问题，就怕脱手耽误时间，是不是早点脱手把稳些，省得担风险。”

“所言甚是。看上去，涨也涨不了多少，还是早点脱手好。”朱暮堂想起了朱延年，接着说，“你能不能想办法送十石粮食给朱延年？”

“三老爷那边吗？”苏沛霖知道老爷和朱延年不搭界有好几年了，怎么忽然要送粮食去呢？虽说在朱公馆里数他最熟悉朱暮堂的那本账了，可是这件事却有点突然。

“对。”

“当然有办法。”凡是朱半天交办的事，凭苏沛霖过去的经验，只要一提朱暮堂三个字，没有办不到的。

“要不要到上海跑一趟？”

“用不着，老爷，我明天早上和这边粮店说一声就行了。”

“弟弟肯收吗？”筱堂他娘怕朱延年再一次拒绝。

朱暮堂摸透了朱延年的脾气，白花花的大米送给他，一定要；等他吃上几天，再写信告诉他，这是

送给他那些田地的一部分租米，要退还也来不及了。他没有把心里的打算说出来，很有把握地笑了笑说：

“你等着看吧。”

她不了解其中奥妙，苏沛霖相信朱暮堂一定有把握才说这句话。他深深了解当过国民党商团队队长和日本鬼子时候的区长的朱暮堂，只要他心里想到了的事，就一定可以办到。他说：

“老爷一定有办法。”

“叔叔见啥都要，有十石粮食，他不要才怪哩。”

朱暮堂很高兴儿子说的这几句话，觉得他慢慢长的成熟了，看事体比他娘还深一层。他心里充满了喜悦，看了儿子一眼，然后转过来对苏沛霖说：

“下甸乡的树林怎么样哪？”

“已经安排好了，准备这两天夜里动手，过几天保险再也看不到树林了。”

“要砍的干干净净，多化点钱也没关系，村里很多人都看上了那一片树木，一棵树也不要留下，看他们分去！”

下甸乡有一片桃树林。无锡的水蜜桃在全国是闻名的，而下甸乡的水蜜桃是无锡水蜜桃当中最好的一种。朱暮堂宁愿把它砍掉，也不甘心分给那些泥腿子。《土地改革法》一公布，他就想到他手下那些财产怎么能够不落在泥腿子的手里，能转移的尽量

转移；能毁掉的彻底毁掉；不能毁的，像老契将来要交出去烧掉，他叫人带到上海拍成照片，痴心妄想等蒋介石回来好派用场。在这方面，苏沛霖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老爷，动手辰光，我也去，绝不会留下一棵树来。这方面的事，你放心好了。”苏沛霖走上一步，低低向朱暮堂说，“最近汤富海的气焰可高哪，眼睛就像是长到头顶上去了，谁也不放在他眼里。”

“汤富海？”朱暮堂一听到这二个字，马上就想到汤阿英，一只已被他捕捉到手的小鸟，却叫她飞了，从此一去杳无音讯。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更可恶的是汤富海这个硬汉子，打不死压不扁，一直是他的死对头。现在快土改了，村里有人撑他的腰，自然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了。他按捺下心中的气愤，冷笑了一声，说，“这两天你看到他吗？”

“看是看到他，没大讲话。”

“你可以和他多聊聊……”

“我？”苏沛霖这一阵子硬着头皮在替朱暮堂办事，他尽量不出头，暗地里卖力气。他从来没有见过老爷像现在这样特别慷慨，从中他可以弄到不少油水；想到村里那些干部，他不得不提防被发觉，自己混在里面，以后下不了台。

朱暮堂察觉他的心思：

“你不敢去吗？”

没等苏沛霖回答，朱筱堂提出反对的意见来了：

“汤富海这样的人没有心肝，多少年来，我们养活他一家子，到现在还欠我们很多石租米没有还，啥地方都和我们做对，理他做啥？”

“孩子，你究竟年轻，人家现在坐上台面了，为啥不可以理他呢？……”

“这号子人，死无赖，欠租不还，差点要抢我们的地了，现在理他，尾巴翘的更要高了！……”

娘制止儿子说：

“筱堂，你不懂事，听你爹说下去。”

儿子默默地望着爹，但脸上的表情还是不赞成理睬汤富海。苏沛霖暗暗支持大少爷的意见，从侧面说：

“汤富海一心惦记分老爷的田地哩！”

“要土改了，当然要分我的地。”朱暮堂抚摩一下胡须，等了一歇，说，“沛霖，你在村里听到仙诗没有？”

“仙诗？没听说过。”

“我倒听到过，这首仙诗很有意思。”

他这么一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每个人的眼光全望着他。他不慌不忙地一句句哼道：

“一片青山柴石水，前人种田后人收；后人收得

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朱暮堂平日无事，喜欢在家里吟诗弄画，有时自己也爱胡凑几句。可是筱堂他娘却是外行，对这些玩意没啥兴趣。但这首诗看来很神秘，和他们的命运攸关。她好奇地问：

“这是啥意思？”

“这是扶乩扶出来的，天机不可泄漏，不过给你们讲讲没啥关系。这首仙诗的意思说的很清楚，现在土改不顶事，那些泥腿子别忙高兴，以后会有人来，朱半天的地还是朱半天的。”

“真的这样吧？”她忍不住高兴得笑出声来了，这一阵子心里担忧的事可以不用发愁了。

朱暮堂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说：

“仙诗是这么讲的。”

仙诗是这么讲的，苏沛霖暗自思量这句话，他想最近老爷很慷慨又很镇定，原来其中有道理的啊！早知这样，他更可以放手替老爷卖力气了。朱暮堂在给自己制造幻想。接着散布谣言，假装是听来的：

“外边还传说：桃花开，蒋军来！”

苏沛霖脱口问道：

“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吗？”

“长不了！”他摆出很有把握的样子，这样好叫苏沛霖死心塌地给他卖命。

“啊！”苏沛霖又是惊又是喜。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桃花开了以后，看我的手段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老爷说的真对！”苏沛霖感到今后要更靠拢一些朱半天。

“那现在何必去看汤富海的脸色呢？”朱筱堂听了这些消息心里着实高兴。

“孩子，你要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现在在台面上，拉他一把，对我们有好处。”

“那是的，老爷，我明天一清早就去找汤富海去……”

“不必那么匆忙，过几天去也不要紧，办这些事不宜青天白日去，夜晚比较妥当，也不要自己打上门，最好是在路上偶然碰上，叫做不期之遇，拉到村外边角落里去谈……”

“老爷想的周到极了。”

“要让他晓得，别高兴的太早了，世道以后还要变的，那四句仙诗说的很清楚啊。他的头是铁做的，他就开会去。朱家和汤家是多年的东家伙计了，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哩。他有啥需要，我可以照顾他……”

“老爷对他太好了。”

“暮堂做人是很慈善的，他救济过的人简直数不

清啦。”

朱暮堂听筱堂他娘的话心里十分舒服，他捋着胡须注视苏沛霖。他发现苏沛霖最近行动很诡秘，虽说给他办事也还卖力气，但是有些胆怯，他不便点破，暗暗对他说：

“这回全靠你啦，汤富海不好对付，不过，你很干练，一定可以成功。只要汤富海在村里不带头闹事，别的人就好办了。”他眼睛望着大厅上那溜宫灯，想起过去光辉灿烂的日子，只要蒋介石回来，他依然会永远在梅村镇住下去，便对苏沛霖鼓励道，“你给我的事体办成功了，过了目前这一关，将来我要好好犒赏你的。”

“听了老爷的指点，我想一定成功。”苏沛霖心里在想：汤富海这个头可不好剃呀！

村子里的鸡在咯咯地啼叫。它呼唤着就要到来的黎明。朱筱堂不禁打了一个哈欠，站起来，对爹说：

“我们该睡了。”

“唔，该睡了。”

25

苏南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背着背包，带着雨伞，一

进了梅村镇，汤富海高兴得整个心儿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因为汤富海成份好，村里情况熟悉，有事好商量，土改工作队里有两个同志分配住在他家里。开过土地改革动员大会，村里每一个角落男男女女都热烈展开土地改革政策的讨论。讨论后，村里一批一批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参加了农民协会。汤富海早就参加了农民协会，现在是里面的积极分子。在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上，他是农民协会委员的候选人之一。他和其他候选人坐在一排木凳子上。他们背后也有一排木凳子，上面放了许多白底蓝花的粗瓷饭碗，一人背后一个。会员们手里拿着黄豆，看中了哪个候选人，就在他脊背后面的碗里投下一颗黄豆。汤富海背后的碗里有六百七十九颗黄豆，当选了农民协会的委员。

汤富海当上了委员，劲头更足，赶早带黑，在农会里和土改工作队同志一道儿办公，讨论问题，领导农民分组算过去地主剥削的细账。做完一天活，他回到家里，一路哼着新学会的歌子：

石头里头也会冒青，
荒山见面也有人影，
受苦格人要出头，

只要大家一条心。

阿贵听到歌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好奇地盯着爹看：

“你也唱歌？”

“老了，不能学吹鼓手？”

“我没听你唱过。”

“现在可听见了。我很喜欢这支歌子，工作队的同志都会唱。他们教我，我慢慢就会哼了。”

“我也会。”

“那好，我忘了，你就教我。这支歌子的意思很好。过去，我们各顾各的，没有连在一道，尽受地主的欺负，有苦也说不出。现在大家连在一道，成立了农会，讲话可响亮啦。人民政府给了我们大权，村里的大事得先问问农会。”

“还要问问农会委员哩。”

儿子一句话说到爹的心窝上去了。汤富海有点不好意思，哼了一声，说：

“看你能的，和你爸爸开起玩笑来了，没有个高低！”

“当委员的也不止你一个！”

汤富海瞪了儿子一眼，心里却很喜欢他，觉得他心眼儿灵活，见事，脑筋转动的飞快，手脚也快，庄

稼话做的蛮出色，是自己的好帮手，将来一定有出息。他忍不住把心里的喜悦流露出来了：

“孩子，我们吃尽了朱半天的苦头，过去眼泪只好往肚里流。你娘在世的辰光，想到根据地去讲理，可是路远，我们又离不开，现在解放了，盼来了共产党解放军。你说，啥人心里不高兴？”

“这倒是的。朱半天谁来都吃香，国民党时代，他是商团队队长；日本鬼子来了，他当伪区长；鬼子投降了，他又当国民党青年救国团的大队长。这回共产党来了，朱半天可吃不开啦！”

“那还用说！好容易巴望共产党来了，又等了一年多，土改队同志才进了村。现在，可以伸直了腰走路，闷在我肚里这口气可以吐出来了。”

“土改队进村好久了，爹，为啥还不下手？”阿贵没有参加具体工作，不了解土改队的打算，他以为土改队同志一进村，应该马上就向朱半天开刀，老不见动静，有点不耐烦了。

“同志们办事可有章程哩，土改不是耕地，一锄头就可以把土翻过来，这笔老账要仔仔细细的算啊，要登记村里的土地人口，公布土地人口清榜，学习划分阶级，评定阶级，三榜公布阶级成份……”

阿贵不等爹说完，拦腰插上去说：

“这些事体不是都办了吗？”

“最近就要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朱半天……”

“那可好呀，啥辰光开？”

“日子还没定，也不远了，正在准备着哩。”

“这有啥好准备？控诉朱半天，谁上台都可以讲他一大篇。”

“你说的倒轻巧，上台讲话，当着众人的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工作队的同志想找谁讲？”

“你猜猜看？”

爹有意不说出来，儿子猜了一个又一个，爹都摇摇头，最后儿子意识到了，指着爹笑嘻嘻地说：

“那么，是你……”

爹脸上满是皱纹的皮肤绽开了得意的笑容，一对老眼炯炯发光，像是枯萎的老树上忽然开放出青春的花朵。儿子走上去，把爹的手紧紧抓住，激动地说：

“真的是你吗？”

“谁给你说过假话？”

“得好好想想，朱半天的罪恶可多着哩，别漏了一桩两桩……”

“你不提醒，差点忘了，我要找工作队的同志先商量一下，怎么控诉，这一辈子还没做过这一行哩！”

爹说完话，拔起腿来，像一阵风似的，走了。

汤富海从农民协会走出来，村里家家户户的灯都熄了，只有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还在农民协会辛勤地工作哩。他在回家的路上，低着头，一步一步慢慢走去，心里在想刚才工作队同志的话。

一轮新月高高挂在墨蓝色的天空，清澈如水的的光辉普照着大地，照着汤富海，他的影子在泥土路上踉踉地移动着。一阵乌云逐渐从西边过来，遮住了新月，挡住了清冷的光辉，村子顿时陷入昏暗里。

汤富海忽然发现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一看：离他三尺远近有一个男子向他走过来，面孔却看不清楚。他问道：

“谁？”

“老汤，是我。”

汤富海从这熟悉的声音中辨别出那个人来了，说：

“苏管账，是你？”

“你别叫我苏管账啦，我不愿意再给朱老虎跑腿了。”

“为啥？”

“给地主做活，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汤富海在想这句话的意思，世道真的变了，连苏沛霖也不愿给地主做活了。他半信半疑地说：“朱半天不是很喜欢你吗？”

“他利用我。我过去不明世事，受他的骗，为了家里几口，给他卖力气，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啥地方不好混碗饭吃，为啥要听他摆布？我想另外找点事体做。”

“另外找点事体做？”

“唔，”他走上一步，和汤富海肩并肩亲热地走着，歪过头去说，“以后要靠你啦。”

“汤富海吃了一惊：

“靠我？”

“是呀！”

“我一个穷光蛋，有啥好靠的？”

“啊哟！别客气啦，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是外人。你以为我不晓得吗？你现在是农民协会的委员，村里的大权都抓在你们手里，你们说东，谁敢讲西？只要你言一声，还愁不给我一碗饭吃。”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汤富海口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热呼呼的，听的很舒坦，觉得苏管账真的变了。

苏沛霖早从汤富海的语调里察觉他心里的喜悦，便进一步说：

“老汤，你有啥事体，吩咐好了，我给你办。”

“我？”汤富海认真地朝自己身上望了一下，因为乌云遮盖了月光，看不大清楚；想他这一辈子尽听别

人使唤，给别人做活流汗，不管大小事体，都是自己动手。他有啥事体要苏沛霖这样的大人物做呢？他客气地说，“不敢当，没啥事体要劳动你。”

“今天没有事体，以后找我也可以。”苏沛霖把嗓子放低，贴近他的耳朵关心地说，“村里谣言很多，你听说没有？”

“谣言？”

“说国民党的兵舰已经开到上海吴淞口，美国兵要协助他们进攻上海，蒋介石要到上海过中秋节，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月光从那一大片浓厚乌云的空隙里泄漏一些下来，照着静静的村落。汤富海随着苏沛霖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快走到村边。苏沛霖借着那一片月光，看汤富海的脸色忽然变了，板着面孔，知道他内心有点愤怒，就没再说下去，听他怎么说。

汤富海头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心里想：日日巴、夜夜巴，好容易巴望到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真的又要回来？朱半天还会得势？他不相信这一派胡言，显然是坏人造谣，站了下来，歪过头，注视着苏沛霖说：

“别听那些谣言。”

“我看也不像真的，共产党解放军早就占领了上海，他们会不把吴淞口的口子守住？蒋该死几百万大

军给解放军打败了，要回来，没那么容易。”

汤富海愤怒的脸色慢慢消逝了，泛出一点红润的光泽，说：

“我也这么想。”

苏沛霖把话又拉回来说：

“不过，这回有美国帮忙，事体也很难说。”

“这个，……”汤富海没有说下去。

“虽说是谣言，留点后路，不管蒋该死回来不回来，反正不吃亏。”

汤富海思索他这些话的意思。苏沛霖见汤富海默默地不言语，估计他的话也许起些作用，便乘势再加一把力：

“老汤，村里还有谣言哩，说今年改地主，明年改富农，后年改中农，改完中农改贫农。土改以后日子也不好过，缴公粮富农要缴一百二十斤，中农要缴七十斤，贫农要缴三十斤。分了田的一定要多缴公粮，缴不出的也要缴，满五亩地的就要缴累进公粮……”

汤富海狐疑地望着泥土地上的月光，他想土改工作队同志说的和苏沛霖的不一样，他们曾经学习过的《土地改革法》也和苏沛霖说的不一样，这是哪能一回事呢？他问苏沛霖。苏沛霖想了一阵，说：

“当然是工作队同志说的算，我听到那些，想来

一定是谣言。”

“对，坏人造谣。”汤富海冷静地想了想，肯定地说。

“现在听话要留心，不能上坏人谣言的当，老汤。”苏沛霖设法收回他的话。

“那些地方坏蛋一定会造谣破坏的。”

“是呀！”苏沛霖改了口，试探地说。“有人说共产党说的好听，就是常常变卦，分了地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他们两人走到村边的十字路口，这时月光又完全给乌云遮住了，苏沛霖见汤富海没有言语，以为给他说动了，便拉着汤富海朝右边的一条下地的抄道走，靠着一家人家的灰墙站了下来，进一步低声试探地说：

“有人说，留点后路好……”

汤富海听苏沛霖的话越说越不对头，觉察出今天晚上苏沛霖的态度有点奇怪，忽然对他这么亲热，啥原因呢？要提高警惕，不能上他的圈套。“留点后路”是啥意思？苏沛霖要留啥“后路”？对他的话需要仔细听听，看他究竟耍的啥阴谋。他不露声色地听他说下去。

“我倒有个主意……”苏沛霖的声音更低了。

汤富海把头就过来，凝神地谛听：

“啥主意，……”

“朱半天现在正是倒霉的时候，在村里谁也不理他，连我也离他远远的，不多加小心，说不定啥辰光把我们连累上。”

“那当然。”

“可是蒋该死一回来，这梅村镇又是朱半天的天下啦！”

汤富海忍下心中的愤怒仔细在听。苏沛霖紧接着说：

“你和朱半天是多年的东家伙计的关系……”

“有这回事。”

“你现在要是暗中帮他一把，将来他对你一定有好处。”

“你现在要是暗中帮他一把，”汤富海了解苏沛霖今天晚上和他亲热的用意了。要我帮朱老虎一把，汤富海暗自冷笑了一声，觉得苏沛霖这条狗腿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朱老虎把汤富海一家弄得家破人亡，血海般的深仇没报，现在救星共产党来了，正是他报仇雪恨的美好的日子到了，却在太岁头上动土，要他帮仇人一把，不禁火冒三丈，恨不能马上给苏沛霖一顿老拳。他两手真的紧紧攥着，但没有揍苏沛霖。他想起了苏沛霖下面那句话：“将来对你一定有好处”，看上去朱老虎和苏沛霖商量好了，要苏沛

霖拉他下水。他竭力按捺住心头燃烧般的怒火，想了解他们打的坏主意，表面保持平静地问：

“暗中帮他一把？”

“你是农民协会的委员，土改的事体你应该照样办，不管谣言怎么说，土改总是好事……”

汤富海认为这些话没啥不对的地方，他听苏沛霖说下去：

“农民斗地主也是应该的，你也要去参加……”

汤富海心里说：“我岂止参加，还要带头，领导大家一道斗朱老虎哩！”

“朱半天有些事体，只有你晓得的最清楚，你不说，村里没人晓得……”

苏沛霖说到这里，望了汤富海一眼，看他面孔没有表情，不晓得汤富海听懂他话里的意思没有，也不晓得汤富海同意不同意这样暗中帮朱半天一把。汤富海见他没说下去，不置可否地问：

“这样暗中帮朱老虎吗？”

苏沛霖急于把事体办好，以为汤富海心中同意了，就连忙说：

“是的，你这样暗中帮助，一不影响土改，二没人晓得，三是朱半天领情，他不会忘记你的帮助的，”苏沛霖看汤富海一直没有吭声，他的胆子也大了，进一步说，“最近朱半天就想分点地给你……”

“分地给我？不要！不要！”汤富海警惕地一口回绝。

苏沛霖马上把话拉回来：

“地主的地当然不能要，老汤，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要是送点粮食给你，我觉得……”

“哪能？”

“可以考虑。”

“考虑？”

“唔，粮食是四大财产，反正要分的，你受了许多苦，又是委员，应该多分点，这又不像土地那样显眼——没地方藏；粮食藏的地方可多着哩，谁也不晓得粮食是谁的。”

“你说的容易……”

苏沛霖看汤富海像是有点意思了，他毫无顾忌地说下去：

“这么一来，你就保险了。”

“这就保险了？”汤富海暗中好笑。

“是呀，现在你保护一下朱半天，国民党回来，朱半天保护你，这是双保险。”

“双保险？”汤富海思索苏沛霖这句话，望着村边茫茫的夜雾，他感到惊诧，怎么和苏沛霖走到这里来了？苏沛霖谈的很久，原来为的是这个呀！想起早一会儿土改工作队同志的话，要提高警惕，防止地主破

坏土改，这话一点不错，想不到朱老虎和苏沛霖胆大包天，竟然活动到他的头上来了。但这也好，一方面暴露了朱老虎的罪恶面目，一方面也给全镇敲了警钟。他要马上回去向农民协会和土改工作队负责同志汇报，同时应该回去快点准备控诉朱半天才是啊！他气生生地说，“我不要朱半天保护！”

苏沛霖一听他口气忽然变了，不知道是啥原因，正要问他究竟，他拔起腿来，径自走了。苏沛霖赶上一步，恳求地说，

“老汤，有话慢慢谈呀！”

“我还有事哩！”汤富海瞪了他一眼。

“有啥事体？”苏沛霖追上去问。

“你别问！”汤富海头也不回，匆匆走了。

26

徐总经理一走进朱瑞芳的卧房，马上给她拉到靠窗户的红木小圆桌面前，两人肩并肩地坐在红木靠背椅上。她放低了嗓子，呼吸很急促，小声地说：

“不好了，乡下出了乱子！……”

“啥乱子？看你这样大惊小怪的！”他十分沉着，

感到今天瑞芳的神色有点异乎寻常。

“这个乱子可不小——暮堂给抓进去了！”

“啊！暮堂他……”他也忍不住吃了一惊，早几天就听到一些儿风声，说乡下在闹土地改革，报上可没消息，和乡下也很少来往，没料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体。他怀疑地问，“是不是他的老脾气又发作了，欺负农民？伤害了人？”

“你这话说到啥地方去了，义德，我哥哥自从解放以后，可老实啦，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蹲在家里，啥事体也不出头露面，也从来不打人不骂人，怎么会伤害人呢？”

“为啥抓进去？”

她把今天上午乡下来人说的情形，详详细细给他复述了一遍，不断摇头，叹息地说：

“世道变了。共产党是个笑面虎，进上海的时候，说什么一切照旧，连国民党的人员也包下来；现在可好，共产了，把地给分了，连地契也烧了！”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的政策，这个倒是早就说过的。”

“你别胳膊朝外——帮共产党说话，我就没听说过。我听人家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现在算是灵验了，共地主的产了。……”

“共产党早就颁布了土地法，对江南一带还算是

客气的，不然早就动手了。”

“还算客气的，你说的倒好听。乡下闹翻了天：汤富海那些泥腿子在台上指手划脚，把朱家的祖宗八代都给骂遍了，成了个啥世界？在万人大会上，共产党尽听泥腿子的话，哪里有暮堂说话的地方？可怜我哥哥辛苦了一辈子，才积聚下这些田地，一下子都叫泥腿子给分了，连牛呀家具啥的也不剩下，这啥地方有个王法？”

“你说话小声点，隔墙有耳！”

“我就不怕，共产党就是有三头六臂，道理总要讲的。没有王法，天下就大乱了！”

“共产党信什么王法，人民政府自己立法，共产党说的算。”

“那我们就没有讲话的地方了吗？”她望着卧房里那一套红木家具，红木的大玻璃衣橱斜对面是一张特制的新式的双人红木床，给一床天蓝色的缎子盖罩盖着，上面绣的是飞天。床头两边的红木小立柜上各有一盏台灯，是红木雕花的；靠窗户的那个梳妆台也是红木的。这一套红木家具是朱暮堂特地定做，给朱瑞芳陪嫁的。她看到这些家具，就好像看到朱暮堂一样，伤心地说，“暮堂就这样让他们抓去吗？……”

“共产党要抓，那有啥办法？”

“那我哥哥就这样完了吗？”

“这个……”他没有说下去。

她意识到会有不好的结果，忍不住幽幽地哭泣起来了，边哭边说：

“义德，你要想法子搭救搭救我哥哥……”

他从朱暮堂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共产党今天这样对付地主，明天可以同样对付资本家。本来，瑞芳卧房里这一套红木家具，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色泽，红润而又发亮，非常牢固，仿佛用一辈子也不会变样，现在使他感到不知道在啥辰光这些家具连同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就不再属于徐义德的了。他好像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席卷无锡乡下的辽阔的原野，越过沪宁线，正向上海郊区冲击，动摇了他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

她哭了一阵，见他坐在红木靠背椅上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啥，嗔怒地问道：

“我哥哥的事，你一点也不动心吗？”

“谁说的？”

“那我要你想法子，为啥不吭气？”

“这……这……”他恍然想起她刚才的话，说，“我正在想哩。”

“你想出啥好法子来了吗？”

“好法子，不是一下子能够想出来的。”

她把眼睛一瞪：

“你究竟想了没有？”

“当然想啦，”他现在真的在想，等了一会儿，说，“区委统战部杨健部长这个人很和气，我们工商界有啥事体找到他，只要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他倒是肯帮忙的，不晓得这件事体怎样。”

“那一定也肯帮忙，你快去找他吧！”

“这事情不好随便找，要好好想一想，”他觉得突然去找杨部长有点冒失，万一不肯，不但碰个大钉子，说不定讲徐义德包庇地主，可吃不消啊！他说，“区里头寸怕不够……”

“找市里？”

“上海市委方面，人头不熟……”

“那就不找吧，让我哥哥死在牢里好了。”

“不，不，一定要想办法，我，我正在动脑筋哩，”他用右手肥肥的食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辩解地说，“我并不是不想法子，我是想找一个妥当可靠的法子，否则不起作用，也是白费心机。我想，这事发生在无锡，一定要在无锡托人情才好，……”

“你是想推到我娘家身上吗？无锡除了我们朱家以外，尽些些穷亲戚穷朋友，共产党来的那帮子新人，谁也不认识。”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

她脸上露出了笑意：

“谁？”

“有位马慕韩，是上海工商界的红人，同无锡党政方面的首长很熟，今天晚上有个聚餐会，可以碰到他……”

“那就找他吧。”她感到哥哥有救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说，“那你快去吧！”

他看看窗外的太阳老高，玻璃窗户上反射的阳光把屋子里的红木家具照得亮堂堂的，闪闪发光。他说：

“还没到辰光。”

朱暮堂有救了，她想到嫂子和侄子：

“乡下这样乱法，嫂子他们老是蹲在乡下也不是个办法，你看，要不要把嫂子和侄子他们接到上海来住？”

“接到上海来住？”他愣了一下。

“唔。”

“上海……也是共产党的天下，……”

“城里究竟比乡下好些。”

“这个……共产党的事……很难说……”

“我晓得你怕，不敢让嫂子和侄子他们来！”

“你让他们来好了，让他们住我家里，看我怕不怕！”

“真的吗？”她没想到他这样干脆，主动要嫂子侄子来住。

“当然真的。”

“那我马上就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接到信就来……”

她站了起来，准备去写信。他稳稳坐在那儿不动，说：

“朱暮堂在狱中，要不要有人照料照料？”

“有苏沛霖他们。”

“你刚才不是说朱家那些佣人佃户都变了心吗？他们肯照料朱暮堂？”

“你说的倒也有理，那就让他们暂时在乡下住着吧。”

“我倒希望他们能来我这里住下，”他心里想：现在乡下闹乱子可以住到城里，将来城里闹乱子，住到啥地方去呢？早想办法，还来的及，不如搬到香港去住，省得担这份心事！把厂搬走，没有这个可能；全家走，也容易引起共产党注意；他一个人走，把三个老婆都撂下？舍不得。马上申请出境，也不是一天能够办到。纵或一时离不开，香港总是一个退路。最近徐义信没有信来，叫他放心不下。守仁也没消息，更是不像话，这孩子一定白相野了，把娘老子放到脑壳背后了。他得安顿安顿，写封信给弟弟，要他好好经

营，管教管教这个小畜生，万一上海风声紧了，他想法去香港，也有个立足之地。他同情地说，“他们在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

“是呀，我想去一趟，看看他们。”

“你自己去？”

“唔。”

他想了一想，转弯抹角地说：

“你能去一趟，亲自看看他们，当然很好，就是这个时机不好。暮堂给抓到牢里，谁晓得有啥别的原因，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一定要调查有关的人，你自己找上门去，万一牵连到你身上，连累我们徐家，那可不好！”

“我不去看看，放心不下。”

“你说的对，连我也想去看看他们，可是，辰光不对头，不去吧，又不放心，真是左右为难……”他皱起眉头，在想香港的新厂，怎样可以快点发展起来。

她见他为难的神情，说：

“你别发愁，这样好了，我不去，你看，叫老王去一趟哪能？”

“叫老王去，唔，这也是个办法。”他不好再不同意，但也不完全同意，掉转话题说，“不过，他去哩，作用不大，看看他们是可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想

办法把暮堂弄出来。”

“你说的对，天色不好了，太阳都下去了，你快去找马慕韩去吧。”

“好的，我去换身衣服。”

“我叫老王准备准备。”

他走出卧房的门，又回过头来，不放心地说：“他走以前，让我交代他几句。”

27

“他今天又来了。”

林宛芝说完了，对徐总经理嘟着嘴。

徐总经理诧异地问道：

“谁？”

“谁，还不是冯永祥，除了他还有谁？”

“他来了，有啥大惊小怪的？”

“我讨厌他。”林宛芝不高兴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去，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把东边那扇窗户完全打开，一阵风吹来，把她额角上一卷头发吹起，披在淡淡的眉毛上。她转过身来，斜对着壁炉上面的美国电影明星嘉宝的照片，把披下来的头发理好，用夹子

夹起。

冯永祥是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徐公馆来的。最近冯永祥几乎是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头几次还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道来，近来只是一个人来了，甚至不到一个礼拜就又来了。这个礼拜一刚来过，今天才礼拜二，便又来了。一来，他总想法找到林宛芝，谈起话来没就有一个完，言语像是一条长长的河流，絮絮叨叨流不尽。

冯永祥总是挑林宛芝爱听的讲。今天他十分关怀地对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工商界家属里，是数一数二的……”

她给他捧得心里痒痒的，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脸蛋儿红红的，谦虚地说：

“冯先生过奖了。”

“我说的完全是实话，一点也不恭维你。”

“我算得啥，工商界家属里比我强的人多的很哩。”

“这件事，老实说，我比你清楚。”他说这句话倒的确真实的。冯永祥不但在上海工商界里是红人，而且在工商界的家属里也是闻人。不管是哪位工商界巨头的年轻太太，只要有啥事找到他，不怕他哪能忙碌，一定遵命照办，并且办得保证使你称心如意。他

自己绝对不嫌麻烦。他在工商界里不但尽力拉拢一批资本家，连资本家的家属也在他的网罗之内，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提高地位。对于徐义德这样的实力派和林宛芝这样出色的人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并且要特别下些工夫。他说：“你啊，真是数一数二的……”

他伸出大拇指来，在她面前赞扬地晃了一晃。

“不见得。”

“你别不信，真的，我不说假话，”他留神地向东客厅外边看了看，见静静的没有一点人声，他便走到她跟前，说，“你聪明，你漂亮，你能干……谁也比不上你。”

“啊？”

她惊喜地望着他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情，口头上虽然不承认，但也不否认。她觉得他真正是她知心的人，只有他才发现她这些好处，也只有遇见他，她才第一次被人这样赏识。不过见他走近跟前来，感到有些惶悚。她的身子有意往双人沙发的角落上靠紧，好跟他保持较远一点的距离。

他会意地追近了一步，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同情地说：

“可惜你老是蹲在家里，像笼子里的小鸟，晓得外边的事情太少了。”他见她听了这几句话低下了

头，知道已经打动她的心弦，又加重语气地重复了一句，“太少哪！”

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在徐公馆里的安逸、舒适的生活，使她忘记了外边的一切；也可以说徐义德用安逸、舒适的生活换得她抛弃外边一切的活动。她自己原来也有一个理想。她家里勉强勉强供给她读完了中学，就再也不可能满足她上大学的愿望了。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到沪江纱厂总管理处当打字员。她不安于这个工作，还希望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她第一天上班，徐义德就注意到她美丽的面孔和苗条的身材，亲自不断分配她的工作，有些并不是一个打字员份内应该做的工作，也叫她做了。慢慢她变成总经理的私人秘书了，经常一同进出。不到两个月的工夫，他和她发生了关系，答应供给她读大学。不久，她的愿望实现了，是沪江大学夜校的一年级生了。每天下了班，她就挟着书包到圆明园路去读大学了。她并不真的喜欢徐义德，也不满意给徐义德骗上了手，为了职业和学费，她不得不和徐义德维持暧昧的关系。她等待大学毕业，找个适合的对象，然后离开徐义德，远走高飞。她上课不到两个礼拜，就成为班上男同学注目的中心，其中有个李平同学，人长得很魁梧，年纪和她仿佛，特别和她亲近，她哩，也不讨厌和他往来。一学期没有读完，徐义德发现这件

事，立刻和她谈判：要末，她马上离开总管理处，随她和李平这家伙到啥地方去，从此断绝和徐义德的关系；或者，她和李平断绝往来，干脆搬进徐公馆去住，打字员的事体也不必做，以后有机会再上别的大学。徐义德知道李平家庭经济不富裕，这样一逼，她一定很服帖地倒在自己的怀里。果然，为了将来能再上大学，她答应搬进徐公馆，成了他的第二位姨太太。可是徐义德开的将来让她再上大学这张支票，至今没有兑现。她提过几次，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推迟，怕她再遇到第二个李平。在徐公馆安逸、舒适的生活里她的意志逐渐给消磨了。近来听冯永祥给她谈的外边姐妹们的一些活动情况，发觉老是蹲在这幢花园洋房里有点儿腻味了。现在年纪大了，功课也早忘了，大学当然考不上，即使想法进去，功课也赶不上了，可是她也不愿意这样下去。她有时甚至想离开徐义德，特别是上海解放以后，不想再过姨太太的生活，可是到啥地方去呢？她想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希望从徐义德那儿得到一些外边的情况。徐义德每天回来很晚，见了面总不给她谈正经。在徐义德的眼睛里看来，她是不必要知道外边那些事体的，他当然无须乎讲给她听。根据徐义德腐朽的人生观来说：这样的舒适而又安逸的生活难道还不满足吗？再有别的要求，完全是多余的。他一天到晚在外边忙碌，

回到家里来需要的是体贴和安慰，也就是享受。这就是他的三位太太的责任，特别是林宛芝的责任，因为他心爱的就是林宛芝。

她也低沉地叹息了一声，隔了半晌，说：

“我何尝不想多晓得一些外边的消息哩。”

“只要你想听，我可以讲给你听。”

他向前走近了两步。

“怕你太忙了。”

他见她答应了，大胆地挨近她的身旁，轻轻拍拍她的肩膀，亲密地说：

“不，只要你愿意听，你要我啥辰光来，我就啥辰光来。”

她的肩膀像是忽然触了电，不自然地跳动了一下。她坐在双人沙发的角落上已经让无可让了，可是冯永祥越靠她越近，她怕外边有人走进来，看见了不像话，连忙客客气气地说：

“请坐……冯先生。”

听到“请坐”两个字，他还以为是让他坐到她的身旁，接着听到很客气地称呼他冯先生，又把他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远，再一注意她的表情，是她的右手指着对面的沙发，知道是误会了她的意思。他并不走开，又试探地拍了她一下肩膀，若无其事地说：

“随便谈谈，没啥关系。”

“冯先生，请坐到那边谈。”

他嘻着嘴，问：

“一定要坐到那边才可以谈吗？”

她见他站在自己跟前不走，“唔”了一声，就坚决地站了起来。他怕弄僵了，连忙放下笑脸，嘻嘻哈哈地说：

“好，好好，遵命坐下。”

他立刻坐到她对面的单人沙发里，跷起二郎腿，轻松愉快地摇了摇，说：

“这样行吗？”

她见他这股顽皮劲，也笑了，说：

“行。”

他谈了许多工商界活动的情况，特别着重谈了一些他和政府高级干部见面的情况，其中掺杂了许许多多的新名词。她听的又有兴趣又有点焦急：有兴趣的是那些事从徐义德那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焦急的是他的话匣子在她面前打开，好像永远不会完似的。连催促他三次，他才站起来告辞。她和他握手分别时，他又紧紧握着她的手很久不放，眼睛毫无顾忌地注意着她的一对眼睛，意味深长地说：

“再见。”

她觉得他的举止有点儿奇怪。徐义德从朱瑞芳那里过来换衣服，她就向他表示对冯永祥的不满，不

料徐义德毫不在意。她想把今天冯永祥对她轻浮的举动详详细细地告诉徐义德，迟疑地说不出口，想想，还是应该对徐义德说，便道：

“他……”

她还没有讲下去，就叫徐义德拦腰打断了，受宠若惊地说：

“我晓得，他又来看我了。今天是礼拜二，我要约朱延年一道去参加，说不定是他准备陪我们一道去的。你为啥不多留他一会？”

“多留他，”她噘着嘴，说，“他要走，我有啥办法。”

徐总经理仍然坐在沙发里，觑着眼睛在欣赏林宛芝那一对明亮动人的眼睛，一边轻轻地问：

“你为啥讨厌他？”

“你不晓得，”她现在想起：假使把刚才的情形老老实实告诉徐义德，可能引起徐义德的误会，便简单地说，“他一来了就不走，死皮赖脸的坐在那里。”

“那也没啥，冯永祥你可不能得罪他，他虽然无产无业，可是华丰毛纺厂的董事，永泰烟草公司副经理，又是工商联的委员，是工商界的红人，哪一方面都兜的转。所以有些厂店都希望请他挂个董事、经理的名义，情愿他拿干薪不做事。他是我们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也是我们工商界的代言人。你晓得，我参加

星二聚餐会就完全是靠他的大力支持。将来我们有许多事体要重托他，要倚靠他。别人请他也请不来，现在他自己常到我们这里坐坐，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林宛芝走到梳妆台前面凳子坐下，拿了一把小镜子照了照刚才被风吹得有点乱蓬蓬的头发，用梳子理了理。她拿起美国的密丝佛陀唇膏涂了涂嘴唇，想起了冯永祥，有意表示不满地说：

“我讨厌他。”可是她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嘴上还是说，“我也没啥事体要求他。”

“你不能这样讲，”徐总经理晓得她不高兴冯永祥，怕她真的得罪了冯永祥，那对他的事业和前途是不利的。他站了起来，走到林宛芝旁边，扶着她的肩膀，温柔地说：

“我可有事体要找他，我的事体不就是你的事体吗？我的事业做大了，前途更有发展了，还不是为了你，还不都是你的。”

“哟，”林宛芝回过头来，用左手的食指指着徐总经理的腮巴子，那指甲上艳红的蔻丹就像是徐总经理腮巴上的一个大的红痣，“看你嘴甜的。我是你的第三房，你的产业将来还不是大的，徐守仁的，同我林宛芝没有关系，我也不做那个梦。”

“你又是这一套！”

“我也不是明媒正娶的，人家看不起。”

“谁讲的？”

“自然有人讲的，二的不说，大的还会不说明么。我跟了你就不倒霉，整天要听不三不四的话，吃人家的眼下饭，受人家的脚板气。”

“这都是你自己多心多出来的，谁不晓得我最喜欢你。大的没死我怎么好扶你的正，给你讲过不止一遍了，你倒忘了。”

“我怎么会忘记，”林宛芝嘟着小嘴，对着镜子里的徐总经理说，“就是大的死了，还有二的哩，我们这种人，命里注定是这等货！”她伸出自己的小手指说。

徐总经理的肥胖的手指指着镜子里的林宛芝说：

“你整天只是闹啥大呀小的，现在是文明时代，不分大小，我要是死在你的前头，在遗嘱上写清楚大部分财产给你，这总算满意了吧？”他用手抚摩着她雪白细嫩的腮巴子，他的嘴轻轻地吻着她刚才梳好的头发。

“我没那福气。别把我放在胳肢窝里，人家心上有个我，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她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总经理一眼。

“小丫头，尽调皮。”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

整个心都给你了，还不满意吗？”

“别灌我的迷汤了，不忘记我就好了。”她仰起头来望着站在她背后的徐总经理，伸出四个手指，说，“人家说你有了第四房呢？”

“少瞎三话四，没有的事。”

“我听说棉纺公会有位江菊霞，是什么执行委员，又是女老板，能文能武，开起会来能讲话，提起笔来会写字，做的一手好文章，拜倒在她脚下的有好几位，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

说到这儿林宛芝有意停下来，徐总经理有意好奇地问道：

“谁？”

“你猜猜看。”

“我不管人家这些事，你说是谁？”

“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徐义德！”

徐总经理用手轻轻捏了一下她的腮巴子：

“死家伙。”

“啊哟，”她从他面前闪开，说，“没有就没有，捏我做啥？捏得我真痛。”

“好，好好，”他抚摩着她的腮巴子，说，“不痛了吧，算我不是。”

林宛芝霍地站了起来。徐义德整理一下有点皱了的白衬衫，穿上西装外套，看了看手表，说：

“时间到了，我要约朱延年到星二聚餐会去。”

林宛芝把他叫了回来，拉到梳妆台的大镜子跟前，说：

“你看！”

徐总经理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头发有一绺披下来，奇怪地问道：

“真糟糕，头发怎么乱成这副样子？”

“别急，我给你梳梳。”

林宛芝给他梳好。他对镜子照照，然后向楼下走去。

林宛芝坐在梳妆台前面凳子上，发现自己的头发也有点乱了。她拿起绿色的塑胶梳子在头上梳过来又流过去。

28

徐总经理的汽车开到汉口路吉祥里停了下来，连揷了两下喇叭。朱延年从弄堂里走到汽车那儿，打开车门，问徐总经理要不要到福佑药房去坐一会。徐总经理摇摇手：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早点到还可以和他们多聊

聊。有些会员早一个钟头就去了。”

“早点去好。”坐在徐义德左边的梅佐贤说。

“那就去吧。”

朱延年跳上了汽车。徐义德问他：

“你晓得暮堂出事了吗？”

“姐姐对我说了，”他漠不关心地说，“这种人，我晓得，迟早要出事的。”

“你不能这样讲，也太不幸了。”徐义德叹息了一声。

朱暮堂虽然是无锡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可是朱延年从他那里，除了借到五十两金子以外，再也没弄到啥油水。也不管朱延年宣告破产以后怎样没落潦倒，他得不到朱暮堂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援助。他听利朱暮堂被抓的消息，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高兴。因为是姐姐要他去，他不得不应付一下。在姐夫面前，他不禁流露出内心的喜悦，轻描淡写地说：

“地主吗，共产党来了，当然要土改；不过，他为人太厉害，人缘不好，自然要吃些亏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亲戚，得给他想点办法。”徐义德想起早一会朱瑞芳的忧虑，给朱暮堂惋惜，希望朱延年也给他出个点子，说，“听说他在土改以前还准备分些地给你和你姐姐哩！”

“他啊，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会分地给我们？还

不是看着要土改了，地保不牢了，想摘掉地主的帽子，把地分散。我才不希罕他这个人情哩！”

“你说的倒也有理。”

“早些日子他又送来十石米，我本来不要，他们硬要我收了，这两天正准备退还给他，谁晓得他出事了。”

“天有不测风云，……”

徐义德看马路上的人像水一样的流过去，想了想，说：“不过，能够给他想法还是尽点力好，你姐姐一定要我找人说说情，你看，今天去了，找啥人好？”

徐义德想要朱延年先找马慕韩开口，探个路子，然后他看情形，再往下说。朱延年懂得他的意思。他自己固然不愿意帮朱暮堂的忙，但是他没法叫别人不帮朱暮堂的忙，何况是姐姐和姐夫哩！看在姐姐和姐夫的面上，落得做点顺水人情，表示也关心的神情，说：

“说来说去，亲戚总归是亲戚，我和他一笔也写不下两个朱字。提起朱暮堂来，我心里当然很气，不过，他出了事，也得救他一把。照我看，你找找冯永祥，他是工商界的红人，人头熟，行情熟，门路熟。他准有办法。”

“对。”梅佐贤附和他的意见。

“冯永祥，”徐义德默默念着这三个字，考虑了一会，说，“对，找他试试看。直接找他谈好不好？”

梅佐贤察觉总经理的意图，接上去说：

“我先和他谈谈看。”

“好的。”徐义德顺便说道，“听说马慕韩无锡方面熟人不少……”

朱延年怕再给梅佐贤抢先，连忙说：“那我和他谈。”

“也好，今天人多，怕找不到机会，你们谈的辰光不要勉强。”

说话之间，汽车已经开进了思南路。

星二聚餐会的会址在思南路路东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徐总经理参加了星二聚餐会以后，他深深觉得他的脉搏和上海工商界的重要方面的脉搏一同跳动了。每次聚餐会上他都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新闻他比一般工商界朋友早知道；有些事体和工商界朋友一道商量商量，学习学习，确实比一个人闷在写字间里办厂要高明得多，而且在这里可以听行情，领市面。但他感到有些情况知道的还不够及时与具体，他的熟人不多，接触面不宽，深交的尤其少，他把梅佐贤拉进去还不够，就想到了朱延年。他从信通银行金懋廉经理那方面知道：自从沪江纱厂担保福佑药房开了透支户头，福佑从来没有透

支过，并且开了户头没几天就存进四亿款子，以后经常有一二十亿进出。福佑还了债，生意也做大了。徐总经理对朱延年另眼看待，想拉他进星二聚餐会。一方面可以做他的助手，沟通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表面也是对朱延年的提携。他和冯永祥做朱延年的介绍人，上一次星二聚餐会批准朱延年入会。今天他带朱延年去参加。

汽车在星二聚餐会的大门里停下来。这一幢相当宽大的花园洋房是大沪纺织厂董事长王怀远的住宅，上海解放以前他去了香港，一直没回来，房子老空着，星二聚餐会成立的时候，马慕韩商得大沪纺织厂经理的同意，借做星二聚餐会的会址。他们两个人向里面走去。朱延年看见一位三十上下的青年，穿了一身笔挺的天蓝色的西装，天蓝色中间隐隐露出紫红的细条子。胸前打着一条白缎子领带，上面绣着几朵大红牡丹花，脚下的黑皮鞋和他的头发一样：闪闪地发着亮光。那青年两手高高举起在鼓掌，一边走着一边大声叫道：

“徐总经理驾到，欢迎欢迎！”

他走上来热烈地和徐义德握手，然后把手伸向朱延年：

“这位是朱——”

徐总经理说：

“是朱延年。”

他紧紧握着朱延年的手：

“哦，我一猜就猜中，朱经理，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他心里说：想不到朱延年在上海滩上又站起来了。

徐总经理在旁边给朱延年介绍道：“这就是冯永祥先生。”

朱延年立时显出钦佩的神情，嘻着嘴说：

“这一次参加聚餐会，承你和徐总经理介绍，很感激，以后还请多关照。”

“没问题，没问题，”冯永祥拍拍自己的胸脯，望了望徐义德，说，“包在我身上，有事老兄尽管提，小弟一定遵命，照办无讹。”

梅佐贤凑趣地捧冯永祥一句：

“只要冯先生答应了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他接着谈朱暮堂的事，但冯永祥开口了，没有机会插上去。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冯永祥照例谦虚两句，接着就露出得意的口吻，“不过，小弟在上海滩上倒确是有点小苗头。”

他迈着台步，口中念着“得得锵，锵……”领着他们两位走进右边一座客厅，他掀起落地的紫色的丝绒帷子，曲背叫道：

“请！”

冯永祥让他们两个走进去，他自己留在帷子后面，在听里面的声音。

徐义德把朱延年介绍给金懋廉，朱延年紧紧握着他的手感激地说：

“久仰久仰，姐夫介绍小号在贵行开了透支户头，我早就想拜访你了，因为穷忙，还没有机会见面。”

“多承照顾我们的生意，……以后在这里见面的机会多了。”

里面一阵介绍握手之后，一位女性发出黄莺一般的轻盈的声音问道：

“咦，阿永呢？”

冯永祥在两个帷子之间伸出一个头去，像是李慧冲的魔术似的，他学那位女性的声音，娇滴滴地问：

“阿永呢？”然后用自己本来的声音答道，“阿永在这里。”

“哟，”那位女性用手向冯永祥的头一指，大家的眼光都跟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她说，“阿永在变戏法了。”

冯永祥走出来，站在紫色丝绒帷子前面，像是对台下的观众讲话似的说道：

“变个戏法，给诸位大老板娱乐娱乐，散散心，还不好吗？”

“好，”那位女性领头鼓掌。

大家都鼓掌欢迎。冯永祥拱起两手向客厅里四面作了一个揖：

“谢谢各位的捧场。”

信通银行经理金懋廉坐在沙发上打气道：

“再来一个。”

“好，再来一个。”柳惠光坐在上面角落上的沙发里热烈响应。

冯永祥趁势下台，走到紧靠着客厅的帷子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他跷起二郎腿，一摇一晃地说：

“现在要欢迎我们的江菊霞小姐表演了。”

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那位女性的身上。朱延年站在徐总经理旁边，他没吭气，在看徐总经理的举止，好确定自己怎么样表示。徐总经理叫好，他叫好；徐总经理叫再来一个，他也叫再来一个。现在徐总经理的眼睛一个劲盯着江菊霞，他也细细望着她。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丝绒旗袍，下摆一直拖到银灰色的高跟皮鞋的鞋面上，两边叉角开得很高，二分之一的大腿露在外边；上身还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羊毛背心，一个玛瑙制的凤凰别针别在胸口，头发是波浪式的，正好垂在肩膀那里，右边的鬓角上插了一枝丝绒制的

大红的玫瑰花。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浑身闪闪发光。朱延年早就风闻到棉纺公会有位江菊霞执行委员的大名，想不到真的是叫人见到以后一辈子也忘怀不了的人物。怪不得林宛芝在吃她的醋哩。徐总经理和朱延年看江菊霞看呆了，幸亏江菊霞张口了：

“我没有阿永的天才。”她微微一笑，向大伙点头，表示感谢大家的盛意。

“别客气了，我们的菊霞小姐，”冯永祥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他指手划脚地讲，“现在我来给各位介绍介绍。我们的菊霞小姐，是上海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大新印染厂的副经理，史步云先生的表妹，上海工商界的有名人物。她是沪江大学商学院的高材生。江菊霞还有个名字：Marry Kiang，翻译出来就是江玛琍，解放以后不用了。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根基也不错，写的一手好文章。她的关于劳资关系的大作，经常登在《新闻日报》上，是有名的劳资专家。另外，布置一个会场，主持一个大会，交涉一件事体，只要菊霞小姐一出面，没有一个不是马到成功，办得漂漂亮亮。要是开大会少一个人讲演报告，你请菊霞小姐去，包你满意：她一登台，立即吸引了会场上的人注意，别人都把自己心里的事忘了，在看她。等她一张嘴，乖乖龙的冬，会场鸦雀无声，只听见菊霞小姐黄莺一般的声音歌唱似的在报告。别的

人是一表人材，我们的菊霞小姐是两表人材，能文能武，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诸位看：是不是应该请菊霞小姐表演？”

徐总经理说：

“应该应该。”

他这一句话既捧了江菊霞，又捧了冯永祥。朱延年跟着说：

“应该应该。”

江菊霞斜视了徐义德一眼。徐义德身上热辣辣的。

金懋廉说：“我们的菊霞小姐，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就来一支吧。”

江菊霞伸出雪白的右手来，向大家做了一个停止的姿势。大家静下来，她说：

“阿永又瞎嚼蛆了，大家别听他那些，还是随便聊聊天吧。”

“聊聊天？”柳惠光凑趣地说，“这一关过不去吧？”

冯永祥不待别人表示意见，他立刻站在当中号召：

“今天不能放过菊霞小姐，一定要表演一个节目，大家欢迎不欢迎？欢迎的鼓掌。”

大家的掌声催着江菊霞。她没有办法，心生一

计，站了起来。大家以为她要表演了，都安静下来。她慢吞吞地说：

“实在不会，让我先去学点啥，下次一定表演。”

“不行。”这是徐总经理的声音。

“你又凑啥热闹，义德。”江菊霞指着徐总经理不客气地说。

冯永祥抓住这机会哄开了：

“徐总经理为啥不可以凑热闹？请菊霞小姐报告他们两个的内幕。”

江菊霞一看苗头不对，她不得不让步了：

“啊哟，阿永，别再闹了，我马上表演；好不好？”

梅佐贤叫：“好。”

江菊霞唱了一支英文歌，算是交了卷。紫色丝绒帷子那边走过来一位穿白制服的侍者，他手里的红木托盘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酒。冯永祥挑了一杯威士忌，他把杯子举着对大家转了转：

“让我们来欢迎徐义德和朱延年两位新会员，”他说出了嘴，又连忙更正，“不，我说错了，徐义德已经是老会员了，朱延年是今天头一次参加，我们欢迎他，请徐义德做陪客。”

坐在沙发里的江菊霞和其他会员都站了起来，向朱延年敬酒。朱延年一饮而尽，把空杯子的底向大家照了照：

“谢谢各位。”

冯永祥又想出了新的点子：

“来，现在该敬我们的菊霞小姐一杯，谢谢她的美妙的英文歌。”

“阿永，不要闹了，等歇吃饭再喝吧。”江菊霞酒量虽然不小，但敌不过冯永祥。她的口气有点求饶了。

“吃饭再说吃饭的话，德公，你说，对不对？”

冯永祥的话徐义德自然赞成：

“对，对极了。”

“不能喝了，我脸都红了。”江菊霞装腔做势地有意轻轻摸了一摸自己的腮巴子。

“你的脸，”冯永祥指着她说，“原来就是红的，不怕。”

“实在不行。”江菊霞一边说一边移动脚步，向冯永祥旁边走来，她企图溜出去。

“那么，随便喝一点。”冯永祥还没有发现她的企图，用杯子对着她。

那个穿白制服的侍者走进来，站在冯永祥的旁边说：

“开饭了，请各位到那边用饭。”

“等一等，”冯永祥想叫江菊霞喝了这杯酒再吃饭，他说，“我们干了这一杯就来。”

“是。”

“为我们的菊霞小姐干杯！”

冯永祥笑嘻嘻地转过身来找江菊霞，没有人应，徐义德朱延年他们站在对面忍不住笑了。冯永祥很奇怪，他向四周一看：在他的身后，有一条黑影子晃了一下，闪出去了。他发现江菊霞溜走了，匆匆追出去，说：

“站住，干了杯再走。”

江菊霞发出银铃一样的胜利的笑声，她的橐橐的高跟皮鞋声慢慢远去。

29

在餐厅里。一张长的西餐台子上铺了雪白的台布，当中放了两瓶粉红的和杏黄的菊花，盛开着。十多个人围着台子坐了下来，朱延年紧坐在徐义德旁边，冯永祥、梅佐贤坐在徐义德斜对面，今天人到不齐，冯永祥旁边还有空位子；江菊霞有意离开徐义德远远的，她坐在上面，在主席座位的左边。今天轮到潘信诚担任主席。穿着白制服的侍者送上来冷盘之后，潘信诚说：

“今天调调胃口，吃罗宋大菜，不晓得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冯永祥叉了一块粗大的红腻腻的香肠，吃着说：“信老办事总合我们胃口的。”

“那倒不见得，阿永，”潘信诚笑着说，“不对，还请指教。”

“确实不错。”

“我们今天改变一种方式，”星二聚餐会是委员制，七个委员轮流主持每次聚餐会，每次总是先聚餐，吃玩玩，然后谈正经。上次聚餐会上有人提出谈正经的辰光太严肃，不活泼，不如一边吃一边谈。吃中菜这样谈比较困难，今天改吃西菜，换一个方式试试。潘信诚说，“接受上次建议，边吃边谈。”

江菊霞头一个赞成：

“好。”

没有一个反对的。冯永祥站起来，举着杯子，说：“先干一杯，酝酿酝酿。”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拥护。干了杯以后，冯永祥又开口了：

“现在该我们的主席——信老发表高见了。”

潘信诚是通达纺织公司董事长，他今年虽还不到六十，办纺织厂却已经有了三十年的经验。

上海解放前两个月，他把自己经营的企业给三

个儿子分了：大儿子管棉纺厂和印染厂；二儿子管毛纺厂、麻织厂和丝织厂，他认为这方面是有发展前途的；小儿子管庆丰面粉厂和永丰碾米厂。他自己呢，坐上飞机，到香港去了。过了几个月，从儿子的来信中看出共产党解放上海以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温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有工商界的代表当委员。特别是《共同纲领》，他在香港读了又读，心里安定了。他觉得不应该在香港当白华，应该回来和几个儿子一道办厂。

十二月，他回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市场很活跃，私营工商业还有发展的余地，物价并不十分稳定，尤其是粮食，这是政府最大的弱点，粮价经常往上跳。穿衣吃饭人生两件大事，潘信诚是最有兴趣的，也认为在这方面最有把握的。他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心里打算再多挣点钱留给子孙，便集中头寸，开始扒进粮食。粮食越涨，他扒的越快也越多，到了旧历年关，他吃足了三万担。他等待新年开红盘，让粮价再往上跳一阵，然后在适当时机他才考虑抛出。

人民政府从徐州、芜湖运了大批粮食到上海。红盘开出来了，往回跌，粮商继续买进；市场上要多少，公家抛多少，而且粮价一直稳稳往下落。粮商喂饱了，粮价还是徐徐往下落。这辰光，粮商吃不消了，只好大写。潘信诚手里的三万担不得不忍痛抛出去。

他栽了这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真行，连管理市场也有一套，过去任何政府对上海的两白一黑^①，从来是没有办法的，人民政府也能解决了。他感到过去那种经营作风吃不开了。这件事，除了他三儿子和几个经手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他再也不敢随便向市场上伸手，凡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他知道，一定要照办，工商界只好拥护。有时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态度。凡是政府的事问到他，他都说好，城府很深，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讲的话，工商界朋友都很尊重。他的几间厂由几个儿子分别掌管的也不错，他就不大到公司里去，也很少出来走动，老是待在家里。不过星二聚餐会，他是每次必到，而且很守时。他和这般工商界朋友谈得来，有些年青后辈虽然比较浮夸，往往轻举妄动，他看不顺眼。但来了，和大伙聚聚，聊聊天，可以散散心，听听行情。

“阿永，你怎么‘将’我爸爸的‘军’呢？”说这话的是潘信诚的大儿子，潘宏福，通达棉纺厂和通达印染厂的经理。他想替爸爸解围。

“他总是钉着我，”潘信诚半闭着眼睛，幽默地

① 两白一黑：指米、棉花和煤。

说，“叫我下不了台，要我好看。”

冯永祥慌忙站起来，拱拱手，赔礼道：

“不敢，不敢。”

潘信诚微微笑了笑。他早就有了准备。因为今天聚餐会轮他主持，他提早一小时来，和马慕韩他们初步交换过一点意见，心中有了数。他望了冯永祥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道：

“阿永真会想点子，出题目给我做文章。”他想起昨天大儿子宏福给他谈的检验的事，说，“那么，先谈谈棉纺等级检验问题吧，大家觉得哪能？”

“听说棉纺业最近很关心这个问题，谈谈也好，”金懋廉说，“我没有意见。”

“金融界真是消息灵通，冯永祥说，“棉纺业的事体也清楚。”

“那当然，银行里哪行哪业的事都清楚，尤其是我们的懋廉兄。”柳惠光说。他曾经向金懋廉轧过头寸，知道金懋廉对西药业也了解。

“但是比我们永祥兄差的远。金懋廉一句话还过去，冯永祥不言语了。

“好。”徐义德插上去说，“最近花司^①为了促进棉纱的品质，提出检验分等的办法。别的厂我不晓

^① 花司：指上海花纱布公司。

得，就我们沪江纱厂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应该凭商标分等级，商标是我们各厂多年努力的结果，不管是飞马或者是双鱼，在市场上有多年的信用，这就是等级。凭商标等级最好了。我们要一致反对花司这个检验分等的办法。”

江菊霞点头称是，碰一碰潘董事长，说：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她伸出细嫩的胳膊向台子上的粉红的菊花一指，来加重她的语气，“据公会方面接触到的厂方来说，这两天大家都为这件事议论纷纷，除了个别没表示态度以外，几乎是全体反对花司的办法，他们要求棉纺公会出来撑他们的腰，正面向花司表示态度：干脆不同意。”

“不能同意。”潘宏福的通达棉纺厂的机器是新旧参半，产品质量不高，当然怕检验。

“对呀。”这是大家的声音。

朱延年立刻想到发往苏北的那二百磅的酞剂，如果也像棉纱这样一检验，那不是等级问题，而是真假问题，就很严重了。他紧张地说：

“反对检验。”

大家不知道他的话里包括也反对检验药品。在大家一致反对声中忽然有人这样说：

“这件事体要仔细考虑，不应该简单地反对。花司这次提出来是为了促进棉纺品质，这一点我们反

对不得，一反对，我们就没有道理了。检验分等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等级高的工缴高，等级低的工缴低，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我们办厂的应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我同意检验分等。”

大家听了这一番议论，暗暗吃了一惊，视线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坐在大餐台子的尾端，恰巧和潘董事长面对面，他的父亲是上海棉纺界的有名人物，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喜爱钱财，青年的时代就在钱庄里当学徒。他父亲生平相信阴阳先生，遇事求神问卜，曾经有一位相面先生看了他父亲的面相之后，说：“从气色上，不宜读书做官，但将来地位高于道府，可是无印。名利双收，一路风光。”这虽是几句无稽之谈，他父亲私下却很高兴，拚命钻研《美国十大富豪传》，找发财致富的门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见纱厂赚钱，就和朋友合作，开办了兴盛纱厂。当时美国为推销机器，纱厂设备可以分期付款，他们乘此机会添了一万纱锭。这样一帆风顺，逐渐发展，加上他父亲深深懂得若要发，工人头上刮的剥削妙诀，锱铢必计，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积蓄了不少钱，把朋友的股票吃过来，兴盛纱厂就成了他家唯一的大股东。这个厂发展到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是具有十万纱锭的现代化的纱厂了。上海解放不满一月，他父亲因病过世，

这份产业就落在儿子手里。这青年担任了兴盛纱厂的总经理，但他对于办纱厂却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还不到两年，满脑筋里尽是些远大计划和个人的抱负，束缚在一个十万纱锭的纱厂里，他并不满足。他自己常说：希望在人民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虽不能名扬天下，也盼望荣宗耀祖，乡里知名。他最初对办厂没有多大兴趣，后来经过朋友劝说，告诉他：要想有个一官半职，首先要搞好经济基础，办厂就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这才扭回头来关心厂里的生产。他姓马，叫慕韩，工商界的人叫他小开。

徐义德仔细研究了马慕韩的意见，见大家不发言，他笑嘻嘻地望着马慕韩说：

“慕韩老弟，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德公。”马慕韩严肃地望了大家一眼，露出很相信自己见解的神情，说，“大家研究。”

“棉纱等级检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等级如何划分？其次是如何检验？谁来检验？检验不对怎么办？既然等级检验，那我们多年努力结果的商标还要不要？老实讲，在座没有一个外人，我们这些私营厂大半设备不全，管理不善，机构臃肿，出的产品难免高低不一，常常要搭配点次货，如果选样选到次

货检验，那别的纱就要连带降级。这个亏我们吃不起，这个本也赔不起。”

潘宏福支持徐义德的意见：

“德公的话有道理。”

“对呀！”几乎大家都同意徐义德的意见。

潘董事长老成持重，不大随便发表意见，他当时没有表示态度。但大家知道潘宏福的意见就可以代表他的。马慕韩一边听徐义德说一边摇头：

“这样的话，我们私营厂就应该要增加设备，改善管理，精简人事，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江菊霞说：

“说的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能做到这样，恐怕就不是私营厂了，”她学徐义德的口吻叫了一声：“慕韩老弟。”

马慕韩立刻还过来一句：

“菊霞大姐，”他这一叫，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却很严肃地说下去，“解放以后的工商业家应该和解放以前的工商业家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厂永远停留在落后的地位，要进步。要想做一个新时代的工商业家，我们首先要把厂办好。”

徐义德忍耐不住，他又说了：

“现在不是学习会上谈理论，《共同纲领》要是下礼拜才学，那时候唱高调很容易，大家都会。这是实

际问题，这是钞票问题。每个厂都有二三十年历史，少的也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改善不是很简单的事，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事。共产党的主意好是好，只是太急了一点。没有钞票，赔不起本，进步不起来。”徐义德话里暗暗指马慕韩这位小开，不在乎钞票，当然可以大谈进步。

“你说的不对，德公。”马慕韩坚持自己的意见，反驳了他一句，“进步也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主要看思想。一个人的行动是由他的思想支配的。思想落后，有钞票也进步不起来。”

“不过进步太快了，工商界朋友们追随不上，也无法高攀。”

“进步不进步，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总不能叫别人不进步，等着奉陪……”

徐义德听了这几句话实在忍受不下去，他的脸变色了，慢慢泛红了。冯永祥一看情势不妙，恰巧侍者送来了热呼呼的牛排，一股香气扑向人们的鼻子，他端起一杯威士忌来打圆场：

“啊哟，一谈正经就这么严肃，弄得我昏头昏脑，实在吃不消。”他无产无业，对大家谈的检验问题没有兴趣，有意扭转大家的注意力，说，“来，来来，大家先干一杯。”

大家举杯于了。冯永祥用叉子按着牛排，一刀切

开，里面还有一丝丝的血，吃了一口，很嫩，他说：“今天的牛排确实不错，德公，我们两人再干一杯。”

徐义德又干了一杯。

从餐厅外边走进来一个矮矮小小的瘦子，他的脚步很轻，一直走到大菜桌子旁边，才首先被冯永祥发现，他高声叫道：

“仲笙兄今天怎么迟到了，来，来来，我这儿正好有个空位子，请坐请坐。”

那瘦子向桌上的人一一含笑点头，然后坐到冯永祥隔壁的空位上。冯永祥马上给他斟满了一杯白兰地，说：

“无故迟到，罚酒三杯。”

“阿永，你饶我一次，我还空着肚子呢，三杯白兰地下去要醉倒的。”

“你是智多星，自然有办法。”

“实在不行。”

潘信诚给他解围：

“仲笙，那么，你先喝一杯好了。”

那瘦子马上举起杯来，向大家晃了晃，微笑地说：

“我奉信老之命，敬各位一杯酒，——先干为敬。”他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对大家抱歉地弯弯腰，坐

下去。

冯永祥不好再说，但总觉得意有未尽，想出个点子，开他个玩笑。他眼睛一动，知道朱延年不认识他，便站起来说：

“延年兄，我还没有给你介绍呢，这位是唐仲笙先生，”他指着那个矮矮小小的瘦子说，“别看他人长得矮小，可是人小心不小，一肚子诡计，短小精悍，聪明绝顶，有名的智多星。《共同纲领》他可以倒背如流，又是税法专家。他是东华烟草公司的大老板，最近市面上风行一时的仙鹤牌香烟，就是他老兄出产的名牌货。”

“不敢当，不敢当，”唐仲笙谦虚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大老板，尤其是在各位面前，不过在华东有点小股子，都是靠在座各位的提携。”

“你不是大老板？我说错了吗？”冯永祥问自己，隔了一会改口道，“你是大老板中的小老板，对不对？”

唐仲笙觉得符合自己在星二聚餐会的身份，微微点头：

“这倒差不多。”

冯永祥按上去补了一句：

“可是在小老板中你又是大老板。”

“那倒不见得。”唐仲笙摇摇头。

“妙句妙句，”潘信诚赞不绝口，对冯永祥说，“你真会讲话，越来越聪明活泼了。阿永，来，我跟你干一杯。”

“不敢当，”冯永祥给自己杯子斟满，对潘信诚举起，说，“我敬信老一杯。”

他们两人干了杯。冯永祥坐下去，指着朱延年对唐仲笙说：

“我忘记告诉你了，这位是福佑药房经理朱延年兄。”

冯永祥一不开口，餐厅里顿时就静下来了，只听见刀叉碰着磁碟子的音响。唐仲笙吃了一点菜和汤下去，肚子有了底子，想站起敬朱延年一杯酒，头一次见面，要联络联络感情。他看到大家低头在吃菜，有的手里拿着刀叉在想心思，料想他来以前一定是争论一个啥问题还没有解决，给他进来打断了。他识相地没有敬朱延年的酒，歪过头去，低声问冯永祥，刚才是不是在谈啥问题，冯永祥用叉子指着他说：

“你真不愧是个智多星，啥事体一看就晓得了。”

冯永祥扼要地把刚才讨论棉纱等级检验问题给他讲了讲。

大家心中在考虑棉纱等级检验问题如何解决。徐义德考虑到马慕韩在上海棉纱界的地位和势力，不能够和他决裂，却又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沪江

纱厂如果检验，一定是乙级纱，很难达到甲级。这样一件纱要差四个单位，一万件就是四万个单位，算人民币有一亿多呢。他怕别人与花司妥协，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假如花司一定要棉纱等级检验，那我们全部把商标扯掉，看他在市场上怎样出售？”

“这是一个好办法。”朱延年赞成他姐夫的意见，说，“这事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不能答应。”

潘宏福放大声音说：“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潘信诚怕局面再弄僵不好收场，他打断了大儿子的话，说：

“我们心平气和地研究，大家利害关系是一样的，要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对付花司。”

潘宏福勉强闭住了嘴。

马慕韩深知自己的厂设备比较好，出产成品质量高，如果检验，可以升级，对兴盛纱厂是有利无弊的，而且公开拥护政府措施，更可以落一个进步分子的美名。他针对徐义德的意见，解释道：

“检验等级划分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产品质量好，也不怕选样，选哪一件纱都是一样，重要问题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检验。花司委托华东纺织管理局试行检验，我们棉纺公会指派两名工程师去参加检验和选样工作，工程师的津贴由我们出，问题不就

是解决了吗？”

马慕韩这么一说，有的人倒动了心，江菊霞也赞成。

“这个办法妙，名义上花司检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检验自己。徐总经理，你不要怕你的纱降级了。”她微笑着望着徐义德，欣赏他整整齐齐的头发，乌而发亮，没有一根白发。

“那倒不是为了沪江纱厂一家，我是考虑到我们同行的利益。我不是为个人打算。”

“徐总经理是从全局考虑的。”朱延年说。

“谁不是从全局考虑？谁为个人打算？”马慕韩瞪了朱延年一眼，旋即顶了一句。

冯永祥插上去说：

“又来了！大家不要抬杠了，请我们的信老做结论。”

潘董事长听他们的意见，看当时的趋势，他早有了一个腹稿，经冯永祥一邀请，就毫不推辞，站起来说：

“慕韩、义德的意见都有理由，大家的希望我也了解，但都没有照顾到我们棉纱界各方面的情况，也就是没有照顾到各厂的具体情况。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确实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给花司交涉也就不可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我们给花司交涉

起来，要有统一的口径，不然自己乱了步伐，谈判是不会成功的。是不是这样：一般的照商标，个别纱好的厂照等级，请大家考虑考虑。”

大家冷静地考虑了一下，都不断地说这个办法好。潘宏福也认为爸爸的意见确是高明，既照顾了通达厂，又照顾了大家，不像自己的意见那么偏。只是马慕韩没有表示赞成，他本来想在政府面前表现一番，拥护花司的措施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遭到以徐义德为首的反对，他也不好再坚持，那样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孤立。潘信诚提出个别纱好的厂照等级，这句话就是照顾他的。他也满意。这样政府可以看出毕竟马慕韩是和一般资本家不同的。所以，他没有表示反对，但提出棉纺公会仍旧应该指派两个工程师去参加等级检验和选样工作。潘信诚问大家：

“你们觉得哪能？”

他的眼光却落到徐义德的身上，征求他的意见。徐义德明朗地表示了态度：

“这个，我同意。”潘信诚望了大家一眼：

“大家同意，那就是江菊霞小姐的事了。”

江菊霞说：“这点小事交给我就得了，我到公会去一趟，不劳各位操心……”

她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侍者轻轻地走到潘董事长旁边，对着他咬耳朵。潘信诚立即放下手里的刀

叉，站起来说：

“北京来长途电话，我去接一接就来。”

唐仲笙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包二十支装的仙鹤牌香烟，向上面江菊霞那边扔了一包，自己打开另外一包，抽出来敬他座位左右的人，刚才没有机会敬朱延年的酒，现在首先敬他一支仙鹤牌，一边说：

“这是小号的出品，请各位赏光尝尝，多多指教指教。”

朱延年吸了一口，他还没有辨别出这个烟的味道，就连忙赞扬道：

“这个烟真不错，他不讲仙鹤牌，我还以为是白锡包呢。”

“过奖过奖。”唐仲笙谦虚地说，“不过小号存了点叶子，这里面倒是掺了点英国叶子。延年兄是老枪，一抽果然就晓得了。”

经他一宣传，朱延年又抽了一口，才真正辨别出有这么一点点英国烟味道。他望见马慕韩坐在长台子尾端，讲话不方便，没机会谈朱暮堂的事，走过去又有点儿唐突，只好坐在那儿又抽了一口烟。

徐义德勉强抽了一口就放下来了，觉得这烟味道太刺激，一点不醇，比他抽的三五牌差远了。他从刚才的争论看出聚餐会的重要，显得棉纺公会反而软弱无力，在公会里有些问题不能集中商谈，也不方

便公开研究。他自己在公会里没有一个适当的实际位置。他趁潘信诚去听长途电话的空隙，借机会提出他的意见来：

“今天讨论很好，我们棉纺界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够大胆说话的地方。不过，有些事聚餐会不能出面，要通过棉纺公会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不晓得对不对，说出来，请诸位指教。目前公会领导方面不强，同业中比较能干的人要‘脱产’来干公会，要像纺织工会那样。我们棉纺公会各部要由老板来担任，这样阵容强大，办起事来就顺手了。”

江菊霞首先附和：

“我也有这个意见，在公会办事总觉得别扭，许多执行委员经常不去，公会下面的几个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委员会老板们挂了名也不掌握，像公营代表一样，根本不大来。做实际工作的人就感到有力无处用。”

“是的，”冯永祥右手拿了一只油炸子鸡的腿，边吃边说，“公会不加强不行，解放以后办事体都要靠组织，组织搞不好，事体很难办。棉纺界在上海本来是很有地位的，目前的情形，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叫做：势力雄厚，阵容不齐。慕韩兄以为如何？”

他用鸡腿指着大餐台子尾端的马慕韩。马慕韩喝了一口可口可乐，思索地说：

“力量是有点分散，组织起来确实才有力量。健全了组织，还得加强学习，加强领导。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得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共产党走。”

他说完了，暗暗看了徐义德一眼，那意思是说：凡事要提高一步看，用旧眼光来办厂，现在是吃不开了。

徐义德懂得他眼光的意思，他说：

“那当然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跟共产党走怎么成。我们聚餐会每两个礼拜学一次《共同纲领》，就是为了学习共党政策，跟共产党走啊。不过，我们工商界也有我们工商界的立场，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他心里想，马慕韩这青年究竟是学生子出身，想法太单纯了。他本人不是办厂起家的，对于办厂的苦心经营不了解，没有尝过酸甜苦辣，就不知道这个滋味。他说，“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总归是民族资产阶级。公会要为我们私营厂服务。要把棉纺公会变成‘私营纺管局’，我们就有力量了。”

“私营纺管局，妙，妙，真妙！”潘信诚不在，潘宏福活跃起来了，指手划脚地赞不绝口。

“这个局长谁当呢？德公。”冯永祥很有兴趣地问。

“我看最好是现在北京开会的史步云，或者，我

们的潘董事长也可以。”江菊霞抢着替徐义德回答。

“爸爸要当局长？”潘宏福心里按捺不住高兴，笑了，又怕给人识破，矜持地忍着，半笑不笑。

马慕韩冷笑了一声，讽刺地说：“那 we 有两个纺管局，也有两个局长了。”

“那辰光，我们菊霞小姐是私营纺管局的办公室主任。”冯永祥说。

江菊霞斜视了冯永祥一眼说：

“阿永，你又吃豆腐了。”

“你放心，”冯永祥说，“局长还没有发表，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暂时当不上。”

在座的人都嘻嘻哈哈笑了。潘宏福对江菊霞叫了一声“江主任”，见爸爸回来了，就没有说下去。

潘信诚匆匆从外边走进来，也不坐下来歇一歇，就急着说：

“刚才是史步云来的长途电话，他在北京出席全纺会议，听到政府要稳定纱布价格，决定统一收购纱布，他晓得今天是我们聚会的日子，就打长途电话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他好代表棉纺界在北京表示态度。各位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他今天等我的长途电话。”

这消息一宣布，刚才轻松愉快的谈笑，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餐厅里静悄悄的，窗外传来秋风吹落树叶的沙沙声。

徐义德的心情像是被吹落的树叶，感到有点失望。政府统一收购棉纱，自由市场没法活动，沪江纱厂系统的棉纱无法自由买卖，即使驻厂员方宇送来更好的关于税收的消息，也不可能一次获得很多的利润。一般利润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照他的意思应该反对统一收购，但是商不能同官斗，要是上海花司意见，还可以钻钻空子：依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争取纺管局，打击花纱布公司。如果不行，还可以上告中央。但这是中央的意见，就有点棘手了。

很久没有一个人喷声。徐义德默默地望着面前的那盘没吃完的油炸子鸡。本来今天的鸡很嫩，味道也不错，他现在好像突然倒了胃口，吃不下去了。

潘信诚见大家不言语，就对徐义德说：

“我们的铁算盘，你倒算算看，我们对统一收购应该表示一个什么态度？”

徐义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

“铁算盘，电算盘，千算万算，经不起老天爷一算。”

冯永祥看徐义德那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气，鼓励他道：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上海棉纺界总应该有个决策。德公，你先提个意见，大家商量商量。”

徐义德用他肥肥的手指在敲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慢慢地说：

“中央决定统一收购，我看，我们地方上没法反对。凡是共产党提出来协商讨论的问题，十有九是一定要办的。他们做法比国民党高明，事先打通我们思想，要我们答应做，还要我们服帖。这就很厉害。我看，我们索性主动提出统配统销的意见。现在各厂原料供应不足，资金周转又困难，市场销路受限制，不如把‘包袱’丢给政府，向政府要原料，向人民银行要资金。销路给了政府，我们自己只问经营管理。政府口口声声要私营企业发展，我们不怕政府不照顾，看政府怎么办好了。我们打这个算盘，你们以为怎么样？”

朱延年听了徐义德这一番道理，衷心佩服徐义德。他的眼光对着徐义德，露出仰慕的神情。本来他想接着给徐义德帮腔，因为刚才马慕韩瞪了他一眼，他不好再说，只好暗中表示完全同意。

梅佐贤在听这些大老板高谈阔论，自己保持着沉默，一直没做声。听徐义德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他伸过头去，讨好地小声地对徐义德说：

“这子鸡不错，你饿了吧，快吃一点，别冷了。”他巴结地送过去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子，又加了一句，“这个要吧？”

徐义德摇摇头，他无心吃子鸡。

江菊霞也佩服徐义德的见解：

“德公的意见对，真不愧是我们的铁算盘。”

“这个办法妙！”智多星唐仲笙也举手赞成。

马慕韩这次和徐义德的意见一致：

“我也同意德公的做法。政府既然决定了，我们就乐得漂亮点。利润多少随政府给，看政府给多少。只要政府拿得出，我们就收得进。”

“对，办事要漂亮。”这是冯永祥的声音。

潘信诚看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他默默计算星二聚餐会能够控制同业的锭子的数字，差不多有七十万左右，史步云代表上海棉纺界在北京全纺会议上答应下来，回上海不会出啥大问题。他问大家还有意见没有，大家说没有，他就说道：

“那我们主动接受统一购销的办法，要史步云代表我们在北京表示态度：拍板。”

“好。”大家异口同声说。

徐义德补充道：

“我们在统一购销上让了步。在工缴上要采取攻势。告诉步云兄，他在会上可以谈一谈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上所规定的官利八厘问题。这样可以衬托出我们棉纺业的当前利润太小，要求解决工缴的计算公式，争取我们在工缴问题上的胜利。”

“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大家一定同意。”潘信诚的眼光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有异议的。他把侍者叫了进来，很兴奋地说：“你给我挂北京史步云的长途电话，加急，我有要紧的事给他谈。”

“是。”侍者应了一声，就连忙走了。

30

沪江纱厂工程师韩云程听完徐总经理的报告，马上从沙发里站起来说：

“刚才总经理报告下个月和花纱布公司订立的合约，其中代纺计划和开锭数，我个人都没有意见，认为可以完成的。总经理说代纺的二十支纱当中要掺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黄花衣，我看有问题，这样一定影响质量。是啵？”

韩云程工程师问坐在他侧面靠背椅上的郭鹏。郭鹏是沪江纱厂的工务主任，一个纺织专科学校没有毕业的穷苦学生，在厂里从书记工做起，慢慢爬上来，上海解放以前，升了工务主任。早两天梅佐贤碰到他，鼓励他好好努力，争取将来可以当个工程师。他同意韩工程师的意见，答道：

“掺这许多黄花衣，自然影响质量。”

“有啥影响？”徐总经理坐在大写字台面前急着问，他的手按着胸前的玻璃板说，“黄花衣不错啊，梅厂长花了好大气力才买来的。”

坐在徐总经理对面的梅佐贤会意地答腔道：

“是啊，我跑了许多趟数，好不容易才买到这花衣，不然车面空缺，花衣脱节，就要关车。”他好像刚买到花衣，露出很吃力的样子，用劲抽了一口香烟。

梅佐贤几句话说到徐总经理心里，他欣赏梅佐贤的口才，赞扬地望了梅佐贤一眼。其实黄花衣买起来非常的容易，只要梅佐贤去一个电话，要多少有多少，价钱便宜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比一号破籽还贱。梅佐贤根据徐总经理的指点，所有沪江纱厂的存籽都卖给信孚记花行，这些破籽经过信孚记花行的梳棉机梳一梳，再用硫磺一熏，清理一下，就以黄花衣的名义卖给沪江纱厂，信孚记成了徐总经理私人的分号。每次缺花衣，最初总是到处买不到花衣，等到再买不到花衣第二天就要关车的紧急当口，梅佐贤把黄花衣买来供应。这是一个秘密，除了徐总经理和梅佐贤以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韩工程师虽不知道底细，却有点发觉，他不满意地说：

“这种花衣当然很难买，拉力、长度和色泽还不如一号破籽……”

韩工程师无意说到黄花衣不如一号破籽，梅佐贤听的大吃一惊，手指一松，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香烟掉到地上。他弯下腰去取。徐总经理却安然不动，仿佛不知道这回事一样，惊奇地问：

“黄花衣不如一号破籽？韩工程师，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问郭主任。”

郭鹏点点头。

徐总经理立刻放下脸，生气地质问梅佐贤：

“你这次黄花衣在哪家买的？”

“信孚记。”

“为啥还不如一号破籽？”

“我看的样品不错么！”梅佐贤努力回忆当时采办的情形说。

“这样不好的花衣，以后不要买他家的。现在厂里存的黄花衣多不多？”徐总经理明知上次进的五百担黄花衣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他有意装腔做势问一声，“要是多的话，退回去。”

郭鹏说：“用的差不多了。”

“那就算了。”徐总经理瞅了韩工程师一眼，见他没有发觉自己的秘密，就把话收回来说，“以后买信孚记的花衣要仔细选选，不要上人家的当，佐贤。”

“晓得了，总经理。”梅佐贤懂事地应了一声。

韩工程师还没放弃自己的意见：

“掺用百分之五还可以，掺到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不能保证质量。”

郭鹏附和韩工程师的意见：

“质量确实成问题。”

“质量问题，”徐总经理想起棉纱等级检验问题，棉纺公会根据星二聚餐会的意见向花纱布公司正面交涉，暂时取得了胜利：一般厂按照商标，个别厂按照等级。质量即使差一点，只要调配的好，贴上商标，照样卖出去。他很有把握地说，“质量差一点那也没有办法了，凭我们的商标，卖出去，我看是没有问题。”

“那影响我们厂里牌子的信用，”韩工程师担心他的荣誉和过去努力的成绩会遭受到不可容忍的损害。人家买到这样的棉纱，一定问：是哪个厂的呀？那个厂的工程师是谁呀？怎么出这样的棉纱？他直率地说，“这样对我们的厂，对总经理怕不利吧。”

徐总经理看他态度那么认真严肃，就像他平常在厂里试验室工作一样，一丝一毫不马虎，不轻易苟同别人的意见。徐总经理用他就是这一点，但对徐总经理也是这个态度，徐总经理就不高兴了。徐总经理本要当面训他一顿，想想自己道理并不多，韩工程师忠心耿耿工作也是为了沪江纱厂啊。他不再和韩工程师谈了，他以总经理的身份说：

“一定要搭配黄花衣，至于是否影响质量，有啥不利，只好随他去。”

韩工程师见徐总经理这样下决心，料想再说也没有用处了，他便紧闭着嘴。徐总经理见韩工程师没有表示态度，料想他心里还不完全同意，有意把脸转过去，不看韩工程师，避免正面和韩工程师冲突，却注视工务主任郭鹏的神色。郭鹏的眉头有点皱起，那样子并不赞同徐总经理的意见，却又犹豫地不敢正面提出异议。梅佐贤见机想缓和有点紧张的局面，他说：

“总经理决定了，我们一定照办。”

韩工程师瞪了梅佐贤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右手的胳膊碰一碰坐在他后面的会计主任勇复基，暗示他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勇复基是一位怕惹是生非的守本份的会计师，与自己无关的事他绝不过问，就是关系到自己，也宁可退让一步，与世无争的。韩工程师碰了他一下，他很紧张，生怕被徐总经理和梅厂长瞅见。他连忙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门上的毛玻璃写的四个字：总经理室，装得仿佛不晓得刚才韩工程师碰他的样子。但是徐总经理早看到了，他问勇复基：

“我们的会计主任有啥意见？”

勇复基站起来谦虚地说：

“没有啥意见，没有啥意见。在生产技术上我是外行。”

徐总经理故意逼他一句：

“同意啵？”

他不假思索地说：“同意，唔，同意。”

“下个月开始执行，”徐总经理撇开韩工程师，他直接吩咐郭鹏。

“好，”郭鹏不得不答应，他旋即想起一件事，说，“黄花衣究竟是一种啥花衣呢？栈房报单怎么写呢？要是花纱布公司问起来，怎么回答呢？”

徐总经理给郭鹏一提醒，他沉思了好久，没有想出办法，便盼望大家出个好主意，笑嘻嘻地说：

“这倒是一件麻烦事，大家想想看……”

郭鹏怕往后查出来，一定要连累到自己头上，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

“搭配这许多黄花衣，确实是一个问题，希望总经理最好再考虑考虑……”

徐总经理每个月的下旬，照例把厂里的主要负责人找到沪江纱厂总管理处的总经理办公室来，名义上是改进业务和改善厂务，实际上是秘密商量下一个月的生产计划，研究用啥方法使下一个月获得更多的利润。谈完了，总经理就请大家吃一顿，算是酬劳。过去，每次谈的都比较顺利，徐总经理有些措

施，大家听了心照不宣，默默地照他的意见做。今天谈的搭配黄花衣问题，因为花司要等级检验，目前虽反对掉了，将来一定要实行的。徐总经理看准了这个空子，想狠狠地捞一票，自然影响到质量方面。韩工程师有意见，他是料到的；郭鹏也有意见，却是出乎他的意外。郭鹏是在沪江纱厂一手培养出来的，公然提出异议，徐总经理非常激动，他两腮下垂的肌肉有点颤抖。他知道不施点压力是不能制服郭鹏的，更不要说韩工程师了。他立即板起面孔，把眉毛一扬，说：

“我用不着再考虑了，花衣不够用，只好买黄花衣来调配。因为用棉量高，车面空缺，花衣脱节，前后纺脱节，关车责任由工务上负。”

梅佐贤望着郭鹏说：

“你……”

“我？”郭鹏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

徐总经理接着说：

“代纺纱不能按时交清，取不到花纱布公司的花衣，也要工务上负责……”

郭鹏听到徐总经理这样逼他，他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嘴里只是结结巴巴地说：

“这，这这……”

勇复基感到空气太紧张，生怕自己卷到这个漩涡里。他低着头，一点也不敢吭气。韩工程师知道徐

总经理这一番话不单是针对郭鹏说的，同时也是讲给他听的。他心里想：他拿沪江的钱，吃沪江的饭，你徐义德要怎么都行，只要别惹到韩云程身上就行。他没吭声。他在听徐总经理说下去：

“原棉问题是我们厂目前最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厂里发不出工资，交不出房租，这也要由工务上负责。”最后他用力叫了一声，“郭鹏，听清楚了没有？”

郭鹏怔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

“听，听清楚了。”他冷静了一下，怯生生地问，“用这么多黄花衣，花纱布公司查出来，谁，谁负责？”他的惊慌的眼光不敢对着徐总经理，只是望着梅厂长。

梅厂长的眼光这时候正望着徐总经理。徐义德充满信心很有把握地说：

“花纱布公司那方面没问题，梅厂长，那只劳来克斯钢表送给加工科洪科长没有？”

“早送去了，他谢谢总经理，我倒忘记告诉你了。”

“明天请他吃晚饭，在新雅三楼，挑个清静的房间，我亲自出马，你也去。”

“好的。”

梅厂长摸清了徐总经理的底盘，他大胆地说：

“查出来当然是我和总经理负责，没有你的事。”

“好，厂长，”郭鹏说，“我用，我用。”

韩工程师听梅佐贤说查出来由他和徐总经理负责，便放心了。

徐总经理的压力发生了效果，他把面孔一变，从心里笑开了，愉快地拉拢韩云程和郭鹏说：

“我也晓得这样会影响质量的，希望大家努力克服困难。韩工程师和郭主任的意见提的也很好，这样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大家的心意，是为了这厂，大家也要晓得，这厂也是为了大家。……”

“那是的，那是的，总经理处处都想到我们。”梅佐贤插上去说。

徐总经理接下去说：

“怕花司问起黄花衣，那么，大家想一个别的名称，就不怕查了，好不好？”他想了一下，说，“用四十二支的斩刀花的名义怎么样？四十二支的斩刀用在低级纱上是可以的呀。”

韩工程师凝神想了想，提出问题：

“这样的和花成份，工务日报上不容易写。”

“那么，用啥名称呢？”徐总经理笑嘻嘻地问郭鹏，“你从小就学纺织，虽然纺织专科学校没毕业，但在厂里年数也不少了，你很熟悉各种原棉，你看，取

个啥名称好呢？”

郭鹏给徐总经理捧得心思十分高兴，他兴奋地抬起头来望着屋顶上的电灯，忽然想到一个名称，他得意地说：

“叫次泾阳好了。”

“妙，”徐总经理翘起大拇指，对郭鹏说，“究竟是郭鹏有办法。用这个名称，就是多掺一点也没有问题。”

韩工程师听到这话暗暗吃了一惊，徐总经理的胆子真不小，还要多掺。但是他已经提过自己的意见，这样不能保证质量，一方面固然是为自己的名誉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徐总经理的利益。话讲到了，出了事就没有他的责任。一方面是花司，一方面是沪江，与韩云程无关。他不宜再提意见，那会影响到自己和徐总经理的关系，说不定甚至影响自己工程师的职务的。他回过头去，看见勇复基的头更低了，好像怕总经理发现，恨不能溜出去。

梅佐贤在一旁冷静地思考，他想了一个更妙的办法，向徐总经理献计道：

“总经理，我看用外加的办法写报表最妙不过了，就说四百十斤的用棉不够，厂方加上去的，这样一切麻烦都可以避免了。”

“你为啥不早说，佐贤，这个办法实在妙，妙，妙

透了。”徐总经理高兴地拍一拍面前台子上的玻璃板。

“总经理，总经理……”勇复基连叫了两声，有重要的话要说的样子，又怯生生地说不下去。

徐总经理知道勇复基不轻易开口，他如果要说话，那一定是他想了又想认为十分重要才提出来的。徐总经理注视着他：

“复基，有啥意见吗？”

“我，我有点意见，”勇复基结结巴巴地说，“不晓得对不对……”

“啥意见？说吧。徐总经理鼓励他。

“说的不对，请总经理包涵……”他还是不大敢说。

“说吧，没关系。”

“我是想这笔帐哪能记法呢？”

“这个啊，”徐义德想了想，觉得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他怎么记法，万一有人嘴不稳，漏出去，那会出事的。如果当时不告诉他呢？又会使在座的人见外，显得不信任大家也不好。他眼睛一转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不露痕迹地说，“等我想一想，再告诉你。”

“好的。”勇复基还有点不放心，说，“将来不会有人查账吧？”

“这个，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勇复基一对怀疑的眼光对着徐义德。

徐义德充满了信心，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绝对不会！”

徐义德这种坚定的口吻，他自己以为有根据的。那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同美国打仗。他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那天几乎一宿没有睡好，肚子里弹琵琶，惊喜交集，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方面觉得这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惹火烧身，为啥美国打朝鲜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呢？不理鸭绿江那边的事，中国关起门来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好吗？美国是世界上的大老板，有钱，有实力，有数不尽的飞机大炮。中国怎么好去碰它呢？解放军打打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差不多，要和美国打，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中国虽然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但恐怕打不过美国。趁这个良好的时机放手捞一票，是绝对有把握的。他料定共产党忙着抗美援朝，谁还会来查沪江的账呢？

“复基，你放心，做这事体，我是有把握的。”徐义德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走，上我家里吃饭去，慰劳慰劳我的功臣。”

31

落日的余晖映在篮球架子上，像是在那雪白的木板上涂上了一层桔红的油彩。球场旁边的那一排柳树，上面新绿的细细的柳条让阳光染得发紫了，像少女长长的头发一般的在风中飘荡着。

嘭的一声，一个篮球打在桔红的木板上，没有进篮，迅速地落在黄橙橙的沙地上，旋即又跳起。钟珮文伸出两手牢牢地把它接住。他的眼睛向四面望去：球场周围站满了人，像是在等待看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日班已经放工，夜班还没有开车，大家在这个空隙的辰光，常常在这里站着玩玩谈谈。可是这时在场子里打球的人并不多，只有四五个人。钟珮文的眼光在寻找打球对手。他瞅见清花间的老师傅郑兴发站在篮边，立刻把球轻轻扔过去：

“来，打一个。”

“不行，骨头硬哪，打不动。”

不等到郑兴发摇手拒绝，那个球已到了他的面前。他把身子一闪，球正落在他的脚旁边。他弯下腰去，拾起来，吃力地扔还钟珮文，笑了笑，说：

“还是你们年青小伙子打吧。”

“不，老年人也应该运动运动……”

钟珮文这次没有把球扔过去，他左手挟着球走到郑兴发面前，不由分说，右手一把拉住郑兴发的胳膊，一同走进场子，把球塞在郑兴发的手里，劝说道：

“投个篮试试，不要紧。”

郑兴发捧着球向四面的人望了望，有点不好意思，想把球放下。钟珮文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

场子四周的人从旁助兴。

“郑师傅就投一个吧。”

“也不是做新娘子，打球怕啥难为情。”郭彩娣说。

“投吧。”

郑兴发很尴尬地站在篮面前，走也走不了，不投也不行，皱皱眉头，说：

“好吧，老了还要学吹鼓手！”

钟珮文站在他背后，看他像是在清花间做生活那么认真，先仔细看了看篮，吃力地举起球来对着篮试了试，然后把球高高地扔上去，沙的一声，球从篮网中落下来。

站在场子四周的人欢腾地鼓起掌来。钟珮文把球捡起来，递给郑兴发，说：

“好，再来一个。”

郑兴发这次捧着球没有刚才那么吃力，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态度也比较自然了，站在原来的地方，说：

“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

郑兴发这一次没有投进去，怕钟珮文要他再投，即刻把球捡起来，摔给郭彩娣，用质问的口气对她说：

“别光说旁人，你不怕难为情，也来试试。”

郑兴发站在篮跟前，对她指着篮。他以为她不会来投篮，那么，话题就会转到她的身上，自己好溜开了。郭彩娣毫不含糊，两只手抱着球，很爽快地走进场子来，说：

“试就试，怕啥。”

她不会拍球，像抱着一个娃娃似的抱着球，向篮跟前一步一步慢慢走去。钟珮文看她越走越近，几乎要到篮底下了，举起右手拦住她的去路：

“行啦。太近了，不好投。”

“远了，投不到，再走两步……”

钟珮文的眼光盯着郭彩娣。从郭彩娣的肩膀那边望过去，在她身后的人群中，发现一张鹅蛋型的红润的脸庞，他心里翻腾着喜悦的浪花，感到自己的面孔有点发烫。他马上把眼光收回来，不敢望下去，怕给人发觉。他望着郭彩娣，却又不自觉地觑她身后人

群一眼，他打球的兴趣更高了。

郭彩娣快走到篮跟前，把球朝篮里扔去，没有投中。钟珮文跳起在空中接住球，跃向篮边，右手托住球，轻轻放入篮中。场子四周响起清脆的掌声，连连叫道，“好球！好球！”有人举起手来，欢呼：

“再来一个！”

钟珮文的脸上浮着微笑，忽然全身有劲道，想把浑身的本事立刻显露出来，站在篮边对郑兴发和郭彩娣说：

“分边打一会，好不好？”

郑兴发刚才投进一球，有了兴趣，说：

“我可跑不动，站在篮底下投篮还可以。”

“这几个人哪能打法？”郭彩娣数着场子上的人，总共不过五个，摇摇头说，“不行。”

钟珮文眼光向四周巡视了一下，发现赵得宝在看他们打球，他走过去说：

“我们的工会副主席参加一个……”

赵得宝直摇手：

“不行，不行……”

“为啥？”

“我不会……”

“不会，没关系，主席要起带头作用，锻炼身体啊。”

“唱歌已经带头了，这个头，我带不了。”

“可以，可以。”钟珮文上去拉他的手。

赵得宝把手一甩，歉意地说：

“真的不行，这条胳膊，这辈子别想打篮球了。”

“是呀，”郑兴发接过去说，“小钟，老赵胳膊开过刀，你忘了吗？”

“那么，人不够……”

“有的是人，”赵得宝指点着场子四周的人，顿时有四个人自告奋勇地走到场子里，他说，“差不多了吧？”

钟珮文点了点人数，摇摇头，说：

“还少一个。哪个来？”

他的眼光向四面扫过，没有人站出来，眼光于是停留在赵得宝的身上：

“再要一个。”

赵得宝向身旁一看，发现管秀芬就站在他旁边，立刻说：

“这里藏着一个积极分子，小管，你去一个。”

管秀芬平常很喜欢运动，球场上只要有人打球，十回有九回可以看见她。她刚才看见郭彩娣投篮没中，就想跑到场子当中来投，不料钟珮文手快脚快，一眨眼的工夫，投进去了。她过去只知道钟珮文喜欢打篮球，不晓得他打得这么好，真有一手哩。她注视

着他的灵活的结实的身体，自己的面孔慢慢热辣辣起来了。最近看到他，她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她并不喜欢他。

那天晚上在十字路口分手，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像平常一样的上工下工，以为这件事永远过去了。

第四天中午，吃过中饭，她准备去俱乐部看看报，门房给她送来一封从本市寄来的信。她打开一看，称呼是：亲爱的秀芬……她的脸立刻绯红，抬头看到不少姐妹们向俱乐部走来，怕给瞅见，马上把信塞到白号衣的口袋里，到厕所去。路上遇到郭彩娣、徐小妹她们，定要拖她一同到俱乐部去，她说要上小间，匆匆跑进了厕所。在厕所里，连忙掏出那封信，屏住呼吸在看。开头一看是解释为啥要这样称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爱慕和自己内心激动的感情。她没有顺着往下看，跳过一行行工整的钢笔字，到最后那行去找写信人的名字，下面署着珮文两个字。她顿时把信又塞到口袋里去了。等了一歇，好奇地又把信拿出来，看看他究竟写了啥。第二段是写那天晚上没有能送她走一段，表示抱歉，以后有啥事体，希望找他做。他是非常非常愿意做的。她看到这里笑了，自言自语地说：

“没看见菩萨就乱叩头，人家也没要你送，忽然

抱起歉来，礼貌太多了。有事，也不是小孩子，自己会做。”

他要求她能够和他做朋友，常常谈谈心，这是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的主要内容。

她的嘴一撇，把那封信扯碎，扔到马桶里去，许久许久心里平静不下来。她决定不理他，也不答复他的信。

钟珮文呢，还在痴心等她的答复，特别盼望得到她亲笔的信，给一个肯定的回答。这几天来，他见了她，老是避着，怕她亲口不答应，当面就很难说下去了。但是等她走过，忍不住要看看她。不看见她，他心里又想能够在啥地方忽然看见她。他本来可以到车间去找她，但是那里面的人多，如果她当面给他一个难堪，那却吃不消。在球场上碰到她，自己不去看她，让她看看自己不是更好吗？他望望辰光还早，就提出要分边打。

管秀芬站在场子旁边，以为没有人注意她，没想到赵得宝推到她头上。她不愿意去打，也没有理由推辞。她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就没有开口。

郭彩娣站在场子中线那里，望着管秀芬，说：“来吧，别扭扭捏捏的。”

管秀芬刚走出一步，就站住了，她听见钟珮文很不自然的声音：

“来，我们一边。”

管秀芬从钟珮文的话里听出另外的意思，她心里说：谁和你一边。

郑兴发也不同意：

“会打的在一边不行，要分分开。”

“分开就分开，”钟珮文只要管秀芬参加打球，他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郑兴发向管秀芬招手：

“来，我们一边，打钟珮文他们！”

她一听见钟珮文三个字，脸上就很不自然，踌躇地望了钟珮文一眼，立刻又羞涩地低下了头，生怕给人家发现，或是叫钟珮文看见。

场子上九个人都在等她。她站在那里不动。赵得宝伸手过去，把她拉了出来，说：

“打吧，哪边都一样，也不是正式比赛。”

你推我拉，管秀芬给送到篮底下。

钟珮文把球挟在左边腰际，像个球队队长，举起右手，叫大家站在他面前报数。八个人都来了，头一个是郭彩娣，只有管秀芬不肯来。钟珮文迁就她，说：

“你算最后一个。”

管秀芬避开他的视线，只顾望着篮球架子。架子后面疏疏朗朗地站着几个人。她没言语。

郭彩娣首先报了“一”，其余的人跟着报下去。钟

珮文叫单数站出来，大家都随郭彩娣一同站出来，和钟珮文一边，正要分开跳球，管秀芬乘大家不注意，身子闪的一下。走了。钟珮文见她走了，顿时大声叫道：

“小管，小管！”

钟珮文没叫她的辰光，她还是一步步走去，一听见钟珮文的声音，步子马上加快，一溜烟似的奔向车间去了。

场子上的人，望着她去的方向，都莫名其妙。

钟珮文的左手不知不觉地一松，球无精打采地落在地上。

32

在电灯光照耀下，筒摇间里几百台摇纱车飞快地转动着，发出大海涨潮一样的轰轰声，丈把长的木段迅速地绕上雪白的棉纱，远远望去，整个车间就像是一片白浪翻腾着，一个雪白的浪头紧接着一个雪白的浪头。格喳一声，靠门的九十六号摇纱车停了。九十六号是谭招弟挡的。她一眼看到车上有两个头断了，很快地接上，用剪子剪去纱头，把回丝送到回

丝箱里。她开出了车子。

车子开出去还不到两分钟，又是一声格喳，停了！谭招弟奇怪地问自己：“怎么，今天车子出了毛病哪？”她回答自己：“不会的，上夜班的辰光，她检查过车子，蛮好的，没有一点点毛病。”她自己又问：“那么，是碰到赤佬，今天该倒霉啦。”她摇摇头：“有啥赤佬呢？没有。”她一边想，一边把指头一碰接好了头。这次她却并没有开车，弯下腰去，仔细看着锭子上的纱，上面毛头毛脚纱不少。她不信任自己的眼睛，再看过去，别的锭子上也有毛头毛脚纱，寄生头也不少。她像是发现了奇迹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怪不得哩，这样的纱，怎么会不常常断头呢？这样的纱怎么能摇下去呢？”

她想起自己到沪江纱厂来做厂，是汤阿英干姐姐介绍来的，初进厂给领班他们的印象不错，就是在夜班，摇二十支纱的出数曾经到过五十二车。凭她七年做厂的经验，把车子收拾得好些，努把力，超过五十五车并不困难。她昨天夜里只摇了四十七车，看今天夜里的样子，怕连四十车也摇不上。谭招弟挡摇纱车以来，没有这样的记录。不摇下去吧，不好的；摇下去吧，这生活实在做不下去。这样的出数，领班还以为磨洋工呢，怎么对得起阿英姐姐，即连对自己，对厂，也说不过去啊。她烦躁地垂下头来，不知道怎

么是好。

一会，她听见有人叫道：

“喂，谭招弟，今天怎么老是停车？”

她抬起头来一看：二十七排的车也停了。挡那排车的徐小妹跟她说：

“今天的车子别是出了毛病？”

“你看看是啥纱！”谭招弟不满地说。

徐小妹到锭子上一看，知道是啥原因了。她对着纱锭发愁。翻滚着的雪白的浪头小下去，此起彼落，好像是车间遭受到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的侵袭，雪白的浪头遇到寒流马上就冻结了，静止了。有的翻腾几下，又停了。轰轰声小下去，车间里浮起不满的和咒骂的声音，三三两两的女工在车头指手划脚地谈论着。

徐小妹看着那样的纱，她头上的火星直冒，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地骂道：

“这倒头纱……”

谭招弟接过去说：

“我在别的厂做的快七年了，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二十支纱。”

“细纱间的人困觉了，”徐小妹想想这说法还不妥当，改口说，“就是闭着眼睛也纺不出这样的纱啊。”

“我闭着眼睛纺一纺，也纺得比这个纱好。”

“那是的。”

“这样的纱怎么好送到筒摇间来，细纱间的人真不要脸。她们不要脸能送出这样的纱，筒摇间却送不出去啊，我谭招弟没有摇过这样的纱。”

“谁摇过这样的纱？”

“这两天我只摇四十几车，说出去真丢人。”

“我比你更少，”徐小妹瞪着两只小眼睛对谭招弟说，“我连四十车都不到，这都是细纱间害人。”

说到这里，徐小妹愤怒地指着到隔壁细纱间去的那扇门。

门那边站着细纱间的接头工郭彩娣。她听的眼睛直瞪直瞪的，哪里忍受得住。她是细纱间的出名刚强人物，性子像一把火。她父亲原来是个拉橡皮塌车的工人，赚钱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每一个人都想办法赚点钱，贴补贴补家用。她八岁那年，也出去做活，拾垃圾，到晚上，她胸前挂着一个带干电池的小电灯泡到处去钻，每天拾得比别人多，她拾的垃圾，摆在马路上任何一地方，没有一个拾垃圾的孩子或者大人敢碰一下。她十二岁那年，到一个姓方的家里当丫头；扫地，倒痰盂，洗尿布，带孩子。主人有个女孩子长的像男孩子一样粗野，整日价在弄堂里跑来跑去，调皮捣蛋，老是和弄堂里的孩子们吵嘴。

有一天，这孩子手上的一副银镯头丢了，主人硬说是她偷的。她一听这话，头上直冒火星，眼睛一楞，说：“我郭彩娣穷是穷，可不希罕这个。别说是银镯头，就是金镯头玉镯头，摆在我面前，我也不看它一眼。你信口胡赖人，我可不答应，搜查不出来，要赔偿我的名誉。”主人骂了她几句，她哪里忍受得了，拔起腿来就走，出了大门，回头说：“我饿死也不跨你方家的门。”她回到家，父亲不了解真情实况，怪她不应该随便拿人家东西，败坏郭家的门风，叫做父母的没有脸见人。父亲也是个逞强好胜的人，气的拿起桌子上的菜刀就向她头上劈下来。幸亏她手脚快，一闪身溜出了门，听见身后父亲气呼呼的声音：“看你敢回来！”她真的没回去，并不是不敢，是生父亲的气。第二天父亲就后悔没有把事体弄清楚，不应该鲁莽地把女儿赶出去，希望她回去，她却不回去，宁可忍饥挨冻，晚上挤在姓王的邻居的阁楼里过夜。日子久了，她帮助王家做点啥也蛮讨人家喜欢，就和王家一道在外边当小贩。她自己开始独立谋生了。五年前，她托人说情，进了沪江纱厂，先做养成工；正式当细纱间的接头工是最近三年的事体。她今年才二十二岁，因为经历多，在社会上吃的苦头不少，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天不怕地不怕，遇事勇往直前，逞强好胜，长得如同三十上下的人一样。一九四八年

冬天那次“摆平”，秦妈妈知道她的性子，一点就着，所以首先和她商量，果然她毫不在乎，事事站在前边。她为人很直爽，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肚里存不下一句半句话。细纱间的姐妹们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她刚才上厕所去，听见徐小妹骂细纱间，她就站在灰布棉门帘背后听。徐小妹和谭招弟的谈话她都听见了，她对着筒摇间呸了一声：“不会摇纱，还怪人，真不要脸！”她气呼呼地跑进细纱间，首先碰到汤阿英。

汤阿英在弄堂里紧张地一边走着，一边接头，右手食指不断推送着擦板。她刚走过去，身后的锭子上又断了头，她按着巡回路线走，在车头那边，碰到郭彩娣。郭彩娣附着她的耳朵大声地说：

“筒摇间骂我们哩。”

“骂？”汤阿英怀疑地问了一声。

“唔，骂我们细纱间，”她嘟着嘴，气得说不下去。

“不会吧，自家姐妹哪能骂人呢？”汤阿英说，“你别听错了。”

“我亲耳听见的。”

“呃！”汤阿英不相信。

郭彩娣的面孔气得铁青，提高嗓子说：

“真的。骗你，杀我的头。骂我们细纱间不要脸，我们为啥不要脸？筒摇间要脸？”

“谁出口伤人？”汤阿英还是有点不相信的样子。

“还有谁，”郭彩娣对筒摇间撇一撇嘴，说，“就是你介绍来的那个谭招弟！”

“谭招弟？”汤阿英知道谭招弟不会骂人的，也不会骂细纱间的。郭彩娣不会胡赖人的。那是不是受别人的挑拨呢？她边接头边问，“你听错了吧？”

“一点不错。”

“谭招弟会骂人？”汤阿英皱着眉头问。

“不单是谭招弟，还有徐小妹也骂我们。我本想过去质问她们，怕耽误生产，也不愿意听她们骂，就回来了。”

“她们为啥骂我们？”

管秀芬听她们两个人在谈论筒摇间的事，她走过来，站在她们两个人的中间，说：

“要骂人还不容易吗，她们想骂就骂，再简单也不过了。”

“说我们细纱纺的不好，害了她们。”郭彩娣解释道，指着汤阿英的大肚子说，“别说旁人，就讲你吧，带着个大肚子，生活做的多巴结，还说我们细纱纺的不好，天下有这个理吗？”

“谭招弟徐小妹真的骂我们？”汤阿英的眼光瞅着筒摇间，她还是有点怀疑。

“知人知面不知心，别说是谭招弟啦，就是亲生

的姐妹，要是她没有良心，还不是照样的骂人。谭招弟那号子人，我看，也没啥好良心。”

“秀芬，不能这样说，”汤阿英不同意管秀芬的看法，但她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你说，我说的不对吗？”

“你，”汤阿英没有讲下去，她的眼光认真地望了望车上纺出的细纱，叹了一口气，说：“这个纱吗，也实在不好……”

郭彩娣听她说到这里，连忙打断她的话，反问道：

“你是说她们该骂我们吗？”

“不是这个意思。”汤阿英一愣，连忙解释说，“我是说，这一阵子细纱也实在不好……”

“这两天的生活多难做，忙的满头满脸是汗，脚从来没有停过，筒摇间不睁着眼睛到细纱间来看看，就晓得张开嘴骂人，真不要脸！你看看这是啥粗纱？”郭彩娣不服气地指着粗纱说。

“是呀，”管秀芬完全同意郭彩娣的意见，她说，“我这个记录工，就可以给你们做证人。”

锭子在迅速地转动着。一会，一个锭子停了。一会，又一个锭子停了。郭彩娣相帮着汤阿英接头。汤阿英本来看五十六木棍，因为这几天生活难做，很多工人都请假，特别是夜班工人，缺勤率达到百分之三

十五六，再发展下去，就要关车了。厂方当然不肯关车，想出了点子：放长木棍。汤阿英增加了十木棍，她要看六十六木棍，断头更多了。

汤阿英用手托着粗纱叹息地说：

“这纱，唉，也实在是……”

“这是啥粗纱，条干不匀，色泽呆滞。粗纱不好，怪不了我们纺的细纱。”郭彩娣不满地哼了一声。

汤阿英说：

“凭良心讲，这两天我们纺的细纱的确不好，试验室说我们二十支纱纺成十八支纱了。”

“十八支纱？”郭彩娣不服气地说，“十七支纱也怪不了我们。”

“怪谁呢？……”汤阿英问。

“怪谁？是不是粗纱有问题，……”一个男子的声音忽然插上来说，“在细纱间工人当中，下粗纱间工人的烂药。”

汤阿英见了那男子，便惊异地问：

“啊哟，你怎么忽然到我们车间来了啊？”

管秀芬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差点叫出声来。那男子是陶阿毛。他为啥忽然跑到细纱间的弄堂里来呢？她想起那天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他突然在她背后出现，没谈多久，又突然先走了。她猜不透他的心思。今天他到车间里来，是不是找她呢？她看见汤

阿英在注视她，便装出看锭子的样子，转过脸去。

陶阿毛好像不知道管秀芬站在旁边，没有理她。陶阿毛昨天在筒摇间挑拨谭招弟，说细纱间哪能纺出这样的细纱，叫筒摇间的生活难做，梦想离间车间与车间姊妹的团结，分散工人的力量，他好从中拉拢一些工人到自己的身边。现在他显出特别关心汤阿英和郭彩娣她们的神情说：

“听说这两天生活难做，到车间来看看你们。车子好使吗？”

汤阿英径自做着清洁工作，一边接着。这边的头接了，那边又有头断了，她忙碌地跑来跑去接，头上的汗直流。一个巡回过来，陶阿毛还在车头那边蹲下去看看，侧着身子听听，对郭彩娣解释：

“车子蛮好，可怪不了我们。”

管秀芬知道不是找她，慢慢转过脸来，笑着说：

“车子有没有毛病还难说……”

“我们保全部这些日子忙得真是连气也喘不过来，自从徐总经理提出来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我们保全部就没停过，今天装修，明天拆平，连搁得一两年的‘冷车’我们也揩得又光又亮！”

“我听学海讲，”汤阿英说，“这一阵保全部倒真是忙……”

“我们忙点没啥。”陶阿毛有意向车间四周看看：附近弄堂里的女工都在忙着接头，手简直是停不下来。这一阵子的生活倒确实难做。

“谢谢你。”汤阿英觉得他真是关心大家的生活，感激地说了一句。

陶阿毛接着补了一句：

“你们生活难做，我们心里不舒服，也有责任。”

郭彩娣心直口快地说：

“有事少不了要找你们保全部。”

“尽管找。我到别的车间去看看……”

陶阿毛走进粗纱间。靠边的末排车上的吴二嫂，正在自言自语地发牢骚。他站在她背后留神听：

“这是谁瞎了眼睛平的车，锭壳里还有黄锈，也不揩揩干净，就送来了，纺出来的纱碰碰就断头，碰碰就断头，这劳什子生活真不好做。”

这台车是陶阿毛拆平的，凭他的手艺来说，平这台车他倒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个别的锭壳没擦干净是有的，但不会影响所有的粗纱。话虽这么说，但车子是他平的，听见吴二嫂骂平车的人，他没话好讲。

“今天夜里的生活真累死人，跑来跑去尽接头！连放屁的工夫也没有。这样的老爷车，八只手也不够侍候它，一落纱最少也得要两个钟头，保全部真害人！”

陶阿毛忍不住答道：

“这不怪保全部……”

吴二嫂一愣：谁答话呢？一听是陶阿毛的口音，她吃惊地问：

“你在这里？”

陶阿毛不好意思承认他在偷听话，他的脸红红的，急忙掩饰道：

“刚来。”

她没注意他慌张的神色，生气地质问他：

“这个车是谁平的？”

“这个车，”陶阿毛随便答道，“要查查看，我还弄不大清楚呢。”

“你们保全部平的好车……”

陶阿毛不懂地问：

“哪能？”

“你看看出的什么粗纱，碰碰就断头……”

“哦，”他认真地看了看，马上故意把责任推到清花间，说，“车子平的不错，出这样的粗纱不能怪车子，是不是和清花间有关系，……”

他没有说下去，留意吴二嫂的表情。她诧异地问：

“这和清花间有啥关系？”

“要是除尘不净，杂质太多，你说，和清花间没

有关系？”

“这个，”吴二嫂仔细想陶阿毛的话，手里托着棉条一看：确实不好，里面的杂物都看的见，自然容易断头。她说，“就是清花间有毛病，保全部也推卸不了责任……”

“保全部有啥责任，我们绝对不会赖账。”

“锭壳里黄锈都没揩干净，这不是保全部的责任？”

“多少锭壳有黄锈？”

“没数，反正不止一个两个。”

“我回去一定查，这个平车的人太不负责任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他愤愤不平地说道，“啥人做生活这么粗心大意，连黄锈也没揩干净，丢我们保全部的人。查出来，我非叫他好好检讨不行！”

“检讨不检讨倒不要紧，下回平好点，别害我们粗纱间就算是行好事了。”

“也不要把事情都推在保全部身上，你自己没有一点毛病吗？”

她惊愕地睁大两只眼睛：

“我？”

“唔。”

“我有毛病？”吴二嫂楞着两只眼睛，望着他。

陶阿毛播下工人不和的种子，说：“细纱间骂你

们哩！”

“骂我们？”她越发奇怪了，问道，“为啥骂我们？”

“说你们闭着眼睛纺纱，条干不匀，老是断头，害得她们生活难做，她们一边接头，一边骂……”

“啊，有这样的事体？”

“是呀，要不是我亲耳听见，我也不相信哩。细纱间骂粗纱间骂成一条声，才难听哩，……”他摇摇头，表示同情粗纱间。

“她们骂啥？”

“有些话连我都听不入耳，别去讲它吧。省得生是生非。都是自家人，有意见为啥不当面说清爽，骂人伤和气，何必呢？”

“谁带头骂我们？”

“那可说不清，反正很多人骂你们。”

“一定是郭彩娣她们，平时没事就好骂人，一定是她！”

她语气很肯定。他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装出怕讲出来会影响工人团结的虚假表情，言语之间却又同意她的猜疑。他含含糊糊地说：

“是呀，我听了也生气，给你抱不平。你们做生活巴结，厂里啥人不晓得？”

她听了这话，像是火上加油，立刻指着棉条说：

“哼，细纱间这些丫头，请她们到粗纱间来看看，

这是啥棉条！”

“是呀，也难怪你们。”陶阿毛同情地说，“我们纱厂里只要有一个车间拆烂污，不好好做生活，每一个车间都要受害。”

“你的话对极了。阿毛，你现在当上工会的委员，要仔细查查，究竟是哪个车间要负主要责任，要处理，”她做得很累了，打了个哈欠，说，“这生活真害死人。”

“好，我先到钢丝车上去看看。”

陶阿毛绕着半人来高的棉筒穿出弄堂，向梳棉间走去，继续施展他的挑拨才能。

33

深夜。细纱间的车间办公室的电钟的短针正指着两点。

汤阿英连续做了五天夜班，身体渐渐吃不消了。今天来上夜班已经是很勉强，做到下半夜，更觉得疲倦不堪，两只眼睛的眼皮老是要搭拉下来。她真想闭上眼睛来休息一会，可是肚子里的小东西时不时蠕动着。她又振作起精神，努力睁大眼睛，注视面前一

个个纱锭迅速地转动。一会，有两个头断了，她很快地接上。她向前走了两步，又有三个头先后断了，连忙用手迅速接上。这边刚接好，她把擦板熟练地推过去了，那边又有三个头断了，几乎是同时断的。她一个个头接好，额角上的汗水像雨一样的流下来。她用手背拭去，抓起油衣裳^①的下摆揩揩干，迈开步子，觉得腿没有劲，她没有注意，仍然按照巡回路线走着。刚才断头太多，车面上落的花衣不少，她努力做着清洁工作。一个个纱锭在她眼前转动，转动，忽然雪白的纱锭上散发出一阵阵金星，在她面前飞舞。

她肚子很痛，像是那个小东西在里面翻天覆地般地转动着，跳跃着，仿佛肚里的大肠小肠的位置都给他弄错了。割裂开的阵痛一次比一次紧，也一次比一次厉害。她咬着牙齿，勉强在弄堂里迟缓地移动着步子。好几根头断了，她的手伸过去，没有从前那样灵活了，痛得手指发抖，头老是接不上，汗珠子从额角上直往腮巴子上流。这几天因为断头太多，她连续做夜班，过分疲劳，现在到了下半夜，她的身子更加吃不消了。但是她一想起筒摇间对细纱间的不满，她要努力做好。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丝不苟地接着头。

^① 油衣裳：即工作服。

肚子阵痛过去了没有一会，现在又痛了。她用手紧紧按着它，痛好像减轻了一些，但又怕压坏了没有出世的婴儿，手放松一点，却又忍受不住。从额角上渗透出来的汗珠像黄豆那么大，她的牙齿紧紧咬着下嘴唇。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气，下嘴唇给咬得显出一个个白色的牙印子。她脚轻头重，纱锭在她面前旋转，一排一排车在她面前旋转，整个车间在她面前旋转。她实在支持不住，想请假回家去。可是望着车面的生活，又不忍心放下手来。这一阵，因为生活难做，缺勤率很大，特别是夜班，人手更少，如果再有人请假，车面更照顾不过来。

她不管自己头晕眼花，也不顾肚子剧烈的阵痛，咬着牙齿，忍受一阵阵袭来的痛楚，顶在弄堂里。两条腿有点不大听她指挥，手也仿佛不是自己的了，眼前的每一根细纱她都看成是两根，断了头的，怎么也接不上。她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打算跟领班去商量一下，刚走到车头那，噗咚一声，倒了下来，手倒挂在马达旁边，差一点点就要给那急剧转动着的皮带把她的手卷进去。

她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两只大腿自然而然地伸展开，两个拳头纂得很紧，似乎手里抓着重要的宝贝。脸上的汗水，雨一样的往下流。

在轰隆轰隆的机器叫嚣声中，从汤阿英身边传

出哇哇……哇哇……的婴儿的啼哭声。

这啼哭声惊动了斜对面弄堂里的张小玲。她是细纱车上的挡车工，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今年才十八岁。她顺着哭的方向找来，瞅见汤阿英躺在地上，大腿下面有一大摊鲜血，裤裆那儿凸凸的，不知道是啥东西在一动一动的。她立刻含羞地用两只手蒙上了脸，不敢仔细往下看，也不好意思站下来，飞一般地顺着大路跑了。

她跑回自己的弄堂，仔细一想：这样跑开不对，马上急急忙忙地告诉秦妈妈。秦妈妈听不清她说的是哪个工人，估计说：

“大概那个来了……”

“不，不是的。”

“不是那个？”秦妈妈站在大路上，奇怪地望着张小玲，说，“是啥？”

“是……”张小玲想说，又羞涩地说不出口。

秦妈妈站在那里没走，推一推张小玲的肩膀，焦急地问：

“是啥呀？你这个丫头。”

“是，”张小玲对着秦妈妈的耳朵说，“是小孩……小孩……”

秦妈妈眉头一皱，不解地问：

“你说的究竟是谁呀？”

“汤阿英!”

“她!”秦妈妈立刻想起她的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不禁脱口说出，“早产哪，快去，快去!”

秦妈妈抓住张小玲的手飞奔到汤阿英的弄堂那边。车间里的人见她们两个人跑过去，料想一定有啥事体，便跟了过来，有的干脆关了车子。秦妈妈蹲下去，轻轻地问：

“怎样?”

汤阿英有气无力地回答：

“还好。”

她睁开眼睛，巡视着大家，眼光里露出衷心的感谢。她接着无力地抬起右手，指一指自己的肚子，手旋即又落在地上。秦妈妈懂得她的意思，冲着她的耳朵说：

“晓得了，你放心……”

秦妈妈从血里把一个赤条条的婴儿提了起来，抬头像在寻找谁，望了一会，说：

“快找医生来，快!”

细纱间的落纱工董素娟今年才十六岁，她正出神地望着躺在地上的汤阿英，一听秦妈妈叫唤，连忙应道：

“我去，我去。”

她头上梳了两根小辫子，右边那根垂在胸前，把

它往身后一甩，飞一般地从人丛中跑了出去。一出细纱间的门，还没有走到医务所，她就叫开了：“医生在吗？细纱间出事了！”

梅佐贤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看完了最后一场电影，又到大世界隔壁王芳斋去吃了夜宵，跳上汽车，想起了好久没有去厂里检查了，听说工人在哇哇叫，说啥生活难做，他怀疑工人是不是“揩油”^①，有意叫生活难做，得到厂里亲自看看。他便叫司机开到厂里去。离沪江纱厂约莫有三十户左右人家，他叫汽车停在路边。司机懂得这是厂长的老规矩，夜里查厂，汽车照例总是不开进厂的，司机也不跟进去，只是厂长一个人进去。这样厂里的人听不到汽车喇叭声，看不见汽车，车间没有人晓得厂长来了。他突然出现在车间和宿舍时，发现问题，好向徐义德报告。徐总经理很赞赏他这一手。

梅佐贤进门以后，没有从大路上走，循着墙根走，像一个贼似的，轻轻地迈着步子，时不时左右望望，生怕叫别人看见。他首先走进职员宿舍。职员宿舍每个卧室的门上，都根据他的设计，开了个小洞，嵌上玻璃，不必开门，从小洞那里就可以看见在上夜班的辰光有没有人躲在宿舍里困大觉。他从每一个

^① 揩油：即不好好做生活，偷懒。

卧室的小洞洞看过去，宿舍里没有一个人。他很满意，今天夜里没有一个职员“揩油”。路过厂长办公室，由于刚才在王芳斋吃多了一点，口里有点发干，要喝点水，他就溜进了厂长室，泡了一杯祁门红茶，准备喝它两杯，再到车间里去检查有没有人“揩油”。正在他悠然自得地品味祁门红茶那股浓涩的滋味，夜空中传来了董素娟在医务所外边的叫唤声，他凝神一听：“医生在吗？细纱间出事了！”料到一定出了事故，说不定是工人受了伤，或者病倒了，甚至于病危，怕有人发觉他在厂里，弄到他头上，深更半夜，一时脱不开手，奉陪一夜到是小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干系到自己身上，那要吃不消的。他根本不管车间里工人的死活，心中后悔今天夜里不该来厂里检查，幸好大概还没有人发现，不如趁早溜掉。他站起来就走，一溜烟似的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这时细纱间的工人们围着汤阿英在纷纷谈论着。郭彩娣仔细端详着汤阿英，打量了许久，还是不解：

“哪能弄的啊？”

“哪能弄的，”张小玲首先发现汤阿英小产，仿佛她有义务解答郭彩娣的疑问，她接过去说，可只讲了一句，再也说不下去，过了一会，才没有把握地说：“大概拿啥重东西震动了。”

“我们车间有啥重东西好拿？”管秀芬提出了异议，“就是摆粗纱也没关系。”

“是摔了一跤？”郭彩娣越想越有点像，说，“怕是的。”

“摔跤？”张小玲望着汤阿英，回忆地说，“我没有听见。”

秦妈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

“你们还年青，不懂得这些事体，别瞎猜了。阿英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不是别的，一定是太累了。这一阵子做啥生活？累得我眼睛睁都睁不开，孕妇哪能吃的消？不小产才怪哩！”

“是呀！这生活，别说孕妇，连我们也吃不消，”郭彩娣同意秦妈妈的意见，“我看，只有张小玲，别人，哼，谁也顶不住。”

在细纱间里，张小玲身体最好，可是她说：

“谁吃的消？尽断头，累得上小间的工夫都没有，有次，我……”有次她急着要解手，可是断头老是接个不完，她忍着忍着，想接完了再去，最后再也忍不住了，跑出去，没赶到厕所，就小便在裤子里了。她羞答答地不好意思说出来，改口道，“下了夜班，两条腿就像木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对啊，人也不是铁打的。”这是管秀芬不满的声音。

哇……哇哇……哇哇……

秦妈妈手里的赤条条的婴儿闭着眼睛，张开小嘴，放声大哭，好像抗议大家没有注意这个幼小的生命的存在。秦妈妈以为医生立刻就会到的，不知道为啥还没有来，她东张张西望望，焦急地说：

“医生还不来？先拿件衣服来，给这个小东西盖上。”

张小玲跑到衣橱那儿，把自己那件蓝布罩衫取来，盖在婴儿的身上。郭彩娣望了望婴儿又望了望汤阿英，咬着牙齿，愤愤地说：

“都怪粗纱间不好，纺出这样的纱来，害得我们细纱间的人小产。”

“粗纱间这一阵生活，听说也不好做，”张小玲说，“恐怕不能怪她们。”

“怪谁？”郭彩娣一个劲盯着张小玲望，那眼光的意思肯定是怪粗纱间，她不满地说，“筒摇间可怪我们。”

“我晓得，”张小玲说，“啥粗纱纺啥细纱，请她们来看看，人都累得早产了，还怪我们，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没有这个道理。”大家一条声地说。

“一提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冒火，你们没听见谭招弟徐小妹的话，可难听哩，我真想过去给她们痛痛

快快地吵个明白。”

“是呀，”管秀芬支持郭彩娣的意见，说，“一定要讲清楚，不能让她们风风雨雨的瞎七搭八。”

“一定要去！”听郭彩娣那口音好像马上拔起脚来就要走的样子。

大家的眼光向着筒摇间。张小玲提出不同的意见：

“别忙，等医生来了，看了阿英和小孩再说。道理总要讲清楚的，自家姐妹，不要吵架，请领导上给我们开个会，来解决问题。”

“对，开会把道理讲清楚，究竟该哪个车间负责。”郭彩娣还是有些愤愤不平的情绪。

落纱工董素娟飞也似的跑进弄堂来，一边高声叫道：

“医生来了！”

医生屁股后面跟来一副担架。医生给阿英按了按脉，又摸一摸她的头，很有把握地说：

“不要紧，抬到医务所去吧。”

秦妈妈她们帮着把汤阿英和婴儿放到担架上，并且跟着送到医务所去。她们在门外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医生出来了，秦妈妈关心地走上去问：

“怎么样？”

“大人平安。”

张小玲紧接着问：“婴儿呢？”

医生犹豫了一下，说：

“现在还很难说。”

34

各个车间反映最近生活难做。这个车间骂那个车间，那个车间又怪这个车间。平常很亲热很和蔼的工人兄弟姐妹，过去见了面有说有笑，高兴起来还打打闹闹；现在大家都有异样的感觉，互相不满意，见了对方来了，甚至低下头去，有意不理睬。工人兄弟姐妹给一堵看不见的，但感觉到的高墙把每个车间给隔绝开了。大家不知道这堵高墙是陶阿毛砌起来的。它妨碍着车间之间的友好和亲密的团结。

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余静，听了各车间汇报以后，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亲自动手处理。她放下手里别的工作，和工会副主席赵得宝一块儿到各个车间看看。

她从打包间走过去，一进了筒摇间，马上给工人们像火一样的热情包围住了。这个给她讲话，那个向她招手，送筒管的女工，走过她身边，摸摸她的列宁

装的下摆，亲切地说：

“余静同志，好啊。”她回过头来看见赵得宝，接着说，“老赵，你也来了啊。”

“这两天生活难做，你们累了啊。”

送筒管的女工点点头。谭招弟接上去说：

“可不是，这样的细纱，真是天晓得！”

“怎样？”余静注视着摇纱车上的细纱。

“毛头毛脚纱多的要命。”

“断头多，是吧？”

细纱仿佛要证实谭招弟的话给党支部书记余静看，格喧一声，车停了。

谭招弟指着车子对余静说：

“你看，这是啥纱，细纱间的人哪能弄的啊，纺出这样的纱。”

“招弟，这里面当然有毛病，啥原因，要仔细调查调查。毛主席讲的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余静慢慢地劝她。

“调查调查，要查到啥辰光？”

“总要查出来的，一查出来，问题就清楚了。不能一口咬定怪细纱间。”

谭招弟不解地问她：

“那怪谁呢？”

赵得宝插上来说：

“我今天和余静同志就是来找这个原因，怪谁？现在还难说。”

谭招弟一边接头，一边嘀咕着：

“不怪细纱间怪谁，这样的细纱，格林不是过重就是过轻，一会七十六牙，一会七十八牙。”

徐小妹附和着谭招弟的意见：

“毛病一定出在细纱间。”

“谁也别先下结论，”余静的话虽然是对徐小妹讲的，但是她的眼光却对着谭招弟，“调查研究以后再说吧。”

谭招弟浑身热辣辣的。她没再吭声，望着她和赵得宝的背影，慢慢消逝在细纱间。她心中说：用不着调查研究，问题明明出在细纱间！

在宽大的细纱间里，巨大机器轰轰的响着，压倒弄堂里女工谈话的声音。花衣在空中飞扬着，就像是冬天落大雪一样，轻轻地落在车面上，落在工人的身上，落在余静和赵得宝的头上和眉毛上。人们身上披着一片片的雪花。余静和赵得宝走进的仿佛不是细纱间，而是轧花间。

张小玲站在车面前，右手非常迅速地接头，一边用绒棍做着清洁工作。把钢板上的棉花揩掉。

余静走到她面前，笑嘻嘻地问：

“怎么样？郝建秀工作者。”

赵得宝用着羡慕的眼光注视张小玲白色油衣裳上面的六个红字：郝建秀工作者。

“生活还是不好做，”张小玲说，“支部书记，你们上了常日班怎么又上夜班哪？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

“你们生活难做，我们哪能安心休息。这几天生活，夜班比日班难做，缺勤率又高，汤阿英累得早产了。今天特地约好赵得宝同志，一道下车间摸情况。”

管秀芬瞅见余静和赵得宝跟张小玲讲话，她就一蹦一跳地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兴奋地说：

“你们来了，就好办了。”她在大街上前后望望，没有人，便说，“生活实在难做，你们来想想办法啊。要不，筒摇间的气实在受不了。”

“这个问题非快点解决不可，早点查出毛病就好办了。”赵得宝说，“你们怪粗纱间，我看不一定怪她们，要研究研究。”

“我同意你的意思。”余静说。

管秀芬睁着两只大眼睛，困惑地注视余静。

赵得宝对张小玲说：“细纱间研究过没有？”

“开过小组会研究，每个小组的意见都是一样的：粗纱不好。”

余静皱起眉头仔细地思考了一阵，然后问张小玲：

“粗纱为啥不好呢？”

管秀芬口快地代张小玲回答：

“粗纱间纺的不好么。”

“粗纱间从前纺的纱好不好？”

张小玲仰起头来，望着高大玻璃窗外面的深蓝色的天空，回忆地说：

“从前纺的不错。”

“为啥现在纺的不好呢？你们研究过吗？”余静进一步问。

张小玲想了想，答道：

“没有研究过。”

赵得宝对余静说：

“这里面有问题。”

张小玲补了一句：“我们希望领导上开个会，讨论讨论。”

余静点点头。她和赵得宝向粗纱间走去。

管秀芬一看见余静，她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她认为不管啥事体，只要支部书记一来就有办法了。她性急而又天真地追过去，歪着头，问余静：

“想出办法来了吗？”

余静望着她的脸笑了：

“没这快。”

她显然有点失望，脸上的笑容消逝了，眉头皱

起：

“没有办法吗？”

“有。”

“那好，那好！”她又一蹦一跳地跑回细纱间去了。

余静和赵得宝在粗纱间遇到吴二嫂她们，立刻被她们包围起，大家诉说着最近生活难做的情形，你一言我一语，并且把棉条指给余静看。吴二嫂听信陶阿毛的意见，她肯定是清花间的问题。余静当时没有表示态度，她又把棉条看了个仔细，才说：

“等我到清花间去看了以后再说。”

吴二嫂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满意的答复，心里未免有点怅惘，但觉得余静对问题的慎重的态度是对的，就没说啥。

余静和赵得宝在钢丝车当中穿过，他仔细地看每一部钢丝车上的像蝉翼一样的非常稀薄的棉网，好几部车上的棉网满布着云片，慢慢转动着，变成一根粗粗的生条。赵得宝对着一块块云片看得有点发呆了，不禁自言自语地说：

“这许多云片！”

余静像是地质勘探队的队员忽然在一个高山上发现了矿苗，喜悦地指着云片说：

“老赵，真像你刚才对张小玲讲的：这里面有问

题。”

老赵深思地唔了一声，仍然盯着云片。

“这一阵的棉网都是这样吗？”余静问站在她旁边的叫做戴海旺的中年男子。

“差不多。”他想起陶阿毛对他说的话，不满地说，“清花间拆烂污，除尘不净，杂质太多，造成棉网上云片过多。”

余静怀疑地问：

“清花间？”

“可不是。”戴海旺肯定地说，“你们到清花间去看看就晓得了。”

老赵在旁边答道：“这就去。”

余静一走进清花间，她就站在和花缸旁边，透过玻璃，看见各种纤维长度不同和品级不同的棉花变成一团，在和花缸里转动，互相调和着，互相搭配着。各种不同的棉花走了一道和花缸，又走第二道。这时棉花已经调和得相当均匀，它自动走进降尘机。棉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经过尘网到了尘室，这下面有地弄，把灰尘啥的输送出去。

赵得宝蹲下去歪着头看和花缸的眼子是不是完全开着。他看不清楚，问站在和花缸旁边的郑兴发：

“底下的眼子都开着吗？”

“开是开着，”郑兴发注视着余静，没有说下去。

余静知道他在探问是不是由于其他原因。余静没有吭气。她拉郑兴发一同走到给棉机面前望一望，一团团的棉花现在已变成厚薄均匀长宽相同的厚纸一样，慢慢卷起来，做成一个一个的棉卷。余静又仔细看看棉卷，然后问他：

“你看最近的花衣怎么样？”

“不大好，”郑兴发指着棉卷说，“杂质太多，怎么也去不净。”

赵得宝抓了一块花衣，撕开来细细地瞧着：

“这是啥花衣？”

郑兴发想了一阵子才记起，用怀疑的口吻说：

“他们说，叫次泾阳。”

赵得宝惊奇地说：

“次泾阳？这种花衣没有听说过。”

“是呀，我在清花间快三十年啦，也没听说过这古怪名字。”郑兴发说完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余静也没听说过这种花衣的名称，她以为已经摸到了问题的一点边，但是还远远不够，她望着郑兴发说：

“和花的成份怎么样？”

“和过去一样。”

“那为啥棉花杂质这么多呢？”余静在问自己，她没说出来。她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说：“用棉量呢？”

“比过去多。原来我们一件纱要用四百十斤花衣，现在要用四百二十多斤哩。听说梅厂长最近很不满意，认为工务上用棉太多，厂里赔本不起。”

赵得宝听得糊涂了，用棉量增加，和花衣成份和过去一样，生产出来的棉卷、棉条、粗纱和细纱却是这样。他皱着眉头，不解地望着余静：

“这是啥道理呢？”

“这里有问题……”像是从一条一条的小溪的上游在查看水的源头，余静特地从筒摇车间了解起，一直检查到清花间，她暗中分析，问题十有九是出在原棉上。但究竟是个啥问题呢？这就需要继续追查下去，找出确凿的证据，才能弄个水落石出，不能鲁莽地遽然下结论。她在冷静地思考，没有说下去。

“支部书记说的再对也没有了，问题一定不小！”

余静看见说话的是陶阿毛，她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转过去问他：

“你到清花间来检修车子吗？”

他信口“唔”了一声，说，“最近生活不好做，保全部不放心，到处看看，车子上再出毛病，问题更大了。”

“最近陶师傅倒是常在车间里转，不断检查机器。”郑兴发不了解陶阿毛到车间是别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见他到处看看机器，便信以为是真地在检查。

“这很好。”她问，“你看，毛病出在啥地方？”

“这个，”陶阿毛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等了一歇，才说，“工人之间意见很多，互相埋怨，你骂我，我骂你……”

他说到这里，眼睛注视着她，没有往下说。她接上去答道：

“这一点我也听说了。”

“天下工人是一家人，我们自己该团结起来，搞好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陶阿毛假装正经地说。

“你说怪我们工人不对吗？”赵得宝不等他说完，不满地打断他的话。

“老赵，等阿毛说完……”

余静要陶阿毛说下去。他的话刚才给赵得宝打断，见苗头不对，立刻改口说：

“我的意见不一定对……”

“对不对没关系，说出来好研究。”余静还是要他说。

他解释地说：

“我说，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那意思不是说责任在我们工人这方面，我亲眼看见，各个车间生活做得很巴结。我是说，我们自己不团结，容易给酸辣汤他们找借口……”

“你这个意见很好。”她点点头，说，“可是问题不在这儿，工人就是团结起来，生活不好做还是不好做。找出生活难做的原因，工人自然是会团结的。工人本来就是团结的。我们现在主要的是要集中力量找出原因来。”

“支部书记这么一分析，就把我的脑筋给打开了。我完完全全同意你的意思。余静同志，我真佩服你，啥麻烦事体一摊到你面前，你就看得清清楚楚。”陶阿毛怯生生地应付道，竭力保持表面的平静，内心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主要是靠大家的力量。”她想起各个车间的互相对立的情绪，问题很复杂，一定要理出个头绪来，便对赵得宝说，“张小玲的意见对，要召集各车间的人开会，把问题彻底摊开，让大家充分讨论，好好研究，找出根源，解决这个问题……”

陶阿手听到她说“把问题彻底摊开，让大家充分讨论”，心中不禁一愣，脱口说道：

“这……”

“你有啥意见吗？”余静问他。

他放声大笑，鼓掌道：

“这，这太好哪！”

35

余静和赵得宝从车间了解情况回来，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余静同志综合报告了各车间的具体情况，根据她的分析：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资方在这个问题上摆下了迷魂阵，迷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相当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首先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问题研究清楚，思想上认识一致，然后才有可能，也只有力量向资方提出交涉，解决这个问题。

支部委员和车间党的小组长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一致同意余静的分析。党支部委员会决定，先召开甲乙两班小组长联席会议，进一步了解车间思想情况，进行酝酿，使大家逐渐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召开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在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余静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主持会议的赵得宝接着站起来说：

“现在我们讨论。不管是出席的委员还是列席的车间小组长都可以发言。”

他的眼光向会场巡视了一下：五十多个人团团

围着长方形的桌子坐着，把一间会议室填得满满的。谭招弟回味着余静的话：筒摇间生活做不好，真的不能怪细纱间吗？从筒摇间的角度来看，当然只能怪细纱间，一则她不知道全厂的情况，二则细纱是不好么。细纱为啥纺不好，这不是筒摇间的事，由细纱间自己去动脑筋。工人当然要团结，但是团结起，也要把责任弄清楚。她把这意见低低告诉坐在她旁边的徐小妹。徐小妹点点头，完全同意她的意见：

“不怪细纱间，怪谁？”

她有意地向细纱间郭彩娣她们那些人狠狠地瞅了一眼。

郭彩娣听了余静的话心里有点难过，怨自己太粗心大意了，事体没有弄个明白，就怪粗纱间不好，影响了工人姐妹内部的团结，上了资方的当。她想站起来，走到粗纱间吴二嫂她们面前认个错，赔个不是，拉拉手。但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好像都在注视着她们，使她不好意思这样做。她感到吴二嫂的眼光盯着她，她惭愧地把头偏过去，望着赵得宝。

赵得宝站在那里等人发言，冷场了将近三分钟，没有一个吭气。钟珮文想站起来领导大家唱个歌，活跃活跃会场的情绪，但看到大家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气氛有点不对头，就没提出来，可是心里还是痒痒的，想唱。

“有话大胆说吧，不同意余静同志报告的，也可以说。说错了不要紧，大家讨论讨论，总有一个意见对的，最后按照对的意见办好了。”

谭招弟马上站了起来：

“我不同意。分明细纱纺的不好，细纱间当然有责任。我们筒摇间没有错怪了人。我们对细纱间也没有成见，我同细纱间的姐妹很好。我进厂，大家都晓得，是汤阿英姐姐介绍的。可是这件事，我们不满意细纱间。”

她说完了话，陶阿毛用胳膊轻轻碰碰徐小妹。徐小妹机灵地望了陶阿毛一眼，她懂得他的用意。有人赞成谭招弟的意见，徐小妹的勇气更大了。她便应声说道：

“谭招弟的话有道理。……”

徐小妹的话没说完，粗纱间的吴二嫂站起来发言了：

“招弟的话不对，她只是从筒摇间来看这件事体，不了解别的车间情况。余静同志跑了各个车间，她从全面来看，寻根究底，主要是原棉问题。我同意余静同志的意见。”

吴二嫂刚说完，徐小妹抢先站了起来：

“吴二嫂，平常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赞成，举你的手。这回，我不举手。原棉有问题？问题在啥地方？

刚才余静同志说了，她调查了用棉量，和过去一样。她又调查了和棉成份，还是和过去一样。同样的用棉量，同样的和棉成份，为啥纺出来的细纱不一样呢？你说不怪细纱间，那么，怪谁？”

余静的眼光一直停留在谭招弟和徐小妹身上。她知道工人同志们的认识有距离，要耐心细致地启发她们，帮助她们。她冷静地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

“招弟，小妹，你们说，怪谁呢？”

“照我看，是细纱间纺的不好。”谭招弟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去看看，纺的啥纱，毛头毛脚。”

“细纱间用的粗纱不好，应该怪谁？”余静问她。

徐小妹不假思索地说：

“粗纱间。”

郭彩娣听到徐小妹的回答，心里稍为平静了一些，她觉得这句话同时也是代她回答了筒摇间；你们过去骂细纱间，现在天良发现了，知道不能怪细纱间，而是粗纱间不对啊。

“粗纱间因为棉卷不好，”余静对吴二嫂望了一下，吴二嫂在注意听着她说，“杂质太多，除尘不净，影响了头道二道棉条，你说，怪谁？”

吴二嫂笑嘻嘻地直点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对，对。”

谭招弟想了想，肯定地说：

“梳棉间要负责。”她答复了余静，又对自己说，“不管你提多少问题，也难不倒我们。”

“那么，钢丝车的棉网上满布云片，这又该谁负责呢？招弟。”余静又进一步问。

“当然是清花间。”谭招弟不假思索地说。

“这么说，全部责任由清花间负吗？”

徐小妹“唔”了一声。

“为啥清花间出的棉卷不好？”

“花……，”谭招弟这个字刚说出了口，立刻又改口说，“不，他们做生活不巴结。”

清花间的老工人郑兴发忍受不住，他霍地站了起来，指着谭招弟忿忿地说：

“你哪能晓得我们做生活不巴结？别瞎三话四，到我们车间来看看。”

“你张嘴骂人？”谭招弟两只眼睛瞪着他。

“骂了你又怎么样？谭招弟碰不得吗？你是三头六臂，我也敢碰。”

“你，你……”谭招弟气得说不出话来。

“不要骂人，郑师傅，有话好好说。”陶阿毛指着清花间的郑兴发，说，“刚才赵得宝同志说了，有话大胆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各说各的理由，提出来大家好讨论。”

“理由？”郑兴发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他想不

到东怪西怪，最后怪到清花间的头上，还说做生活不巴结，这些日子差点把这条老命都要搭赔进去哪。他气生生地说，“这是啥理由？”

大家的眼睛盯着谭招弟和清花间的郑兴发，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会场上浮动细碎的人声。大家的心里很激动，有的赞成谭招弟、徐小妹的意见，有的同情清花间郑兴发的。每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有点不安，都想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会儿这地方伸出一个头来，一会儿那个地方又伸出一只手来，全想说话。因为余静直摆手，大家才坐定。乱哄哄的会场像是一片揉皱了的绸子，给余静的手一抹，又恢复到原来平整的样子了。大家完全肃静下来，窗外车间的轰轰机器声有节奏地传来。余静望了大家一眼，说：

“大家不要急，我们先让谭招弟同志说完了再讲。招弟，你到清花间看过没有？”

谭招弟脸上发烧，她把披在鬓角上的头发往耳朵后面一放，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我也不是清花间的挡车工，到他们那里做啥？”

“你没有去过，哪能晓得清花间做生活不巴结呢？”秦妈妈单刀直入，质问谭招弟。

“这个问题问的好。”钟珮文忍不住插了一句。

谭招弟立刻瞪了他一眼，怪他多嘴多舌。

郑兴发对谭招弟说：“你听见秦妈妈说的话吗？”

他忍不住鼓了两下掌。

“我也不是聋子。”

“那你亲眼看见我们做生活了吗？”

“这还用看。”谭招弟低着头，她的两只手紧紧握着，一会又松开，不晓得放在啥地方好，嗫嚅地说，“生活做成这个样子，猜也猜得出是啥原因。”

“你……”郑兴发又急了。

“没有看见的事情，不好凭猜想。”余静很冷静地说，“那是主观主义。”

谭招弟还有点不信服：

“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啥主义不主义。同样的用棉量和配棉成份，为啥出来的棉卷不好？这能说生活做得很巴结吗？”

“对啊！”这是徐小妹的声音。

郑兴发猛可地站了起来，他伸出颤抖着的手，说：

“我们一同到清花间去看看……”

他边说边走过来，真的想拉谭招弟去清花间看看。

余静止住了郑兴发，她说：

“我和赵得宝同志到清花间仔细看过了，他们的劳动态度很好，生活做的很巴结，机器也没有毛病。为啥从前生产出来的棉卷好，现在生产出来的棉卷

就不好呢？招弟，小妹，你们想想看。”

徐小妹着急地望着谭招弟。她想帮她的忙，说两句，但是余静的谈话，像是剥笋一样，一层深一层，最后剥到问题的核心，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强有力地说服了每一个人。徐小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懂得了，余静同志，这不能怪清花间。”

“对。”余静的嘴角上露出了笑纹，她的脸对着谭招弟，耐心地说，“招弟同志，你看呢？”

谭招弟低着头，窥视了徐小妹一眼，怪她这么快放弃自己的意见。她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郭彩娣兴奋地走到吴二嫂面前，一把紧紧地抱着她，抱歉地说：

“我代表细纱间，向你赔个不是，过去我们错怪了你。请你原谅我。”

吴二嫂感动得眼角上流下两滴眼泪，她激动地说：

“不要紧，事体说清楚了就算了。我们谁也不要怪谁，这件事幸亏余静同志，”她笑盈盈地指着余静，说，“把我们的眼睛擦亮了。……”

谭招弟很奇怪，郭彩娣为啥那么快认错，老实说，她自己对这件事还要保留意见。

郭彩娣听吴二嫂说话，句句打在她的心坎上，她觉得这件事自己没弄清楚，怪张三怨李四，是自己不

对。她伸过手去热烈地握着吴二嫂的手，她张开嘴还想说几句，两个眼眶却红了，鼻子一酸，差点要哭出来。她掏出手绢，捂住鼻子，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她要说啥。

秦妈妈见郭彩娣很激动，便对大家说：

“我们工人兄弟姐妹，事体说开了，大家明白，谁心里也不要怨谁，谁心里也不要难过，大家团结起来，别再闹意见，把原因找出来就好了。”

会场上掀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陶阿毛的掌声特别响，他甚至于欢呼起来了。好像她真的赞成秦妈妈的意见，心里却想：我看你们有啥办法把大家团结起来！掌声停下去，钟珮文站了起来，他语义双关地说：

“平常教你们唱的歌子忘了吗？”

大家想不到他这句话是啥意思，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很得意把大家的眼光吸到自己的身上来，有意不慌不忙地说：

“我不是教你们唱过《团结就是力量》吗？”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他说话的意义。郭彩娣笑了，赞赏他的口才，说：

“说话真会绕弯。”

谭招弟撇了撇嘴，说：

“作家么。”

郑兴发也笑了：

“还是歌唱家哩……”

张小玲打断郑兴发的话说：

“谈正经的，我建议：请余静同志代表我们向资方交涉，查出原棉里面的问题，好不好？”

“好！”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示大家认识一致，表示大家亲密团结，又表示大家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旺盛的斗争的意志。

可是谭招弟心中却想：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看究竟是啥原因。

36

巧珠奶奶点上煤油灯，草棚棚里还是看不大清楚，墙角落那儿黑漆漆的。夜风从门外唿哨地吹来，煤油灯芯的火头跳跃着，一闪一闪的，好像随时要熄灭一样。她过去把门关紧，回来把灯芯捻小了一点，怨天尤人地叹了一口气，对坐在她正对面的余大妈低低地说：

“命里注定有的，这小东西就不会走；不是阿英的，就是不早产，我看也活不长……”

那天夜里汤阿英给抬在医务所，经过医生的检查和治疗，她怎么也睡不着，老是在问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长的模样儿怎样。护士根据医生的指示，把孩子送到她的床边，给她他仔仔细细的看个够，是个男的，她脸上立刻漾开了笑纹，眼皮慢慢搭拉下来，含着微笑睡觉了。

孩子到了第二天下午发生了变化，哭声小了，低沉下去，有些干哑，既不吃奶，也不喝水，眼睛总是闭着，呼吸有点急促。医生看情况不好，没敢告诉汤阿英，马上和余静商量，决定送到市立医院去抢救。医生陪同张学海一道把孩子送进了医院，因不足月，又受了点凉，这个刚投生到世界上来的微小的生命，到第三天上午，便离开了欣欣向荣的祖国。张学海像一段木头似的站在孩子身旁，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刚刚得到长久所希望的一个男孩，谁知道一到手就又走了，心中感到怅惘和无边的空虚。

张学海把孩子带回草棚棚里，汤阿英不顾自己虚弱的身子，从床上跳下来，把尸体抱在怀里，一边亲着他的小脸蛋，一边嚶嚶地哭泣。她的泪水流在他紫而发灰了的小脸上。

学海劝了她许久许久，她才把他放在摇篮里，可是还不断摇他，仿佛他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她摇摇，望望他，自言自语地喃喃着：

“这小脸长的可圆，腮巴子上的肉多厚实，眉毛很清秀，长大了一定很聪明……”

“去歇一会吧。”张学海说。

她对张学海说：

“不累。”

越看，她身上越有劲，竟忘记疲乏了。

“躺一下吧，”巧珠奶奶说，“产后身子要紧……”

“没关系。”她的眼光一个劲儿盯着孩子的脸蛋，那眼光渴望着奇迹：孩子忽然复活了。

可是孩子直苗苗的静静躺在摇篮里，再也不能动了。学海怕她身子顶不住，也怕她太伤心，要马上把孩子埋掉。她转过头来，两道眼光像是两把锋利的宝剑的光芒，直逼着张学海，清癯面孔的皮肤绷得很紧，说：

“你……你……”

张学海自从认识了汤阿英以后，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激动，这样愤怒，真把他吓了一跳，连忙放下笑脸，带着赔不是的神情，低低地说：

“你要怎么样，都依你……”

她听到这句话，心里稍为宁静一点，面孔的皮肤也松动一些，叹了口气，说：

“你不能把我心头的肉拿掉……”

他这才懂得她的意思，接过去说：

“好，不埋，不埋……”

“学海答应你了，”巧珠奶奶早盼望晚盼望，就想有个孙子抱抱，没想到生下来三天就走了。她一边劝阿英，一边按捺住心头潮涌似的悲哀，用袖子拭去眼角的老泪，呜咽一般的说，“你就躺到床上歇一会吧，身子要紧……”

汤阿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把摇篮搬到我床面前来……”

“好的，”张学海过去搀扶汤阿英，一边说，“你先上去，我来搬……”

汤阿英靠墙坐在床上，并不躺下，两道眼光发痴发呆一般的对着摇篮。

巧珠奶奶走到摇篮旁边，两只布满皱纹的手扶着赭红色的摇篮架子，聚精会神地贪婪地望着那两眼紧闭的孩子。望着望着，一阵心酸，泪水簌簌地落在摇篮里，忍不住哭出声音来了：

“早巴你，晚巴你，巴到你出世，你就去了……”

学海走过来劝她不要哭，她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泣着：

“我的小孙子，我的小孙子啊……”

汤阿英刚抑制住自己悲哀的情绪，给巧珠奶奶一阵阵凄凉的叫唤声，又从她的心底勾引起无限的悲恸。她的眼泪盈眶，使得她对面前的摇篮也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了。她拭去泪水，压抑着心中的悲恸，想劝巧珠奶奶，她刚叫了一声：“奶奶，你不要……”泪水怎么也忍下住了，顺着腮巴子直流下来了，心中的悲恸再也压抑不住，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了。

婆媳两个哭成一片。张学海这边看看，那边望望，谁也劝不住。他急躁地说：

“孩子死都死了，哭有啥用呢？再哭，也活不了哪。”

他在草棚棚里走来走去，见劝不了她们，便生气地说：

“哭吧，哭吧！”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她们两个人的哭声小了，低沉了，最后成了干嚎，嗓音嘶哑了。学海给她们倒了两杯开水，让她们两人喝了水，又递过手巾给她们揩了泪水和鼻涕。巧珠奶奶拿着手巾，指着摇篮里的小东西说：

“你，你好命苦啊，生到我们张家来，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就……”

她又忍不住心酸了。张学海看苗头不对，连忙把

妈拉到靠墙的板凳上坐下，说：

“歇一会吧。”他心里想死鬼放在家里，婆媳两个望望就哭，那怎么行？还是早点埋了好。不过阿英不同意，但先说服了妈，阿英慢慢也会同意的。他想了想，说，“我看，还是早点埋了好，也让死鬼安宁……”

汤阿英不等他说完，拦腰打断道：

“学海，你又……”

“迟早总要埋的，”他立刻退让了一步，但旋即又拉过巧珠奶奶来，说，“你看呢，妈，早埋早安宁……”

这一句话说到妈的心里。她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对阿英说：

“学海讲的倒也对，入土为安。把死鬼搁在家里，小东西也得不到安宁……”

汤阿英的眼光直盯着摇篮，望了许久许久，心里已给巧珠奶奶说动了，可是她嘴上还是不肯，语气却缓和了一些：

“今天无论如何不埋……”

他紧接上去说：

“那么，明天早上……”

阿英没有言声。巧珠奶奶看她神情同意了，她自己倒反而留恋起来，其实她心里也并不完全愿意立

刻把小东西埋掉。她顺着学海的意思说：

“也好，就明天吧。”

汤阿英除了自己睡觉以外，她的眼光从不离开摇篮。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完全亮，大家睡得正酣，她醒了，轻轻下床，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在草棚棚里慢慢走着，低低地叫唤：

“宝宝，宝宝……你为啥不答应我，宝宝……”

孩子像是睡熟了一样躺在母亲的手上。张学海起床，看见她又把孩子抱在怀里，立刻叫醒了巧珠奶奶。他对阿英说：

“你又抱他做啥？”

“再不抱，等会儿就没有的抱了。”她把他抱得更紧，仿佛永远不让他离开自己的怀里。

学海没有跟她争执，怕又勾起她的心思，把他埋了就好办了。他到外边买了一口小棺材来。阿英亲自给孩子洗了脸，穿好衣服，对他望了又望，才不舍地放到棺材里。学海掂起小棺材往外去，阿英跟了上去。他劝她不要去，巧珠奶奶也说产后不要招风凉，不让她去。可是她不顾一切，一定要去。她拿了一条毛巾，把头扎了，紧紧跟着他，要一道去。他拗她不过，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拉起篷子，一同去了。

学海把小棺材埋在郊外野地里，做了一个小土堆。阿英站在新坟旁边，迟迟不走。他只好陪她，一

边再三劝她，她才肯坐上三轮回来。一回到家里，她看到摇篮空空的，像丢掉最心爱的宝贝，永远再也得不到了，满眶热泪，忍不住簌簌落下。她伏在枕头上，痛哭失声，凄凉地叫唤着：

“我的宝贝，我的命呀……我的命，我的宝贝呀……”

现在谁也劝她不住。学海赶着上班去了，巧珠奶奶给她煮粥。

天黑以后，余静的母亲——余大妈来探望她。巧珠奶奶知道她在床上睡觉了，就没叫她，和余大妈谈话的声音也有意放得特别低。

余大妈不同意巧珠奶奶说这是命里注定的：

“你这个话不对……”

“不对？”巧珠奶奶大吃一惊，她以为自己的话再对也不过了，反问道，“为啥不对？”

“要是不早产，怎么会活不长呢？”

巧珠奶奶给余大妈一问，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在暗弱的灯光照耀下，她望望摇篮，又窥视了一下床，看阿英醒来没有。阿英闭着眼睛躺着，轻轻地而又均匀地呼吸着，看样子还没有醒。她说：

“要是活的长，怎么会早产呢？这是命里注定的。”

这个似是而非的意见可难住了余大妈，她嘀咕

着：

“早产……”

“是哇，”巧珠奶奶以为她给自己说动了，又加了一句，说，“早产，也是命中注定的。”

“命？”余大妈回味着这个字的意义。余静从小在厂里就和一些进步的工人姐妹们往来，后来和袁国强结婚，又加入了共产党。母亲在家里常听孩子谈一些革命的道理，对“命运”这一类说法她是不大相信的。最近听余静回来谈起厂里生活难做的情况，她更不相信巧珠奶奶的意见，反问道，“早产也是命中注定？”

“当然是命中注定，”巧珠奶奶毫不犹豫地说，“不是命中注定，为啥巧珠不早产，偏偏这个死鬼早产呢？”

“我听余静这孩子说，这一阵厂里生活难做，好人都吃不消，孕妇怎么受的了？碰巧阿英这一阵又当夜班。”

“厂里生活难做？”巧珠奶奶反复说着这一句话，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学海阿英他们回到家里来很少和巧珠奶奶谈起厂里的事。巧珠奶奶自己对厂里的事也没有兴趣。她有兴趣的是到一个号头把工钱拿回来，买些柴米油盐，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在她跟前，大家吃得饱饱的，生活得平平安安的。听余大妈

说厂里生活难做，她心里暗自吃了一惊，却不承认不知道厂里的情形，装出也知道的神情，慢吞吞地说，“厂里生活当然不会好做，从前也难做，巧珠为啥没早产？”

“这个，那时阿英没当夜班，”余大妈看她那股坚持劲，料想她不大了解厂里的情形。她深知这位老好人的脾气，顺着她的嘴说，“是呀，从前生活也不好做，听说，现在的生活更难做，细纱间里头断的数不清，连上小间的工夫也没有，有的把尿就撒在裤子里，有的饭也顾不上吃，有的放工腿都麻木了……这些，我想，你一定晓得。”

余大妈的眼光望着她眼角上的扇形皱纹和鬓角上花白了的头发。她会意地点点头，并且叹息了一声，说：

“这个，我晓得。”

但她心里说：怎么学海和阿英回来都没有谈起呢？阿英早产的情形怎么样，她也不甚了然。她想到床边去问问阿英，又怕触动阿英的心事，也露出自己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她暗中对自己说：“等学海回来问他。”

“生活不难做，阿英不会早产的。”

巧珠奶奶心里想，阿英早产真的和命运没有关系吗？她总觉得冥冥之中有菩萨在给人们做主，安排

一切，不然为啥有些人生下来就有钱，有些人生下来就受苦呢？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也是命啊。”

“也是命？”余大妈以为她同意了，没料到她进一步固执自己的看法。

“当然是命，”巧珠奶奶的口气非常肯定，“不是命苦，怎么会做厂？不做厂，生活难做也没关系。”

“做厂也不是命苦，”余大妈摇摇头，说，“从前做厂没面子，现在做厂可光荣，是工人阶级哩，最吃的开哪。”

“一样，都是做厂。有钱的人家，哪个做厂？”巧珠奶奶撇一撇有点干瘪的嘴，说，“前生没修，今生才受苦——做厂。”

“做厂也不是受苦……”

余大妈的话还没有讲完，草棚棚的门好像有人砰砰敲了两下，她说：

“有人敲门？”

巧珠奶奶凝神一听：门外静静的，没有人继续敲门，只听见晚风像一个贼似的从门缝里钻进来，发出细细的响声，吹得巧珠奶奶的腿有点发冷。

虽然再也没有听到敲门的声音，门外确实站着一个人：谭招弟。她听说阿英在车间早产了，心里痛楚。第二天想去，汤阿英和刚生下的孩子到医院去

了。过了一天，又听到孩子死了，她心里更痛楚，偷偷地掉下了眼泪。昨天想来，走到半途上又退回去了。她怕在阿英家里碰上细纱间的人，在阿英面前冲突起来，说不过去。今天放了工，估计没人会来，赶到阿英家，轻轻敲了两下门，发现草棚棚里有人在谈话，就没有再敲门。她想回去；但隔着一扇门，进去马上可以看到阿英，又不忍离开；犹犹豫豫地站在门外边，悄悄听门里的动静。

门里边有人继续讲话：

“做厂不苦，有钱的人为啥不做厂？”

“有钱的人剥削穷人，当然不做厂。”

“剥……剥啥？”

“剥削。”

“啥剥削？”

“就是你做活，他赚钱。”

“这个……”

“唔……”

谭招弟听出来是巧珠奶奶和余大妈的口音，放心了，又敲了两下门，门开了，谭招弟走了进去。巧珠奶奶问她：

“刚才是不是你敲门？”

谭招弟点点头。

“后来为啥不敲了？”这是余大妈问。

“怕打断你们谈话。”

“这丫头，也不是外人，这么客气。”巧珠奶奶拉着她的手，说，“快坐下来，喝点水。”

谭招弟的眼光向草棚棚里匆匆一扫，没有看见阿英，她吃惊地问：

“阿英呢？”

“睡觉了。”

谭招弟马上走到床边坐下，把那顶灰黑灰黑的夏布帐子吊高一点，方桌子上煤油灯的黯淡的光线射在她苍白的贫血的脸上。她平静地呼吸着。谭招弟低低地叫了她两声。她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谭招弟坐在她的身旁，惊喜地从被窝里伸出两只手来，歉意地紧紧抓着她的手：

“你啥辰光来的？”

“刚来……”

她安心一点，顿时想起郊外那一堆新土，眼眶里润湿，低沉地说：

“你来迟了一步，看不到那个小东西了，长的模样可好看哩……”

谭招弟怕引起她的心思，连忙说：“过去的事体别提了。”旋即把话题岔开，“身子好吗？”

她伸过手去，摸摸她用手巾扎着的额头，问：

“头昏吗？”

“有点。”

“要好好养养。”

谭招弟这句话提醒了巧珠奶奶。她站了起来走到墙边炉子那里端起上面的小沙锅，里面是热腾腾的粥，倒了一碗，放了两勺子红糖，调得匀匀的，白粥旋即变成红粥了。她把红腻腻的粥送到阿英面前，说：

“该饿了，吃点吧，这是补的。”

阿英吃了两勺就放在床边，不吃了。巧珠奶奶又端到她面前，说：

“吃完它。”

“吃不下。”

“你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哩。”

余大妈也走过来，站在床前，对阿英说：

“听你婆婆的话，吃吧。产后要多吃东西，我们从前做月子，老人家也是叫我们多吃。产后失调，身子要虚弱的。”

阿英又接过那碗红粥。巧珠奶奶望着她吃了一勺，皱起眉头，又不想吃的样子，便坐到床边说：

“我来喂你吧。”

阿英的眼光注视着空空的摇篮，叹了一口气说：

“实在不想吃……”

“不想吃，也要吃，身子要紧。”巧珠奶奶想去把

碗拿过来喂她。

她紧紧拿着碗，不让巧珠奶奶喂。要是给巧珠奶奶喂，不晓得要她吃多少哩。但她没法拒绝老人家的热情，只好又吃了两勺，立刻打噎了。她吃力地把碗放在床边，哀求一般的说：

“真的不能再吃了。”

巧珠奶奶像是对待小孩子一样的对阿英说：

“再吃一勺，好不好？”

她又打了一个噎。余大妈怕她吃下去要吐，劝巧珠奶奶：

“不想吃，就别吃了，等一歇再吃吧。”

“也好，”巧珠奶奶拿过那半碗粥来，说，“等一歇热给你吃，多吃点，对身子好。”

谭招弟把阿英的两只手放到被窝里，要她躺下，她不肯。谭招弟拿一个枕头垫在她的腰部，让她靠着，把被子拉上一点，直盖到她的胸部，身子两边的被角塞得紧紧的，说：

“要小心，别受凉……”

“对呀，”巧珠奶奶说，“阿英现在变成小孩子了，像巧珠一样，啥事体都要人照顾……”

谭招弟“咦”了一声，向床里床外看了看，关切地问道：

“巧珠呢？”

“她怕，”巧珠奶奶暗示地对摇篮指指，说，“到对面秦妈妈家去住了。”

谭招弟会意地不再问下去，看到摇篮，想到那孩子，她的头不好意思地慢慢低了下去。她有一肚子话要和汤阿英讲，见了汤阿英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像是在理一把乱七八糟的纱似的，努力回想着脑海里要讲的话，在复杂而又紊乱的记忆里，逐渐理出个头绪来：

“阿英，我早就想来看你……”她脸上露出抱歉的神情，想说下去，话到嘴边，又停下了。

“生活难做，”阿英毫不介意地说，“你忙……”

“忙是忙，也该来看看你，”她鼓足勇气，说，“生活也真难做，是我说过细纱间不好好做，但并不是讲你啊……”

她热情的眼光对着阿英，期望阿英的原谅。阿英莫名其妙，无所谓地说：

“讲我也没关系……”

“你做生活巴结，身子累成了这个样子，谁也没有二话说，可是有些人，就不像你……”

汤阿英明白谭招弟的意思，郭彩娣和细纱间别的姐妹们的声音在她耳际萦绕着。她知道谭招弟的脾气，扭住一件事很难想通的，但她不能不给谭招弟说说清楚：

“细纱间做生活，谁也不推板……”

“这个，这个……”谭招弟说不下去了。

巧珠奶奶一直在谛听她们两人谈话，可摸不着头绪，不晓得她们谈些啥。余大妈听余静回来讲过各个车间争吵的情形，了解一些，很有兴趣地听她们俩人谈。谭招弟对阿英说：

“你埋头巴巴结结做生活，哪能晓得别人在揩油……”

汤阿英把头上的手巾解开，扎得紧些，问她：

“你哪能晓得她们揩油？”

“唉，”谭招弟感到自己很有道理，只是汤阿英不清楚，有点儿着急，辩解道，“一看纺的纱，谁都晓得。”

“什么娘养什么儿子，什么粗纱纺什么细纱。你怎么一口咬定怪细纱间呢？招弟，郭彩娣她们很不满意你，你要多想想。”

“她们不满意我？”谭招弟感到很惊讶，撇着嘴说，“我还不满意她们。”

“你不能乱怪人。”

谭招弟毫不客气地顶汤阿英一句：

“别人也不能乱怪我。”

她本想和汤阿英解释清楚，私下说服汤阿英，没料到汤阿英在批评她了。她按捺不下心中的气，嗓子

也高了起来。她还要说下去，立刻给余大妈打断了她的话：

“招弟，你不是来看阿英的吗？她在月子里，怎么和她吵起来了？”

谭招弟声辩：

“我没有……”

“厂里的事，到厂里谈去。我听余静说，你们不是要开劳资协商会议吗？”

汤阿英听到要开劳资协商会议，浑身顿时有了劲头，曲着身子，冲着余大妈，兴奋地问：

“真的吗？”

谭招弟代余大妈回答了：

“真的。”

汤阿英的眼睛里露出希望的光芒：

“快点弄清楚了，生活才好做。”

37

韩云程工程师在试验室里面翻阅着试验记录。他翻一页眉头就皱一次，翻到后来，沉下了脸，眉头干脆连成一条粗黑线，焦急地对工务主任郭鹏说：

“你看！”

试验记录簿上写着：

八日

二十支粗纱过粗过细的程度过大，究其原因，原棉太差。望再请求多加生棉，补救万一。

九日

若二十支配棉中成份无法增加生棉，则轻纱纺出，恐难成事实，唯有将速度再退慢。

二十二日

二十支细纱近日生活恶劣，究其原因，原棉太差，故将全部暂加一牙。……

郭鹏看过之后，向四面望了望，除了拉力试验机这些仪器之外，试验室里这时正好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走过去，对他说：

“是呀，我们早就提出来，请求改善配棉成份，可是这些意见送上去，如同石沉大海，到现在也没消息。”

郭鹏伸出两只手，耸一耸肩膀，显出毫无办法的样子。

“就让它这样下去吗？”韩云程反问了一句。

“那，那……”郭鹏想不到韩云程会这样问他，有

点慌张，一时答不上来，半晌，才说，“那，那当然不能让它这样下去。”

“你看哪能办法？”

郭鹏刚才很吃力地抵挡过去，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又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他张皇失措了：

“我看没有办法，”他说出了口觉得不对，旋即更正道，“我，想不出啥办法。”

“是没有办法，还是真的想不出办法？”

韩云程两道尖锐的眼光注意着郭鹏。他对郭鹏那天在总经理室里讨论配棉问题时的态度有点意见。现在生活难做，车间里充满了怨言怨语，货色不合规格，外面市场上也有不少流言蜚语。这些话都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作为沪江纱厂工程师的韩云程是脱卸不了这个责任的，而韩云程工程师从中学读书的辰光起，他不管是读书或者办一件事，总希望做得很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好。他在中学和大学的功课至少是保持前五名，理工方面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事体交给韩云程办，同学和同事们没有一个人不放心的，也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会不成功的。他是个一题数学算不对宁可一夜不睡觉的。他最近到车间去走了一趟，了解一些车间工人们不满的情绪，刚才翻着试验纪录簿，责任自然而然要落到工程师

的头上，不改变配棉成份不行，那工人同志会有意见；改变配棉成份也不行，徐总经理一定不答应的。他处在两面夹攻的困难的境地里，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向郭鹏提出了问题。

郭鹏不了解韩云程的心情，给他没头没脑的问题弄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敢答复得太慢，他说：

“不是，不是。”

“是啥呢？”

郭鹏茫然不知所对，楞着两只眼睛，木然地站在韩云程面前。韩云程说：

“我早就说了，掺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黄花衣会影响质量的……”

“我同意你的意见的。”

“这我晓得。”韩云程的眼光盯着他，一点也不放松，说，“可是你给它想的好名字：次泾阳。”

郭鹏把头低了下去，不敢看韩云程。他身上的血涌到脸上来，虽然微微低着头，也隐藏不住脸上惭愧的表情。

沉默了一会，郭鹏慢慢抬起头来，仍然不敢正面望着韩云程，他的眼光望着试验室里的拉力试验机，低声地说：

“徐总经理看你没有啧声，硬逼我，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并不是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的。次泾阳这

名字是我随便胡诌，顺嘴溜出来的。”

韩云程想起那天的情形，软弱的年青的郭鹏，当然承受不了徐总经理的压力。这时，他有点同情郭鹏了，说：“现在车间里生活难做，工人埋怨，我们工程上的人是脱不了这个责任的。我固然要负责，工务主任的责任也不小啊。”

郭鹏一怔，他刚抬起的头又自然而然地低下去。他心里很难过，韩云程对他虽然很严厉，但是他感到很亲切；徐总经理对他的亲切，他倒觉得很厉害。他自己一时没有了主意，求救似的望着韩云程：

“你看怎样呢？韩工程师。”

“我看，不能让这样情形继续下去，”韩云程想了再想，终于说出自己的意见，“要改变这样的状况，要求徐总经理梅厂长想办法……”

郭鹏听了这话暗自吃了一惊：这样的大事工务上有啥办法，徐总经理和梅厂长会答应想办法吗？上一次在总经理办公室里早提过了，那时不肯，现在肯吗？那天徐总经理的每一句话都在他的脑筋里重复着，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响亮，“要工务上负责……要工务上负责……”郭鹏怀疑地望着韩云程：

“能改变吗？”

“你不提出来，当然没有可能；你提出来，就有可能。”

“总经理和厂长有啥办法呢？”

“办法当然有，就怕他们不肯……”韩云程又想到改变配棉成份的问题，可是他没有说出口。

“哦。”郭鹏惊诧地哦了一声。

试验室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韩云程拿起耳机，说：

“唔……我就是……是的……好……我们马上就来……”

他放下耳机，对郭鹏说：

“总经理到厂里来了，梅厂长打电话来，要我们两个人一道去谈谈。”

“要我也去？”郭鹏用手指指着自己说。他想起徐总经理的那副面孔，说不定要他做啥，或者韩工程师在总经理面前要他不做啥，那可就为难了他。这不是逼着姑娘上轿吗？他犹豫地说，“韩工程师，我手里还有事没办完哩，你一个人去吧。”

“正是机会，你为啥不去？”

“我，我，”郭鹏口吃地答不上来，“我去，……你先去好了，我把配棉量再算算就来……”

“不，一道去。那个等一等再算。”

韩云程拉着郭鹏一道去梅厂长办公室。他们路过总办公室。遇到会计主任勇复基，韩云程拉他一道去，人多噪子响，好提起徐总经理注意。勇复基怕事

情惹到他身上，看韩云程要拉他去，他把袖子一甩，慌忙溜走，一边又怕得罪韩云程，远远地解释说：“又快到月底了，很多账还没有算哩。你们去吧。”

徐总经理坐在双人沙发上，梅厂长紧靠着他，低声地向他报告最近厂里生活难做的情形：到处发生不满的怨声，尤其是汤阿英在车间早产，更增加工人不满的情绪。梅厂长感到情况严重，自己有点吃不消。徐总经理却无动于衷，脸上露出很有办法的神情。梅厂长再进一步说明不但工人当中不满，连韩云程郭鹏他们这些人也有怨言。徐总经理这才认为情况有点严重，他想到不及时处理，恐怕连梅厂长也要不满了。他对梅厂长笑了笑，说：

“你是不是也不满意呢？”

“不，完全不，只要是总经理决定的事，我没有不满意的。”梅厂长说完了话，他注意徐总经理眉宇间的表情。

“你对他们的控制是不是失去了信心呢？”

“也不，完全有信心。只要总经理支持我，我办事都有信心的。我刚才不过是把全厂的情况报告总经理，好让总经理决策。”

“那你把韩云程和郭鹏叫来吧，我亲自和他们谈一谈。”

韩云程和郭鹏走进梅厂长办公室的时候，徐总

经理撇下梅厂长，指着他对面单人沙发对他们说：

“请坐，”他装着不了解最近厂里情形的神情，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们最近的工作怎么样？”

韩云程盯着郭鹏，说：

“你向总经理报告一下吧。”

郭鹏一愣：“我？”

徐总经理说：“你先谈谈也好。”

“我们的工作还好，”郭鹏身上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说话，这就是韩云程的眼光。他吞吞吐吐地说，“只是车间，车间的生活不大好……”说了一点他又停住了。

韩云程从旁接上去说：

“车间生活难做，一个女工早产……”

徐总经理的眼光转过来对着韩云程。他察觉韩云程在指使郭鹏说话。他知道只要说服韩云程，郭鹏一拉就过来的。郭鹏迟疑地不说下去。徐总经理不催他，却暗暗点韩云程：

“那么，你说吧。你自己说比他说可能更清楚一些。”

韩云程详细地谈出车间生活的困难情况。徐总经理一口咬定保全部：

“我看保全部有问题，不好好保护机器，生活当然难做，自然影响质量。”

韩云程懂得徐总经理的弦外之音：这事工程师和工务主任也有责任。

“是的，保全部可能也有问题，不过，我看，配棉成份恐怕也有问题，总经理。”韩云程说。

“这仅仅是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说到这里徐义德立刻把问题扯到工人身上去，说，“工人也有责任。并且，我也不相信生活真的那么难做，刚才我听你的报告，其中有夸大之词。孕妇自己不小心，随时随地都可以早产，这和生活难做不难做毫无关系。”

“我夸大？”韩云程有点忍耐不下去，他想顶过去，接着想起自己不过是徐总经理的一名工程师，生活好做难做又何必那么认真呢？

梅厂长插上来附和徐总经理的意见：

“我跑车间的辰光，觉得生活还好做么。”

“好做？”韩云程不同意梅佐贤的话，他说，“那么，请厂长同我一道去看看。”

“用不着了，”对于车间生活难做的情况，徐总经理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不报告，也可以想象到的。他有意把问题分散开，怪张三怪李四，来掩盖配棉的成份问题。他看韩云程那一股认真劲头，怕把事情弄僵，改变口吻说，“当然，生活有点难做，我也了解的。”

“唉，这样的配棉成份，”韩云程见徐总经理已经

承认了事实，便进一步关怀地说，“总经理，请恕我冒昧讲一句话，我们这样做下去是不是好？将来会不会出事，要请你仔细考虑考虑。”

他说完了话，眼光就对着郭鹏。郭鹏的眼睛避开徐总经理和韩云程，他望着梅厂长。他认为韩云程这些话的份量太重，徐总经理要是发起脾气来，对自己是不利的。他觉得韩云程未免太傻，质量好坏并不影响到自己的薪水，韩云程为啥一股劲争呢？他不知道生活难做，车间首先会怪到工程师头上，而现在事实上对韩工程师已经有了闲言闲语。他不得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徐总经理料想不到他对韩云程让了一步，对方马上又紧逼一步，向他进攻，而且刺痛他的伤疤。他脸色气得发白，愤愤地说：

“代纺只有二百四十个单位的工缴，哪能维持？不这样做，有啥办法？就是这样做了，我们的厂都不能维持，我有啥办法，你说。”

韩云程见风色不对，没有再吭气。

梅厂长帮腔道：

“那是的，总经理为了维持我们这厂，可真是用尽了心血。”

徐总经理听了梅厂长的话，气稍为平了些，语气也缓和了。他接着说，讲的比唱的还好听：

“我为了厂想尽一切办法，这也是为了大家。你们不清楚，佐贤是了解我的苦心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何必这样操心，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努力维持厂，也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业化。”

“这我完全了解。”梅厂长笑嘻嘻地说。

徐总经理的眼光落到郭鹏的身边。郭鹏没有吭声。韩云程心里想：“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为了国家和工业化，能够这样做吗？老是唱高调，有啥用！主要是为了你，你不听，出了事，还不是你完全负责，也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韩云程见郭鹏不吭气，他忍不住，觉得自己有责任再提醒徐总经理一次，不要将来出了事，怪工程师没有及时提出问题来，于是继续提出意见：

“车间生活确实很难做，总经理，要是工会提出意见来，事情就麻烦了。”

郭鹏“唔”了一声。

徐总经理毫不在乎，拍着胸脯，大声地说：

“工会问题我和梅厂长去说明，你们大胆配出应用好了。簿子上可以写明是按总经理关照，或者要梅厂长签字也可以。有谁讲话，梅厂长去解释，你们怕做难人，不要你们做，一切责任完全由我徐义德负。”

38

下午两点钟。

在劳资协商会议上，余静代表工会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最后说：

“根据我们工会方面的材料和分析，最近我们厂里生活难做，主要是原棉问题。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下去要影响全厂的生产，影响成品的质量，影响工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汤阿英因为生活难做，过度疲劳，在车间早产，她一心一意巴望有个儿子，这次真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早产，孩子死了。她到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还会发生汤阿英事件的。”

余静一说完了话，秦妈妈便气愤填膺地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高声地说：

“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这不是小事，关系我们工人的健康，关系我们工人的生命，绝对不能马虎。汤阿英是我们厂里最好的工人，思想好，工作好，做生活极巴结。生活难做，把她累坏了，在车间里早产，没两天这孩子就走了，汤阿英哭得死去活来。别说

她，我们工人晓得这件事没有不伤心的！人心是肉做的，哪个不是娘养的，哪个没有儿女？将心比心，你说，你们资本家的儿女是儿女，我们工人的儿女就不是儿女吗？”

她这番话说得大家动容，工人愤恨。徐义德坐在她斜对面稳稳不动，面部没有一点表情，叫你摸不透他心里在想啥。等了半晌，他不慌不忙地说：

“秦妈妈，有话慢慢讲，不要生气！”

“我一想起汤阿英还躺在床上，心里不由地就要生气！”

“提起汤阿英，我心里也很难过，哪个子女死了不伤心的？”徐义德暗中窥视了一下坐在上面的余静，她默默地在听大家说话，两道眉毛有点皱起，因为汤阿英丧子悲哀。汤阿英这件事哄动了全厂，在工人当中引起普遍的不满。秦妈妈这番话是有代表性的。他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但没法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他脑筋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慢腾腾地说，“讲起早产来，原因也很复杂。我虽然不是妇科大夫，倒也听人家说过，有些产妇行动不小心，搬运了笨重东西，或者摔了一跤，都容易早产；也有些产妇不会保养，也容易早产……”

陶阿毛瞪着两只眼睛，像是两个小灯笼似的对着徐义德：

“照你这么说，汤阿英早产和厂里生活难做没有一点关系吗？”

徐义德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

“我们厂里的孕妇也不只汤阿英一个，为啥别人不早产呢？”

徐义德冷笑了一声，他很高兴把汤阿英早产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各人的情况不同。汤阿英头胎没早产，为啥这次早产？”秦妈妈反问道。

“汤阿英一个人早产还不够，要所有的孕妇都早产吗？你们资本家没有一个有良心的……”陶阿毛信口骂了徐义德一句。

徐义德并不生气，奸笑了一声，说：

“骂人不能解决问题，我晓得工人是很讲道理的……”

钟珮文见陶阿毛给徐义德顶得无话可说，从旁帮助道：

“你说我们工人不讲道理吗？”

徐义德对钟珮文放下了笑脸，连忙声辩：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汤阿英早产，谁都说是和我们厂里生活难做有关系。别的车间也有人早产的，都是因为生活难做，累的。”秦妈妈理直气壮地补充说。

“是呀，总经理不要推卸责任。”陶阿毛听了秦妈妈的补充说明，别的车间也有早产的，他的声音高了。

“为啥有的孕妇不早产呢？”徐义德还不让步。

“别忙，还没到辰光。”秦妈妈顶了他一句。

“那我们等着看吧，这桩事体大家谈谈。”

余静见徐义德态度强硬，连汤阿英早产也不承认和生活难做有关，同时还想转移会议中心议题，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不能让他溜过去。她连忙说：

“汤阿英早产，肯定是因为生活难做，累的，这是铁的事实。医务所可以证明，用不着讨论。我们还是集中研究生活难做的问题吧，工会方面认为是原棉问题。”

郭鹏听到余静又提到原棉问题，马上把脸转对着窗户，凝视着矗立在天空中的高大的烟囱。徐总经理很镇静，避开余静的眼光，暗暗用眼睛向坐在他斜对面的梅厂长示意：要他回答余静所提的问题。

梅厂长轻轻点了一下头：暗示总经理他准备发言。但他并没有马上讲，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条，显出很忧愁的神情，慢吞吞地说：

“这个问题么，总经理早就注意到了。最近生产出来的成品的确很差，影响到我们沪江纱厂在市场上的信用。总经理好几次找我谈话，质问我为啥成品

这样差？我想了很久很久，这里一定有问题，正要找工会商量商量，今天余静同志提出来，我想，这是非常之好的。我对这个问题倒有另外一个看法……”

赵得宝听到这里，他有点生气：明明是原棉问题，你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想耍啥花枪。他的左手托着自己的下巴，聚精会神地盯着梅厂长。

梅厂长见他的神情有异，装着没有看见，但是口吻却已经缓和多了：

“我这个看法对不对，大家可以研究，特别希望工会同志多多指教。”他望了余静一眼，然后说，“我认为主要是机器问题，我们厂里很久没有大修了，保全部没有仔细检查，影响了生产，生活难做，质量就差了。”

陶阿毛一听到保全部三个字，根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他以为梅厂长知道粗纱间吴二嫂那排车是他平的，但想起这件事只有他知道，保全部的工人虽然也知道这排车是他平的，平的怎么样，除了他以外，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啊！他感到自己的脸上热辣辣的，努力保持住镇静，诧异地质问道：

“梅厂长，你这话是啥意思？”

梅厂长也很诧异：

“我的话说的很清楚，主要是机器问题。”

“机器问题？”陶阿毛神经稍为松弛了一些，知道

梅厂长指的是整个机器问题，而不是粗纱间吴二嫂那排车，但他的口气并没有因此缓和，“机器问题，你哪能晓得机器有问题？”

“对呀，请梅厂长给我们说说，”赵得宝赞赏陶阿毛的口才，问题抓的对。

梅厂长也不含糊，反问道：

“机器如果没有毛病，那为啥纺出这样坏的纱来呢？”

“纱是用棉花纺的，啥花衣纺啥纱，余静同志说的对，毛病出在原棉上，主要是原棉有问题。”秦妈妈紧紧抓住问题不放。

梅厂长一听到原棉心里便有点紧张，但是他脸上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反而笑了笑，说：

“阿毛，你在保全部工作，不要护短。刚才我说了，我们厂里的机器很久没有大修了，你哪能保证机器没有毛病呢？”

“你说，哪部车子有毛病？我们一道去看。这一阵子我们保全部忙得真是连放屁的工夫也没有。你不能冤枉我们。”陶阿毛站起来，气势汹汹地指着梅厂长的鼻子说，同时向工人们望了一眼，表示他对资本家一步不让。

梅厂长稳稳坐在那里不动。

“坐下来，慢慢研究。”

赵得宝站起来反驳梅厂长：

“你这个意见不对，早两天余静同志和我到车间去看过了，保全部也检查过了，车子一般都很好，没有啥毛病。”

梅厂长怀疑地问：

“那么是——是啥呢？”接着他回答了自己，“当然不是每部车子都有毛病，我是说，有些机器应该检修，那不更好吗？有些车子是有毛病的。同时最近车间清洁卫生工作做的不好，自然影响质量。是啵，郭鹏？”

郭鹏正望着高大烟囱里冒出一股一股的黑烟，在冬末的潮湿的海风中袅袅地飘动着，黑烟越冒越多，越飘越远，像是一大行黑黑的乌云横亘在蔚蓝的天空，缓慢地移动着。他听到梅厂长叫他，吓了一跳，也没听清楚梅厂长说的是啥，只听到最后那句，“是啵，郭鹏？”他慌忙地应道：

“是的，是的。”

梅厂长很得意，他的意见得到郭鹏的支持，马上口吻转硬：

“工务主任的话大概不会错吧？余静同志。”

“重要的是事实。最近车间的清洁卫生工作非常不错，就是个别车间清洁卫生工作稍为差一点，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倒不一定，清洁卫生工作的影响很大的，不信，问问我们的韩工程师。”

韩云程一直没有吭气。他本来不想参加今天的劳资协商会议的，梅厂长要拉他来，他拒绝了。徐总经理给他打了电话，他不好再拒绝。他料到出席今天的会议，他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发言左右为难。从会议一开始，他的右手就拿着面前的一个茶杯。茶杯上写着一个罗马字：13。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有意把这个数目字转过去，一会转回来，13这两个字又在他眼前出现了。就如同这13两个字不可避免一样，尴尬的局面也在他面前出现了。他不准备多说话，但现在不能不说话了：

“清洁卫生工作是有一定的影响，……”

徐总经理趁着这有利的机会发言了：

“最近我听到他们的报告，车间的清洁卫生工作确实太差了，这说明工人同志的劳动态度不好，缺勤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一点，希望工会方面要多多考虑。”

“清洁卫生工作啥地方太差？劳动态度哪能不好？谁给你送的报告。给你报告的人到车间去看过没有？你亲自到车间里看过一眼没有？”

这一连串的问题像是一发又一发的炮弹似的，每一粒炮弹都打中目标，叫徐义德既难于躲开，又没

法隐藏。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给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目瞪口呆，心中忍不住有点发慌，并没有啥人给他正式送过报告，更没有人说工人清洁卫生工作太差和劳动态度不好。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本想把这些事说得凿确有据，才说“听到他们的报告”，特地用了“他们”两个字而不用“他”，一方面说明不止一个人的报告，另一方面也避免把送报告的责任放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不料却问他是谁送的，这就使他左右为难了，不说出来，不好；说出来，更不好；因为没人正式给他送报告，临时推在别人身上，万一对不上口，不是更加被动丢丑吗？他冲着讲话的声音方向歪过头去，装出仔细听取发言的内容，他的阅历很深老于世故的眼光透露出内心的秘密：看看究竟是谁在向他这样有力地进攻，企图发现对方致命的弱点，好紧紧抓住，猛烈地还击过去。

他看见站在会议桌左边墙角落里发言的是一位三十上下的青年女工，中等身材，一绺乌而发亮的头发从左边额角披下，显得鸭蛋型面孔有点发青，虽不消瘦，却十分俊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闪发光，仿佛能洞察一切事物。她身上穿了一件布满暗红小点的淡墨色的对襟夹袄，像是夜晚的天空闪烁着晶莹的繁星点点；下边穿的是一条铁灰色的细布长裤，打扮得朴素大方，整洁和谐。他没想到厂里有这样令

人喜爱的青年女工，听她讲的话那么锋利，咄咄逼人，使他暗暗吃惊。他给那美丽的秀色吸引住了，竟然忘记立刻回答她的质问。余静的声音唤起他的注意：

“汤阿英问的对，你为啥不回答呀？”

“我在注意听，”徐义德警觉自己有点失态，立即用右手放在右边耳朵背后，仿佛真的在注意听汤阿英发言。余静说她躺在床上，有病都来开会，说明今天局面是紧张而又严重。他喘了口气，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微笑地说，“不晓得她说完了没有。”

“你先回答了再说。”汤阿英不让徐义德有喘息的机会，愤懑地瞪了他一眼。昨天秦妈妈到草棚棚去，告诉她今天下午两点开劳资协商会议，她是劳方代表中的一位，但见她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劝她不要参加，她向余静请个假就行了。她想参加，经不住秦妈妈再三苦劝，说她注意身子要紧，有她和余静、赵得宝、钟珮文许多人参加就行了，有啥事体，以后再参加好了。她不好固执自己的意见，同时身子发软，有气无力，头还时不时发晕，只好勉强同意了，但她留了个尾巴：看看明天的身子再说，要是精神，很想去听听。秦妈妈料想一夜工夫身子不会复原，见她对厂里工作这样关心又这样热情，也不便多说了。当天睡的很好，第二天一起来就精神抖擞，准备参加会

议。奶奶劝她还是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别急着到厂里去开会，等身子好了再参加也不迟。她说这次会议特别重要，关系全厂的大事，关系国家生产的大事，受了工人的委托，当选了代表，哪能不去呢？个人身体事小，生产事大，她不能不去。奶奶不了解厂里劳资协商会议的情形，说不过她，也说服不了她，退了一步，要求她早点吃午饭，困一觉再去。她理会奶奶的体贴心情，不好再不满足老人的希望。她草草吃了午饭，便躺下休息了。奶奶曾经答应一点钟叫醒她，看她睡得香甜，有意没有唤醒她，等她自己醒来，时钟的指针已指到两点了。她匆匆收拾一下，跨出大门，加快步伐，一个劲向厂里赶去。等她跨进会议室，屋子里坐得满满是人，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她没有声张，在靠墙角落里的一张靠背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虽然没有引起坐在长方形的会议桌子四周的人注意，但是细心的余静早已看见了，她没有啧声，料想像汤阿英这样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女工，一听到厂里开劳资协商会议，肯定是在家里坐不住的。秦妈妈虽说代她请了假，但是汤阿英终于到来，并不使她感到意外。徐义德和梅佐贤这些狡猾的狐狸在会上大耍花招，她心中十分气愤，努力按捺下内心的激动，耐心地让徐义德他们暴露，必要时才狠狠揭露。汤阿英刚才的质问非常有力，而且击中要害，叫徐义

德躲闪不及。余静像是领导一支劲旅在进行艰苦的战斗，忽然增加汤阿英这支坚强的生力军，感到无比的欢欣。

徐义德没想到小小女工汤阿英讲话这么短而有力，使人无懈可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黄的烟盒，抽出一支带过滤嘴的中华牌的香烟，打着打火机，点燃了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徐徐吐出，一团一团淡青色的烟圈在空中轻轻浮散，慢慢消逝。他对着消散的烟圈凝神思索，怎样回击汤阿英的进攻。

“你是抽烟，还是开会？”秦妈妈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当然是开会。”

“怎么不回答汤阿英的问题呀？”

“当然要回答，”徐义德慢条斯理地说，“我自己虽然没到车间里去看，但是有人看见了，车面上花衣很多，不能说清洁卫生工作没有问题……”徐义德说到这里停顿下来，想看看会议的风向。

“车面上的花衣为啥多？”汤阿英一步不让，说，“不能单看车间飞花多，要说出原因来。”

梅佐贤见徐总经理给汤阿英一再追问，紧紧抓住不放，感到他有责任帮徐总经理一手，这正是他给徐总经理效劳的时机，也是他大显身手的场所，他接上去说：

“工人的工作法不对头，飞花才多，车面上的花衣自然就多了。”

“我们厂里都是根据郝建秀工作法走巡回，这是最先进的工作法，你却说我们工作法不对头，你倒说说，工作法啥地方不对头！”

“这个，”梅佐贤从来不懂得纺纱，也根本不了解郝建秀工作法，他这个厂长没法具体回答，只是反问，“工作法对头，为啥生活老是做不好呢？”

“啥花衣纺啥纱，那个啥次泾阳，哪能纺出好纱？余静同志说的对，主要是原棉问题。”

梅佐贤一听汤阿英提起原棉两个字，神经顿时绷紧了，他信口说出“原棉”两个字，便口吃地说不下去了。

徐义德在梅佐贤的暗中帮助下，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听汤阿英又拉到原棉问题上，他也有些紧张，这是问题的要害，得设法岔开，不然他设下的一道道迷惑别人视线的防线会土崩瓦解的。他慢吞吞地说：

“我看劳动态度是个中心问题，缺勤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在沪江厂的历史记录上是空前的，这很能说明问题。”

“缺勤率为啥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汤阿英以亲身的检验对徐义德说，“你晓得啲？我们照着郝

建秀的工作法走巡回，因为花衣不好，条干不匀，色泽呆滞，断头多得接不过来，两条腿在弄堂里跑来跑去，跑得麻木了，断头还是接不完，许多工人累的不行，病了，垮了，哪能不缺勤？就说我吧，要不是接二连三做夜班，车间的生活把我累的支持不住，我也不会早产的，孩子死了，我病了，躺在床上，叫我哪能上工？”

汤阿英现身说法，生动有力，每一句话都打动人们的心弦。

“汤阿英说的对！”钟珮文大声地说。

“阿英的话有道理！”秦妈妈支持汤阿英的意见，她钦羡汤阿英分析事物的能力，讲得对方哑口无言。

陶阿毛见大家拥护汤阿英，他也跟着高声说：

“汤阿英说出我们工人心里话，徐义德，你听见了没有？”

徐义德微微地点头道：

“听见了。”

余静得到汤阿英这支生力军的支援，把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驳得体无完肤，有些话她本来想说，汤阿英代她说了出来，她就没有吭气，只是把徐义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用笔记下，看他们还要耍啥花招。她懂得只有引蛇出洞，才好打蛇；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才能致蛇的死命。对徐义德这些老狐狸，不能

乱发空枪。她不慌不忙地问：

“厂方看，还有啥意见吗？”她的眼光望着韩云程和郭鹏他们，想听听韩云程他们的意见。

钟珮文说：

“我认为工人的工作法没啥不对头，我看，还是请厂方多想想，问题也许正在那方面。”

“问题当然在厂方，各个车间工人作生活再巴结也没有了。”陶阿毛抢先同意钟珮文的意见。

徐义德见余静的眼光一直盯着韩云程和郭鹏，生怕韩工程师和郭鹏主任说出其它意见，他慌忙说：

“我看：问题主要还是在工人身上。我们没有其它的意见了。”

老练的秦妈妈一丝也不让步。她正面指着徐总经理，说：

“你不能这么武断，咬定问题出在工人身上，要虚心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韩云程他们还没有说话哩。”她的眼光也停留在韩云程身上。她想韩工程师会知道问题在啥地方的。

韩云程一个劲转动着茶杯，他不愿意参加任何一方面，他坐在一旁看徐义德和余静针锋相对，反正与他无关，他怕牵连到自己身上，也怕向他提出问题。他有意避开余静锐利的眼光。

大家都没说话。

余静归纳一下纸上记录的问题，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不能从表面看问题，也不能从枝节谈问题。我们要找出问题的关键。首先谈我们厂里工人的工作法，一般是对的，是好的。清洁卫生工作也不错，可以请徐总经理、梅厂长和工程师亲自到车间去看看。当然，清洁卫生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正如韩工程师说的一样，清洁卫生工作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影响。工人同志们生活做得很巴结，刚才细纱间的女工汤阿英已经说的很清楚，她有七个多月的身子还照常上班，累得在车间里早产了，我们能说这样的劳动态度还不好吗？缺勤率有时候确是达到百分之三十五，这情况是严重的。为啥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呢？正如汤阿英所说，这就要分析，因为生活难做。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生活不难做的辰光，那时缺勤率多少？最多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原因是啥？生活难做。生活为啥难做？钢丝车上的棉网满布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太多，条干不匀，归根到底，是原棉问题。我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坦坦白白地把问题摆在桌子上，谈清楚，不要兜圈子，徐总经理。”

“对，我完全拥护余静同志的意见要把问题摆在桌子上，再也不能马虎过去了。”这是秦妈妈的声音，“有啥问题说出来吧。不说，我们工人是不答应的。”

徐总经理给余静一指点，他心头愣了一下，但很老练地旋即就又恢复到平静，说：

“余静同志，我最希望如此，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可谓是完全一致。”

余静摇摇手：

“不，我们的意见有原则上的分歧的。我同你的看法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赵得宝插上一句，“你说工人不对，那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出在原棉上……”

徐总经理惊诧地说：

“你们认为是原棉问题？”

“当然是原棉问题，”汤阿英斩钉截铁地说，“那还用讲。”

赵得宝坚定不移地说：“是原棉问题。”

“原棉有问题？”徐义德看这个问题没法再躲开，便装出莫名其妙的神情，问梅厂长，“真是这样吗？”

梅厂长知道徐总经理的心思；马上会意地说：

“原棉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梅厂长一边思考一边慢慢地说，“我们厂里用棉量比别人家的厂还要多，每件纱要用上四百十八斤。花纱布公司只配给我们四百十斤，怎么够呢？到交纱末期造成车面不够，联购处又买不到花衣，没有办法，我们自己只好加点次泾阳花衣进去。次泾阳花衣是比较差一点。就是这

样，我们已经赔本了。要是加最好的花衣，那要赔的更多。总经理不会答应的。我这个厂长也做不下去了。嗨嗨。”梅厂长对余静嘻开嘴笑了笑。

徐总经理恍然大悟似的，应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唔。”

韩云程工程师听徐总经理好像演戏一样的念着台词，他心里要呕出来，可是又不好意思吭气。他的眼光盯着茶杯上那两个字：13。

“就是加上八斤的次泾阳，生活也不应该这样难做。”余静反问道，“是不是配棉量上还有问题，希望老老实实说出来。”

徐总经理听到配棉量三个字暗暗大吃一惊，表面上却很镇静，肯定地说：

“配棉成份上我清楚，绝无问题，绝无问题。是不是？”

徐总经理问梅厂长。梅厂长欠身答道：

“一点问题也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梅佐贤完全可以担保。”

余静察觉梅厂长有点慌张。她心想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抓住这个缺口把它扩大：

“这是工程上的事，你怎么可以担保一点问题没有呢？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让韩工程师来发言。”

“对，请韩工程师来发言。”秦妈妈早就认为韩工

程师会了解一些，余静也这样以为，她更加肯定了。

梅厂长不知怎样答复好，他不敢让韩云程发言，万一他说出原棉的秘密，那不是全被揭穿了吗？徐总经理看出他难于应付，他被余静“将”了一“军”。这辰光除了冒险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因为如果不让韩工程师发言，本身就暴露了其中必有问题，只有鼓励他说话，才有可能挽回这难堪的局面。他给韩工程师做好了答案：

“配棉成份当然没有问题，完全是按照花纱布公司规定的，由韩工程师亲手经办的，毫无问题。韩工程师，你说给余静同志听听。”

韩工程师面前的那个茶杯又在不断地转动着了：他想不说出来，跟着徐总经理和梅厂长一道撒谎，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科学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应该违背良心。说出来呢？对厂对自己不利，而且对不起徐总经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沪江纱厂的一名工程师，而徐义德是这个厂的总经理。良心上要他说实话，职业和朋友的关系叫他撒谎。

徐总经理等了他一会儿，见他不开口，就暗示他道：

“你照直说好了。”

“是的，配棉成份没有问题。”他说出了以后，他的脖子发热，腮巴子上泛起淡淡的红潮。

“完全没有问题？韩工程师，你说实话。”汤阿英见韩云程神色慌张，就逼他一句。

话既然说出口，韩工程师反而安定了，他很快地答复：

“自然完全没有问题。……”

余静拦腰插上来问：

“生活为啥难做？”

梅厂长生怕余静在韩云程身上突破，灵机一动，赶在韩云程前头接上去说：

“最近花纱布公司配的原棉不好，不少厂都闹生活难做。我想，这是主要原因。刚才余静同志说问题关键是原棉问题，现在想想，是有些道理的。”梅佐贤给余静步步逼紧，步法有点乱了，颠三倒四，前后矛盾，见余静抓住原棉问题不放，使他没法子反驳，便顺水推舟，把责任推到花纱布公司方面去。

“我们应该明天就向花纱布公司正式提出来，请求他们多给我们厂配点好原棉，”徐总经理刚才确实捏了一把冷汗，听韩云程表示了意见，他这才放心，但还怕事情岔开去，不容易收拢，梅厂长毕竟是老于世故的弄虚作假的能手，他把责任往花纱布公司身上一推，正好给总经理一个现成的台阶。徐义德态度自然的走下来。他摆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情，说，“这个问题最近一定要解决，不然，我们实在对不起

工人同志了。明天厂里派人给汤阿英同志送点补品去，梅厂长。”

“那没问题，明天早上就办。”

“我不要补品。”汤阿英当面拒绝，说，“只要把生产问题解决就好了，这是大事。”

徐总经理转过来对余静和蔼地说：

“余静同志，我们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全靠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厂里没有心腹的人，要想办好厂，只有紧紧依靠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我们才有光明前途。这次你认真提出生产上的重大问题，汤阿英她们提的意见对我们的厂帮助很大。非常感谢你。希望你以后多多领导我们。”他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用不着感谢我，搞好生产，也是我们工会的任务。我希望厂方要改善经营，积极生产。”

“那没问题，”徐总经理满口答应，“那没有问题。”

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秦妈妈见汤阿英带病来参加会议，怕她身体支持不住，陪她一同回家。大家都走了，徐总经理和梅厂长留了下来。梅厂长走过去把门关紧，回过头来站在徐总经理身边，附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

“总经理，你的话说出去了，今后配棉成份怎么

样呢？”

徐总经理早就打定了主意，他抹一下自己的脸，很得意地说：

“余静这些黄毛丫头，究竟是年纪轻，几句话一说，她就没有意见了。”

梅厂长这次却不同意他的意见：

“不，你开了支票。”

“是的，我说最近要找花纱布公司解决这个问题。对啵？”

“唔。可是花纱布公司最近的配棉并不坏呀！”

“这我晓得。”

“哪能解决呢？”

“关照韩工程师和郭主任，最近可以把配棉成份改好一点，缓和一下工人的情绪，工会以为交涉成功，工人的生活好做了，缺勤率就会减少，不满的情绪也就没有了。然后，再慢慢回到现在的配棉成份，这不是解决了吗？佐贤。”

梅佐贤一面凝神谛听，一面直点头，说：

“对，对……”

“这不是解决了吗？”

梅佐贤高兴得大声地说：

“对，这确是解决了。”

39

冯永祥探听到徐义德今天下午两点钟要到沪江纱厂去出席劳资协商会议，讨论厂里的生产问题。用徐义德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就是一天一晚也不能把问题弄清楚。今天第一次开会讨论，只好准备扯皮。徐义德今天上午临走时，告诉林宛芝不回来吃中饭，可能回来很晚。同时大太太和二太太有人请吃中饭，饭后至少要打八圈麻将，很可能打十二圈。

冯永祥提早吃中饭，气咻咻地赶到徐公馆，径自走进林宛芝的卧室。林宛芝弹簧床旁边小几上的美国爱尔金的闹钟正好是两点。他一进门就笑嘻嘻对她说：

“宛芝，你看，我多么守时，说两点就两点，一分不早一分不迟。”

“你就是这些事守时，听说你开会常常迟到早退，一点也不守时。”她向他撇一撇嘴。

“那些会，到不到没关系。”他轻蔑地摇摇头，说，“开会，我顶讨厌了，还不如到你这里来坐坐，聊聊

天。”

“哟，”她指了他一下，说，“你还算是工商界的红人呢，讨厌起开会来了。你不是说过：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大概开会开多了，现在倒胃口了。”

“那不是，”他忽然严肃起来了，一本正经地说，“要看啥会，政府方面召开的会，市工商联召开的会，我也是准时出席，并且坐在前排，好给首长们接近接近。我一到会场，没有一个人看不见我的。”

他的眼光里流露出骄傲和得意的神态。

“当然啦，冯永祥，天下闻名，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她向他翘起了大拇指。

他向她面前走来：

“你不要吃我的豆腐。”

“是你自己讲的么。”

“我不过是小有名气。”他点点头。

“开会迟到早退的名气可不小……”

“开会要看啥会，政府召开的会必须早到迟退；工商联的执委会准时到；同业公会的会和一般朋友的会就得迟到早退；座谈会漫谈会可到可不到；小组会啥的根本不到。这叫做见会行事，选其重要者而到之。”

“想不到，你还有一番理论哩。”

“那当然，”他掏出亮晶晶的银制烟盒子，从里面

抽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点着，抽了一口，就叼在嘴角上，自鸣得意地说，“现在办事没有理论吃不开，我在屋里空闲辰光，经常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啥著作？”林宛芝听不懂他的话。

“哦，这个你不懂。啥叫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让我来解释给你听：马就是马克思，共产党的老祖宗；恩就是恩格斯，马克思的朋友，他们一道写了《共产党宣言》；列就是列宁，斯就是斯大林，毛就是毛泽东。晓得啵？”

“你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当然晓得了。”

“你不晓得，外面通称马恩列斯毛，一提，没有一个人不晓得的。只有你们这些家庭妇女，整天躲在家里，外面的世界，啥也不晓得。”

“当然谁能比上你冯永祥，整天在场面上混的人。就是进步的太快了，连我们这些家庭妇女也看不上眼了。”

冯永祥走上去，一把抓住她的手，颤巍巍地说：“不敢不敢，谁看不上你，那太胆大妄为哪。”

“自然有人。”

“谁？”

“冯永祥。”她的嘴向上一撇。

“没有的话，没有的话。我是同情你，你整天给徐义德关在这个笼子里，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

你，可是把你的聪明的灵魂给封住了。门外边，整个世界天天在变，你们在门里啥也不晓得。你在屋里没有事，看看美国电影，美国画报，听听美国爵士音乐，或者是苏滩；要末，陪那两位太太打打我们国产的麻将。见了徐义德，他不是讲利润，就是谈头寸。他整天关心他那些厂，哪把你放在心上？这样的生活实在太枯燥无味了。”

他这一番话句句讲到她的心里。她想：整天生活在徐公馆里倒不觉得，一混就是一天，过了十天半个月，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些啥事体。看报纸只是看看本市新闻和电影戏剧的广告，自从各电影院不上映美国电影以后，电影广告也没有啥好看了，空闲下来只好看看挂在卧室里那张嘉宝的相片了。家里虽然有一架小型放映机，但老是那几部美国片子，顶多看上三遍，也够腻味了。听冯永祥这么对她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活平凡而又单调。本来精神勃勃的林宛芝，冯永祥的一番话如同一阵台风把她那精神吹得无影无踪。她深深地感到无聊、冷寂和孤独。她坐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慢慢把头低了下来。她的两只忽然失去了光彩的眼睛木然地落在沙发上，正对着一本书：那是早三天冯永祥送给她的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封面上有一幅绿色的尼柯莱·毕斯凯莱夫的木刻，刻的是渥伦斯基满

足了他“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之后，站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面前，安娜·卡列尼娜弯下腰，从她坐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他的脚边。

卧室里静悄悄的。冯永祥可以听到她的轻微的叹息声。他出神地注视着她，看她那满头卷式的头发，看她穿着那件翠绿的哗叽旗袍。他眼睛里闪耀着爱慕的光芒。他的脚步慢慢移过去，挨着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满头卷式的头发，用着充满了同情和怜惜的口吻，低低地说：

“我晓得，你是很寂寞的。”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抬起头来。过了一会儿，她又叹息了一声：

“唉，这单调的生活，有啥办法呢？”

他看见沙发上的《安娜·卡列尼娜》，便暗示地问道：

“我送给你的书，看完了没有？”

“啥书？”

“就是这个……”他指着沙发上的书。

“哦，看了一半。”

“这是世界名著，快点把它看完……”

“写的真好。我很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她长的漂亮极了……”

他接过去说：

“我也很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她一下了彼得堡车站，我就给她抓住了，非看完了这本书简直是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

“我也有这个感觉。”

“可是我讨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安娜·卡列尼娜嫁给这样一位庸俗不堪的丈夫，用一句土话来形容，真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他说完了最后两句，细心地注意她的表情。她微微皱着眉毛，嘴紧闭着，露出厌恶的神情。她懂得冯永祥不是讲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指的是徐义德。徐义德待林宛芝很好，差不多她有啥要求，他总是想尽一切方法来满足她，今天又给冯永祥点出她生活在笼子里，想起过去徐义德那样满足她就很讨厌了，越是满足她，越是叫她讨厌。她说：

“我也不喜欢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这样的男人，他太虚伪了，和他生活在一道，像是办公事一样的，太没有味了。不过，一枝鲜花已经插在牛粪上，也就没有办法了。……”

“不，”冯永祥不同意她的意见，打断她的话，说，“安娜·卡列尼娜就很有勇气。我喜欢她，我也很佩服她。”

她完全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她沉下脸来，说：

“你不应该对我这样瞎三话四，”她想到冯永祥最近对她的言语和举动越来越放肆了，感到和他这样下去，对不起徐义德；同时，又怕徐义德发觉，爆发和李平一样的事体，如果把她推出徐公馆的大门，到啥地方去呢？她严肃地说，“你以后别给我讲这些，你也不要常上我这儿来……”

“为啥？”他听她的口气不对头，兀自吃了一惊，摸不着头脑，说，“讨厌我吗？”

“给人家看到不好……”

他见她没有说下去，料她没有决心，他便下了决心，一本正经地说：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再也不来了。”

“好的。”她低下了头，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

他真的走了。但是走到房门口，就站了下来，转过身来，注视着她。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远去，不舍地微微抬起头来，望着他去的方向，两人的眼光正好碰上。她又低下了头，说：

“你这个人很坏。”

他像是被人刺痛了疮疤一样：刺得很准确，很痛，想反驳也没有理由，他站在那边羞愧地紧紧地闭着嘴。她看他脸上现出不满的表情，马上又说了一句：

“你这个坏家伙，生我的气了吗？”

她随即噗哧一笑，走上去，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她的右手轻轻地抚摩着他的紫红色的领带。他浑身感到一股热流，他明白了“坏”的含义，脸上立刻漾开了笑纹，弯下腰，低着头，附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

“宛芝，我希望我能够分担你一点寂寞。”

她仰起头来，长睫毛的眼睛里露出惊异的神情，过了一歇，显出恐惧的样子，最后，闪动着喜悦的笑意。

“是你的真心话吗？”

她的眼睛里含着微笑，祈求地对着他。

“当然是真心真意，你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只要徐义德不在家，你啥辰光叫我，我啥辰光就来。我希望我能够永远留在你的身边。你要我做啥，我就做啥。能够使你快活，是我唯一的幸福……”

她轻轻叫了一声：“永祥……”

40

朱延年听到台子上电话铃响，拿过听筒，一听到是马丽琳的娇滴滴的声音，他马上坐得端端正正的，

把橘红色的领带结子弄正，放慢了声调，威风十足地对听筒说道：

“你找朱经理吗？唔，我就是……”

朱延年和刘蕙蕙离了婚以后，他在物色一个中意的对象。工商界有名望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底细，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中小工商界的朋友们不了解他的究竟，看他很红，很想和他攀上一点亲，也好提携提携，可是朱延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中小工商界的女儿，没有油水，怎么配上朱经理哩！他一个人回到家里怪寂寞的，刘蕙蕙让他逼走以后，就再没上他的门。他有时倒想起她来了。坐在家无聊，他便到百乐门去跳跳舞。在那里，他认识了马丽琳，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他每次到百乐门，都是叫她坐台子。她不论提出啥事体，他都觉得有兴趣。她哩，想想自己快三十了，现在虽然正当时；在百乐门也算得是个红舞女，可是人老珠黄不值钱，需要早点找个对象，老了有个归宿。她心里早已看上了朱延年，没有表露出来。她从侧面了解朱延年，有时也当面旁敲侧击地探听朱延年的身世。他吗，明知她的用意，借此吹嘘一番。她曾经到汉口路吉祥里窥视过福佑药房，没有上楼，也不了解这个福何药房究竟有多大。她几次打电话来，想从接电话的人的嘴里了解一下朱经理，接电话的恰巧都是他本人，今天也不例外。她只好对他

说话：

“今天晚上有空吗？”

“今天晚上？……”

他看看日历上没有注明有什么约会，但眼睛一转动，福佑药房的经理，又是上海滩上工商界的红人，每天哪能没啥约会呢？他惋惜地啧了一声，抱歉地对着听筒说：

“真不巧，今天晚上工商联的史主任，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史步云主任，对，对，就是他，他请我吃晚饭，……饭后来？怕来不及，你不晓得，工商界这些朋友，一顿饭起码要吃上四五个钟点……散的早，我一定来，……迟了，就改一天……”

最后，他对着听筒叫了一声“达令”。

童进不知道朱经理在打电话，情绪激动地走进了经理办公室，他的心还在剧烈地跳动。他满脸笑容，嘴结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只眼睛望着朱延年，朱延年看他那神情有点奇怪，开玩笑地问他：

“拾到黄金了吗？这么高兴。”

“是，”童进走上一步说，“有两个志愿军来办货，经理，他们，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库房那边，要见经理。经理，你快去吧，你最好把两个志愿军带到我们店里来，让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祖国最可爱的人。”

朱经理没答理这些。他关心地问：

“他们带了多少钱来？”

“不晓得。”

“要办多少货？”

“刚才库房里的人打电话来，说他们要买三四千万元的货，请经理快点去。”

朱延年听到只买三四千万元的货，他兴趣索然，摇摇头，说：

“我没工夫去。”

“是志愿军啊，”童进提醒他道，“我们要抗美援朝，要支援前线。志愿军找你，总是有要紧的事，你还是快去吧，经理。”

朱延年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他有点不耐烦了：

“志愿军哪能？”他的一句话把童进问住了。等了一歇，他说下去，“啥志愿军不志愿军，我们做生意要紧。我们在后方努力经营业务，做好生意，就是支援前线。懂啵？”

童进无可奈何地唔了一声。

“我忙的很，没空去接志愿军。你看，”他举起他正在看的流水账簿和一叠支票，“这笔生意，叫夏世富去一趟就行了。”他心里说，“几千万元的买卖，用不着我亲自出马。”

“志愿军如果一定要见经理呢？”

“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朱经理不在家，他忙的很，不晓得啥辰光回来。”

他说完了话，就拿起桌上的算盘，翻阅着支票本子，在计算还有多少存款，算盘珠在嘀嘀嗒嗒地响着。

童进日日夜夜向往的志愿军，好像从天而降，突然到福佑药房来办货了。他接到叶积善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浑身的热血沸腾，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心中焦急地想看看亲人志愿军，可以好好为志愿军服务，满脸笑容，兴冲冲地跑去报告朱经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以为朱经理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也和他一样的兴奋，准备热情接待，不料被浇了一盆冷冰冰的凉水，叫他高兴而来，扫兴而去。他不了解朱经理平时讲话那么进步，对志愿军也很钦佩，为啥志愿军来了又这样冷淡呢？真叫他迷惑不解。

约莫过了十多分钟，夏世富赶到库房了解了情况以后，打电话来，是童进接的。他放下电话听筒，又走进经理室，这一次他的情绪很平静，也不寄托希望，他怪夏世富太傻，经理斩钉截铁地说过不去，再告诉他又有啥用处呢？夏世富一定要他去说，他只好把听到的情况向经理报告：

“夏世富打电话来说，志愿军……”

朱延年低着头在算账，听到童进提到志愿军，他

想一定又是要他去，他急躁地抬起头来，瞪了童进一眼：

“又是志愿军？不是对你说了，不去，不去！”

说完了话，朱延年又低下头去，一心一意地去算他的账；一张一张支票的存根在他面前翻过去，月底快到了，他要仔细了解一下月底到期的支票一共是多少款子，他好设法轧点头寸存进去。

童进硬着头皮，根据夏世富的报告，慢慢说下去：

“志愿军这笔生意不小，除了带来四千万的现款，那边还要汇五亿来办货……”

一个庞大的数目字的声音在朱延年的耳朵里嗡嗡着，他的头脑跟着膨胀起来。他抬起头来，一对贪婪的眼光露出馋涎欲滴的神情，关切地问：

“你说啥？”

“那边还要汇五亿来办货。”童进冷静地说。

“五亿？！”朱延年两只贪婪的眼睛睁得很大，好像里面伸出了两只手，想把五亿元拿过去。

“唔。”童进平静地说，“夏世富说志愿军一定要见经理才办货，经理不在，他们就要到别人家去办货了……”

朱延年猛的站了起来，急急忙忙地改口说，“志愿军一定要见我？那我就去。……”

“你不是没有空？”

“我忙虽忙，志愿军来了，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么，我总得要去一趟，抗美援朝的事，我们做生意的人也有责任，不能马马虎虎的。”

朱延年一头冲出去，马上又气喘喘地折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赶快打电话告诉夏世富，说我马上到，要他无论如何把志愿军留下来，我马上到……”

他像是一阵风似的飘走了。桌上的账簿支票静静地躺在那里，被冷落下来。童进走过去给朱延年清理了一下，放在抽屉里。朱延年虽然走了，童进看到朱延年态度变化这么快，叫他作呕，不禁轻蔑地冷笑一声。

朱延年几乎是用赛跑的速度在奔走，如入无人之境，只顾自己往前走。他不断碰到路上的行人。被碰着的人回过头去盯他一眼，觉得这人好生奇怪，急忙忙如同去救火一样。他走到库房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后勤部采购员王士深和戴俊杰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说：

“你们经理究竟在家不在家？”

“不在家。”栈务部主任叶积善生硬地说。

“他到啥地方啦？”

“他整天忙的很，我不晓得他到啥地方去了。店

里也许有人晓得。”叶积善没有改变他的生硬的态度。

“那他不会来的了。”那个长得高高的，叫做戴俊杰的拘谨地说，“我们走吧。”

“不，请你稍坐一会，店里已经派人去找了，马上就来了。”夏世富站起来，笑嘻嘻地拦住他们的去路。

王士深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焦急地站起来，向门口张望：

“你老说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为啥还不来呢？我们等不及啦。”

“再等一歇，我马上再打电话去催。”夏世富走过去，刚要拿起电话听筒，电话铃响了，是童进打来的，告诉他朱经理马上到。夏世富笑嘻嘻地对王士深说：

“朱经理已经在路上，马上到。”

王士深不安地坐下来。夏世富怕他们性急，就关怀地问他们朝鲜前线的情形，王士深请戴俊杰讲，戴俊杰推王士深说，最后还是王士深开了一个头，说汉江西岸狙击战的辉煌胜利，刚开了一个头，朱延年到了。他一走进来，就向他们拱一拱手，抱歉地说：

“实在对不起，不晓得你们两位今天来。要晓得你们两位来，我就到车站上欢迎你们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到外边去了。他们打电话找我，说是有两位志

愿军同志来了，我丢下手里的事，马上就赶来，可是已经不早了，迟到了，请你们两位多多原谅。”

“不要紧，”戴俊杰说，“苏北行署卫生科张科长同我们很熟，我们部队原来驻扎在那边的，是他介绍我们到贵号来的。你有事，我们等一会没有关系。”

“承蒙两位光临，小号感到无上的光荣。”朱延年说，“请两位到我们店里去坐坐。”

王士深刚才等的有点不耐烦，他性子急的很，不同意去：

“朱经理，就在这里谈好了，谈好了，我们还有事哩。”

朱经理的眼睛望着戴俊杰：

“小号离这里不远，我们那边还有个小小的样品间，你们要配的货色也好先看看。”

“那也好。”戴俊杰给朱延年说得不好意思了，他劝王士深，说，“不远，就去吧。”

王士深经戴俊杰一说，他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便随着朱经理、夏世富一道去了。

朱经理一跨进福佑药房，他就高声叫道：

“欢迎志愿军同志！”

同时，他带头鼓起掌来。店里立即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同事们都丢下手里的活，大家的心急速地跳动着，蜂拥到栏杆那边来。夏世富大声喊道：

“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声音好像把整个楼房都震动了。一会，暴风雨般的掌声变成有节奏的了：拍，拍，拍……同时，同事们兴奋地唱起高亢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

在歌声和掌声中，朱经理和戴俊杰、王士深他们慢慢地顺着栏杆走进来，一边鼓着掌，一边感动地望着站在栏杆前面的同事们，望着他们一张张热情的面孔。互相点头。他们两个和同事们都不认识，但是又好像都认识，而且很熟悉，如同久别重逢一样的兴奋和愉快。他们走了没两步，一个青年跑上来，紧紧握着戴俊杰的手。他感动得两个眼眶有点润湿，很自然地拥抱着戴俊杰。戴俊杰也紧紧地拥抱着他。这青年是童进。他仰起头来，以崇敬的眼光注视着戴俊杰

的脸庞。

站在栏杆前面的人本来很有秩序，看到这激动人心的情景，都拥过来，堵住他们的去路，把他们包围起来。另一个青年店员走上去抱住了王士深。

有节奏的掌声没有了，激昂的歌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的欢呼。整个福佑药房的同事们的情绪都沸腾起来了。

朱经理也被包围在当中了，他一步也走不动。他看这样不行，就向大家挥手，高声地说：

“先让志愿军同志走过去，不要拦住路……”

同事们都想挨近志愿军，就是摸一摸他们的衣服心里也是舒服的。朱经理讲的话，他们仿佛没有听见，还是拥在路上。夏世富从戴俊杰身旁插过来，推了童进一下，说：

“让戴同志走过去啊。”

童进放下戴俊杰，但是他还有点舍不得，他和戴俊杰平排走着。他的右手亲密地抓着戴俊杰的左手。横在道上的同事们还不肯散去，只是让出一点路来给戴俊杰、王士深走，他们自己倒着走，面孔还是对着戴俊杰和王士深。退到栏杆的尽头，在经理室的门那边，同事们不走了。朱经理不好再叫他们退开去，就对戴俊杰说：

“戴同志，就在这里坐一歇吧。”

墙角那里有一张小桌子和三张小椅子。朱经理等他们两个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了。同事们围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

童进在人丛中跳起来说：

“请志愿军同志给我们讲一个前线英勇作战的故事，好不好？”

叶积善点头说：“好。”

“好！”大家同意，接着是一阵欢迎他讲志愿军英勇作战故事的掌声。

戴俊杰对王士深说：

“刚才在库房那边没有讲的汉江西岸狙击战的故事，你在这里讲吧。”

“不，还是你讲。”王士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戴俊杰腼腆地不肯讲：

“我，我没啥好讲的。”

“一个人讲一个。”这是童进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坐了下来。

戴俊杰不好意思推却大家热情的要求，他想了想，说：“那么，这样子好了，我和朱经理去谈办货的事，你和大家谈谈吧。”

王士深给戴俊杰这么一说，他不得不讲了：

“美国鬼子在朝鲜战场上，给打得狼狈不堪，前进不得，只好步步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麦克阿瑟

这家伙不甘心失败，却想挽回早已破产的威信，打肿脸充胖子，把手下的残兵败将收拾收拾，大吹牛皮，打算强渡汉江，再次占领汉城，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三八线以北……”

王士深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讲话的声音虽然不高，可是大家全听的清楚：

“麦克阿瑟这个如意算盘自以为打的不错，但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不答应。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要麦克阿瑟的梦想破灭，堵住敌人的去路，展开激烈的进攻。按下各路朝中人民部队不说，先讲我们志愿军一支小小部队的活动吧。我们部队奉上级的命令，任务是切断原州公路，阻击麦克阿瑟在注岩里前进的侵略军。团首长带领我们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很快迂回到了砥里，马上把原州公路切断，在注岩里发现了美国鬼子的强大兵力。美国鬼子看到了志愿军，吓得魂不附体，慌慌张张用坦克把注岩里团团包围，梦想阻止我们进攻。那边敌人严阵以待，拚命堵住，我们要给敌人迎头痛击，阻止他们前进。在注岩里，我们的队伍和敌人的队伍顶了牛。

“时间就是胜利。双方部队顶牛，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黑了，夜深了，如果不马上消灭敌人，敌人抵抗到天亮，增援部队赶到，很可能逃跑了。团首长

下了决心，要立刻突进村子里去消灭敌人。下达了团首长的命令，激动人心的冲锋号嘹亮地划过了茫茫的夜空。几路部队同时冲锋，我们这一路首先突进村子，接着各路队伍都先后突进了村子。

“美国鬼子相当顽强，拚死拚活守住阵地，堵住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敌人哪是志愿军的手，你想堵住前进的道路吗？我们战士迅速上了房顶，控制了制高点，从上面向敌人进攻。敌人十分狡猾，他们一边防守地面阵地，龟缩在屋里墙下，一边千方百计守住房屋，企图不让我们前进。我们就展开激烈的逐屋的争夺战。

“东方泛出鱼肚色，天慢慢亮了。美国鬼子的飞机来了，在低空盘旋，飞来飞去。在一片熊熊的火光中，忽然传出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这声音引起我们的注意，立即派人侦察瞭望，只见注岩里村头出现了长长一列的汽车队，汽车连着汽车，几乎把村头那条路面塞满了。这一长列的汽车队像是一条长龙，龙头前面有坦克开路，龙尾也有坦克，担任掩护。这条长龙向公路上浩浩荡荡开去，美国鬼子准备逃跑了！

“已经抓到手的敌人，哪能让他们逃走！团首长一边把敌人继续紧紧包围，一边命令我们连队马上冲过去，阻击美国鬼子。我们一个冲锋，赶到公路附近，约莫离开公路有四五百公尺的地方，敌人坦克拚

命发射炮火，封锁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坦克的火力很猛，它后面汽车上还有美国鬼子，截击部队接近不了公路，眼看着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要逃走了。

“连首长要部队炸毁第一辆坦克！要是把第一辆坦克炸毁，挡住后路，后面的汽车队就全部堵塞在公路上了，敌人逃走不了，消灭他们就容易了。面对着坦克猛烈的炮火，部队很难接近公路，怎样炸毁坦克呢？连首长派出了三个英雄的突击手！

“在公路附近的深坑里，远远看见有三个人伏在地上蠕动，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迅速匍匐前进。一团团炮火爆炸的烟尘，浮在他们上空，伏在地上的人忽然看不见了。等硝烟慢慢散去，又看到那三个伏在地上的人向前跃进，动作敏捷，一会向右，一会向左，有时跃进，有时匍匐奔跑。一眨眼的工夫，他们三个人，先后陆续逼近了第一辆坦克。

“坦克向公路两侧猛烈地喷着火舌，火光上下飞舞，炮弹四面扫射，使人很难接近。那三个人无畏地迎着猛烈的火舌继续前进。离坦克十多公尺远近，第一个人腾地跳出弹坑，直接向第一辆坦克跑去，跑了没有几步，坦克的火舌把他打中，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第二个人英勇地跳出了弹坑，再向坦克跑去，

又中了炮火，倒在地上，不能走动了！

“第三个人看到前面两位战友为祖国献出了美丽的青春，像是拿到革命的战斗接力棒，他从侧面的稻田里爬出，曲着身子，观察前进的方向，继续向前跃进，跑两步，伏在地上爬一阵，又跑几步，又伏在地上爬，接着再跑几步……很快就接近了第一辆坦克，眼看着用手榴弹就可以够到，一条火舌忽然向他身上射来，一颗化学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炸开，顿时把他的一条腿炸飞到半空中，飘飘荡荡，然后落在三百公尺远近的地方。

“他昏迷过去，人事不知，躺在坦克附近，浑身跳跃着熊熊的火焰。猛烈的火焰把他烧醒，睁开眼睛一看，第一辆坦克还在不断发射出火舌。他就地一滚，身上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他忍受浑身痛楚，顾不得扑灭身上的火焰，手里紧紧握着最后一颗反坦克手榴弹，像一个光芒四射的火人，咬着牙齿，向第一辆坦克滚去。他想最后一颗手榴弹如果不能炸毁坦克，就要影响同志们包围消灭逃跑的敌人。他下决心一定要把坦克炸毁！他竭力向坦克面前滚去，一直滚到坦克跟前，才把最后一颗反坦克手榴弹扔出去。手榴弹扔出去了，他身上一点力气没有了，也没法离开坦克了！

“反坦克手榴弹投中了！坦克底下立刻闪出一团

白光，轰隆一声巨响，晃了几晃，便跌倒在公路上了，再也吐不出火舌了。第一辆坦克给炸毁了，第二辆坦克往后一退，撞在后面一长列的汽车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巨大的声音，划破清晨的天空。第一辆坦克的尸体躺在公路上，把敌人逃跑的道路堵塞了。企图逃走的敌人都成了瓮中之鳖，全部给捉到了！

“打扫战场时，大家走到第一辆坦克前面，那里躺着这位英雄的战士。他的衣服烧成黑灰，他的皮肤给火烤焦，他的面目让火烫伤，模糊不清，已经不能辨认了。他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证件，没人晓得他的姓名。这样的无名英雄，在朝鲜战场上成千成万，谁也数不清。没人晓得他的姓名吗？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军！……”

戴俊杰刚才被大家热情的欢呼包围，只见蜂拥上来的人，看不见其它的事物。现在王士深在讲前线英勇的战斗，他才清楚地看到这是一间大房子，有五分之一的地方用一排栏杆隔着。栏杆里面是五分之四的地方，平行地排着两排办公桌。墙壁挂满了大红的、水红的、紫红的、蛋黄的和翠绿的贺幛同贺匾，迎门挂着的是一幅大红的贺幛，两边镶着两条黄缎子，下面挂着黄色的丝穗子。大红的贺幛上用黄丝绒剪贴了这样的字句：

福佑药房 开张之喜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医药卫生事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苏北行署卫生处敬贺

戴俊杰顺着这幅贺幛往里面看，是一些卫生所、公立医院和疗养院送的条幅和横匾，接着是一幅又长又大的桃红绸子的贺幛。这是本市新药业公会赠送的，上面用金纸剪贴了这样的字句：“全市医药界的典型，现代工商业者的模范。”

戴俊杰看着墙壁上填满了这些红红绿绿的贺幛贺匾，觉得福佑药房在上海医药界真是一家有名字号，这许多的公家机关和它往来，同业当中的信用又这样高，难怪朱经理那样忙，苏北行署卫生处张科长介绍他们来办货确实是有眼光的。本来戴俊杰到上海来办货把警惕性提得很高，一步一个小心，注意别上了上海商人的当；现在总算找到一家可靠的商人，这次办货有了信心，也有了把握。他默默地计算汇款的时间，今天不汇到，明天一定会汇到；汇到以后，赶快在福佑药房办好货，运到朝鲜前线，好治疗那些千百万人关心的伤病员……

朱经理见戴俊杰的眼光注意墙上的贺幛贺匾，也有意放慢脚步，让戴俊杰看个够。

朱经理跨进经理室，换了一副笑盈盈的面孔，显出非常关心的样子问戴俊杰：

“你们太辛苦了，戴同志，昨天在车上过的一夜，睡的好啵？”

“很好，很好，太舒服了。”戴俊杰精神抖擞地说，“在前方一宿也睡不上六小时，昨天我整整睡了十个钟头。”

“倒茶来！”朱经理漫无目标地叫了一声。

门外夏世富应道：

“是。”

“要好叶子，上等梅坞。”朱经理加了一句。

“晓得了。”

戴俊杰喝了一口上等梅坞茶，从军装胸袋里掏出一张办货的单子，很慎重地递给朱经理，说：

“这是我们这次要办的货，请你给我们先开个估价单看看。”

朱经理接过来一看，那上面尽是一些前方急需的重要药品：盘尼西林两千支，氯霉素一百瓶，消发灭定粉四百磅，次苍五十磅，消治龙粉五十磅，黄凡士林一千二百磅，血压器八只……这些都是畅销货，福佑药房大半没有，有几种虽然有，数量也不多。

戴俊杰等朱经理看完，他关心地问：

“这些货，宝号都有吗？”

朱经理再看了一遍，很有把握地说：

“都有都有。敝号虽小，可是在上海算是货色最齐的一家了。有些同业货色不全，他们也常到小号来配。我们在上海门市生意不大做，做的都是批发，特别是公家机关批发的最多。承蒙政府和人民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福佑在重庆有分号，在广州有分号，就是香港也有我们的分号。许多市面买不到的货，只要委托福佑办，没有办不到的。就是上海买不到，我打一个电报到香港，我们那边的分号，马上就办货进来。电报打出去，快则一个礼拜，顶多也不过十天，货就到了。这次张科长介绍你们来，我们更要特别效劳，你们两位要的货一定办到。”

戴俊杰想起刚才在外边看到的那些公家机关送的贺幛贺匾，他完全相信朱经理的话句句是真的，他满意地说：

“那很好。朱经理，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出估价单呢？”

朱经理还没答话，戴俊杰又加了一句：

“最好快一点。”

“那没问题，”朱经理欠身说道，“这是军需品，前方伤病员在等着治疗，这是救命的事。你看，啥辰光要，我就啥辰光办好。今天晚上怎么样？”

戴俊杰看看窗户外面的天色已逐渐暗下来，一

排排整齐的高大的洋房大楼里不时亮起一盏盏灯光，像是天上的繁星似的，一会出现一些，一会又出现一些。他说：

“今天晚上开出来，我想，好的。”

朱经理要夏世富把戴俊杰的办货单子交给营业部去开价，说：

“这是给我们最可爱的志愿军同志办货，关照营业部价钱要开得便宜一点……”

“晓得了。”夏世富拿着办货单子送到隔壁的房间里。

一阵热烈的掌声引起戴俊杰的注意。他把估价的事办了，心里感到轻松愉快，听到这掌声，便向朱经理建议：

“外边热闹的很，要不要去听听？”

朱经理已经接下了这笔大生意，和戴俊杰没什么好谈的，听到戴俊杰的建议，便非常高兴地满口应承：

“好的，好的，我很想听听。”

他们两人走了出来，坐在经理室门口。

王士深讲完了汉江西岸狙击战中无名英雄炸坦克的故事。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在童进前面升起，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了解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热爱的心情。他非常敬佩为祖国为壮丽

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英雄行径，这是他学习的榜样，是他前进的号角，是他毕生的志愿。他的钦佩的眼光望着王士深，关心地问：

“麦克阿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下台的？”

“是这个原因。”王士深愤愤地说，“这个战争贩子是被我们中朝人民部队打下台的。这以后，美国鬼子不敢吹牛了，再也不敢提‘感恩节返家攻势’了……”

童进面对着王士深，他的眼光里露出崇敬的神情，走上去，一把紧紧握住王士深的手，激动地说：

“你们真了不起，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发现戴俊杰和朱经理站在经理室门口，料想事体已经办好，他说，“现在请戴俊杰同志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戴俊杰抱歉地说：

“我们到上海来有要紧的公事，现在没有时间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吧。”他向大家点点头，表示对大家的热情的感谢。然后对王士深说，“我们走吧。”

王士深站了起来。

朱经理接上去说：

“我们一道吃饭去吧！”

王士深一愣：

“吃饭？”

戴俊杰见朱经理要请客，拒绝道：

“不，我们自己去吃。谢谢你，朱经理。”

“我也不是请客，”朱经理站起来拉他们两位走，“一道吃便饭，不要见外了。”

“不，我们还有公事哩。”戴俊杰站在那里不走，一再谦辞。

“饭总要吃的，走吧。”

夏世富说：“吃过饭再办公事。”

夏世富不再征求他们同意，连拉带扯把戴俊杰、王士深他们请了出来。出了经理室，走到 X 光器械部，朱延年站了下来，指着那间小房间对戴俊杰说：

“这是敝号新设的 X 光器械部，请到里面参观参观，指教指教。”

戴俊杰犹豫地站在门口，歪过头来征求王士深的意见，没等王士深表示，就给后面的人推进去。所谓 X 光器械部实际上只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一张写字台和两张沙发几乎占去了房间一半的地方，只是在进门的左边的墙角落那里放了一架小型的 X 光透视机。

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位青年人，年纪不过三十上下，头发梳得乌而发亮，洁白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边的平光眼镜，穿着一身咖啡色的哔叽西装，胸前打着一条新的墨绿的领带，特别显眼。他听见朱经理的

声音，连忙放下手里的钢笔，迎将出来。朱经理指着他介绍给戴俊杰、王士深道：

“这位是上海有名的 X 光专家，是我们 X 光器械部主任，夏亚宾先生，本来他要到同济医学院去担任教授，敝号为人民医药事业服务，特地托人聘请来的。”

夏亚宾这位 X 光专家是朱延年给叫了出来的。夏亚宾其实并不是 X 光专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毕业没两年就给介绍到一家私立医院里的 X 光室去工作，因为他原来就有些自然科学的常识，人又聪明，那位 X 光专家也肯教他，确实学到不少关于 X 光器械方面的一般知识。那家私立医院因为病人不多，其中比较受病人欢迎的名医自己都去开业，病人越发少了，收入不够开销，在上海解放以前关了门。夏亚宾从此失业在家里。他原来就没有积蓄，加上没有收入，勉强维持几个月，就靠借贷生活了。他是朱延年的表弟，经常向他伸手想点办法。朱延年依靠各种各样投机取巧的办法，生意越做越大，想建立 X 光器械部，一则营业可以扩充，二则这方面的利润比药品要厚的多。恰巧夏亚宾又来借钱了，朱延年详细问他过去在医院工作的情形。他摸不清原因，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了。朱延年当时就决定请他到福佑来筹备 X 光器械部，并且称他是 X 光专家。从此，大家都叫他

X光专家。慢慢，他自己也以为是X光专家了。他最怕别人问起他过去的情形，逢到这种尴尬的场合，他总是用极为谦虚的语气含混过去。

夏亚宾现在又听到朱延年叫他X光专家，他向戴俊杰、王士深弯弯腰，不卑不亢地说：

“只要为人民服务，到啥地方工作都是一样。至于说X光专家，实在不敢当，不过鄙人从小对这方面就发生浓厚的兴趣。”夏亚宾看到朱经理带他们到这里来，以为志愿军要订购X光器械，便逢迎地说，“您两位是不是要订购一套X光器械？我很高兴能为志愿军服务，这在我，是再光荣不过了。”

戴俊杰望着那架小型X光透视机摇摇头。

朱延年接上去说这次办货单上没有，夏亚宾立即改变了口吻：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给志愿军服务。”

戴俊杰未置可否地点点头。朱延年约夏亚宾一道去吃饭。他整了整墨绿色的领带，跟在他们背后走出来。

走到楼梯口，朱经理对夏世富咬了一个耳朵，他机灵地退了回去。当他们走到马路上，从朱经理、戴俊杰、王士深他们的身子后跟上来福佑药房的十多位同事，走在最前面的是童进和叶积善。

马路上熙熙攘攘地尽是人，在霓虹灯光的照耀

下，不断地流来流去。走过十字路口不远靠右首有一家照相馆，迎街闪动着刺眼的霓虹灯光制成的五个字：大美照相馆。夏世富抢上一步，拦住戴俊杰、王士深他们的去路，欠着身子，用右手做出请进的姿势，说：

“请进来拍一个照。”

王士深莫名其妙，问：

“为啥要照相？”

“留个纪念，嗨嗨。”

戴俊杰摇摇头：“用不着了。”

朱经理见戴俊杰他们不进去，走上来说：

“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你们在前方牺牲流血，受冷挨饿，为了啥？为了我们祖国的安全，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生活。你们在前方抗美援朝，冰天雪地里打仗，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才能在后方做生意，才能在后方安居乐业。这都是你们伟大的功劳。我们日日夜夜想念你们，我们时时刻刻想看到你们。这次，小号有这样的光荣，也为志愿军同志服务，实在是叫人太兴奋了。大家见了面，拍个照，留个纪念，也叫我们沾点志愿军的光荣。……”

王士深叫朱经理这张像蜜一样甜的嘴说得怪不好意思的，他没再说啥，只是望着戴俊杰，征求他的

意见。戴俊杰本来很坚持地要走，让朱经理一说，犹豫起来了。朱经理一边拉他们一边说：

“进来吧，拍个照没关系。”

夏世富乘机会在侧面一推，后面童进、叶积善他们跟上来，把戴俊杰、王士深他们拥进了大美照相馆。朱经理请戴俊杰、王士深他们两位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子，他自己紧紧靠在戴俊杰的隔壁，其余的人有的坐在两旁，有的站在后面。童进很兴奋地站在戴俊杰、王士深他们两位的背后。照相师上好了底片，说：

“请微笑一点，不要动。”

他拿下镜头的盖子，然后又盖上去，微笑地说：“好了。”

朱延年拿起笔来，题了这样的字句：

福佑药房全体同人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
戴俊杰
王士深 两同志因公回国摄影纪念

一九五一年

他把这张纸交给了大美照相馆，要他们用大字印在上面。他心中暗暗打算：等印好了，叫照相馆放大一张，至少得放十六寸，挂在苏北行署卫生处送的

大红贺幛旁边，一步进福佑药房的大门，谁都要首先看到这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哪个看见了不钦佩福佑药房呢？哪个瞧到不信任福佑药房呢？凭公家机关送的贺幛贺匾和志愿军共同拍的照相，就可以完全说明福佑药房是金字招牌，谁会怀疑福佑药房不是货真价实呢？

戴俊杰心里按捺不住的高兴：上海商人的水平真高，不但是满嘴的新名词，而且政治觉悟程度也比别的地方高，见了志愿军这样的热爱和仰慕，实在叫人感动。

他们走出大美照相馆，一同上饭馆吃饭去了。

41

他们吃过晚饭出来，正好是八点钟。朱延年和夏世富送戴俊杰、王士深回旅馆去，别的人四散开去。唯独童进没有走，他一把拉住栈务部主任叶积善留在最后。等大家走完了，对叶积善说：

“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办，你倒忘了？”

叶积善是个耿直、谨慎、小心的人，委托他办事绝对误不了。他听见童进这么问，吃了一惊：

“店里的事体办好了才出来的，库房里也没有什么事没办，忘了啥事体？”

“你晓得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几？”他不解地问，“不是礼拜六吗？”

“是呀，不是礼拜五，也不是礼拜天，正是礼拜六。你想想有啥事体忘了？”

叶积善抬头看见跑马厅的大钟正指着八点，他想起来了，拍一拍童进的肩膀，恍然大悟地说：

“你不提醒我，我真要忘哪。”

童进回过头来考问他：

“啥事体？”

“上团课！是啵？”

“你可忘了！”

“我确实忘了。”

“走吧。”

“怕时间来不及了，走过去要一刻钟，迟到不好意思。”叶积善步子迟疑起来，不大想去。

“迟到总比不到好，”王士深讲的汉江西岸狙击战的英勇故事，在童进脑筋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他要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恨不能自己也能够到朝鲜前线，拿起枪来，援助朝鲜，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当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上

海分会，要求参加志愿军，到三八线上去。抗美援朝分会的一个工作同志找他谈了一次话，说明暂时不报名，留在上海工作也同样可以抗美援朝。他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想想工作同志的话不错，每一个人都到朝鲜前线去当志愿军，后方的工作谁做呢？在上海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啊。他在福佑药房工作了一个时期，慢慢感到不满足了。他虽然是工会的会员，可是工会的组织生活还不能满足他日益增涨的政治热情，好像他浑身有着充沛的多余的力量无处使，要求多做一些工作，给祖国多贡献一点力量。“打烊”以后，别人走了，他留下来看《解放日报》，看《学习》初级版，看有关青年团的小册子。通过利华药房的一个青年团员王祺的介绍，争取到旁听青年团团课的机会。随后，叶积善也在他的鼓励之下参加了。他对叶积善说，“还是去吧。”

叶积善并不固执自己的意见：

“去就去吧。”

他们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礼堂，里面已坐满了四百多人，几乎把礼堂都填得满满的了。四百多个青年人坐在礼堂里却鸦雀无声，低着头在静静地谛听，面前全摊开一个小本子，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团课。站在主席台上报告的人是个年青的瘦子，他叫孙澜涛，是区的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讲话的声音很

慢很低，但是很清楚：

“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义务，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三点，现在讲第四点。”他低下头去，看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念道，“第四点是：爱护人民与国家财富，自觉地遵守各种革命秩序与纪律，与一切损害人民及国家财产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作斗争。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就很不容易。我们青年团员应该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应该模范地遵守各种革命秩序与纪律，爱护人民与国家财富。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特殊人物，而应该是遵守各种革命秩序与纪律的模范。特别不容易的是与一切损害人民及国家财产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作斗争，我们青年团员反对明哲保身，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凡是损害人民和国家财产的行为，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坚决展开斗争，哪怕在斗争中遇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也决不灰心丧气，要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斗争精神……”

孙澜涛讲完了这一段，放下《团章》，他那一对有力的炯炯发光的眼睛向台下四百多位青年一扫，好像在问：这一点你们都办得到吗？

童进心头一愣：做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真不容易啊，不说别的，单讲青年团团员的义务，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感到做一

个青年团团员是无上的光荣。他的义务比别人多，也就是说他对人民和国家的贡献也比别人大。志愿军之所以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就是因为他们对人民和国家的贡献比别人大，对人民和国家尽的义务比别人多。王士深所讲的汉江西岸狙击战的英勇故事像是生动的图画似的在他的脑海里闪动着，王士深的嘹亮的动人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萦绕。童进仰起头来，正碰上孙澜涛的询问的眼光，他钦佩地望着孙澜涛，心里在盘算：应该争取做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

童进好像感到旁人发现他的心思，他的脸红了，头低下来。孙澜涛继续讲下去，他却啥也听不见了，在想：童进够条件入团吗？向啥人提呢？提出去会接受吗？想了一阵，他回答自己：当然不够条件，提出去也没有用，那就不提吧。接着他又问自己：不提，啥辰光才能参加青年团呢？提出去，就是不够条件也没有关系，知道了什么地方不够，好努力争取啊。

忽然坐在他面前的人都站了起来，接着是细碎的人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抬起头来一看：原来团课讲完了，孙澜涛已经从主席台上走到人群中去了。他也站了起来，和叶积善一道随着人群走去。

他们走到礼堂大门的时候，童进右边肩膀上猛地被人打了一下，他旋即回过头去，不是别人，是

利华药房的王祺。王祺笑嘻嘻地指着童进的面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今天怎么迟到了？我到处找你们，连影子也看不见。你做啥去啦？”

“店里有事体，”童进把戴俊杰、王士深到福佑药房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叶积善在旁边补了几句：

“我们迟到，可没有去白相，我们还是赶来的呢。”

“这么说，还应该表扬你们哩。”

“不应该表扬，应该批评我。要不是童进提醒我，我差点忘记哪。本来我怕迟到不好，想不来的，是童进拉我来的。你倒是应该表扬表扬我们的童进。”

“童进最近很努力学习，是应该表扬的。”

“我不行，”童进低声地说。“还差的远哩。”

他不小心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入团，还差的远哩。他的脸上立刻有一阵热潮掠过。他看王祺和叶积善都没有发觉他这句话的含义，连忙加上一句：“我还要很好努力学习。”算是遮盖过去。

谈话之间，他们已走到山东路口，本来童进和叶积善应该转向福州路那边回家去，可是童进对叶积善说：

“你先回去吧，我有点事。”

叶积善径自去了。童进和王祺信步慢慢走去。王祺不了解童进有啥事体。童进想和王祺商量入团的事，几次话已经到了嘴边又缩回去。他怕提出来不成功叫别人笑话。他们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童进还是没提，可是他的呼吸却越来越紧张，有时走上去，歪着头想对王祺提，一会，又往前走了。王祺料到童进有事要和他谈，见他迟疑的不提，便反问道：

“有事体要和我谈吗？”

“我，”童进暗暗吃了一惊，他想：难道王祺已经知道他要求入团吗？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有一件事想提出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

“不讲出啥事体，哪能晓得可以不可以呢？”

“你晓得，你一定晓得。”

“啥事体呀？”

“你说可以吗？”童进肯定王祺已经知道了，他问，“你说可以，我就提出来；你说不可以，我就等将来够条件的时候再说。”

王祺已猜到几分，但是他还没有十分把握，试探地问道：

“想入团吗？”

童进站了下来，一把抓住王祺的手，热情地回答：

“是呀，我晓得你一定晓得。你说，可以啵？”

汉口路上静悄悄的，除了附近报馆还是灯火辉煌以外，其余的铺面都关了。马路上的人也很稀少。童进干脆站了下来，敞开和王祺商量了。这时，他再也没有顾忌了。马路旁边的路灯，把他们两个肩并肩站着影子映在雪白的墙壁上，越发显得很静寂。

王祺轻轻地说：

“根据团章的规定，凡是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男女青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积极奋斗，愿意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承认团章，服从决议，参加青年团的工作，都可以申请入团。”

“我够条件吗？”

王祺冷静地想了想，说：

“我想，够条件了。”

“那我就参加。”童进坚决地表示，一点也没有犹豫。

“不，没那么简单。”王祺拍拍他的肩膀说，“童进，首先要填写入团申请书，要经过团支部委员会审查与团支部大会通过，再送到团区委批准才行。”

“哦！”

“还要有介绍人，正式团员和党员都可以介绍的。”

“那我找谁介绍呢？”

“我可以。”

“真的？”

“当然真的。”

“那我今天晚上就填申请书，好啵？”

王祺摇摇头，说：

“不忙，我明天把入团申请书送给你，你再填。填好了，送给我，我给你转到团支部去。”

“好，好，好好……”童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隔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明天一定送给你！”

42

跳完了最后一个音乐《晚安》，朱延年扶着马丽琳走回自己的台子，叫茶房开账。老有经验的茶房在最后三个音乐以前就开好了每个台子上的账单。他从手里的一叠账单子中抽出一张递给朱延年：

“一共六万八。”

朱延年掏了一叠人民币给茶房，连数也不数。茶房数了数，说：

“还多三万二。”

“给你做小账吧。”

“谢谢你。”

马丽琳看朱延年化钱像是流水一样的不在乎，她想朱延年在西药界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阔佬。他年轻，长的又俊秀，她更觉得他可爱了。朱延年把左胳膊送到马丽琳面前，她的右手就勾在他的胳膊上，两个人肩并肩地愉快地走出了百乐门大舞厅。快走到门口的当儿，朱延年歪过头去，对着马丽琳轻轻地说：

“欢迎我去吧？”

“不欢迎。”马丽琳有意这么说。说完了，她的眼睛向他一瞟，露出非常欢迎的神情。

他们两个人上了汽车。汽车向马丽琳家里驶去，朱延年调皮地逗她：

“你不欢迎我到你家里去，那我送到你家门口，我就回去。”

她没有答他的话，她的右手紧紧捏了一下他的小胳膊。

“痛啵？”朱延年望了她一眼。

“活该，”她向他噘了噘嘴，说，“谁叫你说俏皮话……”

“是你讲不欢迎的么。”

“大人物到我们小地方去，还有不欢迎的？”

“我啥辰光变成大人物了？”

“汽车出汽车进，用起钱来像流水，走起路来眼睛向上，从来看不起人，那还不是大人物吗？”

“我啥辰光对你这样的？大人物是你封的。”

“我怎么敢，”说话之间，汽车已经开到马丽琳的家里，这是北京西路的一条很整齐的弄堂。她说，“请进吧。”

朱延年跟着马丽琳从后门走进去，经过灶披间，穿过过道，马丽琳很熟练地扭开电灯。一座很华丽的客堂间出现在他的眼前。她让他坐在椅子上，说：“对不住，你在这里坐一歇，我上楼去看看，不晓得娘睡了没有。”

说完话，她袅袅婷婷地走了。

朱延年站起来，很羡慕地看着客堂间：客堂当中挂的是一幅东海日出图，那红艳艳的太阳就好像把整个客堂间照得更亮，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挂着四幅杭州织锦：平湖秋月，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和雷峰夕照。一堂红木家具很整齐地排列在客堂里：上面是一张横几，紧靠横几是一张八仙桌，贴着左右两边墙壁各放着两张太师椅，两张太师椅之间都有一个茶几。在东海日出图左下边，供了一个江西景德镇出品的小小的磁的观音菩萨，小香炉的香还有一根没有烧完，飘散着轻轻的乳白色的烟，萦绕在观音菩萨的上面。这个客堂的摆设虽说很不协调，甚至使人一看到

就察觉出主人有点庸俗，许多东西是拼凑起来的，原先缺乏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是朱延年很满意，因为从这个客堂间可以看出它的主人是很富有的，不是一般舞女的住宅。

马丽琳换了一件紫红的软缎夹袄和紫红的软缎的大裤脚管的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浅尖口的缎子鞋，也是紫红的。她像是一团火焰似的回到客堂里，笑咪咪地说：

“累你等了一歇，别见怪。”

“当然不见怪，”朱延年意味深长地说，“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

“啊哟，你是那样的好人！”

“你说不是？”

“我巴不得是的，”好说，“走吧，楼上坐。娘她们都睡了。”

“那很好，用不着惊动她老人家。”

朱延年跨进马丽琳的卧室，给里面艳丽的陈设迷住了。在黯弱的电灯光下，他看见迎窗右边的墙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淡绿色的梳妆台，上面放满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化妆用品的瓶子；右边摆着一张淡绿色的大衣橱，斜对面是一张大的双人沙发床，上面铺着一床天蓝色的缎子被，一对白府绸的枕头上面各绣了两个色彩斑斓的鸳鸯；紧靠窗户摆着一张淡绿

的小圆桌，四周放了四把淡绿的矮背椅子，小圆桌上铺了一张紫红的丝绒桌毯，那上面有一只玛瑙色的小玻璃花瓶，里面插了一束水红色的康乃馨和雪白的夜来香，散发着淡淡的沁人心腑的香味。他望着康乃馨，心里想：就凭客堂间的卧室的陈设看，马丽琳起码有一亿以上的存款。她有钱，人又漂亮，真是不错。

马丽琳在外边冲了两杯咖啡粉端了进来，另外，她又端进来一盘子沙利文的西点，叉了一块放在朱延年面前说：

“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没有好的吃，请多多包涵一点。”

“有名的沙利文的点心还不好吗？太客气了。”他喝了一口咖啡，并没有吃点心。

“跳了那么久，该饿了，”她关怀地说，“吃点吧。”

朱延年吃了核桃仁的蛋糕，他又叉了一块巧克力蛋糕送到马丽琳的手上，说：

“你也饿了，吃一块吧。”

“好，谢谢你。”

“别那么客气，我是借花献佛。”“不过也是表示你的一片好意。”她边吃边说，同时望了他一眼。

“现在我不借花献佛，我自己送你一样东西。”

朱延年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握在自己

的手里。他把手放在紫红的丝绒桌毯上，说，“你要不要？”

“你送我的物事还有不要的？”

“那你猜，是啥？”他的右手指着自己的左手。

她想了想，说：“我猜不出。”

“你猜猜看。”

她的食指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半晌，说：“是表。”

“不是。”

她歪过头来去看他的左手，说：“别针。”

“也不是。”他的左手握得更紧。

“是，是啥？你说。我不猜了。”

“再猜一次。”

她看他的左手握得很紧，估计里面不可能容纳很大的东西，咬上下嘴唇想了一下，肯定地说：

“戒指，是啵？”

“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对了。”

他把左手放开，手心里是一只碧绿欲滴的翡翠戒指，一点瑕纹也没有，真是好货色。马丽琳看得心痒痒的，她望了又望，笑盈盈地问：

“你在啥地方买来这么好的翡翠戒指？”

“为了这个，我整整跑了一个礼拜，几乎把上海的珠宝店都跑遍了，才在天宝买到这一只，你戴戴看，不晓得合适不合适。”

他给她戴在她的右手的无名指上，紧紧靠着她手上的亮晶晶的钻石戒指，正合适。

“很好，像我自己去买的一样。”她把右手放在自己面前，仔细地望过来，又仔细地瞧过去，嘻着嘴说，“我很喜欢。”

“只要你说一声喜欢，我这个礼拜总算没有白跑了。”他紧紧握着她的手。

43

快中午了，朱延年才从马丽琳的家里赶回福佑药房，走到经理室的办公桌面前坐下来，一连打了三个哈欠。他低下头去，想伏在桌上睡一会。忽然听到有人叫道：

“经理！”

他抬起头来一看：原来夏世富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那儿注视着他很久了。他刚才进来没有注意。他用两只手抹了抹自己的脸，清醒了一点，睁着惺忪的睡眼，问他：

“有啥事体？”

“苏北张科长有信来……”

“大概又是催货的，你复他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又打电报到香港分号去了，最近因为船少，误了一只船期，只好等下一只船。总之，快了，请他不要急。”

“不，”夏世富摇摇头，说，“他提到装去那批货……”

“货？”他诧异地问。

“就是那复方龙胆酊，现在沉淀了，经过化验，成份不对，退回来了。”

“是哪一家配的复方龙胆酊？”朱延年又打了一个哈欠，说，“是谁配的？怎么配假药给人家？给我查出来，要严办。”

夏世富走到朱延年身边，低下头去，小声小气地说：

“经理，这复方龙胆酊是经理上次到西藏路厂里自己配的。”

朱延年警惕地向经理室里四周一望：幸好只有他们两个人。通营业部会计部那边的门传来滴滴嗒嗒的算盘声和童进他们细碎的讲话声。但听不清楚他们说啥。朱延年压低了嗓子说：

“哪能办法呢？”

“这个——”富有这方面经验的夏世富也想不出好主意来了。

朱延年对着面前台子上的玻璃板，看见里面压

了一张和福佑药房往来厂商的名单，其中有一家康健药厂，这是一家开办不久靠和福佑往来起家的小药厂。朱延年想起很久以前曾经向这家厂办的货中也有复方龙胆酊，他得意地说：

“有个妙计，你把这龙胆酊退给康健药厂……”

“不是他家的货，好退给他？”

“三个月前，我们向他家办的一批货当中，不是也有龙胆酊吗？”

“那个成份对，已经发到西北去了。”

“就说这是三个月前办的那龙胆酊，化验的成份不对，客户退回来了，要康健换，不能影响我们福佑的牌子。”

“他要是查出来，不是他们的，”夏世富仍然觉得自己没有道理，担忧地说，“一定不肯退，哪能办法呢？”

“他敢不退，”朱延年理直气壮似的，不满地说，“问他以后要不要和福佑往来了？今后不想和福佑往来，那就算了，福佑认晦气，我们赔。如果还想和福佑往来，做福佑的生意，不退也得退。”

夏世富听到这里，他自己也仿佛理直气壮起来，声音也不同了，比刚才的高亢：

“对，不怕他不退。”

“你写信告诉张科长，这批药是康健药厂配的。

收到他的信以后，我们很严厉地批评了康健药厂一顿，解放以后，还这样做买卖，太不讲商业道德了，丢我们福佑的脸。幸亏张科长是熟人，对他不起，请他原谅。今后我们配货一定严格检查，谢谢他这次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

通营业部会计部的门有人轻轻敲了两下。

朱延年说：“进来。”

门开了。童进走进来，劈头说道：

“经理，我刚才轧了一下账，又有一亿五千万的支票到期了，这两天要设法存进去才好。”

“最早的是几号到？”

“二十三号，一张八千万；二十五号，一张四千万，一张三千万。”

“那么还有两天了，”夏世富确实吃了一惊，他清楚经理这两天头寸很紧，这许多数目很难对付，他担心地说，“最晚的也只有四天哪。”

“是呀，”童进要求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送上去没有多久，就被批准入团了，没有候补期。他最近在福佑做活好像责任加重了似的，常常想起自己是个青年团员应该和别人不同，要帮助大家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他今天见了朱延年，态度也和往常不同，讲话比较强硬。他说，“经理，到期不付不行，现在开空头支票要办罪的啊。”

“我晓得。以后到期的支票，早一个礼拜告诉我，别叫我临时抱佛脚，措手不及。”朱延年对于童进的催促感到不耐烦。他皱起眉头，在想心思，过了半晌，说，“我们库存的氯化钾还有几桶？”

童进说：“这要问栈务部。”

“你打电话问一下叶积善。”

童进当时拿起电话问了栈务部叶积善，那边回说还有五桶。朱延年听到了这消息，他的皱着的眉头开朗了，告诉童进明天可以把一亿五千万的现款存进去。童进满意地走了，但是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五桶氯化钾和一亿五千万有啥关系，为啥刚才经理愁眉不展，听到有五桶氯化钾就开朗了。这一亿五千万的款子明天又从啥地方来呢？他清楚最近外埠没有什么款子汇来，大的客户也没有消息，本埠欠福佑的款子数目很小，难道朱经理有点金术吗？不但童进怀疑，就连最知道经理底细的夏世富也莫测高深，不知道经理的葫芦里卖的啥药。等童进走出去，朱经理招手叫夏世富走到他面前，低低地对他说，他才渐渐明白了。

朱经理说：

“世富，你拿这五桶氯化钾到信通银行给我去办质押借款……”

夏世富愣了一下，不懂地问：

“氯化钾一磅八千块，一桶一百磅，只值八十万。五八得四，就是卖给信通银行也不过四百万，能派啥用场啊？经理。”

“咦，你这人真是傻瓜，你还算是我的外勤部长哩。”

“哪能？”

“改装一下，做 S. T. ① 去押，”朱经理很有把握地说，“S. T. 一磅四十万，一桶四千万，五桶值两亿，押他一亿五千万还不行吗？”

“要是查出来，银行里一定不肯抵押这许多款子的。”

朱经理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夏世富恍然大悟，笑着说：

“那行。”

“款子到手，马上存到聚兴钱庄去。”

“好的。”

童进急忙忙地一头冲进来。刚才朱经理训斥了他一通，要他早一个礼拜通知他要到期的支票，他回去马上翻了一下，赶紧跑来报告：

“经理，下一个月十号有一张支票到期……”

“多少？”朱经理望着童进。

① S. T.：即消治龙。

童进说：“数目也不小：五千万。”

“那没啥，”说到这儿，朱经理想起昨天夜里马丽琳和他商议结婚的问题，大家相见恨晚，都希望早一点办喜事。她要求在国际饭店大请一次客，按照文明结婚的仪式进行；他一算，请个四五百号客人并不困难，场面大一点也不费事，困难的是这笔开销可不小，最近银根紧，轧头寸不容易，要马丽琳拿出来，一则不好意思开口，二则会露了马脚；原来福佑药房朱经理是个空心大佬倌，那一定败事的。他说最近很忙，并且主要的是因上海解放了，新社会了，不时兴过去那一套繁文缛节。顶好是先结婚，然后发一个通知给亲友，过些日子，找一个大家空闲的礼拜六晚上，借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举行联欢晚会，和双方的亲戚朋友见见面，这样又大方又时髦。马丽琳给他几句话说了心，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同意朱延年提出来的月内结婚。他想到马丽琳亮晶晶的钻石，想到她家里的华丽的陈设，想到她奢华的生活，因此，想到她一定还有许多财富……到下月十号，区区五千万，朱延年当然不放在心上了。他说，“到那辰光，我把办法，就是再多一点也没啥了不起。”

童进又陷入莫名其妙的境地了。他永远不了解朱经理。朱经理有时是挥金如土的富翁，有时是一文莫名的穷汉，时而快乐时而痛苦，叫人莫测高深，是

一个神秘的人物。他困惑地说：

“那很好，我不过是事先报告经理一声。”

“世富，你到库房里把五桶氯化钾取去，快给我办好。”

“晓得了。”

夏世富会意地答应了一声，就走出去了。朱经理对童进说：

“明天你开张支票，到聚兴钱庄取一亿五来，存到信通去，正好付到期的支票。”

童进提醒朱经理：

“那边没有存款。”

“今天有笔款子汇到聚兴，恰巧是一亿五。”

童进笑着说：

“那太好了。”

叮叮叮……

经理桌子上的电话发出清脆的响声。朱延年不满地对黑乌乌的电话瞪了一眼：

“又是谁的电话，吵死人哪。”

他以为又是柳惠光来追还没有付清的尾数，想不去接，电话铃声却一个劲地叮叮叮地响着。

“真讨厌，”他板起面孔，拿起呼筒，恶声恶气地问，“谁呀？”从听筒里传来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

“是福佑大药房吗？我找朱经理——朱延年轻理

听电话……”

朱延年的面孔上漾开了微笑，很亲密地说道：

“我就是。丽琳……亲爱的，好。……你还要啥吗？……新鲜菠萝蜜，我带来。……对，一定准时到……”

他放下电话听筒，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准备出去，刚走出经理室的门，正和童进撞个满怀，见他形色仓皇，忙问道：

“啥事体？这么紧张。”

“经理，”童进的话没有说下去，用嘴向着经理室一指。

朱延年会意地退回经理室，小声问他：

“究竟是什么事？”

“刘蕙蕙找你……”

“她又来哪，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像是狗皮膏药一样，死粘住不放。我和她早就没有关系了，找我做啥？”

刘蕙蕙和朱延年离婚以后，心里十分后悔，觉得他们是患难夫妻，和朱延年离开，怪不好意思的，心里老是惦念着他。但朱延年复业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她越发后悔了。她当时想到的是自己，没料到朱延年这样没有心肝肺，原来活动得能够复业了，有意把老婆甩掉，好另外换一个，使她孤孤单单地过寂

寞贫穷的生活。她的四千元奖金没有了，丈夫离开了，啥歌也唱不出来了。她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可是向谁倾吐？她到处了解朱延年的行踪，知道他没有结婚，在她心里于是点燃了希望。她想好好和他谈一次，用过去对他的恩情来弥补这次感情上的裂痕，恢复旧好。可是老找不到朱延年。今天，她看到弄堂口停了一辆小奥斯汀汽车，便鼓足勇气找上门来了，正好遇到童进，他同情地把她安顿在 X 光部里，匆匆忙忙来告诉朱经理。

童进见经理的脸色不好，怒气冲冲，好像有点怪他似的。他心里很不舒服，说话也就不很客气：

“没事大概不会来找你的。”

“她在啥地方？”

“她坐在夏亚宾那边。”

“她就在楼上？”

“唔。”

“朱延年有点措手不及，用右手老是抓头皮，在想心思。等了一歇，他说：

“你告诉她我不在。”

“她看到弄堂口的小汽车。”童进不愿意跟朱延年一道撒谎。

“就说我没有坐车子出去的。”

“她要等你呢？”

“等？……”朱延年又在抓头皮，眼睛注视着经理室的门，生怕她一头闯进来，无可奈何地说，“那么，叫她不要等，告诉她，明天早上我到她家去好了。”

“经理，明天早上你不是有约会吗？”

“那么，改在下午吧。”

“你整个下午也没空。”

“这，这没有关系，今天先把她送走再说。”

“那明天？”童进不放心地追问，“明天你还是见她一面，和她谈谈。”

“明天？明天，”朱延年见童进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便敷衍他两句，“明天下午我一定去找她。”

童进去告诉刘蕙蕙，她以为事体有了苗头，朱延年肯去找她，可见还没忘记了旧情。她走了。

过了一会，朱延年才走下楼去，跳上汽车，到润身池去。他准备在润身池先理发洗澡，然后睡一大觉，这样，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准时到马丽琳的家里去。

二十五日，朱延年和马丽琳结婚了。朱延年搬到马丽琳家里来住。从此马丽琳家里的一切都变成朱延年的了。朱延年成为马丽琳家里唯一的真正的主人。

44

在长宁路旁有两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进门那条柏油路两边种着半人高的冬青，像是翠绿的栏杆似的，直伸到尽头。从冬青上面朝两旁望去，是大片的草地，已经枯黄了。两边草地的尽头，靠墙是一排高大的楠树，虽然在严寒的冬季里，枝叶仍旧很茂盛。

一进门右手那幢比较大一点的洋房是上海市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址。在柏油路尽头左边的那幢洋房，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进门左手那间客厅，现在是区委的会客室。会客室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壁炉上端挂着一幅复制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像旁钉着两幅五星红旗。面对古老壁炉的是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布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里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近窗那边放了三张柚木的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圆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竹壳的大热水瓶，上面写着七个红字：中共长宁区委。它前面扣着七八个玻璃杯子。从玻璃窗向外看去是美丽而又幽静的花园，下午绚烂的阳光照耀在墙边那一排高大的

楠树梢上。

余静一走进这间会客室，看见里面有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在沙发上坐着，眼光对着给煤烟熏得漆黑的壁炉出神，显得很不耐烦，看出来他在会客室里一定等了很久。她的脚步声引起那个工人的注意，他以为有人来叫他了，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一看见是余静，立刻走上去，握着她的手：

“你怎么来了？”

他是严志发，庆祥纱厂的工人，袁国强的好朋友。余静见了他，顿时想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快三年的丈夫。

袁国强是个共产党员，在庆祥纱厂清花间做工，因为领导罢工，给抓进警察局，拘留在南市看守所里。在法庭上，他啥也没有承认，只是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政府。国民党特务要他承认是共产党，他说不是；要他骂共产党，他坚决不肯。他被拉到老虎凳上，一直加到六块砖头，痛昏了过去，给冷水浇醒了过来，特务依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东西。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逼近上海郊区，特务头子警察局局长毛森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袁国强给带出了看守所的二门。他慢慢走到槐树下面，猛然瞅到前面的土坑，黑乌乌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给推下土坑，露出半个头在地上。一

只黑皮鞋向他肩上一踢，站在地面上的特务说：

“你承认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你出去。”

“我不要出去。”

“那也好，你就死在这里。”

“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万人会跟上来的，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杀不完的！”

“我们要把这些工人斩尽杀绝！”那个特务狞笑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永远也不能斩尽杀绝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袁国强昂头望着夜色茫茫的天空，仿佛听到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前进的步伐，他豪迈地发出格格的笑声。

一个警察把一铲铲土填到袁国强的土坑里。在上海最黑暗的时刻，在黎明将要来到黄浦江边的重要时刻，袁国强停止了呼吸，脸上却浮着胜利的微笑。

上海解放了。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释放回家了。余静走遍上海每一个监狱，没有找到袁国强。约莫过了半个月，公安局的人从南市看守所里的一个老年的看守嘴里，知道槐树下面活埋了不少革命烈士。余静从一堆尸体中认出了袁国强。袁国强和其他被害的烈士都埋在龙华公墓里。袁国强顽强不屈的性格在余静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她从

严志发身上，仿佛看到袁国强的影子。

她刚才到区委会来眉宇间兴奋的神情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深沉的哀伤。她抑制着自己的伤感，强为欢颜地回道：

“来找杨部长。”

“你也找他？他真忙，我等了快半个钟头了，还没轮上。”

“哦……”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咦，”严志发惊诧地问她，“你叹气做啥？”

“我想起了国强，”她把手心里的手帕拭了拭有点儿润湿了的眼角，坐到严志发旁边那张柚木靠背椅子上，说，“他没有看到解放……”

“是哇，……”袁国强的坚强的影子在他眼前闪动，他的声音也低沉了。

“要不给反动派害死，看到解放后的新社会，一定很兴奋……”

“这自然啦。”

“快三年哪，……”说了这一句，她眼眶里的眼泪再也噙不住了，簌簌地落下。

怅惘若失的情绪笼罩在严志发的心上，他怀念着和袁国强的战斗的友谊。时间过得飞快，上海好像是刚解放，袁国强也仿佛刚去世没两天，袁国强亲切的有力的声音还不时在他的耳际萦绕。他忍住心中

激动的感情，怕谈下去会引起她更大的悲伤，安慰她道：

“过去的事算啦……”

“他的影子常常在我面前出现，夜里也经常梦到他，看见了你，我好像又看见了他……”

她揩去两腮上的泪水，眼睛有点发红了。她低下头，望着右手心里的白手帕发愣。

他没有再答话。

会客室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花园里那排高大的楠树枝上麻雀的啁啾声。

他的眼光注视着会客室的门，没有人声，没有人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岔开话题，问余静：

“你们统战委员建立起来没有？”

余静慢慢抬起头来，用手帕揩了揩鼻子，说：

“还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没搞过，支部里对这个问题有些思想情况，我今天汇报汇报厂里的情况以外，还要请示杨部长这个问题。你们那里呢？”

“我们那里也有思想问题，他们要我当统战委员，我不想做。”

“组织决定你做，你不做，行吗？”她逐渐平静下来。

“做啥工作也不做这工作，要我到朝鲜去抗美援朝也可以，痛痛快快和美帝国主义拚一阵，牺牲了也

愿意，就是不愿意做啥统战工作。我主张根本不要统战委员。党里我只听说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没听说过有统战委员。”

“你这个意见，我看有点不对头。”余静只概念地知道不对，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对组织上的决定是完全拥护的，说，“组织上要建立一个组织总有他的道理的，你不能一笔抹杀。”

“我不一笔抹杀，谁愿意做谁做，我就是不做。一定要我做，我就请求调动工作。”

“你那么坚决？”

“当然，说不做就不做。我死也不和那些人打交道。”

他站了起来，加重他的语气，表示他的态度确实很坚决。

收发室的李同志走进来，余静以为是叫她，她站了起来。李同志摇摇手：

“你还得再坐一会，余同志。这位同志谈过话，就轮到你了。”

他领严志发走了。余静又坐了下来。望着窗外枯黄了的草地，她在考虑见了杨部长哪能谈法。统战委员哪能解决呢？她问自己，约莫过了十多分钟，李同志领她走上楼去，在靠楼梯左边的一间房间的门前停了下来，说：

“杨部长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杨部长办公室是原来房子的卧室改用的。

杨健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也是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副主席。根据区委的决定，为了加强基层工作，特别是工厂的工作，区委的每一个部的部长要领导一个基层单位，结合本部的业务，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分配给杨健的是沪江纱厂。因为沪江纱厂是长宁区的大型私营厂之一，里面阶级关系相当复杂，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特别是最近车间生活难做，内部不大团结，情况有点混乱。区委决定以后，组织部马上就把沪江纱厂的支部书记余静介绍过来，要她向杨部长汇报工作。

余静推门进去，看见严志发还等在那里，她就静悄悄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杨部长向她点头打招呼：

“余静同志，你稍坐一会，我们就谈完了。”杨部长转过去对他说，“志发同志，你还有啥问题吗？”

最近庆祥纱厂党支部要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支部里的同志选严志发担任，他一再推辞，主要理由是没有做过统一战线工作，不知道哪能做法。支部书记把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各级党委统战委员工作的指示拿给他看。他当

时没有话讲了。第二天他又提出了具体做法还是搞不大清楚。支部书记就介绍他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来谈谈。刚才杨部长把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工作方针、原则、内容、方式方法都谈了。他更进一步明白了怎样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再也没有理由提出来不担任这个党的工作了。他站了起来，但是并不想马上离开杨部长，觉得心上还有个疙瘩没有解开，嘴上又说不出。杨部长看他那股犹犹豫豫的样子，料想他思想上一定还有问题，便关怀地说：

“我想，你一定还有啥问题没有谈。志发同志，你有顾虑，尽管提出来好了，党会帮助你解决的。”

一股力量启发严志发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他立即说道：

“我想在党面前暴露暴露我的思想，……”他站在那边，一副坚决的眼光注视着杨部长，征求杨部长的同意。

“早就应该如此，”杨部长点点头，说，“坐下来谈吧。”

严志发坐了下来，侃侃而谈：

“我不会交际应酬，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我和那些人搞不来，打不好交道。请杨部长考虑，最好还是派别人来做这个工作，厂里适宜担任统战工作的同志有的是。我不行，我做这个工作，一定不能完成党

给我的任务的。……”

杨部长打断他的话说：

“交际应酬不是统一战线工作，我想，我还需要简单地再讲一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总任务总斗争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是配合总任务总斗争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团结有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党委的工作部门之一，它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助手。民主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和民主人士往来，自然有交际有应酬，但这只是工作的方式之一，不是工作内容。只会交际应酬的同志一定做不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首先要有坚定的党的立场，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次要掌握最高的原则性和最大的灵活性。我看，你倒是比较适合的。不过，你的主要思想还没有暴露出来，是啵？”

杨部长炯炯的眼光注意着严志发，他的思想上的病位在杨部长的眼光的透视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的脸红了。他说：

“是的，我的思想还没有暴露，刚才给你打断了。”

杨部长幽默地说：

“这次我不打断你，你尽量的暴露吧，志发同

志。”他回过去对余静说，“这一来，你得多等一会了。”

“没有关系，杨部长的指示，对我也有用处。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思想，包括我在内，过去我也不了解统战工作，脑子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听你一说，清楚多了。”

“那末，坐过来，我们一道谈吧。”

余静坐到严志发旁边去，正对着杨部长。杨部长身后的一张办公桌上坐了一位年轻女同志，看上去不过二五六岁。她低着头，头发有些披下来，一心一意地在抄写。

严志发毫不掩饰地把病位指给杨部长看：

“我觉得统战工作是无事找事，给我们工作中添了许多麻烦，没有做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那样痛快。我一看见那些人，老实说，总有点别扭，头就痛，不愿意和他们往来。”

“说完了吗？”杨部长问。

“完了。”

“你的话只有一半对，”杨部长说，“做统战工作是有小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减少了很大的麻烦，把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族人士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是我们党的今天的纲领，最低的纲领。我们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全国人民拥护我们，都执行我们的政策，你说，这减少了多少多大的麻烦？”

严志发直点头。杨部长接下去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怕任何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革命就是找麻烦的。不做共产党员，不革命，不想把整个压迫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推翻，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幸福自由的世界，在家里抽抽烟，吃吃饭，睡睡觉，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吗？那世界就得让反动阶级统治下去了，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所以你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地下时期，你领导工人和反动政府斗争不麻烦吗？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志，袁国强同志为了革命，连生命都献出了。全国不晓得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解放后，你做工会工作不麻烦吗？就是你在党内担任个小组长，组里有各种思想情况和各种复杂问题的组员不麻烦吗？同志，做革命工作，都有麻烦，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不过是各种麻烦不同罢了。毛主席讲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之一。你不做，叫谁做呢？大家都不做，那要不要革命呢？……”

“杨部长，”杨部长的话碰到严志发思想上的病位，他听杨部长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感到自己懂的太少了。他想听下去，给自己多长见识，对党的路线政策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又不想听下去，那是因为自己的理由给杨部长这一说，全不值得提。他心中承认自己不对，暗暗往后撤退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提意见了。

杨部长听他叫了一声没说下去，喝了一口开水，微笑地说：

“这一次是你打断了我……”

“请你说吧，杨部长。”

“我看你还不只是怕麻烦，”杨部长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外科大夫，他手里拿着一把犀利的刀子，打开患处，很仔细地把腐皮烂肉割下来，割得很干净，病人虽然有点痛，但是好的快。他说，“你主要的是怕和那些人往来，说得深一点，是怕和他们往来之后，受他们影响，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做工会工作稳当些。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如果你站稳工人阶级和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那你怕啥呢？怕和他们往来，不是表现你的坚强，恰恰是反映出你的脆弱，经不住考验，没有把握么？”

严志发猛的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杨部长的手：

“这一次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话了，杨部长。我懂了，别的同志为革命连生命都牺牲了，我连这点工作都不能做吗？我一定做。”他激动地注视着杨部长，宣誓似地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做好统战委员工作。”

杨部长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说：

“好！”

严志发像是一列火车，经过了长远的旅途的奔波，煤用的差不多，水也消耗了不少，力竭声嘶地到了一个加煤加水的站头。刚才杨部长那一番话，就是无数的烟煤和大量的水加到严志发的火车头里，有了动力，严志发这一列火车又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地轰隆轰隆地向着远大的前程奔驰了。他走到杨部长的门口时，回过头来，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对余静说：

“做吧。”

余静会意地说：

“向你看齐。”

杨部长对余静说：

“志发是个好同志，给他谈通了，他做起来比谁都卖力气，从来不晓得疲倦。”

“是的，他在厂里的群众威信很高。”

“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

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个下午了吧？”

“唔。”杨部长把办公桌上的电灯扭开了。“接着谈吧，用不着休息。”

坐在他身后的那个年青女同志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很暗，她过去开了电灯，送了两杯开水过来，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埋到桌子上抄写去了。

余静说：

“要不要先把我们厂里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你给区委的报告，我看了两遍。报告上已经写了的就不要再汇报了。”

“那我从那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的。劳资协商会议以后，车间的生活是不是好做了一些？”杨部长关心地首先问这个问题。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确实比较好做了，断头减少，出勤增加，出纱品质由第三级提高到第二级了。……”

“转变得这么快？”杨部长怀疑地问，“生活从此一直好做了？”

“没有，好了不到半个月光景，生活慢慢又不好做了。最近，生活更难做了，断头多了，飞纱也多了，产品质量降低了，……”

“只有缺勤率增加？”杨部长笑着给余静加了一句。

“你说的对，现在差不多恢复那次生活难做的老样子，车间里又唉声叹气，张三怪李四，李四怪张三。”

“你们和徐义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提了，他说是上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厂里派人到花纱布公司交涉，交涉了好几次，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才好一点，生活就好做的多了。最近大概是因为棉花缺货，质量差一点，生活不好做。希望工人同志动动脑筋，把机器保全好一点，清洁卫生工作注意一些，生活慢慢会好做的。目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杨部长听余静谈到这里，他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翠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回忆余静给区委报告上所说的情形，徐义德那张狡猾而又阴险的面孔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了想，说：

“余静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上了徐义德的当。”

“我上了徐义德的当？”余静不解地问，“为啥？”

“你们那次劳资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徐义德欺骗了你们。他当时看到工人同志们普遍不满的情绪，把问题提到他面前，无可抵赖，只好承认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但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花

纱布公司身上，并且表示负责去交涉。过了没两天，生活渐渐好做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狡猾而毒辣的阴谋，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生活好做了，这一方面缓和了当时工人高涨起来的斗争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从事实上把责任完全推给花纱布公司，叫工人同志看：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一好，生活就好做了。生活难做和徐义德没有关系。可是，为啥现在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忽然又坏了呢？这就是徐义德事先安排好的诡计；等大家情绪缓和下去，出勤率增加，再慢慢恢复老样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剥削工人获得超额利润呢？这么一来，生活难做的责任不在他，钞票却上了他的腰包。”

“会有这样的事体吗？”余静大吃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现在怎么办呢？”余静想不到解放后还有这样坏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生活难做显然是徐义德搞的鬼，关键问题是原棉。最近需要再开一次劳资协商会议，顺水推舟，徐义德说最近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那就根据花纱布公司配来的原棉来一次重点试纺。我估计他不好

正面反对的，重点试纺，要有领导，要有计划，要组织各车间的力量，在进步骨干分子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看纺出来的结果怎样。我估计纺出来的纱一定很好，那就可以根据重点试纺揭露徐义德的阴谋。通过这一次斗争，可以启发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总之，可以把沪江纱厂的工作推进一步。事先，党团要开会好好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啥事体都好办了。”

“重点试纺这个办法很妙，只是我们厂里党团员太少，办起事来总觉得人手不够。”余静一想到干部，就有点担忧，她要求道，“杨部长，可不可以调点干部到我们厂里来？”

“又是干部问题。到处要钱要人——批预算，调干部。可是现在区里派不出干部。”杨部长耸耸肩膀，过了一会说，“干部就在你们厂里。”

“在我们厂里？”她不解地问。

“一点不错。”杨部长肯定地说，“群众是干部的泉源，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干部，关键在于领导上的发现和培养。不发展党团员，啥地方有党团员呢？”

“人手不够，马上培养也来不及。我们厂里党的力量太弱，总共只有六个党员，两个还是候补，团员也只有九个。”

“啥辰光培养才来的及呢？”

她发现自己说错了，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杨部长严肃地说下去：

“你们厂里工人差不多快两千，加上职员和资本家代理人就超过两千。党的力量太薄弱了。余静同志，我看，你们在发展组织这个问题上有保守思想，要克服，应该快点发展一些优秀的工人同志到我们党里来。到青年团里来。放手培养骨干，大胆提拔一批干部。通过骨干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啥工作都好做了。”

“杨部长，你批评的对，击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在发展组织上是有保守思想的，要求对象十全十美，又不注意很好的培养对象。上海解放两年多了，只发展了两个党员，团员一共只发展九个，确实太少了。”

“每一次大的运动当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进步分子，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培养他，提高他，那我们的干部就不愁了。……”

“还有问题吗”杨部长又问。

“还有一个问题，”余静说到这里笑了，“不过已经解决了。”

“问题不谈就解决了？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谈谈看。”杨部长笑了。

“就是统战委员问题，接到区委的通知，我们也

要建立……”

杨部长插上去说：

“是呀，执行区委的指示，任何厂不能例外的。你们厂很大，统战对象不少，更需要建立。”

“建立是要建立，只是支部里的党员对这个问题思想上有点搞不通，本来要提出来向你请示。听你和志发同志谈，我有了本钱，回去可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了。”

“那你得了外快，问题没谈就解决了。”杨部长很轻松地站了起来，燃了一支香烟，说，“不过，思想的钥匙是不止开一个门的，它可以开很多类似的门。”

“那是的。”余静想起了戚宝珍，问道，“宝珍这两天好些吗？”

戚宝珍是杨部长的爱人，是余静的姑表姊妹。因为身体不好，她没有工作，在家里休养。杨部长说：

“这两天还好。”

“带个信，给我问候她。过两天空一点，我去看她。”余静站了起来。

“好的。”

“杨部长转过身子关心地望着他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同志，说：

“小叶，抄了半天报告要累了，该下班了。”

“不累，”她仰起头来，一张滚圆的脸上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说，“还有一点就抄完了。”

“不要抄了，明天再抄吧。来，”他对小叶招招手，说，“刚才谈话，忘记给你们介绍了，余静同志，这是我们统战部的秘书，小叶，叫叶月芳。以后你有事找我，要是我不在，你找她好了，她会告诉我的。”

“好的。”余静走过来，握着小叶的手，亲热地说，“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小叶的圆脸上浮起两个小酒窝，说：

“欢迎你常来。”

45

花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杨健独自一个人在枯黄的草地上踱着方步。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深蓝色的天空，数不清的星星闪烁着光芒。

中共长宁区委员会和长宁区协商会的干部们都下班回家了。遨游了一天的飞鸟也栖息在高大的楠树的温暖的窠里了。杨健忙碌了整整一天，虽然预定的工作都完成了，但他不放心就离开，从严志发和余静反映的思想情况看，区里一些党组织在建立统战

委员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需要解决。他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思索这个问题。他认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把要建立统战委员的有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找来，再从头详详细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否则即使建立起来，展开工作也还是有困难的。他对自己说：

“对，这个礼拜内就得召开。”

他想好了主意，打了一个哈欠，感到有些疲倦了，迈开疲乏的两腿，向马路那边走去。区委机关宿舍在马路那边的一条弄堂里。

他走进宿舍看到自己卧室里黑乌乌的，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戚宝珍出去了吗？他跨进卧室，扭开电灯，听到微弱的叹息一般的说话声：

“谁啊？”

他听到这细而长的低低的声音，大吃一惊，径自走到床边一看，躺在那里不是别人，竟是戚宝珍。他惊慌地劈口问道：

“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唔……”她有气无力地讲了一个字，就好像没有劲道讲下去了。

在电灯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躺在床上的戚宝珍。她整个身子给一床淡蓝色的布被子盖着，只有一个头露在被子外边。头上包扎着一条白细布手绢，长长的脸，高颧骨，两眼深陷，隐藏在浓眉下

面，薄薄的嘴唇有点发白，一望而知她已经病得很久了。

“你怎么头上又包起来了，发热了吗？”他坐在床边，低低地问她。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用手按着她的额头，等了一忽，说：

“热还没退哩，——啥辰光发烧的？”

她低低地简单地说：

“下午。”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

“你整天忙的那个样子，我哪能忍心告诉你？我不能帮助你工作，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她一句一句很吃力地讲。

“再忙，不能生病不管，你这人，真是的，自己受罪，连说也不说一声……”

他拿过床边小几上的体温表放到她嘴里去，注视着她癯白的面孔。

她有心脏扩大症，平常不能过度疲劳，更不能剧烈运动；病发作起来，一颗心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连躺下也不舒服，气喘不过来，要静静地靠着，身旁不能离人。她一见没有人在旁边，心就更慌，悬在半空似的没有依靠。她虽然在区政府文教科工作，可是一年当中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休养的。她

怨恨自己得了这样的富贵病，能吃能白相，就是不大能工作。她对疾病不服输，有时勉强去上班，一投入工作，开头几天，一般的还能支持，甚至安慰自己：看样子可以工作下去了，渐渐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不到一两个礼拜，身子渐渐不支，在办公桌前，或者在会议上，忽然病又发作，再回家里休养一个长时期。当然，每一次病发，她都得到一次教训。不过，隔了一些时日，她常常把过去的教训忘掉，又想工作了。最近一个时期没有上班，休养得身体确实好了些，昨天受了一点寒凉，早上又收拾了一下屋子，身子疲劳，下午就发了高烧。

他从她嘴里拿出体温表，在电灯下仔细寻找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上升到三十七度三。他告诉她度数，说：

“还好，只有一点点热没退。最高多少？量过没有？”

“三十九度四。”

“你身体不好，又发这样高烧，你不应该不告诉我。”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是宿舍的人都上班去了，连保姆也找不到一个，我烧得昏头昏脑，躺在床上又动不得，想想，烧总要退的，就没惊动你了，怕你操心。”

“珍珍呢？”

他刚才回来，一心只注意她的病况，倒把珍珍给忘记了。珍珍是他们两人心爱的女儿。

“到余静家里去白相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上午去的，”她歪过头去，看看窗外的天色：黑洞洞的，已经不早了，怀念地说，“该回来啦，这孩子。”

“余静今天到我那里来汇报工作，还谈起你哩。”

“谈起我？”她望着他，仿佛很奇怪，她在工厂里工作，怎么会谈到她。

“可不是谈到你。她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因为厂里忙，很久没来看你，叫我问候你。”

“谢谢她的关照。”

“我还告诉她你最近身体好一些，谁晓得你在家发烧哩。”

“没关系，烧退了，就好了。”

他想起她烧退了不久，没人在家，一个人关灯闷在屋子里，便关怀地问她：

“你吃过晚饭没有？”

“晚饭？”她笑了笑，没说下去。

“一定没吃。”

“猜错了。”

“吃过哪？”

她还是笑了笑，没有说。

“连中饭也还没吃，是不是？”

“猜中了。”

“现在饿吧？”

“有点……”

“中午打饭没有？”

他们平常不烧饭的，都到区委机关食堂里去吃，有时把饭打回来吃。只有礼拜天，机关食堂休息，他们才在家里烧饭吃。

“没有。”

他从床边站了起来，征求她的意见：

“煮点稀饭吃？还是下点挂面？我给你做。”

“省事点，吃点挂面算了吧。”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揭开淡蓝色的布被子，想下床来。

他拦住她：

“做啥？”

“我自己去做。”

“嫌我做的不好吗？你忘记了，我是个老伙夫哩。”

真的，他会做许多菜。他过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行军，带了粮票，领了粮食，买点小菜，就自己动手做菜做饭，做面条包

饺子不必说了，他啥菜也都会做，并且味道很好，吃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赞赏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不大有机会做饭做菜，进了上海以后更少动手了。

“有名的杨家菜，我怎么会忘记哩。”

“那为啥不要我做？很久不做了，手有点痒了。”

“你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来也该休息休息，烧点稀饭，我还可以支持。”

他把她按在床上，不让她起来，说：

“也不是平常，你有病；做点饭也不累，不用休息。”

她躺下来，过意不去，还想起床。他板着面孔，严肃地说：

“你真像个小孩子，给你说了，还不听！受了凉，再发烧，你的身子顶不住啊。”

她不再客气了，躺在床上说：

“好，好好，听你的。”

他过来给她把被子盖好，低低地对她说：

“你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一会，我给你做饭去。”

她真的闭上了眼睛。他拿了一小碗米，在卫生间里洗了洗，放在小锅里；在门口生了煤炉，放在上面煮。他跑到附近小店里头了点咸菜和一个咸鸡蛋回来，切开放在碟子里。稀饭好了，盛了一碗，和小菜一同摆在床边的小几上。他怕稀饭太热，让它凉着；

又怕惊醒她，坐在她身旁，注视着她的面孔，听她鼻子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她慢慢睁开眼睛。他低下头去，小声地问道：

“睡觉了吗？”

“睡觉了。”

“吃吧。”他把稀饭捧到她的面前，手里给她托着咸菜，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

46

余静从中共长宁区委走出来，天色完全黑了，星星还没有出来，天空黑茫茫的一片，烟似的笼罩着马路、夫妻老婆店、住家和远处的工厂。那些工厂现在看不见了，工厂的高大的烟囱更加看不见了，但远远的天空中有时冒出浓密的黑烟，闪烁着耀眼的火光。

马路的电灯已经亮了，在路边有秩序地排列着电线杆，它伸长胳膊，把电灯吊在空中。顺着电灯一直望下去，仿佛是一串闪光的珍珠悬挂在空中。在灯光下闪动着的幢幢人影，几乎要把马路塞满了，熙熙攘攘地向远方的工厂去上夜班。沪江纱厂也在那个方面，汤阿英在人群中匆匆地走去。

余静望着这许多的人去上工，其中一定有不少是沪江纱厂的工人，她想起杨部长的话说的对，“群众是干部的泉源，这里面有无数的优秀的干部，但是要靠你们去培养去挑选。”过去只晓得伸手向上级要，厂里这许多人不知道培养、挑选和提拔。她顺着马路边一边走着一边想着；真怪，给杨部长一说，可以培养的骨干分子忽然发现很多，一个一个名字在她的脑海里出现：粗纱间的吴二嫂，筒摇间的徐小妹，细纱间的郭彩娣，清花间的郑兴发，钢丝车的戴海旺……她想有些人可以吸收入团，另外还有些人可以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入党。党团有了发展，车间的骨干分子增多，那样做起工作来多么顺手，又多么愉快，她的面孔上闪着微笑，自言自语地说：“那样啥事体都好办了。”她边想边走，忽然感到自己的右胳膊给什么人有意碰了一下，她一愣，听到有人叫道：

“余静同志，到啥地方去？”

她转过脸来向右边一看：是汤阿英。她兴奋地说：

“我从区委回来，现在回家去。你身体好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余静借着路边烟纸店的灯光向她脸上一看：雪白，白里发青，看不见一点血丝，眼光也

有点黯淡，一绺头发斜披在额角上，显然身体还没有复原。余静把她披在额角上的头发理到她的耳朵后面去，说，“阿英，你身体还没有复原，上工太早了，又是夜班，你吃不消，会影响健康的。”

“没关系，待在家里闷得慌。厂里一开车，没人做生活不行。”

“你不来，有人代你。”

“我这双手劳动惯了，不劳动好像没地方放，闲着光吃吃饭哪能行。”

“那么，至少不要做夜班。我给厂里说一声，你改做日班，明天再去。”

“不，”汤阿英摇摇头说，“今天来了，还是去吧，日班的事明天再说。”

“你顶得住吗？”余静还是有点不放心，注视着她的黯淡的眼光。

“顶得住。”

马路上的人少了，脚步也比刚才的快多了，因为快上工了。汤阿英看到马路上人群匆忙的脚步，她知道该赶去了，说：

“我上班去了，明天见吧，余静同志。”

汤阿英一股劳动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余静。像汤阿英这样的人，平时虽不大开口，讲出话来却很有力量，阶级觉悟高，和群众的关系好，坚决响应党的

号召，紧紧跟着党走，学习认真，生产努力，这样优秀的骨干，正是培养和发展的对象。她发现有些同志对人要求太高，这么一来，骨干很难找了，发展的对象也不容易有了。她本想马上找赵得宝商量商量，但晚饭还没有吃，肚子饿了，决定回家吃了饭，再去找老赵。

当她跨进自家的门，她意外地惊喜了：老赵坐在房子里，正和她娘谈话哩。

“余静这孩子，就是在家里待不住，白天你别想看到她的影子，等到晚上，很晚才回来，想和她谈谈心吧，看她疲倦得眼皮都快合上了，也实在不忍心。”说到这里，余大妈望见余静走进来，改口说，“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了。今天回来这么早？”

“今天是厂礼拜么。”

“对，我老糊涂了，倒忘记了，刚才赵同志还跟我提起哩。”

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飞也似的从后面跑出来，一头伏在余静的大腿上，快乐地叫道：

“妈妈，妈妈……”

余静摸着他的头，问：

“小强，叫人了没有？”

小强仍然伏在妈妈的腿上，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余静叫他抬起了头，说：

“叫赵伯伯。”

他站好了，脊背紧紧依靠着妈妈的膝盖，望了赵得宝一眼，低着头瓜子，叫道：

“赵伯伯。”

赵得宝伸过手来：

“我抱抱你。”

他不肯去。余静把他推过来，说：

“赵伯伯喜欢你，去。”

他走到赵得宝身边，两只小手马上给赵得宝紧紧抓着。

“娘，我肚子饿了，家里有现成的饭吗？”余静望着饭桌上的碗。”

“有，我给你热去。”

“做两个人的，我和老赵一道吃。”

“不，”老赵摇手说，“我是吃过饭来的。”

娘烧饭去了。余静拿热水瓶倒了两杯水送到他面前。她的背上忽然给人轻轻打了一下，她吃惊地叫了一声：

“谁？”

背后发出格格得意的笑声。老赵看见了，却没吭声，只是对余静说：

“你猜。”

余静机警地回过头去，那个人随着她的脊背转

动，还是站在她背后。

“究竟是谁？老赵。”

那个人对老赵做眉眼，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唇，向老赵摇摇手，叫他不要讲。老赵开口了，却没提那个人的名字：

“那么熟的人你还猜不出？细纱间的……”

“小玲，”余静迅速转过脸去，一把抓住张小玲，热情地说，“你这小鬼，今天到啥地方去哪？”

“我们今天上中山公园过团日活动去了，大家唱了歌，跳了舞，还吃了长生果和糖果。我那一份没吃，留着带来给你吃，余静同志。”张小玲从深灰布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长生果来，一把接着一把，堆在桌子上。她对老赵说，“吃吧。”同时，她捡了一块糯米纸包的三色核桃糖送到小强手里，说：

“这是给你的。”

那边老赵说：“你请余静和小强吃的，我不敢动。”

“我说错了话，见怪哪，老赵。”张小玲更正道，“我是请大家吃的。”

“那有我一份了。”老赵拿起一颗长生果格的一声剥开，放在嘴里，边吃边说，“谈正经吧，余静同志，你见到杨部长了吗？”

“见到了，谈了很久，有很大的收获。”

张小玲听说有很大的收获，感到兴趣特别浓，急着说：

“余静同志，能给我们传达传达吗？”

“能。”余静把见到杨部长的经过详细地给他们说了，然后用征询的眼光望着老赵和张小玲，“你们觉得哪能？”

张小玲跳到余静面前，兴奋地鼓着掌说：

“杨部长想的好主意，妙，妙，妙！”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老赵冷静地思考着，说，“这样一来，拿出真凭实据，可以把问题弄清楚，不怕徐义德和酸辣汤怎样狡猾，再也逃不过工人的眼睛了。余静同志，我赞成这个办法。”

“我双手赞成。”张小玲像是在会场开会一样，她举起两只手来。

“现在也不是青年团开会，你怎么举起手来了。”余静笑嘻嘻地说。

余大妈摸着余静的头，喜悦地说：

“你们这般孩子讲话动作都像是在开会。”

张小玲鼓掌道：

“伯母讲的对。”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落伍了，就靠你们干了。”

“不过，”老赵叹了一口气，担忧地说，“杨部长指出要严密监督，这一点很重要。”说到这里，他摇

摇头，等了半晌，才又接着说下去，“可是，哪有这许多的骨干分子监督？”

“向杨部长要，区委的干部又多又强。”张小玲插上来说。

老赵给张小玲一提醒，他连忙点头，笑嘻嘻地问：

“杨部长答应给几个干部？”

这次摇头的是余静，她说：

“别提了，一个不给，还批评了一通。”她接着用自我检讨的精神说，“杨部长说的对，老赵，我们过去确实不对，厂里有那么多的工人同志，不晓得培养提拔。就晓得伸手向上级要，上级不给，还说怪话，其实干部就在厂里。”

“党员只有这六个，”老赵有点想不通，说，“我们不好把群众当党员用啊，那违反组织原则的。”

“杨部长批评我们在发展组织上有保守思想，应该吸收一批优秀的工人到党内来……”

老赵“啊”了一声，哑口无言了。他同意杨部长的批评。

张小玲愣着望余静，马上想到她的责任：

“这么说，我们团里发展也有保守思想吗？”

“当然有，而且相当严重，今年只发展了三个团员，快两千人的厂里只有九个团员，你说像话吗？”

张小玲摇摇头，她承认不像话。

“厂里许多工人早就具备了入团的条件，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吸收到团里来，要大力加强团的工作，把那些具备入团条件的工人吸收到团里来，我们很快就会有大批骨干了。这些团员又是将来发展党的预备对象，一些优秀团员经过培养，可以吸收到党里来。这样我们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就不愁没人办事体了。”

“我们团里的保守思想，还影响了党的发展，耽误了大事，我们的错误可不小啊！”张小玲感到责任重大，内疚地说。

“这不怪你们，主要责任在党支部方面，”余静勇敢地把责任挑到自己的肩上，说，“就是说，我要负主要责任，团是党的助手，也是发展党的预备力量之一，我没有抓紧，也没有很好运用助手力量，是我的错误。……”

“主要是我们团的责任。”

小强很快吃完了三色核桃糖，他的小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长生果，见大人们都在谈话，不懂他们讲啥。他自己伸过手去抓了三颗长生果剥着吃。

余静没有管他，径自说下去：

“我们是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叫化子，有这许多的优秀工人不去培养，却叫干部不够。党支部和团支部

应该开会严格检讨这件事。我们党章上规定党支部的任务第三条是；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吸收新党员应该是我们经常的重要的任务之一，不管厂里工作多忙，也不应该忘记这工作，放弃这项工作。我是支部书记，我对这件事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负责培养几个发展对象，老赵。”

“是的，”老赵说，“我是组织委员，这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不是明天晚上召开支委会检讨这件事？”

“不忙，先把厂里积极分子排一个队，做好准备工作再开会。”

余大妈热好了饭。把一碗青菜烧油豆腐和一碗萝卜汤端到余静面前，碗里发出一股油味和菜香。娘笑眯眯地欣赏女儿滔滔不绝的谈吐，一边说：

“吃吧，趁热。”

“等一等。”余静对张小玲说，“青年团也要好好准备一下，你们培养的对象更多，发展的对象也不少。我刚才在路上看到汤阿英去上夜班，过去你们对她的培养就不够，小玲。”

“汤阿英吗？”

“是她。她阶级觉悟高，劳动态度好，生产挺积极，生病没好就上工。……”

“我也想到她，可是有人对她有些意见。”

“啥意见？”

“钟珮文说，动员她参加歌唱队，她不来。”

余静说：

“参加不参加歌唱队是小事，不能要求人家十全十美。她办事认真，党与工会有啥号召，都跟我们走。这就不错，是我们发展的对象。”

“她确是个好对象，像她这样的人，我们厂里多的很。”

“对啊。过去注意不够，今后一定要注意才是。”

“那我马上去找她去，”张小玲拔起脚来，想立刻去培养她。

“她在上夜班，明天找她也来的及。不靠一次，要经常培养。”

张小玲站下来了。她看见余静面前那碗饭冒着热气，怕搁凉了，说：

“吃吧，余静同志。”

“好。”余静虽然答应，却并未端起碗来，她对老赵说，“关于培养干部发展对象问题，我来准备。老赵，你把重点试纺问题拿到群众中酝酿酝酿，听听群众的意见。你的酝酿工作做好了，我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再开支委会好好讨论一次，订出一个计划，提到劳资协商会议上去协商。杨部长说：重点试纺事先一

定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行，不然，会落空的。”

“就这么办。”赵得宝见余静办事，胸有成竹，考虑的仔细周到，做起来有条不紊，分工明确，负责有人，心中十分佩服。

“这该吃了吧？”余大妈在旁边看了余静一眼，不满地说，“一会说饿，一会又说等等再吃，你这是啥肚皮呀！”

“好，吃就吃。”余静端起饭碗来，夹了一管子的青菜放在自己的嘴里，又说了，“老赵，这一次得小心，别再上徐义德的当。”

娘把那碗青菜烧油豆腐推到余静跟前，说：“吃完了再谈吧，我的老天爷。”

47

马路上虽然已是初冬季节，但星二聚餐会楼上的客房里却暖洋洋的，仿佛是春天。下沿墙角左右两边，放着两只长脚花几，上面各摆了一盆圣诞红，那鲜艳夺目的红色，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显得娇妍。

左边的墙壁上凹进去一大块，里面放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鱼缸，十七八条热带小鱼在绿茵茵的水

藻中怡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水底堆着一些小沙堆，像是起伏的山峦。山峦里面不时冒出一一个个小水泡，一到水面就消逝了。

上午的阳光照耀着半个房间，把站在玻璃窗前面的一男一女的影子射在厚厚的碧绿的地毯上。这一男一女的影子中间本来还可以容纳下三个人的位置，可是这距离慢慢地缩短，缩短到当中顶多只能容纳一个人，而且要侧面站着才行。男的望着晴朗的天空，说：“真是难得的好天气。”

“单是天气好有啥用。”女的撇了一撇嘴。

“今天一早起来啥地方也没去，就到这里来等你，在阳光里，和你在一起过一个上午还不好吗？”

“有总经理来陪，我们小伙计还敢说不好吗？那不是太岂有此理了。”

“为啥老是讲这些不咸不甜的话？”

“总经理架子大，我们不敢得罪。”

“我，我，”徐义德像是蒙了不白之冤似的，急得说不出话来，口吃地发誓道，“说我在别人面前有架子，还有点影子；我，我在你面前摆过架子？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在你面前摆架子的，我的菊霞。”

“不敢当，说得那么可怜。”她有意逼他，因为昨天约他上爱埃令去跳舞碰了钉子，改约今天上午在这里碰面。所以徐义德等了很久她才姗姗地走来，而

且一进门就给他一个冷面孔看，站在玻璃窗面前不言语。徐义德跟过去，逐渐的靠拢她，才慢慢地搭上话来。徐义德口软了，江菊霞心软了，但是她嘴上还不放松。她抓住了徐义德的小辫子，要狠狠地惩他一下，以后就更服帖了。她说，“人家请你到爱埃令去跳舞为啥不去？这个架子还小吗？”

“昨天不凑巧，实在是，实在是有事体，”徐义德又有点口吃了。江菊霞昨天连打两个电话到徐义德家里，都叫林宛芝接到。林宛芝听到江菊霞的口音，连理也没理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她不晓得谁这么无理挂断电话，以为是小孩子，也许是娘姨。徐义德一回家，林宛芝就跟他吵，说是那个女的又来刁他了。他满口否认，说绝无此事。等到江菊霞第三次打电话来，这一次接的是徐义德，可是林宛芝就紧紧站在电话旁边监视。徐义德只听到约他去跳舞，还没有听清楚上哪一家舞厅，生怕林宛芝在旁边发起醋劲，当面打发，给他一个难看，他连忙提高嗓子说是今天晚上没有空，不敢再谈下去，慌里慌张地挂上了电话。林宛芝因此不让他出门。昨天晚上他实际并没有事，只是被管制在家里。同时，江菊霞一个劲认真地盯牢他，他也感到有点儿腻味。他对她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和她亲近主要是因为她是史步云的表妹，通过她，可以和工商界巨头史步云往来。江菊霞在徐义

德的眼中，不过是他在工商界活动的筹码。她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他，觉得他有才干有魄力，确是一名人物。但他也不愿意对她过于冷淡。现在虽然已经结识了史步云，但这个“桥”还得继续保持。等到林宛芝下楼去吃宵夜，他偷偷打了个电话约她今天上午到星二聚餐会楼上客房里见。江菊霞一步不让地向他威逼，没有办法，只好撒谎了，“厂里开劳资协商会议，非我出席不行。要是在平时，我约你跳舞都约不到，你约我跳舞，我会不连蹦带跳地赶来。你说，是啵？”

“哟，”她把嘴一噘，生气地说，“你们这些男人，以为我不晓得，昨天晚上不又和哪个女朋友白相去了。”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急得额角上露出一根根青筋，说，“不信，下次你问梅佐贤。我昨天确实到厂里开会去了，骗你是孙子。”

“你发誓，一个钱也不值。”她冷笑一声。

“那你要我哪能？”他伸出两只手，哀求地望着她，“你说吧。”

“我怎么敢说，”她一狠心，仍然不松口。她脱下身上的薄薄的白羊毛背心，放在靠窗户的紫色丝绒的沙发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房间热得真闷人，水汀烧的这么热，怕有九十度。”

他等于在她面前跪了下去，看她还是不松口，他懂得一味口软求情不是个办法，退了两步之后应该进一步试试看。他转过脸去，望着墙角那边花几上的圣诞红，自言自语地说：

“我觉得这房间冷的很，冷的可怕。”

她迎过来，两眼向他一瞪：

“你是说我吗？”

在她的眼光注视下，他当时就软得像一摊稀泥似的，立刻改口道：

“不是的，我的感觉不对。我昨天受了一点寒凉，不是房间冷，是我自己冷。”

她觉得怨的徐义德差不多了，该收兵了，刚才紧绷着的面皮开始放松，嘴角上虽微微露出了笑意，却很含蓄。她望着热带小鱼一对对地在水中游着，低声问道：

“今天晚上有空吗？”

他仿佛听到了圣旨似的，连忙答道：

“有空有空，我今天一天都有空，到啥地方去都可以。”

“那么！……”爱埃令三个字已经说到嘴上，她有意让这三个字停在舌尖上不说，两只眼睛水汪汪地瞟着徐义德。

他会意地接下去说：

“还是爱埃令？”

“好。”

他的右手搭到她肩上，她顺势靠在他的怀里，吻着他的颈子，故意小声地问：

“现在还觉得冷吗？”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发出有点颤抖的愉快的声音说：

“温暖极哪！温暖极哪！”

房间的热度更高，好像一碰就会燃烧起来似的。静悄悄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囊囊的皮鞋声。

“谁？”徐义德大吃了一惊，他自然而然地松了手，两只发愣的眼睛对着客房的半掩着的门。门外没有人应。

“管他是谁哩，我们谈我们的。”

她把徐义德按在紫色的丝绒沙发里坐下。……

冯永祥今天上午应马慕韩之约到星二聚餐会来。马慕韩因为上海棉纺公会要改选，其中有些代表要更换，同时目前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中存在问题需要解决，挑今天上午清静些，约几个核心分子谈谈，先交换交换意见。除了冯永祥以外，有潘信诚、柳惠光，还有光华机器厂经理宋其文老先生。冯永祥一早就到了，他走进客厅，见马慕韩还没有来，只有柳惠光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沙发里，低着头，好像在打

瞌睡。他没有理他，上楼解手去。他路过楼上的客房，忽然听见徐义德和江菊霞在谈情说爱，打得火热，最后听到徐义德说“温暖极哪，温暖极哪”。他很奇怪为啥刚才进门没有看见徐义德的汽车停在门口，难道是他走来的吗？他不知道徐义德的门槛比冯永祥精，到了这里，徐义德就打发车子停到复兴公园门口去了。他本想闯进去，抓住徐义德的小辫子，但是菊霞并不姓冯，既不是他的姊妹，又不是他的情人，而且他知道江菊霞是说的出做的到的泼辣的人，万一给自己一个难堪，不是自找苦吃，碰一鼻子灰还没有地方去洗哩。他已经知道他们两人在这里，不必进去，也抓住了徐义德的小辫子了。他最后决定装做不知道，径自下楼去，不料皮鞋声叫徐义德和江菊霞听见了。

潘信诚他们见冯永祥走进客厅，都站了起来。马慕韩握着他的手说：

“今天你可迟到了，阿永。”

“谁说的？谁说的？”他否认道，“我早就来了。你这位主人是迟到哩，我来的辰光，只有惠光兄一个人坐在那只沙发里。”

他指墙角落那儿。

“你到啥地方去哪？”

“到……”冯永祥差点要把楼上的秘密讲出来，

他一想因为是秘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晓得，才有要挟徐义德的力量，如果过早讲出来，倒没有作用了。他改口道，“我解手去了。”

“这么久？”潘宏福问。

冯永祥信口胡诌了一句：“我肚子不好。”

“肚子不好和小便有啥关系？”柳惠光顶了他一句，说，“阿永，别忘了我是利华药房的经理，对于医道，我还懂点皮毛。”

“小便带大便，一道解决的，”冯永祥见他揭穿自己的谎言，连忙信口扯开去，说，“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工商界有名的大夫，一瓶子装不满，半瓶子醋，同我差不多。嗨嗨。”

冯永祥几句话把柳惠光的脸说得通红。他指着冯永祥说：

“你……”

“我哪能？”冯永祥问。

“阿永这孩子真会巧辩，”宋其文对潘信诚低低地说，“这张嘴一天比一天俏皮了。”

“是呀，”潘信诚觑起老花了的眼睛笑咪咪地小声说，“现在年轻人进步的快，见啥学啥。”

“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已经落伍了。”宋其文深深叹了一口气，也小声地说，“五金业当中有位叶乃传，也是年青有为，天大的办法他都会想，真是有本领。”

“青年真了不起。”潘信诚随便答了一句。

马慕韩见冯永祥和柳惠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点剑拔弩张的形势，他旋即把话题拉过来，说：

“别瞎扯了，阿永，我们谈点正经的。”

他的意见立刻得到宋其文的支持：“好。”

“棉纺公会要改选了，旧委员当中有一名是反革命分子，已经枪毙了；有一位病死了；有四位转业到外地去了。我们有二位委员要补进去，另外还得考虑有些委员要更换。这两天棉纺公会就要讨论，所以今天先找少数人交换交换意见，好提出去协商。”

潘宏福立刻想起爸爸昨天在家里和他商量哪些人可以补进去，原来是为了今天早上的协商。他自己也不是委员，因为通达厂有爸爸代表了，希望这一次能够补进。他想：只要爸爸一提，就十拿九稳。潘信诚的脑筋里闪现出一个个棉纺界的活动分子，觉得不少人可以当委员，但他没有马上提出来。潘信诚想先领领行情，问道：

“这次改选，统战部和工商联方面提出啥条件没有？就是说，有个啥原则和标准吗？”

“那要问阿永，他同党政方面的人接触的最多，就是我们认识一些党政方面的首长，有的还是阿永介绍的哩。”马慕韩说，“阿永，你谈谈。”

“这个吗，”冯永祥思索地搔搔头发，装出有一肚

子原则和标准的神情，慢条斯理地说，“原则当然有，我听工商联的人说，要推选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带头的人物，遵守共同纲领的人物，和群众有广泛联系的人物。这就是说，要推选真正能够代表我们棉纺界的人物，一点不能推板。”说到这里，他把头一摇，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

潘宏福点头赞成：“这个原则有道理。”

柳惠光自己并不是棉纺界的人，他很希望这次能够推荐出个把熟人做委员，可是又不好自己提，他就尽量设法向马慕韩冯永祥的身上靠，说：

“阿永说的极是，要有这三个条件才能当选棉纺工会的委员，一点也不含糊，真正不错。”他看冯永祥听自己一番恭维的话眉毛扬了起来，他更加把劲，巴结地说，“我还有个小小意见补充，我觉得这次改选，除了阿永说的三个条件以外，还要真正代表棉纺界的利益说话，要能够在慕韩兄和阿永领导之下做事的人。”接着他又补了一句，“还有我们的信老。”

马慕韩听得心里痒痒的。柳惠光几句话正说到他心里，道出他今天约几个朋友谈话的秘密。他摆出平静无事的神情，附和着说：

“惠光兄补充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工会的委员就要能够代表棉纺界的利益讲话，否则是不合格的委员，信老，你以为怎样？”

潘信诚当时没有吭气，他认为这一点重要倒是很重要，就是不容易办到，只是马慕韩在打如意算盘。马慕韩见他没言语，转过来问宋其文：

“其老，你看呢？”

“我完全同意。”宋其文摸摸胡须说，“原则好谈，重要的是具体人选。慕韩老弟，谁合适呢？”

潘信诚还是不肯给自己儿子提，他试探地说：

“慕韩老弟，你考虑的怎么样？”

“委员吗，”马慕韩懂得潘信诚在摸他的底，他心目中虽然已物色的差不多了，但不好意思一口说出。他曾经和冯永祥初步研究了一下，有意装出还没有具体考虑的神态，说，“我还没有想，所以约大家先来交换交换意见。具体人选，我看，得先请阿永提意见，他的人头熟。”

“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冯永祥嘴上虽然很谦虚，可是他得意地站了起来，右手的食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点了点头，说，“不过，承各位抬举，看得起小弟，棉纺界的朋友确也认识的差不多。”

潘信诚的眼睛望着冯永祥指手划脚的样子，心中有点不满，觉得他少年得志，目中无人，不过没有表露出来。他慢吞吞地说：

“那当然，这事非阿永不行。”

“阿永，当然是阿永。”潘宏福生怕冯永祥提名时

把他忘了，连忙附和爸爸的意见。

“阿永是我们工商界的红人，啥事体离了阿永也办不成。”黄莺一般的轻盈的女人的声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掀起落地的紫色的丝绒帘子，走进来的是江菊霞。她后面紧紧跟着徐义德。他们两个人刚才在楼上谈了一阵，江菊霞觉得既然有人发现，就干脆大大方方走下去找他们，显得没啥事体，也可以表示并不在乎。要是鬼鬼祟祟走掉，再让他们发现反而不好。徐义德不好在她面前显得胆怯，他只好硬着头皮，装出也不在乎的态度，实际上是勉强地给她牵着鼻子走。走到帘子那边，徐义德就听到潘信诚说“这事非阿永不行”，他踌躇地站在帘子外边。谁料到她不但在帘子外边答话，而且立即掀起帘子，出现在众人的眼光下。

“你们啥辰光来的？”冯永祥故意问徐义德。

徐义德还没有答冯永祥的话，她随随便便地代他答道：

“刚来一歇。听说你们来了，就来看看你们。”

“好哩，请坐，一道聊聊。”马慕韩请他们两个人坐下。

徐义德的脸对着马慕韩，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安详地问马慕韩：

“有啥要紧的事体，上午就来谈了。”

马慕韩见徐义德和江菊霞一道走进来，感到十分突然。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两人的暧昧关系，而是因为今天约会有意避开他们两人；请了江菊霞，谈论啥，史步云马上便会知道；如果请徐义德呢，那他对棉纺公会委员的缺一定想染指。他对徐义德这样跋扈的人没有兴趣，上次聚餐会上争论棉纺检验就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这样的人是不会甘心在他手下共事的，而且要处处提防，说不定啥辰光狠狠给人一记。他和冯永祥、潘信诚这些人发起星二聚餐会以后，不仅在学习政府政策法规上有不少启发，了解工商界行情有很多帮助，而且使他发觉单办好兴盛纱厂并不一定有一官半职，要有更大的实力，团结一批人，有了共产党所说的代表性，才能够被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在人民政府里当了“长”字号的人物。民建会上海临工会没起多大的作用，倒是工商联很实惠，是个权力机关，而棉纺公会又是工商联里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公会，抓住了棉纺公会，在工商联里的地位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不满足自己只是一名工商联执行委员的空头地位。现在棉纺公会的委员要更换和补选，正是一个机会，好安排“兴盛”的人进去。今天先酝酿酝酿，以后正式提名就好办了。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他于是改变了主意，简单谈了谈刚才商量这件事的情形，然后把话往

冯永祥身上一推：

“具体人选要听阿永的意见。”

“哦，”徐义德会意地应了一声。他很紧张地注视着冯永祥。徐义德并不是棉纺公会的委员，他早就风闻棉纺公会有六位委员的缺额，可是老没有正式商谈改选的消息。他焦急地到处打听，等了很久。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碰上了，再好也没有哪。他关心地说，“这事倒是要仔细考虑，推选出来的委员一定要有魄力，能够敢于代表棉纺界的利益说话。”

“这个话对。”潘宏福挺身应道。

“阿永，”潘信诚说，“你提出几位来大家商量商量吧。”

“信老，你看谁最合适呢？”冯永祥不表示态度。

潘信诚从来不先表示态度的，提人选的事他更不做，要等待大家提出符合他心思的人选，他才点头赞成，这样不落痕迹，也有把握。他说：

“最近棉纺界的情形不熟悉，我想不出适当的人选来。”

“信老是我们的老前辈，工商界的巨头，信老哪个不认识，只要信老提，没有人不同意的。”

潘宏福得意地笑了。

“那倒不见得，”潘信诚还是不说，“这事要慎重

考虑，不能随便提。最近棉纺界的情形，你们熟悉，还是你提吧。”

“信老的话对，委员的事要慎重考虑，”马慕韩抓到机会，连忙收篷，说：“大家都不提，先酝酿酝酿，改一天再谈吧。”

徐义德好不容易才抓到谈论棉纺公会委员的机会，却又要改天再谈了。改一天谈也不会约他，他这个委员能不能当上就很危险。他不等冯永祥表示意见，马上插上来说：

“今天能先谈谈，大家心里有个数，酝酿起来才有眉目。”

“这也对。”柳惠光附和徐义德意见，想今天能提出他来，以后棉纺公会讨论就有了底子，但是看到冯永祥脸色不对，就没再说下去。

冯永祥见马慕韩想避开徐义德和江菊霞谈，怕他们插一脚。他没有意见，说，“改天再谈也好。那今天随便聊聊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吧。”

“应该谈谈，最近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江菊霞点头赞同。

“请你指教吧。”潘信诚向江菊霞微笑地说。

“指教？不敢当。”江菊霞微微欠起身子说，“我们作具体工作的人，情况比较熟悉，向信老和各位汇报汇报倒是可以的。……”

潘信诚望着江菊霞说：

“请你汇报吧。”

她伸直了腰，两只脚交叉地靠在沙发下边，两只手按在自己的大腿上，低下头望着大红的厚地毯，出神地想了想，然后严肃认真地说：

“目前我们棉纺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思想改造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棉纺业内部思想落后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人曾经对我这样说，假如不抗美援朝，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巨额军费用在中国建设方面。还有人，新爱国主义就是爱苏联。这些思想，当然是糊涂透顶的，应该要改造思想。可是为啥要进行思想改造？哪能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以后又哪能？这里就有文章了。比方说，有人提出来既然四个阶级同时存在，何必要改造思想，学习无产阶级的思想？经过思想改造后，工商界生活水准是否会降低？其次是年终奖金问题。棉纺业对今年的年终奖金很担心事，政府和工会方面还没有表示态度，不了解要不要发。”

她刚说完，马慕韩还没有表示态度，潘信诚正在摇头思考，柳惠光来不及系统地了解她的意思，徐义德怀着不满的情绪，脱口而出：

“一提起思想改造，老实讲，我就想不通。共同纲领上规定了四个阶级，国旗上也有我们民族资产

阶级的一颗星，为啥民族资产阶级要思想改造呢？”

马慕韩说：“我们要以毛泽东的思想为领导思想，德公。”他显然不同意徐义德的见解，但一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笼统地提这么一句。

江菊霞立刻驳回去：

“是的，慕韩兄这句话不错，不过，我们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思想，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的思想。这一点，我同意徐总经理的看法。”

宋其文思索地说：“菊霞的话有道理。”

“你当然同意德公的看法，凡事你都同意他的。”

马慕韩语义双关地敲了江菊霞一记。她顿时给说得两腮绯红，以为刚才在楼上客房走过的就是他。她把脸转过去，有意避开马慕韩的视线，特地望着潘信诚，说：

“那倒不一定。”

“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确实要思想改造。”马慕韩无意敲了江菊霞一记，见她有点紧张，他就拉回话题，说，“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正确的思想存在。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说共产党员中就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整风。当然，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两码事，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说明要思想改造的不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刚才菊霞说的民族资产阶级

这种落后思想应该逐步克服，很对，工商界一定要加强学习，学习服从国营经济领导，学习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

“慕韩兄真了不起，讲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她以退为进地讽刺马慕韩说，“听说你一回到家里，就捧着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政府的政策法规也了解得相当深刻。我们马列主义很少，谈理论自然谈不过你。”

“你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劳资关系方面，我就不如你。”

“那算不了理论。”

徐义德也赞成：“慕韩兄这样说法比较全面合理。不能笼统地谈思想改造，其实每一个阶级都要思想改造，如果大家思想改造，我们就没有意见了。”

“我还有一点意见补充，”宋其文遇事总有点怕，他说，“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还得注意方式方法，好比用药，不能太猛，要缓进。共产党的一些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时性急了一点。”

柳惠光听大家谈了半天思想、阶级、改造这些名词，现在才弄清楚了一个大概意思。宋其文最后一点，他听清楚了，拍掌赞成：

“我同意其老的见解。用药不能太猛，只要能治病就行。”

“年终奖金，我们机器业也感觉到是个大问题，”宋其文说，“发吧，有困难；不发呢，也有困难。”

“不但机器业有困难，棉纺业也是一样。”江菊霞皱着淡淡的眉头说，“要是发年终奖金，有些厂的确吃不消，像广益今年各厂大检修，化了一笔款子，又加上捐献飞机五架半，一共化去三百多亿，再发年终奖金，怎么吃的消？”

“是呀，别的姑且不说，单是捐献飞机大炮这笔款子，可伤了我们工商界的元气。”徐义德曾以沪江纱厂的名义捐献了三架飞机，一想到这笔钱，他就有点心痛。他认为抗美援朝是共产党无事找事，人家美国进攻朝鲜，也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为啥不可以置之不理呢？不抗美援朝，他也不必捐献三架飞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想想看，留下这笔钱，可以给沪江增加多少纱锭！他还有余痛地说，“要是不捐献飞机大炮，各厂流动资金要宽裕的多，对发展生产也有利的多。”

马慕韩瞅了徐义德一眼。他赞成毛主席的主张：不能置之不理，一定要抗美援朝。唇亡齿寒的故事他在中学里就读过了。从三八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他晚上回家一再翻阅登载这些消息的《解放日报》。他起初也怀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那些胜利消息打破了他的顾

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每次过外白渡桥都要向桥上的日本鬼子行礼，感到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抗日战争胜利了。美军顾问团在上海滩上神气活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单是外白渡桥转弯那边就不知道冲伤撞死多少中国人。他老在想为啥外国人可以随便蹂躏中国人的尊严，而中国人的生命又为啥比外国人的低贱？有时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上海解放后，他看到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上海滩上横行霸道了。这时，他想到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他是多么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不但使他惊奇，而且使他有一身光荣的感觉。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作为中国人，地位也跟着提高了。他每次走过外白渡桥都要傲然四顾，深深感到现在这片土地才是中国的。他不同意徐义德的论调：

“德公，沪江捐献了三架飞机，是不是现在还有点肉痛？”

徐义德不知道他问这话的用意，以为兴盛纱厂也感到捐献伤了元气，马慕韩是不是和他一样：也有点后悔。他试探地说：

“三架，可不是小数目啊！”徐义德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当时捐献两架其实也说得过去了，就是因

为大家一起哄，他不得不跟着加码。他说，“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也很可观哩！”

“现在是不是还想收回来？”

徐义德听马慕韩的口气不大对头，脸上的神色有点奚落人的样子，他马上否认：

“捐献出去，哪能收回？”

“那是呀，抗日战争年代，我们虽然没有捐献飞机大炮，可是那损失啊，”宋其文摸摸胡须，不胜感叹地说，“不说别人，就说我吧，几乎弄到家破人亡，侥幸保住这条老命，才又回到上海，重振旧业。”

“其老说的对，捐献这笔数字虽说不小，可是无论如何省不得。志愿军在朝鲜流血流汗，牺牲性命，保家卫国。没有他们，我们上海也不能够安心生产建设。我们工商界捐献几架飞机大炮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公民起码的义务。国家强了，我们面子上也有光彩。”

宋其文接二连三点头称赞道：

“慕韩老弟说的有理，究竟是到朝鲜前线慰劳过的人，感受比我们深切。”

“我亲眼看到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打仗，不管美国的炮火怎么猛烈，他们都是日日夜夜地保卫着我们。志愿军说的好，他们的辛苦和血汗换来了祖国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难道我们好

意思说因为捐献了一点飞机大炮，就可以不发年终奖金吗？”

“慕韩兄别误会我的意思，”徐义德发现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只有江菊霞的眼光里有点同情他的意思，别人的眼光仿佛都不同意他提出捐献飞机大炮做为不发年终奖金的理由。潘信诚的眼睛半闭不闭。他看不出潘信诚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连忙改口道，“捐献飞机大炮是千该万该，那还有啥闲话讲，要是政府现在号召，沪江再捐献六架也没有问题。我不过是说捐献了飞机大炮，流动资金减少了。”

“这当然啰。……”

江菊霞怕马慕韩再向徐义德头上敲一记，她想法把话题拉到年终奖金上，暗中帮助徐义德：

“慕韩兄，你看年终奖金这个问题哪能办法呢？”

“至于年终奖金问题，”马慕韩说，“我听史步云从北京回来说，目前工资制度还没有合理调整，今年年终奖，就现在情形看，还不可能废除。在人代会上可以不提；要提的话，不能要求规定今年不发，而是希望规定发放的办法。”

潘信诚在一旁暗暗点头，觉得马慕韩究竟与众不同，看问题提问题确是高人一筹。但徐义德并不满意马慕韩的说法，因为沪江纱厂这些企业发起年终奖金来要不少头寸。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说：

“提，恐怕还是提一提好。年终奖金是不合理的制度。工厂每年要支出大笔奖金，影响工厂的资金流转。如果将这笔资金放在生产上，是很可观的，发给工人只不过是改善改善生活而已。这次提了，今年不取消，希望以后能取消。人代会是我们工商界合法斗争的地方，一定要争一争。”徐义德想起自己不是人民代表，可是对人代会非常有兴趣，希望有一天最好自己也能被选上当个代表。他于是说道，“我觉得目前棉纺业的公私关系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还须在这次人代会上提出，首先关于配纱问题，目前私营厂每件配纱四百十斤，而实际的需要量是四百十八斤，有时还不够，相差十斤左右。这个本我们赔不起，希望花纱布公司考虑调整。其次是棉花含水量问题，在上海，由于机器蒸发量大，比黄河以北所规定的要相差百分之一，希望全国各地能统一规定。第三是配棉问题，目前配棉不足，特别是中小型厂更感到缺乏。花纱布公司所配的都是绞花。希望能配筒棉，既省电力，又省人力物力。同时，现在配棉周转每半月一次，希望花纱布公司能改为每月一次。”

“对！”又是江菊霞的声音，她说，“这确实是我们棉纺业目前的中心问题，我刚才倒忘了，幸亏徐总经理提出来。”

“又是你首先赞成德公的意见，江大姐。”冯永祥

微笑地望着她。

“阿永，你哪能哪？谈正经事，你总是喜欢开我的玩笑。”她的眼睛狠狠地盯了冯永祥一眼，仿佛在责备他；可是她的嘴角上闪着笑纹，又似乎是喜欢他。

冯永祥给江菊霞望得不好意思，赔不是地说：

“对，谈正经的。德公真了不起，提出这几个问题，的确是目前棉纺业的中心问题，可以请慕韩兄代表我们棉纺业提到人代会上去，‘将’花纱布公司一‘军’。”

“我不行，要信老去。”马慕韩立刻推辞。

“我年纪大了，不行了，最近也很少管事，”潘信诚自己想退后一步，让这些年青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争到利益反正大家都有份的，说，“还是慕韩老弟代表我们提出去吧。”

“我哪能代表？”马慕韩谦虚地说，“头寸不够。”

“那当然，”潘宏福心里说，“哪能和我爸爸比。”

徐义德羡慕地说：

“你是民建上海临工会的常务委员，工商联的执行委员，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又是协商委员，又是人民代表，头寸不小啊。我拥护你代表我们棉纺业讲话。”

“我也拥个护。”冯永祥笑着说。

“不行，”马慕韩摇摇头，心里却也未始不想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露露面，但是棉纺业和工商联不一定推他出来代表，他现在落得谦虚谦虚，等到真的要他出来代表讲话，那时候可以表示遵命，勉为其难。他打定了主意，说，“信老年高了，不愿意讲的话，那么，史步云代表我们讲话比较适当。不过，我倒以为信老能出来讲几句。是最适当哪。”

“慕韩老弟想的对，步老最适合不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和工商界的朋友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有一篇讲话，没有一个朋友听了不称赞的，真是如古人所说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后来，我又同他一道上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被打，他挺身而出，大庭广众面前，慷慨激昂讲了一通，听了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动容的。……”

“哦，步老还有这个本事？”马慕韩在抗日战争的时期，还在上海读初中，没有去过重庆，对下关事件也不甚了然。

宋其文摸摸胡须说：

“想起这些事也蛮有意思。”

“其老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人物。”潘信诚伸出大拇指来说。

“我算啥，不过是跟着步老后面跑跑罢了。”宋其文的眼角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说，“步老要是肯讲，那

最理想了。”

“史步云最适当，我们这些人过时了，讲话也不行了。”

潘信诚点头，同意宋其文的意见。

48

“要啥礼物，你自己说好了。”徐义德把话攒过去，等待林宛芝的意见。

下个月的二十九号是林宛芝的三十大寿。徐义德私下早就许了愿，要给她过生日。现在快到还愿的辰光。刚才他们夫妇两个在房间里筹划这个生日哪能做法。徐义德要场面，同时也是为了讨好林宛芝，他主张大请客一次，热热烘烘地闹它一整天。凡是沾亲带故的人和能够攀上的工商界红人，都请来。一方面显得徐义德阔绰、体面、有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拉拢一批工商界的朋友。林宛芝要实惠，但她并不反对徐义德的大请客，这样可以提高她在徐家的地位，目前虽然屈居第三，但是社会上和亲戚朋友中间知道林宛芝的比那两位总要多一些，更何况徐义德紧紧捏在她的手里。这一点，她是满意的。可是，

做生日要化了这许多的钱，她实际上得到啥呢？当然亲戚朋友会送一些“寿幛”这类的东西，她不希罕这些，也用不上。她于是问徐义德送她啥礼物。谁知徐义德这家伙真刁，反而问她要啥。她想了想，有意不表示，瞪了徐义德一眼，说：

“那看你的心意了。”

徐义德眉头一扬，试探地说：

“送你一件貂皮大衣……”

“那不是礼物，没有纪念的意思。”她摇摇头说，“上海的天气用不着貂皮大衣，别把我的骨头烧酥了。”

“一只翡翠的镯头，怎么样？”

“我有了。”

徐义德一个劲搔着那蒙不白之冤的头发，望着窗外下午的阳光和有点发绿了的草地，好像再也想不出适合的物事了，露出哀求的神情，说：

“你说吧，我的宛芝，我一定遵命照办。”

她撇一撇嘴，说：

“不，我一定要你说。”

“好，我一定说。”徐义德今天带着最大的忍耐，一心一意地想满足她的要求。他想起她曾经羡慕过马慕韩太太的钻石戒指，觉得戴在手上美丽极哪，一伸出手去，光芒四射，确实叫人可爱。他不敢断定她

一定满意，但是很有可能满意。他兴高采烈地说道，“好好好，我想到一件礼物了……”

“啥？”她满怀兴趣地听他说下去。

“钻石戒指。”

“这倒像送过生日的礼物，”她的眼前立刻出现了马慕韩太太的那个中指上戴的大钻石戒指。这个钻石戒指，她想了很久了。她自己的那个，太小了，一克拉都不到。现在徐义德提出来，她满心欢喜，很中意这个礼物，表面上却又努力保持平静，问，“准备送多大的呢？”

“两克拉的。”

“我不要。”

“太小吗？”徐义德看她紧闭着嘴不吭气，他就连忙加码，说，“三克拉的，好吧？”

她心里完全满意了，可是不表示出来，却说：

“我反正没有意见，看你的心意吧。”

徐义德料想她满意了，他于是表现得更大方些，说：

“大小倒没啥，不过多几个钱，只要你满意就好了。”

“现在说的好听了。”她撇一撇嘴。

“再买大一点也可以，”他表示毫不在乎，但旋即把话岔开去，免得她再在大小上争，说，“不过买这

个玩意儿得找个行家陪你去。”

“谁呢？”

“你想想看谁熟悉？”

“你陪我去。”

“我吗，是个外行。”

“外行也不要紧，你总比我懂一些。”

“这个要化时间，到处去看，到处去比较，——这两天，我忙，没有时间陪你。”

她斜视他一眼：

“你陪别人就有时间了。”

他怕她牵扯到江菊霞头上去，连忙岔开，说：

“我最近陪她们两个人出去过没有？”

她们两个人指大太太和二太太。这一阵他倒的确没有陪她们出去。她反过来问：

“你说谁？”

“我不是要你提吗？”

“要末……”她想了想，伸出两个手指来，指着她的卧室斜对面的门。那边是二太太朱瑞芳的卧室。

“你说瑞芳吗？”

“唔，她喜欢这些东西。她认识好几家的珠宝首饰店……”

这个对象不合徐义德的心意。他提出反对理由：

“你怎么想到瑞芳来呢？你的生日不想过得太平

吗？要是瑞芳晓得我送你这么大的钻石戒指，那不要打破醋罐闹翻了天！这事不能让我们家里的人陪你去，也不让亲戚陪你去。”

徐义德一点破，她马上想到冯永祥。她的面孔发烧了。为了不使徐义德察觉，她摘下塞在胳肢窝钮扣上的淡青色的细纱手帕揩了揩脸蛋。她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她私下打定主意要冯永祥陪她去，但她嘴上并不说出来，反而娇嗔地望着徐义德说：

“你不陪我去，也不让别人陪我去！……”

他从中辩解道：

“不是我不让别人陪你去，是要找一个适当的人陪你去。瑞芳去，是不适当的。你想想看，是不是？”

“好啦，好啦，我啥人也不要，我自己去，这行吗？”

他拍手赞成：

“这再好也没有了。”

“不要你去，就再好也没有了。”

徐义德抽出一支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有意望着挂在壁炉上面的美国电影明星嘉宝的照片微笑地说：

“你去买要多少钱，我付好了。”徐义德怕她还不答应，立即想法把话题岔开去，就等于把这件事定下来了，说，“老王咖啡已经烧好了，我要下楼去吃点

三明治了。”

“我陪你去喝杯咖啡。”

他们两个人到楼下的小客厅里。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低声地说：

“今天公司里有事，我要很晚才回来。”

出乎徐义德的意料之外，今天她一点也不留难，很爽快地答应：

“好呀。不过，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天天这样忙，别累坏了身子。要回来吃晚饭吗？回来吃的话，我等你一道吃。”

“不，我不回来吃了，你先吃吧。我大概要到十一点敲过才会回来。”

“那我等你的门。”

“你要累了，就先睡。”

双方的话表面上都很体贴而又温存，其实她摸清了徐义德回来的时间，徐义德有了和江菊霞约会的空隙，她可以找冯永祥，真是相敬如宾，各得其所。

“你坐一歇，我上楼去一趟。”

“要拿啥物事？我给你去取。”

“不，朱暮堂的事，她还在房间等我哩。”

“那快去吧，这一阵为了朱暮堂的事，她老是愁眉苦脸的。”

徐义德上楼走进朱瑞芳的房间，她已经等得心

焦了，见他满面笑容，更是气上加气，便板起面孔，冷冷地质问他：

“我托你的事，早放在脑壳背后去了吧？”

“你这是啥闲话？”徐义德没想到一进门就吃了她一闷棍，笑容慢慢消逝，不满意地反问她。

“这一阵子为啥一点消息没有？”

“你头脑冷静冷静再谈。”

朱瑞芳看他也有点生气的样子，自己的口吻改得缓和了一些，说：

“我头脑很冷静，可是心里怪急的。”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连找了冯永祥两趟，他也愿意帮忙，先找民建会的人说了说，没有起作用；这次他又亲自向市委统战部反映了，人家说，应该按照土改政策和法律办事，他们没有办法。”

“那就完了吗？”

“你说说看，叫我有啥办法？”徐义德望着她，失望地伸出两只手来，又像是向她要办法。

“不能送点钱托托人情吗？”她寻思了一阵，想出这个妙法，责备他，“我的事，你总不肯帮忙，要是林宛芝有啥事体，你早有办法了。”

“你哪能不讲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怎么会不帮忙哩！你想的这个办法不行。现在共产党当家，不像从前国民党的政府，送钱没有用，人家不要。一

一切都照政策办事，就是党员家里有土地也得分，犯了法也要抓起来的，冯永祥说，这件事他没有啥办法了。你叫我哪能办？”

“能不能讲点面子，减刑呢？”朱瑞芳想起老王从无锡回来，说朱老爷关在监狱里，罪恶很大，性命难保，农民都要求枪毙他。她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用哭泣一般的声音说，“可怜暮堂，想不到晚年还受这个罪……”

徐义德看她很伤心，明知没有办法，但也不得不安慰她道：

“你别急，我再找冯永祥想想办法看。”

“那好，”她听到有点儿希望，用天蓝色的手帕拭去了眼泪，说，“你给冯先生讲，这件事办妥了，我重重谢他。”

“那辰光再说吧，”他看了看爱尔金的金手表说，“公司里有事，我得去了。”

“这事要快，迟了，怕有意外。”

“好的，我尽快想办法。”他从老王那里了解到朱暮堂的事很少有希望了。

“我找延年去，看他有啥办法没有。”

“那么一道走吧，我叫车子送你去，快点！”

徐义德和朱瑞芳坐上汽车出去，林宛芝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抓起电话听筒，找冯永

祥。一听到对方接电话的是冯永祥，她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欢，急忙忙地说：

“阿永，阿永，你快来，快来，我等你。”

大概对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啥事体，没有马上答应来。她急了，原来压低的嗓子现在忍不住放高了，忘其所以地说：

“来吧，来吧。我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告诉你，有要紧的事。你快来吧，我在楼底下的客厅等你。”

那边说：“马上就到。”

林宛芝走到梳妆台前面去，她准备给自己打扮一下。可是她一坐下去，望到镜子中的自己，两个腮巴子红润润的，亮得发光；额角上那一卷头发披在淡淡的眉毛上，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放射出强烈的喜悦的光芒，青春的活力从眼睛里透露出来。她把那一卷头发用钢夹子夹在额角上，望着镜子里的林宛芝，她发痴一般的轻盈地笑着，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忽然，她的左手的食指指着镜子里的林宛芝，像是警告她要小心，但又像是毫无意义，不过是人在得意忘形时的一个快乐、兴奋的动作。希望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烧，血液在她周身赛跑。赛跑的终点是她的面孔。一会工夫，仿佛浑身的血液都集中到她的脸上来了，热辣辣的，碰上去就要烫手似的。她陶醉在镜子里，几乎把整个世界都忘了。

静悄悄中，床头的八音闹钟，有节奏地叮叮当地响了，忠诚地报告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这钟声唤醒了她的记忆，想起冯永祥一会就要来了，她不满地向镜子中的林宛芝噘噘嘴，说，“傻瓜，坐在那里做啥，还不快点打扮。”她匆匆忙忙梳了梳头，给红润润的脸蛋上扑了一点香粉，然后用伊丽沙白·阿登牌的唇膏涂了涂嘴唇，又用一把镜子放到后脑勺对梳妆台的镜子照着，仔细地望了又望，才满意地抽掉围着脖子的四一四丝光毛巾，轻轻拭去落在胸前的少许的粉末。

她打开衣橱，那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花绿绿的旗袍。她面对着这些颜色的旗袍愣住了。她歪着头，右手的食指顶着嘴角，自言自语地喃喃着：

“今天穿哪一件呢？”她皱起淡淡的眉头回忆过去几天所穿的衣服；礼拜天穿的粉红色的那件，礼拜一穿的是天蓝色的那件，礼拜二穿的是苹果绿的那件，礼拜三穿的是鹅黄色的那件，今天穿在身上的是深灰色镶着墨绿素边的旗袍，在家里随便穿穿还可以，上南京路去就不像样子了，何况要和冯永祥一道去买钻石戒指哩，更不像样子了。她一件件旗袍看过去，看到第十四件，是紫色哗叽的衬绒旗袍。她点点头，把它拿了出来。在另一个衣橱里，那儿除挂了几件短大衣外，下边还放了二三十双高跟、半高跟的皮

鞋。她挑了一双紫红色的半高跟的皮鞋。

换好衣服，她又从衣橱里选了一件黑色的开司米的大衣，胸前有三个铜板大小的金黄色的扣子闪闪发光。她把衣服全部穿好，在衣橱门上的大玻璃镜子面前照过来，又照过去；正面看看，又看看侧面。她穿衣服不但讲究花样颜色，而且要求全身和谐，既要美丽，又要大方，一走出去还得引起人们的注意才行。她最喜欢听人家说：做衣服得照林宛芝的样子做。她满意今天这身衣服；开司米大衣虽然普通，但加上那三颗金光闪闪的钮子就与众不同了，里面这一身紫色的装束，富丽而不俗，紫黑相配，互相衬托，又很和谐。她安详地走下楼去，坐在客厅里，耳朵却凝神地注意大门那个方向。大门那个方向没有动静。她时不时看看戴在左手上那只十七钻的小四方式的白金手表。

最近她常常想起冯永祥。每天看不见冯永祥的影子，总觉得生活里缺少点啥。每逢冯永祥要来，她老是自然而然地修饰一番，施点脂粉，换件衣服。冯永祥来了，她很希望他早点离开，又想多留他一些辰光，见了冯永祥心里引起一种说不出的但是感觉到的甜蜜蜜的喜悦。等到冯永祥一走，她待在徐公馆里便深深地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孤独。

她坐在客厅里才不过五分钟，但觉得已经等了

好几个钟头似的。她不耐烦地躺在沙发上，焦急地皱着眉头，耳朵却仍然注意大门那个方向。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音响，铁门哗唧一声开了，接着是熟悉的轻浮的皮鞋声，冯永祥走进了客厅。林宛芝站起来去迎他，矜持地伸出手去和他握着，钟情地望着他一眼，轻轻地说：

“为啥这晚才来？叫人等得心焦。”

啊哟，你不晓得，接了你的电话，我马上就准备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电话，是史步云的，他噜哩噜苏说了一大堆，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不晓得他说啥。我只好答应是是是，告诉他等明天当面再详细谈。放下听筒，就赶到你这里来，谁知又迟了。真糟糕！”冯永祥恭恭敬敬向林宛芝一揖到底，一边说，“请恕我迟到，小生这厢有礼了。”

林宛芝看到门外闪过来一个人影，她连忙碰碰冯永祥。她自己迅速地坐到冯永祥斜对面的沙发上，严肃地望着门外。走进来的是老王，他托着两杯很浓的绿茶，放在冯永祥和林宛芝面前。他望着冯永祥的笑眯眯的眼睛，讨好地说：

“冯先生，你好……”

“你好，老王。”

“托你的福，还好。”他知趣地拿着托盘走出去，轻轻把客厅的门关上。

林宛芝来电话的辰光，冯永祥本来可以就到，跨出了大门，他又退回去，把《新闻日报》又看了一遍，才上车。他察觉林宛芝近来对他的态度已经从应付、讨厌转到喜欢接近他了。现在说是有要紧的事，而且要快去，可见得她已经按捺不住内心对他的喜爱。那不能早去，要稍为摆一点架子，见了面热情会更高。林宛芝问起为啥迟到，他伪称临时接到史步云的电话，既不露痕迹，又显得很忙，更暗示出工商界的上层大人物经常找他。

冯永祥听见老王出去把门关上，他斜视她一眼，说：

“这次可是你叫我来的啊，”他有意逗她，“以后可别又怪我冯永祥坐着不走了。”

“你又来了，……”

“我不对吗？”

“对，对对！”她瞪了他一眼，说，“别老说那些酸溜溜的话，好啵？”

“一定遵命，一定遵命。”他笑嘻嘻地说，“那么，你说，有啥要紧的事体呢？”

客厅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是老王经过这里到厨房里去。他见冯永祥来，可能一会儿林宛芝要准备下午茶点，先去通知一声，别临时手忙脚乱。

林宛芝听到外边的脚步声，可不知道是谁，她怕

谈到兴头上闯进人来不好看，便对冯永祥说：

“这里人杂，还是到里面书房去谈吧。”

“好的。”

他站了起来，跟着她屁股后面走去。

49

一个羽毛球在潮湿的寒冷的风里摇摆着，慢慢从天空落下来。徐守仁拿着拍子，跟着这个羽毛球跑过来，两只眼睛直盯着它。羽毛球快要落地，他伸出拍子，啪的一记，很吃力地把它打过去。那边吴兰珍手里拿着拍子却没有接，大声说：

“线外。”

“outside?”徐守仁不相信，他踮起脚尖，透过挂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网子，注视着羽毛球降落的地方。羽毛球歪着身子躲在左边的草地上，橡皮头躲在草地里，只有雪白的羽毛露在草上面。他肯定地说，“inside。”

“明明是线外，”吴兰珍也不服，说，“不信，你来看。”

徐守仁拿着拍子，从网子下面钻了过去，跑到羽

毛球前，对着挂网子的两根柱子一看，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当然是 inside。”

“离线这远了，还不是线外？”

“你站在啥地方？”

吴兰珍经徐守仁这么一问，她不吭气了。他们两人因为客厅里餐厅里卧室里的客人太多，不愿意和那些来拜寿的客人打交道，就跑到草地上来打羽毛球。球场上并没有划线，徐守仁脱下身上穿的黄皮茄克放在自己后面八步远近的地方，吴兰珍也在那边八步远近的地方放了自己那件雪白的兔毛的绒线衫，左右两边没有标志。刚才那球可以说是线外，也可以说是线内。吴兰珍打的很累，从她的鬓角那儿流下了汗水，她用手拭去，洒在草地上，气喘喘地说：

“算你赢了，好吧？”

“哪能讲算我赢？应该讲，是我赢了。”

“好，”吴兰珍不想再打了，也不敢得罪他，有意让他一步，说，“你赢了。”

“这就对了。”他摆出胜利者得意的姿态，说，“再比一盘？”

“休息一会吧。别看不起这个小羽毛球，跑起来可有点累人。”

“白相别的，好啵？”

“好，”吴兰珍拾起地上的雪白的绒线衫，披在她

的淡绿色的丝棉旗袍的肩上，说，“打康乐球去。”

他点头同意，跑过去把地上的黄皮茄克往身上一披，扔下拍子，搀着吴兰珍的手，向花圃那边走去。

站在羽毛球场上看他们打球的一些小孩子见他们去了，像是一窠小蜜蜂似的，都拥到场子里，你夺拍子，他抢羽毛球，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徐守仁在香港书院里第一学期考试不及格，第二学期缺席过多，成绩仍旧很坏，给院方开除了。他在香港九龙荡来荡去考不上一个像样的学校，美国电影倒是看了不少，美国料子的衣服也做了不少，浅水湾、香港仔和青山也玩腻了，只是手头开始有点紧，书也没地方读，英文更不必提了，没有丝毫的进步。这样白相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他开始对香港不满，想起了上海。他写信给父亲，要求回来读书。被开除的事情一字不提，他尽可能瞒着父亲和家里的人。徐义德许久要不到成绩单看，担心他在香港不容易学的好，同时又怕他自己径自去美国而不去英国，另外一方面亲眼见到共产党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如解放前谣传的那样可怕，而是采取缓和的稳健的办法，觉得让徐守仁回来，熟悉熟悉业务，对自己也会有些帮助。他写信叫他回来。徐守仁回来没几天，就碰上林宛芝的三十大寿。

他和吴兰珍走到花圃前面的那一片草地上，那

边摆着一张康乐球的台子。这台子原来放在小客厅里的，因为今天客人多，腾空地方，就移到外边来了。有几个人还在打，一会打完了，有意走开，让徐守仁和吴兰珍打。吴兰珍很熟练地把红的绿的木圈圈间隔地摆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又在四角洞口的上面各放了红圈圈和绿圈圈。两个人开始打了。徐守仁生怕自己输，他抢着要先打。吴兰珍在年龄上是他的妹妹，在举止与态度上都像是他的姊姊，在学问上差的更远：徐守仁中学还没有毕业，而吴兰珍已经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二年级的高材生了。她毫不争先，谦让地说：

“你刚从香港回来，当然让你一步，你先打吧。”

徐守仁没有对准，打了一个空枪。吴兰珍拿起杆子，弯着腰对准洞口，接连打了两个下去。徐守仁站在旁边看得眼红，他有点忍不住了，踮着脚尖，轻轻绕到吴兰珍的背后。她正要打，他有意对她的杆子一碰，打歪了，没有落洞。她歪过头来看他一眼，说：

“看你，打康乐球也是这么调皮！”

可是她并不生气。他咧开嘴得意地笑笑，拿着杆子去打了。这次打进去了一个。当吴兰珍打的绿圈圈只剩下洞口上面两个，徐守仁紧张了。吴兰珍拿着杆子对洞口上面的一个绿圈圈说：

“守仁，我打反动派给你看。”

徐守仁目不转睛地望着“台湾”。啪的一声，被叫做反动派的那个绿圈圈掉到洞口里去了。徐守仁眼看着自己要失败了，他把康乐球的台子一推，放下杆子，说：

“别打了。”

“你输了。”吴兰珍涨红了脸说。

“现在还谈不上谁赢谁输，算和了吧。”

“你赖皮啊。”吴兰珍指着他的面孔说。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我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去。”

“好吧好吧，让你一盘。”吴兰珍并不在乎这一点小输赢，慷慨地答应了他。她看看天色还早，日头不过才偏西，便说，“还不到开饭的辰光，吃啥物事？”

“到楼上去，娘那里准有东西吃。”

“去看看她们也好。”

徐守仁领着吴兰珍从走廊里走进客厅。

三开间的大客厅里挤满了男男女女，乱哄哄地嚷成一团，各自形成了几个中心，东客厅里，大半是工商界的来宾，徐守仁认识的很少，就是少数认识的人。他也懒得一个一个去打招呼。吴兰珍更不消说，她低着头，装着没有看见那些人，尾随着徐守仁走到中间的那个客厅。这间客厅完全改变了往日的面貌。当中挂的是史步云送的一幅大红寿幛，上面贴着一

个金晃晃的大“寿”字。紧靠着这幅寿幛的左边有另一幅寿幛，上面有四个耀眼的金字：“宝婺星辉”，下款是“潘信诚敬祝”。靠这幅寿幛的右首是马慕韩送的一幅向王母恭贺的寿桃图。上沿八仙桌当中的一个是寿星银盾，是冯永祥拜贺的。八仙桌前面挂的是绣着彩凤的大红缎子桌围，桌子上点着一对寿烛，熊熊的火头兴高采烈地跳跃着。中间客厅两边一直延伸到东西客厅墙壁上悬挂的是沪江纱厂梅佐贤他们送的寿幛寿匾。这三间客厅闪耀着一片刺目的红光，红光上面泛滥着各式各样的金字，当中最多最注目的是寿字。徐守仁看到这许多客人和那许多的礼物，他深深感到今天父亲在上海工商界显赫的地位，他自己也仿佛沾到一份光荣。谁不知道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哩。本来急于要上楼去吃东西，现在脚步放慢了，而且挺起了胸脯，东张西望，生怕人看不见他。可是中间的客厅是客人进出口的要道，那里墙上挂了一个鸚鵡，它像是个司仪似的，一见有人来，就张开嘴，饶舌地叫：“客人来哉，客人来哉。”许多客人从外边走进来，立刻被林宛芝、徐义德迎接过去，客人拱拱手说：“恭喜，恭喜。”特地来给你拜寿。”

大家并没有注意徐守仁站在那里等着和他们打招呼哩。虽然没人上来和他打招呼，可是他仍然耐心地站在那里望来望去。他看到潘信诚送的那幅寿幛

上面的四个字，好奇地指着寿幛，问吴兰珍：

“这是啥意思？”

吴兰珍一走进客厅，看到那热烘烘的场面，她就从心里反感；看到那许多的礼物，更不满意了。她认为这是浪费，这是庸俗，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旧社会的坏习惯的残余。更可恶的是，这个热闹的场面是姨父为林宛芝布置的，想起姨妈到徐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心中愤愤不平。她恨不得马上走出去，到楼上找一间安静的房间去看一本《青年的修养》或者是《青年团的任务》这一类的书，那比在客厅里停留或者和那些客人周旋有意义得多。因为等徐守仁，她就厌恶地站在那里，像是发痴一般。听到徐守仁问她“宝婺星辉”四个字的意思，她不耐烦地说：

“还不是说女人过生日，祝寿，有啥意思。”她拉着徐守仁的手，说，“你肚子哪能不饿了？上楼去吧。”

徐守仁点点头，挽着她的手，一同上楼去了。

今天一早，客人还没有来，大太太和朱瑞芳两个人就相互约好：不下楼招呼客人，让林宛芝一个人称能，给她触触霉头，看看她的笑话。徐义德要给她做生日，她们两个人没法反对。自从林宛芝进了徐家的门，她们两个人说话的效力大为减少，凡事总是林宛芝说的算。林宛芝成了徐义德面前唯一的红人。啥事体林宛芝都在她们的前头。她们老想找一个机会报

复，泄一口怨气，却总没有适当的机会。今天过生日，她们两个人不下去，也使亲戚朋友晓得林宛芝在徐家是没有地位的。过生日的辰光，大太太二太太都不出来，可见得她在徐家没有地位，当然也就没有面子。她们两个人没有把自己的心思向徐义德倾吐，只是说她们两个人留在楼上招呼一些内亲。其实她们两个人身上的亲戚早由她们通知不要来了，一定要来的话，也希望迟点来。所以到现在楼上的内亲和女客仍旧很少，只是马丽琳在陪着朱瑞芳。她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朱瑞芳坐着闷的慌，她想起了徐家以后，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做过生日，越想心里越气，越想心里越闷，胸口仿佛有一块铅似的的东西堵着，要把它吐出来，心里才痛快。

楼下传来高谈阔论的欢笑声，有时夹几句刻板的没有感情的出于应付的道喜声，“恭喜恭喜”呀，“给你拜寿”呀，她心里厌烦透了。她想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宁静，把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马丽琳不了解她为啥这样，也不便问她，静静地坐在那里陪伴她。

声音小了，远了。朱瑞芳拿起《解放军画报》来看。这是吴兰珍今天从学校里带来的，早一会和徐守仁下去打羽毛球，攒在她卧室的床上。她翻了几页，里面都是解放军生活的照片。她对这份画报没有兴

趣，轻轻合上。门外传来乱哄哄的人声，她对门口轻蔑地说了一句：

“真讨厌！”

马丽琳随口应道：

“是呀，真讨厌。”

朱瑞芳抬头望了马丽琳一眼，仿佛现在才发现马丽琳在房间里陪伴她。

有人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

“谁？”

推开门进来的是大太太，她笑嘻嘻地说：

“关着门，我还以为你下楼去了哩。”

“下楼做啥？给那个骚货拜寿吗？”朱瑞芳说。

“当然不，”大太太坐在贴墙的紫色丝绒的双人沙发上，说，“不是讲好了不下去么。”

“那就对了。”朱瑞芳放下《解放军画报》说，“我听到楼下乱哄哄的，什么恭喜呀拜寿的，我心里就烦，特地把门关上。”

“对。”大太太走过去把卧室的门关上，表示赞同她的意见，叹了一口气，伸出三个手指，说，“这个人越来越神气了，简直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

朱瑞芳有意装出很淡泊的神情，说：

“人家的眼睛里早就没有我了，谁还晓得徐家还有个朱瑞芳哩。”

“人家不把朱瑞芳放在眼里，可是谁不晓得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这一点她再能也没有办法。她不能说徐守仁不是朱瑞芳生的，是她生的。她要是生了儿子，还不哪能晓得神气哩。”

“是呀，是呀。”马丽琳附和着说，“别理她。”

“她生了儿子，是不是徐家的还很难说。”大太太撇一撇嘴。

“这种野货生的儿子，天晓得是哪一家的！”

“对。”马丽琳说。

她们相视哈哈笑了。

大太太想挑起朱瑞芳和林宛芝的仇恨，好泄心头的气忿。她怨怨艾艾地说：

“我这辈子算完了。我命里无子，没有给徐义德留下一条根，我对他不起。我在徐家伸不直腰，抬不起头，只要给我一碗粗茶淡饭，糊到眼一闭脚一伸就算了。”她抬起头来，惋惜地看看朱瑞芳，同情地说，“只是苦了你，你还年青，你有守仁，可是你也让她压住了。她骑在你头上，今后的日子长哩，哪能过啊？”

“是呀。我是二房，讲起来和她差不多。可是，你不同啊，”朱瑞芳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你在，不管怎么样，她不能压住你，也压不住你。你是明媒正娶的，虽然没有生男育女，但总是这个呀。”

她又伸出了大拇指，恭维地说，“你不像我，你到啥地方都可以站起来，都可以说话。亲戚朋友不管哪一个，谁不叫你一声大太太，有事谁敢不敬你在前头？那个人再神气也没用，只是这个。”她轻视地伸出三个手指来。

“你虽这么说，可是，那个老东西恨不得我早死早好，他哪个地方也不带我去。”大太太深深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命不好，没有生育过，我抬不起头来。”

“她生育过吗？”

大太太给朱瑞芳一提醒，她的心亮堂多了。真的，人家也没有生育过啊。她“咦”了一声，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说：

“她也没生育过啊。”

“这就对了，你为啥要怪自己的命呢？”

“是呀。”大太太接着就想起自己的青春早已消逝得了无踪迹，眼角上聚集着扇形的皱纹，白发悄悄爬上了鬓角，皮肤开始发松了。徐义德那一头好头发，真叫做“蒙不白之冤”，快五十的人了，连一根银丝也没有。她对他的头发早就不满，现在越发讨厌了。她嫉妒地说，“人家长的年青，长的俊，长的俏，我们当然不能和她比。”

“不，还要加一点，长的骚。我们是正派人，不

和她比。”

“那当然，好人不和狗比，”大太太恨恨地把“狗”这个字的声音讲得很高，好像这样心里才松快些。

像是一阵狂风，徐守仁砰的一声推门走了起来。他走进门，谁也不看，眼睛木瞪木瞪的，一个劲嚷道：

“娘，我肚子饿啦，我肚子饿啦。”

吴兰珍接着跟了进来，补充说：

“二婶，守仁早就闹饿了，现在离开饭的辰光还早，你拿点东西给他吃吧。”

“好的。”朱瑞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走过去，打开红木的柜子的抽屉，取出一盒沙利文的什锦巧克力糖和一小玻璃瓶的蜜饯无花果，放在徐守仁和吴兰珍的面前，说，“吃吧。”

这两样东西都是徐守仁的心爱之物。娘随时都要给他准备着。她每次到南京路或者是到外滩，都要给他带点糖果回来，其中必有这两样。徐守仁拿了一颗奶油巧克力，剥开外面的大红的玻璃纸和闪闪发着银光的锡纸，一口就吞下去了，接着又吃第二颗。吴兰珍没有吃巧克力，她拣了一颗蜜饯无花果，含在嘴里，细细品着那股说不出的味道。

大太太的气虽然出了些，但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阵热热闹闹的欢呼声、谈笑声、鼓掌声，林宛芝在客

人当中兴高采烈的神情马上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眉头不满地皱到一起了。她心里想为啥让林宛芝一个人出现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大太太也没死，徐义德也不只这一个老婆，自己生气留在楼上不是显得很傻吗？她把心里想的这一番意思告诉了朱瑞芳。朱瑞芳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你说的对呀。我们不能老躲在楼上，要下去。你下去就坐在她旁边，摆脸色给她看，叫她下不了台，看她还能神气活现？”

“你也去吧。”大太太和朱瑞芳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两个人似乎穿了一条裤子，形影相随，一步不离。

“好，我陪你下去，呕呕她的气。”

吴兰珍边吃蜜饯无花果边听她们两人在谈话，慢慢听懂了，见她们两个人要走，便劝道：

“算了吧，下去吵啥，别理她就是啦。这种女人，在家里天天打扮得像妖怪似的，见了她，我就生气。理她做啥！”

“是呀，这种女人……”大太太撇撇嘴，没说下去。

“让她去过生日，我们在楼上白相。”吴兰珍还想劝姨妈不要去。

“我们不吵，兰珍，”朱瑞芳像是小孩子对大人说

话似的，露出恳求的神情，说，“下去看看。”

“来，你也去。”大太太为了壮自己的声势，拉着亲姨侄女的手，要她一道走。

吴兰珍把手一甩，表现对这些事毫无兴趣，淡然地说：

“我刚从下边来，我不去。你们去吧，我要歇会。”

“好，好好。你们两个小鬼歇着吧，我们去。”大太太拉着朱瑞芳的手，露出不满的情绪，边说边走。

马丽琳站起来说：

“我陪你们一道去。”

朱瑞芳说：

“丽琳来，一道去。”

徐守仁站在那里，吃了巧克力又吃蜜饯无花果。他对她们那些事毫不关心，自顾吃着，一边吹着口哨，同时，用皮鞋踏着拍子。

吴兰珍拿起沙发上的《解放军画报》放到花布的提包里，悄悄地离开朱瑞芳的卧室，走进姨妈的房间里，把房门紧紧关上，好像这一来把一切嘈杂的人声、庸俗的交谈和人事的纠纷都关在门外，和她毫无牵连了。

她坐在沙发上，对着楼下说：

“这些人真无聊，整天闲着没事做，找个机会，到这儿来瞎嚷嚷。”

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感到清醒和宁静。她认为一天不看书学习，就随随便便过去，实在太可惜了。她记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段话，老记在她的心里，几乎随时都在她的脑海里出现，发出一股力量，在吸引她努力学习，好好生活，以便将来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最近，她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她要了解解放军那种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的卓绝的精神，她要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那种忘我的国际主义的崇高的品德，她要研究青年团的团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她贪婪地读着图书和刊物报纸，特别是那些青年读物，每次买到这些书，她恨不得一口都把它们吞了下去，让肚子装得满满的。她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做党的有力助手，在党的指导与培养下，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她把 这个愿望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想到这些，她的两颊不禁微微发红了，低低地对自己说：

“你还差得远哩，要好好努力才行。”

她把《解放军画报》放在膝上，打开来，精神贯注地细细地阅读。

大太太和朱瑞芳肩并肩地下楼，马丽琳跟在后边，走到半道上，大太太在人丛中看见一道亮光从她眼前闪过，她站下来，歪过头去，对朱瑞芳说：

“你看。”

朱瑞芳的眼光在人丛中搜寻，一边问：

“啥？”

“你看看人家手上戴的啥物事。”

朱瑞芳的眼光注意到林宛芝的手。当林宛芝洋洋得意举起手来招呼新到的客人时，朱瑞芳看见她右手无名指上那一颗耀眼的大钻石戒指。她奇怪地问：

“从前没有看见她戴过么。”

“人家神通广大，有本事，”大太太轻蔑地盯了林宛芝一眼，说，“当然有人送啦。”

“谁？”

“谁晓得是哪个寿头。”

“你看她神气的，简直是目中无人。”

“当然啦，”大太太酸溜溜地说，“人家今天是寿婆么。”

朱瑞芳一直不满地注视着林宛芝。林宛芝今天

穿的是短袖大红丝绒的旗袍，两只雪白的胳膊完全露在外边，左手的白金手表和右手无名指上的大钻石戒指不时在客人面前发出闪闪的亮光。从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对客厅门口那边一看，也不论那里麇集了多少人，谁都是首先看到林宛芝。她的那一身红光和两只摇晃着的胳膊夺去了所有人的视线。在她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站着—个青年，也打扮得出奇的漂亮。他的头发梳得雪亮，和他脚下的那双皮鞋—样的可以照见人，面孔刮得光光的，微微可以看出今天脸上涂了过多的香粉蜜，因为脸上过分的白，显得耳朵那里有点黄了。他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哗叽的西装，打了一条大红呢子的领带。从领带后面那里时时发出一阵阵浓烈的香水味。他站在林宛芝的身后，俨然像是徐家的主人。林宛芝招呼进来的客人，凡是工商界的朋友，他都以主人的身份过去引路，把工商界客人带到东边客厅，随后回到原来的地方，笑眯眯地望着林宛芝的苗条的背影。他是冯永祥。

那天冯永祥陪林宛芝到南京路去买钻石戒指，跑了好几家都不中意。最后他们跑到南京路四川路只永兴珠宝玉器商店，那里有一只三克拉的大钻石白金戒指，是菊花钻，做工非常精细。林宛芝用放大镜—遍又—遍欣赏，那线条细而长，闪闪发光，确实

比一般做工高明。她听店员说，定价五千八百万元，一个不能少，马上把戒指放到玻璃柜台上，眼睛却一个劲不舍地望着它，嘴里说：太贵了。他窥出她的心思，在一旁怂恿她买。店员凑趣地说，“做工那么好，这么大的钻石戒指，我们店里只有这一只，全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只来。要不是你们二位来，我们还舍不得卖哩。”她想了想，决心买下。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人到弟弟斯咖啡馆喝了杯咖啡。他们坐在卡座里，在小小的暗弱的电灯光亮照耀下，她取出钻石戒指又仔细看了一番。他把戒指拿过去，凝视了一会儿，戴在她的右手的无名指上，意味深长地说：

“这也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算盘倒精，别人出钱，你送礼。”

“送礼并不在乎钱，”他最怕人提到工厂、商店和钱，因为他在工商界里混，就缺少这三样。他是无产无业也无钱的工商界著名人士。他听了她的话，耳根子有点红，旋即坦然地说，“谈到钱就庸俗了。”

“你真清高！”她近来和他讲话越来越不大客气了。

他也蛮不在乎：“可不是。”

她的左手指着自己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问他：“你晓得这个东西可以随便送人的吗？”

他恍然大悟，懂得她的意思，顿时接过去说：

“我当然晓得。正是因为这个，我才陪你出来的。”

他两只手紧紧按着她的右手。她两眼望着他乌而发亮的头发，很久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像是喝醉了似的，脸蛋儿红而发烧。他今天站在林宛芝右侧，暗暗得意地时不时偷偷看一看她手上的钻石戒指。

“你看她那股劲道，就像是徐义德的正房，”朱瑞芳挑逗地对大太太说。

一把嫉妒的火燃烧起大太太的仇恨和愤怒。大太太咬着牙齿说：

“有我在，她别想。就是我死了，也轮不到她，还有你哩！”

“我们走下去，”朱瑞芳觉得老是在楼梯上谈，给人看见了不好，而且看到林宛芝那股子神气劲，压抑不住心头的火，她鼓动大太太到林宛芝那边去，扫她的兴，抹她的面子，也出出这口气。她说，“我们坐到她跟前去，看她敢再神气！”

“好。”

她们两个人气呼呼地一笃一笃地走下楼，生怕大家听不见似的，有意把脚步走得很响。她们一下楼，附近就有几个女客和她们招呼、点头、道贺。大

太太板着面孔，不自然地敷衍她们；朱瑞芳虽然笑脸相迎，可是皮笑肉不笑。女客们感到两位女主人有点异样，也不便多问，更不敢进一步表示热烈的祝贺。马丽琳见情势不妙，在楼上她可以一味敷衍太太和朱瑞芳，下了楼，林宛芝也不好得罪。朱延年早告诉过她：徐义德最心爱林宛芝了，福佑以后有事还得靠徐义德帮助，得罪林宛芝就等于得罪徐义德啊。她悄悄地混到人群中去了。林宛芝看见她们两个人一同下来，心头一愣，料想情势不好，今天自己的三十大寿，有这许多客人来拜寿，自己占了上风，面子上有了光彩，她打算忍受她们两人可能对她身上发泄的感情，准备受气；同时竭力设法缓和将要紧张起来的空气。她笑盈盈地走过来，体贴地对太太说：

“站着累，你坐一歇吧。”

太太斜视了她一眼，说：

“我自己会坐的，用不着你费心。”

林宛芝碰了一个钉子，她忍在肚里，表面上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并且努力缓和这个局面。她看到桌子上放着烟卷，她拿过去，敬太太一支：

“抽根烟吧。”

“我不抽。”太太有意把脸转过去。

“你抽吧？”林宛芝仍然不失望，她微笑地问朱瑞芳。

朱瑞芳表面很客气，实际上是一个橡皮钉子：“谢谢你，我现在不抽，你忙着招呼客人吧。”

林宛芝把一听香烟放回到桌子上。她见大太太和朱瑞芳一同下来，而且就站在她旁边，好像一团熊熊的火焰给一张薄纸包着，随时都要出事的样子。她加倍小心，从客厅门口退了回来。她不敢离开那里，怕客人来了没人招呼，也不敢站在太前面，有大太太二太太在啊。她小心翼翼地站在客厅门里面，比大太太她们站的地方稍为后一点。她不敢笑，怕大太太她们说她得意；也不能严肃得像是板面孔，怕客人以为她在生气。她只好把面孔对着客厅的门口，尽可能不和她们面对面。

大太太气呼呼地坐在靠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朱瑞芳坐在她的旁边，正好斜对着林宛芝。大太太见林宛芝那样忍气吞声，一个劲向自己赔小心，她准备好的愤怒的拳头打不下去；同时，给她碰了两个钉子，也泄了一点心头的闷气；并且林宛芝没有刚才那股神气劲了，像是一棵萎了的向日葵似的站在她们后面，自己也有了面子。她的视线慢慢转到林宛芝的身后。冯永祥像是永远和林宛芝保持两三步的距离似的，林宛芝退后了两步，他也退后了两步。他发觉大太太和朱瑞芳带进来的那股紧张空气，自己稍为收敛了一些。他转过脸去退后几步，看花园的草地上

有七八个小孩子和两三个大人在打羽毛球，望了一阵，没有兴趣，慢慢转过来，又站在离林宛芝两三步远的后面，望着她的侧影。好像站在那里帮助林宛芝招呼客人是他的一种职责，不好随便离开似的。他察觉大太太在注视他，他装做没有看见，掏出烟盒子，抽了一根香烟，燃起在抽，表示自己并不注意啥了。他嘴里吐出一个一个的圆圆的烟圈。他望着圆圆的烟圈袅袅地升起。从烟圈中他注视着林宛芝的侧影。吐完了烟圈，他眼睛斜视了一下，他发现朱瑞芳也在盯着他看。他感到自己不适宜再站在那里了。他在红寿幛和红寿烛的光芒照耀下，显得自己的脸更是热辣辣红润润的了。他借着把烟蒂送到矮圆桌上的烟盘去的机会，悻悻地向东客厅走去。

大太太的眼光跟着他也到了东客厅。东客厅北面墙角那里坐着徐义德、江菊霞和沪江纱厂会计主任勇复基他们。勇复基坐在那里不言不语，静听徐义德和江菊霞聊天，不时发出一两阵笑声。大太太对朱瑞芳向东客厅噉噉嘴。朱瑞芳跟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勃然大怒地说：

“好哇，我说为啥看不见他，原来在那里谈恋爱哩。”

“你过去，”大太太指着东客厅北面墙角徐义德那里，说，“坐在那里，听他们谈。”

“对。”朱瑞芳在客人当中摇摇摆摆走过去，好像有啥要紧的事体急着去找人。

徐义德和江菊霞谈的正起劲，忽然听到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他以为出了啥意外的事体，转过头去一看，见朱瑞芳板着面孔向自己这边走来。他知道事体不妙，本想站起来避开，想到避开反而露了马脚，不如干脆仍旧坐着不动，装着没有看见她来，继续和江菊霞谈心。他刚才的话没有说完，忽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问题上去，说：

“我觉得这次棉纺公会改选，不够慎重……”

江菊霞听得徐义德突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的问题上来，感到丈八和尚摸不到头脑，她亲热地叫道：

“德公，你刚才说啥？”

徐义德身后的急促的脚步声近了，知道朱瑞芳已经走到自己的身边，他有意放高嗓子大声说：

“是呀，我是说我们棉纺公会这次改选不够慎重，你是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今天要和你谈谈……”

这时她才看到徐义德身后站着朱瑞芳，静静地在听他和她谈话。她立即懂得徐义德改变话题的用意。她天衣无缝地顺口答道：

“当然，我是执行委员，你们会员有意见，我有责任听的，也有义务给你办的，效劳不到的地方还要

请徐总经理多多指教。”

“执行委员太客气了，”徐义德也改变了称呼，两个人好像突然变得很陌生，而且很客气。他说，“我认为棉纺公会改选应该照顾各方面，网罗各种人才。”

“是呀，外边对我们棉纺公会有不少闲言闲语，说我们棉纺公会的委员代表性不够广泛，就是几个大头在操纵，中小厂照顾不够，就连沪江这样规模的厂也没有一名执行委员，实在太不合理啊。”她之所以能当上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主要是因为和史步云的亲戚的关系，否则，保险连委员也当不上。她侃侃而谈，眼睛既不望着徐义德，也不看朱瑞芳，却对着坐在她对面的勇复基，说，“是啵？你是不是也听到一些？”

勇复基不知道他们海阔天空谈啥，一会东一会西，叫他摸不看头脑。既然江菊霞问他是不是，他不假思索，含含糊糊地应道：

“是的，是的。”

徐义德感激她的同情，说：

“是呀，沪江这厂在上海来说，也不算小，连个执行委员也没有，太不像话了。”他想起这次改选棉纺公会徐义德没当上执行委员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冯永祥不够朋友。他答应了考虑，改选出来却

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委员。起不了啥作用。他感慨系之地摇摇头说，“这次改选棉纺公会，我总觉得不够慎重，遗憾，遗憾。”

她懂得是给他自己叹息，便凑趣地说：

“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照我个人看来，徐总经理应该当选为执行委员的。这次考虑不够慎重，下次改选，徐总经理一定会当执行委员的。”

徐总经理脸红红的说：

“我个人倒无所谓，最近忙得很，也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我并不计较委员和执行委员，倒是从我们棉纺公会着想，能多一些人工工作，就多一分力量啊。”

朱瑞芳站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是在谈公事，那不必在背后听，索性坐下去，参加他们谈。她很随便坐下去，给勇复基和江菊霞点了点头。徐义德看朱瑞芳坐下来，刚才为了让她听而说的一番话估计很成功，至少说明他是在谈正经事。现在他可以不留痕迹地走开了，因为当着朱瑞芳的面，没有啥好谈了。他对朱瑞芳说：

“你来的正好，给我陪陪客人。我的公事谈完了，要到那边去招呼一下。”他指着马慕韩、朱延年那一堆人说。

“好吧，你忙去吧。”

徐义德走了，留下一个尴尬的局面。汉菊霞和朱

瑞芳无话好谈，她认为自己不必过份敷衍她。朱瑞芳是带着嫉妒和憎恨的情绪来的，必要时，她准备给江菊霞一个难堪。她只听到一点点传说，风呀，雨的，徐义德和江菊霞有些啥暧昧关系，她不知道。在徐家只有林宛芝一个人了解这个详情，可是林宛芝从来没和她们谈过这些事。朱瑞芳刚才在后面听了一阵，也抓不到啥把柄，心里正在苦闷。勇复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人员，他对人就像是对待数目字当中的小数点似的，生怕弄错，那出入很大的。他永远把自己保持在一切是非的漩涡之外，他不干预任何事体，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就连三岁娃娃，他也不去碰他一下。他今天来拜寿的目的不过是一种职业上的应酬，找机会坐在徐总经理附近，好让他知道勇某人到了。徐义德晓得他是一个怕惹是生非的人，和江菊霞谈话无须避开他，有了他坐在旁边反而可以起一种掩护的作用。三个人沉默地坐在那儿，谁也不吭气。朱延年和马慕韩谈的很起劲，嗓门又高，显得他们这儿三个更加冷静得可怕。朱瑞芳眼睛对着勇复基，有意不看江菊霞，暗中却又不时睨视她一眼。她把江菊霞冷落在一边，打破沉默，对勇复基说：

“近来厂里很忙吗？”

勇复基恭恭敬敬地欠着身子说：

“是的，很忙，很忙。”

“你们的生活好吗？”

“很好，”勇复基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有点拘谨地说，“现在生活很好，很好。”

勇复基这样小心翼翼地简单答复问题，使朱瑞芳很难谈下去。江菊霞听到这些公式的寒暄也感到腻味。东客厅左边的书房里忽然爆裂开一阵喝彩的掌声，吸引了客厅里客人的注意。一会儿，这掌声消逝了，大家又安静地谈论自己的题目。这掌声救了江菊霞。她自言自语地说：“啥事体呀？这样高兴！”她很自然地站了起来，眼睛盯着书房的门，没有和朱瑞芳勇复基他们打招呼，悄悄地走去。

朱瑞芳指着她的背影问勇复基：

“他们刚才谈啥？”

“我不晓得。”

“给我讲，没有关系，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他们谈啥哩。”

“谈啥？我听到一些……”

朱瑞芳聚精会神地在听勇复基谈。她希望在他嘴里能够发现一些秘密。勇复基说：

“他们谈改选委员会的问题……”

朱瑞芳听他说这个，大为失望，淡淡地说：

“这个我晓得，我在后面听见的。”

“啊！”勇复基吃了一惊，暗自想她在哪个后面听

见的呢？讲话得小心一点，别弄出岔子来。这不是一般的是非，这是徐总经理家里的事体，别沾边，有啥差池，那是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的。他警告自己要小心，要留神。

“这以前他们谈啥？”

“这个，”他抬起头来，仿佛在仔细回想，半晌，说，“我不晓得。”

“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

“是呀，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他反问自己。他想，对朱瑞芳不可得罪，她就是徐守仁的母亲，而徐守仁是徐总经理的爱子啊。

“你一定晓得，说吧。”

“我听是听到一些，就是听不清楚，好像老是在讲棉纺公会棉纺公会……”

“他们两人在谈自己的事体没有？”朱瑞芳点他一句。

“没有，”他说出口，又怕徐总经理将来亲自说出什么来，那不是得罪了朱瑞芳，说勇复基不好吗？他改口道，“我没有听见，他们两人谈话的声音很低，我坐在这里听不清楚……”

“声音很低，”这个情况吸引了朱瑞芳的注意，啥事体不可告人？要低声谈呢？她满怀兴趣地追问：

“你听到他们低声谈些啥？再低，你总会听到一

句两句的。”

“这个，”勇复基的眼睛里露出了惊惶的神色，想了想，说，“这个，我真没听见。”

“一点也没听到？”朱瑞芳不信任地问。

“真的一点也没听到。”勇复基坚持不卷进是非的漩涡里去。他把刚才听到徐总经理约江菊霞上佘山去玩的话隐瞒起来，一点也不敢泄露。

“你这人，……”朱瑞芳忍耐不住，有些生气了。她心里说：你这个怕事鬼，三枪打不出一个闷屁来。

朱瑞芳没有再问，勇复基也没有再说，只是沉默地坐着。两人又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里。

朱延年手里拿着一本福佑药房总结书和计划书。这是他在最近一个礼拜之内赶制出来的精心杰作。他早就风闻徐总经理要给三太太林宛芝做三十大寿，工商界有名人物必然前来捧场，这是他发展福佑药房业务的绝妙机会。他在工商界的历史浅，地位低，人头不熟，许多工商界一、二流人物不知道朱延年其人。参加了星二聚餐会以后，认识了一些人，也不过泛泛之交，谈不上往来，更提不到友谊。即使工商界朋友对新药业有兴趣，谁愿意投资福佑药房？谁又对朱延年信任呢？他整整思索了两天两夜，几乎茶饭都要忘记了进，他要抓住这难得的好机会。恰巧快过年了，他写个年终总结，附上今后发展业务的计

划，这样拿出来一方面显得自然，有凭有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给福佑药房吹嘘一番，好取得工商界朋友的信任，投资的事就有苗头了。他邀请了严大律师，把童进和夏世富找来，加班加点，开了三个晚上的夜车，最后由严大律师杀青，连夜用打字机在薄薄的打字纸上打出。封面和封底是重磅的米色道林纸，边上打了两个眼，用一根大红丝带拴起，在封面这边打了一个蝴蝶结子。他到徐公馆来拜寿，本来只带了三本，一想，假使有许多人对福佑药房有兴趣，都要求投资，想先看看计划书，不给他一本哪能行呢？他自己点头说，应该多带几本，纵然不能全部用完，也是有备无患，免得临时要没有。他于是又带了三本，把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

他走进徐公馆，拜了寿，就四处寻找工商界的人。发现他们都在东客厅和书房里，他就走过去，站在那里随便搭讪着，给大家招呼。有些人他并不认识，或者只不过一面之缘，他也亲热地招呼，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人家应付他一下，都谈别的去了，有的则走进书房，把他撇在东客厅里。恰巧马慕韩来了，他和柳惠光招呼他坐下，那边走过来韩云程，他是沪江纱厂的工程师，老板娘过生日，他算得上半个主人。徐总经理昨天就对沪江系统的人说过了，要他们帮助他招呼招呼客人。

寒暄了一阵之后，朱延年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拿在手里，笑眯眯地望着马慕韩说：

“提起小号来，承大家帮忙，客户抬举，总算不错。统计往来客户已遍及全国，东北到辽西，西北到天水、兰州、迪化，西南到昆明，东南到福建，……都有客户往来。全国各地和本号建立联系关系的有三千八百五十二户，经常有联系的也有一千九百四十二户。在户数方面说，私营户比重比较大；在营业额方面说，国营户占的比重大。拿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来说，就达到三十六个多亿，目前还在发展，今年八月，为了照顾到广大人民对 X 光器械的需要，我们福佑又特别设立了 X 光器械部，聘请中外 X 光器械专家主持这方面的事。同时，为了面向生产，扶植小型厂商，以便为今后转向工业生产打下基础，小号今年九月和大利药厂签订了合同，投资了约占大利药厂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二，使得大利药厂继续维持并扩大生产，好共同为人民医药事业服务。”

马慕韩见朱延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听出了神，恭维朱延年道：

“福佑药房的生意确是做得不错，客户遍及全国，可真不容易，现在又从商业注意到工业，朱先生的眼光远大。”

柳惠光听朱延年叙说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况，心中未免有点醋意，以嫉妒的眼光看着朱延年说下去。

“慕韩兄过于夸奖了，”朱延年表面显得颇为谦虚，下面接着说的却又表示出对他的赞美辞受之无愧了，“不过哩，这也是几年来磨炼出来的，现在做生意眼光不能不放远一点。”

“你们生意为啥做得这样发达呢？”马慕韩关心地问。

“是呀。”韩工程师说，“听说福佑药房原来并不怎么大啊。”他想起梅佐贤说过福佑药房开门，全靠徐总经理支持：借了三百万的现款，又担保在银行里开了透支户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讲起来也很简单，小号创办以来，就以树立信誉，薄利多销为经营原则，凡是外埠客户来办货，小号一定按照当天最低市价发货。客户都晓得福佑的价格的确比一般市价便宜，大家都愿到福佑办货，因此客户不断增加。为啥福佑药房的货价比别的字号便宜呢？因为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事开支，减低成本，压低货价。同时，我们在服务态度方面确实做到负责、真诚、恳切和热情，凡是外埠客户有函电来，问上海行情，我们一一具体答复；或者是要购办一些上海市面上买不到的药物器械，像是山东省政府卫生厅要买离

心机，西北卫生部要买高度显微镜，这些重要医疗器械，上海买不到，我们就设法到香港到国外去订购，真正做到完全为客户服务。做生意主要靠信誉。客户和同业中有了信誉，业务必然会发达的。在我们新药业中，惠光兄最了解福佑的了。惠光兄，我说，是啵？”

朱延年生怕马慕韩觉得自己说的不够恳切真实，他特地拉出柳惠光来撑他的腰。柳惠光完全了解朱延年在药业是没有信用的，谁听说福佑药房，谁见了朱延年，没有一个不头痛的。因为有生意做，要和他往来，表面上不得不应付，骨子里却怕和他打交道，万不得已时，也要百倍提高警惕。不说别的，就拿福佑药房和债权人立的和解笔据来说，本来讲三个月内偿清全部债务，如不可能，得延期偿清。除了第一个月偿付二成以外，第二个月的三成就没有付足，其余的款子整整拖欠了一年，经债权人再三再四地登门坐索，才陆陆续续地零零碎碎地付清。一提起这件事，柳惠光就伤心。现在朱延年当着他的面吹牛，真叫他哭笑不得，还要他证明福佑药房和朱延年的信誉，天呀，这个话怎么说呢？打狗看主面。他反正不想多和朱延年往来了，但是，还有徐义德哩，他可是台面上的人物啊。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马慕韩认为朱延年做生意讲究信誉这一点很重要，他点点头，说：

“信誉确实很重要。”

朱延年像是遇到了知己，他眉飞色舞地说：

“慕韩兄同我的看法一致，我非常高兴。”他转过脸来看见韩工程师托着腮巴子好像在想啥，有点露出不大信任他所说的神情。他解释地望着韩工程师说，“当然，单靠信誉是不行的，小号还成立了业务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主要研究三方面：首先研究药物的地区差价，哪个地方大量生产便宜的药用原料，我们及时采购，调节供应，减低成本。其次，研究进口成药原料价格上落问题，小号派专人长期驻留进口处，进口药物滞销价廉的辰光，我们及时收购，这样不会因为旺季到来上涨，可以低廉供应客户，供求不致脱节。对于公营机构在哪一季最需要的是什么药物，我们就事先准备，以便供应。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方面。根据业务研究会的研究，过年以后，我们准备派人到河南收购蓖麻子、纯硷，到苏北收购芒硝，到皖北收购五倍子，到四川收购松节油、甘油、硬脂酸，到西安收购药用棉花……”

朱延年一张口，就没一个完。马慕韩不大愿意听他这些业务上的具体事情，想打断他的话；一想到自己要在工商界树立威信，团结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应该有倾听一切意见的雅量。他于是用赞美来打断他那流水般的谈话，说：

“福佑药房的经营方针真不错，加上朱先生这样努力经营，前途一定远大。”

朱延年听了这些赞美的辞句，他浑身的骨头都有点酥了。他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刚才努力介绍福佑药房的情况立即收了显著的效果，计划中的目的已经闪现出希望。他讲得口渴，连忙喝了一口茶，急转直下地转到了正题：

“今后除了投资工业，扩大 X 光器械部以外，还准备在迪化、成都这些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只是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业务日益扩展，利润也不错，原有资金有限，要想应付这样庞大的经营规模，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困难。所以，我们想扩大招股，或者贷款也可以，主要倚靠工商界有眼光的朋友支持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慕韩兄是棉纺界的巨子，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我想，一定乐于帮助小号的。这是——”朱延年立刻把装订得非常美观的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送到马慕韩面前，眯着眼睛，微笑地望着他，期待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说，“这是小号的总结书和计划书，请指教指教。”

马慕韩一愣，恍然了解刚才朱延年那一番冗长谈话的目的。他对朱延年拱拱手，谦虚地说：

“对不起，我对新药业是外行。”

他没有接过去。朱延年仍然把总结书和计划书

放在他的面前，说：

“新药业讲起来也没有啥了不起，我这个计划书，谁都可以看懂的。里面的内容我刚才已经简单谈了一下，希望你看一遍，小号希望得到工商界前辈的更多的指教、更大的帮助。”

柳惠光望着马慕韩。他久仰马慕韩是一个年少有为、精明练达的人，这次碰到朱延年的手上，不知道会不会上他的当。他有点替马慕韩担忧。当着朱延年的面却又不好戳破。马慕韩内心极不满意朱延年不识时务，人家过三十大庆，正好大家尽兴玩个痛快，不料他来做生意，徐公馆变成了朱延年的交易所了。他想起要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不好露出不满的情绪来，只是应付地说：

“对于朱先生刚才谈的经营方针和今后计划，我个人完全赞成。工商界应该有远大的目光，这样，才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新型工商业家。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才，非常钦佩。”

“过誉过誉。今后希望慕韩兄多多提携。”朱延年指着重磅米色道林纸封面的总结书和计划书说，“小号这次募股是一千万一股，慕韩兄，你看，你来多少股呢？一百股怎么样？多一点也可以。”

“这个……”马慕韩看出朱延年是属于狗皮膏药性质那一类的人，一粘上就撕不下来，不能再随便敷衍。

衍下去，但态度又不能转的太快，也不能表示得过于露骨。他看柳惠光不吭气，便顺水推舟，把问题放到柳惠光面前。他不露声色地说：

“对新药业，老实讲，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并且，自己的精力也有限，办厂都忙不过来，没时间考虑经营其他企业。倒是柳先生，听说利华药厂生意不错，流动资金不少，正在找出路，你们两位是同行，又是老朋友，我看，可以合作合作。”

“惠光兄愿意合作，小弟同样是无任欢迎的。怎么样，惠光兄，你认多少股呢？”

“我吗？”柳惠光把脸转向北面墙角那里，这辰光，朱瑞芳正站在徐义德身后，紧张地听他和江菊霞谈话，此外，没有一个新到的客人。那就是说，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岔开去，得要自己明确表示态度，回答马慕韩摔过来的难题。他想了想，说，“延年兄，你了解利华药房是股份公司，几位股东都是老实人，巴巴稳稳地做点小生意，从来不向外发展的，和老兄比起来，可以说是目光如豆。我在店里呢，是灯草拐杖，做不得主的。”

“这情形，我了解。不过，小数目呢，只要惠光兄肯帮忙，我想，也不大成问题。”

柳惠光看朱延年粘到自己身上来了，想法从速推开，支吾地说：“你不要过份抬举我。抬的高，跌

的重。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利华这片小店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投资福佑呢？我们不像慕韩兄，企业大，实力雄厚，福佑需要这点小数目，只要慕韩兄指头缝里漏一点下来就行了。”

马慕韩听到柳惠光这几句话，见他也不含糊，至少也是在市面上混了二三十年的人了。他这几句话捧得马慕韩心里怪痒的。但是，马慕韩不上这个圈套，却又不能显得自己寒伧，转弯抹角地说：

“当然，福佑募这点股，讲数目，不大；讲交情，应该帮忙。只是兄弟经营的是棉纺业，一向没过问新药业，今后也不准备过问。福佑募股或者贷款，应该找志同道合的人，钱倒是次要的。韩工程师，你说，对不对？经营一种事业，总得要有兴趣才行。”

“凡事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成事。比方我学工程吧，别人在学校里读书见了数目字头就痛，我一见数目字就有兴趣。越是难做的数学题目，我越有兴趣。经过几天几夜思索，一道数学题算出来了，那乐趣，简直妙不可以酱油。”

徐义德从北面墙角那里脱围出来，见马慕韩和韩工程师谈的眉飞色舞，他慢慢走过来，轻松地问道：

“你们谈啥，谈的这么高兴？”

韩工程师告诉徐总经理谈福佑药房募股贷款的

事。徐义德马上发现马慕韩面前的那本福佑药房总结书和计划书。他想不到朱延年把林宛芝三十大寿的盛会变成福佑药房募股贷款的场所了。福佑药房复业向他借的三百万现款，别说利息，到现在连本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过。朱延年当林宛芝过生日这天在徐家募股贷款，显然是想借徐义德的招牌捞一票的。他防备朱延年当着客人向他募股，那才是叫他为难哩。他感到情势于自己不利，内心虽然对朱延年愤愤不满，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发作，便装出对这些事毫无兴趣的神情，说：

“你们谈吧，我到书房里去看看信老他们去。”

徐义德脚仿佛擦了油，一滑，就溜过朱延年他们的面前，到书房里去了。

朱延年并不指望从姐夫身上能得到啥。他没有理睬就离开，在朱延年看来，毫不奇怪。朱延年一心一意在马慕韩身上打算盘。马慕韩纵然一再暗示拒绝，他也不死这条心。不过，现在明白今天当面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了，他给自己留了下一步，说：

“慕韩兄，这本总结书和计划书送给你了，入股多少倒没有关系，福佑药房能得到各位的赞助——就是精神上的赞助也罢，我朱延年总是衷心感激的。今天不可能详细谈，明天再领教，你先收下吧。”

“好的。”马慕韩不好意思不把那份总结书和计

划书收到西装口袋里去，说，“我一定拜读拜读。我想，我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不少经验。”

“那倒不见得，主要是希望你指教。”朱延年又从口袋里掏出两份，分送给柳惠光和韩云程，对他们两个人说，“也请你们两位指教指教。”

他们两个人谦虚地点点头，同声地说：

“一定拜读。”

马慕韩怕朱延年再纠缠下去，他站了起来，指着书房说：

“那里面谈的很热闹，我去听听……”

马慕韩一走，朱延年失去了主要的对象。马慕韩这方面既然没有谈出什么大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书房里面那些大老板身上。他也站了起来，附和地说：

“好，一道去听听。”

朱延年跟随马慕韩走去。韩云程和柳惠光不太熟，也没话好谈，他们两个人旋即也站了起来。

书房里是另外一个天地。徐义德这个书房很大，几乎等于外边的东客厅。书房里的摆设多而凌乱：贴壁炉上首是三个玻璃书橱，里面装了一部《四部丛刊》和一部《万有文库》。这些书买来以后，就被主人冷落在一边，到现在还没有翻过一本。徐守仁对这些书也没有兴趣。书橱上面放了一个康熙年间出品

的白底篮花的大磁盘，用一个红木矮架子架起。大磁盘的两边放着两个一尺多高的织锦缎子边的玻璃盒子，嵌在蔚蓝色素绸里的是一块汉玉做的如来佛和唐朝的铜佛像。壁炉上面的伸出部分放了一排小古玩，放在近窗的下沿左边的角落上的是一个宋朝的大磁花瓶，色调著目，但很朴素，线条柔和，却极明晰。面对壁炉的墙上挂了吴昌硕的四个条幅，画的是紫藤和葡萄啥的。书房当中挂着唐代的《纨扇仕女图》。画面上表现了古代宫闱生活的逸乐有闲，栩栩如生地描写出宫女们倦绣无聊的情态。她们被幽闭在宫闱里，戴了花冠，穿着美丽的服装，可是陪伴着她们的只是七弦琴和寂寞的梧桐树。这幅复制的画，买来以后，重新裱过做成条幅，他平时不挂在书房里的，今天因为是林宛芝三十大庆，他特地把它从楼上移下来，表示徐家的豪富和高雅。这些陈设显得庸俗，极不协调，好像个古董铺。

书房里这些古玩和字画，据专家们研究，几乎全是赝品，唯一值得考虑的是吴昌硕的四个条幅。但徐义德有徐义德的哲学：玩古董和字画，就是假的也要当做真的，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上海古董店的老板们深知徐总经理有这个癖好，经常送点货色上门。徐义德买古董有他的一个章程：不管真假，贵的一概不要。古董商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徐一万。上海

解放头一二年，每件古董超过一万块钱，他就考虑要买不要买了。今年稍为好一点，暗中增加到五万块了，但有了历史的传统，仍然保留徐一万这个绰号。

今天来宾当中的工商界的巨头们都坐在这间书房里，新参加进去的是冯永祥。冯永祥刚才叫大太太和朱瑞芳盯着，他不得不离开林宛芝。离开了以后，像是丢掉了什么东西，丧魂失魄地毫无目的地东张张西望望。他在东客厅里走过去，又走回来，百无聊赖。一会看见朱瑞芳跟进来，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要来和他吵架。幸好看到她站在徐义德背后，半晌又坐下去，而徐义德旁边坐着的就是江菊霞。他知道朱瑞芳并不是对他。他放慢了脚步，停留在东客厅里，幸灾乐祸地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徐义德路过朱延年那边溜走。冯永祥觉得东客厅里没有他落脚的地方，就慢慢向书房里踱去。一走到书房门口，冯永祥就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躲在角落里，把自己隐藏在徐义德的背后。徐义德比他矮半个头，他弯曲着腿，从徐义德的肩头望过去，房间里坐满了人，所以徐义德只好站在门口了。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坐在里面沙发上的梅佐贤的身上。梅佐贤皱着眉头，忧虑地说：

“徐总经理说的对，我最近也感觉到了苗头不对。我们在厂里办事的人，大事体当然不清楚，上面的情形也不知道，就从我们小角落来看。和平常就两

样。不说别的，就讲税务分局驻在我们厂里的驻厂员方宇同志吧，最近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好像税不要了似的。我们打电话到税务分局去，那边要么是没人接，要么是问你是哪一个——问的可仔细，像审问犯人似的。我就说，我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找他有要紧的事体谈。那边总回答没有空没有空。为啥没有空呢？一点风声也不漏，再问，他们就把电话挂上。再说我们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余静同志和工会副主席赵得宝同志吧，他们也忙得很，常常出去开会。开啥会，到啥地方开会，谁也不吭气。开完会回来，神色很紧张，见了我们就远远离开，仿佛我们身上有啥齜齜物事会弄脏他们衣服似的，正面碰到也不大讲话。正如徐总经理估计一样，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好兆头。”

徐总经理对坐在书桌边的潘信诚说：

“信老，你们厂里的情形怎么样？”

“我不大清楚，想来大体和‘沪江’差不多吧。”潘信诚稳重地把她厂里的详细情况避而不谈，因为他不完全了解今天来客当中的情况，如果走漏出去，传到政府首长的耳朵里，那是不利的。他说完了以后，看看四周的人，都是工商界的朋友，稍为放心一些。

“你的熟人多，接触的面广，总比我们要多晓得一些，”徐义德不放过潘信诚，他又追问一句，“信老，

最近可曾听到新情况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阿永熟悉，他到处走动，是我们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啥消息总是他先晓得。有些我们不晓得的事体，他也晓得。得把他找来。阿永在啥地方？”

冯永祥听到潘信诚在问他，他把腿更弯曲下去，完全躲在徐义德的身后了。徐义德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说：

“刚才在东客厅里看见过他，现在，可能还在那边。”

梅佐贤从里面沙发上站了起来，对徐义德说：

“总经理，你这边坐，我请永祥兄来。”

梅佐贤走过来，徐义德移动脚步，冯永祥见自己躲藏不住了，他跨上一步，站在徐义德的左前方，伸出手来挡住梅佐贤的去路，笑嘻嘻地说：

“不必去请，我冯永祥自己来了！”

宋其文说：

“阿永躲在啥地方的？我们怎么没有看见？真奇怪。”

“不奇怪，”冯永祥走上一步，站在大伙当中说，“我刚才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晓得信老有事要找我，我就来了。”

“我晓得，……”徐义德发觉冯永祥刚才从他身

背后走出来的。

冯永祥生怕他的西洋镜被徐义德拆穿，连忙暗示徐义德：

“德公晓得就不必说了。”

马慕韩和朱延年走了进来。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是柳惠光和韩云程。坐位不够，大家谦让，反而多出空位没人坐了。梅佐贤从东客厅里端进来三把红漆皮的椅子，大家才陆续坐下来。朱延年没有地方坐，他靠在马慕韩旁边，在沙发扶手上坐下。他不死那条募股的心，紧紧靠着马慕韩。梅佐贤端了张红漆皮椅子坐在门口。冯永祥的坐位紧对着壁炉。他装出没有听见刚才大家谈话的神情说：

“信老，你找我，有啥吩咐吗？”

“你再掐指算算看。”

“心血不来潮，掐指算不出。”

“可见得你还不够灵。”马慕韩说。

“要灵，还是让我们的德公算算，他是铁算盘。”冯永祥和徐义德开玩笑。

徐义德对潘信诚说：

“不要算啦，你说说就行了，信老。”

潘信诚把刚才大家所谈的内容扼要说了一下，旋即问冯永祥：

“你说，究竟是啥事体啊？”

“啥事体？”冯永祥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很奇怪，他反问潘信诚，“信老，陈毅市长在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讲的话，你记得吗？”

“没有多久的事，哪能会不记得哩。”

潘信诚想起史步云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棉纺业提出了上次谈的年终奖金那些问题，政府交给有关部门解决。

“陈毅市长在第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冯永祥讲到这儿，整个书房里的客人都把面孔对着冯永祥，聚精会神地静听。书房里静悄悄地，可以听见外面客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和从楼上飘扬下来的美国爵士音乐。徐守仁正在楼上，紧靠着电唱机，一个人手舞足蹈地欣赏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冯永祥俨然成为谈话的中心人物，他一本正经地小声地说，仿佛在保守机密似的。坐在远一点的人，像徐义德，他就听不大清楚。徐义德要求冯永祥讲高一点，大家都赞成。因为书房里的客人大多数都不是市的人民代表，没有听到陈市长的报告，显出特别关注的神情。冯永祥打扫了一下嗓子，说，“好，我讲高一点儿。”

梅佐贤从门口那边走过来，倒了一杯热茶送到冯永祥面前，巴结地说：

“冯先生，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再说。”

冯永祥受人奉承惯了，他并不在意梅佐贤的殷勤和恭维，点点头，算是表示他的谢意。他并没有喝，向大家说：

“陈市长说：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我们必须大力地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同时发动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的运动，并以这两个运动为本市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各机关必须厉行精简节约，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精简人员，清理物资，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一定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严惩贪污和反对浪费。陈毅市长认为：特别重要是在我们上海市进行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因为上海市增产节约的任务重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腐化的风气包围着我们。我们如果不彻底严禁贪污，打破包围，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便站不起来，便不能完成建设新上海的任务。陈毅市长号召：上海市各级政府人员及广大市民，在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时，立即与贪污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发动猛攻，非做到‘彻底消灭贪污罪行’绝不休止！”冯永祥一口气说到这里有点累了的样子，他端起刚才梅佐贤送过来的那杯热茶喝了两口，向大家扫了一眼。大家的面孔紧张、严肃。他接着说，“陈毅市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又

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讲的话，谁敢不照办？”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话由冯永祥的嘴重复出来，冯永祥因此觉得自己的地位也蛮高，很神气地望了大家一眼。他的眼光最后停留在潘信诚面孔上，说：

“信老，你说，干部门哪能不紧张？”

“这个我了解，我在人代会上也听到陈市长这番话的。但是，为啥最近看不大见干部呢？问题在这个地方。”

“哦，”冯永祥会意地说，“那是因为最近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陈市长特地在上海市邮政局设置信箱，接受各界人民和公教人员等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秘密检举和控告。三反运动这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你到啥地方去看到干部？这辰光，干部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别说沪江纱厂，税务分局派来的那位方宇驻厂员，就是再大的官，他首先得顾顾自己，至于啥税款呀，那倒是次要的。”

冯永祥的答复，徐义德仍然不满意。他问：

“三反运动么，市面上倒听到一些风声，有的《解放日报》也登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三反运动是哪能反法啊？永祥兄。”

潘信诚、宋其文和柳惠光他们都同意徐义德意见，异口同声地说：

“对呀。”

朱延年加上一句，表示自己拥护姐夫徐义德所提的问题：

“徐总经理所谈的，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呀，问题报复杂。”冯永祥并不晓得中共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三反运动的真实的具体情形，但自己是大家公认的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件事体哪能不晓得呢？天下事冯永祥没有不晓得的。怎样把不晓得的事说成晓得，而且和真实的事实又不能相差太远，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冯永祥抬起头来望着斜对面的书橱和书橱上的那个康熙年间的白底蓝花的大磁盘。他感到书房里的水汀烧得太热，解开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哗叽的西装上衣的钮扣，整理了一下那条大红呢子的领带，想了想，吃力地说，“三反运动主要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发生的事情不一样，采用的方法当然不能一律。共产党办事总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三反运动，各个机关不同。”

冯永祥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梅佐贤见到徐总经理把两道眉毛皱到一

起，显然是不满意冯永祥的解答，同时，又表现出不好意思再问冯永祥。他为了投合徐总经理的心意，代他问冯永祥：

“冯先生，你说一个机关哪能进行三反好不好？比方说市人民政府，或者是我们这个区人民政府哪能进行三反？”

徐总经理暗暗点头。他心里想梅佐贤究竟不愧为我们沪江纱厂的一名人才，问题提的明确具体，叫冯永祥躲闪不开。

马慕韩也希望知道一点“内幕消息”，他说：

“阿永，谈一个具体机关哪能进行三反运动，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可是我不能说。这是有关国家机密问题。我讲出来，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乖乖龙的冬，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吃不消。我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头。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好，慕韩老兄。”他对马慕韩嗨嗨笑了两声，然后转过脸去朝梅佐贤瞪了一眼，觉得这家伙为啥这样不识相，在众人面前“将”了他一“军”，差一点叫冯永祥下不了台。幸亏冯永祥灵机一动，借口国家机密，挽回了难堪的局面。他怕大家再追问下去，连忙熬了车，把话题引到干部身上，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三反运动就是整干部。但是，这个话在外边不能随便讲

……”

冯永祥最后把声音压得相当低，暗示这几句话也属于机密范围内的。

徐义德说：

“干部是要整，太官僚主义了。”他立即想起花纱布公司的干部和区里的干部，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影从他眼前闪过。他又愤愤不平地说：

“一提起干部就叫人生气。别的方面我不了解，我也很少和他们打交道；花纱布公司和区税务分局的干部我可是清楚的，他们那个神气十足的官僚架子实在叫人吃不消，谈业务谈税法，老实讲，没有我们清楚；可是啥事体都得照他们的意见办，不然就给颜色看。我们有钱办厂，也不欠他该他的，凭啥要受这份气？诸位说，是不是？”

“是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声音最高的是梅佐贤。

“幸亏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来一个三反运动，整整这些干部，再不整，干部的官僚架子更不得了，恐怕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了。”

“干部么，不可一概而论。”潘信诚伸出手来，指着徐义德，以他丰富的历世经验分析地说，“据我看，干部有三类：上级、中级、下级。一般的是上级好，中级差，下级糟。你刚才说的，是属于下级的干部，

自然很糟糕。上级，那是无话可说。他们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你和他们在一道，感觉不到他是个大首长。我五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市面，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大人物，从没有见过像中共这样的首长，他们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

“信老分析的也有道理，但是中、下级干部不能一概而论。”马慕韩想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解放军睡在南京路两旁马路上的情景，叫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根本没有听说过军队的纪律这样严明，入城以后，怕惊动老百姓，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睡在马路上过夜，那些长官和士兵一样的睡在水门汀上。这样的好部队，老百姓哪能不喜爱？他不同意潘信诚对干部那种分类法，提出了异议，“拿解放军来说，进城睡在南京路上，没有惊动一家老百姓，这不能说‘糟’吧？”

“那是部队，那些干部真是好，无话可说。”潘信诚也同意这一点，“我不晓得见过多少部队，北洋军阀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英国美国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像解放车这样好的部队，那么守纪律，讲道理，叫人见了一点儿也不怕，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部队。”

潘信诚并没有正面回答马慕韩的不同意见，马

慕韩听出来他的意思：一般干部吗，还是他的意思：中级差，下级糟。马慕韩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在外滩中国银行的楼上。那是上海解放没多久，陈毅市长召集工商界的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心中有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觉：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着布衣服，有的穿黄色卡其布的军装，有的穿灰布的人民装。猛一下见到，叫你分不出哪一个是高级干部，哪一个是下级干部。上海解放快三年了，他们还是穿着朴素的布衣，生活也很节省，见了人和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最初觉得他们在农村待惯了，进城以后，一定会变，现在快三年了，可是还没有变。原来以为他们是所谓“土包子”，对于军事和农村工作有一套办法，城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不一定能行，上海许多公共事业和一些大型工厂，军管会接管以后，派去的那些军事代表和厂长这些人，摸索一个时期之后，居然也熟悉了。这样一来，他对干部看法有些改变：他们不单是生活朴素，态度和蔼，平等待人，而且还有本事。国家大事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那是大有希望的，会给中国人出一口气。他对潘信诚说：

“我虽然年纪轻，接触到政府的干部也不多，但不论上级也好，中级也好，下级也好，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尤其是生活朴素，不爱钱财，确

实叫人佩服。他们那个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真是天下第一！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不大同意慕韩兄的说法。”徐义德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梅佐贤还代他送了两百万块钱给驻厂员方宇，怎么能说是干部不爱钱财呢？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生活朴素是真的，不爱钱财，我看不见得。钱，谁不爱？如果照信老的分类法来说，也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心里爱嘴上也爱；一种是心里爱嘴上不爱；第三种是心里不爱嘴上也不爱。现在的干部多数是第二种，如果你送上钱去，保证不让第二个人晓得，你看他要不要？我徐义德担保：他一定要。”

马慕韩摇摇头：

“德公，你这个说法，要考虑。”

“我有亲身的经验。”徐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看了梅佐贤一眼。

梅佐贤懂得他指的是方宇。梅佐贤说：

“我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

“就是有亲身的经验，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更不能以个人的经验下结论。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要比较的看问题……”

马慕韩在上海解放后就不断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看，学了

不少新知识。在工商界朋友当中，他还是比较有点修养的。他这几个看问题的方法把徐义德说得哑口无言。他心里不服，可是弄不清那些新名词，有理也说不出。他不言语，只是对马慕韩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同意。朱延年从马慕韩的沙发扶手上站了起来，向大家点了一点头，态度很谦虚，语气却坚定，说：

“借这个机会，我想向诸位报告报告福佑药房的具体情况……”

马慕韩一听到朱延年要报告福佑药房的情况，马上就预感到他又要大煞风景，在林宛芝三十大庆的日子来大力募股了。他厌恶地盯了朱延年一眼，想离开他远一点，书房里没有一个空座位，突然离开朱延年也容易引起旁人的诧异。他不动声色，把头转过去，注视挂在墙上的那幅《纨扇仕女图》。

朱延年没有注意马慕韩的表情，他兴致勃勃地说：

“福佑药房复业不久，从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了一位张科长，刚开头，连根香烟也不肯抽我们的，吃饭更不必说了。我们送过去一双黑皮鞋和一套深灰色的哗叽人民装，起先一定不要，劝他先穿了再说，到后来就一直穿到苏北去了。送他礼物不肯要，我们把它放到火车的行李架上，他也带到苏北去了。最初不敢当面送钱，只说是借点钱给他零用，他就放手化用

了。第二次，我们又送了一些钱放在他房间里，他化了，从来一字不提。到娱乐场所吧，比方讲跳舞厅，开头也不肯去，带他去一二次，以后就自动去了，跳完了，就把一个很漂亮的舞女——叫徐爱卿的带到旅馆去了。公家机关的干部总是这一套，心里爱钱嘴上不敢爱。以后，我们摸清了这个底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照办，坚持做下去，只要不让人晓得，他们最后总是接受的。十拿九稳，没有一个干部不是这样的。”

徐义德的嘴上露出了笑容，说：

“我说的，对吧？慕韩兄。”

马慕韩听见朱延年并不说募股的事，而是谈了张科长的例子，这些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兴趣。他没有正面回答徐义德的话，转过脸来，对朱延年说：

“你谈下去。”

朱延年见自己的一番谈话引起了马慕韩的兴趣，他扬起眉头，得意忘形地说：

“哪个干部到了我们福佑药房，总逃不出我朱延年的手。不但生意一定是给福佑做下来，而且人也会慢慢变成福佑药房的。他们自己单位的生意一定给福佑做自不必说，就是他们有联系的别的单位，也会介绍来的。每次介绍生意来，我也不亏待经手人，不是寄点钱去，就是送点礼物去。他们要办货，上哪一

家都是一样，到福佑来，自己有油水，何乐而不为呢？老实说，我们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任你是哪一个干部来，只要跨进福佑的门，思想就一定会得到改造。因此，我们福佑的生意越做越大，经常联系的客户几乎遍及全国，有一千九百四十二家，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曾达到三十六个亿，现在还在发展……”

马慕韩听到这里生怕他又要拉到募股上头去，当着这些朋友的面，再要拉他入股，他是很难拒绝了。他连忙插上去说：

“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那么，你是所长了。”

“不敢当，不敢当。”朱延年谦虚地说，“我不过在这方面多出点主意，具体的事情还是靠伙计们去做。”

韩云程工程师不大接触工商界的这些人物，平日尽在数字里过日子，今天听了朱延年的宏论，他暗自吃了一惊，深深感到自己晓得的事体太少了。拿朱延年和徐义德一比，显得徐义德大为逊色了。他感叹地说：

“想不到福佑药房做买卖还有这一手……”

柳惠光早听说福佑招待客户的一些情形，但是没有今天这般具体。早一会儿和马慕韩、韩云程一道听朱延年谈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形，当时的嫉妒现在

已变为轻视，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这样做法，风险太大，就是赚钱，将来也会出毛病的。他不再嫉妒福佑药房，内心安于利华药房的营业情况了。他听到韩云程的感叹之词，接上去说：

“我们延年兄的花样经多的很，别人想不到的事体，他都做得出。”

这几句话说得朱延年心里不大舒服，在座的只有柳惠光知道他的底细最清楚，怕他再说，连忙顶过去：

“别给我高帽子戴，惠光兄，你也不推板。”

徐义德的意见得到朱延年的有力的支持，他指着挂在上沿墙壁上那幅《纨扇仕女图》说：

“金钱与美人这两关，谁也逃不过。你们看看这是一幅唐朝的古画，这几位宫女画得多美丽！谁见了能不动心呢？干部跳舞当然找最漂亮的舞女跳。有了金钱和美人，你要干部做啥，他不肯，才怪哩。”

潘信诚闭目遐思，想起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曾经看到上海解放初期英文《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感慨万端地说：

“唉！英国人是有眼光……”

大家对金钱与美人这两个问题正有兴趣的时候，忽然听潘信诚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潘信诚。宋其文问：

“信老，你怎么忽然岔到英国人身上去了？这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有关系。”潘信诚说，“上海解放初期，《字林西报》有篇社论，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啥政党来，都要变色的。那意思是说，就是共产党来，也要被上海改变的，也要变色的。我听了延年老弟的一番话，心里很有感触，要修正我刚才的看法。以我五十多年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哪一派得势上了台，开头都是勤勤恳恳朴朴素素地办事，总是得人心的。可是，不久，政权建立起来，生活富裕了，过的写意了，就起了变化，慢慢失去了人心。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百把年，统治阶级也不争气，尽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在人家面前讨饭吃。我原先以为共产党不同，想不到上海解放还不到三年，干部已经起了变化。上海这染缸，……这可怕的染缸……”潘信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都闭住了嘴，不知道说啥是好。书房里静静的，草地上暮色苍茫，打羽毛球的大人和孩子的叫喊声低下去，有些人就走进客厅里来。楼上徐守仁已经把电唱机关了，再也听不见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客厅里的乱哄哄的人声比刚

才更高。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稍为注意一下，可以听到西客厅里有人在唱《捉放曹》：“将此贼好一比井底之蛙……”此外，还可以听到搬动桌椅和放置筷子碗碟的音响……

梅佐贤坐在书房门口那边，伸过手去把电灯扭开。灯光照耀着古色古香的书房，给潘信诚叹息了一声因而沉闷起来的空气，让电灯一照，大家情绪又仿佛活跃了起来。肃静中，马慕韩开口，打破了沉默：

“信老，你是用旧眼光看新社会。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形，过去确是如此，那是反动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一定要起变化的，有的变化迟些，有的变化早些，但是一定要变化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会的。”

“这件事，慕韩兄，你可不能给人打包票。”徐义德完全同意潘信诚的意见。

“不是我要给人家打包票，共产党硬是和别的党派不同么。”

“何以见得？”潘信诚不慌不忙地问。

“自然有道理，我亲眼看见的啊。”马慕韩回忆地说，他仿佛又回到朝鲜前线，“在朝鲜的志愿军，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他们住在坑道里，有时连水也喝不上，用雪化成水来喝，不怕多么强烈的炮火，个个争先恐后，受了伤也不下火线。过去只听说解放军生活

艰苦，打仗勇敢，我却没见过。我在朝鲜前线慰劳，可是亲眼目睹的，他们一点也没有变。”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管教的严。不过，军队在城市里住久了，也很难说。”潘信诚还是相信《字林西报》的论调。

“不，信老，我见到的志愿军，有的是从上海开去的，他们在上海驻防过。”

“哦？”潘信诚感到有点惊奇。

“信老担心的很对，一般干部就很难说了，有些干部，我也是亲眼看见的。”徐义德支持潘信诚的看法。

“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很好，陈市长在一次会上，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早注意这个问题，可以防止，因为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每天要洗洗脸，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腐化的。”

冯永祥给朱延年“将”了一“军”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怕露底。马慕韩提到陈市长，他立刻支持他，表示自己也了解这件事，大声地说：

“慕韩兄的话对，我也听陈市长这么说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腐化，有毛主席领导一定不会腐化，绝对不会腐化。”

“现在还难说，”潘信诚的口气已经有了一些改

变，“走着瞧吧。我的眼光也许旧了一点，不过，我是一番好意，但愿共产党能把中国弄好。”

马慕韩坚持他的意见，说：

“目前正在进行三反运动，事实说明共产党不会腐化。这个运动就是为了挽救那些贪污、腐化、浪费的干部的。”

一提到整干部，徐义德的兴趣就来了。他说：

“对，这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是要整……”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忽的，冲进来一个穿黄皮茄克的青年，乌而发亮的头发向前飞起。他大步跨到徐义德的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没头没脑地说：

“爸爸，开饭啦。”

“等一等，我们正在谈心哩。”

“不，”徐守仁靠着徐义德的膝盖摆了摆身子，说，“我肚子饿哪。”

“客人不叫饿，你叫饿，”徐义德轻轻拍一下他的大腿，说，“没一个规矩。告诉他们，等一会开。”

徐守仁站在爸爸面前不肯走，撇着嘴说：

“外边的客人都等着哩！”

“那就吃吧。”潘信诚给马慕韩批评了一下，心里不高兴，可又说不过这些年青人，感到自己是老了，但又不完全服老。他本来还想多讲一点，驳斥马慕韩，一看今天人多口杂，不是说知心话的地方，他就

放了一步，借口吃饭，站了起来，说，“我也饿了，等会再谈吧。”

宋其文、柳惠光他们也站了起来。徐义德把手指着书房的门，对大家嚷道：

“各位请。”

50

吃过晚饭以后，杨部长走进长宁区税务分局的“三反”办公室，急着问秘书叶月芳：

“方宇坦白了没有？”

叶月芳从她灰棉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冲皮的笔记本来，打开里面记录，向杨部长汇报今天的情况：

“根据小队长指示，这两天我们对采取大会轰、小会挤的方法，有时候，用材料点他一下。他顽强得很，还是不肯坦白。这些留用人员脑筋旧的很，态度特别狡猾。不怕你的火力多猛，他就是不吭气。有人急得没办法，恨不能过去痛痛快快地打他两记耳光。”

“打两记耳光能解决问题吗？”

叶月芳给杨部长突然一问，倒愣住了。她想了一阵，说：

“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对了。”杨部长笑了一声，说：“打‘老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有经验的‘老虎’尤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仅需要勇敢，我们更需要的是智慧。一定要掌握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动脑筋、用智慧。光靠斗争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宇的材料，你们小队长研究了没有？”

“看了一下，说研究，还谈不上。”

“有勇无谋，哪能作战呢？前天我不是在汇报会议上谈了这一点，你们为啥这么急的就展开攻势呢？”

“因为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要领导群众，集中力量，向大贪污犯发动猛烈的进攻，不抢时间来不及啊。”

“进攻没有作战计划，没有准备，单抢时间，行吗？”

叶月芳合上红色冲皮的笔记本，低着头，望着别在列宁装左胸前的红色天安门的国庆节的纪念章，忍不住笑了：

“不行。”

“通知你们的小队长，停止进攻，不要再开斗争

会了。这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实际上是在‘老虎’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增加他顽强抵抗的信心。”

叶月芳同意杨部长的分析，点了点头。

“方宇大概也让你们攻得昏头昏脑的了，叫他休息一下，清醒清醒头脑。你和小队长今天集中力量研究方宇的一切材料和线索，提出你们的意见，送来给我看，批准你们的计划以后再进行。”

“好的。”叶月芳坐到自己的办公桌那边，开了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来，送到杨部长面前，说：“这是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和统计数字，现在要看吗？”

“留在这里好了。”

“我找小队长研究方宇的材料去，有啥事体，派人来叫我好了。”

叶月芳走出去，她轻轻把门关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委员会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后，在十七日紧接着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市府党组干事，和各市区与市郊党委正副书记都列席了会议。由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陈毅同志指出：“武装斗争阶段

转入工业建设的过渡时期行将结束，今后则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懂得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二年是工业建设准备的最后一年，要做的工作很多，而中心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最后，陈毅同志号召上海各级党组织要为执行中央这一伟大正确的决定而斗争。

中共长宁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正确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并且已经从党内推向党外。为了加强重点单位的领导，特地把区委委员和各部的负责人派出去掌握。统一战线工作部杨健部长被派到财经队。他把重点放在税务分局这方面。到了税务分局，他了解了一下全面的情况，感到问题相当严重。整个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原来伪税务局的留用人员，党团的力量很弱，进步骨干也不多。税局人员和资产阶级关系特别密切，其中贪污问题必然严重。他根据税务分局的行政组织，以科为单位建立了小队。他亲自领导一个小队，因为干部不够，同时也因为注意培养他的助手，就把区委统战部的秘书叶月芳派到一个小队去，要她协助小队长首先突破长宁区税务分局在沪江纱厂的驻

厂员方宇。他刚才听了叶月芳的汇报，有点不放心，准备自己抓一抓方宇这个问题。

他坐在办公桌面前，打开夹子，仔细研究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最后，他又想到方宇。深夜临睡以前，他打电话问叶月芳小队关于方宇问题研究的情况。她说正和小队长在突击，估计明天可以缴卷。

第二天上午，叶月芳果然把研究好了的方宇的材料送来，并且提出作战计划。除了大会轰小会挤以外，加了一条——压的方法。另外，他们要求杨部长支援——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杨部长看完了方宇的材料，对叶月芳说：

“昨天我同你说，你们有勇无谋，哪能作战？我看了书面汇报，你们虽然注意发动群众，但是侦察工作做得很差。指挥官对虎性缺乏了解，只是满山遍野乱放空炮，到现在一只老虎也没有捉到。战罢归来，群众自然疲惫不堪，加把劲，就产生了急躁情绪，恨不能打他的耳光。现在你们研究了他的材料，也提出一些意见，比较好。可是你们也只有三个办法，轰、挤和压，对方宇这样的人这三个办法不行。”

“不能用吗？”

“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用处。”

“哪能办法呢？”她睁大了两只眼睛。

“得另外想办法。你想想看。”

她咬着下嘴唇，想了一阵，轻轻地摇摇头：

“想不出。”

“最近市委总结的经验忘记了吗？”

“查、算、劝！”

“对！对方宇这样的人，特别要根据市委指示，用这三件法宝。”

“你不说，我们倒差点忘了。”

“比方说，他承认解放前确实按月收过资本家的津贴，就要查问：“从啥辰光收起的？收到啥辰光为止？一共收过多少？每次收多少？解放以后为啥不收？你不收，资本家不会不送的。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资本家一定送，只要他承认解放以后收过一次——不管收啥——就好办了。既然收过一次就有可能收过第二次第三次。经过查和算，他一点一滴承认了，然后，要劝。你们必须调遣得力干部，加强侦察工作，研究虎性，及时掌握情况，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获胜。今天下午你们小队自己开会总结一下过去几天的经验，并且把方宇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一下，使得每一个战斗员都了解情况，了解作战布署，然后到深山密林里去搜索老虎就有把握了。今天不要去找方宇，让他休息一整天。等你们小队初步总结做好，作战布置传达了，明天再找他开小会。”

叶月芳一边听杨部长讲，一边打开红色冲皮笔记本刷刷地记着。杨部长讲完，她感到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是对付顽强老虎方面所最需要的力量。过去以为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听杨部长抓住关键问题冷静地进行分析以后，觉得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太有办法了。那股力量产生了信心。她向杨部长保证：

“我们小队全体队员一定根据你的指示，满怀信心地上山打虎，不捉到老虎，誓不回来。”

“我祝你们成功。你们一定成功。勇敢加智慧，就是胜利。”

“不过，我们还希望你不断地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支援。”

“那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呢？”叶月芳想起了小队长在作战计划上的要求。

“如果需要，当然可以。”

“那我们的信心更高，明天一定解决方宇的问题。”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准备去了，她想即刻把杨部长的指示告诉小队长，早点准备，好上火线战斗了。她脸上闪着得意的笑容，心里想：方宇这只“老虎”眼看着就要捕获到手了。

杨部长见叶月芳兴高采烈，怕她让预期的胜利

冲昏了头脑。叶月芳是一个里外如一的人，她内心有啥，面孔上立刻就反映出来。她好胜，同时，还有一点虚荣心。上海解放以后，她首先穿上二尺半的灰布列宁装。原来在上海工作的一些女同志初穿上这身灰布衣服还有点不习惯，她却感到很自然，经常穿着那身灰布列宁装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出现。此外，她对各式各样的徽章感到很大的兴趣，尤其是一个新的纪念章——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上海一出现，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去弄来，别在胸前，有意走到熟人面前给他们看。做起工作来，就忘记了一切，不完成组织上给她的任务，她绝不放手。即使三天三夜不睡觉，她也不叫一声苦。她经不住表扬，但受得起严厉的批评。杨部长熟悉她这些特点，在思想和工作上，他对她抓得比较紧。杨部长留下了她，提醒她别让可能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说：

“叶月芳同志，你记得我们三反运动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吗？”

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站了下来，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在机关内部展开坦白检举运动，并与工商界的坦白检举运动结合起来，造成内外夹攻的形势，集中力量追捕大贪污犯。”

说完以后，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杨部长的表情，她怕自己回答的不完全。其实她记忆力和她所做的会议记录一样，在整个区委是出名的，什么文件经过她的手，只要杨部长一提，就可以把整个内容说出来，马上找给杨部长看。任何人参加区委统战部的会议，看到自己发言的记录没有一个人不赞赏的，不但记得一点不漏，最难得的是保持着发言人的口吻，丝毫不差。她是统战部有名的活字典。她见杨部长点了一点头，她松了一口气。杨部长说：

“市委的指示你记的很清楚，这很好。问题是怎样才能追捕大贪污犯呢？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目前税务分局的中小‘老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大‘老虎’还躲藏着。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要小胜即骄，要永远保持清楚的头脑。”

叶月芳的弱点给杨部长几句话指点出来。她的脸像是西方的晚霞。她静静站在那里，仿佛是在暑天，热得头上冒气，给一盆冰凉的冷水浇下来，脑子里感到凉爽和清醒。

杨部长接着说：

“就是方字问题也不会一帆风顺，进行起来可能还会有波折。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毛主席指示我们：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

面对顽强的‘老虎’，我们不可以过早的乐观，当然，要有坚强的信心。纵然方宇问题顺利解决了，也只是突破一点，我们还要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取得全胜。最近区里要召开坦白检举大会，我们要特别努力，配合区里的这个大会。反过来，区里的这个大会，又会推动我们这里的斗争。”

叶月芳羞愧地低下了头，她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乐观，忘记了摆在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杨部长批评了她以后，又鼓励道：

“你们只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你们会不断取得胜利的。”

“那么，我去了，杨部长。”

“好的。”

叶月芳迈着坚定的步子，稳健地一步步走去。

开过了小会，叶月芳走进了杨部长的办公室，嘟着嘴，半晌没有说话。杨部长料想情形一定不大好，问她：

“方宇没坦白？”

“他什么也没有坦白，只承认解放以后受过梅佐贤厂长的一只马凡陀金表，说这是私人交情，……”

“别的呢？”

“他说再也没有了。这样的人，我看他死也不会坦白的。”

“他不是已经开始坦白了吗？”

“啥辰光？”她大吃一惊，方宇坦白了，她为啥不晓得呢？她不解地注视着他。

“你刚才说的呀，他收了梅厂长一只表，这就是行贿干部的一种方式。礼品也要钱买的呀。不是啥私交！为啥梅厂长不送别人的礼品，单独送他呢？送了一次以后，为啥不再送呢？这不是开始坦白一部分了吗？”

“经你这么一说，倒是的。”

“说了以后，他很恐慌吗？”

“看样子很恐慌。他神色有点张皇失措。”叶月芳把召开小会的经过情形向杨部长汇报了，她说：“我们希望杨部长能找他个别谈一次话，好跟踪追击，巩固已得成绩，迅速扩大战果。”

“你们对他交代政策不够。他有顾虑，不敢彻底坦白。”

“我们第一次就给他交代了政策。这家伙顽强。”

“交代一次是不够的，要反复交代，要交代的透。他现在已经露出‘老虎’尾巴来了，紧紧抓住尾巴，反复交代政策，是可以扩大战果的。”

“你啥辰光找他谈呢？”

“让我把他的材料再研究一下。”

三小时以后，叶月芳把方宇带进来了。他拘谨地

站在杨部长面前，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是好，一会交叉地放在胸前，一会藏到脊背后面，最后垂直在身体两旁。

“请坐下。”杨部长指着他办公桌前面那张椅子对方宇说。

叶月芳端过一杯茶来放在方宇面前。

方宇莫名其妙了。他听说杨部长找他谈话，他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临走，他又向房间四周留恋地看来望去，好像是进行最后的告别。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家里，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那就是说，他准备进监狱。他后悔不该坦白出曾经受过梅厂长的马凡陀的金手表，讲出去以后，果然杨部长找去谈话了。见叶月芳站在旁边，他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怕给叶月芳察觉出自己的心思。他心一横，抱着横竖横的心理，跟她来了。走进杨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看见公安局的人员，他就有点奇怪；杨部长和叶月芳那么客气，他更奇怪了。他坐在杨部长面前，还是不敢抬头，也没有喝茶，以一种等待宣判的心情在静坐着。

杨部长窥出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特地缓和一下空气，轻描淡写地说：

“方宇同志，不要太紧张，我们随便谈谈。”

“方宇同志，”方宇想起自己过去的罪行，听到“同志”两个字感到有点惭愧。一个贪污分子值得杨

部长称做“同志”吗？他抬起头来，口吃地说：

“杨部长，我，我……”

“你怎么样？方宇同志。”

“我，我不配称做同志，你待我太客气了。”

“这没有啥。”杨部长望着他的面孔说，“你不要老想着你是留用人员。你要晓得，你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雇员，站在政府机关以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

“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一百一十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一百一十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一百一十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七月一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啊。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不喝。他说：

“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

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
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
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
错误，发现错误，改正
错误，努力避免再犯
错误；有的人犯了
错误，自己不承认是
错误，或者是别人指
出了他的错误，他企
图掩饰错误，甚至保
护错误，寄托在侥
幸上，不想改正错
误，一错再错，就
铸成大错了。对后
一种人，我们要帮
助他，这是我们一
种责任。当然，他
自己也要检查自己。”

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面
孔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
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
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地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
一种人，我们要帮助
他，这是我们的一
种责任。当然，他
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
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
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
长这些话是针对着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
态度又那么和蔼亲
切。他听了心里很
舒服，又很难受。

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他：

“你觉得哪能？”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

“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

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

蹶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

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型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他想起那天在沪江纱厂厂长办公室的情形，梅厂长把马凡陀金表放在他面前，说：“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今天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道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从此，他就接受梅厂长一次又一次的礼品和金钱。想不到来了三反运动，还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而且梅厂长在座谈会上还谈了话。梅厂长啊梅厂长，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摩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晓得从啥地方说起。

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对方宇说：

“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

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

办呢？他看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地恳求道：

“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体，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

“完全可以。”

“我现在可以去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眉头开朗了。

“你现在可以去。”杨部长也站了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

“你刚说动了，为啥又放他走呢？”

“不放他走，”杨部长幽默地说，“留他在我的办公室困觉吗？我这里也不是旅馆。”

“不是这个意思，”她辩解地说，“意思讲，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哪能坦白？”

“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呀！”她急得胖胖的圆脸上的两只眼睛睁得更大。

“那要他再变过来，”杨部长说，“思想基础不巩

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

她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鼓着掌，说：

“那好，那好！”

51

“你说，这样做法，好啵？”赵得宝问陶阿毛。

陶阿毛刚才听老赵谈了一通重点试纺的道理，他料到这绝不是赵得宝个人的意见，一定是党的意图，通过他来了解群众的反映。他想摸一摸重点试纺的“底”。他显得非常关心厂里最近生活又难做的情况，试探地说：

“重点试纺好倒是好，行啵？”

陶阿毛的眼光停留在秦妈妈和汤阿英的脸上。

下了工，谭招弟洗了手，换上衣服。做完了一天的生活，她松了一口气，腿累的有点发软了。她匆匆走出了车间，希望早点回家休息。在路上，秦妈妈叫住了她：

“招弟，走得那么急做啥？有男朋友等着吗？”

“怎么和我开玩笑来了？秦妈妈。”

“好，没有男朋友等着，”秦妈妈赶上一步，和谭招弟并排走着，说，“那你和我们一道走吧。”

谭招弟放慢了脚步，问秦妈妈：

“这两天粗纱间生活怎么样？”

“害摆子病，忽冷忽热，一时好一时坏。”

“细纱间呢？”谭招弟的眼光对着汤阿英。

“也在打摆子。”

“啥路道啊？”谭招弟迷惑不解。

“大舞台对过——天晓得^①，好不了几天，生活又难做了。”秦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怪，我们车间也是的。自从上次开了劳资协商会议，确确实实好了一阵子，最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劳什子生活真难做。是不是细纱间又出了毛病？”谭招弟仍然认为生活难做和细纱间有关系。管秀芬从她们身后走上来，听谭招弟说细纱间，她忍不住抢上一步，用质问的口气对谭招弟说：

“又是细纱间长细纱间短……”

管秀芬突然出现，谭招弟一时愣住了，说不上话来。

^① 大舞台是上海经常演出京剧的剧场，对面有一商店，招牌是“天晓得”。

“恐怕不是细纱间的毛病，”秦妈妈给谭招弟解了围，她想粗纱间出的纱质量不太好，自然会影响到细纱间的的生活和质量。她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很复杂？”谭招弟怀疑地问。然后她回答自己：“我看，问题很简单。”但她看到管秀芬和她们肩并肩地走着，就没有说出口。

汤阿英听谭招弟的口气在责怪细纱间，管秀芬必然要和她顶嘴。上次在劳资协商会议上已经把问题摆在桌子上了，是原棉问题。谭招弟和管秀芬都没有参加这次劳资协商会议，对全厂的生产情况不了解，仍然陷在陶阿毛布置的车间姊妹互相埋怨的泥坑里。她不能眼看着自家姊妹闹不团结，得解开她们之间不和的结子。她说：

“招弟，秦妈妈说的对，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能随便怪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伤了自家人的和气。”

谭招弟听了这段义正词严的话，一时不知说啥是好。她的确不了解全厂的情况，凭她狭隘的经验，加上陶阿毛播下的挑拨离间的种子，不知不觉地在她思想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虽然生动的现实已经说明生活难做不是由于细纱间生活做的不巴结，但筒摇间摇的是细纱间的细纱，总以为细纱间脱不了干系。经汤阿英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自己的确没有

调查研究，却夸夸其谈。可是她又看不出自己有啥不对的地方，自然不能承认错误，反而像是受了委屈似的，说：

“就算问题复杂吧，但我也没有伤自家人的和气呀！”

“你乱怪细纱间，不是伤自家人的和气？”管秀芬愤愤不平地说，“难道是同人家团结吗？”

“不是我怪细纱间，你去看看这两天纺的细纱。”谭招弟不让步。

“细纱就算不好吧，也要仔细分析分析，不能乱怪别人，你没听秦妈妈说吗？问题很复杂，别把复杂的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摸到韭菜就当葱。”管秀芬忍不住又刺了她一下。

“也别把简单的问题看的太复杂了！”谭招弟心直口快，性情急躁，对问题不善于冷静分析，就轻易下判断。她听不进管秀芬含着教训口吻的语气，立即回敬她一句。

“有话好好说，”秦妈妈拉着她们两人的手，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两人别动肝火。”

她们给秦妈妈一说，谁也不好意思顶下去，默默地慢慢在煤碴路上向大门走去。当她们走到篮球场那边，赵得宝一眼看见了，便向秦妈妈她们招手。她们走过去，听赵得宝在和陶阿毛谈重点试纺的事，就

站了下来。秦妈妈见陶阿毛问到自己，她望着赵得宝身子背后的篮球架子，在仔细想重点试纺哪能进行，当时没有答话。谭招弟想也不想一下，就说：

“这啥用，浪费时间。”

“为啥呢？”赵得宝耐心地问。

“反正生活不好做，试纺不试纺，还不是不好做。”她一想起最近车间生活的情形，心里就不满意，越说越生气，“各个车间也调查过了，工会开过会了，劳资协商会议也开过了，生活还是不好做。再试纺，顶多忙一阵子，过了几天，还不是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我看，用不着重点试纺，只要各个车间把生活做好点就行了。”

“这是啥意思？”管秀芬歪过头去问。

谭招弟毫不含糊地回答管秀芬：

“没啥意思。”

管秀芬还要问她个明明白白，见赵得宝要说话，她就没有说。

“没有办法解决吗？”赵得宝问谭招弟。

“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她强辩道，“单试纺没用。”

“试纺，瞧瞧毛病在哪里，为啥没用？”管秀芬顶了谭招弟几句，接下去讽刺道，“事情没做，就晓得没用，我们的谭招弟变成诸葛亮了。”

谭招弟一急，说话条理就差，她说不过管秀芬，也不服输，嘟着嘴讲：

“我不给你说。”

陶阿毛接过去说：

“我懂得招弟的意思，她说试纺不能解决问题，得宝哥，你把怎么试纺讲一讲，她懂得道理，就会赞成的。”

说完话，他的眼睛暗暗觑视着管秀芬，好像是在问她有啥意见，希望得到她的谅解。他并不反对管秀芬的意见，甚至对管秀芬的一切意见，他都赞成。他早就看中了管秀芬，最近更特别喜欢她。他觉得这个年轻姑娘逗人爱：高高的个儿，苗条的身子，聪明的眼睛，伶俐的口齿……在哪一个场合，人们都首先注意到她。她的谈吐，既锋利又富有风趣，吸引了每一个人。当然，她很厉害，特别是那张嘴，从不饶人。她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你一不小心，要给她刺破了手；等你看到那绚丽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又绝不忍离开。富有经验的陶阿毛，是懂得对付这样的姑娘的。他想，如果能够把她抓在手里，那对他会有莫大的帮助。他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心的深处，不仅不让别人知道，连管秀芬也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即使忍不住要看她一眼，也是暗中觑一觑，生怕给她发觉。因为一个骄傲并且带点虚荣的姑娘，倘若你正面拚命

追求她，她不但不理你，反而会增加她的骄傲和虚荣。倒是你对她很平常，不理她，甚至有点冷漠她，要是她心中喜欢你，她会想办法很自然地主动接近你；那时，你再退一步，她就更靠近你的身边了。

管秀芬没有注意他的眼光，更不了解他的心思。她正在想这个问题。听到陶阿毛提出，她马上赞成，表示自己也怀疑重点试纺是不是能解决问题。赵得宝向篮球场四周望望：西边一片浮云逐渐变得灰黯，黄昏迈着轻盈的步子悄悄走来了。篮球场上静静的，没有其他的人。厂长办公室的电灯亮了，说明梅佐贤还没有走。赵得宝压低了声音说：

“重点试纺不是马马虎虎地进行，事先要有准备，每个车间都要组织一批人，严格监督。比方说，从清花间起，经过梳花间，粗纱间，细纱间，筒摇间，成包间，一直到试验间都要安排好，先检查机器，后检查原物料，做好清洁卫生工作，再开始试纺。这样每一个车间都有人看着，纺出的成品，检验一下，就看出毛病在啥地方了。”

和谭招弟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汤阿英，她不像谭招弟那样见了啥事体不假思索就反对，也不像谭招弟那样不仔细想想就赞成，她遇事总是深思熟虑，冷静地想好了才表示意见，一说出来，就坚定不移地去做，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她听赵得宝谈重点试纺也

是这样。仔细听，仔细想，仔细分析，默默地没有表示意见。她认为这是关系全厂的大事，也是和徐义德他们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必须认真研究，慎重安排，严格监督。

秦妈妈和管秀芬听赵得宝说得头头是道，她们表示赞成。

“我也赞成。”陶阿毛正面看了管秀芬一眼，立刻转过脸来让管秀芬注意自己，他担忧地提出意见，“酸辣汤要是破坏呢？”

“他有啥法子破坏？”管秀芬问。

“我想，凡事总有可能破坏的，”陶阿毛只提出问题，答案要留给别人做，“秀芬，你的经验多，你说，是啵？”

“我不晓得。”管秀芬给陶阿毛捧得她心里暖洋洋的，她把头低了下去。

“这个，”赵得宝一眼望见梅厂长的办公室的电灯熄了，他就没说下去。一会，梅佐贤挟了一个黑色的牛皮公事包走出来。他坐进那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机器顿时发动，汽车前面的两盏小灯也亮了，它经过篮球场，慢慢向门口驶去。等小汽车开出去，大铁门砰的一声关上，赵得宝才又接着说下去：

“要破坏当然是有办法的，比方花衣，就可能搞鬼。如果纺的不是真正花纱布公司的花衣，那各个车

间的努力就等于白搭。”

“这要小心提防呀，酸辣汤那个家伙，”秦妈妈指着梅厂长的汽车刚开走的方向，说，“是无空不钻的，上次开了劳资协商会议，生活好做了没两天，又坏了。资本家只要能赚钱，有钞票上腰包，我们工人生活好做难做他管个屁，就是累死人他也不管的。”

“秦妈妈说的对呀！”陶阿毛说。

“那是的。”管秀芬也点头赞成。她觉得陶阿毛这人真不错，技术好，工作巴结，能说会道，人长的模样儿也不错，就是对她有点儿冷淡，不像厂里别的青年在她跟前团团转。

“只要车间生活好做，”陶阿毛心里想，重点试纺的“底”摸的差不多了；刚才梅厂长一定是坐汽车回家，他想快点结束这个谈话，好早一点通风报信。最近梅厂长嫌他消息有点不灵，怪他不卖力气，今天真是额角头高，消息自己碰上门，那还不快点到梅厂长那里去亮一手。他怕迟了，事情传开，消息溜到梅厂长的耳朵里去，再报告就没有价值了。他想报告之后一定会得到梅厂长的夸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声音也高了，得意地说，“我双手拥护。”

“没有别的意见吗？”赵得宝望了大家一眼。

“没有，”陶阿毛亲热地叫了一声，“得宝哥。”

“看你那股高兴劲！”谭招弟指着陶阿毛的面孔

说。

陶阿毛很沉着地说：

“只要是斗资本家，我没有一个不高兴的。这次重点试纺，我报名参加，我在清花间监督花衣，谁也搞不了鬼。”

“那当然，”谭招弟不相信重点试纺真能解决问题，但她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站在旁边听他们谈。她见陶阿毛有点得意忘形，有意顶他一句，“苍蝇飞过你的面前，你都知道是雌的雄的，谁有本事在你陶阿毛面前搞鬼。”

“招弟，你过奖了。陶阿毛没那个本事。”他谦虚地说道，“我个人有啥本事，全靠党和工会领导的正确。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啥事体也做不成。得宝哥，希望你以后多多帮助我。同志们进步的太快了，我老是感觉跟不上，快落伍了。”

“只要认真学习，努力进步，就不会落伍的。你的进步并不算慢。”赵得宝看谭招弟对重点试纺不大热心，他转过来问她，“你现在觉得重点试纺哪能？”

“赞成！”谭招弟立即答道。

“真的赞成吗？”汤阿英了解她的脾气，怕她思想没弄通，将来又后悔，再提出意见就不好了。

谭招弟想了一下，说：

“只要能找出毛病，大伙愿意这么做，分配我做

啥，我也不反对。”谭招弟表示自己中立的态度。

“有啥意见，要说出来，大家可以研究。”汤阿英不放心地说。

“你有意见可以提，现在没有做决定，还要开劳资协商会议和资本家协商哩。”赵得宝补充了两句。

“试纺一下也好。”谭招弟保留自己的意见。

汤阿英认为赵得宝提出重点试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把原棉问题推到花纱布公司身上，现在用花司分配的原棉进行重点试纺，就看出毛病出在啥地方了。她说：

“重点试纺是个好方法，可是一定要派可靠的人严格监督，防止资本家钻空子。”

秦妈妈说：“这点很重要。我拥护，重点试验，只要生活好做，啥办法都行。”

“我也是。”这是管秀芬的声音。

“我完全拥护！”陶阿毛大声地说。他心里很急，惦记着要到梅厂长那里去，想先走，又怕露了马脚，不安地站着。

秦妈妈看天色完全暗下来，只有车间的电灯在闪烁着亮光，她对赵得宝说：

“我们该回去了。”

赵得宝说“那么，一道走吧。”

“陶阿毛连忙接上去说：

“是呀，该回去啦！”

52

早晨，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的黄叶子落了一地。一个年老的清洁工人慢慢地扫着，在他旁边有一个手推的垃圾车。潮湿的寒风呼啸着，好像有意和年老的清洁工人捣蛋，它调皮地把落叶卷起，在空中旋转着，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放在刚才扫过的马路当中。对于离马路不到半里路的那一带草棚棚它更是放荡地恶作剧了，专门找那些屋顶漏了的和墙壁裂开了的草棚棚，像一个贼似的钻了进去，在里面到处乱闯。

一阵阵风吹得汤阿英草棚棚里寒丝丝的。巧珠奶奶坐在床上直咳嗽，嗓子眼上仿佛有一块永远吐不完的痰，一口一口地吐着。巧珠有点怕冷，她躺在奶奶怀里，可是又想起来出去白相白相。奶奶不同意：

“再躺一会，巧珠，今天是你娘的厂礼拜，你那么早起来做啥？”

“不早了，”她在奶奶怀里仰起头来，瞅着奶奶一头的银灰色的头发，要求道：“我们两个人一道起来

吧。”

“你让奶奶再歇一会，忙啥，这丫头。”阿英在门外边用着责备的口吻说。

奶奶低下头来，把披下来的银灰色的头发往耳朵后面一放，眼睛里闪耀着怜惜和慈爱的光芒，对着巧珠的耳朵低声地说：

“娘生气了，你不要吭气。巧珠，和奶奶再歇一会就起来，好不好？”

巧珠懂事地也放低了声音，轻轻应了一声：“好。”

奶奶紧紧地把巧珠搂在怀里，热爱地吻她的额头，说：

“闭一会眼睛吧。”

奶奶望着她甜适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细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两个小鼻孔均匀地呼吸着。奶奶好像自己因此也得到休息，心头感到舒适。

门外传来吧哒吧哒的声音。这是汤阿英在和泥巴。她的草棚棚早就应该修理了，老是没有闲工夫。黄泥和茅草买好很久了，一直搁在角落那里。今天起床，寒风吹得草棚棚里的草纸都飞扬了起来，像是黄蝴蝶似的在飞翔，忽上忽下。一阵风过去，汤阿英把地上的草纸拾起，放回马桶那边，看到堆在马桶跟前的黄泥，她下决心今天动手修理草棚棚了。她把黄泥

拎到门口，倒了两瓢水和了和，另外抓了一把茅草，把它弄短，约莫有两寸光景，均匀地撒在黄泥里。她用力地揉和着黄泥和茅草，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

她拿了一块木板，用抹子撮了两堆已经和得均匀了的黄泥，对着草棚棚侧面仔细看了看，又在正面望了望。她想起夜里从头顶吹来的冷飕飕的凉风，便首先走到草棚棚大门的左边，一眼瞧见竹篱笆剥落的地方，她像是一位熟练的老泥水匠，用抹子弄了一小团黄泥，啪的一声，那黄泥正好堆在剥落的裂缝那里，然后用抹子把它抹来抹去。非常均匀光滑，在清晨灿烂的阳光 下闪闪发光。顺着左边走过去，墙角落那边也有地方裂开了，巴掌大小的一块泥剥落下来了。她糊上黄泥，抹了一下，墙角落那边的裂缝弥补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她还不满意，在墙角那边细心抹着。

“妈妈，有客人来了。”巧珠的声音从草棚棚一直叫出来，气喘喘地冲到汤阿英面前。

“谁？”

“张阿姨，”巧珠高兴地说，“张小玲阿姨。”

巧珠一把拉住妈妈的胳膊，要她马上进去。妈妈把胳膊一甩，说：

“别碰我，我手上有泥。”

巧珠放下了胳膊，嘟着小嘴，站在旁边，催促说：

“快回去，张阿姨等你哩。”

“我知道了，要张阿姨等我一会儿。”汤阿英又用抹子撮了团黄泥，站在草棚棚的侧面，对着一条一尺来长的裂缝，抹上黄泥，仔细抹匀。

“哟，这么好的把式！”

汤阿英一门心思在抹黄泥，突然听到背后赞美的声音，兀自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不是别人，张小玲笑嘻嘻地对着她，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她面前晃了一晃。

张小玲听说汤阿英在抹竹篱笆，她没等巧珠把她娘找回来，便轻轻走了过来。她看见汤阿英刚才抹过的篱笆，平整光滑，心中暗自惊奇。她从小在上海长大，没有做过泥水匠这些活，看汤阿英的手这么巧，十分佩服，一走到汤阿英的背后，不禁脱口赞扬。

“做得不好，别笑话我。”汤阿英谦虚地说。

“你在啥地方学的这么好的手艺？我还不晓得哩。”

“从小在家里跟爹在一道，他带我们做这做那，慢慢就学会了。”

“你这双手真了不起，学一样会一样。”

“会，谈不上，只是凑合着做。”

“看你抹的活，不算八级技工，我看也够上五级六级啦！”

“差的远哩，”汤阿英听到张小玲过誉，丰满的面孔上，泛着绯红的愧色，微微摇了摇头，说，“我不过是个学徒工罢了。”

张小玲对于汤阿英的手艺确实从内心深处感到敬佩和羡慕，望着小木板上的黄泥和抹子，她的手有点痒痒的。她说：

“要不要我来相帮你？”

“用不着了……”

张小玲没等她说完，假装生气地说：

“怕我弄坏吧，我不会，你可以教我，别这么保守呀！”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汤阿英严肃地说，“你别生气，不是怕你弄坏了，是活做完了，以后再相帮吧。”

张小玲见她那么严肃解释，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说：

“给你说着白相的，我怎么会生气哩。以后你修理草棚棚，收我做学徒工，好不好？”

“不敢当。”

“不，收我这个学徒工吧，汤师傅！”

“我哪能当师傅？别把我给折死了。”

“你不答应，我可真要生气了！”张小玲有意把嘴噘起，板着面孔。

“一道学习吧。”汤阿英用瓢舀了一点水，浇在自己手上，边洗边说，“这草棚棚就像是纸糊的，一刮风下雨，不是这个地方漏水，就是那个地方通风。早就说要修理修理，老是没工夫动手。昨天夜里起了大风，我们冻了一夜。今天厂礼拜，学海一早起来，出去看朋友了，我没事，就借了把抹子，赶紧修理。忙了一阵子，总算修理得差不多了。”

汤阿英洗完手，抹去头上晶莹的汗珠，喘了口气，和张小玲一同走进草棚棚。巧珠奶奶见张小玲走进来，高兴地招呼道：

“我还以为你走了哩，快坐下。”奶奶一边对巧珠说：“快给张阿姨倒杯水。”

“我不渴，”张小玲谦虚地说。

“水还没烧吧。”汤阿英走过去，把门口没用完的茅草拾了进来，放在炉子里，点着了，又加了两根木柴，舀了两瓢水在烧。张小玲走上去，想阻止她：

“不要费事，阿英，我们不是外人。”

“到我这里来，别的没有，开水总得有一口。”汤阿英推开她的手，说，“我们也要烧早饭——昨天晚上剩了一点干饭，正好烧点水煮煮。”

“你累了一早上，也该歇一歇。”

“不累。”

奶奶走过来，拉起汤阿英，说：

“我来烧，你们姐妹去谈谈。”

“你应该雇个泥水匠，这点活，半个工就差不多了。逢到厂礼拜，也不会休息休息。”

“没这个福气，自己能买点黄泥修理修理已经不错了，谈不到雇人工。解放了，物价平稳，一天才能吃上两顿干的一顿稀的，要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时代，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今天没明天；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不能不把细一点。”

“就是不雇人工，你言一声，我们也好来插把手，相帮相帮你。”

“这点小事体，哪能好惊动人家？”

“你这句话却说得见外了，你有事我们相帮你，我们有事你也好相帮我们啊。”

“那当然可以，”汤阿英看锅里冒出了热气，锅盖噗噗地响，她拿起一只深蓝色的洋磁茶缸去倒了一杯开水，送到张小玲面前，说，“不过，今天这点活，一个人对付过去了。以后有事，找你就是了。”

“那好呀。”张小玲朝草棚棚里面望望，心里想：如果有事，她马上好帮忙，望了一阵子，看不出有啥事，就问道，“你今天还有啥事体吗？我好帮你一手。”

汤阿英想了想，说：

“没啥事体。”

“上午有空吗？”

汤阿英信口答道：“有空。”

“妈妈答应带我出去白相，奶奶也去……”巧珠接上去说，“啥辰光走呀？”

“看你人来疯，”阿英瞪了巧珠一眼，说，“站在阿姨面前没规没矩的，乱蹦乱跳做啥！”巧珠听到妈妈责骂的声音，她把脸转过去，伏在张小玲的怀里，不吭气了。

“小孩子应该跳跳蹦蹦的，你骂她做啥。”张小玲提出了异议，她用手抚摸着巧珠的头发。

“她野的不像样子了，整天看不见她的影子，到吃饭的辰光就回来了。哪能还能够让她乱跑。”

“要小孩子整天蹲在这个草棚棚里也实在闷的慌，我要是巧珠也要溜出去。你看，这草棚棚，站起来，伸直了腰，就要碰到头。那上面芦席给烟熏得乌漆巴黑，烧起饭来就呛嗓子……”

“是呀，”蹲在炉子面前烧饭的奶奶插上来说，好像是要证实张小玲的意见，她的嗓子给炉子里冒出来的一股白烟呛住了，一个劲儿咳咯咳咯的，吐了一口老黄痰，唠唠叨叨地说，“我就是这两条腿不听话了，每天没有办法，只好蹲在这鸽子笼里。唉，讲起来，鸽子笼也比我们这草棚棚强，它四面透风，空气多好呀，我们这草棚棚到了冬天夜里的风就大了，夏天你要风没有风。夜里好容易睡觉了，不要风，它来

了，老是打你的门，钻进草棚棚里来，到处乱跑，冻得你睡不着觉。下起雨来，更糟糕，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在下，下得草棚棚里简直就像一条小河似的。”

“今天晚上好了，我都糊上了。”汤阿英显然对奶奶那种怨天尤人的态度不满意。

“你只是糊了糊墙壁，还有屋顶呢？就是墙壁，谁晓得能顶几天呢？”奶奶也不满意，说，“我苦了一辈子，这穷日子过惯了，顶得住，不要紧。巧珠，年纪小就怕她吃不消……”

“屋顶下礼拜我再收拾。”汤阿英说。

“奶奶，不要愁，”张小玲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印把子抓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跟毛主席闹革命，好好生产，好日子就要来了。目前我们生活不好，是国民党反动派害的，他们把我们的血汗刮去享受，让我们吃苦。反动派垮了，现在我们工人当家，物价稳定了，不闹饥荒了。现在比从前好多了。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工人好好生产，农民好好种田，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汤阿英听张小玲这一番话，顿时想起爹和弟弟阿贵在乡下分到了两亩八分田，两个人种地，再也不受朱半天压迫，生活确是好了。她贴补无锡家用的钱因此少了。她在上海的日子也比过去好了。更叫她高

兴的是爹在万人群众大会上把朱半天祖宗八代的罪恶连根挖出来了，朱半天给抓了起来。听到这消息，真叫人心里舒畅。她脸上忍不住露出喜悦的表情，说：

“你说的倒也是的，无锡家里搬掉封建石头，分了田，收成不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奶奶不同意张小玲的话，当然，也不赞成儿媳妇的话，冷冷地说：

“农民分了田，许或好点，工人可不见得。”

汤阿英不同意说：

“我们比过去好多了。……”

奶奶打断她的话，质问道：

“好啥？”她瞪了阿英一眼，不满地说，“我们还是住在这个草棚棚里，不是风呀就是雨的。”

“奶奶，不要急，慢慢来，”张小玲从旁解释道，“听说斯大林领导苏联很好，工人都住洋房，有的还坐汽车呢。”

“你说，小玲，”奶奶关心地问，“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么，中国啥辰光可以像苏联呢？”

“要一步步来。现在志愿军在朝鲜抵住美国鬼子，让我们国内建设。生产提高了，我们工人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听说政府在设法先给我们工人盖

些房子，大家搬进去住，比这个草棚棚好多了。”

“政府想给工人盖房子？”奶奶惊奇的眼光望着张小玲，从心里高兴起来，充满了希望地问道，“我们也可以住进去吗？……”

“盖房子就是给工人住的，”汤阿英打断奶奶的话，说，“不过，盖好了房子，也要分批分配，不会大家同时都住进去。我们是私营厂，比国营厂大概要靠后一些。”

“大家迟早都有份的。”张小玲补充了一句说。

“好不好托人活动活动呢？小玲。”奶奶仍然想念着。

“奶奶，现在不时兴那一套了。盖好了房子不好随便活动。要听组织上分配哩。”

奶奶听了这话，一下子冷了半截：“啊！”她把锅里的冷饭团子用锅铲弄弄碎，失望地看着炉子里不很旺盛的火焰。

汤阿英感到张小玲说的这些消息都很新鲜，关怀地问：

“小玲，你连苏联的工人生活都了解，从啥地方听来的？靠得住吗？”

“怎么靠不住？我还会在你面前造谣吗？”

“不是这么说，”汤阿英摇摇手，更正道，“我是说，我为啥不晓得呢？”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多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懂的事体就多。”

“以后有啥政治活动，你通知我好了。”

“今天就是来请你参加团日活动，去听报告的，去吧。”张小玲的手轻轻摸一摸巧珠的后脑勺，暗示她妈妈去也可以带她去。巧珠会意地低着头，不言语。

“参加团日活动？”汤阿英心中暗暗问自己：要我参加团日活动吗？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希望抬头了。她长久以来就十分羡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虽然她的文化程度还不能完全看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章，但是要张学海讲给她听，她听了一遍还要再听，直到把团章的基本内容记住了，才没让张学海讲下去。她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青年团，为祖国的革命事业积极奋斗，为人民服务。有两次碰到张小玲，想提出参加青年团的要求，话已经到了嘴边，又缩回去了。她问自己：够条件吗？张小玲会同意吗？她怕碰钉子，犹犹豫豫地没有住下说，但是她要求入团的志愿却始终埋藏在内心深处，坚定不移。她想即使现在不够条件，也要争取将来够条件；要是有一天能够被批准入团，她一定要努力工作，认真学习，再争取参加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当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解放

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她的豪迈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起，只是偶尔向秦妈妈有所流露，但也是半吞半吐，羞羞答答，怕别人讪笑：连个青年团员还不是哩，就想入党了。现在张小玲一提起请她参加团日活动，她的那对明澈见底的眼睛便闪射出希望的光芒，但是她嘴上却含羞地说：

“我也不是团员，可以参加团日活动吗？”

“可以。”

“我够条件吗？”汤阿英鼓起勇气说，但讲的很含糊。

张小玲以为汤阿英问参加团日活动够不够条件，她不假思索地说道：

“够！”

“真的够吗？”汤阿英以为张小玲懂得她指的要求入团够不够条件，但还是有些顾虑，便退一步说，“我入团怕不够条件吧？”

张小玲了解她的意思了，内疚地说：

“为啥不够？你到现在还不是青年团员，这件事体，我有责任，……”

“哪能是你的责任？”汤阿英不了解地说，“是我不够条件，争取的也不够……”

“不，是我的责任，过去对你帮助和培养都不够，

我脑袋瓜子有毛病，保守思想作祟……”张小玲诚挚地检查自己，看看时间不早，便说，“入团的事，我要和你好好谈一次。现在先去参加团的活动，今天我们请人来讲志愿军的故事，还请人来教唱歌。我们请了厂里许多青年工人参加，比过去闹猛，也比过去有意思……”

张小玲说着说着，忍不住自己唱了起来，先是低低的，后来嗓子放高了，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一边唱，一边望了巧珠一眼，对汤阿英说，“快点收拾一下，就走！”

汤阿英内心充满了喜悦的情绪，恨不得拔起脚来跟张小玲就走，但想起还没吃早饭，家里没有收拾，床上的那两件蓝色的脏罩衣，也没有洗，不能把家里的事扔下给巧珠奶奶不管，又不能不按时去参加团日，有点发愁，皱着乌黑的眉头，说：

“家里的事怎么办呢？”

张小玲用搜索的眼光在草棚棚里寻找家里有啥事体要做。奶奶做好了早饭，装了四碗，端出一碟子的蒸咸鱼，要张小玲一道吃。张小玲说是吃过了。她端了一碗稀饭，夹了一小块蒸咸鱼放在上面叫巧珠吃。她的眼光巡视到床上，看见那两件蓝色的脏罩衣了，便问：

“这两件衣服要洗嘍？”

汤阿英“唔”了一声。

“那好办，”张小玲站了起来，说，“你们吃饭，我来替你洗。洗好了，我们一道去。”

“不要，”汤阿英用筷子在空中一点，想阻止她。

张小玲快手快脚，哪里阻止的了，她过去一把抓起那两件蓝色的脏罩衣，放在床边的一个小木盆里，舀了两瓢水把它泡了起来。汤阿英急的站了起来，一边吐着咸鱼的刺儿，一边说：

“等我来洗，……”

“我活了这么大，洗衣服还不会？”张小玲在草棚棚里找到一块肥皂，也不怕水凉，端到门口使劲地揉呀搓的。等到她们吃好了饭，把家具收拾掉，汤阿英出来张望，张小玲已经把两件罩衣洗好，挂在门口的一根短的竹竿上，远远望去仿佛是两面蓝色的旗子，在初冬的潮湿的寒风中飘荡着。

张小玲倒了洗衣水，擦干了手，对汤阿英说：

“还有啥事体？”

汤阿英见奶奶坐在一旁，没有吭气，她不好拍拍屁股就走，正在左右为难，张学海从草棚棚外边走了进来。张小玲看出汤阿英的心事，趁这个机会迎上去说：

“家里的事，交给学海办吧。”

张学海摸不着头脑。他的眼光向草棚里一扫，也

还是不了解。他望着张小玲。张小玲看出他眼光的意思，就告诉他要约汤阿英去参加团日活动，问他：

“你同意吗？”

张学海随口答道：

“参加团日活动是好事，当然同意。”

“不拖阿英的后腿？”张小玲调皮地又问了一句。

张学海反攻她一句：

“我也不是妇女，不会拖后腿的。”

张小玲有意把脸一板，一本正经地说：

“你这个话不对头，解放以后的妇女和从前不同了，同样要为人民服务，谁也不会拖后腿的。”

“是呀，”汤阿英支持张小玲。她说，“我从来也没拖过学海的后腿。”

张学海发觉自己刚才说法不妥当，不再去和张小玲争辩，接上去只是说：

“我也没有拖过阿英的后腿，她要到啥地方都行。”

“走吧，阿英姐。”张小玲的眼光转到张学海的身上，说，“今天留你在家里料理，好啵？”

学海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

“老婆去参加团日活动，丈夫留在家里收拾屋子，妙得很。”

“这有啥不可以？”

“可以，可以。”

奶奶反对汤阿英出去开会参加活动啥的，但学海答应了，她就忍不住责问道：“礼拜天自己去开会，真的把学海留在家里？”

“娘，让她去吧，我今天没事，待在家里也好。”张学海说。

“这个世道真是大变了。”

奶奶说了这句话，无可奈何地深深叹息了一声。她心里是完全不同意汤阿英出去，可是张小玲亲自来找她，学海又当面答应了，她不好再说。

张小玲想起还有巧珠。她向巧珠拉手：

“走吧。”

巧珠像是一只轻捷的小燕子，飞也似的扑到张小玲的面前。她的心已飞到门外去了，希望马上就走。汤阿英过去一把把她拉过去，板着面孔说：

“我去参加团日活动，家里没人，你不能再去。你在家陪奶奶。”

巧珠嘟着小嘴：“我不。”

她的滴溜圆的小眼睛抬起来望着张小玲，祈求张阿姨帮她说句话。张阿姨真的代她请求：

“带去也没关系。”

“不，她留在家里，陪奶奶。”

“让她去吧，”奶奶也帮她说，“今天没啥事了，

有事，我自己做。”

“不准去。”

张小玲深知汤阿英的脾气，说出了的话绝不改变，她不好再坚持，安慰巧珠道：

“下次阿姨带你去。”

巧珠失望地低下头来，两只小手交叉在自己胸前，不满地摸来摸去。她的眼睛发红，眼眶有点润湿了。学海走上来拉她过去，亲了亲她的额头，说：

“团日活动是大人的事，没啥好白相。你和奶奶在家里白相，让她们去吧。”

她的小眼睛羡慕地望着妈妈和张阿姨走出了草棚棚，没走两步，妈妈忽然又回来了，她以为是来带她去的。可是妈妈没理她，径直走到爸爸面前，嘱咐道：

“爹的信复了没有？”

“没有，”张学海摇摇头，故意和她开玩笑，说，“我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担，哪能写法呀？”

“你不是上了夜校，认识了很多字，连封信也不会写？”

张学海有意逗她：

“你呢？为啥不写？”

“我才是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担。”汤阿英不好意思地说。

“上夜校呀！”

“等我上好夜校再复信，要等到哪一年呀？”

“反正没啥大不了的事，迟点复也没关系。”

汤阿英听他的话讲的不对头，便站下来，认真地说：

“你这是啥意思？”

张小玲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抬杠，连忙赶了回来劝解。张学海见汤阿英那股认真劲，更进一步逗她：

“我和他也没见过面，这个信哪能写法啊？”

汤阿英反问他：

“没有见面，就不能写信？”

张小玲从张学海嘴角上的微笑里察觉出他是在和她开玩笑，便指着张学海说：

“没有见面，当然可以写信，女婿给丈人写信，更是应该。今天是厂礼拜，阿英出去参加团日活动，分配你在家里料理家务、带孩子、写信。”张小玲不管张学海答应不答应，拉着汤阿英的手，得意地说，“走！”

张学海望着她们两人慢慢远去的背影，讽刺地说：

“这倒新鲜，女的出去开会，男的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写信，——妇女真是解放了！”

53

梅佐贤从陶阿毛那里知道工会方面要组织重点试纺，情绪很紧张，立刻报告了徐总经理。徐总经理却一点也不紧张，冷静地想了想，决定找韩云程他们到总经理室来商量商量，研究应付这个棘手的事体。

上午九点，梅佐贤第一个来了，接着郭鹏和勇复基也来了，只是韩云程没来。在讨论技术问题上，没有韩云程参加是谈不成的。徐总经理虽然有点焦急，但也没有法子，非等不可。趁着这个空隙，他想起上次梅佐贤出席税务分局召开的座谈会，事后梅佐贤因为忙，只是简单地给他说了一声。他想了解一下比较详细的情形。梅佐贤向他报告道：

“总经理，那次座谈会是区委统战部杨部长主持的。杨部长很有经验，很有魄力，办起事来很稳。他首先说明政策，打破我们的顾虑。他说凡是自动坦白交代的，可以减罪，或者免罪；不坦白的，查出来，除了要赔偿国家所受的损失以外，还要从严处罚。为了协助人民政府彻底清理内部，转变社会风气，进行思想改造，要我们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坦白和检举

各种不法行为。开头，没有人讲，谁也不言语。”

“那是呀，”郭鹏说，“公家人谁敢去得罪，弄的不好，连累到自己的身上。”

“要我们做这些事体，确是不容易。”勇复基同意郭鹏的看法。

“不见得，”徐总经理摇摇头，说，“共产党啥事体都做得出，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都能做到。我听马慕韩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这个话确实有点道理。你不讲，共产党一定有办法叫你讲的啊。”

“总经理高见，共产党的确是这样。我也感觉到他们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啥困难的事体，他们都有办法。比方这次座谈会吧，杨部长看大家不肯说，他宣布休息十分钟，找了几个商人进去个别谈话。再开会的辰光，有人讲了。这么一带头，啊哟，我们垮了，每一个人都讲了。”

“是吧？”徐总经理凝神地听，说，“不讲，他们不会散会的。”

“大家都讲了。杨部长问到我，我不能不讲……”

梅佐贤说到这里，有意停了停，看看大家的脸色，窥探一下总经理的动静。当然，这是为了表现他的才能，希望讨得徐总经理的欢心。郭鹏和勇复基都

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在听。尤其是勇复基，他把耳朵冲着梅佐贤，生怕漏掉一句半句的。梅佐贤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我不能全讲。”他发现徐总经理瞪了他一眼，那意思说：你不能在郭鹏和勇复基跟前把沪江纱厂的底盘全部托出来。他领会了这意思，马上很自然地改了口，“我们沪江纱厂也没有啥好讲的。我只是讲我曾经送过方宇一只马凡陀的金表。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说不上行贿，也谈不到贪污，更和沪江纱厂没有关系。朋友之间，互相送点礼物，是常有的事。假如说，这样送礼物不好，我以后不送好了。杨部长听我坦白了，鼓励我几句。”

“那算是过了关啦。”郭鹏松了一口气，眼睛里露出钦佩梅厂长应付的才能。

“总算过了关，我可捏了一把汗。”

“就是这样完了吗？”勇复基关心地问，他怀疑关过得这么容易。

“完了？当然很难讲。”梅佐贤的脸上露出了难色。他想起杨部长最后的几句话，说，“杨部长最后留了一个尾巴，他说会上不可能把全部材料提供出来，以后还可以个别继续坦白和检举。”

勇复基这一阵子一听到“坦白”和“检举”的字样就心慌，他面孔有点发白，急着问：

“还要去坦白吗？梅厂长。”

“那倒不一定，主要看各人的应付了。沪江纱厂没有啥材料，也就不需要去坦白了。”

徐总经理立刻接过去说：

“自然不需要再去坦白啥了。共产党注重证据，没有材料，你不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徐总经理用他那老有经验的眼睛向郭鹏和勇复基扫了一下，想从他们的表情上来判断他们懂不懂这几句话的意思，同时，也希望窥探出他们遇到紧要的关头会不会坦白。

勇复基给徐总经理的眼光望得低下头去。郭鹏没有低头，也没有说啥，只是对徐总经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徐总经理见郭鹏的表情，稍为放心一点。他想起了方宇，忧虑像是一片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对梅佐贤说：

“最近怎么老见不到方驻厂员？”

梅佐贤应道：

“税务分局关起门来进行三反，你到啥地方去见方宇？打电话不接，上门去找，都说是在开会，给你一个不照面。”

徐总理想起通过梅佐贤和方宇的往还，在座谈会上梅佐贤虽然没说，可是方宇在税务分局里谈没有谈呢？他最关心的是这一点。他心头上的乌云越

发聚集得多而且厚了。他这一阵心头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老是宁静不下来。他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便问梅佐贤：

“韩工程师为啥还不来？”

“噢，”梅佐贤好像才发现似的，说，“为啥还不来？他是很守时的，别出了事？”

“打电话催他一下。”徐义德说。

“对。”

“我们看报等他。”

梅佐贤到隔壁房间叫人打电话，顺便去拿报纸。他回来说：

“没有报。”

根据过去的经验：凡是《解放日报》迟出版，那就意味着有啥大事发生。徐总经理见九点半钟《解放日报》还没有来，一定有啥大事，更使他想早点看到报。他对郭鹏说：

“你到传达室问一声，《解放日报》送来了没有？一到，就叫他们送来。”

“好。”

郭鹏刚应了一声，还没有站起来，梅佐贤却抢先走过去，一边说：

“我去看。”

梅佐贤打开门跑出去，却和迎面来的人撞了一

个满怀。他站下，抬起头来一看，来的是韩云程工程师。韩工程师见他那么匆忙，以为是发生了啥意外的事体，拦住他的去路，问：

“忙着到啥地方去？出了啥事体？”

“没啥，”他定了定神，说，“《解放日报》到现在还没有出版，我想到传达室问去。”

“《解放日报》吗？”韩工程师举起左手，把手里的报纸一扬，说，“这里有。”

“有啥大消息吗？”梅厂长急着问。

“有。”

“我看看。”梅厂长想先看看标题，好报告徐总经理。

韩工程师左手紧抓着报纸不放，说：

“进来一道看吧。”

徐总经理一见韩工程师，劈口就问：

“为啥现在才来？你一向守时的。”

“为了等《解放日报》，等到九点钟还没有看到，我就来了。这一次是迟到了。”

“标准钟有时也不标准了。”徐总经理笑着说。厂里的人因为韩工程师守时出名，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开会从不迟到早退，平常生活也非常有规律。他的生活如同一座标准钟，人们看他做啥事，就晓得啥辰光。这一次迟到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

“报纸没送到，我在路上可买到了一张，你看——”他把《解放日报》平摊在徐总经理的面前。触目惊心的头条新闻跳进徐总经理的眼帘：

为进一步展开“三反”斗争

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党员干部大会

聂恒裕吴执中等四人思想恶劣阻碍“三反”被撤职

徐总经理不管韩工程师和梅厂长他们也要看这条新闻，他低着头，几乎把报纸遮去了一大半，贪婪地看着，恨不得一口把整个新闻都吞下去。他用手指着一行行的字，一边看一边低低地念着：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市委决定并经华东局批准，将四个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和作风上一贯恶劣的共产党员予以撤职的处分，并令其作深刻的反省，以便视其反省和改悔的程度，决定最后的处理办法。同时，又对四个品质极恶劣的，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条件的坏分子，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市委委员兼秘书长聂恒裕，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虽经一再教育与帮助，

仍然没有改进，在上海两年多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家长式的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福，妨碍了市委的正常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又缺乏严肃认真的检讨，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徐总经理看完了这条新闻，若有所失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两只眼睛像是突然失去了光彩，盯着门上毛玻璃总经理室四个字发愣，许久没有吭气。他想自己还能在这间房子坐多久。

大家都看完了那条消息。他们见徐总经理那股神情，于是都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言语。勇复基感到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叹气都有点困难的样子。他避开徐总经理的视线，暗暗看着梅厂长。他知道梅厂长在任何场合都有办法的。

果然是梅厂长打破了沉默：

“共产党的手段真厉害，铁面无私，对党员的错误不留情，不论地位高低，阻碍三反运动的，就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

“像聂恒裕这样的老干部都要撤职，这，这……”勇复基不敢正面对着《解放日报》，他觉得这张报纸有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正气，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气和权力形成了一种看不见但感觉到

的令人胆寒的压力。聂恒裕这些人撤职的消息像是一阵暴风雨，打击着勇复基脆弱的心，给他带来了恐惧。他好像预知明天自己将要被撤职似的担忧着，连讲了两个“这”字以后，说不下去了。等了一会，他才接上去说，“这实在太可怕了。当了中共市委的秘书长，地位可不低了呀！哪能也……”下面“撤职了”三个字没讲出来。言外之意是说在党里做事，地位再高也不保险。他惋惜地连喷了两声。

“你不晓得，人家还当过省政府的主席哩！”梅佐贤对勇复基说。

勇复基“啊”了一声，没有吭气，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韩工程师今天买了《解放日报》大致看了一下，走进总经理室又详细看了一遍。他听到梅厂长高谈阔论，没有注意到徐总经理在想心思，兴奋地说：

“今天的政府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凡是不利于人民的事就不许做，也不许存在。大干部犯错误也照样撤下来，一点不包庇，真不含糊。老实讲，以前我以为三反运动是假的。不过是杀鸡吓猴子，做给别人看的；五反运动才是真的。现在看来，‘三反’也是真的。市委这个决定叫人不能不服帖，现在看来，做个共产党员真不容易。”他钦佩地点点头。

“服帖是服帖”郭鹏说，“这样做也太辣手哪。”

“就要这样大公无私、严肃、认真才行。听说吴执中税务方面很熟悉，这次也撤职，这说明一个问题：单纯依靠技术是不行的，还要提高政治认识。我们技术人员过去对政治认识实在太差了。……”

“现在办事没有政治不行，”梅佐贤打断他的话，“不光是你们技术人员，就是我们办厂的，也离不了政治。给共产党打交道更要政治。”

“从今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可以把国家的事办好，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韩工程师的眼光里露出喜悦的光芒，他向室内的人巡视了一下，发现徐总经理的眼光盯着门上，板着面孔，忧虑重重。

徐总经理把眼光移到韩工程师的身上，说：

“中国的前途当然是光明的，我们的前途呢？他们党内的‘三反’对自己人都这么厉害，想想对付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会哪能？‘三反’是个活榜样，做给‘五反’看的。”

徐总经理这两个问题像是一片阴影，掠上每一个人的心头。连韩工程师脸上的兴奋的光彩也消逝了。他一时找不出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现在回复到他在学校里算数学的情景：他的嘴紧紧咬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陷入沉思里，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梅佐贤知道刚才总经理不言语的原因了。他感到

室内的空气太紧张。他在动脑筋，想转变这个气氛。

徐总经理把桌上的报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下，仿佛不信任刚才的消息，现在再来证实。白纸黑字，无可怀疑。徐总经理从今天的报纸看出五反运动一定比“三反”凶猛，尤其是职工参加五反运动以后，其势更加凶猛，有一种雷霆万钧锐不可当的气概。可是，五反运动密云不雨，令人莫测高深。徐总经理忐忑不安了，他对着《解放日报》自言自语地说：

“中共地位这么高的干部撤职了，中共这样老的干部开除党籍了，我们工商界做人更难了。唉，五反运动为啥还不正式展开呢？展开吧，展开吧，快点展开吧，越快越好！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受不了……”

他后悔留在上海，不然，也不必操这份心了。现在去香港吧，可是又放不下这份产业，真叫他进退为难。

梅佐贤看总经理忧虑重重，唉声叹气，他想把总经理的思路引到重点试纺上，来缓和一下这紧张的空气。他堆下笑容，走到总经理面前，弯下腰去，说：

“总经理，人到齐了，谈谈重点试纺问题吧。”

他没有走开，站在办公桌前面，睨视着徐总经理的表情。徐总经理没有吭声，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还在焦虑着“五反”问题。重点试纺和“五反”一比，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了。梅佐贤见他没答复，又试探地

说：

“五反运动也没有啥，将来再谈吧。今天先解决重点试纺的问题。”

韩工程师接上去说：

“我材料准备好了，”韩工程师拿过皮包，问，“要不要现在谈？总经理。”

徐总经理没有心思谈这个，他的思想像是一堆乱麻。他甚至感到韩工程师他们在那里都有点讨厌。他对啥人也看不顺眼。无精打采地说：

“重点试纺问题，改一天再谈吧。”

梅佐贤担心地接近徐义德说：

“总经理，重点试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试纺成功了，次泾阳问题一暴露，那事体可大哪！会影响整个厂……”

郭鹏圆睁着两只眼睛惊惶地说：

“这笔帐倒算起来，我们厂吃不消！”

“要垮？”勇复基问。

徐义德代郭鹏回答了勇复基。

“差不多。”徐义德默默想了一阵，焦虑地说，“那么，就今天谈吧。”

等了一会儿，徐义德又补充一句：

“你们先考虑考虑，让我安静一下，再谈。”

54

信通银行经理金懋廉和潘信诚坐在大沙发上，低声谈论目前金融界令人焦虑的情况。柳惠光坐在隔壁一张沙发上，听他们谈的很起劲，伸头凑过去凝神地谛听。一会，江菊霞悄悄地从大红厚地毯上走过来，干脆坐在金懋廉旁边，托着腮巴子侧耳细听。她背后墙角落那边有架落地大钟。

冯永祥见大家忽然都聚拢到金懋廉那儿去，他惊奇地大声问道：

“懋廉兄，在谈啥机密的事体，怕我冯永祥晓得吗？”

金懋廉说：

“有啥机密的事体能够瞒住阿永？我们在随便聊天。”

“那大声谈谈，让我们也听听不好吗？”冯永祥的眼光向客厅里一扫，征求大家的意见，“各位同意吗？”

徐义德说：“同意。”

“同意，同意。”这是唐仲笙的声音，他坐在上面

的一张沙发角上，因为他太矮小，不是他大声讲话，人家几乎看不见他，还以为他今天没有来哩。

大家都同意。

金懋廉咳了两声，打扫一下嗓子，大声地说道：

“刚才谈起最近银根还是紧，暗息每元月息九分，屹立不动。各个行庄存款逐日递减百分之一、二，业务清淡，到现在还没开始放款。厂商向行庄借的款子，十之八九无力归还，大部分申请展期，有的甚至到期应该付的利息也拿不出。就拿我们行里来讲，前天一天只收回一笔洋商借款。退票的事情天天发生，而且是越来越多，家家如此，昨天一天的退票，占交换票据总数十分之一以上，金钞银元都占原盘，华股下跌，趋势恶化，现在市面上金钞黄牛已经逃避一空，你到市面上再也找不到了。”

金懋廉说到这里，想起解放以前投机倒把的黄金时代。一进一出就是多少个亿，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越来越清淡，他不禁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柳惠光以为他是同情工商界，焦虑地问他：

“是啥原因呢？”

大家的眼光集中在金懋廉的身上，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希望他详细地谈一谈。金懋廉端起大沙发旁边的一杯浓咖啡喝了两口，眉头一棱，想了一下，说：

“主要是因为五反运动，客帮呆滞不动，私营工商业形成半瘫痪状态；商品市场交易萎缩，一般厂商客户资金呆滞，周转失灵；‘五反’运动展开以后，工商界都连忙提款补税。所以各行庄存款逐日递减。”

冯永祥听出了神，认为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怪不得那些人围到金懋廉面前听他讲呢，他很关心地问：

“华股为啥下跌？”

“华股下跌的原因是因为客户都想抛出，减价趋降，但是，都没有成交。”金懋廉说，声调里充满了羡慕，“最近中国银行可大忙特忙……”

潘宏福惊奇地“啊”了一声。

“最近到中国银行兑售金钞的一天比一天多，天不亮就排队等候了。听说这两天的兑换量比过去增加了三四倍。”金懋廉解释地说。“也是因为银根紧，要补税，没有办法，只好卖金钞。”

冯永祥赞叹地说：

“银行界真不愧是工商界的中枢神经，工商界有点风吹草动，我们懋廉兄早就晓得了。”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金懋廉苦笑了一声，语气里流露出一点不满的情绪，说，“现在中枢神经是人民银行，我们顶多也不过是神经末梢罢了。我们的黄金时代早过去哪。”他又想起解放前投机倒把的上

海市场。

“人民银行应该是中枢神经，它是国家银行啊。”马慕韩不满意金懋廉的牢骚，说，“如果私营行庄成为中枢神经，那还算个什么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私营行庄够得上算是神经末梢，我看已经不错了哩。”

金懋廉察觉自己讲话滑了边，最近工商界朋友情绪都很紧张，讲话十分小心。他懒得争辩，连忙收回来，把话题引伸开去：

“那是的，我们有现在的地位也算不错哩。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对。真正工商界的情况，在座各位其实都比我清楚。我倒愿意听听各位的高见。”

“拿我们卷烟业来讲，我同意你的看法。”唐仲笙站起来，走到金懋廉身旁说，“懋廉兄，过去我们卷烟业每月有一百五十亿的营业，现在一个月只做三十亿营业。全业银行负债就有四十亿。我们东华厂过去每月最高生产量是八千五百箱，现在一月份只生产二千箱，二月份连一千箱也不到，只有九百八十四箱。你说怎么维持？客帮呆滞不动，香烟销路差，各厂纷纷停工。最近许多小厂要关门。有一个厂的存货，照目前的销路，可以销一个月。因此，想停工。职工却不答应，又怕触犯军管会的命令。现在各业营业清淡，百货公司减少收购量，银行押汇不开放，老

债又逼着要还，大家都喊吃不消。现在比较好的，恐怕要算棉纺业和复制业了，是不是？信老。”

信老没有回答，望了潘宏福一眼，想叫他说，一想，在座不少前辈，行情也熟，不如听听别人的好。他的眼睛转到徐义德身上，说：

“这个吗，最好请教我们的铁算盘，他的行情熟。”

“晓得的也不多，信老要我讲，我就讲一点。”徐义德向潘信诚点点头，把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拘谨地说，“各行有各行的困难，棉纺业也不好，复制业更差，针织业去年十二月份的营业额超过三百亿，二月份连一百亿也不到。毛巾被毯业二月份销量和去年同月相比，毛巾销量减少百分之四十五，被毯竟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你说这个生意哪能做？懋廉兄，我是同意你的意见的。信老，我说的不对，请你指正。”

“铁算盘说的话没一个错。”潘信诚用眼角向马慕韩斜视了一下。他现在凡是有马慕韩在的场合说话比过去更加小心，一方面因为后生可畏，马慕韩看问题确实比一般工商界高明些；另一方面马慕韩并不把潘信诚放在眼里，有时候当面顶得潘信诚下不了台；更重要的是马慕韩经常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会议，和共产党与政府方面的人接触的机会比他多。他不能不防他一手，别把潘

信诚私下说的话漏给共产党与政府方面的人知道。他称赞了徐义德以后，有点不放心，加了一句，“最近这方面的详细情形我很不了然。”

柳惠光听了金懋廉、唐仲笙的谈话，他一直在摇头，等到徐义德说完，他忍不住唉声叹气了，皱起眉头，嘴里不断地发出啧啧的声音，哭丧着脸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目前我们西药业虽然还没有啥，但不久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西药业的，一定会影响到利华的。这，这，这怎么得了啊！”

马慕韩果然不出潘信诚所料，他不同意徐义德的意见，甚至连金懋廉的看法，也需要修正。他等到大家发言差不多了，自己反复思考，再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衬托出马慕韩是高人一等的。他说：

“德公的看法不全面……”

潘信诚不等马慕韩说下去，他连忙插上来，生怕马慕韩说徐义德捎带讲他几句。他自己先站稳了要紧。他说：

“对，看问题要全面的看，要从各方面看，义德的看法是可以多考虑考虑的。”

马慕韩等潘信诚说完，接下去讲：

“比方说棉纺业吧，凭良心讲，我们的生产是正常的，没有受到五反运动的影响，花纱布公司不管三反运动进行得哪能厉害，都照顾我们。从这里看出了

一个问题，凡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工商业，生产经营就有保证。我们棉纺业生产正常，就是因为给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别的行业不是这样，完全靠自己、靠客帮、靠市场，当然就不同了。目前工商界营业清淡，我看只是暂时的情形，工人农民需要日用品，这一点是肯定的。人民的购买力比过去提高，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我们有货色，还怕卖不出去吗？”他转过来说对金懋廉说，“我对你刚才的看法，基本同意，不过还要补充两点，不晓得对不对？”

他等候金懋廉表示态度。金懋廉说：

“别说两点，三点也很欢迎。我今天没有准备，只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请慕韩兄多多指教。”

“我认为‘三反’也是一个原因，别说国营公司减少收购量，就是许多国家机关因为反贪污、反浪费，买东西也大大减少了。这千把万人的购买力也是很可观。”说到这儿，马慕韩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可是整个客厅的人都听得很清晰。他说，“关起门来，说句良心话，这些情形也是我们造成的，别的不说，单讲提款补税一项，给国家纳税是工商界天经地义的事吧，如果我们过去按期如数缴纳，不拖欠，就不会搁到现在去补税了。总之，目前有些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乐观的。”

潘信诚有意捧马慕韩一句：

“慕韩老弟看问题究竟是比较全面。”借此暗中收回“铁算盘说的话没一个错”那一句。

徐义德不同意，可是理由不多，他就从侧面来反驳：

“不管怎么样，目前工商界有困难总是事实，前途虽然可以乐观，可是这难关过不去，前途也就没有了。”

“是呀，是呀，”柳惠光的眉头越皱越深，两道眉毛几乎要变成一道了，忧虑地说，“这实在是困难，这实在是困难。怎么得了呀。”

“有困难得想办法，单是悲观也没有用。”马慕韩一棒子打在徐义德和柳惠光两人的身上。本来马慕韩并不预备打柳惠光这一下的，他认为柳惠光根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柳惠光讲的话自然也微不足道了。这回是凑巧，柳惠光自己送上门来挨打的。

“自己没有困难，不晓得有困难的人的苦处。”徐义德挨了这一棒，并没有低下头去。他昂起头来，望着马慕韩，冷冷地说，“慕韩兄办法多，比我们又进步，倒请你指教指教。”

冯永祥见马慕韩和徐义德顶了起来，他连忙嘻嘻哈哈地插上来：

“你们两位为啥又顶牛了？啊哟，真伤脑筋。听你们讲话，我这个身体吃不消，天天吃人参也来不及

补。有话，心平气和地讲，行不行，两位老兄。”

潘信诚开口了：

“工商界有困难，大家想办法，不要分你呀我的。”

“此话极是。”这是金懋廉的声音，他知道信通银行和工商界脉脉相关，工商界有困难，信通也好不了。

徐义德经冯永祥这么一点，倒有点不好意思。他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得罪马慕韩的，于是退了一步，自己走下台阶，说：

“那么，大家想办法吧。”

客厅里立刻静了下来，面面相觑，每一个人都好像从对方的脸上可以找到什么奇妙的办法似的，看了很久，谁也不言语。唐仲笙一直站在金懋廉旁边，给他背后的壁灯把自己矮小的影子映在大红的厚地毯上。只有他一个人低着头，注意自己的影子在出神地想。

“怎么，要大家想办法，倒反而没有办法哪？”江菊霞坐在金懋廉旁边，望沙发外面移动了一下，使自己身子突出，好像这样可以引起大家注意听她的意见。她的嗓音很尖，轻轻地说，“智多星，江郎才尽了吗？”

“对，”冯永祥站了起来，说，“请我们仲笙兄发

表发表高见。”

“欢迎，欢迎。”潘宏福不禁鼓了两下掌。

“高见不敢当，”唐仲笙走到客厅中间，站在大红的厚地毯上，像是发表演讲似的，举起右手来说，“照我看，目前的困难，工商界自己解决不了，正像一九五〇年‘二·六’轰炸那样，国民党反动派用美国飞机炸了上海，工商界也形成了半瘫痪状态，靠政府才救活了工商界。这次么，我认为除了政府出来，拉我们工商界一把，没有别的办法。”

徐义德听完唐仲笙的话，立刻想起了“二·六”轰炸那年沪江纱厂的狼狈不堪的情况：停电断水，原料缺乏，市场困难，头寸短少，真是寸步难行。他整天皱着眉头，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当时他已经下了决心，准备疏散关厂。幸亏政府伸出手来援助：华东纺管局、花纱布公司和工商局给困难厂出了主意，替政府加工订货，维持困难厂生产。一件纱花纱布公司配给四百十斤用棉，另外给二百零五个折实单位的工缴费。当时市场“花贵纱贱”，花纱布公司给私营厂代纺一件纱，足足要赔五十九斤花的老本。沪江从自纺改成代纺，给政府加工订货，解决了原料缺乏的困难；头寸短少，人民银行又给贷了款。经过人民政府这样大力帮助，沪江才算度过了难关，维持下来。但他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现在

政府想捞一票，会帮工商界的忙吗？当然不会。他摇摇头说：

“怕没那么容易吧？”

马慕韩不赞成徐义德的意见，反问道：

“你说，政府看我们垮下去吗？”

“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望了唐仲笙一眼，说，“现在和‘二·六’轰炸不同……”

唐仲笙也不同意徐义德的意见：

“目前工商界困难情况，我们应该向有关方面反映反映。人民政府只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我看，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人民政府决不会看我们工商界这样垮下去的。”

潘信诚对唐仲笙伸出大拇指来，说：

“真不愧是智多星，好，好。”

“只要政府肯帮忙，有人去反映，我也不反对……”徐义德说。

“谁去反映呢？”江菊霞望望四周坐在沙发上的大老板们。

“这倒是个问题，”冯永祥大叫一声。他一向自命为是人民政府和工商界之间的一个唯一的桥梁，在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面前他代表工商界；在工商界面前他又常把人民政府首长的话复述一遍，似乎他也可以代表一点人民政府的意见。有时他大言不惭地

称自己是半官方，其实他倒是真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否则，就丧失了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地位。最尴尬的是他出席人民政府或者是协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政府首长和工商界代表面对面协商问题，他既不能吹牛代表政府方面某某人说点意见，更不好代表工商界说话，因为真正工商界代表就在会场上啊。这时，他总是沉默不言，但一进会场必须在工商界朋友注意之下设法和政府首长拉拉手打打招呼，然后向会场上所有的工商界朋友点点头，微微一笑。这一方面表示自己 and 人民政府首长接近，另一方面也暗示告诉人民政府的首长，这些工商界朋友他完全熟悉。他衷心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由他向人民政府方面去反映，但又不好自己推荐，就故意夸大这个问题，用大声讲话来引起大家对他的注意，求得有人推他去。他说，“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反映，不然，又会有人说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叫嚣了。”

潘信诚识破他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

“这次非阿永去反映不行。”

冯永祥走前一步，双手直摇，笑着说：

“我不行，我不行。这个问题很大，非信老亲自出马不可。”

他知道伟大的三反运动在轰轰烈烈展开，老于世故的潘信诚是不肯为别人的事体出头的。特地有

意向他身上推，他不肯去，自然是落到冯永祥的身上了。潘信诚果然不答应，他说：

“我最近不大出来走动，找政府首长反映这个问题，有点唐突，很不自然，何况各行各业的困难情况我也不熟悉。这次反映要能解决问题，关系我们工商界太大了，我看还是阿永去吧。”

“我爸爸近来身体不好，很少出来开会。今天他本来不想来的，我厂里也有事。因为他们再三请他来，他才勉强答应。我放下厂里的事，陪他一道来。”潘宏福给潘信诚解释，说，“不必客气了，阿永去吧。”

唐仲笙怕冯永祥去反映头寸不够，不起作用，影响到东华问题不能解决。他不同意冯永祥去反映，可是又不好公开反对。他借着潘信诚的话搭上去：

“信老说的对，这次反映要能解决问题，信老和阿永都不肯去，我看倒有个最适当的人，各位倒忘记了。”

徐义德问：

“谁？”他疑心是不是指自己。

唐仲笙有意不说：“你们猜猜看。”

“说吧，急死人哪，这个事体也好开玩笑。”柳惠光忍耐不住了。

“智多星，干脆说吧，别猜了。”江菊霞盯着唐仲笙。

唐仲笙还是慢吞吞地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指着马慕韩说，“我们的慕韩兄，诸位倒忘记了吗？他是民建上海临工会的常务委员，又是协商委员，从民建那方面，可以反映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出席协商会的时候，又可以在会上正面提出。他不要讲自己企业的问题，只是客观地反映一下工商界各方面的情况，提供政府参考参考，下面的文章政府自然会考虑了。如果说，现在风头不对，在协商会上正面提出怕别人误会，那么，协商会开会休息的辰光，慕韩兄借个机会走到陈市长面前去，各位不要忘记，陈市长是协商会的主席哪；他和陈市长随便聊聊天，顺便就把问题反映上去了。这不是很自然吗？一点痕迹也不露。”

潘信诚边听边点头。

金懋廉听他说完，五体投地，佩服不已，大声欢呼：

“妙，妙，真是妙啊！”

柳惠光听唐仲笙娓娓说来，头头是道，听出了神，发呆发痴一般的望着唐仲笙，一动也不动。金懋廉的欢呼声惊醒了他。他随声附和道：

“妙！”

徐义德完全同意：

“慕韩兄自然最适当不过了，身份也好。”

潘信诚知道冯永祥心里一定不同意马慕韩去，唐仲笙一提到慕韩两个字，冯永祥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逝了，别的人却还没有察觉。潘信诚也认为马慕韩去反映比冯永祥适当的多，可是他并不立刻表示，反而把皮球踢给冯永祥，问他：

“阿永觉得哪能？”

“当然是慕韩兄去好。”冯永祥的脸上浮着勉强的微笑，声调里有点酸溜溜的味道。

马慕韩料到众望所归，非自己不行了，见信老没有吭声，他有意再往潘信诚身上一推：

“最好还是信老去……”

江菊霞插上来打断他的话：

“不要再推三推四的了，慕韩老兄。”

马慕韩强辩道：

“不是推……”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忽然有人掀起落地的紫色的丝绒帘子，宋其文老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头闯了进来。他望见沙发上满满坐的是人，就站下来，定定神，喘着气，轻轻理了理胡须说：

“正好，你们都在。”

江菊霞说：“吃过晚饭，有几位先走了，我们随便聊天。你再不来，我们也要散了。”

柳惠光这几天一直心惊肉跳。谁的步子走快一

点，他就有点怕。他见宋其文跑进来，神色惊慌，预感到有啥不幸的事体发生。他迎上来问：

“出了啥事体？”

“出了大事！”

徐义德问：“是不是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哪？”

“那倒不是，”宋其文靠着落地的紫色的丝绒帘子说，“叶乃传自杀哪。”

“叶乃传，谁？”这个人潘信诚不认识。

坐在沙发上的人伸长脖子，有的歪过头来，都对着宋其文看。

“谁，叶乃传是北京路昌瑞五金号的老板，”金懋廉一提起这个人就有点气愤，说：“欠我们行里五亿头寸，申请展期了三次，连利息也不付。”

江菊霞钦佩地碰了碰金懋廉的胳膊，低声对他一个人说：

“你们银行里啥事体都晓得。”

“哦，昌瑞五金号的叶乃传啊，懋廉兄一提，我记起来了，”马慕韩的脸上露出轻视的神情，说，“早几天报上登的，他派自己的小老婆在新亚酒店长期包房间，勾引干部，承揽定货。昌瑞承制人民解放军一批锚绳，就是白棕绳，表面上是白洋棕，里面却是烂麻皮，经不起风吹浪打。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追击国民党残余匪帮，有些船只因为锚绳断了，

延迟了登岸动作。还有一部分船只遇到狂风，各船一齐下保险锚，结果有九只锚绳断了，翻了好几只船，牺牲了八十多个解放军。这件事体就是叶乃传干的。”

“我也想起来了，”徐义德说，“早几天报上是登了这段新闻的，华东纺管局向他家买的各种规范的钢管，百分之八十九都是假货，用旧货充新货。还有河北省地方国营染织公司在他家买进的一寸半泗汀管五十九尺六寸，规定压力三百磅，他竟不顾工人生命安全，以旧东洋货黑铁管冒充，压力只有一百二十磅。装置竣工，准备使用，幸好给工程师发觉停用，差一点要发生事故哪。”

宋其文点点头：

“慕韩老弟和德公说的一点不错，就是他。早些日子同业里的人就传说，叶乃传对人讲：昌瑞的不法行为实在太多了，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按他计算，他的罪行要判刑就得坐牢两百年，所以各机关凡是有关‘五反’的案件到昌瑞五金号调查，叶乃传都承认。那些日子，昌瑞号一案未了，一案又来，税务局的同志查他的偷漏帐没走，人民解放军同志来了，华东纺管局的同志又来了，同时水利部和铁路局的传询电话又纷纷打来，他简直来不及应付。他对每一个单位的同志都一一承认自己的罪行，他说判徒刑两

百年和三百年根本没啥区别。”

“他哪能自杀的？”冯永祥走过来，站在宋其文旁边问，“其老。”

“据说他本来打算投黄浦水葬的，后来一想不划算，不如跳楼自杀，当街示众，企图说明是人民政府逼他这样的，也好出一口气。他在国际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今天下午从十一层楼上跳下来死的。”

“自杀还要捞回点利润！”

冯永祥这句俏皮话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潘信诚闭上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徐义德说：

“听说叶乃传魄力大，投机能力强，对朋友有义气，同行当中都很佩服他。”

宋其文惋惜地说：“那是的，提到叶乃传，五金业哪个不知道他年青有为。”

“叶乃传如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可能是个成功的人物，”金懋廉说，“现在却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啥个原因？”

唐仲笙给他做了答复：

“那还不简单吗？时代变了，现在是新民主主义时代啊。”

柳惠光问马慕韩：

“叶乃传的事要不要反映一下？”

马慕韩直摇头，撇一撇嘴，蔑视地说：

“这种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够不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严格地讲，他应当算是反革命分子。这种事体有啥好反映，丢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脸。”

柳惠光碰了一鼻子灰，往沙发上一靠，他不再吭声了。

冯永祥同意马慕韩的意见，补充道：

“像叶乃传这样的事，当然不值得重视，不过五反运动没有下文，倒是叫人放心不下。”

他这几句话引起了全场人们的注意。

自从上海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定展开五反运动以来，大家递了坦白书，就松了劲，没有下文了。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加强领导五反运动，工商界的坦白和检举归上海市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这个消息发表出来，工商界人士的神经紧张了起来，认为这一记很结棍。没两天，还是没有下文，又松弛下去。五反运动像是一根箭，一会儿拉满了弦，一会儿又松了。箭在弦上，可是不发。工商界人士心上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

徐义德忧虑地问冯永祥：

“阿永，五反运动怎么没有动静？”

冯永祥有意卖关子：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大家面面相觑。冯永祥扫了大家一眼，打破了沉默，指着唐仲笙说：

“请我们的智多星发表高见。”

“对。”潘宏福首先赞成。

唐仲笙没有答腔，他的眼光盯着乳白色的屋顶，在考虑他的看法。经大家一再催促，他才说：

“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向是关心上海的，五反运动恐怕也和别的地方不同。我听市上传说：重庆是共产主义，武汉是社会主义，北京是新民主主义，上海是资本主义，香港是帝国主义。这传说仔细想想也有些道理。毛主席和中央对上海从来是宽大的。上海市的政策是比别的地方稳的。五反运动已经在上海工商界展开了，工商界也坦白了，也检举了，大概五反运动已经过去了。”

“你说上海五反运动过去了？我看不像。”潘信诚嘴上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可确实希望如唐仲笙所说的，五反运动过去了。他说，“这两天报上登的北京、天津、武汉五反运动的消息很多，他们那边展开的那么闹猛，上海工商界递一份坦白书就算过去了？没有那么轻便吧？”

他摇摇头，加重他的语气。

“我看也不像。”马慕韩同意潘信诚的意见，说，

“我也听到市面上五个主义的传说，全是一种揣测之词。这种说法，是不了解共产党的。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个，各地差别哪能会那么大呢？”

“这个分析对，”金懋廉点点头说，“最近市面上谣言多，有些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也不过这么说说，那看法我也不同意。”唐仲笙改口说，“不过，中央对上海和别的地方恐怕多少总有点不同。”

“天下的事很难说，”冯永祥再三摇头思索，说，“最近街上的标语少了，喇叭也不叫了，也许真的过去呢。”

“过去就好了。”柳惠光用着一种祈求的声音说，他是宁可认为五反运动已经过去了，一提到“运动”和“斗争”等字眼他就有点吓丝丝的。

“阿永的说法也有道理。”潘宏福最近根据爸爸的意见，留心市面上的动静。他也亲眼看到标语少了，喇叭不叫了。

徐总经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过去当然好哪。据我看：共产党不会放过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这次五反运动，是共产党搓麻将，赢满贯，要搞光我们工商业。共产党既然是要大进一笔帐，上海油水这么肥，你说，他们会不从上海捞一票？”

“这个话也对，”江菊霞手里拿着一张几天前的《解放日报》边看边说。那张报上面登了一条新闻：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定，三年来一贯制造物价涨风。紧接着这条消息，还登了一篇短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向人民日常生活的进攻。她指着短论对大家说，“这是党报的短论，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向人民日常生活的进攻。德公说的对。从这张报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来，上海的五反运动没有过去。”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潘信诚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只是笑了两声。

徐义德却隐瞒自己的不满：

“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我们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组织，三无总司令，怎么进攻呢？”

“是呀，这道理说不通啊。”江菊霞接过去说，“共产党这个讲，有啥办法呢？”

“这个么，也很难说。”马慕韩望了徐义德和江菊霞一眼，显然不同意他们两人一唱一和，他想起最近报纸揭发的上海工商界许多五毒不法罪行，特别是今天宋其文提到的叶乃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哪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呢！徐义德企图否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报纸上早就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论调；没有军队吗？上海工商界本身就是一支队

伍，在全国来说，这支队伍还是主力哩；没有组织吗？工商界有多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上海星二聚餐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报上早就有人对这类组织进行批判了；没有总司令吗？各级组织都有负责人，全国也有负责人，这一点也无法否认。工商界为了争夺利润，在上海市场上兴风作浪，各显神通，猖狂进攻，叶乃传和朱延年这些人的例子有的是。他最近特别留心报纸上的新闻，看了叫人怵目惊心，铁一般的五毒不法事实，使人无法抵赖。徐义德这帮人大概看报没有细心研究，到现在还关起门来说梦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他当着工商界巨头们的面，不好多讲，就暗示地说，“大家做的事体，自家有数。这辰光，谈这一套，没啥好处。”

潘信诚不同意马慕韩的说法，但他并不提出异议，只是用眼睛暗暗斜视了他一下。冯永祥自命行情熟，点头称是：

“这辰光，空气不对。”

宋其文一边叹息一边摇头说：

“我看共产党不仅要捞一票，恐怕还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国旗上那颗星要掉下去了！”

“我看不会。”马慕韩一边思索，一边摇头，说：“看苗头，不像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样子。”

“为啥？”

“共同纲领序言里明文规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其老，你忘记了吗？”马慕韩望着宋其文，等他的回答。

“这一点我哪能会忘记，通过共同纲领的辰光，我还举过手哩。”

“这就对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的事情很难说。”

“就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也得开个会修改共同纲领，这是国家大法呀！”

“人家不开会，你又哪能？”

马慕韩给宋其文一问，当时竟回答不上来，心里想，这倒是的呀，共产党不开会，工商界又有啥办法？过了一会，他想起了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又有了根据，说：

“其老，你忘记毛主席的讲话吗？”

“毛主席的讲话？”宋其文一时摸不着头脑，奇怪地望着马慕韩，问，“啥个讲话？”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马慕韩身上。他从容不迫地说：

“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说过，凡是为人民做

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把他忘记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其老忘记了吗？”

“这么重要的话哪能会忘记，不过，”宋其文意味深长地摸一摸胡须，说，“这只是指个别的人，不是指整个民族资产阶级。”

“那么，其老，”马慕韩追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这回共产党一定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吗？”

宋其文坚持他的意见：

“慕韩兄，别想的太天真！不信，你看吧！”

马慕韩不同意，他向徐义德搬兵：

“铁算盘，你说是不是像？”

马慕韩回过头去一看：徐义德的坐位上空空的。他“咦”了一声，惊异地问道：

“铁算盘到啥地方去哪？”

大家刚才聚精会神地听宋其文和马慕韩发表高见，眼光都盯在马慕韩身上，没有一个人看见徐义德到啥地方去了。冯永祥说，可能是上厕所去了。他说完了话，立刻到楼上楼下去找，回来两个肩膀失望地一耸，伸出两只手来，皱着眉头说：

“啥地方也没有了，该不会出事吧？”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说话。江菊霞听冯永祥说话，面孔顿时铁一般的发青。她马上从徐义德身上想到叶乃传，从叶乃传自杀又想到徐义德和沪江

纱厂。她的两腿发抖，有点站不住的样子，两只手合在一块，拼命搓来搓去，竭力保持镇静。她想立刻就走，去找徐义德，见大家站在那里不动，又不好意思一个人先走，担心地问：

“会不会……”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大家都懂得她要说的意思。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使人透不过气来。从叶乃传自杀和徐义德忽然不见，大家都很快地想到自己的厂店，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每一个人的眉头都不约而同地皱了起来。没有一个人答她的话。她的眼光对着唐仲笙，希望智多星给她一个否定的答复。

果然唐仲笙开口了，可是和她的愿望相反：

“这辰光的事体很难说，谁也不能打包票，也许德公一时想不开……”

唐仲笙说到这里，江菊霞不禁失声大叫：

“啊！”

大家都对着她看。她机警地连忙用右手按住胸口，很自然地说：

“我的胸口痛！”

潘信诚看出来她为啥“啊”的一声，不但不点破，并且给她一个台阶：

“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

她顺嘴接上去说：

“好的，好的。”

她没和大家打招呼，匆匆忙忙走了。她的高跟皮鞋囊囊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消逝在门外，潘信诚看大家还愣在那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连最活泼的冯永祥也不说话了，他站在宋其文旁边，一老一少，像段木头似的。潘信诚提醒大家道：

“我们也散伙吧，早点回去，也好料理料理，……”

大家点头赞成，宋其文抹一抹胡须说：

“对！”

大家闷声不响地散了。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了，非常平静，只听见墙角落的那架落地大钟有规律地发出嗒嗒的音响。

（第一部完）

1954年3月13日初稿，上海。

1961年7月26日改稿。北京。

第 二 部

1

朱延年把信往抽屉里一放，咔的一声关起抽屉，气生生地说：

“晓得哪。”

他说完话，低下头去看平摊在玻璃板上的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把童进冷清清地扔在一旁。童进站在他的写字台前面纹风不动，一对眼睛出神地注视着他。童进的眼光里流露出一不满的神情，紧闭着嘴，努力压制内心激动的感情。等了一歇，童进见他还不抬起头来，仿佛忘记自己站在那里，实在忍不

住了，不得不说话，声音却很轻：

“朱经理，这是戴俊杰、王士深两位同志的来信啊。”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朱延年仍旧没有抬起头来。

“你答应寄到朝鲜去的货，要早点寄去。志愿军不比别的机关迟几天不要紧，这些救急用的药早寄去一天，可以早救活几个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前线流血打美国鬼子，我们没有别的支援，应该把货早点配齐寄去。他们催过两次，这次不能再不寄了。”

朱延年听童进理直气壮一个劲在讲，简直制止不住。他把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拿起，然后用力往写字台上一贯：

“我有要紧的事体在办，尽在这里罗哩罗嗦做啥？”朱延年从抽屉里把那封信取出来，对着童进说，“你晓得他们在啥地方？美国的飞机在朝鲜天天轰炸，志愿军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藏。从后方送到前线的给养弹药百分之五六十都给炸毁，真正送到志愿军的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现在哪能寄药？”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药更要寄。后方的弹药送到前线很困难，前线更需要弹药。戴俊杰说，前线只要有药，就可以多救活几个志愿军。他们临走的辰光，不是希望我们早点把药寄去吗？”

“有药，当然可以治病，这还用你说，啥人都晓得。可是送不到前线有啥办法？”朱延年见童进一本正经地在坚持，他不好再发脾气。为了缓和一下童进的情绪，他放下笑脸，嘻着嘴说：“药当然是要寄的，别说是志愿军的，就是一般客户也要寄的。你年纪还青，你不懂得。我们办事要讲究效果。这几天报上登着美国飞机轰炸朝鲜很厉害，现在把药寄去也没有用。我们对志愿军同志要负责，不能乱寄。寄丢了怎么办？过一阵再说吧。”

童进给朱延年这么一说，心动了。他觉得朱经理究竟和自己不同：年纪大，社会经验丰富，看事体有远见，办事体牢靠。他的不满的情绪渐渐消逝，反而感到刚才对朱经理顶撞有些不妥当。但他还是关心这批药啥辰光能够寄出，等了一会儿，对朱延年轻声地问道：

“啥辰光寄出才好呢？朱经理。”

“这个么，”朱经理像煞有介事地用右手的食指敲一敲太阳穴，在凝神思考。他心里想：别瞧不起福佑药房的伙计们，就连童进，解放以后也和以前不同了。虽然朱延年几句话把他说得不再坚持要马上寄药，可是对寄药这件事却一丝一毫也不放松。志愿军好像是他的亲娘老子，比对啥人都关怀。朱延年暗中瞟了他一眼：他站在那里，没有马上离开的模样。

半晌，朱延年信口说道：“等前方平静一点再说吧。”

“咦？”童进内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怎么朱经理说得好好的，忽然又改变了口气呢？他怀疑地望了朱经理一眼：

“太慢了不好吧？”

“当然不能太慢。”

“那么，啥辰光进货呢？给志愿军寄的药品，库房里都没有，应该早点进货。等美国飞机一不轰炸朝鲜，就寄去。朱经理，是不是今天就进货？”

朱延年把眉头一皱，显出很不耐烦的神情，说：“我晓得了，别罗哩罗嗦的，去吧。”

童进没有给撵走，还是站在朱延年的面前。他要问出一个结果来：

“志愿军的信哪能答复？”

“等一等再复。”

童进回想起王士深在店里讲的汉江两岸狙击战的英勇故事，他怀念着志愿军的同志像是怀念着自己的亲人一样。他认为今天催朱经理寄药是他的神圣的职责，有一股力量支持他和朱经理交涉。朱经理的态度叫童进十分激动，他话也讲不大清楚，断断续续地说：

“这，……这哪能，……可以呢？朱，……朱经理。”

朱经理觉得童进胆敢在他面前放肆，怒不可遏，霍的站了起来，瞪了童进一眼：

“为啥不可以？”

“志愿军来信催寄药，我们应该答复他们。”

“刚才不是告诉你美国飞机天天轰炸吗？复信寄去，一定给炸啦。”

“那么，我们就不复了吗？”

“复，当然要复的，不过，也要等前方平静一点。”朱延年心里想，说不定戴俊杰、王士深早给美国飞机炸死了，谁知道他们向福佑药房订过货呢？给志愿军办货，我是有把握的。干脆不寄，给祖国节省一点药品！

童进焦急地说：

“那要等到啥辰光？”

“打仗的事体很难说，我哪能晓得要等到啥辰光。”

“今天先复一封不好吗？”

朱延年恼羞成怒，干脆不答理童进，大声喝道：“这是我的事体，你别管。别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的，我还有要紧的事体呢。你给我滚出去！”

童进仍然站在那里没动。他想起昨天苏北行署卫生处张科长也来信催货，气愤不平地又说道：

“张科长也来信催货，……”

“我晓得。”

“朝鲜有战事，苏北可没有战事。过了这许多日子，为啥还不给他配齐？”

朱延年给童进问得没有话说，狠狠瞪了他一眼，走上去抓住他的胳膊，向经理办公室门外一推：

“滚！”

2

朱延年关上经理办公室的门，坐到写字台的面前，自言自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童进这青年经常出去听团课，开会，简直不务正业，变得越来越坏啦，胆敢在我面前一句顶一句，实在太不成体统了。唉，……”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眼睛对着窗外发愣。

窗外高耸入云的大楼遮去了半个天空，另一半天空上有一大片云彩上镶着金边，把云彩照得透明。金边黯淡下去，那一大片云彩就像是用旧了的破棉絮挂在渐渐灰暗的天空。暮色无声地降落在上海繁华嚣杂的市中心区了。

朱延年望着暮色又想起福佑药房募股的事：那天在徐义德家分送出去的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怎么毫无消息，难道真的是石沉大海吗？柳惠光不理睬还有可说，韩工程师一点意思也没有？马慕韩看了之后竟然会丝毫不表示？还有，……他一个个想下去，都没有下文。他的心情像是那一大片的暗灰色的云彩一样。他对着那片云彩沉默了很久。窗外闪烁着点点的灯光，慢慢越来越多，形成一片灯光的海洋。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半个天空映得血红，像是在燃烧。这灯光给朱延年带来了希望。他努力安慰自己：没有下文不等于完全绝望，投资一种企业是一件大事，不说别人，就拿自己说吧，要投资大利药厂也犹豫好久，想了又想，才下了决心；为了调头寸，又耽搁了一些时间。马慕韩说得好，他是办棉纺厂的，对西药业外行，精力照顾不过来。这也是实情。想到这里，朱延年的脸上有了笑纹，对自己说：得等待一些时间。

过了一会儿，仿佛已经等待了很久，他有点不耐烦了。他希望福佑药房马上很快地发展起来，想四面八方伸出手去。把能够弄到手的头寸都集中在朱延年的名下，先给自己买辆小轿车。啥牌子？倍克不错，又大又稳又气派，但是价钱不含糊，怕要两三个亿；还是节省一点，那么，小奥斯汀，也不错，几千万就

差不多了，就是太寒伧。福佑药房的总经理哪能坐小奥斯汀，跟着马慕韩、徐义德他们一道往来也不像个样子。顶合适是雪佛莱，不大不小，样子也不错，虽说是属于二等货色，坐出去也不算寒伧，在市内跑跑不错的。要是节省点，还可以弄一部八成新的雪佛莱，那更划算。朱延年似乎已经坐在自己的雪佛莱的小轿车里，他要司机先在汉口路四马路兜个圈子，开慢一点，好让同业中的人首先知道朱延年的黄金时代又到了。可惜同业中没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候朱延年的汽车经过。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坐车子去登门拜访，把车子就停在你门口，你们不得不看一下吧。或者，朱延年出面请一次客，派自己的雪佛莱去接送客人，那还不马上传遍西药业吗？这一传，工商联的那些巨头们马上就会知道。他们如果不知道，只要坐着雪佛莱去出席一次星二聚餐会就得了。

窗外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朱延年这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坐在雪佛莱里，而是坐在他的小小的办公室里。他怪那些人太不够朋友，为啥收到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到现在还不给一个答复呢？即使不立刻确定认股多少，也可以先表示一下态度啊。啥原因没有消息呢？是不是总结书和计划书写的不好呢？也许是吧。他半信半疑。他回过头来一看：办公室里黑乌乌的，伸手去掀亮了写字台上的台灯，

打开总结书和计划书仔细地重新审阅，第一页前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本书所述各点，在总结方面者，均系过去业务上之实际情况，具体切实，必要时并列表说明。在计划方面，均为即将执行或部分已开始执行者，今后本药房业务上之发展，大体根据本书指明之方针。

这一段话并无漏洞，而且说得既恳切又肯定。为啥还得不到那些朋友的信任呢？他找不出理由来。他把总结书和计划书又仔细审阅了一番，自己仍然认为写的不错，文字上也无懈可击。他断定是由于那些朋友对新兴的人民的医药事业缺乏高度的热忱，因此，对福佑药房的发展不积极。朱延年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医药事业服务，他不能让朋友们对人民的医药事业缺乏高度的热忱。他要帮助朋友了解和赞助这个人民的医药事业。帮助啥人？他对着宝绿色的台灯发愣：在他眼前隐隐约约的出现了各种面影：柳惠光的，韩工程师的，徐义德的，马慕韩的……“对！”他对自己说，“首先催马慕韩，那天他的态度并不坚决，多少有点苗头。一个大工业家投福佑一点资算啥，就说是办纱厂没有时间兼顾西药，那么，认几股玩玩票

也没啥。朱延年和徐义德的亲戚关系马慕韩不是不知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总得应付一下。”他越说越有道理，右手伸出去，抓过电话听筒就想给马慕韩打电话，旋即一想：当面一催，说僵了，反而不好。不如先写封信去，说得恳切一点，有个回旋的余地，不行，再当面谈。这比较稳当。他打开抽屉取出福佑药房的漂亮的洋信纸信封，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道：

慕韩总经理先生大鉴上次在姊夫徐义德兄处奉上福佑药房总结书与计划书谅邀青睞承蒙俯允赞助小号不胜感激之至吾兄拟认股若干敬请早日示知以便趋前聆教共议大事……

他写好信封，贴上邮票，想早点发出去，就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外边各部的伙计都走了，只有童进一个人独自留在那里。他背靠着栏杆，面对着墙壁出神。墙壁上挂着苏北行署卫生处送的大红贺幛，紧靠这幅贺幛挂着福佑药房全体同仁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戴俊杰、王士深两同志因公回国摄影纪念的照片。早一会童进在经理室碰了一鼻子灰，给朱延年赶了出来。他肚子里好像有啥东西在燃烧，仿佛一张嘴，里面就有一股火要喷出来似的。等到同事们看出他脸色气得铁青，料想一定出了啥事体，低声小语问

他，他又不得不按捺住心头愤怒的火焰，微微摇摇头，说没啥。既然童进不言声，大家也不便追问下去，都去忙手里的事了。

童进心里哪能也平静不下来。他拿起账簿和传票看，只是一些数目字在眼前跳动，究竟多少，哪能也看不清爽。他的两只眼睛盯着账簿。说他闲着吧，他面前摊开了账簿和传票；说他在做事呢，他实在闲着。

夏世富从侧面看出了苗头。这位外勤部长不仅对福佑药房往来客户的底细一清二楚，就是福佑药房的内部人事关系和朱经理肚里的妙计，他也明白。童进垂头丧气地从经理室出来，他就很注意，童进没有回答大家关怀的询问，更叫他注意。他并不是对童进特别关心，也不想帮助童进解决问题，主要因为他有事要找朱经理。他想从童进那里了解一下朱经理情绪。如果碰到朱经理在气头上，那会对自己也捎带几句，甚至坏了事。遇到这样的时刻，宁可慢一点再去谈。夏世富见童进不肯说出刚才在经理室的情形，估计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不好再大声问他，便伏在童进的写字台旁边，显出特别关怀的样子，小声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童进发现夏世富在面前，仿佛窥出他的心事。他

感到突然，眼睛一愣，半晌，才想起要回答夏世富的问题，慢吞吞地说：

“没啥。”

“你同我还见外吗？自家人，有啥不好谈？告诉我，童进，有啥事体，我也好帮帮忙。”

童进想起朱经理的无理的言词，他叹了一口气，说：

“没啥好帮忙。”

“是啥事体？你讲嚟，有话放在肚里也怪闷的，讲出来让大家晓得也好。我看朱经理这两天脸色不好，老是皱着眉头，好像有啥心思。他为啥骂你呢？是不是因为到期支票的事？”

童进摇摇头。

“是催货的事？”

童进没有吭声，也没有摇头。夏世富一看这情形就料到大概是这桩事体，便追问：

“是哪一笔？”

童进没有搭腔。

“你说呀，我还不清楚这些事吗？我也为这些事受气，两面不讨好：不发货，客户骂我；催发货，又要挨老板的骂。”

“是呀！”童进听了夏世富同情自己的话，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究竟是哪一笔？”夏世富一点也不放松。

童进望望前后左右的人，没有一个在看他们两个。他吞吞吐吐地说：

“戴……俊杰……他们……”

“是志愿军的？那数目不小啊。”夏世富贴着童进的耳朵轻轻地说，“这一阵子朱经理在设法募股，没有一点消息，啥地方有钱配这些货？你去的不是时候啊。”

“也不是我要去的，是戴俊杰他们写信来催的。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办的货哪能不配齐，查出来不好，……我也是为了福佑好……他把我赶了出来……”

“啊哟，今天朱经理的脾气可不小……”夏世富希望要了解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他决定自己今天不找朱经理；安慰童进道，“我们端了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的管。受点气，只好忍着点吧。”

童进还是想不通自己为啥要挨骂，朝鲜前线等着药品救命，不把货发齐，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感到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刚才闷在肚里，给夏世富几次三番追问，慢慢流露出来。他听到夏世富安慰的话，眼睛不禁发红，眼眶有点润湿了。

“别生气了，还是好好做事吧。你晓得朱经理的脾气，过一阵也就算了。”夏世富生怕留在店里会有

事挨到他身上，打定主意出去溜一趟，对童进说，“我到客户们那里去转转……”

“好。”童进揉揉眼睛，低低应了一声。

吃过晚饭，店员们陆续散去，只是童进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像是发痴一般，背靠着栏杆，一个劲对着那张照片望，心里觉得不立刻把药品配齐寄到朝鲜前线，就对不起戴俊杰和王士深。

朱延年看到童进一个人留在那里望着和志愿军拍的照片，他马上想起早几天陈市长在天蟾大舞台所做的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刚才他那样对付童进，既不妥当，也不合时机。童进知道不少朱延年的秘密啊。他在经理室门口站了一会，后悔刚才不该得罪童进，要想法挽回。他打定主意，走过去，轻描淡写地随便问道：

“他们都走了吗？童进。”

童进转过脸来，面对着朱经理，不高兴地低着头，应了一声：

“唔。”

“究竟是你好，无事不出去乱跑，对福佑药房的事特别关心。店里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我们福佑发展的会更快；我在外面奔走也更放心。”

童进听朱经理这几句话有点莫名其妙，和早一会的口吻完全两样。他微微抬起头来，怀疑地觑了朱

经理一眼。朱经理嘴角上露出了笑纹，向他走来：

“童进，你说得对，志愿军的药品要早点配齐发去。明天要库房里查查，还缺啥货，最近要想法配齐，等前方平静一点，马上赶紧寄去。”

童进听了这话，从心眼里高兴了，也笑哪：

“好。”

“信也应该复。你拟个稿子，就说货不久寄去。”

“那我现在就起草……”

“你写吧，明天我看了再寄。”

朱经理心里在盘算怎样把童进这一批人完全抓在自己的手里，去应付那锐不可当的暴风雨一般的五反运动。他皮笑肉不笑，亲热地说：

“童进，你给我通知夏世富他们，明天下午四点钟，到我家里坐坐，我有话和大家谈谈。”

童进点点头。朱经理迈起得意的步子囊囊地走出去了。

3

一股浓烈的咖啡的香味飘进客堂间，接着是茶杯茶碟碰击的响声。娘姨托着茶盘走进客堂间，在每

一位客人面前放下一杯咖啡。马丽琳手里端着一大玻璃盘子的奶油蛋糕走进来，放在客堂间当中的红木八仙桌上，自己在下沿空位上坐了下来。

朱延年站了起来，用刀把一块圆圆的奶油蛋糕从中剖开，切成八小块，用叉子亲自叉一块送到童进面前的空碟子里，笑嘻嘻地说：

“这蛋糕不错，你尝尝。”

童进望着朱延年又叉蛋糕送给叶积善他们……最后送了一块给马丽琳，说：

“丽琳，你今天忙着招待客人，可累了，酬劳你一块！”

“你自己呢？”

朱延年面前的碟子还是空的。

“也来一块。”马丽琳叉了一块放到朱延年面前的空碟子里。

朱延年感激地说：

“谢谢。”

童进心里非常奇怪。他不知道朱延年今天为啥这么和气，满脸笑容，究竟要和他们谈啥。他望着油腻的奶油蛋糕想吃，却又没有心思吃，只是用小茶勺不断地调匀咖啡里的糖，也不喝。朱延年虽然望着大家，但是对童进特别注意：

“最近账面上怎么样？”

一提到账，童进就愁眉苦脸，担忧地说：

“总是轧不平。还有六天又有两张期票到期了，一共两亿三，头寸实在太紧。经理，天天过三十晚上，也不是一个办法啊。”

朱延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人，经过大风浪，见过大场面，这点小事体哪里会放在他的心上。他毫不在乎，很有把握地说：

“只是两亿三吗？”

“这数字也不算小了啊，我们福佑存底很薄，靠福佑本身是没啥办法的呀。”童进说。

“数字也不算大……”

夏世富见童进几句话并没有引起朱延年的注意，料想他大概又有妙计，便巴结地凑合两句：

“是的，这数字不算大。不过，就是再大一点，只要朱经理到市面上活动活动，也完全可以应付的。是吧，亚宾。”

夏亚宾点点头。

“那也不见得，”每逢有人恭维，朱延年总是表现得特别谦虚，脸上却露出自满的情绪，说，“不过承同行瞧的起，福佑的信用也不坏，轧个两三亿头寸并不十分困难。”

童进没有夏世富那样世故。他心里有话不讲出来就不舒服。他望着热腾腾的咖啡，发愁地说：

“轧头寸虽说比过去容易，老是拆东墙补西墙也不是个办法。阴天背蓑衣，越背越重。不说别的，就是利息一项，我们福佑也吃不消啊。”

在平时，朱延年早该瞪起两只眼睛，张嘴骂童进了。今天却很奇怪，不但心平气和，而且称赞童进：

“你说得对。我们现在经营的政策方针还值得研究。生意比从前做大了，利润也很厚，门面也撑开了，福佑这块牌子在市面上打响了，就是缺少资金。因为资金不够，周转不灵，就得轧头寸。过去我们找客户拉生意，现在客户找上门来，生意还可以往大里做，就是缺乏资金，放不开手。现在我整天想心思，不是动别的脑筋，只是在资金上转念头。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送出去，工商界的巨头们都愿意帮助，加入几股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考虑的是加入多少股。所以，现在还没有人来认股。这一炮打响了，以后在资金上就不发愁了。”他接着说，“另外，还有一批港货：二十五架计算机，十架显微镜，十只小型 X 光机，此外，还有一大批试药。我已经预付了四亿订货款，货到了，多的不说，可以赚上二三十个亿。我要想办法把货取回来。必要的辰光，我亲自去一趟。取回港货，付了银行的欠款，不再拉东扯西，账面不但可以轧平，盈余还会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童进天真地关怀地问：

“真的这样？”

“当然是真的。那辰光，用不着我朱延年跑到别人面前去轧头寸，别人要跑到福佑来求情，要我帮帮他们的忙。患难之中见朋友。我不会给人太难看，只要手头宽裕，轧点头寸，我一定答应的。希望你们的手也松一点。”朱延年望了大家一眼。

夏世富接上去说：

“我没问题。我晓得轧头寸的苦处的。”

“你，我晓得。”朱延年转过来望着童进，说，“主要是你。”

“只要经理同意，我照付。”

“那就好了……”

朱延年话没说完，马丽琳用勺子敲了敲咖啡杯子，笑嘻嘻地说：

“你们谈话把点心都忘记吃了，咖啡也要冷了。吃点再谈吧，延年。”

“好。”

朱延年首先吃了，大家都吃了。童进想到福佑的前途不禁心里开朗了。假如朱经理的话都实现，那目前这点困难也不算啥。他兴奋地把奶油蛋糕吃下去，一口把一杯咖啡喝得干干净净。朱延年接着说：

“福佑这个字号要靠大家出力，大家的认识和我一致，事体就好办了。我办福佑抱着一个宗旨：有事

和大家商量。有福同享，有锅同当。福佑好，大家好；福佑不好，大家不好。大家在福佑吃苦熬夜，我是晓得的。大家待遇很低，我也是晓得的。等福佑生意做好点，大家都应该加薪。加多少，我们再商量。不消说，在座几位应该多加一点。你们出力多受苦多，这一点我心里明白。”

夏世富听到“加薪”两个字，心里立刻跳了一下。加薪，夏世富加多少呢？那以后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一点了。他对朱延年说：

“我们出力是应该的，不算啥。”

“出力多应该酬劳多。”朱延年注视着夏世富说，“福佑的前途远大是肯定的，只是目前的困难要度过才好。福佑也不是我朱延年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我不过顶个名，多负一些责任罢了。”

童进不解地望着朱延年：朱延年为啥说这一番话呢？仿佛童进、夏世富都变成福佑药房的股东似的。童进有点困惑了。朱延年眼睛一转动，不急不忙地说：

“五反运动已经开始了，头寸也紧，希望大家帮忙帮忙。”

夏世富以为目前头寸紧，要迟发个把月的薪水，他迎合地说：

“那没有问题，只要经理言一声，我们没有不效

力的。就是迟发两个月的薪水也没啥关系。大家说，是吧？”夏世富把眼光向大家一扫，大家不置可否。

童进的眼光里却露出怀疑的神情，因为他知道发这个月的薪水是没问题的。他不信朱延年是為了这点小数目请大家来商量。果然朱延年开口了：

“薪水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按时发。同仁家里有啥急事，要多支点薪水也可以。福佑哪能困难也不能迟发大家的薪水，宁愿我自己节省一点，也要按时发。”

“那是的，”马丽琳在一旁帮腔道，“延年在家里经常惦记大家的薪水。别的账可以拖延几天，这个，他总是早就预备好了。”

“丽琳经常提醒我这桩事体。”朱延年指着马丽琳对大家说，“她也是我们福佑的股东哩。”

夏世富马上巴结地说：

“今后要叫你马经理哪。”

马丽琳谦虚地站起来说：

“不敢当，不敢当。我给你们加点咖啡来……”

她得意地走去，囊囊的高跟皮鞋声一直响到后面的灶披间去了。

朱延年沉思了一阵，一本正经地说：

“我听了陈市长的五反运动的报告，就想我们福佑的问题。福佑这两三年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和

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规规矩矩做生意。我们大家都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也一天比一天大。我们老老实实的经营，从来没有五毒行为，能有今天的规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全是靠在座诸位努力。我想了很久，在五反运动当中，我们福佑没啥原则性的问题，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在座各位，都是我们福佑的骨干，也是我们福佑的创办人。不过，”朱延年说到这儿，点燃了一支香烟，用眼睛很快地觑了大家一眼，然后才慢吞吞地说下去，“我个人办事从来谨慎。这次五反运动是党和政府对我们工商界实行改造。福佑虽然没啥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不能说连一点芝麻大的问题也没有。我个人精力有限，平时照顾大问题就不够，小问题更不必提了。同仁们整天在店里，许多事体都是亲身做的，希望你们多给我提供一些材料。”

朱延年静静观察每一个人的神色：X光器械部主任夏亚宾像是一个大学教授，文质彬彬地皱着眉头在回忆；栈务部主任叶积善面部没有表情，只是两只眼睛里露出惊愕的光芒；童进一脸不高兴，紧紧闭着两片嘴唇，仿佛已经下了决心，啥闲话也不说；只有夏世富脸上有着愉快的笑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动。当朱延年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碰上，他毫不思索地表示了态度：

“这个么，当然罗，我们比经理晓得多一点，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材料……”

没等夏世富说完，那边童进两道警告的眼光向夏世富射来，好像说：你哪能可以这样。童进接到王祺送来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以后，当天晚上，就填好，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他等不及第二天交给王祺，当天夜里就跑到王祺家里，亲自交给了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团区委批准他入团了。他一连两天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老是翻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而斗争》。这是入团那天介绍人王祺同志送给他的纪念品。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在看。他看到团章第七条：“本团团员的义务如下……”回想起过去听孙澜涛同志讲团课的情景，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孙澜涛同志讲的“爱护人民与国家财富，自觉地遵守各种革命秩序与纪律，与一切损害人民和国家财产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作斗争”，更是在他的脑海里永不泯灭。他经常勉励自己要做一个模范的团员。他有意识地在寻找哪些是损害人民及国家财产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好跟它进行斗争。但是他没有找到。今天听了朱延年的一番话，他认为找到了，所以他没有搭理朱延年。听到夏世富那样说法，心里很不满意，就狠狠瞪了他一眼。

夏世富叉起一块奶油蛋糕来吃，把嘴里要说的话都堵住了，没再言语。

夏亚宾比夏世富想的周到。他知道在这样大运动当中自己的地位很难处，轻不得，重不得，最好是超然一点。他的说法很巧妙：

“福佑有啥困难，我们是福佑的同仁，当然是休戚相关，应该出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朱经理一向关心我们，特别是对我们X光器械部尤其关心，我这样的半吊子，也受到专家的待遇，更是感到荣幸。只要朱经理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夏亚宾说到这里，看见朱延年嘴角上漾开了笑纹，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但看见童进板着脸孔，没有吭声，又感到空气有点紧张。他马上补了两句，“不过，我是学技术的，虽然中途辍学，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懂得一点技术上的皮毛。福佑其他方面的事，我就不大清楚。”

朱延年嘴角上的笑纹消逝了。他知道夏亚宾是个滑头家伙，他保护自己比保护世界上任何宝贵的东西还要注意。朱延年的眼光落在叶积善的脸上。叶积善不知道朱延年眼光的意思，他若无其事，毫无反应。朱延年见暗示没有起作用，便直率地点破了：

“积善，你晓得的材料比较多……”

叶积善一愣，惊慌地说：

“我，我……我不晓得……”

“说出来也没关系，这里没有外人，都是福佑的同仁，也可以说都是福佑的负责人。”朱延年心里忖度叶积善这一关比较容易通过，这一关一通，别的关也就容易通了。他知道最近童进思想起了变化，没有过去那么听话。他有意把童进放在一旁，留在最后来谈。他耐心地说，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大家都愿意帮助福佑度过困难，我非常之感激。患难中见朋友，交朋友就在这个辰光。积善，你先谈谈。”

“真的，我不晓得。”叶积善有点急了，他鼻尖上沁出几粒汗珠子。他的眼光对着童进，心想童进知道的事最多，为啥朱经理不问童进，偏偏要问他哩。可是他不敢讲出来。因为童进一直板着面孔不吭气，好像准备随时要对人发脾气似的。

童进听了朱延年那番话，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他想：原来今天招待是为了摸职工的底啊！福佑做的事，不管大小，哪一样能瞒过朱延年？哪一件不经过朱延年的眼？刚才朱延年点名要叶积善提供材料，他特别担心，生怕叶积善漏出来。叶积善虽然一再表示不知道，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便立即向朱延年说：

“店里的事你不是不晓得，何必问我们哩。你去坦白好了，我们没有材料。”

朱延年的眼光马上转到童进的身上：他想童进把门关得紧紧的，真个是水泄不通。小小童进忘记当

年跨进福佑的狼狈情形了，现在翅膀硬了，想飞哪。他也毫不含糊，冷冷地说：

“我当然要去坦白的。有些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怕啥！我应该负多少责任，我一定负。别人要负多少责任，也逃不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福佑，为了大家好。大家凑足材料，我好去彻底坦白。大家不说，也没啥。我晓得多少，就坦白多少……”

沉默，没有一丝儿声音，只是春风吹着小天井里的夹竹桃发出吱吱的音响。在肃静中，忽然一阵电话铃声，接着是马丽琳的娇滴滴的声音：

“延年，延年，你的电话……”

朱延年站了起来，看了大家一眼，说：

“你们再冷静考虑考虑……”

他匆匆到后面听电话去了。半晌。马丽琳端着一壶热腾腾的喷香的咖啡进来，给童进他们倒上，一边说：

“你们哪能这样客气？点心只吃了一点点，咖啡也没有喝完，嫌我这个主人招待不周吗？我刚才去烧咖啡去了，少陪你们，别怪我。谈了半天，该饿了，吃吧。”

刚才空气太紧张，大家坐在那里发愣，给马丽琳一招呼，慢慢缓和过来。

夏世富顿时叉了一块奶油蛋糕送到嘴里，吃了一口，说：

“多谢主人这么殷勤招待，哪能会怪你哩。给你一讲，肚子倒真的饿了。今天蛋糕做的好，肚子又饿，吃的特别香。”

“我不会做。延年说你们今天来谈谈，我就学做了一次。做的不好，请大家包涵包涵。”

“真了不起，”夏亚宾仔细注视着蛋糕，好像发现秘密似的，惊奇地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从沙利文买来的呢。”

“我们的夏技师又挖苦人了。”马丽琳听了夏亚宾的恭维的话，心里很舒服，瞟了他一眼。

童进望着客堂当中挂的那幅《东海日出图》出神：他想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但大家坐在那里不动，朱延年还没有回来，不便一个人径自走掉，但也不愿搭讪马丽琳那些客套话，他只好注视着红艳艳的太阳了。

朱延年接完了电话，回到客堂里，脸上紧张的神色并没有消逝。他坐下来，关心地问：

“你们考虑的哪能？”

夏世富本想应付两句，见童进的眼光从《东海日出图》移转过来，好像在注视他。他就没有吭声。别人也没有吭声。马丽琳莫名其妙地望着大家，为啥延

年一句话使得全客堂的空气又紧张起来呢？

朱延年看当时的情形知道童进从中作梗，今天要他们提供材料已经是没有指望了。不向朱延年提供材料其实也没啥，顶多是摸不清伙计们的底，但如果伙计们向增产节约委员会提供材料，那对朱延年是利不利的。他呷一口咖啡，想起刚才柳惠光打电话来催他早点偿还欠款的尾数，认为是一个机会，给这些伙计一点颜色看。他摆出很有把握的样子说：

“今天临时找大家来，事先也没给你们商量，当然想不起材料，慢慢再说吧。……”

夏亚宾听到这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次谈话总算快结束，他好跳出这个是非窝了。

“刚才工商联的马慕韩打电话给我，”朱延年一提到马慕韩，眼睛里顿时露出骄傲和羡慕的光芒，夏世富脸上也显出肃然起敬的神色。朱延年知道冒称工商联别的人打电话来头寸不够，只有提出马慕韩来才能压倒这些家伙。他从大家的脸色上看到这一着开始成功了。他有意把眼光注视着面前的咖啡杯子，不去望他们，低低地说，“他说福佑这几年在新药业有很大的成绩，对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有很大的贡献，是同行的光荣，也是工商界的光荣。在五反运动当中，如果有人故意捣乱，或者是乱说乱讲，工商联要追究这人的责任，要查问这件事，工商联要以

破坏五反运动的罪名来处理。”

马丽琳昂起头来，红腻腻的嘴唇里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童进怀疑地望着朱延年，在自己心中打了一个问号：工商联马慕韩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吗？

朱延年眼看这一计成功，他脸上的紧张神情消逝，嘴角那里漾开了笑纹，微微点了点头，说：

“当然，我是不会为难大家的。我是很爱护大家的。这一点请你们放心。你们以后想到啥材料，可以随时告诉我。这是新时代的劳资团结互相帮助啊。”

童进愤愤地站起来说：

“事体你都晓得，我们没有材料，你自己去坦白好了。”

朱延年看没有压住童进，并且童进公然站起来这么说，他也很生气，板着面孔说：

“我当然会去坦白的，用不着你操心。”

夏亚宾看见形势越来越紧张，怕自己给卷进去，一再看手表，皱着眉头，显出有紧急事体的样子，说，“经理，我还有个约会，现在辰光到了，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好吧。”朱延年淡然应了一声。

夏亚宾一溜烟似的走了，跨出朱延年家的后门，他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浑身感到非常的轻

松。

4

早晨八点钟，朱延年还在家里睡得很酣适，福佑药房的职工大会在童进主持下开始了。工会小组长童进传达了区里店员代表大会的报告，叶积善把朱延年请他们吃茶点的情形向大家报告。他绘影绘声地描述，讲得有声有色。区里店员代表大会号召全区店员踊跃检举不法资本家，而资本家朱延年却向店员伸出利诱的手。

当叶积善气咻咻地讲完坐下，有的就用牙齿咬着下嘴唇，有的眼光狠命地望着经理室……

童进见大家的神情，知道他们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他站了起来，对大家说：

“我们要根据区里店员代表大会的决议，踊跃检举不法资本家的罪行！我们要站稳立场，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勇敢检举……”

他的话越讲越快，声音也越激昂，手不断地在空中挥动，好像压抑不住的感情，语言已经来不及表达了，要用手来帮忙。

叶积善举起手来说：

“我保证写一封检举信！”

“我也保证写一封。”

接着有四五个人都举起手来，保证的誓言不断地为热烈的掌声打断。童进看到这样饱满的激动的情绪，心里按捺不住地高兴，年青的店员们大多数响应了区里店员代表大会的号召。但是靠近经理室门口那边一些人的反应很淡漠，夏亚宾坐在门口那里，露出半个身子，会场上的人几乎看不到他。他坐在椅子上，手托着腮巴子，像是一个大哲学家似的在沉思。他发觉童进在注视他，就连忙用手摸摸左边腮巴子，又摸摸右边的腮巴子，手没有放处，又托着腮巴子。他把头低了下来，望着自己的黑皮鞋出神。紧靠着他坐的夏世富却蛮不在乎，他直面着童进，显出有点瞧他不起，仿佛说：别那么认真，神气活现做啥。

童进不注意这些，他所关心的是检举信，越多越好，揭发朱延年的五毒罪行越彻底越好。他对这一角落的人问道：

“怎么样？”

夏亚宾听到童进的声音，以为是在问他。他慌忙把眼光从黑皮鞋的尖头上收回来，怯生生地抬起头，很不自然地对着童进。怕童进注视他。他就望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和参差不齐的高大的楼房。他的心怦怦

地跳，对自己说：别人写不写检举信，没有意见；自己不能写，一写，今后哪能有脸见朱延年？见了朱延年，怎么好意思讲话？无论如何不能写啊。不写？童进这里怎么交代呢？大家要写检举信，夏业宾为啥不写呢？夏业宾不是工会会员，自然可以不写。不写，对。不是工会会员，难道连店员也不是吗？是，是店员，而且是高级职员。高级职员就可以不写吗？看样子，说不过去。那么，写。真写？写了，朱延年会怎么样？福佑会怎么样？朱延年一定倒霉，福佑一定关门。夏业宾呢？夏业宾失业。这，这当然不能写；不写，可是童进的眼光正对着自己哩，真糟糕。

幸好夏世富开口了，把夏业宾从左右为难的窘境里救了出来。他说：

“怎么样？你写检举信好了。”

夏世富不含糊，干脆一句话把童进顶了回去。没待童进言语，叶积善抢着质问道：

“我们当然会写，用不着你管。你自己呢？”

夏世富轻松地笑了一声，随便答道：

“也用不着你管。”

童进凭着他和夏世富比较熟悉的关系，听他这样吊儿郎当地答话，怕引起别人的误会，很严肃地说：

“世富，谈正经的事情，不要开玩笑。”

夏世富不假思考，立即回答：

“没开玩笑，是谈正经的。”

叶积善有点火了，大声地说：

“你这是啥意思？别人都表示了态度，要写检举信，参加伟大的‘五反’斗争。你不表示态度，不用别人管，还拒绝别人的帮助，你这是啥态度？”

“啥态度？”夏世富双手在胸前交叉地抱起，往木椅背上一靠，下了决心似的说，“不写。”

叶积善指着夏世富的鼻尖说：

“是你讲的不写！”

“是我讲的。”

叶积善气呼呼地逼紧一句：

“夏世富，你不拥护区里店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夏世富瞧叶积善那股急躁的劲，他显出特别平静，冷冷地说：

“我不是代表，也不是工会会员……”下面的话夏世富没有讲出来，但大家也听懂他的意思。他的态度之所以这样坚决，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凭他的经验，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办事，总是一阵风，开头雷厉风行，好像不得了的样子，其实顶过去，就风平浪静。这会发动店员和资本家斗争，展开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将来，一阵风过后，夏世富还是福佑药房的外勤部部长，仍然要吃福佑的饭，按朱延年的

心思办事。现在抓住朱延年的弱点，狠狠地惩他一家伙，事后，朱延年那号子人，会轻轻放过你？吃亏的不是别人，是夏世富自己啊。何况童进加入工会以后。朱延年就给夏世富密谈过一次，认为童进这种青年跟共产党的屁股后头跑是没有前途的。好好的福佑药房的会计部主任，为啥要参加工会？福佑药房根本没有劳资关系，有事通过学习会解决，参加工会完全没有必要。童进参加青年团，朱延年认为更是近乎荒唐的行径。参加这些组织的人没有别的目的，一定是想依靠组织来对付朱延年的。五反运动展开以后。朱延年更坚持这一点意见。从此，有些事，他就不和童进商量，能够不告诉童进的事，也尽可能不告诉他。他的一切的事情都委托夏世富办。他知道，夏世富有培养的前途，凡事他不避讳夏世富。夏世富是朱延年肚里的一本最完整的账。那天吃过茶点，朱延年看夏世富态度还不够坚决，便私自约夏世富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努力，将来好正式当他的助手，做福佑药房的副经理。副经理这三个字在他的脑海里发出轰轰的巨响，诱惑着他。他现在自以为已经不是福佑药房的一名雇员，而是福佑药房的副经理。福佑药房假定关了门，副经理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在他看来，童进他们对“五反”这样起劲，是年青小伙子凭一股热情跟着胡叫唤，最后自己要吃亏的。所以他毫不犹

豫地回复了叶积善。

叶积善不吃夏世富这一手，马上正面反问道：“不是工会会员，就不拥护店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吗？”

夏世富依旧不正面答复，也反问过去：

“决议也没说要强迫命令啊！”他冷笑了一声。

叶积善再也忍受不住夏世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站了起来，圆睁着两只眼睛，质问夏世富：

“谁强迫命令的？你说。”

大家看他们两个人一句顶一句，刀来枪往，形势逐渐紧张起来。夏亚宾说道：

“有话慢慢讲，这是开职工大会，也不是两个人的辩论会，让旁人也发表发表意见。”

夏世富顿时抢上来说：

“对，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不能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夏世富暗暗又刺了叶积善一下。叶积善没理会这些，他坐了下去，说：

“请大家讲好了。”

夏亚宾刚才亏了夏世富把他救了出来，他歪着身子，深深地换了一口气。叶积善和夏世富顶撞起来，他一方面担心他们两个人把事体闹大，一方面又满足于自己因此被搁在一边，不会被大家注意。他感

到童进他们的眼光又在注视着他。他不能再不讲话了。他也应该表示表示态度。他仔细在脑筋里推敲一下用字，慢慢地说：

“我谈点意见，好不好？”

童进点点头：“好。”

“伟大的五反运动我们店员一定要参加的，没有一个人例外，这是肯定的。

……”

没等他讲完，叶积善对着夏世富鼓起掌来，好像说：你听见了吗？童进他们也都鼓掌欢迎他的意见。他接下去说：

“参加五反运动有很多工作，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也不一定同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有的人先走一步，做的早点；有的人慢走一步，做的迟点。我想，都可以的。凡事，要三思而行，不考虑成熟，就冒里冒失地干，恐怕也不大好吧。”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碰他。他常常超然于双方意见之上，保持自己的第三者的立场。“我这点意见不成熟，不晓得对不对，请大家指教指教。”

童进知道夏世富最清楚朱延年的底细。他知道要夏世富写检举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慢慢来。等到夏世富肯检举朱延年了，那福佑的问题，朱延年天大的本事也遮盖不住。争取夏世富要更多的时间和

更大的力量，不能鲁莽。并且，今天会上还有好几个人没有表示意见，更不能急。孙澜涛同志说的对，群众运动的发动，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耐心地启发，要用事实教育，要树立榜样。他等几个人说了话之后，他就说道：

“大家再考虑考虑，愿意写的，可以交给我们的工会转去，也可以直接寄给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或者寄给市的首长也可以。暂时不想写的，参加五反运动其他工作也可以。”

夏世富听了心里很高兴，他低低地说：

“这才像句话。”

叶积善听见了，想站起来，被童进发觉，一把将他按在原来的位子上。叶积善不满地向墙边的痰盂吐了一口痰。

童进用右手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不过，我自己是考虑好了，保证明天一定写一封检举信！”

马上响起了一片欢迎的热烈的掌声。

5

寂静的夜。马路上繁杂的人声和轰轰的车声已

经消逝，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轻轻迈着疲乏的步子，静悄中，远远传来叫卖声：“五香——茶叶蛋，”声音虽尖细，可是很高亢。

这时，福佑药房经理室的电灯还亮着。经理室里面坐的不是朱延年，也不是夏世富，而是童进。今天职工大会散了，他找夏亚宾谈了话，又安排叶积善去做夏世富的工作。明天，他还准备分组让大家谈谈区店员代表大会号召的体会。事情安排好了，他就思考写检举信。等到晚上大家都在外面会计部营业部摊开地铺准备睡觉，他拿了那本《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而斗争》的书，走进了经理室。他推说今天晚上想看点书，不回家，也不想睡觉。他看完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的报告，外边的电灯熄了，并且开始发出酣适的鼾声。童进摊开“福佑药房用笺”的信纸，伏在桌子上，精神贯注地写：

陈市长：

我是本市福佑药房会计部主任，同时，我也是一个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从广播当中听过你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我还代表我们福佑药房的工会参加了本区的店员代表大会。在你领导之下，我决心参加伟大的“五反”斗争，检举福佑药房不法资本家朱延年……

写到朱延年这里，他放下笔，凝神地望着台灯碧绿的玻璃罩子。

店员代表大会上，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委书记孙澜涛同志说的话，在他耳际回响。五反运动是阶级斗争，青年团员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站在五反运动的前列。朱延年几年来的猖狂进攻，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成员，应该带头检举他的五毒罪行，打退他的猖狂进攻，想到这里，童进马上提起笔来，在信纸上沙沙地写下去：

据我所知道的，根据账面不完整的统计（朱延年很多收入是不入账的），朱延年的五毒罪行主要有下面几项：

第一、行贿政府机关干部交际费一亿二千万万元；

第二、送苏北行署卫生处张科长礼物等一千六百万万元；

第三、扣发志愿军购买医药器材一亿三千万万元；把过期失效的盘尼西林卖给志愿军，暗害志愿军；

第四、制造假药复方龙胆酊等共约两亿元；

第五、朱延年自称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

造所，腐蚀国家干部思想……

童进写着写着，不禁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写下去，福佑药房不是要垮台了吗？”

福佑垮台，大家会失业吗？区里店员代表大会反复讲了这个问题，要大家放心检举，保证不让任何一个人失业。

夜已深沉。童进感到有点疲乏，走到窗口，把窗户推开，深深呼吸了一口春夜的清凉的空气。从海那边吹过来的风有点润湿，迎风一吹，浑身有一种舒适爽快的感觉。南京路那一带的商标霓虹灯早已熄灭了，现在残余着疏落的路灯，被一层蒙蒙的夜雾遮盖着。他注视着闪烁的星星一样的灯光。灯光静静的，好像也有点儿疲乏，如同想睡觉的人一样，眼睛一时张开一时闭起。

他默默地站在窗口，回想朱延年所犯的五毒罪行。

突然从他背后传来一阵清脆的当当的铃声，接着是一个人迷糊地高声大叫：

“啊哟，不是我，不是我呀！”

他回过头去，经理室里静悄悄的，桌子上的台灯发出碧绿的光芒，越发显得幽静。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方向，断定是斜对面 X 光部传出来的。他轻轻打开经

理室的门，对着 X 光部凝神一听，果然里面有人讲话：

“唔，真吓了我一跳。”

他知道这是夏世富的声音，便走了过去。

夏世富自从参加了本店的职工大会，他的心一直不能宁静。今天晚上他特地从营业部放地铺的老地方搬到 X 光部睡，睡了好一阵，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起来，拿了一片巴比妥用开水送下去，开始也还是睡不着，他长吁短叹，想发脾气，又怕人发觉他有心思，只好在铺上忍气吞声耐心地数着数目：一，二，三……不知道数到多少数目，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他睡的并不酣适，朦朦胧胧地走进法庭。法庭上面坐着一个老年审判员，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制服；他的左边是一个中年的陪审员，录事坐在他的右边，低头在忙忙碌碌地记着口供。被告席上站着的是朱延年，下面十几排旁听席上坐满了人，面孔很熟悉，可是连一个人的名字也叫不出来。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

“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

夏世富慌忙回答：

“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

“你参加了工会吗？”

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

“我参加了工会。”

“有工会会员证吗？”审判员的态度缓和了一点，冷静地问他。

“有，有有……”夏世富连忙掏工会会员证，几个口袋都找遍了，没有。

陪审员有旁边插了一句嘴：

“说有，怎么没有？”

“有，有，真有。”夏世富急得满头是汗，他再向每一个口袋摸，几乎要把口袋翻过来了，还是没有。最后，他把手插到衬衫的口袋里，摸到一块长方形的硬东西，他的脸上闪露着笑容，掏出来一看，果然是红派司。他笑嘻嘻地送到审判员面前，说：

“这是红派司。”

审判员看了看，退了给他。他这时才发现工会会员证上有一块黑黑的污点。他想：糟糕了，审判员一定看到这个污点。我名义上是工人阶级，可是有污点，听朱延年的话，想做资本家。他怕审判员的眼光，也怕被告席上朱延年的眼光，更怕旁听席上的眼光。他低下头，偷偷地溜出法庭，一口气跑回福佑药房，把被蒙着头呼呼大睡。

不知道是哪个恶作剧的人，把 X 光部桌上的闹钟拨到三点，半夜里就响了。夏世富梦中听见闹钟响

了，以为是法院发现他冒充工会会员，派红色警车来抓他这个不法资本家。他就高声大叫：

“啊哟，不是我，不是我呀！”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发现是一场虚惊，弄得浑身是汗。他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唔，真吓了我一跳。”

童进不知道屋子里出了啥事体，在门上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

“世富，啥事体呀？”

夏世富扭亮了电灯，把门打开，掩饰地说：

“没啥，刚才做了一个恶梦……”

“哦，”童进会意地说，“我以为出了事体呢。”

“没有事，”夏世富怕童进再追问下去，他不愿把恶梦讲出来，就反问道，“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童进也不希望夏世富问他在做啥，便支吾地说：

“就要睡了，你也好好睡吧，别再叫了，刚才可把人吓坏了。”

夏世富“唔”了一声。童进给扭熄了电灯，轻轻带上门，退了回来。他坐下去，对着那封没有写完的信，向经理室四面望望：朱延年就在这间屋子里做下了许许多多的坏事，单是经过童进的手也不知道多少件。童进入团前后，在这间屋子里，因为那些事，和朱延年吵过多少次。过去的事一件件又闪现在他

的眼前。他想：像福佑这样的商业存在，社会怎么会发展，国家怎么会兴盛？不改造它，真的像陈市长在五反运动报告里所说的，美丽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又哪能会实现？要彻底检举朱延年，揭发他的五毒罪行，撕下他的假面具，报告陈市长。

他精神焕发，提起笔来，伏在桌上，一口气沙沙地写下去。他写完了，又看了一遍，写好信封，贴上邮票，带着信悄悄走下楼去。马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他迅速地走去，在马路口那里有一个邮筒，他把检举信投了进去。他生怕没有完全投进去，又歪过头来看看，知道投进去了，这才安心地轻松地走回来。

外滩那边的天空，泛着一抹淡淡的鱼肚色，慢慢扩大开去，天快亮了。

6

夜晚，村里人大部分都睡觉了。朱筱堂的房子靠墙放了一张方桌，那上面放着一对小蜡烛台和一个小香炉。小白蜡烛摇曳着光芒，照出墙上贴了一张长方形的白纸，上面写着：

先考朱暮堂府君之灵位

孝子朱筱堂泣立

朱暮堂血腥的手曾经屠杀过许多农民和干部，在他压榨下家破人亡的更不知道多少。他那天在农民控诉大会上被捕以后，经过人民法院调查和审问，每一件材料都说明他的罪大恶极，判了死刑，在梅村镇外边执行了。朱筱堂和他娘去收了尸，埋葬了。朱暮堂的房子分给农民住了。朱筱堂和他娘搬到汤富海原先的屋子来住了。

本来，他娘想买个神主龕给供起来，一不容易买，二又怕招摇，就用张白纸，叫朱筱堂亲笔写了，贴在墙上。每天夜晚，村里人们睡觉了，娘儿俩便在灵牌前祭奠。

他娘点好了蜡烛，又点了香，把一碗倒头饭和一碟子菜放在灵前桌子上面，一双筷子笔直地插在饭里。她头上梳了一个S髻子，上面用麻扎着。她走过去，对着灵牌叩头，嘴里叽叽咕咕地叨念着：

“你……你死得好苦呀……我没有给你做

① 旧俗，人死之日算起，每隔七天谓之逢“七”，七、七共四十九天。在这一天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

‘七’^①，也没有请和尚来做做佛事，念念往生咒……这不能怪我啊……世道变了呀，共产党来了啊……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才弄到这份家业，……现在，……现在全完了哪……一点也没有留下……一点也没有留下啊……你……”

朱筱堂穿着一件人字呢的旧夹袍子，灰不溜溜的；头发像一堆乱草似的，脸上的胡髭也没有刮，面孔显得有点儿清癯。他脚上穿了一双黑直贡呢的圆口鞋子，鞋头上缝了一块白布，白布上端镶了一条红边。他坐在灵旁发痴发呆地望着娘。

她一边唠叨，一边想起过去荣华富贵的生活。谁走进梅村镇，不首先望见朱家高大的宅第？哪个不知道附近几十里地没有一个庄稼汉种的地不是朱半天的？靠朱家养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真像古人说的：钱过北斗，米烂成仓，僮仆成群，朱马成行。朱家有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用不完的金银财宝。哪一任无锡县的知县上任不到朱家来拜访拜访？有的还得送些人情。现在可好，共产党一来，兴啥土改，把朱家的财产全分给乡下那些穷泥腿子，连朱家的那座花园房子也分给穷泥腿子住了，让这些人住进去，不是糟蹋东西吗？想起来，真叫人心痛。没想到朱家几辈子积累下来的财富，朱暮堂一生经营的产业，一下子全完了。朱暮堂养活过不知道多少人，

落了个“老虎”的恶名。人民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尽听穷泥腿子的话，把条老命给害了！她现在是人财两空，好不伤心啊！

她想到这里，望望汤富海那间破房子，触景生情，眼睛忍不住发红，幽幽地哭泣了。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嚎陶大哭一场，发泄发泄积郁在心头的愤恨。她想到现在的处境，夜又深了，哭声传出去，引起街坊邻舍的注意，以为朱家出了事哩。她努力压抑着胸中汹涌的愤恨，但又抑制不住，抽抽噎噎地哭泣。

朱筱堂见娘哭个不停，他也忍不住心酸，簌簌地掉下眼泪来了。

娘一边哭泣，一边唠唠叨叨地诉说：

“你倒好……眼一闭，脚一伸，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俩……活受罪……看村里那些泥腿子多神气，……汤富海抖起来了，又有田地，又有房子，眼睛简直长到额角头上去了……我们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你，你死鬼有灵，也该显显圣哟……托个梦给我，也是好的呀……就看我们母子俩这样下去吗……”

说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了，啥也不管了，只顾扶着灵桌哇哇地哭起来了。儿子听见哭声很高，怕引起四邻注意，慌忙站起来，按着娘的肩膀，使劲摇了摇，说：

“娘，别哭了，别哭了……”

“你别管我，你让我哭哭，我心里才舒服……”

“你有啥闲话对我讲好了，别哭吧，娘。”

“我心里实在闷死了。”她还是嚤嚤地哭泣着，指着灵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继续唠叨，“死鬼，你当年的威风到啥地方去哪？你一辈子走在人前头，没有吃过亏，也没有受过委屈，更没有看过别人的眼色，……为啥这回做了屈死鬼，不言语呢？……你死得苦呀，你死得惨……你丢下我们母子俩活受罪，……你应该在阎王面前告告状呀……你应该到汤富海家显显圣呀……让这些穷泥腿子家宅不安，大祸临头……暮堂呀暮堂，你听见了没有？……你……你听见了……没有……”

朱筱堂从人字呢旧夹袍子里掏出一块脏手帕，给娘揩了揩眼睛，劝她别哭了。她把肚里的话倾吐了差不多，闷在心头一块铅也似的东西消逝了，心里好过些。她擤了擤鼻子，喘了喘气，凝神地望着灵牌。她好像从灵牌上看见朱暮堂，如同生前一样，穿着一件古铜色素缎的狐腿袍子，手里托着一只银制的长长的水烟袋，愁眉苦脸地望着他们母子俩。她再认真一看，灵牌的人影又没有了，只是灵桌上的烛光跳跃，一根香点了一小半，袅袅地飘着轻烟。她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要儿子也行了礼，指着灵牌对他说：

“你晓得你爹哪能死的？”

“给共产党枪毙的。”

“我们为什么住到这个破房子里来？”

“农会赶来的。”

“我们原来的房子呢？”

“叫农会分了。”

她紧接着问：

“啥人住到里面去了？”

“汤富海那些泥腿子。”

“我们那些财产家具到啥地方去哪？”

“都分给泥腿子了。”

“我们为啥落到这步田地？”

“都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他咬着牙齿说，“穷泥腿子翻身了，地主倒霉了。”

“对，好孩子！”她抓住他的手，坐在床边，一面抚摩着他，一面夸奖他，说，“你记住这些，很好。娘欢喜你。要常常记住。”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他把脚狠狠地往地上一踹，倒竖起眉毛，圆睁着眼睛，愤怒地说，“我见了汤富海那些人就生气，恨不能抓过来狠狠揍他一顿，像爸爸那样，抛他的笆斗！”

“住嘴！”她用手捂着他的嘴，向四面扫了一眼，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只有小白蜡烛的光芒跳动

着，一闪一闪的，偶尔发出一点吱吱的声响。她提心吊胆地说，“孩子，讲话小心点，别叫人听了去。”

“那些家伙早睡了。有谁听？”他把头一甩，说，“听去也不怕！”

“不怕？现在不是从前那个世道啊，穷人当家了，我们要小心点才是。”

“听去又哪能？大不了脑袋搬家，我豁出去了，准备给他们拼……”

“你不能这样，白送了性命，也报不了仇。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现在得忍住……”

“我真想……”

他一句话没有说完，娘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她警惕地对儿子摇摇手，迅速地走到灵桌面前把蜡烛吹熄了，慢慢摸黑摸到床前坐下，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她的手有点颤抖。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料想有啥事体，低低地问娘：

“啥事体？”

“外边有人……”

“有人？”

“唔……”

“我去……”

“别走……人家问起……刚才那些话可不能说……”

“我懂得，我不会说……”

“好……”

外边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下来。她想这一下可完蛋了！刚才她和儿子谈的那些话一定叫人听去了。这个罪名可不小呀！讲出去的话，再也收不回来了。阴错阳差，早知道流年不利，少说些才好。是非只因多开口，现在挽回不了，可怎么是好。她自己反正老了，有个山高水远，也就由它去了。可是朱筱堂还年青，朱家只有这一条根，千万不能出事呀！人已经堵在门口了，汤富海这劳什子房子没有第二个门，屁股大的一间房子，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逃到啥地方去呢？只好硬着头皮留在屋子里，听天由命了。她屏住呼吸，叫儿子别吭气。屋子里静静的，可以听见儿子急促的呼吸声。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她想：这一定是村干部布置好了，把房子四周包围起来，敲门捉人了。她额角上渗出黄豆大的汗珠，流到眉毛那里。这间房子好像忽然热了起来。她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仿佛一松开，就再也不能在一块了。

门外有人小声地问：

“睡了吗？”

这声音好熟，但她一时想不起是谁的口音。她想顶过去，不理睬，等到天亮，人家再问起，好把夜里

讲的话赖得一干二净。

门外那人好像知道屋子里的人没睡，很有信心地又问：

“睡觉了吗？朱太太！”

她好久没有听人家这样称呼她了。这一句唤起她亲切而又幸福的感觉。她低低问道：

“啥人？”

“是我，苏沛霖，快开门……”

她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立刻松了儿子的手，站起来，摸到一盒洋火，划根火柴，点燃了蜡烛，走过去，开了门。苏沛霖一进门，转身敏捷地把门关上，抱歉地说：

“叫你们受惊了吗？”

“没啥。”她若无其事地说。

朱筱堂的手上满是汗。他把手按在人字呢的夹袍子大襟上，惊悸还没有完全消逝，认真望了苏沛霖一眼，说：

“还以为是村干部哩，原来是你！你为啥不早打声招呼？苏账房。”

“大少爷，你不晓得现在村里人多口杂，行动不方便。白天又不好来，只好夜里来。刚才看到屋子里有亮，晓得你们没睡。走到门口，忽然亮没有了，我在门外吓了一跳。……”

“你怕啥？”朱筱堂现在有点羡慕苏沛霖，在村里没有像地主那样受人注意，可以到处跑来跑去。他们母子俩却受管制了。

“远远听到像是有人哭，到门口又听不见了。灯一灭，我以为屋里出了事。敲门没有应，又不好进来；站在门外，又怕给人发觉……”

“没想到使你受惊了。”她没有告诉他刚才屋子里惊慌的情形，问他，“这两天村里怎么样？”

“那些穷泥腿子分了田地又分了房子，可高兴啦，大家像是发疯一样，没日没夜的蹲在地里，像是穷光棍讨了个漂亮的老婆，日日夜夜看不够，就差把田地搂在怀里睡觉哪！”

“让他们高兴去，反正好日子过不长。”她想起朱暮堂生前说的话。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苏沛霖坐在灵桌旁边，对着母子俩低声说，“汤富海在村里成了大人物啦，整天跟在村干部屁股后头转。他是农会的积极分子哩！”

“汤富海？”朱筱堂一听到汤富海三个字心里就涌起无边的愤怒，显出轻蔑的神情说，“他欠我们的一百一十多担租子，还没有还清哩。汤阿英从我们家逃走，到现在还躲在上海。我爹要不是他在大会上瞎三话四，也不会被害！别看他现在神气活现，这笔账，

将来总要算的。”

“那还用说！”因为朱暮堂判了死刑，苏沛霖在村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朱筱堂在村里变成一堆臭狗屎，谁见了他都离得远远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搭界，就连小孩子见了，也指着他的脊背骨骂朱半天，叫他听的心里像刀刮似的难受。只有苏沛霖还暗地里和朱家保持往来。他认为世道还要变，共产党在无锡呆不长久的。姑老爷徐义德在上海滩上的势力很大，即使朱筱堂在乡下吃不开，一到了上海，将来还是会飞黄腾达的。他和朱家这条线无论如何不能断。患难中见朋友。在朱筱堂倒霉的辰光，他暗地里照顾照顾，将来不会把苏沛霖忘记。今天夜里，他特地来看他们母子俩，看看有啥可以效劳的。他听了朱筱堂的口气，知道他要报仇泄恨，便火上加油，迎合地说，“这笔账非算不可！提到这些事，我就为老爷抱不平。好心当做驴肝肺，汤富海这老家伙恩将仇报。不是朱老爷给他田种，他能活到现在？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没有好下场。”她说了这句话，暗中窥视了苏沛霖一眼。

“太太这话一点也不错。”苏沛霖伸过头来，紧靠着她说，“这两天好吗？有啥吩咐？我给你去办。”

她叹息了一声，兴致阑珊地说：

“这日子谈啥好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三餐茶饭送进嘴，躺到床上睡下，就算又糊过一天。现在啥人也不理睬我们了。你没把我们忘记，常来看看我们，我们也算得到一点安慰。”

“我昨天就想来看你们，手里有点事，走不开。今天才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们的。”

“我也常常想你。”朱筱堂说，“蹲在这间破房子里，可把我闷死哪！”

“你放心，这样的日子不会长的。”

他懂得苏沛霖讲话的意思，也暗示地说：

“长是不会长的，可是眼前的日子不好熬啊！”

娘不同意儿子的意见，说：

“古人说的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要熬到哪一天啊！”朱筱堂深深叹息了一声。

苏沛霖看灵桌前面那一对小白蜡烛快点完了，烛油一滴一滴往下流，芯子给烧得发出吱吱的音响，烛光慢慢暗淡下来。不知道村里谁家的鸡在喔喔地打鸣了。他站了起来，说：

“辰光不早，我该走了。你们先在这里委屈一下，我想，将来你们一定会搬回去住的。”

她听到最后那一句话，脸上顿时开朗，兴致勃勃地说：

“但愿有那一天！”

7

梅村镇外边一片土地上都插着小白旗，在一处小白旗当中，靠村边高高挂着五星红旗，迎着从太湖吹过来的潮湿的风，呼啦啦的飘。

汤富海父子两个人分到了两亩八分田和朱暮堂家大厅当中的一间房子。汤富海那天夜里整整一宿没有睡觉，嘴里老是念着“两亩八”，在床上翻来覆去，听见阿贵不断打着香甜的鼾声，他反而有点生气，喃喃地骂阿贵：“这小狗×的，真会睡！”他起来，到窗口望望：黑沉沉的，啥也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也少了。村里的公鸡伸长脖子啼叫，可是东方没有一丝儿白的影子。他点起煤油灯，望见阿贵睡的那股舒服劲儿，不再骂了，微微地笑着说：“你们这些年青人，该享福了，睡吧，睡吧。”他自己拍出旱烟袋，装了一锅烟，衔在嘴里，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脑筋里想着“两亩八”。

像是有谁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灯笼，照亮了东方云彩。起先只看见长长一片薄薄的云彩，白雾一般的高高浮在天空，接着这长长一片薄薄的云彩仿佛

自己有一种扩张的能力，逐渐扩大开去，白雾般的云彩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簇崭新的棉絮似的，给它后边的蓝色的天空一衬，越发显得皎洁。转眼之间，蓝色的天空忽然发红，在东边最远的地方，如同有成千上万只彩色的探照灯，发射出万丈光芒，把雪白的云彩顿时给染成橘红色了。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来了。汤富海的心里，也像是受太阳光芒的照耀，过去藏在心里的那些辛酸和苦痛的记忆都一扫而光，现在是充满了喜悦的光芒。

屋子里的事物已经完全可以看清楚。汤富海吹灭了煤油灯，走到床边，望着阿贵。他的鼻孔里发出均匀的呼吸，眼睛紧紧闭着，睡得还是很甜。汤富海推推他，他“唔”的一声，翻过身去，又睡了。汤富海一宿没睡，也有点疲倦，打了一个哈欠，想起“两亩八”，精神又抖擞了。他推推阿贵的肩膀，叫道：

“快起来！”

阿贵用手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

“做啥？人家睡得真舒服。”

“不早了，起来，同我一道去。”

阿贵霍的跳下床，穿上衣服，扣着钮扣，问：

“这么早，到啥地方去？”

“到地上去。”

汤富海不由分说，拉着阿贵就走，门也顾不得扣

上了。分给他们两个人的两亩八分田在村东边不到一里地的地方。父子两个走了没有一会就到了。汤富海在田埂上向四面不断地张望，发痴似的站着，远远看去似乎是钉在田边的一根木桩子。过了好一阵，他走到田的另一边，站下来，又呆住了。他看来看去，心里说不出的欢喜，嘴角上露出满意的笑纹。他弯下腰去，从田里抓起一把有些润湿的泥土，平铺在左手心里，把它捏得细碎，粉末一般，送到鼻子那儿闻闻，又凝神地瞧了瞧泥土，然后才爱惜地撒回田里，自言自语地说：

“好地！好地！”

阿贵见他把泥土扔回去，便催促道：

“不早了，该回去做饭了。”他去拉爹的手。

“不，”爹把手一甩，往事从他心头涌起，感伤地望着阿贵的长长的面孔，叹息了一声，说，“你爷爷临死的辰光跟我说，他一生一世吃辛受苦，种了一辈子的田，越种越穷，死后还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他要我想别的办法，不要再种这断命田了。我是跟你爷爷在田里长大的，不种田，走哪条路呢？只好种朱半天的田，一年忙到头，还是饥一顿饱一顿，干饭吃不上，老是喝点汤呀水的。我做了三十年的梦，希望啥辰光自己能买点田。过去穷得叮叮当当响，揭不动锅盖，哪有钱买一分田？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

身，我要做一辈子买田的梦哩。现在分到两亩八分命根子，烧掉了朱半天剥削我们的‘方单’^①，领到人民政府的‘土地证’，这件事好不容易啊。我们这些种田人，过去是‘木匠屋里三脚凳’^②，‘方单’像是金蝴蝶，做梦也没有见过。如今金蝴蝶飞到穷人家来了。你想想看，你爹舍得走吗？”

“不走，住在这里？”阿贵嘴上虽然这么说，刚才听到爹说起过去的一段事情，自己年纪青，没有经历过，一听，对这两亩八分地更加有了感情，也站在田边没有走。

“孩子，不准顶嘴！”爹用右手的食指点了点阿贵的额角头。

“好，不走，不走……”

汤富海满意地“唔”了一声。他弯下腰去，把田边的野草一点一点连根拔起，阿贵不解地问他：

“现在还早哩，拔草做啥？”

“早拔怕啥？”他认为让野草在自己的田里生长太可惜了，但也觉得用不着现在就拔野草，改口道，“不拔就不拔，听你们年青人的话。”

“走吧？”

① “方单”指田契。

② 穷的意思。

他没有理睬阿贵，径自走到田边，看见不到三丈远的地方有个小塘，又看看自己的田，指着东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地方好车水，那个角上好放水，……”

说着说着，他就蹲下去，用手壅土，修起水路来了。阿贵见他一心一意地修水路，又好气又好笑，急得再也忍不住了，走过去一把把他拉起来，指着水路，急着说：

“现在没水，爹，用不着修水路……”

“没水就不修？”他的眼光还是注视着那条像锯齿似的水路，想再蹲下去。

“以后修来的及，”阿贵堵着嘴说，“现在修了，没两天，人家踩来踩去又坏了。”

“等我把这一段修好……”他固执地又蹲下去，修他脚下的那一段。

阿贵拗不过爹的脾气，他不肯走，自己不好意思先走，也不好意思空着两只手站在旁边观望，于是也蹲下去，帮助他很快修好，弄得满手是泥土，站起来说：

“行了吧？”

他望了望那一段水路，想象中水可以很顺畅地流进来，一点也不会漏出去，满意了。他站了起来，说：

“行了，行了。”

他们两人顺着田埂走去。阿贵走在前面，脚步很快；他走在后面，仿佛怕踏死脚下蚂蚁一样，一步一步慢慢地走。阿贵走了没两步，身后的脚步声忽然消逝了，回过头去一看：他蹲在田里整顿田埂了。阿贵无可奈何地“啧”了一声，只好走回去，站在他身旁，语气里流露出一满的情绪：

“哪能又整起田埂来了？”

“整整好走路哇！”

“唉！”

他也知道儿子肚子饿了，心里焦急，便说：

“这块整好就走……”

“好，好好……”

阿贵摇摇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动手帮忙一同整整田埂。

太阳已经高高地升到天空，耀眼的阳光射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们两人修了水路又整田埂，身上有点汗浸浸了。汤富海一宿没合眼，又劳动了这一阵，身子有点乏，也觉得饿了。这次是他先提出来要走，阿贵连忙拍拍手上的泥土，和爹一同走去。爹走了没两步，总要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两亩八分地，恋恋不舍。

田野上远远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吸去了阿贵的注意。他向四边张望：田野上一座一座的村庄上空都

飘扬着五星红旗，越向村子走去，那喜洋洋的锣鼓声听得分外响亮，像是每个村庄每户人家都在办喜事。他不由地顺口唱了起来：

东庄红旗飘，
西庄锣鼓敲；
敲锣打鼓干什么？
土地改革完成了……

爹听到阿贵的歌声，回过头去，眯着眼睛注视了他一下，嘴角上漾开笑纹，高兴地说：

“瞧你不起，也会唱洋歌了！”

“村里老师教的，大家唱，我也跟着学会了。”

“你这孩子，”他认为阿贵从小没有念过一天书，没有喝过墨水，将来不会有出息的，想不到也会唱起洋歌来了，心里按捺不住地喜悦。他打算以后有机会让阿贵上上学校，说，“等你爹把田种好了，秋后收成好，也给你念念书。”

“真的吗？”阿贵早就想念书了，过去饭都吃不上，不好提这件事。

“你爹会说瞎话？”

“那好。”

他们回家吃过早饭，爹在床上打困一歇，找了一

块红布条，请村里教师在上面写了五个字：“感谢毛主席”。他拿了一根一丈来长的细细的竹竿，带着那块红布条走了。他走到两亩八分地那里，把红布条拴在竹竿头上，将竹竿深深地插在两亩八分地当中，那块红布条像面小国旗似的，迎风招展。他又站在田边东头张张西头望望。他回来，快乐得嘴都合不拢来。在路上碰到苏沛霖，他有意高声叫道：

“铁树开了花，土地回老家。”

“铁树开了花，土地回老家。”苏沛霖学汤富海得意的腔调，也唱了起来。他迎上去，对汤富海说，“这回算是真的翻身了！”

汤富海听他的话讲的不错，便“唔”了一声。苏沛霖接着说：

“过去我们村的田地尽让朱半天一个人霸占着，他像个皇帝似的，骑在我们头上，叫我们挨饥受冻，吃不饱穿不暖，福气就叫他一个人给享去了。现在地主给打倒，田地还给农民，今后再也不受地主的气了。汤老伯，你说，是啵？”

“汤老伯”这三个字汤富海听来特别新鲜，他想起过去苏沛霖对他的态度，有意顶了一句，说，“那可不是，你最清楚不过了。”

苏沛霖的脸顿时红到耳朵根子，抱歉地说：

“我这个人糊涂。过去在朱半天手下，给他逼的

没办法，捧了人家的饭碗，只好服人家管。有些事，老实说，我心里也不同意。过去对不起你的地方，请汤老伯高抬贵手，让我过去。”

汤富海心里的不满，给苏沛霖一说，慢慢消逝了。他说：

“我也晓得是朱半天使唤你那样做的，可是也有你的账。”

“那是的，那是的。怪我糊涂，没有看清世道，不是为了糊口，混碗饭吃，早离开他就好了。”

“现在离开也不迟。”

苏沛霖显出惊异的神情，说：

“汤老伯，你还不晓得吗？我早和朱家一刀两断了。过去吃的苦头不够吗？这回可明白了。”

“那好呀！”

苏沛霖怕他再深问下去，慌忙转了话题：

“你分的那二亩八分地真好啊。”

“是块宝地。”汤富海一听到谈他的地，就眯起眼睛笑了。他说，“好好经营，收成不会错。”

“你的庄稼活做的好，全村都晓得的。阿贵体力又好，你们两个好好劳动，秋收一定呱呱叫！”

“现在还很难说，单靠劳动不行，还要多上肥。”

“我听说人民银行要给农民贷肥，你没听说吗？”

“我今天没有到农会去，刚从地里回来，这消息

真的吗？”

“人民银行无锡分行的同志在村里说的，那还会有假！”

汤富海兴奋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对苏沛霖大声说道：

“从来没有这样的好政府，关心老百姓到这个样子。共产党毛主席简直赛过活爷娘。想想从前，越想越苦；朝后想想，越想越甜，越想越要笑啦。”

他说完了，发出爽朗的愉快的格格的笑声。

“是呀，今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现在地有了，房也有了，只看自己劳动了。”

汤富海怕耽误了光阴，脚步一步比一步快，好像有急事在等他去做似的。走到村口，苏沛霖怕给村里人看到他们两人走在一块，别怀疑他有啥活动，便和汤富海分手了。

汤富海生产劲头越来越大了。他带着阿贵起早摸黑，先把田边的茅草一棵棵挖光，又把田做了畦。他贷到稻种和豆饼，嫌肥不够。父子俩在塘里捞了几十担水草，他仍旧觉得肥不够，又没有多余的钱再买豆饼。一天，吃过中饭，便叫阿贵和他两人拾狗屎。阿贵不肯，提出反对的意见：

“总共只有两亩八分地，有这些肥还不够？”

他不假思索地把脸一沉：

“当然不够。”

阿贵没有给吓倒，反而问道：

“从前田里啥辰光上过这许多肥？现在比从前加多了，够啦，爹。”

爹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含着责备阿贵太年青，不懂事的意思。半晌，他回忆地说：

“从前给啥人种田？你晓得啲？”他一想到过去便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咬着牙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种的是老虎田，多施肥，多收成，朱半天这王八蛋就多加租。不加租，他就摘田。一年忙到头，忙到稻熟登场，苏账房来拿走，落得一场空。那辰光，我们凭啥多施肥？现在，现在给自己种田，不是给别人种哪。当然要多加肥。种田要一工二本，你不给它加工施肥，它不给你收成。傻孩子，懂吗？”

阿贵虽然不愿意出去漫无目标地拾狗屎，但给爹说得目瞪口呆，无从反对了。他想了想，皱着眉头，问：

“到啥地方去拾呀？”

爹知道他同意去了，脸上露出笑容：

“自然在地方去拾。狗子拉屎有窝，今天在这里拉，明天还在这里拉。狗子拉屎喜欢在背风的地方，天冷，狗子跑不远，在村边附近就可以拾到。天暖和，狗子满地跑，要拾得远些……”

阿贵听出了神，觉得照爹这么说拾狗屎并不难，引起兴趣来了，好奇地问：

“那么，啥辰光狗屎多呢？早上？还是……”

爹摇摇头，说：

“狗子一天要拉三次屎：大清早，中饭后，下午。中饭后一次拉的最多……”

阿贵听到最后一句吃了一惊，急急忙忙接上去说：

“就是现在？”

爹给阿贵一提醒，紧接着说：

“唔，就是现在，快走！”

他们两人拿着畚箕，匆匆跑到村口，爹叫阿贵往西走，自己朝东边一路去拾了。阿贵照爹指点的地方拾，到黄昏时分，果然拾满了一畚箕，赶回家来，爹已经拾了两畚箕倒在地上，蹲在白石的台阶上，悠闲地抽旱烟了。

地上的狗屎堆得像一座小丘了，父子两个人把它挑到田里。爹挑起最后一担，忽然想起一件事，把狗屎放下，拿了两把泥锄，挑起沉甸甸的担子上田里去了。阿贵把最后一担狗屎倒在田里，已经是气喘如牛了，抹去额角的汗珠子，正想喘口气，好好休息一阵子，不料爹递给一把泥锄来，说：

“来，同我一道锄锄。”

“早几天不是锄过了吗？”阿贵没有接爹的泥锄。

“锄过就不要再锄了吗？给我拿着。”爹把泥锄硬塞在阿贵的手里，教训他道，“任叫人忙，不叫田荒。你晓得啵？床要铺好，田要锄好。床铺好，睡得舒服；田锄好，多打庄稼。”

“你就是一门心思要多打庄稼……”

“要多打庄稼错吗？没粮食，你肚子填的饱？”

阿贵给问得没有话说，望着手里的泥锄，听爹说下去：

“你还不知没有粮食的苦吗？我活了四十八岁，娘老子没有给我留下一片瓦一分田，只留给我一肚子的苦水，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有了房子，又有了两亩八分地，能不好好种吗？你年纪太青，不懂得世事。”

“我懂得，”阿贵想起自己生下地来，饥一顿饱一顿，碗里从来没有见过鱼肉，也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都是用旧衣服补补缝缝，给爹一提，自己肚里也有不少苦水哩。他说话的声音低沉下去，“我懂……”

“那就好，锄吧，打下粮食都是自己的了，把它放在箩里，地主连香也不敢闻一闻。”

他跟着爹一同锄地，直到雀眯眼了，两个人才迈着疲乏的步子往村里走去。

8

东方泛出一抹淡淡的鱼肚色，汤阿英的草棚棚里还是黑乌乌的。她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再也睡不着了。昨天秦妈妈通知她参加重点试纺，她兴奋得差一点跳了起来。她觉得这是党支部和团支部对她的信任和培养，也是细纱间工人同志委托她的重大任务，深深感到肩膀上挑着一副重担。这是关系全厂生产的大事，也是和徐义德他们的一场严重的斗争。通过重点试纺，要揭露过去厂里生活难做的秘密，看看徐义德他们摆的究竟是什么迷魂阵。她自从被吸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感到做一个青年团员的光荣，更感到做一个青年团员责任的重大。她当了青年团员以后，身上猛地增加了巨大的力量，希望有机会给革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恰巧遇到重点试纺，团组织把细纱间试纺的重担放在她的肩膀上，正好符合她内心的期望。她昨天晚上躺到床上，翻来覆去想着重点试纺的事，心里宁静不下来，闭上眼睛，却还是看到自己挡的那排车子，注视着粗纱，注视着筒管，注视着细纱，注视着筒管在飞快地转动，那上面的细

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她慢慢睡着了，草棚棚那一带的雄鸡已伸长脖子打鸣了。她睁开惺忪的睡眠一看，窗户纸已渐渐发白了。她坐了起来，怕惊醒丈夫，轻轻地下了床。谁知奶奶在床上早醒了，她咳了一声，问：

“天还没有亮，这么早起来做啥？阿英。”

“有要紧事体。”

“有啥要紧事体要天不亮起来？”

“你不晓得。”

“我是不晓得。这会，你们年青人哪里把我们老年人放在眼里，啥事体也瞒着我。我不管你们那些事。”奶奶自怨自艾地说，却又有点儿不甘心，“我管也管不着。”

“哪桩事体瞒过你……”阿英边说边走过去，把门开了。

外边天已经大亮，门虽然打开，草棚棚里却还是有点儿昏暗，特别是奶奶的床，给一床灰黑的夏布帐子隔着，更是暗乎乎的。阿英抬头望着蓝湛湛的天空，半边残月挂在天中，一阵阵清新的凉爽的春天晨风迎面吹来，她贪婪地吸了两口，浑身感到特别有劲。

“啊哟，天已经亮了。”奶奶在床上还是不满意，絮絮不休地说，“今天的事体为啥不告诉我呢？阿英，

究竟是啥事体呀？”

奶奶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不问个清楚，她的言语像是涓涓的泉水似的流个不完，等到你嫌腻烦了，终于会告诉她的。今天阿英本没有意思要瞒住她，因为张学海在床上睡得很甜，怕讲话惊醒他，就简简单单地答她一两句。奶奶哪能满意，等奶奶再三追问，她只好说了：

“今天厂里重点试纺，我那排车子参加，要早点去。”

奶奶虽没做过厂，厂里的事，因为常听张学海和汤阿英的谈论，也多少知道一些。解放后，她比从前不同，特别关心厂里的事。她也和青年们一样：希望多知道一些新鲜事物。她关怀地问：

“啥叫做重点试纺？”

“重点试纺，就是重点试纺啊。”汤阿英不愿意详细讲。

“你讲给我听听。”

“怎么讲呢？”阿英用梳子梳着头发，踌躇地说，“讲起来，可长哩。”

“长也不要紧，多长，我都听。”

奶奶越是有耐心，阿英更没有耐心了。她推说：

“不早了，我弄点饭吃，要赶到厂里去，等我回来再讲吧。”

“我给你做饭，”奶奶下床来，抓了一把木柴，坐在炉子那边去，望着阿英，“讲吧。”

阿英舀了一瓢冷水倒在铜脸盆里，她一边洗脸，一边焦虑地哀求说：

“讲起来，实在很长呢，几句话说不清爽。”

“你先简单地讲讲。”

正在阿英无可奈何的辰光，张学海一骨碌坐起来，披着衣服，霍地跳下床来。他好像还没有睡够，恣情地伸了一个懒腰，揉一揉惺忪的睡眼，说：

“你们又唠叨啥？”

阿英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代阿英说道：

“重点试纺就是因为厂里生活难做，老板怪花纱布公司的花衣不好，怪保全部的工作不好，又怪工人做生活不巴结……花纱布公司的花衣不错，保全部工作也不错，工人生活做的也巴结，可是毛病出在啥地方，谁也摸不清。余静同志出了个主意：重点试纺，在工人监督下，从清花间到筒摇间选择几排车试纺，看看啥地方有毛病。”

“哦。”奶奶恍然大悟，骄傲地说：“这么讲也不长啊，有啥难懂？”

“你当然懂，你什么都懂。”阿英笑着说，“快点烧饭吧，我们还要赶路哩。”

“那你们要早点去，这是大事呀。”奶奶表示自己

很了解厂里这些事，她加了两块木柴到炉子里去，说，“我快点烧。”

张学海点点头：“我也要 and 陶阿毛一道监督拆分配棉哩。”

“是呀，今天我们保全部也要检查检查车子。”

“检查出毛病在啥地方，生活就好做了吗？……”

“妈妈，妈妈……”

巧珠在床上叫，打断奶奶的话。

“做啥？”阿英洗完了脸，把洗脸水往门外一倒，问。

“我要起来，妈妈。”

“再睡一歇，还早着哩。”

“不，妈妈，我要起来。”

阿英又舀一瓢水倒在铜脸盆里，送到张学海面前。她到奶奶床那边去看巧珠。巧珠在被窝里已经坐了起来。

“再睡一歇吧，巧珠，”汤阿英说，“你今年不小了，快十岁了，要听妈妈的话。”

“不，我睡不着了。”巧珠摇摇头，那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对着妈妈望，希望妈妈让她起床。

妈妈没有意见：“要起来，就起来吧。”

她穿好衣服，欢天喜地跳了下来。

巧珠想起昨天晚上妈妈答应她的书包，便盯着妈妈望。巧珠进了小学以后，就想要一个书包。她现在的书是用一个书带拴着挟来挟去，多么不方便，许多东西没有地方放。要是有一个书包，五颜六色的蜡笔可以放进去，书可以放进去，笔墨也可以放进去，简直是没有一样东西放不进去。上学放学背着一个书包多么方便，多么神气！每个小学生都有，可是巧珠没有。原来妈妈缝了一个，那是旧布的，早就坏得不能用了。昨天晚上妈妈答应了，等这个号头厂里发工资，一定给她买。她一睁开眼，就想那个书包，生怕妈妈忘了。妈妈不知道巧珠的心思，好久没有言语，直到奶奶把饭端上桌，妈妈也没有提这件事。巧珠心里有点急了，等会妈妈上工去，要是忘了，书包就买不回来了。她有意站在妈妈旁边，把头歪着，一个劲对着妈妈，忍不住说道：

“妈妈，你答应我的事，不要忘记哪。”

“忘不了。”妈妈摸着她的小辫子说，“发了工资一定给你买回来。”

“啥辰光发工资呀？”巧珠把小食指放在嘴角上咬着，她希望今天发工资，晚上就看到新书包。

“还有两天就发了，”妈妈漫不经心地回答，“别急！”

“我今天要！”

妈妈把眼睛向她一愣：

“讲好了发工资给你买，怎么今天就要！”

巧珠的头垂了下去，心里有点不高兴，见妈妈生气，她又不好再说。奶奶在旁边帮她忙：

“阿英，你今天就给她捎个回来。”

“不发工资，啥地方有钱买？”妈妈吃完了饭，把箸子往桌上一放，站起来要走了。

爸爸看巧珠站在那边哭咽咽的样子，心里有点痛。他身上虽然钱不多，可以在保全部想法借一点。爸爸托着巧珠圆圆的小下巴，说：

“爸爸晚上给你买回来，你要好好念书。”

“好爸爸，我一定好好念书。”巧珠抓住爸爸的粗糙的有力的手，爱慕地抚弄着手指。

妈妈把巧珠搂在怀里，对着她的腮巴子亲热地亲了一亲，笑着说：

“这该称心如意了。别再钉前跟后的，小鬼头。”接着她又说，“吃了早饭，快去上学。”

说完话，爸爸和妈妈一道上工去了。

汤阿英一走进细纱间，就向自己那排车跟前去。她换了油衣，戴上帽子，检查一下车子，特别细心地做好清洁工作，又不放心地前后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任何毛病，满意地站在车头。她这时发现日班的人只有她一个人在车间里。她精神抖擞地在车头两旁走

着，像是出击以前的英勇的战士，擦好了枪，摘去枪帽，精神百倍地在等待振奋人心的冲锋的号音。

过了一会儿，车间里的人多了起来。余静从人丛中走来，她领着工会新组织起来的监督重点试纺的工人，巡视每一个重点试纺的车间。她看汤阿英一切都准备好了，对她称赞地点点头，留下钟珮文在汤阿英那边监督摆粗纱送细纱，她自己和别人到筒摇间去了。

正八点，汤阿英衷心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她立即开了车。车子转动起来。她迅速地走进了弄堂。

9

汤阿英手里抱着三个管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工会，后面跟着五六个工人飞也似的奔了进来。余静立刻站了起来，迎上去，抢着问：

“试纺的怎么样？我们正在等你们的消息哩。”

“今天的生活真好做，”汤阿英喘了一口气，说，“顺手得很，你们看。”

汤阿英把试纺的三个管纱送到余静面前。

余静和赵得宝都拿了一个管纱看。余静问：

“你们监督的很严格吧，有没有发现问题？”

郭彩娣没等钟珮文回答，她就张开嘴，像是打机关枪，一句接着一句：

“余静同志，监督很严，没有发现问题，要是细纱间有问题，我郭彩娣负责……”

“你的胆子真不小，细纱间有问题你负责，你把文教委员搁到啥地方去啊！”

郭彩娣听管秀芬这几句锋利的话，连忙改了口，说：

“哦，对不起，小钟。”

钟珮文说：“细纱间监督是很严，没有问题。”

“别的车间呢？”余静心里想到清花间。

“清花间没问题，我敢保险。”陶阿毛得意地说，“我们眼睛一个劲盯着花衣……”

“哦……”余静没有说下去，她望着赵得宝。

赵得宝懂得她眼光的意思。他去过清花间，保全部的张学海和陶阿毛他们在监督拆包配棉。这个车间是重点试纺中的重点，谁都晓得的。张学海非常负责，他一步也没有离开清花机，眼睛真的一个劲盯着花衣，郑兴发今天拆包配棉也特别仔细，不让任何人碰棉花包，配棉成分十分准确。陶阿毛看郑兴发那么仔细认真，谁也没法接近花衣，张学海的眼光又紧紧盯牢，叫他无从下手。他想和郑兴发讲话，好分散郑

兴发的注意力，弄错配棉成分，重点试纺就等于白搭。可是郑兴发注意力非常集中，不和陶阿毛讲话，一面对陶阿毛摇摇手，一面指指车子上的花衣，陶阿毛懂得他的意思：现在正是重点试纺的紧要关头，不要讲话。陶阿毛无可奈何，只好贼眉贼眼地盯着花衣。一霎眼的工夫，赵得宝亲自到清花间来检查了，陶阿毛更没法动脑筋了。赵得宝在清花间待了许久才走，他说：

“清花间确实没有问题，粗纱间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早一会去看了一下，工人同志们的情绪可饱满哩，监督都很认真严格。”

“是啵？余静同志。”陶阿毛笑嘻嘻地望着余静。

“那很好。”余静还不放心，说，“我们不能疏忽，不能麻痹，只要给资本家钻了空子，我们重点试纺就完蛋哪。”

“这当然。”郭彩娣答了一句。她暗暗伸了一下舌头，感到自己在车间工作责任的重大。

余静怕屋子里的光线不够强，看不清楚，走到窗口，又仔细地把管纱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个够，才说：

“这管纱光滑洁白，很少有疵点，真不错呀，老赵。”

赵得宝和汤阿英也跟到窗口。汤阿英说：

“的确不错，这管纱好……”

陶阿毛伸出大拇指，说：“呱呱叫！”

余静转过脸来问汤阿英：

“断头率多少？”

“二百五十根。”

“你们原来的断头率呢？”

“六百多根，生活难做辰光还不止哩。”

“减少一半以上，”余静思索着这个数字，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

郭彩娣在旁边双手抱着管纱跳了起来，忍不住高兴地大声叫道：

“我们重点试纺成功了！”

余静伸出手来指着郭彩娣的嘴巴，暗示她不忙高声大叫。她自己又看了一下管纱，对郭彩娣说：

“单凭我们的眼力看还不够，说重点试纺完全成功了，还嫌早了一点。我们到试验室找韩工程师去，请他评定评定再说。”

“对！”赵得宝举起手来赞成，“走！”

余静手里紧紧拿着那个管纱在前面走着，赵得宝、汤阿英、郭彩娣、钟珮文和陶阿毛跟在她后面，大家一块儿向试验室走去。

工会提出要重点试纺，各个车间的工人同志们都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召开一次工务会议，订出计划再进行。余静和赵得宝商议，同意工人们的建议，不

过余静补充了一点意见：请资方徐义德、韩云程工程师和工务主任郭鹏参加。赵得宝给她加上一个厂长梅佐贤。余静说这样就完全了。工人方面出席工务会议的都是各个车间的积极分子和工务职工。在工务会议上，郭鹏不吭气；韩云程几次讲话都是半吞半吐，说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梅佐贤很尴尬，他看徐义德的脸色说话，可是徐义德说的还是那一套，什么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呀，什么车间清洁工作不好呀，什么保全工作法有问题呀……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赞成重点试纺，但是他不明白表示出来。徐义德不表示，梅佐贤怎么好开腔呢？徐义德老是盯着他望。他不开腔也不行。他只好说厂里生产这么忙，完成加工订货的任务还很吃紧，搞啥重点试纺啊。工人一致主张重点试纺，秦妈妈说，只有找出生活难做的原因，才能按期完成加工订货的生产任务。梅佐贤要站起来申辩，余静讲话了，说明重点试纺并不耽误生产，找出原因，如工人同志所说的，反而对生产有很大的帮助。没有人在棉花里搞鬼，谁也不必怕重点试纺。徐义德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看余静和工人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反对重点试纺了。余静的话一讲完，他就站起来表示完全赞成重点试纺，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看看毛病在啥地方。这时他一眼看到陶阿毛坐在余静的背后，便说，重点试纺的辰光，请工会的同志们

领导协助。这一来，反对重点试纺的好像只是梅佐贤一个人，他陷入狼狈的境地，既不好坚持反对下去，马上又不好改口赞成。他怅怅地坐在那里不做声。大家一致同意重点试纺。工会从各个车间抽调一些积极分子，组织力量监督重点试纺。

余静她们还没有到试验室，韩云程就迎出来了，看见余静手里的管纱，他含笑地问：

“试纺的哪能？”

“成功哪，成功哪。”郭彩娣抢着说。

汤阿英拉了郭彩娣的油衣的角，小声地对她说：

“刚才余静同志不是说了，要请韩工程师评定一下，才能最后肯定哩！”

郭彩娣马上紧闭住嘴，退后一步，面孔上微微露出克制住的喜悦的表情。

余静把手里的管纱递给韩云程。

“我早就在这里等候好消息了。”他接过去，细细地抚摩着，细心地看了又看，说，“不错，真不错，洁白光滑，没有疵点。让我来试试强力。”

他走到试验强力的机器前面，拆下几股纱绕上去试验。他回过头来，看见余静她们几个人围着他，就指着断了的纱，不禁高兴地说：

“强力也很好，我看，在品质上够得上一级纱了。”

“一级纱？”汤阿英急着问，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是的。”韩云程信口说出在品质上够上一级纱，一想，怕不好，却又不好马上改口，就冷静地点点头。

“一级纱，”汤阿英听见这消息心里非常舒服，像是大热天喝了一杯冰凉酸梅汤似的。如果重点试纺真的成功，问题就更清楚了，徐义德施的鬼花样经慢慢会暴露出来，厂里生活好做，各个车间的姊妹再也不互相埋怨，团结得一定比过去更紧密了，她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一点也没有露出来。她注视着韩云程手里的一级纱，暗自庆幸没有辜负党团组织和工人的委托，舒缓地呼吸了一下。她深知战斗远没有结束，前面还有斗争，又问了一句，“真是一级纱吗？”

韩云程又点了点头。

“为啥重点试纺的纱这样好呢？韩工程师。”余静想从韩云程嘴里得到一些材料。

“这是……”韩云程讲了两个字就说不下去了，生活难做的秘密他心里是雪亮的，可是不能说出来。他有意拿过管纱又看了看，好像希望管纱给他回答问题似的。他想了一阵，吞吞吐吐地说，“这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赵得宝和汤阿英默默地站在那儿，不吭声。管秀芬急着问：

“这是什么原因，你是工程师，一看就知道了。工程师不晓得，啥人晓得？”

“是呀，”陶阿毛凑上去说，“工程师应该晓得。”

“没那么简单，纺纱要经过各个车间，这里面有原料、机器、技术、气候和温湿度等等复杂原因。不经过仔细地科学研究，我是不能马上下断语的，”韩云程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管秀芬说，“这不是普普通通的纪录工作，下断语是要负责的。”

“你就怕负责！”管秀芬说。

“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我不怕负责，更要仔细研究研究……”他为了表示自己诚心诚意地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把管纱又送到眼前细细地看了看。

余静瞧出他说话特别小心谨慎，神情有点慌张，生怕露出破绽的样子，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韩工程师有啥顾虑吗？”

他听了这话心头一愣，但表面上竭力装出很平静，把语气放得很和缓：

“没有顾虑，绝对没有顾虑。”

“告诉工会不要紧。”赵得宝劝他，“说吧，韩工程师。”

“你就快说吧，韩工程师，”郭彩娣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说，“真急死人哪。”

“告诉工会当然不要紧，其实告诉任何人也不要

紧。”韩云程微微笑了笑，悠然地说，“我们学技术的，凭技术吃饭，不偏袒任何一方面，也不参与任何一方面。我们只是根据科学试验的结果说话。在没有把问题研究清楚以前，我是不能表示我的意见的。我不能违背科学。科学是客观的真理。真理要经过实践才能知道。……”

汤阿英见他坚决不肯说，同时，讲了一堆大道理，她听得有点腻烦，实在忍不住了，就拦腰打断他的话：

“照你这么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不懂科学，我倒看出来了。重点试纺的生活好做，纺出来的纱又是一级纱，一定是原棉有问题。”

“当然是原棉有问题。”郭彩娣加了一句。

郭彩娣不满地膘了韩云程一眼。韩云程一点也不生气，也不着急，还是慢吞吞地说：

“可能是原棉问题，也可能不是原棉问题；可能是这一批原棉好，也可能是上几批的原棉坏；可能是这排车子好，也可能那排车子坏；可能是这次试纺工人同志做生活特别注意，也可能过去做生活注意的不够。同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整个厂的生产问题。”他怕管秀芬她们再追问下去，稍稍把话题引开去一点，声音也放

高一点，说，“不过，有一点现在是可以肯定的，这次重点试纺的纱很好：一级纱。”

余静看韩云程的态度暂时是不肯讲的，僵持下去不会有结果，便不再追问，改口道：

“根据你的检验，重点试纺成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仔细研究，是啵？韩工程师。”

“是的。”

“对于这个问题工会也要进一步研究的。韩工程师，希望你帮助我们研究研究。”

“那没有问题，余静同志，我一定很乐意帮助工会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是我应尽的义务。”

走出试验室不过十几步远近，郭彩娣回过头去对试验室狠狠瞪了一眼，低声对余静说：

“分明是原棉问题，你问他做啥？看他那个态度，模棱两可，死也不会说的。”

“对，”陶阿毛附和着说，“他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怎么肯对我们工人说真话！”

“过去断头率高，出货坏，生活难做。现在看出来，当然是原棉问题。我不是不晓得。我是想从韩工程师嘴里探听一下过去原棉坏的程度，究竟是花纱布公司的原棉不好，还是徐义德掺了劣质花衣，掺了多个劣质花衣，配棉成份，这些问题都要弄清爽。”

“巴巴眼，望望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肯告诉你？余静同志，你太天真了。”管秀芬向余静做了一个鬼脸。

“你也不能把人看的太死，解放以后，整个社会在变，每一个人也在变啊。”

“我看韩云程就变不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你这个看法不对。对技术人员要耐心地启发，要慢慢教育，认识提高了，看法就不同了。不怕他的嘴多紧，要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到家了，他也会讲的。”

“余静同志，”赵得宝插上来说，“你说的原棉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汤阿英听韩云程讲了一堆大道理，这个可能，那个可能，还提到工人做生活注意不注意的问题，虽然没有说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但语气之间对于重点试纺的成功还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不过不好意思当着余静的面说出来罢了。这次重点试纺，使汤阿英把生活难做的原因看的更清楚了，也更明确了。她从刚才韩云程的口气里料到徐义德他们也不会痛痛快快承认重点试纺成功的，说不定他们会制造借口，说重点试纺之所以纺出一级纱，是因为挑选了技术最好的工人，挡的是检修最好的车子，工人又互相配合，生活做的巴结，当然纺出一级纱来了。她想了半晌，要

堵住徐义德、韩云程他们的嘴，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于是提出一个建议：

“要把试纺点扩大，问题就更清爽了。韩云程他们在事实面前，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对，这个办法好。”郭彩娣拍手赞成，说，“问题弄清爽了，筒摇间可不敢再骂我们细纱间了。阿英，”郭彩娣走到汤阿英旁边低声对她说，“我把重点试纺成功的消息告诉谭招弟去，……。”

“她会晓得的。”

“我愠愠她的气。”

汤阿英止住道：

“你别去，事体弄清爽就算了，自家人吵啥？还是在重点试纺上动动脑筋好。”

余静也在回忆韩云程那些模棱两可的话，思考用啥办法堵住他的巧辩的嘴，要不要把试纺点扩大？汤阿英的建议正合她的心意，顿时高兴地对大家说：

“阿英这个建议实在太好了，我们要扩大试纺点，抓住这个问题乘胜前进！”

10

“大家想想看，究竟是啥原因呢？”

张小玲说完了话，盘腿坐在地板上，她向四面的姊妹们巡视了一下，在等待大家回答，好展开讨论，进行学习。

重点试纺成功，汤阿英要求扩大试纺点，把问题弄的更清楚。试纺点扩大，结果也成功了。这消息轰动了每一个车间，全厂的工人同志们都兴奋地愉快地相互谈论试纺点扩大成功的消息。生活开始好做起来，断头率减低了，车间的怨气和叹息声少了，出勤率增高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过去给国家代纺中总共掺进了多少劣质花衣还弄不清楚。工厂委员会研究了一下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要结合五反运动，首先在职工中间进行学习，特别是要在技术人员当中进行教育，启发他们，才可能逐渐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工会领导和帮助下，全厂工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五反”学习。

日班已经下工，夜班开车还要等个把钟头，在这个空隙中间，细纱间的张小玲小组正进行学习。她把重点试纺和扩大重点试纺成功的情况简单地报告了一遍，把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

在张小玲左后边的是落纱工董素娟，她坐在圈子边上，大声地说：

“想想从前的生活多难做，我看见姊妹们跑来跑去，上气不接下气，额角头上直流汗，断头还是接不

完，这边接了，那边断了，接上去又断了。我当时心里也急的慌，真想上去插把手，帮帮忙，可是每排车都是这样，帮哪个忙好呀？我一双手，也帮不了多少忙啊。阿英姐姐因为生活难做，那天夜里累得早产了，我把医生叫来，连看也不敢看一眼。想起来，真气人呀。重点试纺一开始，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呀。姊妹们在弄堂里，不急不忙，一边做着清洁工作，一边接头，走一个巡回，也断不了几根头，生活好做的多了。我不接头，看见了心里也舒服。你们说，同样是一排车，同样是一双手，为啥从前生活难做，现在生活好做了呢？”

董素娟刚讲完，坐在九十八排车弄堂口地板上的郭彩娣接着说：

“那还有啥怀疑，癞痢头上的苍蝇——明摆着吗，是原棉问题啊。”

汤阿英坐在圈子当中。她刚才听了董素娟讲起前后生活不同的情形，想起那天夜班郭彩娣跑来告诉她筒摇间谭招弟骂细纱间的话，又早产了那个可爱的孩子，她从心里发酸，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深思地在谛听大家的发言。

圈子里静静的，管秀芬手里拿着钢笔，她和张小玲一样：在向圈子里的人们望着，等待哪个说话，她好记录。张小玲没有注意汤阿英的神情，她的眼睛盯

着右前方，因为这个角落还没有人发言过。可是坐在张小玲旁边的余静早注意到汤阿英的神情。余静关心各个车间学习的情况，她和赵得宝两个人分别到车间小组，了解了解学习的情况。她自己今天晚上参加张小玲的小组。她一直没有说话，坐在地板上，静静听大家发言。她看到汤阿英那神情，一直没开口，料想汤阿英肚里一定有话想讲。余静便对张小玲说：

“小玲，阿英还没有发言哩……”

“好，欢迎阿英姐发言。”

大家的眼光全注视着圈子当中的汤阿英。汤阿英微微抬起头来，姊妹们都以期待的眼光望着她，便一边想一边慢慢地说：

“我有一肚子话要讲，不讲，心里难过的不行。想想早些日子的生活，真叫人要流泪。我们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生活哪能也做不好，锭子蛮好，清洁工作也不错，就是一个劲地断头，断头……我的脚在弄堂里简直停不下来，手也停不下来，总是跑来又跑去，忙着接头。想尽了办法，生活还是做不好。那天晚上，我在弄堂里跑来跑去，差点跑糊涂了，头发晕，眼睛发黑，金星在我面前闪来闪去，肚子痛的受不了，我还是跑着接头，接头。我怕耽误生产啊。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啊，才坐到地上去，一双手紧紧按着肚子，不晓得啥辰光，我就早产了。一想起这些事，我

就伤心，忍不住眼泪就流出来了。”说到这里，她用油衣拭了拭眼角，说，“那辰光，谁也不晓得是啥原因，郭彩娣告诉我筒摇间骂我们细纱间，我当时没吭气，心里却不同意筒摇间，特别是不满意谭招弟。大家都晓得，谭招弟是我介绍进厂的。她为人也不错，为啥要骂我们细纱间？老实讲，当时我心里真有了一个疙瘩。不同意谭招弟，以为她一进厂就变了。筒摇间骂我们，我们也不仔细想想，也不把问题摊开来看，我们就怪粗纱间，是啵？彩娣。”

汤阿英坦率地说出她心里的想法，停了停，望着郭彩娣。郭彩娣不好意思地歉然笑了笑，说：

“可不是么。”

“现在可看清楚了，是原棉问题，是徐义德问题。我们流血流汗，养活资本家，徐义德坐在家里吃好的穿好的，动也不动，还要在好花衣里掺上坏花衣，叫我们生活难做，害得我早产，使我们车间的姊妹不和，这不是向我们工人猖狂进攻吗？”

汤阿英昂起头来，激动地望着厂长办公室那个方向。姊妹们听了汤阿英的诉说，个个都很激动。等到汤阿英说“这不是向我们工人猖狂进攻吗”，大家不约而同齐声地说：

“当然是向我们工人猖狂进攻！”

“是向我们工人猖狂进攻！”

董素娟忍不住站了起来，伸出小小的拳头，气呼呼地大声喊道：

“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姊妹们全举起手来喊叫：

“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愤怒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细纱间，有的不是张小玲这个小组的，她们刚来上夜班，也呼应地随着叫道：

“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声音越叫越高，好像车间已经容纳不下这个巨大的声音，都膨胀到车间外边去了，音波动荡在夜晚的空中，扩张开去，连库房、操场和办公室那一带也隐隐可以听到了。

愤怒的声音低下去，张小玲那个小组静下来，汤阿英喘了口气，接下去说：

“生活难做，不怪筒摇间，不怪细纱间，不怪粗纱间，也不能怪清花间，现在谁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要怪徐义德这家伙。徐义德害得我们工人好苦啊。

他一共掺了多少坏花衣，盗窃国家多少原棉，我们要算清爽这笔账！”

“对，要算清爽这笔账！”

“非算清爽不可！”张小玲语气非常坚定。

余静的眼肯一直盯着汤阿英。她很高兴看到汤阿英这个青年团员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东西在成长：看问题比别人深一层，分析问题也比别人明确，从生活难做察觉出徐义德还有其他问题，提到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本质就给它揭露出来了。汤阿英一贯沉默地努力工作，从不跑车，也不误工，做起生活来很巴结，平常虽不大爱说话，工作有了成绩也不摆在嘴上，可是一发言，却句句话有道理，说得别人口服心服，而且能够抓住中心——徐义德一共盗窃国家多少原棉，这不是工会正要设法弄清的问题吗？余静说：

“大家的意见很对，我们一定要算清爽这笔账！”她对汤阿英说，“阿英，你还有啥意见？你说下去。”

汤阿英的意见受到鼓励和支持，特别是余静也赞成她的意见。她更加满意，想起最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五反运动，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到那些五毒罪行严重的私营工厂和商店里去，检查出许许多多的吓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展的比其他省市稍为晚一点，她想如果人民政府也派“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一定可以彻底揭发出徐义德的五毒罪行。她兴奋地说：

“我看徐义德不是一个好东西，他除了盗窃国家的原棉以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花样经，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五毒罪行。我刚才在想，我们要请求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先把他盗窃原棉这笔账算清爽，再彻底检查其他的五毒罪行。你们说，好不好呀？”

“好！”董素娟啪啪的鼓掌。

“当然好呀！”管秀芬说。

“请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

“越早越好！”

郭彩娣更进一步具体要求道：

“请余静同志把我们工人的请求写成书面意见，明天送给政府，希望早点把‘五反’检查队派来。”

“这个办法好！”汤阿英说，她不禁乐得鼓起掌来。因为她看到姊妹们都和自己一样有相同的要求。

管秀芬听出了神，竟放下笔在望。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着发言。张小玲对她说：

“小管，你记呀！”

“记录工磨洋工啦！”

董素娟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管秀芬在大家催促下，连忙拿起笔来说：

“重要的意见保险一点也漏不了，我全给补上！”

她低下头去，沙沙地把刚才大家说的重要的意

见都补记了上去。张小玲看看表，夜班快开车了，就说：

“大家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余静同志今天亲自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也用不着我口头汇报了。”她对着余静说，“请你把我们小组的意见，报告给政府，希望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好不好？”

余静点头说：“好！”

“越快越好！”郭彩娣加了一句，“最好这个礼拜就来。”

“看你性急的，”管秀芬有意和郭彩娣开玩笑说，“就是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派‘五反’检查队还要准备准备哩。”

“快一点不好吗？”郭彩娣红着脸说。

管秀芬看她那股认真劲道，就慌忙让步道：

“当然好，这一句我也给你记上。”

11

老王问徐总经理要不要准备宵夜。徐总经理看看左手的白金的劳莱克斯手表：才九点半，他摇摇头：

“用不着了。”他今天心里很乱，想了想，改变了主意，说，“准备一点也好。”

“是。”老王弯腰应了一声。

“啥辰光要，等我叫你。没事，你们都不要上来，在下面等着。”

“晓得了。”老王懂得徐总经理把三位太太和少爷都找到三太太的房间里来，一定有啥重大的机密事体。他迅速地退了出去，然后轻轻把林宛芝的房门关紧。

今天林宛芝房间的光线显得比往常暗的多，鹅黄色的绒布窗帷已经放下，好像要把这间房子和整个世界隔绝。从墙角落那里的落地反光灯透露出来的灯光很弱，再加上林宛芝坐在梳妆台前面的矮矮的沙发凳子上，遮住了一些光线，徐义德和大太太、朱瑞芳坐在沙发上，连面孔也看不大清楚。徐守仁坐在床上，对着电灯，唯有他的面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头发依然是梳得雪亮，身上披着一件红绿相间的大方格子薄绒茄克，胸前打着一条紫红的领带，那上面飞舞着一条黄龙。大家沉默，眼光都对着徐义德。

那天在星二聚餐会，徐义德突然不见，本想给人民政府一个措手不及，没顾上给大家打个招呼，悄悄离开了。他打算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干脆到香港去，

一走了之。回到家里，他只和林宛芝商议这件事。她起先舍不得离开他，后来想和他一道去，再一想又怕引起人家注意，就勉强同意他去了。她着手帮他收拾行装，给他准备了一些现款。他不要，说是到了香港这个钞票没有用。他有美金，再带点黄金首饰啥的就够了。当他收拾好了，准备向大太太和朱瑞芳说一声就走，忽然想起还没有办出境许可证，怎么到香港去呢？马上到派出所去申请，那不是叫人民政府知道了吗？为啥要走呢？不申请，没法弄到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到深圳去闯吗？闯不过去，叫人发现，反而不好了。林宛芝再三劝他不要冒这个险，就是要去，等“五反”过去了也不迟，先写封信给守仁他叔叔，叫义信在那边先有个安排也好。徐义德盯视着她，越望越舍不得离开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把身上的美金和首饰掏出来放到柜子里去。从此，他心里一直郁郁不乐。陈市长做了“五反”动员报告，他心里更加沉重，考虑了再三，决定找家里人来好好商量一下。

徐义德喝了一口茶，扫了大家一眼，然后低声说，声调里充满了焦虑和失望：

“五反运动真的来哪。政府先从七十四个典型户开始，听同业的说，这次劲头大得很，哪一次运动也不能和这次比。上海吸收了各地的经验，准备得很充

分。陈市长在天蟾舞台的‘五反’报告，每一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我的心。沪江到现在还没啥动静，不过迟早要来的。只要‘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了，我这个总经理也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

徐义德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三位太太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做啥，大太太以为是叫她来打麻将，朱瑞芳估计是看外国电影，林宛芝料想是约大家一道到啥地方去白相。后来老王说老爷请她们到三太太房间里，那地方不好打牌也不好看电影，但谁也猜不到究竟是啥事体。等到徐义德一张嘴，各人轻松愉快的情绪顿时消逝得了无踪迹，心情也慢慢变得有点沉重，逐渐低下了头。只有徐守仁仿佛不懂啥五反运动似的，他望着爸爸，听他说下去：

“我怕临时发生事情来不及应付，今天晚上特地和大家商量商量。‘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这是肯定的。”

“为啥？爸爸。”

“你，”徐义德盯了守仁一眼，仿佛现在才发觉他坐在床上，不满地说，“你在香港好好的，为啥要回到这个倒霉的上海来？”

徐守仁嘟着嘴，有一肚子委屈似的，说：

“不是你叫我回来的吗？”

“我叫你回来，你就回来，这么听话？我的好孩子！”

徐义德不但后悔徐守仁回来，他还后悔没有完全把厂迁到香港，更后悔自己留在上海滩上受这份罪。现在得不到出境许可证，插翅难飞了。

徐守仁知道爸爸不是心思，放低语调，体贴地又问：

“爸爸，为啥‘五反’工作队一来，我们就完蛋呢？”

“孩子别问这些事，你不懂。”徐义德心中平静一些，在盘算自己的违法行为，小的数目根本记不清了，大的主要几笔就不得了，要是清算出来，别说一个沪江，两个也不够赔偿啊。也深深叹了一口气，等了一会，说，“你们要徐义德呢？还是要洋房汽车？”

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默默地愣着。太太料想朱瑞芳和林宛芝一定是要洋房汽车，她们和徐义德好，还不是为了这些。她和徐义德是结发夫妻，当年徐义德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她和他就很好了，即使沪江纱厂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在乎。朱瑞芳和林宛芝嫌贫爱富，一定要离开徐义德，她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想想自己快五十了，娘家也没有人，离开了也没地方去。她们两人要离开，正好，显得她和徐义德的爱情始终如一的，她要 and 徐义德共患难、同生死，一

方面也好收收徐义德的心。但是她不马上表示意见，要看看她们，特别是要看看林宛芝那骚货。

林宛芝打定了主意：不离开徐义德，她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徐义德过这一关。她首先想到冯永祥。过去听徐义德说他是工商联的委员，工商界的红人，又和政府的首长有往来，凭现在她和冯永祥的交情，只要她说一声，难道他这个忙还不帮吗？不过，这个“忙”只能暗中“帮”，现在不好提出来，将来也不能说出来。她生怕自己的心思被大太太和二太太发觉，不再想下去。她旋即想起这几年来她手里有不少积蓄，即使沪江出了事，没有汽车洋房，光是徐义德一个人，找个公寓房子，下半辈子的生活一点不愁。

半晌，大家还是不吭声。徐守仁不假思索地对爸爸说：

“我要你，我也要汽车洋房，我都要。”

“傻孩子，”徐义德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好像要把所有的焦虑和苦恼都要吸到自己的肚子里似的，说，“要了爸爸，就没有汽车洋房；要汽车洋房，就没有爸爸了。”

“我都要，我都要，爸爸。”徐守仁的眼睛有点润湿，模模糊糊地看见林宛芝用手绢在擦眼角。

大太太见她们两个人不吭气，仔细一想，她自己不先说，她们不会说的，也不好说的。她听了徐义德

刚才那两句话，有点心酸，安慰地说道：

“义德，我只要你，别的，我啥也不要。讨饭，我也和你讨一辈子。”

林宛芝鼻子一酸，她实在忍不住了，眼角那里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拭去眼泪，揩了鼻子，生怕给人看见，她侧过身子去，望着壁炉上的嘉宝的照片发呆。大太太讲完了话就注意朱瑞芳和林宛芝的态度，看见林宛芝哭咽咽的，就借题发挥了：

“男人还没出事，就哭了，真不吉利。肚里有啥心思，说出来好了，要洋房汽车也不要紧。有些人就是为了洋房汽车才爱人的，我早就晓得。”

“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忍心吗？”林宛芝心噗咚噗咚地跳，有点激动，但是她努力忍受着。她不能再不说话了。她望了朱瑞芳一眼，好像说：对不起，我要先讲了。她说，“我要你，义德，我不要洋房汽车。要是真的出事，我还是要你，没有洋房，没有汽车，没有厂，我养活你。我会踏缝纫机，我踏缝纫机养活你。我要是有三心二意，我一定不得好死。”

大太太听林宛芝这一番话，感到有点失望，看上去这骚货要死缠着徐义德不放哩，说得多好听，踏缝纫机养活义德，真不要脸！

朱瑞芳没言语，不愉快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纠缠在她的心头上。从无锡传来不幸的消息：朱暮堂判

了死刑，伏法了。朱筱堂想到上海来一趟，她和徐义德商量，他坚决反对。没有办法，她只好托人告诉朱筱堂，现在正碰上“五反”，过一阵子再说。从徐义德刚才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沪江前途是很黯淡的。徐守仁呢，虽说是徐义德的心头肉，又是独生子，但不给她争气，不断闹事，在街坊邻居的舆论中的声名很不好，书既没读好，办厂的能力更谈不上，前途很渺茫。她一时忽然感到自己无依无靠了，忧郁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听林宛芝说完，便向林宛芝轻蔑地撇一撇嘴，冷笑了一声，说：

“我是不会说漂亮话的，我也不是说漂亮话的人。我要义德，保住人要紧。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哪能，一定要保住人。只要保住人，别的我啥也不要。”她想徐义德的家私，当然是徐守仁的，别说什么洋房汽车，徐义德名下的一切财产，将来都是徐守仁的。她不把大太太放在心里，因为不是她的对手。上了年纪的人，说不定啥辰光眼一闭脚一伸，就全完了。最讨厌的是林宛芝，长的年青漂亮，从来又不生病，今天还表示要养活义德哩，鬼才相信。义德没出事，就和冯永祥那家伙眉来眼去，这样水性杨花的人，不变心才怪哩！她多少知道一点她和冯永祥来来往往的事情，有意不点破，也不声张，让他们混下去，等到把柄抓到手里，林宛芝就

别想再在徐公馆里住了。

“啥人讲漂亮话？不要出口伤人！”林宛芝忍不住质问朱瑞芳。

“自己没说，何必多心？”朱瑞芳坐在徐义德旁边，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那你说啥人？”林宛芝追问她。

“屋子里也不是你一个人……”

朱瑞芳没有说下去，林宛芝从梳妆台镜子里看到她的手暗暗碰了一下大太太的左胳膊。林宛芝轻蔑地睨视她一眼说：

“有话自己说好了，不用搬兵。屋子里不是我一个，可是也没有第三个呀！”

大太太开口了：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两个欺负我一个，我不怕。你们不信，拿缝纫机来，我踏给你们看。”

朱瑞芳根本不理她这一套，冷言冷语地说：

“别人的事，我不晓得，我也管不着。义德，不管哪能，我不会变心的，我和守仁永远跟着你！”

林宛芝唰的一下脸红了，她一肚子气真想吐个痛痛快快，可是一时又急切得说不出话来。她总感到在大太太和二太太面前抬不起头来。她的眼光盯着徐义德，好像质问他：你是哑巴吗？让她们欺负我，

为啥不开口呢？

“有话好好商量。现在是啥辰光？你们这样，家庭不和，叫我哪能放心的下？”

徐义德这么一说，朱瑞芳不好再刺林宛芝，她装出一副可怜相，说：

“只要人家不给我脸色看，我总是让别人的。你放心好了，义德，为了你，我啥都可以牺牲。”

“义德说得对，”大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家不和受人欺，这不是有意和义德为难？……”

徐义德察觉林宛芝的眼光又望着他了，知道她肚里有话，他连忙打断大太太的话：“大家少说一句，好不好？”

大家真的不说话了。许久，也没一个人吭声。徐守仁急了，问：“爸爸，为啥不说话呀？”

徐义德对三个老婆的态度都很满意。他怕把事情说得太严重，反而会使她们遇到事情不知道哪能应付。见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了，给儿子一催，他靠到沙发上去，嘴里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轻松地打破了沉默：

“你们有这样的打算，很好，很好。沪江要出事，这是肯定的。不过，还要看我们的布置。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可能事体不大，即使出了大事体，”他望着香烟上三个“5”字凝思，马上联想到香港新厂、

瑞士银行的存款、徐义信……想起留了这个退步真是诸葛孔明的妙计，必要的辰光往香港一溜，走进新厂，徐义德又是徐总经理了。不怕你共产党有天大的本领，对香港的徐总经理又有啥办法？他嘴角上露出了笑纹，暗暗得意地说：“也不至于到那样狼狈的地步，太太，不会和你一道讨饭的。”

他转过脸去对林宛芝说：

“也不需要你踏缝纫机来养活我。倒是瑞芳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我徐义德在，别说你们三四个人，就是三四千人我也养的活。开片厂，哪里不需要三四千人。”

徐守仁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父亲面前，天真地说：

“那么，没有事体了，爸爸。”

她们听徐义德这么说，也宽了心，抬起头来，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脸上。徐义德看见沙发旁边那个白铜制的一个年青的侍者，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大红制服，下面是笔挺的白裤子，两只手捧着一个圆圆的烟灰缸向着徐义德。徐义德把烟灰向烟灰缸里掸掉，想了想，说：

“也不是那么简单，这次运动政府很有经验，工作也很深入细致，听说到大厂去检查的‘五反’工作队都是大干部带着，不像小干部容易马虎过去。他们

啥地方都要检查，连资方的家庭也要派人去调查。厂里的事，有我去布置，也可能不出大事。家里吗，我完全靠你们了。”

朱瑞芳懂得徐义德的意思，她接上去说：

“你是讲，要是家里应付的好，就不会出大事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那不要紧，家里的事交给我们好了。”朱瑞芳拍一拍自己的胸脯，很有把握地说，“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好了，一问三不知，看他们有啥办法！”

“是呀，”大太太说，“我们就说我们啥也不晓得。他们来一百个人也不怕。”

林宛芝心里稍为平静了一点，说：

“我也是这个主意。”

朱瑞芳指着守仁说：

“政府派人来，你不准瞎讲！”

“我真的啥也不晓得，”徐守仁退回去，靠着床边坐着，说，“我说啥？”

“只要大家讲话一致，应付起来就容易了。当然，还要做点准备，……”

大太太不懂地瞧着徐义德：

“哪能准备？”

“值钱的东西不能留在家里，最好都藏到亲戚朋

友家里去。万一沪江纱厂出了事，公家要我私人赔偿，可能会来抄家的。”

徐义德讲话没有留心手上的香烟已经快完了，烧烫了他的肥嫩的食指和中指，他生气地把烟蒂往那个年青侍者双手捧着的烟灰缸里一扔。

大太太立刻想到自己那一盒的珠宝玉器和金首饰；她准备交给吴兰珍保存起来，学校里比较安全；但又想到吴兰珍不能整天带着珍宝盒子上课，放在宿舍里也不保险，不如礼拜天叫吴兰珍送到苏州藏起来，倒是个办法。朱瑞芳考虑自己的四十根金条和许多衣料往啥地方搁；林宛芝忧虑的是银行存款折子和三克拉的大钻石戒子不知道藏在哪一个姊妹家里安全，还有她最心爱的那二三十双各种不同料子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高跟、半高跟的皮鞋最麻烦，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摆，谁肯给你藏高跟皮鞋呢？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一时都想了很多收藏物事的地方，但旋即都推翻了，每一个地方似乎都不安全，好像人民政府干部的眼睛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的。谁都拿不定主意。还是朱瑞芳果断，她说：

“我想好了，藏到我弟弟家里去。”

徐义德直摇头：

“朱延年吗？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藏到他那里去，还有点希望；藏到他那里去，算是丢

到水里去了。就是福佑不出事——我看这次福佑一定要出事的，你说，朱延年见钱眼开花，他会让你拿回来？”

“那么，另外找一家好了。”

“这年头，亲戚朋友谁也信不过。”徐义德感慨系之地说。

“不用藏了，还是放在家里？”林宛芝问。

“义德不是说了，值钱的物事不能留在家里吗？”朱瑞芳瞪了林宛芝一眼。

“家里不能放，外边不能藏，这可为难啦。”大太太皱起了眉头。

徐义德想了一想，说：

“藏在亲戚朋友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千万不能讲里面是啥物事，等事后取回来，就保险了。”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义德，你为啥不早说，害得我担心。”大太太一个劲地称赞。

“没有想起，哪能说。”

“这许多物事，哪能藏法，弄丢了，可担当不起啊！”

林宛芝本来想她多拿点物事出去藏，听朱瑞芳的话，她有点不敢了，怕万一弄丢了，朱瑞芳那张嘴不会饶人。全叫朱瑞芳去藏吗？万一徐义德有个意外，那就要在朱瑞芳手下过日子，那个罪也不是好受

的。她没有做声，暗暗觑着大太太，想来大太太一定不会让朱瑞芳一人去藏的。

大太太也不做声。她心里早有打算，不管徐义德哪能厉害，也不管徐义德哪能喜欢林宛芝，他总不能把红媒正娶的大太太放在一边。朱瑞芳看出林宛芝眼光的用意，连忙对大太太说道：

“你把家里物事带到苏州藏起来，一定保险。”

“这个，”大太太心里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受到朱瑞芳的尊重和信任；不高兴的是这一来会得罪了林宛芝，朱瑞芳叫她做恶人，徐义德也不一定同意。她自己无儿无女，娘家也没至亲骨肉，何必做朱瑞芳的挡箭牌呢？不如往朱瑞芳身上一推，守仁将来不会忘记她的。她说：

“苏州路太远，带来带去不方便。瑞芳亲戚朋友多，还是你出个主意，藏在上海啥地方，拿起来也方便。”

“这个责任不小，我可承担不起。”朱瑞芳满意大太太这一番话，她有意往外一推，只要林宛芝不敢承担，自然落在她的身上了。

林宛芝紧紧闭着嘴，一句话也没答腔。大太太和朱瑞芳穿连裆裤，她感到自己孤孤单单的。幸好徐义德坐在她房间里，她还有点依靠。她要试试徐义德的心：

“我看义德的办法比我们哪一个都多。”

徐义德看透了她们三个人的心思，特别是朱瑞芳一把紧紧拉住大太太，叫他地位很难处，他爱林宛芝，也不能把大太太、朱瑞芳和儿子甩在一边呀！他胸有成竹地说：

“家里的珠宝首饰和一点存款，我已经考虑好了，暂时给你们平分成四份，一个人一份，由你们自己去收藏。不出事体，将来再取回来。”

“好的。”朱瑞芳对于自己分到两份（徐守仁那份当然也是她的）虽不十分满意，也觉得不错了。因为她知道大太太不能不分一份，林宛芝呢，徐义德的心头肉，当然非有一份不可。

大太太和林宛芝自然没有意见。

徐义德安排妥当，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拉起鹅黄色的窗帷，推开窗户，一阵夜晚的凉风吹来，心里感到很舒畅。他向花园里一望：静静的，四周的灯光早熄灭了，那些洋房的轮廓消逝在茫茫的夜雾里。他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怕家里人说错了话，又关照一句：

“大家要记住，讲话要一致。就说啥也不晓得，最好不过了。”接着，他打了一个哈欠。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义德，你放心好了。”大太太站了起来，斜视了林宛芝一眼，又说，“不早

了，该睡觉啦。”

她悻悻地走出去，料到今天晚上丈夫不会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也要睡觉了，娘。”徐守仁走到朱瑞芳面前去。

朱瑞芳搀着他的手走了。林宛芝见她们都出去了，赶紧过去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关怀地问徐义德：

“饿啵？老王还预备了宵夜哩。要吃，我叫他送来。”

“不饿，”徐义德摇摇手，说，“宵夜怕早凉了。”

林宛芝走到衣橱面前，拉开上面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她坐到沙发上去，把首饰盒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仰起头来，对徐义德说：

“这个哪能办呢？”她把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色各样的手表。

手表是徐义德心爱的物事，也可以说徐义德是一个手表收藏家。凡是市面上出现一种名贵的新牌子的手表，他马上就买来。过去，还没有到上海的，他就托人从瑞士，从美国或者是从香港捎带来。全国解放后，上海市场上很少有新手表出现，他对自己所收藏的手表越发喜爱了。林宛芝不提起，他几乎忘记了。他坐到林宛芝身旁去，把盒子里的手表拿出八九个来看看，放到自己耳朵边听听走声，立刻又小心地

放进去，说：

“这些物事我全权委托你了。”

“我给你好好藏起，一定丢不了，你啥辰光要，就啥辰光给你。”

“好，亲爱的……”徐义德搂着她的肩膀，附着她的耳朵，生怕有人来偷听似的，讲话的声音很低很低，说了一阵，最后声音才放高了，“那里面有二百根条子，必要的辰光，你可以设法拿来用。这是给你的。”

徐义德把后面五个字的语气说得特别重。林宛芝听得心里暖洋洋的，徐义德对她究竟是和别人不同啊。她在徐公馆里是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上，徐义德把另外一个地方五十根条子，单独告诉朱瑞芳：“这是给你留的。”

朱瑞芳感激地扶在徐义德的肩上，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12

徐义德刚起来没有一会儿，正躺在沙发里伸懒腰，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林宛芝

问是谁，外边老王说：

“有客人看老爷。”

“这么早，是啥人！”林宛芝有点不满意。

徐义德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开了房门，对老王说：

“你招呼一下，我就来。”他转来代老王回答林宛芝，“是梅佐贤，我约他来的。”

他说完话就想下去，一把叫林宛芝抓住了：

“啥事体这么忙，把衣服穿好再走也不迟啊。”

她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上衣给他穿好，又用衣服刷子在他背上和胸前刷刷，像欣赏宝贝似的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才放他走去。

梅佐贤听见楼梯响，知道是徐总经理下来了，他立即站了起来，迎出去说：

“您早，总经理，我来早了一点吧，打扰您睡觉。”

“不，我早起来了。”

客厅里满屋子都是太阳光，闪耀得有点刺眼。徐总经理对门外叫了一声老王，老王进来了。徐总经理对着落地的大玻璃窗说：

“怎么没把窗帷放下？”

“忘记了，”老王抱歉地向徐总经理弯弯腰，走过去把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放下。阳光给蒙上一层薄薄的纱，显得柔和，不再刺眼了。

“给我把纸笔拿来。”

“是。”

徐总经理坐在下边的沙发上，梅佐贤正坐在他的对面，中间给那张矮圆桌子隔着。徐总经理喝了一口狮峰龙井茶，说：

“佐贤，今天你要来，不是为别的事，请你代我写一份坦白书。”

“那没有问题。”梅佐贤马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摘下胸袋里的派克钢笔，打开笔记本子，问，“哪能写呢？总经理。”他想先摸摸底盘，知道尺寸，好落笔。

老王送进来纸笔，放在矮圆桌子上。他看客厅里收拾得很干净，烟茶都有了，便轻轻移动脚步，退出了客厅。

徐总经理用右手的食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说：

“这份坦白书要这样写：第一，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能写，写上去将来要坐班房的；第二，数目太大的项目不能写，不然，经济上要受很大的损失；第三，重要的地方，口气要肯定，不能含糊，不能有漏洞；第四，一般违法的事实要多写，特别是厂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实都给我写上，越是细小的地方尤其要写得详细，这样就显得事实真切，坦白诚恳；第五，要写

得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同志们看得满意，使他們相信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都彻底坦白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特别动动脑筋。”

梅佐贤听了总经理这五点指示，暗暗叫了一声“啊哟”，感到这样写比考状元还难。总经理的底盘虽然摊开了，可是尺寸的弹性太大，所谓一般违法事实的标准，就不明确。他提笔的勇气顿时消逝了。但想到自己不能在总经理面前塌台，特别是现在蒙总经理重用的辰光，正是大显身手的机会，哪能放下笔呢。他装出很有办法的样子，说：

“总经理这五点指示实在太英明不过了，又原则又具体，想得实在周到，实在周到。”

“我只是临时想起的，恐怕还不够周到，工商组的同志听说都是懂得政策和业务的干部，我们要仔细考虑考虑，不坦白一些，是过不了关的。”

“这五点在我看来，的的确确很够周到了，总经理高瞻远瞩，当然还可以想的更周到的。要叫我想，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

徐总经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在享受梅佐贤对他的阿谀。他歪着头想了想，自己也想不出啥名堂来了，就对梅佐贤说：

“先写起来再讲。我看，开头应该有个帽子，你给我想想看……”

“对。”几句开场白，在梅佐贤并不困难，这一阵子到处开会，听都听熟了。他提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去：

我是沪江纱厂的负责人，听了陈市长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又在棉纺公会学习了三天，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觉悟提高，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多严重的错误。这个伟大的五反运动，是我们工商界彻底改造的试金石，也是犯有错误者的悔过自新的唯一机会。我需要深刻的检讨。我需要勇敢的作一个极清楚的交代……

梅佐贤把这一段念给总经理听，他微微点点头：“这个头开的不错。”

梅佐贤得到徐总经理的赞许心中自然欢喜，可是下面的文章难做了。他仔细回忆一下过去给徐总经理经手的事，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体立刻浮现在眼前，记得详详细细，就是那些芝麻大的违法事体却想不起来。这方面的事体实在太多了，也太小了，不容易记。慢慢，他想起了几件，有的数目不小，他没有

提出来；有的情节严重，当然不能写；终于他想起了两点，对徐总经理说：

“我想，有两件是可以坦白的，一个是欠美援纱问题，一个是包纱纸问题，大家都晓得的。总经理觉得哪能？”

“好，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坦白，你给我写，佐贤，你写的真妙。”

梅佐贤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

一、我厂于解放前欠交前美援会各支纱共陆百余件，解放后曾缴还当局二百七十五件，尚欠合二十支纱三百三十三件，虽然当局一再催促及早清缴，而总存在着观望态度，一味敷衍搪塞，延宕不还。直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始因停车缴五十件，其余二百八十三件及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应缴罚纱七十二件余，迄今仍未归清。这都是卑劣作风，我犯了欺诈行为，使国家对于财产之调节受到影响。我自愿悔过，承认错误。

二、我厂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起，未经准许，擅将包纱纸抽去不用，以致绞纱容易沾污损坏，这是偷工减料行为，我也犯了错误。我保证立即买纱纸使用，决不再延。

徐总经理听梅佐贤念完，说：

“税务方面一定要写一点……”

梅佐贤马上想起方宇，脱口说出：

“方宇泄漏涨税消息能写吗？外边传说方宇已经在区上坦白了，这一点也可能坦白了。”

徐总经理霍地站了起来，右手向梅佐贤一按，生怕他写上去似的，急着说：

“这一点，不能写。我想方宇不一定坦白这个，就是他坦白，我们也不写，更不能承认。佐贤，你晓得，这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毒当中罪名最大的一项，无论如何不能写。”

“当然不能写。”梅佐贤马上把话收回来，说，“我不过提出来报告总经理一下。”

“小数目的偷税漏税倒可以多写几件……”

“这恐怕要找会计主任勇复基提供材料，他一查账就晓得了。”

“用不着找他。他是胆小鬼，树叶掉下来都怕打死的人。一找他，事体就麻烦了。还是你给我想几件。”

“好的。”梅佐贤满口应承。

徐总经理走到梅佐贤旁边，望着他的笔记本子，说：

“你先写出来我看……”

梅佐贤对着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认真地回想，透过窗帷，看见花园那边的洋房晒台上晒着两床水红缎子的棉被，他想起来了，在笔记本上连忙记下：

三、我厂自用斩刀花做托儿所棉被一百八十斤，做门帘四十斤，做棉大衣七十斤，共计用去棉花二百九十斤，并未作为销货处理，显然是偷税漏税行为，现决补缴营业税等税款，并保证决不再犯。

四、一九五〇年秋季起至一九五一年八月止，我厂陆续将旧麻袋九千一百只合两万二千七百四十九斤向信大号掉换，每担旧麻袋换新麻袋四十只，过去认为是物物交换，不做进销货。旧麻袋价格每担六万至十万不等，若以统扯每担八万计，则销售废料约计人民币一千八百二十万元。我厂偷漏了营业税百分之三，附加税百分之三，印花税百分之三，共约人民币六十五万元左右。我厂漏缴税款，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我犯了偷漏国税的重大错误，我保证以后决不犯同样的重大错误。

徐总经理见梅佐贤停下了笔，他赞不绝口：

“这两件想的实在好，事实具体，情节不重，数目不大，实在太好了。佐贤，累了吧，抽根烟歇歇。”

“不累。”梅佐贤放下笔记本和派克钢笔，弯腰到矮圆桌上对着淡黄色的自动烟盒一揷，一根三五牌的香烟从盒子里跳了出来，一端通着电流，正好把烟燃着。他拣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

徐总经理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

太阳光已经移过去，客厅里显得清静和凉爽。窗外挂着的芙蓉鸟，张开嘴，发出清脆的歌声。

徐总经理踱到矮圆桌子面前站了下来，对梅佐贤说：

“我念，你给我往下写。”

“好的。”梅佐贤慌忙把香烟放在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记：

五、1. 我曾借给本厂税局驻厂员方宇人民币一百万元，两三个月以后还我，又借去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2. 一九五〇年六月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戏票四张，并先后请其吃饭四五次；3. 一九五一年七月，曾送加工科洪科长“劳莱克斯”钢表一只，约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还来。……以上各笔，因为厂中不能出账，纯系

我私人贴掉，认为无关紧要，这样做事情可以方便，不知我犯了行贿行为，这是腐蚀国家干部的一件严重而又连续的大错误。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徐总理念完了，又踱了一阵方步，然后站下来，果断地说：

“佐贤，我看这样差不多了，除了盗窃经济情报以外，我们每项都写了，可以过关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梅佐贤连声应道，“当然可以过关了。”

“那么，你给我加上一个尾巴。”

梅佐贤的派克钢笔在笔记本上绕了几个圈圈，停了一会，才写下去：

以上是我据实坦白，决无半点隐瞒。我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识。我是在反动统治社会里成长的，思想麻痹，认识模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厂中内部在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腐败情形，亦因为我领导无方，尚未完全整顿改善。总之，过去一切思想和行为，根本未从人民的利益着想，严重的违反了共同纲领。我愿意接受处分并赔偿因犯上项各款而使

人民所受的损失。我保证决不再犯，从今洗清污点，重新做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又希望对于我以上的坦白有严厉的检查和无情的批评。

谨致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

梅佐贤一口气写完，真的有点累了，往沙发上一靠，很舒适地吐了一口气。徐总经理要他从头念一遍听听，研究一下有啥地方需要补充的。梅佐贤念到第五段关于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那里，徐总经理拍着摆在墙角落那边的钢琴说：

“这个地方有问题，最近没有碰到洪科长，不晓得他们公司里的‘三反’情形哪能，要是不对头，就糟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梅佐贤皱起眉头，说：

“这确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忽然电话铃叮叮地响了，接着老王走了进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哪能打到这里来了？”他怀疑地站了起来。

徐总经理最近既希望有电话来又怕有电话来，

外边有电话来，可以知道市面上的行情；又怕有电话来，报告发生意外。一听到电话，他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了，对梅佐贤说：

“你快去听听，可能有啥紧急的事体。”

梅佐贤去接了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焦虑地报告徐总经理：

“是工务主任郭鹏打来的。重点试纺成功了，管纱光滑洁白，很少有疵点，断头率骤减至二百五十根，经过韩工程师检验，认为在品质上够得上一级纱……”

“陶阿毛在清花间睡觉了吗？”

徐义德同意工会主席余静重点试纺以后，当天晚上就要梅佐贤找陶阿毛，叫他无论如何设法争取到清花间监督重点试纺，另一方面又要郭鹏准备好掺杂劣质的花衣。陶阿毛真的争取到清花间监督试纺了，但是试纺成功了。徐义德就生气地问。

“陶阿毛没睡觉，这次试纺工会监督得很严，特别是清花间更加严格，有三个工人同时监督，余静和赵得宝还时不时去看。”

徐总经理听到这消息像是受到沉重的打击，颓然地坐到钢琴前面的长凳子上，不知道是徐守仁还是吴兰珍弹了钢琴没有把盖子盖上，他坐下去左胳膊正好压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发出一阵杂乱的琴

音。他用力把钢琴盖上，大声骂道：

“是谁弹的琴，也不晓得盖上！”

梅佐贤站在客厅当中愣住了，吓得不敢做声。

半晌，徐总经理冷静下来，焦急地问梅佐贤：

“韩工程师说啥没有？”

“没有。郭鹏说韩工程师只是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啥原因，暂时还不能肯定。”

“那还好。”徐总经理慢慢站了起来，背靠着钢琴，对梅佐贤说：

“原棉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漏洞，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管工会余静哪能领导重点试纺，也不管重点试纺成功不成功，我们决不能承认原棉上的问题。这方面一松口，那我们很多方面就站不住脚。幸好韩工程师还够朋友，没有说出来。郭鹏当然不会说的。勇复基胆小，你去晓之以利害，他也不敢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洪科长，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他，要他千万不要坦白。如果花纱布公司开除他，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你今天能够找到他吗？”

“能够。”

“‘三反’期间，找干部怕不容易吧。”

“不，我有办法，我要他家里人打电话约他。”

“那好。你把坦白书带到总管理处去，要他们打好四份送来。等你和洪科长谈好，我明天就亲自到工

商组递坦白书去。”

“我现在就去。”梅佐贤收起笔记本和派克钢笔。

徐总经理送他到客厅门口，握了握手，说：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3

徐总经理对着电话听筒说：

“是的，我就是徐义德……佐贤吗……唔，洪科长哪能讲……昨天夜里碰到的，因为太晚了，今天告诉我……那没有关系……唔……他说，他们机关‘三反’开展得迟，还没完全结束……是的……沪江的事他没有坦白……戏票和吃饭的事讲了……表呢……没有提……这个可以坦白，就说是借用的，以后又还来了……别的呢……他不谈……那好……他的态度怎么样……很坚定，很沉着……这很重要……告诉他必要的辰光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没有……讲了……好的……厂里那几个人你分别给我关照一下……告诉他们：只要这次帮我一下忙，我徐义德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一定记在心里，将来要大大的酬劳他们……唔……加薪水，提升职位……都可

以答应下来……佐贤，这一次我完全靠你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怕他们来检查……坦白书吗？……我就送去……好的好的……你也要小心注意……佐贤……再见！”

徐总经理最后叫的那声“佐贤”，声音有点颤抖，声调里面充满了感激和希望。他把听筒放到电话机上，躺到床上去，两只手托着自己的后脑勺，满头整齐乌黑的头发散发出阵阵的香味。他的两只眼睛对着屋顶，把自己所经营的企业，从头到尾又想了想，那些挂名董事和董事长的厂以及有点股份的企业，他并没有实际去管事，暂时一脚可以踢开，即使自己过问的厂，也可以轻轻推到厂长经理们的身上，只有沪江这副担子他非挑起来不可。想想解放以后沪江一些严重违法的事情，有关方面都安排了，感到布置妥帖，万无一失了。不过，这份坦白书送上去，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比方说，认为沪江根本没有坦白，坦白的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会不会当时扣留起来？他自己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他下了决心，硬着头皮去。他猛可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叫道：

“宛芝！”

林宛芝站在窗前，随着声音转过身来。

“给我拿件衬衫，要淡灰府绸的。”

“你身上不是穿着一件衬衫吗？”

“还要一件。”

“为啥偏偏要淡灰色的呢？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里面有道理，宛芝。今天我亲自到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去递沪江坦白书，有可能被工商组扣留，那我就会到提篮桥去了。坐班房要多带一件衬衣，灰色的穿脏了不要紧，可以多穿些日子……”

“义德，”她指着他的嘴说，“我不要你讲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也不希望讲。”

“我们讲点高兴的事，讲点吉利的话。”

“我们不幸生而为民族资产阶级，倒霉透顶了。现在还有啥吉利话好讲，宛芝，你给我快拿衬衫吧。”

“民族资产阶级有钱有洋房有汽车，为啥不好？”

“你蹲在家里，不晓得现在世界变了，目前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不像从前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给人家骂臭了，一个铜钱都不值了。”

“我真不懂。”其实现在她并不像过去那样对外边的事体一点不知道，从冯永祥那里早就晓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唯利是图”这些新名词了。但她把这些新名词藏在心里，不轻易讲出来，也不随便表示自己懂得很多。她故做不知地这么说。

“你别管这些。”

她蹒跚地走到衣橱那边，在抽屉底层给他找出那件很久很久没有穿了的淡灰色的府绸衬衫。他脱下西装，穿上这件衬衫，两个硬领子夹在一道很不舒服，他把淡灰府绸衬衫领子放倒，扣好钮子，说：

“把那一套灰咔叽布的人民装拿来。”

“人民装难看死了，又是咔叽布的，别穿那个。你身上这件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不是很好吗？”

“穿西装去坐班房，犯不着。”

“那么，你穿蓝哔叽人民装，这还像个样子。”

“这辰光，还谈啥样子不样子，唔，”他叹了一口气说，“也好，尊重你的意见。”

他平时很少穿人民装的，只有出席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要见首长才穿上。就在那个辰光，他的汽车上也还准备好一套簇崭新的漂亮的西装和化妆用品，散了会以后，或者是临时要到啥地方去，好马上又穿起那身漂亮的西装。今天是下了决心，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留在家。要是在平时，这身英国料子的上等西装，哪能忙法也得折叠整齐，放在汽车后面的车箱里。

他穿上蓝哔叽人民装，自己到卫生间里取了一把绿色的透明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一瓶先施牙膏放在口袋里。

她指着他的口袋说：

“这个也带上？”

“当然带上，你说提篮桥会给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吗？”

“你又讲这些话了，义德，我不要你讲。”

她生气地嘟着嘴。

“讲不讲还是那么一回事——你给我拿点钱带上。”

“多少？”

“一百万差不多了。”

“多带一点好，”她嘴上虽然不希望徐义德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但是她已经受了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在准备那些不吉利的事到来。她说，“带两百万吧。”

她把两百万现款给他分放在两个口袋里。他自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昨天晚上梅佐贤派人送来的坦白书，放在人民装的胸袋里，说：

“下去吧，他们在底下，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她知道大太太、朱瑞芳和徐守仁都在楼下客厅里，还不知道徐义德这番打算哩。

“给他们说一声也好，我想，不会有事体的。”

“但愿如此。”徐义德走到卧房门口看看表：已经九点零七分了，他退了回来，对林宛芝说，“还有一件东西，差点忘记哪。”

“啥？”

“我要换一只手表……”

她走到衣橱那儿，把上面一个抽屉拉开，取出首饰盒，打开盖子，问他：

“要哪一只？要白金的带日历的西马？要十七钻的劳莱克斯？要爱尔金？还是要自动的亚米加？”

“这些都用不着。”

“要啥？”

“你把那个自动的日历手表拿出来……”

“这个太大了，戴在手上不好看，白相白相还差不多。”

“现在要讲实用哪，宛芝，坐班房有了这个表，就知道日子啦。”

“又来了，你！”

徐义德换上自动的日历手表，和她一同下去。走进客厅，林宛芝望见大太太坐在那里，脸上有点不耐烦了。朱瑞芳干脆提出质问：

“义德，在楼上哪能这么久？我以为你永远不下来哩。”

“是呀，”大太太接上去说，“叫人家在楼下等死了，我还以为出了事哩。”

徐义德没有言语。林宛芝从她们的话里闻到了酸味，她解释道：

“他在楼上忙得不停，又换衣服又换手表，还带上牙刷牙膏……”

林宛芝这么一说，大太太和朱瑞芳发觉徐义德果然换了一身蓝哔叽人民装，而且眉宇间隐隐地露出心中的忧虑，知道有啥不幸的事了。朱瑞芳望着徐义德，关心地问：

“带牙刷牙膏做啥？”

“准备上提篮桥，省得你们整天吵个不停。”

如果在平时，朱瑞芳早跳得三丈高，瞪着眼睛，要和徐义德闹个一清二白；今天她却按捺下自己的气愤，知道这一阵子徐义德不是心思，遇事都让他。她低声下气地说：

“还不是为了你。啥人整天吵个不停？你嫌吵，我以后少讲话就是了。带上牙刷牙膏，做啥呢？”

徐义德还是没言语。

徐守仁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

大太太对着徐义德说：“有啥事体，讲呀，义德。”

林宛芝把徐义德在楼上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家都黯然失色，客厅里给可怕的沉默笼罩着。窗外挂着的鸚鵡也好像懂得主人的哀愁似的，站在淡绿色笼子里的松枝上，出神地仰着头，紧紧地闭着嘴。

徐义德打破了可怕的沉默：

“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发愁，有事，我自己有办

法处理。只要你们好好在家里过日子，大家说话一致，我就安心了。”

朱瑞芳安慰他：“家里的事，你放心好了。”

“出了事，你们可不能急，也不要慌，急了，慌了，反而误事。我啥都准备好了，估计也可能没有事，要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消息，那你们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到提篮桥来看我。”

大家都不愿意往那不幸方面去想，徐义德这么说，又不得不表示态度，只好微微点点头。

老王走了进来，弯着腰向徐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文宝斋那个商人来了，他说带来两件刚出土的古董，问老爷要不要？”

“刚出土的古董？啥古董我也不要，你告诉他以后不要来了。”

“是，是是。”老王见情势不妙，知趣地退了出去。

徐义德望望大家，问：

“你们还有事吗？”

每一个人仿佛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点也说不出。她们预感一桩不幸的事体要到来似的，留恋地盯着他瞧。他站了一会儿，见大家不言语，就说：

“我去了。”

大家站起来，送徐义德到门口。一辆一九四八年黑色林肯牌的小轿车停在走道上，老王照例地打开

车门，请徐总经理上去。徐义德摇摇手：

“我今天不坐汽车。”

老王诧异地望着徐总经理从林肯车头走过去。

“义德，你为啥连汽车也不坐？”这是朱瑞芳的声音。

“我有道理。”徐义德心里想，这辰光出去还坐汽车吗？那不是更叫人笑骂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如果被扣留下来，叫司机看到，也不光彩。

朱瑞芳她们见旁边有老王，不便多问，也不好勉强要他坐。大家随着徐义德走去。徐义德走到黑漆大铁门那里，转过身来，对大家仔细望了一眼，说：

“你们回去吧。”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再见。”

14

徐义德跳上到外滩去的三路公共汽车。车上坐满了乘客，没有一个空位。他挤在人群当中，左手抓住车顶上的吊圈，右手紧紧按着胸袋里的坦白书。他感到有点孤单，同时也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忽然降低了。车上的人都用轻视的眼光看他，好像知道

他是去送坦白书的不法资本家。他浑身如同长了刺一般的，站也不是，靠也不是，尽可能挤向车窗跟前去，把面孔对着马路。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好像也知道他是不法资本家，不然，为啥要狠狠望着他呢？他微微低着头，啥人也不望。

不知道过了多少站头，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趟车总算到了外滩。外滩公园门口站着一长行等候公共汽车的男男女女的乘客，一个个都仿佛注意徐义德从车上下来。他怕遇到熟人，连忙径自向南京东路走去。刚走了没两步，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他站下来，一辆雪佛莱喇的一声过去了。接着后面又开来一辆。

“这汽车，真讨厌。”他干脆站在那里等汽车过去，抬头望见高耸云端的海关大钟，恰巧当当地敲了十下。

路口的红灯亮了。他和刚才下车的人一同穿过马路，顺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那座高大楼房前面的子街，吃力地迈着缓慢的步子。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在从前的华懋饭店的楼上办公，接待室就在楼下右边那一排房子里。门口等候送坦白书的资本家已站成一条龙，一直排到惠罗公司那里，龙尾差点要转到四川路上去了。这条龙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讲话。

徐义德顺着龙身旁边走过来，看见里面有几个面熟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没有封，里面装的是坦白书，大家只是会意地笑笑，不像过去亲热地打招呼，都怕有啥脏东西沾染到自己身上。徐义德索性低下了头，注视着那一排整整齐齐的鞋子：皮的，布的，呢的，黄的，黑的，灰的……他自己的步子走得很快，转眼的工夫，他站到最后一个人的后面去了，前面的人移动几步，他也移动几步。他啥也不看，只是盯着前面那个人的脊背。快移到工商组门口时，他看见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马上意识到这是政府摆下的圈套，名义上要资本家递坦白书，承认了罪行，然后一个个都送到提篮桥去，一网打尽。政府把工商界的资财吃个精光。早就料到政府哪会轻轻放过上海的工商界，这么肥的油水，哪个党派得势上台不在上海狠狠捞一票？看上去，共产党比任何党派都狠心，不但要钱，还要工商界的命。他不能眼睁睁地跳下火坑，现在是千钧一发，一跨进那道门啥都完了。他有座华丽的洋房，那里还有三位漂亮的太太，特别是林宛芝，他哪能把她丢下？林宛芝没有他又哪能生活？他还没有给她们好好谈谈，就这样永别了吗？哦，还有守仁那小王八蛋，年纪青，阅历浅，不懂事，他要对儿子好好交代交代，长大了，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他不能就这样跨进那道门，现在还来得

及。就是进去，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好让她们有个准备。他果断地走出了人群，站在他背后的人很奇怪，不知道他忽然为啥向四川路那边走去。

他打了电话回去，叫林宛芝不要等他，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她问他为啥，他没有吭声，那边忍不住哭了。他一阵心酸，话也说不下去，挂上电话，痴痴地走出烟纸店，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南京路朝东——他看到横在眼前的那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不如投水，省得再受这个气。他踉踉地朝东走去，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他的脚步子踌躇了。他问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结了吗？他望着浪涛滚滚的黄浦江，他的心也像是一条奔腾的黄浦江，汹涌澎湃，宁静不下来。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刻，旁边有一个人叫住了他：“德公，你怎么往那边走？”

他回过头去一看：是唐仲笙。他一时答不上话来。唐仲笙问他：

“坦白书递了吗？”

“没有。”

“那到那边去排队，一道走。”

“你也去吗？”他很惊奇智多星也去排队。

“当然去，不坦白哪能过关。”

“过关，”他思索这两个字，觉得智多星肯去排队，当然没有错。他信口应道，“好的，一道走吧。”

他们两个人排到龙尾那里。徐义德站在唐仲笙前面，心噗咚噗咚地跳，现在他不好再离开了。他只好硬着头皮随着前面的人一步步移动。

徐义德无可奈何地走进接待室。他看见满屋子都是人，贴墙摆着一排桌子，桌子联着桌子，形成一个柜台似的，每一个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工商组的工作同志，在桌子前面正对着工作同志坐着的是资本家。他被引到最后一张桌子上，那里坐着一个人没谈完，另外还有两个人站着在等候。他踮起脚尖，想学学别人哪能交坦白书和答复工作同志问题的，自己好应付。可是人声嗡嗡，声音细碎，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他想倾听最后那张桌子上的谈话，又怕人猜疑。等前面的人谈完，轮到他，他恭恭敬敬地把坦白书送上去，两手下垂，挺腰坐着，等待问话。他的搜索的眼光时不时盯着工作同志。工作同志的眼光一碰到他，他立刻低下了头，望着自己人民装上的钮子，表现出老实诚恳的样子。他心里却在想：这个年青小伙子今天可神气了，不是五反运动，你到我家来拜访，还不见你哩。

这个工作同志姓黄，名叫仲林，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却沉着练达，办事很有经验。他接过徐义德的坦白书，很快就看完了。他每天要看上百份这样的坦白书，已经摸出一个规律，头尾那些坦白彻底诚恳的

话，完全可以猜出，照例不必细看，主要看坦白的具体事实，就知道坦白的程度了。他看徐义德坦白的五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显然是来应付应付的。他登记好姓名厂址，把坦白书往桌子上一放，手里拿着钢笔，问徐义德：

“你还有啥要坦白的吗？”

“我坦白的，都写在这上面了。”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问你，除了上面写的以外，还有啥要坦白的？”黄仲林说。

“还有啥要坦白的？”徐义德用力搔着自己的头皮，出神地想了一会，说，“没啥坦白了。”

“我怕你有些事体忘记了，你想想看。”

徐义德脸上忽然热辣辣的，心里想：这个年青小伙子哪能这样厉害，瞧他不起，看了一下坦白书，就知道还有没坦白得，而且话说得那么婉转，给自己留下了补充坦白的路子。他听说“三反”干部过了三道关，“五反”恐怕也得坦白七八次，一次不能坦白完。有些事体根本不能坦白，坦白出来，别说沪江这厂要赔掉，恐怕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他咬咬牙，肯定地说：

“我的记性很好，没啥忘记的。”

“资本家的记性总是不大好的，我们这里常常有人来坦白三次四次，还有的坦白七八次……”

徐义德惊奇地“啊”了一声，坦白七八次，那自己以后还要来吗？

黄仲林接着说：

“还是一次坦白得好，省得下次再来了。”

“我和别人不同，我的记性很好。”徐义德说。他想黄仲林的话：“下次再来”，那么，这一次还不去提篮桥？他有点莫名其妙了。

“多想想不吃亏。”

“那是的。”徐义德含笑点点头。

“那么，你想想有啥补充吗？”

“补充？”

“是的，把那些重大的见不得人的事体补充上去。”

徐义德感到黄仲林的眼睛里有一股逼人的光芒，这光芒似乎可以照得见徐义德那些重大的见不得人的违法事体。他奇怪这个年青小伙子懂得这么多，为啥几句话就说到自己心坎的深处呢？徐义德不单是脸上发烧，心也跳动得剧烈，表面竭力保持着平静。他想站起来走掉，可是话没有谈完，哪能好走？身子背后还有唐仲笙在等着哩。他毫不犹豫地说：

“真的没啥补充了，如果查出来，我愿意受加倍的处罚。”

“话不要讲尽，”黄仲林笑了笑，说，“要给自己

留点余地，今天不补充，将来好补充。”

“你不相信，我可以发誓。”

“那倒用不着，我们不相信这个。”

“真的没啥补充了。”

“一点也没有了吗？”黄仲林用眼睛盯着徐义德。

徐义德斩钉截铁地说：

“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你可以具结保证吗？”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徐义德毫不含糊地问，“是要签字还是打图章？图章我也带来了。”

“今天用不着了。”他对徐义德微笑，说，“将来想起，还可以补充坦白。”

徐义德坦白的门关得越紧，黄仲林欢迎坦白的门开得越大。他耐心地对徐义德说：

“陈市长‘五反’动员报告你们学过了吗？”

“学过了。”

“你还要再学习学习。”

“是的，新时代的工商业家要不断学习，努力进步，好为人民服务……”

黄仲林打断他的话，问：

“你有啥检举吗？”

“检举？”

“是的，就是说，你晓得别的工商业家的五毒行

为，可以向人民政府检举。”

徐义德认为检举别人给对方知道了，对方一定也会检举自己，那是不利的。千万检举不得。他说：

“隔行如隔山，别的行业的事情，我一点也不了解。至于棉纺这方面，我倒是熟悉，不过平时厂里事体忙，很少和同业往来，也不大清楚。”

“检举也可以说明对五反运动的态度是不是诚恳坦白，检举出来的违法事情，对五反运动有好处，对人民政府有帮助，在你来说，立了功，也有好处的。”

检举有这些好处，徐义德觉得可以考虑考虑。一看到四面站着的坐着的都是工商界的人，尤其是唐仲笙就站在背后，他是智多星，工商界的巨头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哪能好当面检举别人？传到对方耳朵里对自己就不利了。他想了想，说：

“同业的事不大了解，就是听到一点半点的，也记不清楚了。”

“你记性不好，我是晓得的，可以多想想，一想就记起来了。”黄仲林对他笑了笑。

徐义德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旋即给自己解脱了：

“别人的事我记不清，我自己的事是记得很清楚的。”

“这没有关系。”

“我可以不可以想好了再写给你？”

“可以。”

徐义德提心吊胆地问：

“还有啥事体吗？”

黄仲林放下了钢笔，答道：

“没有了。”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徐义德站了起来，唐仲笙坐了下去。徐义德跨出了接待室，像是怕后面有人追来似的迅速向大门方向走去，半路上给一个人拦住了，要他从后门出去。他这才了解为啥刚才只看到有人进来没人出去的原因。他走出后门，一个劲向外滩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不到十步，回过头去一看：身后没有政府工作人员跟着，他才安定下来，放慢脚步，徐徐向江边望去。

黄浊浊的黄浦江面上从吴淞口那个方向迟缓地驶来一只江华号客轮，朝十六铺那边开去，快靠岸了。江华号驶过去，江面上一只只小舢板，在波浪上起伏着，自由自在地摇摆着。靠近江边的新修成功的快车道，无数辆的各种汽车呜呜地疾驶着。徐义德羡慕船上的车上的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多么快乐啊。徐义德出神地望着江边，他的右边肩膀上猛可地有人敲了一记。他想：这下可真完蛋了。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怎么会放松资本家呢，随随便便送一份坦白书就让走了，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体。交了坦白书，出了工商组的门，在马路上下手，人不知鬼不觉，就把人抓走了，政府想的办法多巧妙，逮捕了人不留痕迹，追问起来，可以赖得干干净净。这一手太厉害了！好在早已准备妥当了，知道要进提篮桥的。现在就走吧。他准备跟着后面来逮捕他的人到提篮桥去。在嗡嗡的人声中，忽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

“你在这里做啥？”

他回过头去一望：是朱延年。徐义德满脸怒容，盯了朱延年一眼：

“现在是啥辰光？老弟，开这样的玩笑！”

“为啥？”朱延年莫名其妙地笑着说。

徐义德不愿意说出内心的恐惧，定了定神，若无其事地说：

“没啥。”

“我在这里等公共汽车，远远看见你从接待室出来，叫你好半天，你听不见。我就走过来找你了。”

“你也来送坦白书的？”

“五反运动吗，就是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低头，过去我们一向是朝南坐的，这次要朝北坐一下，找几件事体坦白坦白，应应景，低低头，就过关了。”

“你还那么轻松，这次运动和过去不能比，听说

单是职工的检举信，增产节约委员会就收到三十万封呢，来势很凶！老弟，你要小心点。”

朱延年不了解三十万封检举信的内容，但装出好像知道的神情，摆出蛮不在乎的样子，轻轻一笑：

“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宣传攻势，职工哪能晓得那许多？检举的还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一件芝麻大的小事要写好几封检举信，凑起来当然有三十万封。这样的检举信，要一百万封也不难。姊夫，你要笃定泰山，不要上共产党宣传攻势的当，打仗就要心定。”

“这一仗稳是我们输的，只要不惨败，就是上上大吉。老弟，不管哪能讲，这次运动来势凶啊……”

“算它是台风吧，刮过去也就没事了。”朱延年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徐义德，“你得到星二聚餐会的通知吗？今天晚上七点在思南路老地方聚一聚。”

“现在还聚餐？”

“唔，我早一会在店里得到通知，说无论如何要去，好像有要紧的事。”

“我今天没有到总管理处去，还不晓得。”

“去听听行情，领领市面。”朱延年怂恿他去。

他无可无不可地应道：“去去也可以。”

朱延年高兴地巴结道：

“现在快一点了，吃饭去，我请你，你看是吃中

菜还是西菜？”

徐义德想起早一会给林宛芝打电话的哭声，怕出事，得赶快回家。他没有心思和朱延年一道去吃饭，说：

“我还有点事。晚上碰头吧。”

15

太阳的余辉照在绿茵茵的地毯一般的草地上，在草地上的北面有一个大金鱼池，池子当中站着一个石雕的裸体的女神像，她的左手托着一个花瓶，从花瓶里喷出八尺来高的水柱，一到上空就四散开去，雨点子似的落在池子里。四五寸长的“珍珠鳞”、“蓝丹凤”、“望天球”和各式各样的金鱼在雨点子下面愉快地游来游去。

在金鱼池后边是一排葡萄藤架子。架子下面两旁放着四张绿色的长靠背椅子，都坐满了人。晌晚的微风徐徐吹来，吹得人们的脸上有点凉丝丝的，但并不冷，反而使人感到清醒和爽快。宋其文给风一吹，心里尤其舒畅，他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

“陈市长的报告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又诚

恳，又坦白，又严厉，又宽大，又具体，又明确，五反就是五反，你看，多么明确！把我们工商界分为五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五，这个办法实在是公平合理仁至义尽了。我听了报告以后，心中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陈市长这样宣布开始五反运动，人心定了。三月二十五号那天的《解放日报》，我整整看了一天，看完了就舍不得丢掉，放在口袋里，没事的辰光，我就拿出来看看。”

宋其文从口袋里把刊登陈市长五反运动报告的那天《解放日报》拿出来给大家看，证实他的话句句是真的。

“这也是陈市长厉害的地方。”唐仲笙说，“陈市长不但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成五类，而且把各类的百分比也大体做了估计：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估计大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又放宽尺度，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要是彻底坦白，真诚悔过，积极检举立功的，也算做基本守法户。这么一来，陈市长就把我们工商界的人心争取过去了，然后集中力量，对剩下来的百分之五进行工作。这百分之五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工商界就孤立了。这是陈市长的战略：

团结绝大多数，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主要方面。”

潘信诚点点头，觉得唐仲笙看问题比宋其文又深了一层，讲的句句有道理，忍不住赞扬道：

“真不愧是智多星！”

宋其文心头一愣，他刚才没有想到这方面，给唐仲笙占了上风，又无从反驳，他望着女神左手里的花瓶，说：

“不管哪能，按陈市长的政策办事，我想，大家都肯坦白的。要是陈市长早些日子报告，叶乃传不会跳楼自杀了。他究竟是个干才，想起来，有点替他可惜。”

“叶乃传吗，”马慕韩瞧了宋其文一眼，说，“再宽大也宽大不到他头上，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工商界坏分子肯坦白，那才是怪事体哩。”

宋其文看马慕韩的脸色不对，马上转过口来说：

“慕韩兄的话也有道理。”

柳惠光自从“五反”以来很少看报，在利华药房楼上整天板着面孔，像是家里死了什么人似的。他就是到星二聚餐会来，也是愁眉苦脸提心吊胆的，看了陈市长的报告以后，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他和宋其文一样，把那张报纸藏在口袋里，整天带在身边。每逢听人家提到陈市长的报告，他就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激动地说：

“政府的宽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基本守法户的数字以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为标准，因为上海行业多，交易进出数字大，因地制宜，太正确了。”照柳惠光自己的估计：利华的违法所得可能不超过一千万，所以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兴趣。他说，“陈市长的报告，句句听的进。老实说，以前听见检查两个字就有点儿心惊肉跳，听过陈市长的广播，又仔细看了看报告，就希望赶快到我们利华来检查。我这两天饭也吃得下了，心也笃定了。‘五反’没啥了不起。我估计：我顶多是属于前三类的。”

柳惠光得意忘形，边说边笑，只顾谈自己，不知道话里伤了别人——仿佛别人是属于后两类的样子。潘信诚有涵养，只微微望了他一眼，内心虽不满意，却没有透漏出来。马慕韩没有注意听柳惠光说啥，他扶着葡萄架的栏杆凝神地望着那条浑身装饰着珍珠似的“珍珠鳞”游到水面上来争食吃。唐仲笙句句听见了，他忍不住刺了柳惠光一下：

“老兄，你现在轻松了，忘记早两天你那股紧张劲。你急起来，走投无路，唉声叹气；松起来就天下太平，嘻嘻哈哈；真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现在又神气活现了。”

柳惠光给唐仲笙一刺，这才感到自己话里语病太大，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

他顿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想法慢慢把话拉回来，抱歉地说：

“我不过这么说说，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

这句话马慕韩听见了，笑着对他说：

“惠光兄，你啥辰光不担心？你天天担心，事事担心。你说，对不对？”

“对，完全对。”柳惠光借此把话岔开去，说，“慕韩兄的话当然对。”

“那倒不见得。”马慕韩并不在意柳惠光捧他。

唐仲笙没再理柳惠光，他对潘信诚说：

“从陈市长的报告里可以看出：处理工商业者比处理公务人员宽；处理公务人员又比处理共产党员宽。幸而我们是工商界，犹得宽处。否则，‘三反’起来，真正吃不消，不管多大的干部都会撤下来。”

潘信诚信口答道：

“不过，和共产党相处也不容易，随时要小心谨慎。”

“是呀，”潘宏福给爸爸的话做注解，说，“不然要吃亏的……”

潘信诚怕儿子谈家里的事，连忙瞪了他一眼。他会意地没有说下去。唐仲笙不了解他们父子话里的意思。马慕韩正坐在潘信诚斜对面，他歪着头插上来说：

“和共产党共事倒不难，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行了，难就难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这却实在不容易。”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实在不容易。”潘宏福觉得马慕韩说得对。

“道理容易懂，就是做起来难。”潘信诚接着对潘宏福说，“你年纪青青的，不懂事，少多嘴多舌的。”

他说完话，微微重下眼皮，暗中睨视了马慕韩一眼。马慕韩扶着栏杆，想主意来驳他。

“那不是马慕韩吗？”

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马慕韩从女神旁边望过去：冯永祥站在草地那边，举着右手，向葡萄架这边指着。

草地那边聚集着两堆人，右侧那一堆里梅佐贤站在前面，唉声叹气地说：

“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为啥？”朱延年感到有点奇怪，说，“‘五反’也反不到你们资方代理人的头上。”

“你说得好，延年兄，我们有我们的苦处。”

福佑药房没有资方代理人，除了童进那些伙计，就是朱延年代表一切。他不用代理人，也不知道资方代理人有啥苦衷。他轻松地问道：

“你们苦在何处？工人斗资本家，资本家挨斗。你

们苦啥？”

“你们当老板的，哪里晓得我们的苦处。”梅佐贤想起最近厂里各个车间工人高涨的斗争情绪，那紧张的空气，好像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着似的。他一想到这点，就怵目惊心，忧虑地说，“我们不是劳方，也不是资方，可是资方拿你当职员，劳方又拿你当资方。我们夹在当中，非劳非资，左右做人难。”

“这叫做夹心饼干？”

“不，”江菊霞很理解梅佐贤的心情。她虽然是大新印染厂的副经理，那是老板为了拍史步云的马屁，特地给她的干股。她认为自己不但在工商界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就是在大新印染厂也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她亲身体会这个处境，说：“工商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劳方。”

“糟坊？”朱延年不解地问，“是不是糟糕的意思？”

“不是。这是一个新的词儿，这个字也是新的，把劳方的劳字上面的两个火字去掉，加上资方的资字上面的那个次字，连在一块儿，叫做劳方，又是资方又是劳方的意思。”

“这个词叫的妙，这个字也创造的好。江大姐真是天才，变成现代的仓颉了。”梅佐贤竭力赞扬江菊霞。

“这个词不是我取的，是大家凑的。”

“我想：一定是你首先想的。这个词儿实在太妙了，把我心里要说的话都包括进去了。”梅佐贤的心情很尴尬：他希望用掉资方代理人的身份，至少要辞去厂里劳资协商会议资方代表的身份，害怕在“五反”当中被当做斗争的对象。但他感到不好当面向徐总经理提。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能好在徐总经理困难面前临阵退却呢？要是在“五反”中出一把力，说不定徐总经理以后会提拔他哩，至少加点薪水是不成问题的。怎样过“五反”这一关呢？他向江菊霞求教，“江大姐，你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劳方的日子难过。你得出点主意，领导领导我们。”

她给他这几句话说得心痒痒的，觉得梅佐贤这个人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她俨然是个上级，认真地想了想，用教训的口吻鼓励他：

“你说的倒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不过，目前资本家自身难保，顾不上考虑资方代理人的问题，暂时只有代理下去。资方代理人当然代表资方，这一点，不用怕。”

“代理没问题，”梅佐贤皱着眉头说，“就怕挨斗，那可吃不消。”

梅佐贤无意之中流露出恐惧的心情。朱延年不以为然，他毫不在乎，耸一耸肩膀说：

“大不了是开会斗争吧，共产党就喜欢这一套。怕啥？把心一横，让他斗，看他能斗出个啥名堂来？我早就想透了，心里很轻松。”

朱延年怕梅佐贤顶不住，拆姊夫的台。他想了想，又说道：

“天大的事，有徐总经理在前面挡着，你大不了是个代理人。工人就是三头六臂，能把你怎么样？别以为工人斗志昂扬有啥了不起，尽是跟着瞎嚷嚷！”

“不见得吧？”梅佐贤不把朱延年的话放在眼里。江菊霞却有不同的看法：

“延年兄的话，也有他的道理……”

梅佐贤听到她的意见，不好马上转过来，也不好马上不转过来。他想了一个说法：

“当然，延年兄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共产党善于搞宣传攻势，不能叫他们给蒙住。但是共产党有个特点，说一句算一句，也不能不有所提防……”

“江大姐的分析再正确也没有了。”梅佐贤一边热情赞扬，一边向江菊霞点头。

朱延年不满地望了梅佐贤一眼：觉得他不把朱延年放在眼里，他大小也是个经理呀！他有意刺梅佐贤一句：

“江大姐讲的话，没有不正确的。”

江菊霞红润的脸庞上闪着愉快的笑容。朱延年以为他这两句话讲到她的心坎里，发挥了作用，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徐义德从外边走进来了。

徐义德和朱延年分手以后，立刻跑到一家糖果铺子里借了一个电话打到家里，说马上就回去，叫家里预备中饭，弄点好吃的菜。他回家吃过饭，洗了个澡，对林宛芝说，自己这几天神经紧张，过分疲劳，现在坦白书送上去，可以稍为安心一点了，要好好地养养神，美美地睡他一觉。他躺到床上，蒙头睡去。他翻来覆去哪能也睡不着，接待室那个青年工作同志的笑容和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如浪涛一般的翻腾着，滚来滚去，老是不散。他坐了起来，干脆不睡了，一看日历手表，已经是五点三刻了。他跳下床，早上那一套行头全部留下，穿上原来那套深蓝色的条子西装，林宛芝给他选了一条深黄底子印着大红枫叶的领带打上。他坐上一九四八年黑色的林肯牌轿车，像一阵风一样的急驶而去。

他在车上想起应该先打个电话约江菊霞早点到思南路来，好闲聊聊，轻松轻松。他看车子开得那么快，忽然叫司机停下来也不好，就改变主意：到了那里再打电话也来得及。谁知道他一走进去，花园里已经有很多人，而且江菊霞比他先到了，就站在靠大理石台阶附近的草地上，正和梅佐贤、朱延年他们在

聊天。江菊霞今天在徐义德眼里显得更加美丽动人。她上身穿的是一件大红色的兔毛拉绒衫，下面穿着一条淡青色的西装裤子，裤脚管很长，一直罩到脚面上，几乎把黑高跟皮鞋的后跟全遮上了。她站在台阶右前方，给绿茵茵的草地一衬，远远望去就像是盛开着一朵大红花。

徐义德悄悄走过去，站在朱延年的背后，正好斜对着江菊霞。她看见徐义德盯着她望，她的眼睛向他转了一转，微微笑了笑，没有吭气。离他们左边三四步远近的地方，金懋廉和冯永祥谈得兴高采烈，不断发出格格的笑声。江菊霞借故对梅佐贤说：

“阿永在谈啥消息，我们听听去。”

大家走过去，徐义德也不声不响她跟过去，站在冯永祥背后，听金懋廉高谈阔论：

“马慕韩讲话究竟有力量，他向陈市长反映市场情况，真起了作用。国营企业都在收购、加工、订货了，华东区百货公司收购了三千六百五十多亿，华东区工业器材公司设了一千多亿，花纱布公司除加工订货不算，单是棉布一项，就收购了六百多亿，连市的贸易信托公司也收购了二三百亿……这一来，工商界开始松动，有生气了，连我们银行也沾了光，行庄存款都转稳了。”

冯永祥等金懋廉说完，他鼻子一哼，不同意金懋

廉的意见：

“市场好是好些，可不是马慕韩反映的。”

“那么，是谁？”金懋廉奇怪地问。

冯永祥有意卖关子，笑而不答。

“是你？”江菊霞问，“阿永。”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冯永祥开口了，“那天大家不是请慕韩兄反映的吗？我为啥要和他抢生意呢？”

“究竟是谁？说吧，阿永。你讲话总是说一句留一句，叫人家听了老是心里痒痒的。”

“好，我说，”冯永祥生怕别人偷听去似的，放低了声音，说，“那天协商会开会，休息的辰光，慕韩兄走过去，刚提起工商界的情形，你猜，怎么样？陈市长早就晓得市场的情况了。他了解工商界有困难，开协商会前好几天，陈市长就通知华东财委和上海财委共同商议，帮助解决工商界目前的困难了。”

金懋廉吃惊地问：“工商界这些情况，陈市长早晓得了？”

“当然早晓得了。陈市长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曾经率领百万雄兵，在淮海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匪帮主力部队好几十万，每个连队的情形他都晓得，不然哪能指挥这许多的军队打胜仗？孙子早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陈市长是战略家，他亲自指挥五反运

动，你说，他会不晓得我们工商界的具体情况？”

金懋廉的眼睛里露出惊异和钦佩：

“陈市长了解的比我们详细。”

“这还用讲？人民政府对工商界的大事体，没有不晓得的。政府经常注意各界人士反映的。政府的干部不是常常问我们有啥反映吗！不然，人民政府怎么订政策呢？”冯永祥俨然在代表人民政府讲话，接着反问金懋廉：“你说，这能算是马慕韩反映的吗？”

徐义德站在冯永祥背后一直没做声，这辰光他答了一句：

“阿永说的对，当然不能算是马慕韩反映的。”

冯永祥听见徐义德在他背后说话，奇怪地问：

“咦，德公，你啥辰光来的？我哪能不晓得。”

“姊夫啥辰光来的？”朱延年对徐义德特别亲热，有意让梅佐贤看。

梅佐贤没有理会他，只是恭恭敬敬地向徐总经理点了点头。

“我早来了，因为你们谈得正起劲，没敢打搅你们。”他走到冯永祥左边，望了大家一眼，笑了笑，算是补打了一声招呼。他看台阶附近两堆人里都没有潘信诚马慕韩那些巨头们，是他们没来，还是他们出了事。他就问冯永祥，“慕韩兄呢？”

冯永祥四面一望，正好看到葡萄架那边，就举起

右手尖声尖气地怪叫了一声：“那不是马慕韩吗？”

马慕韩看看太阳已经落了，草地上暗下来，他从葡萄架下面走出来，大声问道：

“人到齐了吗？”

冯永祥用双手做了一个话筒，对马慕韩叫道：

“差不多了，你们来吧。”

朱延年生怕马慕韩不知道他也来了，他也补了一句：

“马总经理，全到了！”

冯永祥他们走上台阶，江菊霞回头向花园四面扫了一眼，留恋地说：

“这花园真不错。”

金懋廉走到台阶上停下来，指着洋台说：

“这法国式的洋房也不错啊。”

冯永祥连声叹息：

“实在太可惜了，实在太可惜了。”

徐义德因为迟到，不知道今天有啥事体，也不知道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愿意问，只是跟着莫名其妙地说：

“是呀。是呀！”

大家走进餐厅，外边已经暮色苍茫，里面的电灯都开了，照得餐厅雪亮。今天吃的是中菜，一共摆了三桌，每张圆桌子上都有一瓶满满的威士忌。坐在最

上面一桌的是潘信诚、宋其文、马慕韩、冯永祥、潘宏福和徐义德他们，其余的人都坐在下面两桌。

今天轮到马慕韩当主席。他站了起来，用筷子敲了敲碟子，餐厅里立刻静了下来。他提高嗓子说：

“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桩事体。”

徐义德一听到这两句话，顿时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兆头。他看到大家都静下来了，餐厅里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在听马慕韩讲下去：

“自从重庆星四聚餐会的事情公布之后，聚餐会的名声很不好，一些会员担心，怕引起政府误会，请大家一道研究研究，我们星二聚餐会该哪能办法？”

潘信诚一看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消息，当时就想到星二聚餐会，不禁毛骨悚然，觉得骑虎难下，万一政府追查起来，有口难于分辩。他蹲在家里整整思索了一天，想出了一个妙法：自动结束，可以避免政府的注意。他暗示马慕韩约大家来商量一个对策，也好布置一个善后的事。不料马慕韩说得太简单，把问题提出去，一时又没有人发言。他不露痕迹地接上去说：

“重庆那个星四聚餐会确实别有作用的，最大规模破坏国家经济的集团，是联合同业向国营经济猖狂进攻的集团，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政府处理的非常正确，我完全拥护。我们这个聚餐会和重庆星四聚

餐会性质上当然不同，我们是学习政府政策法规，交流情况和经验的。不过，星四出了毛病，星二确实要研究研究，该不该办下去？慕韩老弟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

朱延年自从参加了星二聚餐会，兴趣特别浓厚。他成了星二聚餐会的会员，不仅在西药业，就是在整个工商界，他的身价忽然提高十倍。工商界的朋友见了，都另眼相看。在银行界调点头寸，在西药业进点货，都比过去方便。而且，通过姊夫和这些巨头们发生了关系，他希望把西药业公会抓过来，那发展的前途，就不是一个小小的福佑药房经理可比了。他今天接到通知，以为会讨论工商界怎样对付政府的五反运动，没想到要研究该不该把这聚餐会办下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星二聚餐会应该办下去，在他看来，是不成为问题的。他还希望星二聚餐会进一步发展，多吸收一些会员，好扩张自己的势力，研究对人民政府的合法斗争。马慕韩对这个问题提的不太明确，潘信诚的意思显然不主张办下去。他盼望有人出来反对，他好跟进。可是大家都默默无言，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喷声。他忍不住站了起来，朝马慕韩说：

“信老说的对，我们星二聚餐会和星四聚餐会的性质完全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

潘信诚从来没把朱延年这样的人放在眼里。朱延年参加星二聚餐会之后，潘信诚不和他往来，也很少和他谈话，认为他是一名危险人物，一沾上边，说不定啥辰光要吃他的苦头。但他是徐义德的小舅子，和冯永祥也算有些关系，不必去得罪他。潘信诚对他采取敬而远之的办法，料他成不了气候。听到他赞成自己的意思，暗暗看了他一眼，奇怪连朱延年这样的人也看到这一点了。等到他说下去，潘信诚听来又不觉得奇怪了：

“两个聚餐会性质不同，坐的端，行的正，也就不必怕政府误会。我认为我们星二聚餐会完全可以继续办下去。上海像我们这样的聚餐会，少说一点，也数得出几百个。据我知道，这几百个聚餐会没有一个要结束的，他们照样聚餐，政府从来没有过问过，更没有禁止，我们为啥要结束呢？没有事情，聚聚餐，聊聊天，有啥不好？”

潘信诚的眼光从朱延年的身上转到第二桌，他看到金懋廉站起来了，金懋廉支持朱延年的意见：

“这个聚餐会对我们联系工商界的朋友，学习政策，倒是有些帮助。如果可能的话，还是继续办下去的好。要是结束了，连个学习的地方也没有了。”

唐仲笙坐在金懋廉对过，直是笑，仿佛笑他不了解行情。梅佐贤坐在朱延年的右边，也赞成他的意

见：

“延年兄的意见值得考虑，”他想到徐义德坐在第一桌始终没吭声，他的态度怎么样还不清楚。他马上退了一步，说：“各位可以研究研究。”

潘宏福坐在潘信诚旁边，生怕爸爸听不清楚，他歪过头去，低声对爸爸说：

“看样子他们都不同意结束，是不是要重新考虑考虑？”

“现在结束都嫌晚了。”潘信诚碰了碰他儿子的胳膊，小声地说，“少说话。”

潘宏福不声不响地闭上了嘴。

马慕韩听听大家的口风不对，没有人提出要结束。这个星二聚餐会是他和史步云、冯永祥几个人发起的，别的人不过是一般的会员，唯有他们这几个人是核心分子，承担的责任和别人不同，政府如果追查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特别是他，政府首长都知道他是工商界的进步分子，党与政府也注意培养他，他哪能还和大家一道搞星二聚餐会呢？潘宏福昨天告诉他不如自动停止活动，希望星二聚餐会能找大家来商量一个办法。马慕韩懂得潘宏福是他爸爸授意来的。显然潘信诚是主张结束的。因为事情很紧急，昨天晚上他就约了冯永祥、江菊霞一同到史步云家里商量这件事，经过再三考虑，认为目前

风头不对，还是结束的好，过一阵子，看看再说。今天史步云身体不舒服，要马慕韩和大家研究研究。他原来估计大家一定赞成结束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朱延年公然不赞成，简直是不识大体。马慕韩几次望着冯永祥，希望他发言。他兀自一杯又一杯灌老酒，不了解他葫芦里卖的啥药。

冯永祥昨天夜里回去，躺在床上，半宿合不上眼，在动脑筋：星二聚餐会就这样结束了吗？他向政府首长和中共市委统战部反映一些情况，主要是靠星二聚餐会听来的，而他谈一些政府首长的指示，大部分是在星二聚餐会上透露的。星二聚餐会虽说没有市工商联人多影响大，但是工商界巨头们大半在这里，并且没有一个政府方面的人，讲话不受约束，商议起来方便，起的影响也不小。从心里说，他是不主张结束的。但是巨头们要结束，度察当前的形势，结束比不结束好。他虽想坚持，如果巨头们不参加，那星二聚餐会就没有啥意思了。他昨天赞成马慕韩结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听听大家的口吻，特别是金懋廉也不主张结束，这就值得考虑了。金懋廉是金融界消息灵通人士，对政府的行情摸的也熟，办事老练而又持重。他希望办下去，看样子，星二聚餐会的命运还有挽回的余地。他明知道马慕韩的眼光是要他发言，他故做不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夹

了一块盐水鸡放在嘴里，细细咀嚼。

马慕韩怕大家意见一面倒，再说服就吃力了。冯永祥既然避开他的视线，其中谅必有苦衷，没有办法，他只好亲自出马了：

“有这么一个聚餐会，大家经常见见面，学习学习政策，研究研究理论，当然对大家都有帮助。偏偏不巧，冒出一个重庆星四聚餐会，把聚餐会的名声搞臭了。我们这个聚餐会虽说和星四聚餐会不同，可是谁也不能保证个别会员没毛病，有的会员的毛病可能还很大。当然，我们联合起来向国营经济猖狂进攻是没有的。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把它结束了，免得引起别人的怀疑。”

朱延年正夹了一块广东叉烧往嘴里送，听了马慕韩这一番话，他的脸顿时红得像箸子上的那块肉。他以为马慕韩讲的那个“个别会员”就是指的他。难道马慕韩深知福佑药房的内幕吗？是谁向他报告的呢？怪不得在林宛芝三十大寿那天，一再不肯认福佑的股子哩！他把那块肉往面前的绿瓷碟子里一放，歪过头去，对第一桌上的人说：

“慕韩兄的担心，我看，是多余的。我们星二聚餐会的人都是很正派的，一向奉公守法，根本没有人向国营经济猖狂进攻。要是有的话，早叫政府发觉了。”

餐厅里的电灯光本来就够强烈，给雪白的屋顶一衬，更加明亮，照得朱延年额角上暴露出来的青筋都看的清清楚楚。马慕韩见他那一股紧张劲，心里不禁好笑，原来在徐义德书房里自鸣得意的干部思想改造所的所长，无意之中给他戳痛了疮疤。马慕韩并不因为他的撇清，而改变自己的说法：

“话不能说绝，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在很多人当中，难免有个把人出毛病，……”

朱延年站在那里追问：

“你说是谁？”

马慕韩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

“没有人有毛病，政府为啥要‘五反’呢？”

朱延年把嘴一撇：

“谁晓得政府想的啥主意？……”

潘信诚见朱延年不识相，和马慕韩一来一往，把别人放在一边，耽误了今天要结束星二聚餐会的大事。他嗫嚅地想说，考虑到现在正是五反运动紧张关口，不要得罪了他，说不定将来咬自己一口，跟朱延年这种人犯不着去争执，自然会有人出来打头阵的。他于是厌恶地白了他一眼，摸摸自己发皱的脸皮，这一摸，好像把心里的气也给摸得没有了。

徐义德看马慕韩脸色不对，他们两人抬杠，徐义德感到自己也有了一份责任。朱延年是徐义德介绍进

星二聚餐会的呀。果然不出潘信诚所料，徐义德打断朱延年的话：

“延年，那些事谁也说不清，还是谈我们星二聚餐会吧。你听听大家的意见。”

朱延年听出姊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但他觉得结束星二聚餐会对自己的损失太大了，以后再和这些巨头们往来就困难了。这和自己的前途有莫大的关系。他忍不住改口说道：

“慕韩兄讲的对，我们星二聚餐会和那个星四聚餐会性质不同，政府不相信，派人来领导好了。”

马慕韩听他的口气坚持星二聚餐会要办下去，有啥风险，一定是落在自己的头上，朱延年那个小药房反正是不在乎的。马慕韩不再和他纠缠，老实不客气地说：

“别让我们两个人把话讲完了，现在听听大家的意见！”

马慕韩的眼光又向冯永祥面前扫了一下，衷心盼望他站起讲两句，扭转这个一面倒的局面。冯永祥仍然不吭气。那边朱延年的嘴叫马慕韩给封住了，只好没精打采地坐下去，夹起碟子里的那块叉烧，报复地一口把它吞下去。

马慕韩的眼光失望地离开冯永祥那里，转到柳惠光脸上。柳惠光认为星二聚餐会越快结束越好，甚

至于以为今天最后一次集会也是多余的。他两次想站起来讲话，都叫别人占先了。朱延年一闭嘴，马慕韩的眼光又盯着他。他慢慢站了起来，说：

“我看，还是结束了稳当，保险。”柳惠光总是找最保险的路走，他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肯冒险的。

坐在他正对面的江菊霞答腔道：

“我赞成惠光兄的意见。结束了，可以省掉许多口舌。”她从史步云那里了解行情不对，昨天晚上又商量过了，她早就想讲话，因为没有人赞成结束，不好先提出来。

“是呀，”柳惠光一听江菊霞赞成他的意见，气更壮了。他紧接上去说，“要是不结束，发生问题，对大家都不好。”

朱延年心里想，不结束会发生问题，过去为啥没有发生问题呢？上海工商界有好几百个聚餐会都没发生问题，为啥星二聚餐会会发生问题！哼！他不同意柳惠光的意见，认为胆小，成不了气候。办事就要大刀阔斧，敢想敢做，才能闯出个天下来。但他没有说出来，马慕韩刚才给他一记，着实打得很痛，不好再顶上去。

马慕韩认为形势转过来了，正是说话的好机会，偏偏冯永祥的眼光还是注意着面前酒杯里的加饭黄酒。他怕这个机会再错过去，时不再来，连忙点冯永

祥的名：

“阿永今天哪能？好像肚里有啥心事，一句话也不说。”

“是呀，阿永今天哪能变成了哑巴？”唐仲笙凑趣地说。

冯永祥没法再躲闪了。他打扫了一下嗓子，接连咳了三声，眼光向三张桌子巡视了一阵，耸一耸肩膀，噙着嘴，停了一会儿，说：

“说我有心事吗？我可是没有心事。说我完全没有心事吗？那也不见得，多少有这么一点点。”

他伸出右手的小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你有啥心事？”江菊霞不相信，说，“你是乐天派。”

冯永祥喟然长叹了一声，提高了嗓子说：

“诸位明公有所不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的心事也各有不同。可是，我这个心事呀，却和诸位明公多少有这么一丝关系。”

他讲到这里，突然煞车，叫江菊霞听得上气不接下气，怪痒痒的。她嗔怒地质问：

“阿永，你是讲话，还是唱戏？开场白倒蛮有噱头，哪能忽然又不讲下去呢？”

“叫一声大姐呀，且慢慢听我道来……”

说到这里，他又不讲下去了。

“快说吧，别再卖关子了！”江菊霞指着他的脸说。

“好，好好，我就说，我就说，”冯永祥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心里想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这个星二聚餐会。想当年我和步老慕韩兄费了几许心血，再三筹划，好容易才办到现在的规模，连会址也有了。这幢花园洋房原来是大沪纺织厂王怀远董事长的，多亏慕韩兄的面子，借我们一直用到现在，一个房钱也不要，还倒贴我们的水电烟酒。各位说，这样的房东啥地方找去？原来以为我们这个聚餐会可以万岁千秋，现在却要半途夭折，好不叫人悲伤也！”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脸上黯然失色，显得靠墙的玻璃橱里的全套银制的餐具越发光芒夺目，叫人留恋不已。徐义德从玻璃橱里看到墙壁上装饰的雪亮的烛光，又看到用红艳艳牡丹花图案的花纸糊的墙，这些事物他看到不知道多少次了，但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可爱。他想到那次早上和江菊霞在楼上房间里谈心，更觉得这幢华丽的花园洋房亲切而又温暖。

朱延年始终心不死，听到冯永祥这番话，他的劲头又来了。为了保持星二聚餐会这个活动场所，他顾不得马慕韩的脸色，忍不住附和冯永祥的意见，高声

地说，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同情：

“永祥兄讲的再对也没有了，结束了实在太可惜了！”

他把“太可惜了”四个字的语气特别加重，生怕别人不注意听。他觉得更可惜的是他讲了之后没有反响，而且出乎他的估计之外，冯永祥的腔调忽然一变：

“不过么，正碰上五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看上去，不结束也不好。”

朱延年听到最后一句话，脸上刷白，好像突然下了一层霜。他按捺不住，提心吊胆地问道：

“我们星二聚餐会就是这样完蛋了吗？”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一直没有开口。诸位明公，你们说，我这个心事是不是和各位多少有这么一丝关系？”

金懋廉本来支持朱延年的意见，因为马慕韩和朱延年有点顶撞起来，苗头不对，他就没有再吭气，心中老是觉得惋惜。冯永祥谈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连忙接上去说：

“阿永真是深谋远虑，了不起的干才！”

冯永祥笑了笑，说：

“讲到深谋远虑这四个字，那要数我们的军师，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还得听智多星的高见！”

“阿永又出题目叫人做文章了。”唐仲笙没有推辞，可也没有说出他的意见。

冯永祥端起酒杯来，冲着唐仲笙那张桌子，说：“来，先敬我们军师一杯酒，请山人想一条锦囊妙计。”

唐仲笙推辞再三，拗不过冯永祥的盛意，只好喝了半杯黄酒，皱着眉头说：

“阿永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冯永祥的想法和宋其文的想法不谋而合。宋其文满意地摸一摸胡须，心里感到愉快：星二聚餐会在绝境里看到一线生机。他从旁凑合：

“军师也觉得是难题？只要你想出一条妙计来，我请你吃一桌酒席。”

“其老，你不要腐蚀干部，山人心中自有妙计。”

宋其文听到“腐蚀干部”四个字心头兀自一惊，等听到下面那一句，知道是冯永祥和他开玩笑。他也笑嘻嘻地对冯永祥说：

“怎么，就在筵席上开展五反运动？你啥辰光当了‘五反’检查队的队长？阿永。”

“其老没有委派，我这个队长还没有上任。你要是真的请客的话，我一定甘心情愿接受其老的腐蚀，而且保证不检举。”

他们两人一问一答，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异口同

声地说：

“我们也愿意受腐蚀！”

格格的爽朗的笑声消逝，马慕韩高声对唐仲笙说：

“智多星，想出啥好计策来了？”

唐仲笙摇摇头，说：

“这回我可要缴白卷了，实在想不出啥办法来。”他给自己却想出了一个脱身之计，说，“这样复杂的事情，只有我们德公才有办法。”

徐义德待价而沽。他心里早在盘算了，因为大家都推崇了唐仲笙，他不好抢生意，也没有必要贬低自己身价，送上门去。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有意再往唐仲笙的身上一推：

“我哪能和你比哩。”

“你也不含糊，别推来推去。想出一条妙计来，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哇。”

冯永祥的京剧道白腔调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连马慕韩也给冯永祥说得动摇了，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倒是不错的。他催道：

“德公，有啥妙计，快说出来吧。”

在大家邀请之下，徐义德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同意慕韩兄的意见，还是结束的好，省得我

们留着把柄在别人手里。要聚餐那还不容易吗，随便哪位朋友请客，我一定到；我也希望有机会请朋友们到我家里吃点便饭，谈谈天。”

他这么一讲，三张桌子上的人都齐声叫道：

“妙！”

潘信诚对徐义德伸出大拇指来，笑着说：

“德公，你真行！”

“铁算盘吗，谁能算过他。”冯永祥醉醺醺的对徐义德说，“这真正是一条妙计，形式上聚餐会结束，实质上保留，轮流做庄，不露痕迹，实在太妙了。德公，亏你想的出！”

马慕韩征求一下意见，没有一个人反对的。他站了起来，说：

“根据各位的意见，绝大部分会员都同意结束，担心的是以后学习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在座的有不少位是我们民建会的会员，将来可以参加民建会的学习。有些朋友不是民建会员，我代表民建上海临工会欢迎朋友们参加我们民建，也可以和我们一道学习。……”

最后，他隆重地宣布：

“星二聚餐会现在正式结束了。”

马慕韩说了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星二聚餐会结束，他再向政府那方面交代一下，

今后有啥事就惹不到他头上来了。至少徐义德说的那个无形聚餐会，他可以根据情况，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他不固定参加，万一有事，也找不到他头上来。他举起杯来，敬大家：

“来，我们干一杯！”

朱延年一杯分离酒喝下肚，还是有点恋恋不舍。他玩弄着绘了太白遗风的瓷酒壶，低低对梅佐贤说：

“要不要唱个《何日君再来》？”

这支歌是他当年和马丽琳热恋的辰光，跟她学来的。梅佐贤没有答他的话，碰碰他的胳臂，指着第一桌徐义德正和马慕韩谈话，暗示他不要打断。不料叫隔壁桌上的金懋廉听见了，说：

“好，唱一个。”

朱延年真的唱了：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那边金懋廉和江菊霞跟着唱了起来。第一桌的

冯永祥兴趣更大，声音更高，他一边打着拍子，一边放开嗓子跟着唱：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

大部分人放下箸子，听冯永祥他们唱。那充满了惋惜和留恋情思的歌声透出华丽的餐厅，飘荡在花园的上空。

16

早晨，阳光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汗浸浸的，虽然是春天，却好像已是初夏的季节了。

从沪江纱厂办公室门口起，顺着库房、篮球场、传达室，一直到大铁门那儿，职工们靠左边一字儿排开，很整齐而有秩序地临时形成了一条人的弄堂。站在最前面靠近大门那儿的是余静和赵得宝。

余静看见“五反”检查队快走到大门那边，她迎上去，热情地和杨队长紧紧握手，然后陪着杨队长他

们一道走进沪江纱厂。站在左边欢迎的人们，一看到“五反”检查队进入了大门，兴奋热烈的情绪如同决了堤的洪水似的，浩浩荡荡哗哗啦啦地奔放开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云霄的欢呼和愤怒激昂的口号混成一片，分别不出谁在讲什么，谁在叫什么，连右边车间里机器震动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了，只听见轰轰的巨响。这声音好像有一种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的前进。

在热烈欢呼的巨响包围里，余静陪着杨队长和“五反”检查队的队员们慢慢走进来。杨队长举起右手一个劲向欢迎的行列挥动，表示对热烈欢迎的感谢，跟在他后面的队员们都笑嘻嘻地鼓着掌，答谢大家对“五反”检查队的热望。

职工们的欢呼一直不停，有的把嗓子都叫哑了。秦妈妈用两只手做成临时话筒罩在嘴上狂喊：

“欢迎‘五反’检查队！”

“欢迎‘五反’检查队！”汤阿英跟着高声欢呼，她的嗓子叫得有点嘶哑了。她今天一清晨就到厂里来了，站在欢迎行列的最前面；那对机灵的期待的眼光对着门口，时不时向大门外边马路上张望。她一见了“五反”检查队向沪江纱厂走来，马上便带头热烈鼓起掌来。她看到“五反”检查队，心中无比的兴奋：她们要求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

果然很快就派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像是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她热情地和每一个“五反”检查队的队员紧紧握手，虽不认识他们，却好似见到相识多年的老战友一般。她不认识叶月芳，亲热地握着叶月芳肥嫩的右手，仿佛是亲姊妹那样熟识，紧紧跟在杨队长和余静后面，一边走，一边用力挥着右胳膊，高声欢呼：

“热烈欢迎检查队领导我们进行‘五反’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家跟着喊叫：

“热烈欢迎检查队领导我们进行‘五反’斗争！”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声，所有的人都跟着喊，你喊，他喊，大家喊，甚至几句不同的口号在同时都喊了出来。站在大门口欢迎的队伍跟在“五反”检查队的后面，一同向里面走来，“五反”检查队越向里面走，他们后面跟着的人越多，到后来，欢迎的人和被欢迎的人分不清了，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五反”检查队伍。郭彩娣觉得声音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挥动着胳膊，快乐地边走边跳了起来。钟珮文干脆摘下自己的帽子向空中扔去，越扔越高，前面几顶帽子从空中落下来，后面又有许多帽子向空中飞上去……

队伍里管秀芬，谭招弟她们高兴得唱起了《我们工人有力量》，大家跟着唱了起来。余静也唱了。杨队长虽然不会唱歌，他也忍不住腼腆地跟着大家一道唱：

我们工人有力量，
嗨！我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嗨！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
变呀么变了样……

杨队长就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杨健。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以后，区委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和统一的部署下，成立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区委李书记担任主任委员，集中一批干部，加紧训练，学习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研究私营企业的“五反”材料，准备行动。区委统战部只留下少数干部在部里处理日常工作，其余的人由杨健带着都参加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指定杨健担任“五反”检

查队第一队的队长。当陈市长在天蟾舞台宣布全市伟大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第一队参加了全市七十四户的典型厂的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亲自领导这七十四户，典型先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展开，使五反运动稳步进行。杨健被分配检查的对象是本区的振兴铁工厂。经过检查，胜利地解决了战斗，做了总结，回到区上。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认为沪江纱厂是本区私营大型企业，五毒行为很严重，资方又很狡猾，并且和市里的上层资本家代表人物有往来，检查这样一个单位是非常复杂而且十分艰难的。李书记决定由杨健带第一队的全体干部到沪江来。

杨健走到办公室门口，余静指着站在那里的那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对杨健说：

“这是梅佐贤厂长。”她同时对梅佐贤说，“这是杨队长。”

杨健点点头，说：“我们认识，在区里开会时见过。”

梅厂长方型的脸庞上露出两个圆圆的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色框子的眼镜，低头弯腰说：

“欢迎，欢迎，杨队长请里面坐。”

梅厂长伸出冰冷的左手向办公室里一指，请杨健他们进去。梅厂长今天早上到厂里来以后，就听见

外边人声闹哄哄的，他以为出了事，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一看：库房里的工人，饭厅里的工人，保全部铜匠间的一部分工人，托儿所的保育员，还有办公室里的许多职员都站到外边去了，从办公室一直排到大门口那边。他心里已经有点数目了，但是还不敢完全肯定。他走到厂长室门口叫人，一个人也没有，都到外边去了。厂里除了车间里的工人和往常一样在紧张进行生产以外，差不多都出去了。他找不到一个人。外面尽是人，他又不便去找。他一个人在厂长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一会儿走到窗口去望望，生怕被人发现，连忙退回来。其实谁不知道梅厂长在楼上呢。在里面走了一会，还是不放心，又走到窗口去，他看到余静陪着杨健进了大门。杨健他们的左边胳膊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五反”检查队的臂章，这还用怀疑吗？他们终于来了。他们要来的，是在梅佐贤的意料之中；等他们真的来了，又有点出乎梅佐贤的意料之外。他听到工人们高呼“欢迎‘五反’检查队”，他问自己：要不要出去欢迎呢？出去欢迎，人家会不会说：你是资方代理人，也神气活现出来欢迎“五反”检查队哪！不去，留在厂长办公室里。仔细一想，不行。人家更会说了：你看，“五反”检查队到厂里来了，梅佐贤厂长都不出来欢迎，不是有意抗拒“五反”，不愿意接受检查吗？这可吃不消。正在

他进退两难的当口，听到欢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在空中飞舞着的帽子在窗口也清清楚楚看到了，得赶快拿主意，迟了，就来不及了。

“去！”他对自己说。

他跟踉跄跄跑出去，几乎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他听到那种排山倒海似的集体的强大的呼声，他的心急遽地怦怦跳着，赶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上气不接下气，两腿发软，手冷冰冰的了。他看见数不清的人向办公室门口涌来，他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也不晓得上去迎接杨健余静他们，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愣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前进的人群。等余静指着他介绍给杨健，他才清醒过来，低头弯腰欢迎他们进来。

杨健和他的队员们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梅佐贤挑选靠会客室门口的那张木椅子坐下，低着头，望着一条条赭黄色的发光的地板，别的地方也不敢看一下。他感到所有“五反”检查队队员都在注视着他。他们心里一定都在骂他这个不法的资本家。他想声明：他只是沪江纱厂的厂长，徐义德的代理人，并不是真的资本家。他再一想：现在声明有啥用场呢？

“徐总经理来了没有？”

他知道是问他。他不得不抬起头来，望见杨健正

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余静坐在杨健旁边。杨健望着梅佐贤微微发青的长方型面孔，等待他回答。他低下头去，小声地说：

“报告杨队长，徐总经理还没有来。要不要请他来？杨队长。”

“徐总经理今天会来吗？”

“不一定，他可能到总管理处去。”

“沪江纱厂的账簿是在厂里还是在总管理处？”

“历年的账簿都在总管理处，总账在那边，厂里只是流水。”梅佐贤的眼睛还是望着地板，一点也不敢移动，小心地问，“要拿来吗？杨队长。”

“好的。”

“是我去拿呢，还是杨队长派人去取？”

“你去也可以，”杨健又加了一句，“工会派一个人陪你去。”

“工会派一个人陪我去很好。”梅佐贤的头低得几乎要碰上自己的肚子。

“赵得宝同志陪你去。”

梅佐贤完全同意余静的意见，他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赵得宝和梅佐贤坐上那辆小奥斯汀到了总管理处。梅佐贤一边通知勇复基把历年的账簿清理出来，一边打电话告诉徐义德“五反”检查队已经进了厂，

希望他早点来。徐义德换上那身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匆匆忙忙赶到总管理处，带着账簿，随梅佐贤、赵得宝一道坐上那辆奥斯汀。因为有赵得宝坐在车上，他不便多问梅佐贤“五反”检查队进厂的情形，但是有点不放心，就催司机开快点。车子一开到沪江纱厂的办公室门口，徐义德首先跳下了车。赵得宝帮助梅佐贤拿着账簿。他们一同走进会客室。

余静把杨健介绍给徐义德。徐义德上去紧紧握着杨健的手，很沉着地说：

“早就盼望你们来了。你们实在太忙，今天才来。欢迎，欢迎！”徐义德向全体“五反”检查队的队员望了望，关心地说：“同志们辛苦了。”

梅佐贤把十几本洋装的厚厚的账簿放在会客室当中的长方桌上，他仍然坐到门口那张木椅子上，不过头没有刚才那样低了，有时他还微微抬起来，但不敢对着杨健和余静，只是望着那些队员们。

杨健把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所发的检查长宁区沪江纱厂的检查证交给了徐义德，然后根据陈市长开展伟大五反运动的报告，向徐义德详详细细谈了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打破他可能有一些顾虑。最后，他很诚恳地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请你仔细考虑，要慎重

地选择你的道路。我们是希望你走第一条道路，并且愿意帮助你走第一条道路。不过，你的道路要由你自己选择。”

徐义德凝神听完了杨健的话，他点头称是，说：

“陈市长的广播报告我就是在外边场子上听的。经杨队长这样详详细细的一解说，我更加明白了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如果让资产阶级这样猖狂进攻，自由泛滥下去，真的像陈市长所说的，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的前途更不可能实现。国家国家，没有富强的国，家也就成问题了。中国过去受外国人的欺侮，我们工商界吃够了苦头，现在谁不巴望国家好起来？为了抗美援朝，我们厂里捐献过三架飞机。政府每次发行公债，我都是踊跃认购。税款，厂里都是按时缴纳的。根据共同纲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敝厂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多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们工商界，爱国不甘后人这一点，杨队长是清楚的。政府有啥号召，我没有不响应的。这次‘五反’是人民政府在挽救我们工商界，在改造我们工商界，实在是太适时了，太好了。再不改造，哪能配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工商业家呢？老实讲，我过去确实不大了解，听了陈市长五反运动的报告，特别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的谈话，我是完全了解了。”

“徐总经理做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给予足够的评价。”杨健说，“不过，这次五反运动，你要是真的了解就很好了。”

“我确实完全了解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也知道选择我应该走的道路。坦白从宽是光明大道。人民政府这样宽大，再不坦白，实在是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首长们的好意。”他心里想：人民政府就是再宽大，别说是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也算基本守法户，就是放宽到一个亿十个亿也宽大不到徐义德的头上。他感到人民政府越是宽大，自己就越孤立。因为一般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都团结到人民政府那方面去了，留下来最少数像徐义德这样的严重违法户不是孤孤单单举目无亲了吗？徐义德表面却装出衷心感激的神情，望了望杨健和余静，继续说，“我一定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和同志们的关怀。”

徐义德又望了望会客室里的全体队员们。

杨健站了起来，很冷静而又严肃地对着徐义德说：

“我们希望你能从行动上表现出来，——你慎重考虑考虑吧。”

17

“主要问题是在徐义德身上。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对付徐义德。只要徐义德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们沪江厂的五反运动便可以取得胜利了。”余静说到这儿停了停，她怕自己的见解没有把握，又加了两句：“杨部长，你看怎么样？”

杨健微微低着头，燃起一支中华牌的香烟，抽了一口，静静地望着乳白色的烟在袅袅地向上飘浮而去。他陷入沉思里。

杨健从会客室回来，立即在工会办公室隔壁那间俱乐部储藏室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沪江纱厂支部委员会的大会，并且吸收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沪江厂支部委员会的骨干分子列席了大会。他带来的“五反”检查工作队的全部党员当然都参加了大会，就是非党干部也列席了。杨健首先宣布“五反”检查工作队的党员和沪江纱厂的党员共同成立临时支部，选举支部委员会。选举结果：支部书记是杨健，支部副书记是原来沪江纱厂的支部书记余静。余静向支部大会报告了沪江纱厂最近的情况，资方的动

态，高级职员的想法，工人群众的情绪和本厂的五毒罪行。根据她的了解，提出对本厂“五反”的看法。赵得宝见杨健没有做声，便说了几句：

“杨部长一到，徐义德的态度就不同了。我觉得他比过去确实有了一些的改变。”

杨健认为余静提出的问题关系到沪江纱厂“五反”整个部署问题，关系到“五反”成功与失败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必须在党内思想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步伐才不会乱。他没有马上表示意见，只是说：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同意余静同志的意见。问题主要在徐义德身上，首先要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坏家伙。”张小玲气愤地说，“只要解决他的问题，别的问题都好解决。”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工问：

“徐义德自己会坦白吗？”

他是严志发。区增产节约委员会为了组织“五反”检查工作队，曾经向各厂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里来训练，然后编到队里去工作。严志发就从庆祥纱厂抽调来，编在杨健这个队里。

赵得宝说：“从今天的情形看，徐义德大概会坦白的。他不是对杨部长说，一定要交代他的不法行为，来报答同志们的关怀吗？”

“对，”张小玲充满信心地接过去说，“杨部长来

了，他不敢不坦白，不坦白也得坦白。要是集中力量对付徐义德，我报名参加一个。”

“是不是把徐义德估计得过于低了一些？”和杨健一同参加振兴铁工厂“五反”工作的叶月芳提出了问题。

“这个，”余静给叶月芳一提，马上想起上次在区委统战部里听杨健所说的话：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她想了想，自己在“五反”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太老实了，但想起刚才徐义德对杨健说的那些话，徐义德准备坦白不是很明白了吗？但是要提高警惕。她说，“徐义德自己对杨部长是讲了要坦白，我们不花力量，我想，他不会彻底坦白的。要是他能够坦白，下面的人就好办了。”

“我有一个经验，”严志发直率地说，“资产阶级的话不可靠。可是我讲不出理由来。”

“是的，”钟珮文说，“资产阶级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每句都是真话，那就不叫资产阶级了。”

叶月芳接上去说：“那便是工人阶级了。”

“还是请杨部长谈谈吧。”余静说完了，望着大伙，仿佛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望着杨健。

杨健向俱乐部储藏室四周看了看：虽然是上午，

屋子里的光线不强，阴沉沉的。靠左面窗下放了一套洋鼓洋号，再上面摆着十多个腰鼓，正对着他的墙上放着五星红旗和游行用的竹柄领袖像。这是储藏室，也是工会的另一个办公室。因为是储藏室，平时无事没有人到这里来的。党团会议常在这里举行。杨健不放心，他怕窗外有人偷听，特地把声音放小了说：

“根据余静同志刚才的报告，毫无疑问，我们主要的对象是资方徐义德。三年以来，党和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政策团结他们的。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高额利润之后，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且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他们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种种罪恶活动。要是让他们这样猖狂进攻下去，不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成功，社会主义的前途也不能实现。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面，改造徐义德，这样的人，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发动工人群众，迫使徐义德彻底坦白，彻底清算徐义德的‘五反’罪行，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监督资方，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徐义德，但目前不能孤立地来对付徐义德，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时间就要拖长，甚至于要影响彻底胜

利。这就是需要我们仔细周密讨论的地方。”

杨健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顿时引起全场非常的注意，张小玲有点闹不清楚，她问自己：“目前不能孤立起来对付徐义德，对付谁呢？”

杨健接着说：

“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徐义德今天的态度：他是一名很好的演员，他装腔做势来麻痹我们，迷惑我们，演得就像是真的一样，骗取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一个证明。我认为徐义德今天的态度并没有变，还是过去那个徐义德。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是变得比过去更狡猾一点。要是他真的认识到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也知道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道理，他为啥早不坦白呢？当时又为啥不坦白呢？这就是麻痹我们，松懈我们的战斗意志。相信他这些鬼话，我们就要上当了。”

余静听到这儿心头一愣，她想起那次劳资协商会议的事。杨健给她指出，是一个重大的经验教训。赵得宝当时也认为应该记取这个经验教训，怎么遇到具体问题，这个宝贵的经验教训就忘记了呢？她托着腮巴子静静听杨健的分析：

“你听他说：老实讲，过去确实不大了解，听了陈市长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特别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的谈话，是完全了解了。他把我抬得比陈市长还要

高，好像我的谈话更能启发他似的。其实我的话不过是根据陈市长的报告，重复说了一遍。徐义德为啥这样说呢？捧我，抬高我，想取得我对他的好感，想蒙混过关，是一种糖衣炮弹。如果一次谈话他就彻底坦白，他就不叫徐义德了，他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了。根据我们在振兴铁工厂的经验，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他不得不坦白的时候，他才会坦白。说得更确切一点，只有坦白对他更有利的时候，他才会坦白，而且是挤牙膏式的坦白。”

“这是一点不错的，”严志发为了加重他的语气，又说道，“我亲眼看见的。”

随着杨健来的“五反”检查工作队的同志们都默默地地点了点头。

“要是我们孤立地集中力量对付徐义德个人，那我们就是攻坚，花的力量大，拖的时间长，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时间久了，不能解决战斗，不但提高徐义德的斗志，同志还会增加资方代理人和高级职员抵抗的信心。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要迅速形成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首先要放手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群众，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明确伟大的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广泛搜集材料，这是‘五反’统一战线的主体；其次要争取高级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和会计工作人员。陈市长说他们对资本家的

不法行为，比一般工人知道得更清楚些。打破他们的顾虑，指出他们的光明大道，能够争取他们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资本家就站不住脚。资本家的家属也应该争取，他们也会站到人民政府和人民这方面来……‘五反’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掌握了资本家五毒不法行为的材料，内外夹攻，剩下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资本家，一个孤零零的徐义德，他才会老老实实地坦白。我们不要忘记，坚强的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能够避免攻坚，我们必须避免。按着这样的部署进行，我们能够胜利，我们一定胜利。”

杨健精辟的分析吸去了大家全部的注意力，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讲到后来声音越来越高昂，字句越来越有力，简直是像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他的话像是有一股不可估量的伟大的力量把大家各种不同的想法统一到一个正确的认识上。在静穆中爆裂开清脆的充满信心的热烈的掌声。杨健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很完整了，他又虚心地说道：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大家没有意见。杨健征询意见的眼光对着余静：“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余静站起来说，“过去我缺乏对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上次在区里杨部长对我说的——一点不错，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太老实了。……”

“是的，”杨健插上去说，“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要老实；但是对不老实的资产阶级，就不能太老实，你太老实，就上他的当了。”

余静还站在那里，接下去说：

“我完全同意杨部长的意见。”

“没有反对的吗？”杨健向大家看了一眼，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的。他说，“那该考虑怎样配备我们的战斗的力量了。”

杨健建议在“五反”检查队下面成立五个组。他和余静、赵得宝商量了一下干部配备，就提出下面的名单：

群众工作组	赵得宝	秦妈妈	陶阿毛
职员工作组	余 静		
资方工作组	严志发		
材料联络组	钟珮文	叶月芳	
纠察组	张小玲		

杨健念完了名单，全场一致通过。正要讨论下一个议程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外边砰砰的打门。从打门急促的声音上，听出有啥紧急的事情发生了。张小玲过去开了门，站在门口的是细纱间的郭彩娣。她想跨进来，看见屋子里满是人，正在开重要的会议。她于

是把脚停留在门槛上，匆匆地问：

“我可以进来吗？”

余静说：“可以。”

郭彩娣跑到余静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

“刚才厨房里的同志说，今天晚上没有钱买菜，向会计领钱，会计说没有钱。向徐义德要，徐义德说一个钱也没有。今天晚饭开不出来了，大家急的没有办法，要我来告诉你……”

余静给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愣住了。她想不到像沪江这样的大纱厂会突然一个钱也没有了。她惊诧地问杨健：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还不明显吗？是徐义德的花招。他现在开始和我们斗法了，有意违反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四项规定。不准三停，他公然想用停伙来威胁工人群众。你们热烈欢迎‘五反’检查队来沪江纱厂检查吗？就让‘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的当天晚上，使大家没有饭吃。徐义德会忽然一个钱也没有，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哩。”杨健对余静说，“你把严志发带去，找徐义德好好谈一谈，要他必然遵守军管会的四项规定，不准三停。”

“好，”余静站起来，对严志发招招手，说，“你这个资方工作组组长马上就上任了。”

“那不很好吗？我正愁着不知道资方工作从何下手哩，这一来，倒好办了。”

18

徐义德很快就知道郭彩娣到工会报告去了。他料到工会方面马上一定会派人来，便对梅佐贤说：

“你让他们给我送一碗阳春面来。”

“阳春面？做啥？”

“其中自有道理。你给我照办好了。”

“那容易。”

梅佐贤刚走出厂长办公室没有一会，余静带着严志发和郭彩娣走了进来。余静刚才在路上想，过去上了徐义德的当不止一次了，这一次得牢牢记住杨部长的话，好好研究徐义德的言行。一个单纯而又老实的人，对付像徐义德这样的人，实在感到棘手。她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像徐义德这样的人。但是也很有兴趣，可以得到非常宝贵的斗争经验。杨部长亲自到厂里来领导，她的信心更高了。

徐义德见他们三个人走了进来，立刻从办公桌那边走过来，把他们三个人让到迎窗那边的咖啡色

的皮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坐在下面那张单人沙发里，正好靠近余静旁边。他向他们敬香烟，没一个人会抽的。他自己点燃了一支中华牌香烟，跷起二郎腿，暗暗向严志发扫了一眼，脸上堆起一片假笑，说：

“这位还没有请教，贵姓是——”

余静给徐义德介绍了严志发。徐义德笑着说：

“我们早一会在会客室见过。”徐义德看见郭彩娣坐在上面那张单人沙发里，正和他面对面，一直在盯着他望。他早猜出他们的来意，但是他装出完全不了解的神情，弯着腰，低声问余静，“诸位光临，有啥指教吗？”

“有点事想和你商量。……”

余静还没有讲完，徐义德就接上去说：

“欢迎，欢迎。请问，啥事体？”

“伙房里今天晚上没有钱买菜了，你晓得啵？”

“啊！”

“希望你早点发钱给他们。”

“哦……”徐义德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郭彩娣看徐义德这副腔调心头早就冒火了，见他不慌不忙的劲，更叫她忍受不住。她大声叫道：

“你还不晓得吗？别装蒜了，你想停伙吗？”

徐义德欠身说道：

“不敢，不敢。”

郭彩娣对着徐义德说：“今天晚上要开伙。”

“当然，当然。”徐义德坐在沙发上，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说，“不开伙哪能行呢，那大家会饿肚子的。”

“那你快点发菜钱吧。”余静以为问题解决了。

“钱吗？实在对不起，我没有了。”

“你会没有钱？”郭彩娣嘴上溅着白沫，说，“鬼才相信！”

“实在没有钱。”徐义德不动声色地说。

“徐先生，我希望你讲话老实点。”一直没有吭气的严志发开口了。

“我讲话从来老实的。没有钱，我说有钱，那不是骗你们吗？”

工友送进来一碗阳春面。徐义德要他把面放在沙发前面那张长方形的矮桌上。徐义德看见阳春面上撒了一些碧绿的雪白的葱花，随着面的热气，散发出一股清香。徐义德问大家：

“诸位用过早点了吗？”

大家点点头。

“对不起，我还没有吃早点，”徐义德端起那碗阳春面来，吃了两口，说，“一个钱逼死英雄汉。没有钱也实在没有办法。老实讲，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阳春面，也不晓得阳春面是啥滋味。可是没有钱，

我今天也不得不端起这碗阳春面了。”说到这里，徐义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不胜伤心似的。他吃了一口又停了下来，仿佛没有浇头，很难咽下这碗面。

郭彩娣不满地瞅了徐义德一眼：

“吃阳春面有啥稀奇？我们工人天天吃。有的吃还算好的呢，有的人连阳春面也吃不上。”

“那是的，那是的。”徐义德避着郭彩娣的眼光，低着头又很快吃了一口。

余静看徐义德一口一口地在吃阳春面，这无论如何不是假的。难道徐义德真的没有钱了吗？徐义德有钱余静是了解的，是不是徐义德一时没有现款了呢？这一点，余静就不清楚了。

“你吃阳春面，你吃海参鱼翅，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同我们都没有关系。”严志发看徐义德这位演员又在他们面前表演了，心中做呕，忍着一肚子气，指着阳春面，对徐义德说，“徐先生，你的态度要老实点。”

“严同志说的真不错，现在是新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老老实实的。我徐义德一向老老实实的，在同业中没有一个人不晓得的。严同志刚到我们厂里工作，大概还不十分了解敝人的脾气。敝人办事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不信，你问问余静同志。她了解人最深刻细致了。她是了解我的。”

余静上过他的当，尝过滋味，听他这么说，特别提高了警惕，说：

“我过去不了解你。最了解你的是你自己。不要再花言巧语的了，老老实实地解决问题吧。”

徐义德大吃一惊：余静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来。他不相信是余静讲的。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向余静瞟了瞟，千真万确是出自余静的嘴。他预感到“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的变化，连余静也和过去不同了。他在余静身上看到杨健的影响。他对自己说：今后得小心点。他不正面回答余静的话，只是说：

“余静同志的话真有道理，最了解一个人的是他自己。这说法再对也没有了，再对也没有了。”他接着哈哈奸笑了两声。

梅佐贤从外边走了进来，看见厂长办公室里的气氛很紧张，他站在门那边，没有往前走，眼光落在徐总经理的身上，想从他的表情上来判断自己该不该进去讲话。徐义德料他有事情，因为他们谈得很僵，来个梅厂长，正好做自己的帮手。他便对梅厂长点点头：

“进来坐吧。”

余静往长咖啡色的沙发角上一靠，让出点地位给梅佐贤坐。他知趣地端了一张椅子，坐在徐义德旁边。徐义德想把刚才的事岔开，特地问梅佐贤：

“有啥事体？”

“有。”梅佐贤的眼光对着余静，没有说下去。

“说吧。”

“工务上报告，明天花衣不够了，再不进花衣，明天要关一部分车……”

郭彩娣一听要关车，不等梅佐贤说完，便跳了起来，指着徐义德的鼻子说：

“徐义德，你好厉害啊！停伙不算，又想停工！”

“讲话斯文点，不要动手动脚的。”

“你为啥要停工？”郭彩娣并没有给徐义德吓倒，仍然指着他的鼻子，丝毫也不放松，气呼呼地说，“你讲！”

“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和大家一样，希望每部车子都转动。没有花衣，那是工务上的事，为啥不早进，我刚到厂里来，也没把花衣藏到家里去，怎么质问我呢？”

“你是总经理，厂里的事，你不负责，要我们工人负责吗？没有花衣，要我们工人空手纺出纱来吗？”

徐义德见郭彩娣一步不让，他的口气缓和了一些，说：

“厂是我办的，我当然要负责。没有花衣，可不能怪我。这是工务上的事。为啥早不报告？我正要查……”他转过来，一本正经地对梅佐贤说，“你要工

务上写份报告给我，没花衣为啥早不报告？办事太不负责了。”

“是呀，我也这么说。”

郭彩娣怕徐义德往郭鹏身上一推，自己滑过去，接着说：

“不管哪能，不能停工。别往工务上推，你不设法，今天可不能放你过去！”

徐义德见她直蹦直跳，指手划脚，他越是显得冷静和安详，不慌不忙地说：

“不放我过去，那好，我就不过去。”

严志发懂得对徐义德这样的人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让她坐下来慢慢谈。她一屁股坐到沙发里去，身子给弹簧一震，又跳了起来。她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严志发对徐义德说：

“你看过军管会开展五反运动的四项规定吗？”

“看过，看过。”

“徐总经理可关心政治哩。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他都要看上几遍。”梅佐贤在旁边帮腔说。

“看过了，很好。那你为啥要违反军管会的规定？今天停伙，明天停工，我看过几天就一定要停薪了。”

“是呀，”余静给严志发一提醒，顿时察觉出徐义德的阴谋，涨红着脸说，“你有意三停！”

“没有这回事。”

严志发逼紧一句：“那为啥停伙停工？”

“这是误会。”

“那你要开伙开工。”

“当然要开伙开工。”

“先发菜金，后进花衣。”余静紧接着说。

徐义德对余静这两句很同意：“这样安排很好。”

“钱呢？”严志发问。

“没有。”徐义德把门关得紧紧的。

“你会没钱？”郭彩娣的声音又高了，“哼，鼎鼎大名的徐义德忽然一个钱也没有了，就是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啊。”

“这是事实。”

“我晓得，徐总经理真的没有钱。”梅佐贤堆下满脸的笑容说。看见严志发气呼呼的，他连忙收敛了笑容，阴沉着脸。

“事实？”严志发也有点忍不住，他大声质问。

“事实，”徐义德不动声色地说，“这两天头寸紧，同业中拉不动，行庄又不放款，人民银行要押款，再借，我厂里机器脚上都要贴满了人民银行的封条了。没有钱，这是铁的事实。”

“真的一点钱也没有了吗？”余静不相信徐义德哭穷。

“真的一点钱也没有，我要是骗你，余静同志，我

可以对天发誓……”徐义德把希望寄托在余静身上。

“一点办法也没有吗？”余静不相信的眼光注视着徐义德。

“要是有什么办法早就想了，何必费这些口舌哩。如果有钱，早就拿出来了。我不是那种耍手段的人。”

“徐总经理办事从来是爽爽快快的。”梅佐贤对大家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

严志发懒得听徐义德这些鬼话，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不管你办事爽快不爽快，简单一句话，你应该遵守军管会的规定。违反规定，人民政府会依法处理的。请你好好考虑。”

徐义德料到严志发会有这一手，这几句话打中他的要害。他连忙解释道：

“这方面还要请各位帮帮敝人的忙，我绝对不是违反军管会的规定，敝人对于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从来是完全遵守的。这一次实在是太困难了，我自己要是有一点点的办法，我早就想了，绝不会麻烦诸位费这许多的时间，实在过意不去。”他说到这里，顿了顿，把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叹了一口气，说，“要么，把这厂押给人民银行，拿些现款来救急。”

郭彩娣脸上露出了笑容，她高兴交涉胜利了，停伙停工问题可以解决了。她问：

“真的吗？”

“当着诸位的面还能说假话吗？请诸位帮帮忙，只要人民银行答应，我一定签字。”

“这是你自己的事。”严志发怕徐义德将来反咬一口，说工人逼他押厂，便往徐义德身上一推，“我们设法帮你的忙。”

“当然是我自己的事。”徐义德见严志发和郭彩娣都没有反对的意思，内心忍不住地高兴。这一来不但真的解决了停伙停工的问题，而且可以得到一大笔现款，不管五反运动怎么厉害，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厂了。工会方面不帮忙，人民银行肯押款吗？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有了这个主意，至少可以把他们搪塞过去。严志发既然不肯帮忙，只有自己动手了。他对梅佐贤说，“你快和银行联系一下……”

“好的，我马上就去……”

梅佐贤迈步要出去，走到门口那儿，给余静叫住了：

“等一等。”

梅佐贤退回来，坐在椅子上，不安地瞅着余静，不知道她要说啥。他见她的眼光一个劲盯着徐义德，料想事情没有想的那么顺利，铁算盘今天也遇到了对手。办公室里静悄悄的，不时传来门外会计找算盘的清脆的声音。余静冷冷地问道：

“你真的准备押厂吗？”

“当然不是讲笑话。”

“‘五反’工作队进了厂，你就要把厂押给人民银行，这是啥意思？”

余静几句话说得徐义德的面孔忍不住绯红了。他认真看了她一眼，旋即又很自然地避开，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

“一个办厂的人当然不愿意把厂押出去，眼看着没有钱买菜，也没有钱进花衣，不得已想出这个下策，解决目前的困难。”

“你看，人民银行肯吗？”

“这个，很难说。工会方面帮忙说两句，也许可以……”

“大家都把厂押给人民银行，‘五反’可以不必进行了。”

“像沪江这样困难的厂不多……”徐义德感到现在和余静讲话比过去吃力，得好好想想，一边留神她的脸色。

“所有困难的厂都把包袱甩给人民银行？”

这一句突兀有力的话把徐义德问住了。他脸上漾开了笑纹，竭力保持着镇静：

“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意思？”余静逼紧一步。

“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度过了目前的难关，让我喘口气，我还是要想办法赎回来的。”

“人民银行不要呢？”

徐义德一时答不上来。他的眼光转到梅佐贤身上。梅佐贤会意地说：“事在人为，人民银行不要，私营行庄也可以活动活动，……”

“哪个私营行庄？”

梅佐贤信口答道：

“金懋廉的信通银行和我们有往来……”

梅佐贤发现徐总经理瞪了他一眼，他发觉提出信通银行来不好，就没说下去。

“信通银行也不要，”余静对徐义德说，“那么，今天停伙？明天停工？”

徐义德兀自吃了一惊，想不到余静话题一转，又把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叫他躲闪不开。大家的眼光都对着他。他毫不在乎，慢慢地说：

“当然不能停伙停工。”

郭彩娣心里想：幸亏有余静在旁边，差点又要上徐义德的当了。她一直在观察徐义德的表情，见他那个不慌不忙的样子，恨不得骂他两句。她憋不住，心直口快地说：

“说话少绕弯子，快发菜钱！”

“刚才敝人已经说了，别的事好办，就是没有现

钱。”

“停伙你负责！”

“我当然要负责。”徐义德对郭彩娣点点头，说，“我这厂能办到今天，全靠党和工会的领导。现在厂有困难，我想余静同志一定会帮忙的。好在杨部长也在厂里，只要党和工会肯想办法，一定可以度过难关的。”

“你呢？”余静的眼光对着徐义德，冷静地质问他，“你这个总经理就不管吗？”

“我实在无能为力！”

“你无能为力？”郭彩娣气得霍地站了起来，冲着徐义德，指着他的鼻子说，“问题不解决，你今天别想跨出沪江的大门！”

“我正想睡在厂里，和工人同志们一道度过难关！”

19

杨健仔细听完了余静的汇报，没有表示意见，在静静深思。他所率领的“五反”工作队像是一只航行的船，刚开出去就遇到危险的暗礁，幸亏发现了，但

不突破这个暗礁，船就不能继续航行了。他早就知道徐义德的为人，到了沪江纱厂，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郭彩娣对杨健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以为一到杨健这里，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她没料到他一言不发，大概也没有啥办法。她感到屋子里的空气沉闷得很，大家都不说话，真急死人哪！她一个劲瞅着杨健。他的脸色十分安详，看郭彩娣想讲话，笑着问：

“你有啥意见？”

“徐义德岂有此理，我看他一心想破坏‘五反’！”

“你说得对。”杨健见郭彩娣一针见血地指出徐义德的心思，便鼓励她，说，“我们让他破坏吗？”

“哪能行。”

“那么，让大家饿肚子？”

“这也不行。”

“可是没有钱买菜呀，也许过几天米也没有了。”杨健对郭彩娣说，眼光却向余静、严志发和汤阿英扫了一下，好像对他们说：听听郭彩娣的意见看。

“我就不相信徐义德没钱。要是他真的没钱，算我看错了，你们把我两只眼睛挖掉！”

“事情没那么严重，用不着挖眼睛，”杨健看郭彩娣涨红着脸，真是快人快语。他喜欢她的直爽。他幽默地说了两句，有意没有说下去，使得她有点怀疑

了，不知道说的对也不对。她正想问个明白，他接下去说道，“你说得对，彩娣，我同意你的看法。徐义德确实有钱，在这点上，我们看法一致。问题是怎样揭露他的阴谋。”

“揭露阴谋，这个，我可没有办法。”郭彩娣皱着眉头，瞪着两只眼睛在动脑筋。半晌，她眉头开朗，脸上微微露出得意的笑意，说，“想起来了，我有个法子。”

她的话引起了严志发的兴趣：

“说出来大家听听。”

严志发离开办公室，心里就一直在想怎样和徐义德斗，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就一直没有开口。郭彩娣对他点点头，说：

“徐义德天天吃山珍海味，在厂里吃阳春面，是装给我们看的。今天晚上没菜金，他家里一定有钱，我们全体工人开到他家里去……”

余静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工人都到徐义德家里去，厂里的生活谁做呢？中共上海市委号召：要五反运动和生产两不误，工人不能随便离开生产岗位。凭气愤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可能使得问题复杂。她问严志发：

“你看，行吗？”

严志发认真地想了想：

“这也是一个办法……”

“大家都到徐义德家去，厂里的生产谁管呢？”余静问严志发。

“这个，我没想到。”严志发摇摇头，觉得那不是办法。

“不怪你，我也没有想到这些。”郭彩娣插上来说，“徐义德太欺负人，我才想出了这个主意。给余静同志一说，看样子，行不通。”

“不是行不通，而是不能这样做。”杨健说，“市委有指示，要‘五反’生产两不误，工人不能停止生产。”

“那么，就让徐义德耍死狗吗？”郭彩娣问杨健。

“当然不能。”杨健看严志发在思考，便问他，“你有啥好办法吗？”

严志发沉毅的脸庞上慢慢露出了得意的神情，扬起了眉头，说：

“我倒想出了一个主意，不晓得行不行，杨部长。”

“你不说，我们一不是神仙，二不会神机妙算，哪能晓得行不行呢？”

“你说给大家听听。”余静鼓励他说，“我们研究问题，啥意见都可以提。”

“对。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杨健说，“有

时我的意见也不对，经过大家一讨论，意见就比较完整、正确了。”

严志发理直气壮地说：

“徐义德违反军管会的法令，有意三停，应该把他抓起来，杀杀他的威风，看他再耍不耍死狗？”

“这一着再绝不过了！”郭彩娣高兴得咄咄鼓起掌来了。

汤阿英认为这也是个办法，但她看见杨健皱着眉头在聚精会神地沉思，说明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她觉得徐义德这家伙真是坏到骨髓里去了，叫你奈何他不得。她在思索，看杨健想啥办法。

大家没有言语。余静打破了沉默：

“按照军管会的法令，我们随时可以逮捕徐义德。抓起来以后，怎么办？菜金还是没有，花衣也没有，徐义德更不会管了。徐义德下决心三停，你说，他没想到这一层吗？把他抓起来，正中了他的计。他一进监狱，把手一甩，啥也不管了。沪江‘五反’怎么进行呢？”

“让他这样横打霸道？……”郭彩娣憋了一肚子气，急得话也讲不下去了。

“他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杨健很有把握地说。

“徐义德给我们的颜色看……”郭彩娣愤愤不平

地说。

“那我们就看吧！”杨健微笑地说。

“你受得了这个气，杨部长，我可受不了。”

“现在人家要给我们颜色看看，我们怎么可以不看呢？”杨健轻松地笑着说，“当然，以后我们工人阶级也要给他颜色看看，这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们有办法吗？”郭彩娣的眼光一直盯着杨健，流露出有点不满的情绪。她站了起来，想一个人去找徐义德，把他问个明白。

“彩娣，别急，坐下来好好商量，”汤阿英对她按一按手，说，“当然有办法。”

“我在这屋里待不住。”

“你想到啥地方去？”

“找徐义德算账！”

“你这个账哪能算法？”杨健想好了主意，他劝郭彩娣坐下，说，“还是我们先算算账，自己算好了，再去找徐义德不迟。”

这一回轮到郭彩娣问杨健了：

“你说：哪能算法？”

“徐义德从心里反对‘五反’，但他嘴上又不得不赞成。我们现在不能急躁，办事要谨慎，不然就要上他的圈套。他吃阳春面，他哭穷，当然是表演给我们

看的。要是让他停伙停工，就要影响‘五反’，说不定他还会煽动部分工人和工会对立，怪‘五反’不好。”

“这个道理我懂，”郭彩娣说，“我们不让他停伙停工！”

“可是他不听我们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别想进行‘五反’。”

“是呀！”汤阿英点头同意。

“装假总是装假，徐义德不能持久的。时间对他不利。我们要想办法叫他继续开伙开工，老严，你去找梅佐贤和勇复基，他们一个是厂长，一个是会计主任，两个人都是怕事的，特别是勇复基，更是个胆小鬼，要他们两个人负责开伙。如果他们也说没钱，你就透露出去：我们准备查账。这么一来，他们态度一定会软下去。账面要是真的没有现金，可以设法向人民银行贷款。但是像沪江这样规模的大型纱厂，会忽然没有现金买菜，谁也不相信的。他们两个人一定有办法，万一没有办法也不要紧，可以分化他们内部，不至于一致对付我们。我们也要想好下一步，这是个群众问题。这是徐义德和我们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个问题不解决，‘五反’工作就很难展开了。我们不能要工人饿着肚子搞‘五反’。”

“对，解决了这个问题，厂里才好进行‘五反’。”

余静同意杨健的看法。

“全体工人不必到徐义德家里去，余静同志，你到徐义德家里去一趟。徐义德在厂里装穷，他家里却装不了穷。”

“我现在就去……”

“不，”杨健对余静摇摇手，说，“徐义德今天一定有布置，现在去，看不出真相来。今天一天不去，他家里以为没事了，明天突然去，可能看到一些真实情况。”

“你想想的真周到。”余静脸上露出钦佩的神情。

“不是我想的周到，是徐义德布置的周到。他和我们斗法，布置了圈套，要我们上。我们不得不多想想。我得把厂里的情况向区委汇报，防止徐义德再耍出啥花招来。不怕他有天大的本事，我们有军管会的法令管着，必要的辰光，可以按老严的意见做，逮捕法办。”

严志发听到这里兴高采烈，眉头一扬，大声说道：

“这个最省事，也最灵光。”

“这是最后一着，能够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严志发的脸上恢复了平静，低声说：

“那我现在去找梅佐贤、勇复基去！”

“不，”郭彩娣拦住他的去路，对杨健说，口气里

有些不满的情绪，“杨部长，你把工作都分配了，我做啥呢？”

“你不提起，我倒忘记了。”杨健对她笑了笑，说，“你想做啥？”

“你要我做啥就做啥，我不能闲着。”

“倒有一件工作，就是性子不能急！急了要误事的。……”

“啥事体，杨部长，你快说，我一定不急。……”

“你看，你又急了！”严志发指着她说。

“好，不急，不急。杨部长，你慢慢说，我耐心地等着。这，对啵？”

“很好。”杨健没有说下去，有意试试她的耐心。她果真屏住气，一言不发，纹风不动地坐在板凳上。杨健看她那副严肃认真的神情，暗中忍不住要笑，便对她说，“徐义德早上吃了阳春面，中饭、晚饭一定到饭厅去吃。你和汤阿英坐在他附近吃，看他还有啥花招。你们要仔细观察他，不动声色，不要让他发觉你们在注意他。他耍啥花招，你们不要理他，赶快回来给我报告就行了。你的行动要听汤阿英的指挥，她比你沉着冷静，看问题也比你全面周到。”

“我以为是多么困难的事体，原来是这个，那容易。”

“不容易，性急要误事的。”

“杨部长，你放心好了，一定误不了事。”郭彩娣充满信心地拍拍胸脯。

“这回该让我走了吧？”严志发站了起来。

郭彩娣让开路，弯着腰，对严志发说：

“不送，不送！”

20

徐义德利用大家都到饭厅吃晚饭的时候，把梅佐贤叫进了办公室。梅佐贤忐忑不安，不知道总经理要谈啥。严志发今天给他谈话的内容估计总经理不会知道，那为啥突然找他来呢？他摆出若无其事的神情，坐在长沙发上，等候总经理的吩咐。徐义德亲自把门关好，紧靠着梅佐贤坐下，亲热地小声对他说：

“佐贤，我现在一切全靠你了……”

梅佐贤听了这话心头一愣，对自己说：总经理知道严志发来找过他吗？总经理知道他和严志发谈啥吗？他竭力保持着镇静，微笑地对徐义德说：

“我的一切都是总经理的。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我能有今日，全靠总经理的提携。现在正是报

答总经理的辰光，你有啥事体，吩咐好了，赴汤蹈火，我梅佐贤决不推辞。”

“事体还没那么严重……”

梅佐贤听了这句话心里稍为轻松一些，仔细听徐义德往下说：

“我今天准备不回家了……”

“不回家？为啥？”

“杨部长带了‘五反’工作队进厂检查，今天停伙，明天停工。你说，那位杨部长会放过我吗？”

“总经理估计的正确。”他又怀疑严志发来看过徐义德了。

“我想，他们可能不让我回家。我不如主动不回家。根据军管会颁布的法令，三停是违法的。现在印把子捏在人家手里，人家要立啥法，就立啥法，我们做生意买卖的人有啥办法呢？共产党根据法令，随时可以逮捕我。也好，我就在厂里等共产党来抓，把我关进提篮桥，好得很，用不着担心五反不五反了。”

“会有这样的事吗？”梅佐贤感到事情严重，万一总经理给抓进去，那么，沪江纱厂的全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胛上了！他没有这个膂力，也没有这个胆量。这么一来，倒真要给总经理想想办法了。只要有总经理在，天塌下来，有总经理顶着。他即使有点责任，也不怎么严重。他安慰徐义德，说：“总经理，不会

的。”

“共产党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他们啥事体做不出来？不过，倒希望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就好避开‘五反’了。请你今天到我家里去一趟，叫她们放心，我今天住在厂里，明天也可能不回去。”

“我一定给总经理办到。”梅佐贤同情地看着徐义德，表示愿意和他共患难，说，“我也住在厂里。”

“为啥？”

“陪总经理。”他的声音有点呜咽。

“谢谢你的好意。”徐义德感激地点点头，觉得梅佐贤究竟是厂长，在紧要关头没有忘记他。在注视梅佐贤穿着一身深蓝咔叽布的人民装，长方型脸庞上那两个酒窝好像为他隐藏着忧虑，感觉梅佐贤比过去更可爱了。现在他更需要梅佐贤这样的人。他说：“你不要住在厂里。厂里，有我顶着。你每天照样回家，好在外边探听探听风声，和我家里联系，省得叫她们待在家里担心受吓。”

“我白天可以出去给你办事，晚上在厂里陪你。”

“不。不能够让共产党把我们一网打尽。我要是出了啥事体，守仁年纪还青，办厂、维持这份企业，全要拜托你了，佐贤。”徐义德说到这里很激动，声音十分低沉。

“我，我……”梅佐贤认为自己是厂长，也有义

务留在厂里，但是总经理那么恳切，要是自己坚持，反而显得自己推卸责任了。他只好说：“我听总经理的吩咐，总经理要我做啥，我就做啥……”

“很好，以后完全靠你了。”徐义德说到这里，把头低了下去。

梅佐贤见总经理对他那么信任，想起和严志发谈话的情形，不禁感到内疚，脸上热辣辣的了。他坐在那里，想原原本本地告诉总经理，又怕总经理怀疑自己；不讲呢，心里又不安。他吞吞吐吐地说：

“总经理，严志发今天找了我……”

“他找你？”徐义德警惕地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注视着

他。梅佐贤一看到那眼光，他就有点心虚、徐义德炯炯的眼光仿佛可洞察一切，啥细微的事物也瞒不过他的视线。梅佐贤慢慢地说：

“唔，他要我负责继续开伙，维持生产……”

“你哪能讲？”徐义德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全身的血液好像一下子都循环到他的脸上了。他涨红着脸，急切地想知道下文。因为他对付杨部长和“五反”工作队，主要靠这一着。这一着万一突破，五反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在全厂展开了。

“我说总经理在厂里，你们可以找他去交涉……”

徐义德脸上的皮肤松弛了，换了一口气，赞扬地说：

“你回答得对。他们有本事，找我徐义德好了。就是杨部长亲自出马、我也不在乎。没钱就是没钱。我没有点石成金的法术。别逼人太甚，顶多我把厂献给政府，省得我担这份心事！”

“他们当然不是总经理的对手。”

“严志发要来找我吗？”

“不，他不肯找你，硬要我和勇复基负责……”

徐义德打断他的话，插上来问：

“你说啥？”

“他硬要我和勇复基负责……”

“勇复基？”徐义德咬着下嘴唇，气愤地说，“他们想的真绝，啥人不好找，要找勇复基！”

“他还要我们保证明天不停伙不停工！”

“你保证了吗？”

梅佐贤给总经理突如其来的一问，没有想好怎么说法，当时愣得说不出话来。徐义德感到事体有点不妙，逼紧了梅佐贤也许不敢说真话了。他放慢了语调，轻轻地说：

“保证了也没有关系。”

梅佐贤从总经理的口吻里，了解总经理并不知道严志发找了他，当然更不晓得他们谈了啥。他心里

有了底，情绪稳定一些，便笑了笑，说：

“我哪能保证？我一口回绝了他。”

“你做得对！”徐义德靠到沙发背上，悠闲地跷起二郎腿来，穿着黑乌乌皮鞋的右脚左右摆动着。

“他还缠着勇复基不放……”

“啊！”徐义德的脚停止了摆动，把腿放下，问，“他怎么说？”

“他，”梅佐贤想到勇复基是他手下的人，如果说了什么不妥当的话，他这个做厂长的也有一份责任，便说，“他见我口气很硬，就没吭气。严志发再三要他想办法，他说这一阵厂里银根确实紧，头寸不够，他是小职员，没有办法想。严志发还要他动动脑筋，他往我身上推，要厂长出点子。他能办到的，一定办。”

“想不到勇复基的本事也不小。”徐义德心中深深感到每月给勇复基那点暗贴，是完完全全值得的。杨部长真是无孔不入，连勇复其这边也想去动摇，幸亏勇复基应付的好，不然坏了他的事，那就很难收拾了。

“我在旁边相帮他，递眼色给他看，暗示他有啥事让我负责……”

“怪不得他的胆子这么壮哩！”

“这全靠总经理的栽培，从前他可是个胆小怕事

的人啊！”

“你也有一份功劳！”

“多承总经理的夸奖。”梅佐贤想起严志发的话，试探地说，“你看，停伙停工下去，行吗？”

“这个……”徐义德想了半晌，反问道：“为啥不行？”

“停伙停工，工人闹起事来，怎么办？”

“闹事正好，‘五反’就没法进行了。”

梅佐贤看这一点没打动徐义德，改口说：

“停伙停工，大家都没饭吃，高级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会有意见，还有总经理……”

“你怕我们饿肚子吗？这没关系，我们可以准备点干粮。”

“我们当然没有问题。”梅佐贤说，“我担心怕坚持不下去。”

“为啥？”

“万一杨部长要查账，账面上是有现金的……”

“你说啥？”徐义德打断他的话，问。

“我说，万一杨部长要查账……”

“查账？”徐义德脸上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说，“杨部长提了吗？”

“杨部长没有提，从严志发的口气里听出来，好像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哦！”徐义德半晌没有做声，等了一会儿，说，“查账也不怕，要勇复基想办法明天把现金支付出去。我们能停伙多久就停伙多久！”

“那当然。”

“你要稳住勇复基。”徐义德的二郎腿又跷了起来，他看到窗外的暮色越来越浓，通向大门的路上的电灯已经亮了，便说，“时候不早了，你快上我家去一趟……”

“今天你睡在啥地方呢？”

“就在这里！”徐义德指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

“你给我送张行军床来？”

“也好。要是没有现成的行军床，千万别去买，我在长沙发上也好过一夜。”

“有现成的，一会叫他们送来。”

梅佐贤走出了厂长办公室，严志发的话有力地在他耳际萦绕。他在严志发面前答应下来，明天一定想办法继续开伙、开工，今天晚上日子好过，明天白天难熬。这话不能告诉徐义德，幸好勇复基不清楚个中底细，徐义德就是找到勇复基，他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但自己夹在徐义德和杨部长之间，这个夹心饼干的日子可不好受啊！不开伙开工，杨部长那边交代不过去；不停伙停工，徐义德这边不答应。他深深叹息了一声，低着头，喃喃地说：这本是徐义德的事，为

啥推来推去推到我的头上来呢？他想起刚才徐义德的口气松了些，明天杨部长要是真的派人查账，逼得徐义德非让步不可，让他们面对面去斗，他就可以跳出夹心饼干的处境了。

他回过头去，向办公室望了一眼：里面的电灯亮了，门轻轻地给关上了。

徐义德走到窗口，把天蓝色的窗帷拉起，旁边留下一些空隙，这样，外边的人看不清屋里的动静，他在屋里却可以清清楚楚看见窗外的一切。梅佐贤在楼下待了一会，交代了几件事，跨出总办公室的大门，在通向大门的煤渣路上踉踉地走着。他今天没有坐那辆黑色小奥斯汀汽车回去。汽车停在他家的车房里。“五反”工作队进了厂，不是坐汽车的辰光，生活应该朴素点。徐义德的眼光一直把梅佐贤送到大门那边，见他顺利走出大门，没有遇到一丝的阻碍，他完全放心了。

徐义德反剪着两手，从窗口走了回来。他走到墙那头，又走回窗口：看到日班工人已经吃过晚饭换了衣服慢慢回家去了。夜班工人断断续续地从门外走进来。他见到那些精神抖擞的工人，要是在从前，心头马上涌起喜悦，做了一班之后，许许多多的棉花就变成无数的棉纱了。可是今天晚上啊，心里充满了无名的仇恨！

“你们都来吧，来吧，反正把我这厂糟蹋完了就称心如意了。你们在厂里生产的蛮好，要搞啥五反、五毒，五毒？这算啥毒？多少年来，哪一家工厂不是这样做的？我徐义德还算是好的哩，哼，别的厂，你们去看看，比沪江厉害的多啊！别说中国，外国可更厉害。美国那些资本家，哪一家厂不是一年赚很多美金，有的赚上十亿八亿也不稀奇！政府官员都听资本家的话，这多么好哩！不像中国，做个资本家一点也不威风，赚了一点钱，政府就眼红了，要三反五反，一定要反得个净光才甘心！好吧，爱怎么反就怎么反，就是锅里这些面，煮干了拉倒！你们来得很好，都来吧，呸！看你们明天能开工！”

他轻蔑地对窗外看了一眼，然后得意地走回来。他有意叫梅佐贤不进花衣，像是在厂里埋了个定时炸弹。这个炸弹明天就要爆炸。没有花衣，所有的车子都得关上。工人进饭厅没有饭吃，不怕杨部长有天大的本事，看他怎么领导“五反”？他仿佛已经看到明天厂里发生的事，脸上浮着胜利的微笑。

他在室内踱着方步，计算梅佐贤离厂的时间，现在大概已经见到他家里三位太太，只要家里那道防线不被突破，他料到杨部长对自己是没啥办法的。他脸上显得十分安详，想起在家里安排的后事，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向右边墙上望了一下，但立刻警惕地

把眼光收回，怕给啥人发觉似的。他匆匆走到门口，向门外一看：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每一张办公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人们下班回家去了。电灯的光亮很弱，照得办公室显得静幽幽的。他缩回头来，轻轻把门关好。他的眼光这才毫无顾忌地盯着右边雪白的墙壁。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站在墙跟前，像是忽然给人发现自己的秘密，慌忙两手下垂，一言不发，脸孔如同雕塑的石像一样，毫无表情。半晌，他的眼光从墙壁移开，向室内扫射了一番：整个办公室除了他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他于是举起手来，向墙壁轻轻敲了一下，用耳朵贴墙仔细听听。接着在墙的另一个地方又敲了敲，凝神地用耳朵去听。这次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点点头，仓皇地退了回来，倒走了三两步，又走到墙跟前，认真地望了又望，不放心地再敲了一下，才满意地退了回来，坐在长沙发上，眼光却还斜视着右边的雪白的墙。……

汤阿英和郭彩娣到饭厅里去等徐义德，第一批吃饭的人走了，第二批吃饭的人也吃完陆陆续续走去，可是不见徐义德的影子。饭厅里闹哄哄的人声逐渐消逝了，现在只听见洗碗洗箸子的响声。桌子上空荡荡的，吃饭的人留下没有几个了。汤阿英心里想：难道徐义德回家去了吗？她到饭厅来以前，他还在厂长办公室呀！难道徐义德不在饭厅里吃饭了吗？中午

却在饭厅里吃的啊！徐义德又有啥花招吗？

郭彩娣的眼光在整个饭厅搜索，找不到徐义德，她笃笃地走到饭厅门口，慌慌张张赶回来，对着汤阿英展开两只手，神情紧张，小声焦急地说：

“糟糕，徐义德溜走了！”

“你看见他走的吗？”汤阿英以为郭彩娣刚才在饭厅大门外边发现徐义德溜走了。

“我没看见。”

“哪能晓得的？”

“饭厅里没有，那还不是溜走了！”

“也许他又要了一碗阳春面去吃哩！”汤阿英估计徐义德不会溜走，张小拴领导的纠察组从厂的大门到各个车间都布置了人，徐义德一溜走马上就会发觉的。她低声对郭彩娣说，“他可能还待在厂长办公室，我们去看看。”

她们上了楼。厂长办公室的门紧紧关着，里面的电灯却开着。汤阿英好奇地轻轻走过去，侧着耳朵去听：没有人声，但是一种悠然自得的脚步声时不时传出来。她哈着腰，从钥匙孔里向里面窥视，屏住呼吸，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看出了神。她看见徐义德从右边墙跟前走过来，举手轻轻向墙壁敲了一下，用耳朵贴墙仔细听听，仓皇地退了回来，倒走了三两步……汤阿英悄悄地把郭彩娣拉过去，指着钥匙孔要郭彩娣

看。郭彩娣睁大两只眼睛细心地向里面看，她的脖子红了，那一股红潮一直涨到脸上，心也急剧地噗咚噗咚地激烈地跳动，看到刚才汤阿英所看到的一样的情形，马上转过身来，诧异地低声问汤阿英：

“啥事体呀？”

汤阿英指着她的嘴，摇摇手，她懂得是叫她不要喷声。她伸了一下红腻腻的舌，蹑着脚尖，轻轻走到汤阿英身边，附着汤阿英的耳朵说：

“徐义德搞的啥鬼把戏？”

“小声点点！”汤阿英把她拉到靠墙的写字台那边，轻轻地说，“墙里可能有物事……”

“有物事？”郭彩娣兀自吃了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焦急地说，“我们冲进去，当面问他！”

“他不会讲的。”

“我们把墙挖开！”郭彩娣拉着汤阿英的手，想朝厂长办公室的门那边走去。

“你又性急了，忘记杨部长怎么对你说的吗？”

郭彩娣顿时想起临走时杨部长的吩咐，她稍为冷静了一些，慢慢说：

“好，我听你的。”

“现在别惊动他，”汤阿英沉着地说，“我们马上回去，向杨部长报告，请杨部长决定，想好了再动手。”

“对！”

郭彩娣慌慌张张退回来，和汤阿英一同悄悄下了楼，一出了总办公室的大门，她们两个飞也似的跑到杨健的办公室去了。

杨健和余静正在听严志发的汇报，郭彩娣抢先一头闯进去，见了杨健劈口就说：

“杨部长，告诉你一件怪事……”

杨健看见汤阿英也走了进来，他不慌不忙，让郭彩娣她们坐下，对她们说：

“老严快谈完了，等他谈完了，就听你们的，好啵？”

“好的。”汤阿英坐了下去。

“老严，你快说。”郭彩娣站着等，有点不耐烦。

严志发汇报完了和梅佐贤、勇复基谈话的情况，最后说道：

“梅佐贤在我面前表示：他一定想办法维持生产，继续开伙，看上去，问题快解决了。”

“不，现在还不能乐观。梅佐贤这种人，是西瓜装在油篓里——又圆又滑！”

“他说话不算数吗？”严志发感到有点奇怪。

“对这些人的话要仔细听。他不是说一定想办法吗？他可以想出办法来，也可以说想是想了，还是没办法。”

“那我马上去找他，把话说死，叫他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否则，不答应。”严志发心里很气愤。

“用不着了，看他明天哪能办，再说。”杨健转过脸来，对汤阿英和郭彩娣说，“现在该听你们的了，什么怪事？是人咬了狗吗？”

杨健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郭彩娣站在杨健旁边，笑弯了腰。她两只手按着腹部，说：

“杨部长，你真会开玩笑，把我肚子都笑痛了。我只听说狗咬人，没听说过人咬狗。”

“狗咬人就不是怪事了。”杨健微微笑了笑，说，“那么，你的怪事是啥？”

郭彩娣把她刚才在钥匙孔里看到的一切详详细细叙述了一番，然后反问道：

“杨部长，你说怪不怪？”

“你有啥补充？”杨健望着汤阿英。

“情况就是这样，没啥补充的。”

杨健深深陷入沉思里去了。从郭彩娣刚才的叙述里，他想起在山东参加土改时候地主的一些情形，同时，他又想起最近别的厂里资本家的一些活动。他感到“五反”检查队在沪江纱厂任务的沉重，如果不提高警惕，说不定要出大乱子。敲墙壁一定有蹊跷，里面不是藏了武器，一定藏了金银财宝，也许是个假墙，里面有个另外的世界？窝藏了啥？他越想，越发

觉得这个墙壁很危险，必须立刻打破这个谜。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候。墙壁里肯定藏了东西，也许是武器，也许是金银财宝，也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徐义德这个人不简单。我们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不能麻痹大意。”

“我也猜想墙里一定有物事，可是没有杨部长想的这么仔细。”汤阿英说。

余静和严志发都同意杨健和汤阿英的看法。郭彩娣起初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给杨健一说，脸上气得铁青，破口骂道：

“徐义德这人狼心狗肺，干脆把他抓起来，省得让他搞鬼！”

“没有证据，怎么好随便抓人？”汤阿英反问郭彩娣。

“他违反军管会法令，三停有了两停，为啥不能抓他？”严志发赞成郭彩娣的意见。

余静觉得情况越来越严重，她也认为应该先下手：

“迟了怕误事。杨部长，你看要不要马上报告区委，还是抓起来好，别出乱子。”

“现在要抓，当然也可以。让徐义德这个狡猾的狐狸再表演一下他的丑态，证据更多，那时抓他也不

迟。刚才我谈的只是几种可能，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大，目前还很难说。现在报告区委要抓人，区委要是问这方面的证据呢？我们哪能回答？抓人是大事，不能鲁莽。”

“万一出了乱子，哪能办法？”余静有点担心了。

“是呀，杨部长。不抓他，传询一下该可以吧？”严志发不放弃他的意见。

“对，传询一下，我去把他叫来！”

郭彩娣越想刚才徐义德的一举一动越觉得可怕，仿佛那个办公室随时可以爆炸似的。她赞成传询，便想去叫徐义德，见杨健没有吭气，便站在那里木愣愣的盯着杨健。杨健听余静和严志发议论，他没吭声，心里在打主意。他想了又想，说：

“我们现在到徐义德那里去！……”

“对，现在就去！”郭彩娣感到有点突然。

“你别急，杨部长的话还没有讲完哩。”汤阿英拉住郭彩娣，凝神听杨健说。

“现在就要去。”杨健对大家说，“过了今天晚上，可能发生变化。”

“变化？”郭彩娣惊诧地问。

“今天夜里他可能把墙里的东西挖走。”

“那我们走吧。”余静站了起来。

“不忙，等一会。”杨健也站了起来，但是没走。

他把汤阿英拉到面前，附着她的耳朵低声说了一阵，生怕给门外啥人听见似的。汤阿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

杨健和余静她们走进厂长办公室，徐义德暗暗吃了一惊，以为梅佐贤出了事，可是自己分明看见梅佐贤顺利走出了厂，该不会出岔子。那么，要逼他保证明天继续开伙维持生产吗？不然，为啥这么晚了，杨部长亲自出马呢？在梅佐贤和勇复基那里没有突破，休想在徐义德这里找到一丝进攻的空隙。他显得十分镇定，把杨健他们迎进了屋，一边让坐，一边不胜钦佩地说道：

“杨部长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实在太辛苦了。”

杨健坐在沙发上，直摇头：

“不。做这点工作，算不了啥，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做好……”

“杨部长，你做的工作很好，自从你到了我们厂里，厂里都有了新气象，个个生气勃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可是明天饭厅开不了伙，车间里要关车，……”

徐义德料到杨健要谈到这个问题，马上皱起眉头，深思地说：

“我正在愁这桩事体哩，无论如何不能停伙停工。今天白天，我和余静同志谈过。我这厂能办到今天，全靠党和工会的领导。现在厂有困难，正好杨部长也在厂里，只要党和工会肯想办法，一定可以度过难关的。”

“那么，你准备袖手旁观吗？”

杨健简单一句话把徐义德问的一时答不上话来。他愣了一下，立刻顺口答道：

“我当然也要想办法。”

“你想啥办法？”郭彩娣忍不住劈口问道。

“我要梅厂长和私营行庄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这厂押点款……”

“你是不是还打算把厂卖掉？”

“这，这，”徐义德感到杨健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连他心里想的事杨健也了解，对杨健这样的人讲话不能马马虎虎。他否认道：“绝没有这个事，绝没有这个事。”

“除了押款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挖空心思，实在想不出啥办法来。”

“银行里一点存款没有吗？”

“真的没有。”

“手里一点现钱也没有吗？”

“实在没有。”

“人家欠沪江的款子收不回来吗？”

“要能收回来，早就想办法了。”

“黄金，外钞有没有呢？”

“这，”徐义德心头一愣，但马上沉着地接着说，“早就没有了，过去，倒是有一些。”

“你自己一点现款也没有吗？”

“唉，每家有本难念的经。”徐义德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叹息地说，“别人总以为我们徐家是殷实富户，实在是天晓得。一个钱逼死英雄汉。说没钱，可真是一个钱也没有。”

“像你这样的总经理，厂里连买菜的钱也没有？”

“可不是，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最近银根紧，月底轧了一些头寸付到期的支票。要是在平时，也不至于把我逼成这副狼狈相。老实说，这事传出去，我徐义德脸上也不光彩。”

杨健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徐义德。徐义德刚才应付杨健，没有注意汤阿英她们。现在杨健没有说话，他发觉汤阿英靠着右边的墙站着，两只手反剪着。他心头有点纳闷，她为啥站在那边？他不动声色地说：

“尽顾谈话了，也没招呼你们。来，大家坐下，喝点茶……”

他指着沙发前面的长方矮几上的茶望着汤阿

英。汤阿英站在那里，在背后用右手食指轻轻敲了敲墙，没有发现啥，但又舍不得离开。她移动了一步，又敲了敲墙，也没有发现啥。她心里有点奇怪了：徐义德为啥敲了墙那么得意呢？难道自己眼花，看错了吗？不，她和郭彩娣亲眼看见，一点也没有错。她站在那里，脊背靠着墙，稳稳不动，摇摇头，对徐义德说：

“我不渴。”

“那么，请坐下。”徐义德指着一张空着的皮沙发说。

“我们不坐。”郭彩娣代汤阿英回答。她站在汤阿英的左前方，有意挡着徐义德的视线。

“站着，怪累的。”徐义德看汤阿英又机警地靠墙移动了一下，他心里有点发慌，但表面上一点痕迹也没有露出来，说，“坐下来，歇一歇。”

“我们在车间里站惯了，”汤阿英仍然靠墙站着，说，“不用歇。”

“你……”

徐义德还想说下去，杨健插上来说：

“主随客便，汤阿英喜欢站着，就随她去吧。”

徐义德哈哈大笑一声，那笑声仿佛震动了整个屋子。笑声消逝了，他说：

“杨部长说得好，主随客便，那么，你就站着吧。”

汤阿英的右手的食指在背后又敲了两下，这次让徐义德发觉了。他的脸色有点红里发白，但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情，质问她：

“你为啥敲墙？”

“为啥不能敲？”

“好好的墙，敲坏了，算谁的？”

“墙还会敲坏吗？”汤阿英继续在敲。

“心里没鬼，就不怕人敲墙！”郭彩娣瞪了徐义德一眼。

徐义德没法阻止她，又怕露出内心的恐慌，便镇静地说：

“那你就尽量的敲吧。”他转过脸来，向杨健进攻，“现在厂里的事全靠党和工会的领导了。杨部长，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想点办法？”

杨健心里想：徐义德简直在和他开玩笑。鼎鼎大名的徐义德，上海有名的铁算盘，办厂的老手，忽然发不出菜金，进不了花衣，谁能相信？他自己有办法不想，反而推在党和工会的头上，这不是欺人太甚？杨健本想当面戳穿，可是察觉他对汤阿英敲墙眼色有点慌张，肯定墙里有问题，权且顺着他扯一下，好让汤阿英和郭彩娣她们方便行事。他语义双关地说：

“可以想点办法。”

“杨部长今天晚上来，就是给你想办法来的。”余

静说。

“那太感谢杨部长了。”徐义德转过来对余静说，“过去余静同志给我们厂里很多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说完了话，暗暗觑了汤阿英一眼，见她站在那儿稳稳不动，生怕给人们发觉，马上很快收回眼光，向杨健点点头，表示对他衷心的感谢。杨健反问他：

“你要我哪能帮忙呢？”

“这个，”徐义德想直截了当请杨健给他向人民银行贷款，但已经碰过钉子，再谈，不一定有效，可是自己又不死这条心，因为真能办到的话，那就太好了。他转弯抹角地说道，“杨部长肯帮忙，办法太多了。你是区委的领导同志，你在区里说一句话，哪个不听你的？市里你的熟人又多，不管是党的方面和政府方面，也不管是银行界和工商界，你都是朋友。只要杨部长肯出面，一定十拿九稳。”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杨健很严肃地说，“你谈得具体点，要是能办到，可以帮忙。”

“具体点？”徐义德这一着没有成功，不得不直接说出来，“银行方面要是肯帮忙，事情就好办了。”

“你说得对。”杨健想起早一会余静汇报的内容，说，“信通银行金懋廉经理不是同你很熟吗？”

“有点交情。”

“你向他商量商量，一定成功。可见得最有办法的还是你……”

“我？”

“唔。”

“我要是有办法，早就想了。”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是呀！”徐义德认真地说，“杨部长，你不相信，我可以向你发誓……”

“我对发誓没有兴趣，主要看行动。”

“噢！”

汤阿英忽然大叫一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杨健撇下徐义德，急着问她：

“发生了啥事体？”

“杨部长，快来，”汤阿英向杨健招手，等杨健不慌不忙走过去，她用手敲墙，说“你听！”

杨健曲着背，侧着耳朵，仔细在听：墙里面发出啞啞的声音。他问徐义德：

“这是怎么回事？”

徐义德脸色铁青，但是勉强保持着镇静，有意把话岔开：

“这些房子建造的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杨部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向金懋廉贷款？现在向私营行庄贷款，他们可能也要征求党和工会方面的意见。如

果你同意，我可以试试……”

杨健没有答腔，他自己用手对着汤阿英指的地方又敲了敲，里面空空的声音说明墙壁是假的。杨健征求徐义德的意见，是不是打开了来看看。徐义德硬着头皮说：

“当然要打开来看看……”

严志发出去找了人来，他相帮着打开墙壁，里面果然是空的，再挖下去，那儿端端的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盒子。郭彩娣眼明手快，首先发现那盒子，马上伸手进去把它抱了出来，放在沙发前面的长方形的矮桌子上。她打开一看，里面闪着耀眼的黄嫩嫩的金光，很整齐地排列着十根金条。她把它拿出来，里面还有十条，每层十条，齐臻臻的一百根金条。墙里面另外一个白铁盒子，也整整齐齐装了一百根金条。郭彩娣脸气得发青，指着金条问徐义德：

“这是啥？”因为太气愤，她激动得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沪江纱厂建造那年，徐义德埋藏下了这二千两黄金，他是准备万一自己经营失败宣告破产，最后还能够保存这二千两黄金，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早几天他预感到自己会有突然不幸的下场，在家里安排后事的辰光，曾私下把藏在办公室右边墙壁里的二百根条子许给林宛芝。他很奇怪：这件事只有他

一个人知道，为啥让汤阿英发觉呢？面对着这二百根条子，徐义德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不承认吧，这是自己的金子，而且是二千两啊；承认吧，那就完全证实他刚才那一番话是欺人之谈。

杨健见徐义德尴尬地望着金子不言语，问道：“这金子是不是你的？”

徐义德立即皱起眉头，慢慢思索地说：

“让我仔细想想看，”他用右手肥肥的食指和中指不断地敲着自己右边的太阳穴，好像在唤回久远的记忆。过了半晌，他的眉头开朗，恍然大悟一般，说，“记起来了，你看我这个人多糊涂，还是盖厂那年放进去的。这是一位阴阳先生教我的，说是墙下埋黄金，前途日日新。我居然会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幸亏汤阿英郭彩娣帮助，否则忘记了多可惜。谢谢你们。”

“你这样聪明的人会忘记，我才不相信呢。”汤阿英望了徐义德一眼，说，“你不是讲黄金外钞也没有吗？”

“这个，这个……”徐义德不知怎么说才好。

余静对徐义德说：

“这金子是你的，可以由你支配。你要保证按时开伙，不准停车。”

徐义德拍拍自己的胸脯，说：

“这没有问题。”

“不要再说没有钱了。”杨健幽默地说，“我晓得你一定有办法的。”

徐义德忸怩地说：“过去的事别提了，杨部长。”

郭彩娣跟在余静和杨健后面跨出了厂长办公室，她回过头去轻蔑地对徐义德狠狠地盯了一眼。

21

夜班已经开车，做日班的张小玲、汤阿英她们都还没有走。“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以后，车间里工人的情绪沸腾了。下了班，谁也不愿意走，都想在厂里做点工作。张小玲她们不怕机器嘈杂的声音，在细纱间的小阁楼上热火朝天地谈论着。陶阿毛在细纱间检查过车子，没有走，也夹在当中听大家议长论短。

董素娟的两只手按着郭彩娣的肩膀直摇，一边对着她的耳朵叫道：

“你说呀，那二千两金子哪能发现的啊。”

“做做好事，别再摇了。再摇，要把我的骨头摇酥了，就不好上工了呀。”郭彩娣歪过脸去望着董素

娟，说，“小鬼头，你越是摇，我偏不讲给你听。”

董素娟的两只手放下来，硬功不行，她只好用软功了。她双手合十，对着郭彩娣作了一个揖，用祈求的声音说道：

“好姐姐，我不摇你的肩膀了。你快点讲给我们听听吧。”

郭彩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软功。你软，她就硬不下心肠了。她看董素娟那副可怜相，忍不住笑了，说：

“讲就讲，作啥揖呀！”

“佛答应了，”管秀芬说，“小鬼头，别再拜啦。”

“你这张嘴啥辰光才饶人？”郭彩娣望了管秀芬一下。

管秀芬说：“你这张嘴也不推扳。”

汤阿英站在管秀芬旁边很兴奋地望着郭彩娣。见郭彩娣卖关子不肯说，怕管秀芬和郭彩娣顶嘴会岔过这件大事，便催促郭彩娣道：

“谈正经的吧，彩娣，你说吧。”

“你再不说，我们就让阿英姐说了。”管秀芬急于想了解这个惊人的消息。

“从何谈起呢，”郭彩娣不再拖延，把鬓角上披下来的黑乌乌的头发往耳朵后面一拢，想了想，认真回忆当时的情景。想着想着，她就站了起来，学徐义德

坐在沙发里的派头和讲话的腔调。大伙把她包围起来。她在当中边说边讲，就像演戏似的。

董素娟听得笑弯了腰，对郭彩娣说：

“做做好事，等一等再讲，……”

郭彩娣停下来，笑着说：

“一会求我讲，一会又求我不讲。要我不讲，我就再也不讲了。”

“不是的，”董素娟慢慢伸直了腰，喘了一口气说，“你讲的把我肚子笑痛了。我是求你等等再讲，叫我喘口气，我怕拉下一句半句的。”

“小鬼头，别再闹了，”管秀芬拉着董素娟浅蓝布上衣的摆说，“你让彩娣讲完吧。”

郭彩娣慢慢讲下去，最后谈到二千两金子处理的问题。陶阿毛暗自吃了一惊，站在旁边，故意挑起问题，梦想瓦解大家对徐义德斗争的意志。他信口说，徐义德办这个厂，养活了二千多工人；现在工人这样对付他，他会不会报复？张小玲顿时发现他的看法错误，但是并不即刻批驳他，抓住这个机会，要大伙儿谈谈究竟是徐义德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徐义德，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

董素娟听了郭彩娣绘影绘声的报告，她很愤怒。但陶阿毛提出那问题，她的愤怒情绪有点消逝，思索陶阿毛提的问题，不解地问他：“徐义德怎么养活了

工人？”

“徐义德拿出钱来办工厂，他雇工人，每个号头发工资。我们拿工资去买柴买米，不是他养活我们吗？”陶阿毛振振有辞地说，心里想当然是徐义德养活工人，这还有疑问吗？

“他养活我们？我不信。”郭彩娣不同意他的看法，想了想，说，“徐义德整天坐着不动，连车间里也不来看看。有些工人还不晓得徐义德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只听说是个大块头，可没见过面。他不劳动，我们厂里赚的钱都上了他的腰包，这是准养活谁？”

管秀芬听得大家说的仿佛都有道理。她不知道哪个道理对。她说：

“这么讲，我们养活了徐义德，徐义德也养活了我們，谁的意见对？”她冲着张小玲的耳根子说的，问她的意见。

张小玲有意不立即表示自己的看法，对大家说：“不好讲互相养活，总有一个为主的。究竟谁养活谁呢？”

汤阿英说：

“我认为我们工人养活了徐义德。我们在厂里劳动，流血流汗，徐义德在家里享福，吃喝玩乐；徐义德坐汽车，我们走路；徐义德住洋房子，我们住草

棚棚；徐义德吃大菜，我们吃咸菜；徐义德有三个老婆，我们工人有的连一个老婆也没有；徐义德的钱花不完，把二千两黄金埋在墙壁里，我们工人没钱花。为啥这样？还不是徐义德靠我们劳动，靠我们流流血汗，赚来了钱，让他剥削去，让他享福去，不是我们养活了他吗？”

陶阿毛慌忙退了一步，装出不解的神情，改口说：

“我也这么想，但是我听人家说，工人劳动，徐义德给我们的工资，也不能说他没养活工人。”

董素娟听陶阿毛这么一说，有点迷惑不解了：对呀，徐义德每个号头发工资，虽说我们劳动，可是领了工资呀，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郭彩娣不同意陶阿毛的说法，徐义德整天不劳动，尽享福，怎么能说他养活工人呢？工资，每个号头倒是拿的，陶阿毛这个歪道理她不赞成，一时自己又提不出有力的反驳的理由。她心里很急，盼望张小玲给大家说说清楚，她的焦急的眼光对着张小玲，那眼光仿佛对张小玲说：你懂的道理多，快点给大家说吧。张小玲还是不说，可把她急坏了。半晌，张小玲提出了问题：

“我们工人一个号头拿多少工钿？”

汤阿英立刻想起解放前的工人贫困的生活，她说：

“解放前，一个号头发的工资，顶多只能买三斗黄糙米；钞票不值钱，物价天天涨，买迟了，一斗黄糙米也买不到。”

郭彩娣接上去说：

“那辰光，钞票不能搁在屋里过夜，一过夜，迟了几天去买，真的一斗黄糙米也买不到，有时只能买到一块肥皂，一刀草纸，一个号头的工资，别说家里人了，就连自己也养不活呀！”

张小玲点点头，同意汤阿英和郭彩娣的说法，她问道：

“我们一天给资本家做多少生活呢？”

“八小时。”董素娟应声说道。

“那是现在，”管秀芬直摇头，纠正说，“从前我们给资本家做生活一天何止八小时，十二小时也不止！”

“有时做到十六小时，把人累坏了。”郭彩娣一想起过去做生活的情况，仿佛现在身上还感到有些痛哩。

董素娟发觉自己的说法不对头，把现在的事当成过去的事，慌忙更正道：

“我进厂比大家都晚，对过去许多事体不清爽，我也听说过去一天做生活的时间可长哩。”

“我们一天做生活的时间那么长，就值三斗黄糙

米吗？”张小玲进一步提出问题。

“当然不止！”郭彩娣马上接着说。

“工厂赚了许多钱都到啥地方去了？……”张小玲又问。

“都装进徐义德的腰包里去了。”郭彩娣不等张小玲说完，便连忙接上去说。

“徐义德整天不劳动，为啥能赚那许多钱？”张小玲提出这个问题，暗暗望了陶阿毛一眼。

陶阿毛见张小玲抓住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不放，提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不了解她究竟有多少问题要提，他一直在想怎么从侧面把她的问题顶回去，没等他开口，郭彩娣她们一一做了回答，都是事实，叫他没法顶回去。现在趁汤阿英她们在思考张小玲提的这个问题，觉得是一个机会，也有他认为的所谓理由，但又怕给人发觉他在帮资本家说话，便绕了一个弯，装出气呼呼的神情说：

“郭彩娣说的对呀，我们工厂赚的钱都上了徐义德的腰包，他为啥要赚那许多钱？真是岂有此理。过去，我听人家说，徐义德经常对梅佐贤他们讲，是他徐义德拿出本钱办厂，将本求利，厂里赚的钱应该是他的；还说啥他不拿钱办厂，工人到啥地方去劳动？我听到这些没心没肝的话，心里非常生气。”陶阿毛十分巧妙地把自已的意见放在徐义德的嘴里说出

来，然后又破口咒骂两句，语气之间显出他并不赞成，可是绝不正面提出反对，叫你捉摸不定他的真正态度。

陶阿毛的一番话在董素娟的心里起了作用，她以为这话也有道理：办厂的确需要钱啊，没有钱啥人也没法子办厂；徐义德不办厂，工人哪能来做生活啊。她没有再深一层去追问这些问题。汤阿英静静在想张小玲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觉得问题提的对，讲的有道理，而且非常重要，很能给人启发，越听使她兴趣越浓。她感到陶阿毛的说法使人认识不清，立刻提出来问他：

“徐义德的钱啥地方来的？”

陶阿毛见汤阿英问题提的尖锐，来势凶猛，预感到有些不妙，不敢再多说，便放下笑脸，谦虚地说：

“这个我不了解。”

“徐义德的钱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吧？不是他娘老子给他的吧？还不是工人劳动赚的钱，上了他的腰包，才有钱办这个厂那个厂。”

汤阿英问得陶阿毛无话可说，他心里有不少话可以说，可又不敢再直接说出来，那会暴露他的面目的。但他又不甘心不说，叹了一口气，显出不解的样子，说：

“我们工人劳动，赚了钱却上了徐义德的腰包，

真叫人生气。徐义德说啥工人劳动，给工人发了工资，正像汤阿英说的，一个号头的工资还买不到三斗黄糙米，够啥呀！”陶阿毛以为徐义德拿钱办厂应该多赚钱的谬论给汤阿英驳了回去，他不好再说下去，便又拉到工资问题上来纠缠，并且有意把问题摊在张小玲面前，看看她的态度。他皱起眉头，说：“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真是复杂，闹得人头昏眼花，小玲，你给我们讲讲吧！”

“陶师傅也弄得头昏眼花，问题真不简单呀！”这是管秀芬讪笑的声音。

郭彩娣等得不耐烦了，她急着想快点弄清这个问题，也对张小玲说：

“还是你给我们讲讲清爽吧！”

“逞能逞不下去了，只好搬救兵了。”

郭彩娣听了管秀芬这两句带刺的话，嗓音高了，态度激昂了：

“搬救兵哪能！犯法吗？”

“别吵，谈正经的。”张小玲按了按手，觉得问题都摊开了，她该说两句了，“我们工人做一个号头的的生活，徐义德发一个号头的工资，表面上看，好像我们的劳动都得了报酬；仔细想一想，徐义德一个号头给我们多少工资呢？三斗黄糙米还不到；我们一个号头给他做多少生活呢？花衣是我们工人运来的，纱是

我们纺的，布是我们织的，又是我们运到市场上去的，……我们劳动创造的财富三担黄糙米也不止，都叫徐义德剥削去了，上了他的腰包。凭那三斗黄糙米工资，我们每天顶多劳动两个钟头，也就差不多了，过去一天劳动十多个钟头，多劳动的时间都是徐义德剥削的，这个多劳动的时间，叫做……”张小玲在细细回忆杨健同志在这里党课上的报告，说，“我听杨部长说，叫做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叫做剩余价值，徐义德剥削的就是这个，他办厂的钱也是从这个上头刮来的；汤阿英说的对，徐义德从娘胎里没有带一个铜钿来，靠工人劳动赚的钱，上了他的腰包，才有钱办厂。单有钱办厂，没有工人劳动，钱和机器能变成纱吗？能织成布吗？要靠我们工人劳动，棉花才能变成棉卷，棉卷才能变成纱，纱才能变成布，他才能拿出去赚钱。他不劳动哪能赚这许多钱？当然是剥削我们，也就是我们工人养活了他！”

“我们工人养活了他？”董素娟仔细咀嚼这一句。这一句话打开她思想上的窗户，越发感到自己太年青，进厂的时间不长，知道的事情太少，道理懂得更少。听张小玲她们这么一说，她心里亮堂的多了。这样说，五反运动更加迫切需要展开了。“五反”检查队在汤阿英她们的要求下果然来了。人民政府派人来撑工人的腰了。她浑身感到温暖，觉得有一股热

力，懂得了许多道理，增加了勇气，提高了和徐义德斗争的认识和信心。

汤阿英听见张小玲这一番话，她的意见得到支持，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她挤到张小玲旁边，高声大叫：

“张小玲说的对呀，是我们工人养活了徐义德。他对待我们工人这样，简直是没有良心呀。这次五反运动，我们要参加进去，不能让徐义德再欺骗我们。”

“今天我讲得很简单。过两天要开诉苦会，秦妈妈今天没来，她准备诉苦会的材料去了，她受的苦比我多，懂得的事体比我多，经验更比我丰富，你们再听听她的诉苦，就会更加明白谁养活谁了。”

“那好呀！”董素娟高兴得跳了起来，手舞足蹈地拍了一下管秀芬的肩膀，“开诉苦会的辰光，你去做记录，这回可要认真学习学习，我懂得事体太少了。”

“小鬼头，你懂得事体太少，打我一下肩膀，懂得事体就多了吗？”

“啊哟，对你不起，”董素娟抱歉地说，“我给你按摩按摩。”她真的用右手轻轻抚摩着管秀芬的肩膀。

“我可没那个福气，”管秀芬把她的手甩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别打我，就感激不尽了。”

“小鬼头，你怎么碰起我们的记录工来了，胆子

可不小，当心以后别人给你小鞋穿！”郭彩娣同情地望着董素娟一眼，她想张小玲刚才那番话讲的道理很深，证明自己的看法对，但没有张小玲讲的那么有条有理。她兴奋地说，“张小玲讲的有道理呀，我们工人养活了徐义德，‘五反’当中要好好检举徐义德；听说打包间已经动起来了，准备成立‘五反’分队，我们也……”

管秀芬听见张小玲说郭彩娣的意见对了，有力地批驳了陶阿毛的看法，也就是批评了她的意见不明确也没有倾向性；刚才郭彩娣又帮助董素娟讽刺她两句，她心中有些不满，却又找不出道理来讲。陶阿毛见苗头不对，不好再从中挑拨，说多了怕露馅，同时又听说要开诉苦会，这是新消息，急着要去报告梅佐贤，就赶紧说了一句“张小玲的看法高明……”然后悄悄地离开了。管秀芬听郭彩娣谈到打包间成立“五反”分队的事，正好给她一个机会。她说：

“这次可说错了。我晓得打包间早成立了‘五反’分队；选出刘三嫂当队长。粗纱间也动起来了，吴二嫂当了‘五反’分队的队长。清花间也成立哪，他们的分队队长是郑兴发……”

郭彩娣冷笑一声：

“我当然比不上你，——谁也比不上你，你有顺风耳，你有千里眼，天下的事谁也瞒不过我们的管秀

芬啊。”

管秀芬正要回敬郭彩娣两句，汤阿英补充道：

“我听学海说，保全部今天也成立了，……”

“哦！”管秀芬愣了一下，她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保全部的消息。

郭彩娣说：“想不到保全部的消息你却不晓得。”

“我也没有内线在保全部，”管秀芬这句话是讲给汤阿英听的。同时，她反击郭彩娣一句，说，“我也不是包打听。”

“早一会我出去上小间，看到工会的快报，筒摇间也成立了。谭招弟还提出来向打包间挑战哩。”董素娟插上来说。

“讲筒摇间就讲筒摇间，提谭招弟做啥？”郭彩娣对董素娟说。

董素娟吓得伸出舌头来。她想起了那次谭招弟骂细纱间，郭彩娣就没和谭招弟讲过话，她心中有个疙瘩，在厂里碰到谭招弟耐理不理的，有时故意低下头，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董素娟有点怕郭彩娣，连忙抱歉地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提她了。”

“提也没有关系，”张小玲说，“彩娣，你不应该不理谭招弟，是自家姊妹啊。”

“谭招弟这号子人，这一辈子我也不想理她。”

“她骂细纱间不对，你这样的态度对她也不对啊。”张小玲说，“彩娣，你要好好想一想。”

郭彩娣没有再吭气。

“别的车间差不多都成立了，只有我们细纱间，这次落了后哪……”董素娟总希望细纱间啥事体都跑到别的车间前面。这次运动，细纱间乙班还没有成立“五反”分队，心中有些惋惜。

“细纱间这次并不落后，我们甲班早就成立‘五反’分队，乙班她们今天夜里下班以后就成立，她们的情绪可高哩。今天上班以前，她们就想停止生产成立。杨部长没有同意。杨部长说，‘五反’生产两不误，不能够停止生产搞‘五反’。乙班只好推迟到明天早上下班成立。”张小玲说。

“那我们全厂的工人同志们都动起来了，都参加了伟大的五反运动哪！”

郭彩娣兴奋地鼓掌。大家跟着鼓掌。热烈的掌声把小阁楼外边机器的声音都遮盖得听不见了。

“过去徐义德他们在我们工人面前神气活现，今天总算把头低下来了。这次我们工人一定要把他斗得服服帖帖的。”汤阿英兴高采烈地望着大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充满了信心的光芒。

“陈市长讲的好，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就要进行五反运动，否则到不了。我们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

限，斗争到底。这次五反运动，有政府支持，有杨部长亲自掌握，徐义德违法，就要依法办他。一定要把他斗得服帖。”张小玲说。

郭彩娣说：

“那是的。我就听见严志发同志对徐义德讲过。徐义德一听到军管会的四项规定，面孔就变了色，比过去老实一些。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撑腰，我们工人天不怕，地不怕。这次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我们厂里来，事情不弄清爽，我们工人就不让他们走！”

“对，事体弄清爽才让杨部长走。”董素娟钦佩地望着郭彩娣，她举起拳头，向空中一击，说，“问题解决了，生活就好做了，阿英姐姐再也不会累得早产了。”

她同情地碰一碰汤阿英的肚子。汤阿英身上那股热力不断增长，勇气百倍地举起手来，说：

“不胜利，决不收兵！”

22

“……我家原来在无锡梅村镇，住在人家的猪窝

里。我十五岁那年地里打下粮食全叫失半天拿走了，害得我们家揭不开锅盖，到冬天，拣野菜糊口。我爹得了胃病，面黄肌瘦，饿得皮包骨，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家里没吃没喝的，娘带我到处去讨饭，讨到饭就吃一顿；讨不到饭，饿一天半天也是常有的事。娘身体很虚弱，走路迈不动脚步，扶着我的小肩膀，算是她的拐棍，到每家每户门前去伸手，有钱的老财家不给，没有钞票的贫苦人家想给，他们自己也是勉强过日子，哪有多少饭菜给我们吃？我和娘就到人家猪食缸里去捞饭菜，到垃圾堆里去拣菜茎菜叶子，把馊饭馊菜淘一淘，把菜茎菜叶洗一洗，煮了煮，凑上一顿，勉勉强强糊口度日。

“有一天，落着鹅毛的大雪，刮着寒冷的北风，爹躺在床上睡觉了，娘看我穿着那件棉袄，半个身子露在外边，冻得直抖索，牙齿不断地打颤战，就把她穿了二十多年的破棉袄披在我身上。她自己穿着一件破夹袄，抵挡不住一阵阵的冷风，怎能忍心让娘受冻，我们棉袄还给她，让她穿上。她怎么也不肯穿上，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要求娘穿上，我坐在她怀里，她才答应了，但她还是不穿上，只是披在肩上，用棉袄把我包在她怀里。我们母女两个紧紧挨着，娘用她的身子温暖着我弱小的身子。冷的好一些了，可是肚子饿的哇哇叫，眼睛发黑，头发晕，望着猪窝外面的雪

还是下个不停，我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熬煎，不让娘晓得。娘其实早就晓得了，她唉声叹气地望着混混沌沌的天空咒骂：老天爷，你也不睁睁眼睛，看看穷苦人家过的啥日子，下雪下了一整天，刮风也刮了一整天，狂风大雪，漫天盖地，连路也遮盖上了，叫我们穷人到啥地方去讨饭啊！不出去讨点吃的喝的，我和小孩还可以勉强忍受，爹有病，这一天哪能熬的过去！到了夜里，怎么受的了？娘一边说，一边抚摩着我瘦削的肩胛骨，和我商量：还是出去讨点吃的喝的去吧。我正在想吃想喝，一听娘的口气，我霍的站了起来，可是万道金星在我面前飞跳，冷风在我耳边狂啸，两腿无力，身子站不稳，一晃，身子一歪，跌倒地上去了。娘吃了一惊，走过来把我拉起来，急着问我是不是跌坏了。我拍了拍身上潮湿的猪尿气味的泥土，摇摇头，说：没啥。我大脚跌得痛的要命，咬着牙齿忍受，不让娘晓得。娘以为真的没啥，扶着我的肩胛向猪窝外边走去。

“忽然刮起一阵狂风，掠过漫漫的雪野，把雪卷起，正好迎面向猪窝卷来，弄得我们满头满脸浑身都是雪，加上那狂风的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刮得摇摇晃晃，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不由自主地退回了两步，靠着一扇矮墙，才算站住了。等狂风过去，娘才扶着我一步一步迈出了猪窝的木栅栏，踏着半尺来

深的白雪，一步一个脚印，脚陷在雪里，光着脚丫子，鞋后跟裂开了，走起路来不跟脚，走一步要吃力的把鞋子从雪里带出来，慢慢移动着，身子背后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一转眼之间，身子背后的脚印又给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填平了。前面是一片漫漫的刺眼的雪野，没有人声，没有鸟语，除了我们母女两个，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娘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大的雪，一个人也看不到，到啥地方去讨吃讨喝啊？

“我们漫无目的走着，东张西望，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人啊！这样的大风大雪，啥人到外边走动啊！我们一步一步走着，身子发冷，肚子饥饿，越走越吃力了。天慢慢暗下来，连路也看不清楚了，这样走下去，大路给雪盖上，晚上连路也看不见了，哪能回家呢？没有办法，我们空着两手往回走了。

“走到猪窝那里，天黑了，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地叫唤，他饿得忍受不住了，又看不见人，在叫我们哩！我连忙跑进去，点了油灯，看见爹瘦骨嶙嶙的面孔上直往下流着眼泪，一把抓住我的小手，问我们到啥地方去了。我告诉他出去讨饭了。他眼睛露出喜悦的样子，一看我和娘的手都是空空的，他立刻闭上了眼睛，眼泪流的更多了。我用小手给他拭去，低低地对他说：等雪停了，我们再出去讨饭，这回一定要讨到饭才回来。娘晓得爹的心思，不但肚里饿了，更重

要的是爹的病，一直躺在床上，没有钱请医生，也没有钱买药。娘对爹说，等天晴了，再到村里找找人，求求情，借点钱回来，找医生看看，慢慢会好的。

“我和娘站在爹旁边，我们讲了很多话，没有听见爹说一句话，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见爹的眼睛紧紧闭着，忍不住放声大哭了。娘连忙用手对着他的嘴一试：手心里感到爹微弱的呼吸。娘叫我快拿水来，我弄了一碗水送过去，娘慢慢用调羹喂他。

“猪窝外边还在落着大雪，北风哭泣一般地哇哇叫喊。这一夜，我和娘都没敢睡觉，守在爹的身边……”

汤阿英坐在夜校教室第五排座位的左边，秦妈妈一提起在无锡乡下往昔的生活就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和秦妈妈相处的日子不短了，还不知道秦妈妈这样悲惨的身世，原来秦妈妈的童年过着比她家还不如的贫困生活，受着饥寒的熬煎，遭到朱半天的迫害，朱半天在梅村镇害死了多少劳苦的农民，欠下了多少血债啊！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大江南北，朱半天不会被镇压，他骑在人民头上，不晓得又有多少农民兄弟姊妹遭到迫害哩！她同情地望着秦妈妈，想到秦妈妈站在那里痛诉旧社会反动统治的罪恶，好像也代她把自己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一样的痛快。郭彩娣坐在汤阿英旁边，她不了解农村生活

的情形，听到秦妈妈她爹病有猪窝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晶莹的泪珠从眼眶里流出，顺着她丰满的腮帮子流下，连成了两条线。一直滴到她的淡蓝色的对襟的褂子上面，接着发出幽幽的低沉的哭泣声。汤阿英用胳膊轻轻碰了郭彩娣一下，小声地对她说，要她别哭，仔细听秦妈妈讲下去。她用淡蓝色褂子的下摆，拭了拭面孔上的泪水，竭力忍住哭声，听秦妈妈往下说。

杨健坐在黑板前面的椅子上，看到夜校教室里里外外黑压压一片，人像潮水似的，从四面八方教室涌来，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把教室围得水泄不通，从拥挤的人群中猛的挤进一个人来，满头满脸的汗水，气咻咻地大步走到杨健面前。杨健站起来，迎上前去，急着问道：

“小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钟珮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现在去行吗？”

“行。”

“你先去，我们马上就来。”

钟珮文掉头就走，挤出人群，匆忙的背影很快就消逝了。杨健旋即走到秦妈妈旁边，小声地对她说：

“你等等再讲，我对大家讲几句。”

秦妈妈让开，站在一旁，以为发生了啥事体，注

意听杨健在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的诉苦会，原是细纱间甲班召开的，但是别的车间的工人同志听到消息，也纷纷主动来参加，可见全厂工人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的积极性很高，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杨健鼓掌欢迎。整个教室的人都鼓掌欢迎，清脆的激越的掌声一浪接一浪地传出去，等掌声消逝，杨健接着说：

“教室地方太小，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我刚才和余静同志商量，把会场搬到篮球场上去，特地要钟珮文同志带几个工人同志临时去布置，现在已布置好了，请大家到篮球场上去开会……”

又是一阵掌声，特别是教室外边的掌声更高，欢呼和感激杨健适时的安排，满足广大工人参加大会的愿望。挤在教室外边的人先走了，教室里的人也陆陆续续向篮球场上走去。秦妈妈跟在杨健和余静他们后面，也向篮球场上走去。

今天细纱间甲班召开诉苦大会，因为是全厂第一个车间召开的，杨健和余静都亲自参加，以便取得经验，好在其他车间推广，杨健并且亲自主持今天的大会。其他车间白班的工人下了工，像谭招弟、吴二嫂和郑兴发他们已经走出了工厂的大门，听说细纱间甲班要开诉苦大会，又走回来参加了。杨健看到出

席的人越来越多，派钟珮文去布置新的会场。

杨健走到篮球场，向会场一看：当中悬空挂了毛主席的画像，四周贴了许许多多的标语，从工会办公室里搬来了一张写字台和三四张椅子两条板凳，都放在毛主席画像的下面，正好布置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他觉得钟珮文真有一手，很短的时间里就布置的这么齐全，可不容易。他和余静、秦妈妈她们走进会场，在板凳上坐了下来，看钟珮文站在写字台旁边像是一位指挥员，在调兵遣将，指挥队伍：他把细纱间甲班的工人都安置在前排席地坐下，其他车间的工人坐在细纱间甲班工人后面，科室的职工都在会场的左侧，早来的就坐在黄橙橙的沙地上，迟来的没有地方坐了，便站到进门的那一条宽阔的乌黑的煤渣路上了。钟珮文见夜校教室里的人都来了，回过头去，对杨健说：

“都来了，是不是开始……”

杨健走到写字台面前，宣布继续开会，秦妈妈接着说下去：

“……第二天，雪停了，我和娘出去讨了点吃的，先给爹吃了，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还是没钱治啊！这辰光，村里来了个上海人，头上戴顶草帽，身上穿着黑绸长袍，反卷两只袖子，里面露出雪白府绸袖子，手里拿了把黑油纸扇子，在村子里一摇二摆

走着，东张西望，像是找啥物事。他说自己是上海的带工老板，逢人便说到上海做厂哪能好，进了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饭，还有工钱拿，把大家讲得心痒痒的。我听到这消息，高兴的不得了，就问那人有啥手续。那人说手续很简单，只要听老板的话，吃包饭，一年十块，三年以后，工钿完全归自己。包洋三十块，先付五块，在契约上打个手印就行了。娘一听就动了心，那五块定洋可以给爹抓药治病，救人要紧啊。娘和爹商量，想让我去。爹躺在床上直摇手，他知道这叫包身工，等于把女儿卖了，说啥也不让我去。娘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再三再四地说，就是包身工吧，过了三年，工钿归自己了。眼前还是治病救人要紧。我央求爹娘让我去，好拿五块钱请医生看病救命。爹起先还是不肯，见我一个劲哭，叹了一口气，摸着我的头说：可是苦了你啦，孩子！娘找到带工老板，在契约上打了手印。那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特立此包身契约。娘把我交给带工老板，他却说：这两个小姑娘卖给我啦，每人五块钱，你们收下吧。原先说是三十块包洋，只付了五块，再也没有付过了。带工老板在村里又找了六个，我们七个小姑娘都成了包身工。

“第二天晚上，带工老板领着我们到上海来了。

我们进了沪江纱厂一看，啥洋房白米饭，全是骗人的鬼话。三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盖一床被子，连腿都伸不直，也看不见阳光，又黑又潮湿，臭虫虱子一大堆，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到了夏天，尽是蚊子苍蝇，嗡嗡叫，呜呜飞，老向你身上叮，闹得你白天疲劳的要死，晚上又没法闭眼。臭虫蚊子咬得身上斑斑点点，又痛又痒，只好拼命去抓，抓破了，生了烂疮，粘在衣服上，自己脱不下来，要靠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我身上和胳膊上到现在还有疤痕哩！”秦妈妈卷起袖子，指着胳膊上的斑斑疤痕给大家看，说，“冬天虽然冷，倒还好些，你靠我的身子，我靠你的身子，可以取暖；一到了夏天，在闷热的房子里就别想睡觉了。天不亮就给叫醒，连大小便也没有一个地方，几十个人只有一个木桶，得排长龙，一个挨一个。吃饭也要排长龙，一桶杂米薄粥，大家轮着盛，有的一碗还没有喝完，桶就见底了，臭咸菜也光了。吃不饱吗？照样得去上工。一天做十五六个钟头并不稀奇，累得我们精疲力尽，浑身动弹不得。

“我们工人，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在旧社会反动派统治下，没有好日头，许许多多童工女工被折磨得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一条条年青的尸体从后门拖出去。童工侥幸不死，即使熬到满师，徐义德又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批又一批解雇，然后又一批

批招收新的童工，再在新的童工身上压榨剥削。我们工人生活不下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跟徐义德斗。徐义德就去叫包打听和三道头来，用手枪威胁工人。包打听，我们不怕；手枪，我们也不怕，还是和徐义德斗，这样徐义德才不敢再随随便便开除工人了。我能在沪江纱厂细纱间做生活到现在，也是和徐义德斗争斗出来的。

“我们工人这样给徐义德拼命做生活，他一个号头给我们多少工钿呢？正像细纱间早两天讨论的那样，解放前一个号头的工资还买不到三斗黄糙米。就是这么一点工钿，徐义德还要在上面动我们的脑筋，他顶刮皮，不按时发工钿，每个号头的工钿他都要拖几天。那辰光钞票天天跌价，物价时时涨价，到饭馆去吃一顿饭，第一碗饭刚吃完，添第二碗饭，这碗饭比第一碗贵了一倍，涨价了，你得赶快吃，不然第三碗饭又要涨价了。别说徐义德晚发我们两三天的工钿，就是晚个一天半天，我们也吃不消。好容易等到徐义德发工钿，拿到手里一看：不是钞票，是本票^①。我们拿到本票，下工要到银行去排队，还要贴水，才

①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滥发钞票，票面数额很大，买东西发工资要一大堆钞票，就进一步发本票，数额更大，要贴水换现钞才能用。

能换现钞，这么一折腾，钞票少了，物价涨了，买到的东西更少了。本来每月工钿勉强可以买三斗糙米，这么一来，连三升也买不到，只够买一块肥皂一刀草纸，一个号头的生活白做了。这样的日子我们工人实在受不了，一九四八年冬天，为了配合迎接亲人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做斗争，我们在厂里摆平^①了，徐义德才不得不答应按时发工钿，不发本票发现钞。

“徐义德不单在工钿上扣我们工人，在劳动上更是压榨我们工人，一再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减人不减活，车间生活难做，许多工人累倒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上工，缺勤率当然要增加，徐义德看出工的人少了，他就出了坏点子，要我们细纱间的工人放长木棍。汤阿英原来身体不好，又怀了孕，劳动强度这么大，身子自然顶不住，肚里的孩子就早产了，这都是徐义德压榨剥削我们的缘故。徐义德这个资本家从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把我们工人身上的血汗榨干了，他就解雇开除，打发你走。我们工人真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做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

“我们全厂工人成年到头辛辛苦苦劳动，沪江厂

^① 摆平，即罢工。

一年赚了许许多多的钞票，都到啥地方去了？都上了徐义德的腰包了。有人说，徐义德拿钞票办厂，赚了钞票自然归他，他不办厂工人到啥地方去做工呀？我倒要问：徐义德办厂的钞票从啥地方来的？汤阿英问的好：是从他娘胎里带来的吗？不是，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吗？他父亲的钞票，又从啥地方来的？是生下带来的？不是；并且他父母原来也没有钞票。这厂是徐义德办的，开头只有一个车间，工人劳动赚了钱，才慢慢发展起来，越做越大，现在徐义德不单是一个沪江纱厂，他还有许多别的纱厂，印染厂，纺织机械厂……都是靠沪江发展起来的，都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聚积起来的。工厂的机器哪一部不是我们工人造的？哪一寸纱不是我们工人纺的？哪一寸棉布不是我们工人织的？徐义德这个资本家整年不劳动，我们工人在车间里做生活，累死了，连徐义德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他一不捏榔头，二不开机器，三不挡车，连地也不扫一下。工人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一个号头发那点工钿，养不活一家人，绝大部分都上徐义德的腰包了，都给徐义德剥削去了。啥人养活啥人不是清清楚楚吗？哪一个资本家的企业不是建筑在我们工人的白骨堆上？哪一个资本家不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养肥的？

“我不会唱歌，上海刚解放的辰光，流行过一支

民歌，我倒记的清爽，我说出来，大家也许还会唱哩。我念给你们听听：

大家看一看，
大家想一想：
地主和农民；
资本家和工人，
到底啥人养活啥人？
三件事情吃穿用，
没有劳动不成功！……”

秦妈妈刚把歌子念完，钟珮文便走到秦妈妈那里，站在写字台旁边，展开两只胳膊，向大家号召：“我们大家一道唱一唱，好不好？”
会场上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好哇！好哇！”

钟珮文先唱了一句，定了音，然后挥舞着两只胳膊，指挥大家唱了起来，会场上的工人随着他的手势，齐声唱了起来，慷慨激昂，清脆嘹亮，歌声里充满了力量，洋溢着愤愤不平的情绪。汤阿英也提高嗓子跟大家一齐唱。她和在城市里生长的工人不同，她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和双重剥削，感到歌词亲切，仿佛是唱出她心里的

话，唱得十分激动。

晴朗的天空，蓝湛湛的，飘浮着几片薄絮似的白云，在缓缓移动。歌声越唱越高，好似直冲云霄，连白云也像是感动得停止移动了。激越的歌声四散开去，逐渐消逝在远方。秦妈妈又接着讲下去：

“我们工人劳动一个号头，只拿那么一点点工钿，住的草棚棚，穿的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下雨天，连把像样的雨伞也没有。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不劳动，整天动脑筋怎么剥削我们，一门心思想钞票赚更多的钞票，住在花园洋房里，这里几间，那里几间，楼上楼下，房子多得很，没有人领着，走进去还出不来哩！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平常一顿饭就是一二十种菜，还嫌不好吃！请起客来更是吓坏人，二三十只菜也不稀奇，一张圆桌面，小菜放在上头，可以转到每一个客人的面前，你爱吃哪一样小菜，哪样小菜就转到你面前来了，这圆桌面里头有机关哩！徐义德出门就坐汽车，冬天汽车里有暖气，夏天汽车里有冷气，出去兜风还有敞篷汽车哩。徐义德一个人就讨了三个老婆，轧的姘头那就数不清了。她们每个人都有几十套衣服。我们工人春夏秋冬换季有时都换不上，他们是一天换一套，天天变花样；鞋子就不要说了，恐怕连她们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双，高跟皮鞋，半高跟皮鞋，平底缎子鞋，绣花拖

鞋，简直是叫人眼花缭乱，没有办法看的清爽说的明白。别的暂且不去说它，单讲徐义德的小老婆林宛芝过三十大寿吧，请了几百号客人，吃了几十桌酒席，客人的汽车一条马路都停不下，一直停了好几条马路，把附近的街道都塞满了！大家想一想，这一天开销要多少？我们工人做多少年的生活流多少年的血汗，都叫徐义德一天都花掉了。徐义德还送小老婆林宛芝的生日礼物，是一只三克拉的白金钻石戒指，听说花了五千八百万买的。我们工人做一辈子生活也拿不到这许多工钿啊！徐义德花的这些钱都是我们工人的汗啊，全是我们工人的血啊！……”

郭彩娣坐在地上听的只气得眉毛倒竖，面孔发青，攥紧了拳头。汤阿英坐在她左边，看她坐立不安，神色不对，低声问她想做啥。她说想找徐义德算账去！汤阿英要她安静坐住，听秦妈妈讲下去，账当然要算，但不忙现在去，听完了，大家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听杨部长和余静同志的指挥，那辰光再算。郭彩娣想想汤阿英说的对，不能现在一个人单独去找徐义德，只好耐心等着，可是她心里忐忑不安。

“徐义德这样残酷压迫剥削我们工人，他并不满足；他那贪得无厌的心简直是填不满的万丈深渊，他还向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发动了狂狂进攻：偷工减料，偷税漏税，行贿干部，盗窃国家资财，还盗窃国家经

济情报，无恶不作，挖我们国家的墙脚，猖狂透顶，罪恶滔天！我们工人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我们厂里开展伟大的五反运动。工人同志们要起来检举资本家的五毒罪行，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秦妈妈的声音越讲越高，越讲越有劲头，越讲越精神焕发，越讲越激昂慷慨，最后忍不住挥舞着右胳膊，高高举起，每一句都变成有力的口号，响亮的号召，激动会场上每一个人的心弦。郭彩娣在地上怎么也坐不住了，她猛的站了起来，也向空中有力地伸出右胳膊，一边响应秦妈妈的号召：

“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工人同志们起来！检举徐义德资本家的五毒罪行！”

汤阿英站了起来，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呼口号的声浪此起彼落，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整个会场沸腾了，一个个都高高举起胳膊，像是密密麻麻的森林，跟着就爆发出巨大的口号声，向四面八方扩张开去。

杨健在高昂的口号声中走到毛主席画像的下面，站在写字台面前来了。他觉得秦妈妈今天讲的生动有力，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活生生的事实，全是农民

和工人亲身遭受的血淋淋的经历，把大家带到解放前的黑暗的悲惨的社会里去，使大家更加感到解放后新社会生活的甜蜜；指出徐义德残酷剥削和糜烂的生活，他深深感到忆苦思甜的威力激发工人迫切要求参加伟大五反运动的心情，会场上像是在燃烧似的激昂情绪，热火朝天。他原来准备讲的话，都由秦妈妈代表工人说出来了。他没有多讲，只是向工人说：

“今天秦妈妈讲的非常好，说出了我们广大工人多年的痛苦和强烈的愿望。徐义德这个资本家不但压迫我们工人，剥削我们工人，还向党和工人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犯了许多五毒罪行，沪江纱厂的五毒是严重的。他到现在还不低头认罪，并且顽强抵抗，企图停伙停工，和我们斗争，企图破坏沪江纱厂伟大的五反运动。这是他的梦想。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坚决领导伟大的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要资产阶级根据‘共同纲领’办事，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大会以后，细纱间甲班工人分组讨论，其它车间的党团小组和‘五反’分队要准备也开这样的诉苦会，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全厂工人同志们动员起来，都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检举

资本家的五毒不法行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23

苍茫的暮色悄悄地从四面八方袭来，高大的仓库和厂部总办公室的轮廓逐渐模糊了，闪的一下，煤渣路上的路灯亮了，总办公室和仓库里的电灯也亮了，憧憧的人影匆匆地在浓厚的暮色中移动着。汤阿英望着煤渣路上来往的人少了，夜班工人已经到车间上工去了，白班工人也陆陆续续走了。她一个人坐在篮球场上，心潮澎湃，回忆秦妈妈刚才讲的话，每一句都打动她的心弦，使她很久不能平静下来。她怀着对徐义德无比愤恨的情绪，往事像是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在她面前展开，一幅一幅的画面又清晰地闪现在她的眼帘。她根据画面出现的情景，努力追寻它的来踪去脉，随着思考的线索反复寻根究底，有时她的两道淡淡的眉头皱起，有时她的鸭蛋型的面孔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她那对机灵智慧的眼睛从总办公室望到车间，又从车间望到仓库，那晶莹的眼睛好像有着透视一切物事的能力，隐藏在任何阴暗角落里

的物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似的。从后门那个方向，蹒跚地蠕动着一个人影，一边走着，一边向左右张望，顺着工会办公室面前那条乌黑的煤渣路轻轻走来，在路灯的光线照耀下，面孔的轮廓也慢慢可以辨认出来了。汤阿英看到那个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前去，兴高采烈地说：

“小玲，我正想找你，恰巧你来了。”

“有啥事体？”

汤阿英向前后左右望望，见有几个人走动，她就没有言语，等了一会，才说：

“后面有事吗？”

“我到各处走走，查看查看纠察队员们是不是都在值班，后面没啥事体。”

“纠察组长真忙……”

“你为啥还没回家？上了白班，又开了会，该回去休息了。”

“一点也不累，刚才在想过去厂里的事，我想现在就检举徐义德，你说，好啵？”

“当然好。”

“现在就写，”汤阿英腼腆地靠着张小玲，低声说，“我虽认识一些字，可提不起笔来哩。”

“这个我晓得。你上夜校学习的时间不短了，字也认识了不少，成绩蛮不错哩。我们工人要学文化，

旧社会不让我们学文化，怕我们懂得事体多了要闹革命。新社会就怕我们懂得的事体太少。现在有了条件，你要继续抓紧学习，多认识一些字，自己就可以提笔了。”

“现在要写检举信，来不及了。你帮我一把手。”

“这没问题，马上写！”

“马上写，”汤阿英向四面望了望，指着夜校教室说，“里面有灯，到里面去写吧。”

她们两个人一边低低谈着，一边走进了教室，靠角落坐了下来。张小玲低下头正要给汤阿英写信，忽然听到一个人说话：

“交头接耳谈话，有啥秘密瞒着人吗？”

汤阿英一门心思在想写检举材料，没有注意教室里有人，连忙抬起头来一看：是管秀芬这个记录工。张小玲一进教室的门就看见在整理会议记录的管秀芬，因为忙着给汤阿英准备纸笔，没有招呼她。汤阿英对她说：

“有秘密还瞒过你，你的顺风耳可灵光哩！”

管秀芬放下笔来，笑了笑，说：

“小组长和你的秘密我可不晓得。”

“那就告诉你，”张小玲急着要给汤阿英写检举信，没有时间和她逗嘴，就让她了一步，说，“我帮汤阿英写检举信，也不是啥秘密。”

“这可是个大秘密，不能让徐义德知道。”

“你那张嘴不说出去就行了。”

“我一定保密。不信，用张封条把我的嘴封上。”

“你那张嘴封得住？”

“不封就算了。”

管秀芬低下头去，在电灯光下，沙沙地整理记录。这边张小玲对汤阿英说：

“你讲吧，我来写。”

汤阿英望着教室的黑板，秦妈妈和杨部长号召的声音在她耳际萦绕，过去的事又在她眼前显现了。她回忆地说：

“厂里那一阵子生活难做，为啥断头率那么高？这里面一定有鬼，准是徐义德在里面掺了坏花衣！盗窃国家代纺的原棉。仔细把这笔帐算一算，可多哩。……”

张小玲停下笔来，兴奋地说：

“我们厂里生活难做辰光长远啦，这笔帐算起来一定不少。”

“我想粗纱里也有鬼，有时粗纱间送来二十支的粗纱可粗哩。一定只过了头道，没有过二道，徐义德在这个上头又偷工又减料。像这样的粗纱，大概用了有一年。……”

张小玲放下笔，用右手数着左手的指头算了算，

说：

“一年也不止，至少有一年两个号头。”

“差不多。”汤阿英点了点头，思索地说，“还有一桩事体，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徐义德搞鬼，可是不具体，也没有把握，你看可以不可以写？”

“啥都可以写，不具体也没啥关系，材料组他们可以根据大家的检举材料综合整理，你提一点，他提一点，汇拢起来，就多了，也具体了，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最后就可以找出问题来了。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写。”

“那还是大前年六月间的事体，我下了工，路过仓库，看到那边停了好几部大卡车，一蒲包纱一蒲包纱往外搬，堆在大卡车上，装满一车开走了，又装一车。我朝仓库里面一看：许多人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特别是方宇驻厂员，手里拿着个紫蓝色的印色盒子，在一个个纱包的骑缝上打印子，满头满脸是汗，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卖力，那天晚上可精神啦，这边纱包打完了，又到那边纱包上去打，不像过去磨洋工，做起活来死样活气，那次动作可快啦，满嘴新名词，说的可好听哪，猪嘴上插葱——装象哩！方宇好像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刚才想，这里面一定有啥鬼名堂，自从我进了沪江厂，没看见方宇这么忙过，也没看见他那样卖力气过，……”

“那天我也亲眼看见了，”管秀芬听汤阿英检举这桩事体，她停下笔，听出了神，插上来说，“我也从来没有看见方宇那样积极过，经阿英一分析，这里面大概有蹊跷。”

汤阿英得到管秀芬的支持，她的怀疑更大了，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哪家买纱这么急的，连夜装货，早过了下班的辰光，方宇加班加点，栈务主任马得财加班加点，整个仓库的人都加班加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确实从来没有过。”张小玲听汤阿英讲的这些情形，也觉得奇怪。她问，“你想一想，那天夜里他们运走了多少件纱？”

管秀芬没等汤阿英开口，马上答道：

“我和阿英看了一会，就走了，不晓得他们运走了多少件纱。”

“你也走了？”张小玲问汤阿英。

汤阿英点点头。张小玲惋惜地说：

“要是晓得运走多少就更好了……”

“当天晚上回家，我老想着这件事；第二天到厂里上工，特地去仓库看了一下，啊哟，一夜工夫，整个仓库都搬空了！”

管秀芬听汤阿英说的情形大吃了一惊，竟有这

样的事，她怎么不晓得呢！她十分钦佩汤阿英深入细致，看到一个问题就抓住不放；而她自己却有点粗枝大叶，那天晚上的事看过就算了，没有仔细去想，第二天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仓库看一看，惭愧地说：

“你不说，我还不晓得哩。”

“过去我听方宇说的那一套，以为是真的，听了秦妈妈和杨部长的讲话，我想徐义德在里面一定搞鬼，可是具体哪能搞鬼，我就不晓得了。”汤阿英抱歉的眼光对着张小玲，仿佛希望她原谅自己不能进一步提供具体的内容。

张小玲迅速记完汤阿英讲的检举材料，满意地放下了笔，兴奋地对汤阿英说：

“你检举的材料十分重要。你不晓得徐义德在这里面搞的啥鬼名堂，不要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一调查，一研究，多么复杂的问题也可以弄的清清爽爽。”又问道，“还有吗？”

汤阿英一口气又想了几条，最后，她问：

“别的车间的可以不可以检举？”

“当然可以检举。”张小玲举着手里的金星钢笔说，“检举不分车间，只要你晓得，哪个车间的事都可以检举。”

“那我还有哩。”

张小玲又给她一件件记上，五张纸写得满满的。

张小玲读了一遍给她听，问她有啥遗漏没有？她仔细想了想，没有了。张小玲要她在上面签个名，她说：

“我写的不好，你代我写上吧。”

“那不行，啥都可以代，唯独签字这桩事体不好代，要你自己来。”

管秀芬整理记录手有点累了，听张小玲回答汤阿英的话心里好笑，便放下钢笔，接上去说：

“还有吃饭不好代，别人代吃了，自己还是饿。大小便也不好代，别人大小便了，自己的肚子还是胀。不好代的事体可多哩。”

张小玲听管秀芬这几句话，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她挑剔自己说错了话，笑的是她讲的那两个比喻又具体又生动，驳也驳她不倒的。张小玲没有办法，只好说：

“你这张嘴啊，真不饶人！”

管秀芬走过来，隔着三张课桌，对张小玲作了一个揖，说：

“对不起，又碰了我们的小组长了。”

“你那张嘴就像把刀子，哪个你也要碰一碰。说起话来，总是出口伤人。”

“哎哟，不得了哪，”管秀芬把两只手合在一道，耸了耸肩，装出有些吃不消，惊慌地说，“那我以后不敢再讲话了，这回真要用封条把嘴封上。”

张小玲向管秀芬撇一撇嘴，脸上浮着不信任的微笑，慢吞吞地说：

“谁能封住你的嘴，那日头要从西边出来了。”

“那我就干脆不封了。阿英，你做证人，这是我们小组长讲的啊。”

“大家都羡慕你会说话，”汤阿英说，“别人想学也学不会哩。”

“你别跟她学，阿英，”张小玲向管秀芬看了一眼，把课桌上写好的那封检举信递给汤阿英，说，“你检举的材料很重要，快点送去吧。”

汤阿英拿着检举信飞快地到“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去了。张小玲坐到管秀芬那里去，看她整理会议的记录，准备待一会送到材料组叶月芳同志那里去。

24

徐义德见严志发走进厂长办公室，慌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弯着腰，笑嘻嘻地欢迎道：

“严同志，请里面坐。”

他的肥胖的左手向咖啡色的皮沙发上一指。他下巴那儿垂下来的肉却有些颤抖。他一见了严志发，

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严志发是纱厂工人，对纱厂内行，讲话一句是一句，一点儿不含糊，也不讲情面。他像是一块钢铁，徐义德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可以活动的空隙。看上去，严志发在“五反”检查队里担任的工作蛮重要，许多场合都看到他。昨天他和余静她们一道来，徐义德找不到机会给他拉拉知己。今天严志发一个人走进来，不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吗？徐义德小心翼翼地抓住这个机会，请严志发坐到沙发里。

徐义德没有叫工友，也没有叫梅佐贤，他亲自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送到严志发的面前：

“严同志，你们实在太辛苦了，喝点茶。”

严志发见徐义德这样低声下气的态度，忽然恭恭敬敬地送过一杯茶来，兀自吃了一惊。他身子往皮沙发上不自主地一靠，很严肃地直摇右手：

“我不渴，我不渴。”

徐义德轻松地笑了笑：

“烟茶不分家，喝点茶，没有关系。”

徐义德本想把那杯茶推送过去，见严志发惊慌的神情，怕把事情弄炸了，就没有动。

严志发不愿意靠近徐义德，仿佛怕徐义德身上啥脏东西会沾染到他的身上去。他向长沙发的上面移去，抬起眼睛盯着徐义德，防备他还有啥花样经。

徐义德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动。他的眼光虽然对着长方形矮桌子上面的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可是暗中时不时觑严志发一眼。

他们两个人相互注视着，谁也不言语。半晌，还是徐义德先开口：

“严同志，有啥指教吗？”

“有啥指教，”严志发警惕的眼光从徐义德的身上移过去。他解开深灰布人民装的右边口袋，从里面掏出三张折叠好的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来，把它打开，弄平，送到徐义德的面前，说：

“你不是对杨队长说：一定要交代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的关怀吗？”

徐义德心头一愣：他竟想不起在啥地方说过这样的话了，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说过这样的话。他轻轻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要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我要坦白。”

“那很好，你现在就坦白吧。”

徐义德感到愕然：他摸不清严志发是要他当面把坦白的材料写出来呢，还是写好了以后送去。他试探地说：

“我一定坦白……”徐义德有意不说完，而且把这句的尾音拉长，等候严志发接上来说。

严志发很简单地说：“那你写吧。”

“是现在写呢，还是等我写好了再送给严同志？”徐义德等了一会儿，说，“材料倒有一些，一时恐怕写不完。”

“写好了送来吧。”

“那再好也没有了。严同志办事真精明。”徐义德笑眯眯地望着严志发，说，“你看，哪能写法？”

“这个，”严志发顿时想起杨部长刚才对他说的话：你现在到徐义德那里去一趟，送几张纸给他，要他写坦白书。他目前不会老老实实坦白的，不必限他的日期，让他写好了再送来。这必然会引起他内心的斗争，他不了解我们掌握他多少材料。他当然希望能够蒙混过去。他不写点真实材料出来，又怕蒙混不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摸我们的底。你去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摸底。你可不能漏一句半句话出去。这种人，你眉毛一动，他就知道你肚里要说的话了，可刁哩。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多说，他就无计可施了。杨部长的估计，果然不错。严志发说：“哪能写法，你自己晓得。”

“对，对。哪能写法，我自己当然晓得。”徐义德暗中瞟了一眼。他并不灰心，又试探道，“不过，严同志能够指教指教，我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是不是，严同志。”

“你老老实实把五毒不法行为写出来就行哪。”

徐义德一听这口气好像有了一点苗头，他拿起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向严志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茶。他自己的身子倾向严志发那边去，小声地问：

“你看从啥地方写好呢？严同志，我们厂里没啥严重的五毒行为。我领导这个厂真是官僚主义浑淘淘，许多事体我也不晓得。偷工减料这方面，我想，可能是有的。别的方面，就很难说……”

徐义德说到这里，暗中注视严志发的表情。严志发霍的站了起来，对他不客气地说：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怎么坦白，你自己晓得。我不会告诉你的。”

严志发径自向门口走去。跨出厂长办公室的门，他向徐义德留下了一句话：

“你的坦白书啥辰光写好，就啥辰光送来。”

徐义德讨了个没趣。他也站了起来，过去把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接着把刚才倒给严志发的茶一口喝得干干净净，好像把怨气吞下去似的。他躺到沙发上，慢慢平静下来。

他的头靠在沙发背上，正对着粉刷得雪白的天花板。他自言自语地说：

“坦白？我徐义德有啥好坦白的？将本求利，凭本事赚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吗？愿者

上钩，怪不了徐义德。办厂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亏本。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钱赚多了就错了吗？就犯法了吗？不法行为？五毒？哼！”

徐义德忽然感到身旁有一个人，数说他的五毒行为，什么套汇呀，什么偷税漏税呀，什么偷工减料呀……徐义德怵目惊心，没法否认。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认为即使有错，也可以原谅：

“好，就算要坦白吧，我徐义德已经坦白过了。市的棉纺公会送了一份，市工商联送了一份，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商组也亲自送去一份，区增产节约委员会里，当然也送了一份去。用打字机打的，完全一样，多送一份两份没啥关系，反正有的是。已经送了这么多的坦白书还不够吗？一定还要坦白？也好，那把过去的坦白书再抄一份就是了。”

徐义德的眼光望着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口袋，想起那份坦白书的原稿没有带在身边，留在家里了。他准备明天带来抄好送给杨部长。不，不能越级，要送给严志发。但也不能把杨部长放在一边，决定沪江纱厂问题的到底是杨部长而不是严志发。他想了一个妙法，写严志发同志转呈杨部长。这样面面俱到，万无一失了。

“已经交过了坦白书，为啥还要写呢？过去写的

不算吗？过去坦白不彻底？唉，这就很难了。啥叫做彻底呢？坦白一件，不彻底；坦白十件，不彻底；坦白一百件，还是一个不彻底。一件也不坦白，倒反而彻底了。最好一件也不坦白，不然的话，坦白没有一个完。”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徐义德想起刚才严志发对他说的这句话。“你们也晓得，那很好，按照我的五毒不法行为定罪好了，何必要我坦白呢？朱延年说得对，政府既然知道我们资产阶级的五毒罪行，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全市职工检举了三十多万份材料，那宣判就行了，为啥还要资本家坦白呢？要资本家自己检举自己，提供材料好定罪。”

杨健在会客室里对徐义德讲的话有力地在他的耳朵里回响着：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那才是天下的大笑话。共产党讲的，总是好听的，不坦白，你不晓得我的材料，你要从严也无从严起。坦白了，有了材料，有了证据，倒反而会从宽？三岁娃娃也不会相信。坦白了好定罪，没收财产。房子没有了，住在啥地方去？另外租一幢花园洋房或者公寓房子？没钱。弄堂房子？又脏又闹，哪能住得下？黑色大型林肯牌汽车没有了，出门坐啥车

子？祥生汽车，太寒伦。人家一看到那刺眼的粉绿颜色，就晓得是营业车子。偶尔坐一下，人家不晓得倒也无所谓。长了，人家必然会看到，一定要说：“徐义德也落架了，坐在一辆祥生汽车里。还有，三个老婆谁赡养呢？守仁的开销呢？有些可以预先藏起来，这倒是一个办法。”

他想到这里，眼光正好望见办公室右边那块墙壁。墙壁是新粉刷的，还没有完全干燥，隐隐看得出是补上去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石灰气味。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走到墙壁那儿去，弯着腰，一边用手指轻轻敲着墙壁，回音是坚实的，取出里面私藏的二千两金子以后，都填满了砖头。他叹息地说：

“足足二千两金子，完了！放在墙壁里都不可靠，放在别的地方可靠吗？现在看来，一切的地方都不可靠。最可靠是不坦白，政府没法定罪，没法没收财产。抗拒从严吗？顶多送进提篮桥。”徐义德的右手立刻放到人民装的口袋里，那把绿色的透明的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先施牙膏还在，撇一撇嘴说道，“进提篮桥吗？早准备好了。”

他的眼光对着早一会严志发坐过的长沙发上，喃喃地说：

“想我坦白吗？我徐义德不上那个当！”

25

戚宝珍今天睡了午觉，起来感到精神很好，看到屋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便兴致勃勃地动手整理了。她首先把杨健的衬衣短裤和珍珍的小衣小裤拿到卫生间里，在浴缸里放了水，给泡上；转过身来，又把桌子上的什物摆齐，铺好床，扫了地，就到卫生间去洗衣服。她弯着腰洗，因为很久没有做事，劳动给她带来了愉快，不洗完，手简直停不下来。等她把衣服晒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她额头上飞舞着金星，整个房间在她面前旋转，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着，仿佛大地在动荡，哪能也站不稳。她扶着床，一步步好不容易走到床边，仰身往床上一倒，紧闭着眼睛，房间里静静地，只听见胸口怦怦地激烈跳动，十分闷塞。她勉强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枕头，稍为好一点，可是呼吸还是不顺畅。

过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睁开眼睛，看到整洁的房间和卫生间晒的衣服，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今天总算打扫了房间又洗了衣服，这是她好久想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也是这

样的事叫她气恼：为啥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就感到那样吃不消呢？要是在过去，别说这点事，就是再多一些活也不打紧。现在哪能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相信自己的体力坏到这个程度，伸手到枕边拿过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面孔照过来又照过去，好像在追寻失去了青春的体力。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的清楚，分析的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决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罗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

人想法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都挟了许多书，放在他面前，低头在看书，在写笔记，没有注意她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离开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组织上调动大批干部支援上海，杨健一到了上海，分配在长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不久，戚宝珍带着珍

珍也到了上海，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文教科担任副科长职务。同时还在沪江纱厂夜校里兼一点课。开头一年多，她工作非常努力，从清早忙到深夜也不感到疲倦。在解放区积累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她研究怎样在区里运用，有时还挤出时间给区里小学教员做报告。自从发现自己有心脏扩大症，精力就不如从前了，开始并不服输，一次又一次躺下，不得不叫她徒唤奈何了……

过去这些事在她脑海里涌起，非常新鲜，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点点家务事，身子竟支持不住。从那面小小的圆镜子里看，自己的容颜并未消瘦，眼角上也没有长起扇形的皱纹，从表面上看，还是年青有为不减当年，她生气地把镜子往床头一放，怨恨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个鬼身子！”

叶月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劈口问她：

“你骂啥人？”

她没有注意有人来，突然听到人声，兀自吃了一惊。她侧过头去看，见是叶月芳，想起床招呼，立刻给叶月芳按住了。叶月芳坐在床边，对她说：

“你躺着好了……”

沪江厂的“五反”工作热烈展开，杨健一连几天

抽不出时间回家。他嘴上不提，叶月芳心里知道的。今天叶月芳到区里来有事，杨健对她说：办完事，有空，到他家去一趟看看。

她见了叶月芳，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个人老是蹲在房间里，总希望见到一些朋友，等到朋友来了，又觉得不如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她以为区文教科叫叶月芳来的，不等她讲下去，抢先说道：

“唉，今天睡了午觉，起来精神好些，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又倒下了。”她的眼光望着叶月芳，那意思说：别看我躺在床上好好的，我的身子可是不行呀！

叶月芳没有留意她的眼光，不假思索地说：

“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养，一个人蹲在家里哪能工作，我劝你还是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时期才好……”

她每次见到人，总怕别人误会她蹲在家里好吃懒做，暗中说明自己的病，但听叶月芳的口气，完全了解她最近的健康情况。她就不详细说下去，改了口：

“厂里正在‘五反’，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哪能闲得住？”

“这个心情，我是了解的。”叶月芳的两个腮帮子上浮着两个小小的酒窝，同情地说，“我一闲下来，就觉得闷的慌，一天不做许多工作，就仿佛一天白过去

一样，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你说的是呀，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实讲，见到你们生龙活虎般工作，我心里就静不下来。好几个月没上班了，在家里也不能给杨健一点帮助。”

“杨部长晓得你在家闷的慌，特地叫我来看看你。这两天厂里忙……”

“厂里‘五反’进行的哪能？”

“‘五反’吗？”叶月芳怕讲起厂里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会妨碍她休息，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为啥不肯告诉我？”

“你还是好好休息，别操这份心了。”

“你告诉我，我不操心就是了。”

叶月芳简单地告诉她最近“五反”的情况，她顿时兴奋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焦急地问：

“徐义德这么顽强？”

“资本家不会痛痛快快地坦白的。”

“让他这样纠缠下去吗？”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徐义德就孤立了。”

“你这个意见很对！”她钦佩地望着叶月芳。

“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杨部长的。”

“哦。”她没有再赞扬，改口说，“夜校的人都参加‘五反’了吗？”

“当然都参加了。”

“只有我这个病号蹲在家里。”她的手按着胸口，内疚地说。

“杨部长常常想念你，觉得他不能多照顾你，心里老过意不去……”

“让他忙吧。我这个病号不能工作，还能妨碍他工作吗？叫他安心在厂里工作，别挂念家里。告诉他我很好，别说我又躺下。”叶月芳感到有点为难：她怎么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杨部长？但又不好违背病人的嘱咐。她未置可否地“唔”了一声。戚宝珍接着说：

“你以后也别来看我，影响你的工作。”

“来看你，也是我的工作。”

“不，你别听杨健的话。”

“不单是杨部长，夜校里的人都关心你，余静同志也常常想你。本来余静同志今天要同我一道来看你，给余大妈找回去了。明天是清明，她们准备到龙华上坟去。”

她望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果然上面有四个老宋字：“明日清明”。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提起，我到忘记了。国强过世快三年了。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和杨健常常谈起他，以为进上海一定能够见到他。谁晓得永远见不到呢！他牺牲得很英

勇，照道理我也应该和余静一道去上坟，只是这个身体……”

“等明年清明再说吧。”

“唉，这个病啥事体也做不了。你告诉余静，别关心我。也在厂里够忙了，别来看我。你，忙你的工作，也别来看我。”

“再忙些，我也应该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休养，不要急。组织上决定你休养，这就是你的任务。等休养好了，要做的工作多着哩。”

“这个道理我懂。我也劝过别的同志，可是临到自己头上，老是想不开……”

“这道理你当然懂，那你就休息休息吧。闭着眼睛睡一会，好不好？”叶月芳像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

她讲了半天话，确实有点累了，上眼皮搭拉下来，慢慢地睡着了。叶月芳看到卫生间的衣服，她走过去，悄悄地拿到院子里去晒。

26

一辆三轮车从衡山路那边向谨记路踏来，坐在车上的余大妈望着两边的田野心里豁然开朗了，对

她身旁的女儿说：

“一眼望这么远，心里开阔，人也舒服哪。”

“可不是，你整天闷在屋子里，眼光看不到两丈远。”余静深深吸了一口田野的空气，说，“这里空气多新鲜。你常出来走走，不要老是呆在家里。”

“你说的倒好，家里没人，哪能走的开？”

“那也是的，”余静想出了一个主意，说，“厂礼拜我呆在家里，你带小强出来走走。”

“这个……”

余大妈一句话没说完，坐在她怀里的小强转过身来，渴求地望着她：

“带我出来白相，婆婆。”

“唔，坐好了，别动，小心摔下去。”余大妈紧紧抱着他。

他贪婪地东张西望，在他眼前出现的事物，都感到新奇。外边实在比家里好白相的多了，家里老是那间小房子，小房子里老是那几样物件，别的啥也没有。他顺着眼前的绿油油的一畦一畦的菜地望过去，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房屋，在一片黑瓦和红瓦的后面，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赭色的宝塔，给它背后的蓝色的天空一衬，再加上一块一块的白云缓缓飘过，越发令人注目。他举起小手，指着天空，歪过小脑袋，对婆婆说：

“你看，……”

余大妈眼光随着他的小手指看过去，有意问他：

“这是啥？”

“这是……这是……”他不知道它叫啥名字，小脸上泛着羞涩的红晕，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你告诉我……”

“宝塔，有名的龙华宝塔，站在上面，全上海都看的见……”

“啊！”他鼓起眼睛，婆婆最后一句话对他非常有诱惑力，上海有多大呢？他从来不知道：全上海是个啥样子呢？他也不知道。他想跑到塔上去看看，一定很好白相。

三轮车经过从前的伪龙华警备司令部，转过弯去，到了龙华塔下。小强拉着婆婆的手，要求道：

“带我上去白相！”

“现在没工夫……”

他嘟着小嘴，说：“不，我要……我要……”

余静劝他：“听大人的话，以后带你来……”

他的一对小眼睛对着宝塔一层一层望上去，一直望到塔顶，要是上去了，人就像站在天上一样，多好白相呀！他的脚情不自禁地踏着三轮车的脚踏板。车夫以为是大人踏的，他停下车来，问：

“下车吗？”

“不下来，”余静说，“走吧。”

三轮车向前面踏去，龙华古塔留在车子后面去了。小强转过身去，对着高耸入云的赭色的宝塔呜呜地哭了起来。余大妈用手绢给他拭了拭眼泪，哄他道：

“你看，你看，这是啥？”

他转过去，看婆婆指的右边。龙华寺赭色墙壁旁边有一座古老的牌楼，经过历年的风吹雨打，朱红的柱子已经变成紫黑色了，许多地方的油漆剥脱下来，露出灰色的粉底和黝黑的木料。通过这座牌楼，向里面望去，却是另外一个世界：一片绿茵茵的草地的边缘一排蝴蝶花，蓝的，紫的，杏黄的和粉红的花瓣像真的蝴蝶一样，仿佛在那里展开翅膀飞翔。在这些蝴蝶上面，如同一片熊熊的火焰似的，是龙华著名的桃林，娇艳的桃花给四月早晨的阳光一照，显得特别妩媚，像是少女含羞欲笑的红润润的脸庞，逗人喜爱。

小强看着那片红红绿绿的花草也觉得新奇，尤其是那耀眼的桃花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不哭了，眼泪干了，嘻着小嘴傻笑。慢慢，宝塔的印象淡漠了，他的眼光对着前方。

一条广阔的煤渣路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尾端和天空连接起来了。煤渣路两边是辽阔无边的田野，一片新绿，上面好像浇了一层油似的发着亮光。路上

的人不多，大半手里都拎着提盘，腰间扎着白布腰带，迈着迟缓的步子，向着同一方向走去。

龙华公墓埋葬的大部分是解放上海英勇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上海解放以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忠贞的革命烈士。许多坟还没有修好，只是靠马路这边的坟修好了，雪白的墓碑肃穆地对着雪白的墓碑，矮矮的松树静静地靠着矮矮的松树，一个一个墓穴用长方形的白石板垒起，默默地躺在蓝色的天空下。一片黄沙在半空中卷来，这是咖啡色的鸫，形成一条曲线，飞过宁静的墓地。

余静她们三个人顺着墓道向里面走去，那边是一片新坟，一堆一堆隆起的黄土整齐地散布在平地上，有的坟前残留着纸钱的余烬，给风一吹，轻轻的飘起，银灰色蝴蝶似的浮荡在空中，慢慢飞去，渐渐消逝在远方。

余静走到一座长满了青草的坟前站了下来，一个熟稔的面影立刻闪动在她的眼前，亲切而又刚毅的声音在她耳际萦绕。她像是一尊玉石雕塑的女像静静地立在那里，啥闲话也讲不出来，也不知道来了要做些啥。她的眼睛忽然给蒙上一层翳，饱满的泪水遮住她的视线，面前那长满了青草的坟墓模糊起来了。她竭力忍住泪水。

昨天夜里余静躺到床上已经快一点钟了。今天

是清明，大家吃了点水泡饭，收拾收拾，雇了一辆三轮，到龙华公墓来。袁国强虽然离开她快三年了，她总以为是昨天的事。一个人独自从厂里回来，孤寂地在家，她就常常想到他了。他也在这个辰光悄悄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像往常一样，和她低低地谈论着厂里的事，展望上海解放以后的幸福的生活。刚才她坐在车上，紧紧闭着嘴，不大言语，心里在想念着他。她一步步走近长满青草的坟边，透过青草和泥土，好像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他躺在那里。看着，看着，她的眉头紧皱，眼泪就忍不住从腮帮子上流下来了。

余大妈见她兀自站在那里不动，等了一会，还没动静，便歪过头去，觑了她一眼，看到她脸上晶莹的泪水，有意装做不知道。小强站在坟面前，歪过小脑袋瓜子，望着婆婆。余大妈点点头。他知道现在该行礼了。他对着坟头行了三鞠躬的礼，婆婆在他身后说：

“还有这边哩。”

他又向左上侧陪祭的祖先位置鞠了躬。余静过去行礼，余大妈在她旁边呜呜咽咽地哭了。

余大妈没有儿子，丈夫是拉橡皮塌车的，“八·一三”事变那年死在闸北的炮火下。她一个人帮人家做活，饥一顿饱一顿的，把余静抚养长大，余静进了沪江纱厂，家里才勉强够糊口。余静和袁国强结了

婚，日子算是安定下来了。袁国强的家在无锡，平常就住在余大妈家里。她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刚才余静的眼泪就勾引起她的悲伤。怕余静伤心，她忍住了。现在看到余静扎着宽大白布腰带的背影，小强戴着白帽子，两手下垂，年纪虽小，也懂事地站在侧面，一声不响。对着那年青的寡妇和八岁的孤儿，她一阵心酸，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哭了，有条有理地诉说着：

“国强呀，你去了，我们是怎么想你啊。开饭的辰光，你不在；出去的辰光，看不到你的影子；阿静放工的时候，也看不见你同她一道回来。阿静想你，小强想你，到处找爸爸，大家都想你。你晓得啵。国强。你活着的辰光，啥人不喜欢你？啥人不说你好？你年青，你办事认真，你走路笔挺，……你在家孝父母，出外爱朋友，啥人有困难，找到你，你都相帮人家，……你一天忙到晚，从不想到你自己……庆祥纱厂上上下下几千人，没一个人说你的坏话。弄堂里的邻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你……只有反动派不喜欢你，恨你，把你抓去，活活的埋了你……你苦了半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从早到晚都是为人忙……好日子快来的辰光，你就去了……你把我们三个人丢下，叫我们想死了你，叫我们恨死了反动派……”

她越哭越有劲，声音也越喊越高，到后来有些儿嘶哑了。余静站在一旁，低着冰，暗暗地流泪。小强望着她们俩人发呆，一个大哭，一个流泪。他不知道怎么是好了。他睁着小眼睛向四面望望；别的坟上也有人在哭，有的呜咽地低泣，有的嚎啕地痛哭，有的一声不响地在流泪，门口那边有好几个人站着，可是谁也不来帮个忙。他没有办法，就走到婆婆面前，叫道：

“婆婆，婆婆……”

婆婆没有答应。他拉婆婆的手，用哀求的语调说：

“婆婆，婆婆，你别哭……”

婆婆还是哭。他去找妈妈。妈妈鼻子一抽一抽的，眼泪簌簌往下流。他叫了一声：

“妈妈，你劝婆婆……”

余静站在那里纹风不动，头低下来，眼睛对着她身上的白布腰带，擤了一把鼻涕，鼻子又一抽一抽的了。他叫婆婆，婆婆不应，叫妈妈，妈妈不响。他有点怕妈妈，不敢再叫下去。他靠到婆婆身边，大声叫道：

“婆婆……”

婆婆仍然不做声。他没有办法，也放声哇哇地哭开了。余大妈拭了拭眼泪，摸着他的白帽子，反而劝

解他了：

“小强，不要哭……”

他真的不哭了，抬头望着她。

余大妈对坟说：

“你去了，我们天天想你，你晓得啵？……小强今年八岁了，长得很结实，也常常想你……家中生活比过去好了，你不要惦记……你在阴间要保佑我们……”

余静跟随余大妈在坟地走了一圈。她站在坟前，出神地望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不忍离去。小强怕她又要哭，拉着她的白布腰带说：

“走啦，妈……”

她给他拉走，快走出墓道，从一片雪白的墓碑上头望过去，又凝视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她心里想：今年无论如何要挤点钱出来，把坟修理修理，种点松树，立块墓碑。

她们缓缓地走出了龙华公墓，跳上了三轮车。余静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眼光对着公墓里面那个长满了青草坟头的方向望了又望，依依不舍。

她们三个人坐在三轮车上谁也不言语，经过龙华塔，小强歪过头去，叫了声“婆婆”。婆婆懂得他的心思，没等余静开口，她说：

“你妈要到厂里去有事，下次带你来。”

他留恋地望着云端里的塔尖。

余大妈瞅见余静皱着眉头，像是有一肚子永远说不完的心事。袁国强过世快三年了，余静经常提到他，刚才上了坟，更是忘不了他。她想：人已经去世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余静还很年青，就带着小强这孩子守一辈子寡吗？她想劝余静早点找个对象，可是看到她满脸悲伤的神情，又不好开口，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对三轮车夫说：

“踏快点！”

三轮车在平坦的衡山路上飞一般地踏过去。

27

“还是替我搬到楼下来好。”杨健幽默地对余静说，“不要孤立我。”

“你住在楼上清静些，对工作也没啥不方便。”余静希望他不要搬动。

“五反”检查队队员住在工会办公室斜对面的两间空房子，原来是沪江纱厂工人夜校的教室，他们来了以后特地腾出来的。那里靠着仓库和托儿所很近，白天和夜晚都很吵闹，余静就给杨建设法在楼上职

员宿舍里找到了一小间房，光线好，环境安静，只是离队员远了些。昨天晚上余静领杨健去，他当时就不肯住下，硬要搬到工人夜校的教室里来。余静跟他说教室里没有空。杨健说他有办法挤，真正不行，他还可以睡地铺。余静没有话说，她推托当时没人搬，队员们都睡了，搬过去会吵醒他们，不如先睡一夜，明天再搬。余静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楼上睡下去，怕他搬下来睡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料不到她今天从龙华公墓赶到厂里，一碰见杨健，他就给她提起这桩事。

“我欢喜和大家住在一道，有事随时好商量。空闲下来，也可以了解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一个人住在楼上有点特殊，也有点寂寞，还是让我和大家住在一道吧。”

“对面教室闹得很。”

“但是可以和同志们接近，就是工人同志有事来找我也方便些。你要是不给我搬，我把铺盖一卷，自己就掬到下面来了。”杨健双手往肩上一放，好像自己真的把铺盖搬下来。

余静拗不过他，无可奈何地说：

“好，好好，今天一定给你搬下来。”

“让我先谢谢你。”

“那倒用不着，”余静叹了一口气，说，“我怕你睡不好啊。”

她还是放心不下杨健的健康。她知道杨健的身体并不好，近来领导“五反”检查队的工作，比过去在区委统战部里显得消瘦一些。她深知杨健的性格，可能办不成功的事，一定不先讲；凡是她讲的事，一定要办成功。她不再言语，走出工会办公室（现在也是“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给他去安排。

当余静和杨健谈话的时候，钟珮文走过去要向杨健报告，半路上叫叶月芳摇手阻止了。叶月芳希望余静能说服杨健睡在楼上，这对杨健的身体健康会有帮助。余静一出门，钟珮文就连忙走进去，把手里的几十份检举材料放在杨健面前，说：

“这两天又收到许多检举信，第五百八十六号到五百九十四号是细纱间汤阿英她们的检举材料……”

杨健一边看着登记的目录，一边翻阅着工人们写的检举信，正好翻到汤阿英写的那封，他从头仔细看下去，看到前年六月底沪江纱厂忽然运出许多件纱，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引起他特别注意，他看完了，又从头看了第二遍，盯着手里那份材料，陷入沉思里去了。

钟珮文屏住呼吸，觉得杨健一定发现啥重大问题，他想了解，在等待杨健指示，材料联络组好进一步进行工作。半晌，杨健的充满了智慧的眼光从汤阿

英的检举信上移开，慢慢转到靠里面墙角落那张桌子旁边的叶月芳身上，注视着她的圆圆的脸庞，低声问道：

“小叶，你记得前年六月底有啥重大事件发生吗？”

叶月芳这个活字典，皱起眉头一想，肯定地说：

“前年六月底区里没啥重大事件，我们部里也没啥重大事件。”

“七月一号呢？”

“党的诞生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叶月芳记的丝毫不错。

“这个我晓得。”杨健摇摇头，料想叶月芳误会他问的意思，解释道，“我是说，七月一日在我们这里，或者市里有啥重大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关于工商界的事体……”

叶月芳歪过头去，回忆了一下，立即说道：

“前年七月一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宣布全市加税，这是市里和区里的重大事体，你传达市税务局通知时，不是说要全体干部注意保守秘密，不要泄露出去吗？”

“对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确实是桩重大事体。”杨健会意地点点头，他又赞赏地望了一下汤阿英那封检举信，感到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汤阿

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从表面现象里发现重大的问题，眼光十分尖锐，看问题真是入木三分。他兴奋地问钟珮文：

“还有人检举徐义德六月底赶运棉纱的材料吗？”

钟珮文见杨健对汤阿英的检举信那么重视，有点像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听杨健查问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起初还是莫名其妙，等到叶月芳说出七月一日加税的事，他心中有些数目了。他看到汤阿英那封检举信，也认为重要，但没有像杨健那样重视，更没有杨健那样仔细查问前年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暗暗感到自己看材料没有杨健细致，内心有点惭愧。幸好他注意把有关问题的检举材料归纳在一起，经杨健一问，他不慌不忙答道：

“有，仓库的栈务主任马得财检举了赶运棉纱的材料；细纱间记录工管秀芬也检举了这桩事体，别的车间也有检举的，还有……”

杨健看钟珮文没有说下去，便追问：

“还有谁写了？”

“我也写了一点，”钟珮文脸上显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一则不愿提到自己，二则他写晚了，但主要的是他写的没有汤阿英那么明确，更没有汤阿英看的那么严重。他微微低着头，小声地说，“在别人写的

这方面的检举材料后面，作为附件，抄了个目录，放在汤阿英的检举信的后面。”

“你也看到这个问题，很不错啊。”

“我没有汤阿英看的透彻，提的严重。”

“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汤阿英看的对。这封检举信给我们工作队的帮助很大。”杨健转脸去，对叶月芳说，“方宇过去在这里没有交代这方面的问题，你今天到区里去一趟，看他最近交代这个问题没有！把方宇的问题进一步搞彻底，对沪江厂的‘五反’检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先把新收到材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去。”

“好的。”杨健转过来，对钟珮文说，“汤阿英写的这个检举材料，要作为一个专题立案，有关的检举材料都放在一个卷宗里，好综合研究，进一步发现问题。”

“我也这么想……”

“那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钟珮文站在杨健旁边，指着五百九十五号到一百零七号说：

“这都是打包间检举的……”

“日期、地点都有了，连数量也写得很清楚。”杨健对着那一张张大小不同的纸头上所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发生特别大的兴趣：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发

动起来以后的热情，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的力量，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徐义德的不法行为，也从那些字里他预见到沪江纱厂五反运动胜利的光辉。他的嘴角上浮着笑纹。

“工人检举材料有个特点，”叶月芳坐在紧靠里面墙角落那张桌子说，“明确，具体，一点也不含糊其词。”

“你已经从五六百份的检举材料中总结出经验来了。”

叶月芳给杨健一讲，羞答答地低下头去，小声问了一句：

“不对吗？”

“你说的对，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特点。”

钟珮文望着登记目录，心里很高兴，在短短的几天中就收到这些检举材料。他还有些不满足，微微皱起眉头，说：

“这都是工人同志检举的材料，高级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一份具体材料也没有。有两份，都是空空洞洞的。”

“你有点儿着急了吗？”杨健笑着问钟珮文，然后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不用着急，高级职员是要慢一步的，技术人员更要慢一步，但是他们会提供材料的，而且会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解决一个单位的

‘五反’问题，工程师和会计师这些人提供材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堡垒里面的重要成员。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还没有正确认识以前，他们是不会说真话的。我倒不希望马上就收到那些不痛不痒的检举材料。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有用的材料。”

“我有点性急，是吧？杨部长。”

“你的性子不慢。”杨健笑着说，“听说你准备写个‘五反’的剧本，是不是？”

钟珮文顿时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红着脸，说：“没有这回事，他们乱说。”

“真有这回事，你给我说过。你还想写多幕剧哩。”叶月芳说，“现在不好意思承认了，看你脸红的！”

“那是说着玩的。”钟珮文给叶月芳一点破，不好再否认，对叶月芳暗中指指杨部长，摇摇手。他说，“不是真的。”

杨健不但从叶月芳那里知道钟珮文要写剧本，而且从余静那里就知道沪江纱厂工会里有一位工人作家，叫做钟珮文。杨健说：

“创作也不是丢脸的事，为啥脸红呢？”

钟珮文捂着脸否认道：

“我没有。”

“文艺工作是我们党的工作一部分。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发表了讲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放后创作太少，尤其是真正反映工人生活的有力作品太少。”

“那是的，”钟珮文脸上的红晕消逝了，转过身子，恢复了平静，说，“工人同志们常说没有文艺作品看。”

“这需要大家来创作。你做过工，现在又是在纱厂里脱产搞工会工作，文化水平不低，条件是很好的。我听说你准备写个‘五反’剧本，我心里非常高兴。五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深刻的阶级斗争，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对民族资产阶级斗争，但是技术人员也是一个方面。你那个剧本里，我觉得技术人员不可少……”

钟珮文不再隐瞒要写剧本这个事实了，说：

“可是现在技术人员的材料最少……”

“从文艺创作要求来看，现在技术人员的材料已经不少了。他们不是没有检举吗？他们不是还在观望吗？他们不是顾虑重重吗？这是必然的过程，这是他们发展的过程，剧本里很需要写。‘五反’检查队一来，技术人员马上就站稳立场，那是不现实的。”

“杨部长分析得很内行。”

叶月芳说：“他当然内行，小钟，你还不晓得杨部长是个诗人哩。他休息的辰光，总爱拿本文艺书

看。”

“杨部长你帮我写剧本好不好？”钟珮文现在不隐瞒他的愿望了，进一步提出了要求，说，“我不会写剧本，其实我想写个活报，配合五反运动。工人同志们老问我要剧本演，常常找不到适合的剧本。我这个工会文教委员推御不了责任，就大胆试试看。”

“我确实搞过文艺工作，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大学里读的就是中文系，但早就放弃当一个诗人的愿望。不过我现在对文艺仍然还有些兴趣。如果能够帮助你，我当然是很愿意的。”

“我就怕写不好……”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有了生活，慢慢总可以写好的。你现在是工会文教委员，‘五反’检查队的材料联络组的组长，从‘五反’工作上看，你需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你也需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这真是公私兼顾。”

“我这个私可不是资本家的私。”钟珮文笑着声明。

“那当然，”杨健也笑了，说，“否则，我就要带着‘五反’检查队到你家去了。”

叮当，叮当……一个工人摇着铃从“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前面走过去。

杨健把检举材料交还给钟珮文，说：

“锁起来，吃完饭再看。”

钟珮文接过去，收拾好桌子上东西，他和叶月芳准备到饭厅去吃饭。杨健跟着也走过来，到门口那儿，正好遇到余静。她拦住杨健的去路，说：

“你的饭，我已经叫他们打到这里来吃，你别到饭厅去吃了。”

“为啥？”杨健站在门口愣住了。

“饭厅太杂乱。”余静因为他身体不好，打来吃，加菜方便些。但是余静没有讲出来。

“怕啥？”

“人多！”余静还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意思来。

“人多，不好吃饭吗？”杨健猜出她心中的意思，说：“别人能去，我为啥不能去？我不能脱离群众，我喜欢和工人同志一道吃饭，同时还可以向工人同志学习，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

余静细心的安排受到杨健的拒绝，而且拒绝的很有道理，但她心中还是有点怏怏不乐，不过尽量不让它表露出来，只是说：

“那么，随你吧。”

“谢谢你的好意。”

杨健和余静一同走进饭厅，黑压压一片人头在攒动，有的桌子已经坐满了人在吃饭，有的桌子上人还不齐，有许多人跑到当中主席台那边去（这里既是

饭厅又是会场)，看今天刚出版的“五反”墙报。每张桌子上放着三碗菜和一碗汤，菜饭的香味在空中飘浮着。

靠着饭厅门口那边有一张桌子，才坐下六个人，杨健问余静：可以坐吗？余静告诉他哪一张桌子都可以坐，只要有空位就行。杨健坐下去，余静刚要给她们介绍，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杨队长，我们认得你。”

“你们来了，大家心里非常痛快，”管秀芬说，“我们欢迎你们来，鼓掌都把手鼓痛哪。”

董素娟端着饭碗正要去装饭，看见大家和杨健谈，她就站下来说：

“大家高兴得把帽子扔得高高的，我也扔了，掉下来差一点飘到别人的手里去。”

“大家从来没有那样痛快过，见了你们，我们勇气比过去更足了，劲头也更大。”

这是汤阿英的声音。余静把大家介绍给杨健，最后介绍到汤阿英，杨健关心地问：

“早产以后，身体复原了吗？”

汤阿英奇怪地看了杨健一眼，觉得杨健啥事体都晓得，连她早产也知道，并且像一家人似的关心她。她感激地点点头，说：

“好了，谢谢杨队长。”

杨健看到大家都站在那里谈话不吃饭，附近桌子上的人也投过来关注和问候的眼光。他说：

“装饭吧，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

郭彩娣伸过手来拿了两个碗要去替杨健装饭，给杨健看见了，连忙拿过来说：

“我也有两只手，从来不要人装饭的。”

郭彩娣一番好意，却突然叫杨健把碗拿走了，她走下一步问道：

“嫌我的手不干净吗？”

“不是的。”杨健解释道，“我的手也不脏。我也会装饭。为啥自己不劳动，要让你装饭？”

“哦。”

郭彩娣不再勉强，杨健自己装了饭来，坐下和大家一道吃。他吃了两口，问：

“细纱间的情绪怎么样？”

“情绪可高哩，……”郭彩娣说。

没等郭彩娣说完，管秀芬接上去说：

“情绪高极哪。”

“大家整天在动脑筋，写检举材料，真有劲道。”

“每一个工人都是这样吗？”杨健问郭彩娣。

郭彩娣一愣，想了想，说：

“不能这么讲，也有少数人情绪不太高，你推他

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他就不动。整天只顾忙生产，忙完就走了。这些人的脑筋，不晓得是木头做的还是铁打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好像同他没有多大关系。”

杨健更正郭彩娣的意见，说：

“这不能怪他们。工人应该热心生产。他们对五反运动不够积极，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好，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还有缺点，群众发动的不普遍。”

汤阿英同意杨健的意见：

“我也感到群众发动的不普遍。我们青年团员也有责任，没有当好党的助手。”

“这责任不在你们青年团员，是我抓的不紧，因此还有一部分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杨健望着坐在他旁边的余静说，“开过大会，成立组织，诉苦运动要抓紧在各个车间，连续进行。群众工作要普遍，要深入，有时还要反复进行。当群众还没有亲身体会到运动和他自己的关系时，当然不会主动积极的。”

杨健讲到这里，郭彩娣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有个意见，好不好谈？”

“言论完全自由。你们有啥意见都可以谈。”杨健说。

“我们细纱间希望这次运动彻底胜利，解决生活难做问题，肃清徐义德的五毒罪行，问题不解决，我

们不放杨队长回去。”

“这个意见很正确。问题不解决，你们要我们回去，我们也不回去。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召开大会的辰光，陈市长早就指示了：要我们带着铺盖进厂，什么时候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才准带着铺盖出厂。”

陶阿毛手里端着一碗饭，站在杨健身后，留心地在听大家的谈话。他听杨健很有力量的话，便火上加油，插上来说：

“问题不解决，把徐义德梅佐贤关进提篮桥。”

杨健听了大吃一惊。他回过头去一看，见是陶阿毛，便对他说：

“要解决问题不一定要靠提篮桥……”

陶阿毛不等杨健说下去，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加了一句：

“资本家是蜡烛，不点不亮！”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根据‘五反’政策办事，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杨健很有信心地说。

“真的吗？”郭彩娣问杨健。

“当然真的。”杨健肯定地说。

“杨队长讲话不会假。”这是管秀芬的声音。

管秀芬、郭彩娣兴奋得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敲着碗，欢呼道：

“那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工人的劲头更足。”

杨健和余静回到“五反”办公室，大家都靠在沙发上和椅子上睡午觉了，只有叶月芳用右手托着下巴靠在办公桌上打瞌睡。她听见脚步声，警惕地抬起头来望望，又闭上了眼睛。杨健对余静说：

“你看，他们睡得多甜。”

“‘五反’以来，你们睡眠一定不够的。”

“大家一样。”杨健坐来说，“和工人同志多接近，可以多得到一些益处。今天郭彩娣她们的意见对工作就很有帮助。”

“她们有亲身体会，反映问题很具体，也很深刻。”

“午觉以后，我们要找老赵来讨论一下群众工作组的意见。细纱间的诉苦会先行一步，工人群众发动的就好一些，检举的材料也多些。我看这两天诉苦会要普遍召开。”

“我听说，有几个车间准备明天开。粗纱间吴二嫂那个小组已经谈开了，昨天晚上她们就诉苦了。”

“那很好。”杨健思索地说，“最好今天晚上先把张小玲那个小组的经验传达下去，明天白班下工以后各车间普遍召开就更有把握了。”

“你的意思是说，把张小玲的经验今天推广到各个车间去？”

“就是这个意思。典型先行一步，取得经验，现

在要普遍推开。”

杨健昨天从戚宝珍宿舍回来，熬到深夜两点钟才睡，现在感到有些疲乏了。他不禁打了一个哈欠。余静怕他再谈下去，就说：

“你也去困一歇吧。”

“也好，”杨健刚站起来，准备去困觉，立即想到今天下午余静约好韩云程工程师谈话，便又坐下去，说，“你忘记今天下午约人谈话了吗？”

“没有。我要和韩工程师谈话。”

“我们来研究一下怎样和他谈话。”

“你昨天夜里两点钟才睡，听说你今天一早就醒了。看你眼皮都有点睁不开，先困一歇再说吧。”

“事体没安排好，我也困不了觉。”

“我约韩工程师下午三点钟谈，现在才一点，你困个把钟点起来再谈也不迟。”

“不，现在他们都午睡了，”杨健指着沙发上和椅子上的人说，“我们谈起来清静些。现在谈，时间也充裕些。”

杨健接着问余静：

“你准备怎样和他谈呢？”

余静于是提出她准备好的意见……

28

闹钟指着三点。

韩云程工程师准时走进细少间的车间办公室。他在藏青条子呢西装外边穿了一件深蓝色阴丹士林布的工作服，左边口袋里装着一把皮套计算尺，它的铜头子显眼地露在外边；左边口袋里凸凸的，那是一本《棉纺织经营标准》。他摸不清今天余静找他谈谈有啥事体，心里有点恐惧。他猜想可能是关于重点试纺的问题。重点试纺的成功完全证明过去生活难做的原因是由于配棉问题，这一点，他心中是雪亮的。当余静她们拿着管纱到试验室来，他感到突然，也估计到这是必然的事。当时，他没敢说出真实的原因，怕得罪徐义德。这消息传到徐义德的耳朵里，徐义德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韩云程总算够交情，没有说出来；担心的是韩云程没有把门关紧，还得研究，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这就有问题。可能说出去，当然，也可能不说出去。徐义德和梅佐贤商量，想办法叫韩云程把门关紧。在徐义德授意之下，第二天清晨梅佐贤亲自跑到韩云程的家里。韩云程刚起来，还

没有穿好衣服，披着一件紫色薄呢的晨衣，听说梅厂长来看他，暗自吃了一惊：厂里发生啥重大事体吗？有啥意外吗？还是……他急急忙忙穿着晨衣到楼下客堂里来，梅佐贤一见他，立刻迎上来，满脸笑容，很客气地说：

“您早。”

韩云程回了一句：“您早。”

梅佐贤看他穿着晨衣，抱歉地说：

“打搅您睡觉了。”

韩云程说：“不，我已经起来了。”

“您每天都起得很早吗？”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这是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一早起来，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运动运动，对身体是有益处的。”

“这很不错。你们学科学的人，比我们工商界确实懂得养生之道。”

“那也不见得，”韩云程心中很纳闷：梅厂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是不随便到比他地位低的朋友家去的，要是去了，一定有目的，何况今天来的这么早，必然有事，却见他慢吞吞地随便闲聊天的样子，又不像是有啥紧急的重要的事体。这样乱扯下去，别误了上班时间。韩云程想问他究竟有啥事体，怕显得唐突，难道说梅厂长不能来坐坐随便谈谈吗？韩云程按

下没问，只是说：“梅厂长的养生之道也不错，你身体多健康。”

“究竟比你差的多了。我是虚胖，没有你结实，早上常睡懒觉，新鲜空气我就呼吸不到。”

“因为你睡得太迟了。”

“唔，”梅佐贤说，“你说得对。不像你睡得早起得早，合乎养生之道。精神好，办事精。”

“你办事也很精明。”

“那和你差远了，”梅佐贤马上联系到重点试纺问题上去，说，“比方说，这次我们厂里重点试纺，工人来问你，你回答得真妙，要研究，不能轻易下结论。这说法真是又冠冕堂皇，又科学，又公正，再妙也不过了。”

韩云程听出一点梅厂长的苗头，没有插上去，让他说下去：

“将来研究的结果，当然不是原棉问题，不是配棉量的问题。因为重点试纺，机器检查的好，工人劳动态度好，清洁卫生工作好，产品质量自然一定好了。你说，是不是？韩工程师。”

韩云程心头一愣：想不到没有经过研究试验，梅厂长就替他把答案做得那么完整。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他龇龇地说不出话来。梅佐贤看见他板着面孔，眉头微微有点皱起，知道事情不妙。梅佐贤不强

求韩云程马上同意，他急转话题：

“徐总经理很欣赏你的才能，认为不单是我们沪江纱厂独一无二的纺织专家，而且是上海有名的纺织专家，当然，也是中国难得的纺织专家。我们庆幸沪江有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非常高兴。徐总经理觉得过去有点委屈了你，你只是在技术上负责，其实应该全面负责，因为你是纺织方面的全才。”

韩云程的眉头开朗，心里暖洋洋的，眼睛里闪着知恩的光芒，在关怀梅厂长所谓“应该全面负责”是啥意思。他理一理晨衣上垂下来的有点乱了的紫色的丝穗子，不好意思地说：

“这太过奖了。”

从韩云程的神情上看，梅佐贤知道他的话已经打中了，就凑过去进一步低声说：

“徐总经理不久想请你担任副厂长……”说到这里，梅厂长有意顿了顿，他暗中觑着韩云程的表情。

韩云程有点摸不着头脑。他马上想到重点试纺和刚才梅厂长的答案，怎么能同意呢？谦辞道：

“不敢当，不敢当。请你代我谢谢徐总经理的好意。我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没有能力担任副厂长。”

“你别客气，云程。我晓得你办事有一套的。副厂长的职务你是能够担任的。我们俩人合作，我相信，一定能够胜任愉快。”

“我实在不行。”韩云程还是谦辞，说，“厂里很忙，技术上的事都有点照顾不过来了，没有时间再担任其他工作。”

梅佐贤看他一再谦辞，不好再说下去，改口说：

“这是总经理的一点意思，暂时还不会发表。你不要着急。总经理是很爱惜人才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纺织专家，总经理当然是更关心的。”

“谢谢总经理的好意。”

梅佐贤站了起来，说：

“昨天听到这个好消息，今天早上特地来告诉你，并且向你恭喜。打搅你半天，我们停一歇厂里见吧。”

“好。”韩云程不知道说啥是好。他把梅厂长送到门口，就匆匆上楼换衣服到厂里去了。可是这件事老是搁在他的心上，忘却不了。

重点试纺研究一直没有结果。在韩云程来讲，说明确实由于原棉的问题，这当然要得罪徐义德。照梅厂长的答案报告呢，又对不住自己的良心。自然，工会也一定不相信的。他原来打定主意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参加任何一方，可是这桩事体却把他卷到是非的漩涡里，非要他表示态度不可。而这个态度又很难表示，在没有办法当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拖下去，来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徐总经理和梅厂长

不催问这个结果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工会余静也没有催问，甚至杨部长率领“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也没人提起这桩事体，更是奇怪了。

余静约他今天谈谈，他想起可能是谈这件事。哪能回答呢？能够说还没有结果吗？不能。啥结果呢？这很难说了。不去谈话行不行呢？不行，伟大的五反运动开展了，工会主席约了谈一谈，不去，要不是和资本家有啥勾结，便是有啥亏心事。一定要去。转眼的工夫，韩云程还没有想妥帖，三点钟已经快到了。他不得不离开试验室，到余静约好的细纱间的车间办公室来。

韩云程一跨进车间办公室，两只手就放进深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的工作服的口袋里，态度显得很安详，可是眉宇间微微皱起，露出心中的忧虑。

余静和钟珮文早坐在里面等候了。余静请韩工程师坐在自己的对面。钟珮文坐在余静和韩工程师的侧面，他面前放着一个笔记本和两支削得尖尖的铅笔。余静直截了当地对韩云程说：

“五反运动在我们厂里开始了。各个车间的工人都热烈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希望你也参加这个运动。”

“这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韩云程连忙接上去说，生怕引起余静的误会，很快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完全拥护五反运动。我当然要积极参加运动。老实讲，中共中央发起三反运动，特别是上海市委撤了一大批高级干部，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非常兴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从三反运动可以看出，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的事体办好，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钟珮文听他滔滔不绝地谈三反运动，就把话题拉到五反运动上来，问他：

“你看五反运动呢？”

“这也是中共中央发起，当然也是完全必要的。陈市长说得好，不展开五反运动，就不能到社会主义社会。”韩云程一进门就担心余静提到重点试纺的问题，谈了半天，没有接触到这方面，心里稍为定了些，说话的声音也逐渐高了起来，“几年来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再不‘五反’，不晓得资产阶级要猖狂到啥程度了。”

余静见韩云程眉头慢慢开朗，态度不像刚才进门时候那样拘谨，放在深蓝色阴丹士林工作服口袋里的手也伸出来了，按着桌子侃侃而谈。她就进一步说：

“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当然要展开五反运动。要想五反运动胜利，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韩云程听到最后一句，不禁吃了一惊，脱口流露出一句：

“划清界限？”

“是的。”钟珮文插上来说，“像你这样的高级技术人员，参加运动，一定要划清界限。不然的话，很多问题看不清楚的。”

韩云程给钟珮文这么一说，慢慢镇定下来，脸上浮着微笑，暗暗掩饰过刚才自己的震动，把声调有意放得很慢，说：

“参加五反运动当然要划清界限。我们技术人员，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平日和资产阶级往来的多，更需要划清。不过，我倒想问一问，余静同志，不要见笑，我们哪能划清呢？”韩云程对这问题感到有些模糊，觉得自己担任这个工程师的职务，哪件事不是为总经理服务的，现在要和他划清界限，以后要不要再担任工程师这个职务呢？

“划清界限就是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韩云程问，这么说，果然不要我担任工程师了。那做啥呢？他自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是的，不要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钟

珮文见韩云程有些疑惧，便说，“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寡廉鲜耻。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一定要划清界限。”韩云程对如何划清界限还是搞不清楚。他问余静，“那以后我要不要担任工程师呢？”

余静看见韩云程眉头开朗了不久，又慢慢皱起，不打破他的顾虑，别的问题听不进去的。她说：

“韩工程师，划清界限和你担任工程师的职务是两回事。我们讲的划清界限，是在各人的工作岗位上，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不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唔，”韩云程的眉头舒展开来，愉快地说，“我当然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

“你是脑力劳动者，照工会规定，可以参加工会。很可惜，你到现在还没有参加。这不要紧，如果你想参加，任何辰光都可以提出要求。我们欢迎你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

“工会的门永远对你开着。”这是钟珮文的声音。

“作家讲话究竟不同，”余静望着钟珮文说，“比我文雅多了，像是一句诗。”

“钟珮文同志很有前途。我在壁报上看过你的大作。”韩云程凑趣地说。

“写得不像样子，要笑掉你的牙齿的。”钟珮文捂着嘴说。

“很好，很好。”

钟珮文怕岔开去，把话拉回来说：

“余静同志欢迎你归队，韩工程师。”

韩云程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点惊异，望着余静，说：

“我可以参加工会吗？”

他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工作上和徐总经理梅厂长他们往来密切，没有参加工会的可能，如果提出要求，工会不答应，他这个脸搁到啥地方去？没有绝对把握的事，他不做。工会的会议多，他对会议没有兴趣。他担心参加了工会，要挤掉研究的时间。但是，工会那张红派司，他私心却又非常羡慕。他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逢到人家谈起工会的事，他尽量设法把问题岔开去，要不，就借故悄悄离开。余静说他可以参加工会，那渴念已久还没有拿到手的红派司在他面前闪耀着。他不相信自己也可以参加工会。

“当然可以参加。我们也欢迎你参加。”

“那再好也没有了，”韩云程兴奋地说，“我一定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

“我代表工会欢迎你！韩工程师。”

韩云程听到余静热情的语句，他浑身感到温暖。

好像在寒冷的冬季，外边飘着鹅毛大雪，北风像刀子一样迎面吹来，而他从外边回到暖洋洋的生着火的屋子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使他感到温暖和舒适。

“技术人员为丑恶的资产阶级服务是可耻的，只有为工人阶级服务，才有伟大光明的前途。”

“这个，”韩云程听钟珮文这两句尖锐的对比的话，仿佛是猝不及防的一盆冰冷的水迎头泼下，使他感到突然。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自己是凭技术吃饭。对他这个技术人员来讲，无所谓可耻的和光明的。但他口头上不得不顺着钟珮文的话讲，“完全对，完全对。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有远大的光明前途。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从来就没有找到过正确的道路，现在找到了：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走，技术人员有了伟大光明的前途。钟同志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我们厂里现在展开五反运动，正是你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最好的机会，韩云程同志。”余静说。

余静亲切的谈吐，热情的关怀，特别是称呼同志，使韩云程觉得真的像回到自己家里见了亲人似的。他的手也很自然了，放在桌子边上，没有拘束地望着余静和钟珮文。钟珮文手里拿着那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在笔记本上学着写鲁迅的签名，一边等候韩工程师谈点材料。他准备记录下来。

韩云程激动地伸出手来，问余静：

“工会要我做啥，我一定做啥。余静同志，我做啥好呢？”

“这要看你自己了。”钟珮文把问题退还给他。

“看我自己？”韩云程的眼光对着余静。

“站稳立场，检举徐义德的不法行为。”

“徐义德的不法行为。”韩云程马上想到重点试纺，他所猜想的问题终于提到他面前来了。哪能说法呢？他还是找不到恰当的说法。他安慰自己：余静也许不是问这个问题。他接着一想，觉得是问这个问题，余静不是要他检举徐义德的不法行为吗？在代纺中掺进大量劣质花衣不就是不法行为吗？哪能说呢？

钟珮文见韩工程师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愣在那里，便催促道：

“你把徐义德的那些不法行为，说出来吧，别怕。”

韩云程给钟珮文一催，心有点慌，不禁脱口问道：

“要我谈重点试纺吗？”

“你从重点试纺谈也可以。”余静想起杨部长早一会在“五反”办公室里和她商量的情形，要她先谈大道理，打通思想，然后就韩工程师所提的材料谈起；条件成熟，再深入扩大开去。既然韩工程师提到

重点试纺，她就让他谈。

“重点试纺？”韩云程给余静一提，他奇怪自己怎么竟然说出这个重大的问题，可是现在又收不回来。这个问题考验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了。他想争取做个工会会员。他应该原原本本地把事实经过报告给余静。否则，他有啥资格参加工会呢？他回想那次在总管理处参加的秘密会议，徐总经理怎么安排的，梅厂长坐在徐总经理旁边……梅厂长、徐总经理，梅厂长……他想到那天早上梅厂长对他说的话，人才，副厂长……他对行政工作虽然没有兴趣，可是副厂长的地位和收入却也有它的吸引力。他徘徊在十字路口。问题提出来了，不说也不行啊。他半吞半吐地说，“重点试纺这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应该解决，这关系我们厂里的生产太大了。我个人初步研究，认为这是成功的，一级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原棉问题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韩云程说到这里就连忙煞住。

钟珮文刚在笔记本记了几句，韩云程就不说下去了。他奇怪地抬起头来，催他：

“具体的说吧。”

“这个，”韩云程发现他在记录，认为自己说话更要谨慎小心，不可随便漏出去。他的右手托着自己的下巴，迟缓地说，“具体的情况还要研究研究。”

钟珮文看他欲说不说，有点忍耐不住，高声地点破他：

“还要研究啥，站稳立场，打破顾虑，痛痛快快地说吧。”

韩云程的脸上发热，辩解道：

“我当然要站稳立场。我没有啥顾虑。问题不研究是不清楚的。根据研究的结果，说起来当然就具体了。”

余静想：一个人思想上的认识总有一定的过程，不能急躁，特别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像韩云程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急是没有用的，早检举也不会真实的。今天韩云程的态度比过去显然有点进步，承认了原棉是重点试纺成功的原因之一。思想未完全通，谈问题不可能彻底的，她同意他的意见：

“你研究研究，想一想再谈也好。”

29

林宛芝的左手托着红润润的腮帮子，一对晶莹的眼睛望着书房墙壁上那幅唐代《纨扇仕女图》，发痴发呆一般，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

冯永祥坐在她左边侧面，看她细细的眉头慢慢地皱起，不知道她想啥心思，几次想和她讲话，话到了嘴边，又吞回去了。一直这样相对无言坐下去吗？他有意咳嗽了一声。她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仍旧宁静地坐在那里。

沙发面前那张矮长方桌上有一个米黄色的电动烟盒子，他向烟盒子上面的揿钮一按，里面自动地跳出一支镶着金头的三九牌香烟。他捡起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张开嘴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向她面前吹送过去。圆圆的烟圈越远越大，快到她面前，慢慢散开，飘浮上去，消逝了。

她还是没有吭声。

他终于忍不住，试探地开口了：

“今天为啥不讲话呢？”

“不为啥。”

“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答腔。

“我啥地方待你不好，你给我讲，我以后改正就是了。”

她摇摇头。

他摸不着头脑。他尽可能在自己身上来寻找原因，想了半晌，又问：

“是不是因为最近不常来，生我的气吗？”

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展开以后，他确实确实比较忙碌，自己的行径也比较检点。他知道什么事不能碰在风头上，要识相。他有几次想到林宛芝这儿来，跨出了大门，又退回去了。他常常想念着林宛芝。他知道“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徐义德天天蹲在厂里，徐公馆里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这是一个好机会。他今天下午悄悄地走进徐公馆，在徐义德的书房里碰见了林宛芝，想不到她一直坐在那里不言语，怎不叫冯永祥纳闷？

他瞧她紧紧地闭着嘴，又进一步解释道：

“我最近不常来，是因为五反运动很紧张。你别以为我无产无业，我也是工商界的一分子。在你面前我没啥了不起，可是在工商界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头头啊。我没有工厂，也没有商店，‘五反’检查队当然不会到我家里来的。可是，我也参加了五反运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把我们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三百零三位组织起来，在市里进行交代……”

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洋洋得意，俨然就是上海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的地位也一步步高了起来。她经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在徐公馆里听不到的新鲜事。徐义德从来不大给她谈外边的事，即使偶然提到，也是老气横秋，简单几句，不像冯永祥谈的这样原原本本，更不像冯永祥谈的这样娓娓

动听。她像是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关在徐公馆这个鸟笼子里。徐义德不大让她出去，连外边的新鲜空气她也呼吸不到。她闷的辰光，就想有个冯永祥这样的人坐在旁边谈谈。她一叫，或者正在想他，冯永祥就来了。冯永祥又善于观察神色，尽挑她高兴的讲。

她听他讲到三〇三的五反运动，真的感到兴趣。她的眼光逐渐从《纨扇仕女图》那幅唐代的画面上移转过来，斜望了冯永祥一眼。他见她移动身子，像是得到鼓舞，讲话的劲头高了，声音也大了：

“在市里交代的人，区里管不着，厂店里的职工当然更管不着。我们工商界三〇三代表人物是由陈市长亲自领导的，第一天他还给我们做了动员报告。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的五反运动是：工人和资本家背靠背。懂啵？”

她询问的眼光正对着他。他说：

“我晓得你不懂。这是新名词。五反运动本来都是在厂店里展开，工人和资本家面对面斗争。上海发明了新办法，两边不照面，脊背靠脊背，职工在自己厂店里检举，资本家在市里交代不法行为，简单地说，就叫背靠背。你说，妙不妙？”

她开口了：

“当资本家也要是代表人物才好，你们讨了便宜。”她想：假如徐义德也在三〇三里面该多好呀！

“我们也并不便宜啊。这个背靠背的关也不好过。谁晓得厂店里的职工哪能检举的，心中没有一个底，怎么交代法？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资产阶级哪会痛痛快快地全交代？能够留一手，总希望留一手。共产党门槛精，他们把同行同业的编在一组，比方说马慕韩、潘宏福他们吧，就在棉纺小组上交代。小组成员都是棉纺界的资本家，棉纺界的五毒行为，每个资本家都是过来人，谁心里头不是雪亮的？斗起来比任何人都凶。大家都是行家，谁也骗不了谁。这叫武戏文唱。”

“武戏文唱？”

“对罗，武戏文唱。这是陈市长给我们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的面子。五反运动，阶级斗争，当然是一场武戏。可是陈市长把我们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三百零三位集中在一道，动员，启发，教育，帮助，让我们在同行人面前交代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你看不是很文明吗？暗骨子里，”他伸出右手的食指来在空中一比划，加重语气说，“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

“唔，别看我轻松，我们也很紧张。”

“你们也紧张？”她显然不相信冯永祥这样整天嘻嘻哈哈的人物也会紧张。

冯永祥生怕她不相信，顿时严肃起来，认真地

说：

“当然紧张。”

“你们不是背靠背吗？只要自己坦白交代一下，就啥事体也没有了，怎么也紧张？”

“背靠背也要过关。这两天慕韩兄的日子就不好过。”

“慕韩兄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不是很进步吗？他也有问题？”她想：连马慕韩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就无怪乎徐义德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只要一检查，工商界没有一个人身上干净的，多少都有这么一点毛病。”

“马慕韩有啥毛病？”她好奇的眼光望着他。

“他的毛病也不轻，他正在准备坦白交代，看上去问题不少。”

“想不到他也有问题。”她叹息了一声。

“工商界的人一检查，大半都有问题，不过问题大小不同，对问题认识的态度不同罢了。”

“有问题，坦白就完了。”

“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要自己讲出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谈何容易！”

“确实不容易。”

“你说，我们紧张不紧张？”

“不管哪能，你们在市里交代，比在厂里交代好

多了。政府给你们面子，只要坦白一下就完了。义德很羡慕你们哩。”

“我们是外松内紧，像水鸟一样。”他的面部表情和上半身显得轻松无事，踩在墨绿色厚绒的地毯上的两只脚忽然紧张地动了起来，用右手指给她看，“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生活。”

她噗哧一声笑了：

“你真会做戏。”

“我是武戏文唱。”

“你能文能武。”

“不敢当，不敢当。”他见到她脸上的笑容，扬起眉毛，把头一摆，得意地说，“不过，我也算得是一个文武全才，虽然不是躺着头牌，也不是站着的戏抹布，不大不小，是个蹲着的二三流角色。”

“你对京剧这一门也是内行。”

“略知一二。什么慢板，原板，倒板，快板，散板，摇板，垛板，二六，流水，回龙，紧打慢唱……全会。”他右手搬弄着左手的手指，一路数下去，像是说急口令那么流利。

“这许多板，哪能弄清爽？”

他的头一摇，卖弄地说：

“其实也很简单，不论是西皮或是二簧、慢板都是一板三眼，原板都是一板一眼，倒板、散板和摇板

都是无板无眼，垛板、流水和紧打慢唱是有板无眼……”

她钦佩地叹了一口气：

“这许多板眼，我一辈子也弄不清爽。”

“你有兴趣，我慢慢教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包你很快就学会了。”

“学戏？没有这个心思。”她的眉头皱起了。

“是呀，现在不是学戏的辰光。”他马上把话拉回来，对她解释道：“我最近来的少，主要是因为参加‘五反’，没有工夫。我不是不想你，我昨天夜里还梦见你哩，……”

他最后一句话已经说得很低了，她还怕有人听见，她的涂着艳红蔻丹的食指向他一指。他大吃一惊，伸了伸红腻腻的舌头，没敢再说下去。

“你别再生我的气好不好？”他苦苦哀求。

“谁生你的气哪？”

“你啊。”

“我没有。”

“那为啥很久不讲话，对我冷淡呢？”

她最近心上有个疙瘩。自从徐义德那天晚上在家里和大家商量预备后事，她心里就郁郁不乐。她老是担心会忽然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听到一些响动，就有些惊慌。她夜里睡觉也不酣沉，往往半夜惊醒，

以为徐义德真的进了提篮桥。她睁眼一看，有时发现徐义德就睡在自己的身旁，有时徐义德熟悉的鼾声从朱瑞芳的房间里送过来，于是才闭上眼睛睡去。这几天老是看不到徐义德的影子，他深更半夜回来，一清早又走了。这更增加她的忧虑。她整天无事蹲在家里，大太太不想打麻将，朱瑞芳也不闹着出去看戏看电影。大家无声无息地蹲在家里，徐公馆变成一座古庙。这座古庙连暮鼓晨钟也听不见，死气沉沉的。林宛芝望见那幅唐代《纨扇仕女图》，想起自己最近的生活，和画里的宫女差不多，被幽闭在宫闱里，戴了花冠，穿着美丽的服装，可是陪伴着她的只是七弦琴和寂寞的梧桐树。

不过她比宫女还多一样东西，就是挂在书房里的鹦鹉。林宛芝过三十大庆第二天，鹦鹉就从客厅外边搬回书房来。站在黄铜架子上的鹦鹉给一根黄铜链子拴着，全身是雪白的羽毛，头上的羽毛白里透红，一张黑嘴可以讲几十句话。这是徐义德花了两金子，从五马路中国鸟行买来送给林宛芝的。每天林宛芝亲自喂它，教它学几句话，散散闷。这两天林宛芝不大理它。冯永祥没有到来以前，它逗她，清脆地叫道：

“林宛芝，林宛芝。”

林宛芝瞪了它一眼：

“叫啥？那么高兴！”

它学林宛芝的口气：

“叫啥？那么高兴！”

林宛芝指着它：

“不要叫，不要叫。”

它照样说：

“不要叫，不要叫。”

林宛芝噗哧一声笑了，不再理它。她一肚子心思鸚鵡当然不知道。她对着《纨扇仕女图》，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来谈谈啊，焦急地想听听外边的声音。可是没有人来。往日到徐家来的像流水一样的客人，都忽然不知道到啥地方去了，好像徐家充满了污秽和危险，谁来了都要沾染上似的，连冯永祥的笑声和影子也不见了。今天下午，冯永祥终于来了。但是她还没有从《纨扇仕女图》的境界里跳了出来。她并不是对他冷淡。冯永祥谈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三〇三的情况，固然引起了她的一些兴趣，可是一想起徐义德在沪江纱厂里的情形不知道怎么样，又叫她眉头间舒展不开，笑容慢慢从她红润润的脸庞上消逝。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唉……”

他注视着她，有点莫名其妙，诧异地问：

“为啥叹气呢？”

“不知道义德在厂里的情形怎么样。”

“他吗，我想，也没啥。”他安慰她说，“当然，在厂里面对面斗争是比较厉害的，不像我们在市里武戏文唱。那是武戏武唱，真刀真枪，全武行，一点不含糊。”

他见她眉头紧紧皱起，知道她为这事担忧，不好再把厂里“五反”的情况描绘给她听，改口说道：

“德公老练通达，深谋远虑，啥事体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工商界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我看，区里那些小干部一定也斗他不过，你放心好了。”

“不。这一次和过去不同。我看，来势很凶。义德不一定有办法，可能会出事。他自己早预备好衬衫牙刷牙膏，准备进提篮桥哩。”

“他不了解五反运动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清除资产阶级的五毒不法行为，并不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为啥要把德公送进提篮桥呢？你别冤枉操那份心。”

“万一出事呢？”

他很有把握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别的事我没有能力，这点小事，还有点办法。你找我好了。”

“找你行吗？”

“当然行。”

她还有点不相信，问：

“说人情有用吗？”

“人民政府说人情自然没用，不过我吗，和首长比较熟悉，工商界的行情比较了解。德公也不是外人，根据‘五反’政策，各方面奔走奔走，疏通疏通，可以有点帮助。”

“义德出了事，我真不晓得哪能办法。”

“你别怕，有我。”

她凝神地望着他：

“那辰光，你还会想到我吗？”

他认真地说：

“当然想到你，我永远想到你。德公有啥意外，你跟我一道好了……”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书房外边忽然“砰”的一声，把他的话打断了。他惊诧地问：

“啥？”

“小霸王回来了。”

“啥人？”

“朱瑞芳的好儿子，徐守仁。”

“哦。”他一愣，说不下去了。

她从徐守仁“砰”的一声中想到徐义德在沪江纱厂里“五反”，自己和他书房里叫徐守仁撞见不好。她内疚地匆匆对他说：

“你走吧。”可是她心里又不希望他离去。
他会意地站了起来。

30

刚才“砰”的那一声是徐守仁的飞刀打在客厅外边墙壁的木靶子上。

徐守仁原来就喜欢看美国电影，在香港看了更多的美国电影。回到上海来电影院虽然不放映美国电影了，可是《大侠翻山虎》和《原子飞金刚》这些美国片子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连夜里做梦都希望自己成为美国电影中的“英雄”人物，特别使他醉心的是《原子飞金刚》影片里的那个会飞的强盗，独来独往，刀枪不入。那个会飞的强盗抢了一架能使黑煤变成黄金的机器，发了横财，……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徐守仁是多么羡慕啊。假使自己就是那个会飞的强盗，有那么一架会变黄金的神奇机器，那该多美呀！东西南北，海阔天空，自己要飞到啥地方就飞到啥地方，自己要多少黄金就有多少黄金，自己要吃啥就吃啥，自己要穿啥就穿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简直是太理想了啊。

徐义德托人设法把他介绍进了私立文汇中学高中二年级。可是他哪有心思念书，一心就想当会飞的强盗。他飞不起来，不能马上成为心目中崇拜的那位了不起的“英雄”，他就从“英雄”的仪表学起。皮茄克有了，宽边的草帽买了，红红绿绿的大格子的花衬衫穿上了，尖头的黑漆皮的皮鞋也穿在脚上了，就是没有小裤脚管的西装裤子。他向妈妈提出了这个要求。

朱瑞芳只有这个唯一的宝贝儿子，平时爱的像自己心头上的一块肉，放在肩上怕老鹰叼了去，含在嘴里怕化了，不知道把他安放在啥地方好。徐义德要他到香港去上学，准备到英国去留学，她老是不放心，恨不得一天给他去一封信。他不来信，就整天惦记着，偶尔来一封半通不通的信，朱瑞芳不知道要看多少遍，以至于都背了出来，晚上临睡以前还得拿出来看一下才能安心闭上眼睛睡觉。徐义德让他回到上海来念书，有一半就是朱瑞芳促成的。徐守仁一回来，不但母子可以天天见面，而且使母亲感到自己在徐公馆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比。林宛芝当然不必提，就是大太太也得让她三分。如果她的意见行不通，怂恿徐守仁一说，谁都没有意见。徐义德也要听徐守仁的。徐守仁有啥要求，朱瑞芳总是百依百顺的。倘若不答应，他只要把脸一沉，母亲就心软了，连忙照办。

徐守仁是徐公馆里的天之骄子。他向母亲要条小裤脚管的西装裤子，那算得啥。母亲想裤子总是要穿的，反正有的是钱，多做两条不是更好吗？

徐守仁的外表差不多有点像美国电影里的“英雄”了，可是还不能像那位了不起的“英雄”飞起来。他在香港也没有把“飞”的本领学会。他回上海不久，在隔壁弄堂里认识了“阿飞”流氓楼文龙。

楼文龙比徐守仁的年纪大一些，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光景。楼文龙在上海解放以前，拜了当地的一个叫做“独眼龙”流氓做老头子，在这一带很有势力。他是一条“黄牛”。解放前做火车票和银元的买卖，解放以后银元不能流通，火车票也不能买卖，就做戏票“黄牛”。戏票“黄牛”也不容易做，公安局注意了，抓紧了，洗手不干，当上了“阿飞”。他早就注意上徐守仁。徐守仁外表、举止竭力摹仿美国电影中的“英雄”，更引起他的注意。最初，他要徐守仁请吃糖，徐守仁不肯。他马上伸出一个拳头威逼徐守仁：

“你肯不肯？”

徐守仁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心中暗暗佩服他是“英雄”，是“好汉”。他也请徐守仁吃糖，带徐守仁出去白相，特别是到南京路五层楼那些地方去，简直是把徐守仁迷住了。一走进五层楼，楼文龙更是神气活现，男阿飞，女阿飞，男招待，女招待，……这

边和他点头，那边跟他招呼。他忙不过来，就向四面八方拱拱手，给全体打招呼。这天回来很晚，徐守仁兴奋得上床很久也睡不着觉。从此他就更没有心思念书了，白相得昏天黑地，到了上课的辰光就请病假，有时勉强上课，脑筋里想的也是楼文龙教给他的那一套吃喝玩乐的腐化堕落的本事。

楼文龙知道他是徐公馆的“小开”，有的是钱，便向他献上一条妙计：拿钱出来做生意。徐守仁想：做生意赚了钱更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但是他不敢向父亲提，给母亲说了。朱瑞芳认为他年纪还青，正是读书的辰光，不忙做生意，等到大学毕业，那时再做生意也来得及。沪江纱厂这些企业，将来还是要靠他管，现在更不忙做别的生意。做母亲的哪里知道徐守仁的用意。徐守仁也不敢坦白说出来，那更没有希望。

不能做生意，可是吃喝玩乐没钱不行。不但徐守仁自己要花，就是楼文龙的挥霍也得要徐守仁支付。每次向母亲要，朱瑞芳总是满足他的，要的次数多了，要的数目大了，引起她的注意。徐守仁又不能说出原委，更不能不和楼文龙出去，就开始卖自己身上的东西，手表呀，钢笔呀……花光以后，欺骗母亲，说这些物事掉了，要再买。刚买来，不好马上又掉了，不卖手表钢笔，就卖衣服。

徐守仁自己的物事卖的差不多，在楼文龙的授计下，偷家里的物事卖。有一次，他和楼文龙勾搭着肩膀在马路卖衣服，叫文汇中学的老师看见了。文汇中学请朱瑞芳去商量这桩事体。老师一讲徐守仁当时卖的啥颜色啥料子的大衣，朱瑞芳心中就一跳：她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件皮大衣，早些日子不见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她板着面孔硬不承认：

“老师，可能你看错了，我们家里没有那样的衣服。”

老师说衣服不像，那就更糟糕：一定是徐守仁和那个阿飞偷别人家的衣服卖。朱瑞芳眼睛一动，想了个主意，说：

“许是你看错了人，恐怕不是我们的徐守仁，是旁人。”

“我亲眼看见是他。”

“也许旁人长得有点像他。守仁手里从来不缺钱用，不会去卖物事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守仁。”

老师见她一个劲不承认，也不好再追问，就告诉她徐守仁有时和阿飞一道出进，学校里注意教育，希望家里也要严加管束。这一点她不否认，答应回去管束。

当天晚上朱瑞芳对徐守仁管教了。她把他叫进自己的卧室，轻轻把房门关起，生怕被人发觉。徐义

德知道徐守仁这些事，一定不会轻易放他过去。太太太晓得了，当然会有闲言闲语。传到林宛芝耳朵里去，必然说短论长。朱瑞芳坐在沙发上，低声地对徐守仁说起这桩事体。

徐守仁站在母亲面前咬紧嘴不承认：

“没有这回事，老师看错了人。”

她见儿子当面撒谎，气得她面孔发青，想大声训斥他，又怕给人听见，按捺住心头火气，瞪了他一眼，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在我面前还赖？那件皮大衣是我的。除了你，谁还能从我的房间里偷去！”

“也许是旁人，老王啊，娘姨啊，……”

“就算是他们偷的，为啥要你去卖？你同他们勾搭起来了么？”

“没有。”

“不是你，是啥人？你不承认，瞧我把你的皮打烂。”她真的举起了手，预备要打他。

他想想实在没有办法抵赖，不得不低下了头，细声细气地说：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他的声音有点哭咽咽的。

她看见儿子那一副可怜相，她的手软了，打不下去，慢慢收了回来。可是她的气还没有消，眼睛望着儿子的右手，咬牙切齿地说：

“你以后再偷物事出去卖，我就打断你的手指头！”

“一定不做了。”他慢慢抬起头来，觑见母亲正望着自己，连忙不自然地又低下头去。

她原先是怕儿子不承认，等儿子承认了，却又怕文汇中学里老师跟家里大太太和林宛芝知道，希望儿子别在这些人面前承认，这种话又不好说出口。想了好半晌，她才想出了一个主意：

“你想想，你做了多么丢脸的事！学校里找我去商量，我都不好意思承认。要是承认你做出这样下流的事，把你娘老子的脸搁到啥地方去？”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就是在家里，也不好意思让别人晓得，大太太晓得了，林宛芝晓得了，那两张嘴还会饶你，唉。”

他一听母亲的口风，就猜到她的心思，懂事地应道：

“我不会对那些人讲。”

徐守仁再不敢随便偷母亲的物事。他想办法偷家里别人的物事，卖掉，有了钱，就出去胡搞。家里丢的物事越来越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三位太太都怀疑是娘姨她们，娘姨她们确实冤枉。她们经常看到徐守仁挟一个包裹出去，但又不敢点破是大少爷自己偷的，只有朱瑞芳心中明白。要是别的事，她

一定打破沙锅问到底，追个水落石出。偏偏这些事，她不过随便问一声，就不再查了。她不查，谁有兴趣问呢？大太太知道点风声，林宛芝也晓得七八成。大家都装着没看见。徐守仁自己也加倍小心，偷点物事总是考虑再三，然后才选择时机动手。

五层楼阿飞活动的场所叫公安局取缔了，阿飞敛迹了。楼文龙和徐守仁有他们自己的去处，唯一困难的是钱。家里的物事不能随便偷，钱来的就不容易，徐守仁又想到美国电影《原子飞金刚》里的那个了不起的会飞的强盗。他要是也有一架能使黑煤变成黄金的机器，该多好呀！徐守仁没有这个神奇的机器。不能成为美国电影里的“英雄”，做一个像楼文龙那样的“好汉”也不错。这要有本领，要有膂力。他想起美国电影里的“英雄”不是打得一手的好枪，就是会飞刀飞剑。他弄不到手枪，也找不到好剑，他买到三把德国造的匕首似的锋利的小刀。在客厅外边的墙壁上安了一个木靶子，他自己在上面画了十道黑圈圈，最中间那里涂了一个红心。他一有空闲，回到家里，就拿那三把小刀轮流地向木靶子上扔去，练习自己的手劲和眼力。

徐守仁在家里独来独往，横眉竖眼，见了谁都要碰一下敲一下，表示自己有过人的本事。谁也不敢惹他。他是徐义德的爱子，是小开，是仅次于徐义德的

主人。徐义德只知道他喜武好玩，别的事就不大清楚，平时很少管教。五反运动展开以后，徐义德自顾不暇，更没有时间管他了。林宛芝私自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小霸王”。

今天是星期六，正是徐守仁活动的好时光，可是他口袋里空空的，在转念头弄点啥出去换钱。到处有人，一时下手不得，他就拿了那三把德国造的小刀子到外边来打靶。

他刚才一扔，那把小刀不偏不歪，恰巧插在木靶当中的红心上，鼓掌欢呼道：

“妙啊，百发百中！”

他拿起第二把小刀，又向木靶上扔去。

31

大太太没谈了几句话，感伤地叹息了一声，坐到古老的红木床上，右手往左手上一搁，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命里注定的啊，没有办法，兰珍。”

“啥命不命呢，姨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吴兰珍从红木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走到大太太

面前，嘟着嘴说。她最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活跃的青年团员。她努力争取在青年团的活动上，也像自己在化学上的成绩一样，站在队伍的前列。她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生活得更美丽。伟大的五反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像一场具有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的暴风雨，上海每一个角落都卷进运动里面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复旦大学的组织上一再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对祖国的危害，又听了陈市长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更加了解不彻底展开五反运动，是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团支委给她谈了很多道理，使她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非常憎恨。团组织希望她好好帮助姨父。在研究化学的公式时，在化学试验室里，她都想起了姨父。她要实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要把整个生命和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为解放人类的斗争。伟大的五反运动给她带来了最好的机会，也是对她一个考验。今天虽然是礼拜六，学校里并且有个音乐晚会，而她是最喜欢音乐的，但是她还是提了书包，带上实用工业化学的试验报告和《中国青年》杂志，跳上公共汽车，赶到姨父家里来。姨父不在家，在沪江纱厂，还没有回来。她便上楼走进古香古色的姨妈的卧房。她给姨妈谈伟大五反运动的重要意义，希望姨妈规劝

姨父早点儿彻底坦白。

姨妈说没有用，啥人也拗不过徐义德的脾气。这是他命中注定了的，今年走坏运，谁也没有办法。吴兰珍公然不同意姨妈的意见。姨妈有点生气了，说：

“兰珍，你还年青，不懂得事体。义德这回事，我早请张铁嘴算过命了，张铁嘴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过了这个坏运，也许会好些。”

“算命先生哪能会晓得姨父的事体呢？还不是闭着眼睛瞎说。”

“他当然晓得，有年庚八字吗。每个人的八字不同，只要告诉算命先生，他一排算八字，就了解人的过去未来了，可灵验哩！”

“一个人的事只有自己晓得最清楚，别人哪能晓得？素不相识的算命先生，更没法晓得。一个人的未来，主要靠自己努力，看你是不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每一个人的未来，都要靠自己创造。”

吴兰珍的话里夹了一些新名词，大太太搞不大清楚，她抬起头来，问吴兰珍：

“你说的啥啊？”

吴兰珍见姨妈不懂，忍不住笑了，说：

“我说的是中国话啊。”

“我这个中国人就听不懂你那些中国话。”

吴兰珍给她解释了一遍。她还是不满意，说：

“你年纪还青，不懂得这些事，张铁嘴可灵哩。”

“劝姨父向人民政府坦白有啥坏处吗？”

“这个，也许没坏处。”

“那就应该劝劝姨父呀。”

“坦白不坦白，我看，是一样的。”

大太太心里另有打算。那天晚上徐义德在家里安排后事，她就紧张起来。等听到“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她心神更是不安，整天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夜里躺在古老的红木床上，也闭不上眼，老是望着帐顶发愣。第二天下午，她换了衣服，对啥人也没讲，坐上汽车，到城隍庙去了一趟。她对着灵佑护海公上海县城隍菩萨，求了一签，是第一签，上上，那上面写道：

巍巍碧落处高空
复 涵仁万古同
莫道先天天不远
四时运用总亨通

穿着深蓝布长夹袍的管签的老先生，看完了签，摸一摸自己花白了的长胡须，很严肃地说：

“这是天道运行之象，乾道轻清，混沌始分；两仪化象，八卦成形。金木水火，四季流行，一顺一逆，

不测风云。土为老母，亘古到今。太太，你问的是啥事体？”

大太太告诉他问的是丈夫“终身”。

老先生皱着眉头，同情地说：

“暂屈必伸。”

“啥意思？”

“你那位先生目前交的是蹇运，只要能守正直，定可逢凶化吉，不久便可以交好运道了。”

“哦……”大太太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城隍菩萨真灵，也知道她丈夫的事，现在正在交坏运，和张铁嘴算的命一样。

老先生怕她不相信，用力“唔”了一声，又怕她担心受不住，便劝她：

“你只要向城隍许许愿，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不要担心。”

她点点头，又在城隍菩萨面前叩了三个头，默默许了一个愿：请求菩萨保佑徐义德平安度过坏运，等“五反”过去，弟子一定捐助一千万元，装修佛像，点九十九天的油灯。请求菩萨慈悲，万万保佑徐义德。

从城隍庙回来，她心里安定了。她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保证。现在她希望“五反”快点过去，好到城隍庙去还愿。在她看来，徐义德能够平安过去，似乎很有把握。徐义德坦白不坦白是无关紧要了。

吴兰珍不明白姨妈肚里的安排，她对姨妈一个劲地直摇头，急着说：

“坦白不坦白，那分别可大哩！共产党的政策，治病救人。坦白了就从宽处理，不坦白就从严处理。”

“这个我也听说了。”大太太表示自己也并不比姨侄女差，外边有些事，她也知道哩。

“你既然听说了，为啥讲坦白不坦白是一样呢？”

她站在姨妈面前，歪着头，等姨妈回答。她头上两根长长的黑乌乌的辫子垂到肩上来，显得她身上那件兔毛的绒线衫更加雪白得耀眼。她两只手插在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

姨妈给她这么一问，一时回答不上来，既不愿意说出暗中许愿的事，也不承认自己说的不对，便借故岔开，训斥吴兰珍道：

“看你歪头歪脑的，哪里像个女孩子。讲话没高没低，也不懂得规矩，给我好好坐到那边去！”她对着姨侄女向右边的靠背红木椅子一指。

吴兰珍退到靠背红木椅子上坐下，她并不灰心。她知道这是姨妈的老毛病：逢到说不过晚一辈的辰光，就信口骂两句，显得还是自己对。她懂得遇到这样的情形，不能和姨妈正面顶撞，要迂回曲折地说，姨妈有时也会接受你的意见。吴兰珍小心翼翼地改口说：

“姨妈当然比我懂的多，晓得人民政府讲的到做的到，坦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坦白人民政府也会晓得的，那辰光，对自己就不好了。”她望了姨妈一眼：姨妈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头微微歪着，出神地听她说话。她了解可以再说下去，“为了姨父，只有劝姨父坦白，才能挽救姨父啊。”

姨妈突然把眼睛对她一瞪，说：

“这些我都晓得，还用你说。”

姨妈心里想：城隍菩萨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徐义德的，因为她已经许下了愿。

“吴兰珍，吴兰珍！”

这是徐守仁在楼下叫唤的声音。

吴兰珍走到姨妈的卧房门口，提高嗓子，对楼梯口那个方向应道：

“我在这里，有啥事体呀？”

“快下来，快下来啊！”

这一次徐守仁的声音比上一次高而清晰。他走到楼梯那里，按着扶手，抬头对楼上叫。

吴兰珍以为有紧急的事体，连忙飞一般地跑下楼来。

徐守仁手里拿着一把德国造的小刀，见她下楼来，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说：

“快来，我们两个人比飞刀白相。”

天黑了，外边看不见，徐守仁一个人也白相的腻了；他摘下客厅外边墙上的木靶子，挂到客厅里面的墙上来，叫吴兰珍下来陪他白相。她看见小刀和木靶子就摇头：

“这做啥？”

“练飞刀！”

“现在是啥辰光？姨父在厂里‘五反’，你还有兴趣在家里练飞刀？”

“我，我……”徐守仁讲不下去了。他想：父亲“五反”，自己也不“五反”，待在家里，不白相做啥？林宛芝老是蹲在楼下看书，像是有意监视他一般，叫他不好活动。他本有意到书房里挑选一两件值钱的物事，偷出去换点钱花，林宛芝在那里，不好下手，多可恶！没钱不好出去，留在家里一刻也闲不住，他总想活动活动。他原来盼望吴兰珍下楼来和自己一起白相，热闹些，不料吴兰珍朝他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说：“实在闷的慌啊。”

“你为啥不给姨父想想办法呢？”

“我？我有啥办法！”徐守仁一屁股坐到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闷闷不乐地说。他望着手里的德国造小刀，嘟着嘴，解释地说，“我不是经理，也不是厂长，

我百事勿管，我啥事体也不晓得。爸爸也不给我讲。这几天他回来很晚，我看也看不见他，我有啥办法！”他讲到这里，把眼光从小刀上移到吴兰珍的脸上，理直气壮地盯着她。

她坐在徐守仁斜对面的沙发上，两根辫子垂在胸前。她两只手抓着右边那根辫子梢，出神地望着绕在辫子梢上的橡皮筋，想起学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委对她讲的话：“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在‘五反’中应该起啥作用呢？你的姨父是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他那片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很严重。你打算怎么样帮助他彻底坦白呢？”她在团支委面前保证：绝对不丢掉一个青年团员的立场，要到姨父家里去帮助他。她感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姨妈的态度已经有些改变，徐守仁还是糊里糊涂，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姨父严重的五毒的不法行为。她要启发启发徐守仁。姨父很喜欢徐守仁，徐守仁讲话的作用比她大啊。她说：

“不一定要当经理厂长才有办法，……”

“哦，”他惊异地说，“那你的本事比我高强，我愿意甘拜下风，听你的！”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对着她一翘，钦佩的眼光注意着她那圆圆脸庞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它掩藏在长睫毛下面，越发显得动人。她问；

“你晓得姨父厂里的情形吗？”

“不晓得。”

“听说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很严重。”

“啊？”

“唔。姨父不坦白的話，就要抓起来，吃官司，坐班房……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他想想也是的，假如父亲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他就是徐公馆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他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那他不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了，也不必动脑筋偷啥出去了。他旋即否定了这个可耻的念头。他想到父亲。如果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自己哪能够忍心出去吃喝玩乐呢？他说：“是呀，有啥办法帮助爸爸呢？”

“只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劝他彻底坦白。”

“我劝他，行吗？”

“当然行，他可听你的话哩。”

“他听我的话？”徐守仁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变成一名“英雄”，好像自己有一股无上的威力，自己讲啥，别人听啥，精神因此抖擞起来。

“姨父最心疼你。”她知道他一贯好胜逞强，整日价就想做英雄豪杰，给他一个高帽子戴，要他做啥就

做啥，如果说动了他，做起来，劲头不小哩。她说：“姨父最听你的话啊。”

他兴奋地站起来，拍一拍胸脯，大声地说：

“那好，我叫老头子彻底坦白。”

叮叮，叮叮叮……

客厅外边忽然传来一串铃声。徐守仁耳朵对着客厅门口，右手放在耳根子后面，在凝神地谛听。他仿佛从铃声里可以辨别出谁在揷电铃。他最初以为是楼文龙来找他，今天是礼拜六啊，多么好的时间啊。徐守仁蹲在家给姨表妹谈啥坦白不坦白，真扫兴。父亲坦白不坦白，同徐守仁有啥关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已经飞到门口，在和楼文龙低声商量，到啥地方去白相？再一想，他的心又回到客厅，因为从那铃声可以辨别出门外的人揷的轻而稳，仿佛心情很沉重，没有一点儿年青人的火气，完全不像楼文龙过去揷的重而急。可是他又希望是楼文龙来，也许这次楼文龙有意揷的轻而稳呢。他拔起脚来，想出去看个究竟。他走到客厅门口那里，大门的电灯亮了，黑漆大铁门上的那扇小铁门咔嚓一声开了。

从外边走进来的是徐总经理。徐总经理今天和往常不一样：他穿着深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头上那顶布帽子几乎要压到他的眉毛上，远远望去，他的圆圆的脸上只有鼻子和嘴。过去他出去，气概轩昂，洋洋

得意，到什么地方都引起人家注目，有意让人家知道，这位矮矮的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徐义德低下了头，唯恐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沪江纱厂的总经理。杨健率领“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他的头更低了下来。他脱下西装，穿上人民装，开口闭口工人阶级怎样怎样，你不知道他是徐义德，有时会误会他的人民装的口袋里恐怕还有一张红派司哩。以往他回家来，汽车还没有开到门口，司机就掀喇叭，门房一听见熟悉的林肯牌轿车的喇叭声，立刻就开好黑漆大铁门，站在门口等候徐总经理。最近门房得听电铃声。不坐汽车，黑漆大铁门也不必开，开那扇小门，徐总经理就跨进来了。

门口电铃声传到楼上，大太太和朱瑞芳都下来了。林宛芝捧着冯永祥借给她看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从书房里走进了客厅。

徐义德走进客厅头一件事是嫌电灯光线太亮，厌恶地说：

“是谁开了这许多电灯？”

这是徐守仁做的事。他在家里总喜欢把一切电灯都开了，自己好跳来蹦去。他听父亲生气地质问，不敢正面承认，把责任推到老王身上：

“大概是老王吧。”

徐义德并不真的要追究谁开的电灯。他回过头去，把屋顶上那盏最亮的大灯关上了，把火炉上的两盏壁灯关了，只留下右边那一盏立灯。在米黄色的府绸的灯罩下，灯光显得柔和，稍为远一点的事物，这个灯光就照不到，靠窗户放钢琴那里几乎是模糊一片。徐义德在外边怕人见到，在家里，最近也不喜欢刺眼的灯光。仿佛灯光一亮，看到徐义德的人就多了似的。

徐义德坐在矮圆桌子面前那张双人沙发上。吴兰珍和徐守仁坐在他正对面那边双人沙发里，朱瑞芳和林宛芝则坐在右边靠墙那一长排沙发上。大太太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徐义德身边。她的眼光从他的头打量到他的脚，好像从他的外表可以猜测到最近厂里的“五反”情况。徐义德那身灰色咔叽布的人民装并没有告诉她啥。她关心地问：

“厂里情形怎么样？”

一提到五反运动，徐义德就生气。他恨不得离开上海，站在天空，痛痛快快大喊大叫几声，抛却那些烦恼的事，把自己的财产和资本家这个臭名义都扔掉，舒舒服服歇一会。徐义德有天大的本事，可是没有翅膀。他今天从厂里回来，对严志发说要细细想一想，好坦白。他本来打算到家里轻松轻松，想不到大太太一张开嘴，就给他提厂里的事。他把脸一板，说：

“厂里的事，提他做啥？”

太太给顶回去，一时想不起哪能说才好。吴兰珍也摸不清姨父为啥这样，不好接上去说。

大家沉默着。老王刚走进来，见空气很紧张，连忙知趣地退出去。过了一会，幸好朱瑞芳打破了沉默，说：

“你讲讲，也叫我们放心。别的人我不晓得，”她的眼光朝林宛芝一扫。她知道今天冯永祥来看过林宛芝，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很久，不知道讲些啥。她不满地说：“这一阵子，我待在家里总没有心思，老是惦记着你。”

徐义德没有答理她，脸上也没有表情，心情却平静了些。林宛芝靠在长沙发上，把《复活》放在膝盖上，搭了两句：

“别老闷在心上，讲出来，大家也好出主意。”

吴兰珍听林宛芝讲话，有意把脸转过去，心里说：“整天讲究吃穿，懂得啥，还出主意哩！”

徐义德摘下头上那顶深灰咔叽布帽子，往面前矮圆桌子上一扔。这时候，他好像才感到自己三位太太都坐在旁边，全关心他的事；并且发现姨侄女就坐在徐守仁身旁。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哪能不在学校里念书？”

“今天是礼拜六，姨父。我惦记你，特地来看看

你。”

“今天是礼拜六？”徐义德怀疑地暗暗问自己。他最近一些日子是在糊里糊涂中过去，根本不记得哪一天是礼拜几了。他猛然想起究竟是在自己家里，家里人惦记他，姨侄女也惦记他。他在家里感到了温暖，这里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徐义德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还不是那个样子。”

“检查队走了没有？”大太太焦急地问。

“杨部长可厉害哩，不解决问题，他会走？”

朱瑞芳生气地说：

“那就让他住下。”

“他住下不是光吃饭睡觉的，”徐义德想起最近厂里闹的热火朝天，车间工人开会，公司职员开会，三两个人走在路上都是噼噼喳喳地谈论。“五反”检查队老是找人谈话开会，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啥。梅佐贤也不知道，甚至陶阿毛也不照面，即使见了面，也吓得远远避开了。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正是陶阿毛卖力气的机会，料不到他不起作用。他自己不好去接近，得告诉梅佐贤。梅佐贤这家伙是个胆小鬼，近来的态度也有些变。他大概看见徐义德不吃香了，有意避着不见面。徐义德一个人像是闷在鼓里，厂里的事不知道，而“五反”检查队的同志，

比如严志发吧，见了他也不催也不急。越是这样，徐义德心里越是没底，有点沉不住气了。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住下去，徐义德担心他那老底子会给翻得一清二楚。他显出自己无能为力，说：“不走，当然住下。”

“不走，请他走！”徐守仁拿出手里那把德国造的小刀子，雄赳赳的神情像是准备帮父亲把检查队打出去。他气呼呼地说：“也不是他的厂。”

“人家是政府派来的检查队，谁敢请他走。”

太太同意丈夫的话：

“那是啊。”

吴兰珍不了解徐义德厂里的情形。她想知道，又不晓得从啥地方谈起好。她从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掏出她一直好好保存着的三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看了大家一眼，最后对徐义德说：

“姨父，我念段新闻给你们听，好不好？”

徐义德正懒得谈厂里的事，念段新闻调剂调剂，倒也不错。他信口应道：

“好吧。”

吴兰珍走到米黄色的立灯旁边，高声朗诵：

“我们根据政务院所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也同样大体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

为五类：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并拟放宽尺度，规定凡违法利得在一千万元以下并彻底坦白交代者，仍算做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估计大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我们也拟放宽尺度，违法利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但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亦可算做基本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会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其中罪恶很大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仍可酌予减轻。”

念到这里，吴兰珍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坐在徐义德坐的那张双人沙发的扶手上，歪过头去问：

“姨父，你是啥户？”

徐义德想不到她念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报告，更想不到她突然会问这句话。他愣了一下才说：

“我么，自评基本守法户，人称两个半。”

“你啊，不是基本守法户，也不是半守法半违法户，我想，你是严重违法户。”

吴兰珍两只眼睛望着姨父，看他怎么说。

姨父的面孔微微发白，他想自己的事，怎么连姨侄女也知道了哩，转过身子，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

“我当然晓得。”吴兰珍很有把握地说。

“瞎讲！”

“你的五毒怎么样？”吴兰珍并没有叫姨父“瞎讲”两个字吓倒，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形。

徐义德看姨侄女那股认真劲，有意和她扯：

“啥叫五毒？”

“五毒就是——”吴兰珍伸出左手来，用右手扳左手指数给他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还有，哦，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不好好在学校念书，管这些闲事做啥？”

“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我们全国人民能不能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事体。姨父，你有几毒？”

“我一毒也没有。”

吴兰珍见姨父赖得干干净净，她有些生气，觉得这真是丑恶资产阶级的本色，却又不好发作，团支委不是对自己再三嘱咐：要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吗？她按捺住火气，慢慢地说：

“你至少有个三毒四毒，我晓得。”

“你晓得？”徐义德以为她和“五反”检查队的人认识，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那他可以从她的嘴里探听出“五反”检查队掌握了啥材料。他便问：“你倒给我说说看。”

吴兰珍并不知道沪江纱厂的五毒具体情况，但她表现出来好像知道一些却不愿意告诉姨父。她说：

“我呵，我才不告诉你呢，你的事，你自己晓得。”

徐义德知道厂里的事瞒不了大家，也骗不了姨侄女。他轻描淡写地说：

“厂里不能说没有问题，有是有些，便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你坦白了没有？”吴兰珍紧接着追问。

“当然坦白了，我没啥好隐瞒的。”

徐义德这句话刚讲完，朱瑞芳大吃一惊。她是最关心厂里的事了。徐守仁是徐义德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徐义德的财产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徐守仁的财产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徐义德坦白了，他的财产充公没收，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充公没收，也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充公没收。她焦急地问：

“真的坦白了，义德，一共多少钱？要不要赔给公家？”

徐义德泰然地说：

“我没啥严重的五毒不法行为，赔啥？”

朱瑞芳吃了定心丸，松了一口气，嘻着嘴说：

“对啦，没啥五毒，自然不要赔的。”

这一来，可急坏了吴兰珍：姨父没有坦白呀！她涨红着脸质问：

“你为啥不坦白呢？”

“没有材料，”徐义德慢条斯理地说，“坦白啥？”

“你是沪江纱厂的总经理，你又是这个厂那个厂的董事长。许许多多的事都是你亲自做的。你会没有材料，啥人也不相信。你不坦白，政府是不会宽大你的。”

吴兰珍接着举了一些彻底坦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和拒不坦白政府严办的例子给姨父听，然后激动地说：

“你要想想自己，你要想想家里的人啊。”

吴兰珍讲完了话，眼睛盯着姨妈。大太太说：

“义德，你还是坦白算了吧，刚才兰珍说得好，坦白了政府宽大处理，不会加重罪行的。不坦白，倒是危险，政府要严办的，你要是有个意外，丢下我们怎么办啊！”

徐义德避开吴兰珍和大太太的视线，他的眼睛望着下沿窗口那架钢琴，在出神地想。大太太见他不吭气，唠唠叨叨地往下说：

“我给你算过了命，你今年正好交坏运，坦白了，坏运走完，就没有事了。”她心里盘算：要是徐义德真的平安度过，头一件要办的事是到城隍庙去还愿。

林宛芝从吴兰珍的例子想起冯永祥今天下午也给她谈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她相信坦白

出来是没有啥了不起的。不坦白，说不定真的会关进提篮桥监狱的。她劝徐义德道：

“大家都说坦白了没事，不会判罪的。义德，你就坦白了吧，也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没吭声，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吴兰珍向徐守仁噉一噉嘴。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挺起胸脯大声地说：

“大丈夫顶天立地，啥也不在乎。好汉做事好汉当。爸爸，别怕，你去坦白好了！”

徐义德的眼光从那架钢琴上移到儿子身上，对儿子这句话又是喜欢又是恼，喜欢的是儿子这几句话有英雄气概，将来一定有出息；恼的是这几句话不像是儿子对父亲讲的，仿佛是长辈对晚辈的口吻。他瞪了徐守仁一眼，训斥道：

“你年纪青青的，懂得啥！”

全家都劝徐义德，只有朱瑞芳没有言语。吴兰珍趁热打铁，连忙加上一把劲，说道：

“姨父，大家都劝你坦白。为了你好，为了大家，也为了祖国。你还有啥顾虑呢？明天去坦白吧，姨父。”

吴兰珍的语气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声音都有点颤抖。

“我一定重新坦白，”徐义德在吴兰珍激动的言

词下，信口说出了这一句，话出了口，又有点后悔。他改口说：“可是我没有材料，哪能去坦白呢？”

吴兰珍见姨父讲话前后矛盾，顾虑重重，态度恶劣，她生气地从双人沙发的扶手上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的脸，庄严地对徐义德说：

“你是总经理，坏事就是你做的。你会没有材料？你一定要去坦白，你不坦白，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姨父，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

32

朱延年坐在卧房淡绿色小圆桌子的面前，右手托着腮巴子，两只眼睛木愣木愣的，不断地长吁短叹，像是有一肚子心事，可是嘴里连一个字也不肯透露。马丽琳问他是不是出了事，他的牙齿紧紧咬着下嘴唇，微微摇了摇头。她今天特地给他煮了浓香扑鼻的 S. W. 牌子的咖啡，还给他准备好一小杯白兰地酒。现在却放在一边，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他自己刚才点燃的一支香烟，也放在董色的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淡淡的青烟袅袅地飘浮着。她走过去，坐在他对面淡绿色椅子上。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

难过起来，想分担他一点忧愁，却又不知道是啥事体。

她倒了小半杯白兰地在咖啡里，放了点糖，搅了一阵，送到他面前，温柔地说：

“快凉了，喝吧。”

咖啡杯里冒着喷香的热气。

“不喝。”

“你有啥心事？这么不高兴！”

“唉。”他长长叹息了一声，低低地说，“这回可完了，啥都完了。”

她大吃一惊，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认识他以来，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失望过，总是生气勃勃，不管多么困难的事体，他都有办法的。他忧虑的事，大概是十分困难的。听他那口气，她不禁发愣了，痴痴地凝视着他，不知道怎么是好。

他暗中觑了她一眼，见她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便用右手中指和食指不断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无可奈何地说：

“真想不到会落到这步田地！”

她紧紧皱着眉头，心中像是给火烧似的焦急，用恳求的语调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延年，你说呀！”

“童进他们在店里开了职工检举大会。童进他自

己要检举就检举吧，他还煽风点火，鼓动别人也要检举。你说，他该死不该死？”

“真该死！”

“他在会上瞎三话四，我们好心好意请他们喝咖啡吃点心，硬说是我要摸他们的底。他们的底我用着摸吗？童进这家伙，从浙江光着屁股到上海，是我朱延年收留了他，给他事做，给他饭吃，讨了老婆，成了家，立了业。没有我朱延年，童进有今日！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哪桩事体我不晓得？我没事不会洗煤去，要摸他的底？他有屁底！”

“那他把好心当做驴肝肺？”

“气人就气在这上头！我们资本家一万个是，请伙计喝点咖啡吃点点心也犯罪吗？”

“别理他就是了。”

“别理他？人家现在可抖哪，当上青年团了。你没看见他那股神气呢，眼睛都长到头顶上去了，走路来一摇二摆，把谁也不放在眼里！”

“哦？”她没想到童进变得这么快。

“唔。童进现在变成一个小头目了，伙计都听他的话，成了他手下的人，一心要反对我哩。”

“他再神气，还是你的伙计。你不管怎么说，总是老板。天下伙计总要听老板的。”她想自己在百乐门当舞女的辰光，只要舞女大班一句话，没有一个舞

女不听的。童进一定会听朱延年的。

“啥伙计老板，人家才不听这一套哩。”

“不听，不怕歇生意？”

“军管会颁布了四项规定，像是紧箍咒，把工商界管得紧紧的，叫你动不得，只好乖乖地让政府牵着鼻子走。现在哪个老板有胆量辞退职工？”

“你别理童进。他能有多大作为？”

“嘿，你别瞧不起他，现在他把店里的人都抓在手里，整天不做别的，一门心思找材料，要检举我！”

“你怕他检举吗？”

“我？”他心头一愣。她这句话问得突兀。福佑药房的事她始终不大清楚，认为福佑是一个殷实而又发达的药房。他当然不能告诉她福佑药房的一本账就在童进的肚子里。比童进知道更详细的是夏世富。这次职工大会夏世富虽说没有跟着瞎嚷嚷，但是童进一带头，别的人就很难说，谁也不能打保票。必须先抓住童进，才能稳住叶积善和夏世富这班人。他不能把这些事告诉她，漫不经心地说：“我怕他检举？那不是笑话！”

“那你让他检举去好了，何必担这份心事！”

“你讲的倒轻巧，现在的事不像过去。解放前，政府听资本家的话。现在，政府听工人的话。童进这些人，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加酱油加醋，谁知道他

乱编乱说啥。政府听到了，一定信以为真，有啥是非黑白？我一张嘴也说不过他们，印把子又在他们手里，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我们倒霉的资本家。政府这回搞‘五反’，名义上说的好听，反五毒不法行为，暗骨子里是想狠狠捞一票。福佑药房这么肥的油水，政府早就眼红了，这回怎么肯不下手？正愁不晓得从啥地方开刀，有童进这些人胡乱检举，不是送上门去的好买卖吗？这么一来，可就完了，啥都完了。”

他又低低叹息了一声，然后把头慢慢低下去。他面前烟灰碟里的那支香烟已经烧光了，留下一条烟灰。咖啡的香气早已散尽，杯子也凉了。太阳已经西下，窗外的阳光很黯淡。楼下对面人家的灶披间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在准备做晚饭了。

她了解到今天朱延年为啥这样心情沉重。她也感到事体不妙。福佑药房出事，和她脱不了干系。早几天朱延年不是当着伙计的面，说她也是一个股东哩。说真的，她手里的一点私蓄，通过朱延年的手早投资到福佑了。

“能够挽回吗？”

“挽回？”

“唔，不能眼睁睁看着福佑垮了！”

“当然，我也不甘心让福佑葬送在童进的手里！”

“你的办法不是多得很吗？”

“唉，山穷水尽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办法？不是没有……”

她脸上闪着爽朗的笑容，说：

“快说，啥办法？”

“要想法把童进抓在手里……”

“对。”

“我本来准备给童进一人加薪，怕他不要。那天说给大家加薪，大家也不要。昨天我支给童进下个月的薪水，他退回来了。他说，他现在不等钱用，用不着借薪水。我鼓励他，以他的才能只管会计，太大才小用了，应该管整个店的业务。我暗示将来要提拔他当副经理。你猜，他哪能讲？”

“他一定很高兴，感谢你的提拔。”

“要是这么说事情倒好办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哼，他说他的能力小，连管会计部的工作都有点吃力，管全店，他没这个本事。要我另请高明。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么不识抬举？”

“他的脑筋坏透了，顽固得像是铁打的，一点水也滴不进去。”

“你别理他。”

“现在在刀口上，不理他不行。”

“有啥法子呢？”

“我绞尽了脑汁，整整想了一天一夜，还剩下一个办法……”说到这里，他没再往下讲。

“啥法子？”她按着他的肩膀，高兴地问。

“办法倒好，可是我不愿意……”他又不说下去了，脸上露出了难色。

“只要有办法保住福佑，管他啥办法，你为啥不愿意呢？你不愿意去做。我来帮你忙。”

“你？”他歪过头来端详她一番，黯然地摇摇头。

“看不起我们妇女吗？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你们男子能做的事，我们女子也能做。”

“你有这个精神，我十分佩服。”

“那你就说出来吧。”

“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你做。”

“究竟是啥办法呀？”

他不言语。她催他：

“说呀！”

“我不能说……”

“夫妻家有啥闲话不好说的呢？现在保住福佑要紧。你还有啥顾虑哩！我们一家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啥客气的啊！”

“我，我不好意思张口……”

“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好意思张口，不怕人笑话。”

“你真的愿意吗？”

“当然真的愿意帮助你，啥人还和你说假话……”

他歪过头去，一把把她搂在怀里，附着她的耳朵低声细语。她先是凝神地听，听了两句，眼睛一愣，仿佛怀疑她的耳朵听错了，接着又听了一遍，她的脸色一会红又一会白，最后眉头立刻棱起，脸庞如同忽然给一阵乌云笼罩住了，满是怒容，霍的一下站了起来，说：

“这哪能可以！”

“你不是说愿意帮忙吗？”

“啥忙都可以帮，这个忙——不行。”她怒冲冲地说，“我自从跟了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啥地方也不大去，过去百乐门的姊妹也很少往来。我没有别的指望，我就指望你把福佑药房办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带大成人，享个晚年的清福。哪能做这种事，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你，亏你说的出口！”

“我是不肯说的，是你要我说的啊！”

“是我要你说的，可是我也没叫你说这个呀！”

“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法子呀！”

“这种事，无论如何不能做！”

“我也晓得，不能做。这回福佑注定完了，我也完了。我为了你，整天在上海滩上奔走，早出晚归，

总想办好福佑，扎下根基，和你过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生活，百年偕老。现在算完了，”他也站了起来，边向床边走去，边说，“我们夫妻也到头了。”

“你这是啥意思？”她跟过去，急切地问。

“我完了，你不也完了吗？”

他一头倒在床上，两只手放在后脑勺，眼睛出神地盯着淡青色的屋顶，一言不发。她回味他最后那一句话，心中不禁发慌了。她现在的命运完全寄托在朱延年的身上。朱延年有个三长两短，她也好不了。再下海当舞女吗？人老珠黄不值钱。她年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能再去货腰，靠“吃汤团”过不了日子。她默默站在床前，好像自己忽然悬在空中，无依无靠。他看她傻不唧唧的，便反问她一句：

“你亲眼看我垮下去吗？”

“我有啥办法呢？”

“不能帮我一次忙吗？”

她坚决地说：

“不行。”

“千万请你帮个忙。”

“你好意思讲出口，我可不好意思做这种事。”

朱延年见她口吻很坚决，便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她作了一个揖：

“好丽琳，亲丽琳，你帮我一个忙，我这一生一

世也不会忘记你的啊。”

作揖也没用。她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说：“说不做就不做，别说作揖，就是叩头也不行。”她把手一甩，侧过脸去，望着衣橱，有意不看他。朱延年嬉皮笑脸，继续恳求道：

“你能见死不救吗？亲爱的丽琳。福佑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我朱延年有个三长两短，对你也不会有好处的。你帮我的忙，也就是帮你的忙啊。”

“我……我不能这样……”

她的语气已经没有刚才那样坚决了。他有了信心，也仿佛有了把握，噗咚一声，他跪在她的面前，扶着她的膝盖，苦苦哀求道：

“你不答应我，我永远也不起来了。”

她怜悯地转过脸来，看他满脸忧愁，心软了一半。过了一会，她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

“叫人看见了像啥样子，站起来吧。”

“你答应了，我的嫡嫡亲的丽琳，我的交关好的丽琳……”

他感激得话也说不下去了，猛的站了起来，双手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在她雪白的脖子上狂吻。她眼睛里流出了两行清泪，羞愧万分地把眼睛紧紧闭上。

33

童进坐在朱延年的客堂间，时不时看表：已经九点半了，还不见朱经理的影子。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踱着方步。挂在客堂间的字画和西湖织锦早就看腻味了，他再也不想去看一眼。他的眼睛一个劲盯着客堂间的门，希望朱经理马上在那里出现。每一次希望都幻灭了，朱经理没有出现。他打算留一个条子，先回店里再说。他从灰布人民装的胸袋里掏出新民牌钢笔，正准备写。楼上忽然传来娇滴滴的声音：

“童进，你来。”

他走到客堂门那里，脸冲着楼上问：

“啥事体啊？”

“快来，快来！”

“出了事吗？”他担心地问。

楼上没有回答。

他急了，瞪瞪地上了楼。亭子间的门关着。前楼的门半掩着，里面透出暗幽幽的水绿色的电灯光。他在朱经理卧室的门口停了下来，高声问道：

“有人吗？”

里面传出有气无力的低语：

“请进来。”

他推门进去，卧房里是一片绿色，在水绿色灯光照耀下，迎窗右边墙角那里是淡绿色的梳妆台，这边是淡绿色的大衣橱，紧靠窗口的是淡绿色的小圆桌和淡绿色的矮背椅子。窗帷也是草绿色花布做的，只有沙发床上那床缎子夹被的面子是粉红色的。马丽琳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细麻纱睡衣，短袖口和领子都绣了荷叶花边。她那凝脂也似的雪白细腻的皮肤隐隐可以见到，上衣有个钮扣没扣，有一小部分白玉一般的隆起的胸脯敞露在外边。她蹙着眉头，觑着眼睛，半闭不闭的，静静地躺在床上，像是荷花池里一朵睡莲，散发出沁人心腑的清香。

童进只顾看那些陈设，没有看到马丽琳，惊奇地愣在那里，心里想：怎么没有人呢？

她躺在床上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啊哟……”

这声音吸引了童进的注意，转过脸来看见马丽琳躺在床上，浑身那副打扮使他暗自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困惑地问她：

“你怎么啦？”

“我，我刚才换了衣服想睡下，忽然一阵头晕，差

点倒在地上，……”

“哦，”他同情地走过去，关心地问，“现在好一些吗？”

“现在头还像是针扎似的，痛得很……”

“要不要我到店里给你拿点药来？”

“不，我这里有，”她伸出柔软的胳膊向淡绿色的五斗衣柜一指，说，“就在这上面。”

他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去，果然五斗衣柜上有几个小药瓶，但是没有止痛片，只有一瓶阿斯匹灵，拿起瓶子问她：

“吃片阿斯匹灵好不好？也有止痛的作用。”

“好的。”

他倒了一杯开水，连着药瓶一同送到她床头淡绿的小立柜上。她如同瘫痪似的躺在床上，四肢无力，说话的声音也微弱无力：

“请你把药拿给我……”

他把药瓶送过去。她说：

“打开。”

他开了瓶，取出一片放在她手上。她没有接，说：

“放到我嘴里……”

她把嘴张开，在等他。他弯下腰，轻轻把药放到她嘴里，接着拿过开水来。

她含着药片，小声地说：

“你坐下来，别把水泼在床上……”

他坐在床边，把开水送过去。她歪过头，去就杯子，嘴有点发抖，牙齿在打颤，碰在茶杯上，发出啾啾的响声。她抓住他的手，把茶杯拿稳，好不容易才喝了一口开水，头一仰，把药吞下去。他把杯子放在小立柜上，问她：

“好一点了吗？”

“好点……”

“那你休息一下，慢慢就会好的。”他想站起来，回店里去。

“你摸摸我头上，是不是发烧……”

他举起手来，看见她微波荡漾的头发，秀丽的额头，淡淡眉毛下面的眼睛，他的手在空中停住了。她的眼睛慢慢移动过来，对着他，说：

“好像有点热……”

他的手轻轻按了按她的额头，好像给烫了似的，迅速地缩了回来。他信口说道：

“没啥。”

“你还没有摸到，哪能晓得呢？”

他的手轻轻放在她额头上试了试，温度正常，肯定地说：

“体温正常。”

“正常？”她的头在枕头上摆动了一下，说，“你

的手不准确……”

“那你自己摸摸看。”

她用右手摸了摸，说：

“好像热乎乎的……”

“那是你的手热。”

“我的手热？”她把手伸在他的胸前，说，“你摸摸看……”

他用两个手指按了按她的细腻的红润润的手心，说：

“唔，你的手热。”

她闭上眼睛不胜感慨地说：

“我一个人蹲在家里，生病没人管……”

“朱经理很会体贴人，他不管你吗？”

“他吗？今天是啥工商联主委请客，明天是啥聚餐会，后天又出席政府的重要会议，整天和上海滩上那些大亨打交道，哪里有工夫照顾我呢？在家里连他的影子也看不见。”

“朱经理倒的确是个忙人……”

“我就不相信他真的那么忙，一定是外边有人了。”

“哦，”他皱起眉头一想，摇了摇头，说，“我没有听说过。”

“他这种人办事神秘得很，啥人也摸不清他的底

细。他有人怎么会告诉你哩。你在他手下多年，你还不晓得他的为人吗？”

“你说的倒也对……”

“当初在百乐门认识他，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把我哄的团团转。我讲啥，要啥，他都是百依百顺。和他结了婚，他的脸色就不同了。现在更不像话了，凡事要听他的，不高兴就同我发一顿脾气。我好像是他下饭的小菜。他在外边花天酒地胡混，把我一个人甩在家里，死活不管。”

“你劝劝他呀。”

“他啊，眼睛里只看见钞票，哪能会把我放在眼里？我的话，他只当做耳边风。”

“夫妻家总会有些小吵小闹的，等他脾气好的辰光，和他谈谈。朱经理有辰光也蛮好讲话的。”

“我们的事再也谈不好了。我现在和他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我们已经分开了。他爱回来不回来，回来也是各住各的。”

“为啥要这样呢？”他听到这消息很奇怪，过去一直没有听说过呀！朱经理待马丽琳不错，上回请他们来喝咖啡吃点心，不是谈笑风生，关系很融洽吗？怎么忽然变坏了呢？天下事真难说，变化起来这么快，从表面上一点也看得出来哩。

“唉，你不晓得他这种人，早变了心啦。一早起

来就出去，谁也不知道他啥辰光回来。我一个人蹲在家里闷死了。”

“你不是有亲戚朋友，可以出去走走呀。”

“出去？”她一个劲摇头，不满地说，“我怎么敢！他这个人心眼儿窄得很，只要我出去一趟，就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叫你耳朵根子永远也不安静。我何必受这个罪呢？我真想离开他……”

“离开他？”他惊奇地望着她。

“唔，离开他。我一个人过日子，比在他手下受罪好。你说，是不是？”

“这个，这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意把话题岔开，说，“你身体不好，不要想这些事。”

她脉脉含情地注视着他，半晌没有言语。她发现他身上人民装的一个钮扣的线松了，只是给一根细线连着，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她说：

“你的扣子要掉了。”

他低下头去，果然看见胸前第二个扣子挂下来了，使劲一拉，真的掉了下来。他拿着扣子，说：

“这一阵穷忙，没顾上缝，你不说，我倒忘记了。”

“我给你缝上。”

“不，你身体不舒服，回到店里，我自己缝。”

她霍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跳下床去，慢慢走到五斗柜那里，取出了针线，顺手把房门轻轻关上，走过

来很自然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说：

“脱下来，我给你缝。”

“你头痛，还是躺下休息好……”他身上像触电一样，浑身暖洋洋的。

“我吃了药，好些了。这是小事，客气啥，快脱下来……”

他迟疑地坐在床边没动。她伸过手去，要解他的扣子。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解了扣子，把灰布人民装送到她面前。她也坐在床边，一边缝着，一边问他：

“你这一阵忙啥？”

“还不是那些事。”他避开谈“五反”。上次朱延年想摸他们的底，没有成功。他怕这次朱延年通过马丽琳再一次来摸底。他心里老是惦记着“五反”的事，汉口路那一带不少店家的“五反”工作都搞开了，工作队也去了，就是福佑药房还没有消息。是不是人民政府不了解福佑的五毒不法行为？可是他已经写了检举信给陈市长了。这封信收到没有？该早收到了。陈市长看到没有？为了“五反”，陈市长专门设了信箱，寄给他的信会不看吗？一定看的。看了，为啥不派工作队来呢？也许没看，陈市长管全市的大事，管华东局的事，还要管华东军区的事，一天不知道要处理多少国家大事，一天也不晓得收到多少封信，怎么会有时间看福佑药房一个小伙计的信呢？那设立信

箱做啥？他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解答。他每天朝福佑药房的楼梯口看，等候“五反”工作队到来，但没有一点影子。他着急的不行，有时就走到样品间朝马路上窥视，一看到左胳膊有白底红字的“五反”工作队的臂章，便兴高采烈，以为是到福佑药房来的，经过楼下的衙堂口，又过去了。他失望地低下了头，恨不能奔下楼去把那些同志找来，但怕他们不来。他在店里表面按着平素老规矩做事，心里总是不能平静下来，噗咚噗咚跳个不停。他焦急地盼望“五反”的心情，谁也不知道。

她见他不说下去，停下手里的针线，问：

“忙‘五反’吗？”

他心头一愣：果然问到这上头来了。他摇摇头，淡然地说：

“‘五反’？店里还没有开始哩。”

“店里事情怎么样？延年从来不和我说老实话。店里的事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整天在鼓里过日子，真闷的慌。你告诉我，我不对任何人说。我绝对不会让延年晓得。他啥事体都不让我晓得，我的事也不让他晓得。”

他心里想：不管怎么说，朱延年和马丽琳总是夫妻呀，就是有点小吵小闹，过后还不是谈知心话。在她面前讲话，得谨慎小心。他没有吭气。

“你不放心吗？”她风致嫣然地向他笑了笑。

他摇摇头。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他紧紧闭着嘴，两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

“你有心事？”

他避开她的眼光，低下了头。

“你和老婆吵架了吗？”

他仍旧没有说话。

“听说你们小夫小妻很相好，哪能也吵架呢？你年青漂亮，有能力，工作又好，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你呢？有了你这样的丈夫，才是真正的幸福哩！”

她一边说话，一边向他身边移过去，见他头低得连眼睛也看不见了，便伸过细腻的白里发红的柔软的手，托着他的下巴，对着他木然的眼光，问：

“为啥不说话，变成哑巴了吗？”

他惊觉地站了起来，望着房间里那一片柔和的像是绿水荡漾的灯光。马丽琳坐在床边，浑身白玉也似的皮肤给一层轻纱罩着，柔和的曲线隐隐可以看见，身上不断散发出扑鼻的诱人的浓郁的香味。她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他感到恍惚。夜已深了，马丽琳又是一个人在家，他奇怪自己为啥在这间屋子里，而且待了这么久。他从梦幻一般的境地中清醒过来，矜持地说：

“把衣服给我。”

“还没有缝好哩。”

“不要缝了。”

“为啥？”

“我要走了。”

“生我的气吗？”她温柔地问。

“不。”

“你坐下来。”

他站在那里不动。

“马上就给你缝好……”她缝了两针，微微抬起头来，暗暗觑他一眼。他笔直站着，眼光朝着窗户，有意不看她。她心里不禁好笑。她老练的抬起头来，挑逗地说：

“看你那个紧张样子，男子汉大丈夫这么胆小，你怕啥？”

“我怕？”他觉得她问的奇怪。

“唔。不怕，为啥连坐下来也不敢呢？”

“我，我不想坐。”

“你真是君子！”

她温柔地望着他，忘记手里的针线了。他急了：

“你缝不缝？”

“缝，马上就缝好。”

她把扣子缝好，打上左一个结右一个结。她站起

来，给他披上，要给他扣。他把她推开：

“我会扣。”

她摇摇晃晃站在他面前，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满脸红潮，脚步不稳，一不小心，一头倒在他的怀里，他着实吓了一跳，慌忙把她扶住，把她送到床边。她紧紧抱着他。她的腮巴子热情地紧紧依偎着他的腮巴子，两只眼睛放肆地对着他：

“你不喜欢我吗？”

“你，你说啥闲话？”他想挣脱身子，可是不行，她的两只胳膊已经把他搂紧了。

“你说，喜欢我吗？”

“不喜欢你，给人看到像啥样子？”

“怕啥！”

“你放开我……”

他用力拉她的手，可是怎么也拉不开。他急得满头满脸尽是汗。

马丽琳卧房的门悄悄打开了，朱延年站在门口，大喝一声：

“嘿，童进，你好大胆！”

马丽琳听到朱延年的声音惊惶地松开手，她和他两个都站了起来，狼狈不堪地低着头。

“童进，你做的好事！我要你到家里来谈话，你竟污辱我的妻子，破坏我的家庭！”

“朱经理，这不是我，你，你问马丽琳……”

“问马丽琳做啥？你自己做的事，还不承认吗？”

“我没有，经理，不要冤枉人。”

“冤枉人，你自己看看，”朱延年指着他的胸口，说，“衣服扣子还来不及扣齐哩！”

“这是她给我缝扣子的，没有别的事。”

“我亲眼看你们两个人抱着在床上滚，还说没有别的事吗？”

“是她生病，要我给她吃药；她刚才晕倒，我扶她上床的，……”

“我晓得她今天好好的，啥辰光生病的？眼睛放亮点，我朱延年是啥人？在上海滩上混了几十年，哪件事情没见过？你骗别人可以，别想骗我！”

“你不信，你问马丽琳好了。”

“好，马丽琳，你照直说。”

朱延年伸出右手，用食指指着马丽琳。她一头倒在床上，哇哇放声大哭，啥也说不出来了。

“一切都明白了，童进，你还有啥闲话讲？”

“我实在冤枉，朱经理。”

“少说废话，你破坏家庭，走，我们上法院去！”

“上法院？”童进一怔，今天晚上的事，他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朱延年翻脸不认人，告到法院里，让同事们知道，他的脸搁在啥地方？他稳稳地站在那里

没动。

朱延年走上一步，威逼道：

“走呀！”

马丽琳的哭声停了，翻过身来，拭去了眼泪，哭幽幽地恳求朱延年：

“你不要冤枉童进，他的扣子掉下来了，是我要他脱下来缝的，没有别的事。”

朱延年格格奸笑了几声，冷讽热嘲地反问道：

“我亲眼看见，还有啥巧辩的？”

“是我头晕……怪我不好……”

“你别代他洗刷，给我戴绿帽子，我不能忍受。今天非上法院不可！”

“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家人，童进跟你这些年，起早睡晚，吃辛受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有不是的地方，也应该讲点情面。有话好好谈，不要撕破脸。延年，好不好？”

“只要给我下了台，我并不是那种不好讲话的人。”

“童进，以后有事，多多帮帮朱经理的忙，……”

“我？”童进茫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像坠在五里雾中，一时间啥物事也看不清楚，是非也讲不明白。

“辰光不早了，你回去吧，有话明天再说。”她让

童进走。

朱延年知道一时谈不出个眉目来，只好闪开一条路，让他先走，气生生地对他说：

“你走也可以，反正今天晚上的事没了。”

童进颓丧地走下楼去，一步慢一步，心情越来越沉重。跨出朱家的大门，夜色正浓，弄堂口十分幽静，他糊里糊涂地站在十字路口发呆，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回家去。

34

夏世富把黄仲林请到经理室。黄仲林一走进去，面孔即刻露出惊异的神色，他站在门口没动。沙发前面放了一张矮矮的长方桌子，玻璃桌面上搁了三个咖啡杯碟，一小壶牛乳，一小缸方糖，还有一壶咖啡，壶嘴里冒出热气，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朱延年一见夏世富带黄仲林进来，马上迎了上去，弯着腰，伸出左手，指着沙发，对黄仲林说：

“请坐，黄同志。”

陈市长收到童进检举福佑药房的信，当时看了，旋即批交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调查办理。市增产节约

委员会工商组会同区增产节约委员会研究了福佑药房的问题，从童进的检举信里和别人检举福佑药房的材料看，证明福佑药房的五毒不法行为是严重的。资方朱延年送给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坦白书没有重要内容，态度是应付的，措辞是狡猾的，实际上是抗拒的。因此，情形是严重的。市、区商量决定派一个检查队到福佑药房去。这个检查队的队长是黄仲林。

黄仲林原来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接待室工作。徐义德的坦白书就是送到他的手里的，朱延年的坦白书也是送到他的手里的。工商组接待室的工作告一段落，组织上把接待完的一些同志分配到各区增产节约委员会去工作。黄仲林被分配到黄浦区。福佑药房的材料是经他手办的。他一见福佑药房四个字，立刻想起朱延年那副贪婪的面孔和流氓的口吻。组织上派他带“五反”检查队到福佑药房来，他非常兴奋。他早就要求下厂搞“五反”，现在派他到朱延年那个家伙的福佑药房来，怎不叫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黄仲林带“五反”检查队到了福佑药房，立刻轰动了左右领导，认为人民政府的眼睛真是雪亮。大家都觉得福佑药房的问题严重，应该派个检查队检查。人民政府果然派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比大热天

吃一客赤豆刨冰还舒服。

福佑药房的职工更不消说，一见“五反”检查队，个个都满心欢喜，表面上全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不流露出来，怕朱延年发觉，不高兴。“五反”检查队队长黄仲林虽然没有说他们是接到福佑药房会计主任童进的检举信以后才决定来的，但童进料到“五反”检查队到福佑药房来，和他那封检举信一定有关系的。童进对陈市长办事这样负责、认真、敏捷，佩服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寄出那封检举信以后，日日夜夜盼望“五反”检查队来，但到“五反”检查队真的来了，他却彷徨起来了。他甚至希望检查队迟一点来才好。那天晚上回到店里已经是深夜了，他躺到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他像是忽然掉在一个很深的烂泥坑里，四面不着边，无依无靠，不能自拔。他在店里避免碰到朱经理，连经理室的门也不敢望一眼。朱延年从门里出来，走到外边办公室里，他有意低着头在看账面的阿拉伯字。本来，他的眼睛最尖不过了，每个数字一看就记住了，绝没有毫厘的差错；现在这些数字像是忽然都长了腿，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哪能也看不准，记不清。等朱经理走过，他的头才稍微抬起来。坐在他旁边的叶积善望他笑了笑，他的头又慢慢低下去。他感到叶积善可能知道那天夜里的事，不然为啥那么笑着看他呢？从叶积善的微

笑里发现含有一种轻蔑的意思。他受不了这个冤枉，真想过去一五一十把真相告诉他，说明童进不是那种人。可是店里那许多人，一时也讲不清楚，朱经理刚走出去，又没说到啥地方去，说不定马上转来，给他加酱油加醋，更加洗刷不清了。目前别人也许还不知道，这么一来，全店里的人知道了，立刻就会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那家里要闹翻天了。还是不提的好，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将来总会弄明白的。他没有望叶积善，眼光又盯着账上的数字看，担心将来能不能弄明白。叶积善却走过来了，附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

“‘五反’工作队来了，我们该怎么配合？”

“啥？”他好像没有听见最后那句话。

“我们该怎么配合？”

他心头一怔，眼睛向店里迅速地扫视了一下，见大家没有注意他们，才应了一声：

“唔，配合。”

“动起来呀！”叶积善瞧他那个软搭搭的神情，有点焦急。

“唔，”他还是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你先想想，有空的辰光再谈。”

叶积善没法再谈下去，悄悄退回自己的写字台那边去。叶积善不了解童进的态度为啥忽然变了。他

想也许童进比他有经验，人多嘴杂，许是现在不便谈。童进不是说有空的辰光再谈吗？童进和他们盼望“五反”工作队多么久了，现在真的来了，还有不高兴不积极的道理？

福佑药房每一个人听说黄仲林带“五反”检查队来，的确没有一个人不高兴的。痛恨黄仲林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朱延年。他看见黄仲林面孔，马上想起他那次到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送坦白书的情景。黄仲林虽然年纪青，可是讲的话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刺中对方的要害，叫人听了浑身汗毛凛凛。那一次朱延年确实领教了黄仲林的厉害，在他的脑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仲林既然来了，朱延年心里想：痛恨也没有用，得打起精神，给他较量较量。他笑脸相迎，上去对黄仲林拱拱手，说：

“我天天盼望政府派检查队来，今天可盼望到了。欢迎！欢迎！你来了，我特别欢迎！我记得我们见过，你在市工商组接待室工作，嘻嘻。”

“是的。”

黄仲林昨天一天没有找朱延年。朱延年毕竟心虚，他动脑筋，考虑怎样在黄仲林身上下功夫。他本想请黄仲林和“五反”检查队全体同志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继而一想；现在正是“五反”，资本家请吃饭，那贿赂的不是太露骨了吗？暗中加点菜呢，倒是可

以，却又表达不出一番意思。他选择了喝茶的方式，而且只请黄仲林一个人，既不露骨，也能表达一番意思。

黄仲林带来的“五反”检查队在福佑药房 X 光部办公。刚才夏世富进去告诉黄仲林，说朱经理想找黄队长谈谈，问他：是朱经理来呢，还是黄队长过去。黄仲林觉得让朱延年到“五反”办公室来不方便，就说，还是他过去吧。黄仲林以为朱延年有啥要向他坦白。

朱延年见黄仲林坐下，自己以为有了三分把握。他眼睛一动，慢慢说道：

“黄同志实在太辛苦了。这么大的五反运动，黄同志要管市里的工作，要管区里的工作，还要管我们小号福佑，真是又原则又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黄同志。”

“没有啥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夏世富在一旁顺口奉承道：

“黄队长真行，啥工作都会。”

“我没有啥本事。别把我捧上天，跌下来可吃不消啊。我只是做一点具体工作罢了，主要靠组织上领导。”

“黄同志有这样的本事，还这样谦虚，的确不容易。”朱延年觉得可以进一步表示，他提起咖啡壶，在

黄仲林面前的杯子倒进咖啡，又倒给夏世富和自己，然后拿起那杯牛乳，问黄仲林，“你喜欢放点牛乳吗？”

黄仲林摇摇手，说：

“我不喝咖啡。”

“我们做生意买卖的人，说句老实话，也是不容易的，整天跑来跑去，没早没晚的；到了下午，精神就差劲了，每天这辰光总要喝杯咖啡提提精神。”

“咖啡是兴奋的，喝了确实可以提神。”

“你不喝咖啡吗？黄同志。”

“这个，”黄仲林怔了一下，他不想撒谎，说，“有时也喝一点。”

“是呀，喝点咖啡好。我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喝点咖啡，嘻嘻。”

朱延年给他倒了点牛乳进去，一边说：

“加点牛乳好喝点。”

同时，他给黄仲林放了两块方糖，说：

“烟茶不分家，喝点咖啡没啥。”

黄仲林不愿意和他扯淡，直截了当问他：

“朱先生找我有事体吗？”

朱延年避而不答，笑嘻嘻地问：

“你先喝点，这咖啡不错。”

黄仲林摇摇手：

“你自己喝吧。别拿我当客人一样招待，我是来‘五反’的。”

朱延年见黄仲林的态度不对，慌忙声明：

“当然不拿你当客人。喝点咖啡，办起事来更有精神。”

“我不喝咖啡，劲头也十足。”

“那是的，你年青力壮，有一股革命朝气，我实在佩服之至。”

“朱经理真有眼光，讲的一点也不错。昨天黄队长忙到深夜，今天一清早就爬起来，照样精神十足！”夏世富对黄仲林说，“佩服，佩服！”

“这不算啥。”

朱延年的眼光向黄仲林那身灰细布人民装上下打量了一番，他奇怪共产党干部不讲究吃和穿，究竟为啥这么卖力气，实在叫人纳闷。他对黄仲林说：

“你真行，不愧是我们人民政府的老干部。”

“我不是老干部。我很年青，参加革命工作也没有多久。我们还是谈‘五反’吧，你是不是有啥要坦白的？”

朱延年送过一支中华牌香烟，慢吞吞地说：

“不忙，先抽根再谈。”

“刚抽过。”

夏世富说：

“黄队长，那你就喝点咖啡吧。”

“咖啡快凉了，”朱延年指着黄仲林面前的杯子说，“少吃一点，赏我朱延年一个光，怎么样？”

黄仲林望着朱延年，问：

“你谈不谈？”

他忍耐不住，一肚子气差点要爆发出来了。

朱延年嬉皮笑脸地说：

“谈，当然要谈。”

“那么，谈吧。”

“抽根烟，慢慢再谈不好吗？黄同志已经住在小号里，谈话的时间多得很啊。”

黄仲林霍地站了起来，不客气地说：

“我手里工作忙得很，没有工夫奉陪，等你喝完了咖啡，要是有啥要谈，上我办公室里来好了。”

黄仲林说完话，立刻走出了经理室。朱延年站了起来，朝经理室的门撇了一撇嘴，气呼呼地对夏世富说：

“这种人真不识抬举。”

“别理他，经理。”

“初出茅庐的小子，愣头愣脑，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你瞧那架子，连我朱延年也不看在眼里。”

“要不是‘五反’，啥人晓得他叫张三李四。”

朱延年听到“五反”两个字，他的气渐渐消逝了。

他懂得现在不是发脾气的辰光，印把子在别人的手里，得小心点。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改口说：

“对呀，人家是‘五反’工作队的队长嚟，当然神气活现。世富，你要好好敷衍敷衍他。我们在人家手掌心里过日子，落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经理说的再对也没有了。”

“店里的事情，你也要多留神。只要你帮了我的忙，‘五反’过后，我决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经理谈到啥地方去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放在心上。”

“这就好了。”朱延年指着黄仲林的那杯咖啡说，“你把它喝了吧。”

夏世富端起杯子，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精光，舔了舔嘴唇，精神抖擞地说：

“我去看看苗头。”

“有啥消息，随时告诉我。”

夏世富从经理室走出来，有意绕了一圈，在写字台面前坐了一会，然后很自然地向着“五反”办公室走去。门紧紧关着，里面不时传出细碎的人声，可是听不大清楚。他走过去，又迈着方步踱了回来，料想那里面一定谈机密的事体，没头没脑闯进去不好，这地方要避嫌疑。他信步走了回来。

黄仲林回到“五反”办公室，感到福佑药房的事

有点棘手，许多事没有一个头绪，朱延年却像块橡皮糖，给你扯来扯去扯不清，而店里的核心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整个福佑药房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只有一个：童进，并且入团不久。他以为“五反”检查队一到，童进就会找他。童进不但没找他，仿佛一见到他，就远远避开了。他不能再等，主动把童进找到“五反”办公室。童进拘谨地坐在写字台旁边，一言不发。他不知道黄仲林为啥突然找他，心情有点紧张。

半晌，黄仲林打破了沉默，说：

“你给陈市长写的那封信，很好……”

童进的眼光马上望着“五反”办公室的门，幸好黄仲林已经关上了。他没有言语，只是点了点头。

“陈市长亲自看了那封信，批给区里，特地派我到福佑来的……”

“陈市长亲自看了？”童进的眼睛里露出惊奇的光芒。

“可不是，陈市长还说你响应党的号召，检举不法资本家，是个模范青年团员。”

“模范青年团员？”童进脸上唰的一下红了。他想起那天夜里的事，以及第二天朱延年和马丽琳同他谈话的情形，摇摇头，惭愧地说，“我不够资格。”

“哪能不够资格？考察一个人不在平时，主要看

在重要关头的表现。你在‘五反’运动中勇敢检举就是一种模范行为。”

童进矜持地摇摇头。

“你检举的材料很重要，说明朱延年的不法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比方说把过期失效的药卖给志愿军，制造假药……”

“那是的。”

“还有福佑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朱延年的胆子真不小。”

“他啥事体都做得出来。”童进紧张的神经稍为松弛一些了。

“我到福佑来，不得不提高警惕，小心给他改造了。”

童进现在对干部思想改造所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朱延年不仅对人民政府的干部要改造思想，对店员也要改造一番。他说：

“你有经验，不会上朱延年的当的。”

“这也很难讲。我们党早就说过了，要防止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这个，也对。”

“你看哪些职工比较进步，给我开个名单。”

“做啥？”

“单靠你一个青年团员工作不容易开展，要团结

大家，形成核心力量，我们的事体就好办了。”

“我，我想想看……”童进不敢答应，但又不敢拒绝。他是一个活蹦活跳的人，现在给朱延年无形的绳子捆得紧紧的，动弹不得。

“很好，想好了再开给我。”黄仲林认为他检举的事不详细，说，“你检举的那几条都很重要，但不够具体，你可不可以写一份详细的材料给我？”

“这个……”童进眼前顿时出现了朱延年的面影，仿佛对他说：怎么，忘记那天夜里的事了吗？你的名誉要不要？你想到法院去呢？还是平平安安跟我朱延年过一辈子？他要跳出朱延年的手掌心，但一时还想不出办法。他犹豫地对黄仲林说，“具体情形我不大清楚，黄队长。”

“你不是会计部的主任吗？”

“是的。”

“怎么不清楚呢？”

“具体的事情我不管，朱经理很多事不入账的。你了解具体的事，可以问夏世富。他是我们的外勤部长。”

“我晓得夏世富，他的问题也不小。目前我不想找他。你写给我好了。”

“我，我晓得的，都写在检举信上了。”

“再也没有材料了吗？”黄仲林看他讲话吞吞吐吐

吐，有点困惑，检举信的口吻很坚决，怎么“五反”检查队来了以后反而变了呢？他不了解是啥原因。他说，“不要怕……”

“不怕，我一点也不怕。黄队长，你，你相信我，我绝对不怕。”

“我完全相信你。”黄队长看他神色惶恐，先稳定他，然后问，“检举信上那些数字怎么得来的呢？”

童进给问得躲闪不开。他想走，又没有借口。他默默望着放在墙角落的一副X光透视机，想了半晌，才说：

“是我和叶积善估计的。叶积善在栈房工作，许多事体他比我清楚。”

“你自己是不是再也没啥可写的了？”

“让我想想看。”

“好的。你好好去想想。”

童进好不容易听到黄仲林最后一句话，他猛可地站起来就走，竟忘记向黄仲林告辞。

35

汤阿英这几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她

在车间里也好，在路上也好，回到家里也好，心里却总是宁静不下来。她不知道从啥地方来的一股劲头，每天希望多做些工作，不做到精疲力尽绝对不愿撒手。不这样，心里就好像对不住谁似的。奇怪的是对啥事体，她都有兴趣，并且是从心里发生出来的兴趣，不是谁动员她的。

为啥忽然变得这样快乐呢？她冷静地想来想去。思想如同找不到头的细纱一样，理了很久很久，才算理出一个头绪来。自从那次在车间里开小组会，讨论厂里生活难做的原因，党支部书记余静支持她要求上海市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没有多久，人民政府果然派了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了沪江纱厂。她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集体的威力使她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厂里工作，是和大家一道工作，有余静支持她们，领导她们。她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重任。她知道，只有大家在一道才有力量，也只有依靠大家，一个人才有力量。她现在亲身感受到这种力量给她斗争的勇气。“五反”检查队是她们自己要求来的，单靠杨部长他们还不行，要大家参加进去，要自己动手，才能消灭徐义德和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她要好好努力。

每天起来，她精力充沛，经过一天的劳动，把浑

身的力气用光，心里舒适，这才安安静静地回到家里。如果有活没做完，她是不肯回家的。回来了，要是还有啥事，给她言一声，她身上会忽然生长出新的力量，又一个劲往厂里奔。

今天是厂礼拜，汤阿英和张学海都在家里。她这个礼拜又是日班，晚上不用去上夜班。巧珠奶奶昨天就张罗开了，今天更是兴奋的了不得。她自己提了篮子，到菜场上去买小菜。

她在小菜场上先买了四两小虾，又买了两个猪脚爪和一条黄鱼，然后买了二斤白菜和两块豆腐。她很满意这样的选择，大家想吃的菜都买了，花钱不多，还剩下四千多块钱。不买鸡，大家没有意见。她自己也不在乎，等将来有钱再买。她准备这样调配：大汤黄鱼、虾烧豆腐、素炒白菜、清炖猪脚爪，有菜有汤，有炒的有烧的，而且都是每一个人喜欢吃的菜，一定个个满意，快快乐乐地过一个厂礼拜。

她提着满满一篮子的小菜，兴冲冲地走进草棚棚。巧珠见奶奶回来了，马上扑到奶奶面前，翻她手里的菜篮看，一边问：

“奶奶，买的啥小菜？”

奶奶像小孩子似的，用手按着篮子里面的白菜，不让巧珠翻。她坐到靠门那张板凳上，把菜篮往自己的膝盖上一放，低下头，问巧珠：

“你猜猜看。”

巧珠用右手的食指按在自己的鼻子上，歪着头，认真的想了想，没有把握地说道：

“鸡？”她知道奶奶喜欢吃鸡。

“不对。”

“那是，”巧珠的两只眼睛转了转，想起妈妈爱吃鱼，很有把握地指着篮子说，“鱼！”

“啥鱼？”

巧珠在家里经常吃咸鱼，她猜想奶奶一定又买回来咸鱼，奶奶贪图咸鱼又便宜又下饭，喜欢买。巧珠却不喜欢吃，她嘟着嘴说：

“一定又是咸鱼！”

“这回你又猜错了，”奶奶得意地笑了，摸着她的小辫子说，“不是咸鱼，是黄鱼。”

“黄鱼，”巧珠知道有了妈妈喜欢吃的鱼，心里很高兴。她的眼珠子对着篮子里的白菜，很想透过白菜看看还有啥小菜。白菜盖得严严的，看不见。她反问道，“还有？”

“当然还有。”奶奶用手盖着白菜不让她看，嘻着嘴说，“你最喜欢的——”

奶奶说到这里故意不说了，望着巧珠，等她自己说。她放在鼻子上的右手食指指着白菜下面说：

“虾！”

奶奶笑了。巧珠笑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翻开白菜，一个小活虾也高兴得从白菜下面跳了出来，弯曲着身子一纵，到了地上。巧珠伏在地上，一伸手，把它抓了过来。

“今天难得大家都在家里，”奶奶对儿媳妇说，“好好吃顿中饭，阿英，快收拾，帮我摘菜弄饭。”

阿英正在收拾床铺，心里惦记着今天约好了谭招弟她们谈话，听见奶奶要她帮忙摘菜弄饭，连忙摇头说：

“不，我还要到厂里有事哩。”

“有事？”奶奶放下菜篮，向阿英望了望，奇怪地问，“今天是厂礼拜，有啥事体？”

“现在厂里的五反运动正闹猛哩，……”

奶奶不等她说下去，插上来讲：

“五反五反，五反同你们有啥关系？那不是政府和资本家的事体吗？”

“不能这么讲，”张学海从墙角那边的布帷子后面走了出来，搭话道，“五反运动同我们工人的关系可大哩。”

奶奶老花的眼睛里露出怀疑的光芒：

“关系可大？”

“是呀，”汤阿英说，“‘五反’就是为了我们工人么，为了社会主义么。‘五反’了，消灭了资本家

的五毒，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活就好做了。生产增加了，国家富强了，大家日子就好过了。‘五反’哪能和我们工人没有关系呢？”

“就算有关系吧，那有政府去管，不是派了检查队进厂了吗？何必你们去操心！”

“我们也要插手，”阿英对奶奶耐心地解释道，“政府派来的检查队是领导‘五反’的，许多事体要我们工人自己动手。过去的事我们晓得的比他们清爽，大家不动手，‘五反’搞不彻底。”

奶奶不了解这些事，也说不过阿英，但心中仍然不满。听阿英那么一讲，她不满的情绪就从嘴里流出来了：

“啊哟，看不起你，你的本事倒不小哩。”

“我没啥本事，不过余静张小玲领着我们干。”

张学海想起工人常唱的《团结就是力量》那首歌，他说：

“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动手，事体就好办了。”

“啊呀，一张嘴我都说不过，现在又加进一张嘴来了。”奶奶显然不满意儿子帮助阿英说话。她想不出理由来反驳，却又不甘心听阿英那一套，于是生气地说，“就算是‘五反’吧，也得有个厂礼拜啊！”

“厂礼拜当然有呀，今天就是。”

奶奶眯着眼睛笑了。她很高兴自己逼阿英讲出

了这句话，于是顶过去：

“今天是厂礼拜，那你就给我蹲在家里。”

“我约人谈话，谭招弟她们在厂里等我哩。”阿英的口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厂礼拜，还要开会谈话？”奶奶把“会”字的声音说得特别重，她问自己，“又开会，又是厂礼拜？这叫啥厂礼拜，啥辰光不好谈话，偏偏要选在厂礼拜这一天！我真不懂。”

阿英焦急地说：

“唔，和你讲话真不容易。奶奶，厂礼拜约人谈话为啥不可以呢？人家杨部长自从进了厂，从来没有休息过，别说厂礼拜没有，每天下了班还得工作，要忙到深更半夜才能闭上眼睛哩。”

“人家是部长，你也是部长吗？”

阿英见奶奶的歪道理说不完，自己又不好发脾气，她的脸急得红通通的，不满地说：

“奶奶，不能这样讲，大家都是工作么。”

“工作，”奶奶用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这句话真好听。为了工作，家就不要了吗？”

“谁说不要家的？”

“谁？”奶奶有点生气了，说，“厂礼拜，连在家里吃顿饭的工夫也没有，那还要家做啥呢？”

“现在‘五反’啊，也不是平时，昨天张小玲通

知，今天早上十点钟，青年团的积极分子要分头约人谈话，进一步深入动员群众检举，做好党的助手工作。”

“积极分子啊。”奶奶撇一撇嘴，讽刺地说，“怪不得这么积极哩，积极得连这个草棚棚也蹲不下啦。我早就说你变了么。这个草棚棚简直看不见你的人影，一回到家板凳还没坐热就又跑哪。”

阿英竭力按捺下不满的情绪，耐心地给奶奶解释：

“实在因为最近工作太忙，没有办法，我在外边也时常惦记家里啊。”

“好，好好。”奶奶心里着实不高兴，她看出来今天怎么说也留不下阿英，却又不愿意让她去，便以退为进地说，“我管不了你，积极分子么。你要开会就开会，你要谈话就谈话，随你的便。”

阿英没有吭气。奶奶转过来，笑脸对着儿子，亲切地说：

“学海，来，天大的面子也留不下人家积极分子，我们在家里弄饭吃。我今天给你买来两只猪脚爪，清炖一锅汤，你喜欢吃的。”

“我……”

“哪能？”

奶奶从昨天晚上起就想好了怎么安排今天的日

子，一清早又亲自去买了大家喜欢吃的小菜，以为今天大家可以欢欢喜喜地在一道吃饭，不料阿英要去谈话，叫她气的说不出话来，只好和儿子、孙女一同吃饭了。见儿子吞吞吐吐想说不说的神情，使她暗自吃惊，难道儿子也——她不敢往下想，用老花的眼睛盯着学海。

学海想不讲，不讲奶奶仍然会知道的，不让她知道也不行。他怔了一下，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也有事体。”

“你——”奶奶不敢往下想的事学海终于说出来了，现在是奶奶说不下去了，她把“你”字说得很重，声音拖得很长，真想不到儿子也有事。可是她还是有点儿不相信，问道，“你有什么事体？”

“我们保全部的工人要开小组会，打算研究保全部怎么进行五反运动。我们讲好了到厂里吃中饭先碰碰头……”

张学海一五一十地把保全部的“五反”情况说给奶奶听，希望取得她的同意。她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噘着嘴说：

“你们都去，你们都去。”奶奶过去一把抓过巧珠的小手，摸着巧珠的小辫子，亲热地说，“来，我们两人吃。我先弄虾烧豆腐给你吃。”

奶奶一肚子不高兴。她的安排全落了空。她向学

海和阿英扫了一眼：

“你们以后干脆就别回来了。”

学海看看娘真的动了肝火，想她今天从早忙到现在，他和阿英都出去，把她和巧珠丢在家里也实在不太好。他眉头一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

“这样好了，娘，现在就弄中饭，我早点吃了去，好不好？”

奶奶的嘴角上浮起了微笑，心也平静了一些，马上爽朗地说：

“当然好啊。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她转过脸去望着阿英说：“那你也吃过早中饭去，好不好呢？”

阿英看看手表，急着说：

“啊哟，快九点半了，我得马上去，等不及吃饭了。”

学海怕奶奶不放，别又弄僵了，就在一旁相帮地说：

“就让她去吧。她们约好了人，迟到不好。我在家里……”

“好，”奶奶有儿子在家，心里比较满意了。她点了点头，说，“去就去吧，谈完了话，可要早点回来，阿英。”

阿英应了一声：“唔。”

36

昨天晚上汤阿英约谭招弟今天早上十点钟到厂里谈谈，一开头就给谭招弟回绝了：

“明天是厂礼拜，有话改一天再谈。”

“厂里的五反运动正闹猛，早一点谈好。”

“后天不是一样吗？”

“早一天谈，早一天对运动有帮助。”

“那么，现在就谈，”谭招弟站在通向大门的煤渣路上，眼光在向四面望望，在寻找一个地方，好坐下来谈。

汤阿英谈话的内容和步骤还没有准备好，她说：

“我还要约别人参加，明天早上十点到厂里谈好了。你今天做了一天生活，累了，该回去休息休息。”

“那么，到我家来谈。”谭招弟还是不大愿意把厂礼拜的休息时间完全花在厂里。

“在厂里谈方便些，厂礼拜杨部长和余静同志都在，有啥事体和他们商量也容易。”

谭招弟见汤阿英坚持明天在厂里谈，想来一定有道理，而且提出杨部长和余静同志厂礼拜都在厂

里工作，她就只好再说了。她嘴上同意了，回到家里，心里老是嘀咕：不了解汤阿英要和她谈啥。她对重点试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更正确地说，她对重点试纺的看法比过去更坚持了。她同意重点试纺是有保留的，态度是勉强的，内心认为重点试纺不会解决啥问题，折腾一阵子，生活难做还不是生活难做，派啥用场？杨健带领“五反”检查工作队进厂，她和大家一道去欢迎了，也鼓掌了，也喊口号了，简摇间的“五反”分队成立她也参加了，细纱间诉苦大会她也听了。总之一句话，该欢迎的，她欢迎了；该参加的，她参加了，该做的事体，她做了。她就是郭彩娣所讲的那种少数人当中的一个：你推他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他就不动；整天只顾忙生产，忙完就走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好像同她没有多大关系。但她并不是对伟大的五反运动不抱有希望，也不是怀疑五反运动会不会和重点试纺一样，不了了之；她当然不了解杨健和余静她们商量好了，要在五反运动中同时解决重点试纺和生活难做问题；不过，正如杨健所说的“当群众还没有亲身体会到运动和他自己的关系时，当然不会主动积极的。”她因此对五反运动持保留态度，一切事体随大流，缺乏主动积极的精神。汤阿英约她谈话，她自然不会积极响应的。

她翻来覆去想不起汤阿英要和她谈些啥，横竖

答应了，只好带只耳朵来听听。今天早上十点以前，她就到厂里来了。现在她坐在工人文娱室里，拿了一份《人民画报》，迎窗坐着，随便翻翻。汤阿英赶到文娱室，大步走了进去，拍了拍她的肩膀，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来晚了一步。”

谭招弟回过头去一看，见是汤阿英，便放下《人民画报》，站起来，亲热地招呼：

“没啥关系，我也刚到不久，快坐下来歇一歇。”

她们两人坐在迎窗的小桌子两边，桌子上有一副象棋盘，不知啥人下了象棋，没有收起，那副残局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汤阿英看了文娱室一眼，空荡荡的，没有人，早晨的阳光从室外射进来，显得屋子里清静明朗。汤阿英接着说：

“我早就准备来了，可是巧珠奶奶不放；她一早去买了小菜，要我和学海在家里过一个厂礼拜，大家团聚团聚；一听说我约人到厂里来谈话，脾气就来了，厂礼拜还到厂里约人谈话，那叫做啥厂礼拜啊！……”

谭招弟心里想：巧珠奶奶说的对啊！汤阿英不过厂礼拜，连带把谭招弟也拉来，真是舍命陪君子，唤起她内心的不满。可是听汤阿英讲下去，谭招弟的面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晕。汤阿英说：

“也难怪巧珠奶奶，七天才逢到个厂礼拜，希望大家在一起过一天，老人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她不知道我们厂里正在热火朝天开展伟大的五反运动，啥人在家里坐的住啊，不到厂里来，也会到工人姊妹家里去，商量商量哪能把五反运动搞得好上加好，给五反运动出点力，肃清了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那辰光再好好过厂礼拜也不迟啊！招弟，你说，对啵？”

谭招弟感到汤阿英不是在说巧珠奶奶，仿佛在批评她。她红着脸，羞愧地不好承认，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不高，心里挂念着家务事，想利用厂礼拜收拾一下，没有想到利用厂礼拜给五反运动多做点啥。她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对呀！别说巧珠奶奶，老实讲，我也有这个思想，你昨天晚上约我，本来我也不想来的……”

汤阿英没有直接批评她，反而鼓励她：

“你今天来了，就很好。”

“幸亏你帮助，要不，厂礼拜我不会坐在文娱室里听你谈话。”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一桩事体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并不稀奇，只要后来做对了，就好了。我有些事体也是别人帮助的，特别是余静和秦妈妈对我的帮助最大。”

“你给我的帮助也不小哩！”

“不，我对你的帮助不够，平常上工，大家都忙，难得在一道谈谈心，我接近你不够，是我的责任……”

“不，”谭招弟见汤阿英鼓励她，却批评自己，感到过意不去，便打断汤阿英的话，说，“是我的责任，特别是车间里生活难做以后，我接近你太少了。”

“我们以后多接近接近，把我听到的事体多给你讲讲。”

“好哇！”谭招弟望着棋盘，说，“好比下棋，别人的兴趣很浓，我也看，可是看不懂，不了解每一步棋的意思。你要是把每一步棋的意思告诉我，我懂了，当然就有兴趣。做事体也是这样的，大家做的事体，我也做，心里可不晓得为啥要这样做，有人告诉我了，道理懂得了，我谭招弟绝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

“我了解你这个脾气。”

“以后有啥事体，你多给我讲讲。好啵？”

“当然好。”汤阿英望着《人民画报》上几幅郝建秀工作者的照片，说，“最近每个车间都写了许许多多的检举信，我听余静和张小玲同志讲，清花间写了，钢丝车间写了，粗纱间写了，打包间写了，连职员们也写了不少。我们细纱间写的比较多，在厂里数一数二哩。当然，我们不能骄傲自满，还要继续写检

举信，别的车间发展很快，我们不努力，就会落在别的车间后面。筒摇车间虽然现在写的不多，只要群众进一步深入发动，很快也会赶上来的。”

谭招弟听到汤阿英介绍厂里各个车间写检举信的情况，兴趣很浓，胸襟开阔一些，眼光也看的远一些。过去，她只晓得筒摇间的事体，特别是她挡车附近姊妹的情况，别的车间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了。她本来以为筒摇间的“五反”工作做的还不错，和其他的车间一比，就看出了差距。她焦急地说：

“筒摇间写检举信哪能落后了？”谭招弟是个要强好胜的人，做生活不推扳，细心负责，总希望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多一些，也希望筒摇间工作在厂里比别的车间好一些多一些。这次写检举信，如果不是汤阿英今天约她到厂里来谈，她还不了解哩。她急着问，“能赶上去吗？”

“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赶上。我听余静同志讲，每个运动开头的辰光，因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先进，有的后进，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随着运动的发展，就会发生变化，后进单位经过努力，可以转化为先进单位。就拿细纱间来说，也有后进的，董素娟就是其中的一个。筒摇间现在和别的车间虽说有些差距，不要紧，赶上来就是了。你在筒摇间的威信很高，加点油，带带头，……”

汤阿英这一番话，谭招弟句句听的进，领会了今天找她谈话的意思。杨健和“五反”检查队领导厂里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党支部、团支部和工会都召开了大会，甲班和乙班的群众动员大会开过了，最近诉苦大会各个车间也陆续开了，杨健和余静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检举资本家的五毒不法行为。这问题提到她面前来了，当时给自己的解释是：不了解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哪能检举呢？她到现在还没有写检举信。在杨健的号召下，各个车间的工人纷纷写了检举信，雪片也似的送到“五反”检举队的办公室，有的工人写了一封，想到了新的材料，接着又写。筒摇间和别的车间比起来，写的不算多，还有少数工人一封还没有写哩。群众工作组负责人秦妈妈曾经到筒摇间“五反”分队去，召开了小组会，她在会上再一次谈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阶级这次要把五反运动领导的好，彻底消灭资本家的五毒不法行为，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今后一定要规规矩矩办事，否则工人阶级不答应，人民政府也不答应。工人同志们，要响应杨健和余静的号召，检举资本家的五毒不法行为，已经写了的还可以写，没有写的要抓紧时间写。秦妈妈和张小玲知道谭招弟是汤

阿英介绍到厂里来的，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就分配她除了找细纱间的工人谈话以外，也找谭招弟谈谈。谭招弟想起秦妈妈在筒摇间小组会讲的那些话，再听汤阿英对她说的这一番话，感到自己应该写检举信。她惭愧地说：

“检举信，我一封还没写哩。”

“有啥困难？是不是找不到人代笔？”

“我自己勉勉强强也可以拿笔，只是了解的事体少，也不具体……”

“那不要紧，全厂工人都检举，你检举这方面的材料，他检举那方面的材料，凑在一道就多了，也具体了；把徐义德的五毒全部检举出来，杨部长和‘五反’检查队领导我们和徐义德斗争，他就隐瞒不了，也赖不了账，这样才能彻底肃清他的五毒不法行为！”

谭招弟进一步了解写检举信的重要性，更加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写检举信是不对的，兴奋地说：

“我要写……”

汤要英看到她下决心要写，一时又想不起写些啥好，便启发她道：

“徐义德的五毒真多哩，那一阵子，车间里的生活为啥难做？徐义德一定在里面搞了鬼……”

谭招弟回忆筒摇间生活难做的情景，立刻想起

加速减牙的事，她拍了一下棋盘，兴高采烈地说：

“想起来了，那辰光工务上要筒摇间加速减牙，八十牙改成七十八牙，甚至到七十七牙，以粗报细，造成圈长不足，这是徐义德搞的鬼：减料！”

“想想加速减牙一共有多长时间，这笔账算起来可不少啊！”

谭招弟低着头，面对着《人民画报》绚丽的封面，一边拨弄着右手的指头，在暗暗计算，一霎眼的工夫，她抬起头来，说：

“有半年多时间！”

“这个材料很重要啊！”

谭招弟受到了鼓励，她更加努力去想，记忆的大门开了，往事纷纷在她眼前呈现，她说：

“过去我听人讲过，徐义德曾经给成包间下过条子，不用包纱纸，打大包，可以多拿十个工缴。这是减料，又是偷工，大概有两年光景。”

“这个材料也很好，你了解的材料很不少啊……”

“还有呢……”

谭招弟正要说下去，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女工，头上两个小辫子垂在脊背上，一晃一晃地走了进来，看汤阿英和谭招弟谈话，便在文娱室门口停了下来。汤阿英看了看文娱室墙上的电钟：正好十一点。她

说：

“你真准时，刚刚十一点，你就到了。”

“你不是约我十一点到文娱室来吗？”

“一点不错，”汤阿英点点头，然后对谭招弟说，“你想到的这些材料都很好，你今天要是没有别的事，就把它写出来，好不好？”

“好，今天一定写出来。”

“你回家写也可以，明天带到厂里来。”

“不，还是在厂里写得好，有些事体一个人想的不完全，还可以找人谈谈，大家互相启发启发，可能还会发现新的材料。”

“在厂里写当然更好。”

“今天不写出来，我就不回去。”谭招弟决心很大，劲头十足，早把厂礼拜忘了。

汤阿英向文娱室门口那个青年女工招了招手，说：

“来吧，董素娟。”

谭招弟兴冲冲地走了。董素娟坐到谭招弟刚才坐的位子上，汤阿英和她谈了起来……

37

从中山公园开出的二十路无轨电车，一到了静安寺，车上的乘客争先恐后地往下拥，生怕搭不上一路有轨电车，只有陶阿毛不慌不忙，他走在所有的乘客最后面，从容不迫地跳下了电车。这时，下了电车的人早已上了别的车子，或者向各自的住处走去。

街上的电灯已经亮了。老大房的灯光特别亮，从里面散发出各种食品的香味，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横过马路，想买点熏鱼带回去下酒。刚走到老大房门口，闪的一下，一个熟悉的背影从他眼前走过。他的眼光随着那背影望去，嘴里说：“一定是他！”他赶上两步，冒叫一声，“梅厂长！”

那个人应声回头一看，见是陶阿毛，面孔变得铁青，眼光老是向四面张望，生怕被什么熟人发觉似的。陶阿毛见那神色，立刻走到他身边，低声地问：“到荣康去坐坐？”

“不……”

“那里清静，没啥关系……”

梅佐贤见老大房附近人太多，讲话不方便，只好

跟陶阿毛一同过了马路，走进荣康酒家。上了楼，贴马路的那间小房间正好空着，他们两个人坐了下来。服务员送茶进来。陶阿毛随便要了点酒菜。梅佐贤见服务员离开了小房间，立刻慌张地说：

“你胆子好大呀，阿毛！”

陶阿毛给梅佐贤突如其来地一问，有点愕然，不解地望着他：

“哪能？”

“你晓得现在是啥辰光？”

陶阿毛看看自己的手表，轻松地说：

“六点三刻。”

“我不是问这个……”

“你是说厂里正在‘五反’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点点头说，“正在‘五反’，我连汽车都不大敢坐，刚才你在老大房叫我梅厂长，万一给人看见，以为我们是攻守同盟哩。”

“就是攻守同盟也不怕……”

“嘘！”他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陶阿毛，叫他不要讲下去。

陶阿毛凑过去，把声音放低一点，问：

“怕吗？”

“现在风头不对，凡事不能赶在风头上。”他的声音比陶阿毛更低微，哀怨地说，“我在厂里和任何人

都不打招呼，低头进低头出，避这个风头。”

“‘五反’这股风把你吹倒了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口头上否认，实际一听到“五反”就感到吓丝丝的，“何必一定要顶着风走呢？”

陶阿毛不再和他辩论下去，把话题转到徐义德身上：

“你最近碰到总经理没有？”

“没有，只通过一两次电话。他问起你，为啥最近不照面，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叫人着急的不行。”

“找你，你又怕。”

“突然叫我，给人发现对你我都不方便。要是事先约好，当然没啥关系。”

“在厂里找不到机会，我也怕叫人发现，以后工作就难做了。”陶阿毛说出心里的话，他最近确实想找梅厂长谈谈，总捞不到适当的机会。今天无意在老大房碰到，就忍不住大声叫住了他。陶阿毛担心徐义德顶不住，如果都坦白交代，他在沪江纱厂就站不住脚了。他关心地问，“总经理顶的住吗？你说。”

“总经理顶的住的，他说有两怕：一怕大家心不齐，二怕检举。”

“这两桩事体都不必怕……”

陶阿毛刚讲了一句，服务员端进一盘芙蓉鸡片和一壶老酒，放在他们两人面前，巴结地说：

“今天老酒可好，是加饭的……”

陶阿毛“唔”了一声，改口接上去说：

“等了很久，肚子倒饿了。”他提起酒壶给梅佐贤斟了一杯热腾腾的老酒，笑着说，“来，干一杯！”

“我敬你一杯！”

他们两人干了一杯。服务员看他们的兴致很高，凑趣地说：

“要不要加点下酒的菜？”

“不要了。”

陶阿毛向服务员挥了挥手。服务员马上弯腰退了出去。

半晌，陶阿毛接着说下去：

“这些事和大家都有关系，一定心齐。你说，谁不为自己打算打算？坦白交代了，自己吃的消吗？”

“这话也有道理。”梅佐贤虽然同意，但马上接着忧虑地说，“就怕有的人吃不消。”

“不怕风再大，总要过去的。我想不必担心。”

梅佐贤不同意陶阿毛乐观的估计。他仍然很焦虑，皱着眉头说：

“只要有一个人说出去，就全完蛋哪！”

“不会有人说出去的，”陶阿毛依然信心很高，反问梅佐贤道，“啥人会说？”

梅佐贤把他认为可能有问题的人一一数过去，

觉得每一个人都可靠，又都不可靠。他没有把握。他叹息了一声，说：

“很难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听说‘五反’工作队收到不少职工的检举材料哩！”

“我是群众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别的我不知道，这个我可清楚。”陶阿毛说到这儿眉飞色舞，仿佛他真的看过检举材料，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职工检举材料的内容，钟珮文和叶月芳负责保管和整理材料，对无关的人从来不谈。他端起酒杯一口喝完，给梅佐贤和自己又斟满了一杯，得意地撒谎说，“全是宣传攻势，啥检举材料，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告诉总经理，这方面，他放心好了。”

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梅佐贤放心了。但是他还有点怀疑，问：

“真的没有重要材料吗？”

“当然真的。”陶阿毛没有看过别人的重要检举材料，可是表面上装出来好像看过全部检举材料的样子。他很认真地说，“我骗你做啥！”

梅佐贤忽然感到浑身非常轻松，就像是放下一副千斤重担似的，微笑地说：

“我也料到不会有啥重要材料的。”

“你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总经理，叫他放心。”

“总经理那方面倒不怕，就怕别人嘴不稳。”

“啥人嘴不稳，啥人吃亏。”

“那是的。”梅佐贤听陶阿毛这么一说，胆子慢慢壮了，“顶过这阵风，就没事了。阿毛，还有啥消息吗？”

陶阿毛凝神想了想，说：

“别的没啥重大消息。”

“有消息随时告诉我。厂里不方便，可以打电话到我家里的，——最好晚上打来，白天人多嘴杂。”

“好的，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你的工作不容易做，得小心点，别露了马脚。”

“你放心，我的厂长。”陶阿毛拍拍胸脯，说。

服务员送进来一盘软炸里脊。这一次是梅佐贤先举起杯，对陶阿毛说：

“来，干一杯！”

陶阿毛会意地端起杯来。

38

陶阿毛从荣康酒家走出来，还不到八点。他站在一路电车的站头上等车，想找个地方去白相，看到斜对面“百乐门”舞厅霓虹灯的光芒，想去跳舞，回去

换衣服太晚了，不换吧，那身蓝布人民装又不像样子。看电影吧，一个人又太单调。正在犹犹豫豫，从愚园路那边又开来一辆二十路无轨电车，乘客下来，纷纷走了，只有一个年青的少女慢慢走到一路电车的站上。他笑盈盈地向她点了点头，问她：

“到啥地方去？”

“看电影去。”她暗暗注视了他一下，说。

“哪家？”

“美琪。”

“一个人吗？”

“当然一个人，还有啥人？”

“肯请我看电影吗？”

这一句话问得对方很为难，使她不好拒绝，只好说：

“要看，我请你。”

一路电车从常德路那边轰轰地开过来，天空电车线上时不时爆发出绿色的火花，站在车头上的司机拼命踩着铃，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叫行人让开。车子到了站头上，乘客下来以后，陶阿毛让她先上车，他接着上去买了票。

到了江宁路口，陶阿毛先跳下车，转过身子，很体贴地扶着她下来。等电车开过，他望了望马路两边的车辆，很小心地搀着她的手，像个保镖似的，保护

她穿过马路。一到江宁路上，她撒开手，加紧步子，一边打开手里的小红皮夹子拿钞票，赶着去买票。

他走的步子比她更快。她走得有些气喘了，还是跟不上，等她赶到美琪电影院门口，他已经买好了两张票。她心头一愣，问他：

“我请客，哪能你买票？”

“不是一样的吗？怕你来迟了买不到。”

她把手里的人民币送到他面前，说：“代我买，谢谢你。给你钱！”

他指着右边的楼梯，说：

“快开映了，进去吧。钱你留着，下次请好了。”

她只好跟他走去，坐到楼上最后一排的右边。她不明白陶阿毛是怎么一回事，要她请客，他自己却买了票。主人成了客人，客人倒变成了主人。她望着手里的那张钞票，迷惑不解了。

他若无其事地坐在她左边，望着舞台上的紫色丝绒幕，同时，眼光暗暗向她右边斜视。她又把钞票送过来，他摇摇手，很生气地说：

“你这样看不起我吗？”

“哪能看不起你？”

“难道我万把块钱也出不起吗？”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请客么。”

“你下次请好了。”

她一时答不上话来。这次请他是碰巧遇上的，而且又是他“将军”“将”出来的。下次请，她不愿意，嘴上却又不好说出口。他代她说了：

“我晓得你请客是勉强的。下次不愿意请，也没关系，你这种人，啥人也不愿意和你往来。”

“这是啥闲话？”

“你太厉害了！”

“啥人讲的？”

“背后哪个不讲你？事事斤斤计较，从来不肯让人，连讲话也不饶人一句。啥人也不愿意和你往来。”

她从耳根子红起，一直红到脸上。当面这样毫不客气地严厉地说她，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去，她听到的尽是些恭维话，谁也不敢碰她一下。她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在电影院一千多个观众里面觉得自己很孤立。她努力保持着镇静，不表露出来。她想知道别人对她的意见：

“还有啥？”

“多着哩。”他说了这句话，不再往下说。

“你讲讲看。”

她望了他一眼。陶阿毛在她的眼中忽然变得亲近起来。她没想到他这样关心自己，别人对她的意见他都记在心里，并且告诉了她。他年青，有技术，人缘好，可是对她的态度却有些儿冷淡。她等了一会，

见他没有说，便要求道：

“讲啊。”

“怕你吃不消。”

“不要紧。”

舞台上的紫色丝绒的幕慢慢拉开，露出雪白的银幕。从乳白色屋顶和墙壁当中放射出来的电灯的光芒慢慢暗弱下去，直到灯光完全消逝，银幕上随着立即出现了七个触目的大字：《内蒙人民的胜利》。他低低地说：

“开映了，以后再谈吧。”

她不好再要求，也没法把钞票给他，只好放到小小的红皮夹子里去。她打开黄铜的拉链，里面有一封信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帘。她连忙把钞票放进去，把拉链拉起。她窥视一下他注意这个没有。他的眼光正对着银幕上的茫茫的大草原，幸好没有看到皮夹了里的信件。

这信是钟珮文写来的。虽然钟珮文几次对她的表示都碰了钉子，但是他并不失望，今天又写了一封信给她。她越是不答复，他越想得到她的答复，哪怕是一句话也好，甚至写一个空白信封也可以，只要上面有她的笔迹便可以得到无上的安慰。他在厂里总设法寻找她，跟随着她，只要有她在场，不管啥场合，也不论是谈论啥，他都感到十分有趣。管秀芬呢，却

完全相反。每收到他一封信，她老是匆匆看过，马上撕碎。特别是开头的亲密的称呼和末尾的署名，要撕得粉碎，使人辨认不出来是谁的信件。她一见了她，就设法避开，如果是没法避开的场合，就离得她远远的，用脊背朝着他。能够看到她的背影，他也感到喜悦。第二天，会又给她写信，并且详详细细地描述当时对她爱慕的深情。

今天出厂，她收到这封信，意外地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看了三遍，不但没有撕碎，而且折叠得好好的，放在红皮夹里。她从信上的字里行间看到他真挚感情的流露，使她心上感到一种温暖。她搭上从中山公园门口开出的二十路无轨电车，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钟珮文的亲切的热情的面影时不时在她面前出现。她第一次感到老是这样不理睬他也不太对，本来大家在一道工作、开会，很熟悉的，现在见了面为啥反而陌生了？双方都很尴尬。钟珮文不懈地对她追求，固然增加她的高傲，可是给他也太难堪，何况他人也长的不错，既聪明，又有学问哩！她的少女的心给钟珮文的衷心的热爱打动了。她准备回家给他一封复信。因为时间还早，好久没有看电影了，决定一个人去美琪看《内蒙人民的胜利》。她没料到下车遇到了陶阿毛，更没料到给陶阿毛三说两说竟一同走进了“美琪”，并且钟珮文的信险些叫他看见。

现在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两个亲切的面影：钟珮文和陶阿毛。她过去总以为陶阿毛看她不起，她也就把对他的好感暗暗埋藏在心里。从今天看来，说明她的判断不一定正确。藏在心里的微妙的感情苏醒过来，她坐在他右边有了另外一种感受。一个秘密的希望在她的心里抬起了头。钟珮文的面影在她面前逐渐缩小，留在她眼前的是陶阿毛的英俊的仪表。她脸上热辣辣的，不敢朝陶阿毛那个方向望一眼。她低下了头，觉得给人看到不好，又抬起了头，勉强注视着银幕。

银幕上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在蓝色的天空下，有一座美丽的帐篷，穿着内蒙民族彩色服装的人们在里面一边饮酒、一边在谈论。帐篷外边拴着几匹骏马，好像经过长途的奔驰，现在休息了，用前蹄踢着草地玩耍。帐篷后边的远方，是一座蓝蓝的高山，几乎和天空的颜色分辨不出来，因为天空有一朵朵白云在迟缓地飘浮，才显出尖尖的山峰。

她开头没注意看，现在从中间看去，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想问问陶阿毛，又不好意思开口，不然，他问起刚才为啥没看，怎么回答呢？她没言声，细心地注意看下去。

陶阿毛早看出她神色有些慌张，特别是红皮夹子里的信封引起他的注意。她窥视他的辰光，他有意

把眼光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等她低下头去，他又斜视着她垂在肩膀上的黑乌乌的辫子。她抬起头来，他的眼光又完全在注视银幕了。他也看得不连气，看一会，又不看，简直摸不清故事的发展，只看到片断的美丽动人的画面。

电影完了，两个人都没有看完，甚至可以说等于没看。但是两个人都好像真的看完了。陶阿毛说：

“这片子很好。”

“动人极哪。”管秀芬说完了，露出赞美的眼光。

“内蒙这地方真美丽！”

“是呀！”她点点头，说，“我还想看一遍。”

“唔，我也想看第二遍。”

她随便说了一句，马上就给他抓住了。她不知道怎么说是好，随着人群慢慢下了楼梯。他见她不说话，有意放慢了脚步，让身后的人群过去，使他们两人留在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观众全走完了。他对她说：

“下次让你请客，好啵？”

“你说啥辰光吧。”

“明天我没空，”他想了想，说，“后天吧，下工以后，看第三场，好不好？”

“好的。”

“这次你可要先来买好票等我……”

“架子倒不小！”

“啥人的架子也比不上你。”他笑了一声，说，“那么，再会吧！”

“再会，”她感到他说得很突然，来不及再和他说啥，他就招招手向南京西路的方向走去，她注视着那高大魁梧的带有点骄傲的背影，站在美琪门口，竟忘记回去了。幸亏路过美琪电影院门口的无轨电车的清脆的叮叮当当的铃声，把她从梦一般的境地里唤醒。

她拔起腿来，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一跨进家里的门，便从红皮夹子里抽出钟珮文给她的信，扯得粉碎。

39

谷雨还没到，汤富海就带着阿贵在田里松土、灌木，准备下种了。等到小秧出来，汤富海每天都要到田里看一看水多少，看一看苗的稀密，寻找有没有缺苗的地方，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关怀刚出生的婴儿。立夏过后，他家的秧苗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既整齐，又肥壮。

一轮新月高高挂在梅村镇的上空，照得村外的庄稼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轻纱，若隐若现。下地的人早回到家里吃了饭，蹲在屋子里休息了，准备明天一清早起来再做庄稼活。

汤富海在家里吃过晚饭，悄悄走出村东边，在一条白线也似的田埂上走去。他走到那二亩八分地旁边站了下来，望着那一片绿油油的秧苗，从心里笑出来了。他如同一位将军在检阅自己培养的部队，从这边走到那边，注视每一棵秧苗的成长。

月光朦胧，稍为远一点的秧苗就看不大清楚。他走过去，蹲下来，用手轻轻抚摩着秧苗，看来看去，舍不得离开。月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的腿蹲酸了，慢慢站了起来，望着辽阔的原野，心情十分舒畅。他独自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喃喃地对自己说：

“有苗三分收。苗长得这么好，丰收有把握了。今年丰收，买点衣服，留点钱；争取明年再丰收，买个牛犊养起，有空让阿贵去念念书。他长的这大，还没有跨过学堂的门哩！……”

未来生活美丽的图景一幅又一幅地在他眼前浮现，就像是站在村边遥看远方月光下太湖美丽的景色，永远看不够。他沉浸在未来幸福的生活里，浑身感到轻松，仿佛刚刚洗完一个热水澡。他离开田埂，

向村里走去。一眨眼的工夫，就走进了朱暮堂的高大的青砖门墙。

阿贵从大厅当中那间屋子走出来，一见爹，便嬉着嘴笑了，显然期待很久了。他迎面走上来，问：

“你到啥地方去哪？”

“到田里去啦。”

“这么晚了，又上田里去？”阿贵奇怪爹这一阵每天要到田里去三趟两趟，喘了口气，说，“我在村里到处找，农会里，学校里，小铺里，……全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你，原来是在田里！”

“有啥急事要到处找我，你老子活的这么大了，会不见了吗？”

“我找你商量一桩事体，”话到了嘴边，阿贵犹豫地没有说出口，怕爹不答应。不告诉爹呢，又不行。歇了会，看看爹的脸色很开朗，额头上和眼角上顽强的皱纹里隐隐含着笑意，知道爹这时心里很高兴，便大胆提了出来，“我想报名参军，你答应我，爹。”

“参军？”他圆睁起两只眼睛吃惊地瞪着阿贵，刚才浮现在眼前的一幅又一幅未来生活美丽的图景立刻消逝了，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过去生活的悲惨的画面。他走进大厅当中那间屋子，坐了下来，叹息了一声，迟缓地低低地说，“你妈死了，你姐姐在上海，留在我身边的只是你。你要去参军，把你老子一个人

扔在家里？日子刚好一点，就要远走高飞了，田谁去种？你老子死在家里也没人晓得哪。”

“参军也不是坏事，村里很多人都报名参军。”阿贵随着爹跨进屋子，紧紧站在爹旁边，耐心地想说服爹，“抗美援朝呀！”

“抗美援朝，我晓得，打美国狼不是？地主阶级是美帝国主义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土地改革把地主阶级消灭了，美帝国主义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他还敢来？”

“地主阶级消灭了，地主真的死心了吗？爹，你说朱筱堂死心了没有？”

“朱筱堂？他在我们管制之下，他敢动一动，我不拿扁担把他打死才怪哩！”

“地主不会死心，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会死心的。”

“啥人讲的？”汤富海觉得儿子的话蛮有道理，但是做父亲的哪能好听儿子的话，这不是反常了吗？他问，“啥人讲的？”

“村干部讲的。”

“这个我晓得。我们的国家，上至天，下至地，东南西北，美帝国主义敢插进一根草刺来？他别做梦，眼下不比从前哪，现在人民坐了江山！”

“美国赤佬在走东洋人的老路，占了我们台湾，

进攻朝鲜，轰炸我们东北同胞，你不晓得吗？日本鬼子、反动派、地主恶霸和美国赤佬都不是好东西，都是穷人的死对头。现在我们翻身了，不能再叫敌人来压迫，又吃二遍苦，要拿起枪杆打美国狼才是！”

“打仗是政府和解放军的事。”爹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把田种好了就行。”

“参军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呀，爹。”阿贵想起村里干部的话，也理直气壮地说，“要先有国，才有家呀！过去我们吃辛受苦，因为那时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是反动派的。现在国家和政府都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要先保住这个国，才能保住家，才能种好田，才能过太平日子啊。……”

爹轻视地把头一歪，显出不屑去听的神情，打断阿贵的话，插上去说：

“儿子训起老子来了。哼，告诉你，这些道理，你老子全晓得。你老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苦也比你多吃了几十年。用不着你教训我。”

爹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赞扬阿贵这孩子有出息。村里动员青年参军抗美援朝他是知道的。他早打定主意想让阿贵去，代阿贵报了名。因为他家只有两口人，又是独生子，村干部不同意。现在阿贵自己要去报名，讲了这番大道理，他心里觉得这些话很对。他想试试阿贵有没有决心，装出很生气的样子。

阿贵这次并没有因为爹生气而不说下去，而且说得很有条理：

“你不参军，他不参军，谁去抗美援朝呀？村里有很多青年报名了，我去参军，村里会有人给我们代耕的。爹，你让让我去，好不好？”

阿贵恳求地摇一摇爹的肩膀。爹有意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增加了理由：

“你去参军，他去参军，大家都参军，田不要种哪？饿着肚子打仗？我知道抗美援朝是好事，保家卫国理应当。你也应该想想家里。我要是有两个儿子，你不去，我还要给你报名哩！”

听到这几句话，阿贵闭着嘴不言语了。其实阿贵今天已经去报过名，因为是独生子，没有接受。他奇怪地把村干部望了又望，过去旧社会抽壮丁，人们不肯去，要用绳子捆着，鞭子打着，半路上还有人开小差的。新社会参军，比选女婿还难。独生子就不能抗美援朝了吗？天下哪有这个理。村干部不同意，他没有法子，打算和爹商量商量，爹要是同意了，他们一同再去找村干部交涉。想想家里的情况：自己一走，留爹一人在家，怪孤独的，有事没有一个依靠。不过，自己还想试探一下，幻想也许能够说服爹。爹进一步说：

“留在家里生产，帮助军属代耕，也是抗美援朝

呀！”

阿贵以为爹决心不让他参军，便气呼呼地说：

“你不同意，我自己报名去。”

他走下台阶，装出真要报名去的神情。

“你有本事报上名，你就去！”

“真的吗？！”

“老子给儿子讲话，还有假的！”

“你同意吗？”

“村干部同意，我就同意。”

“我们一道去。”

“人家不要我这个老头子参军，我去做啥？”

“帮我同干部讲讲。”

“你不是有嘴吗？”

“我讲过了，因为是独生子，村干部不同意。”

“我也讲过了，村干部不同意独生子参军。”爹晓得阿贵也报了名，心里高兴得忍不住笑了。

“参军没有希望了吗？”阿贵从台阶上走回来，焦急的眼光望着爹，说，“可以不可以再和村干部商量商量？”

“商量了不止一次了，要是有什么办法，我早送你去参军了，还等你来和我说！”他想起田里的秧苗，算了一下今年的收成，给阿贵商量，“村干部不同意你参军，我们一同订个爱国增产计划吧，保证每亩地收

他四百五十斤，每亩地拿出一百五十斤来捐献飞机大炮，打美国狼！……”

阿贵不等他讲完，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一对闪着喜悦光芒的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孔：

“爹，我双手赞成。你为啥不早说？”

“老年人做事不能像你们毛手毛脚的，要想好了才行。不好冒冒失失乱说，做不到不是叫人笑话！”

阿贵没想到自己兴冲冲地拥护爹的计划，却被爹训了几句。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轻轻地“唔”了一声。

订了爱国增产捐献计划，父子两人的生产劲头更大了。他们的两亩八分地里水老是车得满满的。过去，顶多拔三次草，今年拔了五次，加上肥又施的多，他们的稻子比哪一家的都长得快。可是老天不帮忙，过了六月下半月，接连几十天不落一滴雨点，塘里的水快干了。

在火炎炎的六月阳光的照耀下，稻子长得齐腰高，一眼望不到尽头。在热风的吹拂下，起起伏伏，像是绿色的波浪似的。汤富海和阿贵走到塘边的牛车旁边，把棍子撬在牛车上，用人力车水。他们两人走了没几步，浑身汗淋淋的。阿贵推着牛车，头昏眼花，慢慢伏在车上竟然打起盹来了。爹看见了，一巴掌打在他的脊背上：

“哪能睡着了？”

“累的不行，”阿贵眯着惺忪的眼睛说，“歇会儿吧，爹，你也累了吧？”

“我不累。”爹摇摇头，说，“做了这点活，累啥？亏你还是年青小伙子哩。人家说志愿军在朝鲜，几天几夜不吃东西不睡觉，还在前线和美国狼拼哩。我们车点水，就累了吗？不车好水，捐献计划完不成了，快走！”

爹推了他一把，两个人又慢慢向前走去，塘里的水给车到田里。稻子有了水，长得饱满结实了。

爹望着稻子，心里像是开了花，嘴笑得合不拢来，对阿贵说：

“我活了快五十啦，没有看过这样的好庄稼。土改以后又丰收，真是小两口结婚，欢喜在一起哪。今年是个双喜年，写封信给你姐姐，要她和你姐夫回来同我们一道快快活活过几天好日子。”

“好的，好的。”阿贵笑着直点头，说，“我真想看看姐姐和姐夫哩。”

“写封信叫你姐姐快回来。”

“她在上海正忙着‘五反’哩，马上能回来吗？”

“‘五反’怎么样？”汤富海想到要做啥事体，一定要做到。要是谁不赞成，他心里就不高兴。他瞪了阿贵一眼，说，“‘五反’，连家也不能回吗？上海到

无锡，只有几个钟头呀，再忙，回家住两天总可以的啊。”

“姐姐能回来再好也没有了。”阿贵顺着爹说，“那么，找啥人写信呢？”

“谁写？我肚子里没有喝过墨水，只好求人哪。”

“我去找村里小学老师写……”阿贵拔起腿来要走。

汤富海怕阿贵说话不恳切，拦住他的去路，说：“你看家，还是我去吧。”

他迈开步子，朝门外走去。

40

太阳已经落山，白云在蓝色的天空上冉冉地飘动。暮色从田野慢慢升起，鸡上了窝，家家户户的烟囱袅袅地冒出一阵阵炊烟，萦绕在村的上空，像是茫茫的云雾一般。

朱筱堂看到村里庄稼长得那么好，想起爹活着的辰光，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恨不能伸手去打那些满脸笑容的农民，发泄内心的仇恨。他眼看着朱家的地都给人分掉了，地上庄稼过去都是朱家

的，现在全是别人的。他垂头丧气迈着懒散的步子，蹒跚跚跚走了回来。他走进屋子，一见了妈，心中的愤怒不禁流露出来了：

“哦，汤富海这些人可抖啦！”

“怎么样？”

“庄稼长得好，他可高兴哩，满面笑容，真叫人生气。”

“你何必生那个气呢？”

“太太这话说的对啊！”

朱筱堂进门只顾和娘讲话，没看到屋子里还有一个人。他朝讲话的地方一看，见苏沛霖坐在靠墙角落那边，高兴地走过去，说：

“你在这里？”

“唔，村里人都忙着，特地来看看你们。”

他望见窗外的暮色浓起来了，不远的房屋和桃树都有点看不大清楚了。

“你选的时间倒好。”他对苏沛霖说，“你看到他们那个高兴劲道，不生气吗？”

“当然生气。”苏沛霖放低了声音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朱筱堂把门问好，和他娘一同走到苏沛霖面前，急促地问：

“啥好消息！”

“你们听！草头将军不出世，社会永无安宁日。一九五二年，应该改皇元。谁要分人田和产，子孙万代难还原。汤富海这些人高兴不长的，别看他现在占了便宜，他的子孙要得到报应的。”

“真的吗？”朱筱堂的两只眼睛凸得大大的，仿佛要跳出眼眶似的。

“那还有假！说不定就应在阿贵的身上。我见了这些人，心里替老爷难过，不过，想到这两句话，也得到了安慰。”

“前面的话是啥意思？”娘问。

苏沛霖对着母子俩小声地说：

“草头将军就是指老蒋，蒋总统。他不回来，社会永远不会平安的。一九五二年，应该改朝换代，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了。”

“一九五二年不就是今年吗？”朱筱堂听了心中十分欢喜，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就是今年。”

“那快啦。”娘抓住苏沛霖的手，眼睛闪闪发光，问他，“这是谁说的？”

“这是神仙说的。”

“啊！”她大吃一惊。

朱筱堂有点莫名其妙，不解地注视着苏沛霖。苏沛霖不慌不忙地说：

“真的是神仙说的。扶乩扶出来的乩训，一点也不假。”

“那是完全可靠的。”她一向对扶乩和菩萨是非常相信的。她说，“老蒋回来就好了，我们可以有出头的日子了。”

她在计算给分掉的田地、房屋、耕畜和粮食，将来可以回到朱筱堂的名下。母子俩搬回家里去住，梅村镇这一带泥腿子又在她们手下过日子，要他们往西，他们不敢往东。她脸上闪着笑纹，喃喃地问自己：

“我怎么没有听人家说呢？”

“我听说过。”

“你啥辰光听到的？为啥没给我提过？”

“从前不是告诉过你，老蒋要回来过中秋节吗？”

“孩子，你差点把我弄糊涂啦。这是过去的事。中秋节不止过去一个，老蒋也没有回来的影子。”

“那是谣传，没有根据。”苏沛霖解释道，“这回是乩训，神仙说的，不会错。”

“老蒋能回来吗？”

“当然能，老蒋有美国后台。”

“苏管账说得对，老蒋有美国后台。共产党怎么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在朝鲜正在打共产党，我看朝鲜人民军和解放军是抵挡不住的，说不定啥辰光打过鸭绿江，美国人一到东北，事体就差不多了。”

娘对于儿子的话不大相信，转过脸去，问苏沛霖：

“你说是吗？”

“只要美国到了东北，或者到了上海，共产党一定垮台，老蒋跟着就会回来。”

“这么说，老蒋今年一定要回来啦？”

“大致差不多。”

朱筱堂听了苏沛霖比较肯定的回答，顿时眉飞色舞：

“到辰光，哼，瞧我的！我给爸爸报仇，头一个就把汤富海抓住。他一定是共产党，先把他干掉再说！”

她对他连忙摇手，说：

“这些话，千万不能乱说，记在心里就好了。”她并非不痛恨汤富海，可是她更痛恨干部，说，“汤富海不过跟在共产党屁股后乱哄哄，最可恶的是那些干部。没有他们，汤富海的腰板没有这么硬！”

“太太说的一点也不错，没有干部，汤富海算啥？要是在从前，我用两个手指早把他捏死了！”

“孩子，要记住那些干部。汤富海这些泥腿子就是干部煽动起来闹事的。古人说得对，擒贼先擒王。村里没有干部，光是汤富海这些泥腿子，天大的本事也闹不起事来。”

“我不在农会，村里很多事都没我的份，有些干部的名字闹不大清楚。”

他的眼睛望着苏沛霖。娘懂得儿子眼光的意思，代他说道：

“苏管账知道的多，认识的人也多，可以帮你的忙。”

苏沛霖不等朱筱堂说，他主动接上去讲：

“这没问题。我给你弄一份干部名单来，方便的话，我还可以探听探听他们的行踪。”

“那好。村里有不少人参军了，他们的心都是向着共产党的，这些人也可恶！”

“他们给共产党当炮灰，活不长的。”

“打听一下哪些人参加了军，将来有用处。”

“你说得对。”苏沛霖补充道，“还有党员，将来也好派用场。”

“对，现在咽下这口气，把账一笔笔记在心里，等将来。”她语意双关地说，“将来将来^①就好了。孩子，现在得忍着。”

“说老实话，我可有点忍不住。”

苏沛霖凑趣地说：

“少爷说得对，谁也忍不住。”

① “将来”是指蒋介石回来的意思。

“一定得忍。忍字头上一把刀，能忍，才有将来。”

“忍到啥辰光？”

“苏管账不是说了，今年要改皇元吗？”

“可是乡下一点动静也没有啊！”他转动着眼睛，望着窗外灰沉沉的暮霭，静悄得有点闷人。

“别忙，还没到时候……”

“要不要到上海去一趟，找叔叔打听打听？”

“找叔叔？”她想了想，说，“不行。你叔叔为了借你爹五十两金子没还，早断绝了往来。现在去找，不是送上门去叫人笑话！”

“找姑爹？”

“找姑爹倒可以。他们在上海日子过的可舒服啦，和工商界的大人物常来常往，消息灵通。上海又是水陆码头，人来人往，见多识广。幸亏朱家出了你姑妈，不然，啥靠山也没有了。”

“我亲自去一趟……”

她想起早些日子收到朱瑞芳从上海寄来的信，摇摇头，说：

“他们很忙，现在又碰上‘五反’，听说也很为难，还没有过关，怕顾不上这些事。”

“那找姑妈。姑妈很喜欢我，每次从上海来，都给我带不少物事来。姑爹听姑妈的话的。”

“那倒是的。”

“明天就去，好不好？”朱筱堂急于想到上海。

“不好，”她抚摩着他的头说，“你不能去。”

“为啥？”

她深深叹息了一声，不胜感伤地说：

“唉，你忘记了吗？我们是被管制的，出入要报告，到远处去要请假。现在不比从前，不能随便走动了。”

“请假，就请假好了。”

“请假，人家不一定准。为啥忽然要到上海去？汤富海一问，你哪能回答？”

“这不关他的事，不理他。”

“说的倒轻巧，”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我们在人家手掌心里过日子，不理他不行。”

“这么说，就不能去了吗？”

娘半晌没有回答。暮色越来越浓，屋子里的物件很难辨认清楚了。

“去吗，”她思索地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他紧紧抓着娘的手，要办法：

“啥办法？快说。”

“苏管账跑一趟，探探你姑妈的口气，要是愿意你去找个借口，写封信来，不就可以请假了吗？”

“这确是个好办法！”他霍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拍着掌。

她连忙止住了他，摇着手，说：

“看你高兴的，别拍巴掌，给左邻右舍听到，又要引起人家注意了。”

“不要紧，他们都忙着吃晚饭哩，听不见。”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是讲话的声音已放低了，蹑起脚尖，走上一步，附着苏沛霖的耳朵说：

“那你快去。”

41

杨健听完余静汇报和韩工程师谈话的情况，察觉她的信心不高，于是反问道：

“你觉得没有把握吗？”

余静想了想，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你的意思是——”杨健锐利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等待她的回答。

余静坦率地把她的思想情况在杨健面前暴露出来。她说：

“我觉得和韩工程师这样的人很难谈话。他的态度老是不明朗，讲话也不痛快。你说他不想站稳工人

阶级的立场吧，他表示一定要划清界限。你要他检举吧，他又说要研究研究，简直摸不透他的心思。”

“这就是韩工程师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又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又要依靠资产阶级，动摇在两个阶级之间。他在考虑怎样才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喜欢痛痛快快，像韩工程师这样，真急死人。”

杨健听她天真的想法，不禁笑了：

“所以你是工会主席，而不是工程师。”

“我一辈子也不想当工程师。”

“那不对，工程师有各式各样的，工人阶级也要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对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工程师是很重要的人才。从韩工程师的过去情况看，他还是比较倾向进步的，有时也有正义感。但是他和徐义德打了许多年的交道，‘五反’来了，徐义德更要拉他一把，怕他检举。他想超然在两个阶级之外，事实上不可能。他想对两方面都应付，却又办不到。因此犹豫不决。这是不足为奇的。假使他很快很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像你所说的痛痛快快地检举立功，这倒是很奇怪了。那就不是韩工程师了。”

“永远这样犹豫下去，‘五反’哪能进行？你不是说要突破韩工程师这个缺口来扩大‘五反’的战果吗？”她想起杨健的指示，便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也没有改变我的意见。动摇的人最后必然会倒向一边，他不能够永远在中间摇摆。照我的判断：韩工程师可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的。他目前顾虑的是职位和前途。解除这个顾虑，他就会站到工人阶级这方面来了。我们一方面要给他谈清伟大工人阶级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远景，另一方面要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落的前途和目前他们可能用的丑恶手段。这样，韩工程师得要慎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以为有绝对把握吗？”

“当然有。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是有的。主要看你的信心了。”

余静很严肃地说：

“只要组织派我去，我一定有信心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然仍旧派你和钟珮文去。”杨健望着工会办公室门外走过的人群，想了想，又说道，“韩工程师检举任何一点材料，都要采取鼓励的态度。开始的辰光，不要要求太高，只要他肯检举，慢慢地会提供许多材料。”

“我根据你的指示去做。”她说，“过去我把他看得太单纯了，经你这么一分析，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我也有了把握。”

第二天是厂礼拜。余静抓紧时间，仍然约了韩云程下午四点钟在厂里谈话。

四点还欠五分，韩云程就走进了试验室。余静和钟珮文来的更早，他们两个已经在里面等候了十分钟。韩云程坐了下来，钟珮文劈口就问：

“韩工程师，你这两天研究的哪能？”

上次谈话后，他一直没有宁静过。他认为徐义德确实有许多不法行为，作为一个工程师，有义务向国家报告。余静那样热忱地欢迎他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而且钟珮文还说工会的门永远向他开着的，难道韩云程是铁石心肠的人吗？研究科学的人可以一直昧着良心代人掩饰罪恶的事实吗？自己虽然说要经过研究才能下结论，车间里生活难做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吗？讲研究这一类的瞎话不过是明明骗人罢了。韩云程就是这样蒙混过去吗？将来水落石出，叫人发现，韩云程的面子搁在啥地方？应该老老实实讲出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他曾经决心到工会里向余静报告徐义德的不法行为，可是走出试验室没有几步路，在车间门口站住了，皱着眉头问自己：这样好吗？徐义德待自己不错呀，很赏识自己的才能。梅佐贤不是说徐义德认为目前的职位有点委屈自己，准备提为副厂长吗？副厂长当然没有啥了不起，不过，这名义也蛮不错。工程师仅仅是管理技术方面的事，

副厂长不同啦，是掌握全局的职位。不消说，每月收入的单位也会增加一些的。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自然是好事，但工程师的职位究竟是徐义德委派的，每月的单位也是厂里发的，不是工会给的啊。现在“五反”来了，政府支持，工会撑腰，徐义德低头。“五反”过后，徐义德这种人会永远低头吗？在“五反”里检举，他会不报复吗？工程师这职位可以保的牢吗？“五反”赞成，就是不检举，双方都不得罪，又能保住自己的职位，那不是理想吗？

正在他皱着眉头思虑的当儿，钟珮文从工会那边走来，见他站在车间门口发愣，便问道：

“韩工程师，你一个人站在这里想啥？”

韩云程没有注意钟珮文向他面前走来，听到叫他，凝神一看：钟珮文已经站在他面前了。他好像自己的秘密叫钟珮文发现了，满脸绯红，支支吾吾地说：

“没啥。我到厕所去。”

他不敢停留在那里，慌慌张张真的到厕所去了。从厕所回到试验室，他还是宁静不下来，做啥事体都想到这个问题。他谴责自己，他要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可是一抬起脚要到工会去，背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着他。他耳边仿佛有人轻轻地在说：要想想后果呀！他努力不想这些事，设法使自己忙于工

作，不让脑筋闲下来。可是这些事像个幽灵似的，时时在他面前闪现出来。今天厂礼拜，他原来准备一个人到吴淞口去跑一趟，摆脱这些烦恼，站在江边去眺望浩浩淼淼的江水。可是余静约他下午四点钟谈话。他跨进试验室以前，下决心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说了，后果怎么样不去管他。钟珮文问他，他马上想到工程师，想到副厂长，想到每月的收入，想到每月的开销……他又改变了主意，信口应付道：

“这两天，唔，研究的比过去更深入了一些……”

钟珮文听他老是说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心里非常不耐烦，用不满的口吻质问他：

“你这样研究来研究去，究竟要研究几何辰光呢？不要再耍花样了，痛痛快快地说吧。”

这几句话刺破了韩云程的面子，他忍受下来，却又不甘心情愿承认自己确实不痛快。他有些激动，语气还相当的缓和：

“希望钟珮文同志讲话客气点。”

“我讲话……”

余静怕钟珮文讲下去把事情弄僵，她打断了钟珮文的话，插上去说：

“这些事应该仔细研究，慎重考虑的。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划清界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韩工程师和

徐义德有多年的往来，交情也不错，一时也不容易扯下面子。……”

韩云程听余静这么说，句句讲到自己的心里，连忙搭上来，勉强辩解道：

“这倒没啥，这倒没啥……”

钟珮文看他那神情，本来想讲“那你还有啥顾虑不肯说呢”，见余静要说下去，就没吭声。

“韩工程师处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有些事不能不多想想。比方说检举了徐义德，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韩云程心里想：“对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哩，”余静接下去说，“这个问题倒是已经解决了。军管会早有了规定，保证工作，资方不得随便撤职工的职。徐义德现在当然不敢动手，‘五反’以后要是动手，要撤谁的职，我们工会不答应，人民政府也不允许。有了共产党，有了组织，资本家无法无天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照规矩办事。”

“那是呀。”韩云程应了一句，对自己说：这一点我原来哪能没想到呢？这么说，就是检举，徐义德也不能把韩云程怎么样啊！

余静见韩云程在想，她有意停了停，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准备倒水。那边钟珮文送过热水瓶来，倒了

三杯。余静喝了一口水，说：

“你和徐义德是朋友，要讲交情，是啵？讲交情？应该给正义讲交情，给人民讲交情，不能给五毒不法行为讲交情，也不能给不法资本家讲交情呀。你是徐义德的好朋友，你应该帮助他向政府彻底坦白，消灭五毒不法行为，让他做一个守法的资本家，才算够朋友……”

余静每句话都讲到韩云程的心坎里。他原来面对着钟珮文，器宇轩昂，神情自得，等到余静娓娓地从职位谈到朋友交情，他内疚地慢慢低下了头。他过去看不起工人，觉得他们粗鲁和没有文化。上海解放以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他才初步改变了对工人鄙视的错误态度。对工人阶级和他的代表共产党来说，他是钦佩的，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他更是五体投地地钦佩，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和光明。具体的工人，就说沪江纱厂的余静吧，对她是表面上不得不恭维，暗骨子里并不佩服的，实际上看她不起。最近，他从余静身上看到许多新的东西。刚才余静这一番谈吐，他深深地感到余静表现出来工人大公无私的崇高思想，言谈里包含了很高的原则性，和他一比就显出自己是多么渺小和无知。特别使他难过的是这些话出自一个他过去所看不起的人，现在才发现真正应该看不起的正是自己，而余静

是他应该尊敬和学习的人。他激动地说：

“余静同志，你不要往下讲了……”

余静看他低着头说话，知道他心里很激动，就没再往那方面说，改口道：

“你是有学问的人，有些事你比我们晓得的多，不用我讲，你也晓得的……”

韩云程心里想：做一个工程师，难道说厂里的事一点不知道吗？他总得要讲一些才行，便毅然抬起头来，勇敢地说：

“是的，有些事我是知道的。徐义德过去有偷工减料行为，八十牙常常改为七十八牙，有辰光甚至改到七十牙，以粗报细，造成圈长不足，这是减料。……”

韩云程没说完，钟珮文插上来说：

“这个我们晓得，筒摇间的工人已经检举了。”

余静马上收回他的话，补充道：

“不，你让韩工程师讲下去。旁人检举的，韩工程师也可以再检举，这对我们研究问题有帮助。韩云程同志，你说。”

韩云程听到余静叫他韩云程同志，心里感到非常温暖。他觉得他知道的许多事不讲，并不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中间，实际上是站在徐总经理那边的。现在余静这样热情欢迎他，他为啥

不把自己知道的事讲出来呢？他往下说：

“副二十支只过头道粗纱，没有过二道。本支抄斩，不经过整理，直接回用^①……”

这些材料工人早检举到“五反”检查队了，余静看见钟珮文的眼光盯着韩工程师，怕他又要打断韩工程师的话，连忙用眼光示意他，让韩工程师往下说。余静认为这些材料虽然工人已经检举了，但从韩工程师嘴里说出来，那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表明他已经站到工人阶级这方面来，决心和徐义德划清界限了。她鼓励韩工程师道：

“你提供这些材料很好，说明你一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许多问题就比从前看的清爽了。”

韩云程知道钟珮文的眼光一直在盯着他，好像在提醒他别只谈轻微的小事，把重要的问题漏掉。而余静和蔼亲热的鼓励，使他感到不谈那个他所避免谈的问题就对不住余静的期望。同时，既然已经谈了，那少谈和多谈也没有啥区别，不如干脆都谈了。他想起徐义德的手段，不照他的意思做，一切都要工务上负责，也就是说要韩云程负责，心里很不满意。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为啥要韩云程负责呢？原棉

^① 本支抄斩花不能直接回用，三十二支纱的应用到二十支纱上，余类推。

问题追究起来，最后工务上总脱不了干系的，不如说清楚了，倒可以使工会了解这件事的真相。他猛可地站了起来，坚决地大声说：

“那次重点试纺研究的结果，证明车间生活难做确实由于原棉问题，徐义德在原棉里掺了劣质棉花，我可以证明，……”

由于他太激动，焦急地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余静报告，一时却口吃地说不清了。余静劝他坐下来慢慢说，他平静不下来，仍然站着，继续大声说：

“我受了徐义德的欺骗。他想收买我，我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人民，我要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我要检举，我要检举……”

余静也站了起来，伸过手去紧紧握着他的手，热烈地欢迎道：

“我代表工会欢迎你，韩云程同志。”

钟珮文加了一句：“韩云程同志，我们大家都欢迎你！”

韩云程听到他们这样亲热地称呼，又这样热烈地欢迎，他感动地握着余静的手不放，说：

“余静同志，是你教育了我，……”

说到这里，韩云程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眶润湿，两粒精圆的泪珠从眼角那里流下来。他浑身的血液在急速地循环，身上充满了一股燃烧似的热力。他

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轻松，这样愉快，这样有劲。

韩云程站在那里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静下去，等了一会，说：

“让我冷静地想一想，余静同志，我写好了送到工会里来。”

42

“全厂同志们注意：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韩云程工程师已经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他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徐义德划清了界限，检举了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我们对韩云程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还没有归队的高级职员们，希望你们赶快考虑，下决心回到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我们在等候你们，欢迎你们，现在是时候了！……”

会计主任勇复基正在会计室里算账，左手翻阅着传票，右手在算盘上的的嗒嗒地打着，忽然听到操场上喇叭的广播声音，很清晰地从窗户外边飘进来。他开始听到韩云程的消息心头一愣，韩云程归队了，检举了，过去那些事情“五反”检查队全知道了？勇复基的事情杨部长也知道了？韩云程为啥事先不通

知一声就归队呢？真不够朋友。自己怎么办呢？勇复基刚这样问自己，就听到下面的那些话了，那话仿佛针对他讲的。他的心情很乱，账算不下去了，按下传票，放下算盘，走到窗口，准备透透气。在篮球场那边临时聚集了一些工人在听广播，热烈鼓着掌，欢迎韩云程归队。广播完了，工人陆续向办公室这边走来。勇复基感到这些工人的眼睛都对着窗户，都对着他。他连忙退回来，坐到原先那张靠背椅上。门外又传来办公室里的掌声，热烈欢迎韩云程归队。他走过去把门关上，悄悄踱到窗户的侧面，斜望着篮球场上那碧蓝的晴空，远方的天空有一片白云，慢悠悠地飘来飘去。他对自己说：那一片白云，没有根，没有依靠，老是飘来飘去怎么行呢？韩云程倒也好，决心归了队，依靠工人阶级，以后可以拿到“红派司”了。自己永远做一片白云吗？依靠徐义德一辈子吗？徐义德真的可靠吗？

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定不下心来，在那里站不下去。他在屋子里踱了一阵方步，又回到窗口，见外边没人，他想出去走走，痛痛快快地透口气。

他把传票压到算盘下，拉开门，慢慢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对面红墙上几张标语立即吸去了他的注意：

欢迎韩云程同志归队！

高级职员们要向韩云程同志学习！

标语怵目惊心地映入勇复基的眼帘。他站在办公室大门那里几乎发呆了。这标语不是杨部长明明要人贴给勇复基看的吗？他怕有人来，叫人发现勇复基站在办公室门口发呆，那一定是有问题呀！他迟缓地移动着脚步，向篮球场上走去。

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韩云程既然坦白了，勇复基不坦白不行。勇复基有些事情韩云程是知道的。别的不提，就说每月到徐总经理那里去开秘密会议吧，这一点韩云程一定坦白了，一定说哪些人参加。勇复基不去坦白，那不是抗拒五反运动吗？抗拒五反运动，这罪名可不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杨部长一到沪江纱厂来就宣布了这条政策。抗拒从严。勇复基得马上去坦白，不坦白不好，迟坦白也不好。他越想越觉得应该去坦白，他的脚步向“五反”检查队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他的脚步慢了，徘徊不前。徐义德的面影闪在他的眼前。他仿佛听见徐义德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勇复基，我待你不错呀。你要三思而行。徐义德待勇复基不错，他反复想这个问题。“三反”开始时，他的月薪从一百八十个单位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单位，旧历

年底梅佐贤又送来一千万的红利和奖励金，平常的小数目更不必讲了。这都是徐义德待勇复基的好处。怎么可以去坦白呢？不能。

同时，他想起徐义德在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曾经单独找他谈过的话：“我一些犯法行为你是参加的。我要是吃官司你也逃不了。检举我，沪江纱厂罚光了也不够。这样，你的高薪职位到啥地方去找？当然，将来大家都检举了，你不检举也不行的。你也可以检举检举，检举那些小的，大家晓得的事体。比方说卖出那笔旧麻袋，没做进销货，漏报营业税、附加税和印花税六十五万元；还有自用斩刀花做托儿所的棉被和门帘，也没有做销货处理，当然也是偷漏税的不法行为；这些我都坦白了，你可以详详细细的检举。可以讲的，你就讲。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只要你好好努力，你的薪水将来还可以增加的。”徐义德这几句话，在他的脑筋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徐义德给他想的多周到，以后还要加薪水。他想到这里，反问自己：勇复基啊，你去检举，怎么好拉下这个脸皮，将来不见徐义德了吗？徐义德待你这样好，能够恩将仇报吗？不对啊。并且，你去检举徐义德，也连累自己，勇复基的手面也不干净啊。那么，你不是检举徐义德，简直是检举自己。勇复基，你不为自己打算吗？不能，绝对不能啊。

他把脚步转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没走两步，迎面看见工务主任郭鹏走来。他指着红墙上的标语暗示地向郭鹏望了望。郭鹏机灵地回过头去，看看四周没有人，便对他说：

“那边走走吧。”

“好的。”复勇基跟着郭鹏顺着清花车间的墙边走去，低声地说，“韩工程师归队了。”

“我听见广播了。”

“我们不坦白，怕不行了。”

“为啥？”

“他检举了那个人，”勇复基指的是徐义德，说，“会不提到我们吗？”

“提就让他提吧。”郭鹏满不在乎，在太阳永远照耀不到的有点潮湿的墙边走着，一边说，“总经理说，共产党重视证据的。口说无凭。韩云程检举徐义德，对我们这些人总得留点情面。难道以后就不在一道工作了吗？”

郭鹏一提到韩工程师心里就有些不满意。他觉得韩工程师是挡住他向上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没有韩工程师在自己的头上，恐怕他早已当上了工程师。“五反”开始以后，梅佐贤不是就说过徐总经理很想提拔他，只是要等适当的时机。郭鹏把这个适当的时机迟迟不到来误认为韩工程师在作祟。别人提起韩

工程师，他总是叫他韩云程。

郭鹏愤愤地又加了两句：

“当然，韩云程这家伙也难说，谁晓得他昧着良心检举些啥。人心隔肚皮。谁也料不到他会检举徐总经理，真棘手！”

“韩工程师不去管他，”勇复基只是在想自己的事。他没有心思去管别人。他想跟郭鹏商量商量，好给自己拿个主意。他说，“我们怎么办呢？不检举，行吗？郭主任。”

“不检举有啥不行，这种事体要自觉自愿，杨部长再有本事也不能强迫命令。我们也不是资本家，怕啥，笃定泰山。”

“可以不检举吗？”

“那还用说。”

“啊！”勇复基还有点不放心，想了半晌，又问，“真的行吗？”

郭鹏正要回答，忽然听到前面有脚步声传来，他就把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来的是钟珮文。

杨健听完余静汇报和韩工程师谈话经过，他很高兴，认为缺口已经突破，要抓紧这个时机，竭力扩大战果。他立即把钟珮文找去，要他马上把这消息广播出去，并且要在下工以前到处贴上标语和漫画，来动摇徐义德影响下的人心。钟珮文布置好工作，他亲

自广播了消息，然后到处去检查一下标语贴的怎么样。

郭鹏见钟珮文走来，他顿时改了口，大声说：

“韩工程师真好，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勇复基忽然听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不知道怎样答话才好，只是“唔”呀“唔”的应了应。

“我们也欢迎你们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钟珮文说。

“唔，”勇复基结结巴巴地说，“是的。”

郭鹏却老练地咳了一声，借此想了一下，镇静地说：

“那当然，我们都要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来的。你不欢迎，我也要来的。当工人阶级最光荣不过了。”

“那很好！”钟珮文对着他们鼓掌，转过身去，又检查别地方的标语去了。

勇复基怕再遇到工会里面的人。他对郭鹏说了一声“再见”，就连忙回到会计室来了。

勇复基坐到靠背椅上，望着面前的传票和算盘，心还是怦怦跳着，宁静不下来。勇复基在会计业务上是出色的能手，三天不记账，单凭他的记忆，也漏不下一笔。可是他自己这笔账怎么也轧不平：钟珮文那样热情欢迎他们回到工人队伍里来，这时不去靠拢、检举，难道敬酒不吃吃罚酒？工会这样耐心地启发、

等待，又这样热情欢迎，还有啥说呢？应该下决心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了。再不检举徐义德也实在说不过去。别人还可以说没有材料啊，不知道呀，会计主任勇复基能这样说吗？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徐义德一些五毒行为能够不经过勇复基的手吗？勇复基会不知道吗？那沪江纱厂的账怎么记呢？瞒不过人啊。既然如此，那就痛痛快快地去检举吧，还落得个光荣归队，像韩工程师这样，多好呀！

他推过算盘，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白纸，摘下插在灰布人民装左胸袋上的派克自来水笔，立即在白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字：“我检举不法资本家徐义德下列五毒行为：一、偷漏税……”第二点，他检举徐义德在解放初期的套汇。这一点没写完，他的派克自来水笔就在白纸上停留下来了。徐义德套汇来的黑心钱，梅佐贤和他自己都分到过啊。这些事检举出来，勇复基不是也有罪吗？徐总经理讲得对：“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怎么能坦白呢？不坦白，又怎么办呢？只坦白一点，杨部长会相信吗？你眉毛一动，杨部长就知道你肚里的心思。杨部长把全厂的工人群众都发动起来，自己的事能瞒过工人的眼睛吗？不但工人，连韩工程师也检举了徐义德。许多事韩工程师都知道，不坦白不行，真糟糕呀！

勇复基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检举徐义德，对

自己不利；检举了，坦白了，对自己也不利。这两笔账他挖空心思哪能也算不清了。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进沪江纱厂当会计主任，当个会计就可以，为啥要当会计主任呢？当会计可以不管这些事，不负这些责任，可以推到会计主任身上。当了会计主任也就算了，为啥又要收下徐义德的黑心钱呢？徐义德把他的薪水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单位，又送来一千万的红利和奖励金，自己当时为啥不拒绝呢？现在退回去，行不行呢？徐义德一只手把勇复基推到深不可测的陷阱里，勇复基陷在里面哪能也出不来，他苦闷地长吁短叹，寻不到解脱的道路。

钟珮文回来汇报路上遇到勇复基他们的情况，杨健仔细作了分析，要余静去找勇复基。她答应马上去，提了一个问题问杨健：

“我看他一定有顾虑，要不，恐怕早坦白检举了。”

“你这个问题提得对。”杨健明晰的智慧和的眼光对着余静，说，“高级职员们和资产阶级有多年的往来，有了一定的深厚的交情，拉不下脸皮，打不破情面。在资本家不法活动当中，必然会分些钱给他们，拉他们一道下水，封住他们的嘴。这是勇复基最大的顾虑。他们手面不干净，怕连累到自己。关于这一点，区委早有指示，凡是资本家利用职工进行五毒行为，

这责任主要是资本家的，而不在职工。资本家送给职工的钱财和物品，一概不要退还，职工也不负责。你要针对这一点反复向勇复基解释清楚，我想问题大半可以解决了。”

余静站了起来，说：

“好，那我现在就去。”

“我要不要陪余静同志一道去？”钟珮文也站起来，问杨健。

杨健果断地说：

“你不要去。”

43

冯永祥在林宛芝面前说马慕韩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马慕韩坐在白克牌的小轿车里，心里噗咚噗咚在跳，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海解放以来工商界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他脑海里出现，确实如陈市长所讲的，工商界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解放前，工商界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要仰政府要人的鼻息，奔走权贵的门路，听洋商

和四大家族的摆布，政府要工商界做啥，工商界不敢说个不字。政府颁布什么政策法令，也不问工商界一声，工商界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提出意见的权力。解放后却大不相同：政府要颁布什么政策法令，事先都和工商界商量，有的还接受工商界的意见修改，就是共同纲领这样的国家大法，也包括了工商界的意见，通过的辰光，还有工商界的代表参加哩。从地方人民政府到中央人民政府都有工商界代表参加领导工作，史步云不但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同时，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啊！中国哪个朝代的工商界也没有今天工商界这样显赫的地位啊！至于说到利润，虽然解放后上海工商界的暴发户很少，但绝大多数的厂商稳步发展，生产经营的都不错，大家都有个奔头。一九五一年上海经济繁荣的景象，更是叫人永世不忘，工商界的朋友谁都怀念难忘的一九五一年！本来，像这样平平稳稳的发展下去，把国家建设富强起来，在外国人面前脸上也有光采，工商界偏偏有些人贪得无厌，好了还要好，利润多了还要多，肆无忌惮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种种活动，资产阶级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了。真是丢工商界的脸！这样下去，国家的前途的确不堪设想，工商界的前途也不堪设想，更不要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

主义的前途了。五反运动的确很重要。工商界既然有不法行为，应该坦白交代。人民政府给上层代表人物的面子，在市里自动交代，再不坦白，也说不过去。自己整天在外面从事社会活动，很少过问厂里的事，谁知道厂长他们只要有利可图，啥事体都做，有些事他们也曾和他商量过，认为解放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没想到违法不违法的问题，更没料到会进行“五反”。现在一计算，想不到兴盛的问题也不少，真叫人大吃一惊！要不是这次五反运动，他一定坐在鼓里，兴盛的有些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几天他在纺织染整加工组坦白交代，别说工商组的同志不同意，就连同组的纺织业的巨头们也有意见。他回到家里，把坦白材料打开来重新看看，也发现交代的问题太不够了。他最初只是想争取时间尽先坦白，好在组里起个带头作用。别的事还可以马马虎虎，早一点迟一点，没有多大关系，这是“五反”呀，宜早不宜迟。工商组每天的情况，料想工作同志一定是按时向上面反映的。马慕韩要不带头坦白，怎么叫做工商界的进步分子呢？他在工商组的一举一动，政府方面一定很注意，知道的非常清楚。如果别人先坦白了，陈市长也许会问工商组的同志，你们那个组里不是有个马慕韩吗？他怎么没有坦白交代呢？是呀，马慕韩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他第一次坦白的前一天晚上，曾经约

冯永祥到他家里去商量。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冯永祥点头赞成：

“你这一着棋看得很准，应该占先，对自己有利，对大家也有好处，对五反运动也有帮助。你这么一交代，那好处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这许多好处？”

冯永祥见他不相信，伸出手来，一一向他诉说：

“你是我们工商界进步分子，你不带头，谁带头？你这么一带头，你进步分子的地位更巩固了。你先坦白，有了样品，也摸了政府方面的底，晓得政府要我们工商界哪能坦白，工商界朋友也好依样画葫芦，照抄。大家都像你一样过关，对‘五反’不是也有好处？”

“照你这么说，倒是蛮有道理。”

“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没有道理的。”冯永祥给马慕韩一捧，头脑顿时发热。

马慕韩有意刺他一句：

“没有道理的也有道理！”

“慕韩兄，你这是啥闲话？”

“你能说会道，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没有道理的也可以说出个歪道理来。”

“那我岂不是颠倒黑白了吗？”

“我不过说着白相，没有那么严重。”马慕韩怕他吃不消，有意缓和一下空气，转移了话题，说，“我

这个头哪能带法。”

冯永祥并不在乎挖苦他两句，若无其事地说：

“怎么带法确是一个大问题呀。带的不好，政府不满意；带的太好，工商界也不满意。”

“你说的真对，阿永！”

马慕韩不禁脱口赞扬，因为冯永祥两句话道出了他的心事。他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坦白多少政府才能满意？政府知道兴盛纱厂多少材料？哪些非坦白不可？政府这个底他摸不透。坦白多少，那一笔退补的数字可不小呀，如果在退现款上面也要带头，兴盛的头寸也够紧的，工商界的朋友更不会满意的。最近潘宏福开会前后老和他在一道，不断问长问短，一定是潘信诚要儿子来摸他的底，言外之意希望他照顾照顾。宋其文私下也表示这次大家口径要一致，那含义不用问，谁都明白。这么一来，马慕韩这个头就很难带了。冯永祥一说，他就顺水推舟：

“你看，怎样才好呢？”

“这事体不简单。要两面讨好，最不容易。照我看，捡几件眼面前的事坦白坦白，过了关，将来退补也容易，也不会得罪工商界的朋友。”

“能行吗？”

“纺织染整加工组到现在没人坦白，大家的口咬得很紧，只要心齐，政府有啥办法？他们哪能晓得那

么详细？”

“这个……”马慕韩没有说下去，可是他心里已经同意冯永祥的意见了。他匆匆忙忙报名交代，关没过去，第二天陈市长召集三百零三户开了会，报告了工商组各专业小组坦白交代的情况，表扬了那些坦白交代的人，严格批评了那些企图蒙混过关的人，没有点马慕韩的名，可是马慕韩认为每一句话对他都很适合。他最初以为自己抢先交代，没料到别的组里早有许多人过了关，显得纺织染整加工组落后了。他发觉陈市长对工商组的战略部署：先解决别的组，好孤立纺织染整加工组，然后再包围突破纺织染整加工组。如果他不彻底交代，那是过不了关，要变成落后的纺织染整加工组里的落后分子。他感到形势严重，时间紧迫了。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路：是带头坦白保持进步分子的称号，还是落在别人的后面，变成落后分子，影响自己飞黄腾达的前景。他要慎重抉择。他昨天向工商组请了一天假，想请厂里的资方代理人到家里来帮忙，把非法所得税统计一下。可是没人肯来，怕沾惹是非，最后总算来了个资方代理人。他的妻子又帮他打算盘，给他准备烟茶和宵夜，直忙到夜里三点钟才躺到床上。决心下了，账算了，他心里感到痛快。今天一早起来，眼圈红红的，有点发涩，匆匆忙忙洗了脸，又埋头亲自复核了一遍，已经快两

点了。他连忙跳上汽车，到工商组去交代。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过关，心里又忐忑不安了。

在马慕韩思潮汹涌的辰光，白克牌的小轿车已经开进一条马路，两边高耸着深灰色的高大楼房，汽车像是一个小甲虫在深沟里缓缓爬行。那边马路口上，是广阔的外滩大马路，行人熙熙攘攘的往来，黄浊浊的江面上正好有一只小火轮经过，怕碰到前面的小舢板，拉了汽笛。马慕韩听到尖锐而又清脆的汽笛声，才从梦一般的迷幻的境地中清醒过来，发觉已经到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商组。他提着身旁的赭黄色的牛皮公事包，跳下车子，走进马路右边那座大楼的玻璃转门。

这座大楼是华懋大厦，矗立在南京东路的日上，俯视着浪涛滚滚的黄浦江。他上了楼，从甬道走进，想起潘信诚那些人一定早到了，步子忽然慢了下来，快到右首最后那间纺织染整加工组的会议室，他昂首走了进去。这间会议室布置得庄严朴素：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和毛主席的织锦像片，两旁是五星红旗；当中摆着丁字形的长长的桌子。桌子两边坐满了人，靠窗户那边一溜椅子今天也坐满了人。丁字形桌子左上端坐了一个将近中年的人，左胳膊戴着一个袖章，白底红字：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

他看到参加互助互评会议的人都来齐了，悄悄

地拿出笔记本子和钢笔准备记录，好像大家都摩拳擦掌等待挑他的眼。他对大家微微点头，冷冷地打了个招呼。他和谁也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丁字形长长桌子的尾端，等候宣布开会。他发现大家的眼光全朝他身上望：好像已经知道他今天要坦白交代，担心他把纺织业的内幕和盘托出。他竭力避开那些侦察他的视线，镇静地拿出烟盒，点燃了一支烟在抽，一口又一口地把烟吸下去，旋即吐出，乳白色的烟在他面前轻轻的飘荡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不望大家了。

潘信诚的半睁半闭的眼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潘信诚坐在主席的位置上，环视了一下今天出席的人，料到陈市长对工商组那一番讲话，一定会在纺织染整加工组里起影响。他不露声色地一个个望过去，最后眼光又落在马慕韩的身上。他对别的人都比较放心，唯独这位“小开”确是令人放心不下。幸好今天轮到他担任主席，还可以想想办法，预先防止那不利于整个纺织染整加工组的局面出现。

他要大家根据陈市长的指示，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最后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要不顾事实，企图蒙混过关，那是过不去的。说完了，他的眼光有意离开马慕韩，望着别人，衷心希望别人先交代，好把马慕韩压在后面。他忖度别人一开头，事情就好办的多了。可是没有人站起来，他又不放心地暗中觑了马慕

韩一眼。马慕韩没有理睬潘信诚的眼光，他知道那眼光的用意，但他决定了的事情，谁也劝阻不了他。他打开公事皮包，从里面抽出写好的坦白交代材料，毅然地站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马慕韩一口气坦白完他的五毒不法行为，最后说：

“兴盛纱厂方面，行贿是三千六百万元，偷漏税是二十亿，盗窃国家资财是九十三亿，偷工减料是一百亿，总共是二百一十三亿三千六百万元。我坦白如果有不明确不彻底的地方，请各位提出问题指教。我自评是半守法半违法户，是不是妥当，也请各位指教。”

潘信诚的眼光一直盯着马慕韩。马慕韩说一段，他的心急剧地跳一阵，听马慕韩一个劲交代，把纺织业的老底都翻出来，他真想插上去打断马慕韩的话，不让他说下去，可是看到工商组的同志就坐在他的身旁，如果一打断马上就暴露了他这个主席内心的秘密。他没有办法，只好按捺住心头的不满，忍耐地听马慕韩往下说。听到后来，他简直不相信马慕韩是兴盛纱厂的总经理，仿佛是“五反”检查队队长在报告兴盛的五毒不法行为，二百一十三亿三千六百万呀，马慕韩一点也不心痛。马慕韩这个青年简直是疯了，也不想到后果，大少爷不在乎钞票，但也要想想旁人的死活啊！为了自己过关，不惜把整个纺织业出

卖了。他虽努力保持镇静，隐藏着内心的愤恨，可是他胸口一起一伏，板着面孔，发松了的脸皮有点儿苍白。他冷冷地向会议室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扫了一眼，伸出右手，向大家说：

“马慕韩已经坦白完了，请各位发言。”

他摘下老花眼镜，拿起桌子上那支两寸来长的短铅笔，左手按着面前的笔记本子，在等待大家发言，他好记录。他本来想这样可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却不料手不听他的话，拿着铅笔不断在颤抖，他生怕工商组的同志看见，但又没办法不叫人看见，他自言自语地解嘲：

“年纪大了，连手也不听使唤了。”

大家没有注意潘信诚的话，都正在翻阅刚才马慕韩坦白的记录，想在马慕韩的坦白里发现一些问题。会议室里只听见翻阅笔记本子的响声，没有一个人发言。潘信诚稍为冷静了一些，催促大家：

“哪一位先发言，意见想的不周到，第二次还可以发言。我们大家一定要帮助马慕韩彻底坦白，弄清问题。”

潘信诚心里非常不满意马慕韩把偷工减料部分说得太多又太详细，简直是揭露了棉纺业的底盘，把棉纺业的战线搞垮了，而且垮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像是一道洪峰，忽然冲破了坚固的防堤，叫你来不及堵

挡。青年人办事老是毛手毛脚，事先竟然不和“信老”商量商量，目中没有潘信诚，只想自己过关，实在太岂有此理了。他向马慕韩望了一眼，嘴角虽然露着微笑，可是这微笑里却包含着轻蔑和憎恨。既然马慕韩不顾别人死活，他也顾不了马慕韩，他这时候真希望有人发言，干脆再揭马慕韩的底，看马慕韩以后哪能办。

潘宏福听了马慕韩的坦白交代，和他父亲一样，一个劲盯着马慕韩看。

马慕韩静静地坐在那里，头微微低着。心里也非常不安，倒不是因为他的坦白得罪了同业，而是因为他同业中向来被认为进步的，想不到兴盛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算起来居然也超过了两百亿，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事实却又是如此。他内疚地有意不看那些熟悉的面孔，只是凝神地在等待别人的发言。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金懋廉。这位信通银行经理原来是在金融贸易组交代的，他们那边人少，全组业已结束，因为“信通”和“兴盛”素有往来，而且他也是星二聚餐会的成员，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商组就请他来；同时，也请了一些类似金懋廉这样的人，像唐仲笙、江菊霞、冯永祥等等都是。金懋廉说：

“慕韩兄偷漏方面谈的不多，逃到国外的账外财

产所得税怎么算法？据我晓得的，兴盛外逃资金远不止这点数目。兴盛敌产方面谈小不谈大，是不是真的只这么一点点？解放初期，兴盛有没有把纱布调金钞，这一点应该交代。”

唐仲笙看见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作组的人坐在潘信诚旁边，他知道对马慕韩提问题提的尖锐，就表明自己坦白的彻底，今天列席这个会议听马慕韩坦白交代，一定要发言的，迟发言不如早发言。金懋廉一讲完，他就抓紧机会说：

“慕韩兄是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民建会上海临工会的委员，经常和政府方面的人接近，也出席过中央纺织工业部的会议，有没有行贿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行为？”

马慕韩听唐仲笙提的这个问题，心中十分恼火。这不是一般问题，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哇，那罪名可不小！要是多少亿钞票，老实说，他倒不在乎。唐仲笙这一记很结棍。他马上想到星二聚餐会和史步云。步老和他都曾经从北京打过电话回来，算不算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呢？那是研究问题，商量对策，并没有买进卖出，扰乱市场，不能算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他想到上面有步老顶着，同时聚餐会讨论问题唐仲笙也参加的，如果说这就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那唐仲笙也脱不了干系。他笃定地盯了唐仲笙一眼，想不出

智多星提这个问题是啥用意。

坐在靠玻璃窗口那里一个中年妇女站了起来，她今天穿的比往常朴素，上身穿了一件淡青色的对襟毛线衫，下面穿的是一条米色的英国素呢的西装裤，裤脚管长长的，一直罩到高跟皮鞋的后跟。她的头皮烫得和往常一样的整齐，额角上那一绺头发微微向上翘起，就像是要飞去似的。当金懋廉发言的辰光，她就在思考怎么发言。她了解纺织业的底细，她不发言过不去。她要是真的揭了这些巨头们的底，那以后在公会里哪能混法？不管怎么样，自己究竟是这些巨头们的干部啊。她挖空心思在想，既不能重复别人的话，又不能提无关痛痒的意见，那会减低劳资专家江菊霞的身份的。可惜现在不谈劳资关系。她想一点，便记一点在淡黄色的小小本子上。她手里捧着那个笔记本，看了一下，便轻声地说：

“在敌伪时期，兴盛纱厂被敌人占领的机器到胜利辰光发还，其中详细情况怎样？这是一。其次，兴盛有没有敌伪股份和敌伪棉纱？第三，国民党反动派从上海撤退，有没有美棉存在兴盛，还给人民政府没有？”

她说完了这三点意见，就坐了下来，得意地向潘信诚他们扫了一眼。她感到在座的人都羡慕地朝她望，好像说江菊霞究竟与众不同哇。

马慕韩暗暗抬起头来，也向江菊霞觑了一眼，觉得她今天也不放过他，一口气提出三个问题，第二第三个问题倒无所谓，那第一个问题确实刺痛了他。他把大家提的问题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他的头又慢慢低下去，担心大家还会有啥问题提出来。这个滋味真不好受，多退补一些钞票倒无所谓，——他甚至想到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一大笔财产成了他沉重的负担，现在一时也没法甩掉，让大家这样提下去，今天怕又“过”不了“关”。他的心像是一根绷紧了弦，谁要是轻轻碰一下，马上就要断了。要是今天再过不了关，他哪能有脸见人？在工商界的代表性失去了，前途也就没有了。

今天不但是坦白交代问题的马慕韩态度严肃心情紧张，就是旁的人也不轻松。没有坦白交代的，如潘宏福，在考虑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和爸爸商量好，已经准备好了坦白书，表也填了，马慕韩把棉纺业偷工减料的底盘一揭开，逼得他非重新来过不可。他又不甘心，真伤脑筋，恨透了马慕韩。已经坦白交代的，像金懋廉、唐伸笙他们，也希望自己提升一级。他们一方面怕自己提的问题敷衍了事，叫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人看穿；另一方面又怕得罪了马慕韩，今后见了面不好讲话，影响业务上的往来。大家在关心着自己的问题。这些人当中，只有冯永祥是唯一的例外。他

认为自己无产无业，没有五毒不法行为。他和政府方面的人往来比较密切，在这五反运动的辰光，特别是马慕韩坦白交代的辰光，他要表现自己是站在人民政府这一方面，说几句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他想了很久，慢慢站了起来，还没有开口，先微微笑了笑，仿佛说：你们这些人身上都是有五毒的，只有我冯永祥一身清白。他的两只眼睛对着马慕韩说：

“慕韩兄今天能够这样坦白交代问题，我认为是很好的。不过，坦白交代一定要彻底，不彻底就说明对人民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越彻底，处理越从宽。这一点，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深切了解。刚才各位对慕韩兄提的意见，我认为很好很好。慕韩兄应该仔细考虑这些意见，有些地方确实坦白不彻底的，除了各位说的以外，在偷工减料方面是不是还有遗漏？前天我们在这里谈的大茂纱厂打包绳偷工减料的事，兴盛纱厂是不是有同样的行为？希望慕韩兄详细地补充交代。”他向会议室每一个人望了一眼，眉飞色舞地又加了两句，“各位以为如何？兄弟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不吝指教。”

潘信诚听见冯永祥向马慕韩偷工减料方面进攻，他怕马慕韩再说出啥来，使得整个棉纺业越发不可收拾。潘宏福更过不了关。他眉毛一皱，想了一计，狠狠地进攻马慕韩，连忙把问题引到外汇方面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外汇问题，兴盛手里的外汇很多，刚才只说了数额，没有说明各笔外汇存在啥地方，也没有说明这些外汇如何处理，需要详细说明。兴盛的财产是人民的血汗，逃避资金这许多，我们要求兴盛把这些资金拿回国来。慕韩是很进步的，应当把种种不法行为都告诉政府。”潘信诚得意地把手里那支两寸来长的短铅笔往桌上一放，说，“请慕韩补充交代。”

他怕别人再插上来，又把话引开去，误了事，进一步把门关紧，说：“诸位如果还有问题，等他补充交代以后再提出。”

马慕韩给潘信诚这一记打下来，着实心痛。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外汇和逃避资金是他唯一的退路，有了这，就是把兴盛整个企业交给政府也不在乎。他今天坦白交代不怕数字很大，可是他总是设法避开谈这方面的问题。冯永祥提到偷工减料的问题，他一点也不恐惧，举的那个打包绳的例子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全部可以包下来。外汇和逃避资金不但是现款，而且数目很大，牵动他的命根子。潘信诚对他有多大的冤仇，为啥别的问题不提，偏偏提这个呢？这个问题像是一支毒箭射穿了他的心。他暗暗咬紧牙关，一口把这支毒箭吞了下去。他想了一条妙计，把外汇和逃避资金统统算在刚才坦白交代的盗

窃国家资财九十三亿里面去，一方面可以不必再补充数字，另一方面又可以显得他坦白的原来就很彻底，而潘信诚不过是有意挑剔。他低着头，两只眼睛对着桌子上的笔记本，根据大家提的问题，稍稍整理归纳一下，尽量把话说得简短，避免有把柄留在别人手里，又冒出一大堆问题来。他慢吞吞地说：

“一，解放前逃避资金数字刚才已经报告过，解放后没有黄金和一件纱逃出。二，现在还有三百件未能进口的美棉在香港。三，胜利后，兴盛接收时损失很大，原有机器一千三百八十八台，接收时只有五十台是好的，一千一百台是并起来的。日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新机器。四，兴盛厂是无限公司，股份不可以卖，因此，没有敌伪股份。五，解放后，没有用纱布调换金钞的事体，……”

马慕韩把大家提的重大问题都回答了，有意补充坦白了解放前的逃到国外的账外财产的数字和这些账外财产所得税数字，加在一块儿违法总数是六百三十五亿四千八百万元。他坐下来，希望这次能够顺利过关，可是他嘴上还说：

“如果还有不彻底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潘信诚见马慕韩没有补充偷工减料方面的数字，他心里很高兴，但马慕韩从二百一十三亿三千六百万一下子加码到六百三十五亿四千八百万元，

虽然不是潘信诚的，可是四百二十多亿呀，他算算也有些肉痛。潘信诚心中好笑，马慕韩不是亲手办厂起家，是承先人的余荫，为了急于过关，竟然沉不住气，一口吐出这许多，损人，又不利己，简直是一位不懂世道艰难的大少爷。马慕韩这样放手加码，实际上也是做给大家看，尽量凑上数字，只要“过”了“关”，在所不惜，却叫潘信诚这些人为难了。更荒唐的是马慕韩还要“各位指教”，这不是不顾别人死活吗？潘信诚怕他经不起别人再一追问，可能又要胡乱加码，他便先发制人，抢先站起来说：

“这次慕韩坦白是很彻底了，我不晓得各位有啥意见没有？我是没有意见了。”

“我也没有意见。”这是潘宏福的声音。

大家听了潘信诚带有暗示性的话，又仔细翻阅了一下笔记本，再看看马慕韩第二次坦白交代的数字，没有一个人讲话的。大家都觉得马慕韩坦白交代的数字确实不少了，也没啥问题好提。现在是担心自己怎么坦白交代和补充坦白交代。

金懋廉坐在窗口，望着窗外下面的黄浦江，滚滚浊流向北边流去，江对过的浦东那边，在一片绿色的原野上散布着一座座耀眼的红色砖瓦砌成的厂房，当中矗立着高大的烟囱，直薄云霄，里面冒出一阵阵黄色的黑色的浓烟，一团又一团的飘浮在空中，如同

黑的黄的云彩似的。金懋廉暗中计算马慕韩坦白交代的数字，如果纺织染整加工组的同业们都照他这样算，那大家便要倾家荡产，钞票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流掉，工厂也要像那黄的黑的浓烟一样飘走。信通银行也不会存在，就是存在，在上海滩上也没有多少生意好做了。

和金懋廉一样焦急的还有江菊霞。当马慕韩补充交代的辰光，她不断用眼光暗示他。他仿佛没有看见，一个劲往下说。她恨不能走过去捂住他的嘴，质问他是不是发疯了。看到大家都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她也不好轻举妄动，不能造次。她担心棉纺业要是都照他这么坦白交代，那每一家都要清理资产，料理后事，关门大吉。这么一来，棉纺业公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她也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她倒要看看政府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会议室里，大家沉默，可怕的沉默，谁也不吭声。潘信诚的眼光向大家巡视了一下，察觉大家的心事，他也没有再言语。

在静悄悄中，坐在潘信诚隔壁的那个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中年工作人员站起来说话了：

“我们五反运动，根据中央的指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算起，解放以前的一概不追究。马慕韩先生坦白数字里有几笔是解放前的，我刚才

算了算，有四百二十二亿一千二百万不应该计算在内，应该除掉的。”

“那四百二十多亿应该除掉吗？”潘信诚心中兀自吃了一惊。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政府不是要钞票吗？为啥一下子除掉四百二十多亿？接着一想：也有道理，这都是解放前的账，当然不应该算。他像是自己忽然收入了四百二十多亿，高兴得差一点要笑出声来，紧紧闭着嘴，努力不露出喜悦的心情。他提高嗓子问，有意引起大家注意。

工商组的同志回答是肯定的。潘信诚又说道：

“政府办事真英明，一点不含糊，该多少算多少。”

他的谴责的眼光睨视了马慕韩一下。金懋廉深深喘了一口气。他心上的阴影给工商组同志的几句话吹得一干二净，心里开朗起来，如同窗外的浦东的原野，一眼望过去，看不到尽头，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江菊霞心情也舒畅了，她站起来说：

“这四百二十二亿当然不能算，全是解放前的账。”

“人民政府完全按政策办事，共产党说到就做到。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这是冯永祥的声音。潘信诚抓住这有利的形势，问大家还有意见没有，只有两个人提了一些无关重

要的问题。马慕韩说明了一下，再也没有人提意见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问题。潘宏福从黑公事皮包里掏出坦白交代的材料翻了翻，觉得过不去，又放到皮包里去了。他也希望想出一两笔大数字坦白坦白，然后由工商组的同志除掉，那多么漂亮呀！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只好等今天散了会，回家和爸爸再商量。他又怕错过今天的好机会，用眼睛望了爸爸一下，征求爸爸的意见。潘信诚暗中轻轻点了点头，迅速地望着大家：

“马慕韩自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诸位有啥意见？”

唐仲笙因为不了解棉纺业的情况，没有办法，不得不提有没有行贿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那条意见。他以为马慕韩只要说一下“没有”也就完了，不料马慕韩一直不断盯着他望，不满的情绪从马慕韩炯炯的眼光中流露出来了。他觉得做人真难，马慕韩一点也不想想他的处境，他来了，哪能不提点问题。话既然说出去了，没法收回，他想等到散会以后跟马慕韩解释解释，弥补弥补两人之间的裂痕。现在潘信诚征求大家的意见，正好给他一个好机会。他站了起来，因为矮小，和别人坐着差不多高，差一点叫冯永祥抢先发言，幸亏潘信诚早看到了，对冯永祥说：

“唐仲笙先站起来，请让他先谈。”

冯永祥歉意地向唐仲笙拱拱手：

“对不起，我没看见你站起来。好，仲笙兄先谈。”

“从坦白交代的数字来看，二百一十三亿三千六百万，兴盛的五毒不法行为是不轻的……”唐仲笙说到这里，马慕韩的眼光又盯到他的身上了。他发觉了马慕韩的眼光，有意把脸转过去，对大家说，“不过，要是分析一下，有一些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产生漏洞，按着过去陋规办事，这是过去私营厂常有的事。加工订货以后，旧作风没改，不完全是有意的，经过大家帮助，慕韩兄今天坦白的彻底。根据政府的政策，似乎可以考虑提升一级。”说到这里，他朝潘信诚旁边的那位工商组的同志望了望，怕话说得滑了边，又连忙收回一点，说，“我这个意见不晓得对不对，还希望工商组的同志指教。”

这一次是唐仲笙主动地朝马慕韩望了一眼，希望求得马慕韩谅解他的苦衷。马慕韩面部没有表情，那炯炯的眼光暗暗窥视着工商组的同志。工商组同志说：

“看大家意见，不要忘记，大家要互助互评呀！”

“是的，是的。”唐仲笙试探不出工商组同志的态度，他灵活地紧接上去说，“互助之后，应该互评了。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请大家来评。”

潘信诚内心里恨不能评马慕韩是严重违法户，

因为他害了大家。想到潘宏福还没有互助互评，又希望评马慕韩是基本守法户。可是他不做声，望着大家：

“诸位有啥意见？”

江菊霞完全同意唐仲笙的意见，但她嘴上却说：

“马慕韩自评半守法半违法户很好，兴盛很多事是按照政府规定办的，但也有许多违法行为，兴盛的非法所得是惊人的，慕韩推脱不了这个责任。我同意慕韩的意见，……”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会场上的人都朝她这边望，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马慕韩都是半守法半违法户，那工商界没有一家不是严重违法户了。只有潘信诚态度非常镇定，半闭着眼睛，觑着面前的那个精致的小笔记本，注视上面的数字，心里想江菊霞反正无产无业，乐得讲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江菊霞不慌不忙接着说：

“不过，马慕韩坦白得很彻底，态度也很诚恳，唐仲笙建议提升一级也有道理，大家可以评评……”

“我也同意唐仲笙的意见……”

冯永祥的声音压倒江菊霞的娇滴滴的吞吞吐吐的语调，场子上的人精神抖擞，大家会意地相互望着，认为冯永祥虽不能完全代表政府，但至少可以代表一半。他一说，大体就差不多了。大家都赞成唐仲

笙的意见，没有一个人反对。潘信诚抓紧机会，说：“大家没有别的意见，就作为建议报告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请工商组审定吧。”

44

徐义德把厂长办公室的窗户统统关上，他不愿意听窗外欢乐的人声，好像大家知道他在厂长室里，有意在外边说说笑笑。他讨厌这些声音。他要安静。他坐在沙发上，望着窗户外边的太阳发愣，觉得太阳老是在那里不动，时间过得比蜗牛走路还要慢上千百倍。忽然厂长室的门开了，他一眼望见严志发把马慕韩带了进来。他有些愕然，莫名其妙地望着马慕韩发愣，几乎说不出话来，以为一定是星二聚餐会有啥不幸事情发生了。人情真是薄得如同航空纸一样，徐义德倒霉的辰光，谁都可以踩他两脚。提起星二聚餐会么，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员，史步云、马慕韩这些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许多重要活动并不通知他。星二聚餐会究竟有些啥活动，他是个睁眼睛，不知道呀！他想起那天早上在聚餐会楼下无意碰到马慕韩他们，见他和江菊霞进去，很快就煞车不谈

了。他不清楚马慕韩潘信诚他们背后搞啥鬼名堂。现在出事了，马慕韩亲自出马，一定是带人来抓他，事先也不向他透露一点风声，太不讲交情了。他想来抓他的警察大概就在厂长室的门口，他借故歪过头去向门口顺便觑了一眼，没有人影，可能没上楼来，一定在楼下等着。马慕韩这一着真毒辣，过去拖人下水，要大家给他抬轿子，现在倒咬一口，亲自来抓人，用别人的血来洗干净自己的手。这个办法想的真聪明。你既不仁，我也不义。徐义德把心一横，想好了主意，只要马慕韩提到星二聚餐会的事，他就一塌括子往马慕韩身上推，另外给加上点酱油醋，叫马慕韩推脱不掉，也好表明他自己是受马慕韩他们欺骗加入的。万一政府听信马慕韩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抓他怎么办呢？他看看厂长室，两边窗户全关得紧紧的，临时连跳窗户也来不及。他后悔刚才不该把窗户关上，他想到跳下去，正好警察就在楼下等着，也逃脱不了。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马慕韩匆匆走进去，并没有注意徐义德惊慌的神色，伸过手去，一把紧紧握着徐义德的手，关切地说：

“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好久不见了，”徐义德冷冷地重复了一句。他也握着马慕韩的手，应付地说，“你好呀！”

“彼此彼此。”

马慕韩和严志发坐了下去，那边徐义德亲自端茶壶，准备把热水瓶拿来泡茶。严志发说：

“叫工人来弄好了。”

徐义德连忙摇手：

“不必，不必。这些小事应该自己动手，我可以来，劳动是最光荣的。”

徐义德把茶先恭恭敬敬地送到严志发面前，然后又倒了一杯给马慕韩。他等待马慕韩谈星二聚餐会的事，只要马慕韩一提，他马上就还击过去。可是马慕韩坐在那里不言语。马慕韩端着茶杯喝了一口，正在想从何谈起哩。大家僵了半晌，还是徐义德先开口：

“你在市里交代完了吗？”

“我交代完了，有的人还在开总结会。有的人参加‘五反’工作了。”

“还是在市里交代好，干脆利索。我这里还没有完哩，”徐义德发现严志发在望他，连忙改口道，“我们这里大概也快了。”

严志发听徐义德说的不对头，立即对他说：

“干脆不干脆，全靠自己。市里区里全一样，不坦白总是不行的。”

马慕韩顿时接过去说：

“严同志的话对，市里区里交代都一样，主要靠自己彻底坦白。”马慕韩听徐义德的口吻，知道他的脑筋还没有转过来，便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说，“我可有亲身的体会……”

徐义德的眼光惊诧地对着马慕韩，说：

“你……”他想马慕韩大概要谈星二聚餐会的事了。

“唔。”

马慕韩扼要地把自己坦白交代的经过说完之后，端起那杯龙井茶又喝了一口，喘了喘气，望着徐义德，慢慢又说下去：

“老实讲，义德兄，五反运动初期，我当时认为‘五反’主要是思想斗争。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太可笑了。我把思想和实际分开了，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要检查自己的错误，也不认为自己有啥错误，坦白交代当然也不认真，大大影响了五反运动。听了陈市长的‘五反’动员报告，我完全赞成人民政府展开五反运动，但认为自己没有五毒不法行为的。没有深入去检查，只是空谈理论，不联系实际，肯定自己没有什么问题。……”

徐义德从中插上来说：

“是呀，我也没啥问题。”

严志发不满意徐义德有意打断马慕韩的话，说：

“马先生还没有说完哩。”

“哦。”徐义德装出好像现在才知道马慕韩没有说完，连忙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慕韩兄。”

马慕韩说：

“增产节约委员会通知我到市里来交代，我的神经就紧张起来。陈市长又对我们三〇三户做了指示，我才开始觉悟过来，晓得单谈理论不讲实际不行，对谁也没有好处。联系实际，就要检查自己，发现了一些问题。我第一次交代就是马马虎虎的，互助互评组对我提了许多意见，没有通过，要我重新交代。小组提那些意见，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进一步又检查出许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工人的帮助。我在市里交代，厂里的工人也帮助我检查。经过他们的帮助，我才比较彻底的坦白。过去我对业务只晓得一些大概，这次使我知道企业中存在的毛病，也熟悉了业务。这些收获，比我过去十几年所学的还要多的多。过去，我的主观很强，这次我批评了自己的主观，看清了工人的力量，的确使我思想上得到了改造，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认识到自己不是没有五毒不法行为，并且很多，义德兄。”

马慕韩娓娓地谈论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徐义德心里好笑：马慕韩不但是一位阔少爷，而且是一位

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啥理论与实际呀，啥实际与理论呀，这些名词叫人听了头痛。最实际的还是钞票，这个起码的道理马慕韩都不知道，还学啥马列主义呢？他本来是用第三者的身份去听马慕韩谈论转变过程的，想不到马慕韩结尾时叫了一声“义德兄”。他听到这三个字，心头一愣，但表面上却很严肃，赞扬地说：

“慕韩兄介绍自己转变的过程，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说到这里，停了停，说，“不过，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比方数字吧，我最近几天也老是在想加码，我想加到一定数字，问题也就差不多可以解决了，只是没有那些不法行为，随便加上恐怕也是不好的吧。”

严志发听他这些不入耳的话，直冒火星，忍不住高声质问道：

“这是啥闲话？你想诬蔑人民政府吗？五反运动是要钱吗？”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严同志，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徐义德不动声色，慢悠悠地说。

“那是啥意思？”严志发盯着徐义德问。

马慕韩插上来指责徐义德道：

“义德兄，你这几句话确实欠妥。人民政府开展五反运动主要是肃清我们的五毒，建设新民主主义

的经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要数字。那四百二十多亿是我亲自交代的，工商组同志马上就剔除了。政府这次运动要帮助我们清除五毒行为。最初我不了解，晓得一些不法行为，也不好意思交代，交代了一件两件还有点儿肉痛。总以为这些事自己不交代，人民政府不会晓得的。可是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高级职员又归了队，大家又互助互评，哪件事能瞒过人民政府。有些事，还是政府启发，我才想起来的。”

徐义德顿时想起了昨天他就在这间厂长室里听到“五反”检查队同志的广播：

全厂同志们注意：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韩云程工程师已经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他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徐义德划清了界限，检举了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

这几句话在徐义德的脑筋里老是转来转去，想不到韩云程这家伙忘恩负义竟然归了队，厂长是不想当了，等五反运动过去，干脆工程师也别当，给我滚出沪江纱厂的大门！幸好韩云程知道自己的秘密还不多，梅佐贤和勇复基还没有动静，徐义德的心稍为安定了一些。他说：

“是的，没有一件事能瞒过政府。”他心里却说：难道人民政府是神仙，有顺风耳和千里眼，啥事体都晓得？马慕韩究竟年纪青，想的未免太天真了一些。他巧辩地说，“没有做过的事，也不好乱说……”

“谁要你乱说的？”严志发忍不住插上来问他，“政府强迫你乱说吗？”

“没有，没有。”徐义德放下了笑脸，说，“严同志，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

严志发觉得和徐义德这样的人说话要吃糯米才行，你顶他一下，他就缩回去。你让他，他就进攻。他话里老是带刺，可又不容易抓住他的把柄。他说：

“你有啥意见，爽爽快快地说，不要浪费时间。”

“我完全同意严同志的意见，我讲话喜欢直截了当。余静同志和严同志给我不少帮助，我还要向严同志多多学习，在五反运动中好好改造。”

马慕韩怕他们再顶下去，从中和缓空气，笑着说：

“义德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可见得五反运动改造我们工商界确实起了不小作用。”

“我不过跟着大家一道走，不敢落后。”

“能跟上时代走，也就不错了。”马慕韩进一步说，“星二聚餐会的事我也在市里交代了！……”

徐义德见他提起星二聚餐会，每根神经都紧张

起来了。他料想的不幸事情终于发生了。今天一点准备也没有，牙刷牙膏和衬衣都没有带，身上的钱也很少。打个电话回家去吧，马慕韩和严志发就坐在旁边；下楼去打电话呢，那边人更多。他瞧见马慕韩和严志发在望他，慌忙提高嗓子，大声说道：

“星二聚餐会么，这只是工商界朋友们在一道吃吃饭，上海这样的聚餐会成百上千，别的聚餐会没听说要交代，星二要交代吗？”

“当然要交代。”

“哦。”

“还应该详细交代。”

“是的，是的。不过星二聚餐会和重庆那个星四聚餐会性质不同，星二是学习政策联络感情的。”

马慕韩不同意徐义德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更正道：

“你这样说法不对。星二聚餐会虽说和星四不同，我们除了吃吃饭以外，有时也商量一些事情，研究怎样对付政府的政策法规，至少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加工场所。”

“这个，这个……”徐义德面孔发青，心里发慌，话也说不周全了。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个，我不大清楚，……”

“有些事你也参加了的。”

“慕韩兄，”他意味深长地亲热地叫了一声，说，“你别记错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讨论棉纺检验问题，你不是在场吗？”

徐义德歪着脑袋出神地望着马慕韩，奇怪这位小开变得这么快，简直是一点旧情也不念，叫他没有退避的余地。他皱着眉头，好像在回忆，却又想不起来似的，惊诧地问：

“有这样的事吗？”

“当然有。”马慕韩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交代了我们聚餐会筹备经过，请求政府给我应得的处分。”

“啊！”徐义德听到这里，向沙发背上一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马慕韩见徐义德神色惊慌，连忙安定他，说：

“星二聚餐会主要是我们几个发起人负责，一般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人倒没啥。”

徐义德慢慢从沙发背上抬起头来，对严志发说：

“星二聚餐会确是冯先生领导的。马先生对这个聚餐会最清楚不过了。”

严志发早知道徐义德是星二聚餐会的成员，见他那副慌张神情，把责任尽往马慕韩身上推，心里有些好笑。杨部长说的对：别看徐义德表面怎样顽强，

只要抓住他的弱点，拿到真凭实据，他就很脆弱。他对徐义德说：

“不要说参加星二聚餐会的人，就是发起星二聚餐会的人，像马慕韩先生，只要坦白交代了，人民政府一定从宽处理。如果有五毒不法行为，拒不交代，那是要从严处理的。”

“严同志说得对，义德兄，人民政府的信用向来可靠，这一点，你放心。”

“我知道。”徐义德勉勉强强地说。

“那很好。”马慕韩见他态度很少改变，便暗示地说，“在市里交代，有些人兜圈子挤牙膏，自己不动手，要别人擦背，结果还是要彻底坦白交代，可是弄得很难堪。”

徐义德懂得这几句话的意思，也知道这几句话的分量。他料想马慕韩一定是杨部长请来劝降的，自信和梅佐贤勇复基这些人有交情，就是韩云程归队，也不能够动摇徐义德自以为巩固的阵线。星二聚餐会的事比较棘手，听严志发的口气，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大概还不至于上提篮桥，他的精神又抖擞起来，态度也比刚才强硬了。他很有把握地说：

“我洗澡从来是自己动手，不要别人擦背的。”

马慕韩也不含糊，站起来说：

“我今天也不过是为了朋友的关系，特地来帮助

你。希望你仔细考虑考虑我的话，绝不会叫你吃亏的。别弄得狼狈不堪，下不了台，后悔就来不及了。”

徐义德也站了起来，仿佛是在请马慕韩早点走出去。他冷冷地说：

“谢谢你的金言。”

45

下午四点半钟光景，大太太和二太太她们在餐厅里吃完了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大太太有点累了，上楼回到卧房里去闭一会眼睛，养养神。守仁一放下箸子，脚底上像是有油似的，一滑就溜出去了，平安溜冰场有朋友在等他哩。二太太精神充沛，拿了一副美国造的玻璃扑克，走进东客厅里，把扑克往玻璃桌面的小圆桌子上一放，坐在一张朱红色的皮椅子上。透过玻璃桌面，她看到小圆桌子下面钢架上那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开得正旺，叹息了一声，说：

“花开得倒不错，只是他，不晓得前途怎么样……”

这一阵子，徐义德回来不大说话，不知道厂里“五反”真相究竟怎么样。她也不好问，看徐义德

的神色，大半不妙。她替他担心，也替自己担心。最近苏沛霖从乡下来，谈到乡下情形，更加重她的心思。现在是啥辰光？朱筱堂还想到上海来！她不能帮徐义德的忙，但也不能让娘家来人添徐义德的麻烦。目前徐义德已经够受了。要是哥哥还在的话，徐义德万一不幸有个三长两短，她还有个靠山，可以到无锡去。现在这个靠山倒了，徐义德又岌岌可危，她将来怕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想到这里，她立刻洗了洗牌，一张一张放下去，成一个宝塔形，第一排一张，第二排两张……第六排六张，全盖着，一排压着一排，只有第七排七张是翻开的，然后把手里多余的牌一张一张揭开，要是和桌子上翻开的牌数字邻近，就拿掉，再揭手里的牌。她拿到第四排，桌子上翻开的是两个 A 和两个 Q，K、J 和 2 已经出过不少，连揭了三张，数字都同 A 和 Q 不邻近。她心上浮起了乌云，心情有点沉重，如果“顺”拿不完，“开”不了“关”，那不是明明告诉她徐义德的前途不妙吗？她发现手里的牌不多了，大约还有十几张，再拿不了，就很危险。她的眼光盯着两个 A 和 Q 发愣。

老王从外边兴冲冲找到东客厅，见二太太在玩扑克，料想心情很好，便不假思索地走到她身边，报道：

“太太，余静同志来看您！”

朱瑞芳满脸不高兴地望了老王一眼：

“啥鱼金鱼银，我不认识。”

他看到苗头不对，可还不知道二太太不是心思，连忙解释道：

“就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余静同志，听说她还是党支部书记哩。”

“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同我有啥关系？我不认识她，找我做啥？”

“她说，”他曲着背，冲着她慢慢地说，“想和您谈谈总经理的事……”

“和我谈啥？有事，要她找总经理去。就说我不在家。”

她把头一晃，转过脸去，又望着两个 A 和 Q，揭开手里的牌，是张 J，笑着说：

“这次可拿了一副。”

他见她脸上有了笑容，乘机小声说了一句：

“我已经告诉她，您在家里。”

她生气地把手里的牌往玻璃桌子上一放，歪过头来，问：

“什么？你为什么告诉她我在家里？”

“太太，我买东西报账，您不是总对我说，做事不要说谎，不要报假账吗？”

她瞪了他一眼：

“这和报账有啥关系？”

他弯了一弯腰，应声说：

“是，这和报账没有关系。……您事先没吩咐，小的这次说错了……”

他没等他说下去，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办别的事体门槛很精，就是这桩事体糊涂了。”

他顺着她说：

“是的，一时糊涂，以后一定留心。”

她没有再言语。他站在那里没走，想起余静还在等候，过了一会，说：

“太太，余静同志在门口等着哩。”

“唉，”她想了想，事情没法挽回了，只好说，“那你叫她来吧。”

他连忙退了出去，刚走出东客厅的门，又给她叫回去了。她说：

“以后有人来看我，特别是厂里的人，要先问我一声，再告诉人家我在不在家。”

“晓得了。”

他走出去把余静领进了东客厅，接着送进来一杯绿茶，便迅速退出去，远远避开了。

她指着对面的那张朱红色的皮椅子，对余静说：

“对不起，请坐一歇，我这副牌马上就拿完了。”

她不高兴见余静，有意把余静放在一边，冷余静一下。她急于想知道徐义德的命运，不把牌拿完，没有心思谈话。她揭开手里的牌，是个2，拿出了一副A，又翻手里的牌。

余静坐在她的对面，看她只顾翻牌，不理人，便说道：

“你有事，那我改天再来。”

“这，”朱瑞芳想把余静气走，余静自己要走，那不是再好也没有吗？可是想到改天还要来，不如现在打发一下算了。她微微一笑，说，“真对不住，我马上就拿完了。你看，只有一张了。”

桌子上剩下了最后一张，是个7；她手里也剩下最后一张，不知道是啥，能不能开关，就看这一张了。她渴望这一张拿掉，迅速地翻开一看：是5，差一点，没能拿通。她把牌往旁边一推，自言自语地说：

“真讨厌！”

她的眼睛慢慢转到余静的脸上，自己嘴上浮起一个非常勉强的笑容：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歇。找我，有啥事体吗？”

余静本来准备和她先闲聊聊，慢慢再谈到徐义德身上，不料朱瑞芳开门见山，干巴巴地直接问她。她想了想，避开朱瑞芳的问题，岔开去说：

“早就想来看看你们，一直没有空……”

朱瑞芳立刻插上去说：

“你们忙，不敢惊动你们。”

余静没理会她话里的刺，很自然地说下去：

“你们在家里也很忙吗？”

“我们，蹲在家里没事，闷的发慌……”朱瑞芳信口讲到这里，觉得不对头：既然闷的发慌，那正好，余静一直和她扯下去，她怎么好走开呢？她丝毫不露痕迹地把话收了回来，说，“这一阵倒是比较忙一些。你们在厂里忙，我们在家里忙，大家忙个不停。不过么，我们在家里无事忙，整天手脚不停，忙不出一个名堂来，不像你们……”

“只要劳动都好！”

“劳动？”朱瑞芳不懂这是啥意思。她在家里忙的是打牌，看戏，吃馆子，买东西，和劳动有啥关系呢？她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是呀！”

“你们常常出去吗？”余静想了解她们参加不参加社会活动。

“有辰光出去……”

余静很高兴地接上去说：

“那很好。”

朱瑞芳接下去说：

“到南京路公司里买点物事……”

余静大失所望：

“哦。”

“有辰光也到淮海路旧货店跑跑，买点进口货……”朱瑞芳以为工会主席一来一定谈政治啥的，没想到余静和她谈家常。她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谈话也随便一些了。她说，“现在旧货店里也没有啥好物事，……”

余静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又不得不听，等她说完了，便问她：

“你们在家里看报吗？”

“报纸？看的，看的。”

余静的嘴角露出了笑意。她觉得坐在她对面的徐义德的二太太毕竟不错，家庭妇女能看报，知道国家大事，认识会逐渐提高，谈起话来就容易投机了。她又问了一句：

“每天看吗？”

“天天看。”

“养成看报习惯很好的，可以了解很多事体……”

“是呀！”朱瑞芳叹息了一声，不满地说道，“这一阵没啥好看的，老是那几张片子：《思想问题》，《有一家人家》，《卡查赫斯坦》……越剧也老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没啥好看的。……”

余静凝神地望了朱瑞芳一眼：坐在她对面的朱瑞芳和她早一会儿想象中的朱瑞芳竟然是两个人。她不让朱瑞芳再乱扯下去，把话题直截了当提到“五反”上去，说：

“最近报上登的‘五反’消息很多，你没看吗？”

“‘五反’消息？”朱瑞芳心头一愣，她所预料的事终于在她面前出现了，冷静地反复思考，提高警惕地说，“没看，没看。”

余静见她不愿谈下去，便单刀直入地说：

“这是当前的国家大事，你应该看看。我想，对你，对徐义德都有帮助。”

朱瑞芳马上想起早些日子徐义德在林宛芝房间和她们谈的事。她生怕余静再说下去，慌慌张张关紧门：

“义德的事我们一点也不晓得。”

“我并不想打听徐义德的事……”

“哦，哦，”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失言了，余静还没有开口问，怎么倒先撇清，不是露出了马脚吗？她含含糊糊地说，“是啊，是啊。”

“看看‘五反’消息，晓得当前国内的形势，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劝劝徐义德，早点坦白交代五毒不法行为，可以从宽处理，对家里的人也有关系，你们应该劝他……”

“这个，这个，”朱瑞芳想打断余静的话又没法打断，勉强地应付她，说，“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家庭妇女，也闹不清……”

“现在妇女和男子一样，可以管事，也有责任可以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处理家庭关系，劝说自己的亲属……”

“这个么，是那些能干的年青妇女的事。我们脑筋旧，不中用了。”

“不，听说你很精明哩！”余静有点点她一下。

“谁在瞎嚼蛆，没有的事。”

“徐义德回来不和你谈谈吗？”

提到这，朱瑞芳不由地气从心起，酸溜溜地说：

“他么，一回来，就钻到林宛芝的房间里。”她伸出右手的小手指来加强对林宛芝的不满和轻视，说，“啥也不和我谈。我在徐家啊，就像是聋子，啥也听不到；又像是个瞎子，啥也看不见；如今变成个哑巴了，啥也说不出。”

“林宛芝啥事体都晓得吗？”

“她呀，自然什么事都晓得，”朱瑞芳一提到林宛芝，仇恨的激流就从心头涌起，现在借机会把事体往她身上一推，让她去做难人：不说出来，看她怎么对付余静；说出来，瞧她哪能有脸见徐义德。这样反正对朱瑞芳都有利。她撇一撇嘴说，“他有啥事体，总

对她说。我嚟，经常蒙在鼓里。有的事，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全晓得了，我还不清楚哩。”

“林宛芝不是出去了吗？”

“是呀，她常常出去，谁晓得她到啥地方去了。”

余静听她推三推四的口气，叫你无从谈下去。但余静不能白来一趟，空着两手回去，怎么好向杨部长汇报呢？她把话拉回来，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在沪江厂里做工很久了，徐义德和你们家里的事我多少也晓得一点。你今天讲话太客气了一些，总说啥不晓得。你说我会相信吗？”

朱瑞芳的年龄起码比余静大十岁，她听了余静这几句老练而又有骨头的話，余静倒好像比她大十岁光景。她一时回答不上余静的话，随手拿过散乱地放在玻璃桌子上的扑克，望着那上面裸体女人的画图，耸了耸肩，轻松地说：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她把扑克理好，洗了洗，说：

“我这个人，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人家总说我精明，其实我一点也不精明，啥事体也不晓得。我只会起起卦……”

她又把牌一排一排的摆好，要“开关”，再问问徐义德的吉凶祸福。

“起卦有啥用场？这是洋迷信。你年纪不小，懂得的事体不少，有时间应该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考虑徐义德的问题，劝他坦白交代，这样对徐义德才有帮助。徐义德的事体你一点不关心吗？”余静不让她把牌摆好，提高了嗓子说。

这个问题朱瑞芳没有办法再说不知道了，她点点头，接着手里的牌，蹙着眉头，忧虑地说：

“义德的事么，我当然关心的。”

“你希望不希望他快点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呢？”

“当然希望啰。”

“你要劝劝他。”

“他么，”朱瑞芳眉头一扬，怕余静又引到她身上，连忙推开，说，“从来不听我的话。我哩，啥也不晓得，哪能劝他呢？”

“就算你不大了解他的问题，也应该劝他坦白。这是政府给他的出路。他不坦白，根据他的五毒罪行，人民政府也可以定罪。那辰光，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朱瑞芳不愿意再听余静说下去，望着玻璃桌面下边的娇妍的水红色的月季花，没有答她，像是在想重大问题。东客厅里静静的。余静望着她光溜溜的乌黑头发上玛瑙色的鸡心夹子，心里有点忍耐不住，真的想跳起来质问她，一想起今天是头一回来，事情还

没有个眉目，得耐心点。她又忍住了，耐心地等她说话。她听余静很有斤两的话，态度有点改变，不敢顶下去，也不好意思再沉默下去，慢悠悠地说：

“这些事，我看，你还是找义德自己去谈好。也希望义德能够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不过我们女人家不了解他那些事体。”

朱瑞芳把门关得更紧，点水不漏。余静咬咬下嘴唇，站了起来：

“需要的辰光，我会找徐义德的。我刚才说的话，希望你很好考虑考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余静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朱瑞芳送到客厅门口，露着牙齿，半笑不笑地说：

“不远送了。”

朱瑞芳说完话，径自上楼去了。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指着余静的背影，耸了耸鼻子，说：

“真讨厌！害得我‘关’也没有‘开’！”

她一笃一笃地走上楼，去敲大太太房间的门。

大太太今天多吃了一个芝麻汤团，胸口感到有个啥物事堵着，不舒服。她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自己不断用手抚摩着胸脯，帮助肠胃消化。朱瑞芳敲门，她正在闭目养神。她以为是娘姨送啥物事进来，躺在床上没动，只是迟缓地低低地应了一声：

“进来！”

门开了。大太太半睁开眼睛朝门觑了觑，一见是朱瑞芳，她坐了起来，说：

“原来是你……”

“真倒霉！”朱瑞芳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在床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说，“真倒霉！”

大太太不知道出了啥事体，关心地问：

“守仁出了事吗？”

“他，现在好了。”朱瑞芳在别人面前总给守仁说好话的。她说，“不是他，是工会主席……”

朱瑞芳把刚才余静来的情形向大太太叙述了一番。大太太伸了伸舌头，小声地说：

“你的胆子可不小！工会主席好得罪的？”

“工会主席哪能？她的权力再大，也管不到我这个家庭妇女身上。”

“不能这么讲，工会主席总是工会主席呀！”

“我有意这样的。”

“你晓得，”大太太望望门外，没有人，声音稍为放大了一点说，“现在是啥辰光？”

“不是在‘五反’吗？”

“对啦，不比平常，现在是‘五反’。你哪能对工会主席这个态度。”

“她能把我怎样？就是因为‘五反’，我才对她这样。要是在平时，我对她会好些。我才不怕她哩！”

“她对你没有办法，对付义德可有办法啊！”

大太太这句话提醒了朱瑞芳。她心头的一股怨气马上消散，头脑清醒了一些，有点后悔，说：

“你的话倒是的。”

“我们不能帮义德忙，可也不能增加他的负担！”

朱瑞芳连忙声明：

“我也是为了他。义德不是说，要是厂里有人来，大家回说啥都不晓得吗？”

“这个，也是的；不过么，讲话也可以客气点。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犯不着去碰人家……”

“我心里气不过，”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做的有点过火，想挽回这个局面，向大太太讨救兵，说，“你看，怎么办呢？”

“能不能追回来？”

“人家早走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大太太低下头来，想了想，说，“下次来，对她态度好一些，也许可以挽回。”

“唔。”朱瑞芳说，“下次她来，一定好好敷衍敷衍她。”

用不着等到下次，当她们两人在楼上后悔没法挽回，余静又坐在东客厅的玻璃小圆桌子面前，在和林宛芝谈话了。

刚才余静走到徐公馆的黑铁大门那儿，老王给她开了门，她正要跨出去，林宛芝手里挟着一大包东西，从南京路回来了。老王走上去接过林宛芝手里的那一包东西，指着余静对她说：

“太太，这位余静同志来看你。我说，碰巧您上街去了。她和二太太谈了一阵，正要走，您回来了，真巧。”

林宛芝从余静那身灰布列宁装上就猜出她是厂里的同志，一听到余静这两个字，完全清楚了。她是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徐义德在家里常和林宛芝提到她。林宛芝对她点点头，说：

“对不起，我上街去买了点零碎物事，差点碰不上你。里面坐，里面坐。”

林宛芝热情地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进大客厅，想起朱瑞芳她们在家，就把她带进东客厅，指着靠窗户那边的小圆玻璃桌子，说：

“这里坐吧，安静点。”她转过脸去，对老王说，“倒茶，拿些点心来。”

余静摇摇手，说：

“我不饿。”

“不要客气，我也要吃一点。”

“今天预备的点心是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好不好？还是弄点别的？”

老王知道林宛芝不喜欢吃汤团的。果然林宛芝说：

“汤团？腻得很。有啥清爽点的。”

“蟹壳黄^① 怎么样？葱油的。”

“也好。”她转过来对余静说，“来了很久吗？”

“没多久。”

“真对不起你，早晓得你要来，我今天不上街了。”林宛芝仔细地向余静浑身上下望个不停。她一辈子也没见过共产党员，更没有见过女共产党员。关于共产党员的事情她倒听说过不少，可是没有见过共产党员。在她的脑筋里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也是十分厉害的人，一定生得和众人不同，可是余静浑身上下却和普通的女人一样，看不出有啥区别来。但她的眼光仍然不断地端详余静。

余静给她看得有点奇怪，以为自己身上衣服有啥破的地方，低下头来看看，没有，她说：

“没关系。……”

“这一阵，厂里忙吗？”

不等余静开口，林宛芝主动谈到厂里的事。这是一个机会。余静觉得林宛芝热情而又直爽，一见面就谈得来，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她就直接和林宛芝谈

① 蟹壳黄即烧饼。

到徐义德的事，说：

“是呀，忙着搞‘五反’，今天来看你，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徐义德的事……”

林宛芝心头一愣，一个不祥的兆头掠过她的脑海：在她上街以后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难道徐义德出了事吗？她关怀地反问道：

“义德不是在厂里吗？”

“唔，在厂里。”

林宛芝仿佛悬在半空中的那颗心放下了：

“他的事怎么样啦？”

“还是不肯坦白。”

“那多不好。”林宛芝听余静不满的口气，立刻感到徐义德的影子就站在自己身边。

“他不坦白，家里人要帮助帮助他才好。”

余静说完了话，注视林宛芝面部的表情。林宛芝微微低下了头，避开余静的视线，叹息了一声，说：

“我可没有能力帮助他呀！”

“为啥没能力？”

“女人家有啥能力？他的事从来不和我商量，一回到家里，向来不谈正经的。”

“女人和男人有啥不同吗？”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林宛芝一时答不上来，她望着玻璃小圆桌子下面的那盆水红色的月季花，望着地上的草绿

色的厚厚的地毯……在这些物件上找不到答案，也得不到启发。她吞吞吐吐地说，“这个，是不同呀！”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那是的。”

“有啥不同？”

“他们当家。”

“我们女人就不能做主吗？”

她怀疑地问：

“你说女人和男人是——”

“一样的，平等的。应该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

“我和别的女人也不一样……”林宛芝没有说下去，注视着余静。她听余静说下去：

“为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人。”

林宛芝的眼睛里露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的光采。她在徐公馆，总觉得低人一等，感到头上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抬不起头来。她有天大的理由也说不过那两位太太，只要她们伸出一个手指来，她就啥也说不出来了，好像自己这个卑贱的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徐义德虽说很宠爱她，但也只是拿她当一只金丝笼中的娇嫩的小鸟儿看待，抓在手里，绝不放松一步。像是徐义德很多财产一样，她不过是徐义德的一个能说话的财物。余静对她的谈话，使她明白自己

地位原来并不低于别人，第一次感到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余静进一步说：

“今天来找你，就是因为你有能力，一定能帮助徐义德。”

林宛芝半信半疑，指着自已，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我？”

“就是你！”

林宛芝的脸上堆满笑容，高兴地问：

“我哪能帮助他呢？”

“你应该劝他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改正错误，接受党和工会的领导，合法经营企业，这是唯一的出路。”

林宛芝思索余静的话。

老王送进来一盘蟹壳黄和两杯浓香扑鼻的咖啡，放在玻璃的小圆桌子上。他问林宛芝：

“还要点啥？”

林宛芝摇摇头。老王拿着托盘，悄悄退了出去。林宛芝用筷子挟了一个蟹壳黄放在余静面前的淡青色的空碟子里，说：

“先吃点心吧。”

余静没吃。林宛芝给自己拿了一个，边吃边说：

“别客气，吃吧。”

“好的。”余静吃了一口，又放到淡青色瓷碟子里，问她，“你说，我讲的对吗？”

“对是对，”林宛芝咽下嘴里的蟹壳黄，说，“只是——”

余静代她说：

“没有能力？”

林宛芝笑了。

“只要下决心做，一定办的到。”

余静坚决的口吻给林宛芝带来了勇气。她问：

“像我这样的人也行吗？”

“当然行。”

“只怕办不好……”林宛芝还是没有把握。

“一次不行，两次，……十次，百次，最后一定办到的。”

林宛芝从余静充满信心的言语里吸取了力量，很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

“让我试试看。”

余静告辞，林宛芝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多少年来总感到自己是徐义德附属的物事，只有余静第一次拿她当一个独立的人看待，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在余静面前比在一般人面前要高的多。她紧紧握着余静的手，眼睛里忍不住润湿了。余静热望地对她说：

“好好努力，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

林宛芝微微点点头，很激动地望着余静，很久很久，才放她走去，说：

“有空请到我这里来坐坐。”

46

下午三点钟。严志发来约徐义德到夜校的课室去。快到课室那儿，徐义德有意把步子放慢了。他寻思是不是开会斗争他？怎么应付那转瞬之间就要出现的激烈的场面呢？得好好考虑一下，想个对策。

自从杨健跨进沪江纱厂的大门，徐义德的心里就没有宁静过。本来他并不把余静放在眼里，但余静现在和过去仿佛是两个人，非常老练英明，他的花招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耍了。不讲余静，连严志发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也和他过去所见到的工人不同，不仅办事有能力，经验很丰富，而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他还能说一大套哩。从党支部那里，从杨健那里，发出一种看不见但是完全可以感觉到的巨大的力量，日渐向他逼近。那天严志发送给他三张白纸要他坦白，第二天他马马虎虎写了空空洞洞的

几条送给严志发转呈杨部长，以后就没有下文。杨部长不曾找过他，严志发也没有再来找他，他有点沉不住气，想去找严志发，却又不知道从何谈起，处在尴尬的境地里。他自己感到一天比一天孤单，昨天马慕韩那一番话，听了之后，他表面虽然很顽强，可是心里却冷了半截：像马慕韩那些工商界的大亨，好像全坦白了，没有一个抵挡得住。那么，徐义德能够抵挡得住吗？抵挡不住的话，所有的财产就要完蛋了。

昨天晚上他怀着一肚子心思回到家里，希望从林宛芝那里得到一些温暖。林宛芝一见了她，劈口就问：“你坦白了没有？”

他注视着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难道她也变了心吗？为啥也逼他坦白呢？他沉下了脸，把嘴一撇，三分生气七分开玩笑地说：

“女人家不要问这些事。”

“为啥不能问？女人不是人吗？女人该受男人欺负吗？男人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现在男女平等了……”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她从啥地方忽然学来这些新名词。她信口滑出“余静同志……”几个字。他愣住了，旋即眼睛一瞪，质问她：

“你为啥去找余静？”

她想起余静对她的鼓励，毫不含糊地走上前一步，

反问：

“为啥不能找？”

“你能，你能。你和余静穿一条裤子都可以……”他气生生地坐到沙发里去。

她见他真的生气了，连忙笑着说：

“是她来的……”

“余静这家伙到我家里来了吗？”

“是的，今天下午……”

余静和林宛芝谈的话，在林宛芝的生命史上是新的一页。余静讲的话和别人不同，特别新鲜。她是关在徐义德特制的狭小的笼里的小鸟第一次见到春天的阳光，感到特别温暖。她一听见徐义德回来，便鼓起勇气正面向他提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谈过话，所以态度有点生硬，语气十分直率，叫他感到突然。徐义德知道余静到他家里来过，心中非常愤恨。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走到她面前说：

“很好，很好。你和余静一道来对付我，好极了，好极了！”

他狡黠地笑了两声。她见他这样，心里有点慌张，怕和他的关系搞坏，别让朱瑞芳她们从中挑拨，想不往下谈了。不过一想到余静亲切的交谈，她又沉着了，勇气百倍地说：

“义德，你不要这样！”

“我怎么样，称赞你还不好吗？”

“这样叫我心里难过。”

“这样我心里舒服。”

“不，义德，”她过去一手扶着他的肩膀，温存地低声地说，“我劝你也不是为别的，是爱护你，才说这些话。自从‘五反’开始，我哪天不在家里提心吊胆，总怕你有啥意外，天天晚上不等你回来，我总闭不上眼睛。共产党的政策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她忘记了这个字，想了一阵才说下去：“从严。迟早要坦白的，不如早点坦白，我们也好在家里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他站在那里不言语，想不到一天之间林宛芝竟然变了样。她讲到后来，声音有点呜咽了：

“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自己，义德，你向政府坦白吧。”

说到这里，她眼泪在她的眼眶里再也忍不住了，像一串透明的珍珠似的顺着她红润细嫩的腮巴子滚下来。她说不下去了，坐到沙发上，低着头，用一块苹果绿的纱手绢拭去腮巴子上的泪痕。

徐义德一见她这副可怜相，心头的愤恨消逝了，反而坐下去安慰她：

“好，好好，我坦白。”

她抬起头来，微笑地问道：

“真的吗？”

“当然真的。”他盯着她的眼睛问，“你和余静谈别的没有？”

“没有。”

“那很好，我自己去坦白。”

“义德，”她高兴地说，“你这样做得对。”

“你说做得对，当然就不会错了。”他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林宛芝究竟是青年妇女，给余静三言两语就说动了心，傻里傻气地也来劝我坦白。厂里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更不了解共产党办事辣手辣脚，去坦白，有个完吗？不坦白，共产党就没有办法。无凭无据，人民政府能把徐义德抓起来吗？坦白倒反而有了证据。林宛芝一个劲纠缠他，没有办法，就信口随便应承一声。林宛芝却以为是真的。徐义德见她那个高兴劲头，心中也很高兴：三言两语骗过了她。但是他心中还不满意，就是马慕韩这些人坦白了。他旋即又安慰自己：马慕韩这些人是大少爷，是小开。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事先没有周密的布置，也缺乏至亲密友，一露破绽，自然抵挡不住，要去坦白。徐义德却完全不同：他有经验，有办法，有布置，还有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这些心腹朋友，何必惧怕？一想到这里，他好像有了依靠。马慕韩这些人抵挡不住，他能抵挡得住，这才是与众不同的徐义德。

不过，今天严志发来约他谈，他还是有点提心吊胆。

严志发一个劲往前走，忽然听不到徐义德沉重迟缓的脚步声，他站了下来，回头一看：徐义德站在那里想心思。他便催徐义德快走。徐义德这是似乎才想起要到夜校的课室里去见杨部长。他加快走了两步，一会又慢了下来。他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即将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啥场面。他留心向课室里面听去：静静的，没有一丝的声音，这更增加了他的顾虑。如果有人声，倒可以估计出里面的规模，甚至还可以从声音里辨别出啥人在里面。可是啥声音也没有。他以为一定是里面坐得满满的，等徐义德一进去就展开激烈的斗争。徐义德不坦白交代，大概是再也走不出课室的门了。他摸摸身上的黑色哗叽的丝棉长袍子，心中稍为定了些，因为穿这件长袍子在课室里过一夜是不会感到寒冷的。他硬着头皮，随在严志发后面低着头跨进了课室。

徐义德暗暗抬头向课室四周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地吃了一惊：课室里空荡荡的，椅子上没有一个人。杨部长和余静坐在靠黑板那边，一间大课室里再也没有别的人。他定了定神，心里稍为平静一点，认为没啥大不了的事体。

杨健看他神色惊慌不定。四处张望，有点恐惧的

样子，便走过去搬了一张椅子放在老师桌子旁边，对他说：

“徐先生，请坐。”

杨健最近有意不找徐义德，也叫严志发别去理他。杨健了解像徐义德这样的资本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打通思想的。他这个堡垒是很牢固的，不是一个冲锋可以击破，不但要组织坚强的兵力从外边进攻，还要设法从它的内部突破，这样内外夹攻，才可以拿下。他在党支部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大家同意了意见。他就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瓦解韩云程，动摇梅佐贤、勇复基和郭鹏这些人，劝说林宛芝，同时又向市里请求派来马慕韩劝降。他看看在工人阶级这支主力军的领导下，伟大“五反”的统一战线业已形成，决定今天找徐义德谈一谈。

徐义德很不自然地坐下去，双手放在胸前，微微点点头：

“谢谢，杨部长。”

“你的坦白书我们已经看过了。……”

徐义德一听到杨健这句话就急忙站起来，说：

“请杨部长指教。”

“坐下来谈……”

“是，是是……”徐义德的屁股靠着椅子边坐下。

“我很坦白的告诉你，徐先生，你的坦白书写得

很不坦白……”

徐义德不解似地“哦”了一声。

“你自己写的，你还不晓得？”严志发在一旁哼了一声，说，“别装糊涂！”

“我自己写的，当然晓得。”徐义德连忙对严志发点了点头。

严志发坐在他正对面，也微微点点头：

“那就好了。”

杨健接着警告他说：

“这样对你自己不好。‘五反’工作队进厂那天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想，你应该还记得……”

“记得，记得。杨部长每一句话都是金石之言，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严志发单刀直入地质问道：

“那你为啥不坦白？”

“我当然要坦白，一定坦白……”

余静插上来说：

“你曾经对杨部长说过：一定一一交代你的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部长和同志们的关怀。许多天过去了，你为啥到现在还不坦白呢？”

“我已经坦白了，余静同志，”徐义德说，“我送来那份坦白书，你看了没有？”

严志发忍不住又说道：

“余静同志早看到了，就是没有内容。”

“内容？有的，有的，我写了很多么。……”

杨健不让徐义德再兜圈子、耍花招，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还是直截了当的谈好。我们不在乎写几次，也不在乎写多少字，主要看真正坦白了几条。你想想看，你真正坦白了多少？”

杨健这么一问，徐义德哑口无言了。停了一歇，徐义德才答道：

“我晓得的都坦白了。”

“不见得吧？”杨健笑了笑，说，“是不是说，凡是没有坦白的，你都不晓得呢？”

徐义德听到这好像洞悉他内心秘密的笑声，心头不禁一愣。他于是改口道：

“让我再仔细想想，可能还有点。”

严志发马上说：

“那你现在就坦白吧。”

“现在就坦白？”徐义德的眼光对着杨健。

杨健有意没有答理他，看他究竟怎么打算。严志发质问他：

“你现在还犹豫吗？”

“不犹豫。”徐义德连忙一个劲摇头，“我这个人办事一点不犹豫。”

“人民政府的政策不懂吗？”

“懂，懂，完全懂。”

“那你现在就坦白，坦白完了再回去！”

徐义德仔细思考严志发这两句话。他理解为不坦白就不能回去，也就是说真的要在课室里过一夜了。他的右手摸一摸黑哗叽的丝棉长袍，心里说：早就准备好了，不回去就不回去。他的眼光还是对着杨健，怀疑地问：

“要现在坦白吗？”

杨健知道他在试探，偏不给他露口风，反问他：

“你看怎么样？”

“我，”徐义德没想到杨健会有这一着，确实难住了自己，说了个“我”字，就说不下去了。

“唔，看你自己。”

“那我现在坦白？”

“很好，”杨健马上答应，并且对严志发说，“拿点纸给他。”

“早就准备好了，”严志发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来，撕下三张放在课桌上，对徐义德说，“给你三张。不够，这里还有。”

这一次徐义德可摸不清杨健的意图了。他面对着三张白纸，写不写呢？不写，那不是暴露自己刚才说的是假话吗？写，空洞的言辞再也不能蒙混过去，

五毒不法行为又不愿意坦白，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要决定坦白还是不坦白。他拿着派克自来水钢笔仿佛有千斤重，在白纸上怎么也写不下去。他顿时皱起眉头，向黑板望望，向课桌看看，似乎又真的在回想什么来坦白。但他的眼睛就是不敢对着杨健。杨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严志发在旁边催促：

“你写呀，徐义德。”

“是，我写，我写……”徐义德马上把笔按在纸上，过了一会儿，还是写不下去，不得不正面提出要求，说，“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想想，写好了送来？”

徐义德一时施展不出妙计。他希望争取时间，回去再谋虑谋虑，可能想出啥办法。即使想不出办法，起码可以拖延点时间。出乎徐义德的意料之外，杨健说：

“我晓得你还没有下决心坦白，当然想不出来。回去写也好，别再浪费时间了。”

这几句话把徐义德说得面红耳赤，脸上忽然感到热辣辣的。他勉强镇静，竭力否认道：

“杨部长，决心我是有的。希望你相信我。……”

“要我相信很容易的，只要你真正坦白。我希望你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五毒材料，现

在就等你自己坦白了。你不要迷信攻守同盟，那是靠不住的。你是有名的铁算盘，应该给自己好好打打算盘。党为了挽救你，是可以多等你一些时间的。”

“是的，是的，杨部长的话，句句是良言。”徐义德的头低了下去。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徐义德站了起来，有点不相信杨部长真的让他回去，追问了一句：

“我现在就走吗？”他看看表：五点钟还没到，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他怕提早下班不好。

“现在就可以走，”杨健点点头，说，“坦白书啥辰光送来？”

“明天。”

“好的，希望你好好考虑，不要又想不起来。”

“那不会的。”徐义德一跨出课室的门，步子就加快了，急急忙忙往家里去。

47

徐总经理回到家里，时钟正指着五点。他进门就脱下黑哔叽丝棉长袍子，递给老王。老王没有像往常

那样立刻挂到衣帽间去，他紧紧跟在徐总经理的屁股后面，抢上一步，张开嘴想说啥，却又嚅嚅地说不下去。

徐总经理径自向楼上走去。老王鼓足了勇气，追上一步，大声叫道：

“总经理……”

叫声止住了徐总经理的脚步，他在楼梯上回过头来：

“啥事体？”

老王看见他浓眉下一对锐利的眼光盯着望他，他有点惶恐了。他问自己：报告不报告总经理呢？不报告，不好，应该报告。一刹那间，他自己又回答说：不能报告，报告了，出了什么事，各方面都不讨好，要怪老王哩。不报告，啥人也不能怪他。这是上面的事，老王怎么知道呢？啥人也不会问他的。他拿稳了主意，改口道：

“您有啥吩咐？总经理。”

“没啥。”

“准备点心吗？”

“用不着。”

“要喝点咖啡吗？”老王抬起头来，透过楼梯上的栏杆，望着他。

“不要。”

徐总经理知道没啥事体，便向楼上走去。他今天神经很紧张。现在到了紧要关头，他要最后下决心了。他想休息一下，轻轻松松，然后再考虑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习惯地匆匆向林宛芝的卧室走去。他想象中的林宛芝一定打扮得很漂亮，浑身香喷喷的，一个劲在看画报啥的，心里准是惦念着徐义德。他突然回来，会给她带来意外的喜悦。他走到卧室跟前，房门却关得紧紧的，里面不时传出轻微的亲密的谈话声。他心头一愣，在门外站住了，没有敲门。等了一会，他好奇地弯下腰去，把左眼紧贴着门上钥匙的孔，屏住呼吸，细细往里面看。

冯永祥那天在书房里受到林宛芝的责备，虽然他自己不是心思，整天穷忙，但是有口难以分辩。最近他在市里“过”了“关”，在三〇三户里面变成了积极分子，到处劝人家坦白交代，浑身感到轻松愉快了。他知道徐义德还没有过关，整天泡在厂里，正在经历严重的时日。他从林宛芝那里知道二太太陪大太太上永安公司买东西去了，这是很好的机会。下午三点钟，他换了一身新西装，赶到徐公馆。他和林宛芝先是在大客厅里谈的，不久，他要求到楼上参观参观她的卧室。她没答应。他说参观一下就回到楼下来，没有关系。她犹豫了一会，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一进卧室，东张西望，问这问那，没有一个完。一

边谈着，一边顺手把门关紧。他们两个人坐在长沙发上，越谈声音越低，越靠越近。他的左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听她诉说着在徐家单调而又寂寞的生活。他同情地把她搂在怀里，热烈地吻着她的香喷喷的腮巴子。……

徐总经理在钥匙孔里看出了神，他竟忘记了弯腰站在那里，两条腿有点麻了。刚才的情况，他亲眼完全看见了。他想一头冲进去，那马上三个人同时要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他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名誉。他不能进去，也不能再站在那里。他果断地离开那里，向楼下走去。在楼梯上，他想起刚才老王神情慌张的原因了。

他一进大客厅，冯永祥和林宛芝的一对影子浮在他的眼前。他对林宛芝说：“你太没有良心了。我待你这么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只差把心挖出来给你了，你还不满足！我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为谁辛苦为谁忙？还不是为了你。不管大太太二太太她们的闲言闲语，我一回来总是往你的房间走。忙了一天回来，也不过希望有个窠，有个温暖的家庭，谈谈笑笑，好休息休息。第二天，我这条老牛再出去为你奔走。你背着我，却做出这样的丑事，说啥寂寞、单调，呸！想想看，上海解放以后，像徐家这样的生活享受究竟有多少家？还不满意，嫌寂寞、单调，难道说就凭寂

寞、单调便要偷人养汉吗？真不要脸，真亏你说出口，我真替你害臊！”

林宛芝好像也很不满意徐义德。他仿佛听见她说：“是你讲的，不能得罪冯永祥。他是工商联的委员，是工商界的红人，将来我们有许多事体要拜托他，要依靠他。别人请他也请不来，现在他自己常到我们这里坐坐，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既然要我应付他，怎么现在又怪起我来呢？”

这些话确实是徐义德亲口说的。林宛芝一提，他的理有点屈了。但他旋即给自己解说：“是我讲的，不要得罪他。但是没有要你和他这样啊。这样……这样……简直是太不成体统了。”

林宛芝又说：“是他，是冯永祥这样，哪能怪我呢？”

徐义德一想，这话也有道理。他对着浮在自己面前的冯永祥的苗条的影子说：“是的，她说的不错。冯永祥，你太对不起朋友了，太不讲道德了。古话说的好：朋友妻不可欺。你竟敢在我家里对我老婆这样无礼！你当面污辱我，使我站不住脚，使我见不得人！我不能忍受！我们要把这桩事体谈清爽，从此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今后，你要是再跨进我徐家的门，小心我一刀砍断你的腿！”

他气忿忿地从大客厅走出去。他不从楼梯上大

红色的厚厚的地毯上走，有意踏在地毯旁边的水门汀上，让皮鞋发出囊囊的响声。这响声是告诉冯永祥：我徐义德来了，无耻的家伙小心点，我要给你颜色看。

他一上了楼，脚步声不知不觉地就轻了，快走到林宛芝卧室门口，他的皮鞋声简直听不见了。他站在门口，问自己：“进不进去呢？”第一个声音说：“当然进去。”接着第二个声音说：“还是考虑一下吧。进去容易，出来难。进去以后怎么办呢？大家把脸皮扯破，今后见面不见面呢？见了面，讲不讲话呢？不讲话，人家一定要问：徐义德和冯永祥，怎么忽然见了面不讲话呢？追问起来，内幕会传出去。一传出去，谁也控制不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徐义德的脸搁在啥地方？以后要不要在场面上混呢？他不进去，可以装做不知道这回事，可以把这桩丑事紧紧关在林宛芝的卧室里。今天大太太和二太太都不在家，保险没人知道。老王？他顶多知道冯永祥在楼上和林宛芝谈话，社会公开，那有啥关系呢？并且，徐义德由于冯永祥的介绍才参加了星二聚餐会，往来于工商界巨头们之间，今后还得依靠冯永祥。何况自己还没有‘过’五反的‘关’，不要祸不单行，那边厂里‘五反’斗争弄得热火朝天，这边冯永祥再放一把火，要把徐义德烧得焦头烂额。无论如何，冯永祥这条路

不能断。个把女人是小事。天大的怨气也得咽下。冯永祥是徐义德的晋升的阶梯啊！”

徐义德想到这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回过头来，顺着大红色的厚厚的地毯迟缓地走下楼，轻得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快走到大客厅，他的皮鞋才发出愤怒的橐橐声。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点燃了一支三五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并不吞下去，却用力吐出去，像是吐出一口口的怨气。一支烟吐完了，心里感到舒畅些。他望着墙角的那架大钢琴，设法忘记楼上那一幕，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半晌，楼上那一幕又在他的眼前展开，非常清晰，连声音也仿佛听的清清楚楚。他忍受不了，他的心再也平静不下去。他站了起来，眼光愤愤地望着客厅门外的楼梯，想了想，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他迈脚步，不满地向书房走去，拉出书桌的抽屉，取了三张白纸。他伏在桌上，抽出派克自来水笔，准备重新写坦白书。

他想到杨部长那些话，决心把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向政府坦白，这样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他从上海解放初期的事一件件想起，理出个头绪来。先从套汇写起。他的笔尖一接触到纸面上，便停下来了，问自己：为啥要彻底坦白呢？这些事不坦白，政

府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凭你杨部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知道。为啥要坦白？那不是自己上钩吗？不能。正是因为这是严重关头，只要咬咬牙齿，也许就滑过去了。杨部长那样说法，可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真有本领的话，为啥不拿点颜色出来看看呢？

他越想，越觉得不坦白完全有道理。他无聊地用笔在纸上乱画乱写。他画了一个女人的头，又画了一个男人的头，最初以为不像，再一看，又觉得很像。他感到身后有人在窥视，突然回过头去，书房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他怕被人看见这张画了乱七八糟的纸，赶快把它揉成一团；但又怕给人拾去，立刻把它扯得粉碎，再揉成一团，放在人民装的口袋里，仿佛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回事了。

他站了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几步，停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草地，望着红色围墙外边的一幢幢花园洋房。每家洋房都打开了窗户，好像都有人在窗口望着徐公馆，望着徐公馆里林宛芝的卧室。他不能再在书房里停留，这样下去，不是等于告诉人家徐义德心甘情愿戴绿帽子吗？徐义德不是这种人。他要冲上楼去，把冯永祥这家伙撵走。他走到书房门口又退了回来，心想这桩丑事本来没人知道，那么一闹，反而会传开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也无论如何不能

得罪冯永祥。更不能叫人晓得徐义德知道这件事。他自言自语地说：

“徐义德根本不知道，对！”

应该马上离开这地方。到啥地方去？公司？今天讲好不去的。厂里？刚才和杨部长告别，回来写坦白书，怎么忽然又回去呢？不能。他回头看见挂在墙上那幅《纨扇仕女图》，忽然得了启示，报复地说：

“对，找我的菊霞去！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他得意洋洋地走到门口。老王见他要出去的神情，诧异地问：

“总经理要出去吗？”

“唔，”徐义德态度自若，说，“有点要紧的事体。”老王给他送上帽子。

“准备车子。”徐义德接过帽子说。

“是。”老王飞奔去叫司机。

过了一会，徐义德坐上那辆一九四八年式的林肯牌汽车走了。老王见徐义德走了，他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看门的老刘问他笑啥。他捂着嘴说：

“没啥，没啥！”

老刘附着老王的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问道：

“是不是？”

两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48

晚上七点钟。沪江纱厂铜匠间里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群当中是一张长方桌——用三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块白布。长方桌上端坐着杨健，他正对面坐的是徐义德。徐义德一走进铜匠间，看见那许多人就料到今天的情况不妙，坐下来以后，他有意把头低下，暗中却又不时觑来觑去，但看不太清楚，又不敢完全抬起头来看。他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眼光经常望着那只细白的肥胖的手。

铜匠间里像是处在暴风雨的前夕，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这平静里仿佛孕育着巨大的声音，随时可以爆裂开来。在肃静中，徐义德听到杨健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过去你只坦白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态度极不老实。本来，我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材料处理，为了挽救你，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到仁至义尽，希望你彻底坦白。今天会上，要你表示态度，别再耍花招。你坦白，或者不坦白，我们好处理。以前写的讲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交代的

好，算你坦白；交代的不好，工人同志不允许的。人民政府的法令也不允许。你现在考虑考虑，想好了再讲。”

从课堂回去的第二天下午，徐义德又交了一份坦白书，比过去增加了一些琐碎的项目，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坦白。杨健料到徐义德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还存着蒙混过关的幻想。他便把最近沪江纱厂的情况写了个报告给区委，建议召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大会。区委批准了他的意见。今天就召开了会，厂里有关的职工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出席了。他向徐义德讲清了道理。徐义德听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向杨健感激地点了点头，顺便向左右两边望了望，梅佐贤和韩云程坐在他的左边，他右边是郭鹏和勇复基，再过去有不少工人，他只认识余静、赵得宝、严志发、钟理文、汤阿英和陶阿毛这些人，许多车间的工人面孔很熟，名字可叫不上来。他看到陶阿毛，马上把眼光转过去，生怕被人发现，但又情不自禁地睨视了他一眼。他心想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这些人，在紧要关头就不起作用。这样大规模的会，事先为啥没告诉他？幸亏陶阿毛没有把他忘记，通过梅佐贤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要开这个大会，使他精神上有了些准备。陶阿毛怕他坦白交代，特地编造群众工作组的一些假情况告诉他，鼓励只要今天这个会能够顶过

去，问题就差不多了。他在会场上看到梅佐贤、郭鹏、勇复基和陶阿毛这些人，使他稍为放心：除了韩云程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去以外，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动摇，那么，自己的态度硬到底也就有了把握。他听完杨健讲话，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拘谨地站了起来，按照他事先想好的三部曲表演：首先摘下那顶深蓝色麦而登人民装的帽子，然后低下了头，最后两手垂直，毕恭毕敬地发言，声调低沉而迟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杨部长，我绝对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你到厂里来以后，再三再四开导我，我再不坦白，实在没有良心，也对不起党对我的教导。我晓得的，我都交代了；我不晓得的，我不好瞎说……”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一个老年女工站了起来，大声质问道：

“啥人要你瞎说？你犯的五毒，你自己不晓得？你不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工人不答应！”

这是细纱间的秦妈妈，说到最后，她把胸脯一拍，来加重她的语气。

徐义德不慌不忙地说：

“我晓得了，一定交代。”

“那我问你，那一阵子车间里的生活为啥难做？”

徐义德看秦妈妈气势汹汹的那副腔调，以为她

掌握了重要材料，一听她问的不过是一般的生活难做问题，他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慢慢说道：

“生活难做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很不简单，这里面有机器问题，工人的工作法问题，清洁卫生工作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问题……”

“你提的这些问题，想把责任往工人身上推；我问你：这里面有没有原棉问题？”秦妈妈气愤填膺，盯着徐义德。

“当然，不能说原棉不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你既然承认原棉是其中一个问题，生活难做的主要问题是啥？”

徐义德见秦妈妈立刻抓住原棉问题，而且要他说出主要问题，他感到势头不对，不能掉以轻心，要小心对付，讲究措词：

“这就要仔细研究了。”

“你还要仔细研究，要研究到哪一年才弄的清爽？”秦妈妈冷笑了一声，说，“重点试纺的辰光生活为啥不难做？”

“正在研究，还没有得出结论。”

韩云程见徐义德学他过去的语调，还想实行拖延战术，碰着秦妈妈这个富有经验的对手，不大容易蒙混过去，何况参加会议的那许多人还没有发言哩。他亲身体会拖延不是一个办法。听到徐义德话里一

再重复“研究”这两个字，他内心便有些羞愧，这原来是他的挡箭牌啊，现在被徐义德利用上了。

“生活难做的辰光，钢丝车上的棉网满布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很多，条干不匀，造成细纱间的断头率不断提高，有六百多根；重点试纺和试纺点扩大的辰光，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作法，同样的清洁卫生工作，可是钢丝车上的棉网很少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也少，条干均匀，细纱间的断头率突然降低，只有二百五十根，而且是一级纱，这不是原棉问题是啥问题？”

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问得徐义德目瞪口呆，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也不愿意回答。但是原棉问题摊开在他面前了，既不能避开，也无法说是和原棉无关，他眉头一动，小心地说道：

“花司的花衣供应不稳定，有时花衣好一些，有时花衣差一些。”

“我们生活难做的辰光，花司供应坏花衣；我们重点试纺，花司就供应好花衣？”杨健识破徐义德把责任往花纱布公司身上推，这只狡猾的狐狸又想逃走了。他便抓住，问徐义德，“是不是？”

董素娟听杨健幽默的语调，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她旁边的汤阿英连忙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董素娟会意地马上用手捂住嘴，望着徐义德尴尬的表情，看

他怎么回答。

“也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的声调低了。他预感到情况发展有些不妙：不单是秦妈妈一个人向他进攻，杨部长开口了。

余静接着说：

“我们过去不止一次上你的当，你别再想欺骗我们了。我们现在懂得你那一套拿手好戏，啥事体都往别人身上推，同你徐义德没啥关系。你想想，哪桩事体不是你出的坏主意？坏花衣是花司配的，不是你徐义德买来的。同样的花司的花衣，为啥重点试纺的辰光花衣忽然变好了呢？真奇怪！”

“真奇怪！”管秀芬说，“花衣自己会变戏法呀！”

“真奇怪！花衣一歇变好，一歇变坏！”会场上的工人，你一句我一句连声说：“真奇怪！”

“徐义德，你快坦白交代！别梦想欺骗我们，我们工人今天绝不放你过去！”陶阿毛涨红着脸说，叫别人相信他真的在生气。

杨健见徐义德冷静地站在那里，头虽然低着，一对眼睛却不断向左右窃视，在暗暗观察会场上的动静，寻思怎样对付这个局面。杨健不让徐义德有喘息的机会，单刀直入地问：

“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徐义德还没有拿定主意，默默地没有回答。

“回答杨部长的问題呀，”管秀芬生气地说，“怎么，忽然变成哑巴了？”

徐义德想起梅佐贤曾经在劳资协商会议上说过：花纱布公司每件纱只配给四百十斤，沪江厂用棉量比别的厂多一点，要用四百十几斤，到交纱末期，车面不够，只好买点次泾阳花衣加进去。当时工人方面听的有道理，就没再追问下去。他很赞赏梅佐贤的妙计。他认为这一着现在正好派用场，便说：

“花司每件纱只配四百十斤，不够，我们只好加点次泾阳花衣进去。次泾阳的花衣是比较差一点，对质量多少有点影响。”

秦妈妈料到徐义德会把次泾阳作为挡箭牌抬出来的，她早就等待了，连忙抓住问他：

“你这个次泾阳是从啥地方买来的？”

徐义德觉得秦妈妈这个问题问得叫人好笑，不值一答，但表面上装出很严肃的神情，认真地答道：

“是从信孚记花行进的货。”

“信孚记花行是从啥地方进的货？”

徐义德没料到秦妈妈追问到信孚记花行的货源，这可是问题的要害呀！他差点回答不上来，低下头想了一下，说：

“这要问信孚记花行。”

“你不晓得啵？”

“我不晓得。”

“你真不晓得啵？”秦妈妈正面盯着徐义德，看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情有点慌张，便又重复问了一句，“是真的不晓得啵？”

徐义德暗暗咬紧牙关，一口否认：

“真不晓得。”

“要是晓得呢？”

“我不是那种不老实的人。”

“我倒晓得……”

秦妈妈说了半句，有意停了下来，看徐义德的态度，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徐义德以为秦妈妈吓唬他，并不是真的晓得，便稳坐钓鱼台，闷声不响，听秦妈妈的下文。会议上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秦妈妈的脸上，急于想从她的嘴里知道影响全厂生活难做的秘密。秦妈妈在杨健和余静的领导下，对“次泾阳问题”做了专门调查研究，信孚记花行的职工也在五反运动中检举了这方面的材料，提供了确凿的人证物证。秦妈妈等了一歇，徐义德还是不开口，她说：

“要不要我告诉你？”

徐义德轻轻地弯了弯腰：

“好的。”

“信孚记花行是从沪江纱厂进的货！”

汤阿英和郭彩娣她们大吃一惊，诧异的眼光都对着徐义德。徐义德还不死心，仍然企图抵赖：

“我们沪江纱厂从来没有卖过次泾阳的花衣给信孚记花行，这有账可查，如果真的卖过，我徐义德一定认账。”

梅佐贤见秦妈妈一直追问次泾阳的货源，他身上直冒冷汗。这是他一手经办的呀！秦妈妈虽说是一步步向徐义德进攻，但火力的威胁使他感受比徐义德还要深切！徐义德正面顶住，矢口否认，说得有凭有据，庆幸徐义德的远见，把沪江纱厂的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由信孚记花行自己去处理加工，在沪江纱厂的账面上抓不到把柄。他听到这里，暗暗松了口气。

秦妈妈英勇地继续前进，她高声地说：

“账，我们早就查过了。沪江纱厂的确没有卖过次泾阳给信孚记花行……”

徐义德得意地抬起头来，插上一句：

“我从来不说假话！”

“别忙表扬自己，”管秀芬瞪了徐义德一眼，说，“秦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哩。”

徐义德的头低了下去。秦妈妈继续说：

“沪江纱厂把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是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信孚记花行用梳棉机把破籽梳一梳，再用硫磺一熏，就变成次泾阳了，再卖给沪江。你晓得啵？”

“我不晓得信孚记花行的情况。”徐义德心慌了，他奇怪秦妈妈哪能了解的这么清爽。

“啥人是信孚记花行的老板？”

“信孚记花行是合股公司。”

“你有没有股子？”

“多少有一点。”徐义德现在感到秦妈妈所问的每一句话的力量，不能再完全赖账了，但设法尽可能缩小一些无法抵赖的事实。

“啥人的股子最多？”

徐义德见秦妈妈一步步逼得更紧，叫他躲闪不开，却又不甘心完全承认，梦想再负隅抵抗一阵，摸摸秦妈妈的底盘，看她究竟掌握了多少真实情况。他摆出回忆的神情，歪着头想了想，说：

“因为忙，很久没有参加信孚记花行的董事会了，不了解啥人的股子最多。”

“要不要让秦妈妈告诉你？”杨健望了徐义德一眼。

“也好。”徐义德无可奈何地说，声音很低沉。

“股子最多的就是你！沪江纱厂的徐义德把破籽卖给信孚记，信孚记的徐义德把破籽变成次泾阳，再卖给沪江纱厂的徐义德。你这个徐义德却啥也不晓

得！”

汤阿英气愤愤地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说：

“你好狠心，害得我们工人好苦，还想赖账吗？”

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的手不约而同地都指着徐义德，愤怒的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的身上。徐义德的脸微微发红，头更低了，可是他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真的变成哑巴了。

“你看看，韩工程师就坐在你旁边，”余静看徐义德还不肯交代次泾阳问题，便让大家坐了下来，她接着说，“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你不坦白，别人会坦白的。徐义德，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的好。”

徐义德一听余静点出韩工程师在场，他心里更加紧张，想起韩云程已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难道说花衣问题也完全交代了吗？归队就归队，为啥要“揭”徐义德的“底”呢？太不够交情了。也许没有，是余静有意压一下，想叫徐义德交代。他心里稍为安定了些。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韩工程师站了起来，他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刚才隐隐发红的脸现在却变得铁青了。他仔细在听韩工程师说：

“余静同志说得好，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秦妈妈已经把次泾阳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徐义德，你老老实实地交代吧……”

郭鹏听到“次泾阳”三个字，根根神经紧张了，

吃惊的眼光木然地盯着韩工程师。他想：这下可糟了，秦妈妈虽然揭露了沪江纱厂和信孚记花行来往的秘密，但和他没啥关系。韩云程坦白“次泾阳”，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了解“次泾阳”的名称是郭鹏给取的，那他摆脱不了这关系。勇复基吓得低下了头，不敢呼吸，他后悔不应该去参加第一次总管理处倒霉的秘密会议，现在无论如何也跳不出这烂泥坑了。梅佐贤心里很坦然，他不动声色，坐在那里。他知道：天掉下来有徐总经理顶着。他端徐总经理的饭碗，当然服徐总经理管。资方代理人还有不为资本家服务的道理吗？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正要紧紧靠着徐总经理，“五反”过后，料想徐总经理不会亏待自己的。徐义德给秦妈妈进攻得浑身有气无力，已经招架不住，这时又亲自听了韩工程师这几句话，迎头又受到一闷棍，打得他非常沉重，痛上加痛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在广播里听到韩云程归队，还以为是大势所迫，不得不应付应付，现在听他那口气，完全不是应付，而是不折不扣归了队。那么，“次泾阳”以外的问题，当然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他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个缺口堵住。秦妈妈只是揭露问题的一个方面，韩云程却了解生产方面的全部情况，如果这个缺口突破，汹涌澎湃的大水通过这个缺口便会冲垮他的防堤，一泻千里，洪水泛滥，便不可收拾了。他向韩工程师

笑了笑，用那鹰隼一般的目光注视着韩工程师：

“韩工程师是学科学的，态度严肃，办事认真，不随便讲话。你是我们厂里的技术专家，沪江靠了你，我们的事业不断扩大。我对你一向是很尊敬的。你每次讲话我都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你的记忆不好，没有把事体说清爽，使人容易误会。我们厂里过去用过‘次泾阳’，工务日记上写着的，报表上也填了的，因为花司配的花衣不够，我们不得不自己买点花衣贴补上，你说，是吧，韩工程师。”

徐义德最后两句话充满了热情和无限的希望。他热望韩工程师再回到他的身边，即使不肯马上回来，也不要使他太难堪了。他这一番话在韩工程师的心里确实起了作用，总经理就坐在自己的面前呀，多年的交情，哪能抹下这个面子呢？要是现在当面顶撞，以后要不要在一块儿共事呢？在徐义德面前，秦妈妈又把“次泾阳”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听到这里面的内幕，叫他吃惊，也使他懂得做了事是隐瞒不住的。他不能作证“次泾阳”的秘密。可是杨部长的眼光正对着他哩，他在杨部长面前能够不作证吗？他曾经向工会谈的那些事哪能好收回？说出去的话，谁也没有法子收回了。他一时解脱不开尴尬的处境，只好紧紧闭着嘴。杨健看韩工程师拉不下脸来说话，他亲自点破徐义德：

“花司给别的厂配的花衣够，同样数量的花衣，沪江就不够，你说，奇怪不奇怪？照你这么说，你贴补了很多‘次泾阳’，那么花司还欠你不少花衣了？”

“已经贴补进去，不必再算了。”

“那你不是吃亏了吗？”杨健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身上。

徐义德的脸唰的一下红了。杨健追问：

“你一共用多少‘次泾阳’换了好花衣？”

徐义德从杨部长口气里已经知道韩云程啥都坦白了，秦妈妈揭露的那些材料，物证人证俱在，再也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现在再坚决否认，那对自己不利。他毅然下了决心：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干，干脆坦白。他想用坦白把韩云程这个缺口堵住。他低着头，用悔恨自己的语调，沉痛地说：

“唉，这是我的过错。从一九五〇年六月起，棉花联购处宣布联购，私营厂不能自行采办。花纱布公司配棉很好，纤维很长，我资产阶级本性未改，觉得有利可图，就在信孚记花行头了一些黄花衣搭配。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次泾阳’。我先后一共买了两千多担，大约用了一千八百担，现在还留下两百多担在仓库里没用。余静同志提出重点试纺以后，我就没敢再用了。以一百万元一担计算，一千八百担共取得非法利润十八亿。细账要请工务上算。这是我唯利是

图。盗窃国家资财是违法的，请上级给我应得的处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徐义德说完了，连忙又补了一句：

“这些违法的事情是我个人做的，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希望上级给我处分好了。”

“这个我们了解，当然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不用你操心。现在就是要你彻底交代。”杨健说。

“是的，我要彻底交代。”

钟珮文匆匆走到余静面前，附着她的耳朵，低低地告诉她夜校教员戚宝珍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会议，已经踉踉跄跄走进大门了，余静一听到这消息，马上皱起眉头：戚宝珍那个病哪能参加这样激烈的会议呢？她的身体支持不住的？余静要他赶快劝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进入会场，派人送她回去好好休息。他站在余静旁边，迟迟不去，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他这个夜校教员怎么能够阻止戚宝珍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说别人，就说他自己吧，听到这样重要的会议，不管身体哪能，一定也要来参加的。余静察觉他的顾虑，果断地说：“你告诉她，是我不让她参加的。她要是生气，过两天，我亲自到她家去解释。”

钟珮文立刻走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回到铜匠间，坐在汤阿英附近的木凳子上。

汤阿英听到徐义德坦白用了一千八百担的坏花衣，顿时想起从前那段生活难做的情景，心里汹涌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怒。她听了徐义德的坦白，霍的站了起来。

坐在她前面的人闪出一条路，她站在长方桌旁边，感到无数只眼睛都在对着她，耳朵里乱哄哄的，听不清楚是啥声音。她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右手抓住白台布，激动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点。这时，整个铜匠间很平静，她知道大家在等她发言。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慢慢地说：

“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她说到这里激动得再也讲不下去了。

余静在一旁鼓励她：“慢慢讲好了。”

“我要控诉徐义德的罪恶，”等了一会，汤阿英才接下去说，“你害得我们工人好苦呀！你用坏花衣偷换国家的好花衣，我们流血流汗，你吃的肥肥胖胖。我们累死了，你还不认账，说我们做生活不巴结，清洁卫生工作不好。我的孩子都早产了，这样做生活还不巴结吗？徐义德，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坏家伙，你有良心吗？……”汤阿英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句紧接着一句，声音也渐渐放高了。她每一句话像是一粒火种，散发在人们的心田上，立刻燃烧起熊熊的愤怒的火焰。

坐在韩云程紧隔壁的清花间老工人郑兴发心里特别激动。他在清花间做生活总是很巴结的，就是因为徐义德盗窃国家原棉，车间生活难做，工人同志们怪来怪去，最后怪到清花间。余静虽然在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是原棉问题，不怪清花间，可是没有水落石出，在人们心上总有个疙瘩。徐义德坦白交代才完全道出问题的真相，给汤阿英一提，他的心像是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激动。他站了起来，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要把徐义德的丑事揭出来。在纱厂里，清花间顶重要。清花间花卷做不好，那么，钢丝车棉网不灵，影响棉条，粗纱条擀不匀，细纱断头率就增多，前纺就影响到后纺。细纱间工人骂粗纱间工人，粗纱间工人骂钢丝车工人，钢丝车工人骂清花间工人，从后纺骂到前纺。这个车间和那个车间不团结，大家都怪清花间。我在清花间做了二三十年的生活，哪一天也没有磨洋工，生活做的不能再巴结了。本来一千斤一镶，不分层次；后来五百斤一镶，分八层，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做到家了，后纺的生活仍旧不好做。毛病出在啥地方？余静同志和秦妈妈把资本家偷盗原棉秘密揭出来，盗窃国家原棉，破坏我们工人团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徐义德。徐义德一共盗窃国家多少资财，要详详细细地算出来。”

“是呀，就是徐义德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陶阿毛大声叫了起来。

铜匠间各个角落同时发出相同的声音。可是谭招弟靠墙坐着，闷声不响。自从生活难做以后，她最初是怪细纱间，后来又肯定是清花间不好，余静在会上虽然说过，她听了心里总是不服，相信自己是对的。她老是说：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她认为总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这一天终于到了，但证明自己的意见不对。事实不可驳倒，心中也服了，她面子上还有点扭转不过来。

汤阿英等郑兴发讲完了，她举起右手高声叫道：

“我们要徐义德彻底交代五毒罪行，不胜利决不收兵！”

大家都跟她大声叫了起来。汤阿英叫过了口号，转过身子要退到后面去，余静要她坐在刚才发言的地方。她就坐下了。她现在感到非常舒畅。

徐义德见汤阿英慷慨激昂的发言，而且还叫了口号，确实叫他吃了一惊。他深深感到上海解放以后变化太大了，秦妈妈那样的老工人发言有步骤有层次，条理清楚，一步步向他紧逼，叫他不得不服帖；汤阿英这样女工也毫不在乎地指着他的鼻子叫口号，使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向是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今天才觉得这个日子过

去了，要低下头来。他低声地说：

“我一定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把盗窃国家原棉的细账算出来，呈交杨部长……”

“其他方面呢？”杨健问他。

“还有哪个方面？”徐义德故作不知，惊诧地问。

“哪个方面？”杨健看他装出那股糊涂劲，想从他的口气里探风声，就反问道，“你自己的五毒行为还不清楚吗？”

“清楚，清楚。”徐义德不敢再装糊涂。

“那就交代吧。”

徐义德望着吊在铜匠间上空的一百支光的电灯在想，他感到今天这盏电灯特别亮，简直刺眼睛，叫人不敢正面望。可是杨健的眼光比这盏电灯还亮，照得他无处躲藏。他想了一阵，说：

“关于偷工减料方面，我想起了两件事：去年人家用包纱纸，我下条子叫不用。打大包可以多拿十个工缴，打包不够，没打，棉纱商标也减小……”

杨健止住了他往下说：

“这是小数目，你就重大的方面谈……”

“我想不出了。”徐义德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袖筒里去，不再讲了。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徐义德听杨部长一追问，不敢应承，却又不愿否

认，很尴尬地站着。他把头歪过来，似乎在回忆。

“要不要别人帮你想一想？”

杨健笑着望望他。他不好答应，也不好拒绝，顿时想了个主意，说：

“启发启发我也好。”

韩工程师见他吞吞吐吐，就对他说：

“你每月在总管理处召开秘密会议的事忘了吗？”

“韩同志，事情太多……”

韩工程师听他叫同志，慌忙打断他的话，更正道：

“啥人是你的同志？我已经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韩先生，事体多，一时想不大起来。”徐义德见静云程态度那么坚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刚才想把他拉回来显然是不可能了。他便狠狠给韩云程一棒子，想叫韩云程抬不起头。他说，“韩先生每次会议都参加的，许多事体也不是我徐义德一个人做的。韩先生是专家，是工务上的负责人，过去工务上有些事我不懂，还亏韩先生帮忙出力。今天也请韩先生坦白坦白，有啥错误，都算我的，我一定愿意多负责任。”

徐义德轻轻几句，把目标转到韩云程身上。韩云程心里想：徐义德你好厉害，把事体往别人身上推，

想摆脱自己！他有点狼狈，急得说不出话来，头上渗出汗珠子，结结巴巴地说：

“徐义德，你，你……”

工人们的眼光转到韩云程身上，在等待他发言。杨健的眼光却停留在徐义德胖胖的面孔上，说：

“韩工程师早向‘五反’工作队交代了。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是你主使的，别的人受你的骗，上你的当，他们参加了，受了你的钱，不要归还，也不要负责。今天是你坦白交代，怎么要韩工程师坦白？态度放老实点，不要拉扯到别人身上。”

余静从杨健几句简单有力的话里进一步看出徐义德的阴谋诡计。她钦佩杨健的智慧，及时识破了徐义德的阴谋。

杨健把韩云程从狼狈的境地里救了出来。韩云程紧张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盯了徐义德一眼，说：

“别耍花招了，你的五毒不法行为我都向杨部队检举了，你快坦白吧。”

“是，韩先生。”徐义德竭力抑制心中的愤怒，表面装得很平静。

“在座还有梅佐贤，郭鹏，勇复基……他们也都晓得，你再也隐瞒不过去了。”

从会议开始到现在，勇复基的眼光一直望着面前的白色台布，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噗咚噗咚地跳，

希望会议早点散，可是今天的时间过去的特别缓慢，一秒钟比平时一点钟还要长。他在担心别联系到自己，韩工程师终于点了他的名。这不比在别的地方，这是在铜匠间呀。这里有徐义德，还有杨部长啊。正当勇复基左右为难的时刻，徐义德怕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他们动摇，赶紧接着说：

“我做的事，我一定负责；就是韩先生帮我做的事，我也负完全责任。”

郭彩娣指着徐义德说：

“你叫别人做的事，你当然要负责。不要兜圈子，快说！”

“我马上就说。偷税漏税部分我已经写在坦白书上了，早交给了‘五反’工作队。是不是可以还给我看看？这是我和总管理处同仁一道弄的，我没有亲手弄，记不清楚了。”

“刚才我说的话，以前写的谈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你忘记了吗？你自己做的坏事写的坦白书，不清楚吗？还要看啥？”杨健知道他又想把问题扯远，延迟时间，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便把问题拉回来，说，“老实比不老实好，坦白比不坦白好。快交代吧。”

“我一定老老实实坦白，杨部长，”徐义德皱看眉头，苦思冥想似的，用祈求的口吻说，“有些事体，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呀，不是不肯坦白。”

“真的想不起来了么？”杨健的嘴上浮着不信任的微笑，学徐义德的口吻讲，“要不要找别人启发启发你呢？”

“好么，杨部长。”

杨健的眼光从徐义德愁眉苦脸上转过来，暗示地望了汤阿英一眼。汤阿英会意地站了起来，沉着地说：

“我来启发启发你！”

徐义德随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见是汤阿英，猜想汤阿英大概又要喊几句口号，没啥了不起，硬着头皮听下去：

“三年前六月底你卖过一笔棉纱没有？”

“我们沪江是纱厂，给人民政府加工订货以前，经常有纱卖出去。”徐义德漫不经心地说。

“我问的是三年前六月底那一笔。”汤阿英特别强调“六月底”三个字。

徐义德猛的想起那件事，他认为做得天衣无缝，手脚弄的干净，找不出啥漏洞，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说：

“过去厂里出售的棉纱很多，要我记清这一笔那一笔是很困难的。”

“这一笔棉纱数字特别大，几乎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你好好回想一下。”

“每次出售棉纱，成交的数量大小不等，有时多出出售一些，仓库里的纱当然要大量减少。这很难回想。”徐义德委婉地拒绝回想。

“这一笔你会记住的。”

“实在记不起来了。”

汤阿英见徐义德设法竭力堵住这个缺口，可是不把话说死，语气又显得委婉。她就进一步点他：

“那天常日班下工了，仓库里还加班加点，一直忙到深夜，抢着搬运棉纱，为啥这样忙？”

汤阿英刚才提到三年前六月底出售棉纱的事，梅佐贤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神色有点紧张，惊慌的眼光慢慢从汤阿英的身上移到会议桌上的台布，头也低了下来，眼光望着自己的人民装的钮扣，怕别人察觉他的心思。听到徐义德设法对汤阿英的进攻左堵右挡，稍为安定一些。现在听到汤阿英谈仓库加班加点这些事，他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难道汤阿英知道出售棉纱的秘密吗？旋即又安慰自己：也许是她看见搬运棉纱，不过提出疑问。他以为像汤阿英这样的女工，是不会知道其中的秘密的，何况出售的手续和买主的安排都十分周到，从账面上不会发现啥问题的。他聚精会神地在听徐义德哪能应付。徐义德说：

“白天棉纱搬运不完，晚上接着搬运棉纱，这是常有的事；工作忙一点，就加班加点，厂方按规定发

夜餐费，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厂里夜里从来没有出过货。”

“从前也有过，你年纪不大，到我们厂里的时间不长，也许这方面的情形不大了解。”

“沪江开办没多久，我就来了。”秦妈妈坐在会议桌子旁边插上来说，“我就没有听说夜里出货的。”

“从前是有过……”徐义德的口气没有刚才那样硬了，“买主要的急，只好连夜出货了。”

汤阿英紧接上去说：

“是哪一家字号买棉纱这么急？晚一天也不行吗？”

梅佐贤的脸色忽然发青了，这事是他一手经办的，而且听汤阿英那口气“晚一天也不行吗？”大概已经了解其中的秘密了，不会是无意问了一句，暗中巧合吧！他但愿如此，又怕不是这样。如果徐义德往他身上一推，他哪能摆脱这个干系？他急得头上冒出几颗汗珠，又不方便用手绢拭汗，人家会问：梅佐贤，你为啥忽然出汗了？他眼睛一动，想了一个主意，立刻摘下鼻梁上那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先用嘴对着眼镜哈了两口气，然后用雪白细纱手绢擦了擦眼镜，接着顺便迅速地拭去额角头上的汗珠。他戴上眼镜，提心吊胆地坐着。幸好徐义德没有往他身上推，好像在保护他，其实徐义德早打定了主意，在会

上尽可能把事体都搁在自己的肩胛上，别人不被杨健和工人突破，徐义德的防御阵线才可以巩固下来。徐义德说：

“沪江往来客户很多，哪一家字号买的，我可记不清了。”

汤阿英见徐义德巧妙地回避要害问题，心里想：这个狐狸真狡猾，杨健早就料到了，要她抓住这个问题追问，确实有先见之明。她深深感到杨健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她追问道：

“哪一家字号买的，你记不清，我倒晓得哩。……”

徐义德见无法蒙混过去，赶紧补上一句：

“沪江出售棉纱，每一笔都有账。沪江历年往来账簿都交给‘五反’检查队了，在杨部长那里，一查就晓得了。”徐义德给汤阿英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问的喘不过气来，他想借此机会提出账簿，引起大家注意，好分散目标，避免在要害问题上给抓住不放。

汤阿英还是抓住不放，继续追问：

“卖棉纱这么急，为啥晚一天不行？”

韩云程不了解其中奥妙，听汤阿英一再追问棉纱出厂的字号和时间，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必要在枝节问题上和徐义德纠缠。徐义德既然承认出售棉纱，字号和时间有账可查，就不必再追问了，好揭发

其他问题，可以节省点时间。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怕别人怀疑他帮助资本家说话。徐义德自己深知这是一个要害问题，而且是他五毒不法行为当中最严重一项，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啊！这个罪名可吃不消啊！他决心顶住。但他听到汤阿英把“买棉纱”改成“卖棉纱”，一字之差，触及到要害问题的核心，真有千钧重量，压在他的心头，两道浓眉紧张地聚拢，下巴的肉也有些颤动了，他感到汤阿英这个女工真不简单，进攻的好厉害，一步比一步逼紧，使他难于招架。表面上，他却努力装出镇静的样子，还想把问题推到买主身上：

“人家哪一天要货，我们只好哪一天发货。”

“对方一定要六月底夜里交货，七月一号白天交货都不行吗？”

汤阿英洞察一切的机灵的眼光炯炯有神地盯着徐义德。徐义德的肥胖的面孔红一阵白一阵，瞠目结舌，一时竟不晓得哪能回答。杨健坐在那里，徐义德和梅佐贤表情变化都看在他的眼里，他指挥若定没有喷声，非常满意汤阿英一句又一句有力的追问，使得徐义德躲闪不开，推脱不了。徐义德的态度十分顽固。他料到徐义德这样的人是不见黄河心不死的。他等了半晌，徐义德还没有说话，他便点出：

“人民政府决定七月一日加税，所以要在六月底

夜里交货，是不是？”

韩云程这时才明白汤阿英刚才追问的很有道理，怪不得徐义德那么躲躲闪闪哩；回想起那一阵子增加生产，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他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迫切地等待这桩事体的下文。

徐义德心中对自己说：这个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罪行，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其他的五毒，就是全部承认，问题也没有这个大。他心里慌乱，面部没有表现出来，竭力保持镇静：

“这和加税绝对没有关系，我也不晓得人民政府哪一天要加税。”

“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杨健问。

“是不晓得。”

“我问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杨健说，“你回答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徐义德心一横，仍然努力顶住，心想闯过杨健这一关，大概就差不多了。他说：

“真的。”

“不要把话说绝，做了的事要想永远隐瞒是不可能的。你不承认，别人会承认的。我们允许你再想一想，现在你承认了，还算是你个人坦白的。”

徐义德咬紧牙关，一声不响。他以为这事只有梅佐贤、方宇和他三人经手，梅佐贤不会说出去，方宇

不敢说出去，他自己不承认，那啥人也不晓得。

杨健等了一歇，徐义德仍旧紧紧闭着嘴。铜匠间静悄悄的，大家在等待徐义德坦白交代。

杨健胸有成竹地对余静说：

“你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会。”

余静走出铜匠间没有一会，她带进一个青年干部。会场里的人都注意着那张熟悉的面孔。郭彩娣问张小玲：

“咦，他怎么来了？”

张小玲含含糊糊地说：

“组织上需要他来，他就来了。”

“哦。”郭彩娣不解地望着那个青年干部走到会议的长方桌那边来。

杨健指着徐义德右前边的地方说：

“你就坐在这里吧，谈起来方便些。”

人们让出一个空位。方宇坐了下来。徐义德一眼望见他，兀自吃了一惊。他差一点叫了出来。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五反”以后徐义德到处寻找而始终没找到的税务分局派在沪江纱厂的驻厂员方宇。

方宇那天经杨健打通了思想，第二天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汤阿英检举了六月底以前抢着抛售棉纱的事，经过杨健和区税务分局的帮助，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做了补充交代。这以后，他积极参

加反贪污斗争。组织上决定对他免予处分，仍然在税务分局工作，不过不派出来当驻厂员，而是留在分局里。今天开会以前，杨健和余静、赵得宝商量好了，并取得区里的同意，要他到沪江纱厂来，如果徐义德还不肯彻底坦白，就要他出席做证人。

徐义德一见了方宇，他的胖胖面孔的脸色顿时发灰了，吓得微微把头低了下去，避免正面看着方宇的愤怒的眼光。杨健指着徐义德对方宇说：

“你把徐义德腐蚀干部偷漏税的情况讲一讲……”

方宇站起来，说：

“徐义德，你应该老老实实坦白，我把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了。你要梅佐贤送我一只马凡陀金表和五十万人民币，以后每个月送我两百万人民币，要我及时告诉你们税局的消息……”

方宇说到这里叫杨健打断了：

“讲到这里就够了，其余的让徐义德自己交代吧……”

徐义德面对着方宇，无从抵赖，可是他还不甘心承认，狡猾地说：

“我也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方驻厂员误会了。这是梅厂长和你私人的交情，和沪江厂没啥关系。”徐义德把这件事推出去，惟恐别人不相信，转

过脸望着梅佐贤说，“是啵，梅厂长。”

梅佐贤对杨健说：

“是的，这是我个人不好，解放以后，还保持从前的旧作风旧习惯。我愿意检讨检讨……”

“现在不是你检讨的辰光，”杨健撇下梅佐贤，对徐义德说，“梅佐贤为啥特别和方宇好呢？为啥要他送税局的消息呢？税局的消息和梅佐贤个人有啥关系？政府现在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呀！”

梅佐贤听到这里，哑口无言，瞪着两只眼睛，对着徐义德祈求救兵。徐义德以为反正没有和方宇直接往来，可以不认账，何况梅佐贤已经挺身而出呢。杨健看徐义德不动声色，还企图抵赖，便问道：

“方宇告诉你七月一日要加税，你就赶出两千件纱，有没有这回事？”

徐义德看到方宇正望着他，梅佐贤坐在那里神色不定，他没法直接否认，却设法间接否认：

“这是两回事。”

“这完全是一回事，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想抵赖吗？”

徐义德听到方宇高声质问，他的头更低了。杨健进一步说：

“要不要会计主任勇复基也启发你一下呢？”

徐义德一听到勇复基三个字像是头上突然给浇

了一桶冰凉的冷水，一直凉到心上，浑身都几乎冰冷了。勇复基不比方宇，他的一本账就在勇复基的肚子里呀。向来态度从容不迫的徐义德这次却沉不住气了。杨健点中了他的要害。勇复基比韩云程和方宇知道徐义德的五毒行为还要多的多呀！韩云程顶多只知道工务上的那些事。方宇也只不过知道税务上的事。勇复基却不同了，几乎啥事体都知道的啊。徐义德陷在绝望的深渊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勇复基的态度了。

勇复基的心这时正急遽地跳着。“五反”以来，他日夜不安的一个问题，给刚才杨健几句话澄清了他脑海里翻腾的混乱思想：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是徐义德主使的，别的人受了骗，上了当，参加了，受了钱，不要归还，也不要负责。杨健这几句话虽然是对韩云程说的，可是勇复基听了，好像也是对他说的一样。徐义德放在勇复基身上的沉重的包袱，给杨健几句话毫不费力地放下。勇复基感到浑身轻松，顿时觉得全身有力。杨健给他力量，使他可以伸直了腰，站在徐义德面前讲话。方宇突然在铜匠间出现更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育：正如杨健所说的，做了事要想永远隐瞒是不可能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反而会得到组织上的宽容。经杨健这样支持，他的眼光便不再盯着面前的白台布，勇敢地站了起来，正面对着徐义德

说：

“徐义德，你害得我好苦，硬拉我下水，做资方代理人，帮你做了对不起政府和人民的事。我现在已经认清了立场，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从今以后，和你划清界限。方驻厂员讲的事都是真的，偷税漏税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明白了，你快坦白吧！”

徐义德万万没想到捏在自己手掌心的这个胆小怕事的会计主任，今天居然也指着鼻子斗他了。他认为勇复基是他亲手提拔的，暗贴是他亲手给的，不应该这样翻脸无情，太不讲交情了。他恨不能当面把勇复基骂个痛快，说：

“勇先生……”徐义德看到会场上的人都望着他，气呼呼地没有说下去，只是又叫了一声“勇先生”。

“你不要横也勇先生，竖也勇先生的，”勇复基说，“七月一号要加税，你六月底赶出厂两千件纱，偷了多少税你不晓得吗？”

谭招弟立刻想到那辰光徐义德说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原来是满足资本家徐义德偷税的需要！她想站起来说话，却叫徐义德抢了先。他毫不含糊，狠狠地回敬勇复基一下：

“这是你经手办的呀！”

“是我经手的。”勇复基有了杨健那几句话支持，

他也不推扳，拍了拍胸脯说，“钞票上了谁的腰包？你说！”

“对呀，钞票上了谁的腰包？”秦妈妈站起来问。

“钞票上了谁的腰包？”汤阿英跟着问。

“你说呀！”陶阿毛指着徐义德的鼻子。

会场上的人很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同时质问徐义德。余静想起方宇在区里坦白交代的那些问题，证明勇复基确实和徐义德划清了界限，引起徐义德不满，想把勇复基再推下水去。她于是对徐义德说：

“你不要分化我们工人阶级，你偷税要勇复基负责吗？”

钟珮文站了起来，挥动着胳膊，领着高声呼口号：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声叫道：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徐义德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

“不彻底交代，我们决不答应！”这是汤阿英嘹亮高昂的声音。

大家的手指向徐义德。徐义德在无数的手当中，发现有韩云程的，有勇复基的，还有郭鹏的……他认为有把握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站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了。现在只有梅佐贤和他自己站在一道了。他感到

深深陷入杨健一手布置的重重包围中，无路可逃。形势变得这么快，简直是他料想不到的。等到大家坐下去，勇复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本子。徐义德一见了这个小本子，他的脸唰的一下完全发白了。这本子是徐义德的黑账。勇复基打开本子看了看，并没有照本子念，只是说：

“徐义德，你不要把你做的坏事推到别人身上，你是总经理，我哪一件公事不给你看过？哪一张收付的单据不给你盖章？你还想再赖吗？告诉你，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这是你的黑账，今天我要交给杨部长……”

勇复基高高举起紫色的小本子给大家看。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郭彩娣和谭招弟高兴得一个劲敲着铜匠间的洋铁皮，发出哗唧哗唧的快乐的响声。

徐义德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杨健请大家静下去，对徐义德说：

“徐义德，你的五毒罪行材料，我们早已完全掌握了。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马上彻底交代，还算你坦白的。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杨部长，我晓得。”徐义德想起那天马慕韩对他说的话：“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高级职员又归了队，大家互助互评，哪桩事体能瞒过人民政府？有些事，

还是政府启发，我才想起来的。”从他亲身经历来看，马慕韩的话是对的。马慕韩告诉他在市里交代的辰光，有些人兜圈子挤牙膏，自己不动手，要别人擦背，结果还是要彻底坦白交代，可是弄得很难堪。现在徐义德想起来，这一番话确是好意，那一天不应该冷淡马慕韩，辜负他一片好心。马慕韩坦白交代了六百多亿，工作组同志剔除了四百多亿，而且不再要他坦白交代了，可见得人民政府心中是有数的，不是永远追问不完的。他不应该再有顾虑。同时，他也了解过去杨部长给他谈的话句句是真的，的确是想把他从错误的泥沼里拉出来。杨部长像是一面镜子，徐义德在这面镜子面前，没法隐藏。现在所有的防堤都冲垮了，再不坦白，那最后确实实对自己不利的。杨部长刚到沪江纱厂对徐义德讲的“坦白从宽”四个字，现在有力地在他脑海里出现了。杨部长说马上彻底交代还算是自己坦白，真的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要争取从宽处理。他的防御阵线已经土崩瓦解；没有办法再抵抗下去，不得不下了决心：

“现在我向党和工会彻底坦白，”他把“彻底坦白”四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别人饶恕他的罪行，语调里充满了悔恨的心情，慢悠悠地说，“上海解放初期，我太幼稚，不了解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政策，我把棉纱尽量偷运出去，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纱三百八十件，装到汉口和广州的二十支纱一共八百三十二件，总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我套了外汇……”

49

巧珠奶奶又一次走出草棚棚，望望天，数不清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好像星星也感到在深夜里有些儿疲乏了，一闪一闪的光芒仿佛眨着惺忪的睡眠似的。

草棚棚附近的人家都熄了灯，只有一盏路灯照亮了那条狭小的潮湿的泥土的道路。路上非常安静，看不见一个人影。路两边的草棚棚里不时发出舒适的鼾声，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都沉入甜蜜的睡乡。只有巧珠奶奶精神焕发，没有一丝儿倦意，眼睛里闪着奕奕的光芒，时不时向小弄堂口望去。马路上传来的每一个脚步声都吸引了她的注意，可是每一次从小弄堂口走过的脚步声都给她带来了失望。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喃喃地说：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巧珠奶奶今天的晚饭吃的特别晚。她做好了菜饭，像往常一样，等候张学海和汤阿英回来一同吃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巧珠又一个劲闹着肚子饿，奶奶几次三番哄她白相，劝她等爸爸妈妈回来一道吃，好不容易挨过一分一秒的时辰。直等到巧珠不再叫饿了，小小的上眼皮耷拉下来，慢慢快睡觉了，奶奶才热好了菜饭，和孙女一道先吃了。可是桌子上还是放了四份碗箸，奶奶希望学海和阿英能够赶到。她们慢腾腾地吃完了，他们的影子也没看到。

奶奶给巧珠擦擦嘴，要她先上床去睡。巧珠吃饱了，精神来了，她站在奶奶跟前不肯睡，对奶奶说道：

“我不睡。”

“这么晚了，还不睡？”

“我等爸爸妈妈。”

“谁晓得他们啥辰光回来，先睡吧。”

“不，”巧珠嘟着嘴，歪着头，向奶奶要求，说，“他们啥辰光回来，我啥辰光睡。”

“他们不回来呢？”

这句话问住了巧珠。巧珠知道爸爸妈妈每天都回来的，有时爸爸先回来，有时妈妈先回来，有时爸爸妈妈一道回来。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不回来的。今天爸爸妈妈为啥不回来呢？奶奶这句话是真的吗？她怀疑地问：

“爸爸妈妈不回来，到啥地方去哪？”

“谁晓得啊。”

“我找他们去。”

“上海这么大，你到啥地方去找？”

“厂里。”

“厂里这么大，生人进去了都认不得出来。你这个小鬼就找得到？”

“奶奶陪我去。”巧珠仰起头来，两颗小眼珠子盯着奶奶。

“你想想的倒好，我陪你去，这个家交给谁呢？”

“这个家交给谁？”巧珠歪着小脑袋瓜子想了一想，头角上的小辫子垂在右边的肩膀上。等了一会，她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了，说，“交给秦妈妈。”

“秦妈妈也没回来。”

“那，”巧珠右手的食指放在嘴里，一边咬着一边又想出了一个人，说，“交给余妈妈。”

她知道余妈妈是个好人，喜欢她，碰到她都要摸摸她的头，还给她一块两块糖哩。余妈妈不做工，现在一定呆在家里没有事体，把家交给余妈妈再好也不过了。

“亏你想的出！”奶奶望着巧珠笑了，抚摩着她的小辫子，安慰她道，“不用去找，爸爸妈妈自己会回来的。”

巧珠听到这句话放心了。她问：

“啥辰光回来呢？”

“就要回来了，快睡吧。”

“不。”巧珠嘟着小嘴，摇摇头。

“快睡吧，明天早上起来要念书哩。”

巧珠不肯，可是也没再言声。

奶奶站了起来，拉着她的小手，向床边走去。奶奶要她上床，她站在床边没动，转过身子，向房门斜视了一眼：门紧紧关着，门外没有一丝人声。奶奶把她抱上了床，她要求：

“再等一歇，奶奶。”

“不早了，你先睡，爸爸妈妈回来，我叫你。”

“好，一定叫我啊！”

奶奶帮她脱了衣服。她的头刚放到枕头上，一眨眼的工夫，就睡着了。

奶奶收拾好饭菜，抹干桌子，坐在靠门口的那条木凳子上，闭着眼睛，凝神地听着门外的动静，在等候儿子和儿媳妇回来。等了一阵，她站起来，走出草棚棚去看看；过了一会，又出去望望，这回是第三次出来了。

她顺着草棚棚前面的那条小道，一步步移去，走两步，停停，望望，听听，又走两步，走到弄堂口那边，朝马路两头望去，也没有人影，十分静寂。她觑

起老花了的眼睛，踮起脚尖，向马路南头仔细地看看，还是没有人影。在弄堂口呆了许久，她有点累了，给夜风一吹，倒精神了些，可是身上有点凉飕飕的了。她叹息了一声，走回弄堂里。

这时，弄堂里越发静寂。只有那盏路灯光像是一个守夜的人，注视着宁静而又有点黑暗的弄堂。她低着头，嘴里不断地在唠叨，踏着熟悉的泥土的道路走去。

在静寂的弄堂里忽然传来一连串的咳嗽的声音。这声音引起她的注意。她站了下来，朝两边低矮房屋和草棚棚望去，辨别咳嗽声音来自哪一家。咳嗽声音消逝了，但不久又传来两声。她这一次特别留神谛听，从那熟悉的声音里，她知道是余妈妈。

她嘭嘭地敲了两下余妈妈的门。

余妈妈在里面一边开门，一边说：

“这么晚才回来！”

余妈妈开门，见是巧珠奶奶，兀自吃了一惊：

“原来是你！这么晚，还没睡？”

“人还没回来，哪能睡的着？”

“怎么，阿英她们还没回来？”余妈妈让巧珠奶奶坐下来，她自己也坐到小方桌子旁边。在电灯光下，桌子上有一个针线盒，它旁边有一双脚跟破了的淡绿色的细纱短统女袜，上面插着一根针。余妈妈拿起

那双没有补好的袜子，轻描淡写地说，“大概厂里忙，有事体绊住了脚。”

“现在啥辰光哪！天大的事体也办完啦！”巧珠奶奶絮絮不休地把等候阿英她们回来的情形说了一遍，不解地说，“你说，这么晚哪，到啥地方去啦？”

“不会到别的地方去的，这一阵厂里‘五反’忙，大概在厂里开会吧。”

“开会，开会，整天开会，觉也不睡，像个啥样子！”

“有事体才开会……”

巧珠奶奶打断余妈妈的话：

“有啥大事要开到现在？在家里就别想看到阿英的影子，很晚才回来，一早拍拍屁股就走了。把家丢给我这个老婆子，她倒放心，啥也不管！”

余妈妈听她这些不满的话，有意缝了两针袜子，慢腾腾地说：

“她不是常在家里帮你忙吗？”

“那是过去的事体。”

“早几天我还看见她收拾屋子哩。”

“哎哟，那是难得的呀！”

“不回来，总是厂里有事，不能怪她！”

“做厂么，就是上工，下了工，不回来，还有啥事体呢？”巧珠奶奶摇摇头，说，“阿英变得越来越不

像样了，整天不晓得疯疯癫癫地到啥地方去！”

她这些话并没有引起余妈妈的惊奇和同情，只是随随便便搭讪了一句：

“年青的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可不是吗，就说余静这孩子吧，不到睡觉的辰光，她总是不回来的。解放前，白天有时也在家里，可是，你晓得她做啥？开会！这个厂的，那个车间的，一来总是五六个，还要我在门口给她们看着哩。有生人走进弄堂，我就高声咳嗽一下。她们会开完了，一个个走了，连余静也走了。我哩，赶紧给她们收拾茶碗，扫扫地。她们不到我家来开会，白天就不大容易看到余静的影子。余静和国强结了婚，也是这样，回来比从前更晚。有时，国强干脆不回来，整天在外边奔跑，那两条腿，就没停过。你说，哪家的年青人不是这样？”

“阿英同学海差不多，才不爱在外边乱跑哩。”巧珠奶奶对着吊在半空中的电灯注视，在仔细回想阿英从啥辰光开始起常常迟回来的，她的思想有点乱，心里很焦急，一时竟想不起来。许久，一个熟悉的面孔在她面前浮起，是细纱间的张小玲。她愤愤地说，“就是张小玲这丫头，常常来勾引阿英，一会要去参加啥团日活动呀，一会要去上夜校呀，她又当上了青

年团员，……把阿英的心弄野了，家里再也蹲不住了。”

余妈妈放下手里的淡绿色的细纱袜子，劝她道：“这些都是好事哇，怎么怪起张小玲呢？”

“好事，唔，不是她，阿英不会这样的。”

“阿英当了青年团员多好啊，”余妈妈笑眯眯地慢悠悠地说，“年青人总爱和年青人在一块，让她们在外边跑跑，开动开动脑筋，多做点工作多晓得一些事体，也是好的。”

“多少晓得，还不是一样拿那么多的钞票，我就不指望学海阿英他们晓得多少事。他们回家从来也不给我说。”

“不给你说，就不指望他们多晓得事体吗？我的老奶奶，年青人在外边跑跑有道理哩。国强余静他们过去闹罢工闹革命，大伙闹，上海就解放了，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过。让他们出去开开会，把事体办好，以后的日子会更好的。”

“真的吗？”

巧珠奶奶怀疑的眼光望着余妈妈。她不相信学海阿英他们出去有这么大的本事，但也不能说国强余静他们闹革命没有功劳，她支支吾吾地说：

“学海哪能和国强比？阿英更赶不上余静。我听他们说，国强和余静都是党员哩！”

“党员倒都是党员，可是，他们和学海阿英不都是工人吗？”

“这个，唔，这个，学海阿英不是那号材料。”

“不，”余妈妈的眼睛里露出赞扬的光芒，笑着说，“我听余静说，阿英当了青年团员，比过去更积极。她参加‘五反’劲头可足哩！”

“她参加‘五反’？”

“可不是，斗资本家哩！”

“啊！”巧珠奶奶的眼睛里也露出赞扬的光芒，但她嘴上并不透露出内心的喜悦，还是说，“不管怎么的，这么晚还不回来，总是不对的！你晓得，她肚子有喜哩。……”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弄堂口传进来匆促的脚步声，接着有愉快的讲话声浮起，在静寂的深夜里听得特别清晰。她霍地站了起来，朝门口望去。余静在门口对人说了一声“再见”，便跨进大门。巧珠奶奶见了余静，劈口问道：

“学海阿英呢？”

“一道回来的，他们刚回去。”

余静的话刚落音，阿英听见巧珠奶奶的声音，知道她在余妈妈家，拉着学海也走了进来，笑嘻嘻地对巧珠奶奶说：

“今天可真高兴，奶奶，把徐义德斗倒了！”

“阿英今天在会上发的言很好，很有力量。”余静赞赏地拍了一下汤阿英的肩膀。

“全靠你和杨部长的帮助。”

“不，你讲的好，质问的有力量。”

汤阿英想把刚才在铜匠间的情况告诉巧珠奶奶，不料巧珠奶奶把脸一板，生气地说：

“这么晚才回来，还笑哩，快给我回去！”

她过去一把拉着阿英径自往门外走去。余静盯着她们慢慢远去的背影，直到她们走进了草棚棚。她奇怪地问母亲：

“啥事体？”

余妈妈把今天晚上的经过从头叙述了一遍，余静会意地说：

“哦，怪不得哩。”

50

汤阿英关了车，匆匆忙忙向筒摇间走去。

昨天晚上在铜匠间开的说理大会的生动的情景，时不时在她的脑海里出现，夜里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在铜匠间的会议上指着徐义德发言，过去

张小玲给她谈工人阶级要当家做主，她完全不懂，现在才算有了深刻的了解。她想象中的徐义德要比昨天晚上真实的徐义德厉害得多。过去总以为徐义德有无上的权力，一句话就可以开除工人，叫你东来你不敢西。在昨天那个会上，她认识到徐义德阴险毒辣的面目，也认识到徐义德这个不法资本家在工人面前软弱无力，没啥了不起。她从昨天那个会上懂得全体职工团结起来，徐义德就没有办法了。她总以为韩云程、勇复基他们和徐义德穿一条裤子的，谁知道他们也归到工人的队伍里来了。职工团结的紧，凭你徐义德多么狡猾也没有办法。她想到因为车间生活难做，和谭招弟有些意见。今天关车吃午饭以前，她就打定主意到筒摇间再找谭招弟，把问题谈谈清楚。

她走进筒摇间，看到谭招弟正站在摇纱车旁边低着头贴号头，便过去，说：

“招弟，昨天晚上这个会开的不错呀！”

“有杨部长领导还会错。”

谭招弟不再说下去，同时也使得对方很难说下去。她们两人闷声不响地走出车间向食堂走去，还是汤阿英先开口：

“这样的会我生平还是头一回参加呢。”

“是呀，谁也没参加过。”谭招弟依旧是简简单单地搭这么一句半句，不过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一点，不

像刚才板的那么紧了。

“真想不到昨天的会开的那么好……”

“我也没想到……”谭招弟微微把头低下，有点不好意思。

“徐义德害得我们好苦啊。”

汤阿英想起她在车间里早产的那小孩子。谭招弟听来以为是讲她过去和各个车间闹意见的事，她的头于是更低了，讲话的声音也很低：

“我没想到徐义德会这样……”

“徐义德真毒辣……”

“你别说了，我心里难过……”

“徐义德坦白了，我们应该高兴。你心里怎么难过起来了？”汤阿英不解地问她。

“我不是为这个……”

“那为啥？”

谭招弟一阵心酸，眼眶里不禁落下几滴眼泪。昨天晚上散会以后，谭招弟心里激动，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脑筋里老是在想：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她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过去生活难做，明明是细纱间不好好做生活嘛！害得筒摇间吃尽了苦头。重点试纺之后，也还不能完全说服自己，因为重点试纺有人领导和监督，哪个做生活不巴结？细纱间更要加把油啊。不怕大家说

长道短。就是不能叫谭招弟心服；顶多只是口服。她不好帮徐义德说话，来和大家争个明白。她一直在心里说：总有一天你们承认我谭招弟对的。她也确实在等待这一天。昨天晚上大家揭了徐义德的底，使她从朦朦胧胧的梦境里清醒过来，对的原来不是谭招弟，而是杨部长余静同志和各个车间的姊妹们。她恨透了徐义德，也恨自己太固执，不冷静听听大家的意见。她想来想去，不能安静下来，清楚地听见自己太阳穴那里急遽地跳动，一直望到窗户发白，等到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门外已经吵闹得不能再睡了。她起来，头有点昏沉，用冷水洗了洗脸，才算清醒一些，匆匆吃了点水泡饭，就到厂里上工。她打起精神在车间里做生活，像往常一样的卖力，生怕别人看出她昨晚一宿没有睡觉。刚才汤阿英叫她，心里便有点不宁静，听汤阿英老是问她这个那个，心里更是忐忑不安。她心里确实难过，但不是为了徐义德的坦白，是因为徐义德坦白让她看清楚了自己不对。她的声音有点呜咽，低着头，抱歉地对汤阿英说：

“我过去的眼睛瞎了！”她说完了，在等待汤阿英批评她。

汤阿英并没有责备她，相反地，却同情地说：

“我们懂得的东西太少，谁的眼睛也不能保准没有毛病。”

出乎谭招弟的意料之外，汤阿英没有一丝儿怪她的意思。从汤阿英简单的话里，她得到无上的温暖，身上仿佛有一股热流打心头流过。现在已是四月天气，她身上穿的是一套蓝细布裤褂，外面加了一件白布油衣，关了车，身上一点不感到热。汤阿英和她并肩走着，使她浑身感到又舒服又惭愧，那温情好似夏天的热气一阵阵迎面扑来。

她们两个人走到细纱车间，谭招弟望着那灰布门帘，她想起那次和徐小毛骂细纱间的往事。她的脸忍不住绯红了。她抓住汤阿英的手，内疚地说：

“我对不起细纱间的姊妹们……”

讲到这里，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汤阿英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介意地答道：

“过去的事算哪。”

“不。你能原谅我，”她注视着汤阿英的脸庞说，“郭彩娣她们不会饶我……”

“她们不会计较这些的……”

“我没有脸见她们……”说到这里，谭招弟的眼光凝视着一排排洁白的细纱锭子，步子放慢，踟蹰不进了。

“自家姊妹，不要紧，”汤阿英站了下来，劝她道，“等一歇，我给她们说好了。”

“我受不了……”谭招弟心里想，你一句她一句

的冷言冷语一定会说个不完。冷茶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受。谭招弟的嘴从来不饶人的，难道这一次用封条把自己的嘴封住，任旁人随意奚落吗？她越想走的越慢，拿定主意，改口道，“阿英，我要回车间里去一趟……”

“做啥？”

“有点事体……”谭招弟没想好去做啥，只是说，“有事……”

“车子不是收拾好了吗？”汤阿英看出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料定还是怕见人，便拍了拍胸脯，对她说，“招弟，我的话你不相信吗？”

“相信。”

“那就好了，同我走，到了饭厅里有谁讲不三不四的话，我给你说……”

谭招弟感激的眼光落在她的脸上，那眼光透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不过脚下的步子快了。

饭厅里有几个人已经吃过饭，匆匆忙忙往车间里走去，准备等人到齐了读报。谭招弟低着头走，啥人从她身边走过，她一点也不知道。汤阿英当然看的一清二楚，她给姊妹们一边打招呼，一边向饭厅走去。跨进饭厅的门，谭招弟的心就怦怦地跳，那一片黑乌乌的头就好像全转过来朝她看。那一片杂乱的分辨不出来在讲啥的声音也仿佛在谈论她。进了饭

厅，再也没有办法了，她只好跟在汤阿英身后走去。汤阿英走进去，看见郭彩娣她们那一桌正好空着两个位子，大家装了饭，拿着筷子，没吃，在等人。汤阿英走过去拿了两个空碗，递一个给谭招弟，两个人去装饭。汤阿英装好了坐下来，谭招弟没留意桌上坐的啥人，也坐了下去，拿起筷子，抬头一望，正好看见坐在自己对面的是郭彩娣。她马上站了起来，迅速地坐到隔壁那张桌子的空位上去。汤阿英顿时放下了碗，过去把谭招弟拉过来，一边说：

“你哪能啦？”

谭招弟眼睛愣愣地说不出话来，低着头在望着饭碗。管秀芬看谭招弟那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尴尬相，便对汤阿英说：

“人家嫌我们桌上的菜不好。”

汤阿英奇怪地把两张桌子上的菜认真地望了望，两张桌子上都是三菜一汤：红烧刀鱼，炒肉片，素烧青菜和咸菜场，没啥不同。她当时不懂管秀芬这句话的意思，费解地皱起眉头，说：

“不是一样的吗？”

郭彩娣懂得管秀芬那句话的含义，直截了当把话讲穿，笑了笑，说道：

“不是菜不好，是嫌我们人不好啊。”

谭招弟急得面孔发烧，想站起辩解，却让管秀芬

抢了先：

“我们人不好，请批评批评呀，我们也不是坚持错误死不承认的人啊。”

管秀芬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犀利的针，刺在谭招弟的心眼上，痛得叫她流出眼泪来，可是又不得不把眼泪忍着，往肚里倒流。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

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汤阿英这才听出郭彩娣和管秀芬两人说话的意思。她好不容易把谭招弟劝了来，别让她们两人几句话说僵了，于是把刚才在车间的情形给大家说了一遍。从汤阿英的嘴里知道谭招弟发现自己错了，郭彩娣心头的气稍为平了。管秀芬却还不放松，她说：

“以后眼睛可要睁大点，别再乱怪我们细纱间不好了。我们的肚皮差点没让你气破了。”

她说完话，夹了一块刀鱼，一边吐刺，一边细细地在咀嚼刀鱼的味道，好像同时也在欣赏自己这几句话。

郭彩娣看管秀芬死抓住谭招弟不放，便代谭招弟打抱不平，瞪了管秀芬一眼，说：

“招弟已经认错了，你还要说这些不咸不甜的话做啥？”

“哪天小管的嘴饶人，那就好了。”汤阿英嘻着

嘴，望着管秀芬说。

“好，我不说，我不说，别弄到后来反而怪我管秀芬不是。”她半生气半开玩笑地一个劲划饭。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郭彩娣心直口快地说，“谁冤枉过你？”

郭彩娣这么一说，管秀芬不好再开口了。谭招弟开头就怕郭彩娣不饶她，想不到现在郭彩娣相帮她说话，她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左手捧着碗，右手拿着箸子，发痴似的呆着，竟忘记吃饭了。

汤阿英夹了一箸子的肉片放在谭招弟的碗里，关切地说：

“快点吃吧，饭要冷了。”

落纱工董素娟坐在桌上吃饭，她闹不清她们刚才讲的那些话究竟是啥路道，她想参加进去搭两句，却又插不上。她那一对小圆眼睛直往她们几个人脸上看来看去。她最不了解的是谭招弟，平常她最佩服谭招弟，也最怕谭招弟，想不到今天谭招弟给大家说得不言语，真是奇怪极了。她忽然听到广播里钟珮文的声音，便大声叫道：

“你们听！”

大家注意力集中在广播上。钟珮文亲自广播：

……昨天夜里开仔一个说理会，打了胜仗

回转来，收获大得来胡海海。现在我把经过情形搭仔战利品，全都唱出来。徐义德起先还想把花样翻，只说小来大不谈，鸡毛蒜皮一大堆，经不起我侬职工一声喊，将他的底牌翻开来，人证物证来校对，徐义德目瞪口呆，只得低头来认罪。我侬初步算一算，数目大得吓煞哉。自从解放到现在，徐义德他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偷税漏税七亿九千一百一十一万五千元，他行贿干部七千五百万，他偷工减料有六亿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元，他盗窃国家资财二十七亿七千四百五十五万五千元。我侬把账结出来，他总共偷盗国家财产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元。假使一个工人每月工钱三十万，要做一千一百八十一年还多一眼。我侬辛辛苦苦增产节约六个月，早上工来晏下班，只是捐献十万万。现在不法资本家，他一偷就是三架飞机缺一眼眼。他这卑鄙的坏行为，我侬毫不留情的把他翻开来。他赖不脱来推不开，只得把头低下来……

钟珮文清脆的富有旋律的快板唱完，饭厅里立刻翻腾着恣情的胜利的声浪。汤阿英这一桌更是笑个不停，钟珮文的快板固然吸引住她们，更重要的是

快板表达出她们的胜利。管秀芬心里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喜悦：钟珮文确实不错，能文能武，运动场上是篮球健将；黑板报上是作家，现在又成了快板专家，自编自唱，全厂的职工们都知道文教委员钟珮文，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今天是礼拜六。昨天她答应了他今天晚上到中山公园去白相。她抬头望着挂在墙上的扩音喇叭笑了，仿佛通过那个喇叭可以看见钟珮文似的。

吃完饭，郭彩娣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她主动地过去拉着谭招弟的手，谭招弟扶着汤阿英的肩膀，汤阿英拉着管秀芬的左手，一同欢天喜地从饭厅走出来。董素娟见她们走了，连忙放下箸子，一口气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说：

“等一等，一道走。”

郭彩娣和她们都站了下来。郭彩娣回过头来对董素娟说：

“快来吧，小鬼头！”

董素娟走上去一把抓住郭彩娣的手，得意地和她们手挽着手，一同向车间走去。

51

童进那天从“五反”办公室出来，心里一直不能平静。他没想到自己竟然那样回答黄仲林同志，会计部主任对福佑药房的事会一点不知道吗？黄仲林同志问的好：那些检举数字怎么得出来的呢？他不能自圆其说。奇怪的是黄仲林不再一追问下去，这更增加他的不安。

他懊悔那天不该上朱经理家里去，也不该等那么久，更不该上楼。马丽琳是百乐门的舞女，他怎么忘记了呢？舞女会有好人吗？自己太粗心大意了。一脚陷进了烂泥坑再也拔不出来了！他想找叶积善商量商量，可是这样的事哪能张开嘴呢？给自己妻子谈谈呢？绝对不行。不能叫她知道，那是非绝对弄不清了。把冤枉吞下去吗？那他一辈子要无辜地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向谁诉说呢？上海滩上有七百万人，竟找不到一个人倾吐他这一肚子冤枉。如果把他胸膛打开，他肚子里的冤枉和愤恨一定可以淹没了整个上海滩。现在给闷在肚子里，多么难受哟！

他在店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想找个知心人

谈谈，一碰到别人，又主动悄悄离开了，怕接触任何人。他回到写字台上，埋头在乱纷纷的传单和密密麻麻的数字里。

打烊以后，别人纷纷回家去了。他留在店里，一连三天没有回家，感到不好意思见自己的妻子。他蹲在店里时间很难挨过，坐在写字台跟前东张西望，望到墙上挂的那些“开张之喜”的贺幛贺匾，仿佛都在笑他：童进呀，“五反”检查队没有到福佑药房的辰光，你不是很积极吗？要大家检举朱延年吗？你也写了检举信给陈市长。怎么“五反”检查队来了反而消沉呢？就是因为你受了冤枉，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名誉，便丧失了勇气，不敢和朱延年斗了。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青年团员都像你这样，哪能进行“五反”呢？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怎么对得起青年团员光荣的称号？是呀，青年团员，货真价实，一点不假啊。将来还要争取做个党员哩。党员，像他这样的人能当上党员吗？他的眼光盯着那些红艳艳的贺匾贺幛，讨厌这些东西，恨不能把它们都摘下来，扯个稀烂，仿佛这样可以泄一泄郁积在胸中的闷气。他甚而至于想把面前看到的一切东西砸个粉碎。

他两只手扶着头，眼光注视着写字台上的玻璃板。在绿色台灯的照耀下，从玻璃板上的反光，看见自己愁眉苦脸，怎么也排解不开心头的郁闷。

马路上喧哗的人声早已听不见了，车辆的喇叭声也没有了，连不时传来的先施屋顶花园的锣鼓声也消逝了，汉口路这一带静幽幽的，仿佛整个上海都睡觉了。童进却睡不着，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板和玻璃板上的自己的面影。

吱的一声，办公室的门开了，黄仲林手里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他以为童进扶着头睡觉了，想退回去明天再找他。童进抬起了头，一见是黄仲林，兀自吃了一惊，在这夜深沉的时刻，怎么忽然来找他，有啥紧急的事体吗？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问：

“黄队长，你还没睡？”

“唔，没睡，我在看材料。”黄仲林跨过栅栏的小门，走了进来，说，“刚才看到一封检举信，不了解这个人。看到这边屋子里灯还亮着，晓得你没睡，想向你打听一下。”

“好的。叫啥名字？”

“蕙蕙。”

“哦，刘蕙蕙，是朱延年从前的老婆。朱延年的材料上有的。”

“这个我晓得。”

“她写了检举信吗？”

“唔，”黄仲林又看了看信，说，“她提供的材料很有价值，对我们研究朱延年的问题有帮助……”

“朱延年最初就是靠她发起来的。”

“她的信写得很不错。她说，朱延年是新社会的害虫，他害了很多人，请求政府好好查清朱延年的罪恶。她并不是因为离了婚才检举他，就是不离婚，一定也要检举他。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坏人，要害死很多人。只有检举他，重重的办他，才能救活许多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哇。”

“唔，这话说的真好。”

“每一个人都像刘蕙蕙这样，别说一个朱延年，就是一万个朱延年也躲藏不了。”

他没有表情，低声答道：

“那是的。”

“你觉得刘蕙蕙这个人怎么样？”

“她吗，是个老实人，原来在电台工作，爱唱歌，天真活泼，就是没有经验，上了朱延年的当。”

“她的话很可靠？”

“她从来不说瞎话。”

“你可以找她谈一谈，鼓励鼓励她，一定还有许多材料。”

“我去找她？”童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这两天情绪不正常，黄队长知道吗？黄队长要他提供福佑的材料，他推脱了。黄队长忘记了吗？黄队长不但不

怀疑他，还要他去调查材料，这是真的吗？

“是的。你明天去一趟，好不好？”

“黄队长要我去，还有不好的。”他怕让朱延年知道，心里虽想去，可是又有点迟疑，说，“刘蕙蕙和朱延年离婚以后，我没有见过她。不晓得她现在住在啥地方。”

“那不要紧，信上有地址，”黄仲林把刘蕙蕙的信递给他，说，“你看。”

童进接过来信，没有办法再推辞了，只好说：

“那我明天去。”

黄仲林点点头，对他说：

“你该休息了。”

黄仲林退了出去，童进又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了。窗外传来黄浦江边海关的有节奏的钟声，已经是深夜一点了。附近人家的电灯都熄了，只有马路上路灯还亮着，但是光线很弱，好像有点疲倦，在打瞌睡哩。童进却不疲倦，精神充沛，思潮如同黄浦江的水，汹涌澎湃。刘蕙蕙那封检举信，仿佛是面明亮的镜子，连一粒尘埃也可以照得清清楚楚。他在这封信面前，显得矮小而又懦弱，为啥一名光明正大的青年团员，还不如一位家庭妇女呢？刘蕙蕙说的多好：就是不离婚，也要检举他。只有检举他，才能救活许多被害的人，才能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走社会主义

的道路。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他没想到离了婚以后，刘蕙蕙在里弄工作，居然有这样重大的变化，太令人崇敬了！他把刘蕙蕙的检举信扔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不敢正视它一眼。他在栅栏里走来走去，走到墙边退了回来，再往前走，碰到栅栏又退了回来，好像找不到一条出路。最后，他走到写字台那里，刘蕙蕙的检举信像是黑暗里的一颗宝石，在闪闪发出夺目的光辉。他对着那封信望了又望，毅然地拿起来，放在灰布人民装的口袋里，到隔壁卧房里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起来了。他比谁都起得早，眼圈有点红，因为昨天夜里根本没有合上眼。他匆匆吃了早点，便找刘蕙蕙去了。

他从外边回来，没有到办公室，径自走进“五反”办公室，激动地向黄仲林报告他和刘蕙蕙谈话的经过。黄仲林一点也不焦急，要他坐下来，并且亲自倒了一杯茶给他：

“坐下来，慢慢谈。”

童进上气不接下气还想说，黄仲林用手把他按在椅子上坐下，笑着说：

“忙啥，我们有的是时间，先喝口茶，喘口气再谈。”

他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定了定心。

黄仲林走过去，把门关了，回来，坐在他斜对面，

舒缓地说：

“现在你谈吧。”

他详详细细地报告谈话的经过。黄仲林一边仔细地听，一边用铅笔在拍纸簿上记着要点，夸奖他：

“你这一次工作做得很好。”

“不是我做得好，是刘蕙蕙说得好。”

“不，你也有功劳。”

“过奖了。”

“谈完了？”

“谈完了。不——”他又喝了一口茶，鼓足勇气说，“刘蕙蕙的谈完了，还有我自己的哩。”

“你的？”黄仲林惊异的眼光盯着他。

“是我的。”他回到福佑药房以前，在电车上就下了决心：他这个青年团员不能落在刘蕙蕙的后面，她啥都敢讲，意进为啥不敢讲呢？他要告诉黄仲林。

“你谈吧。”黄仲林用微笑欢迎他。

他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和盘托出，谈到后来，头渐渐低了下去，说：

“怪我没有经验，我不够做一个青年团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处分。”

“经验吗？你确实没有。这不怪你。这是朱延年设下的陷阱，他不但想改造国家的干部，还想改造你这个青年团员。我到福佑以后，就发现你神情有异，

晓得你一定有心事，可还没有料到朱延年的手段这么毒辣。他想拖你下水。你很好，有勇气把这些事报告组织，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应该受到表扬，怎么谈到处分呢？”

“不要处分？”

“当然用不着处分。”

“这些事谈的清楚吗？朱延年和马丽琳勾结起来乱造谣……”

“真金不怕火。组织上帮你解决。马丽琳这人看上去还不错，我今天就派人去做她的工作。你放心好了。”

童进听了这一番话，感到浑身忽然轻松了，心里也舒畅了，激动地站了起来，紧紧握着黄仲林的手，眼眶润湿，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52

童进领了一个青年走进 X 光部，黄仲林抬起头来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那人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布人民装，里面的白布衬衫没有放在裤子里，下摆露在人民装上衣的外边；帽子戴得很高，一仰头仿佛就

要掉下去似的。他左胳膊挟着一个深黄布做得公文包，挟得很紧，好像里面装了很重要的材料，怕掉了似的。黄仲林一看，心里便有了数，微笑地问童进：

“是来调查材料的吗？”

童进愣着两只眼睛，奇怪地问：

“我还没有介绍，你哪能晓得的？黄队长。”

“是他那身服装和他手里的公文包告诉我的。”黄仲林笑了笑，接着说，“恐怕还是从苏北来的吧？”

那个青年点点头。童进更是吃了一惊，几乎是跳到黄仲林面前说：

“你简直像是活神仙，啥事体都不用讲，一看就晓得了。”

“我不是活神仙。”黄仲林到了福佑药房以后，亲自把朱延年的材料仔细看了三遍，几个主要活动方面都牢牢记在脑筋里。苏北方面是个重点，张科长的事那边始终没有派人来。今天从那个青年的服装举止上看，他估计是从那边来的，果然叫他猜对了。他说，“有辰光估计对了，有辰光也会猜错的。”

“不，你估计都对，真像活神仙。”

“你要烧香吗？”他打趣地问童进。

童进嘻着嘴，笑而未答。

“别开玩笑，还是我们来谈谈吧。”黄仲林的态度顿时严肃起来，对那个青年说，“贵姓？”

那个青年打开深黄布的公文包，把区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介绍信递过去。黄仲林看了看，把介绍信放在桌子上的卷宗里，抬起头来说：

“李福才同志，张科长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李福才长长叹了一口气，慢吞吞地用着感叹的语调说，“‘三反’一开始，我们的科长心神就不定，整天愁眉苦脸，老是有一肚子的心思。大家劝他，有啥事体，早点和大家谈谈，没有关系。我们晓得是啥事体，也好出力。他老是对我们科里同志说：没啥事体，没啥事体。他参加‘三反’的会议不积极，每次会议坐在那里，老是不发言，看上去，又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有时，在我们处长面前却特别积极，话比谁还多，只是老讲相同的话，没有内容。他是我们的科长，他有情绪，你说，黄队长，我们科里工作哪能搞的好？打虎也不得劲。别的科里都打出老虎来了，有的还是大老虎，就是我们科里一个老虎也打不出来。你说急人不急人？我们都急的不行，张科长一点也不急。第二个战役开始，张科长可急了，整天跑来跑去，像是有什么急事，可是科里啥急事也没有。他就是在科里坐不住，脾气忽然变得特别好，谁有什么事找他，他都同意，并且帮忙。有一天，处长找他谈话，他回来面孔铁青，我们料到一定是吃了处长的批评，可是，还不晓得他出了事啦

……”

“啥事体？”童进问。

黄仲林向李福才微笑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张科长一定会出事，从他的笑纹里透露出来好像出了啥事体也清楚。

“啥事体？——张科长原来也是一只老虎。”

“哦！”童进不了解机关里“三反”的情况，听说张科长也是一只老虎，不禁大吃一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

“张科长那样的老干部，居然也是老虎，真正想不到。”

“这有啥想不到的，”黄仲林从李福才的话里证实了自己的估计。他想起刚到福佑药房，童进他们向他汇报的那些情况，便气愤愤地说，“到了朱延年的干部思想改造所，哪能不变呢？”

“我们科长自己也不好，”李福才说，“从你们转来的材料看，他不应该接受朱延年这个坏家伙的钱和那些物事。”

“你说的对。”黄仲林指着李福才的面孔说，“张科长经不起朱延年的糖衣炮弹，应该他改造朱延年，不料被朱延年改造了。”

“朱延年这家伙腐蚀了许多干部，真是害人精。”童进咬牙切齿地说，“这次可不能放过他呵！”

“当然不能放过朱延年，”黄仲林把话题拉回来，问李福才，“现在张科长怎么样啦？”

“后来我们晓得组织上找他谈过几次话，他心里很恐惧，不敢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怕说出来要受处分。处长请示上级，决定他停职反省，……”

“这个决定很正确。朱延年把他改造过去，我们再把他的改造回来。”黄仲林点点头说，“停职以后，坦白了没有？”

“初步写了一些材料。没两天，组织上派我到上海来调查材料了。”

“你来，我们很欢迎。关于张科长的事体，童进同志可以同你谈。你们谈了以后，还可以找夏世富谈谈。夏世富这个人很滑头，不是一次能谈出来的，要耐心和他谈。书面材料在我这里，你可以看。”他望着李福才说，“苏北方面关于朱延年的材料，还希望你多提供一点。”

“那没有问题，我带了一点来，”李福才连忙打开深黄布公文包，急着问，“要不要现在就给你？”

“交给童进同志好了。”

李福才拿出材料来，迟疑地望着黄仲林。黄仲林便给他介绍：

“童进同志是我们‘五反’检查队材料组组长，交给他一样的。”

李福才把厚厚一包材料送到童进手里。黄仲林对童进这么信任，他认为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幸福。他感到十分愉快。那天向黄仲林汇报朱延年和马丽琳勾结的诡计，黄仲林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简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就投入“五反”运动，积极和叶积善他们商量，怎样帮助黄仲林做好福佑“五反”检查工作。第二天，黄仲林召集了童进和叶积善这些积极分子开会，成立了组织，童进担任了材料组的组长，叶积善是群众工作组组长，黄仲林自己兼任资方工作组组长……迅速展开了工作。

这消息很快从夏世富的嘴里传到朱延年的耳朵里。朱延年立刻去找黄仲林，哭丧着脸，说了童进许多坏话，希望黄仲林主持公道。黄仲林听完朱延年那一套鬼话，冷笑了一声，说：

“我正要找你，你谈了很好。”

“我晓得黄队长在市面上混的人，啥人在你的眼睛里也瞒不过去。童进这样的人，别看他表面老老实实的，心眼可坏哩。你一看一定就晓得了。我用人不当。他到店里来是我一手提拔的，没想到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叫我戴绿帽子。要不是黄队长，我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哩。”

“童进到我这儿来告了你……”

朱延年霍地站了起来，生气地把袖子一卷，仿佛要找童进打架似的，说：

“古人说得好，恶人先告状。一点也不错。朋友妻不可欺，他连我这个经理的老婆也下手哩！”他有点心虚，问，“他告我啥？”

“你自己清楚。”

“我？黄队长，你别听他瞎三话四。我找他来，三头对面，一定要谈清楚。”

“不必找他，问题很清楚。”

朱延年心头一愣，发觉局势有点不妙，他想设法挽回，把希望寄托在黄仲林身上，恭维道：

“黄队长明察秋毫。希望黄队长给我做主……”

黄仲林鹰隼一般的目光，注视朱延年，严正地对他说：

“陷害好人，破坏‘五反’，你晓得这个罪不小呀！”

“黄队长，黄队长，你这，你这是……”朱延年像是迎头受了一个闷棍，弄得昏头昏脑，口吃的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镇静下来，强辩地说：“你不能听一面之词，你，你听听我的意见呀！”

“谁也没有封住你的嘴，有话，尽管说吧。”

朱延年气呼呼的，好像有一肚子冤气要吐，愤愤不平地说：

“童进调戏我的妻子，千真万确！那天夜里，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两人在一张床上……，我在黄队长面前可以发誓，绝对没有半句假话。我不是那种颠倒黑白的人。我不会拿我老婆来开这个玩笑。不管我在做生意买卖上有啥不对的地方，童进总不应该欺负我的老婆。黄队长，你说是不是？”

“如果童进真的欺负你的老婆，童进当然不对；要是诬告，童进不但没有罪，诬告的人要受到处分。”

“我一点也没有诬告。”朱延年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话你不相信，童进的话你也别相信，黄队长，你问问马丽琳，真相就明白了。”

“问马丽琳能把问题弄清楚吗？”

“那当然，她是当事人，她最清楚不过了。”

“马丽琳会不会说假话？”

“不，绝对不。她有一句说一句。我们是夫妻，她的脾气我很了解。她不会冤枉任何人的。”朱延年想，只要关照一声，马丽琳完全可以听他摆布，要是来不及回去，打个电话也就行了。

“她讲的话，你完全相信吗？”

“那我没二话说。”他回答得十分干脆。

“我已经派人找过她了……”

朱延年忍不住打断黄仲林的话：

“啥辰光？”

“就是今天。”

“她哪能讲？”

“她讲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黄队长，你别听她瞎三话四。”

“你不是说，她绝对不会说假话吗？”

“不过，”朱延年喘了一口气，改口说，“她给人逼得没有办法，有时也说句假话。”

“你说，是我们逼出来的吗？”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朱延年讲话太急，没有很好考虑，有了漏洞，让黄仲林迅速抓住，叫他躲闪不开。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说，是说，她有时给人家问得没有主张，可能说点假话。”

“你不是说，你完全相信她讲的话吗？”

“她讲的真话，我当然完全相信。”朱延年一步一步退下来，感到招架黄仲林的攻势非常吃力，但仍然勉强顶住。

“我看你还是老实一点好。老实人绝对不会吃亏的。害人的人，最后一定害了自己。真相已经完全明白。你陷害好人，破坏‘五反’是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五毒不法行为。”

“这，这……”朱延年还企图抵挡，但已是强弩之末，在童进身上一时玩不出新的花招。他恨不能一口把童进吞下，才能消除心头的愤恨。现在童进有黄

仲林撑腰，急切不能下手。但等“五反”过后，黄仲林这小子滚蛋，再看朱延年的颜色。别说童进，就是黄仲林，老实说，朱延年也不放在眼里。朱延年在上海滩上混了几十年，哪个官员不败在他的手里，小小黄仲林，更不在话下。他装出有一肚子冤屈没有办法诉说的神情，摇摇头说，“真想不到，马丽琳也会这样，黄队长，将来你会晓得真相的。”

“不必等到将来，现在我已经晓得了。”

“好，好，我现在不说，我有啥好说的呢？我一张嘴哪能说过他们两张嘴呢？马丽琳变了心，要和童进相好，自然帮助童进说话……”

“那要不要马上把马丽琳找来，当面对质？”

朱延年给黄仲林一逼，怕真的把马丽琳找来，一五一十讲出来，他更加没法下台。他摆出委屈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忽然用手按着头，皱起眉头，说，“黄队长，我昨天没睡好，现在头痛的要裂开来似的，我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那你去吧。”

朱延年跨出“五反”办公室的门，马上把手从额角上放下，暗自对自己说：这回算我倒霉，以后，等着瞧吧。黄仲林有天大的本事，拿出来好了，朱延年绝不在乎，看谁翻过谁的手掌心！

事后，黄仲林把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童进。童进越发放心，一点顾虑也没有了，勇气百倍地从事材料组的工作，主动给黄仲林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材料，团结店里的职工，形成核心力量。他成为黄仲林得力的助手。

童进接过李福才那包厚厚的材料心里十分喜悦，打开一看：第一页是张材料单子，每份材料都有标题，注明来源，还有时间、地点，眉目清楚，一目了然。他钦佩地对李福才说：

“你们整理的材料真好。”

“这样便于你们查对。”

“你们自己留底吗？”

“重要的，我们把原件留下，抄了一份给你们；同你们有关系的，就把原件给你们，我们把重要部分摘了下来。”

“这个方法太好了，黄队长，我们材料组也要仿照他们的办法，好不好？”

“完全由你决定，我没有意见。你是搞会计的，管理材料一定像管账一样的清楚。”

“管材料可没经验，这是头一回，要不是你的鼓励，我真不敢担任材料组的组长哩。……”

童进的话还没有说完，叶积善一头伸了进来，站在门口，满怀高兴地小声地说：

“黄队长，有信……”

“啥地方来的？”

“从朝鲜来的。”他的声音很细，语调机密，生怕给门外的人听见。

“志愿军的信？快进来。”

志愿军的信是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转来的。黄仲林打开一看，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对童进说：

“你看：戴俊杰和王士深的信来了。部队办事真快，接了我们的信，马上就复，写得这么详细，问题更明白了。”

“志愿军么。”童进望着信，钦佩地说。

“对，志愿军。”黄仲林重复了一声，皱着眉头想了想，用商量的口吻对李福才说，“你能在上海多住两天吗？”

“只要搞到材料，多住两天没关系。”

“那好。”黄仲林两只手按着桌子，眼光对着李福才、童进和叶积善他们，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几个主要方面的材料都来了，连没想到的刘蕙蕙，也主动写了检举信来。我想准备几天，向区里请示一下，就动手，看朱延年还有啥办法抵赖！”

“没问题吗？”童进想起朱延年那股牛脾气，信心有点不高。

“不能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朱延年要抵赖也不容易。”黄仲林充满了信心，转过来，对李福才肯定地说，“朱延年的问题解决了，你带回去的材料更具体更完全呀！”

“那我等朱延年的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李福才说，“有啥事体，我还可以帮点忙。”

黄仲林拍拍李福才的肩膀说：

“这再好也没有了！”

53

马丽琳听说今天福佑药房要开会斗朱延年，不放心，想来听听，却又不敢来。她不是福佑药房的职工呀！正当她拿不定主意的辰光，叶积善来了。童进想起马丽琳一定知道朱延年许多五毒不法行为，建议叫叶积善来请马丽琳参加，黄仲林立刻同意了。

马丽琳今天穿的一件紫红色的缎子对襟夹袄，胸前有一排深蓝色的充宝石的精圆的钮子，下面穿着绿呢绒的西装裤子。她走进房间，对着镜子梳了梳那波浪型的头发，便和叶积善搭了一路电车到福佑药房去。

她一走进福佑药房，便发现自己这身衣服很不合适，在那一片蓝色的和灰色的衣服中间显得特别刺眼，早知道应该换身素净的衣服来，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叶积善把她领到最前面一排椅子上坐下。她暗暗向四周巡视了一下，福佑药房今天完全变了样：栏杆里的两排桌子都搬掉了，里面放着一排排木板凳和椅子。靠墙那里放了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墙上挂的那些医药卫生部门送的横匾和条幅仍然和往常一样的挂着，新药业公会送的那幅贺幛，红底金字，特别突出：“全市医药界的典型，现代工商业者的模范。”

她坐在那里心有点不安，好像大家的眼光都朝她身上射来，感到热辣辣的不好受。幸亏黄仲林带着朱延年到靠墙的那张桌子上来了，大会开始了。

马丽琳仔仔细细看了朱延年一眼：朱延年好像早就有了准备，穿了一件灰布人民装，没有戴帽子，头发虽然有点披下来，两只眼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奕奕有神，心里很笃定的样子。她的心稍为安定了一些。

她因为注视朱延年，没有留神听刚才黄仲林宣布开会讲的一大堆话，不知道他说啥。

接着黄仲林讲话的是童进。他讲得满头满脸都是汗，一边高声喊叫，一边拍着桌子，一边指着朱延

年，气愤愤地说个不休，那唾沫星子直往外喷，差一点没喷到马丽琳的脸蛋上。她心里想：看不出童进这个青年小伙子，现在变得这样能讲会道的，生龙活虎一般，那股劲头，就差伸出手来打人了。她给朱延年担心：一个个上台揭朱延年的底，他这个脸搁到啥地方去，以后还要不要和这些人共事呢？

叶积善接着走上去讲话，比童进平静的多了，但是语调也是很气愤的，诉说朱延年一件件的坏事，连朱延年和刘蕙蕙离婚的事也端出来了。这些事马丽琳听出兴趣来了。她很高兴叶积善带她来参加这个会，使她了解她过去不知道的事体。她一句句留心听下去。

第三个上来的是夏世富，叫她心头一愣：她知道夏世富是朱延年的心腹，平日朱延年待夏世富最好，夏世富也最听朱延年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没有一句二话的。夏世富在朱延年面前仿佛是架自动机器，听凭朱延年指挥。这架自动机器向来没有主见的。今天上台，难道也攻击朱延年一番吗？她把耳朵冲着墙那边，凝神地听。夏世富也没有说啥大不了的事，只是讲些零零碎碎的事，叫朱延年赶快坦白。她放心了。

一个下去，一个紧跟着上来，马丽琳到后来记不清有多少人上台指着朱延年的面扎诉说了。她心里

有点慌：这样诉说下去，有个完吗？朱延年吃的消吗？她微微抬起头来，向朱延年扫了一眼：朱延年站在那里，意外地安定，紧闭着嘴，眉头开朗，态度安闲，眼光里露出一一种蛮不在乎的神情。她虽然相信朱延年有办法对付这个严重紧张的场面，可是究竟放心不下，有点儿替他担忧。

要上台讲话的人差不多都讲了，黄仲林见朱延年还没有表示，而且态度很沉着的样子。他便向台下的人望了望，问道：

“大家还有意见吗？”

童进站了起来，指着隐藏在左后方角落上坐着的夏世富说：

“夏世富说话不老实，尽讲些鸡毛蒜皮的事，有意包庇朱延年。要他再发言，揭发朱延年的五毒罪行。他了解的事体比啥人都多！”

台下的人高声响应：

“对！夏世富要和朱延年划清界限！”

夏世富坐在那时，以为已经过了关，没人注意他了。他没想到童进注意到他。他没法再隐藏，也不敢站出来，要是脚底下有个洞，他真想钻下去。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了，担心这回可过不了关啦，再上台发言，不能尽谈小事不谈大事了。大事，朱延年就站在旁边呀，哪能好开口呢？真是左右做人

难，他的眼光向朱延年求救。

朱延年咬了咬嘴唇，脸色有点儿发青。他果断地走到黄仲林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很诚恳地向黄仲林要求道：

“黄队长，我请求下去向你个人坦白。”

“真的吗？”

“绝不说半句假话。”

“只要坦白交代，在啥地方都行。”

“谢谢黄队长。”

黄仲林说明朱延年准备坦白交代，宣布散会。办公室的空气顿时松下来，大家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朱延年，仿佛说：看你这一次敢不坦白！叶积善被黄仲林叫到面前去谈了两句。叶积善连忙走到马丽琳面前，说：

“我们谈谈好不好？”

“有啥不好？”马丽琳反问了一句。

“来吧。”

他和马丽琳两个人走到经理室去。她一走进去，顺便把门关上。他立刻想起童进那天晚上在她家的情形，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警惕地说：

“不用关门，开着门谈一样……”

正好童进推门进来，门敞开着。叶积善要马丽琳坐下，同时约童进一道谈。他想了想怎么开头，过了

一会，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会上揭发的那些事，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朱延年做的坏事可多呢，你也上了他的当。”

“是呀，我从前不晓得他这么坏啊，我当初还以为他是有钱的大阔佬哩。”马丽琳想起当舞女积蓄的一些钱都叫朱延年左骗右骗花光了，有点心酸。

“你想想看，你该怎么做？”

“我怎么做呢？”马丽琳反问自己，得不到回答，便央求道，“你告诉我，我一定做。”

童进说：

“叶积善同志不是要你自己想吗？你自己做的事不晓得吗？”

马丽琳脸唰的一下绯红了，她羞涩地低下头去，暗示地说：

“有些事体我已经说过了，还要说吗？”

童进懂得她指的啥，说：

“说过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没有说过的事，快说出来。”

马丽琳认真地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他是奸商。他不坦白，我就和他离婚。我不要他，这个决心是有的。我反正还年青……”

“单有这个决心不够，”叶积善同情地看了她一

下，说，“还要立功。”

“哪能立功呢？”马丽琳不解地望着叶积善。她想：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还不够吗？

“有啥法子叫他坦白？”叶积善说，“你能想办法叫他坦白，你就算立功了。”

她无可奈何地瞪着眼睛，说：

“这我没有办法呀，你晓得，朱延年可厉害哩。”

“你晓得他的事体很多，”叶积善鼓励她道，“你又聪明，你一定有办法。”

“不。他啥事体也不告诉我。他这个人门槛精来兮，拿我当小孩子看待，高兴辰光，带点巧克力精回来，从来不给我谈正经。不高兴就给我眼色看。”

童进摇摇头，嘴上浮着一个不信任的微笑，说：

“你真的一点不晓得吗？”

马丽琳从童进的微笑里知道他一定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了，她脸上热辣辣的，接连否认道：

“真的一点不晓得。”

“你想想看，”叶积善说，“你立了功，对朱延年也好呀。”

马丽琳歪着头，皱起淡淡的长眉毛，努力回忆和朱延年认识的经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朱延年有啥五毒不法行为。今天会上听到的，在马丽琳来说，都是新鲜事。她像是坠入朱延年迷人的陷阱里，过去一直

糊里糊涂过日子，今天才算是拨开云雾，看清了朱延年的狰狞面目。她有点恨朱延年，一想起朱延年待她不错，赚了钱都花在家庭的费用上，又有点怜悯他。但听到会上大家揭发的坏事，都骂他是不法的资本家，又不敢同情他。她心里这种复杂的情绪，使得她的思路乱了，像是一把没有头绪的乱丝，不知从何想起。她苦恼地说：

“我实实在在不晓得呀！我心里乱得很，让我回去吧。”

“那你先回去也好，我们再谈吧。”

马丽琳无精打采地点点头。童进等她走出去，自己就找黄队长去汇报。

散会以后，黄仲林和朱延年一同走进了 X 光部。黄仲林坐在转椅上，朱延年坐在他左侧面的一张椅子上。下午的阳光从窗外射来，屋子里显得有点闷热。黄仲林拿出小笔记本和新民牌自来水笔，说：

“你说要向我个人坦白，现在说吧。”

黄仲林拿着笔，准备记。

朱延年回过头去看看门外边有没有人，他怕童进站在外边，又怕黄仲林把夏世富找来。黄仲林以为他是怕别人听去，便安慰他：

“说吧，没有人来的。”

黄仲林把门关上。

“好，我说。”朱延年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不假思索地说，“我坦白：上海解放前，我开过五万多支盘尼西林的抛空账单，这是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去年小号的营业发展，单拿六月份来说，营业额就是三十六个亿，赚了不少钱，这是暴利……”朱延年一条条说下去，一共说了五条，最后说：“在我们新药业当中有个旧习惯，常常在风月场中谈生意，我为了做生意，也难免参加参加，这是腐化堕落，是旧社会的坏作风。今后我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做一个新社会的新人物，这点，我在这里一并交代。”

黄仲林听朱延年说的牛头不对马嘴，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都忍耐下来，看他究竟说到啥地方去。等朱延年一说完，他实在忍耐不住了，板着面孔质问朱延年：

“你和我开玩笑吗？”

“岂敢，岂敢！”朱延年彬彬有礼地欠欠身子。

“那你为啥不老实？”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解放前的事，不属于‘五反’范围以内，国家也没有限制每家商号做多少营业额，你不晓得吗？”

“这个，这个……”朱延年很焦急地抓自己的头皮，做出好像完全不知道的神情。

“这不是坦白交代……”

“请指教指教。”

黄仲林一双眼睛一个劲盯着朱延年，按捺住心头的怒火，竭力保持平静，说：

“那你为啥不说？”

朱延年嘻着嘴，毫不在乎地说：

“请黄队长栽培栽培。”

“啥栽培，”黄仲林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大声说，“老老实实快把你的五毒罪行坦白交代出来。”

朱延年脸上的笑容虽然消逝了，态度却从容不迫，奇怪地问道：

“啥五毒罪行？”

黄仲林指着他的面孔说：

“盗窃国家资财……”

“除了解放前开过五万多支盘尼西林的抛空账单以外，小号里没有敌伪财产，也没有到国家仓库里偷过东西。”

“制造过假药卖给国家吗？”

“那怎么敢，”朱延年心头一惊，但旋即镇定下来，慢慢地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新药业。”

“行贿干部呢？”

“曾经行贿过……”

黄仲林见朱延年承认这一条，他想从这个缺口扩大开去，别的问题可能陆续交代出来，认为自己应

该更有耐心才行。他坐了下去，冷静地说：

“讲吧。”

“干部不要，又退回来了。”

“你，你……”黄仲林盯着朱延年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朱延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劝黄仲林：

“黄队长，有话慢慢说，不要急……”

黄仲林发觉朱延年在玩弄自己，深深地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不能让朱延年再耍花招，立刻打断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

“你坦白不坦白？”

“不是已经坦白了吗？”

“你不说老实话。”

朱延年沉着地说：“句句是实话。”

“你不要嘴上说的好听，要有内容，要有行动表现出来。”

“那么，这样好了：所有福佑药房的资财，我愿意完全交给政府处理，政府要罚多少就罚多少，并且希望政府加倍罚我，罚的越多越好。我这样的行动总够了吧？言行一致了吧？”朱延年说完话，冷冷轻笑一声。他刚才在会上早就拿定了主意：他是空着两只手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走进上海滩的，凭他的本事，创办起这番事业。他经过不知道多少风险，都安然度

过，跌倒啦又站起，福佑这块牌子在新药业总算有了地位。他并不惧怕黄仲林这个年青小伙子，只是人民政府太厉害，发动群众，想挖他的老根。看到童进要夏世富再上台揭发他，他怕夏世富顶不住，把事体暴露，来了个缓兵之计：要求向黄仲林个人坦白交代。黄仲林果然中了他的计。他想起在上海滩上所做所为，特别是上海解放后这几年，人民政府任何一个人只要擦一根洋火都可以把他烧死，何况除了黄仲林，还有意进他们帮忙哩。反正是死，于是下决心不坦白。不管你有啥人证物证，统统给你一个不认账。不怕你黄仲林三头六臂，也奈何不了朱延年。他想：顶多也不过是空着两只手穿起蓝布大褂离开这十里洋场，黄仲林不能叫他有更大的损失。他和黄仲林敷衍一阵，就提出这几句话，瞧你黄仲林有本事拿出颜色来看看。

黄仲林听了他这几句话，立刻气的脸红脖子粗，几乎要跳了起来，继而一想：这样急躁，不是向朱延年示弱吗？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心平气和地说：

“你别乱说！政府不要你的资财，要你交代五毒罪行。”

“我已经交代了。”

“你没有……”

“怎么没有？”朱延年抬起头来故意想了想，说，

“那这样好了，我听说有的厂店检查队发动职工检举，他们检举的材料，资方都承认了。我也愿意这样做，欢迎你们检举。你们检举出来的，我一定承认，并且希望你们多多的罚我。”

“你这个态度就是不老实。”

“哪能不老实呢？”

“你自己为啥不交代？”

“我晓得的都交代了，我不晓得的，哪能交代呢？”朱延年有意搔头皮，装出很苦恼的样子，说，“黄队长，你不是叫我为难吗？”

“你自己做的坏事不晓得？”

“我晓得的都讲了。要我再讲，我只好乱讲。我想，这恐怕不符合政府的‘五反’政策吧。”

“谁叫你乱讲的？”

“我掏出良心来说，我实在没有隐瞒的了。要是有的话，杀我的头好了。”朱延年伸出右手在自己脖子上做了一个杀的姿势。

童进从马丽琳那儿走到X光部来，一进门，见朱延年做杀头的姿势，不知道出了啥事体，他连忙退出门外，愣着两只眼睛站着。

“不要把话讲的太绝了，”黄仲林不慌不忙地说，“有头比没有头好！”

“那当然，黄队长说的再对也没有了，啥人不希

望有个头呢？”朱延年见童进站在门口，恨不能从眼睛里跳出两只手把童进抓来，一刀把他的头砍掉。他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说这句话的。”

“办法不是没有，主要看你自己，不要往绝路上走才好！”

朱延年听了这句很有分量的话，额角头突然汗浸浸的，像个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哑口无言。

54

礼拜六的夜晚。

中山公园的水池像是一面镜子，圆圆的月亮映在池面。池子附近树旁的几盏路灯，那圆圆的灯光映在水里，就像是一个一个小月亮似的，围绕着池中的月亮。一片一片臃肿的白云缓缓地移过池面，仿佛是一群老妇，弯着背，一步一步吃力地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的空隙倾泻下皎洁的光芒。一片白云和一片白云连起，如同一条宽大的不规则的带子，给碧澄澄的天空分成两半。白云移过，逐渐消逝在远方，天空碧澄澄的，月亮显得分外皎洁。

钟珮文一个人独自站在水池边，面对着水中的明月发愣。

他站在那儿已经快半个钟点了，虽然面对着水池，可是他的眼睛不断向左右两边暗暗望去。水池左边的柏油路上传来囊囊的皮鞋声，在幽静的园中显得特别清脆嘹亮。他的耳朵顺着声音的方向听去，辨别出有人从水池左后方走来的声音。这更引起他的注意，他退后几步，坐在草地上，两手抱着膝盖，等候那清脆响亮的声音到水池这里来。

清脆的囊囊皮鞋声从水池的左边走过，低沉下去，消逝在通向动物园的小桥那边了。

钟珮文失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又走到池边，捋起袖子，在月光下看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一刻了，按照约定的时间，整整过了一刻钟。但在他看来，好像已经足足过了三个钟头。

“这家伙，忘了吗？”他问自己，同时又回答自己，“不会的，明明说好了八点钟在水池边等候么？哪能会忘呢？”

钟珮文第一次给管秀芬写信没有得到答复，他并没有灰心。最近他编“五反”斗争的黑板报经常和她有往来，问她意见呀，约她写稿呀……起初她不愿意写，推说没有文化。拗不过他再三再四的请求，她写了一篇。他仔细给她修改，第二天就登在黑板报

上。她看见了又害羞又喜欢。早几天，他又写了一封短信给她，约她今天晚上八点钟到中山公园去玩。她没有答复。昨天在路上碰到，他当面问她，她点点头，啥也没有说，便飞一般地跑了。

他怕误事，七点三刻就站在池边守候了。他气愤地说：

“拿我开玩笑？不来？那明天找她算帐！”

“用不着等明天，现在就给我算账好了。”

他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和他答话，吓了一跳，转过身去一看，不是别人，是他等候了半个多钟点的管秀芬。他抓住她的两手，又惊又喜，定了定神，笑着问她：

“啥辰光来的？”

“早就来了。”

“我哪能不晓得？”

“你在骂人，哪能会晓得。”她冷冷地说。

“你全听到了？”

“唔，我是家伙，不是人。给你开玩笑，我不该来，我来错了……”她一甩手，嘟着嘴，穿过水池左边的草地，笃笃地跑到柏油路上，向大门那个方向走去。

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他站在水池边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半晌，他见她向大门走去，

清醒过来，知道她真的生气跑了，连忙拔起脚来，拚命追赶上去，接近她的身边，不敢再抓她的手，又怕她走掉，低低叫唤：

“秀芬，秀芬……”

她站了下来，怕人家听见，向他望了一眼：

“叫啥！”

“不叫，不叫，”他连忙答应下来，接着请求道，“那么，你来……”

“还骂人吗？”她站在那里不动。

“以后再也不骂了，刚才是我一时糊涂，瞎说……”

“你还装糊涂！”她不让他蒙混过关。

他不得不承认：“不，怪我嘴不好。”他嬉皮笑脸地指指自己的嘴，伸过手去，想拉着她一同回来，说，“走吧。”

她把手向背后一放，说：

“我也不是小孩子，不会走路，要人搀着！”

“好，好，大姐自己走。”

“我还没那么老……”

“我的妹妹，不要生气，……”他发现自己又讲错了话，立刻更正道。

“你倒会讨便宜……”

他伸伸舌头，说：

“算我说错了，好不好？别生气。”

她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气。刚才她有意从水池跑开，试试他的心，看他赶上来不赶上来。他接二连三赔不是，使得她心里很乐，觉得他人很老实，真心爱她，顺从自己的心意。

他们两人慢慢地走到池边。她站在池边给月光照得变成墨绿色的四人靠背椅上，准备坐下去。他向四面望望，指着背后树下两张椅子说：

“那边去坐一会吧。”

她嫌树底下太阴暗，黑啾啾的，摇摇头，指着身旁的椅子说：

“这里不是很好吗？”

“这里？唔，也很好。”

他讲话很不自然，也说不出一定要到树底下去的道理，又怕她不高兴，就坐了下去。两个人拘谨地各坐一边，中间空着两个位子。

两个人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言语。他生怕自己再说错了话，惹她生气，不知道说啥是好。他的脚无意识地踢着地上的石板和泥土。她呢，肚子里有话，不说，等他先开口。她的头微微低着，眼光对着池面的圆圆的一轮明月。

他几次要说话，话已经到了嘴边，又吞了下去。半晌，他才嗫嚅地说：

“你从啥地方来？”

她回答得很简单：“厂里。”

他又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她问了：

“怪我迟到吗？”

“不，不。”他慌忙声明没有这个意思。

“应该怪我，厂里有点事，来迟了。”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管秀芬竟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是不敢责备她，却说：

“多等一歇没啥？今天晚上我反正没事……”

他的语调自然一些了，脚也不去踢石板和泥土了，平静地踩在地上。他不知道再说啥是好，两个人又沉默了。

她默默坐在靠背椅上。他不能再支支吾吾，也不敢正面说啥，怕碰一鼻子灰。他想了一会，说：

“你今天在车间读报了吗？”

她听到这句话，心中暗暗笑了，知道他问这句话的意思。她今天在车间给姊妹读了报，而且比往常任何一天都有劲，读完了以后，感到身上轻松，精神愉快。但她把这些喜悦的情绪隐藏在心底里，没让任何人知道。她说：

“没有。”

“你不是细纱间的读报员吗？”

“是呀，记录工兼读报员，没有人开除我。”

“那你今天为啥不读报呢？”

“天天读报太腻味了，天把天不读报也没啥。”

“不能不关心时事……”他的语调有点责备她的意思。

“为啥今天要特别关心时事呢？今天有啥大事吗？你倒给我说说……”

他的脸发热了。早几天他写了一首小诗，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投给了《劳动报》。《劳动报》编辑部给他修改了一下，今天登在四版的右下面的角上。他今天一早发现自己的作品和名字头一次登在报上，心里就怦怦地跳，拿着那份报看来看去，舍不得丢掉。那首诗，他已经可以背诵出来了，可是还要一个劲地读，好像每一行诗里有无穷的奥秘，越看越新鲜，越看越有意思。见了熟人，他都要把话题拉扯到《劳动报》上，关心人看过了没有。厂里大门光荣榜旁边原来是张贴《劳动报》的地方，他怕今天别人忘记贴了，特地跑去看看。《劳动报》和往常一样地张贴在那里，他放心了。站在那张《劳动报》面前，他又把四版右下面角上的那首诗看了个够。

他伸手到西装裤子的口袋里，摸出那张《劳动报》，送到她手里：

“我带了一张，你看。”

在皎洁的月光下，她仔细看了看一版和二版的大标题，三版也看了一下，就是不看四版，轻描淡写地说：

“没啥大事体。”

她的眼光暗暗凝视着他。他皱着眉头，心里焦急，又不好意思张口，怕她再把报退回来，忍不住说：

“四版你还没看哩。”

“哦，”她翻到四版马马虎虎一看，若无其事地说，“也没啥。”

他坐过去一点，指着四版右下面的角上，腼腆地说：

“这个看了吗？”

他说完话，不好意思再盯着报纸，望着她那根挂在靠背椅上的长长的辫子。

她不得不看那首诗了。她的脸也红了。她满肚子的喜悦再也抑制不住，爆发出格格的笑声：

“真的成了作家了，怪不得要我看报哩！”

“一首小诗，不算啥，当作家还早着哩，你别笑话我！”

“啥人笑话你？”

“你。”

“我！”她瞪着两个圆圆的眼睛，摇摇头，说，“我没文化，哪能有资格笑话你？……”

她最近在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在陶阿毛和钟珮文之间选择哪一个，她还拿不定主意。她无意之中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秘密。他听了这话，马上接过去说：

“不，你也有文化，你的稿子写得不错。”

她把手上那张《劳动报》折起，放进藤子编制的手提包里，她把话题岔开，关心地指着他身上的衣服，说：

“看你衣服穿得脏成这个样子，也不晓得换一身……”

他见她把《劳动报》收进小手提包，从她的话里更感到无限的温暖。他连忙扑扑灰布人民装的上衣和裤子，用抱歉的口吻说：

“是呀，今天本来要换的，怕来迟了，忘记换了。”

他坐在她旁边，和她那一身整洁的服装一比，确实感到有些惭愧。她指着他的衣服说：

“看你那袖子，又是油渍，又是粉笔灰……”

他嘴上漾开了笑纹。最近管秀芬表面上不大和他打招呼，暗中却很注意他，而且看得那么仔细。他感激地说：

“我明天就换……”

他望着她披在额角上的头发。

“你换不换，同我没关系。”她含羞地低下了头。

他们两人谈话的声音低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啥。

园子里静悄悄的，远方传来唧唧的虫声，在歌唱愉快的夜晚。从黄浦江边吹过来的微风，掠过树梢，吹拂过水面，平静的水池漾开涟漪，圆圆的月亮和圆圆的灯光仿佛在水中喝醉了酒，摇晃着。映在水池两边的树的倒影，也轻轻摆动。公园里各式各样的花朵，徐徐吐露着芳香，给微风一吹，四散开来。

钟珮文和管秀芬两个人的影子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水里，看不大清楚，好像是一个人的影子，沉醉在幸福的海洋里，随着微风飘荡。

55

礼拜六的晚上，在戚宝珍的宿舍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宿舍里每个房间的电灯都熄灭了，走道上那盏电灯像是没有睡醒似的，不明不灭的吊在雪白的屋顶上，显得有点阴暗。戚宝珍带着珍珍在房间里忙碌地工作。她两腿浮肿，吃力地迈着步子。

戚宝珍把杨健的和珍珍的衣服整理好，有的挂在衣橱里，有的放在五斗橱里，刚才仔细地告诉珍珍

哪些衣服放在啥地方，她还不放心，把珍珍拉到面前，问她：

“爸爸的灰布人民装在啥地方？”

“在衣橱里，”珍珍信口说出，两只小眼睛一转动，发觉不对，连忙摇了摇手，微笑地说，“不，在五斗橱第二个抽屉里……”

“我给爸爸买的那双新布鞋呢？”

珍珍右手的食指指着圆圆的小嘴一想，说：

“在第三个抽屉里。”

“你那件红呢大衣呢？”

“在衣橱里。”

“你能拿下来吗？”

“能。”珍珍走过去，打开衣橱，指着短短的红呢大衣给妈妈看，证明自己记的不错，马上端了一张椅子，放在衣橱前面，爬上去，把红呢大衣取下来准备送给妈妈。妈妈说：

“给我再挂好。”

她熟练地把衣架挂在衣橱上头的一根圆棍子上。妈妈满意地接着问：

“爸爸的衣服脏了，拿到啥地方去洗？”

“妈妈洗。”

“妈妈不在家呢？”

她的小眼睛一愣：妈妈一直在家的。妈妈有病，

天天在家，为啥忽然不在家呢？她说：

“妈妈天天在家。”

“妈妈上班工作呢？”

“晚上回来。”

妈妈不愿意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她，改口说：

“妈妈进医院呢？”

她想起早一会妈妈对她说的话，便接上说：

“找隔壁张阿姨代洗。”

“爸爸的手帕和袜子谁洗？”

“珍珍洗。”

“乖孩子，记住了，很好。”妈妈一把把她搂在怀里，吻她的脸，说，“拿功课来做。”

珍珍在妈妈的怀里没动，她歪过小脑袋，仰望着妈妈，理直气壮地说：

“今天礼拜六，不做功课。”

珍珍礼拜六晚上从来不做功课的，不是出去白相，就是在家里休息。这一阵子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很少出去，今天晚上忙着跟妈妈收拾衣服，也没想到出去。妈妈要她做功课，她倒想起来了：

“看电影去，好久没看电影了。”

“等妈妈好了带你去，”妈妈说了这句话，不由地心酸起来，黯然地低下头去。她没有告诉珍珍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特别是最近病更加重了，老是

感到不舒服，从来没有想念过的死的兆头，近来时常浮上脑海。只要有一点点精神，她就做点啥，仿佛不做以后就没有时间做了似的。想到啥，她就做啥，然后躺到床上才能宁静下来。她勉强镇静地说，“今天先做功课。”

珍珍不解地望着妈妈。她很奇怪妈妈和平常不同，好像要把所有的事今天都做完了，明天不是礼拜吗？明天过了，不是还有明天吗？为啥要抢着今天做呢？连不应该今天做的功课也要今天做，她实实在在不懂。她知道，妈妈讲的话一定要做的，没有办法，只好搬了一张椅子，拿着紫红布做的小书包，伏在饭桌上，开始做功课了。算完算术，她翻开语文课本，做习题。今天要做的是填写，第一道题是：

我家里有 人

她很快地填上一个“三”字，但一想：外婆算不算家里的人呢？她搞不清楚。她指着“三”字问妈妈：“对不对？”

妈妈看到“三”字，两个眼睛一愣，脸色有点发白，她担心不知道啥辰光家里就要剩下他们父女两个了。她望着“三”字很久没有说出话来。一股热泪已经到了眼眶，她努力噙住，不让它掉下。珍珍看妈妈好久不说话，吓了一跳，生怕自己填错了，连忙问：

“不对吗？妈妈。”

“对，孩子，……”妈妈的手摸着她的脑袋，没有说下去。

珍珍是个聪敏的孩子，在学校的功课经常得到五分，不管啥功课，只要老师一教，她就懂了。今天的功课做的尤其快，她希望做完了功课去看最后一场电影。她做完功课，把书本和练习簿整理好，放进紫红布的小书包。她走到妈妈面前，小声地恳求道：

“看电影……去……”

“功课做完了吗？”

珍珍从书包里取出书本递给妈妈看。妈妈翻了翻，要给她上新功课。她说老师会上的，但妈妈要上，她只好上了。妈妈抓住她的小手，和她说：

“妈妈不在家，你要听爸爸的话。”

珍珍点点头。

“爸爸回来了，你要帮助爸爸做事。晓得吗？”

“晓得。”

“爸爸回来晚了，你早上起来，不要叫爸爸，懂吗？”

“懂，”珍珍会意地说，“我叫妈妈。”

“不，我说的是妈妈不在家的辰光。”

“那我不吃早饭吗？”

妈妈觉得她问的对，低着头告诉她：

“每天晚上，你自己买好面包，早上起来，用热

水瓶里的水泡了吃。”

“妈妈，你啥辰光不在家？我今天要不要买面包？”

“今天不要，等我不在家再买。”

从珍珍懂事的时候起，妈妈一直在家里的，妈妈上街买东西，或者是到外婆家去，总带她去。现在为啥要把她丢在家里？她不懂，问道：

“妈妈，你不在家，你到啥地方去？”

“到啥地方去？”妈妈给问住了。她不愿把心里想到的那个不好的兆头告诉孩子，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可是她总觉得有许多事要预先做好，便支支吾吾地说：“啥地方也不去，——但不能一天到晚都蹲在家里，总有时要出去的。”

“你不回来吗？”

“回来，”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支持着她。她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可是最近到医院去做了心电图，医生的眉头有点皱起，好像治疗上很棘手，还是那一句老话：要她在家里安心休养。休养到啥辰光？别人休养一天天好了，自己休养却一天天坏了。她强打起精神说，“当然回来。”

珍珍抱住妈妈的腿，生怕妈妈马上就出去似的，说：

“你出去，我陪你去。”

“有的地方……你……你不能去。”妈妈的声音暗哑了。

“啥地方我不能去？”珍珍愣着两只小眼睛望妈妈。

妈妈伤感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等你大了就明白了。”

“妈妈现在告诉我……”

“不……”

“告诉我，妈妈……”珍珍的头在妈妈的怀里揉来揉去。

猛的，有人嘭嘭地敲门。妈妈推开珍珍，说：

“快去开门，大概爸爸回来了。”

珍珍飞也似的去开门，走进来的不是爸爸，是个女的。珍珍一把抱住她的两条腿，愉快地叫道：

“余阿姨！余阿姨！”

余阿姨把珍珍抱了起来，一边亲着她红红的脸蛋儿，一边走到戚宝珍面前，劈口问道：

“你生我的气吗？”

“你说呢？”

“我晓得会生气的。”

“你也太狠心了一点，我已经进了厂，为啥连铜匠间也不让我进去一下呢？”

“你一进了会场，我晓得你更不肯走了。还是回

家休息的好。”

“厂里轰轰烈烈进行‘五反’，和资产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在夜校里兼的课虽说不多，也算是一个教员，哪能安心在家休养呢？你不让我参加会议，老实说，我思想上是不通的。那天晚上钟珮文要我回来，说是你的意见，你是支部书记，我只好服从组织。”

“你的心情我是晓得的。我关心的是你的身体。那样激烈的会议，你一定支持不了的。我们要从长远着想，等你病好了，要做的事体多着哩！”

“这一点，我也晓得，可是一想起厂里五反运动，我的心就静不下来了。”

“这两天好些了吗？”余静改变话题说。

“唉，”戚宝珍叹息了一声，隔了半晌，才说，“这个病，我看，难了啊……”

余静一听这口气不对头，她从来没有听戚宝珍这么悲观过，暗暗看了戚宝珍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她的身体表面上虽然还保持着丰满，但是脸上皮色显得青紫，眼睛有点浮肿，乌黑的眉头里隐藏着忧愁，眼睛的光芒也失去过去的光彩，不过从头到脚整整齐齐，这又说明她心情十分宁静。她泰然地注视着未来。余静安慰她：

“休养休养总要好的，慢性病要慢慢来，不能性

急……”

“我何尝不晓得。我这病，和别的病不同，休养好久了，”她摇摇头，话到了嘴边，看到珍珍站在床边凝神地听，她没有说下去。

半晌，她想了想，对珍珍说：

“阿姨来了，你哪能忘记倒茶了？”

“哦，”珍珍转过头去拿热水瓶，里面空空的，她抱着热水瓶上老虎灶泡开水去了。

戚宝珍这才接着说下去：

“静，这两天我感到心里不舒服，从来没想过的事，这两天都想了。我看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她又说不下去了，余静宽她的心，说：

“听组织的话，在家里好好休养，别胡思乱想。我听人家说，多休养一个时期就会好的。”

“你没有我自己清楚。”她的眼睛注视着余静，对她的健康的身体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停了停，说，“看样子，我以后夜校去不了啦。你以后多上我家里来走走……”

余静没听懂她的话，满口答应：

“我有空一定来看你。”

“不是看我，你看看珍珍……”她的眼睛有点红了，小声地说，“还有杨健，我对他的工作很少帮助。

他在外边一天忙到晚，回到家里来还要照顾我这个病号，实在是对他不住……”

余静怕她伤心，有意把话题岔开，问她：

“要不要叫我娘来住两天，照顾照顾你？”

“不要。姑妈来了，你的孩子谁管？”

“一道来，好不好？”

“也用不着，我这个病不会拖很久了……”

“你讲这些做啥？”余静设法打断她的话头，说，“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

她没有吭气，眼光停留在余静脸上。余静在找话题，说：

“你想吃啥小菜，我给你做点送来。”

“用不着了，我啥也不想吃。”

“那么，要不要啥唱片，买两张来给你听听？”

“我啥也不要，你以后常来来，我就安心了。”

“别讲这些话，好不好？”

“见一次少一次了……”

一片新月挂在明净的深蓝色的天空，从窗口射进微弱的光芒。房间里静静的，可以听到院子里习习的风声。弄堂外边传来赤豆汤的叫卖声。余静焦虑地征求她的意见：

“我打电话叫杨部长回来，好不好？”

“他？”她想了想，说，“还是让他在厂里吧，‘五

反’工作重要……”

“他在厂里写汇报，写好了，要到区上汇报‘五反’检查总结大会准备情况，现在可能在区上。我打电话叫他回来……”

余静站起身来要走，一把给她抓住了，说：

“他讲今天要回来的，要晚一点。别妨碍他的工作。让他忙吧，做完工作，他会回来的。”

她恳求地望着余静。余静也望着她。两个人默默地没有说话，静悄悄中，门外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接着是爽朗的谈笑声，出现在房门口的是杨健和珍珍。他左手搀着珍珍，右手提着热水瓶。他一进门，把热水瓶往桌上一放，首先问余静：

“怎么，你还没回去休息？你有三天没有很好睡觉了，要注意身子。健康是我们革命工作的本钱。”

“出了厂，想起好久没看宝珍了，你也有两天没回来，就弯过来看看她。刚才正要找你，恰巧你来了。”

“有啥事体吗？”

余静把眼光对着戚宝珍。戚宝珍打起精神，勉强露出愉快的样子，望了余静一眼，遮掩地说：

“表妹给你开玩笑，——没啥事。”

杨健从余静的眼光里已经知道一切了。他问戚宝珍：

“你这两天身体哪能？”他过去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注视她的脸庞。

“还好。”她只说了两个字，话便哽塞在嗓子眼里了。她有无数的话要对他倾吐，可是见到他由于过分忙碌而显得疲惫的神情，往往就不说了。今天更怕引起他的忧伤，便忍住没有说下去。

余静不了解她细腻的用心，站在杨健身后，口直心快地说：

“好啥？你刚才怎么给我讲的？……”

戚宝珍用眼睛望了望她，又指着他说：

“忙了一天，在厂里也不得好好休息，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吧。”

余静没有再开口。戚宝珍一时也不知道说啥是好。杨健没有吭气，但他感到今天戚宝珍和往常不同。他回过头去望了余静一眼，好像问：你为啥不说下去呢？

珍珍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谈论啥。她听妈妈的话，在泡茶。她先送了一杯绿茶给余静，接着又送一杯给妈妈，妈妈笑着说：

“先给爸爸喝。”

珍珍把最后一杯又送给妈妈。余静在杨健和戚宝珍两人眼光之下，感到自己说话也很困难，她便把话题转到珍珍身上：

“珍珍真不错，在家里帮助妈妈做事了。”

“小孩子从小要养成劳动习惯，不然，长大了就变坏了，看不起劳动。”杨健对余静说，“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呢？”

没等余静开口，戚宝珍代她说道：

“你哪能强迫人家说话！她要是有话，早就讲了。”

余静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很快告诉杨健，可能他有办法把她治好。她不管戚宝珍祈求的眼光，坦率地把刚才谈的告诉他，最后建议道：

“你看，要不要送到医院去？”

“你为啥要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你早就应该告诉我了，宝珍。”

“唉……”戚宝珍轻轻叹息了一声，有点怨艾的情绪：怪表妹终于透露了自己的病情，又恨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这病，到医院去也没啥办法……”

她的心怦怦地跳得很乱，仿佛有啥说不出的但是感觉到的东西堵在那里，呼吸有点急促，感到气喘没能把话说完，赶紧用手指一指枕头。他会意地连忙放下她的手，过去给她垫高枕头。她的呼吸好一点，心还是跳得很乱，可是她没有告诉他。他低下头去，小声和她商量：

“我看，还是到医院住两天，那里照顾比家里周到。我这两天厂里又忙，要开‘五反’检查总结大会……”

“没有关系，你忙你的，我在家里休养也是一样的。”

他抓住她的手，用着恳求的声调说：

“宝珍，你听我的话。”

她摇摇头，但脸色变得青里发紫。他不再征求她的意见，回过头去对余静说：

“你赶快打电话到医院去，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

余静出去打电话。

珍珍倒了茶以后，就懂事地站在床边，静静地谛听他们的谈话。听爸爸刚才急促的声音，和余阿姨匆忙跑出去，妈妈又闭着嘴不说话，她两只小眼睛焦急地望着妈妈。

妈妈对爸爸说：

“健，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道，我感到十分愉快。”她在心里想了很久的话，像是一条热情的激流，终于越过理智的闸门向他倾泻了，“叫我遗憾的是我为革命工作太少，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想初步实现了，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可是疾病拖着 我，使我不能把全部精力献给党。我对你的工和帮助

也很少，有时还要累你来照顾我，影响你的工作，我心里常常过意不去……”

她心头不舒服，涌到嘴上的语言不能顺畅地说出来，不得不闭上眼睛，稍稍停顿一下。他抚摩着她的手，安慰她：

“不要急，工作的时间长得很哩……”

“这个病根难治好了啊……”

“不要这样想，宝珍，听我的话。”

珍珍见妈妈闭上眼睛，低低地叫唤：

“妈妈……”

半晌，她睁开眼睛，又说：

“我啥都安排好了，家里许多事珍珍也会做一些，一些物事她晓得搁在啥地方，我没有别的牵挂，只是劳累你一些，又要在外边工作，又要管家，珍珍这孩子很聪明，希望她将来也学教育，当人民教师……我很……想你啊……健……”

她的语言有点乱，但是蕴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虽然是断断续续，但他完全懂得。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是他激动得竟不晓得说啥是好。她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可以不让她离开这个充满了希望和灿烂前途的祖国。他的眼眶有点润湿，视线也显得模糊了，怕哭声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不幸的预感。他忍住泪水，低声说：

“你不要焦急，我想一切办法给你医治……”

房间里的电灯光这时也失去了光彩，显得有点黯淡，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陈设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外不知道啥辰光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增加了深夜的寂寞，一阵阵呜呜的海风拍打着窗户，房间里越发感到寒冷和阴森。他用深蓝色的花毛巾毯子给她盖上。她的两只手放在外边，眼光还在房间不断望来望去，最后落在房门上。他以为她在寻找啥，便问：

“要啥？”

她摇摇头。

“要喝点水吗？”

她摇摇手。他发现她的眼光望着房门，立刻意识到是找人，问：

“找余静？”

她“唔”了一声。他刚要站起来去叫余静，余静轻轻从外边走进来了，怕惊扰病人，附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她在找你哩！”

余静屈着身子，冲着戚宝珍的面孔，轻轻地问：

“这会好些吗？表姐！”

表姐没有答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当当……当当当……救护车的清脆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一声紧一声的从弄堂口外传来。余静陪杨健一同把戚宝珍送到医院去。

56

沪江纱厂的饭堂今天变成了会场。

汤阿英和谭招弟来晚了一步，会场里已经挤得没有一点空隙，黑压压一片，到处是人。后来的人没地方坐，干脆贴墙靠门站着。谭招弟站在门口发愁，后悔来迟了，没有地方坐。汤阿英倒不愁，也不忙，她要谭招弟和她一同走进去看看。谭招弟跟着她挤进去，里面比外边宽绰一些，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汤阿英一眼看到秦妈妈和郭彩娣坐在那边，谭招弟和汤阿英挤进去坐下了。汤阿英的眼光对着临时高高搭起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主席大幅画像两旁，挂着两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钟珮文很吃力地找到的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给碧绿的叶子一衬，显得特别娇艳。主席台后面放了一排椅子，杨健坐在第三张椅子上，余静坐在杨健右边，眼光不时向台下四个角落扫来扫去，在看场子上

的人是不是到齐了。她看了看表，和杨健低声讲了两句话。台前挂了两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联写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联是：巩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上面一块横幅，也是红底白字，写着十四个大字：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台前左右两旁各放了三盏水银灯，工作人员在试验灯光距离，六盏水银灯同时打开，把主席台照得雪亮。台下的人的眼光都和汤阿英一样：注视着水银灯下的主席台，只有坐在右边第一排的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主席台。

徐义德在铜匠间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伤透了心。他没料到秦妈妈和汤阿英提供那许多线索，检举了那样多重要的材料，更没想到他的攻守同盟瓦解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想到勇复基这样胆怯的人，居然也跟共产党走，并且挖了他的底牌，把黑账当场交给杨部长。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胆怯的人变得勇敢了，心腹的朋友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了。那么，天下还有啥事可以相信的吗？还有啥人可以依靠的吗？当时梅佐贤虽然还没有开口，但从勇复基身上看出梅佐贤最后一定会开口的，郭鹏当然是更加靠不住的人物。徐义德对一切都怀疑了，连他家里的三位太太也是一样，林宛芝更加危险，不知道和余静谈了些啥。他心里想：那还有好话，

一定是揭徐义德的底。他把过去认为最可靠的人都一一想了想，认为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不是别人，是徐义德自己。他感到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形成一种瓦解他的巨大力量。他感到陷在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十分孤单。他这才真正想起杨部长第一天到沪江纱厂对他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和分量。他清清楚楚地看出只有坦白才可能挽回他将要失去的一切，再坚持抗拒下去，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会给他带来不幸和莫大的损失。上海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讲到做到。共产党既然讲坦白从宽，他相信决不是骗人的假话。如果能够不坦白，自然更划算；到了非坦白不可的辰光，那坦白比不坦白要划算。

他从铜匠间慢慢回到家里，认为一切都完了。林宛芝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是啥原故。他隐瞒了铜匠间说理斗争大会那一幕，只是说头有点痛，心里不舒服。她劝他早点上床休息，睡一个好觉就会好的。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唔，很容易，睡个好觉就好了。”

她听他的口气不对，连忙低下头问他：

“要不要请医生来？”

“医生治不好我这个病。”他摇摇头。

“那是啥病？”她歪着头问他。

他认为今天晚上是他一生最丢脸的一次，不愿意让她知道，也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徐义德在一切人面前都是一个有魄力有手腕办事无往不胜的能手，只有今天晚上败给他平素最看不起的工人手里。他料想不到连细纱间接头工汤阿英这个黄毛丫头也公然指着他的鼻子斗，逼得他步步退却，问得他哑口无言，未免太叫人难堪了。他不好意思把这些事告诉她。他要保持自己的威望和尊严。他咽下这口气。他怕她打破沙锅问到底，谎撒的不圆，就要露出马脚，改口道：

“我这个病不需要医生治，睡一觉就好了。”

“那快点睡吧。”

她离他远远的，不敢碰他，怕他睡不着。他躺在那里，紧闭着眼睛，却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一个数字在他脑筋里晃来晃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沪江纱厂整个资财当中除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还有多少呢？虽然凭良心讲，他坦白这个违法所得的数字并非虚报，可是为了这个违法所得也开销了不少啊，得到以后，自己也花去不少啊。现在哪里有这许多现款赔偿政府呢？想到这里，他又后悔刚才不该那样坦白，少坦白一点不是一样吗？接着又问自己：少坦白一点行吗？不行。坦白了，沪江纱厂再也不是徐义德的了，要变成政府的了，徐义德

落得两手空空的啦。他感到极度的空虚。他甚至于考虑到睡在自己身旁的林宛芝和这幢心爱的花园洋房，会不会也因此丧失呢？他想一定会。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呀，不是个小数目，到啥地方去拆这些头寸？别说现在“五反”，就在平常，也困难啊。数字不够，那还不要卖心爱的花园洋房吗？三个太太住到啥地方去呢？林宛芝仍然会跟着自己吗？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得不到肯定的解答。

她在他身旁睡熟了。她鼻孔里呼出一股股热气直向他脸上扑来。他干脆睁开眼睛，对着床头碧绿色的头灯发痴，喃喃地问自己：

“这些还是我的吗？”

然后他失望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传来一声声鸡叫，不知道是附近哪家的鸡打鸣了。徐义德微微感到一些倦意，知道夜已深沉。他熄去床头柜上的灯，上眼皮慢慢耷拉下来。

林宛芝早上七点半钟醒来，见他睡得呼呼打鼾，便轻轻起床，对着他的脸仔细地望了望，低低地说：

“睡得真好，多睡一会吧，昨天晚上一定是累了。”

徐义德一起床，又想起昨天铜匠间的大会，他紧紧皱着眉头。考虑今天要不要到厂里去。第一个念头决定不去，在家里痛痛快快地躺他一天；旋即想起这

样不对，坦白交代了不进厂，那杨部长他们也许会说徐义德消极对抗了。去吧，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头寸呢？如果立刻要缴款，啥地方来的这一笔款子呢？不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就不要了吗？他们不知道徐义德住的地方？余静自己不是来过的吗？徐义德不露面不行的。进了厂，说明徐义德积极，说明徐义德仍然是过去那个有魄力有胆量的徐义德，即使有啥事体，在厂里也好应付，丢脸也只是丢在厂里，家里人不知道，社会上的人也不知道。他下决心按时到厂里上班。

他坐了三轮车在厂门口下来，走进去迎面恰巧碰见杨部长从“五反”办公室走出来。他想：难道家里有内线打电话告诉杨部长，杨部长有意在路上等他吗？他设法躲开，可是只有那么一条路，往啥地方躲？他硬着头皮走上去，有意把头低下，装做没有看见杨部长的样子。杨健却偏偏向他打招呼：

“你早。”

“你早，”徐义德抬起头来应了一声，但接下去不知道说啥是好，只是嗨嗨地笑了两声。

杨健向他点点头，他也机械地点点头，没有言语。

“你上班真准时……”

“不，您来的比我更早。”徐义德的态度稍为镇静

了一点。他站在路上想快点走去，怕杨部长提到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块钱。可是杨部长站在对面不走，他也不得不站在那里了。

“不，我住在这里的。”

徐义德发现自己说话太紧张，竟忘记杨部长是住在厂里的，连忙安闲地改口道：

“对，我倒忘了。”他向杨部长上下打量一番，试探杨部长是不是在等他谈钱的事，说：“你这么早到啥地方去？”

“趁着没开车，到车间里和工人们谈谈。”

“哦。”徐义德放心了。

杨健要抢时间到车间去了解一下徐义德坦白交代以后的工人情绪，便和徐义德招招手：

“等一歇见。”

“好，等一歇见。”

徐义德坐在办公室在思索杨部长讲“等一歇见”的意思。他分析一定是和工人谈过话便来和他谈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问题，哪能答复呢？全部缴还现款？用沪江纱厂抵押？不足之数呢？卖房子？借债？他心里有点乱，啥事体也没情绪做，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等候杨部长到来。这天杨部长没来。他弄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杨部长也还没来。下午，余静来了。他以为杨部长派余静来和他谈钱的事。他生怕余

静谈到钱，主动地问她：

“这两天你们很忙吗？”

“不。”

“车间里的生产好吗？”

“好。”她出神地望他一眼。

“喝茶吧。”他送过一杯茶给她。

余静看出他神情不定，不等他再这样问下去，直截了当地说：

“告诉你一桩事体……”

余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生怕她提到那个问题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定了定神，勉强镇静下来，和蔼地问：

“啥事体？”他还没等她说出来，就想把话题岔开去，说：“是原物料问题吗？”

“不是的……”

“一定是钱！”他心里说：“这可糟了。”

余静说下去：

“我们打算明天开个‘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你在铜匠间坦白交代的那些问题，你准备一下，明天在大会上向全厂群众坦白交代……”

“就是这桩事体吗？”

“是的。”

“那没问题，”他庆幸余静没有提到钱，再坦白交

代一下并不困难。他高兴地说：“我准备一下好了。”

当时徐义德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回家一想，他又觉得问题极其复杂。余静讲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全厂群众参加，规模当然比铜匠间大的多。他记起那天晚上铜匠间的局面，确是生平头一遭。这次大会是全厂性质的，各个车间里的人都来，听见徐义德有这么大的五毒罪行，会轻轻放过徐义德吗？余静讲开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自己五毒行为少讲一点，行吗？参加铜匠间会议的人会不会不提出质问吗？一点不能少讲。全讲出来，工人能让自己下台吗？自己检讨深刻一些，提出保证以后不再犯五毒了，这样可以取得工人的原谅吗？有可能。他一个人蹲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写坦白交代的稿子。他在寻找妙法：既要坦白交代自己五毒的罪行，又要不引起工人的愤怒，还要深刻检讨，严格保证不再重犯，以博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这篇稿子写了两句就扯掉，重新又写，没写两句，还不满意，又换了一张纸。扯了十多张纸以后，一直写到快深夜三点钟，才算初步定稿了。

他回到林宛芝房间里，她正发出甜蜜的轻轻的呼吸声，睡得正酣。他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推开窗户，天上繁星已经稀疏了。上海的夏夜非常寂静，叫卖五香茶叶蛋的沙哑的声音早已听不见了，远方

传来赶早市的车轮的转动声。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特别清凉。

东方泛出鱼肚色，天空的星星更少了。他身上感到有点寒冷，便懒散地推上窗户，忘记拉上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慵倦地躺到床上去了。

早晨的刺眼的阳光射在林宛芝的脸上。她起来了，发现自己和徐义德都是穿着衣服睡了一宿，料想他睡的时候准是很晚了，给他轻轻盖上了英国制的粉红色的薄薄的毯子，自己坐在梳妆台面前悄悄地梳头，不敢有一丝声音惊扰他。

徐义德起来，穿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灰咔叽布的人民装。他吃了早饭，到三位太太的房间里去转了一转，向她们告别。

林宛芝送他到二门那里，站在台阶上，说：

“早点回来。”

徐义德很早就坐在会场右面第一排，他期待这个大会早点开始，好早知道会议的情况；但又希望这个大会迟点开始，仿佛预感到有啥不祥的前途，不愿意那不祥的前途马上就在眼前出现。他的心情很矛盾，低着头，外表虽然很安详，心里可老是在噗咚噗咚地跳动。

余静在主席台上非常镇静。她不止一次主持过大会，但总没有今天这样的持重和老练，坐在杨健旁

边，显得一切的事情极其有把握。她注视着台下的职工们，个个兴高采烈，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在等待大会开始。只有徐义德坐在右边第一排，失去往日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低着头，不声不响。徐义德今天的神态和职工的高昂的情绪，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对照说明历史起了伟大的变化：向来高高压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低下了头，而过去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真正地站了起来，掌握了全厂的大权，领导大家对他斗争。徐义德像是罪犯一样坐在被告席上，在等待判决。余静看到沪江纱厂的新生，她眯着眼睛微笑，心花怒放，眼睛老是从第一排右边一直望到后面。

司仪钟珮文用高亢的唱歌的嗓子宣布大会开始，赵得宝走到主席台上那张铺着红布的小桌子面前，看到右边第一排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头坐在那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感到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大会上讲话十分重要。他自从进厂以来开这样的会是头一回。他生怕遗漏了一个字，也怕台下的人听不清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声音非常清晰嘹亮，说明“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在杨部长正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厂职工同志们要加强团结，总结这次经验，巩固胜利，进一步在生产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的讲话几次给掌声打断。汤阿英的手掌几乎鼓红了。她听见钟珮文宣布现在由不法资本家徐义德坦白交代五毒罪行，立刻站了起来，眼光望着台前：一个胖胖的身影从她眼前迟缓地向台的右面走上去。会场两边布置好的水银灯全开了。上海市地方报纸的五位新闻记者从台的左边也走了上去。他到了台上，低着头，向台下恭恭敬敬地深深地一鞠躬，眼光却不敢向台下细看，只觉得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四面八方的数不清的眼光像水银灯似的都对着徐义德。徐义德从灰咔叽布人民装右面的口袋里掏出坦白具结书，往小桌上的那盆水红色的月季花后面一放，眼光紧紧对着坦白具结书。他双手下垂，声音低沉，有意把语气说得十分恳切，坦白交代了他的五毒罪行，最后说：

“我经营沪江纱厂曾犯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等四项不法行为，违法所得共有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元整。我做了许多丑恶事情，反映出资产阶级最卑鄙龌龊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利令智昏地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完全不了解只有坚定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真理。经过此番五反运动，挽救了我，给了我有着重大意义极大价值的一个教育。我过去是完全看错了，想错了，

做错了。我对人民政府仁至义尽的援助与扶植，恩将仇报。我现在除将违法事实彻底坦白交代外，决定痛改前非，决不重犯，并决心要加紧学习，深求改造。我愿以实际行动保证下列各项：

一、服从工人阶级领导，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国营经济领导；

二、决心搞好生产，决不借故推托破坏生产；

三、决不将物资外流；

四、保护本厂现有资财及生产设备不受损失；

五、对职工决不借故报复。

以上各点，如有违犯，愿受人民政府的严厉处分。

徐义德谨具”

徐义德念完了坦白具结书，木然站在那里，心里急速地跳动，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啥事体。赵得宝走到他的身旁，大声问道：

“这些都是你犯的五毒罪行吗？”

“是的。”徐义德低声回答。

“都是事实吗？”赵得宝又问。

“完全是事实。”

徐义德见赵得宝没有再问，料想没啥话说了，他机警地在坦白具结书上盖上了自己的私章。

可是赵得宝接着说话了，面向台下广大的职工

们：

“大家对徐义德的坦白具结书有意见吗？”

徐义德一听这句话，马上心惊肉跳。他对自己说：这下子可完了。他拿着坦白具结书尴尬地站在那里，在等待那心中早就料到而现在即将到来的事情。

秦妈妈霍地站了起来，说：

“有！”

赵得宝向她招手，她会意地向主席台上走去，站在小桌子面前，指着徐义德说：

“你贿赂税务分局驻厂员方宇，要他告诉你加税的消息。方宇告诉你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要加税，你连夜赶着在六月底出售两千件纱，这不是一般的偷税漏税问题，这是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这桩事体汤阿英在铜匠间大会上揭发了，你为啥轻描淡写地只说是偷税漏税呢？”

徐义德对秦妈妈先弯弯腰，然后恭敬地说：

“是的，是我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没有在坦白具结书上写清楚，是我的疏忽，我一定写上，一定写上。”

秦妈妈走下来，清花间老工人郑兴发走了上去，对徐义德高声问道：

“沪江纱厂的五毒违法行为这么严重，都是你指使的。在坦白具结书上，你为啥不保证今后不犯五毒

呢？是不是准备再犯五毒！”

“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吓得面孔微微发青。他原来想尽可能写得含混一点，不要引起工人的公愤，也给自己留点面子，但蒙混不过工人敏锐的眼光。他没法再给自己辩解，“在第一条里，我写了遵守共同纲领，以为包含了不再犯五毒，因为我所犯的五毒罪行是违反共同纲领的。不过，你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写上保证今后不再犯五毒违法行为更明确更具体。这一点，我一定写上，一定写上。”

徐义德一边说，一边向郑兴发直点头哈腰。接着又有几个职工提了意见，徐义德不得不一一接受，当场修改。赵得宝对徐义德说：

“现在你把坦白具结书送给工会主席余静同志。”

徐义德慌忙双手捧着坦白具结书，微微低着头，恭恭敬敬地送到余静的面前。余静从杨健身边迎上来，并没有立刻接下坦白具结书，她谨慎的眼光盯着徐义德圆圆的面孔，问：

“今后还要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吗？”

徐义德连忙摇头：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以后服从工人阶级领导吗？”她又问。

“服从，服从。”徐义德即刻点头。

余静接过徐义德的坦白具结书。

这时，新闻记者早就准备好了，对准余静和徐义德，咔嚓一声拍下徐义德保证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镜头。摄影师也不断选择镜头，拍制新闻纪录片。

余静在徐义德的坦白具结书上盖了章。工人代表汤阿英和职员代表韩云程也上台在上面盖了私章。台下顿时唱起《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连不会唱歌的汤阿英也激动地跟着一同唱了起来。她不懂得曲谱，也不完全会唱，但她热情地跟着大家一同歌唱。她心里非常高兴，有无数的话要说，可是语言一时也表达不出内心的激动，好像只有歌唱才能尽情地表达衷心的喜悦。庆祝胜利的高亢愉快的歌声唱了一遍又一遍，仿佛要一直唱下去，等到汤阿英走到主席台，大家知道她要讲话了，歌声才慢慢低下去。

细纱间和其他车间都推选汤阿英代表工人在大会上讲话。她再三推辞，还是推脱不掉，就去找余静，说明这个责任重大，希望另外推选一位，要求余静支持她的意见。余静不但不支持她的意见，反而支持大家的意见，认为汤阿英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越来越高，在五反运动中积极工作，上上下下，

厂里厂外，内查外调，揭露批判，忙个不停，贡献很大，是理想的代表。各个车间推选她代表工人发言，说明工人的眼光很准，选的恰当。余静一番话把汤阿英的脸说得绯红，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只是尽了应该尽的力量，同党与工人对她的要求来说，还差得很远。余静赞赏她的谦虚，鼓励她的干劲，要她准备发言。她不好再说，但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余静帮助她考虑发言的内容。余静同意了，却要她自己先准备，然后再一同商量。她回到草棚棚，一宿没有睡好，老是在思索发言的腹稿。她认为五反运动前后自己的发言，那只是个人的意见，讲的不好，说的不对，影响不大。现在要代表全体工人发言，责任重大呀！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好腹稿的梗概，慢慢才睡着了。一清晨，她就赶到厂里，把腹稿对余静谈了，等待余静指点。余静认为很好，无需增减内容。她得到余静的支持鼓励，信心更足了。她在夜校教室里，一句一句在想讲话稿，喃喃地念出，然后又从头想了一遍内容和次序。她一站到台前，望着下面许许多多工人对她寄予热望的眼光，想起徐义德做的那些坏事，心里十分愤恨；杨部长和余静领导“五反”检查队和全厂职工取得伟大的胜利又使她十分兴奋；她根据腹稿慢慢一段一段讲，充满了激情。郭彩娣和谭招弟她们听的非常亲切，内心感动，认为说出了她们心里

的话。汤阿英最后说：

“……徐义德办的沪江纱厂，五毒俱全：行贿干部，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还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真是无恶不作。他违法所得总共有四十二亿五千多万，这全是我们工人的血汗和国家的财富，都上了他个人的腰包。从这些五毒罪行来看，徐义德这几年向我们工人阶级进攻是多么猖狂！要是让徐义德这些资本家猖狂进攻下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巩固吗？不能！我们国家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吗？也不能！我们决不允许徐义德挖我们祖国的墙脚！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只准他们规规矩矩办事，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徐义德今天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保证，”汤阿英望着徐义德说，“你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彻底执行你的保证！”接着汤阿英的眼光转向会场上的全体工人，说，“我们工人阶级也有责任，要监督徐义德执行他提出的各项保证，决不让他再挖我们祖国的墙脚。我们工人阶级要抓牢印把子，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汤阿英一讲完，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停。

等掌声消逝，韩云程代表职工发言，表示他归队

以后，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一定要好好工作，来报答党和工会的信任和期望。他代表全体职员保证：一定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搞好生产。

余静很沉着地走到主席台前面小桌子那里，她垂着两只手，像谈家常似的代表全厂职工说话。她叙述了五反运动前后的简单经过，用来说明工人阶级觉悟空前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加强了。徐义德卑鄙污秽的手段和盗窃国家资财和黑幕被揭穿，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也给打退了，不可一世压迫工人阶级的威风也给打掉了。她祝贺在杨部长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说到这里，她回过头去，向杨部长点点头，代表全厂职工感谢杨部长的领导。台下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一阵又一阵地响个不停。最后，她说：

“全体职工要加强团结，努力学习，继续提高觉悟。向人政府保证：严密保护机器，搞好生产，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赵得宝宣读大会致陈市长的信，报告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胜利经过，保证“五反”与生产两不误，继续向胜利前进。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杨健。他两只手按着那张小桌子，眼光向台下群众望了一眼，才慢慢开始讲话。

台下鸦雀无声。他的声音不高，可是台下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听得非常清晰：

“……在这次伟大的五反运动当中，我们取得了三大胜利：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觉悟空前提高，工人阶级的团结大大加强了；其次是揭发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打退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第三是树立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杨健的话给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徐义德听见大家鼓掌，他也想跟着鼓掌，但是一想：自己哪能鼓掌呢？他低着头，静静地听。杨健很安详地站在台上，等掌声过后，接着讲下去：

“……这三大胜利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和‘五反’检查队的领导取得的，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陈市长亲自领导下，经过全厂职工同志们努力取得的。刚才余静同志说是在我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要在此更正。我们‘五反’检查队不过参加了这个工作，尽过一点点力量罢了。……”

余静听到这里，心里不同意杨健这种说法。她很清楚知道，确是因为杨健和“五反”检查队到了沪江纱厂以后，徐义德的气焰才慢慢退下去，工人的觉悟逐渐提高，扭转了过去工会工作多少处于被动的地位。她想站起来插上两句，但怕打断杨健讲话，而且

厂里的职工同志谁不知道杨健到厂以后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呢？

杨健讲话没有底稿，可是话讲得极有条理，就像是在读一篇条理分明语句动人的文章一样，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仿佛是从山上流下的泉水，清澈见底。他每一句话都说到人们的心里：

“……沪江纱厂的五毒违法行为是严重的，由于广大职工同志们的检举和工会同志不断的帮助，经过几次和徐义德谈话，他才坦白交代了他的五毒不法行为。他的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从何而来的？是压榨工人的血汗得来的，是他向花纱布公司偷工减料得来的，是盗窃国家的财富得来的。这证明资产阶级是怎样猖狂地向工人阶级进攻，我们应该不应该向他还击？”

台下爆裂开一个强大的声音：

“应该！”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杨健大声说。

全体职工激动地回答他的号召：

“对呀！对呀！”

“我向党、团、工会建议：要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水平，进一步增强团结，搞好五反运动和生产。”杨健的话语越来越慢，可是也越来越有力，说：“同时，

要发展党、团的组织，领导全体职工同志们监督资方执行他所提出的保证……”

台下全体职工同志们用热烈的掌声回答杨健的号召。

杨健等了半晌，台上恢复了安静，他说：

“徐义德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我们表示欢迎。徐义德今后应该坚决执行自己提出的保证……”

徐义德从右边第一排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向杨健点点头：表示一定坚决执行自己提出的五项保证。

“徐义德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好好生产。根据沪江纱厂违法的情形来看，是严重的，应该评为严重违法户，只要徐义德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我们可以向人民政府建议，从宽处理，提升一级，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徐义德坐在右边第一排向杨健一个劲点头，几乎杨健讲一句话，他就点一下头。最后杨健说：

“我们不要满足我们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在胜利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工作，扩大我们的胜利。让我们高呼：庆祝‘五反’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搞好生产！”

台下职工同志们跟着杨健一同高呼。一句叫完了，接着又是一句，无数张嘴巴发出热烈的相同的口号，形成强大有力的嘹亮的巨响，响彻云霄。有的职

工挥动着胳膊，有的站了起来，有的拥向主席台去……只有一个人向大门匆匆走去，她是谭招弟。郭彩娣站起来随大家向主席台拥去，一眼望见谭招弟满面怒容向大门走去，以为她又和谁吵架，想上去拉住她问个明白，谭招弟把手一甩，头也不回，便气生生地走出去了。

57

秦妈妈摸着汤阿英床上的床单问：

“这个花样可好呀，从啥地方买来的？”

这是花布床单，白底子，上面印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正在开屏的孔雀。这床单把草棚棚映得比过去都明亮了。

巧珠奶奶走过去，眯着老花了的眼睛对翠绿的孔雀尾巴，得意地觑了一眼，指着孔雀尖尖的红嘴说：

“是阿英买来的，听说是在你们厂附近一家百货店买来的。”

秦妈妈抬起头来望着灰白的墙壁回想了一下，说：“那一定是兴隆布店的。”

“谁知道是啥龙，——这床单我很喜欢，阿英可能会买东西哩。你看——”巧珠奶奶指着贴墙的那张漆得黄嫩嫩的心爱的小方桌说，“这也是她买来的。”

秦妈妈刚才进来不经心，没注意汤阿英家的摆设，给巧珠奶奶一指，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张小方桌确实很结实，又很美观。靠近小方桌的墙角落上放了一只木制的大红衣箱。墙泥笆不仅不再透风了，并且刷了白粉，因为天天在墙根烧饭，熏得有些发黑了。但比过去漏风的泥笆好多了，加上床上的床单一衬，显得草棚棚里光亮多了。秦妈妈从这些新东西上面，想起过去这草棚棚的情景，不禁脱口说出：

“巧珠奶奶，好久没到你们家来，可变了样了。要不是你在这里，我还以为走错了人家哩。”

“也没啥大变，还是那个老样子。”巧珠奶奶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非常高兴，她的眼光向草棚棚里巡视了一下，暗暗得意地说，“不过添了几样物事罢了，嗨嗨。”

“不，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啦。”

“真的吗？”巧珠奶奶故意反问，她的眼光忍不住又向草棚棚里每一件新买的东西扫一眼，想了一想，说，“唔，是有些不同了。现在工人翻身了，欠的债还清了，阿英她爹分了地，听说庄稼长得好，用不着阿英寄钱贴补了。我们的日子好过了，学海和阿英两

个人领了工钱，我们紧打细用，积蓄了一点钱，就添置一点。给你一说，我看看，比比从前，确实不同了哩。”

“大不同啦。”

“应该大不同嚟，上海解了放哩，以后的日子还要好过啊。”巧珠奶奶忽然变得好像懂很多新鲜事体了。

汤阿英蹲在草棚棚门口在洗衣服。秦妈妈来了，因为是老熟人，娘又在屋里，只是点了点头，要秦妈妈先进去坐一会儿，等她洗好了衣服再来陪。刚才巧珠奶奶和秦妈妈谈话，她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因忙着洗衣服，没有搭话。她听到巧珠奶奶最后说的那几句话，便歪过头来，对着巧珠奶奶说：

“现在你说对了，刚刚解放辰光，奶奶，你哪能讲的？”她笑了笑，装着奶奶的腔调说，“谁来了，还不都是做工，工钱还不是那些，日子哪能会好呢？”

“过去的事，说它做啥！”巧珠奶奶见秦妈妈坐在旁边，怕阿英再说下去，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阿英！”

汤阿英懂得奶奶的意思，可没有理会她，仍然说下去：

“知道过去，才晓得现在的好处。记住过去的苦处，才了解现在的甜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嘻嘻。”

巧珠奶奶辩解地说：“我过去也没说过日子不会好啊！”

“就是没信心。”

“人也不是菩萨，哪能晓得未来的事体呢？”巧珠奶奶反问一句。

汤阿英丝毫不让步。她倒掉洗衣盆里的肥皂水，把洗好了的衣服放在盆里，擦干湿漉漉的手，走进草棚棚，坐在板凳上，喘了一口气，说：

“现在的人啊，比菩萨还灵验。工人阶级领导了，掌握了印把子哩，日子当然一天比一天好过。菩萨不晓得，工人都晓得，——未来的事体哪能不晓得呢？”

巧珠奶奶平常不大出门，草棚棚外边的许许多多的事根本不知道。学海和阿英放工回来，觉得累的慌，吃了饭，坐一会，就躺到床上去了，很少有时间和巧珠奶奶谈点新鲜事。刚才阿英讲了这一大堆话，有些她是听得懂的，有些可不明白：啥叫工人阶级领导呢？这时候她也不好意思向阿英问个明白，反而装得很懂似的。她不同意阿英的意见，但也没有理由驳倒阿英，不满地叹了一口气，说：

“看你这个嘴利的，一点也不饶人！”

秦妈妈看她们婆媳两个刀来枪去地一句顶一

句，她插不上嘴，便坐在床上静静地听下去。她看到汤阿英身上发射出青春的光芒，一点也不让巧珠奶奶，怕婆媳两个说僵了，便岔开去说：

“阿英这张嘴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巧珠奶奶得了救兵，不等阿英开口，马上进攻：

“是啊，变了，解放了，把我这个老不死不放在眼里了。”

“奶奶，你说这些话是啥意思？”阿英一听这语气不对，连忙说明，“你在家，啥人不尊敬你老人家，我说错了，你尽管批评好了。”

“批评？我不懂你们这些新名词。”巧珠奶奶把头向里面一歪。

“那你讲我好了，骂我好了。”阿英说。

“现在不作兴骂人了，我敢骂你？”

秦妈妈插上来说：

“巧珠奶奶也进步了哩，——晓得现在不作兴骂人啦。”

巧珠奶奶发皱的有点灰白的面孔露出了深红色，她有点儿害羞，内心只有点儿高兴，谦虚地说：

“我啥也不懂，老糊涂了。别把我抬得太高，跌下来可不轻哩。”

阿英凑趣地搭上一句，来缓和一度紧张的形势：

“奶奶晓得的事体可不少哩。”

“哪里赶上你们年轻人！”巧珠奶奶心里头对阿英没有一点疙瘩。阿英放工回来，还要洗衣服烧茶饭，做了这样做那样，手脚勤快，从来没闲过，有好吃好穿的都把一老一小放在前头。讲话虽然不大饶人，只要奶奶脸色一不对，马上就改口，叫你跟她顶撞不下去。她这句话倒不是一般泛泛恭维的，却是出自内心的赞扬。她回过头来，仔细望了阿英一眼，忍不住嘴角上露出了愉快的笑纹。

“奶奶！”

外边猛可地飞进来一声清脆的像黄莺似的叫喊，接着是一个物体跑了进来，就仿佛是一阵风，扑到奶奶面前，举起小手里提着的重甸甸的物件，急忙忙地说：

“你看，你看！”

奶奶把那个物体抱到自己的身上，眯着眼睛认真看了看她，又看看她小手里的物件，然后说：

“我的小孙女给奶奶买猪肉回来了，真乖！”

奶奶的嘴唇紧紧吻着巧珠的额角头。

学海接着走了进来，看见巧珠提着猪肉坐在奶奶身上，立刻说：

“看你没规没矩的，提着猪肉就坐到奶奶身上去了，也不怕把衣服弄脏了。”

阿英接过去说：

“是呀，十岁的孩子啦，越来越顽皮，一点也不懂事，这丫头。”

巧珠给爸爸和妈妈说低了头，右手提着猪肉无力地放下，把小脸冲着奶奶的怀里，慢慢从奶奶的膝盖上滑下来，一声不响地站在墙角落那边，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里死命地咬，悔恨刚才不该坐到奶奶的身上，同时，又不满意爸爸和妈妈当着秦妈妈的面这样严厉斥责，叫她丢脸。

奶奶看到巧珠站在角落上发呆，她走过去把巧珠手里的猪肉放到贴墙的那张小方桌上，然后拉着巧珠坐在原来的地方。巧珠给奶奶这么一亲热，她的眼睛红了，有点润湿，害臊地用右手捂着眼睛。奶奶用自己的打满了补钉的黑粗布夹袄的角给她拭了拭眼泪，对着学海和阿英不满地说：

“看你们两个人把孩子弄哭了，做啥呀？”

巧珠听奶奶在给自己说话，更喜欢奶奶。她的面孔紧紧贴着奶奶的胸脯。

“太娇嫩了，连两句话都受不了。”学海完全不同意巧珠奶奶的意见，说，“将来长大了更不敢碰啦。”

“你们碰吧，碰吧，我反正管不了。”巧珠奶奶这两句话仿佛马上要把怀里的巧珠送出来给他们碰，而她的两只手呢，却把巧珠搂得更紧，并且对着巧珠的小耳朵低声地说，“别怕，有我哩。”

“小孩子吗，总是这样的，说过就算了，学海。”秦妈妈看巧珠奶奶脸色发青，认真生起气来似的，便转过脸去劝学海。她看见学海左手拿着一瓶烧酒，右手拎着一捆青菜和韭菜什么的，像一根木头似的站在那儿，两只眼睛瞪着巧珠，也在认真地生气。她忍不住笑了，对学海说：

“看你这么大的人，和孩子生起气来了，连手里的酒菜都忘记放下来，不累的慌吗？”

学海给秦妈妈一说，马上看看自己的手。他紧闭着嘴，可是也忍不住露出了笑纹，奇怪地说：

“你不提醒，我倒真的忘了。”

他走上两步把酒菜放在桌上。阿英讪笑地说：

“这么大的人，给小孩子闹糊涂了。”

“可不是么，唉。”

“天不早了，该做饭了。今天叫秦妈妈来吃饭，别叫她饿肚子。”

阿英走到方桌面前准备拿菜去摘，巧珠奶奶拦住她的手，说：

“你去把洗的衣服晒了吧，我来做饭。”

“对，”秦妈妈说，“阿英，你去晒衣服，我帮巧珠奶奶做饭。”

“也好，你们先动手，我晒了衣服就来。”阿英走出了草棚棚，拉了一根麻绳拴在对面的草棚棚上，把

衣服过了一下，一件件晒在麻绳上。

做好了饭，奶奶忙着把红烧猪肉和百叶炒肉丝这些菜端上桌子，催大家趁热吃。学海斟酒，让秦妈妈坐下。秦妈妈坐下，并不动箸子，要巧珠奶奶来一同吃。巧珠奶奶不肯，叫他们先吃。大家都要等巧珠奶奶。巧珠过去把奶奶拉来。全坐好了，学海举起杯来，对大家说：

“来，我们痛痛快快地干它一杯！”

今天恰巧学海和阿英都不上班，昨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商议好了，今天要吃它一顿。因为徐义德在“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上向工人阶级低头认罪，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喜事，要庆祝一番。阿英到上海来，全靠秦妈妈照顾，进沪江纱厂又是秦妈妈介绍的，她提议把秦妈妈请来，学海完全赞成。今天一早秦妈妈就来了，不知道学海忽然为啥请客。到了他家以后，见没有外人，便没有问起。现在听学海说“痛痛快快地干它一杯”，就问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不是。”

“是你的？”秦妈妈的眼睛望着汤阿英。

“也不是，”汤阿英想起今天没有告诉秦妈妈为啥请她来吃饭，说，“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大家的生日？”秦妈妈的眼睛里闪出怀疑的光

芒。

“是的，我们大家的生日，”汤阿英肯定地说，“你忘记‘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了吗？”

秦妈妈懂得汤阿英的意思了，举起酒杯，和学海他们碰了碰杯，笑着说：

“对，我们大家的生日，来，痛痛快快地喝一杯！”

学海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用空杯子对着秦妈妈。秦妈妈的嘴唇只碰了碰酒杯，喝了一点，皱着眉头，再也饮不下去了。

“干杯！”学海催促她。

“我不会喝酒，学海，你还不晓得吗？”

“刚才你自己说的痛痛快快地喝一杯……”

“慢慢来，这杯酒我喝完了就是。”

学海不再勉强她喝。巧珠从板凳上站了起来，指着学海面前的烧酒瓶说：

“我也喝一杯，爸爸。”

奶奶立刻瞪了她一眼：

“不准，小孩子不准喝酒。”

“唔……”巧珠不满意奶奶，她的两个小眼珠向奶奶瞅了一下。

这回是爸爸满足了她。学海用箸子在酒杯里沾了一点酒，送到她的小嘴里，说：

“好，你也尝一点。”

“看你把孩子宠的……”奶奶不赞成孩子养成喝酒的习惯，也不同意别人满足巧珠的要求。

“今天让大家高兴高兴，尝这么一点酒，算啥。”

“对，高兴吧。”奶奶不满地说。

巧珠的眼睛盯着爸爸的箸子。学海说：

“当然要高兴，是大喜事嘛。”

阿英接上去说：

“过去余静同志说什么工人阶级领导，老实说，我不大懂，也不晓得哪能领导法。这次‘五反’，我可明白了，晚上想想，越想越开心。”

“是呀，”秦妈妈接着说，“我活了四十多岁了，做了几个厂，从来没有看过老板这样服帖的场面。徐义德这样服帖，我看是他一生一世头一回……”

“当然是头一回，”学海兴奋地说，“过去他在沪江厂，大摇大摆，哪里把我们工人放在眼里！现在，哼，不行了，得听我们工人的领导。”

“我们工人要领导，这个责任可不小呀，以后啥事体都得管啦。”

秦妈妈听阿英的口气有点信心不足，她不同意阿英的看法，很有把握地说：

“怕啥，过去厂里的事，哪件事不依靠我们工人？没有工人，厂里生产个屁！”

巧珠奶奶听不懂他们在谈啥，但是知道老板徐

义德服帖了，工人抬头了，她惊奇天下竟有这样的
事！他们谈话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凝神地在谛听。

“对呀，我们有工会，有区委，上头还有市委，我
们工人要大胆负起领导责任，搞好运动和生产，监督
资方。”

“对！一点不错！”秦妈妈完全同意学海的话。

学海眉毛一扬，给大家斟了酒，端起杯子，站了
起来，大声地说：

“来，再干一杯！”

秦妈妈和阿英站了起来，巧珠和奶奶坐在那里
没动。学海把巧珠奶奶拉了起来，说：

“娘，你也和我们干一杯，高兴高兴。”

“我也来凑个热闹……”巧珠奶奶举起了杯。

你碰我的杯，我碰你的杯，发出清脆的愉快的响
声。

忽然有一个中年妇女一头闯了进来，看见大家
兴高采烈地在碰杯，一脸不高兴地说：

“你们倒高兴，碰杯哩！”

阿英回过头去一看，见是谭招弟，开玩笑地说：

“你的鼻子真尖，今天忘记请你，你自己却赶来
了。”

秦妈妈也回过头来，望了谭招弟一眼，说：

“她吗，鼻子比猫还尖哩，啥地方有吃喝，总少

不了她。”

谭招弟把脸一沉，生气地说：

“我呀，早吃过了，才没有心思吃你们的饭哩。”

汤阿英听出谭招弟话里有话，没再和她开玩笑，认真地问她：

“招弟，你又发啥脾气哪？”

“啥脾气？你不晓得吗？”谭招弟看到啥事体不满意，以为天下人都应该和她一样的不满意。

“我也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哪能晓得？真奇怪。”

“昨天你没有参加总结大会吗？”

谭招弟虽然开了一个头，可是汤阿英仍然莫名其妙，反问她：

“昨天我们两个人不是一道去参加的吗？”

“那就对了。”谭招弟的气还没有消。

“招弟，有话好好说，”秦妈妈站起来，拉着谭招弟的手说，“阿英和你也不是外人，那么熟的姊妹，有啥话不能慢慢说？”

“秦妈妈说的对，”巧珠奶奶放下手里的筷子，也插上来说，“你对阿英有啥意见，讲出来，我来给你们评理。”

谭招弟见大家上来劝解，气平了点儿，语调也缓和了些：

“我对阿英没啥意见……”

她这一讲，大家全不明白了，异口同声地问：“对啥人有意见呢？”

每一个人都以为谭招弟对自己有意见，又不好明说，只是把眼光停留在她脸上，注视她的表情，大家不言语。谭招弟也没言语，沉默了半晌，谭招弟低声地说：

“杨部长。”

汤阿英立刻想起昨天散会的辰光，谭招弟忽然一个人溜走了的情形，诧异地问她：

“你这个人啊，对啥人都有意见，——杨部长啥辰光得罪了你？”

谭招弟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你为啥对他有意见？”秦妈妈把谭招弟往床上一拉，说，“你坐下来，给大家说说清楚。”

谭招弟觉得已经点明了，奇怪大家为啥还不清爽，问：

“你们不晓得？”

秦妈妈说：“晓得了还问你？”

谭招弟昨天听了杨部长最后的讲话，心中非常不满意，不等他讲完就想站起来走出会场，一想前面坐着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左右挤满了职工同志们，没散会一个人先走不大好，按捺下心头的愤怒，好容易等杨部长讲完，便撅着屁股走了。她回到家里怎么

也想不通，横想竖想，都认为杨部长讲的不对，躺到床上迷迷糊糊睡去，才没想。今天起来，收拾收拾，吃过中饭，便奔来找汤阿英。她以为汤阿英也不满意杨部长的讲话，一定也在家里生气，准备和她痛痛快快地诉说一番。她没想到她们在碰杯喝酒，真叫做火上加油，气上生气，忍不住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讲话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我们早巴望，晚巴望，好容易巴望到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来了。我们职工动员起来，打破顾虑，扯破脸皮，给徐义德这些坏家伙斗，早斗，晚斗，把徐义德斗服帖了，总以为该赶走徐义德，让我们工人出头露面了。啥人晓得不单是不赶走徐义德，还要他戴罪立功，从宽处理，还要提升一级，你说天下有这个理吗？”

她的面孔朝秦妈妈望着，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肯定答复。这问题秦妈妈没有想过，突然给谭招弟一问，倒叫她愣住了，一时回答不上来。汤阿英认为杨部长不错，她知道杨部长是区委的统战部长，代表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来的。他讲的话一定不错。她说：

“杨部长讲话一定有道理……”

谭招弟不等她说下去，拦腰打断，气冲冲地问：

“啥道理？他要我们扯破脸皮斗，斗服帖了，啥戴罪立功呀，啥从宽处理呀，啥提升一级呀，他做好

人，我们做坏人，就是这个道理吗？”

“话也不是这么说……”这是学海的声音。

“哪能说？”谭招弟一点不让步，顿时顶上一句。

“杨部长代表区里来的，”汤阿英说出自己的意见，“一定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管他谁的意思，我就是不同意这样做。”谭招弟摇摇头，说，“杨部长啥都好，就是这点不好。”

秦妈妈坐在床上想了一阵，反问谭招弟道：

“把徐义德斗服帖了，不叫他戴罪立功，难道要把他赶走吗？”

谭招弟心里说：“那当然哪。”

“我们党现在的政策，并不没收私营企业，这个厂还是徐义德的啊！”

谭招弟听秦妈妈一说，头脑忽然清醒过来，觉得把徐义德赶走不符合党中央的政策呀！可是她嘴上还转不过弯来，并且想到从宽处理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要重重处罚才能出心头的那口气。她说：

“我想不通！”

巧珠奶奶见谭招弟一进来，弄得大家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桌上的酒菜都快凉了，而她们的谈话呢，还没有尽头，忍不住插上来说：

“招弟，不管通不通，先来吃点儿吧。”

“不，我吃过了。”

“那么喝一杯……”汤阿英让谭招弟坐到桌子旁边来。

巧珠对谭招弟说：“阿姨喝酒，阿姨喝酒。”

谭招弟半推半就地坐在汤阿英旁边。学海给谭招弟斟了一杯酒，说：

“酒都凉了，快喝。”

谭招弟端起酒杯，想起杨部长的讲话，又放下杯子，说：

“我一定要找余静同志问问清爽。”

“找杨部长也可以，”学海举起杯子，说，“先喝了这杯……”

谭招弟又端起杯子，送到嘴里，一口把满满一杯酒喝得干干净净。她放下酒杯，刚要坐下去，发现草棚外边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左手里提着两个四四方方的纸盒和两筐子的面筋，背有点儿驼，觑着眼睛，东张张，西望望，像是在找人。她不禁脱口大叫了一声：

“有人……”

大家的眼光都随着谭招弟的惊诧的声音向门口望去。阿英一见那人立刻放下手里的箸子，奔了出去，紧紧抓住那人的手，注视那人的脸，她的眼眶里有点儿润湿，半晌，才激动地叫道：

“爹，你哪能来的？”

学海看见阿英跑出去和那个人这样亲热，他有点莫名其妙，听到阿英叫唤的声音，才知道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丈人来了。他走了出去，亲热地叫了声：

“伯伯，里面坐……”

汤富海给他们夫妻两口拥着走进了草棚棚，阿英给爹介绍了草棚棚里的人以后，欢喜地问：

“你事先为啥不写封信来……”

一提起信，汤富海心里就不高兴，他沉下脸来，瞪了阿英一眼：

“写信有啥用？人家不肯来，只好我自己来了。”他看了看草棚棚的陈设，气呼呼地说，“在上海过舒服日子啦，把乡下老头子忘哪。要是写信告诉你，怕不欢迎老头子来哩！”

从爹的口音里，猜想出来一定是因为没有回乡下去，引起爹的不满，怪不得复了他的信过后，一直没有信来哩。她急得脸涨的绯红，慌忙解释爹的误会，说：

“因为‘五反’，厂里忙的不行，实在走不开，哪能会把你忘记哪。早两天，还同学海谈起你们哩，见没有信来，正想写封信问候你，——你为我们儿女吃辛受苦，我们没有一天不想你的！你先来封信说啥辰光到，我和学海好去接你……”

阿英说到后来，声音低沉，语调里含着受了冤枉似的。她的眼角上滚下一粒粒的透明的泪珠，呜咽地再也说不下去了。学海接上去说：

“伯伯，阿英可想你们哩。早两天还给我商量，想等‘五反’结束，就到无锡去看你们，没想到你自己来了。说实话，我也想去看看你和阿贵弟弟哩！”

“哦！”汤富海觉察到有些错怪了好人，原来他们都想着他哩。但是上次写信要他们回家，他们推说“五反”忙，走不开。他认为不对。今年是个欢喜年啊！他还想讲阿英几句，出出积压在心里的闷气，见阿英低着头流眼泪，话到嘴边又不忍再说了。

秦妈妈看他们三个人僵在那儿，起初摸不着头脑，后来知道了是这么回事，便从旁解说：

“为了‘五反’，很多人都没回家，不是阿英一个人，富海，阿英是个好姑娘，常常想起你们。解放前不能回去，蹲在我屋里把眼泪都哭干了。”

刚才富海气冲冲走进来，一个劲盯着阿英，有时也暗中望学海一眼，心中怀疑别是他拖着阿英的后腿不让她回家去，忘记感谢秦妈妈这些年来对阿英的照顾，给秦妈妈一提，他才想了起来，拱拱手，笑着说：

“她们母女俩到上海来，承你关照，又给阿英介绍进厂，结了婚，不晓得应该哪能谢谢你才好。”他

把左手里的礼物分成两份，一份送到秦妈妈手里，衷心感激地说，“一点肉骨头和面筋，算不得啥礼物，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谢谢你。我好几年没有吃家乡这个东西了。”秦妈妈接过去，想起当年阿英母女到上海的狼狈样子，对朱暮堂的仇恨还没消，她问，“听说朱暮堂枪毙了，是吧？”

汤富海扬起眉毛，说：

“一点也不错。”

“他老婆儿子呢？”

“在管制劳动。”

“那太便宜他们了，”阿英回忆从前受他老婆的虐待，说，“也该枪毙！”

“是呀，应该枪毙。”秦妈妈想起朱半天一家那些血债，同意汤阿英的意见。

张学海插上来说：

“政府办事不会错，该枪毙的活不了，不该枪毙的死不了，这里有政策。”

“把他一家枪毙了才出了我心头这口气。”汤阿英说。

“那可不是么。”汤富海赞成女儿的意见，说，“唉……”

谭招弟见他们谈开了，就打断他们，说：

“这些事慢慢谈吧，先吃饭吧。秦妈妈，肉骨头现在就打开来，大家吃吃，好不好？”

“好的，好的。”秦妈妈一边说一边真的打开了。

学海见谭招弟把话题岔开，草棚棚里早一会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了，连忙走到桌边，加了一张凳子，对汤富海说：

“伯伯下火车一定还没有吃东西，先随便吃点吧。我去打点酒来。”

汤富海拦住他的去路，摇摇头，说：

“不用打酒了，就吃点饭吧。”他手里另外一份肉骨头和面筋递给学海，说，“这个送给你们。”

“谢谢，伯伯。”

学海把肉骨头和面筋交给娘：

“秦妈妈的让她带回去，吃我们这份好了。”

巧珠奶奶没料到亲家头一趟见面差点闹得大家不痛快，虽说是说他的女儿，但是在自己的草棚棚里呀！别的不说，总得看看她的面上啊，也不是她不让他们小夫妇两个回去，是厂里“五反”绊住了脚。她尽量忍住，看这位亲家脾气到底有多大。幸亏秦妈妈几句话说开了，她脸上一度绷紧的发皱的皮肤松弛了，但讲话的声音却有点冷冷的：

“这点道理也不懂？当然吃我们的。”

阿英拭去眼角的泪水，给爹倒了杯茶来：

“先喝点水吧。”

“唔。”爹看阿英长的个子比过去高了，身上长的比过去丰满，两根长长的辫子已经剪掉了，从额头披下的几绺乌而发亮的刘海短发梳上去了，鸭蛋型的面孔完全露出来了，皮肤白里泛红；一对眼睛比过去更加机灵有神，流光四射；身子更加结实，却不臃肿，浑身洋溢着健壮的活力，在厂里做起生活来一定呱呱叫。她身上穿的那件月白色的细布褂子，配上那条玄色的府绸裤子，显得素净大方，想来日子过的不错。阿英比他想象中的女儿还要聪敏能干，多亏秦妈妈的帮助和领导。他看女儿长的俊秀和那一身打扮，心里得到安慰，高兴地微微露出了笑意。他有意不给女儿写信，总以为女儿一定会写信来赔罪的，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他本想写信骂她几句，但还是见不到怀念着的女儿和女婿。他不知道女儿在上海也等他的信哩。老头子毕竟放不下女儿，想了几个晚上，无可奈何地对阿贵说：“你姐姐不来，只好老头子去了。”阿贵早就劝爹别生气，想看姐姐，到上海去一趟也一样。爹现在提出来，他当然十分赞成。他原要和爹一同来，因为家里没人不行，他就留下来了。爹喝了一口茶，又看看女儿，心头的气已消了大半。

巧珠一见汤富海这位陌生人，就躲在奶奶怀里，不敢瞧他；再听见他和妈妈吵嘴，更吓得头也不敢抬

了。阿英伸手过去把她拉出来，指着爹对她说：

“也不是外人，怕啥？叫爷爷。”

巧珠一对黑宝石似的眼睛望了爷爷一眼，生怕碰到爷爷，立刻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两只小手，低低地叫了一声“爷爷”，点了点头，披在两个肩膀上的辫梢的红蝴蝶结子跟着动了动，就像是要飞起来似的。

爷爷看到站在面前的巧珠，长的健壮，仿佛像个男孩，圆圆的脸庞却十分清秀，含羞地微微低着头，偷偷看了爷爷一眼，又不好意思地把头转过去。听到她清脆的叫声，他心头充满了喜悦，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的皱纹里也露出了笑意。他托着她的小下巴，微微把她的脸抬了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赞不绝口地说：

“长的模样儿不错，真俊，往后一定有出息……”

奶奶见亲家喜欢巧珠，刚才引起的不满情绪也逐渐消逝了，搭上去说：

“这孩子将来不会像我们这辈人受苦啦，要享福哪。”

“那自然……”爷爷的右手向怀里掏去，好像要拿啥物事，手伸到怀里却又停住了，眼光还是注视着巧珠，逗她说，“巧珠，爷爷送你一个好玩的东西，你

猜，是啥？”

“响螺？”她想起在弄堂口看见过有人玩这个。

“啥？”爷爷不晓得啥是响螺，给阿英一说，他才了解；他摇摇头，“不是，是这个……”

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惠山出品的女娃娃，肥肥胖胖的，上身穿着金花红袄，下边穿着的是苹果绿的裤子，头微微歪着，一对圆圆的眼睛注视着手里那只展开翅膀想要飞去的和平鸽。爷爷送到巧珠手里。巧珠学那个女娃娃抱和平鸽的姿势抱着女娃娃。阿英对巧珠说：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爷爷把巧珠拉过来，抱在怀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儿，笑着说：

“真是乖孩子！”

“吃饭吧，亲家。”巧珠奶奶在汤富海面前加了一双碗箸，说，“饿了吧？先吃点小菜。”

“还好，还好，”他夹了一箸子的肉丝百叶，想起阿英她娘，转过脸去，对阿英说，“今天下午有工夫吗？”

“有。”

“买点香烛，带我到你娘坟上去看看。”

“好的。”

“我也去。”学海说。

“那好么。”富海把那箸子的肉丝百叶往嘴里一放，觉得这菜特别香。

58

徐义德在客厅里大声喊叫：

“人呢？人呢？”

第一个应声出来的是老王，他手里捧着一个福建漆制的茶盘，里面摆着一杯热腾腾的祁门红茶，放到客厅当中的那张矮矮的小圆桌子上以后，弯了一弯腰，笑脸向着徐义德，说：

“老爷，她们在楼上。”

“请她们下来，快。”

“是，是是，……”老王来不及放下茶盘，匆匆上楼去了。他懂得谁是老爷心上最爱的人，揣摩老爷的心思，先叫林宛芝，再叫朱瑞芳，最后才叫大太太。

林宛芝一听说徐义德回来了，拔起脚来就走，像一阵急风似的，从楼梯上跑下来，冲到他面前，欢天喜地叫道：

“你回来了，义德。”

徐义德站在三角大钢琴旁边，面对着墙角落的那盏落地的立灯，望着柔和的电灯的光芒，在等待她们下来。他看见林宛芝冲到他面前，一把抓住她的手，劈口就说道：

“我过关了，我过关了。”

林宛芝不解地皱起眉头，两只眼睛盯着徐义德微笑的肥胖的脸庞，问：

“啥关呀？”

“我过关了。”徐义德一把搂着林宛芝，他高兴自己回到了家，回到林宛芝的身边，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又说，“我过关了！”

“看你那个高兴样子，”她伸出涂了红殷殷美国的寇丹的右手食指在徐义德的腮巴子上一划，说，“啥关呀？”

开完了“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徐义德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杨健就走了进来。徐义德最初大吃了一惊，他想：刚开完了会，怎么又来了，难道又出了事吗？他的心急速地跳动，态度却很镇静，不过面部皮肤有点紧，嘴角上浮现出勉强的笑纹，用他那肥胖的手指向长沙发上一指：

“请坐。”

杨健察觉出徐义德态度不大自然，神经还是相当紧张，立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今天坦白交代的不借……”

徐义德一听杨健用徐缓和蔼的语气鼓励他，他面部的皮肤放松了，向杨健屈着背，抱歉地说：

“我应该早坦白交代我的五毒……”

“只要坦白交代，不论迟早，总是好的。”

“老实讲，杨部长，现在我才完全体会你刚到我们厂里讲的那些政策……”

徐义德说到这儿就停下，在等待杨健严肃的责备。杨健不仅没有责备，并且说：

“资本家体会党和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容易的，要有一定的过程，没有一定的过程，不会有深刻的认识的。就拿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来说吧，也有过程的，不过，有的人时间短些，有的人时间长些……”

“这一次幸亏杨部长的帮助、指示，不然的话，我不会有这样的体会……”

“这不是我个人的帮助，这是大家的力量，当然，其中也包括你个人的觉悟……”

“我？”徐义德的脸红了，连忙否认说，“谈不到，谈不到。”

“你提的保证也很具体……”

“这是起码的……”徐义德微笑说。

“保证不在多，要彻底实行。”

“那当然，那当然。”徐义德心里想：杨部长一定

是要他口头再保证一下，他接着又加了一句，“我一定保证彻底实行，这一点，请杨部长放心好了。”

“我们相信你会实行。”杨健没有对这个问题再谈下去，把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说，“你自己问题搞清楚了，我希望你立功，帮助别的人……”

徐义德发现自己又猜错了，原来是要他立功，于己于人都有利，何乐而不为，立刻说：

“只要有机会给我，杨部长，我一定立功。”

“机会多得很……”

“你啥辰光通知我，我就去。今天？明天？都行。”

“今天你该回去休息休息了。”

“不，我的身体行。”

“这个事不忙，以后有机会再去。”杨健见他松弛了的情绪又有点紧张了，岔开去说，“你最近要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厂里的生产问题？”徐义德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从杨健的嘴里提出来，他又觉得十分惊奇。他问自己：以后厂里的生产还要徐义德管吗？不。杨部长讲的这么肯定，又不容他怀疑。他点点头说：

“杨部长指示的对，‘五反’过后，应该考虑生产问题……”

“你办厂多年了，厂里生产情况你都了解……”

“了解的也不多，要靠党和工会的领导。”徐义德

说，“以后还希望杨部长多多指示。”

“那没有问题，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帮助。”

“只要你肯领导、支持，那厂里啥事体都有办法。”

“主要还得依靠厂里的全体职工同志们……”

“那当然，那当然。”

这一次会见，徐义德感到愉快。杨健走出去，他果然考虑厂的生产问题。但考虑了一会，还没有个头绪，他想起该回家了。他出了厂，先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个照，然后才回到家里。

林宛芝刚才问他啥“关”，他望了她一眼，那意思说：这还不晓得吗？等了一会，见她的眼睛还是盯着他，便说：

“啥关，‘五反’的关呀！”

“你坦白交代了吗？”

“唔。”

“杨部长他们相信了吗？”

“当然相信。”他说，“我的五毒都讲了，那还不相信？再不相信？我只好报假账了。”

“你哪能想起今天坦白交代的？”

“我想，迟交代，不如早交代。”他简简单单地说，“我看差不多到辰光了，我就坦白交代了。”

“是向少数人坦白交代的吗？”

“不，他们开了个全厂大会，我在上面坦白交代，”说到这里，他眼睛滴溜溜地向四下张望，好像担心地在看会场里的工人群众说，“全厂的人们都参加了……”

“哦，”她挨着他的身子问，“大家都没意见吗？”

“多少有一点，不过只要领导上同意了，工人提得出啥意见来。”他故意装出得意的神情，声音也跟着高了起来，“开完了会，杨部长还来看我……”

“杨部长拜访你？”她眼睛里露出惊奇的光芒。“谈啥？”

“谈得很多很多，——他要我领导厂里的生产……”他改变杨健的原话，一边卖弄关子，一边撒谎。

“你哪能回答？”

“我接受他的要求。这个厂是徐义德的，本来应该由我来领导生产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叫她听不出来是谎言。

“过了关就没事了吗？”

“过了关当然就没事了。”

“真的？”

“谁还哄你。”

“亲爱的……”她一句话没说完，涂着美国探奇口红的嘴唇就紧紧亲着他的肥肥的腮巴子。

他见她对自己这样亲热，立刻想起那天从钥匙

孔里看到她和冯永祥的那股浪劲，心头涌上无比的愤怒，恨不能痛痛快快地给她一巴掌，又怕让大家知道，他便木然地站在那里让她亲自己的腮巴子。

“真不要脸！”

这是朱瑞芳的愤愤的声音。老王来叫她的辰光，她正劝守仁：

“你也这么大了，应该懂事啦。”

守仁昂着头说：

“我当然懂事，我啥都懂，飞檐走壁，打枪骑马……没有不懂的。”

“你这样下去，哪能得了？”

“我吗？”守仁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挺着胸脯说，“将来一定成为一个英雄，你就是英雄的母亲了，说不定新闻记者还要来访问你哩。”

“我也不想做英雄的母亲。”她想起他偷东西的那些丑事，心里很难过，讲话的声音变得忧郁而又低沉，“只要你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就满意了。”

“我不是个平凡的人。我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

她瞟了他一眼：“就凭你这样！”

他端详一下自己，耸耸肩膀说：

“我这个样子不错呀！”

她看他那副神情又好气又好笑。说不出话来，只

是“唔”了一声。

“你以为我不行吗？”

“行，当然希望你行。你能做英雄，做爹娘的还有不欢喜的吗？我连做梦都盼望你真的能干一番事业，也给我脸上涂点金……”

“那没有问题。”她的话还没讲完，他就得意地接过去说。

“不是要你真涂金。只要你学好，别叫我生气，也别丢你爹娘的脸，这就好了。”

他把过去的事忘记得干干净净，即使记得一些，他也不以为那些事会丢爹娘的脸，反而以为是自己有本事，能干。不是徐守仁，别人能做出来吗？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啥辰光丢过你们的脸？”

“啥辰光？你自己晓得。”她想不到他赖得一干二净，气的鼓着嘴，说不下去。

他泰然自若地说：“我晓得：没有。”

她想起这一阵闹“五反”，徐义德整天老是愁眉苦脸，提心吊胆过日子，今天出去了一整天还没见回来，更是叫她放心不下。家里唯一的男人就是守仁，徐义德唯一的继承者也是守仁，而她是守仁的亲生的娘。她对守仁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偏偏守仁这不争气的孩子老是丢她的脸。想起来，她好不伤心。她声

音有点暗哑，语重心长地劝他：

“你做的那些事体，以为我忘了吗？守仁，别和那些人鬼混，你好好念书，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好了。你爹这份产业，将来还不全是你的。”

“将来是我的，现在可不是我的。”

“你还年青，交给你也管不了。”

“那倒不一定。”

“你现在应该好好念书。”

“这容易，只是头脑子里装不下去。”

“你野了，收收心，就装下去了。”

“念书，没钱不行。”他心里想：娘开了口，要钱会容易了。

“要多少我给你好了……”

老王在外边敲门，她应了一声：“进来。”

“老爷回来了，请你们下楼去。”老王站在门口说。

“一会就来。”她点点头。

“是。”老王知道二太太在训子，不方便多留，连忙退出，带上门，去叫大太太。

朱瑞芳一想今天也谈不完，留待以后再劝他，站起来，拉着守仁的手，说：

“走吧。”

他站在那里不走，向娘伸出一只手来。她不懂地

问他：

“做啥？”

“钱。”

“待会再说。”

“不，你给我一百万。”他伸出一个手指来说。

“先下楼去，回来给你。”

守仁一听母亲答应了，欢喜得跳了起来，按着她的肩膀说：

“好，好好。”

“看你这个高兴样子。”

母子两人向楼梯那边走去。朱瑞芳还没下楼，就听见林宛芝娇滴滴的声音，她马上把脸一沉，心里想徐义德回来先和林宛芝谈好了才叫她，便拉住徐守仁的手，不满地低声说：

“别下去。”

他差一点走下楼梯，给娘一拉，慌忙退回来，掉转头，问：

“做啥？”

“小声点。”

他吃了一惊，伸出一条红腻腻的舌头，旋即又缩回去，走到娘面前，附着娘的耳朵，轻声地问：

“啥？”

娘没有直说，只是用手指向着楼下客厅的方向

指指。他歪过头去，侧耳谛听，知道爹和林宛芝在谈话。他会意地点点头，屏住气息，站在娘身边一动也不动，听楼下在谈。

没有一会工夫，大太太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过来。朱瑞芳迎上去，对着大太太的耳朵嘀咕了一阵，大太太一边凝神地听，一边眼睛愤愤地瞪着楼梯下面，随着朱瑞芳一步步向楼梯口轻轻移去，可并不下楼。林宛芝每讲一句话都叫朱瑞芳生气，恨不能下去给她两记耳光。等到她亲密地叫一声“亲爱的”，朱瑞芳实在忍不住了，就破口骂了一句。

徐义德等了很久还不见有人来，他放下林宛芝，大声喝道：

“老王，老王！”

老王一头从大餐厅里钻了出来，弯着腰，问：

“老爷，有啥吩咐？”

“她们呢？”

“都请过了。”

“怎么没有来呢？”

“我再去叫……”

老王放开步子向楼梯上跑去，一眼看见她们三个人不声不响地站在楼梯口，他差点要笑出声来，幸亏拚命忍住，同时放慢了脚步。

大太太怕给老王发现，慌得想退回去。朱瑞芳却

蛮不在乎，暗中抓住大太太的手，一边很自然地答话，暗示老王不要响：

“老爷在啥地方？老王。”

“老爷在客厅里……”老王好像没有看见她们似的，说。

“哦，”朱瑞芳漫应了一声，说，“我来了。”

徐守仁第一个跳进客厅，好奇地站在爹身边，想知道叫他们究竟有啥事体。大太太坐在朱瑞芳对面的双人沙发里，看见朱瑞芳两只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林宛芝，仿佛要从林宛芝身上发现啥秘密似的。徐义德没注意这些事，他一门心思在想过“五反”关的经历，看她们都下来了，只是不见吴兰珍。他又向楼梯上看看，老王站在客厅门口，见老爷望楼梯，知道又在找人，便远远答道：

“都下来了。”

徐义穆的眼睛转过来看朱瑞芳，察觉朱瑞芳两只眼睛直瞄瞄地盯着林宛芝，而大太太的眼睛注视朱瑞芳的表情。他料想他回家以前她们之间又闹事了，但是他装做不知道，只问：

“吴兰珍呢？”

“今天也不是礼拜。”朱瑞芳冷冷地答了一句。

徐义德这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四，不是礼拜六，心里好笑自己，说：

“老王，派车去接她回来。”

“是。”

老王应了一声，还没有走出去，听见朱瑞芳的声音，他站了下来。朱瑞芳说：

“有啥急事要她回来？”

“当然有要紧的事。”

“现在‘五反’，你自己都不坐汽车了，派汽车去接她，好吗？”

徐义德听这话有理，顿时改口说：

“老王，你打电话要她马上回来。”

“是。”

徐义德唯恐她回来晚了，又对老王说：

“马上。”

“晓得了，老爷。”

徐义德坐在贴墙的长沙发上，面对着三位太太和心爱的儿子，把厂里“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番。他讲到后来，嘴都干了，一边喝茶，一边说。最后，他扬起眉毛，微微挺起胸脯，得意地说：

“我过了关啦，我过了关啦。”

太太太听了心上像是放下千斤的重担子，又轻松又高兴。她关怀地问：

“以后没事了吗？”

“当然没有了。”

徐义德说得非常有把握。朱瑞芳特别关心的是坦白交代的数字，她说：

“这笔款子可不少啊，政府里要还吗？”

“怎么会不还……”

“那，那……”朱瑞芳急得说不下去了，她像是看见无数的钱从家里流出去，很痛心，扞着自己的胸口，半晌，说，“那，那怎么行啊。”

“不行也得行。”

“这些钱给我多好哇！”守仁撇一撇嘴，惋惜地插上来说。

“你整天就晓得要钱，不好好用功念书。”

守仁给爹训了一句，心里笑爹老是拿他做出气筒，可是不敢说出来，但也不同意爹的训斥，大胆顶了一句：

“我今天也没向你借钱……”

“要也不给你，”徐义德瞪了守仁一眼，说，“大人讲话，小孩子少插嘴插舌的……”

朱瑞芳怕他再骂儿子，连忙打断他的话，问：

“还政府的都要现款吗？”

“我哪有这么多现款！”

“是呀，我们家里都空啦。”仿佛有政府工作同志在旁边，朱瑞芳有意哭穷；其实徐义德手里的现钱，

存在国外的不算，单在上海的就要比坦白交代的数字大的多。

“我早打定主意了，”徐义德想了想，说：“尽锅里煮。”

“这是个好办法。”

“反正厂里的资金我也不想提了，政府也别想从我家里拿到一块现钱。”

朱瑞芳“唔”了一声，表示完全同意他的好法子，同时也安心了：徐义德不拿现款出去。大太太还不放心，她说：

“就怕政府不答应……”

同时，她想起城隍庙的签十分灵验：暂屈必伸，只要能守正直，定可逢凶化吉。义德毕竟过了关，从此要走好运道了。她应该早点到城隍庙去还愿：捐助一千万装修佛像，点九十九天的油灯。

“不答应？”徐义德反问了一句，接着说，“不答应，我没现款，把我怎么办？”

吴兰珍从外边走了进来，见大家谈得正起劲，她便悄悄地站在那里没言声。徐义德抬头看见了她，欢喜地站了起来，迎上去说：

“你回来啦！”

“有啥要紧的事？”

“啥要紧的事，”徐义德有意说得很慢，“我过关

啦，你看要紧不要紧？”

“真的？”

徐义德又从头把厂里的“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的前后情形一一叙述给吴兰珍听，说得有声有色，一点也不感到疲乏。林宛芝听了第三遍，有点累了。徐义德每一句话，她都听熟了，甚至可以代替徐义德来坦白。为了不打断徐义德的兴头，她静静地出神地在听，好像是头一次听到一样的新奇和兴奋。

真正新奇和兴奋的是吴兰珍。自从上次回来以后，她知道姨父死不坦白交代问题，便一气不再到他家了。今天接到老王的电话，她本来也决定不来，但听说姨父有重要的事请她马上回去一趟，决心有点动摇了。她在女生宿舍的走道上踱来踱去，拿不定主意：已经和徐义德划清了界限，回去不好；如果姨父真有重要的事非她回去不可，不回去也不好。最后，她走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的宿舍里，向他汇报了思想情况。支部书记鼓励她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但主张她回去，如果有啥要紧的事，也好帮助帮助姨父。所以，她非常冷静，提高警惕，生怕讲错，或者做错。她仔细听徐义德讲下去，原来是叙述坦白交代的经过，她听出兴趣，眼睛里闪闪发光，注视客厅里每一个人的表情，大家脸上都有笑容，笑的最厉害的是姨父，那爽朗的笑声，几乎震动了客厅。

吴兰珍的脸上也露出笑纹，听到姨父把五毒不法行为都交代了，千言万语表达不出她心头无穷的喜悦，忍不住跑到姨父面前，亲热地叫了一声：

“姨父……”

徐义德想起上次不愉快的分手，仰起头来，“哼”了一声，说：

“现在认我这个姨父了……”

吴兰珍抓着姨父的手，说：

“你坦白交代了，我为啥不认你？”

大太太得意地望着吴兰珍，说：“这孩子，嘴利的，好好给你姨父说话……”

“唉，”徐义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总是你们年青人有理……”

他抓住姨侄女的手，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

59

徐义德接到通知，请他今天下午两点钟出席黄浦区的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心里按捺不住的高兴，盼望的立功机会，终于来到了。政府第一次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立一大功。但他

不知道为啥要请他参加黄浦区的检举大会。黄浦区的商业区，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哪能立功呢？如果是在长宁区纺织业，他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既然要他参加，大概总有道理。

他匆匆搭上公共汽车，向外滩方面赶去。今天的公共汽车特别慢，每站都有人上上下下，车子里挤得水泄不通。车子好容易开到南京东路江西路口，他从车子里挤了出来。穿过江西路，他慌忙赶到会场，已经是两点一刻了。走进会场，迎面碰上利华药房的伙计王祺，问他：

“你是沪江纱厂徐总经理吗？”

“是的。”

他奇怪地望了王祺一眼，这位青年并不相识，怎么会认识他呢？王祺说：

“请你跟我来……”

徐义德跟他从人丛中穿过，引到第一排那边，站下来，指着留下的唯一的空位子说：

“坐吧。”

徐义德坐下去，抬头一看：利华药房柳惠光正在上面坦白交代他的五毒不法行为，大会早已开始了。他回过头去一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他怪公共汽车开得太慢，使自己第一次立功就迟到，真叫人难为情。他听到柳惠光在台上交代，利华药房的业务情况

他一点也不了解，待一会哪能帮助柳惠光呢？不帮助，政府别疑心他有保留，以为他连帮助别人也是扭扭捏捏的，岂不是冤枉？柳惠光这个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在星二聚餐会里从来不大谈论，不然他还可以从星二聚餐会这方面帮助帮助柳惠光。他正在焦急，忽然有人碰碰他的肩膀。他歪过头一看：原来是马慕韩。徐义德惊奇地问道：

“你也来了？”

“我代表工商联出席。”马慕韩低声地说，“听说你过关了，德公，恭喜恭喜！”

“谢谢你的启发……”

“主要是你的觉悟……”

“你给我指出了路子，这关可真……”徐义德见前后左右一些人都不大认识，就没有说下去。

马慕韩知道他要说什么，也觉得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指着台上说：

“想不到柳惠光也有问题！”

“是呀！”

柳惠光在台上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除了坦白交代我的问题以外，最近还检举了别人二十三件罪行。今天，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保证……今后绝不再犯，要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做一个守法的工商业者……”

他讲完了，场中有许多人高呼：

“不法工商业者，只有彻底坦白，才有出路！”

许许多多的职工纷纷走到台前，要求检举、控诉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朱延年。主席黄仲林见大家都拥到台前，不好一齐上台同时检举、控诉。他请大家排好队，依次序一个个上去。站在台前的人马上自动排了队，一个接着一个，一条长龙似的，一直排到会场进门那边。徐义德想站起来去排队，怕轮到他发言，没有想好词；不排队哩，又怕别人有意见。他见马慕韩坐在第一排不动，他想先让别人检举，领领行情再说。头一个上台检举的是童进。

黄仲林对朱延年再三劝说，结果都是白费口舌。别的厂店经理老板是挤牙膏，挤一点，坦白一点；朱延年这瓶牙膏却怎么也挤不出来，好像是封住了口。昨天晚上黄仲林和童进又找他谈了一次话，他坚决否认自己有五毒不法行为，即使有人证物证，他也赖得干干净净，板着面孔，硬是一丝一毫也不承认，反而说这是别人有意报复，企图陷害他这个忠诚老实的商人。

黄仲林把这些情况向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汇报，区上决定请他们来参加今天的大会。童进见柳惠光坦白了以后，朱延年毫无动静，他忍不住抢到前面去了。

童进走到台上，喘了一口气，大声叫了一声“同志们”，就激动得讲不下去了。他肚里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不知道从啥地方说起。他和叶积善曾经在这个礼堂里听过青年团的团课，区里团工委书记孙澜涛在上面做报告，好像长江大河一样，一张开口就滔滔不绝。他站在台上，足足有两分钟，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额角上不断渗透出黄豆大的汗珠来。他想不到为啥忽然讲不出话来了。台下静悄悄地等待他控诉。

黄仲林走过来看看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站在台前没说话已经好久了。无论如何得开一个头，他先报告自己的身份，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我要控诉福佑药房不法资本家朱延年的罪行：他一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骗人钱财。上海解放以后，他仍然作恶多端。”说到这里，心里稍为平静一些，许多事慢慢回想起来，而且记得非常清晰。他生怕会场上有人听不见他的话，对着扩音机，提高了嗓子，说：“他腐蚀干部，自命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许许多多的政府机关的干部被他腐蚀了。从账面上看，单是行贿干部的交际费就有一亿二千万元。他制造假药出卖，危害人民。有的人吃了朱延年的假药死了，还以为这是自己的命运不好，哪里晓得是被黑心肝朱延年害死的。今天我要把毒死他们的凶手罪行检举出来……”

坐在会场里黑压压的人群，静悄悄地在听童进的控诉。听到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有些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但还压抑着心头的愤怒，耐心地听下去；一听到朱延年制造假药害人，有的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像是平静的水面忽然来了一阵巨风，卷起一个一个浪头似的，站了起来，举着手要求发言。黄仲林站起来，向台下按一按手，希望大家先听完童进的控诉，然后再发言。站起来的人生气地坐下去，连椅子也仿佛不满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徐义德不认识童进，一听他提“朱延年”三个字，徐义德心弦拉紧了。朱延年犯了这么大的罪，他还蒙在鼓里哩。看上去，今天要帮助朱延年了，他怎么开口呢？朱延年就是朱瑞芳的亲弟弟呀，姊夫怎么好检举小舅子呢？他要是检举了朱延年，他回到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啊？朱瑞芳追问起来，哪能回答呢！对柳惠光他可以推托不了解，或者拉扯一些星二聚餐会的事也可以混过去。对朱延年就不能说不了解啦，当场一言不发也说不过去，别说台上那位主席，就是坐在他旁边的马慕韩也不会放过他，至亲郎舅，能够一点不知道吗？还是想保护过关呢？徐义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狼狈的局面，他不知道怎样应付才好。

童进在台上越讲声音越高：

“最可恨的是朱延年扣发志愿军医药器材，到今

天为止，还有一亿三千万元的货没有发。一亿三千万呀，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可以买很多药，能够医治很多伤病号。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抗美援朝，流血牺牲，多么需要医药器材呀！可是朱延年怎么说？你们听：他说不发货不要紧，也许部队给美国军队打死了，发货去也没人收。这是啥闲话？！已经发的货，也有许多是过期失效的，别的不提，单讲盘尼西林一种药吧，当时志愿军因为缺乏药品，许多患骨髓炎的伤员，都需要盘尼西林治疗。哪里晓得朱延年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把过期失效的盘尼西林卖给志愿军。伤员注射了以后，不仅没有一点效果，反而热度增高，增加痛苦。大家晓得，”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志愿军王士深在福佑药房讲的无名英雄炸毁坦克的英勇故事。这故事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仿佛他亲自在前线看到似的，永远也忘记不了。他说，“大家晓得，志愿军用生命来保卫我们。我们应该爱护志愿军，应该拿最好的药品给志愿军，可是朱延年这个坏家伙呀，却把过期失效的药品卖给志愿军，暗害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你们说，朱延年有心肝吗？”

“没有！”全场高呼。

“朱延年是人吗？”

“不是！”

“要不要惩办朱延年？”

“要！”台下的人异口同声喝道。

童进说到这里，干脆撇开扩音机，站在台口，伸出拳头，高声喊叫：“我们要求政府逮捕严办奸商朱延年！”

这时，会场再也平静不下去了，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汹涌地向台上冲击。黄仲林看群众情绪这样激动，便走到台前，大声问道：“同志们有啥意见？”

台下的人一致回答：“要求政府逮捕严办朱延年……”

接着你叫一声，他喊一声，只听见轰轰的巨响，大家的声音混在一块，分辨不出谁说的了。黄仲林举起手来，台下的声音慢慢低下去。他说：“大家有意见，请到台上来说。”

马慕韩坐在第一排，脸上气得发红。他原来只知道朱延年在同业当中信用不好，投机倒把，没想到他做了这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特别是对待志愿军，只要有一点点国家观念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他听了，心头非常气愤，朱延年玷污了上海工商界的名声，连他脸上也没有光采。他坐不住，仿佛凳子上有针，刺得很。他想离开这个沸腾了的会场，可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又叫他留下。正在他坐不是走不是的难熬的时刻，听到黄仲林的声音，好像

是对他说的。他认为他这个代表应该上台去表明态度。他还没站起来，已经有人在台上讲开了。等三四个职工讲了之后，他怕再失去机会，立刻跳到台上去，事先没有时间想好词，一时竟在台上说不出话来。台上台下的人都静下来，等他发言。他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人群的眼光都朝他身上望，努力定了定神，喘了一口气，说：

“我很惭愧，……我们工商界出了这样的败类，居然暗害我们的志愿军，这是国法人情所不允许的。我……我完全拥护大家的意见，要求人民政府逮捕工商界的败类朱延年，严加法办，越严厉越好。……”他讲完了，回到原来的座位，轻轻碰徐义德。徐义德纹风不动，他便低低对徐义德说：

“老兄，朱延年是你的小舅子，你不上去讲几句吗？”

徐义德表面还保持镇静，可是心里直跳，胸口一起一伏。马慕韩点了他，他非上台不可了。他也顾不得回家的日子了，得把眼前的事打发掉，不然，哪能走出会场，想不到轮到他帮助别人也这么困难。他想起朱延年欠他的债，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借给他三百万现款和在信通银行开的透支户头，更叫他伤心。三百万现款当然又扔到水里去了，现在得给他还透支款子。他恨透了朱延年。马慕韩在身旁给他一提，

更是气上加气，火上加油。他霍地站了起来，匆匆走到台上，激昂慷慨地说：

“我听了童进先生的控诉，心里非常愤怒。朱延年一贯为非作歹，童进先生说的完全是事实。上海解放以前，他做的坏事更多，别的不说，单是骗取我的钱财就数不清。凡是和他有点往来的人，没有不吃他的亏的。他在工商界名气很臭，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往来。他谋财害命，罪恶滔天，是自绝于政府和人民。我也要求政府逮捕法办这个败类……”

徐义德最后一句话是用叫口号的语调喊出来的。他说完了又有几位职工代表上台发言，大家都提出同样的要求。

黄仲林要人打电话向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请示，立刻得到了答复。他走到台前，全场顿时静下来，鸦雀无声，凝神地听他说：

“同志们，我代表区人民政府接受大家的要求，把大奸商朱延年当场逮捕，依法严办……”

他说到这儿，马上给欢腾的掌声打断了。

执法员立刻走到右边第三排第四个座位上，把朱延年拉起来。朱延年最初参加这个大会，心里相当镇静。柳惠光在台上坦白交代，他心里笑他是个阿木林。童进上去控诉时，他的心像是被犀利的刀子在一块块割裂开来，恨不能上台咬童进几口。他认为把童

进这青年留在福佑药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有童进，福佑的底盘不会完全揭开的。他一听到黄仲林宣布当场逮捕，面色如土，头无力地垂了下来。执法人员拉他，他心一横，蛮不在乎地站起来，心里说：“逮捕吧，逮捕了我的身子，逮捕不了我的心！”他心里虽这么想，可是他的两条腿发软，已走不动了。两个执法人员架着他，慢慢向外边走去。

（第二部完）

1956年9月3日初稿，上海。

1962年4月12日改稿，厦门，鼓浪屿。